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五)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Астахова М. С., Горская Г. В., Данилов В.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王一禾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马杰 责任校对:张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臧乐安 译
王钢华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879-4

I. 新… II. ①雅… ②臧… ③王…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377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臧乐安 译 王钢华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50.75

字数:914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06879-4 定价:11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879-4



9 787040 068794 >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臧乐安 译 王钢华 校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人民出版社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宁	郁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葵	黄书元	鲁桓	戴秉国
魏华	臧乐安				

序

1929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政治上摧毁了A. И. 李可夫、H. И. 布哈林、M. П. 托姆斯基集团及其支持者(有关材料发表在本书的上一卷,第四卷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对政治局中斯大林多数派的束缚,使其得以放手施展。在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五年计划的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1.8倍,而第一部类增加2.3倍¹。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1929年6月至11月期间,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大大提高了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其中包括森林工业、有色冶金、机器制造、黑色冶金、化学工业,等等。除了4月通过的五年计划规定建设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之外,又规定在1931—1932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和哈尔科夫再建成两个新的拖拉机厂。车里雅宾斯克厂的年产量为4万台,它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拖拉机的企业。1932—1933年拖拉机生产计划被扩大到20.6万台,而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批准的五年计划方案则规定为5.5万台。生铁和钢的生产任务在1929年4月至12月间较五年计划增加了40%以上²。全国都广泛地宣传“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

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绝对优先方向,而这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这里说的不仅是要用出口谷物从西方购进工业设备,而且也包括要保证日益扩大的工业工人大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

农村中“紧急”收购粮食的新浪潮把1929年最初几个月的第一次浪潮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对“右倾分子”政治清算之前,中央有关机关的指示和通令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同经常提醒要遵守“革命法制”,对贫农和中农阶层“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联系在一起

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早在3月末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就已经开始试行粮食收购的新办法,这种新办法又恢复了向农村以及农户摊派“硬性的计划任务”。

5月初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5、6、7月,也就是说在新的收成之前,收购5500万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的决议,“作为必须完成的最低任务”³。早在劳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之前,А. И. 米高扬就通过直线电话通知地方:第一,提前通报说,5月7日他将下达每个区的任务;第二,指示要立即采取“在把计划任务通知到村并动员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基础上完成粮食收购的办法”。详细说明了应该如何行动:自上而下地下达“每个(!)村任务的准确份额”(如同战争年代实行的余粮征集制做法一样);“在村民大会通过……每村的粮食收购计划”之后由这个村民大会选举的贫农和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而且“首先要从所有的农民中挑出上层富农,给他们规定交售一定数量粮食的义务以完成全村的计划。粮食的余额部分再在其他农民中分配”。没有完成应交售义务的农户“应该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⁴。从与这个指示有关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地方上马上就规定了“不经法庭审理,而用行政手段处以罚款的办法”,在拒绝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处以五倍的罚款”。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专门决议,认为“规定把粮食收购计划任务分配到每个村镇的办法是适宜的”,并批准了政治局一个委员会制定的具体决定,就在同一天,这些决定被列入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扩大地方苏维埃权限以促进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和计划”的决议之中。从这一刻起用行政办法处以罚款,以及罚款数额“为规定的赋役或任务”五倍的规定就成了法律。而且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⁵。

采用新的镇压手段的做法,在农民中被称为“加倍惩罚”,开创了一个由使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107条起始的剥夺富农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消灭被列为富农的农户具有了公开的、彻底的性质;因为在一次性任务对他们已经是不胜负荷的情况下,哪一个农户能经得起没收五倍的财产呢。剥夺富农历史中的下一步——过渡到没有任何原因和理由地消灭被划定为富农的农户,这一步很快就在1930年1、2月份到来了。

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是同时进行的,到1929年五六月间已经成了对农民实行国家暴力的主要方向。没收粮食储备往往也没收生产工具,过去曾经被认为

是地方当局的“过火行为和歪曲”，从实行“加倍惩罚”开始则成了行为准则，甚至是官方政策所直接要求的。当抱怨浪潮达到了不能不引起注意的规模时，政治局在1929年11月5日，也就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前夕，通过的《关于粮食收购的进程的决定》中委托卡冈诺维奇和瑟尔佐夫“起草就个别具体事件给个别地区的信件草案”，并且没有指定上呈信件草案的期限⁶，而当时在（对斯大林领导层）重要的情况下，规定的期限有时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的。

从1929年收成中收购粮食计划期限的缩短，在极大程度上加剧了对农民粗暴施加压力和扩大镇压措施的局势。最初向地方组织提出的要求是在1月份“保证完成全部计划”（个别情况下可以延迟到2月底），可是到了10月底由斯大林签署的中央特别指示指定了更短更准确的期限——1929年12月1日⁷。为此目的，从州和边疆区一级“负责工作人员”中派出的和一部分直接从中央机构派出的粮食收购特派员数量迅速增加。这些特派员，第一，为人们作出了指挥镇压行动的榜样；第二，领导地方组织和工作人员执行联共（布）中央和政治局下达的一个接一个的指示（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如8月15日和29日的指示，9月5日、13日和20日的指示，以及10月3日一天就下达的两个指示⁸。

让我们来看一看政治局这些决定中的第一个决定——8月15日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确定了总的原则，而且确定了所有后续指示的基调，从而也就确定了党和国家组织系统在农村的活动。这个决定不单单是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事实上决定是他亲自写成的，这一点可由1929年8月10日他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件来证明。这封信提出的基本要求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写进了决定的文字之中。“[……]如果我们真的想在一二月间结束收购，从而成为这次运动的胜利者”，——斯大林写道——那么就应该“立即给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达指示，要他们立即对城市中（同城市有联系的）的粮食投机商采取镇压措施（即逮捕他们并把他们押送出产粮地区），以便使粮食持有者现在就感觉到[……]，粮食只能规规矩矩地（而且是无损地）交售给国家和合作社机构”。“所有被查明与粮食收购人员竞争的”和“扣留余粮或把余粮卖给商人的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建议“立即解除其职务，并以欺骗国家和破坏罪交付法庭审判”⁹。自1929年秋天起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开始在农村粮食收购的行动中起主导的作用。

国家暴力不可能不引起农民的反抗。有关1928—1929年农民的具体反抗行动的文件表明，农民的行动主要表现为抗议和对国家及其具体执行者的暴力进行自卫。尽管如此，政治局1929年10月3日通过了一个给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和各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专门指示。这个指示命令“采取坚决的迅速的镇压措施,直至枪决,以反对组织袭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的恐怖活动和其他反革命行动的富农[……]”,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如果要求特别迅速[……]可以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实施”,也就是说可以不经法庭的审判¹⁰。而以前通过的指示也保证了1929年秋天可以“对富农迅速采取镇压措施,直至枪决”。正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政治局准备的资料所说,到10月4日,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已经有“7 817人遭到镇压”,其中“富农约占百分之六十”¹¹。到11月4日被镇压的人数达到了28 344人,其中犯“经济罪”的15 536人,犯“反革命罪”的12 808人¹²。“加倍惩罚”和对“硬性任务者”——指那些接到提高了的交售粮食任务的人的惩治并不要求特别快地予以实行。1929年10月3日的指示的目标是农村即将面临的未来——“全盘集体化和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但是,新经济政策那时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早在十一月全会之前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就已经完全被抛弃了。

在苏联的历史文献中1928—1929年是作为“直接准备集体化的时期”而被突出出来的。对这一时期人们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因为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文件看,似乎“过火行为和歪曲”还未具有直接的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性质。虽然1928年春天曾试图加速组织集体农庄,但其结果在当时的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是受到批评的。可是党和国家机关日益卷入了强迫加速集体化的进程,不管当时技术和农艺发展的可能性如何,而主要的是——不管农民自己是否愿意联合到集体经济之中。

农村改革的最初计划设想不是很大的。1928年春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为俄罗斯联邦制订的计划草案预期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仅吸收110万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事实上1929年秋天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国家花费的资金在10亿卢布以上。就在1928年这一年的6月已经在谈论在俄罗斯联邦的范围内将有大约300万农户参加集体农庄。

但是就在这些计划批准之后,立即就开始修改,加快了集体化的期限。1929年6月25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合作社集体农庄运动领导机构在10月10日前“制订出保证在五年计划期间有85%以上的农户参加生产合作,以及把初级生产合作组织改造成大型集体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计划”。这样五年计划的生产合作化的任务就翻了一番。捉摸到中央情绪的地方领导人也开始重新修改集体化计划。与

此同时,1929年夏初也大致确定了解决富农命运的办法。7月18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工作的决议,决议写道:“中央赞同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关于吸收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是不合适的决定,以及必须系统进行工作以便把企图从内部腐蚀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清除出集体农庄。”¹³这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富农问题”,因为如何处理富农本人和他们的产业还不清楚。但是禁止吸收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几百万农民被送进“劳改营”的命运。

1929年夏秋的粮食收购和推行集体农庄工作之所以进行得特别残酷无情,不仅仅是由于有经济上的需要,并且也有它的政治上的原因。对斯大林来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证明所选定的方针是有效的,是能够扭转农村形势的。与此相反,困难的加剧会增加“右倾分子”的机会,会使斯大林多数派的领导成了问题。但是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并不仅仅寄希望于粮食收购的顺利进行(当时粮食收购的前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右倾分子”的特别措施。由于在党的机构中拥有绝对多数,斯大林集团从1929年5月起开始清党,在清党过程中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支持者纷纷从联共(布)组织中被驱逐了出去。在垄断了所有的舆论宣传工具之后,斯大林分子组织了反对“右倾”的群众性宣传运动。主要目标是“右倾分子”的首领——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他们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还保持着一定的阵地,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威望。

尽管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被从自己的岗位上撤了下来并被任命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担任次要的职务(相应地担任科技管理局局长和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主席),他们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此外,李可夫还占有最高国家岗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暂时还没有掌握在一段时间之后所掌握的全部权力,因而不得不相当小心地采取行动,准备逐步地把“右倾分子”清除出政治局,分几个阶段实行其清除计划。1929年11月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年7月——托姆斯基,一直到1930年12月——李可夫。每“清除”一个人,都事先发动严厉的批评运动和制造一些挑衅事件。

1929年斯大林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布哈林。这一次批评布哈林的借口是他在全苏无神论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¹⁴和他发表的一篇大文章《“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¹⁵。1929年7月8日政治局就此通过了下述决定:

“(1)认为布哈林同志在反宗教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撰写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文章是继续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反对党及其中央的斗争。

(2)建议《真理报》及其他党的机关报编辑部为执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最近一次联席全会的决议今后不得发表这一类文章和讲话”¹⁶。

1929年7月19日受斯大林的委托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散发了某个名叫Г.普拉托诺夫的共青团员的信件,布哈林在捷别尔达休息时曾经同他见过面并谈过话。后来布哈林自己曾坚决地说过,普拉托诺夫在这些信中“以歪曲的形式”叙述了他同布哈林有关党领导层内的斗争的谈话内容。这就使斯大林多数派得以发表声明说,布哈林“继续采取他近来选择的同党及其中央斗争的办法,对中央的决议在‘私人’谈话中从旁进行攻击;以前是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现在是同共青团员普拉托诺夫同志以及其他人的‘谈话’”¹⁷。

根据许多迹象判断,普拉托诺夫拜访布哈林以及后来的信件是专门组织的挑拨行为。布哈林自己在这件事情里,正像以前同Л.Б.加米涅夫见面时一样,表现了自己不好的品质的一面。布哈林这一新的政治上的失误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沮丧。7月19日,也就是分发普拉托诺夫信件的那一天,托姆斯基写信给李可夫说:“在读了共青团员[……]给捷别尔达的智者的复信之后,感到‘愉快的’震惊!为什么叶菲姆卡(托姆斯基指的是布哈林的秘书叶·蔡特林。——编者注)不好好地看住他!这给我们的观众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印象。”¹⁸

但是在政治上破坏“右倾分子”信誉中占关键位置的是所谓的“工业学院事件”,或“沃罗比约夫事件”。

1929年9月19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学院党支部听取了支部委员В.И.沃罗比约夫的报告。1928—1929年沃罗比约夫相当积极地同“右倾分子”保持接触,常去“右倾分子”领导人之一的莫斯科党组织书记H.A.乌格拉诺夫家里,等等。但是他后来倒向了斯大林一边。沃罗比约夫报告了“右倾分子”在莫斯科组织里的“派别活动”,以及乌格拉诺夫和布哈林及其周围的人在他們同斯大林发生尖锐冲突期间的情绪和言论。沃罗比约夫的供词由工业学院党支部会议作了详细的速记记录,并把速记记录交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见补充材料4)。

对斯大林来说,“工业学院事件”的价值在于,这件事使他说“右倾分子”已经转向采取派别活动和非法斗争的方式,在自己的支持者中组织地下支部。这一次上演的仍然是1927年末对付左倾反对派(在他们被赶出党之前)的那个剧本,虽然其规模有所不同。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了一个自己的侦探,后来他又被宣布是“弗兰格尔白匪军官”,打进了反对派的一个组织,然后在他的帮助下捏造了一起关于反对派准备武装暴动的事件¹⁹。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关

于“工业学院事件”挑拨性质的说法。虽然政治局通过了决议要把从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得到的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²⁰，但是后来并没有发现审理“沃罗比约夫事件”的材料。而这个人后来的命运也是相当平安顺利的²¹。

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我读了工业学院支部的速记记录。看来得把问题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来。应该想到，布哈林将被从政治局开除出去。”²²虽然关于“工业学院事件”问题在十一月全会上并没有专门讨论，这一点可以从本卷所发表的速记记录中看出，但“沃罗比约夫事件”还是作为对“右倾分子”的指控之一提了出来，这也是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的一个理由。

上面所援引的斯大林的意见证明，关于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早在例行的中央全会之前就已经事先决定了。根据某些材料判断，斯大林在为对 A. И. 李可夫作同样处理准备基础。斯大林选择了李可夫在莫斯科州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对他发动攻击的借口²³。就语调和内容而言这是仍然掌握着全部权力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讲话。对李可夫的讲话，据《真理报》报道，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斯大林对这篇讲话的发表反应非常强烈。1929年9月30日他从南方写信给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你们读过李可夫的讲话吗？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党的苏维埃官僚的讲话，装出一副‘忠诚’、‘同情’苏维埃的调子。没有一句话谈到党！没有一句话谈到右倾！[……]你们怎么能忍受（也就是说——包庇）这种政治伪善？[……]是不是应该使李可夫面临一种选择：或者公开地诚实地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或者剥夺他以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讲话的权利。”利用这次机会，斯大林要求剥夺李可夫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权利（这是从列宁开始的党的传统——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我得悉，每星期一和星期四李可夫继续在你们那里主持会议。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们让这样的喜剧上演呢？谁，为什么需要它呢？就不能结束这样的喜剧吗？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吗？”²⁴

莫洛托夫在复信中报告说，由于工作繁忙还没有来得及阅读李可夫的报告，并表示完全愿意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你的所有建议来得并不太迟并且应该予以实施”；“你可以相信，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放过李（可夫）和布（哈林）。不管他们使用什么孟什维克的欺诈手段，也不管他们在党的工作的某些方面的反党怠工，我们都会执行自己既定的一切”。²⁵

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谴责李可夫在自己的发言中回避了“同右倾倾向作斗争”的问题²⁶。这个决议没有涉及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问题，但是，根据所有的情况判断，这个问题已经在“工作程序”中得到了解决。斯大林对战友们的

行动感到满意,并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0月7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在建议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之后,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读过了政治局关于李可夫的决议。决议很正确!它,这个决议,当然也使我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关于这一点,等我回来后再谈。”²⁷斯大林对李可夫要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暂时还不清楚。不能排除早在1929年他已经考虑了把李可夫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并把他从政治局开除出去的可能性。

在准备联共(布)中央例行全会期间同李可夫发生的新的冲突,以及李可夫被排除在全会报告人之外,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作为政府首脑李可夫本来应该同国家计委主席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B. B. 古比雪夫一起就全会日程的第一个问题,即主要问题——关于1929—1930经济年度的控制数字作报告。1929年10月19日晚政治局收到了李可夫的报告提纲(实际上也就是全会的决议草案)。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保存有一份这个报告提纲,上面有斯大林的批注。根据文中批注的意见,以及在最后一页背面所写的几句话的片断可以判断,斯大林不满意提纲中没有提到粮食收购的成绩,没有提到农村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个别工业部门的强劲的增长。“[……]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已经被超过,已经变成了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最低方案”;“检查右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行动纲领 = 完全失败”,——斯大林写道。²⁸

毫不奇怪的是,10月20日在讨论李可夫的提纲时,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要在提纲里增加关于“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和谴责“右倾倾向”和“调和主义”等政治提法。李可夫拒绝修改文件,也就被剥夺了在全会上作报告的权利²⁹。

尽管斯大林很明显地希望摆脱李可夫,但仍然不得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容忍他留在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直到1930年12月。关于斯大林虽然坚决地,但又不能不谨慎小心地逐步实现他把“右倾分子”开除出政治局的原因,十一月全会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可以给我们一些概念。

关于控制数字的报告结束之后,在辩论中第一个发言的全乌克兰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Г. И. 彼得罗夫斯基在谈到“右倾”时所用的语调,与其说是谴责的还不如说是调和的。他说:“我不再像当年那样是一个‘死抱住法规不放’的人,那时我们是同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同新的反对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斗争,以密集的队形相互对垒,战斗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现在我们同右倾斗争则是另一回事,右倾对党内和党外都是危险的。事实上右倾的力量是微弱的。布哈林同志现在在座,我们应该公开地讲,

布哈林同志应该承认犯了右倾错误。他犯了很多错误,他推行了一条把我们的青年教授们引入歧途的路线,使父子两代不和(笑声。)”等等。(我们在括号中指出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的儿子 П. Г. 彼得罗夫斯基积极支持“右倾分子”,几年之后被镇压,死在监狱之中。)虽然随后的几位发言人使形势有所改变,他们不仅严厉地谴责了“右倾分子”,而且也批评了彼得罗夫斯基的软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看来,有某种根据可以期望从部分中央委员那里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拒绝悔过,并在 11 月 12 日晚上发表相当尖锐的声明,拒绝对他们右倾的指责,更不用说有什么反党的倾向,确认同斯大林多数派在有关工农业发展有脱节的危险,以及把采取“非常措施作为一项长期制度”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乌格拉诺夫的态度也引人注目,不顾别人的呼吁,他也没有在全会上匆忙地表示悔过。

一切迹象表明,斯大林也感到了部分中央委员一定程度的克制态度。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之后——他在发言中尖锐地谴责了“三人集团”的新的声明,斯大林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谢尔戈!发言很好。这里的某些(许多)同志和你的想法一样,但不急于发言,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反对再‘稍稍地’躲一躲,害怕率先发言。你的发言的价值正在于此,它鼓舞了同志们,并给了他们所缺乏的勇气。这很好。科巴。”³⁰

事实也是如此,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之后,反对“右倾分子”的发言越来越激烈。可以不用怀疑的是,使“不急于发言的同志”受到鼓舞的不仅是奥尔忠尼启则,而且还有在全会幕后所做的积极的说服工作。这种说服工作有机会取得完全成功,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是作为胜利者来参加全会的。他们在党的机构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得以孤立政治局委员中的三人集团及其支持者。

十一月全会前夕,在《真理报》1929 年 11 月 7 日发表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周年的文章里,斯大林宣布即将过去的 1929 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坚决进攻”的一年,并号召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文章的基础是下列数字:1928—1929 经济年度对大工业的基建投资为 16 亿卢布(其中 13 亿是对重工业的投资);1929—1930 年度这方面的投资准备增加到 34 亿(其中 25 亿投向重工业);大工业的总产值相应地增加了 23% 和 32%,而重工业则增加了 30% 和 46%。国营农场生产的商品粮在 1928 年达到 3 600 万普特,集体农庄——2 000 万普特;1929 年这些指标已增加到 4 700 万和 7 800 万,而到 1930 年应该达到 1.1 亿和 3 亿普特,这就意味着,斯大林强调说,1930 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商品粮将占整个农业商品粮的

50%以上。

这些数字是把想达到的冒充为事实上已达到的。文章中关于中农开始参加集体农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开始的主要论点完全不符合现实。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到1929年10月1日只有7.6%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³¹。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支持者在全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教学参考书，“总路线”的拥护者都从这本教学参考书中寻找论据。

斯大林的文章决定了Г. Н. 卡明斯基《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的内容，就更不用说莫洛托夫1929年11月14—15日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上的发言了。莫洛托夫声称，1930年夏天“北高加索将实现集体化，而且不只是这一个州”，而是“我国的主要地区”；成功的粮食收购使我们得以建立“粮食储备”（“9.9亿普特的紧急备用粮”，也就是说超过一年所必需的粮食用量！）；1930年春天“从组织方面我们将有一个对农业和对集体化特别有利的时期，这样的时期过去是不可能有的”。他以令人惊奇的激情高喊：“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投入播种运动，只有鬼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³²这句话在我们发表的正式速记记录中被删掉了。但这句话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大转变”的形势。大家知道，1930年春天党的“全部力量”不是被投入播种运动，而是被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和纠正“过火行为”。

全会上大多数发言都具有类似的激情——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必须更加扩大这些成就，执行既定的方针！关于日益增加的问题、矛盾和现行政策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发言中只是一带而过，似乎这只是暂时的，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困难。例如，由于急剧增加投资而在工业中收到的暂时效果，完全没有根据地被看成是长远的和经常的倾向。斯大林的支持者们常常引用的关于1928—1929经济年度工业产品增长的官方数字，大大地粉饰了现实状况，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比如，产品的质量大为下降了。斯大林初步提出，而后由十一月全会批准的1930年的不切实际的工业生产计划甚至就连形式上的百分比指标也没有达到。过度的疯狂的扩大基建工作战线，以及同这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投资效果的下降到1930年夏天已经使工业陷入了危机，这个危机在随后的一个时期里急剧加深，一直到放弃工业跃进的政策³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实施的斯大林式的工业化实际上造成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

这在更大的程度上涉及农村的形势，全会决议对农村形势的总的估计也是根据斯大林文章的精神作出的：“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向一些州提出了全盘集体

化的任务”。某些全会参加者所作的为数不多和不彻底的关于集体化的技术基础和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关于以行政手段强行建立集体农庄,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大规模屠宰牲畜的发言被淹没在总的乐观主义的合唱声中,引起的只能是愤怒。例如,C. B. 柯秀尔曾说道,在乌克兰犯了“数十次过火行为”：“我们有过几件事,整个整个村庄刚转成集体农庄,而后它们很快就垮台了,我们被打着鼓从那里赶了出来。我们在几十个村庄的土地上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而后来发现,这一切全是吹出来的,虚构出来的,居民没有参与此事,什么都不知道。”在С. И. 瑟尔佐夫发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插曲,当时他还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但很快就成了反对派)。瑟尔佐夫举了一些地方上的例子,特别是霍皮奥尔区——第一个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区的例子：“地方各个机关实行的是一套搞突击和搞运动的办法。全部组建集体农庄的工作都是在‘看谁建得多’的口号下进行的。地区的指示在地方上有时竟变成了‘谁不参加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没有进行广泛的群众工作。有这样的情况,村民集会通过决定建立集体农庄,却要求不愿参加的人上交一份专门的声明,说明为什么不愿意参加。也有慷慨许诺给拖拉机和贷款的情况。‘什么都会给的——来参加集体农庄吧’[……]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使集体化的程度,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69%^①,可能在我写信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0%。”瑟尔佐夫的发言被斯大林的插话：“您以为,一切都是可以‘预先组织’的吗?”打断了。

这一句意义重大的话结束了过去的时代,并标志着新方针的开始。而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带有市场关系的自发倾向,要求对合作化的发展作出“预先组织”,要求在农民从细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巨大的集体经济的道路上建造一整套的过渡阶梯。而有指挥的镇压体系的行动,即使它们能够直接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是不需要“预先组织”的。十一月中央全会正是按这样的原则通过决议的,这次全会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里是可以在历史上最短的期限内完成的”。对工业部门跳跃式的增加投资和在农村强制推行集体农庄,这些在全会前已经开始的做法,获得了政治上的依据,并以新的力量继续执行下去。

十一月全会关于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和严厉警告李可夫及其他“没有同右倾分子划清界限,没有摒弃对右倾分子调和态度”的人的决议表明,“右倾分

^① 原文如此,但发言中说的是60%。——译者注

的可能性。而且中央机关编者所作为数不多的文字上的修改很容易在注释中说明。

发言者本人对最初的速记记录的修改非常之大,以至完全翻印它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的是同时发表两种文本。但是,由于发言者本人的修改主要是修辞和语法性质的,完全考虑这种修改也没有必要。与此同时,意思上的修改——补写的文字或有重要意义的段落的删除——都作了充分说明。新加进去的文字画了着重符号,删除的片断恢复在方括号之内。

编者认为,经过这一番工作能够再现与所有三种文本几乎相同的速记记录。

本书是根据《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 1990)的要求出版的。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特点的同时,编者对明显的印刷错误,以及对文本的某些地方根据现代正字法作了修改,这些修改未加说明。为恢复含义所必须加的编者插入语用角形括号标示。

本卷的参考附录有:序,序对全会前的事态和全会工作的进程作了总的评价;发言中提到的具体事实的注释;人物简介、人名索引、缩略词表^①。

除了全会速记报告本身的附件之外,书中还收入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其他全宗里的与全会同时产生的有关文件,它们发表在《补充材料》栏目里。除了斯大林讲话未经修改的原始记录(这个讲话记录被从全会材料中取出,存入了斯大林的私人档案)之外,本书还发表了“工业学院事件”,“加米涅夫事件”的材料,以及某些其他文件。

В. П. 丹尼洛夫 Г. В. 戈尔斯卡雅 О. В. 赫列夫纽克

^① 中译本略人名索引和缩略词表。——译者注

注 释

- 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莫斯科,1984年,第9版,第450页。
- 2 详见:戴维斯,R. W.:《苏联经济在困难之中(1929—1930)》,贝辛斯托克和伦敦,1989年,第187—194页。
- 3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1927—1939年文件和资料)》5卷本,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第614—615页。
- 4 同上,第612—614页。
- 5 同上,第659—660页。
- 6 同上,第744页。
- 7 同上,第677—679、737页。
- 8 同上,第679、691—693、695—699、173、714页。
- 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0年)》,文件集,莫斯科,1995年,第141—143页。
- 10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714页。
- 11 同上,第732页。
- 12 同上,第742页。
- 1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31张。
- 14 《真理报》,1929年6月12日。
- 15 《真理报》,1929年6月30日。
- 1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8号案卷,第5张。
- 17 同上,753号案卷,第7—8张。
- 18 《苏联领导人通信集(1928—1941年)》,莫斯科,1999年,第85页。
- 19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通信集(1912—1927年)》,莫斯科,1996年,第185、347—348页。
- 2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6张。
- 21 1930年从工业学院毕业之后沃罗比约夫在经济领导岗位上工作(工业项目的建设局局长、副局长、厂长)。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做党的工作。自1977年起为全苏个人养老金领取者。1982年去世(材料摘自党内登记文件)。
- 22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第168页。
- 23 《真理报》,1929年9月28日。
- 24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第166页。
- 2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68号案卷,第91、92张。
- 26 同上,17号全宗,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6张。

-
- 27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第 168 页。
 - 2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 号全宗，11 号目录，798 全宗，2 号目录，第 121 张反面。
 - 29 同上，17 号全宗，2 号目录，726 号案卷，第 2、7 张；3 号目录，763 号案卷，第 9 张。
 - 30 同上，558 号全宗，11 号目录，778 号案卷，第 23 张。
 - 31 《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之间苏联农业所取得的进展》，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 年，第 2 版，第 22—23 页。
 - 3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34 号案卷，第 22 张。
 - 33 详见：戴维斯，R. W.：《苏联经济在困难之中（1929—1930）》，贝辛斯托克和伦敦，1989 年；戴维斯，R. W.：《苏联经济的危机和进展（1931—1933）》，贝辛斯托克，1996 年。

目 录

序 1929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 B. П. 丹尼洛夫 Г. В. 戈尔斯卡雅 О. В. 赫列夫纽克 (1)	
1929 年 11 月 10—17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速记报告…… (1)	
第一次会议 …………… (4)	
第二次会议 …………… (24)	
第三次会议 …………… (57)	
第四次会议 …………… (107)	
第五次会议 …………… (154)	
第六次会议 …………… (197)	
第七次会议 …………… (249)	
第八次会议 …………… (294)	
第九次会议 …………… (337)	
第十次会议 …………… (375)	
第十一次会议 …………… (434)	
第十二次会议 …………… (478)	
第十三次会议 …………… (533)	
第十四次会议 …………… (582)	
附 件 …………… (589)	
1. 1929 年 11 月 10—17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第 7 号 记录…………… (589)	

2. 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决议 1929 年 11 月 17 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准 (594)
 3. 关于 1929—1930 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 1929 年
11 月 17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596)
 4. 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 1929 年 11 月
17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卡明斯基同志的报告通过的
决议 (606)
 5. 关于乌克兰的农业和关于农村工作 1929 年 11 月 15 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柯秀尔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 (615)
 6. 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1929 年 11 月 15 日联共(布)
中央全会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621)
 7. 关于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1928 年)的培养技术干部的
决定的执行情况 1929 年 11 月 16 日联共(布)中央全
会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624)
 8. С. П. 比尔曼、Н. М. 什维尔尼克、Ю. П. 菲加特纳的
声明 (633)
- 补充材料 (636)
1. 斯大林 1929 年 11 月 13 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
发言 (636)
 2. 1929 年 7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
哈林的决议》 (645)
 3. 基辅 С. С. 加米涅夫联合指挥员军事学校附设军政训
练班学员 И. 普列杰因 1929 年 3 月的发言记录 (648)
 4. 联共(布)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学院支部委
员会 1929 年 9 月 19 日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 (660)
 5. 在阿拉木图查抄 Л. Д. 托洛茨基档案时发现的 Л. Б.
加米涅夫同卡普林斯基与佩列韦尔泽夫谈话的记录

(1928年9月22日);讯问Л. Б. 加米涅夫、Я. В. 沙罗夫、 卡普林斯基的速记记录和Л. Б. 加米涅夫关于此事的信件 (1929年11月)	(686)
注 释	(712)
人物简介	(759)

绝 密

按密件存放
必须退回
禁止翻印

1929年11月10—1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速 记 报 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议程¹

1929年11月

1. 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指示
(报告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古比雪夫同志)
2. 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
(报告人:卡明斯基同志)
3.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报告人:大柯秀尔同志)
4. 关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
(报告人:莫洛托夫同志)
5. 关于中央委员会七月(1928年)全会的培养技术干部决定的执行情况
(报告人:卡冈诺维奇同志)

第一次会议

11月10日²晚上

莫洛托夫：建议全会开幕。选谁当主席？

喊声：鲁祖塔克！

莫洛托夫：谁赞成选鲁祖塔克同志为全会主席？通过。

主席（鲁祖塔克）：议事日程已经发给了大家。没有任何修改意见？请允许我认为议事日程已经得到批准。

建议以下会议议程：早间会议从11点到3点，晚间会议从6点到10点。有没有反对的？通过。

现在开始讨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关于第一项议程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发言。

1929—1930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³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控制数字的报告由我和古比雪夫同志分别来作。工业和能源的详细评价由古比雪夫同志负责，报告的所有其余部分由我来讲。

首先我想把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同五年计划作一个比较。

半年前讨论了我们的五年计划⁴，我们称这个计划是“巨大工作和社会主义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你们记得，这个计划中提出了多么大的任务。工业产品增加两倍，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降低工业产品成本35%，提高收成量35%，提高农业播种面积22%，实际工资提高71%，五年对工业建设的投资150亿到160亿卢布。改造农业的任务是到五年计划末农业公有化部分应提供42%的商品产量。最后还有重要项目生产的具体任务：220亿度电，1000万吨钢铁，7500万吨煤炭，2200万吨石油，20亿卢布的普通机器制造业产品，800万吨化学肥料，价值6.1亿卢布的农业机器，1.8万到2万公里新的铁路网。只要

举出这一系列数字就足以看到,这样的任务理应称之为巨大工作任务,理应称之为战斗任务。

但是你们回想一下,在那一次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曾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第一个远景计划,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订的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我们曾称之为大约的计划,编制远景计划的第一次尝试,那么这一个五年计划我曾谨慎地称之为进了一步的大约的计划。我曾讲过,还需要对这个计划进行新的深入的检查。只有在这个计划的方针为劳动者自己实际经验所验证,在作为我们计划基础的创造性理论思想和这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逐渐接近那样一种不会被叫做大约计划的远景计划,这样的计划才能百分之百地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需要。

请你们回想一下,在回答西伯利亚农民古谢夫发言时我讲的话,古谢夫当时谈到,我们对工厂和农村的劳动纪律采取不同的态度使他感到惊讶!他说,已经到了农村舆论对农业劳动施加一定压力的时候了,应该使农业战线的纪律同工厂的劳动纪律一样。当时我说,如果6000万农村积极分子都向古谢夫同志所希望的方向真正行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五年计划提出的任务和数字就都毫无用处了。我们将被迫提出大得多的任务。我当时还曾说过,如果广大的劳动农民都有这样的情绪,那么这个五年计划,我们将会认为是一个最低的计划⁵。从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第一年的经验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五年计划第二年的情况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呢?你们记得,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形势处于某种转折的情况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正好是在无产阶级积极性新的浪潮掀起时举行的,开始时它表现为无产阶级本身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互通气息和交流工作经验,而后表现为日益增长的、在我们眼前成长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浪潮。这只是另一次决定性进展的前夜,过渡到不间断工作的前夜⁶。总之代表大会是在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举行的,以至可以预见到,就在我们制订出这个远景计划之后,马上就得对它们进行修改,以适应我们实际经济情况的这种特殊的、强大的运动,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负责下达指令性计划的领导机关立即这么做了。在编制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仅投入到这种新的特殊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局势中去,不仅要依据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东西,而且要考虑到领导机关提出的一系列较五年计划提高了的决议。

我想提醒你们,就拿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的产量来说吧,根据中央的决定⁷,在这期间较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提高了20%—25%。决定把拖拉机的产量提

高一倍,重新修改了有色冶金的计划,较原五年计划提高1—1.5倍,棉花收成预计将较原五年计划提高33%,等等。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编制了本年度的控制数字。如果我们曾经认为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战斗性任务,那么这些控制数字提出的任务就更是战斗任务了,这些任务要求我们特别努力。

如果谈到决定经济建设命运的最基本的综合性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将从原规定的增长15%提高到20%。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我们可以指望从增长10%—12%提高到20%。

最后,估计到工业产量扩大的可能性,我们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将会有新的巨大的提高,从20%提高到30%。

我就用不着说,与此同时,我们在某些决定性的工业部门大大地向上跳跃了好几步,而这在以前我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只要说以下一点就足够了,在电机制造和农机制造这样的工业部门,我们在控制数字中计划一年就增长60%—7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历史的记载中是完全前所未闻的,而且在世界劳动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我们在决定扩大再生产命运方面和投资方面对五年计划的设想和控制数字进行一下比较,那么控制数字所提出的战斗任务就更加特别显眼了。下面就是用数字作的某些比较,它们比语言的表述更能说明问题。

工业方面,根据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为38.06亿卢布,五年计划原定为28.45亿卢布。电气化投资6.14亿,原定为4.53亿;农业中公有部分——16.36亿,原定为100万^①;交通不包括公路交通——18.4亿,原定为14.3亿;铁路——13.35亿,原定为10.87亿;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商业——5.74亿,原定为3.4亿;最后,教育和卫生事业——6.44亿,原定为4.11亿;住宅和公用建筑(不包括工业、交通和电气化部门的住宅建设)——9.72亿,原定为9.39亿。

最后,从最为综合性的指标——财政计划来看,1929—1930年度财政计划的总量将从122亿卢布,这大概相当于动用国民收入的41%,增加到177亿,相当于1929—1930年度国民收入的52%。1929—1930年度国民收入按整数计算将增加40亿,财政计划将增加54亿。这的确是战斗性的任务。这里还要加上1929—1930年度整个工业中将有大约一百万工人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②这一因

^① 原文如此:1млн.100万,根据上下文显然是1млрд.10亿之误。——译者注

素。你们记得,在建筑业的某些部门我们将建设巨大的项目,它们不仅在我国,就是在西方也是特大型的。我们要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同时会感到非常需要干部。为了有一个具体的印象,我举一个例子,就拿合作化来说,它要求培养30万名受过合作化训练的人,需要成千的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3300名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单是集体农业就需要5000多名工程师和农艺师,将近6000名中等建筑和农艺技术人员。

为了更具体地同五年计划的设想进行比较,我们以拖拉机制造业为例。就提出建设任务的大胆和坚决来说,这个行业特别典型。确实,五年计划中我们打算建设年产量5万台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年产1万台的普梯洛夫拖拉机厂,年产3000台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和第二个相当于斯大林格勒厂规模的拖拉机厂,当时还没有确定该厂的厂址和建设期限。现在提出的拖拉机计划是:普梯洛夫拖拉机厂年产2万台30马力的拖拉机,斯大林格勒厂——2万台15马力,车里雅宾斯克厂4万台*50马力,乌克兰厂——5万台30马力的拖拉机。目前在美国这种类型的拖拉机的年产量仅为1.9万台。同我们的计划比较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任务的规模了。

我们正在建设两个联合收割机厂,目的是为了到1932—1933年度将会有7万台联合收割机参加收割工作,而目前美国只有6万台。在农机制造方面我们总的任务是以这样加速度来准备农机产品,以便到1932—1933年度将拥有价值10亿卢布的农业机器。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战前农机生产的产量仅仅只有6000万卢布。

这些具体数字生动地表明任务有多么巨大,与此同时也表明提出这样的任务时我们要承担的全部责任。尽管如此,下面我将尽力来证明在提出这样任务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学习如何充分地考虑到现实情况,未来一年的完全特殊的经济现实情况。

促使我们提出这样巨大任务的首先是十月革命之后的形势,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这种形势告诉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十分深刻地正确指出,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而且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体系里,这些国家是如此地对立,以至在它们之间只可能有暂时的和平,喘息时间,而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就是为了利用给我们留下的喘息时间,我们也只能最大限度地鼓足力量。但是,能够提出这样的任务只是因为经济现实的经验在我

* 速记记录中为5万台。——编者注。

们眼前日益展示出新的潜力,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估计到的。了解这种潜力是了解经济建设可能性的钥匙。

完全清楚的是,经济建设能够成功的决定性保证对我们来说将是鼓足劳动者的劲头和精神以及他们的新的组织形式。请回想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切列姆霍沃矿工的信,回想一下他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⁹。他尖锐地肯定地强调指出,在经济和政治工作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令人高兴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向自觉的同志式劳动的新纪律的令人鼓舞的进展。这种进展在苏联经济建设的日益展开的情况下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显示出来。正是这种进展在我们眼前日益发展,正是它们在推动我们,引导我们前进。

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经验中,什么是最突出的东西?五年计划第二年中,什么是我们预见到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恰恰就是劳动群众这种新的伟大的振奋,完全独特的——社会主义的振奋。这种振奋通过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各种形式在不断发展,而我们眼看着社会主义竞赛由一件件小事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的劳动组织体系。这种振奋表现为自我批评的高涨。不是“纯理性的批评”,也不单单是“批评”,而是自我批评。为什么?因为只有自我批评才是千百万劳动者社会主义振奋的表现,因为只有自我批评才是被调动起来的千百万人的理性,因为只有自我批评才是这千百万人正在实现过程中的经验。

不仅我们对外政策的事件向我们说明了喘息期限的短暂,我们国内经济战线上的事件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旧事物不愿意和平地屈服于苏维埃国家的技术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建设。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技术改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挖掉旧事物的根、宣判旧事物死刑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旧事物以自己的进攻回答社会主义的进攻,它不愿意和平地长入我们这个十月革命赢得的现实。

我们经济建设大厦的脚手架正在拆除。这些脚手架尚未拆除完毕,但清理工作已在进行,大厦渐渐显露出来,已经看得出这座大厦一些山墙的用途。大厦里已射出探照灯耀眼的光芒。什么是照耀这整个经济建设的探照灯?是列宁主义。什么是我们将这一建设进行到底的最重要的保证?是为未被歪曲的路线而斗争,是为体现列宁学说的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在我们即将鼓足极大干劲的时候,首先必须维护这些列宁主义探照灯的光辉。党的队伍钢铁般的团结一致是经济成功的决定性保证。因此,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必须具有列宁式的毫不留情。在与臆造的公式的奴隶的斗争中,他们知识分子气地想要缚紧现实,而不是

同现实一道前进,分担它的痛苦,分娩的痛苦,他们忘记了,没有痛苦,没有紧张,没有巨大的牺牲,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诞生的。一方面是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半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假现实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他们以官僚主义的自负过高估计自己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在嘲笑这个极其伟大的建设时代的实践经验。我们的口号是:更接近实际的经济经验。我们将首先在我们向现实学习的标志下安排我们的计划,安排我们一切经济和政治机关的工作,因为我们眼看着现实超过原先的一切计划和预测。

因此就提出了这次全会的口号:拥护真正的战斗性的控制数字,给对党的总路线的任何动摇以粉碎性的打击。只有具备了这个必需的条件,才有可能放心地拟定所面临的经济建设的途径。

总之,如果说这个计划是对劳动者积极分子的新的思想情绪的回应,那么在过去的第一个经济年度的经验中,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考虑之外,究竟什么东西可以支撑计划的任务呢?为了正确估计1928—1929年度经验的价值,我马上就谈这一点,应当回忆一下我们跨入今年时的情况。

我们跨入1928—1929年度的时候,空前尖锐地感到工业前进速度和农业前进速度之间的脱节。去年是靠1928年的收成过来的。你们记得这一收成的糟糕透顶的地区;你们记得,700万公顷越冬作物的死亡恰恰发生在提供商品粮最多的最可靠的农业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你们记得,随后春天和夏天的燥热风毁掉了一些春播作物和一些经济作物;你们记得今年发生的特大的虫灾;你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记得1928年粮食收购的极度紧张的状况,这种紧张状况终止了我们自流征购粮食的方针¹⁰。

今年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形式空前尖锐的争夺粮食的阶级斗争,同时,在粮食状况紧张的条件下,1928—1929年初我们发现了工业劳动纪律涣散的十分严重的征兆。你们记得,我们是怎样提出工厂的三角关系,即工会组织、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请回想一下,紧接着我们眼前就展现了一个又一个破坏事件,这些破坏事件证明恩格斯警告技术知识分子上层将要背叛的预言的正确性¹¹。请回想一下,1927—1928年度以1.7亿卢布的外贸逆差而终结,复杂化的外部情况打击了我们整个外贸业务战线。与此同在的是新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未利用设备的堆积,缺乏经验的人员对设备的损坏,对熟练劳动、对自己的红色技术干部日益增长的需要,整个建设事业的无序状态。

此外,还要加上市场的波动、集市价格和收购价格的悬殊和我们的价格政策被突破¹²。私有经济成分力求迅速利用这种情势。国民收入作了如下的再分

配:农业的份额首次超过了工业,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与各个农民上层集团的超额利润相比明显地倒退了。总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有从这种情况着眼,你们才能看清楚今年的积极成就。1928—1929年将作为气势浩大的扩大再生产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发展速度进一步提高的年份留在我国经济史的史册上。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投资比过去的1927—1928年度增加了整整十个亿,即50亿比40亿,而特别突出的是,投资分配的增长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1927—1928年度投资分配的情况是:公有化经济成分超过私有经济成分不到两倍。1928—1929年度50亿分配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投资比私有经济成分多六倍。工业固定资产以下列百分率逐年增加:1926—1927年度、1927—1928年度、1928—1929年度分别为12.4%、15.4%、18.7%。重工业的比重今年由42%上升到44%。数字和事实就是如此。让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数字奥秘的外国经济学家们去试图推翻它们吧:我肯定地说,这些数据从统计方面和经济方面进行过全面的核查,准确地反映了1928—1929年度工业化的丰富多彩的现实。

今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和建筑材料生产任务曾经作了修改提高。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今年有91个新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其总产值为1.68亿卢布。整个工业的固定资本正在大大更新。工业劳动的技术装备程度一年间提高了14%—15%。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如此严峻的粮食状况下,在上半年出现过表明我们组织上尚未成熟到符合现实要求的那种劳动纪律涣散,为什么尽管如此我们一年间终于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计划规定为17%)。由于物价上涨,工资的上涨超出了我们的设想。在我们工业部门中,工资上涨了9.5%,而计划指标为7%。工人的数量比我们计划设想的增加了2%。降低工业产品成本这个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指标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工业产品成本的降低,与计划规定的7%相比,上半年只达到了2.3%。年底,我们冲破了反抗的工业自发势力的阵线,依靠工人阶级提高了的积极性,实行冲刺前进,到年底,一些决定性部门产品成本的降低达到了7%—8%—9%。最后,在这一有决定意义的指标方面,我们达到了降低工业产品成本5%,即只比计划指标少2%。更加综合性的结果——国营大工业的全部产品:计划增加21%,实际增加24%。1928—1929年度,我们第一次打破了通常工业工作的季节性,我们第一次看到夏季休假期间工作不是下降而是提高,恰恰在1928—1929年度的最后一个季度工业劳动的一切主要指标第一次不断上升。而同志们,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只是处于探求适当的工业组织的过程之中。实际上,《工商报》¹³所起的独

特作用已经不是秘密,它像是一个思想中心,像是一份工业的中央机关报。而工业在拥有这份中央机关报的同时,需要有一个根据改造的需要,以新的方式与各个工业基础部门协调一致的强大的中央工业委员会。然而,这些数字证明,我们工厂的现实中就具有我们所期望于即将到来的 1929—1930 年度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成功的基础。

我们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农业建设领域和农业社会主义成分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按照计划,我们原先预期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将增加大约 7%。怀疑主义者曾对国家谷物工厂的巨大任务表示十分担忧。事实上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可以肯定地说,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¹⁴通过了考验,在耕地面积方面和总的经营方面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旧的国营农场也开始追赶上来,国营农场的面积增加了不是 7.1%,而是 27%。按照计划,集体农庄建设应当比去年增加大约 100%,而根据粮食播种面积计算,增加了两倍。

然而,我觉得,这些数字也还概括不了农民队伍中已经发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在继续发生的进步,农民已经不仅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表明他们坚信,终于摸索出永久改变农民命运的真正正确途径。

与今年,1928—1929 年度相关的是,我们村镇之间共用的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活动。总之,我们有 3.6 万台拖拉机在田间作业,我们第一次一年为农民提供了 9 700 台新拖拉机。对农村的机器供应第一次一跃上升了 68%,产值达到 2.36 亿卢布,而且这些机器的绝大部分供应给了公有化经济成分——42%,而 1927—1928 年度为 29%。集体农庄庄员物质生活的提高,全体农民是清楚的。而集体农庄的扩大还处于最初阶段:集体农庄的平均实力一年间由 54 公顷增加到 82 公顷,只是初次建立了平均面积约为 2 000 公顷的 200 个大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农田的生产率大约高于个体农户 30%。

然而,总体上说,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上述增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的增加,虽然使集体农庄商品产量在农业全部商品产量中的比重增加了三倍,而商品粮的比重增加了两倍,但是,当然还不能够将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的私有成分排挤到这种程度而使农业产量摆脱自发势力的支配。毫不奇怪,我前面讲的那些自然灾害的打击对总产量,对农业总播种面积的变化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你们记得,我们原先确定 1928—1929 年度播种面积增加 7%,收获量增加 3%。由于收成品种的多种多样和我们农业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根本无法查清收获量的真实变动情况。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况说明,农民上层群体的播种面积大

大减少,他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进攻政策的反应是在生产中实行怠工。如果这一上层的播种面积的普遍减少最终使得只有2%未完成计划,那只是因为这种减少由贫农和中农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农业公有化成分播种面积巨大前进而得到了补偿。

尽管今年社会主义农业成分的规模不大,它已经在实际上向我们表明,它无论直接地还是在与周围农民联系方面是一个多么强有力的杠杆。

为了描述这种联系,只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另一个纽带,即预购合同制¹⁵这一杠杆就行了。谷物预购合同增加到2100万公顷,包括了25%的谷物播种面积。经济作物预购合同包括了330万公顷,比去年增加55%。谷物预购合同总体上大约超过任务的一倍完成了计划。

同志们,我以为,对主要经济领域的变化的这一数字描述,在其发生的那些困难条件下是相当说明问题的。

收成的特殊地区范围和我们赋予我们经济建设速度的巨大提高当然会沉重地压在运输业的肩上。这一杠杆承受得如何?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今年曾经看到令人不安的征兆,它向我们表明,运输业未来需要特别仔细的关注,可是运输业仍然完成了任务,仍然在收入预算大增2亿—2.5亿卢布的同时最终保证我们将每吨公里的运输成本由1.135戈比降低到1.065戈比。铁路运输发货量超过了1.77亿吨,而计划为1.65亿吨,旅客公里超过预计五分之一。

但是,最令人担心的是粮食。你们记得,今年一开始就流传着这样的预测,说我们单靠自己的粮食是怎么也过不去的,只得从国外进口粮食。然而,通过组织我们商业采购活动、与贫农和中农群众在这方面的新的配合及向富农坚决进逼等努力,在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和与私人购粮者冲破我们阵线的种种企图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借助于我们的整个物价政策,我们成功地巧妙应对过来了。采取这种粮食收购政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私人采购将于十分短的期限内粮食采购市场上消失。

今年私人采购粮食还起过一定的作用,其比重为23%。毫不奇怪,有这23%比重的存在,需要在边远地区购粮食的时候,必定会发生地区间价格和集市价格与国家采购价格的巨大差别。国家采购价格和私人采购价格的差别超过了100%,在北高加索、乌克兰、中央黑土地带州为160%、170%、190%。尽管如此,粮食最终还是收购上来了,国家机关振作起来了,粮食采购机构个别人员之间的有害竞争减少了,没有进口外国粮食我们终于应付过来了。不错,我们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价格被大大突破。价格的这种突破,顺便说一句,影响了以下各

项综合指标。如果你们看一看1928—1929年度整个国民收入,你们就会看到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独特情景。如果拿不变价格来说,结果是,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大体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增加了0.6%,即我们比计划增收了大约1.83亿卢布。而如果不按照不变价格而按照每年的价格进行比较,那么结果将是,1928—1929年度的国民收入超过计划整整17亿卢布,其中10亿多为农业的收入。当然,这些钱大都落在了农村上层的手里。当然,在粮食状况紧张和缺乏储备的情况下,只是到第四季度初我们才积累了一定的粮食储备,我们未能为贫农群众储备必要数量的粮食,他们必须自己到市场上去采购。然而,在预算指数变动方面,最终我们没有出现整个分配计划的特别剧烈的动荡。事实上,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如何呢?预算指数实际提高了5.2%,而计划的规定为2.8%。但是,当不顺利的情况在农业价格方面刚一显露,刚刚开始影响我们消费合作社价格的时候,我们便有可能利用一些杠杆迅速将其结束。由于这种不利的收入重新分配,终究出现了相当大的缺口。我们的经济学家对此评说不一。一些人说,农民上层群体得到2亿—3亿的好处;另一些人说,我们付出了4亿—5亿的代价,但总体上说,这些缺口毕竟没有妨碍雇佣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大家都知道,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幅情景。

我们发生了价格波动,但不是灾难。市场平衡的杠杆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在生产方面我们毕竟在步步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一点才是决定性的。

预算这一指标也推翻了我们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口里听到的悲观主义论断。整个预算执行结果是,无论收入项目还是支出项目都略微超额完成,而且收入大于支出1亿多卢布。

再举一个指标为例,这个指标初看起来是十分消极的,这就是货币发行量的过量增加。实际上,1928—1929年度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6.7亿卢布,也就是说大大超过了我们计划的设想。然而这些货币的发行是如何分配的呢?其中,4.29亿发行于第四季度,即货币发行首先取决于粮食收购和原料采购情况的那个季度。我们在有粮食和工业用原料这些商品作为保证的那部分货币发行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货币发行,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担忧。本年度,如同我们在工业领域第一次对工业的季节性实行了坚决进攻那样,我们也第一次做到了改变我们收购粮食的日历期限。你们知道,我们设想的在新的年度开始前集中进行这种粮食收购的策略获得了成功。

当然,还可以列举很多数字来描绘1928—1929年度的光明面和阴暗面,但

我认为,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最重要的和主要的,它告诉我们,本年度将作为特别艰难和紧张的一年,同时又作为工业化战线和农村社会主义成分建设战线都取得巨大积极进展的一年载入我们经济史的史册,本年度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成分在我们整个经济中的新地位和新比重。

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困难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克服它们,因为可以依靠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本身正在形成的新的力量克服它们。在决定性的政治因素中,在农民对我们建设形式的渴望中,在我国很多地方第一次出现的对全盘集体化的渴望中形成了伟大的转变。中农明白了,这就是改善他们状况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国家现在已经向他们伸出了保障他们前途的巨大的物质和组织援助之手。在这一变化之中就有最终克服我们建设中未来一切困难的答案。从这一观点看,在自身经济技术目标各异的农业和工业这些环节不同的前进速度方面困难尤其巨大。我们可以坚定明确地说,1928—1929 年度的确是大转变的一年,是农业中势不可挡地引导人们不断前进的苏维埃的权力取代作为农民千百年困境的自发黑暗势力化身的土地的权力的一年,而对农民千百年来的这种困境,人类曾绞尽脑汁徒劳无益地思索了那么多年。正是苏维埃政权正在这样解决至今谁都无法解决和未曾想要解决的农民问题。1928—1929 年度的这一经验就是我们规划 1929—1930 年度控制数字的基础,接着我就控制数字进行说明。

我想请求休息一会儿。

主席:休息十分钟。

(休息以后)

主席:现在继续开会。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发言。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已经部分说明了 1929—1930 年度我们将面临的工业方面的任务。向你们阐述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协作的具体特点,以及今年将它们新装配成为功率大得多的公共社会主义锅炉,那就是古比雪夫同志的事情了。工业的组织问题已经紧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新的大规模的建设逐年获得越来越大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古比雪夫同志需要特别用心地阐述建筑业本身的组织问题。我想强调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制定了一个专门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建筑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本身的组织将脱离旧的半手工业的基础并根据我们情况的全部特点多少向国外模式看齐,而我们的情况使我们能够在标准化方面和利用各地区的地方建筑资源方面坚决和迅速地前进。本控制数字确定的工业建筑

费用降低14%的意义无论多么巨大,对于我们来说,建筑业组织机构素质的变化、建筑业本身的工业化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指标。

1929—1930年度,工业能够在对于活的动力、对于工业劳动有利得多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任务。我们预定名义工资至少提高9%,估计到粮食供应的前景并有在1928—1929年度教训的基础上今年对物价波动进行更积极有效干预的设想,我们能够保证实际工资总计提高至少12%。与此同时,我们深信,争取降低工业品成本11%这一次是有牢固基础的。

为了不使你们过于疲劳,我不再列举数字,但是,如果你们对去年和即将到来的一年决定成本降低命运的各种因素加以对比,你们就会看到,降低工业品成本的这一打算是建立在对去年第四季度已清楚显现的情况准确考虑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把工业技术改造的计划推行到一个工厂的话,这里考虑到了工厂劳动合理化的实际进行情况,记录下应该记录的东西。

降低失业率将对劳动力的情况产生非常有利的影晌。工业品大幅度增加32%,手工业合作化范围达到小手工业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切总体上使1929—1930年度成为劳动力市场上转折性的一年。我们将第一次过渡到绝对降低失业率10%。从1929—1930年度起,失业只会发生在第一次找工作的人身上,而对熟练劳动力我们将会感到缺乏。同时也不应该忘记,1929—1930年度实际工资提高12%,并非实际改善工人物质状况的全部。这里还应该加上我们社会保险基金增长对工人阶级的保障部分。社会保险基金大约从11亿多增加到13亿。基金的使用计划以首先保障无产阶级基本干部利益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职工生活改善专门基金提成将增加1亿多卢布,此外,还计划设立帮助青年工人学习的助学基金。住房建设事业也将获得重大进展,这是劳动合理化的重大基础之一。住房建设计划预计为8亿多卢布,但公有化成分的住房建设占最大部分——约7亿卢布,比去年提高50%以上。劳动保护费用由5400万卢布增加到7900万卢布。

干部问题空前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在这次全会上听取卡冈诺维奇同志的专门报告,古比雪夫同志大概也会阐明我们打算如何让50多万工业工人改学新技能的问题。

与此同时,1929—1930年度在物质动力方面也是转折性的。请大家注意,今年电力供应将获得巨大进展。各区域电站5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各工业电站超过1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将首次投入运行;农业公有化成分将第一次为农业电气化提供坚实的基础。1929—1930年度,我们大型区域电站和这类与区域电

站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业电站的建设同时具有另外一个积极的特点,即建设期限明显缩短。你们都听说了,斯大林格勒区域电站¹⁶的建设已将其建设期限由两年改为17个月;各个热电站我们设想至多于一一年半的期限内建成。

电站和工业联合企业的结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从组织上整合工业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我们暂且安于把大托拉斯分成小托拉斯的权宜办法,但显然,今后我们的托拉斯将建立在这种电力工业联合企业的基础之上,这些联合企业也将变成根据本地区特点兴建的支配经济区的联合企业。

在对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方面,1929—1930年度我们将以比去年加倍的速度前进。这里就产生了与过去的某种决裂。在工业基本建设工程拨款这种成倍增加中已经可以感到与过去所有年份不同的另一种生产能力及社会潜能的工业经济。量变成了质。

我不再继续论述工业化的主要环节,我想简短扼要地请你们注意农业中的新的积极进展,这些进展虽然继续着1928—1929年度经济建设的路线,但已经呈现出新的质量。我们预计,到五年计划末尾,农业的公有化成分将向我们提供大约270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加在一起并考虑到机器拖拉机站从明年秋天就将开始大规模作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29—1930年度超过180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将掌握在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手里,这一成分的总产量1929—1930年度就会以巨大的数字表现出来。1929—1930年度,全部商品粮的50%以上,算上农村之外的交易额,我们将得自这一社会主义成分(4亿多普特粮食)。同时,大型国营谷物农场的发展速度将超过五年计划的一倍。至少120个谷物工厂将为我们种上约100万公顷的土地并于年底前为250万公顷土地的播种作好准备,即达到五年计划预定的最后一年的指标。拖拉机功率的增加也将不同于去年。我们从国外订购了2.5万多台拖拉机。我们在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红色普梯洛夫工人”工厂的产量和建设斯大林格勒工厂,以便于1930—1931年度将其投入运行。因此,我们将在国营农场里完全改用新的动力发动机——拖拉机。我们还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对拖拉机的需求。集体农庄必须采取临时的办法——集体使用耕畜的办法。但就是在那里,主要是最大和最重要的联合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增添的速度也将完全不同于去年。

现在农业研究人员从四面八方对我们说,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同样迅速地处理畜牧业问题。这里通常忘记了一个情况,不解决粮食问题,在畜牧业方面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展。只有现在,当我们能够说在农村之外商品交易额的决定性部分粮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的时候,只有现在我们

才能够以新的方式处理畜牧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依靠社会主义成分、考虑各农业区的特点和饲料业的合理化。我们正在组建一系列畜牧业国营农场并于今年内将14万多头牲畜集中到这些农场里面。苏联国家肉类生产国营农场联合公司这个组织正在变成为类似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组织。苏联养羊国营农场托拉斯¹⁷这一组织也将大大加强自己的活动。然而，1929—1930年度还不能解决我们在粮食市场上的困难。只有在继续实行食品定量及多少扩大其范围的条件下，我们才能保证相当于1928—1929农业年度第四季度水平的那种粮食状况。对定量供应必须有阶级观点，必须保证从事工业劳动、重体力劳动和季节劳动的人员每天1000克定量的面包，大多数工人——800克，其他居民——400克面包。为了在粮食方面向前迈进一步，首先必须为1930年的收成奠定新的基础。我们预定增加播种面积10%，提高单位面积产量8%。那时，1930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总的将提高约16%。今年将是农业和粮食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一年，当然，如果不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的话。我们必须对土地规划工作的继续给予最认真的注意，但这已经是与我们此前所作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规划。在这种土地规划中应该以我们社会主义成分的需要而不是以某些村镇的需要为依据。必须以土地区域化为基础，其主要代表应该是联合起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成分。推广农业基本知识、秋耕、种子消毒、条播、防治虫害等措施对于我们仍然是重要的。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有了选种机和筛选机，我们能够用选种机选出100%和用筛选机选出60%以上的优良种子。我们能够使防治农业害虫的化学药剂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

在进一步振兴畜牧业的问题上，对待农业饲料基地的新的态度和采用新品种的精饲料对于我们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考虑到牲畜蛋白质食物、多汁饲料的严重缺乏和我们在改良草地经营方面的落后，我们正在拟定一个宏伟的160万公顷草场的草地改良计划并准备建设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型青贮塔。最后，我们计划通过签订合同使草地由2100万公顷增加到4400万公顷，占全部粮田的40%以上。1929—1930年度，农业工业化在农用工业方面获得的资金将超过去年的一倍：1.78亿卢布比9200万卢布。1930年，增加了16%以上的这一商品总产量将给予我们大约9亿公担的粮食，使商品粮部分比去年增加29%。由于其一半以上集中在公有化成分手里，摆脱粮食困难的出路就清楚了。农业拨款预期将有30多亿，其中20多亿为基本建设投资。这比去年增加了75%。值得注意的是，吸引的民间资金在这里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跨村镇拖拉机站的工作能取得特别大的进展。这些拖拉机站使我

们能够发挥居民在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中的更为积极的作用,减轻国家预算的负担并赋予一整套国家农业措施某种经济核算的性质。

似乎跨越了五年计划一个年头的运输业,1929—1930 年度面临着规模巨大的工作。1929—1930 年度,货运量以吨计算为 2.15 亿吨,而以吨公里行车里程计划算为 1 270 亿吨公里。这超过了五年计划 1930—1931 年度的安排,而客运计划甚至超过了下一年。如果你们看一看运输合理化工作 1929—1930 年度是如何进行的,你们就会看到,我们走的大致还是过去走过的那条路。运输人员的增加与工业人员的增加相比,速度完全不同。尽管有这样巨大的货运负担,我们还是以百分比来衡量它。然而,同志们,去年第四季度货运的延误表明,我们的运输业已接近于过分紧张。因此,即使我们超过五年计划的安排,在 1929—1930 年度的运输业计划中得到 560 台新蒸汽机车、900 多个客车车厢和 3.4 万个货车车厢,我们也不应因此而满足。应该记住,我们的运输业此前一直具有所谓装载不均衡的特点。正是这样一种装载不均衡,它迫使我们不仅要考虑运输业运营标准的合理化问题,而且要考虑水路运输、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之间新的力量对比问题。应该肯定地说,当我们的铁路运输尽管有些紧张,但无论如何在完成超过战前工作量 60% 的工作的时候,在水路运输方面我们还未达到战前的装运定额。同时,我们新的庞大联合企业建设的整个性质,我们在增加木材出口、增加石油运输和一般笨重货物运输方面所看到的一切都空前强烈地向水路运输提出了要求。我们常常说,这里有着来自造船业,无论是内河船舶还是海船建造业能力方面的限制。然而,同志们,调查表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看来可以用新的尺度来确定我们造船厂的生产能力了。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水路运输和内河船舶建造业的建设在运输业的年度预算中继续以大约 6 000 万—8 000 万卢布的数字计算,那么很显然,我们在这里并非一切顺利。

关于我们的公路也完全应该这样说。1929—1930 年度将是其生活中转折性的一年。你们知道,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专门决定,1928 年 11 月 28 日对公路的组织和拨款进行了一定的改革¹⁸。公路管理和拨款机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但应该说,对公路运输的这种管理和拨款尚未确立起来,还没有编制。公路运输统计处于极其可悲的状态。你们看到,公路总长度测定为 120 万公里,但你们清楚地感到,这一总计数字并不反映真实的生活。毫无疑问,必须用新的方法来抓这件事情,因为很清楚,农业的新建设、谷物生产方面的新任务和新进展是与铁路运输方面的新进展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工厂的工作也是与运输问题最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今年的预算,决定从全苏联预算中拨出 1.27 亿卢

布和从地方预算中拨出2.43亿卢布用于公路运输基本建设。但最重要的是,重新设想居民自己对于此事的参与。没有这种参与,单靠全苏联预算和地方预算的资金不可能取得我们期待于陆路运输的那种进展。预定今年劳动居民的参与程度为去年的七倍。新的铁路建设,其2.65亿卢布的规模恰恰是由于工业建设的需要,是由于与我们新的工业联合企业建设相关的新的铁路的发展。

由于没有时间,我就不谈航空运输问题了。航空运输在邮递方面,在增加旅客运送人数方面,甚至在防治虫害这类农业用途方面都开始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发展航空运输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是我们整个航空业的前进基地。我要指出,对航空运输需要的2000万卢布的拨款就其运输比重的近期前景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你们知道,我们跟福特签订了建设一个汽车厂的合同¹⁹。这个汽车厂和增加其他汽车厂的产量无疑也将从另一方面推动我们无轨道运输的提高。

今年我们已接近于完成粮食收购的庞大计划:与去年的5.6亿普特相比,我们将拥有8.3亿普特粮食。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年初我们已具有将近1亿普特的粮食储备。

肉类供应问题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1929—1930年度,市场上的肉类供应量将会减少。不同的研究者对此估计不同,但决不会少于5%。政府有一个关于提高肉类生产、签订预购肉牛合同、补充牛饲料、防止牛在我们运输途中掉膘、改善肉类储藏等措施的专门决定。应该坦率地说,必须竭尽全力,使签订预购合同的计划得以超额完成。工人居民的合理预算是与奶和肉的供应部分的增加相关联的。1929—1930年度,在把工作重担交给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尽快帮助工人食品定量的这种合理化。你们知道,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指望,在减少牲畜屠宰的情况下我们的奶产量会多少有所上升,我们可以期待牛油和奶制品的供应会增长5%左右。我们希望,弗鲁姆金同志这一次能够不带任何倾向地掌管渔业²⁰。肉类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对提高鱼类供应40%的计划指标的任何偏离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不能低估原料作物方面的困难。在甜菜和棉花方面,我们离所期望的和计划规定的收获量还差很远。为了把更顺利发展第二部类工业所需要的我们的主要技术原料搞上去,还需要长期的工作。然而,考虑到1929—1930年度的商品情况,我们可以指望,20种主要商品的工业产量的预期增长将保证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提高大约11%。甚至食糖的供应虽然由于甜菜歉收比去年减少,我们仍然能够维持去年第四季度食糖供应的标准。

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煤油供应系统的十分重要的任务。煤油供应部门今年应该向我们提供至少 50 万吨煤油。这里不得不注意的是,我们的煤油有时被用来清洗拖拉机。拖拉机是好东西,每一台拖拉机就是 300 公顷机播面积,就是五六十家脱离私有成分的农户,但在我们感到煤油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用煤油清洗拖拉机似乎是不应该的。

这些关于我们粮食状况的总的看法、新的一年年初我们成功获得数千万普特以备意外的储备粮这一情况,乌克兰的同志们通报我们,他们在主要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收购……

柯秀尔, C.: 不是在主要方面,而是完成了。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这一切说明,在对市场进行巧妙组织调节的情况下,1929—1930 年度我们不会再发生去年那种价格突破,何况实践使我们变得聪明了。

当然,必须特别关注合作社的工作。合作社各个部门 1929—1930 年度将接受巨大的任务。农业合作社必须覆盖 63% 的居民。其营业额大大增加。将达到 40 多亿卢布。农业合作社自身的巩固密切关联着预购合同制的命运、农业工业化的命运和我们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命运。

我就不谈表明手工业合作社和住宅建筑合作社特点的指标了,我只想说,它们,当然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担负着一方面为个体手工业者,同时也为整个住房建设战线进行极为重要服务的巨大任务。

然而,整顿商品流通主要取决于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数量方面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1928—1929 年度它的入股社员的人数就增加了 45%。它的零售系统将增加 25%,1929—1930 年度它必须吸收 750 万新入股社员,它的零售额将达到 110 亿—120 亿卢布的巨大数目。私商在逃离市场。1928—1929 年度上半年,我们看到商业的私有成分减少了 50%。我们知道,与消费合作社战线这种数量上扩大的同时,它在股金积累制度方面,在抢占由于私商离去而空出的商业阵地方面都并非一切顺利。今年它只能单靠数额 3 亿多卢布的股金来加强自己。在我们根据整个经济需要必须增加回收,加重消费合作社与工业、与信贷机构结算负担的条件下,它只能认真注意自己的干部,注意调整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自己的财务。但是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试图用多方案办法,采纳这种或那种可能性,制作一张我们的工业财务计划总汇总表。我应该坦白地向你们承认,这张总汇总表我们是有条件地完成了,不仅给合作社,而且给我们经济的其他部门加上了另外的重大义务。让合作社也在巩固我们的主要阵地,社会主义工业阵地的

伟大事业中承担自己的一份紧张。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由于农业成分去年在分配方面的向前跳跃而引发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变化。如果说去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无产阶级的平均收入,那么根据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的设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4%的情况下,雇佣工人人均预算收入可能增长11%。

如果以战前的数字进行计算而又注意苏联经济构成的全部特点并对战前和现在的国民收入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国民收入发展的总的情况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下面就是有代表性的数列。1913年,全部国民收入以战前卢布计算为140亿卢布,而1929—1930年度以前的数列是这样的:1925—1926年度——130亿卢布(我只以10亿为单位);1926—1927年度——140亿;1927—1928年度——160亿;1928—1929年度——180亿;1929—1930年度——210亿,换言之,即以战前卢布计算我们国民收入的增长到1929—1930年度已经超过50%,按全国人均计算增长达30%以上。这些数字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经济的前进。对这些数字还必须用对社会进展的估量和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统计予以补充。我只列举一些最笼统的数字,我非常抱歉用许多数字使你们厌烦,但问题在于,这些数字能够说明太多的问题;载入速记记录,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对我们未来命运一系列我认为最为重要和最有决定性意义思考的依据。

因此,只要举出公有化成分到1929—1930年度末的主要进展为例,我们就会得到以下引人注目的数列,它们可以作为我们提纲中所载资料的极好补充。就人数而言,1929—1930年度这种公有化成分会是什么样呢?它大约只能争取到四分之一,即25%左右的居民,而就生产能力而言,集中在公有成分中的这四分之一居民将提供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它将提供全国商品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公有化成分将拥有整个雇佣劳动大军的85%和全部中介贸易额的96.3%。最后,这里还将投入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将近四分之三。

结果是,四分之一的居民掌握着决定扩大再生产命运和整个流通方面的大部分资金。公有化成分拥有这四分之三的基本建设投资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其他所有居民尽管人数众多,在未来的建设中资产却比他们少三分之二。态势是明显的。在这种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公有化成分的每一个单位与几十个私有成分单位相比,都具有极其巨大的能力。我们将拥有全部中介贸易额的96.7%^①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过去整个漫长恢复时期和改造时期第

^① 前面提到的数字为96.3%。——译者注

一阶段曾经存在的那种价格突破和市场关系波动即将结束。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我们合作社纽带力量的同时更牢牢地把握住舵,朝着把私商完全从流通领域排挤出去的方向前进。

在这里卡冈诺维奇同志将作一个关于干部的专门报告。社会文化建设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把正在我们经济各个决定性领域中进行的经济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在这时候文化革命的问题正在变成生产性质的问题,就在这时候我们在每一领域里看到,劳动的活的动力是怎样有力地与文化进展的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就在这时候扫除文盲、初等工科学校、函授教育新方法、电影和无线电广播这些杠杆的适当运用正在成为我们生产成功的本原。我们教学机构的工作可以与我们的基本建设方面的工作相比,就是说,它与长期投资有关。局面极为迅速的发展,极为迅速的变化主要与在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工作的干部同时变成学习干部有关。因此,当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财务计划里看到,尽管我们整个经济条件极其紧张,我们社会文化用途方面的资金仍比去年上升 36%,例如,1929—1930 年度的社会文化费用为国家预算拨款 6.95 亿,地方预算拨款 13 亿,总计超过 20 亿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只要有一点可能增加这些金额对现有干部进行最广泛的新技能培训,就必须这么做。对劳动者进行新技能培训的问题,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共青团员青年、中央劳动研究所²¹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那场争论终于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总方针在日益形成,它使我们用新的观点看待我们的学校和看待学校与文化工作任务的结合。我们至今未能用所作的安排和设想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大学和我们的工厂之间架起一座直通的桥梁,我们尚未使文化工作的组织形式达到需要的终点。我们工人的教育和培训制度仍在探索之中。显然,这里需要完全特殊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创造性的探求。这条文化战线还在等待自己富有创造性的组织者。如果看一看所谓的工人发明现在已经具有多么巨大的积极意义,它在实际中,在工业内部已经怎样以其在物资消耗方面的积极节约在发挥作用,那就应当说,这件事也值得好好研究研究,以便使它摆脱官僚主义的束缚。值得考虑的是,怎样做到使我们劳动的工业中心、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都成为主要的学校。顺便说一句,同志们,像第聂伯河建设工程这样巨大工程的场地在我们的眼前表明,这一建设工程具有多么巨大的技术教育意义。如果最近几年继续展开一系列这样的建设工程,这些不仅是工作的而且是文化的基地与我们普通的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将会怎样呢?培养干部的重心是否就会转移到这里来?

我已经说了,我们财务计划上升到动用170亿卢布的水平,占了国民收入的50%以上。同志们,在其他国家的生活中只有在出现战时作战情况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形。但是,恰恰是我向你们通报的这些数字和事实说明,我们的经济建设全线确实存在着战时作战的情况,但是,这种战时作战的情况确实是由劳动者生活中那些巨大变化和对新资源的那种不断开发引起的,它们,尽管紧张,一方面保证我们的成功,另一方面迫使我们去想各种可能的办法帮助和促进这个伟大高潮的到来。在考虑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强调我们的组织问题的巨大意义。你们知道,今年,1929—1930年度,恰巧是我们打算在各个领域实行一系列新的创举的一年。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正计划建立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²²,你们将听取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报告;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在计划方面实行了巨大的改进,开始把我们的计划机构和统计机构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²³。我们面前摆着改变整个科学研究战线、科学研究工作组织形式的重大问题。你们知道,我们计划给科学研究工作以巨额拨款,这一点古比雪夫同志大概会对你们讲的。同时应当指出,这里有零散基金。最后,毫无疑问,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工农监察委员会这些机构之间的工作关系也需要重新考虑。组织问题并非总是意义如此重要的问题。现在,在这个时代,它们当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让我们回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的话,他曾对运转良好的国家机构的存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毕竟说过,驾驭机构比驾驭譬如说经济建设要容易一些。我想,不容置疑,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些以物质力量巨大增长为后盾、以劳动者积极性高涨为后盾的组织改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百分之百利用活的动力,用新的方法利用其力量的任务,以便我们今后永远不再听到关于被提拔起来的人变成“被打下去的人”的情况。

这样,同志们,1929—1930年度将光荣地载入我们不久前刚庆祝过其12周年的十月革命之后的那些荣誉年代的系列。

从这些数字的角度看,从我简略地向你们说明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角度看,我肯定地说,不管一切损失和考验,苏联建设的这12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12声丧钟。它们说明,资本主义已经敲过了12点。

主席:现在是9点20分。显然,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只好推迟到明天了。请大家明天11点准时到会。

第二次会议

11月11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请古比雪夫同志作报告。

古比雪夫:在讨论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的时候,首先应当对已经过去的1928—1929年度进行一定的总结。

对下述问题即便稍加注意也是十分重要的:1928—1929年度工人阶级和党是有成绩还是没有成绩?党领导经济的政策是否正确?1928—1929年度曾经存在的争论解决得对谁有利?是党正确还是那些攻击党、攻击党对经济政策领导的正确性的人正确?是党正确还是右倾分子正确?

这些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谈1929—1930年度的前景之前不能不予以回答。

1928—1929年度我们是有成绩还是没有成绩?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已经详细地谈了1928—1929年度的总结,我只想谈谈这个总结的某些方面。

由于党的政策,1928—1929年度我们在社会阶级方面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在工人阶级中我们看到积极性的强烈表现,积极性的空前提高,这表现为自我批评的广泛开展,表现为社会主义竞赛过程的广泛开展。工人阶级为了尽快建成社会主义,为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行动起来了。用不着列举这种积极性的事例,因为在我们近来的整个生活中这种事例屡见不鲜,因为你们大家对这些事例都非常清楚。我只举几个例子,我认为它们能够说明很多东西。就在不久前在列宁格勒沃洛达尔斯克区举行的青年代表会议上确认了这样一件事:“11月7日列宁格勒‘红十月’发电站的一台大功率涡轮机将投入运行。电站锅炉的安装是由德国‘比特纳’(Бютнер)公司进行的,为此招来了受过专门培训的德国工人,他们安装每个锅炉用了五个半月时间,在这样的期限内德国工人安装了两个锅炉,即5号和6号锅炉。工程的技术领导认为这样的安装期限太慢,提出了由苏联工人进行安装的问题,为此在共产党员工长谢尔巴科夫同志领导下

建立了一个由2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的工作成果如下:安装了三个锅炉(水管锅炉,受热面积1750平方米,在苏联安装这样大功率的锅炉是头一次),每个锅炉的安装时间不是五个半月(像德国工人那样),而是两个半月。‘比特纳’公司的技术经理承认青年突击队对锅炉的安装是无可指责的。这个青年突击队的工作使电站工程提前竣工,为生产节约了60万卢布。

沃洛达尔斯克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区代表会议认为,必须让该青年突击队担任其他正在建设的苏联热电站锅炉安装工作,因为在苏联没有这样的专业技能,从事这类工程的熟练劳力至今只能从国外去招。‘红十月’水力发电站第五青年作业队能够理解外国技术,在高功率锅炉安装速度的问题上甚至超过了它。

区代表会议请您最迟于今年11月3日对青年作业队的使用问题给予原则性的答复,因为沃洛达尔斯克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区代表会议这一天将结束自己的工作。

受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委托(签字)。1929年10月31日”

“‘红十月’发电站建设工程工程技术部支持沃洛达尔斯克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区代表会议关于指定我们的青年突击队担任其他正在建设的苏联热电站锅炉安装工作的呼吁,他们曾以自己在工作中的主动精神和对外国技术的迅速理解完成了如‘红十月’发电站高压锅炉安装这样重要的工作。

热力工程部主任、工程师 戈卢布佐夫

1929年10月31日”

你们看到,党的正确政策激发起了工人阶级极大的积极性,1928—1929年度工人阶级已经有可能在建筑战线的某些工段超过外国工人达到的速度。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们,敌对阶级的人们对我们这里的劳动激情的评语是非常有趣的。

我有曾经为美国福特建造过几个最大工厂的一家美国大公司——卡恩(KAHH)公司一位工程师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建设的评语。我就不读整封信了,虽然它非常有趣,我只选读几段:

“当我看到今天为止作出的成绩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讶和满意。建筑工程开始之前,我们在底特律制定了建造工厂各项工作循序向前进展的计划,在检查工程的时候我确信,确实一切都按计划规定的期限完成了。其实,工程的某些部分早在规定期限以前好久就完成了。例如,总装车间的钢结构按照计划本应

于几个月后才完成。而实际上,这些钢结构的建造是9月25日开始的并将于10月23日,即在不到30天的时间内最后完成。应当记住,这个装配车间大概将是现在全苏联最大的工厂建筑物。

锻造车间钢结构的安装是10月11日开始的并将于10月28日前,即在16天内完成。这又是苏联最大的锻造车间。

当然,在这个国家里取得这样的成果我感到很满意,因为这证明,在这个国家里钢结构能够安装得像在美国一样快。”

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份书面报告中,这家卡恩公司写道:

“钢结构安装的迅速和节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行这项工程的苏联工人方面的合作。除了称赞,关于他们我们再无别的话可说。他们比我们的工人更聪明伶俐(有知识)。如果给予他们正确的指导,如果不妨碍他们的工作(这个题目我后面回头再谈),如果给予他们适当的刺激,即让他们的工长和领导者跟他们一样干繁重的工作,我们同他们在一起就能够比同我们美国工人在一起获得更好的成果。

我没有打算对于他们说一些不应得的赞美之词,我只力求描述真正的事实。如果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期限之前在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和必需的材料方面得到相应的支持,那么,我们将通过拖拉机厂建设给你们提供一个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经济、最迅速建造一座工厂的例子。”

卡恩公司的代表接着谈了建设工地上存在的障碍,然而障碍不是工人生产率,不是我们的工人熟练程度低,这些障碍是工程的组织欠缺,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我们领导干部不大可靠和素质低下。他对于我们的工程师说了一些十分尖刻挖苦的话,而且以十分具体的事例论证自己对我们工程师的这种态度。他说:

“这个工程的杂项开支,如拖拉机厂建设工地主任²⁴告诉我们的,占了总开支的30%;在美国杂项开支只占不到7%。巨额杂项开支的形成主要是斯大林格勒有许多事务所,里面挤满了核算计件工作费用和进行各种其他计算的工程师。当全部费用核算出来之后,正如上述情况那样,结果计件工作费用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些工程师中的多数本应当在工程现场并向工人表明应该怎样在生产中进行节约。

当基础已经奠定之后,柯尔德尔先生因为他的钢柱基础螺栓安装法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了他的柱基浇灌法。他不管派来说服他不要这样干的那些团组,继续按自己的办法做。费用的节约和钢结构安装的迅速就是他的方法正确的证明。

有人对柯尔德尔说,在钢结构安装好之前,他不可以砌砖地基。他证明了可以这样做,因为钢柱安装到位之前他已经往墙基里砌了4.5万块砖,因而赢得了那么多施工时间。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说我们应当教你们的工程师采用美国的施工方法,他们应当调整到更易于接受的状态。当我们向他们展示新东西的时候,他们应当观察,他们应当努力把能够使生产效率合理化并加以提高的新东西学到手,而不是每当美国的方法与他们的方法相反时设法中止我们的努力。”

这样,即使我们的工厂在实行美国施工速度方面有延误的话,那么这些延误不是来自我们的工人。受到劳动热情感染的工人能够创造奇迹。这样,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劳动热情的迸发,我们看到工人提高自己生产效率的渴望,我们看到工人对优良工作方法的巨大向往,我们看到工人在实行连续生产中处处表现出的强烈主动精神,而实行连续生产能够使生产合理化,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使用机器和生产工具,能够使我们增加工作日的数量,从而使我们工业的工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我们看到劳动热情的巨大迸发。十分清楚,从我们未来发展的前景的角度看,这个成绩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在农民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对集体农庄的巨大向往。从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的角度和从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角度看,1928—1929年度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不仅贫农加入了集体农庄,中农也如同巨流一般动了起来。整个区、整个民族区准备实现集体化这样的事实说明农民中发生的真正历史性的进展。十分清楚,这种向农村社会主义经营方式方面的进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党的正确政策,是因为有党的列宁主义政策,是因为有党的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政策,是因为有党的领导贫农和中农同富农进行斗争的政策。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1928—1929年度的巨大成绩。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已经详细地谈了1928—1929年度迅猛进行并具有于最近几年以更迅猛、更飞快速度发展的趋势的集体化过程。在总结1928—1929年度党的政策的成果时,我现在只指出这个事实。在这里我们也有巨大的成绩。

社会阶级方面发生的这些巨大进展当然是党规划经济和领导经济的正确政策的结果。在经济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成就。我们现在才确信并注意到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制度、我们的经济管理制度蕴藏着巨大潜力,在这个意义上,1928—1929年度也是意义重大的一年。1928—1929年度表明,五年计划的各个方案——过去曾被称为最佳的方案而且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被许多人认为是可能达

到的成绩的极限,——五年计划的这个最佳方案有变成最低方案的趋势。现在已经显现出来,这是1928—1929年度发现的,在国民经济几乎所有部门和工业所有部门我们将超过五年计划。1928—1929年度在与该年度的计划方案比较时发现,我们在工业产值方面超过了五年计划,在农业的社会主义形式方面,我们在1928—1929年度就已经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1929—1930年度将继续证明,五年计划,即所谓的最佳方案正在变成为最低计划²⁵。实际上,如果由于1930年的收成我们1929—1930年度将从社会主义成分获得50%以上的商品粮(五年计划规定将由1932年的收成中获得43%的商品粮),那么这就说明,五年计划的方案在农业方面也将被超过。从社会主义成分获得50%多的商品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消除粮食危机的开始,消除粮食问题的开始,完全不同的城市食品供应状况的开始,等等。

1928—1929年度,工人阶级的福利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到1928—1929年度末,已经在50万工人中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工资提高了10%以上。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服务增加了。由于为社会保险拨出了巨额资金,社会保险正在成为改善工人状况的巨大因素。我们的实际工资也提高了,而现在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国我们到处看到的是相反的趋势——工资的降低。

这就是1928—1929年度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概况。

党的政策是否正确呢?

有人喊:正确。

古比雪夫:面对着这些成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这一政策是在与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实行的,尽管有人竭力要把党推到别的道路上去。我觉得,这些成果应当告诉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党员,右倾分子的政策遭到了我们的任何一个反对派从未如此迅速遭到的彻底破产。

的确,右倾分子硬说我们的农业退化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成分的迅猛增长。右倾分子硬说发生了危机,必须放慢我们发展的速度;否则,就不能把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²⁶理解为是反对党的工业化速度方面的政策。党采取了这个时期所需要的速度,结果是党成了胜利者。

“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²⁷,——你们记得直接向党、向中央委员会抛出的这个卑鄙的指控。历史将嘲笑这些哑哑乱叫的预言家,哑哑乱叫一阵之后几个月他们就成为了破产者。不是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而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巩固和农民特别是中农对集体经营形式与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巨大向往。联盟在巩固,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在加强。1928—1929年度的成果说

明了右倾分子路线的彻底破产。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任何一个受过右倾分子影响的正直的党员应当公开地承认这一点。

当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控制数字提纲²⁸的时候,李可夫同志说,除了同右倾分子辩论的那一部分,他同意整个提纲。我想,现在用这种态度是躲避不过去的。如果李可夫同志及其同伙认为控制数字提纲里所写的一切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应当说,他们至今主张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能够采取这样的高速度实行农业集体化是正确的,如果明年我们应能够从社会主义成分得到50%多的商品粮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指控苏维埃政权和党“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怎么会是正确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采取这样的高速度发展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关于危机和农业退化的哑哑乱叫和预言等怎么会是正确的呢?如果中央的提纲是正确的,那就是说,确认右倾分子破产的那一部分也是正确的。

1928—1929年度的成果,如我已经说过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群众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积极性,这种巨大的积极性使我们有可能规划1929—1930年度的很高速度的发展。我只谈1929—1930年度我们国民经济工业部分的规划,而且,我要是谈工业所有部门的话,我会耗费你们太多的时间。我只能谈谈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然后对工业计划作一个概括的说明。

我从向工业和国民经济提供粮食的那些工业部门,从能源谈起。这是最重要的工业部门,这也是最紧张的工业部门。我们必须在这些部门提出最紧张和最高的速度,因为不这样就不会有整个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

首先,谈谈电气化。在电气化方面,1929—1930年度计划展开耗资6.08亿卢布(去年为3.69亿卢布)的大规模建设。这比五年计划多很多。五年计划原预计拨出4.5亿卢布用于电气化。这6.08亿卢布中,5.13亿卢布将用于区电站,其余的将用于公用电站和农村电气化。此外,还应该加上包括在工业企业内的工业系统的大规模电力建设。这将耗资1.45亿卢布。

有人喊:不包括在这里。

古比雪夫:这不包括在6.08亿卢布之内。这样,在电力建设方面我们就有大约7.5亿卢布的建筑工程。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首先是过去许多年已经花在电力建设上的那些费用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现在我们比战前时期拥有多得多的电力:战前为19亿千瓦,1929—1930年度为87亿千瓦。19亿比87亿,就是说1929—1930年度我们拥有的电力将比战前多3.5倍。

87亿千瓦——这比1928—1929年度多很多:去年我们拥有65亿千瓦

时。1929—1930年度比去年增长34%。区电站的发展特别迅速,这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我国是自然的。区电站增长54%,而工业电站增长23%。

有人喊:不是到处都是这样。

古比雪夫:工业电站供给的电力暂时还比区电站多。但区电站的增长速度快得多。我可以举出数字。1928—1929年度区电站发电24亿千瓦时;工业电站发电32亿千瓦时。明年区电站将发电37亿千瓦时,即增长54%,工业电站将发电40亿千瓦时,即仍比区电站多,但是区电站已经逐渐赶上工业电站。电站的功率也将大大增加。1928—1929年度发电功率23亿千瓦时,1929—1930年度将为29.7亿千瓦时,增长29%。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两个数字:发电功率增长29%,发电量增加34%。这说明,我们在电力建设方面正在走一条最节约的道路,走一条建造发电功率增加少、发电量多的区电站的道路。

主要建设项目。第一,最近几周和几个月即将完成和已经完成的有:什捷罗夫卡、“红十月”、埃斯哈尔——第一期²⁹……

柯秀尔:什捷罗夫卡完不成。

古比雪夫:怎么会完不成?

柯秀尔:无论如何也完不成。

丘巴尔:涡轮机五个月不想“运转”。

古比雪夫:那里出了故障,但无论如何这台涡轮机完成的时间快到了。

1929—1930年度一系列电站将要竣工。将要竣工的电站有:“红十月”(我已经提到过它)、卡希拉第三期,车里雅宾斯克电站将于1929—1930年度竣工,斯大林格勒电站。关于斯大林格勒电站我应当顺便说几句。我们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了解得很多,但对斯大林格勒发电站正在创造的奇迹谈得比较少。电站六七月份开始建设,现在已经封顶,安装不久即将结束,无论如何不会迟于拖拉机厂建筑工程。在那里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在精心组织和利用相应技术援助情况下我们所能达到的样板。

诺沃罗斯斯克电站将于今年竣工。我就不一一列举正在建设的电站的名单了,它们共有28个。我只提一下斯维里电站,它今年必须加紧建设,第聂伯河电站建设工程、里奥尼河电站建设工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电站、下诺夫哥罗德电站等。

新的区电站开工建设的有:新的列宁格勒泥炭电站、列宁格勒“热力站”^{*}、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博布里基电站(应在莫斯科附近开工建设)、莫斯科“热力站”、位于下诺夫哥罗德边疆区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交界处的尤扎电站、巴克桑电站(暂定)、祖耶夫卡电站……

米高扬:巴克桑电站你每年都说是暂定。

古比雪夫:有许多情况迫使我们考虑建造这个电站是否适当。下萨尔达、卡纳基尔、库兹涅茨克、克麦罗沃电站今年开始建设。

卡巴科夫:乌拉尔没有吗?

古比雪夫:我认为,卡巴科夫同志说得不对,因为电站布局的总趋势是向正东发展。我现在不列举数字,但这些数字十分清楚地证明,电力在东移,其中也包括乌拉尔。

有人喊:卡巴科夫满意了。

古比雪夫:这表现为十分确定的千瓦时和用于东部和乌拉尔的千百万卢布。

外国的技术援助³⁰——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几句。你们知道,我们为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吸引来了外国技术援助。在这里我应当十分明确地说,在这方面我们为其他项目吸引外国技术援助的努力不够。当然,在一些情况下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譬如说,同一家美国大公司,鲁宾逊(Робинсон)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曾同它进行过关于承包祖耶夫卡电站建设工程的谈判,由于这家美国公司提出的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谈判破裂了³¹。现在正在谈论吸引大批外国专家参加能源建设的问题,而且这批专家将达一百人。这样,吸引这种外国技术援助来建造电站我们能够办到,但大型电站的发包暂时尚未成功。

关于对斯维里电站的外援我想说几句。我认为,我们应当采纳库伯的建议,无论如何要吸收他参加斯维里建设工程。斯维里电站建设工程的工作人员和电机工业总局的工作人员对吸收库伯参加斯维里建设工程的方案持不满意的态度。

有人喊:但是应当吸收他。

古比雪夫:我觉得,应当改变这种态度并吸收库伯参加斯维里电站的建设工程,甚至尽可能地以比第聂伯河工程时更积极的形式吸收他参加。有关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工业的第二个能源部门是煤炭。煤的情况极端紧张。1929—1930年度我们向煤炭工业提出了很大的任务。战前我们生产煤炭2 890万吨。1929—1930年度我们将生产5 160万吨,即比战前时期增加将近一倍。

罗伊津曼:可我们投入了多少钱呢?四倍多。

古比雪夫:非常明显,这是投入资金的结果。这比去年(我们生产了4 100万吨)多27%。这比五年计划原先预定的1929—1930年度的任务多。按照五年计划,原先预计产煤4 660万吨,也就是说,1929—1930年度我们打算比五年计划原先预定的多生产500万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担负着特别重的任务。然而,这一紧张的任务即使完成,也不能确立绝对稳定的燃料平衡。需求在非常迅速地增长。譬如说,我们是在对煤的需求速度的增长大大高于计划预计的情况下,在许多煤区多少欠产的情况下度过1928—1929年度的。1929—1930年度不会预示我们储备会有较大的增加,即使在计划全部完成的情况之下。但计划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这是一项战斗任务,它几乎是1929—1930年度一切任务中最重要任务。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煤炭计划……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要特别注意顿巴斯的情况。

古比雪夫:特别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因为顿涅茨克的煤决定一切。

斯大林:乌克兰人不想完成?

柯秀尔:相反。

古比雪夫:我个人认为,连续工作制³²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艰巨、紧张的任务。在煤炭工业中我们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实行连续生产。我们认为,1929—1930年度整个煤炭工业的80%应当转入连续生产,也许甚至应当超过这个百分数。我们正在研究,为什么不能在剩下的20%的部分也实行连续生产。有人借口说在某些工区实行连续生产在技术上有困难,有人借口说这在技术上是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党组织、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任务是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并尽可能于今年就把整个煤炭工业转为连续生产以利于煤炭计划的完成。

应当注意到,对煤炭工业的基本建设拨给巨额的资金。罗伊津曼同志提醒说,一直不断地在投入大量资金,他说得对。往年,煤炭工业占了当时国内进行的基本建设工程最大的一部分。今年我们拨给煤炭工业2.68亿卢布(去年为1.65亿),即比去年多1亿多。五年计划原预计为2亿,这样,就比五年计划的预计多了6 800万卢布。

这些巨额拨款必须用于不惜一切地保证1929—1930年度采煤任务的完成并为以后几年的采煤任务作好准备。

我要指出的是,在勘探方面,1929—1930年度我们比往年大大增加了拨款。下面就是煤炭勘探拨款的变动情况:1927—1928年度——350万,1928—1929年度——800万,1929—1930年度我们为此拨款1 450万卢布。

煤炭方面将进行哪些基本建设工程?在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将继续开掘

16个新矿井和改造14个老矿井,而且16个新矿井中的9个将于1929—1930年度投入使用,其煤炭生产能力约800万吨。将重新开始开掘3个新矿井,5个矿井将进行大规模改造。为开采莫斯科郊区的煤将进行大量工作,在那里继续开掘11个新矿井并开始建设4个新矿井。在乌拉尔煤炭托拉斯建设5个大型矿井和5个中型矿井;在远东煤炭托拉斯建设2个矿井;在西伯利亚煤炭托拉斯建设5个新矿井;在中亚建设2个大型矿井,总生产能力为60万吨煤炭。最后,应当提一下特克瓦尔切利³³,正拨款500万卢布开采那里的煤层。你们知道,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政府仍然决定为这个煤田预留了一定的资金,以便对这个问题详细研究之后——这种研究恰巧现在正在进行——春天就开始对特克瓦尔切利煤田第一批煤矿进行开采。

在机械化方面今年将取得重大进展:与1928—1929年度的25%相比,如果拿所有煤矿来说,我们各地区的机械化采煤将达到39%,如果拿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来说,1929—1930年度我们的机械化采煤将达到44%。

考虑到煤炭工业极为不利的干部情况,比任何地方都更加不利的情况,在为这个工业部门吸引外国技术援助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因为破坏活动在那里展开得最为广泛,用外国力量补充我们工程师队伍的需要在那里表现得最为迫切。

我们有一些设计新矿井的外国单位:例如,同美国“阿伦加尔西亚”(Аленгарсия)公司签订了合同,而且这家公司的一批工程师将到我们这里工作并设计顿巴斯和西伯利亚的一些矿井;其次是美国罗伯茨和希弗(Робертс и Шеффер)公司,它将在境外工作,在那里为顿巴斯制定设计方案;最后是“斯图尔特”(Стюарт)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将在我国工作,承担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莫斯科煤炭托拉斯和乌拉尔的矿井设计项目。在开掘方面我们为西伯利亚同三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合同。其次,为顿巴斯同蒂森(Тиссен)签订了合同,同古特曼(Гутман)签订了截煤机合同。最后,“斯图尔特”(美国公司)将给我们派几位大工程师从事合理化工作。

除了必须完成产煤计划之外,我应当强调我们国民经济各部门降低燃料单位消耗量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1929—1930年度必须完成的一项硬任务。工业部门燃料单位消耗量应减少12.5%—13%,运输部门应减少5%。应当指出,1928—1929年度减少燃料单位消耗量的任务,工业和运输业都完成了,甚至有所超额。

在石油方面,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生产7.47亿卢布的原油(五年

计划提出的任务为 6.07 亿卢布,1928—1929 年度实际完成 6 亿卢布)。与 1928—1929 年度相比,增长 17%。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新地区的问题。经济管理机关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开发新的地区上,包括乌拉尔、恩巴区和乌赫塔。这些地区无论如何应当处于所有经济机关经常的集中注意之下,以便为明年的出口和为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需求形成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乌拉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³⁴,将要打至少 50 个钻井,以便使乌拉尔 1929—1930 年度就成为提供石油、提供燃料的开采单位。

1929—1930 年度石油方面将要进行的基本建设工程总额为 2.86 亿卢布(五年计划原预计为 2.3 亿卢布)。应当指出哪些工程?巴统一巴库输油管道的结束,巴统炼油厂及那里的裂化工厂。1929—1930 年度将建成 14 个裂化工厂,其中杰宁斯(Джейнингс)公司的 3 个和温克列尔-科赫(Винклер-Кох)公司的 8 个 1929—1930 年度将投入运行。11 个裂化工厂 1929—1930 年度将投入运行。这是一种此前不知道的全新的生产方法,即通过一定的工艺流程对重油进行加工而提取汽油。格罗兹尼—图阿普谢输油管道的扩建,炼油厂和其他工厂的建设。将进行 57.5 万米的钻探(去年为 46.5 万米)。应当指出,在石油工业领域将继续推行合理化措施。比如说,回转钻探将达到 78%,抽油井将达到 85%。1929—1930 年度,油井电气化将达到 95%,即接近完成,而在巴库油井电气化将达到 100%,那里全部油井将实现电气化。

吸引外国技术援助的事情进行得不是特别顺利。我在概述每个工业部门的时候都将谈到外国技术援助的问题,因为我认为,1929—1930 年度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采取我们为 1929—1930 年度和以后几年提出的速度,那么,外国技术援助的问题,掌握外国新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和建筑工艺方法的问题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石油领域外国技术援助的情况不是特别顺利。例如,我们同法国施柳别日(Шломберже)公司订有用电法勘探石油的合同。还打算同一家外国公司签订建造裂化工厂并把这个生产项目放在塔甘罗格工厂的合同(同温克列尔-科赫公司)。就钻探工具问题,就是说在我国生产这种钻探工具(在巴库的以中尉施米特命名的工厂)的问题,也打算同爱姆斯科(ЭМСКО)或者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签订合同。这就是关于石油领域外国技术援助的情况我们所能告诉你们的一切。

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对此应当予以十分重视。如果我们完全掌握了美国的生产、钻探和勘探方法,就能使工序更加合理化,就能达到比现在更好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开掘费用还太贵,我们的钻探开掘期限还太长,等等。这一切都

应当纠正和改进。如果我们在石油领域按美国人的方式工作,我们就能够用给石油的同样数目的拨款取得更大的成果,1929—1930年度就不是增长17%了。

我现在转向不属于能源的各工业部门。我必须谈谈这一个工业部门,因为它是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无论如何我们要把我们的机器制造业推向前进,以便改造我们的国家。工业、农业、运输业无论如何都需要机器。机器的奇缺几乎是我国现在所有的一切所谓“货荒”中最厉害的一种了。我们被迫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为了工业,为了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我们被迫从国外进口机器。我们只得进口拖拉机,我们只得进口农业机器、汽车。由于我们国内没有制造完美的和现代化的机器的可能,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好用旧的生产方法对付。这就需要钢铁。这就是为什么未来1929—1930年度工业工作的最重要方面是钢铁,是黑色冶金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黑色冶金工业已经越过多年压在它身上的那个不祥的战前水平。你们记得,当许多工业部门已经远远地跨过战前水平的时候,黑色冶金工业仍然处于这条耻辱线之下,因为黑色冶金工业的战前水平低得可怜。黑色冶金工业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战前水平,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应当有更大得多的进展。当我谈黑色冶金工业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有关我们将给黑色冶金工业的拨款情况和黑色冶金工业部门应当建设的工厂的情况。

十分清楚,铁矿是黑色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关于铁矿应当说几句。

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很糟糕。我们为1929—1930年度确定了高速度。我们希望开采铁矿石1100万吨(1928—1929年度我们开采了700万吨),即增长55%。

在这个重工业部门这样的增长速度当然是非常困难和紧张的。五年计划原预计1929—1930年度开采1020万吨,这样一来,我们就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其中,南方矿业托拉斯接受了十分紧张的任务——700万吨(五年计划原预计为590万吨)。这个紧张的计划能不能完成呢?我认为能够完成,要是坚决改变作业方法的话。还是举外国技术援助为例。在美国和欧洲技术向前迈进了很大一步的这个重工业部门,看来,正是在这里可以尽可能广泛地吸引外国的援助;然而,我们仅仅在同美国诺顿(Нортон)公司就矿业设计、合理化和开采方面的技术援助合同进行谈判。这项合同有望在两个星期之后签订和实行。合同将对南方矿业托拉斯和乌拉尔矿有效。但这当然是极其不够的。这里需要实行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这里需要加速矿井的开掘,改进和完善勘探方法。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我们的勘探工作进行缓慢而花费大量资金,

我们的开掘工作进行得不好,我们对矿井经营不善。从国外来的所有同志都说,那边在这方面有很大成果。无论如何要把这些成果学到手。

今年矿山的基本建设费用大大超过我们去年的拨款。我们拨给南方矿业托拉斯3 200万卢布(去年的拨款为2 000万卢布)。因此,应当要求采矿工业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个艰巨紧张的计划。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我们这个时期的所谓轴心工业部门,这就是黑色冶金工业。提出的1929—1930年度的任务也大大超过五年计划原先的预计;我们提出的目标是生产550万吨生铁(五年计划认为,该年度提出生产500万吨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同1928—1929年度相比,这个任务就变得更为紧张了。这一年我们生产了420万吨,即大约相当于战前的生铁产量。现在我们要比1928—1929年度多生产32%,从而也比战前要多生产32%的生铁。

钢的生产计划也很庞大——610万吨(五年计划原预计为520万吨),钢材——480万吨(五年计划原预计为400万吨)。以价值计算,冶金工业今年必须提供10亿卢布的产品(以价值计算,冶金工业去年提供了8.2亿卢布的产品)。这就是黑色冶金工业的巨大而又紧张的任务。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数额很大;给予黑色冶金工业5.17亿卢布,即比1928—1929年度的2.64亿卢布几乎翻了一番。基本建设工程在这个部门的这种集中,我认为,会被1929—1930年度和随后几年的整个国民经济情况证明是正确的。顺便说一句,五年计划原预计1929—1930年度拨给3.65亿,而现在拨给了5.17亿。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十分清楚,这个数字后面有对现有企业的巨大改造工程,这个数字后面有新的工厂;今年黑色冶金工业部门的新建项目将占用1.44亿卢布。

新建项目有哪些应当指出来呢?第一,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厂,为其拨款4 000万卢布;库兹涅茨克厂——2 700万;刻赤——为结束第一期工程——1 900万;马里乌波尔制管厂——1 400万;扎波罗热冶金厂(工程展开初期)——1 500万;恰图拉的锰矿——600万;最后,远东继续建设中的彼得罗夫斯克厂——300万。这一数字中的较大拨款用于原料部门,即用于为高炉准备原料,用于烧结设备,用于供料的机械化等。

大家还对过去曾经列入计划、现在我又没提到的一些工厂感兴趣。比如说,克里沃罗格厂;看来,今年我们只能做到拨款完成该厂的设计了。要建造比已列入计划的更多的大冶金企业,我们无论在技术上,无论在干部人力方面还是在资金方面看来都是无法做到的。

米高扬:瓦列伊基斯说,你们不想建利佩茨克厂。

古比雪夫:不对,只是在进行利佩茨克厂的设计和最初期的准备工程。矿石只好运往南方。整个建厂期间都将如此,所以早一年晚一年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年无法开始建这个厂。我们应当把精力集中于已经开工建设的那些工厂。我们应当把精力集中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厂,一定要为它吸引有资质的外国技术援助,吸引来参加设计,参加编制施工图纸和参加该厂的建设本身,以便以我们在建筑开始达到的速度建设这个工厂。

有人喊:你给捷尔别斯³⁵多少钱?

古比雪夫:2 700 万卢布。

对库兹涅茨克厂也是这样,对待扎波罗热厂也是这样。扎波罗热厂应当加紧建设,以便能赶在第聂伯河电站投产前建成。应当把精力集中于这些工厂并且无论如何要达到美国速度。我要特别提一下刻赤厂,应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最后消除工业身上的这个脓疮了,应当完成可能使刻赤厂开始赢利性经营的一切工程。因此,那里的工程也应当加速进行,这1 900万卢布应当结束刻赤厂第一期建筑工程,以便刻赤厂有可能生产35万吨生铁。

我们黑色冶金工业吸引外援的情况不是很顺利。我们同弗莱恩(Фрейн),同德国普佩(Пуппе)设计公司订有设计冶金工厂的合同。但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吸引的是像我们与奥斯汀的合同那样能够保证我们建设工程本身的速度和质量的那种技术援助。我们还不能建造冶金工厂。我们能够建造个别的高炉,建造个别的平炉车间,而且工期长,费钱多,但要建造像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这样的巨大冶金企业——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按最初方案产量为65万吨,按现在制订的方案在高炉数量相同的情况下能够生产110万吨,而在高炉产量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甚至能够生产250万吨——建造这样巨大的工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因此,为这些大工厂吸引外国援助是即将领导黑色冶金工业的机关的战斗任务。

伏罗希洛夫:世界上什么地方真的有这样的工厂吗?

古比雪夫:能生产110万吨生铁的工厂在美国有几个,根据最新的调查情况,德国克虏伯的产量不低于此。但要是我们把它扩大到250万吨,那么这将是欧洲绝对没有、美国也极少见的工厂。那里有两三个产量超过200吨的工厂。

在有色冶金工业领域我们今年必须取得重大进展。预计铜的产量增长32%,铅的产量增长39%,但这还都是绝对满足不了我们国民经济需要的产量。

今年的基本建设工程量将比1928—1929年度大大增加。1928—1929年度

拨给了有色冶金工业4 600万卢布,今年我们将拨给1.13亿卢布。五年计划原预计为7 400万卢布。这样,我们拨给的资金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的预计,比1928—1929年度增加1.5倍。因此,今年有色冶金工业的工程面是非常大的。此外,由于我们矿石的加工过程的技术复杂性,这也是责任非常重大的。政治局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对有色冶金工业和黄金工业实行合并,建立一个管理有色金属、白金和黄金的统一联合机构³⁶。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受命担任这个联合机构的领导。这个部门,有色冶金工业部门面临的工作很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十分复杂的有色冶金工业的地区布局问题。

首先,哈萨克斯坦有有色冶金工业。这是一个中心地区,看来我们只能以它为发展我们有色冶金工业的基地。乌拉尔有有色冶金工业。外高加索有有色金属。不同的埋藏条件,不同的混合物,这一切使处理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因此,除了巨大的工程量,还需要解决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吸引外国援助在这里也是顺利完成计划的条件之一。已经签订的合同有:同“维列尔”(Уиллер)公司(美国)的新工厂设计合同,而且已经有17名工程师在这里工作;同法国“久尔-铝业”(Дюр-Алюмений)公司的合同;同德国“瓦尔特·米特克(Валтер Митке)”公司的特种锌生产合同。正在同法国铝业公司进行谈判,但这种谈判未必能够达到圆满的结局,因为法国铝业公司要价太高。显然,吸引外国技术援助的这个范围应当大大扩大。

如果黑色冶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现时期保证和决定其他所有部门的轴心工业部门,那机器制造业就是由于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革命性作用而应当受到我们特别注意的工业部门。我想更详细地谈谈拖拉机制造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因为这个工业部门1929—1930年度和最近几年应当成为不仅是各工业机关,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全国,特别是农民注意的对象。农民以期待的目光看着工业并等待着我们什么时候会给他们廉价的拖拉机和足够数量的农业机器。对集体化自发的向往,巨大的向往就因为农村缺乏这种动力而受到限制。靠马,靠木犁和陈旧的犁是难以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农场的。需要拖拉机,需要复杂的农业机器。因此,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了拖拉机制造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问题。政治局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并最后拟定出一个拖拉机制造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近几年的明确计划³⁷。而且,这个计划是比向任何工业部门提出的一切计划中的任何计划都更为紧张的计划。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在这个部门我们应当采取最紧张的速度。我们应当以无产阶级国家在动员工人阶级全部精力和全部意志的情况下所能达到

的极限速度前进。只要是可能的,我们就必须做到,因为不然的话……

柯秀尔:甚至超过我们的所能。

古比雪夫: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延误对农业的服务,因为不然的话,工业就会变成农业集体化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带动它前进的因素。因此,政治局在这方面采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前所未闻的速度,是绝对正确的。

在拖拉机制造业方面我们有什么打算呢?首先是我们有什么?我们现在有普梯洛夫工厂的拖拉机车间,1928—1929年度它生产了3000台拖拉机,1929—1930年度它应当生产1万台拖拉机(10马力挂钩式福特牌拖拉机型)。大家都知道,这种拖拉机虽然在逐渐改进,但已经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大农场的需要。大农场,大集体农庄,尤其是规模巨大的国营农场需要功率大得多的拖拉机。然而我想预先警告所有轻视这个工厂和这些拖拉机的人。

米高扬:说得对。

古比雪夫:对这些拖拉机的这种轻视态度是存在的。

柯秀尔:说得对。

古比雪夫:有人说:“哼,普梯洛夫的拖拉机算什么。”

这是绝对错误和有害的看法。普梯洛夫的拖拉机在开创我们农业集体化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当普梯洛夫工厂年产2万台拖拉机的时候,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柯秀尔:说得对。

古比雪夫:政治局向它下达的计划是2万台拖拉机。从1929—1930年度起,普梯洛夫工厂必须生产1万台拖拉机。这些铁马还将在我们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田地上大大地干一场,还将大大地帮助我们的党和国家把农民拉到社会主义一边。拖拉机的每一匹马力能耕12—15公顷;每一台普梯洛夫拖拉机能耕120—150公顷集体化了的土地,社会主义的土地……

米高扬:还有这土地上产的粮食。

古比雪夫:每1000台拖拉机就是15万公顷耕好的土地,每1万台拖拉机就已经是150万公顷集体化了的土地。这样,150万公顷集体化了的土地将由普梯洛夫工厂1929—1930年度生产的这一数量的拖拉机得来。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已经是一个极其有分量的,无论如何不能轻视的重大的经济现象。

柯秀尔:现在它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古比雪夫:是的,它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能从国外进口很多拖拉机。
有人喊:一点也不错。

古比雪夫:这样,1928—1929年度我们得到了普梯洛夫工厂3000台拖拉机;我们得到了哈尔科夫工厂生产的200台拖拉机,它们的功率大得多,50马力的。

柯秀尔:怎么是200台?是600台。

古比雪夫:不,我说的是去年。200台50马力的拖拉机就等于普梯洛夫工厂的1000台拖拉机。今年我们将生产600台,这相当于普梯洛夫工厂的3000台拖拉机,即大约为普梯洛夫工厂1928—1929年度的产量。这样,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小了。我们在哈尔科夫工厂生产了200台拖拉机,还将生产600台,即增加两倍。我认为,如果在这方面加劲干,可以在哈尔科夫工厂生产更多的拖拉机。我觉得,波斯特舍夫同志、哈尔科夫和乌克兰各级组织应对此事予以注意并学习列宁格勒的经验,普梯洛夫工厂的经验。

柯秀尔:我们会努力的。

古比雪夫:我觉得,这一点柯秀尔同志应当记在心里,因为乌克兰人现在提出的反对可能生产超过600台拖拉机的那些有力的理由,过去在普梯洛夫工厂论证只能生产2000—2500台拖拉机的时候也曾经提出过。然而,生活驳倒了这些理由,3000台拖拉机在“红色普梯洛夫工人”工厂生产出来了。我认为,哈尔科夫的工厂会承担起为农业生产拖拉机的任务的。

[有人喊:那里还生产别的东西。

柯秀尔:为伏罗希洛夫生产汽车。

古比雪夫:这项生产我了解,但是农业用拖拉机的产量是可以增加一些的。]³⁸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其余的靠进口。1929—1930年度将有6万台拖拉机在苏联田野上耕作。从现有需要的角度看,这当然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据统计,在农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就需要40万台拖拉机进行田间作业。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我们只有6万台。

今后几年我们将拥有什么呢?1929—1930年度,我们将拥有“红色普梯洛夫工人”生产的1万台拖拉机和600台哈尔科夫拖拉机。其他再也没有什么了。今后几年我们将拥有什么呢?政治局决定: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1930—1931年度就应当生产2.5万台15马力挂钩式轮式拖拉机³⁹。生活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至有些同志也有点看不起斯大林格勒厂。说这其实不是拖拉机,而是一种莫名其妙东西。

柯秀尔:给他们空中拖拉机。

古比雪夫:他们需要功率大得多的拖拉机。我对于普梯洛夫工厂所说的一切,在更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些拖拉机将在我们的农业中起到革命的作用。1930—1931年度就得生产2.5万台。任务非常艰巨。工厂的建设期限是十分紧张的。比如说,在美国建厂期限比我们现在按照政治局这个决定所规定的期限要长得多。但这个决定必须完成。

特别是对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其建设速度必须进一步加快,1930—1931年度的生产准备,包括材料方面的准备、熟练劳动力方面的准备等等,必须于1929—1930年度最后两个季度开始。总之,从1930年10月1日起必须开始大批量生产拖拉机,因为年产2.5万台拖拉机,这已经是大批量生产。考虑到两班倒和连续工作制,斯大林格勒厂在完全建成之后应当生产5万台拖拉机⁴⁰。

彼得罗夫斯基:哪一年?

古比雪夫:下一年,即1931—1932年度就要生产5万台拖拉机。这将是它的最终生产能力。

其次,政治局决定1929—1930年度开始建造两个大功率拖拉机厂。一个厂在车里雅宾斯克(50马力履带式拖拉机),设计生产能力应为3万台拖拉机。

莫洛托夫:4万台,只是第一年生产3万台。

古比雪夫:4万台拖拉机,完全正确。考虑到连续工作制和两班倒,第一年生产3万台。第二个工厂是南方厂,从1929—1930年度开始,它应当同样以加强的速度建设。这个厂应当生产30马力的挂钩式拖拉机,产量为5万台。这个问题曾经在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里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毫无疑问的确定,我们的国民经济既需要50马力的,也需要30马力履带式的拖拉机。

车里雅宾斯克厂将生产50马力的拖拉机,南方厂生产30马力的。最初曾经设想把车里雅宾斯克厂和南方厂都建成生产两种类型拖拉机的工厂,但因为两个工厂同时开工建设又同时开始生产拖拉机,于是为了使拖拉机便宜和为了生产更方便就决定,把一个建成为生产50马力拖拉机的厂,把另一个建成为生产30马力拖拉机的厂。为什么生产50马力的在乌拉尔而不在乌克兰?这是因为需要50马力拖拉机的巨大国营农场离乌拉尔近一些。此外,因为关于这个厂的谈判已在美国进行并且已经确定将为其进行设计的公司等,所以它更有可能稍早一些开工建设。

我们将尽力设法使两个厂1929—1930年度以同样的速度建设。政治局决定为每个厂的建设拨款5000万卢布:5000万卢布给车里雅宾斯克厂,5000万

卢布给南方厂。但因为早先只计划建车里雅宾斯克厂,所以只就车里雅宾斯克厂在美国开始进行谈判。

我还忘了告诉你们政治局的一个决定,是关于中耕作物拖拉机的。政治局建议在规定期限内对这个问题再加以研究,以便弄清为普梯洛夫工厂拖拉机生产拖挂的设备的可行性,如不可行,即预先决定从1930—1931年度起开始建造这一工厂。

有人喊:建在哪里?

古比雪夫: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拖拉机将是15马力的,三轮的。这就是拖拉机制造的计划。这个计划预先决定了什么呢?当所有工厂都投入运行之后,我们将每年生产43万台折合为10马力的标准拖拉机。

米高扬:400万匹马力。

古比雪夫:400万匹马力。顺便说一句,我提供的是有些缩小了的统计数字,因为我没有计算南方厂的投产期限和生产能力。如果这样计算,我们每年将增加500多万匹马力。500万匹马力将注入国民经济之中。十分清楚,这将彻底改变整个农业。当然,我们不能于最近一年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拖拉机。1929—1930年度仍将是拖拉机的荒年;1930—1931年度也将是拖拉机的荒年,因为只能靠斯大林格勒厂的2.5万台拖拉机和普梯洛夫工厂的2万台来解决这种饥荒。而对拖拉机的需求将大大增长。1931—1932年度情况就会开始大大缓解。这个庞大的拖拉机计划一定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受到表扬,因为我认为,政治局关于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这个决定是近来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因为这个决定反映了我国农村目前正在发生的那些巨大的社会变革。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局决定制定这样一个与农村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相适应的向农业提供生产工具的计划。

关于农业机械我较简要地说一说。政治局已经批准了政治局一个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计划将农业机械的产值增加到11亿卢布(五年计划原预计为6亿卢布),而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数额中机引农具的数量大大增加。在现在批准的计划中机引农具将占60%—70%,而在五年计划中这种机引农具只有27%。这样,无论从数量上说还是相对而言,机引农具的计划增长幅度都大大高于五年计划原先的预计,而且政治局认为这个农业机械制造计划,特别是机引农具部分,是最低的计划。

说到农业机械制造计划,还应当谈一谈联合收割机。这是一种我们的农业至今还不知道的而又在农业生产技术中起着巨大革命化作用的新机器。很自

然,要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大农场,我们必须对这种机器给予极大的重视。这种机器在美国所有大农场里开始得到大规模推广,它在实践中博得了毫无争议的承认。我们打算在联合收割机方面开始实施一项广泛的计划。从1929—1930年度起在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附近开始建造一个新的联合收割机厂。1929—1930年度已拨给它相应的资金。它将使用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厂的一些车间——铸造车间和锻造车间,但这实质上将是一个新工厂,而不是我们从前所说的车间。其次,也是从1929—1930年度起在西伯利亚建造一个专门生产联合收割机的工厂。

米高扬:在新西伯利亚?

古比雪夫:在新西伯利亚。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将拨给该厂2000万卢布的巨额资金,因为那里不仅需要建造机械车间和装配车间,而且需要建造备料的铸造车间和锻造车间。它的费用初步定为4000万卢布。今年拨给2000万卢布。这两个工厂必须以美国速度建成,而且罗斯托夫厂必须于1929—1930年度内建成并于1930—1931年度拿出产品。西伯利亚厂的工程比较复杂一些(需要建造铸造车间和锻造车间),所以不可能于1929—1930年度结束,但是1930—1931年度建筑工程必须结束。

还剩下一个关于“公社社员”工厂的有争议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关于把乌克兰扎波罗热“公社社员”工厂改为联合收割机厂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应当予以支持……

丘巴尔:我们欢迎。

古比雪夫:〈支持,〉因为那里已经生产出这种联合收割机,因为那里有一切可能安排生产至少8000台联合收割机,这样做是比较有利的。这个问题将专门研究,政治局将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专门报告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政治局决定于短期内,好像是一个月内提出一个关于萨拉托夫工厂,关于萨拉托夫工厂计划的报告。我所以提起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很可能现在就需要把1929—1930年度开工建设的萨拉托夫复式农业打谷机厂改成与柳别尔齐厂协作生产联合收割机的工厂。

有人喊:政治局又把中央黑土地带州忘了吧?

古比雪夫:您怎么老是提中央黑土地带州?

柯秀尔:顿巴斯正移交给中央黑土地带州。

[米高扬:跟马铃薯一起。]⁴¹

古比雪夫:请允许我就此结束关于农业机器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的部分。

臧声：应当休息一会儿。

主席：你还需要多少时间？

古比雪夫：我请求再给一个小时。

主席：古比雪夫同志请求再给他一个小时，看来，需要休息一会儿。宣布休息 10 分钟。

(休息以后)

主席：现在继续开会。由古比雪夫同志发言。

古比雪夫：关于汽车制造业简短地说几句。汽车制造业具有巨大的国民经济意义，对其急切的需求也在极其迅速地逐年增长。我们现有的基础，如你们所了解的，很微小而又薄弱。1928—1929 年度总共只生产了 1 400 辆。1929—1930 年度这一产量将大大增加，但由于增长是从零开始，所以汽车的绝对数字将是很小的。1929—1930 年度我们将生产和装配 1.2 万多辆。这 1.2 万辆汽车的构成如下：1.05 万辆福特汽车将在下诺夫哥罗德和从春天起在莫斯科我们的装配车间里组装。雅罗斯拉夫尔将生产数量不多的汽车。莫斯科汽车联合公司将生产 1 800 辆。

有人臧：你们什么时候将在哈尔科夫组装？

古比雪夫：这个年度的组装计划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因为组装汽车的数量暂时很小，从明年起，当福特汽车零部件进口增加之后，组装将在更多的地点进行。总之，1929—1930 年度我们总共将组装和生产 1.23 万辆。今后几年的汽车制造计划也相当大。莫斯科汽车联合公司的一个工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正在扩建为两班制生产 5 万辆的规模，而且将生产两吨半的汽车。该厂必须作好 1930 年 7 月就生产这么大量汽车的准备。第一年显然生产不出 5 万辆，但工厂必须于 7 月份就这种生产能力做好准备。下诺夫哥罗德厂，考虑到连续工作制和一些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现在估计生产能力为 14 万辆。那里将生产小轿车和一吨半载重汽车。从 1931—1932 年度起该厂将以全部生产能力运转。根据与奥斯汀的合同，工厂的建筑工程应当于 1931 年 8 月竣工。

米高扬：这只是厂房的建筑工程还是连同安装一起？

古比雪夫：连同安装一起。最后 1931—1932 年度就开始大批生产。

雅罗斯拉夫尔厂设计生产能力为 1.25 万辆载重三吨半的卡车，这只是一个班，两个班将多得多。雅罗斯拉夫尔厂的问题暂时尚未最后解决。这个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工程未列入 1929—1930 年度的控制数字。雅罗斯拉夫尔这个新

工厂的建设工程 1929—1930 年度还开始不了,暂时我们没能为该厂引来外国技术援助。今年应当加紧进行设计和同外国公司就它们参与工厂的设计和建设工程进行谈判。关于军用汽车及其车型问题还没有决定,这些汽车比下诺夫哥罗德厂所生产汽车的功率更大因而也更贵的。关于地点。列宁格勒在争,而且应当说不无理由,哈尔科夫在争,还有那雅罗斯拉夫尔也在争。这个问题必须成为今年之内研究的对象,以便 1930—1931 年度开始该厂的建设工程。

由这项建筑工程决定的汽车制造业计划必须进行修改,这特别与拖拉机制造业的庞大计划有关,因为如果农业将每年得到 500 万匹马力在土地上进行作业,那么显然,农业所需要的运输工具也就比此前预计的要多得多。

米高扬:特别与联合收割机有关。

古比雪夫:是的。特别与联合收割机有关,因为每一台联合收割机必须有一辆卡车跟着装运粮食。因此,汽车制造业计划必须修改。这是近期的任务,鉴于农业和工业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看来中央委员会有必要于近期重新研究汽车制造业的问题⁴²。说到拖拉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不能不谈一谈汽车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的辅助产业问题。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必须在优质钢生产、橡胶生产、电气装置生产和最后在燃料方面实行根本性改进。为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庞大计划服务的问题必须尖锐地提出来。现在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1929—1930 年度正在采取一些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近来拖拉机制造业计划的增大,1929—1930 年度采取的一切措施显然将是不够的。在优质钢方面,现在正在进行工作并且已经制定了一个利用现有工厂生产适合汽车和拖拉机需要的钢的明确计划。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计划必须大大扩大,为此必须追加拨款。在橡胶方面,将在雅罗斯拉夫尔建造一个大的橡胶联合企业生产汽车外胎。

既然我已经谈到了橡胶生产,我想简短地说明一下国产橡胶的状况。由于我们依赖从外国进口橡胶,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1929—1930 年度我们就要花费几千万卢布进口 2 万吨。如果爆发战争或者国际上发生什么复杂情况,我们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因此,为橡胶生产寻找国产原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自己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⁴³。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需要把经济机关和党组织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我们联盟的一些实验室生产人造橡胶的工作暂时尚未得到什么良好的结果。已经证明,可以从酒精中和其他的来源提取橡胶⁴⁴,但这种橡胶非常昂贵,对其进行工厂生产绝对不会证明是合算的。最近开始朝着利用我们的橡

胶植物方面进行考虑。

乌克兰现在正在对能产一定数量橡胶的一种特别植物进行试验。根据基辅的同志们的倡议,种了几十俄亩这种植物,试验还处于未完成的阶段。看来,只有在一年时间内才能够说利用这种橡胶植物是否有利。它的出胶率比较低。如果把这种植物全都拿来,出胶率为1.5%—2%⁴⁵。在我们联盟的另一端,在哈萨克斯坦发现了另一种从粉苞苣中提取橡胶的方法。这是一种生长在沙漠里的对水分和土壤要求很低的植物。由于昆虫、幼虫的危害或者由于对根的机械损伤,它的根部形成了瘤。由于根周围全是松散的沙子,那里积存的液汁与沙子混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根瘤,这种根瘤含沙约80%,含橡胶8%,其余的为树脂,而树脂极为宝贵,是工业和国民经济,尤其是橡胶生产所需要的。橡胶同树脂分离很容易,同沙子分离更加容易。这样,采集这些根瘤能够使我们得到国产橡胶。政府决定今年计划以相当快的速度对这种根瘤进行采集工作。顺便说一句,已经进行了实验室试验。首先是树脂和橡胶同沙子分离,其次是橡胶同树脂分离的方法已经研究出来。已经用所提取的橡胶制造出一些产品,其质量不低于从国外进口的外国产品。现在关键在于采集这些根瘤。这种植物分散在相当广大的地区,其分布很少一株挨着另一株,因此采集是个很大的困难。应当走与游牧人签订预购合同的道路,他们在这些地方游牧的时候,可以采集这些根瘤。我们认为,只要作出巨大努力,我们今年就能采集到够生产2000吨橡胶的根瘤。我们再进口2万吨。如果这一点做到了,那将是前进了一大步。顺便说,不久前有人对我讲了一件奇特的事情,说在离被发现粉苞苣产地不远的地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进行了巩固土壤的工作,而且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沙地上种植能够适应那里环境的植物。当时,他们虽然并不了解这一点,专门为了巩固土壤,在那里种下了大量粉苞苣(因为恰巧选了这种植物)。这样,似乎意外地建立了一个粉苞苣种植场。这一情况必须核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布尔什维克的上帝”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因为那就不仅能够在荒漠里采集这种根瘤,而且在种植这种植物的地带采集。今年必须开始在各个种植场里栽培这种粉苞苣的工作。我们现在摸索出的这条道路对于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摆脱从国外进口橡胶是否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暂时还很难说。但是接触此事的工作人员却满怀信心和希望,认为这条道路就是最终解决我国橡胶问题的道路。

我已经谈了使拖拉机和汽车的电气装备的生产速度与汽车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协调一致的必要性。现在我来谈谈必须承担这项供应的电工器材工业。电工器材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很大的。下面是一些数字。电工器材工业的产值战

前为6 300万卢布,1928—1929年度已达到2.71亿卢布,而明年计划为4.6亿,即比去年增长70%,比该工业部门战前的产值增长6倍。五年计划原先预计今年生产价值3.3亿卢布的产品,而我们打算生产4.6亿卢布的产品。这样,我们就比五年计划有了很大的增长。

米高扬:我们处处违反五年计划。这算怎么回事?

古比雪夫:是的,五年计划被彻底违反。

今年将为电工器材工业基本建设拨款6 000万。领导这个工业部门的茹柯夫同志认为这个数目太小,但是它超过去年的拨款一倍多。去年拨给了2 800万,而现在给的是6 000万。增长速度是相当大的。当然,给的更多一些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大概不能在所有工业部门以电工器材这样高的速度前进。电工器材工业的潜力是巨大的。如果注意到美国人对我们电工器材厂的观察结果,那么就会发现,我们原先认为的伟大成就最后竟然只不过是发展的起点。我们为70%这样的高速度感到高兴,可结果是,按照美国人的意见,从同样的面积上,就以“狄纳莫”铸造厂为例吧,一个月可以收获我们一年收获的东西。哈尔科夫全苏动力委员会工厂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人发现,有些车间能够生产比现在多七倍的产品。全部问题在于合理布置机床,在于对机床设备进行一些改进。总之,问题不在于花费大量基本建设费用,不在于为此建造新的工厂,而在于对工作的组织实行合理化和改进。例如,在“狄纳莫”工厂我们有极好的机床,但由于工艺流程与该车间的其他的流程完全不协调,一周只能使用两三个小时。茹柯夫同志如果发言,他会举几十个例子说明,尽管产量增长得飞快,电工器材工业仍具有能够不落后于国家需要的潜力,尽管汽车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更何况在电工器材工业方面吸引外国援助的情况比其他部门要好。经过在这一工业部门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利用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我们同“通用电气公司”(美国)订有合同,这个极为重要的合同曾经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同瑞士“先季亚(Сентиа)”公司订有生产磁电机的合同。我们同A. И. Г. 公司(德国)订有技术援助合同。我们同法国无线电报公司、同德律丰根(Телефункен)(德国)、同爱立信(瑞典)订有合同,等等,等等。总之,在这里吸引了足够的技术援助,因此,应当向电工器材工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能够向国家提供在我们现有投资情况下要求于它的东西。

通用机械制造业。我只能很简短地谈一谈这个极为重要的部门,因为不然的话我就过分拖延时间了。通用机械制造业也在大步向前发展。我们预计今年比去年增长44%;五年计划原定增长30%。这样,速度就比五年计划预计的高

了一半。我就不列举涡轮机、柴油机、锅炉、车厢、蒸汽机车等的生产数字了,我只想说明,我们正在生产的一切当然无论如何满足不了改造中的工业和国民经济的需要。进口外国设备的绝对数字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今年进口设备的数字为4.5亿卢布,这比去年多得多⁴⁶。然而,就是这个数字看来也满足不了全部的需要,于是政治局决定在讨论第二季度的进口计划时专门研究预付进口的问题。这样,我们把极大数额的款项,成千万成亿卢布的巨额款项用于进口外国设备。尽管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飞快,这种情况仍然在发生。为了缓解工业的机器紧缺情况,除了已经列入计划的和包括在44%增长中的项目之外,我们争取今年由我们的工厂再为我们的基本建设工程追加生产1亿卢布的设备。现在我们想把原定用于进口的一部分专款分配给我们的工厂,即让它们为建设中和改造中的工厂再生产1亿卢布的设备。然而,这也不能使我们腾出用于进口设备的4.5亿卢布这笔巨额款项,还要加上一定数额的预付进口款项。因此,今年我们拨给机器制造业数额很大的基本建设工程资金,是有理由的。我们将拨给4.83亿卢布(去年为1.73亿)。4.83亿卢布*。这是在把各拖拉机厂和,比如说,由于紧急建造联合收割机厂需要的追加拨款等都包括进来的情况下。这4.83亿卢布中,1.57亿卢布用于为农业服务,即用于农业机器和拖拉机。这4.83亿卢布中,2.12亿卢布,即将近一半——用于新建工程。

我们正在继续建设的和新开工建设的工厂有哪一些?我举出几个继续建设中的工厂的名字: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这是一个重型机床制造厂,它今年得到1150万卢布的拨款,也就是说今年能够以比去年快得多的速度进行建设;卢甘斯克建设工程,这是对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几个车间的改造工程;外科器械厂的建筑工程在继续进行;边疆地区正在建造几个小工厂(在埃里温——机械厂,今年将竣工,在梯弗里斯——机械修理厂在继续建设);正在继续为莫斯科两个钟表厂拨款,1928—1929年度已经为其拨了一定数额的款项用于技术援助和购买设备。

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只能顺应情况,把两个工厂都建在莫斯科,因为这两个厂的工程已进行到这种程度,中途改变费用的方向是不适宜的。

彼得罗夫斯基:这不好。基辅已经开始建厂,基辅已经在造钟表。

古比雪夫:在机器制造业方面我们新开工建设什么呢?

彼得罗夫斯基:五年计划剩给了基辅什么呢?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古比雪夫:建造一个费用2 000万的“轴承”厂。今年我们将拨款700万卢布。

米高扬:将建在哪里?

古比雪夫:建在莫斯科这里。

丘巴尔:那基辅怎么办?

[柯秀尔:把基辅关了。]⁴⁷

古比雪夫:其次,计划今年在塔什干开工建造一个棉花生产工具厂。为此将拨款300万卢布。开始建造两个工具厂: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乌克兰。在莫斯科开始建造一个费用2 500万卢布的机床制造厂,今年将拨款550万卢布。在乌克兰建造一个费用300万卢布的锻铁厂。这些是开工建设的工厂。我列举的不是所有工厂,而是最重要的。我已经不可能列举各机器制造厂正在进行的巨大的改造工程。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不是别的,正是新厂的建设工程。

我谈一谈这方面的外援情况。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我觉得是不够的。在柴油机制造方面我们有足够的外国技术援助。这里有“曼,祖尔策和多伊茨(Ман,Зульцер и Дейтц)”公司。我们有冷冻机方面的技术援助(博尔齐克[Борзик]公司);涡轮机方面的技术援助(维克尔斯和纽波尔[Викерс и Ньюпор]公司);机床方面的技术援助(德国“福德巴克[Фаудевак]”公司)。但这一切是不够的,这方面吸引外国技术援助的工作应当更有力地展开。

化学工业的生产计划增长相当大。特别是在肥料和过磷酸钙的生产方面,1929—1930年度我们应使产量比去年增加83%。但化学工业是我们超不过五年计划的一个部门,尽管它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化学工业的情况很糟糕。这方面我们最束手无策,技术上最不内行。在这个部门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看来最强大的破坏分子的巢穴,他们十分明确地把我们的化学工业引入歧途,这是一;第二,在这方面我们受到来自外国资本的最大的破坏性包围,因为在化学工业领域得到技术援助最为困难。

化学工业是西方和美国集中程度最高的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实际上总共有三个决定全世界化学工业命运的大康采恩。这就是德国法本、美国的杜邦(Дюпон)和英国的蒙德(Монд)。就是这三个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康采恩正在商谈对化学工业实行全世界性的垄断。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得到外国技术援助、学会现代化生产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达不到,特别是1928—1929年度未能达到五年计划的指标。1929—1930年度我们计划在生产方面比五年计划原先预计的要减少一些。诚然,化学工业的总产值以百万卢布

计算将高于五年计划的规定,但在主要和重要产品生产方面,比如肥料生产方面,我们达不到五年计划的水平,我们超不过五年计划的水平,而从农业需求的角度看这正是应当做到的。我们的硫酸生产将有所增长——39.7万吨(五年计划为37.1万吨),但与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民经济的需要相比,这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化学工业的基本建设。我们的基本建设在强劲发展。如果把轻工化学和重工化学算在一起,1929—1930年度将拨款3.44亿卢布(去年为1.45亿卢布)。这样,基本建设工程的规模将增加1.5倍。但是化工领域这种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最缺乏技术保障。在这里对施工期限,对工程造价和对工程质量没有信心,因为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能力都很差。大家都知道我们别列兹尼基工厂存在的缺点。现在正在吸引外国技术援助:“尼特拉仁”(Нитражен)(美国)在氨方面,“杜邦”(美国)在硝酸方面,“彼得森”(德国)在硫酸方面对波列夫斯科伊和切尔诺列钦斯克工厂的援助,等等,等等。但是,我再说一遍,由于化学在国防能力方面和同世界康采恩竞争方面的突出重要性,对这种外援是否质量优良没有我们对,比如说,拖拉机厂或汽车厂的外援所具有的那种信心。所以这方面的情况非常紧张和困难。然而生活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快速前进,特别是氮肥问题一定要加速解决。政府已经决定把两个氮肥厂——在莫斯科附近的博布里基和在乌克兰——的建设问题挂起来,为此留出相应的资金。我认为,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也要建造这两个工厂。

简短地谈谈人造纤维。今年我们用于人造纤维的费用为2600万卢布。建设些什么呢?今年列宁格勒人造纤维厂必须竣工,白俄罗斯人造纤维厂必须竣工,克林齐厂的建设应当继续进行,一个火药厂附属的生产硝化丝的人造纤维工厂应当开工建设。此外,与莫斯科州这里将建的通用化学业联合企业有关的一个工厂将开工建设。

关于木材我只说几句,虽然木材问题是我们出口的主要问题之一。木材生产计划是非常大的。以百万卢布计算,与去年相比得出的数字如下:去年的产值为9.2亿卢布,现在的产值为15.41亿卢布,而五年计划原预计为8亿卢布,即几乎比五年计划的预计翻了一番。应当指出,由于控制数字制定之后通过的增大了的计划,1928—1929年度我们超过了五年计划为1929—1930年度规定的任务。木材方面的基本建设工程比去年大大增加:2亿卢布(去年为7900万卢布),也就是说,木材方面的基本建设工程增加了两倍,而且这笔款项中较大的数目用于森林开发和森林开发的准备工作。这个数目约为6000万卢布。基本

建设工程中也有我国各地区许多工厂的大规模新建工程。

彼得罗夫斯基：关于磷灰石您什么也没说。

柯秀尔：还有钾盐。

古比雪夫：关于某些化学工业产品我没有谈。当然，关于钾也应当谈一谈。

臧声：我们请求延长时间，让他谈谈一切。这很重要。让他讲到3点钟。

主席：我不反对，让我们商定，3点钟结束。

古比雪夫：在钾的方面，我们的建设工程比我们原定计划方案延迟了大约九个月或者一年。1929—1930年度两个开采钾的矿井建设工程将竣工并开始对钾进行工业开采，而且1929—1930年度在掘进过程中将开采足够数量的钾供试验田使用，也许还能进行一些试验性出口。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这方面也吸引了一家外国——德国生产钾的公司（格弗利尔矿业公司），该公司正在负责一个矿井的开掘工作。

这方面的情况是相当紧张的。应当考虑到，德国是钾工业的垄断者，所以德国对我们着手开发我们丰富的地下宝藏绝对不会感兴趣。因此，能够期待于这家公司的不会是特别认真负责的态度。

有人臧：可能。

古比雪夫：但是，当然这至今仍需要进行特别的调查，我们至今没有根据认为这是直接怠工，或者是破坏活动，或者是对我们这项工程的干扰。要知道，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一个矿井由我们自己的力量开掘，另一个矿井一开始就由德国人开掘。我们的矿井出了事故。

罗伊津曼：没听一个德国工程师的话。

古比雪夫：正在我们的矿井出了事故，而为了消除事故的后果，保证下一步的安全，避免新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向在另一个矿井工作的这家德国公司请教。结果我们修复了断裂。由于上述原因工期大大推迟，工程造价也提高了一些，但这是帮助，而不是怠工和破坏⁴⁸。

我认为，今年年中我们会有两个竣工的矿井开始运营。对这件事情的一切调查暂时没有提供怀疑这些工程不能如期完成的任何根据。

现在领导化学工业的托姆斯基同志⁴⁹打算亲自前往这个地区，以便加快工程的进度并最终确信我们确实能为我们的农业获得五年计划规定数量的钾。

至于磷灰石，那我未必能对报纸上广泛报道的作什么补充⁵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对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将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这些磷灰石的质量，即其含磷百分比在世界全部储量中是创纪录的。所以在这里我们

将为我们的农业和出口找到一种宝物。在这方面今年已拨款 500 万卢布,磷灰石的开采实际上已经开始,当然现在还是用手工业方式进行,但是 1929—1930 年度我们将出口一些我们的磷灰石。

现在回到木材上来。我只能局限于上面所作的那些简短说明,而且这些简短的说明与木材在我们发展现阶段所具有的意义绝对不相符合。正是这几年我们无论如何应当以尽量加强的速度推进森林的开发。我们承担的计划是非常紧张的和难以完成的,但毕竟是能够完成的。出口 2.7 亿!是这样吧,米高扬同志?

米高扬:是的。

古比雪夫:今年的出口是 1.6 亿!

米高扬:完成了 1.38 亿,计划是 1.65 亿*。

古比雪夫:也就是说,出口比去年实际完成的数字翻了一番。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米高扬同志召集的出口会议⁵¹以自己的成果充分证明,只要真正集中各单位的全部意志和精力,这个数字是可以实现的。

建筑业——这个题目值得作一个专门的报告,因为在这个领域(我说的不仅是建筑材料,而且是整个建筑业)政府今年正在采取一些应当彻底改变我们未来基本建设整个进程的措施。这指的首先是建筑材料计划的大大扩大,以便消除水泥、砖和其他建筑材料,特别是钢等的缺乏。这指的是在建筑业机械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为此将拨给一定的资金。这指的是确定一些将来能使我们廉价、高速和优质进行建设施工的固定组织形式。这指的是施工单位、办事机构和托拉斯的专业化,它们必须在范围很窄的建筑业务方面实行专业化并以此达到最大的效益。这一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并改变一切由同一个机构包办的我们那种“俄罗斯”建筑方式:它既盖大楼,又进行安装,它还是建造电站或者某种复杂机械机床等的专家。总之,一切都以自营方式行事。我觉得,这种情况必须结束,而且政府已经走上了坚决推进整个建筑业的道路,为建筑材料,为建筑业的机械化,为这些未来建筑机构的周转金拨出了大量的资金⁵²。在这个领域我们吸引外援的政策也必须加强。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同阿尔伯特·卡恩的谈判已经结束,这家公司曾建造过几个福特汽车工厂,我们即将与它签订关于组建一个各种产业和各工业部门建筑物建筑设计室的合同。建筑物将由它来设计,由于这家公司世界驰名并具

* 速记记录为 1.35 亿和 1.60 亿。——编者注

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看来我们将有可能不犯此前犯过的那些无数的错误,此外,这让我们有可能使建筑物标准化,在我们现在建设规模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必要的。同麦克唐纳工程公司(我不懂英语,所以提到公司的名称时,我的发音不准)就设计和建造几个水泥厂的谈判已经结束。

我们同特莱斯康钢铁公司(Тресконстиль и Ко)就建筑几个钢结构厂的技术援助问题的谈判已经结束,不久就将签订合同。同美国肯尼迪公司关于快凝水泥等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在建筑业领域需要吸引特别大量的外国技术援助。

轻工业。首先谈谈整个轻工业的总的情况。同志们,我应当说,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实际上,基本建设工程我们最近几年是这样分配的。1926—1927年度,第一部类为71.5%,第二部类为28.5%。1927—1928年度情况大致相同,第二部类为28%。1928—1929年度为22%,而1929—1930年度第二部类的基本建设工程只占15.5%,84.5%为重工业。如果拿第二部类基本建设费用的绝对数字与例如五年计划原先预计的相比,那么我们整个第一部类比五年计划增加了53%,而第二部类比五年计划减少了5.4%。这样,1929—1930年度全部基本建设费用的最大部分比前几年更集中用于重工业,用于煤炭,用于整个燃料,用于电力和冶金,其中冶金,如果拿整个冶金业说,将得到全部基本建设拨款的将近四分之一。在轻工业方面,1929—1930年度主要是:第一,为某些轻工业部门建立原料基地,第二是改造性工程。

纺织工业。今年我们不建一个新厂,只继续已经开始的工程。作为极个别的例外,我们认为乌兹别克、外高加索和土库曼可以开始纺织厂的第二期工程,但这实际上已经不是新建工程,而是在建工厂的后续工程。此外我们不再开工建设一个工厂。我们今年给纺织工业基本建设工程的拨款比去年少:1.92亿卢布比1.98亿。然而我们要求于这些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却很大。1929—1930年度纺织工业必须提供43亿卢布的产值(去年为32亿),即增加产值11亿(卢布)。这必须靠利用现有设备和由以前基本建设工程将投入运行的设备对棉花进行深加工来实现。

亚麻工业将有相当大的增长——2.1亿米(去年为1.7亿米)。

毛纺织工业增长不大——1.31亿(去年为1.13亿)。原料基地是这方面的限制。即使不进行新的基本建设工程,生产潜力当然也还是有的。比如说,连续生产。现在纺织厂的连续生产安排得与其他企业完全不同。我们不能以在别的部门采用的那种形式在纺织企业实行连续生产,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数量的棉花,而棉花进口又有限。因此,只有在合理封存陈旧设备和把劳力集中于运转更优

良、生产率更高的设备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纺织厂实行连续生产。我们在纺织工业中实行连续生产还得取消第三班,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第三班的生产效率是不太好的。这样,如果有更多的棉花,更多的原料,纺织工业是有生产潜力的。这里我们遇到了原料基地的问题,纺织工业的原料基地问题具有极大的紧迫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专门研究了棉花问题,做得是对的。政治局把五年计划的最终任务增加了30%,大大增加了近几年的任务⁵³。这个棉花计划无论如何必须完成。不仅如此,就是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这个棉花生产计划,看来也有可能超过,因为所有地方上的同志,比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作人员都说,只要有一定的政策,有一定的投入,棉花的产量可能比最后确定的任务增加。

羊毛的情况同样如此,大麻的情况同样如此。

我们的新纤维——洋麻和罗布麻的进展情况很不好。很不好。中央政治局将专门听取这个问题的报告⁵⁴,这里需要真正有力地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因为,看来,我们丰富的国产原料资源没有得到利用,但却在进口黄麻、绳子等。

制革工业的情况大致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给制革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资金很少。制革工业基本建设工程总额为3000万卢布。去年也大体是这个数字。这样,我们就在基本建设工程方面使它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上,然而从摆脱进口、从原料、从保障我们工业的原料的角度看,这方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工程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建造从摆脱进口角度看来需要的那么多鞣革厂,不可能使原料基地合理化达到从正常生产角度看来需要的那种程度。

制糖工业。今年制糖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拨款为6300万卢布,这比去年稍多一些,但对于更有力地推动这个行业向前发展是不够的。这里的问题也主要在于原料基地。我们制糖厂的数量是足够的。采用新的甜菜干燥法(这种新方法在我们的条件下也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使我们能够用这种设备加工比现在数量多得多的糖。主要的是原料基地,制糖工业的工作人员、与制糖工业有关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主要注意力都应该放在原料基地上。我不会说,对制糖工业的这种原料基地已经给予了它所应得的重视。我觉得,我们应当为自己定一个规矩,任何行情波动都不应使我们离开保护甜菜作物的政策。但不幸的是,去年和今年发生的行情波动却常常促使我们决定制糖工业命运的同志采取妨碍糖业原料基地发展的步骤。这里曾有人插话说,需要拖拉机和肥料。完全正确,1929—1930年度预计将提供比此前更多的这种拖拉机和肥料。但还不止于此,在这方面马铃薯的价格也在起作用,还有集体农庄,还有公有化等等。

在造纸工业方面,受基本建设工程总额的限制,我们也只能给予一个不足的

数额——6 350 万卢布,这大大高于五年计划,但不足以使我们尽快摆脱纸张的进口。但我再重复一遍,这个数字是为基本建设工程总量设定的限额所决定的。

我就不谈食品、陶瓷、印刷、制盐和其他轻工业部门了。例如,固定资本的增长就可以作为这些部门的概况。我现在就谈谈这些总的数字,以便结束我的报告。

工业固定资本增长的情况如何呢?截至1925年10月1日为止,固定资本为50亿卢布,以后逐年的增长情况是:1926年10月1日为55亿,然后依次为59亿,67亿,79亿,1930年10月1日将达到100亿卢布。这些固定资本在各工业部门之间,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分配比例如何?截至1925年10月1日为止,重工业占固定资本的51%,也就是说,大约一半对一半——一半是重工业,一半是轻工业。到1930年10月1日,重工业的固定资本将占64%,轻工业只占36%。如果以绝对数字计算,那么重工业的固定资本这几年间将增长一倍半,而轻工业只增长50%。我认为谈谈基本建设工程方面是需要的。我只简单地说,新建工程很自然地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增长,现在已达到全部工业建设工程的45%,而过去,1927—1928年度为23%。科研和勘探工程增长很快:从1927—1928年度的1.9%达到1929—1930年度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7%。这就是我们基本建设工程方面的情况。

说明了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情况之后,现在我来谈一谈困难。主要困难是我们的技术素养差,我们的技术水平低。第二个困难是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方面取得巨大的质的成就。在工业中,我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25%,降低产品成本11%。这第二项任务十分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它对于完成整个工业的计划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我们必须提高实际工资12%,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动员所有合作社和商业机构、所有苏维埃机构使名义上提高的9%的工资全部到达工人手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再加上由物价某种程度的降低所得到的部分。政治局通过了第二部类产品降价1%,用意是落实到消费者身上降价为2%,也就是说,这第二个百分点必须从商业费用中节约出来⁵⁵。虽然,必须这样定量分配和安排农产品的供应,使工人实际上能够提高工资12%。这项保证提高实际工资的任务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做就难以达到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我们必须提高产值32%,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是任何一位多少前瞻的经济学家从未想象到的。我们必须进行比去年增加一倍的基本建设工程。这条工

作战线需要大批的干部。我们的干部很少。这些数量不足的干部我们必须设法分配到这条扩大一倍的战线上去,显然,同时要更大量地吸收工人阶级中正在成长的新生力量参加到这项事业中来。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完成1929—1930年度这个庞大的施工计划呢?两个条件:我们必须抛掉我们的妄自尊大,即认为“我们自己一点不比别人差”,我们可以不要外国技术援助、不要外国优秀样板自己自作聪明进行施工建设,自己发现新大陆。我们必须坚决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从那边,从国外吸收一切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一切东西。同时,我们应当更多地利用我们本国现有的科技思想萌芽和成就,有时是巨大的成就,与我们最近几年积累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经验。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只有在发挥工人群众极大的积极性的情况下,这个宏伟的计划才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竞赛的进程应当发展得比现在更加广泛。至今存在的一切错误无论如何必须消除。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使社会主义竞赛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经常的工作方法。

这必须化为每个工人的血肉。每个工人必须努力作出优秀的榜样,成为所有别人都应当学习的楷模。

实行连续生产将在完成这些巨大任务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对这一重大举动的全部意义还估计不足。预计,我们今年将把全部工业的大约70%转为连续生产。我认为,生活会赶到我们的前面,计划安排的这些速度将是不够的。非常可能,到年底我们不得不确认连续生产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作方法。当然,这是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量的巨大源泉。

因此,依靠这些1928—1929年度挖掘出来的、现在已经表现得如此强劲的新潜力,我认为,这个紧张的基本建设计划和工业生产计划是能够完成的。

主席:宣布休息到6点钟。

第三次会议

11月11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请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至于我们的成就和以其为基础制定的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那么,它们应当由全会批准,当然是在对以更满怀信心的态度完成这些数字的可能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后。从头一年起我们对五年计划就是这样进行宣传的。必须使工人阶级和贫中农更深地了解1930年度的计划。工业增长、工人阶级壮大、工资增加和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这些情况在我们所有工业区无疑处处都有。我们在乌克兰有机会看到工厂的迅速发展(电厂、哈尔科夫蒸汽机车厂、许多农业机器制造厂),它们深深地投入了生产过程。例如,著名的祖利采尔内燃机曾经使哈尔科夫蒸汽机车厂全部5000无产阶级的群众焦急不安,直到工人们准备好光荣地完成并且完成了这项竞赛(竞赛在几个工厂进行)。如果以农业机器制造业为例,那么,与往年不同,这方面也作了许多改进,作出了许多装置甚至发明。我曾有机会到扎波罗热季诺维也夫斯克“红星”工厂去,工人们说起工资,说起食品供应不好等。而现在工人在工厂里带着你到一座、另一座、第五座机床跟前,向你展示他们这段时间所作的一系列改进并夸耀说,工厂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一道在发展。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目前感受到的食品缺乏的情况。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情况。生产在蒸蒸日上,但食品供应还不正常。尽管短缺情况严重,“红星”厂在铁制脱粒机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发明创造。在我们乌克兰,你们大概都听说了,已经造出了一台联合收割机⁵⁶,改造了现在拖拉机大规模田间作业需要的播种机。

城市的发展也显示出发展中工业的重要现象之一。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现在被大量的电灯照得通明,居民可以说在努力使生活适应于这种光明。我有机会到过这些小城镇,清晨早早地起来,在小巷里走走,看见居民拿着笤帚从家里出来,像德国人那样卖力地清扫马路,弄得整洁、卫生。

应当说,失业问题过去在乌克兰是令我们感到头痛的问题,事情有时闹到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地步,我们常常收到从敖德萨、基辅发来的有关这方面情况的电报。在哈尔科夫,我们的失业者来到人民委员会、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门前,把我们这些大小官僚主义者都叫出来,要求解决当时形成的状况。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失业大大减少了。

关于曾经十分碍眼的流浪儿现象也应当这样说,这种现象还有,但现在已经不像去年那样经常在眼前闪现。关于少年儿童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也应当这样说。当你突然出现在老工人中间的时候,他们总是向我们这些老头子提出要求:“你了解家里的情况,孩子长大了以后,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他们。”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哈尔科夫蒸汽机车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曾经到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来找我们,提出应当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浪潮也已经消退了,少年们已被工厂吸收。

斯大林:情况好些了吗?

彼得罗夫斯基:这个问题至少解决了80%。

[斯大林:结果是前途彻底无望。]⁵⁷

彼得罗夫斯基:最后,庆祝12周年的游行确实表明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当说,与去年相比,工人阶级走得更勇敢、更高兴一些,他们要求我们喊些口号,以使用雷鸣般的“乌拉”回应。而如果有人讲话太长和把口号拖得太长,工人们就喊“乌拉”打断他。这一切十分活跃。我不想用这一点来说明我们的情况百分之百的好,但就在我们经济生活的这一方面无疑有很大的成就。尽管应当说,为了唤起这种生产热情,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到。你们在这里听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竞赛巨大意义的报告,而不久前我们在哈尔科夫红色工厂区党委会里听到了这样的情况,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与非党群众相比,我们工厂里的共产党员同志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百分比还很小,有时甚至还落在后面。星期六义务劳动也表明,共产党员落在后面一些,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使我们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同志用自觉的和有组织的工作,用有组织的支持来提高工人群众的热情。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我们存在的缺点并对其进行批评,以便振作精神,完成计划。

我们曾经多少次叫喊过要建造克里沃罗格冶金厂,可今天我们又听到令人沮丧的论调,说这项工程应当推迟到或远或近的遥远的未来。

有人喊:相对的,相对的!

彼得罗夫斯基:请允许我向你们申明,南方机器制造托拉斯主席⁵⁸在哈尔科夫说过,乌克兰没有铁,他不得不在乌拉尔采购铁块,然后把它们运到乌克兰。

臧声:好啊!

罗伊津曼:我们在波兰采购铁。

彼得罗夫斯基:这是一。我想要说的不是我们在波兰或者别的地方采购铁……

柯秀尔:乌克兰没有铁了!

彼得罗夫斯基:我想要说的是发生了怎样的不协调:非常需要铁,只好到几千俄里之外去采购,而克里沃罗格冶金厂是可能使我们摆脱这种不协调的。这个冶金厂到底建在什么地方更有利呢?

卡巴科夫:应当建中乌拉尔厂。

彼得罗夫斯基:我并没有说,不需要建这个工厂,卡巴科夫同志。您为什么立即生了嫉妒心?(笑声)难道您将支持把铁从乌拉尔运往顿巴斯这种不合理的事情?

卡巴科夫:我反对这样做。

彼得罗夫斯基:我说的正是这一点。我不久前到过季诺维也夫斯克。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工厂,制造很多机器:脱粒机、播种机、风扬机,有将近6000名工人,这个工厂有时因为得不到铁皮做这些机器的外壳而停工。

再比如,现在我们已经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第十三周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像什捷罗夫卡建设工程那样的缺点呢?古比雪夫同志在这里夸耀即将投入运行的区域电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谈到了什捷罗夫卡建设工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什捷罗夫卡电站我们建了七年,只是到了现在才冒着失败的危险好歹输出了1.2万千瓦,这给人的印象难道不是耻辱,不是犯了大罪?

柯秀尔:对!

彼得罗夫斯基:然而,由于寄希望于什捷罗夫卡电站,没有维护其他矿山的发电设备,结果我们现在落得一场空:什捷罗夫卡电站没有完成,各矿山的发电设备没有修好,我们得不到电,开采受到影响,而中央说:拿煤来,别的就不管了。

关于多少改善顿巴斯工人的生活 and 那里的劳动保护问题。

鲁祖塔克同志,您参加了中央解决顿巴斯供水问题的会议⁵⁹。斯大林同志热情地抓了消除顿巴斯矿工恶劣生活条件的问题。可为实现中央关于顿巴斯供水问题的著名决定又做了些什么呢?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斯大林:什么都没做?绝对什么都没做?

彼得罗夫斯基:什么都没做,几乎什么都没做。如果做了,也少得令人不能容忍。现在那里伤寒猖獗,死亡率很高,未能保护好工人免于忍受艰难的处境,我们是有过错的。或者拿劳动保护的情况为例吧。现在大家都认为很清楚,不能让顿巴斯缺乏电灯照明了。你们都知道,这对采煤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因为在底下,在矿井里没法摸着黑儿干活。可是不给我们这种灯泡,米高扬不给开需要的许可证,以便少量购买这种最必需的东西,预防爆炸的危险。

柯秀尔:那里是瓦斯矿井。

米高扬:黄金不够,许可证开给谁的来往账户?

彼得罗夫斯基:至于粮食收购,那么你们大家都了解,粮食收购在乌克兰进行得很紧张。计划我们现在是完成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我不想在这里为我们的党组织请求任何奖赏……

柯秀尔:可还是要得到点什么。

彼得罗夫斯基:大家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也许,在有缺点的地方,工作更加紧张。我应当说,我们的粮食收购前进了,因为组织工作进入了战斗状态,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学习优秀地区的榜样。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东西应当归功于我们农村贫农的组织——农村贫农委员会⁶⁰。依靠它们,我们在农村拿走了富农的粮食。但应当指出,我们工作开始的时候有过大的失误,粮食收购最初是由中农和贫农自流地进行的,只是到了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才开始向富农施加压力,当然就发生了更加尖锐的阶级斗争,农民积极分子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村苏维埃主席、贫农委员会主席和其他积极分子被枪杀。但如果看看有多少富农遭受了损失,那么,结果是大约1.5%。当你来到农村的时候,会有一两个富农走到跟前抱怨,抱怨过量的税收或者“出口”税。

斯大林:究竟卖了多少富农户?*

彼得罗夫斯基:1%—2%。

斯大林:这一笔“赚了”多少?

彼得罗夫斯基:我们没让富农吃亏太多。您不要袒护他们。(笑声)

至于播种运动,那么,尽管它将如我们所预计的少种7%—10%而结束,但在粮食收购和播种运动方面我们已经接近了如上一次全会指出的需要把农民提高到工业纪律水平的时刻。有些农民从田里回来后抱怨说:就是这些共产党员,年轻人,天已经很晚了,可他们还逼着大家耕地和播种,活儿都白干了。再说天

* 指剥夺农户。——编者注

气,列宁格勒气象台愚蠢的预报引起了张皇失措,使村里的农民完全停止了播种。我们党组织的巨大功绩在于逼着农民播了种。尽管播种时天气不利,后来在已经播下种子的田里下了一场小雨,越冬作物的苗到处都出得很好,因此,如果有一个气候良好的冬天,看来我们明年将获得越冬作物的好收成。

至于集体化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说这方面有一个新的十分危险的因素。这个危险的因素在于,农民现在整村、整区地涌向集体化,四面八方传来消息说,富农正拼命往这些集体里钻,甚至排挤中农和贫农。最严重的是,一面参加集体,一面卖牲口。四面八方传来消息说,农民写信给自己的熟人和亲戚说:我要去参加集体,我把牛卖了,把马卖了等。这非常危险,我们应当防止这种情况,以免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有人在这里谈了发展畜牧业的问题,但农民的这种倾向使我们适得其反。农民参加集体,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应当把这种自发力量引入有组织的轨道,使它只会带来好处,而不会给我们带来艰苦的考验。

我再简单说说我和米高扬同志去过的公社的情况。

米高扬:你谈一谈,这是些很重要的事实。

彼得罗夫斯基: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公社从1924—1925年度贷款,用最新技术建造了最好的荷兰式牛棚,用斗车给牛运送饲料等等,建造了很好的猪舍,可当你问他们为合作社工人提供了多少牛奶、奶油和奶酪,他们说:“我们自己还不够呢。”而公社已经存在了五年多。你走到猪舍,问:“你们的养猪业给城里提供多少口猪?”“暂时我们自己需要!”

斯大林:正是这里需要监督。

彼得罗夫斯基:完全正确。你到菜园里去看——荒芜了,你到果园里去看——荒芜了,这就是我们经受蔬菜和水果危机的原因之一。公社是建在一个过去的地主庄园里。

现在简单谈一谈右倾的表现。现在我不属于“死啃法律的人”之列,像我过去那样,比如说当我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进行斗争,两军对垒,战斗可以说是很激烈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乌克兰,在列宁格勒奋力进行了战斗。现在当我们同对于党和在党外都很危险的右倾进行斗争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实际上,右倾拥有的力量很弱。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布哈林同志的追随者们,他的门徒在各地说,我们反对右倾,但布哈林不是右倾分子。布哈林同志就坐在这里,我们应当开诚布公地说,布哈林同志必须承认自己的右倾。他犯了很多错误,可以说他采取了一条路线,让我们年轻的教授们围着它转,把他们搞懵,使父子不和。(笑声)布哈林同志在党内引起了许多纷争。

右倾的追随者们是我们的可以说是共产主义青年,他们在布哈林同志周围组织起来,亲密相处,同志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现在他们已无法跳出这个魔圈了。然而现在这种右倾在国内外对于党都是危险的。它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危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报刊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右倾上,连别谢多夫斯基这个败类也说:右倾是我们党内健康化的现象。

按照老习惯,我们应当这样看待:如果整个国际上的败类夸奖我们中的某一个人,那就是说,这个人干了坏事。

有人喊:对,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

彼得罗夫斯基:应当明白,如果这种情况在国际范围内发生,资产阶级懂得并将极力从这方面阻挠同我们的一切相互关系,以便给这一斗争火上浇油并制造我们国内发展的困难。在国内发展方面,大家都知道,反革命富农分子在发出的传单中号召寄希望于右倾。

在我们的阶级斗争中,当党向富农发起了坚决的进攻之后,我们不能退却,不能允许出现任何裂缝,让国际和国内的敌人产生分裂我们的图谋。不久前散发了孟什维克沃伊京斯基的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的力量》。作者写道,李可夫分子对斯大林分子的胜利无疑会导致国内和国际联系情况的缓和。最后,斗争会转移到个人,转移到斯大林同志身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诅咒斯大林同志,似乎他是唯一掌握国家和共产国际权柄的人。似乎是他在执掌我们全部政策的方向,而不是整个的党。

[米高扬:他是什么,是党?]⁶¹

彼得罗夫斯基:所以我说,不允许把斗争转移到个人身上,这种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具有极度政治中伤和贬低党的性质。我不想加进,这么说吧,对这个问题的主观态度,我想做到客观。我们的青年教授们也被这种情况传染,我有机会像在托洛茨基主义时期那样听到,我们这里正在出现禁卫军⁶²,他们遵照一个人的命令制定和实行全部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内战线上对富农展开坚决进攻,在我们面对国外阶级斗争大大激化,在目前冲突和世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日益临近这个时候,布哈林同志必须诚心实意地到这里来并表明,他与他说过的使一切国际上的败类感动兴奋的话决裂,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他们进行反对党、反对苏联活动的缝隙,并以此结束这种右倾的可悲时期。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找到更加协调一致的共同工作的办法,这种右倾是不会使我们党得到好结果的。⁶³

主席:现在请戈洛谢金同志发言。

戈洛谢金：从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获得的成就的观点看，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对在完成我们民族政策的任务方面的巨大成绩注意不够。不言而喻，早在五年计划开始以前我们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问题在于，现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现在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基础上我们正在达到这样的完成我们任务的速度，使我们能够在最短期内完全实现党的指示。

许多人认为，这些成就就是在大量基本建设投资基础上发展工业的结果。当然，这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这不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谈到各民族共和国，我们不应当忘记，它们主要是农民共和国，正因为如此，在农业发展中有着解决民族政策问题的办法。我们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情况的观察结果和数据表明，正是在实行表现为五年计划的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基础上，那里正在绕过资本主义关系很快地从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关系向社会主义关系过渡。

让我来举几个例子。我们过去遭受贫困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土地，我们的土地很多，但由于贫穷、蒙昧和不开化，哥萨克*贫中农群众无法对这些土地进行生产性开垦。现在，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我们给哈萨克农民拖拉机，给他们农业机器、割草机，我们使他们实行集体化，因此他们有了实际可能性定居下来并对这些土地进行生产性开发。这里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恰恰是在以集体的形式进行，这一过程吸引了贫中农群众参加。因此，他们逐渐脱离旧的半封建关系，摆脱对巴依的依赖。正是在这个方面正在发生社会经济关系变革，我们村庄里过去那种旧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变革。实行五年计划仅仅一年就表明，根据五年计划在定居和土地开垦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年哈萨克居民已拥有了32%的播种面积。这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在集体化方面，我们的集体农庄达到了4500个，其中53%是哈萨克人的，现在这一过程进行得更加坚决。如果我们再加上大型国营农场的组建、工业的发展和民族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的形成，那么你们就会清楚，正如关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决议所说的，由于建立了新的基础，因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法，我们的确能够在最短期内实现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提高全体贫中雇农群众的经济力量，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并直观地展示由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关系绕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关系的过渡。这一过程迫使我们考虑培养大批民族文化和技术干部的问题。但不扫除文盲，不实行普遍初等教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们

* 原文如此。指哈萨克人。——编者注

面临着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否则我们就不能完成上述经济任务。我们将以更快的速度消除文化上的不平等。

在这个基础上,在这条道路上阶级斗争现在正以新的形式变得异常尖锐化。巴依过去对重新分配草场的反应,对没收财产的反应都不像现在对他面临灭顶之灾的集体化过程反应这样强烈。他感到他的末日到了。所以现在他采用特别激烈的斗争形式反对贫农,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

有些人认为,这种尖锐化是某些地方的某些错误的结果。错误当然是有的,缺点当然是有的,它们有自己的影响,但现在主要的是,巴依们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进行的斗争将异常尖锐化,而且将愈演愈烈。我认为,这一点同样是在关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的决议中表述得很好。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不惧怕这种斗争,而是领导这种斗争,帮助村庄摆脱巴依的影响并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道路上在较短的历史期限内彻底地消除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的不平等。

我简单地谈一谈右倾,因为不指出右倾这种危险,就无法谈控制数字,谈实现五年计划,换言之,就无法谈我们党的总路线。决议草案⁶⁴在今年经验的基础上清楚地反映了右倾反对派的破产,但我认为,许许多多起初,我觉得,许多人现在仍然,如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说明的,不了解分歧的深刻性和右倾在思想上与实践上构成的巨大危险。这段时间彻底查明了,首先,右倾思想的根源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右倾不仅表现在不同意比如说五年计划表明的速度、数字,右倾分子对列宁主义的一切方面几乎全都不同意。

另一方面,滋养右倾的那些社会阶层表现出巨大的顽固性和很大的反抗性,他们在各个方面表现自己:在农村经济中,在城市的工厂里,在思想战线上,在技术知识分子中间,他们都企图依靠这种右倾。

最后,我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如此轻率地对待右倾的态度感到奇怪。难道他没看见,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难道他没看见,右倾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可每一个组织现在在实行粮食收购的时候,在实行农业税的时候,在进行我们所有战斗运动的时候都看到了这一点。每一个组织都看到,我们的社会异己阶层、社会异己阶级在怎样影响我们的机关,影响我们党的某些阶层,他们构成多么巨大的危险。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把同右倾的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因为这种倾向对我们执行我们党的总路线构成极大的危险。

主席:现在请米高扬同志发言。

米高扬⁶⁵:现在我们正在总结上一个经济年度,转折性的一年的政治经验并

提出新年度的任务。对于我们党的政策,过去一年的教训具有特殊的意义。古比雪夫同志正确地谈到了我们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我们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通过反对右倾的决定时,我们对此也没有怀疑过。过去的一年具有特别的意义,生活本身在短短的期限内证明了党的总路线的全部正确性并完全推翻了我们党的右倾反对派的所有论断。生活本身对党的各项决议和对反对派的路线的检验结果是,反对派遭到灾难性的破产。我不记得我们党内有哪个反对派像右倾反对派这样由几个政治局委员领导并如此迅速地遭到了破产。恰好今天我重新阅读了四月全会前夕即大约半年以前得到的“三人”政纲⁶⁶。读这个政纲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不是半年以前写的,因为里面有那样荒谬绝伦的论断,你不相信三位显要的政治局委员会如此脱离生活和脱离党,会如此背离党,以至六个月以前写了这样一个可耻的政纲。读这个政纲的时候,你会得出一个肯定无疑的结论,它的作者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期待的不仅是最剧烈的危机,而是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彻底垮台。大概,他们今天读那个他们过去千方百计企图散发的文件会感到羞耻。生活已经无情地批判了这个政纲。这就是从去年的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尽管现在还有并且将来我们还会遇到种种困难,党已经取得了具有根本的决定性意义的巨大成就。我们取得这些成就,首先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党的总路线,同右倾以及各种其他倾向及其一切表现进行了坚决斗争。

只有克服右倾,我们才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这就是上一经济年度的第二个主要教训。

过去一年的第三个主要教训是,由于我们的政策完全正确,十分明确,不仅能为党的干部而且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理解,我们不仅对最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而且对农村贫中农群众实现了近几年来空前的规模最大的发动。如果过去许多人对我们通过什么具体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么这些途径现在已经勾画得如此清晰,亿万群众可以触摸得到。我们政策的这种明确性就帮助我们广泛地动员了群众并使他们重新英勇地站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线上。

我们必须根据过去一年的这些教训拟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年度计划。

反对派的最大失败是在农业政策方面。总的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困难在农业领域。以三名政治局委员为首的右倾反对派硬说我们的农业退化了,看不到党的政策走出“绝境”的任何出路,他们打算使党的政策发生急剧的逆

转——向进一步扩大新经济政策和取消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方面逆转,以“扩大”商品流转、使市场“正常化”的要求掩饰这条路线,反对向富农个人征收农业税并要求在春季提高粮食价格。由此就产生了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未来几年现实力量的意义估计不足和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消除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障碍,寄希望于农民个体经济和由此产生的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否定态度——这就是右倾的同志们认为应当在最短期内向国家提供粮食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三人团”在自己的政纲中写道:“国家发生粮食短缺不是由于集体农庄的发展,而是尽管有了这种发展。如果我们把未来几年我们农村政策的全部成就仅仅只同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联系在一起,这种缺粮的情况将会加剧。简单的数量统计向我们表明,未来几年它们(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不可能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

当党以前的全部政策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历史性的转变作好了准备,当国家进入了经济政策的新阶段,当列宁预言的我们过去“梦想不到”的速度出现了,当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开始了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布哈林集团不是在对经济中形成的阶级力量状况进行正确估计的基础上抓住决定我们发展新阶段的那种特别的东西,而是过去企图并且现在继续企图使党的政策发生另一种急剧的转变——向后倒转,取代党的“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口号,在扩大商品流转和贸易自由,即在发展资本主义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因此,布哈林集团是一种算法,我们是另一种算法。按照他们的算法,未来几年我们不能把我们事业的成就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可按照我们的算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1930年就应当提供收购粮食的将近一半。他们的算法不仅在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速度的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而且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和这个集团那么轻视的一般国营农场的事例上可耻地失败了。从这一角度看,正是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例子是有教育意义的。关于组建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决定是1928年夏天通过的⁶⁷。1929年国营谷农场联合公司播种面积为15万公顷,产粮800万普特。1930年它将播种100万公顷,提供粮食5000万普特。按照1931年的控制数字,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播种面积应为250万公顷,产粮1.2亿普特。然而,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肯定地说,现在已经可以作1931年播种400万公顷,产粮2亿普特这样的准备。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这个建议已提交政治局⁶⁸,我认为,一定要接受这个建议。根据最初的计划,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在五年的末尾应当提供粮食1亿普特,为此按照五年计划应有播种面积200万公顷。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

司在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将拥有播种面积400万公顷,产粮2亿普特。在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可能拥有播种面积700万公顷,而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播种面积将达到1000万公顷,产粮5亿普特,即1928—1929年度全国粮食收购的数量。我就不说那些将提供1.5亿—2亿普特粮食的老国营农场了。这些潜力显示出我们的算法和布哈林集团的算法之间全部惊人的差别,显示出反对派的路线和我们党的总路线之间的整个鸿沟。

全党幸运的是,布哈林集团的算法不仅在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领域,而且在工业建设领域遭到了破产。布哈林的预言也像从托洛茨基开始的过去一切反对派的类似预言以及托洛茨基之前和与他同时的《社会主义导报》⁶⁹的预言一样破灭了。我们没有削减进口,甚至有所增加,主要用于引进拖拉机厂和汽车厂的设备,外汇情况比较好,基本建设计划全部完成,工业品生产计划超额完成,增加了23.7%(五年计划为21.3%)。总之,我们到处看到右倾反对派及其预言这种可耻的破产,这就使人产生一个疑问,这些预言的作者是些什么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异己分子?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报纸和经济学家,即最清醒的阶级敌人也没有像右倾反对派那样把我们的经济状况描绘得漆黑一片。

反对派的失败,所有的人,包括非党工人,都已经看到,党的决定性的成就人人都清楚,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予以报道,这就是右倾反对派的亲爱的同志们沉默的原因。看来,如果布哈林集团没有背离党,没有危险的消沉,看到党的成就,他们就应当到这里来,坦率地说:“幸运的是,党是正确的,幸运的是,党取得了成就,我们曾经担心党摆脱不了困境,结果党取得了胜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错了,党胜利了。”现在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很难找到比这一次全会更适当的时刻了。他们这样做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要知道,布哈林曾经不止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什么现在不也承认自己最近的错误,他以前一切错误中最致命和最危险的错误呢?然而他们不这样做,但这对他们更糟,因为他们自己应当明白,在党的生活的关键时刻他们是在把自己革除出社会主义建设战线先锋战士的队伍。党已经走出了艰难的困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摆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战线,即使没有他们和不管他们,将来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站到党的路线上来。

说近几年来党的一切成就中粮食收购的成就最重要和最值得借鉴是正确的。同右倾分子的论断相反,党不仅做到了不进口粮食,而且能够这样动员自己的力量,在大约四个月内——8月至11月,完成了粮食收购年度计划的将近90%。虽然全联盟的收购尚未完全结束,但现在已经可以对粮食收购进行政治

总结。在我看来,成功的最主要条件是,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十分明确和坚定不移的领导粮食收购的行动方针,这是去年收购中所没有的,那时党的手脚在某种程度上为右倾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动摇和反对所束缚。

动员党在农村的优秀干部同党员干部一道支援粮食收购,城乡优秀无产者组成的数量众多的工作队在充分动员贫农群众并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巩固他们同中农反对富农的联盟,在与国家粮食收购人员互相竞争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加强对富农和投机商人迅速集中打击的政策和在建立国家粮食收购人员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的事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围绕着农村粮食收购计划,苏联农村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了;在广泛推行预购合同制(尽管实行中有种种缺点)的同时,给富农富裕上层规定单独的收购粮食任务(约占农村全部农户的7%—10%)是我们带给这次粮食收购运动并保证了粮食收购顺利进行的根本性的新东西。

中央同一些组织扩大规定单独任务做法的应用范围,把中农户甚至贫农户也纳入这一措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些毫不动摇地只打击富农富裕上层(例如在乌克兰),没给贫中农户规定单独任务的地区,收购进程表明了中央路线的全部正确性。不仅党在农村的政治胜利十分巨大,而且粮食收购计划也在短期内完成了。

在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无保留地肯定说,我们不仅已经完成并将全部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这是党的胜利),而且在取得粮食收购成就的同时我们真正实际上巩固了无产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把这个联盟转入生产的轨道,从而使集体农庄运动蓬勃发展,提高贫农在我们同中农联盟中的重要性和领导影响,大大削弱了富农在农村的影响作用,考验了苏维埃和党的机构,消除了其中的腐化了的富农分子或异己分子,带动并教会了苏维埃和党的基本干部在同富农的斗争中组织贫中农群众并推动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本领。可以并非夸大其词地说,革命以来我们从未把如此大量的党的最优秀力量(有大约10万名共产党员参加了粮食收购)和同样数量的城里的优秀无产者派往农村,我们从未进行过像党在最后一次粮食收购运动时所做的这样深入检验和发动农村基层群众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村庄,甚至小村庄和村社没派几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前去,他们在那些大小村庄里工作了好几个月,因此不仅粮食收购计划顺利完成,而且整个社会主义阵线得到了巩固。

我想特别谈谈我们最近工作中应当注意的粮食收购的两个教训。我们每年都不得不承认苏联统计的靠不住及其在各个重大经济运动中的失败,这种情况

不仅发生在地方各民族区和各州里,而且也发生在我们中央⁷⁰。如果前几年,甚至在批准粮食收购计划时不同意谷物饲料平衡表的情况下,我们应多多少少注意谷物饲料平衡表的数据,那么,今年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里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专家委员会⁷¹提出的谷物饲料平衡表,只得扔掉它,把它退回去,不管和离开谷物饲料平衡表,根据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机构的业务资料和经验制定粮食收购计划。

谷物饲料平衡表肯定地说,今年的粮食收获量低于去年,而去年我们是勉强对付过来的,没有建立什么储备,今年我们无论如何要建立1亿普特的紧急粮食储备⁷²。人民委员会审核这个粮食平衡表刚刚过去了三个月。现在我们收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到11月1日我们已经建立并入库1亿普特的储备粮。要是我们通过了这个粮食平衡表,我们的粮食收购就会遭到破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储备。这表明,不以谷物饲料平衡表制定工作参加者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这个平衡表对我们具有明显的危害性。雅科夫列夫⁷³从西伯利亚收购粮食回来之后,讲述了鄂木斯克民族区发生的情况。鄂木斯克民族区的缺口确定为1100万普特,后来民族区的党的机关把这一数字降低了,但仍然留下了缺口,也就是说不能在民族区进行粮食收购,然而向鄂木斯克民族区下达了480万普特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一切展示并说明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机构统计方法的破产,现在这些方法仍然从上到下主宰着我们的统计机关。许多拥护苏维埃的老经济统计学家现在公开说他们赞成右倾的政策,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有些组织常常盲目地相信这种科学,而没有对它表现出无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就拿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举过的关于气象台发布信息的例子来说吧。在基辅的时候,我9月份在报上看到,说10月中旬严寒即将来临,第聂伯河将要封冻。

柯秀尔: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

米高扬:我们的同志相信了就发表了。

罗伊津曼:干吗登出来?

米高扬:现在已经是11月中旬,乌克兰根本没有什么严寒,轮船在第聂伯河上非常平安地来往行驶。或者再以北高加索为例。边疆区土地局根据气象台的资料写了一个通报,警告说10月7日植物生长期将停止,应当早早地在这之前结束播种运动。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不仅植物生长期还没有停止,而库班的播种运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

举这些例子,我丝毫没有打算要求我们的气象工作者准确地预报天气,我只

是提请大家注意,尽管这些预报明显地荒唐,我们的共产党员干部对这些预报没有表现出任何批判态度而盲目地相信并根据它们安排自己的工作。有一些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很轻易地不赞成并不执行党的决定,不相信它们的力量和正确性,可是他们盲目地相信“学者们”所说的一切。

必须从根本上改组我们的整个统计机构,注入新的、自己的干部,最后使苏维埃统计机构成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无产阶级专政手里的实际武器。从这个角度看,根本改组统计机构的任务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我们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往往盲目地相信统计机构的数据与资料和学者们所说的一切,往往忘记了科学与科学不同,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可能是中立和“客观”的。

资产阶级老经济统计学家中的一些优秀人物真心希望帮助我们,却常常使我们为难,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经济的全部特点,看不见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看不见社会主义革命为生产力提供的那种发展规模。他们既不考虑党的动员和社会主义竞赛的意义,也不考虑群众的提高、贫中农的积极性和我们对富农施压的效果,不考虑这一切极为重要的因素,经济政策会怎样呢?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方面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正是由于党积极调动起了这些新的潜力。

在去年的七月全会上,布哈林要求无条件地听从这种科学,认为我们对这种科学的修正,由于党的影响和群众的参加,就等于是我们不要对经济进行有计划的领导,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领导。(主席摇铃)

我请求能再给我延长 20 分钟时间。

主席:米高扬同志请求再给他 20 分钟。没有反对的?

米高扬:新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另一个教训是不允许市场上留有許多收购者。我们必须以苏联粮食公司⁷⁴是全部收购谷物的唯一所有者,而农业合作社是农村的主要收购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竞争的关系,而应当是真正合作的关系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组收购机构。这样协调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在下一次收购运动中更加团结一致地反对富农和投机商人。

新的粮食收购运动还十分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很短期限内收进的大量粮食的运输和保管问题。我们过去和现在所以能够十分艰难地完成粮食运输和保管的任务,完全是由于动员起了所有党的、苏维埃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主要是工人群众特别是共青团员们的主动精神。前几年没有一个季度我们曾经收购和运输过 3 亿多普特的粮食。然而,今年仅 10 月一个

月,在并非粮食收购而是其他农作物收购和季节运输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收购和运输了3亿多普特的粮食。如果没有群众奋起支援国家的极大热情,如果没有出现群众积极参加建设的新形式——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恢复,特别是在一些区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共青团员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机关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今年是在粮食保管和运输方面遇到严重困难的第一年。但这些困难与缺粮产生的困难相比使人感到轻松和愉快得多。

有人喊:那当然。

米高扬:毫无疑问,明年我们将比今年收购更多的粮食。不论收成的水平如何,而收成的水平将取决于谷物成熟的条件,单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增加就能保证我们获得更多的粮食储备。这就是说,现在就需要立即提出扩大粮库面积,建造大批新的中继和终端港口的大粮仓及对磨坊与收购站粮食装卸作业坚决实行机械化的问题,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便加强粮食工业的技术基础,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明年即使有工人阶级的这种动员和支持,我们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量的粮食。然而国家计委在批准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和预算控制数字的时候却狠狠地愚弄了我们。

丘巴尔:特别是乌克兰。

米高扬:对,特别是乌克兰,但也还有别的地区。我将坚持要求对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找到一定的资金来源,然后就开始建设粮食业的技术基础。加强国营谷物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要求在每个这种国营农场或大型集体农庄附近建造一个机械化的中继粮库。

喊声:对。

米高扬:单是从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1930年我们必须于40天内在那些或者完全没有大型粮仓或仓库网,或者虽然有但数量极少的地区接收5000万普特的粮食,而1931年接收2亿普特的粮食。而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⁷⁵完全公正地说,关心接收粮食和建造大型粮仓与粮库不是它的事情,它将要求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时接收所要求的全部粮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需要可观的基本建设投资。装卸作业的机械化就需要至少1000万卢布,鉴于在运输规模季节性增大的情况下由于装卸工的缺乏和由于提高交通人民委员部全部车皮机动性的需要不允许装卸有延误,这是完全必需的。

除此之外,从1930年夏天起,粮食出口将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年我们不出口粮食,而仅限于出口少量的大麦、燕麦,也许还有玉米,但

是毫无疑问,明年我们将出口相当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不仅我们清楚,甚至美国农业部也清楚,它十分密切地注视着我們解决粮食问题的工.作,完全合理地把我們视为世界市场上粮食出口的竞争者。鉴于农场主们打算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北美合众国农业部发出了一个把生产规模保持在国内需求范围之内为适宜的正式警告,同时也鉴于“俄罗斯可能在几年之内重新成为世界市场的因素”。

请大家注意我们的口号和他们的口号的对立性。我们号召“种多一点”,他们号召“种少一点”。

但为了进行粮食的大量出口,必须立即在黑海各个最重要的港口,特别是乌克兰各港口着手建造大型机械化粮仓,因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将是主要的出口地区,而且原先粮仓的一多半仓库面积在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被破坏了。需要在敖德萨、赫尔松、马里乌波尔和图阿普谢建造新的港口大粮仓。

在已经通过的和我们正在执行的五年计划中,粮食资源和对工人阶级的供应问题是薄弱环节之一。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同时,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吸引到对计划这一极其重要部分的彻底修改上来,使其大大增加,有的地方甚至成倍增加。在新建的巨大工业企业的周围,新的工人中心在光秃秃的地方开始迅速兴起。同时,这些新中心的工人物质生活的安排,在工人居民大量增加及其对主要食品需求增长的情况下整个工人阶级的供应问题,改善工人供应的任务正在成为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在粮食方面,五年计划的这个缺点我们通过采取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谷物种植业发展速度的办法来消除,如果党这样毫不松懈地关注粮食问题,我们一定能于最近两三年内完全彻底地解决粮食问题。

继粮食之后,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如果党不立即亲自着手解决肉的问题,我们将在肉的方面感受到最严重的紧张。有一切可能在最短期间内消除肉的困难并按照粮食的成例解决肉的问题。

在新的经济年度里,在改善面包和鱼的供应的同时(在鱼的供应方面政治局的决定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我们将在两年内把渔业提到更高的高度⁷⁶),在多少增加米和葵花子油以及蔬菜供应的情况下,我们在肉、奶制品以及食糖供应方面仍将有很大的困难,食糖的产量比去年急剧下降。所有食品中糖大概是最紧缺的。在我们采取把制糖工业原料基地搞上去的措施的同时,我们今年就必须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保证对主要工人中心不间断的食糖供应,哪怕是定量的一半也好。

其实,正是由于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手里掌握着食品并不断地供给工人,才能够保证工业领域控制数字质量指标的完成。这些数字规定1929—1930年度提

高工人实际工资12%。其中9%由增加名义工资来实现,其余的3%由改善和降低物价来实现。我必须提醒中央全会,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一系列特别措施安排工人的食品供应,首先是肉的供应,这项任务的完成将受到威胁。

有人喊:这是对的。

米高扬:然而,这些任务在控制数字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尽管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农业食品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了很大的增长,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这些设想。

我们已经从振兴产肉畜牧业、建设肉食品加工的肉类工业和冷藏网的角度把肉的问题提到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政治局组成了专门委员会研究我们的各种建议⁷⁷。我相信,我们会因此使肉的问题发生根本的转变。现在是1929年秋天,肉的收购在超计划进行。现在我们肉很多,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向我们发出警报,如果现在不采取一系列措施,秋天和夏天我们将发生肉的严重缺乏。我们的出发点是,不能超过由畜牧业牲畜总头数正常增长的需要得出的那些定额,去扩大牲畜收购计划。但是因为这个收购额度要求比去年大大降低城市肉的供应而不是必要的增加,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不增加牲畜屠宰量的情况下,用各种育肥措施增加已收购牲畜原有重量的办法增加肉类资源并把养猪业的问题摆在首位。猪是一种成熟最快的产肉动物,我们必须动员力量,特别是集体农庄以及国营农场与城乡合作社的力量,育肥350万—400万头猪,大范围推广牛羊的放牧育肥办法和利用工业(糖厂和酒精厂等)的废料进行育肥。这些育肥办法可能因牲畜育肥增重向我们提供至少3000万普特的肉。

我提请你们注意,我们畜牧业的最大弱点,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农场,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作用小得令人难堪。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截至1929年4月1日,社会主义成分在产肉畜牧业中占1%,而且,在产品畜牧业中也像在粮食生产中一样,遇到的全部问题是必须建立大型的社会主义企业取代许许多多商品率低和不能使畜牧业在质量和数量上快速提高的小的和很小的农场。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已经谈了集体农庄商品率低的问题。在收购粮食巡视各地的時候,我询问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商品畜牧业的情况并从这个角度进行了了解。这是一幅十分令人不快的景象。在畜牧业方面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仍然是自然经济。它们的商品率不仅不比农民平均商品率高,而在一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甚至还要低。我没有时间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这种情况,但这却是肯定无疑的。商品率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到国营农场的我们的经济管理

领导干部的面前。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和老国营农场胡乱糟蹋饲料,把它们大量分发给自己的职工和邻近的农民,后者又把大部分转手倒卖给别人;它们还私分私拿畜牧业产品,把畜牧业看作没有商品价值的副业。我们应当在提高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商品率方面立即实现急剧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应当加速发展具有肉用、乳油兼用等专门方向的专门的畜牧业集体农庄。在这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单是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就能在自己的饲料基地上接收三十多万头牛。可以把数以百计的牛养在国营农场的牛栏里,对这些牛栏进行根本的改造并消除其旧地主经济的精神,在苏联国家肉类生产国营农场联合公司系统内建立专门的肉类国营农场,改变我们各主管部门对工业式国营农场的态度,以便三年之后,即到五年的末期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国营农场得到所需肉类的至少20%,更不用说应当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集体农庄了,就如同它在粮食方面所起的作用那样。在增加放牧育肥措施的同时,工业化养牛业、养羊业和养猪业,建立肉用畜牧业各部门专门化国营农场的完整网络,应当和能够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肉类供应方面提供强大的支持并且成为农民和集体农庄畜牧业技术和社会改造的主要中心。

尽管我们的肉类缺乏,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肉类资源的浪费都没有苏联大,美国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没有肉类工业,我们屠宰业可用于制造食品的成百万普特的剩余物都白白浪费了。最近几年建造了几个肉类工业联合企业,例如在鄂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波尔塔瓦。它们最近几天才投入生产并给了我们巨大的、简直是惊人的成果。且不说它们的高利润,靠它们我们可以节约大量的肉食品,而过去却白白浪费掉了。单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工厂每天生产12万—15万个罐头,但这是我们唯一有这样生产能力的工厂。应当用美国的最新技术成果建造一个大型肉类工业联合企业网,以便利用屠宰业的一切剩余物,例如:血、肠子、肚子、脂油、皮、角、蹄子、肝、脾,——总之,这一切都能够并且应当被作为宝贵的工业产品加以利用。然而,我们城市里的屠宰场完全不像工业企业。直到不久之前,它们还与粪便车队和旅馆一道同属于公用事业,这些屠宰场被公用事业管理局看作是牲畜的旅馆。(笑声)

柯秀尔:不错的旅馆!

米高扬:每头牲畜一昼夜收费大约20戈比,而对其他的事情公用事业管理局毫不关心。然而,在屠宰场里我们的牲畜掉膘,死亡,剩余物得不到利用,这一切在我们贫穷的国家里竟不为人所注意。几千万金卢布白白地丢失了。而最主要的是,这一切并不难解决。既然我们能够建立大型机器制造工业,难道我们就

不能建立肉类工业？我们必须于最近两三年内建立起新的肉类工业。

我们今年到底怎样摆脱肉类危机呢？第一，今年秋天超计划收购的肉不能仓促卖掉，而要最大限度地把它加工成腌肉、冷藏肉和冻肉，加工成罐头和香肠，把它们保存起来供春夏两季之用。第二，把最大数量的牲畜放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工厂里育肥。第三，从放牧育肥的牲畜里挑出奶牛，不送去屠宰，用它们补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牛群。而最主要的是立即让猪来帮助克服肉类危机。

有人喊：对。

米高扬：在肉的方面最能救急的就是猪。

有人喊：对。

米高扬：应当由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来抓这件事。让它们各买20—30头小猪，将其养大喂肥并在规定期限内交给我们以便供应工人。我绝对相信，如果党认真抓这件事情，我们最近一两年内就能解决肉类危机。

由于几乎所有的食品都缺乏，今年我们在各主要工人中心对这些食品实行定量供应。这是保障工人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因为在食品缺乏而又不实行定量供应的情况下排队是不可避免的，而排队占便宜的是有仆人的耐普曼，吃亏的是从事生产的工人。但是，定量供应要求改善我们所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很薄弱的分配的技术基础。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人中心，如顿巴斯和乌拉尔，以及在一些工人居民增长很快而技术基础发展很慢的新的巨大建设工地上情况特别困难。这些地区的工人合作社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工业又不予以帮助。第一，应当保证工业对这些地区的帮助，第二，应当对消费合作社的利润和积累重新分配，以便由比较富裕的、没有大量工人居民或者新的大型建设工程的地区调拨资金给主要的工人中心，如顿巴斯、乌拉尔，以及新建设工地：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建设工程、库兹涅茨克建设工程、车里雅宾斯克建设工程、拖拉机厂建设工程等。不这样做我们将难以完成工业的计划，不这样做我们将妨碍已经开始的简直是空前高涨的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英雄主义的伟大迸发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社会主义竞赛。

我认为有必要对古比雪夫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报告提出一点意见。这个意见涉及国家生产力正确分布和与之相关的新工业企业建设的区划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在五年计划中，而且在控制数字中都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便以中央黑土地带州为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与许多地区相比，中央黑土地

带州有着巨大的地理优势,处于联盟的中心位置,从原料运送和产品销售的角度看,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央黑土地带州离顿巴斯很近,拥有过剩的农村人口,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然而,在整个工业五年计划正在完成和超额完成的同时,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工业五年计划却完不成,且不必说中央黑土地带州这个五年计划是最微不足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同志反对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在沃罗涅日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们的一些抱怨,但同志们肯定地说,中央黑土地带州利佩茨克冶金厂的建设比五年计划的期限推迟,而40万吨矿石正从中央黑土地带州运往顿巴斯,我对他们能说什么呢。在推迟建设利佩茨克厂的同时,在克里沃罗格和莫斯科郊区开始了冶金厂的建设。与正在建设的和五年计划预定要建设的相比,在中央黑土地带州应当而且可以建设更多的工业企业。这是由正确安排全联盟国民经济的需要决定的。忽视中央黑土地带州和国家其他一些地区的工业建设在经济上是不适宜的,在政治上是近视的。而政治因素在这里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在一个大工人中心建一个新厂和增加5000名新工人,这不会给该工人中心增加多少政治分量,可是如果把这样一个5000工人的工厂给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科兹洛夫或者另一个农民区,这将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将在农民群众中形成坚强的无产阶级支柱,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并减少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困难。根据我的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已由中央全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⁷⁸批准的五年计划的决定中特别指出重新配置工业企业的必要性,将一部分工业企业移到一些农民地区,首先是中央黑土地带州。尽管如此,“车到现在还没有动”。要使这件事情发生转变,需要党中央的干预。我想,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工作人员在反对和抱怨的时候,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斯大林:他这是在挑唆瓦列伊基斯。]⁷⁹

米高扬:我们必须在工业建设方面支持中央黑土地带州,不是因为这对中央黑土地带州有利,而是因为这出于全国的直接利益。如果中央黑土地带州工作人员的一切抱怨只是地方主义的表现,我是绝对不会予以支持并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的。

至于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那么应当指出,除了这些数字所采取的极高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我们建立国家储备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特别指出了建立国家储备的目的⁸⁰。控制数字规定了数量相当大的粮食和外汇储备,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粮食储备已经建立——需要的只是像保护眼珠一样的保护它。由于在许多最重要的地区,特别

和首先是在乌克兰、中央黑土地带州、伏尔加河下游、巴什基尔和鞑靼,以及在伏尔加河中游、莫斯科州、下诺夫哥罗德和西部边疆区提前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我们比规定期限提前三个月建立了这种储备。北高加索虽然在大麦和玉米方面大大落后,但在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方面,计划完成得比较令人满意,与这些先进地区的差距不很大。整个任务在于,督促在完成计划方面落后的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和远东赶上来,以便在规定期限之前,即不迟于1月1日全部完成自己的计划。这是完全可能的和现实的。

至于某些作物的收购情况,那么应当指出,全联盟的黑麦年度收购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但小麦的收购我们还大大落在后边。截至11月15日我们只达到了62%,有不能全部完成这种作物收购计划的危险。因此在小麦消费方面需要更加节约。大麦和燕麦的年度计划已经大大超额完成,我就不说了。葵花子的收购情况不太好。应当改进和办好葵花子收购这件事。

因为时间少,只能简短地谈谈对外贸易。在我们工业发展超过战前水平的情况下(现在工业已经为1913年的150%)*,由于出口大大落后于战前水平,过去的两三年是对外贸易最为困难的年份。进口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特别是在设备和原料方面,由于工业建设速度的加快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本国原料基地的发展速度跟不上需求的增长。这几年中央在对外贸易方面成功实行了意义重大的对策。这对策就是,在不出口粮食(粮食出口占俄罗斯战前出口的一半)的情况下,加强所有其他项目,首先是工业项目的出口,把几乎全部进口的资源都用于满足发展中的工业的需要,这就保证了我们工业这种蓬勃发展的速度。

从这个角度看,下面的数字是很有代表性的。战前全部的出口整数为13亿卢布,而除了粮食之外的全部出口为6.11亿卢布;现在,按照1929—1930年度的计划,除了粮食之外的全部出口应为11.5亿卢布,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而连粮食在内的全部出口现在只接近战前的水平,为12亿卢布,即比战前减少1亿卢布。从这项对策的角度看,下面的情况也很重要:在战前的进口中生产资料的进口占了全部进口的60%。而现在生产资料的进口占整个进口计划的90%。

这些数字的意义本身就一清二楚,无须说明。

在分析我们出口计划的时候,应当首先注意的一点是,整个出口计划的

* 原文如此。——编者注

50%都落在三大类出口商品——木材、石油和毛皮上,计划规定这些商品要比战前大大增加:木材比战前增加将近一倍,石油增加将近三倍,毛皮也增加将近三倍。这既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弱点在于,这些大项目出口计划没有完成的每一个百分点在整个出口计划中都是一百万卢布的外汇。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进行极大的努力全部完成出口计划,首先是这三大项目出口计划。如果说石油工业和毛皮业采用了不少最新技术成就,那么我们在林业方面却非常落后。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有的不是森林工业,而是木材采运。只是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才计划建设真正的森林工业,包括林业最主要过程的机械化和对森林工业全部下脚料进行工业加工。至今我们的木材采运仍然是几乎全靠农民和他们的马匹。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与粮食收购方面同样的困难,因为依靠的力量——社会基础是相同的。然而需要建造冰道,需要大胆采用拖拉机作为木材运输的牵引力量。制材、纸浆、造纸企业的建设——这一切都应当进行根本的改造。

木材工业和木材出口的各种问题不久前曾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召开的,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我们还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道去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请求党帮助坚决扭转我国林业的命运⁸¹。

我提请你们注意去年完成出口计划不足的方面,因为这些不足的方面对新的经济年度仍会有影响。

有一些商品,我们未完成出口计划6500万卢布,即:油的出口未完成1200万卢布,蛋——2000万卢布,木材——2800万卢布,石油——约500万卢布。但是,其他项目却超额2700万卢布完成了计划,这样,我们的整个计划有3700万卢布没有完成,即整个年度出口计划只完成了96%。我们必须采取一整套措施保证整个出口计划的全部完成,可能的话超额完成,因为出口制约着我们许多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决定着十分急需的设备、原料和拖拉机能够进口的规模。为了引起集体农庄和合作社以及所有地方机关对大力提高出口,特别一些有巨大潜力的次要项目出口的关注,我们通过了一个决定,凡是这些项目超过计划所赚的全部外汇都用来为集体农庄追加进口拖拉机。

如果发挥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各界的广泛主动性,我们就能够超额数千万卢布完成这一大类商品的出口并用这笔钱增加从国外订购拖拉机的数量。

尽管要求增加进口并有理由提出这种要求的用户有种种抱怨,计划进口的规模很大,与出口增长的速度是一致的。工业将得到经济管理人员一年前连做

梦也想不到的那么多的设备。单只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进口设备一项就占了我们4.5亿多卢布(去年的计划为1.2亿卢布),而设备的全部进口为5.3亿卢布。农业将得到1.1亿卢布的进口,而且这个数字大概还得加上为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和机器拖拉机站进口拖拉机的1500万—2000万卢布。这表明,农用产品进口额比去年增加一倍多。同时,我们面前还摆着积累1.2亿卢布外汇储备的任务。1929—1930年度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将是转折性的一年。未来几年将轻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出口战线上作出极大的努力,以便从这一方面支持我们整个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

但是,对外贸易的这种增长和改进我们外贸业务的质量要求尖锐地提出了党的外贸干部问题,问题提得甚至比对我们所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干部更加尖锐。外贸机构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各国阶级斗争的接合部。我们的外贸工作人员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工作,天天同资本家打交道。对于工人来说,外贸事业是比工业管理和农业建设更不熟悉的事情。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普遍尖锐化和专家的分化,我们驻外机构的非党工作人员和专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而且这些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如果在国内我们在苏维埃的环境中有无产阶级舆论的影响,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那么在国外我们不仅没有这一切,而且相反,在那里我们工作人员的心理每天都受到来自白卫军报刊、资本主义报纸和企图瓦解我们机构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影响。这种环境不仅对专家,甚至对共产党员都发生着腐蚀性的影响。某些著名共产党员,例如巴黎全权代表处的别谢多夫斯基⁸²等人的背叛,开始对非党机构和对某些阶层的共产党员发生传染性的影响。去年有44人拒绝回国,其中多数是1926年以前派往国外的,而七人是1926年以后派出国的⁸³。而且,其中不少人有许多共产党员负责干部的良好推荐性评语。

有人喊:他们当中有多少共产党员?

米高扬:有七名共产党员。

最危险的是,这种现象在共产党员中开始增加。这就使反对非党工作人员背叛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在一部分工作人员腐化、离队与背叛的同时,近几个月我们发生了几件性质相反但也非常危险的事情。由于神经过度紧张和受到怀疑与责难的影响,有两名工作人员自杀了。其中一名是非党员,在汉堡自杀⁸⁴,另一名是我们许多人在国内战争时期就知道的共产党员、驻中国的商务代表科罗布金同志,回到莫斯科以后,他自杀了。

这一切都要求特别提出外贸工作人员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具有一切必要

知识和经验的干部,我们最需要的是经过多次审查、考验和能够在国外坚定地维护我们的利益而不受任何腐蚀影响的干部。需要专门动员一批最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和青年专家及经过审查的工人,他们不难在半年至一年期间经过实际培训即能胜任工作。如果我们将要审查的是有能力的人,这一点不难做到。我特别强调从审查个人生活的角度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因为首先腐化的是那些曾经过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和那些受妻子影响的人,因为妻子引诱他们追求资产阶级的奢华。嗜酒好色的人不应派往国外。一部分工作人员的选拔应当交给一些地方党的组织进行,如列宁格勒、莫斯科等,责成这些地区的党委会为我们选拔相应的工作人员并于他们在国外工作期间同他们保持联系。

中央应当专门为对外贸易动员 200—300 名工作人员,以使用他们替换一部分现有的驻外干部并加强机构⁸⁵。必须为外贸工作人员建立专门的学院⁸⁶,按照红军的经验安排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如果不迅速和根本解决驻外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如果不迅速和根本解决驻外干部的问题,我很担心,我们会因不能称职地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外贸战线上让党和工人专政丢脸。

主席:请什维尔尼克同志发言。

什维尔尼克:在讨论 1929—1930 年度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对它们的讨论同经济年度的结束联系起来。1928—1929 经济年度的成绩说明,我们党的总路线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把对控制数字的讨论同对右倾分子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联系,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在一切问题上完成揭露右倾分子的工作,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向党提出的,而在这一切问题上结果党都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必要的,还因为正在规划的 1929—1930 年度的前景说明,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必须为实现这些前景付出巨大的努力。我指的首先是冶金工业。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1929—1930 年度的控制数字在总产值平均增长方面给冶金工业的任务是提高总产值 38.2%。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即冶金工业中这些数字的分配情况如下:黑色冶金——24.2%,有色冶金——34.7%,通用机器制造——44.2%,农业机器制造——75%,船舶制造——66.2%,金属制品——27.3%,电力*工业——70%。

这些数字相当清楚地说明冶金工业在完成经济计划时必须承受的极其紧张。如果再考虑到其他的指标,例如降低成本 11%,提高劳动生产率 23%,同时还有增加实际工资 12%—14%,那么这些指标更加深了我们完成控制数字时将

* 速记记录为电工器材。——编者注

要承受的那种紧张状况。

在这里我必须把所了解的有关我们企业实际情况的资料告诉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我昨天才从乌克兰巡视归来,在那里我去了顿巴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白采尔科维并了解了工会的工作。

彼得罗夫斯基:没到我们那里去。

柯秀尔:去了,去了。

什维尔尼克:在去顿巴斯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前⁸⁷,我去了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同梅德韦杰夫同志谈了巡视计划,巡视计划得到了乌共(布)中央和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的同意。

我想请全会注意和我到企业首先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正如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正确指出的,工人的谈话是从生产问题开始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工人们指出生产中存在混乱现象,这些混乱现象妨碍利用工人的热情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竞赛,而这是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工作的唯一正确的形式。但不由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工会到底工作得怎样?我得出的结论是,工会继续在用老办法工作,还没有真正地面向生产。这一点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工会组织,上起州工会理事和州工会各部,下至地区分会和工厂基层支部。它们都还没有真正地面向生产。如果再注意到,我们不仅应当面向工业,而且应当面向在新技术基础上对农业的改造,那么工会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情况更加糟糕。如果工会工作面向生产的一翼开始有所进展的话,那么面向农业改造的另一翼,工会的工作就开展得太差了。它甚至没像第一翼那样多少挥动一下。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结论,为了实施无产阶级对农业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改造的影响,需要工会的第二只翅膀像第一只翅膀那样挥动起来,以便工会展开自己无产阶级的双翼,不仅对我们工业的发展实施自己的影响,而且也成为对农业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无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社会主义竞赛作为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确实把工人群众吸引到生产工作中来。在这方面我有机会看到,工会在认真地开始领导这件事情,逐渐面向生产,总结去年发生的缺点,规划前景,这肯定会消除去年的缺点并保证广大工人群众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发展我们的工业以及对农业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事业。

在这里我请古比雪夫同志注意一点,自下而上由工人群众直接讨论控制数字使得工厂的领导采取了令人气愤的态度。因此工人不可能投入他们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时所表现的热情。下面就是一个有关速度问题的例子。我们在这里进

行讨论,通过决定,制定路线,可这条总路线怎样才能速度问题上折射在实际工作中呢?我举斯大林工厂的例子。厂里拟定生产计划,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斯大林工厂的领导确定降低成本2%。工人考虑到社会主义竞赛的成绩和生产会议的情况,建议降低7%。工厂的领导对此表示反对,从而把工人拉向后退,劝说他们不要承诺降低成本7%,而只限于降低2%。这种现象也发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捷尔任斯基工厂。结果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共产党员负责人呆在那里在速度问题上投票赞成党的决定,赞成党的总路线,而实际上是右倾泛滥。很难给这种态度以别的称呼。当工人提出降低成本7%的时候,这些负责人坚持降低成本2%,而当中央来了降低成本11%的指示,他们表现得俯首贴耳并开始执行中央降低成本11%的指示。应当结束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了。应当让经济机关更敏感地注意工人群众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社会主义竞赛的开展,我们将获得新的资源,它使我们能够在发展我们工业的道路上以更高的速度前进。

第二个问题是实行五天周⁸⁸的问题。在这里照例应当指出经济和工会组织在贯彻这个问题时所表现的可怕的迟缓。许多工会工作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不理解实行连续生产,实行五天周的政治、经济和生活意义。就拿斯大林工厂和彼得罗夫斯基工厂的高炉车间为例吧。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实行连续生产?他们说,高炉车间不能实行五天周,因为这会提高工资总额。

有人喊:高炉车间在连续工作。

什维尔尼克:请不要用花言巧语骗人,我这里说的是实行五天周,我说的是贯彻五天周的决定。

这里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没有作任何计算,却把一个想法硬塞进自己的头脑:不能实行五天周,而又举不出任何证据。这种态度是完全要不得的,你们必须改变这种情绪,以便使像五天周这一重要措施能够贯彻执行。

苏维埃机构是怎样进行改革的?我举斯大林诺的一个例子。这里的卫生保健处和社会保险处实行了五天周。我们看到的情况怎样呢?来了一个工人,他肚子疼。卫生保健处的人对他说:“我们只能给你拔牙。”工人反对说:“我肚子疼,干吗给我拔牙?”原来他们进行了这样的改革,没有值班医生,只有一个牙医,所以他只好对肚子疼的工人说:“来,我给你拔牙。”

而社会保险处是怎样实行五天周的呢?工人们来领补助金,可这时候出纳员不在。当一个工人问,出纳员怎么不在,他得到的回答是:“编制里没有。”这只是顺手捡来的两个例子。而这种情况不少。这是一种最极端官僚主义的态度。

度,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连续生产抱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关心为工人服务。我们必须最坚决地提出消除这种现象的问题。

现在谈谈生产会议。我觉得,工会工作人员应当抓这个极其重要决定⁸⁹的落实,因为它责成经济管理人员实行工人在生产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现在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彼得罗夫斯基工厂对生产会议情况进行检查以后发现,有17 000条工人的意见下落不明。我认为,工会的这种态度有造成政府如此重要的决定得不到贯彻的危险,而这就使我们没有可能百分之百地利用工人真正创造性的能量。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为实际工资而斗争的问题。供应问题现在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怎样呢?工人们抱怨说:“什维尔尼克同志,真不像话,我们在这车间里干完规定的时间,回家以后还得每天排四个小时队。”工人的妻子、工人本人每天都得把四个多小时浪费在排队上。像高炉工、轧钢工这些工人,工作非常沉重,需要正常的休息,可每天不得不排四个小时队。我曾经问过,在同排队现象进行斗争方面在做些什么。我应当说,斗争开展得太差。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工厂工会委员会主席同中央工人合作社主席早晨一起去巡视市场。他们看见两个面包凭证供应商亭,一个商亭在分发面包,它后面排起了长队,另一个商亭却空空的。一个姑娘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商亭前一个排队的也没有。(笑声)如果不是这么可悲的话,那会是可笑的。他们问她,你为什么坐在这里看书,你为什么不去旁边的商亭拿些面包来并招呼一声,大伙儿别排那个队了,到我这里来,我来分发面包。代替这的是一声官僚式的回答:她坐在那里,因为面包没送来。在主动与排队现象进行斗争方面他们一点事情都不做。这是纯粹的官僚态度。

我认为有必要把顿巴斯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工人的申诉报告中央全会,他们在申诉中抱怨说,干的是重活,却领不到油脂。甚至领不到规定的定量,因此他们提出为家庭人口多的工人增加面包的定量。所说的是家庭成员。工人领取两磅,而家属每人四分之三磅。因此工人们说,如果没有油脂,就给家属们增加一点面包,以使用面包补充油脂的缺乏。我认为,这一点应当加以注意。工作确实是这么重,需要增加面包定量。对于像冶金工人、采矿工人这些类别的工人,如果没有可能增加油脂定量的话,的确需要增加他们家属的面包定量。这是必须做的。

我们是怎样为实际工资而斗争的呢?我觉得,为实际工资而斗争的问题现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为实际工资而斗争方面,工会工作人员什么事情也

没做。我在这里这样说是完全负责的。

他们不是面向菜园,面向工厂周围的国营农场,而是面向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要钱,而向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要土豆和白菜。1922—1923年我曾有机会担任顿涅茨克冶金工人工会区委会的主席。那时我们安排好了由地方菜园向工人供应蔬菜的工作。那时我们没有发达的国营农场,但我们还是向工人供应了蔬菜——工厂附近菜园产的土豆、白菜、西红柿。可现在同志们却面向哈尔科夫并等待着什么时候从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给他们运土豆来,而在就地促使有关单位种植蔬菜并以此真正为实际工资而进行斗争方面自己却什么事情也不做。

事情往往弄到可笑的地步。有些工会领导人向我证明,顿巴斯不长土豆。当我把他们逼得理屈词穷的时候,他们说,他们那里土豆虽然能长,但是不能吃。那时我叫来了附近国营农场的一位负责人,结果出现了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我想请你们注意。工厂边上有一个国营农场,国营农场有几个菜园,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完全满足工人对西红柿、土豆和白菜的需求。可工人们并不了解这一点。不仅如此,就在这里斯大林工厂旁边的“沙土”国营农场里有一个奶牛场,到5月1日那里的奶牛将达到1000头。这1000头牛将产奶250万公升。看来,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措施,工会工作人员、经济管理人員和工人都是应当知道的。结果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常常奏着乐,敲着鼓到这个国营农场去,在那里举行集会,但没有一个人关心生产计划,关心国营农场在做什么,以便给工人一个缓解食品困难的明确前景。他们也不了解,政府正在花费15万卢布扩大这个国营农场。

我认为,如果今后将继续这样进行争取实际工资的斗争,我们将无法完成提高实际工资的指示。在这方面需要党的、工会的组织改变工会工作人员的脑筋,使他们真正面向的不是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而是自己荒芜的和未利用的菜园,面向国营农场,面向真正全面为在工业中心工作的工人服务。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我们心里想保护工人的利益,而实际上却在建立牢固的几乎是富农式的农场,它们只会给我们带来绝对的害处。很遗憾,我不懂乌克兰文,不能用乌克兰语朗读,也许同志们能读一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件。

扎东斯基(翻译):

生活问题。

“厂领导保证在粗饲料和饲料有剩余的情况下按照成本发给没有份地的固定职工饲料。对铺垫用的干草,确定以下标准:一头牛(母牛)铺垫用的干草

为——每天10磅；一只猪铺垫用的干草为——每天2.5磅。”

有人喊：什么地方这么干？

什维尔尼克：糖厂到处都这么干。我可以告诉您更多，他还没有读完。（笑声）

扎东斯基：我来读完：

“凡有一头母牛、一头小牛和一头猪的家庭，铺垫用的干草每天总计不超过16磅；凡有两头母牛、两头小牛和两头猪的家庭，铺垫用的干草每天不超过25磅；一个月第一种情况为12普特，第二种情况为19普特。

甜菜渣一头牛每天为6普特，一头小牛为3普特。酸渣一头牛每天为3普特20磅，一头小牛为1普特30磅。”

什维尔尼克：我为什么注意这一点？正如你们所听到的，你养的母牛、小牛和猪越多，给你的甜菜渣、干草等的定量就越多。此外，每个工人每月可以按低于成本10%的价格为自己领取6磅砂糖和为每个家庭成员领取3磅砂糖。我曾试着问，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腐化。固定工人利用母牛、猪进行投机买卖，利用砂糖等进行投机买卖，他们无暇进行加强无产阶级对周围农村居民影响的斗争，因为他们自己陷入了这种经营活动之中，陷入了猪和母牛之中，因而不执行赋予他们的那些任务。不仅如此，熬果酱的季节到来的时候，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必须支持发给每个工人4普特砂糖的要求。他们把这称为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我认为，对这种保卫者应当最坚决地打击，因为这不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企图建立大的农场，这种大农场决不是我们政策的无产阶级传播者，相反，它们在腐蚀周围的农民，制造反对我们的情绪等。

下一个问题是经济机关的工作。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企业都在制定工厂根本改造的方案，却完全不注意各个车间的协调一致。工人们宣布进行社会主义竞赛，开始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遇到了不协调，缺乏相应的工作安排。在斯大林工厂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轧钢工人来上班，在自己的机床旁边没找到联轴器，无法开动机器。他们便去找配件技术员（有这样的配件技术员），结果他人既不在，也没有备用联轴器。请问，既然在需要的时刻他不能前来帮助工人，要这样的配件技术员干什么用？工人去铸造车间和其他地方寻找联轴器，以便开动机床，完成定额，但在那里也没找到这种联轴器。结果找了个旧的联轴器凑合上了，但为此浪费了一个半小时。我故意举细小的例子，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举不胜举，它们使工人受到打击，使他们心情焦急，破坏全体工人群众的热情。工人群众对此作出痛苦的反应。经济机关应当改革，使它们的管理配件的

领导和配件本身都在其位并能及时送达,否则就会出现脱节。

再举马克耶夫工厂的一件事。机床应当先轧制轻薄板坯,然后轧制重薄板坯。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机床适应,重薄板坯在最后比较容易轧制。可他们反着干:先轧制重的,机床受到磨损,而后轧制轻的。结果出了废品,造成停工。工人们抱怨,就通过决议。大家都接受这些决议,但没有一个人为消除这种现象而做点什么。

莫洛托夫:工会工作人员也不做?

什维尔尼克:我认为,这些小事也很重要。可我们都在研究改造问题,制定各种大的方案等。而当我们有了固定资本,而且这种固定资本往往在空转的时候,人们对此并不注意。这里没有各个车间之间的协调一致。请看一看工厂的领导机构。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一个用官僚主义态度制定的合理化计划。这个计划是关在办公室里制定的,完全脱离了企业自身的实际生活。工人们说:“你们哪怕把你们已经收到的我们的建议放进合理化计划里去也好。”这真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各个车间能够开始协调一致地工作,不会再出现现在仍然有的那么多停工和神经紧张。但连这件事情也不去做。因此改革经济机关,消除这些缺点应当成为一项战斗任务。如果我们不迅速改造自己,我们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竞赛的开展,破坏利用工人所具有的热情的可能。对于那些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真正改进企业工作的人,我们必须揪住他们的领子使劲摇晃。

以彼得罗夫斯基工厂为例吧。由于外汇困难和因此而产生的青铜缺乏,那里打算改变轴承的成分并采用新的合金。结果是停工和工人一个月期间损失工资30%。你们为什么停工?原来,轴承每天都断裂。怎么回事?已经弄清楚了,试验不是在实验室里也不是在一台机床上,而是在生产中开始进行的,损坏了许多辘子,因为安装了由青铜和铸铁制造的轴承。很清楚,青铜磨损了,铸铁剩下来并磨损辘子的轴承。我问,损坏了多少个辘子?损坏了很多。轧制用的辘子非常贵。工人们说,试验将比使用青铜轴承更贵。难道国家就找不到青铜,试验就不能在不影响整个生产的那些机床上进行?这种试验进行了一个月,结果工资下降了30%,生产率也降了。一个在那里工作了20年的工长向我表示:“什维尔尼克同志,如果冶金工人工会中央不采取任何措施,我将离开工厂。”

斯大林:工厂厂长呢?

什维尔尼克:工人们向我表示,他们同工厂领导谈过,工厂领导借口说有外汇等大量的困难。情况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出现了很多演说家,他们来到全体大会上,信口雌黄地大谈困难,大谈国际形势,而自己却连手

也不动一动去消除有时是很小的缺点,而这些缺点的消除完全取决于他们。我们应当让党组织打击这些“哲学家”,他们大谈困难,大谈国际形势,而在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并帮助工人同经济机关一道消除使大家焦急不安的小事方面却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措施也不采取。

我认为,我们应当加速进行工业管理体制的改组⁹⁰。

有人喊:一定要。

什维尔尼克:关于改组的事所有的工厂都知道,这就导致了那些被撤销机关的工作的放松(包括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对生产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如果我们打算改组托拉斯,那就应当赶紧进行,或者说明今年我们不进行改组,以便让工人了解前景,因为没有奔头会削弱他们的劳动意志。

我想请你们注意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使金属工业工厂尽快专业化的问题。我认为,金属工业工厂应当尽快实行专业化。就以卢甘斯克蒸汽机车制造厂的事情为例吧。卢甘斯克厂曾经接到连续生产几种新类型蒸汽机车的任务,生产这种机车需要对工厂进行改造,结果工厂几乎是在空转。然而,它本来可以在我们机车缺乏的情况下生产更多得多的原有类型的蒸汽机车,同时又逐渐适应新类型的机车。这样,生产效率既高,又对国家有利。可是不这样做,硬是取消了工厂原来承担的系列,让它生产新类型的蒸汽机车。工人让工厂在空转,一切灾难纷纷落在他们头上。还好他们光荣地挺过来了。斯大林同志!假如让卢甘斯克厂只生产适合于它的一种类型的蒸汽机车,那它生产出来的就不是41台,而是60台。因此,金属工业工厂专业化的问题应当加速解决,而且不用增加新类型的产品去干扰它们,而让它们有可能逐渐转向新产品的生产。只应当这样来安排生产。可我们总是轻率地决定问题:撤销旧产品,上新产品,打乱生产进程。要知道,金属工业不是缝纫工业,在那里可以缝制一种式样的服装,两三天以后改而缝制另外式样的服装。金属工业的转产需要时间。

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我说过,应当重视并加快第聂伯联合企业的建设。我肯定地说,第聂伯建设工程将如期建成,而各个工厂跟不上,我们也将在那里空转。所以我认为,在认真提出问题和好好推动这件事情方面乌克兰的同志做得太少了。应当加速解决这件事情,可你们在睡大觉,乌克兰的同志们!(喧嚷)

斯大林:冶金工人工会中央万岁!

什维尔尼克:新建工程方面的一个例子。马克耶夫工厂新建了一个4号高炉。我应当说,这不是一座高炉,而是个美人儿。这是座能生产大量生铁的美国

式高炉。就这样建起了高炉,但忘了盖遮阳棚。工人在露天下面工作,八个小时在雨里淋着,连个他们能在里面暖暖身子的岗亭也没有。我问,为什么没盖一个棚子和岗亭,这需要花多少钱?他们用玩笑应付过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饶恕的。我们应当要求进行这种建设工程的人遵守规矩。

有人喊:这用的是美国技术?

什维尔尼克:他们追赶美国,这不错,我们会支持的,但是应当不仅赶上,而且还要超过。应当既有棚子,也有岗亭,让工人能够在美国高炉前不比在旧的高炉前工作得差。

还有一个问题,即合理化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你们看,有这样的样板。有一个科学技术处,是它画出了这幅图画。

斯大林:在哪里,是谁的属下?

什维尔尼克: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属下的科学技术处。

有人喊:你现在不用翻译了,现在你自己来读。

什维尔尼克:让他来证明,这件事情不是他那里干的。

有人喊:我可以证明!

什维尔尼克:请看,这个处搞的是什么生产合理化。这是反革命,而不是生产合理化。

有人喊:为什么?

什维尔尼克:你们看,有两个企业——一个坏的,一个好的。企业为什么工作不好,这里是怎么说的呢?要明白,第一,因为这个企业的工人没有觉悟,没有经验,不认真负责。第二,因为有经常的督促、员工因担心失掉工作而不满、吃不饱、身体不舒服、家里不愉快的事情、疾病、债务、贫穷、普遍的不满情绪、大量的不幸事故等等。最根本的是工资低、工作日过长、人员太多、不卫生的住房条件、缺乏教育帮助、幼儿园等等。这是坏的企业。那新的企业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喊:这是在沙皇统治下吗?

什维尔尼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正在到来。

有人喊:已经到来了!

什维尔尼克:这就是合理化。请看,为了企业能工作得好,他们提出了什么建议。第一,预防疾病。应当通过体操预防疾病。预防不幸事故,保持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

住宅必须具备卫生状况、对工作的体力上的选择、医生和卫生监督、高工资、改善个人的生活、良好的饮食、娱乐等等。但这里是否哪怕有一句话谈到真正的

生产合理化、企业内部工作的正确安排、劳动纪律、生产会议的工作、社会主义竞赛等这些真正是社会主义企业基础的东西呢？

加里宁：这是对的，是对的。

什维尔尼克：应当怎样真正实现生产合理化的问题又在哪里呢？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处把这也送上来了。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

我认为，这样的合理化建议者只能称之为糊涂虫和破坏分子。必须把他们立即赶走，别让他们拼命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合理化。他们还把这张贴在企业里，工人们看着，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在国营企业里，还是鬼知道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样的合理化应当结束。

再给你们举一个样板。我指的是捷尔任斯基工厂临时监察委员会的一个初步文件，是临时监察委员会主席交给我的。这家工厂一年来提出的指标是，它要降低成本6%—6.5%。经济年度的最后一个季度即将到来。发现了什么情况呢？原来，各车间曾提出技术报告，对指标进行了修改。因此，工厂的会计处一直在唱——胜利的雷声响起来吧——降低成本6.5%等。但是，终点线快到了，经济年度即将结束。工厂领导开始做什么呢？第一，注销高炉车间40 028卢布的产量，使产品成本上长0.81%戈比，而由于产量是49 015吨，结果得出了40 028卢布的整数。注销马丁炉钢锭141 465卢布，使1吨马丁炉钢锭的成本上长6卢布37戈比。研究来研究去，讨价还价……

柯秀尔：讨价还价——高高兴兴，计算完了——哭鼻子。

什维尔尼克：真的是：讨价还价——高高兴兴，计算完了——哭鼻子。其次，由于注销的结果，贝氏炉钢锭每吨成本上长1卢布46戈比等。结果是，工厂不是正式降低成本6.92%，而是年降低成本1.86%。

斯大林：哪个工厂？

什维尔尼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民族区卡缅斯科耶的捷尔任斯基工厂。

我声明，这是临时监察委员会的初步文件。我请求中央全会把这样的经济管理人员记下来，如果所举的情况真的属实，应当把这样的经济管理人员赶走并剥夺他在金属工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权利。在那里当领导的好像是马纳延科同志。我了解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管理人员，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金属工业不能容忍这样的经济管理人员，以便使其他经济管理人员不敢再进行欺骗。

最后一个意见，是关于一长制问题⁹¹。一长制贯彻得如何？看来，经济管理人员在中央经受了那场斗争之后，应当紧紧地抓住贯彻中央的指示不放。代替这的却是消极态度。在我到过的工厂里，关于一长制的指示至今没有一个工厂

完全贯彻执行。你开始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执行?经济管理人员抓得不够紧。这个指示对工会工作人员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呢?下面就是例子。在斯大林民族区的一家氮肥厂里,工厂工会委员会主席一字不差地这样说:“同志们,实行一长制,是因为三人领导小组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有人喊:弄清楚了!

什维尔尼克:那里大家都说:“如果被证明不正确——三人领导小组滚蛋!”另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斯莫良卡”煤矿工会委员会主席跑到工会里来说:“喏,既然实行一长制,我们工会工作人员当然就没事可干了。”明白了。

这就是说明中央指示执行情况例子。我问过,为了发出由党、工会和经济管理系统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共同研究的明确指示,党的组织做了些什么。没有这样的指示。仍然存在着经济管理人员曾经与之斗争的那种混乱现象。无论是党组织、工会组织还是经营管理部门都不去消除这种混乱现象。我在这里发出警报,应当结束这种情况。既然有应该消除混乱现象的指示,就应当抓住它并坚决贯彻执行。

最后一个问题,同志们。(笑声)

主席:需要多少时间?

什维尔尼克:最多5—10分钟。

喊声:给他。

什维尔尼克: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的决定,我不仅了解了各工业区工会工作人员改造自己工作的情况,而且也察看了农村地区的工作。我去了白采尔科维并看到那里的工会是怎样改革自己的工作的。惹人注目的是下面的情况。令人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甚至像农业和林业工作者工会这样的工会都学会了正确计算耕地的成本、田间收获的成本等。那里已经能够计算个别工种的成本。同时应当指出,无论是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教育工作者工会还是其他工会都不帮助农业和林业工人工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收获甜菜的时候,工人委员会主席被派去搞粮食收购四个月。而他是工人委员会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一个示范工作队,它以自己的工作榜样激励别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工作队按时来上工,完成生产定额。似乎,其他人应当向它看齐。就在这时候工人委员会主席被硬派去搞粮食收购,而当地的农民季节工不仅不帮助这个工作队的工作,而且恐吓他们说:“伙计们,要是你们干得这么好,你们就等着吧,等你们来到村里,我们会给你们个厉害瞧瞧。”他们就来到村里,放火烧各示范工作队的房子。

有人喊：是什么人？

什维尔尼克：是自己不想在苏维埃的田地里好好干活的农民和那些打突击队耳光、向他们捅刀子的人。在这个时刻不但不帮助农业和林业工人工会制止这种想向国家敲诈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却硬把主席派走四个月，破坏领导，以此轻视农业工人工会的政治作用，不支持农村的先进分子并阻挠我们的措施的实行。

我认为，已经确定的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造的速度坚决要求党、工会和经济机关加强动员和更多地吸引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环节。工人的热情和社会主义竞赛的开展显示了并可能进一步显示工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成分中大量的潜在资源。

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要求更快地改革党、工会、经济和合作社机关工作的形式、方法和速度。五年计划第一年的胜利结束和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的前景百分之百地批驳了右倾分子的张皇失措和对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缺乏信心。今天我们应当在这里要求右倾分子走上这个讲台并放下自己反对党的机会主义的武器。否则，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会成功的人从我们党的总参谋部中清除出去。（鼓掌）

主席：现在宣布休息。

（休息以后）

主席：现在继续开会。请柳比莫夫同志发言。

柳比莫夫：我必须指出，国家计委所规划的涉及供应问题，特别是消费合作社工作问题的速度（它们制定得最不仔细），很遗憾，与控制数字规划的工业和农业的速度不一致。

现在，供应问题是最薄弱的环节，米高扬同志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总是处在对许多食品严重短缺的边缘上，我们不得不向这个或那个地区紧急投放：今天向顿巴斯，明天向莫斯科，后天向列宁格勒。虽然由于党和我们各级组织实行的那些措施，一些问题，如粮食问题，现在已经大大缓和，但是一些日用工业品和食品情况始终是紧张的。

供应方面这些客观困难所以在加深加剧，还由于按照控制数字通过的初步安排中，商业部门，特别是消费合作社在完成所肩负的任务时被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商业部门，首先是作为基本供应部门的消费合作社决不当落后于所制定的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我们也应当改造自己已经落后的、现在完全不能用

的技术基础;我们应当建造许多新的店铺用房,几万处店铺用房;我们应当建造大量的蔬菜储藏库,以便在应有的规模上进行农产品贸易;我们应当在为公共生活服务这样的问题上努力赶上来,如在面包烤制和非常落后的公共饮食方面。我们应当改进服务质量。消费合作社是这样一个部门,数额极大的资金可以通过它调动起来并转移,再分配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特别是工业。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把为新地区的新建企业的服务搞得比我们过去对老工业企业的服务更好。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搞好服务并在不断发展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以及搞好为日益增多的国营农场服务。

已经确定的初步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极为重大任务的实现实际上成为问题,或者它们的实现至少会有特别大的困难。按照控制数字确定,今年从消费合作社的资金中收回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数额,即6亿卢布。收回通过各种办法进行:增加营业税、合作社承担认购公债的义务、提高批发价格但不许提高零售价格、降低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2%,而工业批发环节却只降低1%。其次,还减少贷款约1.7亿卢布。

现在我们要增加销售额26%;去年我们的纯零售额约为100亿,今年消费合作社纯零售额将达到120亿。这样,纯零售额将增加20亿,这就需要增加流动资金和贷款25%,然而我们计划提供的资金比去年少1.5亿—1.75亿。这就是说,在6个亿被收回和1.5亿自有资金需要投入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合作社必须利用更少的流动资金实现更大的周转。这收回的6亿卢布是今年所必需的全部流动资金的33%。这就是说,一年要使我们的商业工作合理化33%。这样的收回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以提出随便什么样的速度,但一年收回33%的资金和使我们的商业工作合理化33%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收回对于解决合作社应当解决的消费合作社应为之服务的那些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实际上,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的所有单位,我请地方上的工作人员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的所有单位今年将几乎得不到任何商业利润。我们现在计划获得纯利润……

斯大林:严重吗?

柳比莫夫:是的,严重。如果时间够,我马上就向您解释。我们计划从商业交易、从我们的工业获得纯利润大约2.2亿卢布;1927—1928年度我们收集股金1.1亿卢布,刚过去的一年收集股金1.9亿卢布;在即将到来的1929—1930年度计划收集股金3.25亿卢布。

一切直接取决于我们和我们单位的措施,国家计委一切高指标的指示我们实际上都接受了,就像我们接受政治局选举的财务问题委员会⁹²的指示一样。可是强迫我们在不取决于我们的地方去进行节约,特别是加速商品周转。现在商品周转期为50天;16天在路途上,5—7天用在畜力运输、卸载、登记、称重、定价上(全苏的平均数据)。还剩下27天。商品在我们的店铺里应当呆27天。这方面的合理化、减少商品库存及在这个基础上收回资金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已有的商品运送时间表,取决于调节机关的指示,取决于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取决于政府规定的仓库和店铺商品必备储存的定额(盐——两个月的储备等,为军事部门的储备)。这种储备的数量本来就很少,不停地侍弄它们非常困难。

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控制数字中规定减少一些商品周转。

其次,为了论证资金的收回,强迫我们减少数额很大的应收账款,这里有挂在各单位、个人等名下的款项。这里既有工人贷款,也有我们各个单位应当提成的各种基金。

这种计算导致的结果是,似乎可以以消费合作社收回多达6亿卢布的巨额资金。与我们平常的计算和我们已经确定数额为2.5亿的概算相比,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紧张的努力,但是,3.5亿卢布实际上仍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仍找不到收入的来源,无论是国家计委还是专门委员会都无法指出这种来源。

我们怎样失去了全部商业利润的?我们去年的利润为纯销售额的1.5%,100亿的纯销售额利润约为1.5亿卢布。今年销售额为120亿,如果也按照1.5%计算,我们就应当获得1.8亿卢布的纯利润。现在我们必须降低日用工业品价格2%,这实际上表明1.2%由我们负担。这样,我们只剩下我们所能获得的全部利润的0.3%;但是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批发价格提高了,却不许提高零售价格。这也使利润明显地、大大地降低。在纺织品方面遭受纯亏损6.8%,这是任何一个初级会计师都可以核查的。我们担心,纺织品这种赔钱工作可能会使一些单位在某些情况下不愿意接受或者不愿意按应有的数量接受纺织品。

除此之外,实际受到打击的是我们使用利润提成进行的我们的一些文化性质的措施。我们所剩下的利润是来自工业企业的利润,而工业企业只参加联盟级的合作社和一些工人合作社。50%的工业企业参加了几个组织: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列宁格勒消费合作社联社、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全乌克兰消费合作社联社和一些其他组织;其余的组织里没有工业企业,因而也就没有利润。

我们使用商业利润提成实行了下列措施:我们把纯利润提成的 10% 转为长期贷款基金——用于基本建设,利润提成的 15%——用于文化需要,8% 转为福利基金,9% 转为贫民合作化基金;此外,干部培训工作的费用也由利润里出。

受到打击的既有贫民合作化、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培训,也有福利基金,因为所有这些资金实际上都来自于我们的利润。

我想指出这一点,我想提醒这一点,因为虽然也许并非我们的所有单位都会陷入这种收回实际上把它们所置于的那种境地,但仍然造成了非常困难和紧张的情况。

基本建设问题特别尖锐。我们没有必要数量的冷藏库、蔬菜储藏库、面包房、公共饮食企业等。

什维尔尼克同志在这里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顿巴斯的供应情况。我今年也去顿巴斯呆了三个星期⁹³。已经弄清楚,如果想要把顿巴斯各工业区的供应搞得多少令人满意,今明两年需要投入大约 2 200 万卢布进行店铺建设,蔬菜储藏库、冷藏库等的建设。现在给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运来了 800 多万普特的土豆,尽管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社按其蔬菜储藏库的状况只能保存 150 万—200 万普特。顿巴斯的情况更加糟糕。实际上,我们每个工人合作社的情况都是如此。控制数字里没有规定应有数额的基本建设款项。

现在谈谈实际工资。国家计委所拟定的生活费指数方面和工资增长方面的那些打算可能实现不了。工资的实际增长是由名义工资提高 9% 和生活费指数降低 3% 计算出来的。预计,日用工业品降价将提供 2%,其次,由于农产品贸易工作由抬高价格的私商手里转到合作社手里,农产品方面生活费指数的下降将提供 3.6%。但是,只有在我们不惜花费一定数量的资金,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建立起那种技术基础,进行蔬菜储藏库、冷藏库等所需要的基本建设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开展农产品的贸易工作。纺织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赔钱买卖也将推动各个单位走上弥补、抵偿的道路。

我应当在这里指出,新的建设项目对基本建设有巨大的需求。仅在新建项目的主要企业里,我们必须花费 2 200 万卢布建立技术基础。同时应当指出,多数新建企业,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建设工程、汽车厂等,实际上都建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一切都需要新建。附近的中央工人合作社都没有可能对此投入所需要的资金,地方各部门不给予协助,甚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和那些专为这些企业的建设而设立的管理机关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给以支持。实际上,既然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建设工程还没有任何股东和任何协作者,它能到哪里去弄

资金呢。附近的合作社,例如斯维尔德洛夫中央工人合作社,当然不能提供资金,因为它们自己就没有这种资金。我们多次就这个问题找过政治局,给政治局写信。诚然,问题现在正在由副主席们解决⁹⁴。我们曾经写信说,我们不能在新建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因为我们没有所需要的资金。我们在信里说,希望工业部门能在自己的工业财务计划里预先规定出这种资金。我们可以承担大约25%的建设费用,其余款项我们承担不起,但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事坚决持否定态度,对我们的询问只是最近几天才由一位主席团委员签字通知我们,它实际上拒绝并认为不可能参加冷藏库、店铺房舍、面包房等为工人服务的企业的建设。

我应当提醒中央和我们的全体同志,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我们的各个部门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本建设,进行文化服务,进行干部培训。根据五年计划,我们需要50多万新售货员,我们需要建造10万个新店铺。为此我们计划在五年内从自己的资金中支出2亿卢布。在收回资金的情况下,这些干部的培训工作实际将受到打击。

我们各个单位的服务质量不仅取决于某些商品是否缺乏,而且往往取决于是否善于工作,态度是否诚实,干部是否中用,我们的干部在许多情况下是狭隘的事务主义者,他们推行的往往是完全错误的经营和原则路线。现在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由于工作不力,由于歪曲党的路线,由于狭隘的事务主义,由于右倾,我们最大州区一些部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的中央工人合作社,图拉的图拉消费合作社联社——的领导被更换。在这些部门里揭露出工作不力,不善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工作中的事务主义态度和陷入右倾的现象。

我想提请大家仅仅再注意一个与我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这就是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消费合作社常常因为它自己犯的那些过错和不是自己犯的那些过错,特别是因为产品的质量而挨骂。我们不止一次整皮包、整皮箱地向中央委员会,向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向工农检察院机关展示残次商品和质量低劣的商品,指出工业实际上靠牺牲商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但这件事情,为商品优良质量而斗争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局部的事情,不仅是消费合作社的事情,而且应当成为全党的事情。必须使地方的合作社、工会、苏维埃机关各界、党组织对这些问题给予比此前更大得多的重视。

我还想指出,各级党组织对于我们合作社部门的工作给予的关注不够,特别

是最近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任务被提到首位之后,对消费合作社部门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给它干部、人员,因此发生了一系列的失败,一系列的争执和混乱。我已经向你们举出了实例。

由于收回消费合作社的大量资金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我们考虑到党的意志,一定鼓起全部干劲,以便在存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把工作安排得正常有序并采取一切措施改进我们工作的质量。但是,只有在你们对消费合作社及其工作、物质状况和干部给予更大得多的注意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遇到的每一个在地方上工作的人员都说:“你们把我们赶得筋疲力尽,又不给资金。”这不是我们赶的,这不是我们不给资金,这是实行新控制数字计划的结果,这是国家银行的甚至超过政府机构规定以更大规模降低贷款的政策的结果。

当消费合作社的工作被给予比此前更多注意的时候,那时它的工作会安排得更加合理,它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任务。

主席:现在请埃赫同志发言。

埃赫:过去的一个经济年度,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完全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性。我们地方的全部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要举例子的话,那就可以谈一谈哪怕是工作的这样一个方面,即吸引工人阶级的注意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来克服我们面临的困难。如果工会的做法不改变,我们就不会在工业中取得这样的成绩,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能够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进行目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吗?每一个经济管理人员,每一个党的工作者都十分清楚,这是不可思议的。当党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托姆斯基同志是怎么回答我们的?他回答说,党采取了根本改变工会的方针,托姆斯基同志拒绝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拒绝着手在工会中进行工作,实际上是拒绝执行党的路线⁹⁵。

甚至用这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可以相当清楚地表明右倾方针的失败,右倾实践的失败。假如党没有克服这种方针,我们今天就不能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向我们作的总结报告了。

但是,在指出我们成就的时候,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以后会出现的那些薄弱环节和困难上。

米高扬同志今天在自己的讲话中提请我们注意畜牧业的问题,指出这是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克服这个经济部门正在显露的倾向。用什

么办法才能取得这方面的进展？除了建设国营农场，建设集体农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振兴畜牧业。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建立畜牧业基地和克服畜牧业方面存在的困难。

这件事在实际上是怎么反映在我们贷款单位的呢？直到今天在给畜牧业贷款方面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贷款发放给奶油制造厂，而不是用于发展畜牧业。有人认为，在建立加工企业的时候，为畜牧业做得够多的了。但是，这些企业却没有相应的原料。我们的信贷实践不符合党提出的那些方针。

在这方面，我个人甚至对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昨天的报告以及提纲感到不满意。关于畜牧业，提纲中只有一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说，畜牧业非常重要，必须把这件事推向前进。

假如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能够补充说明，为了克服困难正在做些什么和具体计划做些什么，那就更有价值了。在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您也做了类似的指示，但随后什么也没做。我肯定地说，要是我们只是谈论我们畜牧业的情况很糟而不紧接着采取具体的措施，我们的事情是不会前进的。米高扬同志在这方面是完全正确的。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计划已经确定今年将给畜牧业单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量资金帮助。

埃赫：我担心，这些拟定的措施可别成了米高扬同志所说的那种“旅馆”，因为如果你们计划把钱用来加工肉制品，那这将无助于畜牧业的振兴。在这方面，重要的是给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很大的帮助。你们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呢？至今什么也没做。我也不得不向米高扬同志提一点意见。他正确地描绘了畜牧业的情况，但他的话与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做法不一致。奶油制造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向工业奶油制造地区提供粮食。在生产西伯利亚全部奶油30%的巴拉宾斯克民族区，粮食和奶油的比价比去年下降了三分之二。如果去年用1普特奶油可以买20普特粮食，那么现在只能买7普特。难道这种做法能发展畜牧业？不能。米高扬同志，我认为，您的金玉良言应当成为对您的机关的教训。

米高扬：我早就发出了供应的指示。

埃赫：农业是右倾分子喜欢用来反对党的路线的问题。他们在我们耳边叨叨农业退化了，他们大叫大嚷必须给富农自由。党做得正确，没有采取给富农自由的方针，而采取了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坚定方针。撇开今天的需要，我们看到，克服粮食供应困难离得是多么近。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面前的出路。

我们发展的巨大速度,我可以用西伯利亚的例子向中央委员会展示。如果去年公有化成分——集体农庄、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公社——播种了15万公顷,那么今年我们公有化的播种面积为68.9万公顷,而明年计划为166.5万公顷。

米高扬:这样的规模会使布哈林晕倒的。(笑声)

埃赫:这当然彻底驳倒了弗鲁姆金和其他同志关于集体农庄五年内最多增加四倍的一切说法⁹⁶。可它们一年就增加了四倍。还应当说,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我们自己忽略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对把我们的集体农庄包括进去准备不足。右倾分子企图以此摆脱困境,败坏集体化思想的声誉。我们没有研究清楚,哪些集体农庄交售粮食的情况会比较差,哪些会比较好。我肯定地说,集体化的最高形式是公社,劳动组合完成任务比较好。在很多情况下,粮食收购完成不好是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不好。有不好的集体农庄,这谁都不否认,但企图利用这一点进行投机,如右倾分子做的那样,是使用卑鄙手段的企图。谈到集体化,我忍不住要指出中央机关对待主要生产资料分配的不正确态度。没有拖拉机,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建立大农场。这就像没有机械发动机要建立工厂一样。没有拖拉机,大公社就不可能存在。

中央是怎样对待拖拉机分配的呢?在这方面是从集体农庄的总数出发的,不考虑它们的生产能力,不考虑它们的播种面积,也不考虑联盟不同地区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这一点我可以举例证明。

今年拖拉机是怎样分配的呢?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庄成分只得到了400台。我们形成现在这样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1926—1927年度集体农庄每1000公顷播种面积有7台拖拉机,那么1927—1928年度在我们那里变成了5台,而1928—1929年度只有2.5台拖拉机。瞧,出现了怎样不相适应的现象。不能这样解决问题。要知道,仅我们西伯利亚大集体农庄明年将拥有播种面积60万公顷,即每个集体农庄拥有至少2000公顷播种面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在这时候,库比亚克同志分配拖拉机却用对待每个集体农庄只有9—12户的那些地区的那种尺度对待我们。这种分配拖拉机的办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既不符合党的路线,也不符合在正确分配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的结果。

我想顺便回答丘巴尔同志,他在代表会议⁹⁷上发言说,西伯利亚有的是畜力——让他们建立大型的马力公社,让大公社用牛耕田。

丘巴尔:你们那里每匹马在俄亩数量方面的负担比乌克兰小,这是我在米柳

* 原文如此。——编者注

亭同志散发的材料里看到的。

埃赫：数字是个牵引杆，你往哪边转它，它就转向哪边。丘巴尔同志，您必须考虑到，你们那边在田里耕作和收获的季节比西伯利亚长一倍。如果你们那里每匹马的负担为4公顷，而我们这里为3公顷，那么落在西伯利亚马身上的负担比乌克兰的大。可您建议在西伯利亚大公社里用我们的马来应付。这是不行的，丘巴尔同志。党完全正确地采取了集体化、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方针，使我们有可能摆脱曾经遇到的粮食困难。已经取得的成绩应当激励我们更加热情和顽强地准备春播运动。为了顺利进行春播运动，群众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千百万群众参加，但是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项是给我们最大限度的拖拉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提出增加拖拉机进口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可能，那么筹措资金追加进口拖拉机将是正确的。

斯大林：那你们能提供出口商品吗？

埃赫：我想，应当这样向党提出任务：“使出吃奶的劲儿”，也要提供需要数量的商品，以便追加进口拖拉机。

[斯大林：你们就去弄追加进口的资金吧。]⁹⁸

埃赫：党应当怎样对待这件事？我觉得，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应当提出无论如何要解决粮食问题的任务。

臧声：当然！

埃赫：关于粮食收购，我说几句。今年西伯利亚动作慢了。这是我们的过错。斯大林同志在笑。当然，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的过错。但是我们确信一点并且可以用我们的全部经验证明，动作缓慢给了富农挖好更加牢固掩体的机会，以后要把他们从这些掩体里赶出去将困难得多。由于延误，后来就需要整个组织大大地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在西伯利亚所进行的发动似乎现在可以使人有理由完全乐观地看待计划的完成。在这方面西伯利亚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凡是我们对富农狠狠进行了打击的地方，粮食收购就进行得容易得多。第二个结论：凡是党的路线遭到歪曲，凡是打击伤及中农的地方，我们就帮了富农天大的忙。我们这个经验所有的党组织都应当吸取。我们为争夺粮食而进行的整个斗争，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完全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对争夺粮食的斗争所做的评述。他说：“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争夺粮食的斗争，实际上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2页）⁹⁹

斯大林：对！

埃赫：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正在进行的争夺粮食的斗争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进攻而斗争。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在向我们描绘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描绘了存在的困难。我们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它们。克服这些困难首先需要党的团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向全会的成员发出这一号召是正确的。没有团结，我们就克服不了今天存在的和明天将要出现的困难。可是布哈林同志的集团不仅不帮助使党的队伍团结起来去克服困难，而是企图涣散、搞乱我们的队伍，企图瓦解党。他们的方针和行为就是进行派别斗争的号召。他们用自己的发言、自己的全部行为号召在党内开始派别斗争。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吗？我们建设的速度，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我们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不允许我们给布哈林同志等人这样的机会。动摇党的队伍的团结是不能容许的。11月初举行的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会全体会议通过决定：鉴于布哈林同志在明显实行开始派别斗争的路线，认为他呆在政治局里是不能容许的¹⁰⁰。我们觉得，我们的司令部，我们的领导必须把布哈林同志清除出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提纲感到不满意。提纲对右倾做了十分详尽的评述，指出布哈林变成了反列宁主义者，彻底揭露了布哈林集团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这是正确的。我觉得，对于一个反列宁主义者、反布尔什维主义者应该做出明确的组织结论。

我觉得，不能仅仅局限于这种评述。我不同意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看法，他说，现在我们的右倾危险并不那么大。不，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我觉得，党内的右倾分子集团不大，但国内的右倾危险却相当大。我们根据西伯利亚的经验相当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柯秀尔：在我们乌克兰也不差！

主席：现在请托洛孔采夫同志发言。

托洛孔采夫：起先我想谈的不是右倾，而是我们取得的成就和我们面临的那些前景。当然，在这次全会上我们非对右倾做出评价不可。

有人喊：当然！

托洛孔采夫：应当给它以适当的评价。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年我们在我国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就。两三年前谁也估计不到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际显现出的那些巨大的潜力。中央坚决地把工业化、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摆在政策的中心，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为了消除我们曾经有过的紧张状况所必需的。中央在首先振兴重工业并通过重工业振兴农业的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是完全正

确的。

我们这里正在得到广泛发展的那些农业组织形式——组建国营谷物农场、集体农庄等——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采取的速度出发,这项政策本身就相当令人信服地说明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完全正确的方针。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地建立起这一宏伟事业的技术基础。是从国外进口拖拉机,还是我们在自己国内生产?当然,如果它们在我们国内制造,事情会有利得多。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农民基本群众——贫农和中农准备加入集体农庄,尽管阶级敌人不仅我们乡村里有,而且城市里也有,工业中也有。阶级敌人要表现其积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快速发展,我们在大步前进,这一方面激起国内敌视我们的势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引起国际形势的尖锐化。中央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把一切努力集中于防止可能发生的战争。农村的富农认为,他们日益失去自己对贫农、雇农的影响,他们将没有人可以剥削的那一天和那个时刻已经临近了。很明显,他们正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充满敌意。我们的集体农庄发展得越快,阶级敌人的进攻就更猛烈,这表现为纵火和旨在破坏公有化农场的其他行动。节日期间我在“红色壮士”做了一个报告。在那里有一位女代表发言说:“我们开始过上美好的生活,为我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城,您帮助我们……但这个集体农庄被富农放火烧掉了。”我能用什么去安慰她?我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拖拉机计划,您不用担心,一年以后你们的集体农庄将比刚建立的时候好得多。”

在工业方面我们的情况如何呢?在工程技术人员中间隐藏着阶级敌人。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国家政治保卫局破获了反革命和破坏组织。就是说,在我们经济的这一部分中有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们工业中的情况远非处处都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破坏分子。如果那样,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某一部分专家的创造性上。可事实就摆在面前。当我们解决引进外国技术问题的时候,一些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说:可以引进,另一些人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办到,第三种人在实际上妨碍这样做。

我就不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在报告中相当充分地陈述过的问题了。

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发展农业、发展拖拉机制造业、发展我们整个工业的问题。但是去年我们的缺点在哪里,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完成计划?如果拿整个工业来说,那么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即降低成本。未完成的部分为

2%。我们机器制造业的情况如何呢?诚然,给我们的任务不是7%,而是9.1%,我们完成了7.1%。计划从10月份才实际开始执行,计划的任务能够全部完成吗?我不怀疑,能够完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派我去列宁格勒检查和组织这项工作,列宁格勒人积极地参加了,特别是共青团员们。他们很快组织了突击队。有代表团来问,应当怎样组织起来,我们就我们的所能,尽力在这件事上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去年,我们在这一方面落后了。我们是从一二月份开始降低成本的。我们到来之前,这件事在地方上还没到达车间。这在最后一个季度才产生了结果,正是因为我们不是从10月份开始的。这是去年存在的一个缺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我们未能如数完成;在工资计划有所超过的情况下有2%的落后。在整个四年期间我们情况年年如此。我们至今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考虑到我们生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内工业的180亿卢布的产品和每一个百分点在工业内部积累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取得成功是十分必要的。要知道,降低的每一个百分点在数量上就相当于建两个多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价值。我们认为,今年给工业提出了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降低成本11%,而不是7%。落在机器制造业身上的为15%,同时劳动生产率要提高27%,工资要增长9%。我不怀疑,全会会完全赞成两位报告人所表述的和政治局批准的观点。当我们全会散会,大家回到地方上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一天、一个小时都不要延误。

有人喊:不能!

托洛孔采夫:去年以进行社会主义竞赛和建立突击队等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的事实使我们有信心,所提出的降低成本的任务将全部完成。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措施的实行将伴随着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实际工资增长12%和大批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日。

如果考虑到1929—1930年度工资应当至少增加9%,我们实际去实行的时候,任务是不轻松的。

丘巴尔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生产定额的要求提高20%,在这方面党、经济管理人员和工会应当站在一条战线上。我们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工资提高到规定的数额,同时完成关于降低成本的指示。最近几天我去了莫斯科的一些工厂。夜班的工作情况如何呢?你白天去——第一个班工作得还可以,虽然仍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我们一些企业里马虎作风还很严重。夜班又如何工作呢?莫斯科有个布罗姆列伊工厂,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厂,不久前新盖了一个大楼,引进了进口机床。夜间访问工厂的时候发现,车间里有两个工人在干活,

工长在睡觉。关于这事我在《工商报》上写了文章。我也去过其他的工厂。夜班工作得很差,对这件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今年下达给我们的计划是:通用机器制造比1928—1929年度增加43.5%*。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是能够完成的。我们在企业里具有很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生产潜力。应当加速培养能够最好地利用每一个企业的干部,应当更广泛地派遣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到外国工厂去,采用它们的经验。这种派出去的办法的成果是很大的。

对工业财务计划进行平衡之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给通用机器制造业下达了再增产一个亿的追加任务。为此我们动员了人力,进行计算以后发现,不仅我们的工厂拥有这种潜力,而且交通人民委员部各修理厂和其他工业部门的辅助企业能够接受数千万卢布的订货。这些订货主要将是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和可以停止进口的设备。我们在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时候,在钢铁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冶金工业落后于机器制造业。在这方面我们陷入了窘境,给我们的是扩大了的计划,但不给钢铁。工人、厂长和工厂工会都说:没有钢铁我们完不成计划。这是对的。

如果我们的资金许可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从国外进口钢铁比进口现成的机器更为有利,因为在国外1普特生铁最多60戈比,而你要买的机器,1普特10个多卢布。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生产潜力和劳动力。

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机器制造工业需要的钢铁。这对于尽快扩大国内机器制造业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我来说明我们在新企业建设中所采取的速度。特别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缺点在哪里?那就是毫无用处地把资金分散用于许多企业。一个工厂的价值确定为5000万卢布,就给它300万,然后是500万,再后是800万。今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这样进行建设是不行的。诚然,在这方面工农检查院和政府不止一次施加压力,但我们自己对这一点也了解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是怎样进行建设的,格列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拿来了下诺夫哥罗德工厂的规划,就决定建设。给了我们5000万卢布,工厂造价将为1亿卢布。我们打算在15个月内建成工厂。设计完成以后我们将立即展开施工。我们将用15个月利用美国技术建成工厂。就举索尔莫沃造船厂建设的例子吧,船厂造价确定为1000万**,买进口设备计划用大约400万。当库里岑同志(机器制造厂联合总

* 速记记录为48%。——编者注

** 速记记录为1500万。——编者注

公司主席)到国外去给人家看了设计以后,人家对他说:设计很好,但买设备不用400万卢布,而只需要250万或者280万。于是就节约了120万外汇,三个月之后,支付数量不大的设计费用,就能得到一份内行的设计图。如果同志们要问,对帮助建设像下诺夫哥罗德汽车厂这样一个工厂我们支付百分之几的费用,那么我应当说,我们将为造价1亿卢布的汽车厂支付250万卢布。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会从中得到好处,因为你们清楚地了解,在极短的期限内建成一座汽车厂对我们何等重要。

我们在我们第一个大型工厂的造价方面没有算错。我说的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它的设计造价约为7000万卢布,为其购买进口设备的费用预计为2400万卢布;结果我们为进口设备花了2300万卢布。我们能够在7000万卢布的范围内完成,而只是在转向连续生产的情况下,我们会需要额外的住房建设费用。这三大拖拉机厂我们得花费多少钱,它们又能提供什么呢?如果折合成福特牌拖拉机,按其生产能力它们将提供大约50万台福特牌拖拉机。在这方面,在这个对于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上,三年以后我们将赶上美国。

这件事对于我们是否力所能及呢?如果拿三个工厂为例,这将花费最多3亿卢布。我们已经有了斯大林格勒厂的经验,我们没有超出这些数字。哪一个工厂将是最大的?车里雅宾斯克厂的造价将为大约1.2亿—1.3亿卢布。哈尔科夫厂的造价将为1.02亿卢布,2100万卢布我们将用于普梯洛夫工厂。两年期间我们将总共花费3.21亿卢布。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这些拨款,那么计划将会完成,而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国内将拥有60万台拖拉机,这不仅能解决粮食困难,而且能为扩大出口开辟很大的可能性。现在我们所拥有的3.6万台拖拉机太少了,但它们在农业集体化的事业中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我们对拖拉机的利用比美国好得多,尽管我们是落后的国家,但由于采用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组织形式,我们具有优势。我们每一台10马力的拖拉机平均耕地168公顷(机器拖拉机站、粮食合作社资料)。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德国人以后,他们说:“不可能!在你们技术落后和不文明的国家里拖拉机的利用率高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怎么可能?”拖拉机使产量提高了30%—50%(取决于作物和地区)。

拖拉机制造业最近几年的计划怎样呢?我们确定了怎样的速度呢?确定的1931—1932年度的生产计划为24万台标准拖拉机,而在五年计划第一年,即1932—1933年度为45万台标准拖拉机(马力与福特牌拖拉机)。美国的拖拉机年产量1927年为18.4万台,1928年为15.2万台各种型的拖拉机。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我们拥有北美合众国所

万台拖拉机,我们就能够翻耕全部1.2亿公顷的农田。北美合众国在个体经济条件下拖拉机的利用率大大地低于苏联。

我想到此结束我的发言。我们既引进美国技术,也引进德国技术。我们已经签订了一些援助建设新工厂和建立新产业的合同。关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建设我们同奥斯汀公司有初步协议,它承担在15个月内建成这个工厂。哈尔科夫厂的建设也应当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必须自己采购建筑材料,修好专用线路、工人住房,以便不多花钱。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工厂会于15个月内建成。

新的大型企业的建设就需要及时在国内准备冶金基地和改进所生产的钢铁的质量。在这方面我们与福特有合同,与克虏伯有合同,它们将为我们的冶金业开辟很大的可能性。需要的只是善于正确地利用它们。因此,我们的长期计划提出的那些任务,不管有什么障碍,无论如何必须完成。

农业集体化问题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特别重要的问题。农业的机械化不仅应当立足于进口拖拉机(这在最初几年是不可避免的),而应当立足于最近几年建立自己的拖拉机工业。应当以加强的速度建设拖拉机工厂。如果斯大林格勒厂花费了2300万—2400万外汇,那么这个厂的年产量(按美国价格计算)为1亿卢布。所有拖拉机厂的产量(按美国价格计算)将超过5亿卢布。

注意到主席在不停地摇铃,我这就结束。我简短地说说联合收割机。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有——建设三个生产联合收割机的工厂,年总产量为4万—6万台。我只是今天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博罗金设计师¹⁰¹(制作)的联合收割机的试验成功的话,那么我们苏联的联合收割机可能会比美国的便宜得多并在技术方面更加完善。1930年6月我们将试验自己的第一批联合收割机(发动机除外)。制造我们自己设计的联合收割机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们在组织联合收割机的生产及其在农业中的使用方面获得很大的优势。我们做得对,只要有可能的地方我们就引进外国的技术,但是我们毕竟也有自己的技术力量,他们在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既利用自己的,也利用外国的技术。农业的社会化及其发展将逐年提高自己对工业的要求。最近几年农业机器制造业在农机具产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改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29—1930年度产值将达到3.7亿卢布,而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产值将达到11亿卢布,而不是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和通过的6.1亿卢布的产值。只要工人阶级和党鼓起全部力量,经济计划是能够完成的。

所列举的一年来我们在发展工业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数字

和事实证明了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的正确性。因此,右倾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开向党声明这一点。在工人阶级和党面临着那些社会主义建设巨大任务的情况下,党的队伍中,特别是个别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的动摇是不能容忍的。

主席:现在宣布休会到明天上午。

第四次会议

11月12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请丘巴尔同志发言。

丘巴尔:我想谈谈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以便最好地保证所定计划的完成,也许是超额完成。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正在审议和讨论的那些控制数字(我说的不是中央决定草案,而是控制数字)从地区的剖面看研究得不够,从某些地区经济协调的观点看研究得不够,此外,控制数字作为统一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也不协调。国家预算、各共和国预算和地方预算都是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和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应当为经济发展计划服务的各种预算协调的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大的漏洞。因此,我们乌克兰的地方预算有大的漏洞,因为我们地方预算补充的来源是与众不同的、独特的。重工业给地方预算的提成很少,林业也很少,等等。大家都承认这个方面薄弱,但对于加强这个方面,无论是国家计委还是联盟人民委员会在控制数字里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共和国1929—1930年度的预算增加得比其他共和国少,大家都承认,它满足不了不断发展的经济的需要,但从财政人民委员部里产生出来以后,它只经过最微不足道的修改就原样通过了各个级别,结果是,配合全联盟国民经济发展任务的各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在我们这里消失了,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在应当纳入实现五年计划紧张工作总轨道的干部培训方面。先前的一系列指示仍没有实现,还悬在空中。只要举培养工人和贫穷的农民上学这样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在我们乌克兰,尽管有想要实行机动的愿望,但在生活推出的那些框架里面我们无法满足这个需要。这些例子表明,对业务计划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况且在一系列经济部门,特别是在工业财务计划方面,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将有什么和没有什么的准确数字。在基本的主导的部门方面这种数据是有的。在更深的层面上许多数据还没有。它们暂缺。控制数字的这一切不协调,我觉得,会导致所孕育的各种后果,在实行计划

的时候,某些预想可能得进行重大的改变。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方针、决定性的方针,在这些控制数字里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努力利用、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加速我们经济的发展并利用这些资源在各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否被群众甚至我们的积极分子充分理解了呢?我觉得,到今天为止这一点被理解得不够充分,这里也有国家计委的一份过错,它在确定编制控制数字方法的时候,没有找到真正清楚、明确的指示,使人人作好精神准备。要知道,只要指出我们共和国工业和在各共和国的联盟工业的计划方案已经改变了五六次,这就足够了。国家计委在编制预算和确定国民经济拨款计划的时候,方法也大大地改变了。我认为,改变方法的目的当然是正确的,但只是提出得晚了。在资源利用部分里,例如在吸收农民本身的资金进行集体化方面所做的改变是完全正确的。按照五年计划,我们原先预计,35%或者40%资金由农民自己筹措,而60%由国家通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可能进行筹集。今年认真研究和考虑了上一年度的经验以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恰巧应当调转过来,国家应当用贷款方式、分配自己资源的方式提供35%—40%,而集体化所需要的60%—65%资金应当由正在进行集体化的农民自己筹措。不仅在这一部分里,而且在其他的部分里我们也有了同样的进展。控制数字在动员地方工业资金方面,在把这些来自地方工业的资金再分配到共和国和全联盟工业方面,在动员工业本身的资源方面提出了巨大的任务。例如,在基本建设拨款中怎样不仅用上一年度的利润,而且用本年度的利润进行抵偿。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像去年那样以冷漠态度对待降低成本的任务将是不允许的。形势本身不允许以去年那种态度去对待,去年这种态度只是部分地影响了基建工程的进展和基本建设的速度。动员我们所能拉来资助所定工程计划的全部资金这个基本方针,我觉得,必须最广泛地贯彻到基层去、贯彻到群众中去,此事应当立即研究,以免像去年那样迟误。当然,去年的经验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现在工会组织正在面向生产,工会中健康的自我批评的清流到达了最基层,那里已经部分地实行了转变——这保证经济管理机关、计划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所提出的那些任务并完成降低成本11%,提高劳动生产率25%和提高我们工业和我们农业各项质量指标等这些任务。所制定的1929—1930年度的计划,在我看来,是完全现实的,因为已经过去的1928—1929年度为这个计划的完成所建立的基础毫无疑问是牢固的,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党的正确政策,由于认真贯彻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在城乡经济建设中,在工会组织的工作中,在巩固党的队伍的事业中,在为党的明确的总路线、在为加强各个领域工作的斗争中不仅取得了物质方面

的成就,而且取得了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进展。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为我们制定和实现我们现在的1929—1930年度的计划创造了前提。我们实行这个计划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不会自己出现的。前提是有了,但是每一个方面,我们计划每一个部分的结果,我们必须自己用自己每天的工作去争取。去年的成就使我们能够在各个方面比去年更顺利地展开斗争。工人阶级的创造热情上上年度才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发挥,1929—1930年度应当发挥得更加广泛和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农村贫农和中农群众的集体化运动上一年度产生了那么惊人的结果,在未来的一年里不仅应当巩固,而且应当更加有力地发展,因为我们现在提出的任务和我们今后几年应当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这方面要求更深更广的规模。

为实现所定计划的斗争需要党的清楚、明确、统一的领导。我觉得,过去的1928—1929年度所广泛进行的同右倾的斗争、同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的斗争、同左倾的斗争,1929—1930年度丝毫不能减弱,反而必须加强。如果我们毅然决然地说,右倾反对派破产了,而情况又确实如此,它的所有预言都声名扫地,这个反对派一无所得,那么我们仍然应当说,右倾反对派产生的条件,我们将在其中继续实行社会主义进攻的条件仍然是那样,即对于犹豫、对于动摇、对于各种倾向是相当适宜的。像在上一次全会上一样,在这里我要说的不仅是布哈林同志及其集团想要同党中央进行斗争,想要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而且是这个集团必然成为处处都有,每个基层组织里都有的那些犹豫、动摇现象的首领。要知道,右倾的所谓实践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布哈林写了某一篇文章,而是由于下面对我们社会主义进攻的巨大任务的理解还不够充分。动摇和这些错误立场、错误运动的形式将来还会发生,发展越急剧,我们的进攻越坚决,我们越坚定不移地动员我们的一切资源,而犹豫、动摇、怀疑、寻找独立活动方法的情况就会越多。这将滋养右倾反对派的那些力量,它们在自己的思想破产的同时,在自己的预言破产的同时,仍然会危害我们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危害我们的社会主义进攻。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提出我们领导的一致,我们司令部——政治局一致的问题。这里问题是这样地摆着:如果曾经在四月全会上坚持特殊路线的某些立场,坚持某些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政治局的同志现在,在11月,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加深这些错误,那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阶段领导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我看来,它将不符合这个阶段的要求,不会保证我们战斗力、我们进攻运动的最大发展。对于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们党的司令

部,问题就是这样地摆着:坚持错误,加深错误,加深分歧在现阶段是不能搁在一边,不能保留的,因为这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进攻,妨碍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我们在进行这种动员,但是注意党的队伍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富农、耐普曼分子和小资产者也在动员起来并努力把一部分力量动员到自己一边,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进攻。阶级斗争的这种尖锐化对于我们可能会越发有害,越发成为阻碍,如果在我们的司令部里分歧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能团结一致,不能对右倾反对派的那些表现展开共同一致进攻的话,因为在这个大进攻时期右倾反对派的这些表现是最有害,最危险的。党的战斗力应当是很高的,以便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应有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工作。

在转而对控制数字提具体意见的时候,我想简短地、提纲挈领地谈谈以下几点。为了实现所确定的计划,为了加快五年计划提出的速度,为了使五年计划在基本的主导的部门能够四年完成,我们需要大大加强我们全部工作、我们整个机构的改造,不仅限于清理,不仅限于审查队伍,不仅限于动员,需要改造整个工作体制。

有人喊:对!

丘巴尔:在这方面,正在认真讨论改造工业管理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觉得,在这种改组中大家都那么想要一刀切,因而这种改组可能产生导致不良结局的过火现象。集中领导的原则,逐渐地、稳步地实行集中领导的原则——这是大家始终承认并记录在案的。但是记录在案的还有另外一点:分散管理。如果改组的进行不是为了加强有计划的领导,而是为了集中管理,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在我看来,这种集中管理令人十分担心,中央委员会全会需要十分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以免犯错误。在一些极为重要的部门,在一切经过认真权衡、进行过重新审查的地方,可以进行这种改组,这样的安排是正确的。但就是在这些部门我们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许多不足。例如,我很担心,甚至大工业中联合公司的建立也不会以技术干部加强企业,不会以领导干部加强现阶段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基层支部,而人员、工程师、技术员将被抽调到这些中央机构去,在那里书写文件和编制各种纸上空谈的计划,很多方面将脱离实际生活的计划。

改造我们的管理体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但更加紧迫的任务是我们工业的技术改造。我们在延误改造计划,延误得岂有此理。例如,我们在延误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各工厂的改造计划,必须由此作出相应的结论,因为不进行改造我们就实现不了五年计划提出的那些钢铁生产计划。

工业的改造必须逐个部门仔细研究。技术改造是我们今年必须落实的任务。如果不以新的态度去抓,不通过一个又一个环节,不制定出技术改造计划,那么我们解决问题就将始终和经常不符合事业利益的要求。

1929—1930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包含一系列的战斗任务。

在这方面降低工业品的成本是最具突击性的任务,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控制数字提出的工业的一切速度。什维尔尼克同志在这里谈了,有人伪造降低成本的成绩。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造假和欺骗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

柯秀尔: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事实。

丘巴尔:有伪造降低成本的事实,有如同在布良斯克诉讼案中造假的事实,有某些矿上伪造煤的化验结果的事实。

有人臧:往坏的方面。

丘巴尔:文件上标明的产品的质量与实际不符。这种在企业本身的化验室里进行的破坏活动还未充分地引起党组织的注意。只是现在才开始与这些极其有害的现象展开斗争。

在降低建筑成本方面我们仍然做得很差。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应当在冬天采购物资。可我们往往在田间工作大忙期间雇用农民,运一立方沙子到铁路上要花费40卢布。我们建筑材料(沙子、石灰等)的惊人指数依然如故。当需要开采紧缺材料,例如雪花石膏的时候,我们请求让我们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建造雪花石膏厂,我们得到的回答是:这与我们无关,可当我们给不出雪花石膏时,这就与所有的人都有关了,狠狠地批评我们破坏建设。

降低工业成本、降低建筑费用和为产品质量的斗争——这就是实现工业积累计划、积累和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道路。在我看来,对于这一点,就是今年我们也还没有根据这项工作的规模作好准备,没有动员群众,而群众需要尽早地动员。

在农业方面,粮食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解决,并且需要在提高产量方面,在巩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但是对于今年来说畜牧业问题特别尖锐地突出出来。畜牧业问题前几年不知怎么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诚然,没有健全、强大的粮食和大田作物基地,谈论畜牧业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建立粮食基地,把大田作物栽培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就可以提出饲料资源的问题,也就可以从组织和物质方面提出畜牧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集体农庄更严厉一些。在这里已经说过,在参加集体农庄的时候卖掉牲畜,这是

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更糟糕的是,现有的集体农庄搞畜牧业非常不情愿,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的目的。在我们乌克兰,我们很早就指引我们老的国营农场走发展畜牧业的路线,但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各种拨款逐年被削减。我们同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斗争了三年,为的是让它的国营农场繁育牲畜,可它证明说,我们不应当去养牛,不应当去养牲畜,我们只应当种植甜菜;而废料交给制糖工人,就像什维尔尼克同志以集体合同方式所公布的那样。只是去年才开始有了转变。今年我们才使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开始既办奶牛场,又繁育牲畜。

发展畜牧业的问题,我觉得,不仅决定于苏联国家肉类生产国营农场联合公司,而且决定于地方在畜牧业问题上必须转变。

关于鱼的问题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谈得很少,但是在我们的联盟里在中央委员会提出之前¹⁰²,鱼的问题一直处在不被重视的位置。鱼的问题不仅是大海的问题,而且是江河、池塘等的问题。到处都可以并且应当搞养鱼业。对了,关于畜牧业我还有一个意见。为什么在中央地区,像莫斯科和其他地区,那里有大量的饲料,那里的草不像我们那里长两个月就枯死,而是长四个月,那里有森林牧场等,为什么在那里几乎一点不搞畜牧业? 只要需要肉,只要需要食品,就立即向外省伸手,并指责说,外省不给。应当在所有地区安排这件事情。中央委员会做得对,把粮食收购计划分别安排给了各个地区——西部州、中央消费区等¹⁰³。这种做法已经有了结果。在畜牧业方面也应当做同样的安排,不仅对于那些很早就以牲畜好而著名的地区,而且也对于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地区。

有人喊:对!

丘巴尔: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在控制数字里此事被忽视了,未充分地研究。

下一个问题,谈谈实际工资。有的同志在这里表示担心,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领域。确实,实际工资的问题将是斗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为了在这个领域里取得胜利,应当展开合作社建设,加强商业建设,因为单是今年我们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组织对工人的供应还会有几年给我们造成困难。我记得,早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在制定工人商业建设决议的时候有人企图从这样的观点提出问题,说这是小事,这是你们的任务,这是地方上干的事¹⁰⁴。但是现在,在计划里一切都作了安排,也包括地方的资源。各大工人中心的商业建设必须在1929—1930年度的计划里明确地标示出来并且必须切实地予以保证,因为没有它我们就保证不了对工人的有组织的供应,因而也就无法在这个最困难和重要的领域,在提高实际工资的领域取得胜利。我就不谈干部

问题了(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但将涉及这里提出的那些关于外国技术援助的意见。应当最大限度地引进技术援助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应当欢迎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开始向群众推广技术知识的坚决进军¹⁰⁵。这样一来,这件事情的转变就有了保证,因为党像过去抓一系列的问题那样坚决地在抓这件事情。这将提高千百万广大群众的技术知识水平,但使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技术援助合同能保证派多少我们的人出去?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能往那里派去多少自己的人。

古比雪夫:每个合同我们都有附加说明。

丘巴尔:拿乌克兰工业来说吧,在过去的1928—1929年度我们在派人出国方面只有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几乎什么人也没有派。

斯大林:为什么?

丘巴尔:这件事情还没有安排好。还感觉不到对这件事的有计划的领导。关于派遣什么人,派出多长时间和应当带回什么的方针至今还没有。必须这样派遣,要使被派人了解,他应当在某个方面带回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干部身上,寄托在我们派到那里去的我们的干部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从那里引进来的那些人身上。

波斯特舍夫:应当派车间主任。

有人喊:派发明家,而不是旅游者。

丘巴尔:对,希望必须寄托于在那里工作过一定期限的工人、车间主任和工程师,而不是白白地呆在那里和进行旅游的人。技术援助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乌克兰的要求。什维尔尼克同志在这里宣称,乌克兰在睡大觉,把世界上的一切全都睡耽误了。我想,在这里的同志们不完全同意这个评价,相反,大家都在插话中骂乌克兰把一切都捞去了,但是在反驳什维尔尼克同志的说法时,我必须在这里说,在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里乌克兰的情况是很狼狈的。如果全联盟的产值高于……

古比雪夫:指乌克兰的工业还是联盟的工业?

丘巴尔:(如果全联盟的产值高于)五年计划很多,那么乌克兰的计划产值总共只比乌克兰整个工业五年计划高出4%。

古比雪夫:包括联盟的工业在内?

丘巴尔:包括联盟的工业在内。高于五年计划抵偿部分4%。

古比雪夫:指工业方面?

丘巴尔:请您检查吧。我没有算拖拉机厂,它今年还不会提供任何产值,而

我说的是产值。

古比雪夫:那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呢?

丘巴尔: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今年也不会提供任何产值。(笑声)

莫洛托夫:现在懂了。

斯大林:现在明白了。

古比雪夫:那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呢?

丘巴尔:我说的是产值增长率,是给我们超过五年计划抵偿部分的幅度有多大。

在基本建设部分,我们的一些项目丢了。就拿我们实现基辅右岸区工业化的要求为例——一点也没剩下,连我们指望的最后一个钟表厂,也被古比雪夫同志留在了莫斯科。

柯秀尔:把基辅完全忘记了。

丘巴尔:请你们判断吧,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改造的问题,这是乌克兰的要求还是全联盟的要求?我请问大家,这是乌克兰的还是全联盟的要求?拖延克拉马托尔斯克厂的改造就意味着抛出金币为重工业购买设备。计划写明和规定为克拉马托尔斯克厂的改造拨款1500多万卢布,可现在只给我们250万卢布。这样一来,改造就中断了,今年我们就什么改造项目也没有了。

关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和第聂伯工业联合企业。应当说,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设计期限,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没有执行。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提出警告,敲过警钟并将一直坚持要求遵守这些期限。

拖延工程的开工,就开始使一些工厂成了疑问。但难道可以这样“说明”我们的整个基本建设计划。根据工业联合企业建设工程的计算,今年需要拨款大约7000万卢布。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总共只给我们1700万卢布。可是用1700万卢布我们甚至无法订购明年用的材料。所以,由于拨款的削减和设计的延误,工业联合企业建设工程也成了问题。

关于拖拉机厂。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古比雪夫同志十分起劲地说,这是南方厂,而南方,众所周知,范围非常大,但政治局的决定说这个厂建在乌克兰¹⁰⁶。所以,请允许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关于联合收割机车间。已经决定研究,是否可以在乌克兰制造联合收割机。我们已经在“公社社员”工厂生产出了联合收割机。“公社社员”工厂是生产转臂收割机的,但现在形成的情况是需要裁减工人,因为转臂收割机销售困难,需要有更完善的机器。

柯秀尔:工厂是否已经不生产转臂收割机了?

丘巴尔:“公社社员”工厂已经生产出了试验性的联合收割机¹⁰⁷,本来可以立即安排生产,但不知为什么决定还要对这件事进行研究。

波斯特舍夫:联合收割机本来应该造出来了。

丘巴尔:我们请求为此事拨给我们共和国预算300万卢布。一点也不给!被勾掉了!

关于顿巴斯的给水工程。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说了,什么事情也不做。当然,有的事还是在做。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正在为阿尔马佐-马里因卡区铺设给水管道,大概1929—1930年度完工。但是,鉴于这件事情很大,我们放弃了(我想,我们因此犯了一个大错误)自己最初的立场——在自己这里建立管理局和自己建设。我们同意了国家计委和上下水道工程总托拉斯的建议,让这些全联盟规模的单位以其现成的机构开始铺设给水管道的工作。它们没搞设计而搞了个施工图。它们本应于10月1日前完成并提交施工图。但至今没有见到。同时,这个施工图被吹嘘到这种程度,以至赖因霍尔德打电报来说:施工图将于1月1日前提交,并说明工程总造价为3.5亿卢布。洛莫夫同志以前说过,这件事将花费5000万—6000万,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适的。但3.5亿卢布——这意味着破坏给水工程任务。打电报给我们说:1930年初斯大林诺将收到20万只水桶,此后,第二期,1930年将再收到20万只水桶。我叫来斯大林诺民族区执委会主席,问他:你们那里有水没有?他回答说:我们既没有水,也没有抽水井,连许诺的地底下会有水的指望都没有。正在建设一座抽水站,可是没有水。在一个地方打出了一口井,抽了一会儿,附近三个村子里的水都没了。结果发生了类似中亚水利案件¹⁰⁸的事情。现在我们提醒,顿巴斯饮用水给水工程有转向不正确轨道的危险,现在我们提醒,顿巴斯饮用水给水工程处在重大的威胁之下。应当使上下水道工程总托拉斯行动起来,工农检察院应当插手此事。要知道,现在已经有五个顿巴斯给水工程方案。

关于甜菜问题的意见,这是给古比雪夫同志的答复,他说,似乎我们过去不关心原料基地。尊敬的同志们,我们年复一年地尖锐提出甜菜原料基地的问题。大约两年前我们说过:提高甜菜产量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让我们来100%地保证肥料,那我们甜菜供应中断的情况就会减少。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保证肥料,尽管办法很简单,运100万卢布的肥料来,我们就能得到1000万卢布的糖,这当年就会抵偿有余。肥料我们必须用外汇进口,但要知道,我们的糖也部分向国外出口,用于买肥料的外汇我们可以用当年出口糖得来的外汇超额两三

倍补上。但这一点过去没有纳入计划,现在却说:没有原料基地。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失误和缺点,特别是在糖厂所在地区的集体化方面。集体化搞得差,可种植者是些什么人呢?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提供的资料是:49%为有一匹马的农户,24%为无马户,即73%为贫农和中农。当然,本来可以展开集体化,但是技术资源不足。制糖工业地区集体化搞得差的原因之中,也许应当列上这样一条:拖拉机给了草原地区,但没有给糖厂。在草原里情况更糟糕。甜菜的种植取决于市场的行情,因为一普特粮食在市场上值六卢布的时候,那人们就不特别愿意种植甜菜,因为种粮食可以赚得更多。现在我们也坚持要求,肥料问题不仅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里,而且要在实际上得到保证。不这样,制糖工业的原料基地将是不稳固的。

第二,两年前在制糖工业中实行预购合同制的时候(从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日子起我们就一直实行预购合同制),我们曾经坚持要求,让我们实行长期预购合同制,以避免种植者的流动。让我们实行10万公顷的预购合同。告诉我们说,不行,只能实行2万公顷。现在我们提出:让我们把一半甜菜作物改为长期预购合同制,以便能够巩固原料基地。对我们说,没有资金。那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既然你们在最高领导机关里计划的时候拒绝我们的建议,那你们为什么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甜菜因为土豆遭受了损失。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那里没有东西可吃和春天需要种子的时候,尊敬的同志们不给我们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土豆,我们只好在糖厂所在地区购买土豆。

我曾经在这里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作了决定,而在那里在地方上取消了决定,只是在播种结束以后才给我们。

关于商业建设和乌克兰在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没有时间我就不谈了。十分清楚,我们需要的增加,要求的增加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必须使它们同总的计划相协调。我们认为完成计划的任务是最主要的,围绕这一点正在顺利地动员群众。完成了粮食收购任务的乌克兰党组织正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秋播运动,我们已经完成播种大约90%,即今年的播种面积多于去年。尽管气象台的混乱预报和一些地区的不利气候条件,党组织一定能完成这些任务。控制数字提出的任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组织将努力奋斗,在已经批准的计划范围内达到最好的指标和发挥社会主义进攻的最大速度,削弱在乌克兰还让人感到很有力量的富农。富农正在组织恐怖主义的行动,这一点我们和全体工人都看见了,但也还有我们没看见的东西,这就是富农在滋养反革命的思想家、破坏分子等。我们还没有把这连根铲除。在这方面我们还得扎扎实实地工作,扎扎实实地

斗争。

但为了这一切,需要有健康的党组织,我认为,这次全会以后,同右倾的斗争,同对各种倾向的调和主义态度的斗争将以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要求的速度进行。

主席:请加马尔尼克同志发言。

加马尔尼克:仅仅半年以前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讨论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从布哈林同志右倾集团的口里听到了对党的可怕的警告,我倒想说,我们听到了右倾分子哑哑的乌鸦叫声,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有覆灭的危险,如果党不走布哈林的右倾道路,即抛弃阶级斗争的道路,“富农长入社会主义”¹⁰⁹的道路,不断向中农让步的道路,在“宁静致远”口号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对抗党的列宁主义战斗口号:开着汽车和拖拉机在最短历史期限内赶上和超过经济和技术方面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请你们回忆一下,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就五年计划问题说了些什么。布哈林同志说:“我们这些强大的巨大的工厂在发展,我们的建设在前进……问题在于,里面坐着无产阶级的这整个庞然大物像飞机一样,刚离开地面一点它的发动机便有可能停顿的危险。危险就在这里。”

李可夫同志附和他道:“如果党不站到我们的观点上来,即不能冒着打乱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危险,想要在粮食方面正在经历或不断增长的困难的基础上‘跨过’农业脱节的危险,那么,困难将会变得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困难将会增大并首先对我们的五年计划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再说一遍,即使在我们的政策有重大错误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建立的并且拥有巨大力量和运动惯性的那种制度也会使前进成为可能。”

4月份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战斗性讲演反对党的政策,称它为招致灭亡的政策,并把自己的右倾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起来。

我听说,布哈林的青年门徒中有人悄悄地把这些思想大体朝着下面的方向进行了发挥,说党现在对资本主义分子实行的进攻就像我们1920年向华沙的进军¹¹⁰,等待着我们的的是失败,阶级敌人会击退我们。右倾分子充分展示自己纲领的四月全会已经过去半年了。

今天我们在审议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过去一年的总结数字是党和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战线上所取得的重大和决定性胜利的光辉汇总。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是向资本主义分子继续坚决加紧进攻的计划,规划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方面的巨大跃进。可是今天,当我们中央委员,

当全党和工人阶级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制定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计划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在这次全会上我们直到此刻没听到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他们的声音,我担心,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因为鲁祖塔克同志的报名发言者的名单上没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右倾领袖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度过了真正是大转变的一年,在激烈的阶级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于是我们集合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指挥部里总结我们的工作和制定未来一年的计划,但是我们没听见右倾分子领袖们的声音,他们在沉默。难道他们真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们谁都没有报名,看来,他们谁都不打算说话,不打算参加我们的工作。半年前,当我们在四月全会上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从右倾分子口里听到了反对党的战斗性的讲演,可是今天我们听不见他们说一句话,虽然党在这段时间里在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力量进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做了重大的工作并在整个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克服了许多薄弱的环节,——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释呢?他们的沉默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的成就就是唯一的解释。是这些成就使他们,右倾分子们闭上了嘴。如果我们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便兔子般胆怯地从战场上逃跑,而只要我们的道路上一出现困难,他们就反对党,就开始说话。今天他们沉默,因为现在粮食收购已基本结束,因为在工人国家的仓库里存有大量的储备粮。而4月份情况却完全不同,那时右倾分子利用粮食困难试图提出靠牺牲机器进口从国外进口粮食的问题。今天右倾分子不想说话,他们躲进灌木丛里去避风头,等待我们建设道路上的困难,等待向他们提供养料的困难,等待他们向党发动进攻所需要的困难。中央四月全会承认,我们有两条路线——党的路线和右倾路线,右倾的领袖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必须得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明确的政治答复,他们是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反党路线,还是真心诚意地放弃这条路线。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听到过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声明,布哈林说:“我绝对一秒钟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右倾分子”,李可夫说:“因为从我们开始往下滑的时刻起已经过去了很多时间,所以有人可能会问:今天我离弗鲁姆金距离有多远”。四月全会给他们的回答是,认为他们的立场同右倾路线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次全会对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有一切理由认为,他们现在处于右倾的正中心,他们的路线就是完全右倾的路线。我不知道,李可夫同志现在距离弗鲁姆金同志有多远,因为我不知道,弗鲁姆金同志现在的立场如何。

斯大林:他们比弗鲁姆金走得更远了。

加马尔尼克:是的,我也认为,像斯大林同志说的,他们比弗鲁姆金走得更远了。不论如何,他们无疑处于右倾的中心并且是右倾的实际领袖。我们也要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共产国际生活的问题作出回答。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宣布布哈林是右倾分子,是右倾分子的领袖¹¹¹。我们正在共产国际各个支部里对右倾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我们在为各个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清除其中的右倾分子,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而斗争,而且右倾叛徒们在反对党的斗争中甚至不惜求助于警察。可布哈林同志,公认的右倾分子的领袖,却在沉默。布哈林现在就应当走上讲台并告诉我们,他对共产国际里的右倾分子和已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人的全部活动是否完全承担责任。让他清楚、明确和诚实地说,他是同我们还是同布兰德勒和奇尔布姆在一起。暂时他十分坚决地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不参加我们反对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的斗争,我们将认为布哈林是全体右倾分子的领袖,因为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布哈林团结一致,我们将认为他们三人同属右倾分子营垒。

在这里我应当说,我没有完全理解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的发言。他比我年长许多,他的经验更丰富,但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就下列话题发表的语气安详、平和和温厚的讲话,即当谈到坚决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一切调和主义的时候,与自己的儿子争吵是多么痛苦。

同志们,我认为,凡是事情涉及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地方,那里就根本谈不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呼吁我们保持的和平和友谊。我不知道,在存在两条不同路线的情况下能幻想怎样的友谊。要知道,四月全会,我提醒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确认了两条路线的存在。要知道,我们工作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里,我们有右倾分子这样的人,他们企图减弱我们对阶级敌人的打击,挡住我们举在阶级敌人头上的手,企图阻挡我们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怎么可能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我认为,在不同的路线下你连同自己儿子的和平都得不到,这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今天应该谈的不是友谊,也不是和平,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而是同右倾分子的无情的斗争。当右倾的中央委员们真心诚意地承认并放弃自己的错误,无保留地承认党的路线唯一正确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将谈论和平,谈论共同的工作,而且不单是谈论,是要在实际上建立它。如果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放弃右倾——对此我们大家会表示十分高兴,而如果他们不放弃——我们将打击他们,狠狠地打击。

我觉得,全会必须十分坚决地要求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这次全会上

作出清楚和明确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报名发言,那么全会可以责成他们报名,我觉得,全会应当这样做,因为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急剧发展这个重要阶段上,诚然,这个阶段已经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还会在我们前面推出不少困难并要求我们今后更加鼓足全部干劲,而主要是保持全党坚如磐石的团结,保持同工人阶级最密切的联系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巨大决心。在克服一切障碍的时候,我们不能容忍我们政治局的队伍里有人妨碍我们的斗争,碍手碍脚,客观上在保护阶级敌人。乌格拉诺夫同志在摇头,认为说得太厉害了。可我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是问题果真如此,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在这次全会上对一切政治问题作出明确的无保留的回答。

柯秀尔:对!别再捉迷藏了。

加马尔尼克:要求他们在这次全会上发言,为的是不让他们从派别斗争利益的观点出发,在党困难的时刻想发言的时候才发言,而要求他们现在就在这次全会上发言,在我们确实在大转变的这一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正在拟定进一步迅猛果敢前进规划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否可以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留在我们的指挥部里。

现在谈谈对提交给我们的控制数字的审议。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谈个别细节和个别数字,因为它们¹¹¹在材料里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的讲话里已经作了详细无遗的说明。我想谈谈经济、政治与党内方面的几点结论,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对控制数字的分析得出这些结论。我们经历过的一年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转折性的一年,根据这一年的总结,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一系列基本的总的问题作出回答。这些结论主要归结如下:

第一,控制数字十分清楚、十分有力地说明,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路线、代表大会以后的党的各项决议、第十六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完完全全、彻头彻尾为我们的全部工作、为生活证明是正确的并保证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第二,这个年度的总结向每一个直到最近仍陷在托洛茨基主义罗网里的正直的工人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部反革命本质,关于热月政变、民族局限性的说法与我们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听到的一切诽谤和谎言的全部卑鄙性。无怪乎长期效忠于他的托洛茨基的老近卫军抛弃了他: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和其他许多人现在离开了托洛茨基¹¹²,因为生活、事实、我们的建设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留在其营垒里的只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这个年度的总结对于“左倾冒进”的所有代表也是一次可资借鉴的良好

教训。控制数字也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右倾分子的一切预言,而且是很短期间就粉碎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¹¹³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来的一切坦白现在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废纸。米高扬同志昨天说,我们第一次在党内遇到像右倾反对派这样被我们迅速粉碎的反对派。对右倾反对派的这一评价,我应当加以补充,我们第一次在我们党的队伍里遇到这样溜滑、蜿蜒如游蛇,胆小如兔的反对派。过去一个年度的总结、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是维护党的路线,反对各种倾向的最有力的战斗武器,是斗争的,是我们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

第三,现在全党、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都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赶上和超过”的口号正在迅速和坚决地实现,它的现实性、它的实现已经看得见,摸得着了。现在每一个工人,无论党员非党员,每一个雇农,每一个农民,无论贫农中农,都看到了我们是怎样越来越快地在追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拖拉机制造业、我们的汽车制造业、一批又一批新工厂的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它们现在特别有力地使每一个人相信“赶上和超过”这一口号的现实性。而这个口号的一天天顺利实现十分有力地加强着工人阶级为党的这个口号的最终胜利而斗争的意志。

第四,我们不顾右倾分子对我们的一切恐吓,正在克服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我们前进道路上与我们的发展、与我们的急剧上升、与阶级斗争尖锐化有关的种种困难和薄弱环节。粮食问题现在对于我们已经不再是一年、一年半以前那样尖锐的问题了。再有一两年我们将基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当然,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很大的困难和薄弱环节,但我们是不向它们低头的,我们将去克服它们。

第五,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也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结论提供了依据。同志们,早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过争论,他们主要是从分析列宁引文方面¹¹⁴对列宁关于我们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的论断提出疑义;而现在,在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规模及其巨大成就与工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强劲发展的基础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正在迅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时候,对我们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对我们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千百万群众的精力、牺牲和意志将决定社会主义建成期限的尽早到来,对此,党员、工人怎么会有任何怀疑。

第六,这一年,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

用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和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加强了,作为我们在农村的依靠的贫农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在同富农进行激烈阶级斗争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我们巩固了同中农的联盟,我们列宁主义的联盟,这个阶段上的生产联盟,而不是托姆斯基同志的“联盟”,他根本不懂什么是联盟的新的生产形式,对于他来说联盟只能用不断让步的代价换取。这种稳固的政治形势是由我们巨大的经济成就,是由经过工业化公债、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粮食收购、社会主义竞赛等检验的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决定的。

前天伏罗希洛夫同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同乌拉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的100名工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进行了谈话。工人们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运来了几列车的钢材。对伏罗希洛夫同志提出的问题:“现在你们那里面包,食品情况怎么样?是否困难?”一位工人在所有在场者的一致赞同下回答说:“情况是这样,可以生活得不错,可以好好地进行建设。”我认为,这个回答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心情。

最后,最末的一个结论是:党在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和在自己队伍内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更加团结了,思想上更加巩固了,理论上更加成熟了,现在在我们党出现了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积极性和朝气蓬勃的党内生活。我认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从未这样统一,这样紧密团结,这样积极,在自己的全部党内生活中从未像现在经过本年度总结之后的今天这样积极。

所有这一切成就我们首先应当归功于什么呢?我认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列宁主义探照灯的卓越作用是保证我们成就的主要因素。同志们,我想在这里谈谈与此有关的斯腾同志的一篇文章,他完全正确地抛弃了这篇错误和有害的文章¹¹⁵。他在文章中写道:“列宁成功地在实践上发现了政治环节,因为他善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发现理论环节。列宁之后我们再没有人这样辩证统一地一身兼有理论和实践的智慧。”

而接下去就开始了卖弄聪明和关于理论思想的“肥胖症”及其他种种事情的谎言,由斯腾和沙茨金的左倾冒进和思想的某种轻浮所决定的卖弄聪明和“左的”空谈。

有人喊:说得太轻了。

加马尔尼克:的确说得太轻了,我同意这一点。斯腾的这个说法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呢?我觉得,丝毫也不正确,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我们已经取得的这样巨大的成就。我们再没有天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但我们有党的中央委

员会在,在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里我们还有人——党的领导人、党的领袖、伊里奇的学生,他们“辩证统一地”一身兼有“理论和实践的智慧”,有在每一个阶段发现整个链条的主要环节的本领,确定每一阶段党的总路线的本领并以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坚定性予以贯彻的本领。我们的中央,列宁主义的中央,实行了猛烈和急剧的转变。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一个具有极为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极为复杂的转变时刻。就在这个我们在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下正以坚决的大规模的战斗夺取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关口上,党及其中央表现了善于发现并全力抓住主要环节的列宁式的本领。这些环节在现阶段就是以加强的速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大力发展国营农场,我们已经抓住了这些环节并将通过它们越来越有力地拉动整个链条。社会主义竞赛和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我们基本的工作方法。从我们以真正列宁的方式解决现阶段基本任务的观点看,沙茨金和斯腾关于理论思想的“肥胖症”等的高谈阔论只是愚蠢的空谈。[这个阶段我们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表现了巨大的意志和决心。我认为,我们大家应当了解,一年半以前我们把希望寄托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当一年半以前斯大林同志在红色教授学院里¹¹⁶特别尖锐地提出了粮食问题和与之有关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问题的时候,这就是在极为困难条件下的急剧猛烈的转变,许多人陷入了惊慌失措。难怪李可夫同志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在莫斯科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称,他不能保证我们红军的状态¹¹⁷。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在那里表现了我们党的钢铁般的意志,冲天的干劲和对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的执行。]¹¹⁸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的总任务就是完全实现我们1929—1930年度,即五年计划第二年控制数字所规定的建设速度。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为此需要做特别多的事情,需要一整套的措施,这在报告里已经谈了。发言的同志们又补充提出了一系列实际的建议。干部问题开始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干部问题现在是一切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全部工作,包括党的工作的质量问题 and 速度问题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在保证解决控制数字提出各项任务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仍然是我们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这一点将决定一切问题并将保证我们正确解决控制数字提出的各项任务。从这个观点看,我觉得,全会应当要求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作出清楚、明确的回答。如果他们不在我们顺利进行的建设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放弃自己的错误,那么中央委员会全会应当说,我们不能容忍领导集团中有人妨碍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妨碍我们进行工作,碍手碍

脚,当事情顺利时,在全会上对问题避而不答,当情况变得比较困难时,就钻出来向党进行反击,而在总体上,他们像自己年轻的门生¹¹⁹那样认为,最终等待我们的是阶级斗争战线上的失败,那时他们将放开喉咙说话。我们对未来的胜利和最终的胜利抱有绝对的信心,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正在完全正确地解决我们的各项任务。在率领千百万群众反对阶级敌人的不断进军中,我们使自己的整个后方保持极好的状态,不脱离后方,我们在前进中不冒进,我们研究敌人、盯住敌人,毫无疑问,我们今后顺利、坚决的进攻是有保证的。但是为了使进攻更加顺利,我们必须清除政治局里的右倾分子。

主席:现在请阿库洛夫同志发言。

阿库洛夫:这个年度的控制数字精彩地驳斥了右倾反对派关于五年计划不可能完成的一切预言。我们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那里听到的这一切预言的基础是不相信党领导的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曾努力把这种不信任灌输给党。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必须要求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他们十分清楚、明确地向我们声明,他们是否认为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路线是正确的,还是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作出回答,他们是否仍然认为自己关于党、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特别是布哈林同志必须对过去曾经向他提出、他曾根据自己以前文章的精神回答过的问题——他对农村上层的态度和我们对农村上层的政策问题作出回答。你们大家都记得,他曾经坚持富农的窝巢能够长入社会主义¹²⁰。他在四月全会上没有放弃这一点。

相反,他强调说,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现在让他在贫农和中农参加集体农庄,富农不仅减少自己的播种面积,而且手持武器积极反对党,反对在农村执行党的路线的无产阶级干部的事实面前,让他说,他放弃不放弃自己的错误。

我记起了全会之前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政治局对李可夫同志写的提纲宣布说,这个提纲不能令人满意,这个提纲是非政治性的,这个提纲没能对我们党的右倾作出评价之后,李可夫同志拒绝进行任何修改,声明说:“我拒绝鞭打自己。”¹²¹这可真是:朱庇特想要惩罚谁,就使他失去政治理性!李可夫同志对直接向他提出的问题的这个回答证明什么呢?回答证明,李可夫同志原来是一个差劲的政治领导人。对直接提出的问题:党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李可夫同志本人最近曾经参与的工作是否正确,一个政治领导人竟能用这样的话回答!这不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回答,这是一个,这么说吧,受了命运亏待的人的回答。

我完全同意加马尔尼克同志的意见,必须要求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作出十分清楚的回答,清楚地声明他们赞同不赞同党的路线。如果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回答或者听到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回答,就必须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我也应当赞同加马尔尼克同志这个意见:我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昨天的发言也感到完全不满意。他的发言谈到布哈林同志及其学派的那一部分十分奥妙费解。我从他的发言中只明白了一点,就是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请求党比较宽容地对待布哈林同志及其学派,因为,您要知道,这一小伙伴——布哈林及其门生——是红色教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党内以布哈林同志为表现和化身的右倾的政治意义,如果对我们国内存在的右的危险这样估计不足,像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是会产生许多后果的,同志们!

不,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虽然我像加马尔尼克一样在政治问题上经验比您少,但我也像他一样必须指出,右倾问题,国内右的危险问题不只限于布哈林及其门生的集团。

柯秀尔:可惜不只限于此。

阿库洛夫:是的,可惜不只限于此。难道我们在工会组织中工作发展的情况没有向我们证明,我们在那里有怎样的右的根源,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强调在工会组织中产生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不是偶然的。每一个党的机会主义倾向都产生于工会组织不是偶然的,每一个党的机会主义倾向都靠从事工会运动工作的那些党的干部的培育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和在西方都得到了证实。

洛佐夫斯基:不仅是工会干部!

阿库洛夫:是的,但是每一个党的从事工会运动工作的党的干部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的培养基。无论如何不能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也不能,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对我们工人阶级某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估计不足。我给你们举你们乌克兰工人阶级的成分为例。(笑声)

什维尔尼克:你已经脱离了乌克兰。

阿库洛夫:什维尔尼克同志,我像你一样“脱离了”乌克兰。

有人喊:这就对了。

阿库洛夫:我想指出顿巴斯工人阶级的成分,其中最近几年进来的工人68%是农民的子弟。如果我们党不执行明确坚定的路线,难道在我们的主要地区之一,我们这个工业基地,在这一成分之中我们不会有各种动摇?我们不可避

免会有的。

柯秀尔:已经有了。

阿库洛夫:对这全部危险估计不足,只把它归结为教授集团是绝对不行的,您的错误就在这里,彼得罗夫斯基同志。

应当认为党最近一年的最大成绩不是基本建设的数字和我们在产品生产等方面的成就,而是我们终于成功调动起了最广大工人群众并引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我们最近一年看见的工人群众的这种热情是我们前几年不曾看到的。在这里不能低估正在各单位实际工作中实行的开展自我批评的方针,不能低估像社会主义竞赛这样重要的工作。借助于依靠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自我批评的这一方针,党真的把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调动起来了。这是我们事业的重大成绩,这是我们正在规划的新的一年和五年的工作能够完成的基本保证。

现在我来谈几个实际问题。我想从五年计划的观点谈谈与下个年度控制数字有关的干部问题。我知道,干部问题将作为单独的问题提出,但那将涉及的是专业领导干部,而我想谈谈我们工业的熟练工人干部。

我们认为1929—1930年度是决定性的一年。我们认为,顺利完成我们所规划的一切不仅将保证完成五年计划,而且保证超过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实现所提出的全部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我们工业的熟练工人干部问题。我想给你们举几个数字,这是我从现在正在加工整理的我们不久前进行的工会调查资料¹²²中借用来的。你们大概很快就会得到登载有初步加工整理过的这些数字的小册子。那里面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顺便指出,在对工人进行教育和技术重新武装方面,这次调查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列宁格勒有四年半以上学历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40%,如果列宁格勒22岁以下的工人中受过四年半以上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有70%,那么乌拉尔同样类别工人的数字、顿巴斯的数字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乌拉尔只有17%,顿巴斯才只有12%。这证明,我们熟练工人的培养是不平衡的。(主席摇铃)

阿库洛夫:我请求延长时间。

喊声:让他继续,这是工会。

主席:我们毕竟是有规定的。

阿库洛夫:我知道,我们有规定,但它注定要被打破。

主席: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当这样进行工作,以便在下一次全会前结束工作。您需要多少时间?

阿库洛夫:十分钟。

主席:阿库洛夫同志请求给他十分钟。

喊声:给他。

阿库洛夫: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发展中地区,像顿巴斯,像乌拉尔,最近几年在我国整个经济中正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工人干部的培养方面却大大地落在后面,对此我们应当采取某些措施。然而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在国民教育系统,在国民教育拨款系统和工人技术培训系统,我们必须着手对资金进行再分配。比如说,让乌拉尔或者顿巴斯用地方资金解决熟练工人培训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做是不行的。其实这些地区不仅现在,而且在当前一整个时期都是主要的地区。我们应当在控制数字里,在已经开始的年度里这一点已经无法做到了,采取这样的方针,对使用于国民教育和对工人重新进行技术培训的经费实行再分配。否则我们就会出现差距。靠只有最起码学历的17%的工人是不会有作为的。

有人喊:差距已经有了。

阿库洛夫:差距还会更大。特别是关于顿巴斯,我们的调查揭示的情况是惊人的:我们顿巴斯没有干部。正当最近几年我们在各工业部门看到新来的工人中农民子弟的百分数在减少和工人子弟(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里甚至职员子弟)的百分数在增加的时候,在顿巴斯我们看到新来的工人中农民子弟的百分数在增加。顿巴斯是提供这种消极情况的唯一地区。只有在顿巴斯,我们1926—1929年新来的68%的工人是农民子弟,主要是青年。只有在顿巴斯我们有这样的情况:41%的工人在最后一个工作地点呆的时间不到两年。这证明流动性很大。顿巴斯没有干部。顿巴斯煤炭工业的指标也很接近于顿巴斯冶金工业的指标。

现在谈实际工资问题。如果我们各个方面都在超过五年计划,那么我们在本年度的控制数字中却有一个薄弱环节,显然,这将是以后若干年的薄弱环节,这个方面就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这方面不仅没有超过五年计划的数字,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比五年计划的方案还差。实际工资没有实现五年计划所规划的那种增长,而这种现象可能会具有持久的性质。这一切迫使我们敲响警钟。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米高扬同志的意见),本年度提高实际工资12%没有保证。应当直截了当和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有人喊:那干嘛要写上?]¹²³

阿库洛夫:最后,应当认真对待工人的供应和实际工资问题,应当像对待基

本建设、降低成本等问题那样认真对待(在这里我也向政治局提出指责)。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注意的中心,应当让政治局对有助于解决这个十分复杂问题的所有问题专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当前与基本建设和降低成本问题同样重要。我们没有保障,在即将到来的一年实际工资不会降低,至少不会比去年第四季度降低。但要知道,去年第四季度(我不想给你们列举数字)证明,在一系列主要物品方面对工人的供应大大落后于1928年第四季度。

1929—1930年度工人名义工资的平均增长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不会高出于2.5%,而我们打算提高实际工资12%。

你们看到,所缺少的9%我们无处去弄,提高实际工资(或者降低生活费标准费用4%)的方案不能保证实际工资保持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斯大林:真是荒唐之极。

有人喊:不能按季度衡量。

阿库洛夫:不能按季度衡量,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去年第四季度供应标准已经削减,那么前景仍然是不顺利的。

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带到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最后建议证明工人供应的前景将极为困难。应当说,60%享受统一供应的工人一天连四分之一磅的肉都得不到保证。为了解决提高实际工资的问题,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实际工资增长的措施。我就不提全面完成五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了,但为了使实际工资继续提高,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必须对这件事给予极大的注意,必须把这件事作为平衡控制数字时未解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而今年的结果是这样的,关于实际工资未来增长的问题似乎是在平衡控制数字时顺便解决的,而且政治局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决定已经进行了修改¹²⁴。

我们这些你们授权在工会里工作的人¹²⁵,我们认为需要把提高实际工资增长速度的任务作为极为重要的问题向中央提出。

我想用我开始的话题结束我的发言。尽管我们有困难,包括由于非常严重的粮食状况,由于工人供应的严重状况造成的困难,我们一定能顺利解决经济建设的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只有在我们党将保持团结,只有在我们党将保持一致,首先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将保持一致的条件下,我们才能顺利地解决它们。

主席:现在请瓦列伊基斯同志发言。

瓦列伊基斯:在四月全会上,托姆斯基同志作为党的总路线问题的主要副报告人发言的时候,把自己的批评,如你们所记得的,主要集中在什么是联盟的新形式和联盟的这些新形式到底是否存在的问题上。我来引证托姆斯基同志当时

讲的话。他说：“现在我们之间有没有政治分歧？是的，同志们，它们正在形成。当有人开始用‘新的’联盟，最新的联盟吓唬人，想要说出某种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自己最后的，最‘新的’理论结论的时候，我感到惶恐不安。遗憾得很，我不能签署这种结论，不能无条件地投票赞成这种结论。”接下去他说：“这是联盟的什么新形式？这是列宁主义的还是非列宁主义的联盟？是什么改变了？是列宁主义的形式还是不是？当你着手进行分析的时候，那么这里没有任何列宁没讲过的新东西。可你们却开始用你们所发现的联盟的“新的”形式吓唬我们。你们同样用新经济政策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吓唬我们，这里任何新东西也没有，而有的是非常措施和购货本。”

这就是托姆斯基同志对我们的纲领，对我们在四月全会和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就联盟的新形式问题提出的决议所进行的批评的主要之点。我觉得，现在，特别是对上个年度，即五年计划第一年实际取得的经济成果进行总结之后，我们能够真正对谁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也作出总结和结论。第一，是那些曾经否定新形式的人还是那些曾经证明我们这里正在出现、形成新形式的人正确，第二，联盟的这些新形式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牢固的，它们的发展和巩固对于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正确的城乡关系、无产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必需的？我觉得，恰巧在四月发言的这一部分里托姆斯基同志最清楚地表明，他不明白联盟的新形式，不明白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根本就是孟什维克的态度。他不明白我们向新经济政策新阶段的过渡，新经济政策在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商品关系方面、城乡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的那一切变化，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是看作新经济政策的发展，而是看作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看作是与其完全相反的东西，看作是向某种特别的，“新的”或者最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或者换言之，如某些右倾反对派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是转入“战时共产主义轨道”。我认为，托姆斯基同志在其对联盟新形式的批评中完全站在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这是事实。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是孟什维克的解释。他的完全停留在新经济政策旧阶段的号召实际上是企图把新经济政策说成像马尔托夫曾经描绘的新经济政策¹²⁶，像孟什维克所想象的新经济政策和我们向新经济政策的整个过渡。我认为，现在根据我们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粮食收购结果，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联盟新形式的全部巨大的优越性，而托姆斯基同志，尽管具有他从前表现出的、列宁同志曾经谈到过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感性¹²⁷，但

陷入右倾分子营垒以后,失掉了最起码的感受现实的特性并在对联盟新形式的批评中毫无疑问犯了最不可宽恕的政治错误。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¹²⁸至今仍然是布哈林同志的整个“芭蕾舞”学派——“少壮”学派的“圣经”。我必须说,这些《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实际上是惊惶失措者的札记。

莫洛托夫:这是对的。

瓦列伊基斯:最名副其实的惊惶失措者札记。你们都记得,李可夫同志在上次全会上对曾经批评过布哈林同志理论著作的一位同志¹²⁹十分猛烈地进行了攻击。他大致是这样说的:“您怎么能够对布哈林同志,对他的理论著作抱那样不尊敬的态度,谈到布哈林同志的时候,把‘某些理论家’加上引号。”

我认为,李可夫同志是不对的,因为,说实在的,对布哈林同志那些理论著作怎能不抱某种怀疑态度并加上引号呢?因为他企图跟着施米伦巴赫重复说,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所谓“受束缚的经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转到改良主义者的立场并把现阶段,即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第三个阶段描绘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描绘成盲目性、竞争,因而也是内部矛盾消失的阶段¹³⁰。对布哈林同志的这些理论习作,实际上半改良主义的理论著作怎么能抱以尊敬的态度?难道列宁同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的页边上的批注中¹³¹对布哈林同志的著作抱尊敬态度了吗?难道列宁同志没有警告布哈林,如果1922年他不停止为其当时受到我们批评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的蛊惑人心的辩护,那么他将不得不自己出面反对布哈林¹³²?难道布哈林同志当时没有停止发表自己的作品和停止为他在该书所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辩护?

我们应当十分明确地说,右倾分子的破产正在急剧发生,不仅是在经济和农村政策方面,而且也在理论方面。斯列普科夫们、艾亨瓦尔德们之流想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一部多么“出色的”著作的议论拯救布哈林同志理论旗帜的努力是可怜而又可笑的!必须承认并且应该开诚布公和十分明确地承认,在理论方面也破产了。这种破产表明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和他不愿意走列宁建议的道路——学习辩证法,认真地学习。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我们正在全会上总结的情况,在我前面发言的许多同志已经谈过了。

还有与我发言的这一部分有关的两点意见。第一,是四月全会以后发现了右倾分子派别活动在继续的事实,然而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在四月全会上他们的发言中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没有进行并且不会进行任何派别活动。“你不可能把我们赶到派别里去!”——布哈林同志说。实际上是,派别过去是有的,

并且进行了活动,在座的乌格拉诺夫同志同这个派别曾经有过某种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能够更详细地讲述这个派别的活动。因为他比我了解得更多。我希望,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如果他不谈,那么中央监察委员会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中央全会非常希望听听四月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特别是与工业学院所揭露的事实有关的情况¹³³和参加右倾反对派的我们中央的几个委员(乌格拉诺夫、布哈林、李可夫同志)与这件事情的关系。

第二个意见,谈的是右倾分子拒绝同右倾斗争,拒绝反对右倾,其中也包括这段时间内曾经几次公开讲话的李可夫同志。为什么人们拒绝同右倾斗争?这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调和主义,要么是公然不愿意执行四月全会的指示,而这些指示坚决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必须执行党的路线,这就是同右的危险及对右的危险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最坚决、最彻底、最不调和的斗争,这是不是实际上对右倾的公然支持?

我认为,这两种情况要求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对右倾分子的行为,首先是对作为这个派别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行为专门地,以什么形式我不知道,但进行讨论。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与控制数字直接有关的几个问题。我觉得,控制数字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及国家根本经济改造的纲领,然而这些控制数字也有一些弱点。丘巴尔同志是对的,他指出,弱点之一是这些控制数字缺乏正确的地区构成。但当丘巴尔同志在这里提意见说“乌克兰被愚弄了”的时候,他像一只“一面撕食母牛,一面自己嚎叫”的熊。

丘巴尔:你反映的是中央黑土地带州富农的情绪,而什维尔尼克反映的是冶金工人的无产阶级情绪。

瓦列伊基斯:在这些控制数字中乌克兰未必被愚弄了。但如果你们看看别的一些州,比如中央黑土地带州、伏尔加中游地区,那么你们就会在这里找到完全不同的证据。去年区域划分已经结束。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州,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州的控制数字尚未编制成功,我觉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应当用自己结束语的大部分来阐明这些任务。诚然,在国家计委最后一次全会上和其他一些会议上有人试图从地区的观点提出控制数字构成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方面的进展显然是不够的。区域划分没有被应有地利用,我们从区域划分得到了很大的管理上的方便。但这是不够的。现在应当让各个地区建立经济基础,各个地区需要实行严格的专业化。要实行每一个地区的专业化,以便一个地区搞畜牧业,另一个地区甜菜是主导的、主要的作物,第三个地区搞粮食。应

当更广泛地提出改革我们工业地理分布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正在重复革命以前我们工业企业布局的那些落后的方法，这些方法甚至受到资产阶级教授格里涅韦茨基的批评¹³⁴。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也曾经谈到过他。然而我们在重复落后的方法，这是由于落后、习惯和成见，总之“我们脑子里装满了祖先们的错误和他们事后的聪明”¹³⁵。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他说得慷慨激昂。

瓦列伊基斯：在大的经济、工业联合公司的地理布局方面我们也在重复这样做。

我完全无意作为“穷”州的代表在这里发言，因为我决不认为自己贫穷。我认为，中央黑土地带州比许多别的州富得多。例如，就产量来说我们有稳定的收成。我们的平均产量为55普特，比其他的州多。我们有集约的农业，在这样的农业中现在，特别是由于有了新技术，过去曾经是消极因素的农村人口过剩的一切成分，正在变成为积极的现象，因为得到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正转化为农业迅速集约化的积极因素。在即将开始的一年里，在燕麦方面我们将完全改用纯净的种子。在即将开始的一年里，我们70%的耕地将实行多区轮作制，这是许多州所没有的。

有人喊：在乌克兰呢？

瓦列伊基斯：乌克兰的一些地区情况相同。据我从柯秀尔同志的材料里得知，右岸地区具有与中央黑土地带州所进行的形式大致相同的较快的农业集约化。我们不是穷州！我们在两个星期中用土豆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来的事实，你们在莫斯科组织土豆消费“社会主义竞赛”的事实（笑声），（主席的摇铃声），表明我们不是穷州。

喊声：为了土豆让他讲！让他讲！土豆太小了！

瓦列伊基斯：毫无疑问，一年后我们将推翻中央黑土地带州在经济方面比其他地区“穷”的看法。今年在粮食收购方面我们占了苏联的八分之一。

莫洛托夫：我们表示祝贺。

瓦列伊基斯：莫洛托夫同志表示祝贺，但是祝贺不能缝制成皮袄，莫洛托夫同志。（笑声）我倒更喜欢少一些祝贺，多给一些实际的帮助，包括政治局的帮助，帮助中央黑土地带州实现农业工业化和发展工业的事业。我们打算建设四个联合收割机厂。

古比雪夫：是两个。

瓦列伊基斯：怎么是两个？四个！我看过政治局的决定¹³⁶。

喊声：在修改。

瓦列伊基斯：怎么在修改？正在建设两个新的……

古比雪夫：西伯利亚厂和罗斯托夫厂。

瓦列伊基斯：然后在乌克兰和塔什干。我要问，中央黑土地带州什么地方跟别的州不一样？在建设这些工厂方面别的州为什么处于比较有利的情况？我们在一年里提出过应当在中央黑土地带州建设一个拖拉机厂的问题。现在五年计划预计建设四个拖拉机厂。过去建设第一个拖拉机厂的时候对我们说：“喏，下一个我们或者将建在你们那里，或者建在乌克兰。”现在计划建设四个，可对中央黑土地带州什么也不准备给，一句话也不说。

柯秀尔：怎么会是四个？

瓦列伊基斯：五年计划规定建设四个拖拉机厂。

有人喊：那第四个将建在你们那里。

瓦列伊基斯：我们利佩茨克“自由之鹰”冶金厂开工已经多年了。那里有两座高炉，但它们加工不了全部矿石，我们从那里把矿石运往乌克兰。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说得很漂亮，把矿石从乌拉尔运往乌克兰是多么不值得。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我也会说，从中央黑土地带州运给你们不值得！为此应该对建设进行坚决的准备并兴建利佩茨克冶金联合工厂。

古比雪夫同志对这件事情非常了解并且那么出色地论述了冶金问题的全部迫切性，为什么他对利佩茨克联合工厂的建设问题说得有些不明确？

古比雪夫：明确，从明年起。

瓦列伊基斯：同时，实际上没有任何“明确性”。对从明年起将开工建设甚至没有一点信心。我们看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老是想呆在那些地区，那里历来就部署有工业，那里已经踩出了道路，由于习惯，由于惯性他们就在那里建造新的工业企业。那里已经有数十个老工厂，你们又在建几十个新工厂。然而，在那些各方面都具有巨大经济合理性的地区，例如中央黑土地带州，我们往外运劳动力，往外运粮食、土豆，经过我们这里运送煤和金属，从中央黑土地带州旁边往莫斯科运送一切好东西，而有一些维护不在中央黑土地带州建设工厂的原则的“经济学家”说，“他们有农业”。这是前所未闻的谬论！如果从前中央黑土地带州被认为是落后的州之一，那么现在落后这个问题已经在消失。我认为，对于中央黑土地带州来说，1925年颁布的“关于整顿落后的中央黑土地带州”，关于它的“重建”的那个决定已经过时了¹³⁷。现在我们离这已经很远了。在像农业改造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正以这样的步伐前进，乐意于最近做出应如何实际实现农

业改造的榜样。我们已经有 17 个拖拉机站。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全会上关于拖拉机站谈得很多。古比雪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打算建立 103 个拖拉机站,而我们已经有 17 个拖拉机站在工作,已经耕种 20 万公顷土地。今年给我们如此数量的拖拉机,我们将被迫减少这些拖拉机站。发生了岂有此理的事:一方面,计划建立 103 个机器拖拉机站,而另一方面,今年已经耕种了 20 万公顷土地的 17 个拖拉机站却因为没有拖拉机不得不减少。毫无疑问,这部分原因是在中央黑土地带州拖拉机化的问题上有反动的成见,认为那里“地少”,那里是小农户,因此没有这也能“对付”。在这些发展机器拖拉机站、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措施方面,首先必须进行一些坚决的改进。对像中央黑土地带州这样的地区必须改变方针,以便加强新的工业建设。

主席:现在请瑟尔佐夫同志发言。

瑟尔佐夫:过去一个经济年度的总结和现在编制控制数字的那些原则再一次无可争辩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右倾分子的思想成了指导和主导因素。不是这些思想能够成为我们经济建设条件下的组织和主导因素。从我们经济建设各个部分、各个项目来看,这一点很清楚。我只想谈谈与控制数字密切关联的一些问题,因为控制数字不仅是经济关系和经济任务的总和和总量,而且它们后面还隐藏着阶级关系。就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根据经济年度的总结和现在的初步经济计划所展现的可能性和前景,应当回答说,由于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农村当前正处在极为重要的决定性的经济转折点上。今年的基本事实是,相当大部分的农村基本群众虽然处在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下并跟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但过去在一定时期里仍然倾向于动摇并有时向富农经济看齐,现在他们最坚决地把农村的富农富裕上层交给他们自己的命运安排,让他们听天由命。这个转变,像政治局的提纲十分正确指出的,表现在对集体农庄运动态度的决定性变化上。不言而喻,这里没有必要说,现在正在参加集体农庄的全部贫中农群众既对集体农庄运动充满信心,又自觉地认识到,正是这种形式才是经济上最适宜的。当然,在这个环境里有很多,这在以后还会表现出来,有很多对经济公有形式的经济上的不信任,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还会强烈地显示出来。认为这一转变已经完成了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事情,那只是幻想。主要的事情无疑还在前面。已经完成的转变最坚决地驳斥了布哈林同志去年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那么坚决和那么绝对表述的论点:“向改造时期的过渡,当然,并不表示经济政策根本上的变革,毫无疑问,1921年曾经有过这种变革”¹³⁸。经济和阶级集团中目前正在发生的那些

变化说明了经济关系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即根本上的变革。这种过渡也要求提出新的经济任务,也要求从新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旧的任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加速发展现在已经提出了并将于近期更加尖锐和坚决地提出关于同农民联盟新的形式和性质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出农村阶级斗争的问题。很自然,右倾分子曾经提出疑义的那个论断现在得到了最彻底、最明显的加强,就是说,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农业中发生的那些变化使得无论是联盟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在彻底改变。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蓬勃发展使得我们社会主义成分明年将拥有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巨大份额和巨大控制数额的时候,它们不可能不改变。这个事实的意义当然不会因为这个控制数额的某一部分,也许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将是可疑的、虚假的、以后需要代替的情况而改变。这个情况仍然完全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已经成长的工人阶级有可能从另外的角度提出问题并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根本的新东西而从急剧变化的国内力量对比中产生的。就是我们生产的这种急剧转变使得大规模社会化经营形式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并将于近期成为农业中的决定性的因素,它当然最坚决地推翻囿于恢复时期思想的人们所产生的观点。这种观点也表现在我所引证的布哈林同志的话里,它正在完全被推翻,他说,向改造时期的过渡并不表示经济政策任何根本上的变革,同1921年不可能有任何相似之处。在这些极其重大的变革之下,毫无疑问,阶级对比关系在发生变化,“国内政治平衡”方面的对比关系在发生变化。各种经济比例的变化可能以其突然性吓坏了某一部分同志,使他们有时感到失去了平衡,它所表现的事实是,正在发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急剧进展及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相应的变化。当然,这不当使我们不去注意这方面的各种危险征兆,不去注意各种这样的因素,比如说,像有时十分激烈加剧的粮食困难,因为它们有引起生产方面和经济发展方面停顿的危险和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情绪形成威胁。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事实,像市场的双重体制、两种并存体制在奥妙的相互关系中的存在。

斯大林:什么体制?

瑟尔佐夫: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由我们调节的经济相互关系体制、明确的价格链条等,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并行的体制,资本主义分子在其中翻本,怀有自己的目的等。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只会使那些曾经打算和指望安安稳稳、按部就班地前进,安安稳稳地登上高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指望国内主要经济比例及其相应的政治上的反映会长期保持丝毫不变的人感到惊

慌和害怕。但很清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必定会引起矛盾的尖锐化。

我想谈谈与工人阶级同农民相互关系问题直接有关的问题。超过了一切计划设想的集体农庄的发展带来了崭新的因素并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暂时绝对对付不了的特殊要求。今年政府在控制数字里未能充分突出和明确地提出集体农庄建设的质量问题。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考虑我们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限额,不是为了向它们看齐,而是为了坚决克服它们。计划用于农业集体化的大量资金与需要相比仍然这么少,以至我们必须最坚决地给自己提出合理和正确使用这些资金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不熟练是毫无疑问的。过去我们有过不少这样的情况,资金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我要指出,例如,大量的抗旱专款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反对我们,靠这笔钱形成和发展起了许多新的富农农场。现在我们不能拿这笔资金的较大部分去冒险,用错方向。

现有的关于我们集体农庄运动现状的那些资料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一系列危险和挫折的前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通过一系列组织、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措施克服它们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在乌克兰只有50%的集体农庄有公积金,而且这种公积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一半以上)是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农民庄员的财产,我们对很多集体农庄的巩固性和长期存在没有保障。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这方面的情况比乌克兰更糟。结果是,集体农庄正在形成的那些积累常常用于个体农户,国家的资金也相当大量地被转移到那里去。打着集体农庄牌子的某一部分贷款也变成了农户的个人积累。有时集体农庄的一些拥有最好的生产资料、未充分公有化的产业对贫农起着剥削的作用。

当有人认为某一部分集体农庄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垮台,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在集体农庄问题上听到的这种宿命论的调子是完全不正确的。毫无疑问,某一部分集体农庄注定会垮台,但哪里也没有说,我们不应争取把这个数量减少到最小限度。当我们展开新工厂建设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要说,如果我们建造100个新工厂,那么我们事先就要有这种准备,25个将毫无用处,但有75个将是好的。我们努力争取做到那样,尽可能使100个工厂全部都是好的。

在大规模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可能立即接受我们组织影响的自流成分。必须最大限度地努力加强组织影响,因为这种影响的缺乏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腐败的、经营不善的和受富农影响的集体农庄的数量。为了把这类集体农庄的数量减少到最小限度,我们必须立即更加认真和坚决地提出关于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形式、关于加强集体农庄资产的公有化程度、关于

增加公积金、关于正确领导的问题。在基层组织分不清集体农庄的形式和类型的时候,应当让他们停止一般地谈论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总的概念掩盖了一切;把当前对富农利益非常有利的共耕社,把公有化百分比很高的公社和把劳动组合相提并论,把一切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

现在我来读一个干部的内容丰富和有趣的报告的一段摘要,他熟悉实现了全盘集体化的一个地区的情况。他写道:

“截至1928年6月1日,地区1.5%—2%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建立了一些很小的集体农庄,现在发现,其中许多原来是假集体农庄。实际上,集体农庄建设在地区里是前所未有的。运动基本上是新的。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不同寻常的发展是在1929年春天。到1929年6月1日,集体农庄已经包括了大约6%—7%的农户。到8月1日为12%,到10月15日已经超过了50%。在组建大型集体农庄的这种速度和制度下,只建立大型集体农庄,到1930年1月1日前所有农户都将实现集体化。一年之内全区将实现集体化。取代集体化的五年计划,执行的是一年实现集体化的路线。结果是,要么应当发出放慢建立集体农庄的指示,要么放弃这种速度,认真考虑这样匆忙从事的后果。我简短地谈几句关于组建的方法。任何组建大型集体农庄的初步计划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最近几天建立了一个拥有5万—6万公顷土地和另一个拥有3.5万—4万公顷土地的用牛耕种的集体农庄。一个集体农庄里好像完全没有拖拉机,另一个有5台或者7台。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预料不会有机器拖拉机站。在这种技术水平下,这样的集体农庄怎样才能坚持住——很难说。而这样的集体农庄,也许拥有的土地少一些(1.5万—2万公顷),已经很多了。

地方各个机关实行的是一套搞突击和搞运动的办法。全部组建集体农庄的工作都是在‘看谁建得多’的口号下进行的。地区的指示在地方上有时竟变成了‘谁不参加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没有进行广泛的群众工作。有这样的情况,村民集会通过决定建立集体农庄,却要求不愿参加的人上交一份专门的声明,说明为什么不愿意参加。也有慷慨许诺给拖拉机和贷款的情况。‘什么都会给的——来参加集体农庄吧’……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使集体化的程度,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60%,可能在我写信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0%。对集体农庄的质量方面我们没有研究清楚。资料的完全缺乏使我们无法说出什么明确的东西。已经有干部出发调查去了,待调查以后情况会更清楚。但从一些调查中可以确定,虽然大型集体农庄的役马和牛形式上被认为是公有化了,但养在个体农户的畜栏里……公积金少得

可怜……

……这样一来,大型集体农庄数量的增长和质量建设之间就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脱节。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措施巩固这些集体农庄,事情将会弄得名声扫地。集体农庄就会开始瓦解。秋天翻耕的土地,春天会种不上。必须考虑到,该地区在极为严重地出卖牲畜——耕牛……这一切把我们置于困难的境地。”(摘自巴拉诺夫同志给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¹³⁹议会党团和其他组织的报告)

有人喊:这是哪个地区?

瑟尔佐夫:是霍皮奥尔地区。全盘集体化地区选择的偶然性本身、准备不足和行政压力是现在不能不指出的令人不安的因素。

斯大林:您认为,一切都是可以“‘预先组织’的吗” * ?

瑟尔佐夫:不,我不这样认为,但我认为,在现在展开的、带有很大自发性成分的声势浩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十分突出地强调组织工作的任务并相应地给地方指明方向,同认为自流能替我们做到一切的极为有害的成见进行斗争。政治局的提纲说得完全正确:“……克服农业,特别是其中粮食和畜牧业部门发展速度过分落后的状况。彻底解决这个任务的途径就是进一步加速集体化的进程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就是进一步改善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本身,最后,就是加速发展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关键的工业。”

至于这里提出的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实际上它们常常被遗忘。陶醉于表面的成绩是个很坏的参谋,它可能会使我们错过非常多的东西。集体农庄运动无论以其目前的形态,还是明天将发展成的那种形态,是那么声势浩大,那么富有活力,那么健康的潮流,并且已经提供了那么多良好的榜样,以至我们可以用不着去搞摆样子的村庄和摆样子的集体农庄。实实在在的很好的集体农庄数量很多,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集体农庄都归入有成绩之列。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我们有社会主义竞赛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暂时还完全没有涉及质量,这种竞赛暂时只在数量方面进行。而要求改进集体农庄的质量指标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能把每一个集体农庄自动地划归某个社会主义主管部门来统计农村的社会主义成分。在目前情况下,必须实行更加严格的标准,而且我们不应忘记,集体农庄有时会变成为资本主义分子的工具,有时同国家的资金一起被我们的阶级敌人利用。而我们必须做到这样,使国家资金的流动能够遇到以吸收

* 引号是斯大林加的。——编者注

农民积累为形式的相向的流动。集体农庄的硬性质量指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百分率、贷款率、欠债、单位产品的成本等——这一切现在都应当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所有经济领导与计划机构和集体农庄本身的任务。

必须着重注意与参加集体农庄的运动,与农村各阶级集团对集体农庄不同态度有关的政治因素。仅仅参加集体农庄这一事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但现在必须提起的情况——不会奇迹般地转瞬间改变农民的社会本性。集体农庄迅猛发展的事实本身引起的相互关系中的那些根本变化仍然绝对不会于近期取消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只是从新的角度,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在地方上有相当多烦琐的争论:让还是不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有人想要得到一个永远一成不变的药方,而忘记了,我们参与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猛并将十分彻底地改变形势。而在这些议论掩盖下,不少富农违反党的路线进入了集体农庄。有相当多这样的事实:富农甚至在领导或者企图领导集体农庄的组建,被我们的社会主义进攻打败的富农想要合法化,想要得到某些公民权,即使用欺骗手段得到苏联人的权利。一些地区滚过了一阵富农生产资料自行消除的浪潮。富农把自己装扮成对集体农庄忠诚的公民,争先恐后地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脱粒机、发动机、碾米机交给集体农庄使用。一些集体农庄由于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玩弄的那些手段缺乏足够的批判态度,结果上了这个当。而且,富农并不总是公开反对集体农庄,有时装成集体农庄的热烈拥护者,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我们的每个失误,有时在宣传鼓动中用非常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现在在农村里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些话是个别农民说的,但明显是富农性质的话:“搞什么集体农庄,不如一下子直接去国营农场当雇佣工人,领国家的薪水,成为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人。”这种议论变成了富农的宣传鼓动:清理产业,卖掉牲畜和别的东西,赤条条地去参加集体农庄。当然,所有这些事实改变不了集体农庄运动所具有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全部积极的基础,集体农庄运动现在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空前的贫中农群众运动。但这些事实向我们提出了集体农庄要有紧张的、有组织的、坚强的经济和政治领导的坚决的要求。首要的任务是把集体农庄里的雇农和贫农分子组织起来,他们是工人阶级对集体农庄运动的政治领导的保证。

最后一点意见涉及农业合作社的组织问题,但这是那种性质的问题,它们有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的危险。应当指出,各个农业合作社系统管理下的最简单的合作社组织发展成为集体农庄的速度很慢。往往在新的地方组建复杂的、有时很大的集体农庄,同时却人为地阻碍依靠最简单的合作社组织来发展集体农庄。

在这种人为的阻碍中,各个农业合作社系统之间的本位主义斗争起着并非最后的作用。各个农业合作社系统的工作人员想必这样认为:“如果最简单的合作社将变成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失去基地,我们会失去隶属于我们的,由我们管理的那些基层组织,将失去我们存在的意义。”由此就产生了阻碍最简单的合作社变为集体农庄的相当明显的倾向,因为这同把它们交给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进行相应的管理没有关系。这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某些理论家企图在理论上界定的东西,即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之间的脱节。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极力在合作社运动和集体农庄运动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却忘记了或者不愿意了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也包括集体农庄运动。

主席:现在请哈塔耶维奇同志发言。

哈塔耶维奇: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沉默不能看作别的,只能看作是一种派别手段和同党玩的议会游戏。我们始终要求普通党员在党内说出心里所想的一切。我们尤其必须要求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全会上这样做。而他们暂时在同我们玩沉默游戏。古时候就有“沉默就是表示同意”的谚语,而现在沉默显然应当理解为表示不同意。

我认为,现在未必能够指望右倾反对派解除武装。

卡冈诺维奇:不能指望它自行解除武装,我们来解除它的武装!

有人喊:我们能够解除他们的武装。

哈塔耶维奇:当然,我们能够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是指望他们于近期自行解除武装,指望他们向党交出他们的阵地,指望他们思想上解除武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发展的飞快速度产生的紧张形势必然在工人阶级落后阶层中引起动摇;这种紧张形势会在小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引起更大的动摇,而这些动摇会滋养和加强我们党的队伍里的右倾情绪。根据这种情况,必须更加激烈地反对那种低估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和危险的说法,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昨天在这里的发言就是这样。按照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说法,右倾反对派不是名副其实的反对派,它在党内是那么软弱无力,根本不值得注意。

不对。在党内,甚至在党的工人阶层里我们仍然看到右倾情绪未定形的,不明确的,但却很大的反映。例如,我记得,八天以前,有工人工作队和负责支援工作的积极分子约1000人出席了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前夕举行的庆祝大会。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报告结束以后,共有15个人就报告进行了发言,其中有两个人向报告人提出反对意见并完全复述了右倾的全部政纲;这里既有对农民基本群众的剥削,又有农业的退化等。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女工人党员,另一个过去是

共产党员。所有在这次会上发言的其他的人是非党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庄员,他们对这两个人给予了猛烈的反击。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党内的右的情绪比较严重,需要加倍地注意并与之严肃斗争。关于党内不存在右倾危险、党内右倾的影响不大的一切言论在当前是有害的。我们正在痛切感受的当前时期粮食供应方面表现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缺乏的困难,会在最近半年、一年里加剧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右的动摇和不满。因此,应当对我们党内的右倾情绪、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加大打击,而不是缩小,不是淡化这种危险。

1929—1930年度的基本任务是,在保持所预定和采取的工业化的战斗高速度的同时,最终使农业赶上这种速度,即最终消除由于农业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而产生的困难。在主要农业地区,这一任务正在解决。这些地区的所有数据和事实说明,这个任务一定会解决。但在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应当在中央全会上说。

这里谈到了拖拉机,在政治局的决议里也正确地谈到了拖拉机¹⁴⁰。但关于拖拉机的备件什么也没有说,其实不妨谈谈这一点,因为这些关于拖拉机备件缺乏的车轱辘话已经反复说了三年了。年复一年,相当大部分的拖拉机因为缺乏拖拉机备件而停在那里。例如在我们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国营农场将近25%的拖拉机和集体农庄40%的拖拉机由于缺乏备件在最忙的季节开动不了,最缺乏的是振动器。这种振动器只值10戈比,而我们的工厂却三年不能安排振动器的生产,只好从国外订购。

我们从国外订购拖拉机的时候,人家按照美国标准给我们一定数额的备件。但问题是,我们的人还不习惯,我们还没培养出使用机器的干部,损坏机器的情况自然就更多。我认为,宁可相应地少预定5%的拖拉机,用这笔钱增加预定拖拉机备件的数量,也比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使我们相当大部分的拖拉机在最忙的季节无法工作为好。应当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制止备件方面的这种缺点。最后,应当在苏联境内安排这些备件的生产并保证适当数量的进口。

我们也有相当大数量的拖拉机因为缺乏煤油而停在那里。为什么全俄石油贸易辛迪加没预见到这一点,它为什么没预见到拖拉机是靠煤油工作,因而应当及时把煤油运到使用拖拉机的地区?由于拖拉机方面的这些缺点,我们少翻耕了足足10万公顷秋耕地。我们全区比去年多翻耕了100万公顷秋耕地,但如果没有使用拖拉机方面如此严重的中断情况,我们会翻耕更多的土地。

我们的工业远未准备好为农业的改造服务。例如,布良斯克工厂制造的拖拉机牵引犁完全不能用,真的应当把它们扔掉并停止生产。它们只会损坏美好

的土地。闲置了几十年的老撈荒地应当提供战斗性的收成,可它们提供的收成比农民的土地还少,因为这些犁使翻起的土层侧立着,因此翻耕过的地段杂草丛生。但尽管如此,布良斯克的犁仍然继续大量地送来,而且质量没有任何的改进。我们的工业完全不生产草皮铧,只得从国外订购。而没有草皮铧就无法翻耕撈荒地和冰草地。

在古比雪夫同志报告的整个计划里,关于草皮铧只字未提。如果没有这种草皮铧,我们每一公顷国营农场的土地和机器拖拉机耕种的土地将损失 15 普特粮食。

有人喊:要少些!

哈塔耶维奇:嗯,也许不是 15,而是 12 普特。目前我们国营农场谷物农场现有犁只有四分之一带有草皮铧。

关于畜牧业提纲里说了,而且说得很对。但正是现在畜牧业面临着特别大的危险,我不知道是否到处都如此,我说的是我们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我们正在形成这样的情况,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明年春天我们拥有的牲畜的总头数将比今年春天减少 20%—25%。一个原因是,我们最重要的产粮区今年遇到了歉收,这些地区的饲料几乎绝收。与这个原因一起,还有别的原因在起作用。富农在“自行剥夺”。当然,第 61 条¹⁴¹在很多情况下运用得笨拙和不完全正确,在基层实际上常常被归结为大规模的强制剥夺,但富农本身也在加紧和迅速地适应新的情况,在改变自己的产业,在看齐,在消除自己的一部分牲畜。而且不只富农在这样做,富裕的中农也在这样做。由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参加集体农庄的时候,有的比较富裕的、有三头牲口的中农卖掉两头,带着第三头去参加集体农庄,因为他不愿意比他只有一头牲口的邻居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公积金。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们看到市场上抛售役畜在大量增加,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这里一匹平时值 100 卢布的役马在歉收的地区只卖到 20—25 卢布。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购买这些牲畜并把它们赎给集体农庄使用,购买饲料,精饲料和粗饲料,我们在这方面将出现重大的缺口。这些措施必须立即采取。问题提出来了,但当它在莫斯科各种办公室里研究、运转,文件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机关的时候,几十天、若干个星期就过去了。必须在这里,在莫斯科就这个问题做出尽可能迅速的和最有战斗性的决定。

由于粮食收购的结果,农村的政治形势问题现在值得认真注意。因为粮食收购,我们在农村里狠狠地施加了压力。下达给我们的粮食收购计划十分紧张,而现在我们已经接近 100% 完成这个计划。计划的完成靠的是最充分地鼓足党

组织全部干劲和施加非常巨大的强迫性的压力——不仅是对农村的上层。但我们完成这一计划的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农村的形势基本上牢固和稳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实际上得到的广大贫中农群众的那种支持,任何行政压力措施都不能帮助我们拿到粮食。我们有比去年多100万公顷的翻耕的秋耕地。这也是广大农民群众不仅没有失去扩大农业生产的动力,而且比过去几年更加劲地扩大播种面积证明。但仍然必须说,在一些区里在对于比富裕富农上层范围更广的农户使用纯粹机械的、行政的压力措施方面无疑搞得过火了,现在由于正在开始准备春播运动,应当对这种情况予以纠正。

现在我们在农村里看到双重性的现象和过程。一方面,红军新补充的人员(当然是经过十分认真审查的)情绪非常好。年轻的新兵从未像今年,1929年这样情绪高涨地来参加红军。这一点我们进行过检查,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集体农庄运动广泛展开的区里(这样的区我们已经有好几十个),我们在贫农和中农群众中看到毫无疑问的热情和振奋。没有上面的任何倡导,在组建拥有2.5万—3万公顷土地,包括3—4个村庄的集体农庄,它们关闭教堂,在这些地方人们的情绪无疑是好的。人们成百张犁一队队地去翻耕秋耕地,他们热情高涨地翻耕没有地界的大片农田。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改造的伟大工作所产生的这种振奋和热情在从所有的毛孔里往外冒,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受富农一定程度影响的一部分中农毫无疑问的某种迷失方向的成分。农村中正在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破除和改造不能不在一部分中农中间引起某种惊慌,某种不理解和恐惧。他们的个人主义本性不能不对他们千百年来习惯的那些东西被破除作出病态的反应。我们曾试图检查减少播种面积的农户有百分之几。这很难确定,但是某些数字仍然能使我们得出结论,有12%到15%的农户减少了播种面积。这就表明,除了富农之外,某一部分富裕中农也走上了缩小自己产业的道路。我们的秋播运动已经结束,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2.5%,比扩大计划增加6.5%。而且这增加的部分几乎全是国营农场达到的。农户大部分都没有增加播种面积,而由于集体农庄成分大大增加了播种面积,结果是个体成分的播种面积减少得相当多。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常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这里通常是8月份、9月份播种,而今年9月15日以前天气一直非常干旱。

这是未完成越冬作物播种面积计划的主要原因,但富农减少播种面积的宣传鼓动显然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并引诱某一阶层的中农跟着他们走。也许,我们在这方面多少也有过错,因为我们地方上有时没有禁止把对富农采取的行政压力措施扩大到中农的十分坚定和明确的方针。

我们看到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尖锐化。在有些地方富农竟到了往井里下毒的地步。最近几天,我们地区有几起往集体农庄和一些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井里下毒毒死牲畜的事件。由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富农竟达到了如此凶狠、残暴的程度。但同时富农狂热地改变自己,改组自己的产业,适应新的情况,有时带头提出全村参加集体农庄的倡议。竭力变成令人认不出的平平常常的人。

关于曾经发生的,不知为什么大家谈得很少的土豆失误,我认为有必要说几句。莫斯科拼命催逼我们:给土豆来¹⁴²。我们把这种催逼传到了农村。多少有损于粮食收购,我们把土豆计划下达到了村,逼迫农民运到车站,损坏了马匹和车辆,我们拿走了工业用的土豆,不把土豆供给我们的工人。可后来我们在报上看到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地方委员会要求人民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多收购土豆的通知。我们的工人读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土豆没地方放,大批腐烂和损坏。你们自己会同意,这是绝对不行的。在这方面莫斯科有人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和土豆市场的混乱。应当把造成这种情况的那些人揭露出来,狠狠地整治一通,以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要知道,农民也在读报并看到在发生什么事情:催他,逼他,现在土豆却在烂掉。因为我们狠狠地施加了点压力,土豆正在运来并将继续运来,而严寒即将到来,土豆将会腐烂,因为我们没有土豆储藏库,而中途快速改变计划又不可能,我们迫不得已收购的1200万普特土豆中,看来10%无疑会在我们这里毁掉,在莫斯科和我们把自己的土豆运去的其他地方毁掉的还没计算在内。

总之,比土豆更加一塌糊涂的情况我从未见过。今天我们收到把土豆运往某地的任务单,明天它又被撤销——不是运往这里,而是运往那里。混乱情况严重,而这种下达任务单的混乱主要来自柳比莫夫同志的消费合作社系统,来自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系统。

柳比莫夫:完全不对!有人曾想逼我们把土豆从萨马拉运往莫斯科和从奔萨运往乌拉尔。我们证明了,这样做是荒唐的。后来,瑟尔佐夫同志和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都承认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¹⁴³。

哈塔耶维奇:有一天下达给我们把土豆运往顿巴斯的任务单,然后改为运往北高加索,然后又改为运往中亚。每天都改变任务单。

我们地区正在进行农业改造的巨大工作,按照五年计划,我们应当提供50万公顷土地供办国营谷物农场之用,我们已经为**国营谷物农场找到了180万公顷并为其他国营农场找到了30万—40万公顷,总共200多万公顷的土地。为**

了这个目的,我们修改了奥伦堡和萨马拉地区份地的定额,分别从7公顷和8公顷削减为4.5公顷和4公顷,而没有遇到农民大的反抗。围绕这个问题在农民中间进行了非常大量的工作。

今年我们就在建立20多个机器拖拉机站。我们已经有28个规模巨大的国营谷物农场。在萨马拉地区至少有40%的农民已经加入了集体农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完成这些宏伟任务的干部我们却非常非常缺乏。

为了完成农业改造这项重大工作,需要有无产阶级基础,而我们的工业中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拳头,没有无产阶级干部,少得可怜,少得太可怜了。太少了。

如果仔细看一看正在拟定的培养这种无产阶级干部的那些措施,我们发现,事情的发展对于我们,对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告诉我们说,五年计划将在更短的,即比计划减少将近四分之一的期限内完成,而五年计划预计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进行基本建设投资1.6亿卢布。这个数额是远远不够的,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被欺负了,被大大地伤害了。这1.6亿中头两年投入了多少呢?最多15%—20%。这就是说,在整个五年计划的40%的期间里,在我们这里投入的最多只有整个五年期间计划投资的20%。在这里发言的同志们抱怨说,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给他们增加的投资少。而我们呢,至少少给我们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半。这哪里有计划性,这又是谁的过错?据说,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叫嚷得少。可乌克兰和莫斯科总能够叫嚷得压过我们,更厉害地向各种机构施加压力。我认为,应当完全终止某个地区的投资数额决定于来自地方人们压力大小的做法。计划应当更加坚定不移地被遵守。如果工业化的速度总体上在提高,那么我们有一切理由要求为我们保持已经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批准的那种速度。

顺便,我认为有必要也来谈谈我们大型工程建筑地区的问题。我觉得,在离苏联边界很近的地方兴建耗资数亿卢布的巨大工程的时候,国防方面的考虑未被注意。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拥有的海军和海上远程大炮的情况下,在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初冲突中,刻赤工厂两个小时内就可能被摧毁。我觉得,这样数额巨大的资金主要应当投到离边界比较远的地方。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也同样。

柯秀尔:刻赤工厂应当迁往伏尔加河。

丘巴尔:可我们的边界会往西移。

哈塔耶维奇:这还不是很快就会实现的,而在西方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航空技术的情况下,现在伏罗希洛夫同志得要很多很多的张罗,以保证第聂伯河

建设工程的防空。我认为,规模巨大的工程应当建在伏尔加河附近,把它们放到伏尔加河以东。保证离边界1 000公里以上的任何工程的防空比保护离边界200公里的工程要容易得多。在我们今后的建设中,这一点应当更加认真地注意。

[柯秀尔:这是失败主义的观点。]¹⁴⁴

主席:现在请米柳亭同志发言。

米柳亭:我们正在审议的控制数字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从这些控制数字的角度看,正如大家在这里强调指出的,特别清晰地显现出右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实际上在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方面可以确定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的某些共同性。托洛茨基主义在自己的政纲的提纲中曾经明确和公开地宣布,在我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空想。右倾分子以其一整套措施和路线从实质上说是站在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同一立场上。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利用什么投机的呢?利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右倾分子现在利用什么投机呢?利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他们硬说,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内的集体化正在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毫无疑问,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吸引农民基本群众参加。现在我们在吸引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证明并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右倾分子的破产。右倾分子推行的主要指标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性质的指标。你们都记得,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当然首先是关于农民——中农群众、贫农群众不会增加播种面积,而会减少播种面积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里实际上回忆了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结束时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农民迅速减少播种面积,喀琅施塔得暴动¹⁴⁵成为需要改变政策的信号的那段历史。这一情况是右倾分子举出来证明他们路线的正确性的。生活表明了什么呢?到今年我们的播种面积增加了,但速度减慢了。今年表明,播种面积增加了5%,而且为了展示,这里只采用了把自己的播种面积提高两倍的公有化成分的增长数字,但应当强调指出,在发展速度方面个体成分,中农基本群众也比上一年增加了自己的播种面积。我们的总产值也增加了,也是5%。只是我们的牛减少了,这里的原因主要应当从生产方面去找,但我们的马匹今年增加了2%。今年的数据说明了什么?不错,我们还没有秋播运动的全部数据,一些地区的播种还没结束,但来自地方统计机构的一些初步数据,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列宁格勒州个体经济越冬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7.4%;莫斯科州增加了2.1%;伊万诺沃州增加了

3.5%；下诺夫哥罗德州稳定地增加了0.5%；我无法列举关于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数据，因为那里要么播种正在结束，要么我们还没有这些数据的总汇。我们集体经济的情况如何呢？应当直率地说，我们的预计将被超过。列宁格勒州集体农庄越冬作物播种面积增加了262%，即增加了2.5倍；莫斯科州增加了390%，即增加了将近4倍；伊万诺沃州增加了364%，即增加了将近4倍；中伏尔加州增加了——我对这些数字表示怀疑，因为人们往往喜欢预先夸口，但这里集体农庄的产量*提高了5倍。

哈塔耶维奇：实际上还更多。

米柳亭：克里米亚增加了2倍。这样，就秋播运动来说，今年会有一些的生产上的提高，会对吸引农民基本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发展和从而使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作出回答，因此，利用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这一建设中的分裂进行的投机现在被实践粉碎了。顺便指出，右倾分子这方面的论断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得到了响应。例如，《前进报》¹⁴⁶也是从把希望寄托在工农分裂的角度庆祝我们的12周年的。

今年的控制数字预先决定了明年的情况，这两年对农业是决定性的，如果用哲学语言表述，在农业结构从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上量转变成为质。农业的结构这两年在根本改变。量将变成为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在工业发展方面，尽管有提纲和两个报告指出的那些巨大困难，我们现在已有坚实的基础。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将经历巨大的转折，结构的改变。首先，这与农业的技术有关。在这方面，我觉得，应当倾听这里已经响起的地方上的呼声。这种呼声应当设法予以听取，总结并形成成为实际的措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农业机械化方面，这里已经有一条走出来的道路。不错，我们在拖拉机方面有困难，我们在拖拉机方面落后了，尽管如此，应当说，我们今年提供给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比它们现有的数量多一倍。而如果再加上我们正在建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是为集体农庄工作的机器拖拉机站，那么我们现在正大大增加对集体农庄的拖拉机供应。然而，将得到拖拉机供应的集体农庄大约有25%—30%。这样，70%的，在有些地方60%的集体农庄将仍然没有拖拉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全会也接受埃赫同志提的建议，那就好了，我个人也热烈支持这一点。尽管我们的进出口平衡表很紧张，我觉得，我们应当增加拖拉机的进口，哪怕为此提出筹措专门资金弥补所需费用的任务，可能甚至于减少一些我们的积累，这一点

* 原文如此，疑应是播种面积。——译者注

我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要知道,对于农业来说,拖拉机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真的是农民的最深层都行动起来了。改造在坚决地进行,这里应当竭尽全力加强这些进程,而拖拉机化的进程、技术的进程现在是最可靠的加强。这是第一点。

第二,预先定出深化技术规划的办法无疑是必要的。我一直注视着,我们在如何开展拖拉机化,我们在如何建造联合收割机和一系列农业机器,新的机器,现在就应当为农业的许多领域安排这些机器的生产。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我们在控制数字里没有看到它的反映。我们提出畜牧业的问题。没有农业这一个部门的机械化和机器化,我们是不会有作为的。虽然丘巴尔同志说了,莫斯科州、中央州的种植业使它们有可能比草刚长起来就干枯的乌克兰更好地发展畜牧业,尽管我们这里收获干草,但这是没有机械化系统的农事,如果不首先把机械化转移到饲料基地方面,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

有人喊:对!

米柳亭:关于我们农业的其他部门,关于经济作物,关于甜菜种植等方面的机械化,我就不谈了。这些农业技术改进的问题必须仔细研究。我再重复一遍,我个人认为我们国民经济计划方面的主要缺点是对我们的技术问题研究不够。

下一个问题是与农业有关的问题。这里响起了各个地区关于必须把企业建设的分布与地区特点结合起来的呼声。但不仅如此,应当把企业的建设同我们的集体化结合起来,把工业化同集体化结合起来。今年我们花费将近5亿卢布用于建设,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术语,在这里只随便说用于“农业工业化”,这太狭窄了,——甚至用于对农业原料进行加工方面的肉类企业、果品加工企业等,还有用于冷藏库、粮仓等服务性企业。

这些新企业的建设必须同集体化,同大型集体农庄的建设结合起来,因为农业正在按照工业方式进行改造。我们的大型集体农庄实际上就是未来的工业型的农业企业。在这里现在就必须把它们同工业结合起来,不仅是在狭义的、农业的独特性质方面,而且恰恰是把这一点同我们工业的改造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那些企业,要知道,它们决定着今后很多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就必须实现这种结合。

最后,我不可能谈一系列在这里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但我想再指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局部性的,但却仍然对我们的计划有着巨大的意义。围绕着计划现在无疑开始了一场阶级斗争,不仅是在实际执行方面,不仅是在农村广泛的阶层中,不仅是在我们的专家中间,而且也在我们的统计和计划机关

里。问题在于,现在数字统计也成了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

莫洛托夫:不仅仅是现在。

米柳亭:不仅仅是现在。但从前它不像现在这样突出。现在我们在工业,在运输业等各个领域里揭露了一些经济性质和政治性质的反革命阴谋。现在我们在统计领域里也看到这种性质的进攻。

米高扬:对!

米柳亭:在这里也必须一方面把方针转向换班和改变体制本身。我认为主要任务之一是立即转向建立村苏维埃属下的统计机构。村苏维埃统计机构。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措施并且已经政治局通过¹⁴⁷。在模范地区,村苏维埃的这种统计机构今年就应当建立。但另一方面,我想提醒大家在研究控制数字时有机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即一部分同志起初提出的年度数字说得一切顺利,万事大吉,但当需要落实的时候,这些数字却顺利地缩小大吉了。对这一点也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我们需要的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客观数字,对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阐明既不缩小,也不夸大,以免使人产生误解。

主席:现在请洛莫夫同志发言。

洛莫夫:古比雪夫同志把下达给煤炭工业的计划称为最紧张的计划。情况正是如此。现在苏联整个煤炭工业的紧张状况,正如古比雪夫同志说的,比战前高出大约70%,非常紧张。为了实现下达的今年的巨大而困难的任务,顿巴斯不得不以最加紧的速度改行连续工作周。现在顿巴斯改行煤炭工业连续工作周的已有我们煤炭企业全体工人的大约70%。到12月1日前,我们将使80%的企业改行连续工作周。同志们,这清楚地说明顿巴斯目前总的紧张状况和速度。尽管我们十分缺乏采煤工、支柱工和钻探工这些作为整个生产中心环节的地下最紧缺的工种,仍然在改行连续生产制。当什维尔尼克同志在这里骂顿巴斯人,说顿巴斯改行连续生产制的速度不够的时候,我们煤矿工人要把这种指责还给什维尔尼克,因为在为改行连续生产制企业服务方面工会所表现的,工会和党所表现的速度难以置信地落后了。

我同样肯定地说,所有其他文化委员会的缓慢速度使连续生产制难以巩固。我甚至断言,工会的文化部和地方的文化委员会,我们的商业网从未像这次在顿巴斯表现出这样不善于机动和适应新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这对连续生产制是主要的危险,我们必须从这方面尽力督促。

丘巴尔:不仅是督促,而且要保证。

洛莫夫:集市在整个星期里非常妨碍正常工作。使我们能够说,有党和工会

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完成计划的第二个杠杆就是竞赛。尽管什维尔尼克同志在这里发表了说竞赛比较“顺利”的声明,我要说,情况远非如此。我可以举一些矿务局的例子。例如,谢尔比诺夫卡矿务局。积极参加竞赛的生产第一线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在一些矿上占党员总数的6%。当我们在谢尔比诺夫卡举行的一些星期日义务劳动和工业化日各矿平均只有20%到50%的党员参加的时候,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谢尔比诺夫卡的这些数字不是唯一的。我还可以举谢格洛夫卡的数字。这是斯大林诺专区,而不是阿尔乔姆专区。你们会看到,那里的数字比谢尔比诺夫卡稍微好一些。我举的是比较差的,而不是比较好的数字,但这个事实已经说明,这个杠杆我们利用得不够。这一点应当抓,应当狠狠地抓。

我们今年机械化产煤35%,而计划是45%;进口设备的情况非常差;各工厂完成订货方面的情况非常差,等等。然而我认为,我们仍然能够完成机械化计划。

我想向古比雪夫同志说明,我个人认为,在他称之为非常庞大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里,很遗憾,并非总是反映了顿巴斯最急需的需要。是哪些需要呢?我们提出四年完成煤炭五年计划的实际任务。这是切合实际的任务,我认为,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我们能够完成它。要知道,适应速度的加强(我们今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五年计划对1929—1930年度的安排),必须考虑到,与此相应也就需要大量的煤。与此相应就需要以加强的速度建设新矿井。新矿井拨款应当充分满足。我希望,少给我们的部分将由国家计委拨给。必须支持我们十月革命节之前发出的建设一系列总产量为1220万吨的新矿井的命令。这是由所采取的速度决定的。否则,如果我们在新矿井建设方面跟不上,我们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就会完不成无疑将给予我们的计划。

今年,供应现在已经是特别薄弱的环节。这一点应当好好抓一抓,以便克服困难。与其说是食品供应(这也困难),不如说是为保证我们所承担任务完成的物资供应。关于这一点说得很少。

我想提请全会注意令我们十分不安的电力供应。

柯秀尔:对!

洛莫夫:什捷罗夫卡的情况令人不可思议。

莫洛托夫:什捷罗夫卡,它在什么地方,在乌克兰?

洛莫夫:这是我们顿巴斯的一个电站,在卢甘斯克地区,坐落在无烟煤矿之上。古比雪夫同志说了,什捷罗夫卡就要完了。

柯秀尔:正是,就要完了。

洛莫夫:你们要知道,它在完全另外的意义上就要完了。

柯秀尔:对!

洛莫夫:什捷罗夫卡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电站我们已经建了七年了,你们看到,打破了一切纪录!这样的工程似乎世界上哪里都没有,现在我们从什捷罗夫卡电站得到8500千瓦电力。我们一年建成的任何一个燃煤的小电厂都能提供这个数量的电力。从6月份安装了一台2.2万千瓦的涡轮机,不知道它是否将投入生产。

柯秀尔:或者必须建一个新的。

洛莫夫:第二台1万千瓦的涡轮机坏了。结果,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之前整个阿尔马兹诺-马里因卡区和克林达乔夫卡区处于缺电的状况,十月革命节前夕关闭了各俱乐部和电影院的电灯。

如果我们今后这么搞什捷罗夫卡电站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完不成计划。

祖耶夫卡电站。我今天在《工商报》描绘了处处遇到的那些阻碍这项极为重要建设工程的官僚主义花招:忽而是一个完全荒唐的反对意见,忽而是另一个反对意见等¹⁴⁸。这里也应当设法打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由它提出一个明确坚定的方针,应当尽快结束祖耶夫卡电站工程。

电力问题是顿巴斯开拓和发展的最薄弱的环节。

应当指出,我们所接受的将近3900万吨的最紧张的采煤任务的完成遇到了我们矿井井筒状态的问题。这是顿巴斯伤脑筋的问题。劳动人民委员部(热尔托夫同志)的一个委员会在对矿井进行调查的时候查明,全部井筒的三分之一需要大修¹⁴⁹。我能不能在这样的紧张速度下把一个矿井停下来一个月进行维修?我能不能让它停产?在矿井的负担方面,我们接近了今年的极限。再往前会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将靠不幸情况和灾难的增加前进。这里已经达到了极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更多地向莫斯科郊区的煤田和地方上其他许多种燃料生产单位施加压力。

我还要再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改组的问题。中央四月全会决定:“建议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就仔细研究改善顿巴斯工人村的供水和公用事业问题并批准与供水有关的工程的财务计划。”¹⁵⁰这一点没有做到。同志们,费周折的事情开始了,而现在真是好事多磨。乌克兰曾由我和丘巴尔同志上报过一个计划,在计划中我们提供了一个制订好的,经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批准的技术方案,可苏联国家计委认定,这个方案需要的资金太多。克维林同志在国家计

委主席团里提出的理由就是这样。这之后曾委托国家计委的一个部门对这个问题再加以研究。我们曾想:好吧,让他们审核去吧,这样会更好。现在国家计委赖因霍尔德同志奉送给我们的是3.5亿卢布的方案。

丘巴尔:不是方案,而是初步设想。

洛莫夫:完全正确,是3.5亿卢布的初步安排。似乎我们乌克兰人应当抓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相反,应当坚决拒绝这样的安排。我们的联共中央全会谈了饮用水,那就请给我们饮用水吧。饮用水问题无论如何一定得解决,因为这个问题成了顿巴斯发展的瓶颈。我们提出的方案计划按顺序解决顿巴斯各个区的饮用水问题。

我还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改组的问题¹⁵¹。改组问题是使工业领域毫无例外的所有工作人员感到焦急不安的问题。从夏天起我们就开始叫喊,应当取消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改组金属矿务局、煤炭矿务局和管理网络的所有环节。我们把疑惑的成分带进了我们的机构,大家都开始想,他们是否将继续工作。每个人都开始寻找比较稳定的位置。保护自己不被改组掉。应当按照这样的公式行事:想好了——就赶快做。不能把不确定性带进工业管理的所有环节。改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进行,现在已经感觉到整个机构在颤抖。在改组的时候,应当明确区分两个问题:基层环节——煤炭矿务局和金属矿务局。在这里应当声明,我们现在不打扰它们,以便使它们建立坚定的成分和信心,它们将继续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计划。至于上层环节,这里问题比较容易,但无论如何应当赶快解决。

煤炭计划的实现同我们党的政策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党的政策请试试实行连续生产制。难道不经过战斗它就能够实行吗?每一次会议上都有一些同志发言,硬说实行这种连续生产制是不可能的。前几天布哈林同志生我的气了:有一次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这样一个说法,所有阻挠连续生产制的人都以他的名义和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名义在发誓¹⁵²。他开始直接用“您”同我谈话(我一辈子同布哈林同志从未用“您”说过话):“洛莫夫,您怎么会说我反对连续生产制?”

米高扬: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赞成”。

洛莫夫:全部不幸在于,也许布哈林同志并不反对连续生产制,但是所有反对连续生产制的人都用他的名义起誓。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由,当我指出许多同志和连续生产制的反对者怎样用他的名义起誓的时候,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发言的理由并表明他是赞成连续生产制的。顺便指出,他在会外大骂特骂,

而当应该在这里发言的时候,却没有他。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当布哈林和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切反对我们党的政策的人的领袖。

我们正在执行的今年的计划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计划。但是,为此需要党也发动起来,以便不再出现有时只有6%的党员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或者只有25%的党员参加“工业化日”¹⁵³的那种情况。这里需要整个组织的最大限度的团结工作。那样我们就能够完成我们的计划。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日产煤的最新数字(正常日产煤量为650万普特)为485万普特和550万普特,就是说,我们在星期日也已经接近了产煤量的70%。

主席:在宣布休息之前,我提出以下建议请全会讨论。为了我们今天就能结束控制数字问题,我建议休息之后继续讨论到8点钟,然后宣布休息一会儿,再听取结束语。

喊声:对!

主席:建议被采纳。现在宣布休会到6点钟。

第五次会议

11月12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请卡达茨基同志发言。

卡达茨基:我想,没有特别的需要复述我们的经济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计划的超额完成说明,在制定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对现有的那些生产能力估计不够。我们一些个别部门超额完成计划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平均水平。

我不能谈论别的地区的生产能力,但在列宁格勒我们至今有许多未被注意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例如,在一些工厂里我们拥有可用于生产的面积1.5万—2万平方米。不用说,我们也有未利用的设备,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如果拿民用工业个别一些车间为例,就是在那里这些生产能力仍未被利用。这说明,我们在制定我们计划的时候,没考虑到我们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证明党提出的速度是正确的,粉碎了右倾分子对我们的速度和计划的种种诽谤。

由于时间很少,我想谈谈在我们州有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古比雪夫同志在谈到动力工程建设重要性的时候说,我们工业的成就决定于我们电力建设的成就,而且提出了许多近期必须动工建设的电站。我想描述一下列宁格勒州电站的情况。如果同志们对某些工厂假设性地列入建筑工程在这里表示了愤慨,那么我们在电力供应方面也有不能容忍的状况:今年我们需要有24万千瓦的电力,可我们总共只有20万千瓦。因此,在这里谈论什么正常储备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情况将在最近两三年内继续存在。我们不仅将没有储备,而且将没有工业正常发展的最小功率。古比雪夫同志指出,为了保证列宁格勒州的工业,计划修建一座泥炭发电站,但这座电站的修建早在三四年前就计划了,可当事情发展到实际施工的地步,却由于不知道的原因被取消了。现在,当我们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局要求回答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答复大约是这样的:“是的,列宁格勒需要一座泥炭发电站,但是什么样的发电站,这需要另行确定。”

有人喊：应当研究。

卡达茨基：在两个区里进行了研究。拨给我们600万卢布，以便这座发电站能够在两年内建成。电站的建筑费用大约是8000万卢布。我想问问，如果施工第一年我们拨给600万卢布，那么，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建筑人员，他们第二年能用掉7400万卢布？当你开始到各个计划机关奔波的时候，你才会弄明白，连这600万卢布也石沉大海了。如果我们将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我们的电力建设，那么我们就一定会陷入停掉一些工厂的危险之中，因为我们保证不了我们的工业有必要的电力。这里有人举的什捷罗夫卡发电站建了将近七年那样的事情，我们那里没有过。我们正在进行技术稳定的成功建设，例如，我们建成了约10（万）千瓦的“红十月”大功率发电站并将其投入使用。我们有进行建设的一切可能，我们有泥炭蕴藏，我们有燃料蕴藏。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向列宁格勒州施压的时候说，它对地方的资源利用得不够好。为了建一座泥炭发电站，我们已经奋斗了四个年头，但这座电站至今没有建成。只是今天我才得知，拨给我们的、不足以满足电站建设速度的那600万卢布也取消了。如果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一方面发展工业，但又由于电力不足而出现生产中断的危险。

古比雪夫同志列举了一系列1929—1930年度将动工兴建的冶金厂。只要简单列举一下打算建造的拖拉机厂，就可以敲响我们工具制造业的警钟。古比雪夫同志指出，明年将开始开工建设一个工具厂。我问托洛孔采夫同志，打算怎样供应拖拉机厂工具。他说，特种工具，工厂将自己生产，全部标准工具则将从别的地方购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工具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对于我们的工业化和新冶金工厂建设的速度来说是否足够了呢？我认为，肯定是不够的。我们曾这样提出问题：请允许我们建设一个工具厂。我们被拒绝了。同时应当指出，我们打算建造的这个工厂的产品到五年计划末总共能满足列宁格勒州大约50%的需要。我们在采用高速度建设冶金工厂。但同时，工具问题随时都可能打破我们的一切计划或者迫使我们从国外进口工具，因为我们自己将没有工具厂，不能在国内生产工具。我们认为，控制数字应当规定扩大工具制造业或者今年就建设新的工具厂。

下一个问题是组织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在实行两项重大措施：第一项是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第二项是从地方工业收回资金用于联盟工业¹⁵⁴。工业管理体制的改组进行得怎样呢？我们读了提纲，读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应当指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吸收地方参加非

常不够。我们从提纲里得知,一些工业部门在开始打破托拉斯过去拥有的整个庞大的技术机构,完全不考虑这样做好还是不好。我可以举一个同样是机电工业的例子。弱电工业、强电工业和蓄电池工业混为一谈,成立了一个托拉斯。也许,从结构的观点看这样做很好,但从这个庞大的托拉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担起全部工作的观点来看,这种托拉斯的成立令人产生很大的怀疑。以前我们一直都知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机构,它管理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工厂数量太多,但却未能胜任它面临的技术任务。此外,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人们不想把它集中到联盟的或共和国级别的规模上来。这表明,地方将被排除在这件事情之外。我可以取火柴和其他产品为例,这是地方完全能够胜任的,而有人却想在这方面建立联盟的或共和国的联合公司。改组最后应当导致集中。我们认为,对工业管理体制改组的问题应当更多地吸收地方参加。

财务问题。给我们州的任务是从地方工业抽走大约9000万卢布给联盟工业。同时应当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地方未被吸收参加。我不否定资金再分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如果我们把大量任务加给地方,不考虑地方的条件和需要就把资金拿走,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最后一点意见是关于外国专家问题。同志们谈得很多,说我们应当一方面吸引技术援助,另一方面派我们的工程师到国外去。现在,派遣我们的工程师出国的情况非常非常糟糕。为了派遣某一个专家出国,他得通过这样的障碍,这样的阻挠,以致最终许多必要的出差完全失去了可能。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必须对被派遣的专家认真地进行审查。但当这种考察变成我们对外联系的障碍时,就应当结束这种状况,否则我们就无法完成落在我们肩上的任务。

主席:现在请李可夫同志发言。

李可夫:古比雪夫同志在自己关于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指出,我有保留地投票赞成提纲,反对提纲谈右倾的那一部分,委婉地说,古比雪夫同志的这个声明是不准确的。我始终支持和投票赞成同右倾进行的斗争。我声明的是,我反对提纲指控我个人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右倾的那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古比雪夫同志在自己的通报中什么也没说。

许多发言者(如果不是所有就控制数字发言的人的话)在这里的讲话中都表示,希望“三人集团”,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上一次联席全会曾就其通过著名决议¹⁵⁵的那个三人集团中有一个人出来发言。我个人原没打算就控制数字在这次全会上发言,但就关于控制数字决议草案展开的辩论迫使我作

这个发言。

请允许我现在宣读一个文件,陈述我、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对国家生活主要现象的观点和我们对党的总政治路线的态度。(宣读):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

亲爱的同志们!上一次中央全会(1929年4月)作出了关于我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决议,指控我们右倾并把我们在党内及其领导机关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四月全会以来的时期内,在报刊上和在国内进行了准备进一步的组织结论的运动。虽然在提交本次全会的决议草案里,在反‘右倾分子’的段落里没列出我们几个人的姓名,但根据上一次全会的决议,这些段落是针对我们三个人的。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我们革命现阶段的紧张形势需要我们党的最大限度的团结,我们认为向你们发表本声明是自己的政治责任。

1. 我们认为,从一致通过决议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的经济建设领域正在进行极其深刻的变革。过去的经济年度可以认为是转折性的一年。宏伟的和速度空前的基本建设规模、工业主导作用,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加强已经无法容忍个体户、木犁、耕地交错等在农业中的统治地位。因此,大规模公有化经济的发展不仅成了当务之急,而且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具有了真正的群众性,展开了超出计划机关一切安排和一切设想的速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愈益成为经济变革和技术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根本改变着农村的经济并使农村的经济发展出现转折。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伟大工程的计划,在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尖锐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群众正在动员起来,发挥群众创造能力的新形式在不断完善。

我们进入了新的建设时期,这个时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向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证明,苏联工人阶级正在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在经济战线上赢得自己决定性的战斗。

2.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同意党的总路线。我们最直接地参与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几次中央全会决议的制定。与某些不真实的说法相反,我们投票赞成五年计划。我们同样支持政治局决议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控制数字。我们认为,过去的经济年度完全证明了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使党‘回到十四大’¹⁵⁶的种种企图是不正确的和政治上有害的。

3.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与表示赞同这类企图的党内一切右倾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些右倾派别阻碍无产阶级群众朝着社会主义方向

前进,瓦解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意志,客观上是在帮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忙并加剧其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方面的动摇。我们认为对这种派别和相应做法采取思想上和实际上的调和态度是不能允许的。

4. 过去的经济年度在工业方面和农业集体形式发展方面创造了最高的数字,发现了我们建设的无穷无尽的资源和潜力,同时也就使党面临许多需要动员工人阶级全部力量予以解决的困难和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困难和问题是:尽管集体化的规模巨大、机器供应增加等,整个农业,特别是粮食部分的产量计划未全部完成;在畜牧业方面,计划未完成的部分更大,耕畜有所减少;最后,实际工资计划未全部完成。

1928年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定提出,‘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基础的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¹⁵⁷。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主要危险’还没有消除,虽然农业生产社会化在新的机器技术基础上的发展已经奠定了消除它的基础。

5. 在完全正确的和我们完全同意的坚决向富农进攻的政策之下,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富农经济比重降低和富农生产基地缩小的事实是自然的。

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过去和现在都在于,以贫中农成分和速度不断增长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成分的发展弥补富农经济产量的减少。

由于担心非常措施作为长期制度的实行不可避免地也会触及相当多的中农阶层,我们在上一次(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曾反对实行非常措施。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多数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我们这样做,不仅依据过去实行非常措施的经验,而且也依据中央委员会自己从这种经验中得出的那些结论。在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中我们读到:‘党的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既要对那些表现我国资产阶级倾向的和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决定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又要对那些使非常的和临时的措施具有经常的和长期的方针的性质,从而使工农联盟受到威胁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6. 毫无疑问,在短时期内保证了无产阶级国家粮食储备的非常措施的实行在一些地方引起了某些中农阶层不满情绪的增长,把这一部分中农推到了拼命抵抗的富农一边。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非常措施的实行对农业计划的未能全部完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工人阶级的极大毅力、对农村的一整套其他措施(农业最低限度措施、工业品下乡、机器供应的加强、对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全力支持、新国营农场的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等等,等等)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和顺利镇压富农的

情况下导致了所有集体化计划的突破、农业新技术基础的奠立和贫农与很大部分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周围。”

卡冈诺维奇：与你们的预言相反。

李可夫：如果有人即使再说一句，说我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说贫农违反我的意愿正在围绕着苏维埃政权组织起来，我就不在这个讲台上再说一句话！

(宣读)：

“在这种执行党的总路线的轨道上，农村的客观形势改变了，在确定党的下一步策略的时候，正应当以这种新的形势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粮食后备储备的形成和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成分与按预购合同得到极高百分比统购粮的可能性使非常措施明年就不必要了。

我们认为，如果采用我们在四月全会上提出的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方法，我们就会通过痛苦较少的途径获得所期望的结果。但是，在对过去的一年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对影响农村的那些最强有力的杠杆有过某种错误的估计不足，是这些杠杆最后开始弥补非常措施的消极方面。因此，在党所采取的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方法的轨道上，由于通过的决议我们参与了这个方法的实施，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出党的这些毫无疑问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丝毫不忽视党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困难，我们愿意在党的决议的基础上同全党一道去克服这些困难并将为克服这些困难而奋斗。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之间的分歧消除了。”

斯大林：怎么，怎么，李可夫同志？听不见，请再说一遍。

李可夫：“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之间的分歧消除了。”

彼得罗夫斯基：就是说，有过分歧。

李可夫：(宣读)：“7. 我们想象的农村发展的近期前景如下。我们认为，必须大力继续对富农的坚决进攻，无情地镇压他们对无产阶级国家政策的抵抗。”

斯大林：甚至用非常措施？

李可夫：当我们在那些场合下说反对非常措施的时候，如这个文件所说，我们说的是反对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我们中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未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否定非常措施“an und für sich”……

喊声：用俄语说。

李可夫：本身。(宣读)：“对富农的一切恐怖企图必以最坚决的镇压措施予以回答，继续党正在进行的团结和组织农村贫农群众的大量工作。其次我们认为，尽管集体农庄运动具有群众性，尽管个体贫中农经济的比重和作用将以日益

加快的速度下降,个体贫中农经济必须上升的问题还未消除。然而,一方面,吸收不仅是农村的贫农,而且还有中农大规模参加集体农庄、已经显现出来的集体农庄扩大的明显倾向、这些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导作用、整区整区的全盘集体化,另一方面,预购合同制做法的广泛发展在取消非常措施制度的时候正以新的方式提出市场关系问题。”

卡冈诺维奇:总算猜到了!

李可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如果您想同我们辩论,是谁、什么时候先猜到了什么,那我不认为,这种辩论的结果会对您有利。我不认为,许多人会赞同您在这方面的如此“乐观的”期望。至少,我不想和您竞争。

奥尔忠尼启则: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市场问题,你刚才读的东西毕竟不是布哈林在上一次全会上说的东西!

李可夫:布哈林现在说的就是我才读的东西,这个文件上有他的签字。

奥尔忠尼启则:我只是说,这不是他在上一次全会上说的东西。

李可夫:我可以把你们每一个人一两年期间的发言的速记记录拿来,向你们每一个人证明,你们在一篇发言里说的不是另一篇发言里同样的东西。

有人喊:原来如此!

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这个意思。

李可夫:我可以保证对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也这样做。

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这个意思。并不一定要每次重复同样的东西。

李可夫:(宣读):“国家规定和限制的市场关系首先将在还非常大的农村内部周转领域和同不由国家供应的那部分居民的周转中占主要的地位,在经济生活决定性的关键问题上日益为各种组织(国家、合作社、集体农庄、个体户的预购合同制)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做法所代替。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它们低下的生产成本应当成为集体化进程扩大的最有力的推动。这样,集体农庄便越来越成为农业的主导成分。

8. 总之,过去我们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主要分歧就是在实行非常措施问题上的分歧。因此我们不得不声明,报纸和杂志上作为体系宣扬的、似乎是我们赞同的观点体系与我们的真实观点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莫洛托夫:原来如此!

卡冈诺维奇:季诺维也夫总是带着报纸摘录到这里来并抱怨说,有人把他没说过的话加到他身上。

李可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又想进行私人辩论,我很希望进行这种辩论,但是

要公开的辩论。我可以用报纸上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声明和报道证明,人们怎么会把别人不仅从来没有说过,而且从来没想过的那些东西加到他们身上。这也是我很难在这次全会上说话的原因,虽然我个人坚信,即使不是整个全会,那也是全会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对我、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提出的那一切指控是正确的。

有人喊:依您看,这是什么,是吵架吗?

柯秀尔:关于在上一次全会上的声明呢?

李可夫:就拿指控我们右倾为例吧。你们作出了决议,说我们是右倾的首领。根据这个决议整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同阿斯特拉罕诉讼案件“联系起来”的企图才成为可能,因为报纸把阿斯特拉罕受贿和诈骗诉讼案件同右倾联系起来¹⁵⁸。但是,我认为,如果我在这个讲台上对中央委员会推举并让他至今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似乎是个曾与阿斯特拉罕案件有牵连的人表示反对的话,那么我就会侮辱全会,在我之前发言的人,甚至卡冈诺维奇同志。

有人喊:事情不是这样。不对。

李可夫:不,是这样,在支部里就是这样讨论的。

那么,我继续读。(宣读):“说我们反对五年计划是谎言。说我们反对所采取的工业化的速度是谎言。”

有人喊:那《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呢?

瓦列伊基斯:那你们的三年计划呢?

李可夫:第一,没有过任何三年计划,第二,在人民委员会里和在政治局里也采纳了我对五年计划、对今年的控制数字的建议。报告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人民委员会里提出了五年计划的两个方案——最佳方案和起步方案,是我提出了取消起步(最低)方案建议的!(宣读):“说我们反对现在的集体化速度是谎言。说我们反对建设国营农场和所采取的这一建设的速度是谎言。说我们反对同富农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谎言。”

我们坚决拥护工业化及所采取的速度,拥护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所提出的速度。我们赞成对富农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赞成依靠贫农,大力组织他们反对富农,赞成同中农的巩固联盟。我们反对的是‘作为长期方针’的非常措施。

9. 指控我们说过农业的退化,顺便指出,这个指控也遭到斯大林同志的驳斥,他说,提出退化危险的问题,像布哈林同志所做的那样,是‘合乎规律的’(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的讲话)。”

柯秀尔:有点不是这么回事。

李可夫:“指控我们提出了无产阶级同农民分裂的论点是夸大其词。我们说过分裂的危险和这种危险有可能增加;我们从未预言粮食进口‘不可避免’,而是建议把粮食进口作为最艰难(从粮食危机的观点来看)月份里为避免非常措施而采取的有限的临时办法;我们谁都从未宣扬迁就‘薄弱环节’;我们中间有人指出‘薄弱环节’,完全是为了克服它们;指控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更是不能令人信服:我们赞成为发挥无产阶级的创造力创造尽可能更好的条件;因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展作为无阶级民主基础的自我批评,主张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和吸收尽可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整个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战线的积极斗争。

10. 对布哈林同志‘厌恶阶级斗争’、‘低估富农—耐普曼分子的反抗力量’、‘反列宁主义的富农长入论’、‘不懂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等指控完全重复列宁格勒反对派 1925 年对整个中央的指控。对所谓“四人政纲”陈述的一切指控,那时政治局由自己的多数成员(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同志)签名在两个由反对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签署的专门文件中作了详尽的回答¹⁵⁹。

对于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说他(其他同志也同样)有‘忘记阶级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的指控,政治局的文件回答说:‘这是故意撒谎。所有同志的发言,包括受攻击最猛烈的布哈林的所有发言都清楚、准确和坚决地指出了发展的矛盾和对抗性质、资本主义成分不可避免的增长、这些倾向的斗争和由此产生的危险等等。’¹⁶⁰(《关于四人派别政纲》)。

接着,这个文件作了下述总结:

‘政纲的作者们抛出这些可笑的诽谤表面上是反布哈林,实际上是反对中央的。’

11. ‘长入’的提法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以后写进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决议¹⁶¹的,这个提法本应仅仅表明‘第三次革命’是不需要的,但它可能被错误地解释成为排除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可能性的说法。因此,尽管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都曾维护过这个提法,但现在它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在上一个发展阶段,商品流转方面的合作社是农村公有化的主要形式(布哈林同志曾经谈过这一点),在机器拖拉机站‘创办’以前,集体农庄起不了现在这样的作用。然而,正是集体农庄现在是主导整个农业的因素。因而,从前的说法历史地消除了,它们过时了,没有人再坚持它们。根据 1925 年的引文对布哈

林同志的攻击更加不能容忍,因为众所周知,布哈林同志是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转向反对富农的倡议者之一。

因此,无论报纸和决议对我们观点进行的陈述还是评论,我们都无法赞同。我们决不认为自己是右倾的代表。

12. 尽管我们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为进行派别活动(这种指控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一指控)和对我们使用了不能允许的斗争方法,我们声明,在任何条件下和不以中央全会将对我们作出的那些决定为转移,我们将处处严格执行党的决议,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推上集团或派别斗争的道路。我们坚决反对并将对利用我们的名义反对党的路线的任何企图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在任何意义上把我们的名字同非法传单联系起来的卑鄙诽谤。

同志们,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谈我们最近遭受的那些十分卑鄙下流的侮辱(‘滚向西西斯主义’、‘阿斯特拉罕案件的思想家’等),对它们我们没有回答。我们不想谈这些。我们陈述了我们对国内当前形势的看法。我们也十分坦率地提出了我们经济生活消极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十分坚决地为克服这些消极方面而奋斗。我们得出的总的结论表明,我们的分歧在消除。当然,我们可以只声明分歧消除就行了。然而,我们宁愿详细地说出一切,其中也包括我们真正的错误,以便让所有的同志准确了解我们是怎样得出我们现在在这里陈述的结论的情况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文件只是一个在形式上表示忠诚的文件。我们始终反对成立派别和集团,我们过去既不是集团,也不是反对派,将来也不会是。我们始终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和对党有利的东西,而且只是在我们是其成员的党的机关内部。我们现在发表这个声明,也是在这样做。宏伟的改造任务、我们党现在身处其中的伟大战斗、尚需克服的极大困难、同阶级敌人的极其尖锐的斗争绝对要求我们党的队伍最大限度地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因此,尽管我们受到不应有的攻击,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放弃一切论战性的反驳并再次表明我们愿意在党的全部决议的基础上以全部精力为解决党所面临的极其困难的任務而奋斗。

1929年11月12日

M. 托姆斯基 H. 布哈林 A. 李可夫。”

主席:现在请谢尔戈同志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我想,全会本有权期待一份比在这里宣读的政治上更诚实的文件。

柯秀尔:对!

奥尔忠尼启则:真的不应该向全会宣读这样一个文件,它从头到尾是……
喏,怎么说得委婉些呢……

有人喊:难呀,谢尔戈!

奥尔忠尼启则:如果我可以说心里话,我就会说:这是一个骗人的和有失中央委员会委员体面的文件。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过去一年半期间,在工业发展速度、农业改造、使农业转入社会主义轨道等这些存在十分深刻分歧的问题上,中央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同志及他们的其他同伙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在这之后是否真的可以面对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言,而不坦率和诚实地说谁对谁错呢。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可他们在这里发言,并且说,似乎过去的一切分歧都归结为他们曾经反对非常措施制度,仅此而已。对不起,问题不在这里。从未有人建议把非常措施制度化。那是关于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问题。现在你们说,我们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是的,我们的成就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你们应当在党的面前诚实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成就都是违反你们的政治处方取得的。这才是你们应当坦率和公开地说的话。

柯秀尔:对!

奥尔忠尼启则:这没有什么。如果你们真想诚实地、高尚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以党性的态度行事,就像你们自己在你们声明的结尾所说的,为了克服一切困难需要党的钢铁般的团结一致,需要铁的纪律,你们愿意做到这一切,如果你们说这一切是认真的,如果这不是我们不止一次从这个讲台上听到过的同党斗争的老一套的派别方法;那你们就应当说:“同志们,我们不只像你们说的那样有点低估……”等等,等等,而且你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党之幸运,国之幸运,我们不得不声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体系,我们过去所提的摆脱我们一年半之前处境的那一切建议都是错误的;党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解除武装并且说:再不会有这种事情。”

这才应当是向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这样的声明是会受到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高兴地欢迎的。可你们刚才向我们宣读的是什么东西呢?去年或今年就有过分歧,分歧在于,是低估还是高估了党的能力,还有关于非常措施之类的东西。不,这样是不行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们认为,我们工业建

设的速度太快,这是国家力所不及的。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还有布哈林的“著名”论文《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¹⁶²,其目的是主张应当迁就薄弱环节;砖就是薄弱环节,砖不够,我们就无法进行建设,因此就应当收缩工业建设。这就是所谈的问题。接着就提出了出口和进口的问题。但愿布哈林同志不要忘记,他曾多少次建议进口粮食,因为他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进口粮食,就不能进口设备,因而就应当收缩工业建设。你们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另一个问题。关于农业的问题。李可夫同志宣读声明的时候,我插话说,布哈林在上一次全会上不是这么说的,他回答说:“我要让你看看,你在这次全会上说的也和上一次全会上说的不一样。”喏,同志们,对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没有人要求你们在每一次全会一字不差地重复你们在上一次全会上说过的话。要是那样的话,那就请你们把以前的记录拿来宣读就行了,我们也就用不着来开会了。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粮食不够,农业发展滞后,摆脱这种已经形成的困境的出路何在呢?同志们,你们把希望押在个体农民的发展上。你们把希望押在应当设想富农发展的可能性上,并说这样做没有特别大的危险。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等两三年,当我们在工业方面站稳脚跟,富农也会得到发展,他们将拥有粮食,他们将向我们提供粮食,然后他们将长入社会主义或者我们将向他们施压,——你们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我手头上没有这些同志的讲话,但是大概你们都记得乌格拉诺夫同志在上一次全会上的讲话,记得他在那里说了些什么。他说:“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问题现在也清楚地摆在面前,因为甚至按照五年计划”(按照那个你们认为无法实现的五年计划,所以你们就提出了一个两年计划)……

有人喊:对。

奥尔忠尼启则:(甚至按照五年计划,)乌格拉诺夫同志断言,到这个五年计划末,来自公有化成分的商品粮将只占40%,其余的部分将来自个体成分。怎样摆脱困境呢?他又一再把希望押在个体经济上。

现在结果怎样呢?现在李可夫同志声明说,这结果不完全一样。是的,对,李可夫同志,这不是你们想要的结果,而是党所说的那样的结果。现在的结果是:今年,1930年,我们应当从公有化成分获得大约45%—50%的商品产量。

再看看你们对国营农场的态度吧。谁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与弗鲁姆金丝毫没有区别?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李可夫也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谈这一点。

布哈林:明显的谎言。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真正的实话,布哈林同志,如果你现在不承认这一点,说没有过这事,否认你曾经十分担心地看待国营农场的发展,你曾经说过,不应匆忙地建立国营农场,应当进行试验,应当小步前进,如果你现在说,这是谎言,说你从未说过这话,这就表明,你现在不敢重复你一年前说过的话。

有人喊:对。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整个前进运动是违背你们的预测和指示进行的。

其次,关于工人的情绪你们说了些什么呢?你们是如何评价工人阶级中间正在开展的那个非常伟大的运动的呢?关于这一点你们在自己的声明里是怎样写的呢?你们没看见表现为社会主义竞赛、突击小组等的工人阶级那种巨大的热情。你们曾经写道,工人阶级中间对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不满及不信任在日益增长,而那时正在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对此视而不见,对这一切闭口不谈。

你们说过,工人阶级对我们表示极大的冷漠。在自己的声明中,在自己很不像话的声明中,在你们的宣言中,你们指责党在培植官僚主义。你们在这个声明里的话同托洛茨基的话毫无两样。

[米高扬:比这更可耻的文件我没见过。]¹⁶³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同志,您在摇手!不高兴了?现在就可以把你们著名的文件要来并宣读。接下去,你们说过,国家被弄到闹饥荒的地步。饱汉不知饿汉饥——这话是谁说的?这是您的话,布哈林同志。这就是过去所谈论的问题。只要你们不想明天再开始反对党的斗争,现在就应当在这个讲台上发言,不说你们过去说过的话,而说,在我国国民经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一个困难的关头,你们,同志们,胆怯了,没能同党站在一起克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困难,现在你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站到党的前列。现在你们看到,一切都在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你们想要参加进来——请来吧并坦率、诚实、高尚、公开地说:“是的,是我们错了。党是对的,我们来同你们一道工作。”而你们今天宣读的那个文件毫无用处,不仅如此,这是一个继续派别斗争的文件。

喊声:对。

奥尔忠尼启则:你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也不会相信你们说的我们中某人某时曾指控你们制造了“阿斯特拉罕案件”。你们会说,报纸上什么地方写过。可能报纸上写过。我们报纸上写的东西还少吗?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曾经进行过争论——我同意总路线,但不同意这条总路线的实际执行。

有人喊：决议是一回事，而工作是另一回事。

奥尔忠尼启则：是的，决议是一回事，工作是另一回事。情况是这样的，布哈林同志，我们总路线的目的就是发展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和加快工业建设的速度，而这条你们不赞成和不承认的路线的实际执行使我们获得了集体农庄的极大发展、国营农场的极大发展和使我们工业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速度。

布哈林同志，请回忆一下去年的一件事，当我们同你们一道编制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的委员会¹⁶⁴里是否发生过关于速度的争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是否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速度，应当怎样理解速度，到什么时候我们产品的增长率将达到20%—21%？

当时我们对李可夫同志说，当我们前几年支出的费用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高速度。现在请看一看，你们所不赞成的我们的实践给了我们怎样的速度？30%—40%—45%。事情就是这样，布哈林同志。应当承认这一点。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你们就不会使任何人有任何可能性对你们的声明抱一点信任的态度。你在摇手？不喜欢？毫无办法，无论你怎么改变话题，事情仍然是老样子。〔依我看，声明的第一部分使我想起的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不如说是记述往事的编年史家涅斯托尔。说的不是这个问题。〕¹⁶⁵

同志们，正在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不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国营农场、一个工厂都不会有，不进行斗争，什么都不会有。最近一年半你们，右倾的同志们，未能在这一斗争中与党同步前进。

再拿关于新的专家的问题来说，难道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分歧？

米高扬：夜里曾经召开过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

奥尔忠尼启则：完全正确！沙赫特事件¹⁶⁶之后，根据您的倡议夜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有人总想向我们灌输，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有人给我们带来了一大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的摘录，想用这些摘录说服我们。不仅如此，还想以此吓唬我们。但是应当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说过，如果发生沙赫特事件，如果军事工业、冶金工业和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发生破坏活动，就一定要抓住这些破坏分子，抓住所有这些歹徒不放并证明，没有他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布哈林同志，请告诉我，我们今年采取的这个工业发展速度，你们去年赞成这种速度并认为实行这种速度是可能的吗？不。你们认为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以便不向农民施加压力。你们赞成减少设备进口，因为这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所以你们去年赞成压缩我们的基本建设，而

我们赞成更大地加快这些速度。今天让你们看看,这就是今年的成果。这些成果迫使你们在这个讲台上发言说:又想要,又怕扎,妈妈又不让。不能这样。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被生活打垮了,党胜利了。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我们原来就对此深信不疑。没有一个反对派像你们失败得这样快。如果你们不想得到一切反对派所得到的那种可悲的下场,如果你们不想可耻地离开党,那就请站出来并诚实地说:我们错了,再也不犯了!(鼓掌)¹⁶⁷

主席:现在请布勃诺夫同志发言。

布勃诺夫:在座的人都不是政坛上的新手,因此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对于整个全会都十分清楚,如果布哈林集团不想在这个全会上发表一篇声明,坦率、公开、诚实地放弃自己受到党谴责的立场,那它当然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它选择的那条道路,在这里发表了一个由李可夫同志宣读的文件。

谢尔戈同志已经对这个文件作了基本的评价。谁都不会怀疑,在出席全会的人中间会有人不同意对这个文件的这一完全正确的评价。四月全会以后我们已经两次演说,它们再一次证明了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我们有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在那里重又提出了自己“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在现在这个11月份的文件里对此只字未提。要知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在对现代帝国主义的评价方面滑向了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它助长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声威。我认为需要提醒你们,列宁当时在为布哈林的小册子写的序言里说,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的公然的决裂”采取的是幻想较为和平、较少冲突、较少灾变的超帝国主义的形式¹⁶⁸。

布哈林:这是文不对题。

布勃诺夫:就在这篇序言里,列宁说,考茨基的愿望是“回避”激烈的任务。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因为布哈林的理论掩盖着布哈林明显机会主义的意图:“回避”当前国际形势真正激烈的任务,遮盖和掩饰“第三个时期”特有的那些十分激烈的政治冲突和阶级矛盾。在李可夫宣读的文件里对此只字未提。要知道,这个问题,如你们自己所理解的,对于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不是小事。这是国际问题方面。

其次,关于声明中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提法,谢尔戈同志已经说了,可以从同一个布哈林不久前的发言里举出与李可夫同志向我们宣读的东西有明显和直接矛盾的无数引文,而文件又没有宣布放弃它们。李可夫同志宣称,“我们从未反对过五年计划”,我来提醒你们,半年以前举行的中央四月全会上,不是别人,正

是布哈林说过,在党所进行的“实践”的情况下五年计划“将被变成一纸非常漂亮的空文”。在那里就是这么说的。

柯秀尔:还说我们在超越一整个阶段。

布勃诺夫:一纸漂亮的空文,仅此而已。这是4月份的事。而在11月份,李可夫走到讲台上宣称,从未有过这事。右倾分子应该记得他们自己不很久以前说过的话。但要知道,这远不是全部。请听一听,还是那个布哈林在四月全会讲的话。他说,“我们对农民基本群众没有足够正确的态度”、“本来还应长期作为我们主要形式的联盟的基本形式被破坏了”,其次,中农经济是“生产动力”被压制了的经济,等等,等等。关于这一些,文件又是半句未提。似乎这一切“预言”也没有过一样。

喊声:对!

布勃诺夫:其次,对于“未来的”(即现在的)粮食收购运动布哈林发出了怎样的总的“预报”呢?布哈林同志预言,我们今年成绩卓著进行的、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粮食收购运动会遭到彻底的失败。他是怎样描绘今年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呢?他说,“开始我们将取得成绩,以后将是下落的曲线”,而且他还补充说,“这将是比今年更坏的曲线”。

柯秀尔:下落的布哈林。(笑声)

布勃诺夫:还是在那次四月全会上,布哈林说过,我们现在处于“绝境”之中。他说,“应当设法从里面走出来,应当从里面跳出来,应当从里面爬出来”。在这里说明工业发展的时候,他强调说,“这个无产阶级坐在里面的整个庞然大物像是一架飞机,刚飞离地面一点,马达就有停车的危险”,就是说,他“预先决定了”我们建设的失败。

所有这些发言都充满着腐朽的悲观主义、对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完全缺乏信心。在这一切之后,就是这些人在发表一个可笑的、虚伪的、伪善透顶的声明,对这一切根本只字不提,似乎构成一条特殊路线的这些预报、预言、估计、处方完全都没有过一样。用这种声明是不可能党内建立和平的,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声明。最近几年看到过不是一个反对派,而是几个反对派,他们全都采用发表长篇大论的愚蠢手法。如果你想放弃反党立场的话,有非常简单的办法,这就是: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玩诡计地说:“我干了许多蠢事,干了许多荒谬的事,现在我确信这一切全都是错误的,我放弃。”我们过去曾经有过这种不错的风气。

斯大林:有过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但现在他们少了]¹⁶⁹。

布勃诺夫:我不太方便援引个人的情况,但是我应当说,1921年同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我必须进行选择:或者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副报告,或者手持步枪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当时我不管这事,拿着步枪就去了喀琅施塔得的冰上。

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对!

布勃诺夫:也有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次,请允许我提醒你们第二件事情,1923年末我签署了46人声明¹⁷⁰,而顿巴斯之行以后我看见我大错特错了的时候,我没有写长篇的声明,而在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当天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给我打了电话并根据这篇文章作出结论,认为我那个时期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斗争已经结束,画上句号就完了,清清楚楚。]¹⁷¹这样,同志们,为什么过去这样做是可能的呢?而现在,从托洛茨基反对派开始,我们这里就采用发表长篇声明的办法,其目的只有一个:绕弯子,兜圈子,消灭痕迹。应当结束这种做法。党内不会由于这种声明而有和平。当然,右倾派别分子同志们现在完全被逼到了墙角里,因为取得的极其伟大的成就就摆在面前,冲不过去,因此他们就……“迂回前进”。这个文件是一个耍手腕的文件,这不是诚实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家的文件,而是一个闪烁其词、虚伪、伪善的文件。

其次,在我看来,李可夫同志虽然已经很迟了,但毕竟想起来了,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十分深刻的变革”、“转折性的一年”、“新的时期”等等。我们手里有一份他不很久以前写的、被政治局认为不合要求的提纲¹⁷²。这是四月全会以后右倾分子的第二次行动。

有人喊:那里面也顺带地谈到了右倾。

布勃诺夫:关于右倾那里是在最末尾的什么地方谈的,追——也追不着,找——也找不到。请看,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文件里是怎样评价这个“时期”的:“国家,——他写道,——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怎样的时期呢?请听:“进入了探索 and 实际大规模运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去克服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时期。”“探索 and 实际运用”!这说得太精彩了!

有人喊:这已经不是兔子,而是狐狸了。

布勃诺夫:我认为,如果右倾分子想同党一道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想结束自己的一切动摇,他们就应当立即发表这样一篇为我们和全党理解为真正放弃他们过去所持立场的声明。李可夫同志所宣读的文件是毫无用处的。

我还应当请你们注意涉及文化建设的一些问题。在提交全会的关于控制数字的提纲里有一段是关于文化问题的,其中说,1929—1930年度应当是“整个社会文化工作战线同经济建设新的数量和质量任务坚决(那里是这样说的)看齐的一年”。这样写是对的,但我应当告诉你们,这里所写的东西最好在提法上能改得更尖锐一些,因为我们在经济建设拨款和文化项目拨款之间至今仍有明显的不相称。

有人喊:对!

布勃诺夫:格列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自己的报告里关于这个问题几乎什么也没说,要知道,他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并为之辩护。

[米高扬:批反对派喊得失声了,对于文化就没有嗓子了。¹⁷³

奥尔忠尼启则:他自己有文化修养,他就满足了。]¹⁷⁴

布勃诺夫:同志们,其次我应当告诉你们,国家计委……

有人喊:愚弄了你们。

布勃诺夫:(国家计委)去年就向我们许诺,将拨给文化建设足够的经费。可他们在今年的控制数字序言里从文化的角度对去年进行评估的时候,却这样写道:“在文化建设的实际发展方面,过去的一年不是转折性的一年。今年才只是出现了文化革命进一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你们写的东西。去年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如决议所说,是转折性的一年,可你们自己确认,在文化措施方面它不是转折性的一年,即存在着落后,明显的不能允许的落后。不久前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从伏特加酒的收入中拨出1亿卢布给文化事业的决定¹⁷⁵。这项决定是对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通过的,而结果是我们这1亿卢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被人据为己有了。

有人喊:不是全部,不是整整一个亿。

布勃诺夫:其次,俄罗斯联邦文化五年计划里有12亿卢布赤字。这些赤字应当由联盟预算的补贴抵补。已经是五年计划第二年了,而补贴没给,赤字还在。这是中央预算。再看地方文化预算,几乎所有的国民教育处长都指出,地方文化预算的增长照例都落后于地方预算的总的增长。这就是我们因此而得到的结果。就以北高加索为例吧,用于社会教育小学生的所谓助学金保障,即用于供给工人子女衣服、鞋子和热早餐的费用,我们罗斯托夫总共只有1万卢布,而整个边疆区共有12.7万卢布,而且就是这个数字也还不是最终数字,它有可能被削减。在西部州,今年普及初等教育计划只有60%是有保证的,即甚至(八年

制)头一年的覆盖面 1933—1934 年度也将得不到保证(按最低方案)。再请你们看看中央黑土地带州,关于这个州,瓦列伊基斯说过:“我们给你们土豆”;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给的土豆,但让瓦列伊基斯注意自己的文化预算,因为他的州是个农民的州,是个十分愚昧的地方。甚至像莫斯科州这样一个富裕的州,今年文化预算的增长也快于总的预算(莫斯科州的整个预算增加了大约 12%—15%,而文化预算增加了 16%—18%),因为莫斯科州有一些这样的工人区,那里由于名额缺乏工人子女并不总能被接纳入学,那里由于政治教育工作薄弱阶级敌人组织私刑,等等。我只列举了几个州为例。我不打算谈其他这类问题,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文化工作,关于工人新区的文化工作,这里文化建设也有很多缺点和巨大的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当然,我们必须同你们一起在这里斗争,以便给教育应该给的东西。但你们自己在自己的地方预算里应该竭尽全力,无论如何要为文化建设找到资金。工人区、农村的社会主义成分都要求这样做。请注意,1928—1929 年度我们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要知道,这就碰到了工人群众文化水平低的难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论合作社》一文里说过,文化革命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它遇到的是“纯粹文化方面”的障碍,遇到的还有我们文盲多,以及物质方面的困难,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¹⁷⁶。这个“相当的物质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它正在不断壮大。不仅如此,现在造成我们描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历史阶段”的这一形势的那种巨大的变革坚决要求文化建设成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真正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不落在它的后面,随着需要的增长而发展。文化事业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脱节现象应当被消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最后,我想谈谈有关狭义的物质基础的问题,即我想称之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级的”工业部门。我想,除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外,我们应当再建立一个为满足文化措施物质需要的第三部类工业部门。

有人喊:不能把它们放进两个部类里吗?

布勃诺夫:我不反对把这些部门转到第一部类里去。我说的是造纸工业、印刷工业、电影工业和无线电工业。我应当在这里代表教育人民委员部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几点要求。请看造纸工业。整个第二部类今年增加 24%。

有人喊:30%

布勃诺夫:不。整个工业增加 32%,重工业增加 46%,第二部类增加 24%。

而造纸工业总共只增加 16.4%，而且，如果你们看一看前两年，你们就会看到一条下降的曲线。我提请你们注意，我们各类纸张——卷筒纸、平板纸、印刷纸、书写纸——的情况都非常糟糕。

丘巴尔：特别是笔记本。

布勃诺夫：这一点你们都应当知道。而且，我特别提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注意，现在我们有三台为报纸生产纸张的大造纸机：一台在坎达波格，一台在列宁格勒，还有一台在巴拉赫纳。现在正在巴拉赫纳安装第二台机器（年产纸 3.6 万—4 万吨）。这台机器的情况如下：这台机器的 80% 的设备已经运到，厂房已经建好，机器底座已经有了，母线已经装好并浇灌了混凝土，配备了两台电力起重机和混凝土水槽，但还缺少 20% 的设备。因此，机器 8 月 1 日前，也许 5 月 1 日前才能开始运转。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尽一切力量，使这台机器从 5 月 1 日起运转起来。告诉你们，到那时我们将增加 3 000—5 000 吨卷筒纸，因此我们就能使许多地方报纸每周不间断地出版。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印刷工业。我们的印刷工业处于绝望的境地。

1929—1930 年度印刷工业预计总共只增长 16.2%。又低于第二部类的平均增长水平。如果拿最近三年来看，又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有人喊：也缺乏印刷机的生产。

布勃诺夫：印刷工业不仅需要大力加强对它的投资，而且需要对其进行改组。请看，我们拥有什么。例如，就拿德国和我们相比吧。德国有 2.3 万台高速平板印刷机，而我们总共只有 3 500 台；德国有书籍轮转印刷机 2 180 台，而我们总共只有 50 台；德国有排字机约 9 000 台，而我们只有不到 500 台，此外，我们机器的磨损率很大（排字机——32%，平板印刷机——42%，轮转印刷机——38%。这是印刷委员会的数据）。印刷工业组织被分割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3 万工人，各个出版社——1.7 万工人，“其他”有 2.8 万工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提出印刷工业的集中、加强投资和整顿的问题。

有人喊：那教育人民委员部将干什么呢？

布勃诺夫：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的事情就够多的了，而我作为你们派到这个工作岗位的人，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让它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这一工业部门搞搞好。计划很简单：重新装备，进行新的建设、印刷机器制造和改变结构。

关于无线电。我们无线电的发展仍然微不足道，在西欧平均每 1 000 人有 31 台无线电收音机，而我们只有两台无线电收音机。

其次是电影。这是一个聚宝盆,也是文化方面最重要的工具。而我们至今没有自己生产的胶片。直到我们有自己的电影事业原料之前,我们就无法在电影业方面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前进。

我提请你们注意高等技术院校实验室设备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和教材低劣的情况。要知道,对于国民教育这也是物质基础(在这个词的狭窄的意义上)。在实验室里,我们的计量容器、瓷坩埚等数量不够。要知道,没有这些器具就培养不出技术员和工程师。制图仪器的情况也很不好。要知道。这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事情。我提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对这些服务于文化需要,又构成文化革命物质基础的工业部门给予坚持不懈的注意,为了文化建设,亦即为了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快的发展,应当认真地抓一抓这些部门。

主席:我们决定今天结束讨论和听取总结发言。但是,由于出现了新的提纲,看来我们只好修改自己的决定。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讨论,但仍然这样打算,我们明天结束这个问题。

有人喊:明天晚上。

主席:有没有反对意见?现在请允许我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以后)

主席:现在继续开会,请科托夫同志发言。

科托夫:现在正在进行改造我们整个经济的伟大建设,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动员自己的力量在国家工业化和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很快的速度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我们经济得以顺利发展和继续前进的基本条件应当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意志,而主要是我们党的队伍及其中央的团结一致。整个这种统一意志的目的应当是执行党的总路线。

在最近一次四月全会上我发言说,中央的决议对于我是必须执行的,我将最认真地执行中央的决议。四月全会以后我确实也这样做了。在自己的全部实际工作中,在自己有机会发言的地方所作的全部发言中,我最认真地进行了发言和执行党的路线。但同时,同志们(我现在不能不说这一点),在执行路线、在作正式发言的时候,我内心里感到有一些动摇,感到有点沮丧。如果我真想认真执行党的决议,我就不能不在这里发言,就不能不说这一点。

奥尔忠尼启则:对!

科托夫:毫无疑问,过去感觉到的这种内心的动摇和沮丧,现在弄得越来越清楚了,仍然是在我们党的路线的基本问题上,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和我国工业化继续发展的速度问题上。这样,尽管我过去精力充沛地发言,我有时善于这样发言,我仍然向自己提出问题:这里有没有过火的地方,这里有没有歪曲的地方?也许,路线确实是正确的,而方法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内心里仍然有怀疑:这样做正确吗?我曾长久地思索这一切问题,终究还是得出了结论:事情的本质不在于有这些或那些缺点,问题不在于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触犯谁多一点,触犯谁少一点,或者打击谁更厉害一点,拿走谁的更多一点,问题在于,如果让这些存在的动摇保存下来,那么毫无疑问,问题就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动摇,而是路线的问题。如果让这些动摇保存下来,那就应当解决:怎么,这些动摇会引向哪里?对这一点反复思考的结果,我个人得出了结论: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党的路线问题,就摆脱不了这些动摇。

有人喊:对!

科托夫:我个人认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历次中央全会采取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真的,应当执行这条路线。最近一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实践打破了我的一切动摇。我承认,我错了。从政治观点看,我的动摇是错误的,对我们在其中展开建设、真正从根本上改造我们整个经济的条件估计不足也是错误的。我们快速改造我们的工业并在这一改造的基础上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个别一些同志,可能还有个别一些组织有许多个别的缺点(对这一切不能装看不见,这一切都存在),农村里毕竟在创造宏伟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对整个农村进行真正的改造,真正在挖资本主义的根。确实,我们正在抛弃祖先传下来的管理经济的方法。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借助机器和组织,同我们农村中存在的因循守旧、落后和不开化进行一场非常伟大的斗争。完全可以理解,党坚决进行的我们这项工作自然地激起了疯狂,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激起了富农十分激烈的斗争和部分富裕农民的反抗。富农也成功地把农村的非富农部分拖入了这场斗争。

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加紧进攻和对整个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这些人中间的动摇客观上在加强这种右倾的危险并帮助其形成。

有人喊:对。

科托夫:所以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同右倾危险、“左”倾行为及对它们的调和态度进行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执行这条路线是为了党的利益,是为了我们整个

经济继续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继续巩固的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要求进行紧张建设的统一意志的利益,是为了无产阶级动员农村贫雇农、联合中农进行这一建设的利益。在个别问题上曾经有过一些动摇和分歧的所有同志应当发言并客观地说,有过这些动摇。可能,当同志们有这些动摇的时候,并未考虑到,这些动摇会导致更大的分歧。根据党同一切反对派斗争的实践,起初很小的动摇在实践中总是导致党内更进一步尖锐化的斗争,实际上这可能会破坏我们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不需要模棱两可的声明的原因。应当发言并坦率、公开地说,不仅有过动摇,而且有过错误。特别是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同志应当发言并且声明,有过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承认错误,不会再重犯,我们放弃这些错误和自己的观点,以我们所有的全部精力和能力同全党和工人阶级一道重新担起重任,将同全党一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基础——社会主义经济而工作。(鼓掌)

喊声:对。

古比雪夫:好样的,科托夫。

主席:现在请雅科夫列夫同志发言。

雅科夫列夫¹⁷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十分满意地欢迎三位政治局委员的集团真正“撤销”分歧。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从李可夫同志嘴里听到的一丝一毫也不像是撤销分歧。不仅如此,当你听这种声明的时候,在这里真的会感到惊讶,怎么能在一个文件里聚积如此多的伪善、两面手法和欺骗。形式上这个文件是以表示同意党的路线开始的。有两个地方说到“撤销”分歧,而同时不久之前的那一些文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的声明¹⁷⁸却仍然有效,因为什么地方都没说撤销他们的签名,这几位同志在这些文件里表述了自己的被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斥责为“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的”观点体系。怎么会这样呢?这表明,我们在四月全会上讨论过、中央对其作出了相应决议的那些文件仍然有效,同时我们还应当相信声明“撤销”分歧的布哈林同志的真诚!新的声明宣布,它的作者从未反对过党的总路线,他们只是拥护执行总路线的“特殊方法”。如果这不是布哈林想以他的观点与总路线完全一致、争论的只是执行这条路线的方法为借口,保存自己原先的立场(尽管它们已经完全破产),那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声明呢?那拿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定、同一次全会《关于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的决定¹⁷⁹怎么办呢,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怎么办呢?显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以为,可以到我们全会上来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没有过昨天,它消失了,整个

一年消失了,没有过任何特殊的路线,只有过关于路线执行“方法”的争论,还有关于非常措施是制度或不是制度的争论。只要在这里把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宣布为“从未有过的”东西同他们在四月全会上和这次全会前所声明的东西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到,像今天这样如此虚伪的文件甚至在托洛茨基同党“耍手腕”的时候我们也未曾有过。

今天李可夫同志声明说:“我们从未拥护农业退化的理论。”曾几何时又是何人说了下面的话:“是什么实际上决定了党在农村的下一步的政策呢?是斯大林关于贡税的讲话。”¹⁸⁰“农民将逃离”农业领域,“逃到随便什么地方——马车运输业、手工业、城市、建筑工程,去随便什么地方,但是他们将不再种粮食”(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89页)。这是谁说的?

柯秀尔:你说,是谁说的。

有人喊:据说,是普希金。

雅科夫列夫:或者,也许农民不再种粮食这不叫“农业退化”?其次,下面的话是谁说的:“春天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实施计划彻底破坏了形势”?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84页)。这是谁说的?

有人喊:是塔拉斯·谢甫琴科。(笑声)

雅科夫列夫:如果农业领域被彻底破坏了的形势不是“退化”,那什么才叫退化呢?“我们农业的基础,越冬作物和春播作物,明年的情况将比今年更糟。”(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布哈林的讲话,第89页)。

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懂得:农业退化意味着农业基础今年比去年恶化。那拿李可夫同志关于他和布哈林同志似乎从未拥护农业退化的说法怎么办呢?最后,如果不认为农业形势彻底恶化、农民逃离农业和农业基础恶化等是农业退化,那么农民停止购买机器至少是退化的相当无可争辩的征兆了。而布哈林同志那时预言,“农民将不购买”生产资料,“因为使用它们不合算”(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90页)。为了更清楚,布哈林同志在速记记录中给“使用”一词加上了着重号。实际上是,尽管我们对富农不仅使用了非常措施,而且简直是在数十个方向上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今年所有的生产资料都非常顺利地分配完了,我们只得把产量增加了将近一倍,并且暂时还没有听到抱怨,说我们为农业生产的机器太多了,由于农民不愿意购买有什么地方机器过剩了。富农确实减少了购买。但是在我国,除了富农之外,有的是机器买主。在粮食收购方面,布哈林同志也什么都预见到了:“初期粮食收购将顺利进行,而

后将出现比今年‘更坏’的曲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89页)。

有人喊:对谁更坏?

雅科夫列夫:这你们在第89页上可以找到。“缺粮的情况将会加剧。”(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9年2月9日联席会议,第76页)

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要知道,总得有一点良心,怎么也得使前后一致!要知道,如果你们现在出来说,总路线只有一条,分歧只在于实行路线的“方法”,那你们为什么那样估计我们实行路线的方法的后果呢?你们想把你们同党的分歧描绘成类似共产主义科学院¹⁸⁾里辩论材料的某种东西。

有人喊:是科学院里。

雅科夫列夫:但这你们办不到。过去和现在辩论的是我们应当走什么道路,而且争论的题目是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

现在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宣称,他们从未反对所采取的工业化的速度。这是他们在清楚了我们有能力在今年把基本建设规模比去年加大一倍之后,现在才这样说的。正是布哈林同志今年1月宣称:“我曾经预言,如果没有(也不可能用一年生产出来)建筑材料,给予拨款是荒唐的。”(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9年1月30日联席会议,第18页)。这就是说,当去年的结果还不清楚的时候,预言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荒谬的布哈林同志作为预言家那时是正确的,而现在,当去年的结果已经摆在面前,布哈林同志又想以永远支持工业化的预言家的角色发言。这办不到。

现在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宣称,指控他们反对所采取的集体化和国营农场发展的速度似乎是诽谤。显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声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5—10年以后才会提供所需要的粮食,而我们现在就需要摆脱粮食的困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9年1月30日联席会议速记记录,第20页)。结果是,按照布哈林同志的意见,我们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同现在就需要获得粮食的任务是相矛盾的。这就是说,布哈林同志建议我们在获得粮食和发展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之间进行选择。

我就不向他们提醒他们关于分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央似乎在使党官僚主义化、关于党实际上真的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等等的声明了。因为十分清楚,如果我们的政策过去使得农民必然不再种粮和停止购买机器,如果因为没有建筑材料我们给建筑业大量拨款是错误的,如果需要在粮食和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前几个月的全部问题都归结为以任何代价摆脱困

境,那么,现在怎么能够以骄傲的姿态走出来,在这里宣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过去疯狂反对那全部政策恰恰是他们曾经提出的那种政策,要知道,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而且要知道,布哈林同志自己也丝毫没有否认,他曾经提出过另外的政策,相反,他还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应当“完全以另外的方式提出我们与农民基本群众的关系问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9年4月,第91页)。“完全”一词不是我用声音强调的,而是布哈林同志在修改速记记录时在文字中加了着重号的。这就是实情。这就是整个问题的重心。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有同党的路线对立的另外一条竞争的,完全另外一条路线,如我们在上一次全会上决定的那样,一条“与党的总路线不相容的”路线。遗憾的是,这条路线仍继续存在,因为表述这条路线的那一切文件还在,上面的签名没有撤销,只是由于明显没有可能再一次公开重复那些旧的卑鄙勾当,现在右倾领袖们想要像托洛茨基分子屡次所做的那样,假装宣称“撤销分歧”,暂时退却,进行机动,把自己的队伍撤出战斗一段时间,以便同时保存先前的全部反党武器不受损坏。

为了看得清清楚楚,所谈的问题正是观点体系,还应当回忆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布哈林同志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就是他的《政治遗嘱》¹⁸²,在里面他把自己的计划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在里面他把自己的发展农业的计划同列宁的发展农业的计划对立起来。我觉得,总的说来我们至今对这篇《遗嘱》估计不足,因为这篇《遗嘱》里所有的东西是与列宁合作社计划的全面公开的决裂。

斯大林:请您说,这是谁的遗嘱,否则许多人不清楚。

雅科夫列夫:是布哈林的遗嘱。(笑声)

斯大林:没有这样的遗嘱。

雅科夫列夫:是布哈林的一篇讲话,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但实际上这不是列宁的遗嘱,而是布哈林的反对列宁的遗嘱。请看他是怎样陈述列宁的计划的。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为了实现合作社计划(这是他的陈述,布哈林是这样陈述列宁的),需要进行文化革命,因为为了实现个个参加合作社,首先要使合作社工作者文明地做买卖。”(《列宁的政治遗嘱》)。他的第二个声明是:“为了使合作社通向社会主义,就需要有文明的合作社,为此就应当不按亚洲方式,而按欧洲方式做买卖。”(同上)¹⁸³。

这就是布哈林所作的基本的政治声明。合作社计划的整个问题和列宁的整个合作社计划被布哈林归结为首先学会“按欧洲方式做买卖”的任务,布哈林形

式上在重复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所说的必须学会做买卖的话,形式上几乎逐字逐句重复列宁逝世前写的文章语句,实际上却完全歪曲了列宁的计划,这是如此地清楚,未必需要长篇大论的证明。只要把布哈林的说法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理解的合作社计划加以对比就够了;只要把布哈林的话与列宁的文章表面上似乎被布哈林“引证”的那些地方加以对比就够了(过去伯恩施坦曾经同样“引证”马克思,而抽去了马克思著作的革命本质!)

列宁是怎么说的呢?“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第18卷下册,第142页)¹⁸⁴。

这样,在列宁那里合作制度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这一点在布哈林那里消失了。代替这一点的只剩下了一个任务:文明地、按欧洲方式做买卖。列宁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他所理解的以其为基础形成“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的合作社企业。“……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第17卷下册,第143—144页)¹⁸⁵。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生产资料公有制又是这种合作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请把这一点与布哈林的提法加以对比,布哈林提出的使合作社通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必须“按欧洲方式做买卖”。难道不清楚吗,列宁的改造农民经济、把许多人的小财产改造成为公有的合作社财产的思想在布哈林那里消失了。不仅是消失了,而且为完全另外的思想,即在合作社里学会“文明地做买卖”的农民经济,其中包括富农经济,机械地长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所取代了。布哈林对列宁的计划的这种解释与他的富农的合作社窝巢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难道还不清楚吗?

再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论文《论合作社》中的一段。列宁写道:

“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列宁:第18卷下册,第142页)¹⁸⁶。

十分清楚,列宁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他建议把做买卖的本领与之结合起来的革命气势和革命热情。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给这句话的后一部分加了一个附加说明:“这里我几乎要说。”可布哈林同志,而且不是在1923年,而已经是在1929年初在纪念列宁同志逝世五周年的讲话里,正当生产合作化的意义、建立

合作企业的意义无限增长的时候,又在做什么呢?他取消了列宁的话的前一部分。他不做像列宁所做的“我几乎要说”那样的任何附加说明。换句话说,建立合作社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的合作企业(合作社买卖)的方法之一,在布哈林那里几乎变成了目的本身。这样,他就从列宁的计划里抽去了它的真正的革命本质,它的基本内容,这种内容无可争辩地归结为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的合作企业的任务。

在这之后,难道我们无权把布哈林在他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纲领中的所有个别论断、被我们上一次全会斥责为右倾的那整个观点体系与布哈林对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陈述联系起来吗?布哈林提出这种陈述已经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制定我们发展的五年计划的紧张时刻,即正当党在前些年成就的基础上实际着手建立被称为集体农庄、劳动组合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大批合作企业的时候。正是那时候布哈林认为可以把在列宁那里作为可能会把庄稼汉带到有组织的公有生产资料的出发环节和重要环节之一的“做买卖的技能”变成当前发展的基本口号和基本环节。这难道不是彻底修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

对此还应当再加上一点。列宁是怎样提出我们同小农和最小农基本群众的联盟的问题的?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观点吗?”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列宁:第18卷下册,第138页)¹⁸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只有同中农的联盟,而不提出改造农民经济的问题,不把最小的节约用于机器工业,不准备从农民的马上跨到工业的马上,可能意味着农民狭隘观点的胜利。要是我说,正是把在列宁那里构成基本点的东西,即在土地上建立合作的、集体的和公有化的企业推到次要地位的布哈林同志的观点体系在把我们引向农民的狭隘观点,那我是不不会错的。

如果把布哈林同志的这个理论观点与他怎样估计党的政策的结果加以对比,就会十分清楚,农民狭隘观点的纲领也就是布哈林同志的纲领。

现在布哈林同志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没有过这个纲领。

现在他想说,根本没有过这种事情,即:他只是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才指望从国营农场得到粮食;由于执行我们的政策,他曾期待农民会抛弃土地,不再种粮食,停止购买机器,减少粮食生产。李可夫同志来到这里,代表整个三人集团说,他们从未以特殊的政策与党的政策相对抗。这是多么可耻的伪善!当然,他们被我们去年发展的事实,被我们明年的计划打败了。这里确实是无处躲藏了。在作了今年的总结之后,现在告诉他们半年之前他们说了些什么话,要知道,不仅共产党员,而且任何非党工人都会讥笑他们的。大家会嘲笑和赶走这些逆着党和工人阶级走的、什么都看不见的无聊的人的。右倾反对派的领袖们在他们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想要至少保存旧的纲领,至少同旧的文件一起再加上一个“关于撤销分歧”的新的文件。显然,在一些场合他们将玩弄新的文件,而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将玩弄旧的文件,那下面有他们的签字,文件仍然有效。这才是他们今天发言的本质,这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的。

关于最近一年的总结我再说几句。今年在工人阶级与农民基本相互关系方面发生的情况,未必可以低估。这里确实发生了意义如此重大的变革,大概是我国存在的年代里无与伦比的。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从各个主要方面对去年进行了总结,正确地把这一年确定为大转变的一年¹⁸⁸。我们取得进展的主要方面是集体化。你们记得,在代表会议上我们通过了关于加里宁同志报告的决议,决议提出了以集体大经济排挤富农大经济的问题¹⁸⁹。里面提出了为期几年的、需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去完成任务,这个任务的解决决定了我国发展的方向。今年我们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在生活中实际地用一种类型的大经济排挤另一种类型的大经济,富农类型的大商品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大商品经济所排挤。

另一个事实就是国营农场正在发生的情况。要知道,我们这方面的一切计划现在正在被生活打破。甚至不仅如此,今年的计划可能会被生活打破。

有人喊:现在就在打破!

雅科夫列夫: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计划预计明年为播种准备250万俄亩土地。我认为,如果多少牺牲一些进口,多少增加一些预算拨款,我们就一定能够把这个数量提高到400万俄亩,大概,未来几年我们能够把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土地规模由计划预计的1200万俄亩提高到2000万—2500万俄亩,

以此形成一个突击部队,它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指引我们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当忘记,这将是新投入经济周转的土地,这将是旧的农民土地上新加的土地。)

最后,第三个事实就是,随着集体农庄的发展,随着国营农场的这种发展,我们不仅没有失去提高大量个体中农经济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当着大家的面找到了引起对这种经济极大兴趣的新的驱动器。有人向我们预言,如果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路线,我们会同小农和最小农经济发展的利益发生矛盾,就会使它们失去所具有的即便不大的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今年我们得到的结果表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这一任务也在解决。大概,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正是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我们才能够更顺利地解决使大量个体贫农和个体中农经济更容易提高的任务。一些地区很大程度上依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出色进行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区里我看到令我非常惊讶的情况,因为在一个不大的区里它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很多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比斯克专区的事情。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庄,大约有1000户人家;现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从四面向这个村庄逼近。它的边缘已经被集体农庄和公社“占去”了。

古比雪夫:怎么会这样?

雅科夫列夫:在这个村庄的田地的四边,坐落着一批最近两年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和公社的农户。对粮食收购问题在村内是这样争论的。我们的干部提出的要求是卖给2万普特粮食。庄稼汉争辩说:困难呀,我们无法完成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只能完成1.8万普特的计划,而不是2万普特。进行着半友好、半做买卖的讨价还价。我们的干部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你们看看,邻近的公社交给国家多少粮食,可加入公社的是些什么人呢?当你们的邻居,你们村的居民去参加公社的时候,是不是你们说的,去参加的都是二流子和懒汉!”庄稼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沉默。我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农民对任何别的理由都能找出几十种反驳意见,而对这个理由却没有办法反对。

柯秀尔:分歧撤销了。

雅科夫列夫:原来,非常简单。村里的1000户人家上交了2万普特粮食,而两年前被全村嘲笑的昨天的“二流子”、“懒汉”组成的公社上交了1.8万普特。于是我们的干部就对农民说:“怎么会这样呢,公社里100个“二流子”户,上交了1.8万普特粮食,而你们的村却不能卖给2万普特。你们是1000户,他们才100户。”对新的一年采用的这个新的理由,庄稼汉们无言以对。于是在这

个村里整个加入集体农庄的决定正在成熟。

在同很多农民的交谈中,我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因素在这里起作用。除了公社用榜样击败了村庄的基本事实,我未能确定任何别的因素。(同时我们在村里,像一个地方的农民说的,还狠狠地杀了杀富农的威风。)两年前几十个“二流子”从村里分离出来,去参加了公社,而现在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拖拉机产业、商品小麦农场,并用这种榜样打击自己的邻居。我再说一遍,特别重要的是同时全面地对富农施加压力。由于这一切,富农正空前急剧地被孤立。同样是在西伯利亚,不久前富农在大街上走路趾高气扬,现在走在大街上却因为他是富农感到羞耻¹⁹⁰,人们尽力设法少同他们交往。中农知道,最好离富农远一点,这样会更好。最后,十分重要的是,在粮食收购的过程中我们的基层机关变得健全了一些,大大地纯洁了,这里的清洗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进行的任何清洗更好,这里人们是在战斗中进行清洗,在战斗的过程中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把富农和为富农办事的人清除出去了。

柯秀尔:这是对的。

[斯大林:但还有剩下的。]¹⁹¹

雅科夫列夫:我不怀疑,但是基本的清洗已经过去了,粮食收购的情况表明了这一点。在两年前我们拥有的那种机构下,当对贫农和中农的社会组织性质的措施与对富农坚决进攻的措施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可能成功地用现在的方法和以现在的规模进行粮食收购。

现在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与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正在发生的过程表面上与我们这里一样,但是同时这些过程在其阶级本质上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那里正在推广拖拉机和新的农业机器。那里正在把新技术用于农业。我们这里也在推广拖拉机和新的农业机器,我们这里也在建立农业的新技术基础。美国的情况是,80%的农场主使用拖拉机无利可图,因为80%农场每个拥有土地不到60俄亩,而拥有60俄亩以下土地的农场不能从使用拖拉机和把拖拉机与各种收割机及其他机器配合使用中获得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这种推广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依靠全部技术成果的大型机械化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在美国是通过众多农场主破产的途径进行的。这个事实由下列的消息来源得到证实,诸如最近几年曾对农场主的情况进行过核查的“实业家委员会”、美国农业部的正式报告和许多教授的著作等等。我们这里类似的过程是这样进行的:不是小业主被大业主吃掉,不是被大业主弄得破产,不是被大业主从土地上挤走,不是被大业主抛入贫困和破产的深渊。在我们这里,这一

过程是通过最小经济体的联合,通过它们合作化的途径进行的。这样做的时候,不得不使一些人破产,使一些人受到打击。无论有的美国教授对此感到多么奇怪,我们的大农场在建立的过程中打击的不是贫农,而是农村的资本家。这就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本质,他通过合作化发现了不经过大量农民群众的破产,而经过他们的联合、团结、合作化的途径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可能性,布哈林就是把列宁计划的这一本质推到某个雾霭迷漫的遥远的地方,把它变成一种类似伯恩斯坦最终目的的东西,用目前“按欧洲方式做买卖”的计划代替它,换句话说,用自己确立小农“农民狭隘观点”的计划代替列宁改造农民经济的计划。(马克思把停留在小农经济立场的制度称为“普遍天真”的制度)。

于是布哈林同志这整个纲领仍然有效,尽管今天他和李可夫同志宣布“撤销分歧”。

今年一年就这样检验了两条路线:我们的路线,即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路线,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路线,真正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路线和另外一条路线——布哈林反对国营农场,反对集体农庄,赞同张皇失措政策的路线。生活作出了选择,党作出了选择。现在,如果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当真想让我们相信他们,他们首先就应当说,他们打算怎样处理自己的第一个声明,打算怎样处理自己的第二个声明,根据最近一年的经验,现在他们怎样评价他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主席团会议上和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表的讲话,拿布哈林同志按照伯恩斯坦的方式对列宁进行歪曲、曲解的“新的”重大发现怎么办呢?这一点仍然有效还是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予以放弃呢?如果这一切都仍然有效,如果他们想要与新的文件同时保留全部旧文件的效力,我们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并会由此作出一切组织结论的。

主席:现在请波斯特舍夫同志发言。

波斯特舍夫:越读右倾分子的全部旧的宣言、文件和各种声明,越深入思考右倾反对派分子,主要是布哈林同志所发挥的整个观点体系的实质,右倾反对派的本质和内容就变得愈加清楚。斯大林同志这样说,右倾的同志们在党和工人阶级遇到的困难面前胆怯了或者吓坏了。问题不仅在于他们被困难吓坏了并开始把党从党的总路线往后拉,这说得对,可是如果想一想列宁同志关于同中农的正确相互关系所说的话(这种正确的相互关系是党过去和现在始终坚持不懈和一贯实行的),那么,在右倾的同志们那里,特别是在布哈林同志那里,列宁同志关于同中农正确相互关系的这个方针正在扩大到富农和农民中的富裕部分的身上。他,布哈林同志最近利用各种幌子企图把这种同中农的正确相互关系扩大

到富农和接近于富农的农民群体,在党和工人阶级同富农分子斗争的最困难的时期他特别卖力地干这件事情。

李可夫同志在四月全会上偶然或者非偶然地好像在渲染粮食收购的恐怖,他讲述,似乎庄稼汉脖子上挂着木牌被牵着游街,他给我们列举了一长串歪曲中央指示的情况,等等,等等,但关于富农的恐怖手段,富农怎样杀人放火,杀害和烧死了多少积极分子,其中既有共产党员,有贫农,也有在当地坚持不懈地执行党的政策的农民,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右倾分子把党同富农的斗争,一场不仅为了粮食,而且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常严重的斗争描绘成同中农的斗争,右倾分子企图把富农的疯狂反抗及其恐怖行动说成是全体农民的暴动,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和党所执行的总的农村政策的不满。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布哈林同志过去和现在都觉得富农不构成危险。他们将定期地企图干他们富农的勾当,但党和苏维埃国家是如此地有保障,用不着害怕富农,因此不需要对富农展开任何进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富农会逐渐消失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长入社会主义,而党把火力集中在富农身上并以此给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弗鲁姆金在这之前说,我们不仅不应当向富农进攻,而且应当利用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谁将多提供100万普特粮食,特别是在粮食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不都是一样吗¹⁹²。当然,在困难面前的怯懦更有力地把右倾分子推入富农的怀抱,同富农和平相处,使他们离开列宁的道路更远。布哈林同志的被他称为《列宁的遗嘱》的著作不是偶然的,在这篇著作里只字不谈阶级斗争,只字不谈富农,好像富农并不存在,而布哈林同志却把列宁描绘成一个国内和平的信徒。右倾分子在困难面前的怯懦更突出地表明了机会主义的本质并使其在理论上定了形。

我想简单谈谈右倾的同志们如此“捍卫”的围绕总路线兜圈子的话:“我们拥护总路线,拥护五年计划”等等。拥护总路线,但只是这条总路线不要特别总,拥护五年计划,但这个五年计划不要这么五年,拥护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不要太工业了,等等。喏,要知道,用这种废话掩饰自己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是不愿意,也不会为这样的总路线去奋斗的。这过去和现在都是蒙骗。应当谈党的总路线,这是工人阶级需要的,是党和工人阶级那样坚持不懈执行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成果的总路线。

同志们,最后,我还想谈谈当前的形势。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当忘记,富农还未被战胜。我们前面的困难还很大。我们到达了转折点,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山口。现在我们正背着巨大的负载处身于陡峭的悬

崖上,工人阶级的、党的膝腱十分紧张,而想要打击这膝腱的有意无意的关怀者有的是,他们都在等待你在这陡峭的悬崖上双膝瘫软无力的时候。当然,旧事物的深渊是巨大的。正当党和工人阶级奋力登上这陡峭的悬崖,接近山口的時候,有人朝我们喊:“他们在把国家引向毁灭,而不是引向山口。”我们前面还有很多,有无数的困难,从这一方面看,李可夫同志的发言应当不是那种被谢尔戈同志完全正确地称为骗人的文件。

在这里,在中央面前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且又这样“谦虚”,用意是什么,我们不想向你们提醒你们直截了当对我们说的那些下流话,真是岂有此理!我认为,右倾分子应当首先放弃对党的指责,说党在瓦解共产国际,说党滑到了托洛茨基的轨道上,说党对农民实行掠夺政策,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说我们党内书记是委派,而不是选举产生,说党在培植官僚主义。我不知道,应当把你们直截了当向全党和党中央说的那些话叫作什么?为什么对这一点一句不提?如果你们在这里找不到人格尊严和无产阶级的荣誉感收回你们曾经那么勇敢、那么坚决地抛出,甚至记入文件¹⁹³的这些卑鄙的指责,那么,在这之后要求工人群众,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跟你们客气,喏,同志们,你们要知道,这就太过分了!工人共产党员会就你们在这里宣读的声明这样对你们说,在那里面你们既不是右倾分子,也不是有罪的人,在那里面你们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们要知道,只是对影响农民经济的一些小杠杆估计不足而已。“共产国际的瓦解”、“党滑向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等等,是什么意思。同志们,你们这里的脱节和矛盾太大了。我认为,在这个声明之后,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能让中央放宽自己对右倾分子的要求。这就使我们更可以对右倾分子提出要求,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党应当向你们提出这些更加严厉的要求,要求你们放弃自己的错误,要求你们放弃你们在托洛茨基分子之后再次使用的与党斗争的那些方法。否则,只好提出这样的同志不能留在党内的問題,因为现在斗争与形势更加困难。如果我们向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与留在党内是不相容的,那么,对右倾分子也应当十分严厉和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你们的立场现在有更多得多的拥护者,而且是在最危险的地方的拥护者。我认为,对于右倾分子,特别是对于布哈林同志,警告得已经太多了。这个声明不能使中央委员会满意,不能使党满意,它更迫使我们现在把问题提得更加尖锐。因此我认为,同志们没有以自己的声明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没有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东西,无论整个中央委员会还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个人对右倾分子的态度都不应当有任何变化。我认为,对布哈林同志,我们还是应当提出他不应该待在党的指挥部里的问题,而对其他

某些人现在就更严厉地给予警告而且要比那次四月全会走得更远一些,那次全会对整个集团进行了警告,因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们感觉到了,现在得小心行事,让我们在烧红的铁板上溅上一些凉水,让它多少冷却一下。

有人喊:结果出现了蒸气。

波斯特舍夫:对,完全正确,由此得到的是蒸气和水泡。

柯秀尔:还有恶劣的空气。

波斯特舍夫:最后我想说说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发言。我也不同意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看法。为什么我必须谈他发言的这一部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非常清楚,整个乌克兰党组织非常严厉和明确地提出了与右倾分子斗争的问题。

彼得罗夫斯基:对。

波斯特舍夫:依我看来,在这里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错了。我不想说,他把这个问题强调得这么严重,只是他那里弄得有点不太好。结果似乎是这样:我们曾经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包括他在内,而在这里似乎没有必要进行这样坚决的斗争。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文件表明,你斗争得越坚决越好。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应当真正同样坚决和齐心协力去斗争,去战斗,像过去同托洛茨基分子战斗一样,因为右倾分子大概至今也这样认为,是在同他们开玩笑,不会像对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对他们进行战斗。可是当他们感觉到了,便站了出来,虽然带着的是一篇残缺不全的声明。党的斗争的结果和胜利使他们,右倾分子们暂时单膝跪倒了,因此作为同志的劝告,虽然我很难劝告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我想在这里说,应当更坚决地在这里把事情处理好,否则乌克兰的共产党员将不会理解我们。他们会说,怎么这样,在家里说一套,而在中央是另一套?我认为,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并不想这样提出问题,而只是得到的结果不太好。

主席:现在请卡巴科夫同志发言。

卡巴科夫:波斯特舍夫同志说,在所宣读的反对派文件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对这种说法不能同意。声明的内容和调子说明,这里有重新武装,在另一种情况下把力量重新部署到新的阵地上与中央斗争。为此只要谈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声明中的一点就足够了,在那里他们说,党过去进行的反对布哈林反列宁主义观点的斗争像是列宁格勒反对派进行的反对党中央的斗争。签署了在此宣读的声明的三人集团认为,在中央的领导下,在一年半期间为反对右倾和右倾的思想家布哈林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党不是别的,正是列宁格勒反对派,而布

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为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中央。

雅罗斯拉夫斯基：结果就是这样。

卡巴科夫：而布哈林的创作《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他们看来，是纲领，是遗嘱，是党的战略和策略。在失败和破产之后，到中央全会上来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别的，正是嘲笑。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期间，在同右倾斗争的一年半期间，党学会了识别派别问题提法的特点和本质。这个文件是一个尝试，企图事后把党的成就记入反对派的进项，在同最广大农民群众结合的新途径这个意义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把主动权从党的手里夺过来并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成就拿过来并记在反对派自己的工作平衡表上；不承认自己的破产，而是说，我们对这一切都是同意的，这是我们的观点，只是在关于粮食收购的行政措施一个问题上有过分歧，这意味着歪曲具体事实和政治事实。与右倾反对派真正分歧情况的这种说明，中央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经济年度总结的成就，工人和农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是党对右倾进行斗争的结果，我们取得这些成就只是因为中央把这个问题作为根本的政治问题提到全党面前，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对右倾，对机会主义进行的斗争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了，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积极性。工人阶级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上的提高恰恰是违反右倾思想家们的预言发生的，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关于进口粮食、关于放弃非常措施问题的争论是直接与该时段的整个改造时期相联系的。如果中央去年放弃非常措施，如果党不在粮食收购战线上以新的方式工作，我们就不可能既在工业战线、农民经济公有化和改造战线上，又在提高工人阶级和贫中农的积极性方面取得那些成绩。今年我们所拥有的新的因素，情况也是一样。拿开展自我批评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的问题、改行连续工作周问题、一长制问题来说，难道这都是自动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正沿着建设和与农村联系的新途径前进，这个新途径是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意志、党的意志，而违反布哈林和另两个人的观点提出来的，我觉得，现在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在建设的更高阶段正在改变自己的方针并制定与党斗争的新的纲领。新纲领将具有怎样的内容呢？以完整的形式与党的政策抗衡的将是什么呢？这很难说，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撤销分歧，它绕过分歧，规避分歧。现在看得很清楚，只要一有困难，只要外部环境和国内党内一有风吹草动，大概就会同旧的文件一道提出一个增补过的新的纲领。由于这里没有一个公开和明确的提法，我觉得，中央委员会全会没有理由放弃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决议十分明确地提出并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指出，如果他们违

反决议,党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应当采取措施以防止他们继续破坏党的纪律。

在这次全会上,我们要执行四月全会的决议。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波斯特舍夫同志的意见,党在有关估计成绩的基本政治问题上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在乌拉尔组织的成就里得到了突出的表现。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群众的热情是很明显的,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显而易见的。整整几个世纪以来,乌拉尔的工业是带有季节性的:冬天搞冶金,夏天同样这些工人便去干田里的活,去割草。今年我们头一次有了成果:夏天乌拉尔工业完成了扩大了的任务,取得了比本经济年度上半年更大的质量优良的成果。工人群众在寻找和建立与农村联系、结合的新途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提高产生了许多城乡相互关系前所未有的新形式。有一系列新的健康相互关系的生动鲜明的事例。拿丘索瓦亚为例。地方组织吸引很多工人来同农民签订运送农产品上门的合同。经过工作,我们农村里已经有几十个集体化了的村镇并对工人居民进行充分的菜园蔬菜供应。这些形式具有联系农民群众的另外一种特点和本质。义务帮助不是通过开大会安排,而是通过工人与农民签订目标合同进行。根据合同,农民承担义务种植并按规定价格给工人运送一定数量的土豆、圆白菜和某种数量的黄瓜,而工人预付给合同账户的是:帮助修理工具,帮助农民组织共同工作,建立集体经济。

工业中心与农村相互关系的这些形式不是个别的,而农民按照合同在乌拉尔各个地区种植了将近两千俄亩菜园作物。

彼得罗夫斯基:是通过合作社吗?

卡巴科夫:是的,合同是通过工人合作社签订的。

莫洛托夫:应当增加。

卡巴科夫:今年打算更广泛地开展工作,吸收更多的工厂参加此事,以这种规模加快集体化的速度,以便充分供应工业和城市中心所需要数量的菜园作物。

莫洛托夫:这很好。

卡巴科夫: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在通过集体农庄预订肉畜方面也有肯定的成绩。今年州里共预先订购牲畜近4万头,集体农庄大都及时履行了合同。自今年秋天起已经提出了为集体农庄购买10万头牲畜以加强其饲养的乳畜群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很大部分正在完成。而这最终明年春天就能向米高扬同志提供大约20万普特奶油以供出口。

莫洛托夫:只给米高扬一个人?

米高扬:你不想给莫斯科人一些奶油吗?

卡巴科夫：如果事情将涉及莫斯科，我仍然应当承认，为供应乌拉尔工人也需要奶油。

全州将近60%的播种面积已经签订了预购合同，今年的特点是，尽管我们的假期打乱了今年的一切准备，粮食收购真的在两个月内就结束了。如果把对农民进行惩罚措施的次数加以比较，那么，今年的惩罚措施，除了对反革命集团和富农居民的没收之外，比去年少得多。这使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吸引贫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自己的经济公有化为集体农庄毫无疑问地加强了。我来举例说明。州里有10个集体农庄，它们拥有土地100万公顷，换句话说，在50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中，在10个点上就集体化了100万公顷。在这10个集体农庄后面各个区里还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大约3000个其他集体农庄。像库尔干这样的专区，就其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而言处于草原地带，已经集体化了30%。我觉得，开拓与农村联系新途径的这个例证是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提出与农村的市场关系是联系的基本因素时所犯错误的鲜明回答和鲜明驳斥。所述成就的取得只是因为整个党组织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对右倾的揭露和斗争，用于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而不是用于右倾反对派的纲领。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纯粹乌拉尔的问题。

主席：可你的时间到了。

喊声：请给予延长。

主席：你还有五分钟。

卡巴科夫：鲁祖塔克同志给我五分钟，我应当指出，五分钟我讲不完，我已经列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古比雪夫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没有谈到。这些问题其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有人喊：应当给时间。他们有石油、粮食和奶油。

卡巴科夫：埃赫同志在这里尖锐地提出了加强拖拉机进口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集体农庄对拖拉机的需求在增长，对拖拉机的需要是农民经济改造进程的整个发展提出来的。在现阶段这个任务只有通过扩大出口才能够解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控制数字，把它看作年度工作计划，看作开发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的计划，看作给各个劳动分队的具体任务，那就应当承认，我们还没有学会利用出口的能力。我举几个问题，我认为，如果它们能够按照党的利益需要那样得到解决，那么，我觉得，拖拉机进口问题将解决得不那么紧张。

有人喊：以后会进口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卡巴科夫：我举铬铁矿这种出口物资。国际市场上有需求。按照苏维埃共

和国联盟的控制数字,将为此项事业拨款 23.5 万卢布。我不知道,用这些资金能建立什么:一个手工业企业或者某个小资本家的一项事业?再举另一个问题。白钨矿,将给这个部门拨款 21.1 万卢布。重晶石,为此将拨款 6.2 万卢布¹⁹⁴。

斯大林:有点儿少。

卡巴科夫:为矿物染料拨款 5.4 万卢布。

莫洛托夫:少点儿。

卡巴科夫:当然,莫洛托夫同志,我觉得,我们的不幸是,我们的经济机关往往至今还没有学会发展有效益的工业部门,这样的工业部门我国有不少,它们能够扩大原料和工业品的出口。

有人喊:说得对,卡巴科夫。

卡巴科夫:我觉得,发展方面这种慢腾腾的作风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用到钾矿上。是的,同志们,四年期间做了一切准备……

古比雪夫:两年半。

卡巴科夫:(做了一切准备)挖掘一个矿井。

斯大林:这个五年计划你们会不会出钾?

卡巴科夫:已经找到了钾。第一个矿井的开凿正在顺利结束。

有人喊:四年,顺利吗?

卡巴科夫:第二个矿的开凿……

斯大林:到底会不会出钾?

卡巴科夫:仲夏或者早一点会出钾。

对待这样重要事情的慢腾腾的作风当然是奇怪的,但是如果今后像这次那样对待事情,那么,我们当然还将长时间学不会完全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经济潜力。不是一开始就同德国人签订大工程量的合同,不是建立一个矿井,而是建立两个、三个,不是以非常小的规模,而是以无愧于苏维埃国家颜面的规模转移技术,那么,结果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这里的处理方法近似手工业的规模。经济各个部门尚未开发的地段有的是,我举鄂比河渔业资源的问题……

喊声:对。

卡巴科夫:计划每年生产鱼罐头 900 万个。这里还可以发展。鄂比河流域渔场的产量为 400 万—500 万普特。

有人喊:在那里建三个工厂。

卡巴科夫: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在离乌拉尔工业中心 200 俄里的地方,鱼的价格每普特为 30—40 戈比,而工业区的市场上没有鱼,这样每一个人都会清

楚,鄂比河的渔业资源是多么丰富。

那里有极为巨大的森林;第一次试验——今年我们从乌拉尔运出价值为1 100万卢布的木材。

鄂比河地区煤炭蕴藏极为丰富,煤炭的质量听说与锻造用煤相同,但这煤炭不能被冶金业所利用,只是因为缺少一条180俄里长的塔夫达—托博尔斯克铁路。尽管我们到处奔波请求,到处游说,这个问题仍原地未动。

有成群成群的鹿,数万只鹿未被苏维埃国家利用。有面积巨大的牧场,我们可以在那里饲养大群大群的牲畜和建立我们苏维埃的畜牧业。

米高扬:建立鹿肉联合加工厂。

卡巴科夫:像塔夫达—托博尔斯克铁路这样意义重大的问题,在控制数字里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一个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的发展。

现在谈谈古比雪夫同志说的电力在东移,其中包括乌拉尔。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反映全部问题。我来举乌拉尔电气化的规模和方向的有代表性的数字。为乌拉尔区电站的建设拨给3 600万卢布,为各种小电站的建设也同样拨给了3 600万卢布。

古比雪夫:让我们来修改,我同意。

卡巴科夫:这是一个资源最丰富的州的电气化,那里现在没有一个区电站。

古比雪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什么地方都去过。他在乌克兰,在西部州转了转,最后停在了莫斯科州的需求上。米高扬同志提到了中央黑土区州等等。我不在这里说,乌拉尔被忘记了。

米高扬:乌拉尔在工业方面发展很快。

卡巴科夫:我提出的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在这里指出,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将要建成,但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将为之提供电力的那些工厂却来不及建成。这种现象是不能允许的,相反的现象也是不能允许的;乌拉尔有工厂——没有电力。拿有色冶金业为例。乌拉尔的有色冶金业占整个炼铜工业的50%多。

古比雪夫:在哈萨克斯坦更多。

卡巴科夫:有需要在这里建一个锌厂,建一个镍厂,建一个电解厂和一个铜加工厂。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这一切都因为缺乏电力被卡住了。在有色冶金工厂附近有面积非常大的泥炭田。泥炭的气化和供给电站使用的问题已经解决,因此有一切可能获得廉价的电力。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就不说丘索瓦亚河上和卡马河上游电站的设计、库哈宾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电站的建设缺乏应有的速度了。但是,我觉得,在控制数字里应当反映出乌拉尔电气化问题的解

决,在实际执行控制数字的过程中应当纠正这个缺点。

作为对米高扬同志关于乌拉尔在工业方面发展很快的说法的回答,我们举建设的速度为例。机器制造厂。其造价为4 500万卢布多一点,已经建设了三年,竣工日期不得而知。博戈莫洛夫工厂设计能力为1.2万吨,已建设了四年,现在设计方案改为2万吨,将来该厂还将扩大到3.5万吨,这一切改变都是在建设过程中进行的。

有关矿石勘探的问题。在蕴藏量约为6亿吨矿石的阿拉帕耶夫斯克矿共有六台钻机在工作。然而,用这种速度完成矿石的勘探,仅仅在这一个区里就需要工作八年,只有八年之后才能探明这个矿的矿石储量。我不知道,在国家机器化和拖拉机化时期,当每一吨钢都十分宝贵的时候,这样的勘探速度是否能够允许。有色冶金业的勘探规模不足。已探明的矿藏难道够开采4—5年吗?

现在谈谈乌拉尔的黑色冶金工业。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意义非常重大。古比雪夫同志没谈这个问题。

古比雪夫:怎么没有谈?

卡巴科夫:没有从应当提出问题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我们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修改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建设五年计划的问题。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重大理由的。这里面有五年计划没有规定的新东西,这就是石油和基泽尔焦炭。焦炭在各国的整个冶金工业中引起了一场革命。乌拉尔的黑色冶金业至今全都是靠木头燃料建立的。有人从各个方面吓唬我们说,供给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锻造用煤是遥远未来的问题。现在使用基泽尔焦炭炼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古比雪夫:什么时候?

卡巴科夫:早在1926年就解决了。试炼是今年9月进行的¹⁹⁵。曾经就这个问题及时向您作了汇报。

古比雪夫:在9月,而五年计划是5月批准的。

卡巴科夫: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我给你们举黑色冶金工业管理总局一名工作人员特劳特曼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在自己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不用乌拉尔的煤,而主要用外来的、西伯利亚的煤生产焦炭。我认为,用当地的焦炭保证乌拉尔冶金工业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以手工业方式工作是不行的。”

古比雪夫: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卡巴科夫:9月份。

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曾领导一个改造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的委员会,并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个改造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的计划。

古比雪夫:那是5月份通过的。

卡巴科夫:今年的建设计划是根据特劳特曼的报告通过的。有我们的代表在场,这个计划是违反我们的决定通过的。我认为,是提出充分发展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的时候了。

罗伊津曼: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卡巴科夫:我们给古比雪夫同志发去一封信,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也发去了一封。

斯大林:信发表了。

卡巴科夫:信的摘要发表了。

罗伊津曼:他们说,信没收到。

卡巴科夫:我不知道,也许,这是办公室干的事。我觉得,应当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不应当再往后拖了。问题应当大体归结为什么呢?设计中乌拉尔工厂的问题成熟了,当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回答我的插话,说我太忌妒克里沃罗格工厂的时候,我应当声明,事情并非如此。问题何在呢?拿克里沃罗格的矿状来说,接收的可能储量在地下640米深。(喧嚷)

彼得罗夫斯基:整个矿都在上面。

丘巴尔:没有这么回事!(喧嚷)

卡巴科夫:我有地质委员会的鉴定书,说在克里沃罗格区接收的储量在640米深处。

阿库洛夫:是你把这跟库尔斯克地磁异常区弄混了。

卡巴科夫:阿拉帕耶夫斯克矿处在地面上,旁边就是基泽尔焦炭。再拿塔吉尔工厂建设的问题来说,当地就有矿藏。离这里180俄里有煤,在基泽尔建一个类似的工厂,从塔吉尔运矿石到基泽尔,往回运焦炭。运输可以达到全负荷,形成一条独特的运输带。三个工厂可以生产650万吨生铁,其价值和质量将不低于,而是高于其他工厂生产的金属。这已经不是忌妒,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有益的实事求是的建议。

彼得罗夫斯基:你们将从哪里弄煤?

卡巴科夫:基泽尔在比顿巴斯焦炭更近的地方有煤。

现在,谈最后一点意见。只要草草检查一下我们在什么地方利用外国技术,检查一下合同,检查一下外国工程师工作的所在地,你就会到处发现外国公司的

代表处——在乌克兰,在斯大林格勒工厂,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但是你们找不到一家在乌拉尔从事建设工程的外国公司。

彼得罗夫斯基:是你们自己的错。

古比雪夫:那麦克唐纳工程师呢?

卡巴科夫:喏,关于麦克唐纳工程师,给扣的帽子比事实上更多¹⁹⁶。麦克唐纳的事,与其说是乌拉尔的人错了,不如说莫斯科的人错了。但是,我当然不是否认这个事实,是有办事马虎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涉及乌拉尔问题的研究、把建设和改造工程交给外国专家进行的问题在最短期间就能证明是正确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木材运输和矿石运输。我们每年要耗费1 000万普特燕麦用于运输。在矿山木材采运机械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每年出口1 000万普特燕麦并用这些钱为矿山和伐木场进口设备。两三年每年出口1 000万普特燕麦,伐木场和矿山将完全实现重新装备。单是黑色冶金工业改造问题的完全解决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不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乌拉尔的工程师们能够胜任十分急需的黑色冶金工业的改造。

古比雪夫:没有人这样想。

卡巴科夫:他们胜任不了这个任务。他们已经习惯了用木炭炼铁。指望乌拉尔的技术力量完成乌拉尔的电气化是非常错误的。进行这样的建设,经验缺乏,他们已习惯于建造规模很小的电站。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必须更密切关心乌拉尔当前的首要问题并保证其顺利的实现。这就是在执行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任务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大体设想。

主席:现在宣布闭会。

第六次会议

11月13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请洛博夫同志发言。

洛博夫¹⁹⁷:控制数字提出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增长速度确实不会让人担心太慢。我们好几年才习惯了这样的速度。如果有人想仔细研究编制前几年计划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会告诉我们如下的情况:起初编制的控制数字数额比较小,后来综合工业—财务计划的时候就大大地增加了数额。因此便产生了种种争论。不管多么奇怪,让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不要生气,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几乎每年都得为更快的速度与国家计委争论。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胆大包天的人们!

洛博夫:是的,胆大包天的人们,但我不用胆大包天来说明这种情况,而是用我们至今不能正确估计工人阶级中、工厂中蕴藏的全部潜力来加以说明。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说得对。

洛博夫:比较接近工厂,接近工人阶级的人会更多地感受到这种影响。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脱离群众。

洛博夫:离得越远,对这种脉搏跳动的感受就越空洞抽象。俄罗斯联邦工业产值的增长现在预计约为40%,而全部工业产值的增长仅为32%。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已经很多。

洛博夫:对,提出的增长比例已经很高了。为了真正完成这个计划,得好好干一番。然而,就是这样的增长比例还远远满足不了许多工业部门的需要。

格里亚金斯基:那地方工业呢?

洛博夫:我说俄罗斯联邦工业产值增长40%的时候,这主要是指地方工业。最近一个时期,地方工业发展的速度最快。你们都知道,共和国的工业约占地方工业的20%。而共和国的工业就其数量指标来说比较接近联盟的工业。对一些工业部门我们本应当设计更高的速度:建筑材料、纸、木材、食品工业各个部

门、油脂工业,特别是肥皂等等。我们在这些工业的若干部门有限额,使我们没有可能采取更高的增长比例,一种情况是原料限额,另一种情况是基本建设工程限额。但俄罗斯联邦这些工业部门与去年相比仍然有如下增长:木材 86%,纸张 22%,水泥 43%,砖 111%。今年我们正在为森林工业拟定一个大的计划。与 1928—1929 年度实际完成 135%—140% 的计划相比,现在我们通过了一个 2.7 亿外汇卢布的木材出口计划。计划是十分艰巨的。然而外汇平衡表就是这样,这迫使我们无论如何得去完成这个大计划。只有在我们完成各种质量指标的情况下,工业产值的这种增长才有可能。我指的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基本建设工程投资等这些主要质量指标。这些钱得实实在在地去挣,年初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钱。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成本降低 11.6% 并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25% 的时候,比去年增长 75% 的俄罗斯联邦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的完成和产值增加 40% 才有可能。

这些十分艰巨的任务可能完成吗?可能,但是应当以与我们现在有所不同的方式工作。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对。

柯秀尔:不是有所不同,而是大大不同的方式。

洛博夫: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系统采取了许多措施,早在业务年度之初就派了一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同我们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托拉斯研究降低成本的计划。我们的工作实践已经表明,我们许多地区的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没有做这件事情。诚然,其中有些组织现在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粮食收购上了,但粮食收购并非在所有的地区都是主要的任务。

柯秀尔:这样说是对的。

洛博夫: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只有在党组织像对粮食收购问题那样看待和解决降低成本问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 11% 的任务才可能完成。

臧声:对。

柯秀尔:以同样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洛博夫:以同样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同样把工人群众的注意力调动到这个问题上来。现在,在第一季度,这一点还看不出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我们就会失去速度。最近政府通过了一个关于从地方工业和共和国工业收回 3.8 亿多卢布的决定¹⁹⁸。

格里亚金斯基:请说说,请说说。

洛博夫:你们,在座的各位执委会主席和州委书记,请注意,这不是一个闹着

玩儿的决定,是要执行的。等到收回这些资金的时候,怎样收回、从谁那里收回和收回多少,那就请你们注意,我们是用这种方法计算的:如果你们把工人人均产值增加25%,你们就得降低成本11%,如果不降低,你们就得不到完成生产计划、基本建设工程的资金,流动资本就会减少。我十分严肃地强调这个问题,因为生产年度一开始就应当把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的注意力都调动到这个问题上来。如果我们第一季度拧紧所有指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那么,不管基本建设工程计划多么大(计划是很大),不管我们的生产规模多么大,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还想提请你们注意几个对某些工业部门有意义的问题。森林工业的出口计划预计为2.7亿外汇卢布。你们都能清楚地想象出,计划的这一部分如完不成,对我们的整个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木材计划非常艰巨。当我们同米高扬同志一起召开会议的时候,召集来开会的主要是在出口战线工作的托拉斯工作人员和将要转运这些产品的各个港口的领导人,几乎所有的托拉斯都认为,这个计划过于紧张¹⁹⁹。此外,在国内市场上木材产品至今也缺货,只有潮湿劣质产品。我们给自己提出了建设烘干室的任务。决定用新的方法进行木材采运。米高扬同志说得对,我们的森林工业至今还是名实不符的。由于固定资本薄弱和木材采运落后,我们现在只能按照苏联国民经济要求的那样去抓林业。我们确实有过木材采运,而没有森林工业。这段时间政府决定把采伐区和大片森林交给森林工业管辖²⁰⁰。森林工业可以走进森林深处,与此前不同的方法工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使林业工业化。从前每年在森林里工作两三个月,没有相应的木材运输和流送工作的机械化,40%—50%的木材丢失在森林里得不到利用,等等。现在有可能在伐木区工作九个月。森林交给森林工业长期使用。因此我们决定真正在森林里定居。应当相应地改编森林工业开发计划。

我们一定要在运输和其他工作机械化方面追回我们失去的时间。我们必须现在就提出冰道的问题。我们决定今年把30%的道路改成冰道。但是我们整个这件事情卡在了森林工业干部的问题上。无论在木材采运还是在森林开发方面,我们至今没有工程技术力量,没有行政和党务干部,所以简直没有人能提出机械化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森林工业工作干部的配备,森林面积集中的主要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像对大工厂那样把林场管起来。应当像对其他工业部门那样挑选场长和技术厂长。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责成我们为森林工业配备党务干部和专业人员²⁰¹。当提出党务干部问题的时候,地方党组织往往以不应有的态度对待此事。他们派给一些三流干部。各个木材采伐企业都划给了

很大的地段,它们需要有工程师,它们需要组织机械化、拖拉机化、森林道路修建等等,而当我们派专业人员去这些地区工作的时候,我们遭到了工程师们的拒绝,尽管我们与有关工会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特别是当提出派遣30个人前往北方木材采伐托拉斯的时候,他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就是把我们赶出联盟,剥夺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不到那里去!”

有人喊:可耻!

洛博夫:是的,可耻,但为此我提出这个问题供我们思考。应当为这些专业人员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地方组织很少关心工程师去的是什么环境。另一方面,不能允许工程师长期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这种情况。看来,这里与学生签订预聘合同的事进展并不完全顺利。应当要求所有领取补助金的学生毕业后首先去边疆地区,去新建设工地工作。长期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的现象应当受到工会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系统的最强烈的反对。也不能排除采用行政手段。我不能详细地谈基本建设,谈我们面临的那些困难。我觉得,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来表述工业所面临的全部情况:我们把粮食收购进行到了最后,完成了任务,现在应当用三四个月时间真正把各级党组织和工会的全部力量用于解决我们所有的工业和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也像在粮食收购运动时那样把党组织和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调动到质量指标、保证工程技术力量、实行机械化、冰道各个方面,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在谈这整个工作的时候,不能不谈谈党内的情况,因为它与我们的整个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到过列宁格勒许多工厂,转了转,同工人聊聊天。我有机会不仅同年老的工人,而且同不久前刚从农村来的工人谈过话。在同工人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感到,右倾在工厂里是什么样子。与农村有关系的工人们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你们干吗搞这种工业化?要知道,这得靠农村进行,你们在掠夺农村,没法活了,等等。”当你同他们聊起来,他们便直截了当地说:“这不仅是我们的意见,你们也有人这样想,例如李可夫同志和其他的人。”

我们党内的情况有没有因为右倾变得复杂化呢?有,这是使我们所有措施难以执行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昨天李可夫同志宣读的信里指出,“我们和中央之间的分歧消除了”。这是怎么消除的?说它们消除了是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是办不到的。它们存在着,在工厂里,在我们的机关里,在党组织里。这个三人集团签署的以前的全部文件和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说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分歧消除了,因为此前党一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而现在赶上来了,站到了李可夫和布哈林一边。

李可夫和布哈林同志应当说,所有这些文件都写得不对,这些文件都不符合实际,他们放弃这些文件,今天就同我们一起站到队伍里,共同工作。

这里正在重演其他反对派曾经发生的情况。列宁格勒反对派也曾经说,我们同意中央的观点,因为我们过去所说的一切,中央都同意了。我们过去反对富农,你们现在也反对富农。我们没有分歧。党站到了我们一边。

柯秀尔:分歧消除了。

洛博夫:现在提出的大体上是同样的一个说法。如果签署这篇声明的同志希望更好地、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更有效地克服一切困难,那就应当由他们自己撤销这些分歧。他们必须真正像理应的那样说,在所有这些文件里,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错了,大体如科托夫说的那样。但他们应当比科托夫更加坚决,因为他们犯的错误更多。那时党就会对所有想用李可夫—布哈林掩饰自己右倾的人说:“不,对不起,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过去怎样看,但某月某日他们说,这全是他们的错误。”如果现在他们不这样做,那么,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将是右倾的思想家。我认为,这一点现在完全取决于他们。不应当加深自己的错误,而这是以前所有反对派的经历。现在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

柯秀尔:正是这样。

洛博夫:我记得,季诺维也夫绝没有想到,列宁格勒竟有人敢撤掉苏维埃主席。

柯秀尔:领袖们头脑发昏了。

洛博夫:离开他谁来主持共产国际的事务呢?谁反对过他们,就被扣上种种帽子。我认为,为了结束这件事情,就应当真正放弃自己的错误,否则党就不得不对右倾进行彻底的揭露。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主席:现在请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发言。

什基里亚托夫:我只谈党的情况并用我的整个发言时间谈这个问题。刚刚签署了文件的同志想怎样同党一道工作,你们在这次全会看见了:三位政治局委员抽出工夫到这里来只是为宣读一个文件,然后便走了。仅此而已。

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在党的领导机关里共同工作。我认为,这不仅有害于政治局委员,而且有害于每一个普通党员;这次中央全会在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可他们不来。我记得,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顺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反正你们,政治局的多数,已经拟好了一个把我们开除出政治局的计划。”²⁰²我认为,他们正在变成预言家。哪方面的?他们三个

人为自己策划了一条退出政治局的道路并在相应地行事。为什么？他们写的这个最后的文件(我不知道,它是否将是最后的)是这样结尾的:

“我们得出的最后结果表明,我们的分歧在消除。当然,我们可以只声明分歧消除就行了。然而我们宁愿详细地说出一切,其中也包括我们真正的错误,以便让所有的同志准确了解我们是怎样得出我们现在在这里陈述的结论的情况的。”

喏,真的!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一切的!他们谈自己的错误了吗?没有。如果您是怀着诚意来的,你们就应该说出所有的错误,你们是带着一个狡猾的文件到全会上来的,关于错误,当然不是在像过去所写的30页纸上,而是在7页纸上什么也没说。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文件,你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

你们说,你们只是对粮食收购时的非常措施有过分歧,仅此而已。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请读一读你们自己1929年2月9日的文件。

他们在第四页上是怎么说的呢?

“但是,在对过去的一年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对影响农村的那些最强有力杠杆存在某种错误的估计不足,是这些杠杆最后开始弥补非常措施的消极方面。”

他们在自己的文件里是怎么说的呢?“然而工人阶级的极大毅力帮助克服和纠正了这一切。”看来,只是现在他们才得出,是工人阶级的极大毅力帮助克服了困难。而过去他们不知道这种毅力,当我们依靠工人阶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执行自己党的整个路线的时候,只是现在他们才说,“工人阶级的极大毅力”帮助克服了一切困难。

同志们,这整个文件里以强词夺理的方式,而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写的。只有一个无产者托姆斯基进到了那里,而当他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之后,他也只吸收了知识分子最坏的方面。也许,他们会说明自己的文件,当他们在第四页上写道:“这样,在……轨道上……”,他们这个或那个词指的是什么?

有人喊:在什么轨道上?

什基里亚托夫:看来,这属于鲁祖塔克同志的管辖范围……“在党所采取的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方法的‘轨道上’,由于通过的决议我们参与了这个方法的实施,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说得好,他们也在这个轨道上参加了工作,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许,他们随后会说明他们是怎样参加的。根据这个文件,很少看到你们的参加。

接下去他们说——“在……基础上”。在那里他们“在轨道上”说,而在这里

又转到了“基础上”。“在指出党的这些毫无疑义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丝毫不忽视党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困难,对于这些困难,我们愿意在党的决议的基础上,同全党一道……”而且是这样结束的:“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之间的分歧消除了。”瞧,无产者托姆斯基不是干脆用无产阶级的方式说他错了,而是走了一条最坏的路,开始签署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文件。但是,托姆斯基同志,要知道,这种文件以后将是很难放弃的。在这里他们在“轨道上”开始,然后转到“基础上”。同志们,放弃这个文件将是很困难的。如果你们读一读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前写的那些文件,你们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文件里开始打“基础”并在“轨道上”滑得离党越来越远。这个文件是以十分圆滑的外交手腕写成的。现在不能说,他们过去是怎么说他们预见到所有困难的。布哈林甚至说过,事情向比他所想的更坏的方面发展。现在要重复这一切当然是困难的和不可能的。他们在文件里回避这一切。他们在文件里很少正面援引我们这一年的成绩,但是为了给自己留下空隙,他们说,什么“没有完成”,说工资落后了,农业落后了,偷偷地在这个文件里塞进这些将来也许有用的东西。

最近我们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反对派的文件。但是,看来这些同志吸收了先前反对派分子写的东西里最坏的东西。看来,对于他们这条路最容易走。他们选择了托洛茨基等人曾经走上的那条道路。我认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坏的道路。对他们现在使用的这些方法应当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接下去他们在这个文件里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说:“在这一点上我们错了,而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没有错。”“指控我们提出了无产阶级同农民分裂的论点是夸大其词。我们说过分裂的危险和这种危险有可能增加。”

结果是,他们说的不是分裂,而是分裂的危险。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放弃他们过去写的那些文件,因此他们只好在这里采取这种写法,说我们说的不是分裂,而是分裂的危险。

接下去是:“我们谁都从未宣扬迁就薄弱环节;我们中间有人指出薄弱的环节,完全是为了克服它们。”

你们看到,这个文件是用怎样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写成的。总得设法证明自己正确,于是他们就写道:我们不是那么说的,而是这么说的。

柯秀尔:强词夺理!

什基里亚托夫:正是。一个最强词夺理的文件,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像托姆斯基在四月全会上说的:“强迫老布尔什维克们违背自己的良心承认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是错误。”他过去是这样说的,看来,他现在也确信自己是正

确的,如果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话,而且不仅是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提到的粮食收购问题上的错误。如果你们读一读这个文件,真是不想读它,让他们自己读一读并看一看自己在那里暴露的面目吧。他们在结尾说,“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推上集团或派别斗争的道路”。你们要注意,是有人推他们,而他们不愿意,并且说:“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但说是一回事,而行动有时往往是另一回事。没有人推你们,如果你们自己不愿意,没有人想这样做,但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有时也是有益的。

你们当然了解其他派别的经验。在这方面你们大概比其他人更清楚,组成一个反党派别是何等困难。毫无疑问,没有人把你们往这条路上推。四月全会之前发生了什么呢?难道没有对莫斯科组织的派别活动?让同志们说说这事吧。

工业学院沃罗比约夫的文件难道不就证明了这一点,证明在工业学院里进行过这种活动²⁰³。进行过尝试,可这种尝试并不那么容易,碰了钉子,而现在想要否认这一点。没有人推你们去进行派别活动。如果像托姆斯基说的那样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说出一切,那就用不着签署文件——“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难道需要三个人署名?应当让每一个人单独发言,说他个人怎么想的。难道这不像是制造派别活动?派别不仅是建立印刷所和印发传单。也有派别活动的其他方法,你们在用这个文件制造派别活动。你们说:别推我们!但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你们自己就会走到这一步。依我看,应当以另外的方式说这一点。中央四月全会以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道没给你们足够的时间改正错误吗?可你们向改正错误哪怕迈出了一步吗?没有。你们是直截了当这样开始自己的文件的: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被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什么地方说,你们是不平等的党员?可决议里说,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没有权利反对中央的决议。你们,政治局的委员,应当像任何一个党员一样捍卫中央的决议。可你们为改正自己关于右倾危险的错误做了什么呢?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为中央全会写的长达23页的提纲里(这个提纲未获通过)²⁰⁴,你们想,关于右倾危险和对右倾危险及对其抱调和态度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过什么吗?在前22页上是一般化的议论,而在第23页上他们谈了右倾的危险。关于一般问题,他所写的是每一个非党员都能说出的话——关于我们的困难,关于我们的成就,这里有个别同志的发言像非党员一样。他在自己的文件里是怎样谈与右倾斗争的必要性的:“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张速度有关的困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引起了党内个别分子的动摇。”

他只写了两行半：

“中央委员会全会强调指出，在最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挖掉国内资本主义最后根子的事业中，执行党的全部政策是与对党内的一切向右摇摆和种种对此的中立、不经意的调和态度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不经意的态度！就完了。全党都知道，在四月全会上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与党发生了分歧，成为右倾分子的首领。你们仍站在旧的立场上还是已经放弃了？在这之前你们从未表示放弃和谴责自己的立场，相反，是避而不答，害怕大声说右倾分子。

要是你们看看他们在政治局工作中的表现就好了！对政治局讨论的许多问题，他们在表决时既不投票赞成，也不投票反对。这应当怎样理解呢？

柯秀尔：他们想溜掉。

什基里亚托夫：正是，要溜掉。〔谈论红色危险的时候，他们有时会脸红。他们脸红，是不是在说他们。〕²⁰⁵这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发言过程中卡冈诺维奇插了一句话的时候，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便说：

“如果这里发言的人中有谁哪怕再说一句，说我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等等。”

同志们，这是为什么？是谁对你们这样说了？

柯秀尔：这是姿态。

什基里亚托夫：谁需要这样？每一个党员都会说，你们这是在蛊惑人心。

简短地谈谈阿斯特拉罕案件。如果你们读一读关于阿斯特拉罕案件的整个决议，你们就会明白，那里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被指控。〔那里有些人收了贿赂。当然，没有指控你们干了这事。为什么他们自己谈这事呢。〕²⁰⁵决议里说，我们的机关与私商接近并给予宽纵——这是右倾分子干的。但是在阿斯特拉罕的党组织里，许多领导过这个组织的党员没看见，没发现同私人资本的结合。如果有与私商的和平相处，这难道不是右倾危险？〔与私商和平相处——这就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经说的：“别动农民，别太伤害他。”在正在进行改造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而他们想和平相处和任何人都不触动。〕²⁰⁵

我们的国家有很大的困难，我们的党正在进行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党员应当团结一致，不允许有动摇，尤其是在党的司令部里。党能否指望今天在文件

里写一套,明天写完全另外一套的领导人呢?党能否指望这样的领导人呢?我认为,不能。这些同志应当怎样真正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去做呢?他们本应该走到这个讲台上,把一切都说出来,可他们带来了这个文件,用完全不应有的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因此党不能理解他们。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在自己党内形成领导人不可能有错误,而如果犯了一个错误,接着便会犯一系列新的错误,并且决不会认识和放弃错误这样一种风气呢?在我们巨大的工作中难道真的能不犯错误吗?这种情况也在你们身上发生了,你们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就动手写文件,对党的领导和全党横加指责。带着你们在四月全会上表明的分歧和动摇,不放弃自己的错误,很难与政治局一起对党进行领导*。

主席:现在请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发言。

克鲁普斯卡娅:中央提出的决议草案说:“……工业和运输业工作的质量指标的落后与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存在产品质量变坏的情况……”²⁰⁶说得有点过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决议草案接下去说,应当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等,但是没有分析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些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经济建设没有考虑在建企业工人的文化需要。在这里发言的同志每人都谈自己的那个方面,我也从自己的工作方面谈起。我们教育工作者常常有机会听到下层工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谈话。最近,刻赤工人代表团激动地说,一个巨大的刻赤工厂正在建设,而工人的孩子要走七俄里多的路去上学。克里米亚国民教育局一筹莫展,而经济管理干部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文化机关用房的建设在整个经济建设中将只占很小的比重,但是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可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什维尔尼克同志说过,高炉建起来了,但却没有可供工人烤干身上衣服的棚室,而我们根据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的经验,根据过去宣传鼓动的经验知道,没有开水,没有供工人烤干衣服的棚室会怎样地使工人的情绪低落。我认为,对文化机关、学校建设等的不重视就属于妨碍产品质量符合所提要求的原因之列,应当让经济管理干部在自己的计划里也添上这种建设的费用,以便使这种建设足够有力地进行。我指的不仅是高等学校,拨给它们钱是比较容易的,到提干部问题的时候,我将专门来谈,我说的是必须支持所有的教育机关,我说的是整个系统。必须为我们的宣传鼓动活动创造广泛的可能性和物质前提,因为应当说,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加深整个文化工作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

* 不知何人所加。——编者注

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有明确的目标,也有不灵巧的手,往往不得不盲目地行事。然后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时,所提出的目标明确性有些模糊了,但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学会了工作,学会了为我们的法令提供广泛的说服根据。当我们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谈了学会以新的方式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要仔细听群众所说的话和他们想要什么。应当说,在这里我们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现在,日前时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叫它,但考虑到已经走过的整个道路,毫无疑问,它应当把目标的清晰、目标的明确与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结合起来。这种本领是经过多年获得的,我们应当把这种本领利用起来。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农村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城市。要知道,现在我们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紧张气氛增加了,这是革命年代常有的那种紧张气氛。心理在急剧地变化。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这种新的心理在怎样发展,群众怎样以新的态度对待许多问题。这个方面也像我们的经济建设同样地重要。这是我们工业方面和在新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方面的成就的结果。但这同时也是群众心理上的巨大的革命变化。因此,同志们,我们当然应当十分留心,不要滑回到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新经济政策最初阶段的时期。

但是当你观察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思想不够深沉的同志有时像一匹听到军号的战马那样行事;从需要施加压力和进行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结论:不需要说服的方法,只需要靠命令办事。不久前我们就粮食收购问题召开了一次农村阅览室管理员会议。我不知道,这给了我们的农村阅览室管理员们什么,但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很多东西。第一,会议表明,农村阅览室管理员非常清楚粮食收购方面提出的目标,他们了解粮食收购应当争取达到什么目标,他们感到这些目标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同时应当说,我们看到的简单化作风够多了。例如,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农村阅览室管理员说:“我们是这样做的:三个富农没向我们交粮食,第四个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没交粮食。我们便对他们进行审判,把全村召集起来,大骂了他们一通,他们马上就全都交了,村民的情绪高涨起来了。”那时这位西伯利亚农村阅览室管理员说:“这是阶级反常现象。”我按老习惯困惑不解地喊道:“怎么会是阶级反常现象?”他说:“难道可以和富农,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谈话?您是在排戏,而应当把他们直接交给法庭审判,不应当进行任何的谈话,这是右倾。”我说,您不只是和他们谈话,而重要的是让全村参与了此事,使所有的人都更清楚了,这里不应该有任何动摇。“不行,——这位西伯利亚农村阅览室管理员说,——这是对阶级路线的歪曲。”后来当我和同志们谈话的时

候,我看到,不仅农村阅览室管理员这样看,而且这是非常普遍的观点,现在问题不在于说服,用不着任何说服,交给法庭——就完事了。我们也应当靠施加压力办事,但是放弃提供说服的根据——这完全不是我们的观点。我说的那个农村阅览室管理员是西伯利亚人,而西伯利亚的富农是顽固的。这位西伯利亚农村阅览室管理员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仅是西伯利亚人这样看问题。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现在我来谈令大家十分不安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问题。依我看,这篇声明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把把这个声明与他们过去写的那些文件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前进了一大步,可以看到整个建设,整个形势使以前的谈话成为不可能了。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也是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但是也应当指出另一点,依我看,这个声明写得非常不正确。本应当简短地说放弃错误,而不是一一列举谁委屈了谁,什么报纸上写了什么。不能在这样的声明里,在人们放弃所说过的话的基本文件里争吵。我觉得,委婉地说,这个声明很不妥当。

臧声:委婉,太委婉了。(笑声)

克鲁普斯卡娅: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个文件呢?我理解这个文件引起的强烈气愤。要知道,在座的同志们每人都在自己的领域担负着重大的工作,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得如何克服大量的困难。描述困难是容易的,但应当指出如何在斗争中实际地去克服这些困难。问题就在这里。因此,在谈到所提出的这个声明的时候,所有发言的同志都特别气愤地说,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感觉不到对党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巨大的创造性工作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在向前看的时候,我们应当说,由于党内的种种争论我们会受到损失。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损失呢?因为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又一个新的障碍。因此,依我看,应当考虑我们该怎样把这减少到最低限度。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当然,这样的声明是完全不够的。但我们关心的是,如果人们通过生活现在已经50%相信了,他们会迈出下一步的。因此应当从两方面对待问题:一方面,指出这个文件是完全不够的,另一方面,向前看并把提出声明的人置于这样的环境,让他们更快地迈出这一步,当然,很高的警惕性仍会保留下来,甚至于提高,所以现在只能加倍注意他们的每一步和特别慎重地评价他们的行动,但同时应当把他们置于这样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彻底相信并且说:“是的,我们错了,党是100%正确的,没有什么话好说,让我们来工作。我们不仅确信,而且我们将进行工作,在每一件小事上帮助党,帮助党正在进行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

有人喊：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纠缠。

克鲁普斯卡娅：所以我说，没有时间纠缠，结果产生了很大的麻烦。你们考虑考虑，我们应当开展自我批评。我们都承认这一点。有这样一句古老的俗语：不耕田的人没有罪孽，不干事的人没有错误。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会出现一些很小的，甚至不很小的，而且有时还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关心的是在工作过程中纠正这些错误（顺便说，布哈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个别的事实加以概括并从这些发生过的个别失误中作出了普遍的结论，这些结论依我看是完全要不得的）。我们在工作中需要自我批评，它会帮助我们。而人们不敢说话，因为怕被指责为右倾。在一个没有合适黏土的地方要建一个砖厂。人们不敢说，黏土不好：会被指责为右倾，会说你不懂得建设的重要性，“此事与我无关”。后来工厂开始建设，国家因此受到重大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党内的磨擦妨碍自我批评，我们关心消除这些摩擦，我们应当向前看并好好地考虑，我们应当怎样创造这样的条件，以便彻底消除右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布哈林是党最喜欢的人。我们也了解这些同志的优点。我们从一个观点看待，也只能从一个观点看待：凡是对党、对事业有益的东西都是好的，而对党有害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

有人喊：对！

克鲁普斯卡娅：我们应当把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争取做到使所有的同志都怀着像此前那样紧张和继续工作的愿望离开这次全会，去争取更大的成绩。

有人喊：怎么能带着这样的声明心情好地走出去呢？

克鲁普斯卡娅：一篇已经写了，还可以写另外一篇，党也可以要求另外的回答。

柯秀尔：说服没有用的地方，就需要强迫。

主席：现在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

雅罗斯拉夫斯基²⁰⁷：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有一次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当大家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非常愿意接受党的任何指示。他说：“无论我还是其他人，我们可能会继续犯错误。中央和中央委员越少纠正我们，我们就会犯越多的错误。”

然而，当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和稍早时候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²⁰⁸试图纠正他们的错误时，他们却用声明、书面文件迎接我们的尝试，他们昨天在自己的声明里并未撤销它们。

米高扬：他们重申了自己四月纲领的正确性。

雅罗斯拉夫斯基：他们没说，他们先前的声明是不对的，他们放弃他们文件里含有的那些诽谤性的指控。避而不谈这一点就等于说：“瞧，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犯的一个小错误，这就是对实行非常措施必要性理解的问题上，即非常措施应当作为制度还是临时措施实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他们都是正确的，我们对他们的指控，如他们的文件所说，是“卑鄙的指控”。但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向党提出了怎样的指责。是否不仅向党的总书记，而且向全党提出了指责，说我们宣扬并且对农民实行了封建剥削政策，说个别课税和其他非常措施是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政策呢？

你们的这种说法在国内引起了什么反响和在什么阶层中引起了反响呢？首先，是在富农阶层的居民中。当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说，这个右倾集团是一个小集团的时候，他忽视了，问题当然不在于它是小是大，而在于这个集团关于“对农民实行封建剥削政策”的这种说法在哪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这个集团引起的反响主要是在农村富农阶层中间和工人阶级中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阶层中间——这种人我们这里还不少。我们这里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新的阶层参加了进来，这些阶层常常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小私有者阶层，他们喜欢顺手接过理论上能为他们想要的东西辩护的任何话语。

对党内的情况曾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指责，这类指责有，诸如：我们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全党闭口不谈工人阶级关心的一切伤脑筋的问题，我们的党内民主只是为了装门面，我们没有一个选举产生的书记，我们在培植官僚主义而不是与之斗争。这些说法撤销了没有呢？要知道，这些说法是针对全党的，它们包含在1929年春天宣读的文件里。你们应当，必须说，你们认为你们这些声明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你们放弃它们。这里有没在你们声明上签字的、曾经有过动摇的其他同志，例如乌格拉诺夫同志。为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不像科托夫同志所做的那样老实地说，他的动摇是错误的，反对派的这些说法是不对的，他放弃它们，他不赞同它们，因为它们对党有害，会动摇和破坏对党的信任。为什么不说呢？你们必须这样说。但是，你们既然不这样说，你们就是使它们仍然有效，你们不仅使它们成为你们个人的说法，你们使它们成为你们的追随者和拥护者的整个集团的说法。

当你们指责共产国际的时候，说你们反对共产国际实行的“……对西方加倍荒唐的政策和领导方法，用吆喝代替证据，认为所谓的‘自己人’是主要的，虽然这些‘自己人’曾经是整脚的政治家，而且还具有一些其他非常可疑的品

质”……“在共产国际系统,代替‘指路明灯’和‘热情’的是‘自行’减少‘秋播作物’:分裂,脱离,集团——没有一点集中力量的痕迹”²⁰⁹。

就是你们的这些说法成了形形色色的赛拉、埃姆拜尔·特罗、埃韦特的旗帜,成了一切不愿服从党的纪律、反对所谓“莫斯科方法”的人——瑞典右派、美国右派、德国右派、捷克斯洛伐克右派的旗帜。可你们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取消过它们吗?“要知道,你们曾经有20次机会出来在报刊上说明激烈地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各个分裂主义集团的错误。当这些集团企图依靠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有机会并且必须表态的,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必须表明自己对这些争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态度。没有一次,没有一句话,——沉默,嘴里含满了水。你们和谁在一起?和共产国际在一起?和党在一起还是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所通过的决议?谁了解你们,要知道,你们一次、一句话也没说。玩弄沉默的这种把戏对布尔什维克是不体面的;当残酷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当反对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部分人以你们的声明为依据的时候,在这个时刻沉默是十分有害的东西。当你们说,你们没有表示过反对,没有作过任何派别性的发言的时候,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有时沉默比公开的声明更坏,因为当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至少会清楚表明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而当你们沉默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认为,你们发表的那些指责共产国际、指责党的声明仍然有效。问题就在这里。你们有一系列这种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党的声明,而你们不说这些声明已经撤销。

他们现在说:“我们没有过深刻的分歧。”这不对!有过深刻的、原则性的分歧,应当说这些分歧,这些分歧是你们自己不久前宣布的。要是想一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三个年头,拥有150万党员的大党有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和这样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它们开会是为了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同志提出明明是捏造的指控,难道真的都发疯了吗?我们为什么在1929年4月对右倾分子作出了严厉的评价和严厉的决定?因为你们发表的那些声明是破坏性的、有害的、危险的,它们鼓舞了右倾。布哈林同志曾经宣称:“也许,正是在这方面有细微的差别,这一点就构成了整个‘音乐’。”有可能。但是,对这一点我“有点”不相信。我认为,我们能够推进工业化的速度,也许,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但有一个条件,如果我们能为个体贫中农户的个人和商业利益奠定基础。这就是基本中心。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计划就有垮台的危险。²¹⁰

这才是基本的中心问题。正当全党认为推进农业的集体化正是重心的时候,你们却认为充分发挥个体户的个人和商业利益是基本中心。难道这不是根

本分歧、最严重的分歧之一？对这个问题你们在文件里说了什么了？什么也没说。就是说，这个说法仍然有效。你们把它撤销了吗？那就请你们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错了，党是正确的。

李可夫同志今年春天说：“其次，我应当说，在一切基本方面我赞同布哈林同志的意见，也赞同他在这里宣读的那个文件……其次，指责布哈林同志，说他要求取消个别课税。我也要求过取消个别课税，我在最后一次全会上公开声明过这一点。”

我们要问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同志：这个取消个别课税的要求，它是否仍然有效？这不仅是今天的问题。要知道，我们在实行个别课税并且不能保证今后不再继续实行。要知道，我们正在用这样的经济措施与富农斗争，而你们说，你们是赞成与富农斗争的。那你们对这些措施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你们曾经说过，你们反对这些措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你们对这些措施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而你们在自己今天的声明里什么也没说。

下面我举李可夫同志的这类声明：

“无论如何我们今年无法做到扩大播种面积7%。因此，明年我们也摆脱不了我们现有的困难。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危机，其时间的长短得用几年来计算。曾经有过如何克服这场危机的争论……”

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危机，其时间的长短可以用几年来计算，这种说法现在对不对呢？当然，不应当缩小困难；但是党有一个方针——五年计划的方针是不让这场危机延续几年，而是在最近两年内把粮食问题解决到这种地步，至少解决面包危机。你们说，你们同意五年计划。我觉得，你们投票赞成五年计划的时候，你们做的与托洛茨基分子说他们赞成七小时工作日时候的做法完全一样。像你们提出这样的保留条件和保持这样的沉默，人们可以认为，你们并不赞成五年计划，因为你们仍然确信，我们终究在经历一场持续的危机，其时间的长短得以几年来计算。

其次，我来举通货膨胀问题。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在这方面的基本错误在于，他完全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是一个很蹩脚的辩证法家的评语。布哈林同志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把对资产阶级国家正确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机械地搬过来，完全用于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关系。

请看通货膨胀问题。当然，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规律，我们肯定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因此，他在把这些政治经济学规律机械地搬到苏维埃国家来的时候，大喊通货膨胀，四处奔波，用通货膨胀吓唬所有的人，吓唬皮亚塔科

夫,有一次逮住了我:“你难道没看见?我们要完蛋了,我们正处于灾难的前夜,我们通货膨胀了,”——他浑身抖成了一团。为什么?因为书生气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概念是一回事,而在阶级关系完全不同、很多东西不同、市场关系问题不同、我们的财政制度问题不同的完全另外一个环境里试图辩证地、马克思主义地、列宁主义地解决这些问题却是另一回事。有一次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反驳我们观点的时候,发挥了这种错误的主张,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规律在我们这里全部适用²¹¹。布哈林同志现在也有这个毛病。还有没有通货膨胀呢?可布哈林同志曾经用这种通货膨胀吓唬我们,他是这样说的:

“与托洛茨基的印象主义的计划不同,我们过去那么关心其坚挺的我们货币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的明显征兆。”²¹²他说过:“我们无疑有了通货膨胀。”

而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说过些什么呢?现在他们说:“没有任何分歧。”而李可夫曾经宣称:“简单的数量上的计算向我们表明,最近几年它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会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可五年计划表明什么呢?可来自地方的一切报告表明什么呢?它们表明,我们的集体农庄有了迅猛,巨大,甚至我们未曾预见到的发展。它们表明,最近几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将提供商品粮的主要部分。我要问:三位同志放弃不放弃自己先前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意义的估计?

李可夫同志提出了明显的原则性的错误,根本的原则性的错误,而现在他在任何地方只字未提,我们对此应当怎样想呢?要知道,他春天宣称,党的错误似乎在于“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社会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评述,这必然会导致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基础的非常课税的做法”²¹³。这个说法是他提出的,但为什么现在他对此一言不发?要知道,这是对党的最严重的指责,指责我们执行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指责我们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对此我们一句话也未曾听见,文件里也只字未说,这个指责是否仍然有效。这就意味着,这一指责仍然有效。这就意味着,党的和共产国际的关于右倾分子的决议也都仍然有效。

我想再占大家一点时间。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它会推翻一切期望:如果这些同志不改变他们现在所持的立场,根据这个文件判断,那我们就不会有右倾派别。我就不说中央已经通知自己成员的事情,即印发被称为《别再流血了》的地下传单的事了²¹⁴。传单是以李可夫同志的声明开始的。李可夫在自己的一

次讲话中说过,有人想要布哈林流血。他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有人想要布哈林流血。”

右倾分子印发的地下传单的题目是:《别再流血了》。传单说,你们想要布哈林流血,不要再流血了。接着传单就发挥托洛茨基分子关于列宁留下了关于斯大林同志的遗嘱,而我们不执行这个遗嘱的观点。明显是一个右倾分子写的这张传单也完全是从托洛茨基分子那一头开始的,他向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卖弄风情,说本来不应当流放托洛茨基,等等,等等。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声明,他抗议说他们与地下传单有关系的任何怀疑。我想,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即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写,没有校订,没有印发这张传单,无论布哈林,无论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与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同志们,问题不在于他们与这张传单的印发是否有直接关系,而在于他们怎样鼓舞了其他人。请看某个普列杰因的发言,关于他我们曾在《布尔什维克》²¹⁵和《真理报》上写过文章,他一方面根据弗鲁姆金同志的信,另一方面根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几次声明所包含的那些论点,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纲领。你们不要忘了,几次全会的记录现在已经传达到几乎每个党员,因为我们在公开的党员大会上宣读它们。他们也读右倾分子的这些声明。普列杰因表述了一个完整的纲领。请看他的声明:

“这些措施应当有以下几点:

1. 通过下列办法降低对全体农民的税收:

(1)取消对收入500卢布以上的中农和富裕农户的附加税率(收入500卢布以下的没有附加税率);

(2)降低年收入不超过2000卢布的所有农户的统一农业税的累进率;

(3)取消对富农的个别课税;

(4)不得向所有农户收取35%以上的公益捐;

(5)降低间接税,即降低日用工业品的价格。

2. 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和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在粮食和原料收购问题上。

3. 给予所有阶层的农民参加合作社的广泛权利。

4. 给予私人手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充分自由,免除手工业者和手艺人的沉重税收。”

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富农的纲领,其中也包含三人便笺里表述的要求²¹⁶。问题就在这里。右倾分子从这封三人便笺里吸取东西写传单,还将为某个富农协

会吸取东西,从你们的主张里吸取东西。

请看公然的托洛茨基分子某个马克耶夫10月9日在第十三印刷厂公开的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

“社会民主派在壮大并拥有很大的力量。生活费用在上涨。从我们各个工厂拿走的利润弄到哪里去了?工人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在降低自己的身价并以此帮资本家的忙。我们没看见倾向,而只听到一面之词。我们听不到布哈林的声音。”²¹⁷

你们看见了,沉默意味着什么。沉默不总是金。它有时是很坏的东西,当随便什么人开始利用你们的名义的时刻,你们却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如果你们不坦率说出自己的错误,不说明任何人都无权打着你们的名义宣扬这样的观点,这种沉默更坏,比你们在辩论中公开反对我们更有害。

请看另一个反党声明——退党声明。我就不读整个声明了。这是拉佐廖诺夫1929年10月24日的声明。他宣称:

“我们注定要衰竭和死绝。既然我们的革命权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曾经证明,没有有意识的刺激、创造的动机和经济要素的积累。

要是不相信他们,那我永远不会相信斯大林的应声虫。”²¹⁸

你们要知道,你们正在成为什么人的旗帜,你们正在成为公然反党的、与党决裂的人们的旗帜。你们怎么能够仅仅发表“分歧消除了”这样一个声明呢?

请看已被我们开除出党的皮萨列夫的声明:

“我,——他说,——我站到右倾立场上来是有充分根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已存在比例失调,这正在导致整个苏联经济的退化。集体化——这不是改造农业的基本方法。”²¹⁹

“集体化——这不是改造农业的基本方法”——这话是从哪里拿来的?我肯定地说,这话是从布哈林那里,从他关于列宁的政治遗嘱的讲话里拿来的²²⁰。“集体化——这不是改造农业的基本方法”就是从这里来的。某个同党决裂的皮萨列夫在寻找他应当怎样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决裂并发现了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富农的本质。

然后再看也被我们开除出党的苏博京的另一个声明。当有人问他,他是否犯有右倾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宣称:

“在有些问题上我不同意党的路线,特别是,他说,如果我们将继续搞集体农庄运动,那我们就完蛋了。集体农庄最多支撑一两年就会垮台。此外,它们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我认为,需要给富农发展的机会,这是摆脱粮食困难的唯一可

能。党采取的指靠集体农庄的方针是不对的。1919年提出过同样的方针,结果失败了,现在又在继续干同样的事情。”

还有。党对富农的政策是否正确呢?他回答说:

“党对富农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党不给富农以发展的机会,在农村点燃阶级斗争,总的说来党对农民问题的领导是极为有害的。富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危险,我认为,他们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²²¹

这些话又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哪里拿来的?我肯定地说,这些话他是从布哈林的著作里拿来的²²²。

请看过去的党员科热夫尼科夫的声明²²³。

“从1928年秋天开始,我和其他许多同志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党开始实行不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借用来的。

1. 把农村的全部余粮拿走。
2. 农民真的成了工业的殖民地。
3. 工业品的价格如雨后春笋般上涨。
4. 中农真的被中立化了。
5. 采取了超出任何工业化的速度,我们肯定会同这种速度一起覆灭。
6. 由于扶植集体农庄,春天向其投入巨额资金,而到秋天其中50%便瓦解了,因此我们的中农没有发展前途,而如果让他们发展,由于集体农庄还为时过早,他们会在消除困难中发挥很大的效应。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不降低超工业化的速度,不中止扶植集体农庄(现在只有命运不济的人还去参加),不废除对农民的各种剥削和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采用(到农民的粮仓里去,把全部余粮拿走),不让大部分农民发展,那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被断送,因为现在已经与大部分农民完全脱离了(一一列举事实需要很多纸张)。”

“从与红军战士们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到,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同意支持布哈林同志提出的为全体农民,特别是红军战士所理解的路线。”

“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看到了这一点并会渐渐地确信,他不会跟着你们的路线走,而将跟着布哈林同志提出的路线走,因为这条路线他更理解和更适合于他的产业。所以他也考虑会受到迫害。”

同志们,我可以给你们列举很多这样的事实,但我不再列举了,我认为,这些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昨天所发表的这种声明不仅不可能使中央委员会感到满意,现在也完全不可能带着这篇声明去看工

人并向他们解释,对党说了这么多错误言论的人究竟用什么办法,究竟怎么会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这是无法解释的。因此,他们自己应当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坚决、爽快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同我们一道工作很久很久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反对过其他派别组织,他们了解,派别斗争的逻辑是怎样地甚至不管搞派别斗争的人的意志或愿意与否而发展的。

这些同志徒劳无益地说,他们是被人推上了这种派别斗争。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这里说得对:没有人推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把他们推上派别斗争道路的,是他们自己的立场使他们成为反苏维埃、反党分子的中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我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把希望寄托于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分子,在我们国家里不可能获得成功;公开把希望寄托于建立另一个党的萨普罗诺夫分子²²⁴,在我们国家里不可能获得成功;而这些发誓效忠列宁主义,发誓说他们与党没有分歧的同志,同时怀里继续揣着石头,这石头就是他们已经发表的、以前并未撤销的那些声明,所有这些同志都可能成为随便什么反对派的旗帜。这些同志可能成为最极端的富农分子的旗帜,后者将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同志在各种声明里提出的各种不正确的、错误的反党主张作为自己的政纲,作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应当放弃这些声明,他们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坦率精神承认这些声明是错误的。

主席:现在请苏利莫夫同志发言。

苏利莫夫:在右倾反对派遭到十分重大的失败之后,全会本有权期待他们真诚地承认错误。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相反,我们听到了虚伪的、不真诚的声明,它非常像以前各个反对派的许多声明。

喊声:对!

苏利莫夫:当然,从李可夫同志对这篇声明的宣读中,很难准确地领会这整篇声明的含义(声明的印刷材料现在刚发下来),但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把自己与党的分歧仅仅归结为实行非常措施的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呢?即使他们与党的分歧仅仅归结为非常措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不看到,非常措施植根于党的整个政策,右倾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应是由他们与党的方针迥异的独特方针决定的。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发给了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份厚的材料——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两篇声明,一篇好像是1月30日的,另一篇是2月9日的。只要浏览一下这些文件,就可以看到,右倾反对派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是对我们党的政策的全面的分歧。

现在掩盖这个问题将是可笑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1928—1929年度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成果是另一个样子,反对派会说些什么,他们的行动会是怎样。他们会说完完全全另外一套,大体上是: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警告过,我们预见到了,你们不听,等等。他们的声明就会归结到这里。

如果在作出了经济和政治方面成就这样十分巨大的总结之后(我们可以拿工业、拿农业集体化、拿任何一项工作为例),如果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之后,他们除了出来发表这篇虚伪的声明找不到任何别的可说,那么,我再说一遍,可以想象,假如我们总结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小一些或者他们的“预见”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他们会出来说些什么!不想与他们声明的个别提纲或个别要点进行详细和单独的论战,我应当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的声明总的说有点像一句俄罗斯谚语:“狡猾的米特里死了,却睁眼瞧着。”

喊声:对!

苏利莫夫:他们宣称,分歧消除了,分歧消失了,等等。但从这篇声明的连篇累牍的议论中闪现出,他们还活着,他们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便恢复自己的进攻。全会的参加者谁也没有形成这样的印象,由于这篇声明右倾反对派就在党的面前放下自己的武器。我的印象也是这样。我们有权指望,为了党的统一,反对派会到我们面前来老实地、真诚地放下自己右倾机会主义的武器并且说:“是的,是在这样的和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错了,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也承认,党内许多别的不太著名的、影响比较一般的同志跟着我们走了,是我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成为国内右倾分子的某种旗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没有作应有的反应。”他们本应当这样说,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声明。全会应当从这一切中作出结论,我们不能继续容忍最近政治局里,总司令部里的这种状况。为了事业,为了继续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就,我们必须作出组织结论。我认为,我们应当就在这次全会上作出这些结论。

现在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个中央全会上很少触及的问题,即关于“轨道”的问题。在这里曾触及轨道,但角度有些不同。我想从运输业需要的角度来谈轨道。

波斯特舍夫:你也谈谈机车吧。

苏利莫夫:机车和轨道是一个产业,在谈轨道的时候,就一定得谈机车等等。运输业的工作是整个国民经济派生出来的工作,如果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其主导部分——工业如此蓬勃、如此迅猛地在发展,这一点本身就迫使把我们的运输工具也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向运输业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这些要求必须得到保证,一方面……

米高扬:关于这一点三人声明里没有写。

苏利莫夫:我转换话题了。

有人喊:关于冷藏车写了吗?

苏利莫夫:关于冷藏车我也要谈,因为我们遇到了缺乏冷藏车的困难,这对运输业的正常工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晌。

我再说一遍,我们最近几年应当完成的大量的运输工作必须得到保证,一方面通过大力改进运输业内部的工作、加速车辆和机车周转、提高运输业内部工作的质量指标,另一方面通过运输业的合理化和改造,通过新建铁路和公路及改进水路运输。

而且,我应当告诉你们,五年计划的货运量的计算计划只是以供给为依据的,最近几年我们在制定运输计划方面将会有所改进。特别是计划预见到了,通过运输的合理化最近几年我们将缩短平均行驶里程。众所周知,革命前俄罗斯的平均行驶里程为496公里。我们最近时期的平均行驶里程保持在600公里的水平上,这当然就使铁路运载同等数量货物的工作大大增加。五年计划预计,平均行驶里程问题将通过工业、农业和其他运输更合规划得到改善,正因为如此计划规定了降低货物平均运输里程。由此就得出了,在工业品五年期间增长230%的同时,计划预计货运量将增长192%。就是说,货运量增长的速度故意预计得低于工业增长的速度。指望工业增长230%和货运量增长192%之间的这个差额将会由运输计划的某种改进加以弥补。

1928—1929年度,即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工作实践和1929—1930年度已经比较现实的货物前景说明,这些设想在生活中落空了。平均行驶里程丝毫没有降低,相反,平均行驶里程不是计划规定的1928—1929年度的590公里,而将是605公里,甚至更多。计划预计的货运量被生活大大地超过了。其中,1928—1929年度的铁路运输工作在货运方面超过计划一年多,而在客运方面超过了几乎两年。

我不再用数字腻烦你们,但有一点,即我们的运输工作大大走到了计划的前面,单是这一点就不能不造成运输业本身工作的许多困难,特别是在所谓的货运量季节性增加的时期。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计划提出的运输业的改造措施有些落在了计划的后面。在这方面,限制我们的不是拨款,而是机器制造工业。所以国家计委过去曾经正确地指出,工业应当走在运输业的前面,因为只有组织良好的强大的冶金工业,特别

是机器制造业才能成为运输业改造的基础。

去年的工业对我们运输业的欠货不仅有钢轨,不仅有金属工业其他大量产品,而且还有直接决定运输业改造的那类部件。就拿我们全部机车和运输工具现代化这件事来说吧。大家都已经知道,给蒸汽机车安装给水过热器和蒸汽过热器能给经营带来极大的效果,尤其是在燃料消耗方面。这花钱不多,但运输业由此获得的效益却是巨大的。尽管所提出的1928—1929年度我们蒸汽机车现代化的计划很小,计划只完成了50%。

(托洛孔采夫同志的插话没有听清)

不,托洛孔采夫同志,这是一种复杂的机器,我们工厂的设备肯定不适合生产。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工厂里制造这种蒸汽和给水过热器,那当然是最好的出路,但可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就像货运量超过计划一年和运输业改造措施落后于计划一样)也无疑是造成我们工作中相当大困难的原因。

对于未来几年的运输业应当作出的结论就是政治局在提纲里提出的那些结论,运输问题或者交通运输业在提纲里就已经被认为是瓶颈。去年,如果同志们还记得中央全会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²²⁵我在全会上的发言,我就说过,运输业现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只能说是瓶颈。我知道,在这次全会上已不可能在增加运输业投资方面对控制数字进行任何修改,但从这种认同中当然应当作出对未来投资、对加快运输业改造速度方面的结论。确实,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情况:从1924—1925年度到1927—1928年度四年期间对工业的投资,对工业固定资本的投资为其固定资本的36%,而同一时期对运输业的仅为4.5%。我不想争辩,由于运输业的改造取决于工业,在国民经济现阶段这条工业控制投资超前的路线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今后两年,即1928—1929、1929—1930年度,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这方面也大大高于运输业,1929—1930年度全部计划内工业投资的增长为76%,而重工业为96%(这引自国家计委的小册子),而铁路运输的投资仅为48%。这样一来,对工业和运输业投资的不均衡不仅不会消除,甚至还在加剧。因此,我认为突出强调作为瓶颈的交通运输问题是及时的和正确的。现在我不详细谈这个题目,因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已经作出决定)将有一个关于运输业的专门的报告²²⁶。

有人喊:终于盼到了!

苏利莫夫:是的,终于将有一个报告,那时所有的运输问题应当全面讨论。那时,可能有许多人会骂我们,趁现在他们还没骂我们,我先利用这个机会来骂

别人。

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一个情况。许多同志,甚至很有威望的同志对运输业存在着错误的看法。不久前,在一些谈话里我遇到了对一些毫无疑义的东西的不理解。第一,运输业本身的财源。令我们感到可惜的是,舆论把各种运输部门的运输工作成果和财务总列在一起。国家预算也只提供总的总结资料,结果,像铁路运输这一运输部门的成绩得到的是歪曲的反映。实际上我们的情形是这样的,铁路运输今年的收入为25.65亿卢布(我只说整数),铁路运输的运营支出为16.5亿,因而铁路运输只剩下9亿卢布。

[奥尔忠尼启则:对运输业发言的人有没有限定时间?

鲁祖塔克:至少他们比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们讲得时间短。(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不,不,苏利莫夫,请你接着讲,我只是问问主席。]²²⁷

苏利莫夫:对现有铁路网的投资大约为5.8亿卢布。新的铁路建设,即使把它列入铁路的支出(但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要知道,工业新厂的建设不列入经常项目支出),但是即使把拨给新的铁路建设的这2.65亿卢布列入铁路运输的支出,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约1.5亿卢布会被从铁路运输拿走并转用于水路运输、无轨道运输、航空运输等运输业预算中已有的开支项目。我们拥有的运输业总投资似乎相当大。但如果把铁路运输的投资单独分出来,那就只能说,这里投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其他运输部门。今年公路方面的基本建设增加一倍,在造船和水路方面我们也有相当大的增加,航空运输——这是一项新的事业,虽然应当预先说明,对这些运输部门投资的绝对数额,委婉地说,是微不足道的。

米高扬:水路运输的情况很不好。

苏利莫夫:我知道您会这样说,所以我想专门为您提供一份资料。我不否认,我们水路运输的情况比铁路运输更差。

波斯特舍夫:铁路职工历来怕水。

有人喊:他们不怕。

苏利莫夫:并非完全如此,何况我们还有水运业务,每个流域单独划分为类似托拉斯级别的单位并规定与任何工业托拉斯同样的结构。当然,从这一方面看,与我们经常仔细检查的靠国家预算维持的铁路相比等等,它们离交通人民委员部更远一些,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此。拿我们最重要的水运干线——伏尔加河为例,我们在那里拥有什么,那里像牵引力这样极为重要的水路运输的要素和整个吨位的情况怎样呢?就蒸汽船队而言,我们只有革命前的1913年的35%或者40%。

米高扬:看见了吧,我也是这么说的,这我了解!

苏利莫夫:非蒸汽船队……

米高扬:还要少。

苏利莫夫:是的,还要少——27%—28%。

米高扬:问题就在这里!

苏利莫夫:今年的工作量为战前的70%,甚至76%。这里的问题何在呢?问题部分在于,国家预算的状况不允许对我们的水运业进行比较巨额的投资。这是一。第二,这方面最重要的限制是造船厂。关于我们的海运业,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米高扬:委婉地说,实际上我们对水路运输有些忽视了。

苏利莫夫:我甚至不会说,我们忽视了。我再说一遍,在未来的全会上我们会向你们汇报,什么时候曾经和怎样提出过造船的问题。最近三年造船问题完全不是卡在国家拨款上,而完全是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造船厂的限额上。革命前造船业的情况,特别是海洋船舶制造业的情况很糟糕。革命前我们俄罗斯完全没有海洋商用船舶制造业。米高扬同志,您自己非常了解并与此事有密切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海洋船队扩大一倍的话,那么,单从租用外国轮船一项,我们每年就可以节约很大的一笔支出,即1亿或1.5亿外汇。各内河航运公司的船舶的情况由于船舶的技术状况非常糟糕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大部分机器的使用年限已经在25—30年以上。

关于运输业需要说的话很多,但是我没有时间,我只想请你们再注意下面一个情况。可以作为我们运输系统某些成就标志的有:第一,铁路运营系数,这个运营系数今年预算规定为64%,即铁路运输收入的每一个卢布中64戈比用于铁路运输的维护和运营,而36戈比用于新的工程。

有人喊:用于基本建设?

苏利莫夫:是的,用于基本建设和其他运输部门。第二,降低运输成本。如果拿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即1928—1929和1929—1930年度为例,那么,我们1928—1929年度已经达到的和所拟定的1929—1930年度降低运输产品成本的指标大约将为19%。当然,这不是极限,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最近一年半期间在改进我们工作的各个环节方面,在改进和利用我们的车辆和全部运输工具方面加劲干的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因素。

主席:请允许我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以后)

主席:现在继续开会。请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请求给我半个小时,鲁祖塔克同志。

喊声:给,给。

莫洛托夫²²⁸:在李可夫同志按照在座各位十分熟悉的上一个时期某些全会的成例宣读了预先准备、事先写好的三人集团的文件以后,在这之后不能不首先谈根本的问题,党的路线的问题。

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文件是以重复李可夫同志在自己最后一次讲话中的声明开始的,他的那次讲话也是受三人委托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表的。文件是以含糊其词地指出三人集团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似乎“不平等的地位”开头的。

现在我来读文件的开头:

“上一次中央全会(1929年4月)作出了关于我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决议,指控我们右倾并把我们在党内及其领导机关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黑体是我表示的*——维·莫·)

这些同志说的到底是怎样的“不平等的地位”呢?中央四月全会通过谴责他们右倾立场的决议以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形成了什么“不平等的地位”呢?如果这些同志多少珍惜自己立场的原则方面,他们至少应当明确地说,他们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没有充分的权利”表现在哪里。但是,无论在四月全会上,还是在昨天宣读的文件里他们都没有把上述模棱两可的话说清楚。其实很清楚,关于中央委员集团不平等的含糊其词的声明,只要根据下面一点就可以理解——这个集团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会里的一个方面,把自己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我们”与中央。

斯大林:集团联合会!

莫洛托夫:[如果我们有二个中央,那就可以说:没有一个党中央,而实际上有二个中央,两种政策,两条路线,于是就没有权利平等,没有平等,你要明白,就需要容让。]²²⁹三人集团实际上滑到了否定一个中央的地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捍卫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政策、自己的集团的时候,把自己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只有从这种对立出发,才谈得到声明他们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里不平等。他们仍然是一个集团,所以努力为自己中央委员会里争取,你要明

* 速记报告文本中为半黑体字。——编者注

白,充分的权利和“平等”。

米高扬:权利平等。

莫洛托夫:是的,这是要求权利平等。用不着证明,这种要求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关于“不平等的地位”的含糊其词的声明是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宣读的文件作者们毫无原则性、毫无思想性的最典型表现之一,这个文件是彻底虚伪、彻底伪善、彻底两面派的文件。对于这一点已经有几位同志在这里发表了意见,我觉得,他们讲得十分令人信服。

但是全会最后总得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三位政治局委员在这里讲的是怎样的“权利不平等”和什么“不平等”?说实在的,他们在谋求什么,他们想向中央委员会和向党要什么?

如果这种“不平等”在于,他们的观点受到党的谴责和被中央四月全会定性为右倾观点……

米高扬:这是有理由的。

莫洛托夫:(如果是这样,)那么,且不说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是得到全党和共产国际承认的,且不说这一切,我们应当提醒三位同志,过去当托洛茨基的观点被认定为反列宁主义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的时候,托洛茨基当时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说自己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里“不平等”。我再说一遍,过去当托洛茨基集团企图把党从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拉下来并因此受到党严厉谴责的时候,托洛茨基及其集团当时同样可以说不平等。

在这之后,无论布哈林集团在自己的“宣言”中如何庄严地宣告“分歧撤销了”,布尔什维克中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不,从他们就“不平等”对中央的攻击中我们看到,布哈林集团把自己视为党内的反对派。“我们”与党——这个论点是每个反对派最典型的特点之一。三人集团文件中关于“不平等”的模棱两可的词句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凡是愿意执行党的政策并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在中央同心协力工作的人,就不会说“不平等的地位”和“不平等”。三位政治局委员对待事情的方法不同。如他们自己的文件所表明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党的反对派,视为这个反对派在中央里的领袖。这样他们就走上了派别活动的道路。现在我们不得不从这个事实出发。

李可夫等同志的文件里说,在有一条总路线的情况下三人集团过去和现在都赞成与党不同的执行这条路线的方法。他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党的和布哈林集团的路线是一条,但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方法”有差别。

三人集团接着承认,“在党所采取的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方法的轨道上”,“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三人集团在指出“党的毫无疑问的成就”的时候,宣称:“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之间的分歧消除了。”总之,在继续顽固坚持地说,“如果采用我们(即三人集团——维·莫·)在四月全会上提出的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方法,我们就会通过痛苦较少的途径获得所期望的成果”的同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不得不承认党的成就,甚至企图在不放弃自己根本性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情况下,在“分歧消除了”的说法后面躲藏起来。

下面我还要谈,什么是布哈林集团执行党的政策的特殊的“具体方法”。但从以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出,“分歧消除了”的宣告完全是欺骗。

现在右倾分子的三位领袖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党的成就。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已经度过,而且获得了很大成就,在我们第一次已经基本完成了粮食收购运动并且拥有9 000万普特的紧急粮食储备,在工人阶级和农村广大群众愈益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的情况下,这又怎么能否定得了。看一看我们中间企图否定工人阶级这些成就的那些人是很有趣的。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当然不可能不承认这些起码的事实!但是,即使在这之后他们还宣称,他们赞成另一种与党不同的执行总路线的“方法”,如果现在他们还宣称,他们的“方法”会“通过痛苦较少的途径”带来所期望的成果,那么,难道我们看不见,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在这些宣告里不只是把一种具体方法与另一种具体方法对立起来,而实际上是把一种政策与另一种政策、把一条路线与另一条路线对立起来。关于两种具体方法的虚伪的、十分含糊的词句掩盖不了右倾的立场与党的立场对立的事实。把政策的贯彻执行(“具体方法”)与政策本身(“总路线”)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我们今年实行的那些实际措施,首先是没有对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一整套措施,联共(布)的政策是不存在的。这是任何花言巧语都掩盖不了的。

对于同意党的总路线的声明,我们现在必须加倍警惕。甚至根本不应要求共产党员发表这样的声明。一个不同意党的总路线的党员是什么党员?如果发表这种不同意的声明,任何一个组织都会向这样的“共产党员”下逐客令。现在是这样一个时期,与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和明显与党格格不入的分子有时也会声明“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总路线。

我用一个文件来说明最后这种情况。

昨天在全会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转交给我著名的B. A. 巴扎罗夫陈述

对党的政策看法的一个文件。巴扎罗夫已经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很长时间,最近应国家计委主席团委员切尔内赫同志的请求,陈述了自己现在的政治立场。切尔内赫同志把巴扎罗夫说的话记录了下来。在这份记录里有不少不仅对于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半孟什维克,而最近几年成为典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的巴扎罗夫立场有意思的东西。

他对党的路线究竟抱什么态度呢?

请看切尔内赫同志11月6日与巴扎罗夫谈话之后的记录:

“他(巴扎罗夫)可以坚决地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呆在我们的营垒里。在发展路线问题上他与党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这里及后面关于巴扎罗夫的摘录中的黑体是我表示的。——维·莫·)

斯大林:真有你的!

莫洛托夫:甚至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他现在仍然是这样的人,也宣称,“在发展路线问题上他与党没有原则性的分歧”。难道这个声明能不使我们警觉起来吗?当然,会的。

我们记得,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乌斯特里亚洛夫也宣告,他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政策。乌斯特里亚洛夫只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将最终使俄罗斯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于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他“赞同”列宁的党的政策。列宁当时就把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个声明公布于众并对这位不请自来的“同盟者”向党和全体工人发出了警告²³⁰。列宁的这个指示帮助党自觉地对待路标转换情绪,帮助党加强了与反革命的路标转换派分子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确实加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锻炼。

现在我们是另一个时期了。现在关于改造时期我们说了那么多,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是的,我们已经顺利开始实行改造的任务并且不顾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而向前进。凡是不对苏维埃制度完全怀着极端强烈的资产阶级仇恨情绪的人,他至少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某些毫无疑问的成就。当我们十分成功地开始展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并胜利地开始从资本主义最后的藏身之地,从农业中挖掉它的老根之后,那时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就只得后退了。在巴扎罗夫关于与党的政策没有原则性分歧的声明里,我们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这种退却。

我现在使用的文件,即已经提到的切尔内赫同志的“记录”,非常短,但是很能说明问题。全会的所有成员都应当看一看。

喊声：对！

莫洛托夫：我还得谈谈其中的几个地方。

请看巴扎罗夫对我们的工业说了些什么：

“如果明年(1930—1931)将提出更高的工业指标,巴扎罗夫不会感到惊奇……”

“巴扎罗夫承认,现实正在推翻他的‘逐渐衰减的曲线’的理论。”

斯大林：原来如此！

莫洛托夫：要知道,仅仅两年前巴扎罗夫刚出版了一本学术论著,里面载有大量证明相反东西的图解和表格²³¹。现在他不得不竭力回避自己的“学术著作”。

米高扬：分歧撤销了！（笑声）

莫洛托夫：原来,在这里“分歧也撤销了”！

我接着读巴扎罗夫关于我们发展的主要困难说了些什么。你们会看到,他好像是在踩着党的决议的脚印,踩着中央过去几次全会的脚印走。而他所提出的怀疑恰好是与布哈林同样的路线。请看巴扎罗夫的意见：

“巴扎罗夫认为我们发展的主要困难是农业。他认为,总的说来,农村集体化和进攻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他想,党采取了过快的进攻速度。”

你们看到,他提出自己分歧的地方恰好是党与右倾分子发生分歧的地方。

斯大林：这里隐藏着非常措施。

莫洛托夫：请看在刚刚引证的地方后边巴扎罗夫说了些什么：

“在巴扎罗夫看来,我们使农民失去了发展生产力的动因并造成了供应问题上不应有的困难……”

米高扬：这是他从布哈林那里偷来的。

柯秀尔：不知道是谁偷谁的。

莫洛托夫：巴扎罗夫的这个声明,特别是关于我们“造成的”“不应有的困难”的声明与……

米高扬：我们造成的？

莫洛托夫：这个声明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文件里关于可能“通过较少痛苦的途径”获得所期望的成果的说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巴扎罗夫的立场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立场没有任何不同。一个非党的巴扎罗夫和三个中央委员一致认为,“总路线”保证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工人阶级的进攻速度造成了“不应有的困难”,是“痛苦的途

径”，因此显然应当改变。说法虽然略有不同，但巴扎罗夫和右倾分子的三位领袖所声明的实际上完全是同样的东西。不能不承认，这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我再引用陈述巴扎罗夫观点的几个说法。例如，下面的一处：

“应当承认情况是很困难的，我们的政策失败的机会（请注意：‘我们的政策’！——维·莫·）大于成功的机会。但是，不应从这种估计中得出他，巴扎罗夫，主张退却的结论。”

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巴扎罗夫说联共（布）的政策是“我们的政策”。

有人喊：啊哈！

（喧嚷声）

莫洛托夫：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分子，作为一个真正的资产者，他不相信革命会成功。在他看来，“我们的政策失败的机会大于成功的机会”。但是，甚至这个游手好闲的自由主义分子也不主张退却。他往肺里吸一口气，往工人背后躲得更远一些，“勇敢地”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放开市场（这一点布哈林在四月份不明白！——维·莫·），也不能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一点布哈林也不明白！——维·莫·）。”

有人喊：这一点布哈林现在也不明白。

莫洛托夫：“不论成功的机会多么小，但是现在只能前进。”

正如你们看到的，巴扎罗夫几乎明白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迅猛进攻速度无处躲藏，于是他“勇敢地”表示，“现在只能前进”。请看我们把自由主义分子先生们逼迫得多么厉害。甚至连他们也只好表示：“只能前进。”

最后，巴扎罗夫说，“对他这个非党人士不可能提出要有百分之百信心的要求”。我认为，这一次他是对的。怎么能要求巴扎罗夫对革命的胜利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过去季诺维也夫同志曾经要求几乎每一个党员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少一点他通常都不同意。但我们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我们就应当对列宁主义政策的正确性抱有充分的信心。]²³²布尔什维克应当用事实检验自己的政策，从实践中汲取新的材料以改进自己的工作，更不用说，在最好的实际工作中也会有个别的错误。我们知道，列宁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党也必须纠正自己工作的个别部分并经常注意实践提示的新的东西。但在巴扎罗夫关于不能向他这个非党人士要求百分之百信心的附带说明里明显地翘着一条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的小尾巴。因此，他关于同意党的路线的声明一文不值。另一方面，我们看

到,巴扎罗夫关于自己政治立场的声明基本上与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文件里所说的毫无区别。

米高扬:只是更简短。

莫洛托夫:但是,右倾分子同志们,如果你们得到像巴扎罗夫这样一个新的同盟者或者至少与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在政治上接近,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就此向你们祝贺的。这对布尔什维克不是什么光彩!而你们还想要争取你们的观点与党的观点“平等”!你们最好还是放弃吧,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援引了巴扎罗夫关于我们的政策的成就的声明。不管怎样,他终究是过去的布尔什维克,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而现在,要知道,不仅是过去的革命者和现在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众所周知,甚至舍费尔先生也在《柏林日报》上报道这些成就,法布曼先生也在《每日先驱报》上进行同样的报道。资产阶级报纸的不少其他记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字里承认苏维埃政权在提高工业、振兴农业和实行集体化等方面的重大成就。有谁不知道,所有这些舍费尔们和法布曼们都是我们的敌人,狂热的敌人,彻头彻尾的敌人?

因此,对于以右倾的领袖著名并且至今没有放弃自己错误的那些人来说,签字承认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某些成就是完全不够的。如果不公开谴责自己的右倾动摇,这种对成就的承认和撤销分歧的声明有什么价值呢?对待原则问题的这种态度只能证明没有任何原则性和明显缺乏思想性。党不能只限于指出成就。它应当了解并且也了解,这些成就是通过什么政策、用怎样的工作和在什么环境下,同时又是在反对谁,反对谁的反抗,反对谁的斗争和对党的工作隐蔽怠工的情况下取得的。

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自己的文件里不止一次地声明:我们不是右倾分子。在这个文件里第一页上就说,“使党‘回到十四大’的种种企图是不正确的和政治上有害的”。声明的作者们认为用这些话,这么说吧,与弗鲁姆金划清界限是适当的。在弗鲁姆金同志发言一年半之后他们才与他,而且是用这种含糊的方式来划清界限。但是,同志们,你们是在与谁划清界限?你们走得比弗鲁姆金远了十倍!

斯大林:对!

莫洛托夫:难道关于党的农村政策,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关于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弗鲁姆金同志说过类似的话吗?

有人喊: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

莫洛托夫:完全正确,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难道弗鲁姆金说过什么类似的话吗?你们向右走得比弗鲁姆金远了十倍并在这之后认为与弗鲁姆金划清界限是合适的。难道这样做对政治领导人体面吗?要知道,是你们综合了并把弗鲁姆金的错误坚持到底的。你们变成了弗鲁姆金同志去年以比较模糊的形式表达的那些情绪²³³的真正传播者。现在你们却攻击这个弗鲁姆金。你们想要用这种对待自己的追随者和半追随者的态度赢得什么人的信任?不,这与原则性、思想性毫无共同之点。不但如此。我不了解弗鲁姆金同志现在的立场,但我不排除,他现在比你们三人集团离党的路线更近,因为好像无法走得比你们更右了。

三个人在自己的文件里声明:我们不是调和分子。可见,无论右倾分子,还是对右倾持调和态度的人在我们党内都是不受欢迎的。你们用自己的声明证明了这一点。

但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是“左派”吗?不像。没有人会相信,你们是左派。比如说吧,沙茨金是“左派”,洛米纳泽是“左派”,至少不久前曾经是“左派”,现在他承认自己的“左的”错误²³⁴。

米高扬:他是满怀热情投降的!(笑声)

莫洛托夫:可你们是“左派”吗?甚至都不像,至少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既然你们仍然不赞同中央和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如果回忆一下或者重读一遍你们最近期间说过的话或者现在所说的话,应当把这叫作什么呢?你们所宣扬的,这至少是明显的机会主义,这也就是右倾的观点。也许,这些观点有时候像“怯懦的机会主义”,但至少这是公然的机会主义,是实质上右的机会主义。党已经是第二年在进行反对右倾的坚决斗争。因此,现在甚至已经无法躲藏在调和态度的假面具后面了。对右倾持调和态度的人,现在就是公然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真正的右倾分子。别的调和分子现在是没有的。

现在我来谈三人集团是怎么确定自己与中央和党的分歧这个根本问题的。

请看文件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么说的:

“由于担心非常措施作为长期制度的实行不可避免地也会触及相当多的中农阶层,我们在上一次(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曾反对实行非常措施。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多数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两处黑体都是我表示的。——维·莫·)

但是每一个人都清楚,这完全是欺骗。抹杀事情原则方面的这种企图露出

了马脚。但想要抹杀这一点是办不到的。之所以办不到,是因为文件保存下来了,右倾分子领袖们的讲话、论文和声明保留下来了。你们怎能躲得开你们的讲话,你们自己的声明?例如,你们怎能躲得开从米留可夫的报纸上借来的对党的指责,说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难道你们真的以为,不承认这些和类似声明是绝对错误的和反党的,你们就能够郑重地宣布“分歧消除了”?

大约一年前,布哈林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支持下发表了以下声明:

“是什么实际上决定了下一步的政策呢?‘文件’中提到的正是斯大林关于贡税的讲话。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狠狠地批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殖民地和剥削农民的说法。而在七月全会上他宣布了贡税,即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²³⁵(最后的黑体是我表示的。——维·莫·)

在这些声明里,正如每一个人都清楚看到的,你们在攻击斯大林同志的借口下攻击的不仅是中央,而且是全党。你们讲的不是随便什么,而是政策,是曾经“实际”执行的政策,即全党曾经做过的事情。你们直接对党进行了这些攻击,你们并没有放弃它们,而现在却以为,有人会相信你们说的“分歧消除了”?!

从刚引证的布哈林同志的文件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表示同意这个文件,我再引一段。这就是布哈林同志1月30日文件里所写的和三人集团至今没有放弃的一段:

“全国(‘全国’! ——大概可以认为,其中也包括富农和耐普曼! ——维·莫·)在为粮食和供应问题而苦恼,而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全国都感到农民方面有问题。而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全国都看见并感到国际形势在变化。而无产阶级的党的代表会议却保持沉默。可是关于倾向的决议多如冰雹(‘词句都一样’)。”

现在你们想避而不答,甚至不用两三句话声明放弃这些适合于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喊叫吗?! 你们是否把你们文件里所写的对党的攻击保留起来以备将来合适时机之用? 我们前面的重大困难还会少吗?

可你们怎能躲得开你们对共产国际的攻击? 怎么会这样:“分歧消除了”,你们却甚至只字不提,你们关于“脱离和分裂”及关于共产国际“分化”的典型自由主义的攻击是否仍然有效?

关于不久前你们反对共产国际的这些行动,甚至在像美国的洛夫斯顿这样的坏蛋,像捷克斯洛伐克的伊列克这样典型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像意大利的赛拉、像瑞典的奇尔布姆这样的叛徒,不顾你们的喊叫,被赶出共产国际之后,你们仍认为没有什么话需要说吗? 要知道,如果把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内没有“团

结”的歇斯底里信以为真,我们就应当容忍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和骗子继续留在第三国际的队伍里。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高潮不断成熟,这种革命高潮日益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的时刻。顺便说,关于这一点你们至今没有抽出工夫哪怕说一句话。可见,机会主义者的眼镜妨碍你们看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高潮的成熟。

难道在你们说了和写了所有那些东西以后,在这一切之后,你们真的以为可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避而不答吗?不行,这办不到。

右倾分子的三位领袖到这里来声明说,他们的主要分歧是实行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似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很大的意义。让我们更近一点来仔细看看。

与右倾分子的分歧涉及许多重要问题。

首先,进行了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争论。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度不能不成为与右倾分子的所有具体分歧中极为重要的一点。还就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样的问题进行了争论,这个问题与加强对富农进攻的政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右倾分子对这一点抱明显不信任的态度并用自己对党的政策的攻击企图使党离开所采取的方针。还就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进行了争论。

但是,归根结底,争论的基础过去和现在都是对阶级力量的不同估计,对阶级斗争的不同态度,对阶级任务的不同理解。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一切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动员无产阶级向苏联的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全面进攻和在全世界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右倾分子的领袖们现在也不愿意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我同意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评价——用骗人的手段抹杀根本的问题并且用关于实行“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问题上的分歧的伪善议论掩盖基本的分歧。

实际上,他们对“非常措施”提出异议的时候,他们就不只是反对“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而是反对对资本主义分子全面进攻的政策,反对对富农加紧进攻的政策。最近一年情况下的所谓的“非常措施”只是无产阶级向富农和耐普曼展开全线进攻政策的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为了有组织地开始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进攻,过去一年我们采取了和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什么措施。非常措施本身具有的性质不同了。现在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在似乎只是在非常措施问题上有分歧的掩护下,用迂回的方式攻击我们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政策。其实,政策也通过对党曾经实行的“非常措施”的态度受到了检验。与对待这些措施

的态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根本问题的回答：是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进攻，在需要的情况下不放弃实行某些非常措施呢，还是后退。问题曾经就是这样摆着：要么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要么在他们面前退却并把脑袋藏进沙子里。如果把与右倾分子的所有分歧之点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下面的问题：是向资本主义分子全线发起进攻，为了给工人和红军弄到粮食，为了贯彻执行五年计划和为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采用非常措施呢，还是不实行这种进攻并在阶级敌人凶恶的反击下收缩自己的战线。谁在这一点上畏怯了，谁就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十月的日子里在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面前退缩畏怯了一样。

斯大林：对！

莫洛托夫：这样，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就用自己的文件揭穿了自己，他们确实在实行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政策这个根本问题上畏怯了。他们曾经企图用退却的政策偷换进攻的政策。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分歧。

甚至巴扎罗夫也明白，现在是后退无路，对于苏联的工人阶级现在只有前进的路。要知道，他是不得不这样说，尽管他不相信革命会成功。他坦率地说自己不相信革命，从他那方面说，这话至少是诚实的。

总之，右倾分子反对的是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进攻的党。在自己的文件里，你们口头上也表示赞同进攻的政策。但是，怀着你们的政治情绪难道能够去进攻，对党的政策抱着这种态度难道你们能够成为进攻大军好的同盟者？

米高扬：在辎重队里进攻。

莫洛托夫：辎重也是需要的，但不需要军队的破坏者，特别是在军队的指挥部里不需要他们。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与右倾分子的分歧是十分严重的。这里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在党的政策与右倾分子的政策之间不可能寻找，而且也找不到中间的路线。党的路线与右倾分子的路线是不可调和的。

因此，文件的作者们应当彻底考虑好自己的立场：要么他们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实际上与右倾思想决裂，要么他们将滚到党的敌人的营垒里去。右倾通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营垒。它的根就在这里。很清楚，党正在并将继续与这种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由于以上所说，再谈谈右倾分子领袖们对当前时期所谓“正常”市场关系的态度是重要的。右倾分子的思想家布哈林同志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把“发展商品流转”的政策，恢复“正常”市场关系的政策与党的政策对立起来。布哈林讲话

的全部要点就在这里。

斯大林:正常化。

莫洛托夫:布哈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呼吁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方式的“正常化”,因而就呼吁“发展商品流转”。谁不同意这一点,布哈林就直截了当地把他叫作托洛茨基分子。

在反对派领袖们的新的文件里你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很容易确认,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敬重的领袖们也在退却,把布哈林的思想扔了一路。诚然,他们这样做也是怯懦的,不光明正大的。

在三人集团的文件里说,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和预购合同做法的广泛发展“在取消非常措施制度的情况下正在以新的方式提出市场关系的问题”。文件的作者们给“以新的方式”一词加了着重号。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从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退。但是他们不像珍视基于原则的政治上的诚实的人们应做的那样后退。

在这里他们也再次重复捏造的谎言,说党似乎在实行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在这里他们也在给党抹黑,指责党似乎在用非常措施政策即行政惩罚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自己退却的必要性而把希望寄托在“发展”市场关系上,他们企图用“在取消非常措施制度的情况下”(黑体是我表示的。——维·莫·)会以新的方式提出市场关系问题的附带说明来掩饰布哈林政策的失败。原来,党应当先“取消”不存在的非常措施“制度”,而在这之后右倾分子的领袖们才会同意“以新的方式”提出市场关系问题。喏,这种对待原则问题,对待思想斗争问题的态度对于布尔什维克是不是可耻的?不得不再一次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只是口头上赞成我们对富农进攻的政策。实际上他们在往另一个方向拉。

我们的政策是向富农进攻,直到我们把他们致于死命,直到把他们作为阶级力量消灭。而对资本主义分子的这种进攻是由我们为发展工业,为支持国营农场,为加强集体农庄运动,为组织贫农,为在税收,在与富农、耐普曼和我们国家机关中的破坏分子的各种影响进行斗争方面对资本主义施加压力等等所做的一切来保证的。文件的作者们企图以隐蔽的形式塞进另外一条路线。代替进攻的政策他们朝着向资本主义分子投降的政策方面拉。在这之后,无论怎么说“分歧消除”,我们应当加强对富农和耐普曼投降的右倾政策的揭露。

让我们把现在的全会与四月全会比较一下。

右倾分子的领袖们,正如每一个人都清楚看到的,相当笨拙地转了一个弯。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等人在四月全会上什么话没说呀。当时我们从他们那里听了多少自由主义的词句。他们的讲话里对富农有多少姑息。他们对党进行了多少不能容忍的攻击,而现在他们表现得是多么孤立无援。

请看两个例证。

我举布哈林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讲话里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之一。那时他企图往我们这些罪人中的几乎每一个人身上特别卖劲地涂上污泥,而后“归纳为一类”。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总之,皮亚塔科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曾经宣扬的东西,米高扬同志曾经作为指靠热月党人思想进行过批判的东西和他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方针的东西,现在正由斯大林同志以更尖锐的形式进行宣扬,特别是由古比雪夫同志和许多其他同志天才地深化了。从我们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看,这一切都是什么呢?这是向托洛茨基分子思想上彻底的投降。”(各个强调之处都是布哈林同志自己加的。——维·莫·)

在作出这种“出色的”评价之后,最“有才华的”和至少已经是最顽固的布哈林分子罗济特从座位上插话说——“对”。

因此,右倾分子的思想家布哈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认为最好是指责中央“向托洛茨基分子在思想上彻底投降”。原来是这样:在中央向托洛茨基分子彻底“投降”以后,右倾分子的领袖们现在向我们表示:“分歧消除了。”

斯大林:“滚到”托洛茨基主义那边去了。

莫洛托夫:是的,就是说,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打算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里去。

如果你们,昨天文件的作者们,即使多少认真地表示“分歧消除了”,那你们是否肯费心从这些声明里至少作出最起码的结论呢?那么你们就不得不一笔勾销你们在四月全会上的讲话,而且不仅是这些讲话。那么你们就不得不一笔勾销你们自由主义的声明和不妥当的文件。只有在这样诚实地承认自己错误的情况下,你们才能在党内工作得不比我们中的许多人差。请用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对待党的政策的根本问题并放弃你们说了那么多的从别人的思想行囊里借来的半自由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右倾的东西。到那时分歧将真正被消除,我们大家将在一个阵地上工作。

就是在那次四月全会上,乌格拉诺夫同志发表了几次他最好不讲的讲话。[现在任何一个少先队员都羞于去读它们。]²³⁶真想不到,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的立法和指令里有的是摇摆不定,而没有路线”。而现在怎么样呢?也是

“分歧消除了”吗？

奥尔忠尼启则：他没有签署这个声明。

莫洛托夫：这是对的，但他暂时没有明确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在根本问题上我们将不清楚：他是否仍然站在先前的错误立场上。

米高扬：需要弄得很清楚。

莫洛托夫：在这样的问题上弄得越清楚越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根本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一定得弄得十分清楚。

我们应当告诉右倾分子的领袖们，他们犯了一个重大的过错。这种过错是任何一个把自己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起来的反对派所特有的。这种过错就是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你们在自己最后一个文件里承认了这一点。你们说：

“我们有过某种错误的估计不足……”

有人喊：也有的估计不足不是错误的。

莫洛托夫：“……对影响农村的那些最强有力的杠杆有过某种错误的估计不足，是这些杠杆最后开始弥补非常措施的消极方面。”

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曾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在任何语言里都叫作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革命的力量。

米高扬：也许，要翻译成乌克兰语？

莫洛托夫：我无法把这翻译成乌克兰语。如果让彼得罗夫斯基同志²³⁷把文件里的这句话译成乌克兰语，尽管他对右倾估计不足，结果反正都会是，在这种情况下文件的作者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

在四月全会上发言反对右倾的领袖们的时候，我们曾努力想方设法使他们相信，工人阶级具有向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很大潜力并且一定会齐心协力地展开这种进攻。反对右倾分子的主要论据是论证国内发生的阶级变化，论证变化了的阶级力量对比和论证由此而来的加紧向富农进逼、加强贫农组织、在巩固与工人阶级生产结合的基础上把贫中农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周围的必要性。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把维护另一条路线与这对立起来。现在我们特别的优势在于，布哈林反对派的路线已被事实所粉碎，已被生活所嘲笑。

三个人的文件企图指责我们的报刊不正确地评述右倾分子的观点。当然，错误是有过的。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李可夫同志甚至认为适合用充满自信的腔调（他善于这样做）宣读了自己声明中下面这一段：

“我们不得不声明，报纸和杂志上（举的几乎是全世界范围的‘报纸和杂

志'! ——维·莫·)作为体系宣扬的、似乎是我们赞同的观点体系与我们的真实观点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黑体是原有的。——维·莫·)

如果相信这个倒霉的文件,那么,所有批评过右倾分子的报纸和杂志原来全都错了。然而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却充满自信,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这真是令人可笑的事情!

喏,那么拿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怎么办呢?这个决议是否存在,抑或这也只是所提“报纸和杂志”里的一篇文章?

又拿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怎么办呢?总不能把这也归入“报纸和杂志”的文章之列吧?

有人喊:各报上登过。

莫洛托夫:难道只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曾在各报上发表过!

我只好提醒大家,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拥护这项决议。就是说,右倾的领袖们是未被理解的天才。当然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但有谁会相信这一点呢?没有举出任何理由让我们怀疑,报纸和杂志基本完成了说明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右倾思想的责任。

有人喊:大体上。

莫洛托夫:“总体上说”。(笑声)

现在有必要提醒,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在自己关于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问题的主要决议里说了什么。同志们是否记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里的下面一段话?现在我来宣读: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认为某些共产党员维护被共产国际谴责为怯懦的机会主义并极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利益的右倾的观点是与共产党员的党籍不相容的。

全会同时指出,表现为怯懦的机会主义、掩护公开的取消主义的调和派最近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主要问题上都滚到了右的立场上并在共产国际内部承担起了右倾分子的角色。右倾取消主义者被开除以后,调和派成了吸引各国共产党队伍里所有右派分子的中心和一切失败主义情绪与机会主义观点的传播者。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要求:(1)调和分子公开和坚决与右倾分子划清界限;(2)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积极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3)他们要绝对服从并积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的一切决议。不履行这些要求中的一项将把任何违反者置于共产国际的队伍之外。”²³⁸

让右倾分子的领袖们更留心地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所说的关于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的话吧。

这次全会是在四月全会通过谴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观点半年之后举行的。它也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撤销布哈林同志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并且谴责他右倾观点的决议之后举行的。尽管如此,右倾分子的领袖们至今对这些决议,委婉地说,领会很差和明显估计不足。对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机关的这种态度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应当说,关于右倾分子的问题在中央的实际工作中也具有了尖锐的影响。例如,最近中央就没能使用在右倾道路上蹒跚的那些同志去完成许多实际的任务。

请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在最近几个月期间,即粮食收购最困难的月份里派右倾分子中的什么人到地方上去担任负责粮食收购的中央全权代表呢?不能。政治局就没有这样做。中央不能对右倾分子委以重任。中央不能委任右倾分子去执行责任极其重大的粮食收购任务,因为考虑到,他们会不愿意,不能够和实现不了党所需要的,即如事业的利益所要求的东西。所以我们未能派遣右倾分子中的任何人担任中央粮食收购的代表。

米高扬:他们没有请求。

莫洛托夫:这是对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请求。然而我回想起,去年年初乌格拉诺夫同志在伏尔加河沿岸收购得不错²³⁹。那时他还没有跑到布哈林的立场上去。而今年,由于他没有与这一立场划清界限,我们就没有提出派遣乌格拉诺夫同志去进行粮食收购。我想,比如说,任何一个乌克兰人、乌拉尔人或者西伯利亚人都不会认为派遣右倾分子做中央粮食收购的代表是真正的帮助。

柯秀尔:相反,我应当为此“感谢”你们。

莫洛托夫:我不怀疑,来自所有粮食收购地区的回答都会是这样的。

斯克雷普尼克:他去过顿巴斯就够了²⁴⁰。

莫洛托夫: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十分尖锐的外交政策问题。英苏谈判的巨大成功我们不是白白得来的²⁴¹。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实行的路线又遇到了来自右倾分子方面的不小阻力。为了实行保证我们得到英苏纪要形式的有利结果的路线,我们不得不与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

雅罗斯拉夫斯基:对!

莫洛托夫:不仅政治局委员,而且曾经出席政治局多次讨论这个问题的会

议²⁴²的许多其他中央委员和中监委委员*可以证明这一点。

喊声：对！

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托姆斯基在休假²⁴³)往往离开我们在多夫加列夫斯基与韩德逊谈判一开始就采取的坚定路线转到机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上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滑到了韩德逊往那里拉的方向——实际上预先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政治局没有跟着他们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胜利是在不顾和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的经常动摇而取得的。这是确凿的事实。

在共产国际问题上,右倾分子的领袖们不止一次地帮了外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的忙。布哈林集团给在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偶然同路人以充足的理由指望得到它在这方面的帮助。德国、捷克、美国、瑞典及其他党的右派叛徒们反对共产国际的厚颜无耻的发言在不小程度上从布哈林集团反对我们党的斗争中得到了滋养²⁴⁴。这些分子在思想上是从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的浑浊的源泉中吸取营养的,布哈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观点²⁴⁵就是这种理论的变种。

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右倾分子暂时就谈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左派”。

这方面有新的文件,应当让全会知道。我指的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托洛茨基离开阿拉木图后留在那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档案里得到的文件。只是上个月底中央才收到了这些文件²⁴⁶。

沙茨金、科斯特罗夫、阿韦尔巴赫及其他同志从这些文件里会看到,顺便说,托洛茨基特别重视对青年和共青团组织影响的问题。在阿拉木图发现的托洛茨基的指示里有这样一份专门的指示:“了解共青团里,特别是它的机构里、《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里等正在做的一切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为这项工作选派一个精干的小组……”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多么细心地审查像《共青团真理报》这类机关的机构。尽管《共青团真理报》有过许多失误和大的错误,但在一些情况下出色地帮助了开展自我批评的事业,尽管如此,我们应当认真地考虑到有一份托洛茨基关于派遣“小组”到共青团组织中工作的指示。我们应当把这些反革命“小组”²⁴⁷的一切残余从我们所有的组织,包括共青团组织中清除出去。

* 原文如此,指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但是有加米涅夫出现的那个文件特别重要。我说的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档案里找到的记录加米涅夫与两个托洛茨基分子(简称“K”和“П”^①)谈话的文件²⁴⁸。这次谈话是1928年9月22日,即在加米涅夫已被接收入党并来得及与布哈林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以后进行的²⁴⁹。

请看上述“记录”中是怎样记述托洛茨基分子K.和П.与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的:

“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Л. Б. (加米涅夫)通过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和对问题的说明,给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下面的定义:国家经济在发展,在第四个丰收年之后正在进入更加**尖锐的经济危机**。粮食收购的情况就标志着,**所采取的措施消除不了危机**。”²⁵⁰(此处和以下“记录”摘录中的黑体都是我表示的。——维·莫·)

这就是加米涅夫去年9月对经济形势的总的估计。

接下去记述的是加米涅夫对非常措施的看法。你们以为,他——赞成非常措施吗?他——反对。

有人喊:那还用说!

莫洛托夫:加米涅夫宣称:

“去年愚蠢地实行的非常措施触及了相当大部分的中农分子,甚至于贫农分子……”

“如果政府和党不得不提出重新实行非常措施的问题,那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措施是不会得到农村贫农的支持的。”

看来,加米涅夫非常了解贫农!

斯大林:他自己是贫农出身。

莫洛托夫:是的,差不多是个贫农。

在这之后,加米涅夫就转向了可以说是问题的本质。他宣布:

“领导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能够用自己的资金使国家摆脱危机的经济性的手段已经没有了。现在重新实行非常措施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我们,不知道加米涅夫的咒语,又犯下了多少这种“极大的错误”。

有人喊:是的,相当多。

^① 现在已经准确弄清了,“K”和“П”这两个人不是别人,第一个(“K”)就是不久前重新被接收入党的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卡普林斯基,而第二个(“П”)是至今仍留在托洛茨基阵营里的佩列韦尔泽夫。——维·莫·(文件脚注)

莫洛托夫: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并——我继续读“记录”的原文——“会造成这样的状况,使农民居民转而采取不可容许的方法去夺取粮食”。

现在我们也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不情愿地夺取粮食的斗争方法”了。

柯秀尔:集体化。

莫洛托夫: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否定大规模集体化的事实了。

但是,让我来读完这段说明加米涅夫政治“方针”本质的摘录。这就是加米涅夫的基本结论:

“现在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政治性质的措施,即更换领导,校正路线,使其具有更大的阶级明确性,制定一些措施,长期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

当然,我在引文末尾所引的关于“动员群众”、“使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等全部词句,在这里全都只是“为了说漂亮话”。实际上,加米涅夫同志去年9月的观点的实质看起来十分模糊,像在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那里一样模糊。在他关于需要采取新的“政治性质的”措施的宣告里不可能听不到破坏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号召和隐蔽的资产阶级民主倾向。

在这之后,所引的“记录”中说的关于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的态度的那些话也就明白了。对此文件里一字不差地说了下面的话:

“接着Л. Б. (加米涅夫)宣称,Л. Д. 托洛茨基对中央七月全会所作的评价是绝对正确的。”

就是说,第二次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加米涅夫同志像个托洛茨基分子在发议论,而不像个布尔什维克。

米高扬:像个“年轻的”党员。

莫洛托夫:如果“按公历”计算,是年轻的党员。

还需要从这个有趣的文件里再读点什么。例如,怎能不读一读,用К. 和П. 的话说,什么是加米涅夫认为的摆脱已形成的状况的出路呢。对此,“记录”里说了以下的话:

“Л. Б. (加米涅夫)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加入党,逐渐占据苏维埃和工会的负责岗位。”

有人喊:从内部进行爆破。

莫洛托夫:我认为,写得很清楚,不需要解释。

根据“记录”所说的来看,加米涅夫回到党内以后仍然心怀叵测。接下去“记录”一字不差地说了以下的话:

“危机正在成熟,当它达到某种限度的时候,我们会向党和工人阶级说明和宣布这一点的。而现在应当采取措施,以便一道工作。”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莫洛托夫:看来,是这样。

从后面的谈话记录里可以看出,加米涅夫没有与托洛茨基分子决裂的打算。

而谈话时在场的沙罗夫同志(也是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列宁格勒人)除了鼓励托洛茨基分子便找不到更合适的话语了。

“在场的沙罗夫指出,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甚至被选进了一些支部委员会,这证明,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是有生命力的。”(笑声)

看来,这是证明了一些东西,但决不是沙罗夫所想的東西。这证明我们的一些组织对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过分轻信。

柯秀尔:对,别无其他。

莫洛托夫:关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9月22日说了很多十分愚蠢的话。“记录”里是这样说的:

“加米涅夫接着说,Л. Д. (托洛茨基)现在应该递交一个文件,在文件里应当说:‘召唤我们吧。我们将一道工作。’”

奥尔忠尼启则:分歧撤销了。

斯大林:“撤销了”!

莫洛托夫:结果似乎是这样。我继续读:

“但Л. Д. (托洛茨基)是个固执的人,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将呆在阿拉木图,直到派特快列车去接他,但要知道,当这一列车派出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将会是这个样子:克伦斯基就要回来了!”

柯秀尔:到那时候托洛茨基也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斯大林:这是加米涅夫说的?

莫洛托夫:这是加米涅夫说的。

我继续读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看法。加米涅夫对来找他的托洛茨基分子表示:

“只能表示遗憾的是,发生了破裂。生活证实了反对派的所有论点。反对派作出的诊断是完全正确的。”

由此可见,加米涅夫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后也仍然是托洛茨基分子。无论如何,他去年9月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整篇谈话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看来,分歧“撤销”了。

莫洛托夫：“记录”是用下面的一句话结尾的：

“离开加米涅夫的时候，同志们受到邀请看见有灯火顺便进来坐一坐！”（笑声）

有人喊：最主要的。

莫洛托夫：瞧，加米涅夫家的“灯火”是为谁预备的。

我没读过整个文件，但读过的已经足够了。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常跑去找加米涅夫，但他与加米涅夫的联盟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加米涅夫仍是加米涅夫，回到党内以后还向着托洛茨基。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想，领导机关和全党是不会忽略这个文件的。

喊声：对。

有人喊：请发给大家。

莫洛托夫：当然，我们会发的。

归根结底，党内可能会有需要消除的是个别的分歧，但所读的文件表明不是个别的分歧，而是直接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党的斗争。

波斯特舍夫：应当从党内赶出去。

莫洛托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会谈不能叫作别的，只能叫作支持敌人。这是托洛茨基分子背着党搞的阴谋诡计。

但除此之外，应当更注意地仔细观察加米涅夫政治观点的本质，它们在这份“记录”里是如何陈述的。加米涅夫同志的下述声明是有代表性的——鉴于已形成的危机，经济措施已经不够用了，出路在于采取“政治性质的措施”。这些话里明显地露出了“新新经济政策”的尾巴，“政治新经济政策”喉舌的尾巴，资产阶级民主预言家的尾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的尾巴！加米涅夫议论的含义是清楚的：挫败向资本主义分子全面进攻的政策，——这就是其真正的含义。要知道，这是一切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分子一直梦想的。

现在我们应当再作出一个总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时涉及右派和“左派”。两者最终都拉向同一个目标。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当工人阶级着手对国家经济进行根本改造，在资本主义最深的藏身之处——农村挖它的老根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无论右的，还是“左的”摇摆，在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总路线中无论这种还是那种机会主义的动摇都通向同一个目标：这些动摇通向阻挠进攻并实际上意味着在阶级敌人强化的反击面前投降。对于那些同意党的总路线的声明，无论它们来自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抑或来自加米涅夫及其政治朋友，如果这种同意没有事实上，实际上对党的政策无条件的支持来支撑，我们都应以同样不信

任的态度对待。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革命最重要、最关键的时期之一。在决定性的事业,在对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出现了转变。相当大部分的贫民已经卷入了集体农庄运动。我们每天都看见这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是,现在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真理报》上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文章²⁵¹里突出强调的那个事实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事实就是中农开始加入集体农庄。这是最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自中农群众转入集体农庄运动的轨道,开始了我们革命的新时期,具有巨大国际意义的时期。中农思想情绪的这种转变说明了很多东西。这种转变表明,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对作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的政策的一般苏维埃政策的起码原则的信任,而正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策的信任。在中农群众思想情绪的转变中表现出了中农对社会主义,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的转变。从现在起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掌握农村真正的贫中农群众。为社会主义斗争的觉悟早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就已经深入了工人群众。现在这种觉悟实际上开始在掌握农村的群众。无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还得要克服多少困难,无论我们对农村(还有城市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解释工作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已经走上了对整个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宽广大道,走上了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的宽广大道。

我们过去也知道,尽管有种种动摇,广大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策的原则的信任是巨大的,但苏维埃政策的这些原则直到最近尚未向农村千百万劳动者展示开来。现在这方面出现了转变,这是工人阶级和党的极其伟大的胜利。农民群众的这种转变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苏联的国际影响及其在以革命方式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将极大地提高。

在这样的环境里,机会主义的动摇应当受到特别齐心协力的反击。党过去始终在进行这种反击,而现在正以特别毁灭性的力量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给予这种反击。

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交了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文件这里已经说得够多了。这是一个虚伪的、伪善的和两面派的文件。它不可能使党内任何人感到满意。这不是停止反党斗争的文件,而是继续这种斗争的文件。全会应当从这里作出结论。

四月全会不仅谴责了右倾领袖们的观点,而且向他们提出了警告。在这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了自己的意见²⁵²。现在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组织方面

的措施,使党的司令部摆脱这些不可救药的右倾分子。这是革命事业利益的需要,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对那些承认自己原则性错误的人,党始终给予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参加共同工作的机会,而对那些在基本政治问题上误入歧途并继续妨碍走在对阶级敌人全面进攻最前面的工人阶级的手脚的人,中央委员会应当让他们知道自量。

党不向腐败的机会主义分子看齐,而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们团结一致的队伍看齐。

主席:现在请米哈伊洛夫同志发言。

米哈伊洛夫: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之际对经济年度进行总结,我们应当清楚和明确地说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一切成就和成绩。我们可以坦率和坚定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去发出过关于给予工人阶级和最贫苦的农民一个形式简单明了的10—20年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伟大纲领并用这个明白易懂的纲领吸引千百万群众的指示,——我们以五年计划的形式提出了这样的纲领。五年计划的确成了深受欢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它已被千百万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掌握。我们在提高工人群众的热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主义竞赛、星期六义务劳动——它们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无产阶级的开始日益高涨的革命战斗精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清楚而又雄辩地证实了我们在广泛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大力提高工人阶级热情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我想,就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所有问题上取得的成就来说,这能说明很多东西。十月革命以后,我们现在来着手认真彻底地摧毁那些生活准则、偏见、我们俄罗斯过去的现实;这就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就是马马虎虎,漫不经心。

连续工作制的实行现在确实在根本改造全部生活条件,无论是日常生活的,还是经济的。这是重大的革命性措施,这正在产生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成果。

最后,党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审查和清洗苏维埃机构的步骤²⁵³是一项重大的措施,通过这一措施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一次震动了一下我们在个别地方已经腐烂了的苏维埃机构。我们第一次着手实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7年提出的一项基本指示,即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履行某些苏维埃职责的指示²⁵⁴。现在我们有检查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新形式并第一次着手做这件事,像电器厂这样的大工厂对财政人民委员部实行的义务帮助以及别的许多对我们苏维埃机构的义务帮助说明,工人阶级不仅对整个苏维埃机构进行清洗,而且以义务帮助的形式着手改进苏维埃机构的工作。

最后,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获得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的确,集体

农庄的建设表明,我们已经进入我们整个经济改造的转折时刻。我们第一次尖锐和直接向农民提出了搞集体经济对个体经济的优越性的问题。党从未像最后这一年,即十月革命第十二年这样尖锐地提出过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集体农庄不仅在物质基础的意义上,在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意义上是支柱,集体农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组织支柱。现在,当我们向资本主义分子全线进攻,当我们积蓄了一定力量,坚决转入进攻的时候,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不仅是农村的,而且是城市的资本主义分子的坚决抵抗。在我们的每一个机构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小规模阶级斗争,看到异己分子对我们社会主义创举的隐蔽的反抗。我认为,阶级斗争在各个部门在尖锐化,在我们各个专区里(就拿我有机会接触的扎波罗热专区为例吧)阶级斗争在加剧,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方面,不断发生富农针对我们苏维埃政权优秀代表的恐怖行动。因此很清楚,由于这些现象应当特别明确地突出强调我们党的路线。

最后,工业领域的破坏活动,这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激烈的阶级斗争。当你读有关破坏活动的文件时,立刻就会羞得脸红。就会为我们的肤浅态度、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感到羞愧,为我们的共产党员还未充分地把某些部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感到羞愧。我认为,这种破坏活动生动地说明,与资本主义分子、与工厂主等有联系的旧工程师在对我们进行最后一次坚决的反抗。

是否需要坚决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对右的危险,反对右倾或者如乌克兰人所说的反对右乌希尔^①呢?(笑声)

我认为,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怀疑。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应当坚决地与右倾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展开斗争。

我应当说,在个别的问题上我曾经有过一些错误和模糊认识,特别是当时与斯大林同志对个别问题进行过争论。有时你去参加工人的会议,他们把工厂里的一切思想情绪都向你倾诉,而你又以不加批判的态度把这一切积极和消极因素混杂的思想情绪倾吐出来。当我们(我、乌格拉诺夫和科托夫)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说:“当心,怀着这种思想情绪你们会滚向机会主义的。”²⁵⁵这个插话是一个警告,是正确的。所以,我在个别问题上是有过一些模糊认识和动摇的。

^① 乌希尔,乌克兰语,意为倾向。——译者注

* 在未修改的速记记录里为辩论。——编者注

应当坚决地放弃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在上一次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几次发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上我不同意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集团所持的立场。但我在工会运动方面有过某些怀疑。当然,工会运动中没有过工联主义路线。但那时我曾怀疑,工会运动中是否也有工联主义倾向?我认为,自我批评的浪潮清楚地揭露了许多工会机构中存在的工联主义倾向、对工会在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以及存在非政治倾向。因此,中央委员会注意加强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做得完全正确。

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宣读的那个文件是模棱两可的。这里需要要么——要么。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我认为,如果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放弃他们在个别问题上曾经有过的错误路线,那将是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这是回避不了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回避不了的,以及许多这样的需要给予直接和明确回答的问题。应当对这个问题进行一定的澄清,模棱两可在这里是于事无补的。我认为,漂亮姿态是不相宜的,是不会有好处。事实是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缩短了用于粮食收购的时间,我们现在有大半个工作年不用再搞粮食收购。

柯秀尔:这是我们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米哈伊洛夫:而过去是全年都在搞粮食收购。因此,由于摆脱粮食收购而腾出的相当部分的工作年使我们能够更多地注意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非常措施当然不是旗帜,但这是某种战略上的机动,它在我们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将会被重复采用。要知道,我们党从未拒绝采取某些措施影响我们经济的这些或那些形式。把所有的分歧只归结为非常措施,这对于在许多问题上与党站在不同立场上的那些同志是太微不足道了,这一点我们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宣读的那个文件里就看到了。

最后,应当坚决与反对共产国际的各个右倾集团划清界限。就拿奇尔布姆集团为例吧,它用闻所未闻的形式进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甚至求助于警察。奇尔布姆曾经在共产国际担任要职,在其中扮演过并非末流的角色,瞧他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走到了何种地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十分清楚和明确地与右倾分子划清界限。²⁵⁶

不能拿批评中的某些过火情况作为借口。砍伐树木——就会木屑纷飞。我们的缺点当然很多,有大量马马虎虎的作风,但是不能用个别的缺点代替整体。

我回想起,季诺维也夫曾经怎样走上讲台,手里摇晃着库班什么地方出版的一张
小报,说:“瞧,你们瞧,他们是用怎样难听的绰号骂我们的。”可能,这张或那张
报纸上是这样骂你们的。但这不是主要的。需要的是不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是
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呼吁我过去在莫斯科工作的战友乌格拉诺夫同志这
样做。

扎东斯基:以社会主义竞赛的方式。(全场大笑,喧嚷)

米哈伊洛夫:不是以社会主义竞赛的方式,因为这个问题太微妙,在这里很
难进行竞赛。

有人喊:特别是对于你和乌格拉诺夫。

米哈伊洛夫:我应当说,乌格拉诺夫同志也应当承认自己个别的错误。

柯秀尔:不是个别的,而且所有的错误。

米哈伊洛夫:他应当承认自己所有的错误。他在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²⁵⁷
曾经承认它们,如果他能在中央全会上十分清楚和明确地讲出自己的所有
这些错误,那将会更好。

只有在我们今后的路线完全明确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经济的各个
领域以更快的速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掌声)

喊声:对!

主席:现在宣布休息。

第七次会议

11月13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请索尔茨同志发言。

索尔茨:我只能谈文件,而不谈控制数字。文件很坏,其中最坏的就是它是个文件。(笑声)

斯大林:这已经是抹不掉了的。

索尔茨:这里正在举行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全体同志都就我们如何完成五年计划的问题纷纷发言和交换意见,而不是分成“集团”发表自己的声明。这至少无助于我们应当进行的事业。

几位同志似乎承认,有些东西他们过去不了解,有些东西他们估计不足。波斯特舍夫同志完全正确地和以俏皮的形式说,在他们看来,总路线不完全是总的,五年计划——不晓得它是不是五年计划等等。几位同志自己承认,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他们写道:

“然而,工人阶级的极大毅力、对农村的一整套其他措施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和顺利镇压富农的情况下导致了所有集体化计划的突破、农业新技术基础的奠立和贫农与很大部分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周围。”

斯大林:不够,不够。

索尔茨:这还不足以说,十分幸运的是,我们的估计错了。要知道,如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犯了错误或者过高估计了形势,那么,当他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应当说:“很遗憾,我原以为,事情会进行得更好。”而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即估计不足,那他就应当说:“十分幸运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身上有那么多革命力量、毅力和觉悟,结果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幸好结果不是那样。”应当为此而高兴,而不是用某种遗憾的腔调说话!

几位同志说,分歧消除了,但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加上一句:“然而我们认为,再也不会再有非常措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由三个人签名发表这

样一个声明呢？为的是用这个文件表明，他们认为必须把群众的毅力提到最高的程度。与此同时他们仍然说：“我们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看法，我们仍然不像全体中央委员那样对待这件事情，我们仍然反对非常措施，让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保证，不会再有非常措施。”非常措施不是原则，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叫作非常措施，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只有在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采用它们。因此，何必在分歧消除的时候要这样强调呢？

分歧消除——这是什么意思？分歧消除是否因为它们过去就不存在，是否像他们在一些场合宣称的那样只是一种误会，分歧消除是否因为工人阶级表现出了那样的毅力、那样的独立自主精神、那样的革命觉悟，是否因为他们确信了我们能够完成着手做的事情？抑或分歧消除是因为宽宏大量，是出于不应继续争吵下去等考虑？我们应当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如实地说出来呢，而且恰巧是在真正需要说出这一切的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时刻？真正的革命家表现出的这种估计不足，而我仍然没有理由怀疑，主观上他们是大革命家，是想要社会主义的，如果这种估计不足没能应验，那这非常好，因此不必用“但是”一词作为句子的开头。

斯大林：是的，“但是”。

索尔茨：“但是结果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似乎在惋惜，结果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而我认为，他们对发生的事情反而应当感到高兴。如果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而其他同志估计得更恰当，那就更好了。要知道，如果我们走向了更坏的方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实际上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不是在压制革命精神的意义上，而是在振奋革命精神的意义上。他们自己说，这一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他们说，一年里我们在对待农民方面争取到的东西还是有些价值的。于是，他们不是简单地走出来，每个人单独地说他错了，而是带着“文件”走出来的。他们认为必须不理睬我们的会议，不出席这个会议，而在什么地方单独集合，然后带着文件走出来。而要知道，这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我们现在确实很困难，不仅需要我们，需要党，而且需要整个工人阶级、现在大批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全体农民作出很多的努力和付出很多的精力。所有的群众都知道，我们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知道，有些人想的跟全党不一样，他们说不需要非常措施。他们说：“请给予保证，不会再有任何非常措施。”干吗要这样？

非常措施暂时好像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为什么要预先许诺不再采取这些非常措施？而应当说，任何声音都会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得到回响。

啫,我明白,当问题第一次提出的时候,是会产生某些怀疑的,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立刻决定一切这样的洞察力、经验和知识。但是,在四月全会开过以后,在党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以后,在千百万人已经着手实现我们提出的任务以后,在这之后每一个守纪律的党员,即便他有怀疑,他也没有权利公开表达自己的怀疑。他不应当公开表示,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自己的全部才干和能力集中于完成这些决议。

这里有人把目前的时期与1920年对波兰的战争²⁵⁸相比。啫,那又怎么样,就算是这样吧。就算是有过对波兰作战的决定,于是有几位同志说:“当然,你们去吧,去打仗吧,但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怀疑,这会产生什么结果。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怀疑,这场战争是否会顺利。”怎么能这样提出问题呢?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件呢?既然我们也是克服这些困难的不小的力量,这个文件能激发我们的毅力,能激发我们对胜利的意志吗?这个文件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些任务吗?不,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带着文件来并说出我们对这一点的看法。这比干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重要得多,而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你正在与之谈话的全体劳动者所认定的。我曾经去过沃罗涅日,在那里有机会和一些人谈了话,他们签订了比斯克和阿尔马维尔之间的竞赛合同,一边的两万农民与另一边的两万农民正在就如何更好地建立集体农庄和组织集体农业展开竞赛。而三位政治局委员却在撰写文件……

斯大林:他们在怀疑。

索尔茨:无法命令一个人不怀疑,如果他在怀疑……他们在撰写文件,一个政治文件并把它提出来。为了什么?为的是表明,我们虽然撤销了分歧,可我们仍然多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仍然想要你们现在就许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有任何非常措施。为什么?你们过去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它已经被生活证明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你们现在又把它提出来,这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们把全党摆在首位的东西也摆在首位的话,为什么要给我们所处的环境造成困难,为什么不出席这里的会,不和大家一起参与正在进行的一切,不以同志式的态度发言,不简简单单地说:“既然我现在没有分歧,既然我过去有过分歧,就是说过去错了。”也许,对此应当这样理解:反对派分子说,我们站到了他们的观点上,这三位同志说,我们站到了他们的观点上,因此我们与他们没有分歧?绝对没有这回事!这些同志十分清楚地知道,新的政治文件,三个人的文件意味着什么,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文件不会有助于我们的斗争,可他们仍然要这样做。对此我无法向自己作别的解释,只能说他们把自己个人的事情摆在首

位。怎么能这么出来,怎么能这么说,我做得不对呢?我最好用某种外交方式表述,让人弄不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和在干什么。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又是什么人所需要的呢?莫洛托夫同志给我们宣读了这样一个文件,你听的时候,真的会因为它为那个人感到不好意思。我以前读过它,我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常有人试图脚踩两只船,常有人脚踩两只船,而有人同时脚踩三只船。

斯大林:甚至脚踩四只船。

索尔茨:他既同布哈林谈话,他又同托洛茨基谈话,他又入党,这么一来他没有任何分歧。一个普通党员怎么能够把这结合在一起,他怎么能够理解这种事情呢?

斯大林:而有时候他们自己与自己商谈。

索尔茨:怎么能够不明白这一点,怎么能够如此脱离集体、失去活生生的现实感,在那里编造文件,而不走到这里来并简简单单地表明态度。如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觉悟表明了自己建设新制度的能力,那你们应当说些什么呢?只能对此表示高兴和欣喜并且说:“就是说,我们错了。就是说,我们估计不足。”而且是每个人单独这样说,而不是商量如何发言,不把这搞成一个其中具有某些细微差别的声明、政纲。干吗要这样?每一个发言者都与另一个说的不同,他与任何另一个发言者总得有点区别。但是在我们这里,在布尔什维克党里不兴带着声明来;只有建立集团的时候,只有建立反对派的时候,才这样做,我们过去的所有情况只是如此。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这应当成为那些尚未发言的人的榜样,如果他们曾经有过失误,应当简单地走出来并说清楚,因为这里的情况表明,这不是理论上的争论。大家都在评价我们今年取得的那些胜利,大家对它们的评价都是相同的,你们也在自己的文件里评价它们。你们为什么不走出来,简简单单地说呢?当然,发言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虽然这种做法在我们这里似乎特别受到赞许,有些人甚至在加以滥用。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不会说,承认这样的错误是非常愉快的事。如果犯的是相反的错误,如果是估计过高,那么,对一个革命者来说,确认这一点会是不愉快的,而如果他估计不足,如果一切顺利,比他预期的更好,怎么,这难道不好吗?谁都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说出自己的错误,但既然我们习惯这样做,我现在也来说说。(笑声)四月全会以前,对于非常措施我也曾经有过某种怀疑。我确实感到很为难,不是从革命的或任何别的角度来看,而是简单地从对待人的角度来看,当我不得不向人数众多的人群施加行政压力的时候,我对是否应当这样做并

不总是满怀信心,这总引起我的某些怀疑。在四月全会上我确信了,我过去的怀疑是不对的,于是说出了这一点。但我那时想,一切措施的采取都应当是为了保护同志,对这方面的各种预防性的态度我表示了欢迎,虽然我对布哈林同志与加米涅夫谈话这个情况很不满意。我至今不明白这一点,我不明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怎么会这样做。而现在,在这个文件之后……

有人喊:只好双手一摊。

索尔茨: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顽固地想要成为某种特殊的小集团。从4月到现在已经过去那么多时间,这段时间本应当使他们相信,他们的估计错了。可在这之后我们仍然带着文件走出来,在这之后我们想用十分模糊的形式突出自己的不同之点,显示出自己的细微差别。你们这样做正是在你们自己所写的现在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一致、团结和对胜利的信心的这个时刻。要知道,这具有某种心理上的意义,取胜的往往是对胜利充满信心的人。而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一点。大部分时间往往用在某某说了我什么错话,某某反对我反对错了。现在这有什么意义呢?与现在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这是那么微不足道,真的,你们本应当更多地想,人们会把这忘掉的,会忘掉在什么文章的什么地方写了你们,既然你们将和大家套在一个套上,但不是用这种办法,而是从这个讲台上发表一个普通平常的声明,人们真的会立即忘掉的。到那时候大家会忘掉哪一年哪个报纸上写过什么。可你们用自己的文件加固了人们对这一点的记忆。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你们现在不说出这一点,而仅限于发表这个文件,你们就会成为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的成就的阻碍。

主席:现在请基洛夫同志发言。

基洛夫:对三位同志向我们提出的文件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我只想说明,我们昨天听这个文件的时候,它好像没有给人留下仔细读过以后那样的印象。

喊声:对!

基洛夫:昨天以凄惨的语调向我们陈述的这个文件的前半部分好像表明,我们在出席一个放弃阵地的仪式。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以便让这三位同志相信,我们的事情进行得比他们所想象的顺利得多。经过我们党最近一年所作的努力之后,当然,只有瞎子和聋子才看不见和听不到我们所取得的那些真正巨大的成就,在这之后根本不可能不写下“我们撤销自己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这样一句话。这似乎是反对派提交给我们的文件中弄得最通顺的地方。确实,声明的这个地方听起来似乎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过

声明中所写的东西,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情况是这样的,反对派同志们的口袋里装着比党曾经实际采用的有效得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处方。这个文件里直截了当地谈的就是这一点。分歧消除了的说法听起来不是对反对派的大赦,而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赦……

柯秀尔:好像是这样!

基洛夫:声明说,尽管如此如何,你们毕竟取得了颇大的成绩,虽然我们反对派会作出更大的成绩。

但是就在你们作出的很大成绩中也有许多未做好的事情。声明指出,我们提出的振兴农业的计划未全部完成。在实际工资方面,我们也未达到所许诺要达到的指标。同时,任何人都知道,我们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为什么未能全部完成。应当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对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现在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是由于一些农业地区不利的气象条件而发生的。但是我认为,声明里提出的更令人不快的指点是反对派同志们指出的实际工资增长不够。

有人喊:蛊惑人心!

基洛夫:瞧,这里有人说:蛊惑人心。我不知道,这样写是为了蛊惑人心,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但我觉得,尽管我们有各种普遍的困难,为了达到我们已经达到的实际工资水平,政治局和全党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当然,可以期望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要是你们早一点告诉我们这事该怎么做,那就更好了。十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听见这种指点。抱歉得很,我认为,指出工资(实际)增长计划没有完成不仅仅是作为去年的总结,而这里有关于我们今年的某种空子。

喊声:对!

基洛夫:我们刚刚进入了新的经济年度,作为完全成年的人我们明白,今年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当然是我们所预计的提高实际工资12%。这是十分清楚的。我怕冒进,但有可能发生我们不能全部完成这一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声明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谈论工资的。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向党发动新的进攻的成分。

同志们在这里已经指出了这个声明的一些地方,我只想谈一个地方,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地方。他们说:“我们认为,如果采用我们在四月全会上提出的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方法,我们就会通过痛苦较少的途径获得所期望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既然要谈论并像谢尔戈同志昨天那样评述这个声明,那么这恰巧是由

此而来的。一方面的结果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我们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我们本来可能用比我们现在小得多的消耗、小得多的损失取得这些成果的。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分歧的重点就在这里,两条路线,如他们所说的执行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两种方法就表现在这里。似乎可以想象,当然,任何目的都可以达到,但是途径不同。三位同志有一条比我们党过去所走的花费更少、消耗更少的没有痛苦的完成计划的道路。如果把这翻译成军人的语言,那么这种胜利没有什么可以令人特别高兴的。如果你一次以过多的各种物质消耗和有生力量的消耗取得了胜利,如果你的第二次胜利也是用同样办法取得的,那么,也许第三次你会碰上这样的情况,即你会很容易由胜利者变成失败者。这恰巧就是有些人早就对我们讲的那种哲学,他们说,你们中央委员会正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早晚你们会跌进一个这样的坑里,摔断自己的脖子。而我们知道一条较平坦的道路,一条较合适的道路,走这条路,我们不用冒坠入深渊的危险。我认为,那几位同志的一切毛病都是从这里来的,这说明他们为什么尽管身居应得的很高地位,却仍然不懂得基本的东西,他们不考虑,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的,那里,特别是在我们工作的当前时期,正在发生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似乎同意这一点,似乎准备同我们一道投入这种阶级斗争。但是既然有斗争,既然当前时期正在发生残酷的阶级斗争,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没有沟沟坎坎,怎么可能会没有坑坑洼洼呢?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我国现在的各个阶级并非全都也并非一致接受我们的政策,由此就产生了斗争,就需要克服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当前时期。为了保障我们在农民战线上的阵地,我们似乎商定了要投入坚决的进攻,在斗争的全线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在农村正在向富农展开最“猛烈的”进攻,这是反对派的同志过早地向党建议的。要知道,只有把富农描绘成傻子,才会看不见,由此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丘巴尔和柯秀尔同志在乌克兰向自己那边的乌克兰富农施压的时候,富农那么大声喊叫,连我们普梯洛夫工厂都听得清清楚楚。(笑声)应当知道,有时我们会遇到不仅是来自我们向其施压的富农方面的反抗。我们应当坦率地说,在工人阶级的个别阶层里我们有时也听得见富农思想的回响,在我们的机关里也并非到处都有对我们政策的同情,由此就产生了右倾活动的实践。这一切就是那些坑坑洼洼和沟沟坎坎。无论怎样迂回机动都是绕不过去的。而指望能够用什么办法避免我们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费用和消耗,这样的魔术师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

右倾分子对我们说,“我们赞成党的总路线”,但同时又补充说,执行党的总

路线的方法不对,不是应有的那种方法。但是当我们开始逐一分析,当我们开始一一列举这些方法是由什么构成的时候,结果发现,在这些方法的一切基本方面我们的看法都是不同的。那么请问,究竟在什么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呢?结果是,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热烈、绝对真诚和所谓最崇高地向往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但途径我们多少有些不同。一些人,右倾分子们觉得,可以没有这种特别的痛苦,没有特别的消耗,没有特别的压力、失望等就能解决当前的任务。

柯秀尔:一句话,白给。

基洛夫:当然,白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就在不久前他们对我们大家说,我们赞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赞成工业化,但不是对党所规划的短时期内;积累不够,粮食不够,这也不够,那也不够。最好稍微等一等。结果是,总路线我们是共同的,但我们的表是不同的,托姆斯基同志。你们的表在每一个问题上总是慢。为了使五年计划达到我们现在部分达到的水平,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全党和工人阶级的努力,而你们来到全会上说:我们现在“赞成”。你们把自己的表拨到我们的时间,现在说,分歧消除了,但表还是原来的表,因此我们丝毫没有信心,下一次全会你们不会同样晚来。

有人喊:表慢了。

基洛夫:这是办不到的。

有人喊:应当把表校准。

基洛夫:看来,不仅应当在这些非常措施方面把表校准,在这方面你们已经捎带地从侧面承认了一些东西,招认了一些东西,但是应当真正尖锐地提出使我们分开的所有根本问题并真正有一条完全明确的、毫不拐弯抹角的路线。这样你们才能不走得很远。

斯大林:也可以走得很远。

基洛夫:也可以走得很远,也许,就需要这样,但如果这有过多的困难和消耗,可以不这样做。我们围绕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分歧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这我们早就知道了,同志们。有人早就向我们说教,不应只是匆匆忙忙——一切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要知道,不很久以前,几年以前,你们曾经那么委婉地教育我们说,这些最美好的、兴旺的“富农的窝巢”正在那么一点一点地、悄悄地逐渐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诚然,现在有人为此在骂我们,说:“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不要求我们遵守秩序?”很清楚是为什么——那时候情况不同,应当说句公道话,你们实际上没有把这件事强加于我们。这是一。第二,我们在忙于(如你们所知道的)别的事情——与所谓左的活动进行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曾是同

盟者。那时候我们顾不上这件事情,现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几年前酝酿中的东西,那时候所写的一切,现在有人极力要我们落实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在这里我们的界限就分得十分清楚了。现在,托姆斯基同志,无论你们在这里在这个文件里怎样掩饰这段历史,似乎这一切已经消除,而实际上远非一切都消除了。我认为,归根结底应当把这个文件看作是相当有经验的老手写成的新的政纲,而不是向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投降的要素。是新的政纲。让我们,比如说,作片刻的设想,如果这里的这些话——“我们愿意同党一道与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斗争”——写得是真诚的,如果这确实的,那么,米沙,让我们带着这个文件去同工厂里的、农村里的和随便什么地方的右倾分子斗争。你又不是右倾分子。请凭良心说:这个文件对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会不会有帮助呢?我认为,它只会使我们的斗争复杂化,而不会有丝毫帮助,它只会把事情搅乱。

如果你们不是右倾分子,如果你们愿意与这些右倾分子斗争,那么,老兄,就应当在这里更开诚布公一点,更直截了当、更简单而又不要任何手腕地把这一切陈述清楚。文件的第一部分是今天的投降,整个其余部分是明天的政纲,最明确的政纲。如果我们注定(而我们完全没有得到历史的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明天会跌进新的坑洼里,整个这段历史肯定会浮现出来。

斯大林:对。

基洛夫:有人会对我们说:“我们那时候就对你们这么说了,瞧,真正的列宁主义在那里,瞧,党的真正的总路线在那里。”这个文件就是为这种情况而写的。

罗森霍尔茨:为生活中的两种情况而写的。

基洛夫:这里做得很巧妙。这是有经验的人写的。当人们称他们右倾分子的时候,他们大动肝火,人们不会称他们左派,但他们跟不上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斯大林:这就是右倾。

基洛夫:如果你们不喜欢右倾分子这个词,我们可以让步,称你们是落在党的总路线后面的人,但我不认为,因此会产生什么不同。可以落后得比向右冲的远得多。也可以相反。你们的结果是:向右或者向后,而不是向左和向前,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右倾分子全面落后,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会博得微笑,但是落后分子不比来自右的或来自左的阻碍小。这同样阻碍我们的建设。

我们讨论重大的问题好像已经是第三天了,让我们十分明确地说,我们全面研究了与控制数字有关的所有问题。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把60%的时

间都花费在这个声明上了。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们怎样描绘我们,我们坐在那里,在忙着什么,在做着什么事情,我们有一大堆伤脑筋的问题。本来可以对这一切更加仔细地研究,对我们的计划全面详尽地琢磨。而我们在这里坐了一天半,谈了谈这个计划,而现在有人给我们送上了一个政纲。

有人喊:从头开始了。

基洛夫:开始回忆,又要作各种回顾。可哪里有保证,过两天不会送来一份新的文件?到那时,你就再从头开始吧。我们与这种右倾活动打交道已经相当久了。我认为,我们所有的组织,包括我们列宁格勒组织做得对,要求中央对这种右倾从思想上彻底揭露。我应当说,它不仅在出版物和报纸上被充分地揭露,而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工厂里和农民的田地里被粉碎了。

有人喊:这是真的。

基洛夫:它被这种非常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内容彻底粉碎了。我认为,我们的各个组织,也包括我们列宁格勒组织一致要求这次中央全会坚决结束这种右的或者落后的倾向,做的是正确的。如果除了他们在这里给我们送上的,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如果反对派的同志不明确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应当设法在组织上加强整个这场战斗和斗争。应当用一切办法保证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首先是我们的司令部的工作。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工作,要知道,我们挑起了这样一副担子,如果我们的人比实际上更多一些,担这副担子就更合适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党内的组织措施决定着许多东西。应当让领导觉得自己是坚强的,不会抖动的,让我们的总领导稳坐在自己的马鞍上,不要再左顾右盼,更不要向后看。应当直截了当地而不是拐弯抹角地说明这一点。全党,根据我们的组织判断,期待于这次全会的正是这一点。

喊声:对!

基洛夫:在右倾分子的声明里雄辩地写着,现在需要党的统一,钢铁般的统一。那么,如果这是真的,就应当由此作出某种结论。如果你们不作出这种结论,我认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作出这种结论,作出任何人——无论是落后的,勇往直前的,还是站在我们共同队伍里的人都明白的十分明确的结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成绩卓著地实现我们伟大的建设工程计划。

主席:现在请鲍曼同志发言。

鲍曼: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对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进行总结,我们当然不能不指出超出我们的计划和期望的那些极其巨大的成就。建立大工业的计划我们超额完成了,同样我们也超额完成了所提出的农业集体化的计划。有人说,集体化运

动现在已经变成了强大的贫中农运动和我们现在可以提整村整区全盘集体化的问题,说这话的那些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有人说,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巩固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与中农基本群众的联盟并以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对我国的资本主义残余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阵地,应当为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老根展开斗争,说这话的那些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这就是经过五年计划第一年之后我们可以说的经济方面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指出,经济是基础,在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各种政治派别。这对于我们的党也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党内的许多派别和动摇是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出现的那些困难中吸取营养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那些成就的同时,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内的派别在瓦解,它们正在遭到破产。当然,托洛茨基主义遭到破产要早得多。但现在我们看到,托洛茨基分子的最后残余在土崩瓦解。不仅如此,那些还想要诋毁党的总路线的同志,比如说,沙茨金同志、斯腾同志,本应当向这次中央全会悔过²⁵⁹。而现在在这次全会上我们又看见了下一个阶段,悔过的不仅有斯腾和沙茨金,科托夫同志和米哈伊洛夫同志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生活的教训是如此有力,它们迫使一些同志虽然迟了一些,但认识了自己背离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总路线的错误,认识了往任何一边动摇都是不能允许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于党的生活的现阶段,这个问题是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关于那些在中央领导里,在政治局里的我们党的右倾分子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这里发言的同志们完全正确地断言,党期望于这次全会的正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带着五年计划第二年的控制数字来到党的面前,五年计划是动员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相当明确的纲领,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和中央内部、政治局内部、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内部的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的关系问题,党就会感到不满意的。我们应当在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期待,我们布尔什维克总路线的成就、生活的成就、生活的教训既然能够教育沙茨金和斯腾,能够教育许多托洛茨基分子,能够教育科托夫和米哈伊洛夫,难道它们就教育不了在党内担任更负责的工作的那些人。难道他们比那些人敏感性差,难道生活的教训没有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特别是我们的老朋友乌格拉诺夫受到教育?当然不能说,这些教训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痕迹。留下了一些东西。他们对自己的正确性发生了某些动摇。从这个观点看,我觉得,在他们提交的这个文件里也可

以找到某些成分。毫无疑问,在这个文件里有一些退却的调子。这些同志表面上在退却,一边退却一边掩饰退却,努力这样地退却,以便不解除武装,以便把武器留在手里为了继续向党进攻。

我尝试着简略地归纳了一下,他们在哪些问题上在退却。现在他们写道,他们承认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是正确的。他们承认党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同时附带声明说,他们的方法会获得同样的成果,而且痛苦较少,但是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党的方法获得了成果。

他们放弃富农长入我们的经济的理论。

柯秀尔:没有这么回事。

鲍曼:他们间接地、表面地放弃,说“长入”的提法过时了。

罗伊津曼:让他们就这样写下来,他们放弃富农长入的理论。

鲍曼:我同意。我在这里谈的是表面的不彻底的退却的那些因素,由于已有的生活的教训,它们是不可能不发生的。请看第十一点——“长入的提法”,实际上这个提法本应当表明所谓的“第三次革命”是完全不需要的,它在中央委员会通过以后被写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有可能被错误地解释为排除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可能性的提法。因此,现在它在政治上是有危害的……²⁶⁰

接着他们暗中放弃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解释、对市场关系的错误解释。这里毫无疑问有对他们过去说过的话的某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彻底的背离。他们现在暗示,他们对合作社在商品流转方面是农村公有化主要形式的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主要的形式是农业的集体化。

他们在间接地与自己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估计不足,与迁就薄弱环节的理论划清界限。这些表面上退却的因素在这个文件里是存在的,退却,而又不表明他们在退却,退却,而又要躲避无产阶级对他们明显错误的反列宁主义提法的批判炮火。生活的事实像一把巨大的锤子,像一根巨大的木棒在敲击这些同志的脑袋,使他们不能不认识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错了。

但是,他们在放弃这些错误观点的同时,不公开承认,不谴责被党谴责为与列宁主义路线对立的自己的观点体系。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分歧只归结为在非常措施问题上的分歧,同时他们建议党预先把非常措施从无产阶级与富农斗争的武器库中勾掉。

他们暗中在一个地方放弃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却同时暴露出,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并不放弃,极力把武器保存在自己的手里并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与

党的路线对立起来。

他们避而不谈他们先前抛出的攻击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指责,这种指责涉及无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的根本问题。

他们使攻击党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仍然有效,他们说,中央委员会在对他们的指责中在重复列宁格勒反对派当时针对全党的那些指责。

他们只字不谈,他们是否放弃了攻击党在培植官僚主义的指责。他们保持沉默,不撤销自己在关于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声明上的签字²⁶¹。如果这里再加上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对外政策所说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十分清晰,他们退却得是如此之少,他们放弃的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是如此之少。可以这样说明这种立场的特点:进一步,退两步。总之,结果是落后于布尔什维克总路线更远了。又仅仅是落后吗?

看得很清楚,这里所谈的不是小事,谈的是两种观点体系、两条路线——列宁主义路线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第十六次党的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²⁶²,这里谈的是新的、独特的、“胆小如兔的”(托姆斯基语)或者别的什么反对派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

十分清楚,根本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和全世界阶级斗争当前时期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反对我国资本主义残余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难道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谈到当前特别重要和关键的问题,谈到阶级斗争必然会尖锐化,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资本主义分子的疯狂反抗,对无产阶级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进攻的反抗会增强了吗?这种阶级斗争过去曾经被抹杀,同样,对当前时期阶级斗争性质的总的观点在这个文件里阐述的是不正确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难道在这个文件里我们看到了对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放弃?没有这一点。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当前时期是稳定在动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高涨的时期的估计。关于无产阶级在与农民的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增长也没有明确的提纲。这里没有足够明确地谈到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相反,却指出一部分中农投到了变得凶残的富农一边,没有谈到以出现的新形式为基础巩固联盟,即以生产形式为基础巩固联盟,这里没有说,这是党取得的一个主要成就。可我们记得,托姆斯基同志在上一次全会上表示惊讶地说:这谈的是联盟的什么新形式。现在他们承认,集体农庄运动正在成为农村的主导现象,同时却不谴责托姆斯基同志和其他人在上次全会上对社会主义城市和农村在当前改造时期结合的新形式,即生产形式所表现的

那种讥讽态度。

对整个这一历史时期我们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看法问题上的分歧,同样保存了下来。党清楚地说明,我们经济高速度的发展是必然的,并强调指出,这是由整个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的。而要知道,我们有布哈林同志叙述的“政治遗嘱”,遗嘱里说,慎重是共产党当前时期的主要美德,发展必须以较慢的速度进行。我就不说《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²⁶³了。这里仍然保留着分歧,对如何认识当前阶段是极大地加速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这个重大问题的分歧。总之,我们可以说:尽管声明说他们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杠杆有错误的估计不足,但现在还存在着对工人阶级力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曾经是作为完整观点体系的反对派观点的特征。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对与党的观点对立的作为完整观点体系的反对派观点的放弃和谴责。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否则,右倾就没有解除武装。现在我们没有进行,比如说,我们去年或今年年初与右倾领袖们所进行的那样的战斗(请回忆1月30日和11月9日的声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与退却中的敌人进行战斗。敌人在退却,但却竭力保住自己手里的武器,他们不交出武器是为了重新发起进攻。而这次中央全会的作用应当是从思想上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迫使他们放下自己的机会主义武器或者使他们在组织上不能为害。这就是党向这次中央全会提出的要求。如果我们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谴责反对派的观点是与党的观点对立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完整体系,并同时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攻击党的路线,就不得不作出组织结论,那么,在这次全会上,在他们发表了这个两面派的声明之后,必须作出这种组织结论。我们莫斯科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像斯大林同志提到的,采取的是这样的策略:谴责他们的观点,向他们提出警告,但同时尝试把他们保留在指挥部里,保留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生活表明,这些同志向党学习得这么不好,显然,我们不得不实行四月全会的警告。我们的各级组织,从工厂的支部到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全都持这个观点。我们的代表会议都明确表示了自己这方面的意志。我们的各个支部和区委会都指出,如果把这些同志保留在指挥部里而他们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今后的工作将会遇到困难,前景将是不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说:要么像党所要求的那样彻底投降,彻底放下自己的机会主义武器,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里,在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里就没有当前时期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领袖们的位置。如果你们要问,我或者别的莫斯科的同志认为哪一种办法更好,那么我们应当说,我们更喜欢前一种办法——三人集团彻底投降,而不是从组织上驱除他们。但他们的顽固确实

是令人惊讶的。这种顽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思想迟钝还是自尊心，或者是由于一系列别的原因，或者是机会主义的原则真的深入到他们的世界观里了？但无论如何，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我们记得，过去布哈林曾多次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结束自己的报告时他号召：前进，前进！现在他是机会主义的殿军，因为整个机会主义在我们党内已被击溃，但这支小小的殿军还在坚持，它的领袖就是布哈林同志，他十分明显地在把党拉向后退，可能他将发表讲话并且说：前进，前进，前进！但向哪里前进？也许是向资本主义，向调和主义，向右倾前进吧？显然，不仅是他们的表的指针慢了，像基洛夫同志说的，而是采取的方针不对，这是主要的。

有人喊：走的方向不对。

鲍曼：应当根本改变自己的脑筋，自己的观点体系，而不是辩论某些细节。我认为，在多次代表会议上陈述的并得到各个支部决议肯定的莫斯科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反对派分子同志们对莫斯科没有什么可指望的²⁶⁴。

但是，我想指出一点：有些支部里有过派别斗争的企图，特别是在工业学院的支部里²⁶⁵。当然，这种派别斗争不可能得到明显的发展，因为右倾反对派分子的观点不受欢迎。我们的反对派分子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尽快地停止他们存在的动摇，特别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应当更勇敢地停止动摇。你们对自己的正确性已经没有坚定的信念。应当停止了，也许，这对于你们是最重大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以后这种时刻不会再有了。要与党同步前进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你们过分落后并远离党的路线了。

关于控制数字我简短地说几句。我想提请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成员注意，人们通常把莫斯科看成是取之不尽的金库，莫斯科富有，因此向莫斯科要大量的钱，当然，在各级地方组织都同意的情况下，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可以决定从莫斯科多拿走一些钱。但是，如果你们仔细看一看我们的预算，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很多部门都落在你们后面。

丘巴尔：建起了两个钟表厂。（场内喧嚷）

鲍曼：还没有建成。不管这会使人感到多么奇怪，但是在奥列霍沃-祖耶沃专区，布勃诺夫同志说得完全正确，我们这里并非所有工人的子弟都有学上。

柯秀尔：那在顿巴斯呢？

鲍曼：在卡累利阿有许多地方实行了普及教育。并入莫斯科州的一些专区预算恶化了，因为拒绝给予它们补贴，特维尔、图拉、梁赞这些州过去都领取政府

的补贴。其实,从总的计划看,给我们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场内喧嚷)

柯秀尔:那还用说,穷嘛!

鲍曼:我早就知道,乌克兰的同志对从我们这里拿走东西会感到高兴。(场内喧嚷)

我想举下面的数字。去年从我们的工业拿走了1 800万卢布。今年预计要拿走2.25亿卢布。你们说说,怎能设想我们经受得了这种跃进?

柯秀尔:竟有这样的穷汉?

有人喊:从穷汉那里没法拿走2.25亿卢布。

鲍曼:我们同意把这个数字提高5—6倍,就让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1亿—1.2亿卢布吧,但2.25亿卢布——这太多了。

喊声:没有什么,你们不会变穷的。

鲍曼:有人说,我们有大工业,但别忘了,这主要是印花布工业,而正当现在谈论第三个时期,谈论我们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当你们将听取的所有讲话、所有报告人讲的都是这种伟大的热忱、列宁主义的探照灯等等的时候,你们将听不到莫斯科的名字,那里会有乌拉尔,那里会有西伯利亚,那里会有下伏尔加,那里会有高加索,而关于莫斯科什么也没有。(喧嚷)

丘巴尔:那种表厂呢!

鲍曼:是的,我们有一个钟表厂,一个自行车厂等等。可拖拉机厂在哪里?我们的复杂农业机器厂又在哪里?同志们,你们的目光有些短浅。你们以为,莫斯科州是特维尔大街?我们有700万农民人口,我们的工业应当为农业服务。

柯秀尔:莫斯科州有多少工人?

鲍曼:我想,在这方面北部州、西部州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应当同我们结成联盟。(喧嚷)

柯秀尔:你有多少工人?

鲍曼: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有铁矿。我们也有煤。

丘巴尔:那你们去年为什么没完成产煤计划?

鲍曼:我们会补上的。毫无疑问,我们也能够建设冶金工厂,我们也应当广泛发展金属加工工业。

我希望,尽管有抗议的叫喊声,你们仍然会总体上同意,不能用过于肤浅的态度看待莫斯科。应当多少为莫斯科想一想,因为她在我国整个经济改造中是主导的因素。

主席:有人提议结束讨论。还有32个人要发言,其中有斯大林同志。我建

议让斯大林同志发言,然后就结束讨论。

奥尔忠尼启则:我建议让斯大林同志发言,然后再看情况。

索柯里尼柯夫:刚才本应当由我发言,但与主席商定挪后一个发言。因此我请求让我发言。

喊声:让他发言,让他发言。

主席:索柯里尼柯夫之后又有一个人要发言,然后还有一个人要发言,这样没完没了。

喊声:应当让他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我建议让索柯里尼柯夫发言,然后休息,然后让斯大林发言,然后就结束。

主席:现在我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建议提付表决:让索柯里尼柯夫发言,然后让斯大林同志发言,然后是总结发言。谁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没有。

现在请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言。

索柯里尼柯夫:首先,谈一点小意见。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今天说,在财政政策问题上我是从这样的一种认识出发的,即我们这里的货币流通规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的,这是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的。

索柯里尼柯夫:〈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同样的。我想,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也没有说过这话²⁶⁶,而在很多场合我说的恰巧是相反的东西。这道理是如此浅显,我觉得,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疑问。

柯秀尔:未必!

索柯里尼柯夫:顺便说,在货币流通问题上我始终认为并且捍卫的观点正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货物匮乏现象,而不是通货膨胀。为此我们曾发生过争论。因此,条件的类似和相同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想,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会同意,如果我同意他的这个论点,尽管我们这里通货膨胀的出现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用来对付通货膨胀的杠杆,而我们有这种杠杆,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危险,我们就不应当与之斗争。显然,我们应当与之斗争,我们是有这种斗争的可能性的。

现在谈谈由于三位同志的声明在这次全会所触及问题的实质。我觉得,这个声明这样提出分歧是不对的,似乎这些同志与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多数之间的分歧大都和主要是在粮食收购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我觉得,这种阐述是不对

的,这些同志对集体农庄建设、国营农场建设问题,对与富农斗争的问题,对富农经济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所陈述的那些观点,正是这些观点才是基本的核心,而完全不是粮食收购中的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问题。同时我觉得完全无可争辩的是,几位同志就这些问题所表述的观点是完整观点体系的极端突出的极端的表现,或许体系一词是不对的,因为这些观点并未形成体系……

斯大林:互相矛盾。

索柯里尼柯夫:但它们是流传很广泛的观点的表现,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我们敌对阶级的纲领,这么说吧,从这些观点到我们敌对阶级的纲领无疑有着一定的联系。同志们,现在我来说,我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并且详细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此刻我想说说自己个人的观点,我没有附和过这些同志表述的原则观点中的任何一个。

有人喊:那去找加米涅夫呢?

索柯里尼柯夫:我没有附和过这些同志所表述的任何一个原则性的观点。我所持的观点是必须与富农斗争,我始终捍卫农业领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巨大重要性和决定性意义的观点,但是我当然应当承认,我当然有过某些动摇,对自己的这个观点我表述得不完全彻底。(插话未听清)特别是,如果同志们在这里用茨维申鲁夫²⁶⁷打断我,关于谈话……

柯秀尔:说媒。

索柯里尼柯夫:关于加米涅夫与布哈林之间当着我的面进行的谈话²⁶⁸……

莫洛托夫:而且是根据您的倡议。

米高扬:是谁把加米涅夫从卡卢加叫来的?

莫洛托夫:有您的一封信在。

斯大林:在托洛茨基的档案里。

索柯里尼柯夫:问题不在这里,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的会面不是我倡议的。

莫洛托夫:有一封信。

索柯里尼柯夫:请读吧。加米涅夫与布哈林会面不是我倡议的。

奥尔忠尼启则:那是谁倡议的?

莫洛托夫:信就在这里,请读吧。(笑声)

喊声:读吧,读吧!

索柯里尼柯夫:我丝毫不反对,请读吧。

奥尔忠尼启则:不,您来读吧。

丘巴尔:也许需要一个翻译?(笑声)

(索柯里尼柯夫把信交给扎东斯基。)

扎东斯基(朗读):

“莫斯科 1928年7月9日

亲爱的Л.Б.:我们刚回到莫斯科几天,便直接去参加全会。我原以为会在这里碰到您,而您原来还呆在卡卢加。您是否很快就到这里来?非常需要跟您谈谈和商量一下——您能否于近日到这里来一趟。这将会是非常重要的。看来,全会将于明日结束。今天对米高扬的报告进行讨论,正在开始‘交战’。如果可能,请回电话(3—49—24)。早日见面。握手。Г.索柯里尼柯夫”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们,我不愿意读这封信,原因很简单……

米高扬:也许,信是伪造的?

索柯里尼柯夫:不,干吗说它是伪造的?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信是我写的,我准备为信里的每一句话负责。如果你们问我关于同加米涅夫会面的政治含义,那我应当再说一遍,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的会面是布哈林直接倡议进行的。

米高扬:而您充当了信使的角色?

索柯里尼柯夫:真俏皮!布哈林想与加米涅夫商谈。这次会面进行了,与大家的推测相反,这次会面没有结盟的目的,谈话也登出来了。你们早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参与是怎么回事。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这次谈话我在场……

奥尔忠尼启则:以什么身份?

柯秀尔:以见证人的身份。

索柯里尼柯夫:以什么身份,这已经查明;如果你们愿意,我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在场的。

柯秀尔:作壁上观的证人。

鲁祖塔克:见证人,见证人!(笑声)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们,很遗憾,你们逼迫我谈一个话题……

有人喊:不愉快的话题。

索柯里尼柯夫:它会使我离开我想说的更重要的东西而岔到一边。(笑声)

如果你们认为,这对于你们是最主要的,那我现在就谈这一点,只是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

斯克雷普尼克:没有问您的身份,问的是您的观点,而您谈的是身份。

索柯里尼柯夫:好的,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您是著名的法学家。如果给我延长时间,这一点我也可以谈。

斯克雷普尼克:是法律上的事,真的!

索柯里尼柯夫:为了判明这个事件,你们应当考虑到以下情况。在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这一点我应当坚决声明,加米涅夫当时一直向我表示,他认为政治局多数的观点是正确的。顺便说一句,我今天又得到了其他谈话的什么新的记录等,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全部读完,但是我可以只考虑从加米涅夫那里听到的话。

奥尔忠尼启则:听谈话的时候,您就确信了[加米涅夫说得不对?]²⁶⁹

索柯里尼柯夫:什么谈话?

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的谈话。

索柯里尼柯夫:在这里我应当引用斯大林同志是怎样评价这次谈话的,即……

米高扬:斯大林不在场,而您在场。

索柯里尼柯夫:(即)加米涅夫在一定程度上捉弄了布哈林。这次谈话有什么目的和什么含义呢?你们应当考虑到以下情况……

米高扬:您给予了协助。

奥尔忠尼启则:总之我认为,结果很不好。您本来至少应当告诉我们,有人在欺骗党,可您没有这样做。但让我们把这放在一边,继续说下去。

索柯里尼柯夫:是的,结果“不好”,因为后来分歧尖锐化了。但是我从加米涅夫那里不止一次地听到,在这些分歧中他认为政治局多数所持的观点更为正确。

米高扬:那您干吗把他从卡卢加叫来?很难从您这里得到一句真话。

索柯里尼柯夫:米高扬同志,请让我把话说完。一年半以前没有人授权加米涅夫去与布哈林战斗。

米高扬: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应当了解,是怎么回事。

索柯里尼柯夫:当然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请让我说下去。

鲁祖塔克:米高扬,让他说,让人家忏悔!

米高扬:我请他讲出一切,你却说——不要妨碍他说话。

索柯里尼柯夫:如果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很遗憾,这件严重的事情没有由应当干这事的机关调查。

米高扬:我们是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

索柯里尼柯夫:我看不出,您知道了什么新的东西。

米高扬:既然您向党隐瞒了,又向谁去了解?

索柯里尼柯夫:我不想把自己的发言变成与米高扬同志的对话。

主席：米高扬，要么你来替索柯里尼柯夫转述，要么由他自己来讲述。

米高扬：整个全会都感到愤慨。而你不愤慨，很平静？

索柯里尼柯夫：米高扬同志，我没看见全会在愤慨。全会的愤慨表现在哪里？

柯秀尔：相反，是普遍的赞许。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们，你们非常清楚地了解1927年以前我与加米涅夫原先的政治关系。因此，我过去与他关系比较密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他与布哈林的会面，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声明过了，我只能再重复一遍。

奥尔忠尼启则：您向党隐瞒了这次谈话，这一点您没说。

索柯里尼柯夫：我当时就声明了，布哈林这样提出了问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应当参与迫害他布哈林，他也认为应当说明自己对他们的态度，说他不是他们最不可调和的敌人。本来就是为这个问题才需要进行谈话的。我认为，可以进行任何谈话，但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主要错误是，我没有考虑到，这次谈话会变成……

什基里亚托夫：您没考虑到一个情况，这个文件会被人知道。

索柯里尼柯夫：不，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我没考虑到，整个这次谈话会由于托洛茨基分子的利用而变成一个政治事件。（笑声）如果一个政治局委员……

索尔茨：但如果谢尔戈叫一个中央委员去谈话并邀请我到场，我会这样认为，这是一次政治性的谈话，而不是品茶聊天。

索柯里尼柯夫：索尔茨同志，您想把事情说成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不能出席一个政治局委员与一个声明自己与党一致的昨天的党的积极工作者的谈话。

罗伊津曼：要知道，他们是反对党中央的。

索柯里尼柯夫：从在场的布哈林的谈话里……

索尔茨：品茶聊天。（喧嚷）

索柯里尼柯夫：这不是品茶聊天，但这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与一个党员的谈话，关于他我认为，他是赞成政治局多数的观点的。至少他是这样向我表示的。

什基里亚托夫：做得不好。

索柯里尼柯夫：但是，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我丝毫不否认这一点，这我已经说过了并且再重复一遍。

有人喊：干吗要拖整整一个小时。

索柯里尼柯夫：等一等，或者你们想让我提供证词……

柯秀尔：是否把这件事交给党的侦察员办理？

索柯里尼柯夫:或者你们问我对这件事情实质的看法。对这件事情的实质,我开诚布公地向同志们说:我认为自己参与加米涅夫同布哈林的谈话无疑是错误的。

鲁祖塔克:错误不在这里,而在于你没有向中央报告这次谈话。错误就在这里。

索柯里尼柯夫:我来到谈话现场以后,我听完了布哈林所说的话以后,正是在这以后我与布哈林的政治关系就断绝了。我不再支持布哈林所持的立场。

奥尔忠尼启则:本应当向中央委员会报告,那样一切便清楚了。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们,你们当然不知道许多别的谈话。(笑声,喧嚷)

有人喊:也许我们会从托洛茨基那里了解到;我们还会好好找一找的。

索柯里尼柯夫:你们可以放心,这是允许进行的谈话,在这些谈话里你们谁都看不到任何不好的东西。这是与谢尔戈的谈话,他就坐在这里……

喊声:啊!(喧嚷,笑声)啊!

索柯里尼柯夫:这是与斯大林的谈话,他也坐在这里。我对他们说过的话,现在我还想再重复一遍。

奥尔忠尼启则:我应当证明: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与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有过什么谈话。

索柯里尼柯夫:我没有说过,但这写进了托洛茨基的那个文件里,那个文件早在去年十一月全会上就发给了全体中央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对,但在文件分发以前你没有说过这一点。

索柯里尼柯夫:我认为不可能讲述由于布哈林个人的坦诚而得知的东西。(喧嚷,笑声)

请你们去问进行了你们认为不能允许的谈话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吧。

奥尔忠尼启则:他隐瞒了,你们也隐瞒了。你干吗老围着这一点兜圈子,说吧,你干了很多蠢事。

索柯里尼柯夫:我已经说了,我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我不能同意你们对这次谈话的解释。另一方面,当我过去同您谈话的时候,当我同斯大林同志谈话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因为11月曾经发给全会的所有成员一个文件,托洛茨基在里面写道,“布哈林从后门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同他进行谈话”。

米高扬:当时我们无法相信,您与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在搞反对党的阴谋。

喊声:限定的发言时间!

索柯里尼柯夫:限定的发言时间!是你们自己在破坏限定的发言时间。

(笑声,喧嚷)

主席:请你们让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讲完。(喧嚷)

索柯里尼柯夫: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七月全会决议之后,在我了解了从布哈林那里听到的所有东西之后,我认为布哈林实行的那条路线是不对的。这一点我曾经声明过,这一点我在书面声明里也说过。我不否认自己有过某些动摇,我认为这些动摇是错误的,但这些动摇与我们七月全会面临的那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在七月全会上已经解决了。

中央七月全会取消了非常措施,对非常措施的某些方面我曾有过怀疑;中央七月全会对粮食价格实行了某些提高,这种提高表明是完全足够的。七月全会以后,在去年中央十一月全会上,请你们回忆一下我发表的关于自己立场的声明,那为的是消除关于我与右倾分子一致的揣测。我认为这些事实是主要的。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问题的本质和我与布哈林同志及支持他的同志确认的那些分歧上来。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农业应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过动摇并且认为,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该有动摇。而当布哈林在自己最近的文件之一,在《列宁的政治遗嘱》里对此作了这样的表述,说集体农庄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之后,我就认为,他在这里接近了根本问题,接近了根本问题之一。我觉得,这里的表述应当恰巧相反,在我们的条件下,农业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当然是集体农庄加国营农场。这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至于布哈林所说的各种合作社,那么,这当然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只是通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引路而已。无疑,把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但如果在这里就把集体农庄作为生产合作社与其他类型的合作社区分开来,那么我认为,这里的情况正像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与我们革命政策的基本问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过去多年间已习惯于保存农业中的小经济,那么这种政策只能是暂时的。这是我们在工业领域,商业、运输等领域发展社会化大经济,而在农业中在农民很小的地段上保留小经济、分散经济原封不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孕育着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极大矛盾的发展,因为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工业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大经济在工业中取得了胜利,而同时农村的发展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由于保留着小商品经济,而这种小商品经济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分每分钟都在恢复。由于农业中这种小经济的土壤仍然存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这里应当记起,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夺取大工业企业的同时,实行了摧毁大地主财产、大地主经济的政策。因此,由于这种摧

毁,由于我们在这一点上支持了旨在消灭农业中已经建立的那些大经济的农民革命,我们支持这种农民革命是为了巩固城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成了全世界农业中小经济占最大优势的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我们农业这种分散的状况。

如果在工业方面在大经济形式和推行社会主义类型经济的意义上我们已经成为最先进的国家,那么,在农业上则是一个小经济无法保证或者只有在产生资本主义成分的同时才能保证生产力提高的最一筹莫展的国家。我们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所实行的农业政策的转变就是为了执行列宁多年以前所说的我们能够给农民经济成千上万台拖拉机的指示,这种转变是我们革命中的一种新的东西。(主席摇铃)

我请求延长五分钟。

主席: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请求再给他五分钟。

喊声:给,给!

主席:就五分钟,不再延长。

索柯里尼柯夫:发生了转变,它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农村政策方面开始更加坚决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过去摧毁地主庄园的时候和小农经济加强的时候,是一回事情。要赞成这一点,但不继续前进,做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行了。而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与城市社会主义大经济同时开始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大经济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极大胜利。这个极大的胜利是对互相矛盾的发展道路的克服,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将会消失的保证,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的加强。正因为问题这样摆着,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对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不可能有任何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能完全地和百分之百地拥护我们党中央的路线。从这个观点看,我认为,“三人”声明中对问题的那种提法是完全不够的。毫无疑问,“三人”声明既在抹杀这样一个有长久历史的问题,像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不能容许的理论问题。现在我不谈这个问题。这个声明也在抹杀个别课税的问题,即我们与农村斗争的形式和深度的问题。签署这个声明的同志们当然对与富农的斗争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没表现出那种必要的坚持精神,只有这种坚持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在农村执行农业政策的胜利。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只有全力打击富农,才能同时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与阻止富农钻进集体农庄并躲藏起来的企图。

关于党的工业化政策和党在农业方面给自己提出的那些任务之间正在形成

的相互关系,我想再说几句。我认为,我们确实用最近几年在农业方面的工作为工业化的任务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我们找到了真正克服农业与工业之间矛盾的政策。我们现在看到的对工业化政策突出强调,强调它保证农业公有化成分最迅速提高的方面,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它同时既保证了农业的提高,又保证了工业最迅速发展的可能。一些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硬说,党所实行的这种工业化就是他们过去所要的那种工业化。我认为,应当大力强调,中央实行的这种工业化与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推荐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用不着去说许多方面,特别是它与农业的提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是通过标志社会主义农业提高,而不是富农农业提高的形式。而托洛茨基主义在超级工业化问题上宣扬的那种方针是加速发展工业,而不注意农业公有化成分提高的方针,因而这种方针曾经造成了两种危险——它使工业的提高脱离了原料和粮食基地,同时它让农业朝资本主义方向,而不是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主席:现在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之后)

主席:现在请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²⁷⁰:关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这里讲了那么多又那么详尽,对大家所说的,我只能补充几句。

三人声明作为一个政治文件是什么呢?

三人声明是我们的同志退却的结果……

有人喊:亲爱的。

斯大林:我们亲爱的同志们、右倾的领袖们退却的结果。他们在从最后一次全会上所持的立场退却。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右倾分子,他们放弃了与中央的斗争,与党的路线的斗争呢?不,不是。他们退却是为了向中央展开新的进攻准备基础。这就是文件的本质和政治含义。

他们退却,是因为已经守不住否定和低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旧有阵地。现在连瞎子都看得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飞速发展。现在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这一点。现在连巴扎罗夫们也不否认这一点。

他们退却,是因为已经不可能重复那些诽谤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旧的指控而不冒被赶出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的危险²⁷¹。现在连瞎子都看得见,立宪民主党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神话已经被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

强有力发展、对富农的顺利进攻和贫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的不断加强的进程揭穿和彻底粉碎。

他们从旧的阵地退却,是因为右倾分子关于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和迁就“薄弱”环节的旧的观点已经被生活揭穿和彻底粉碎。现在连瞎子都看得见,以加强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和接近生活的政策。

他们退却,是因为现在右倾分子已经不可能不冒危险地重复诽谤党在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培植官僚主义的指控。现在连瞎子都看得见,这种诽谤的武器已经被我们党的实践的整个发展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竞赛、突击队、清党、清洗苏维埃机关等的整个发展进程彻底从右倾分子的手里打掉了。

他们从自己旧的政纲退却,是因为现在右倾分子已经不可能不冒危险地重复他们诬蔑联共在瓦解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的谰言。现在连少先队员都知道,这种造谣诬蔑已经被共产国际的发展进程及其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美国支部的发展进程彻底粉碎了。

他们从自己旧的派别政纲退却,是因为它已经被生活所粉碎了,已经不能用来反对党,反对党中央了。

他们从旧的派别政纲退却,是因为现在他们需要新的派别政纲来与党进行斗争,与党中央进行斗争。

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正是这种新的派别政纲。

他们在自己新的派别政纲里究竟提出了些什么呢?

他们在自己新的派别政纲里提出了四点作为在发展的新条件下向中央展开斗争的基础:(1)党未完成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2)党未完成发展畜牧业的计划;(3)党未完成提高实际工资的计划;(4)对富农进攻的政策,尤其是对富农实行非常措施的政策中隐藏着的危险。

这就是右倾的领袖们的新的政纲。

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他们还没有放下武器而且也不打算放下武器,他们只是重新进行了武装,为的是在新的派别政纲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反对党的斗争。

不用说,这个新的政纲也会像他们旧的政纲一样被生活粉碎。只有右倾分子营垒里的瞎眼的派别分子才会由于这个新的政纲为自己抱一线什么希望。

我不来逐点分析这个虚伪和伪善透顶的政纲。它不值得认真去研究。我只谈一点——关于非常措施问题。文件的作者们满怀恐惧谈论非常措施,就像鬼害怕神香。他们怎么会针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产生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恐惧呢?首先,是由于右倾分子完全不理解当前的整个形势。第二,是由于他们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在阶级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立场。最后,是由于他们完全不理解我们党对富农进攻的政策。你们自己想想吧。

1. 右倾分子把非常措施描绘成针对全体农民的政策。请问,根据是什么?非常措施是针对富农和富裕分子的而且只是针对他们的,难道这不清楚吗?在这之后怎么能把非常措施描绘成针对全体农民的措施而不诋毁党呢?

2. 在反对非常措施的时候,他们从原则上反对对富农实行非常措施的可能性,认为在这里只能采用经济性质的措施。为什么?根据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这种原则上的胡说八道?为什么可以对耐普曼实行非常措施,而对富农就不能实行呢?难道富农不是同样的而且力量比耐普曼更大的资本家吗?

3. 在反对非常措施的时候,他们把今年正在实行的非常措施与去年所实行的非常措施等量齐观。为什么?根据是什么?去年的非常措施主要带有行政性质(这是对富农的试探),而今年的非常措施是由千百万贫中农群众实行的措施(贫农和中农向富农的进攻),难道这难以理解吗?怎么能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呢?

4. 在反对非常措施的时候,他们实质上是想要攻击对作为阶级的富农全面进攻的现行政策,但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担心被揭露有富农倾向。请问,为什么?右倾分子同志们哪里来的这种思想上的怯懦?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公开和诚实地提出我们所采取的对富农坚决进攻的方针是否适当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对富农进攻的政策是否正确呢?现在连瞎子都看得见,它无疑是正确的。它的正确性已经被最近期间我们在农村在粮食收购方面和在集体农庄运动发展方面取得的许多决定性的成就证实。在我们展开进攻和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目前条件下,非常措施是什么呢?它们是这一进攻和这一运动的十分之一或许二十分之一的组成部分。现在离开对富农的进攻和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突出强调非常措施问题意味着站到伪善的、虚伪的、彻底怯懦的立场上,这不是很清楚吗?右倾分子对去年中央全会关于不宜把非常措施变成为经常性措施的决议的援引,同样是虚伪和伪善的,这不是很清楚吗?因为去年中央决议谈的是旧的非常措施(主要是行政措施),而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新的非常措施,这种新的非常措施受到千百万贫农和中农群众的支持并且是对富农进攻和集体农庄运动发展的组成部分。

1929年秋天反对非常措施的时候,声明的作者们直接陷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泥潭,这还需要证明吗?

关于富农合作社的窝巢长入社会主义形式经济体系的提法,我说两句。声

明的作者们企图证明,这个提法似乎有一段时间曾得到过我们党的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我应当声明,同志们,文件作者们的这个声明只能看作是欺诈的手段(我无法用别的话表达),目的是诋毁我们共产主义的最高机关并把人们引入歧途。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声明的作者们在自己的文件里说的不是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而是关于一般“长入”的提法。是谁,是什么长入——可敬的文件的可敬的作者们没有说。这不是欺诈又是什么呢?难道关于“长入”一词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争论吗?难道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出版物里不许使用“长入”一词吗?当然没有!我们曾经争论过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不是一般的“长入”一词。我们反驳的是什么呢?反驳的是布哈林关于“富农合作社的窝巢”能够并将会“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文件的作者们现在援引的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决定是什么呢?在那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著名的决议里说,“农民的合作社联社……在新的条件下将在无产阶级国家正确政策的指导下长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体系”。能不能说,布哈林的提法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的提法是相同的呢?显然不能。不能,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说的是农民的合作社联社,而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通向社会主义之路》²⁷²里提出的说法里说的是富农合作社的窝巢长入社会主义。可敬的文件的可敬的作者们悄悄塞给我们的是伪造的东西,这不是很清楚吗?

另一个问题是现在使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领导共产国际工作时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农民的合作社联社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否合适,是否适宜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提法,我再重复一遍,与上面提到的布哈林同志的提法毫无共同之处,不完全适宜。不完全适宜,因为它使人有理由认为,小农和中农经济能够以它们现在的形式长入社会主义,即不经过改造,不经过根本的改造它们就能够长入,这当然是不能的。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像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这样的同志,这些远非我们最差的,曾经同我们一道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并站在这一斗争前列的同志,这样出类拔萃的同志现在陷入了困境,成了右倾分子的领袖,陷入了破产政治家的境地,竟写出了三人声明这种不成体统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种现象的发生,就像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我们党许多过去的领导人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通常,当党,当党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核心强调反对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比如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对“左的”词句持不信任态度的右倾或半右倾分子加入党的核心,以同盟者的身份参加进来,而一些人则以同路人的身份加入马克思主义核心,虽然他们并不完全

明白党在这一斗争中的目的并至少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一斗争。相反,当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得不强调反对右倾,反对公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些“左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加入党的这个核心,以同盟者或者以同路人的身份参加进来,他们参加进来,虽然并不清楚马克思主义核心在这一斗争中的目的并至少在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些目的。很清楚,战胜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一些与党一道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右的同盟者或者同路人的隐蔽的右的意图一定会显现和暴露出来,就像战胜右倾之后一些与党一道进行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的“左的”同路人的隐蔽的“左的”意图一定会显现和暴露出来一样。因此,在战胜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便有一些右的同路人脱离党的核心。同样因此,在战胜右倾之后,便有一些“左的”同路人脱离党的核心。这是我们党内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之一。

1906年以前我们党内进行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孟什维克分子的斗争。这时候加入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是一些颇为著名的“左的”分子。我指的是波格丹诺夫集团。1906年以前的情况是这样。1906年以后,我们的斗争已经主要是反对“左的”空谈家,争取利用合法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形成了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左的”空谈家的最后通牒派-召回派集团,除了少数例外,这个集团后来都脱离了党²⁷³。这时候,一些对“左的”词句持不信任态度,但并未完全弄清楚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目的和任务的右的分子便加入到党里。我指的是孟什维克左派的许多工作者(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同情他们的布尔什维克)²⁷⁴。后来,战胜最后通牒派-召回派之后,右的和半右的同路人一部分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核心,一部分脱离了党,后来在十月革命时期暴露出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本质(《新生活报》)²⁷⁵。在所有这些时期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捍卫了自己,根据情况时而着重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时而着重反对“左倾”分子的斗争。

现在我们也正在发生与此类似的情况。

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时候,布哈林与他的朋友们曾经同马克思主义核心站在一个队伍里。渴望战胜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他们所期望的不是向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展开进攻和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是采取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发展工业和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而是放弃对富农的进攻,暂缓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暂缓搞高速度发展工业,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建立完全和平的生活并慢慢地不慌不忙地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就

是这样理解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的。很清楚,当生活嘲笑并彻底粉碎了右倾分子的“理想”之后,他们一定会更远地避开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

关于我们“左的”同路人同样应当这样说。渴望战胜右倾分子的时候,他们所期望的不是捍卫工人阶级与中农群众巩固联盟的思想和为这一联盟奠定新的生产基础(集体农庄),而是通过组织贫农协会脱离与中农巩固联盟的思想,脱离通过集体农庄吸引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宽广大道并以此清除接近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推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就是这样理解对右倾分子的胜利的。很清楚,当生活嘲笑了我们“左的”同志们的“方针”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避开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党内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完全可能,右的和“左的”同路人的一部分,优秀的部分会转向党并与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完全融为一体。不用说,我们会欢迎这样的同志的。但是也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可能,——另一部分右的和“左的”同路人将越来越远地离开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很清楚,我们将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这样的同志。至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众所周知,他们不仅脱离了党,而且直接陷入了反革命的营垒。

你们会问,以后会怎样。我想,只有两个可能的办法。要么签署声明的同志像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那样,放弃自己虚伪透顶的文件并公开和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会欢迎他们迈出的并不怎么困难的这样一步。要么他们继续坚持自己的文件,那么,简单地说,党将不得不痛打他们。实际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和公开地说:“是的,是我们错了,党是对的,是我们不对,让我们在这里画上句号并开始同心协力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工作”?我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主席:讨论结束。现在请古比雪夫同志作总结发言。

喊声:推迟到明天。

主席:有些同志建议,今天不听取总结发言了。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结束。

主席:我现在付诸表决。谁赞成今天听取总结发言? 多数。

斯大林:多数。

主席:谁赞成挪到明天? 少数。现在请古比雪夫同志作总结发言。

古比雪夫:同志们,实际上我本可以不作总结发言。发言的同志们对三人文件作了十分详尽的回答,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回答一些同志在这里提出的具体问题。

我想回答关于控制数字物质内容的一些问题。首先,我想回答卡巴科夫同志的问题。我认为,他在这里捍卫乌拉尔利益的热情和毅力是完全正确的……

有人喊:是值得效仿的。

有人喊:和值得鼓励的。

古比雪夫:是值得效仿和鼓励的,完全正确,不仅是因为每个地区负责本地区经济的代表应当这样行事,而且也因为乌拉尔是一个特别的地区,乌拉尔以其整个的经济情况突现出来。特别是现在,当乌拉尔煤炭焦化试验成功以后,乌拉尔的经济正在大大改变,因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学也在大大改变。确实,如果我们在乌拉尔能够不用西伯利亚运来的煤炭,如果我们在乌拉尔能够照例抛掉用木炭冶炼生铁这种祖传的陈旧方法,那么,十分显然,乌拉尔有希望变成我们冶金业的最大中心。

丘巴尔:这是对的。

古比雪夫:我们应当考虑改编全联盟的整个黑色冶金工业计划。乌拉尔人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为革命军事委员会送来一列车金属的乌拉尔工人代表团曾经在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里维护过这一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到五年计划末期在乌拉尔生产1300万吨生铁的要求。请回忆一下,五年计划原预计全联盟生产1000万吨。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到五年计划末期无论如何也生产不了这么多,他们想要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生产1300万吨生铁。

这当然是一个不成熟的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计算。同志们原指望,可以用我们拨给乌拉尔冶金工业的那些资金实现这一目标。

卡巴科夫:这是不对的。

古比雪夫:起初大家以为,不用进行任何重新计算,并且说,这将是很便宜的。然而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初步计算表明,为了在乌拉尔生产1300万吨生铁,需要花费大约40亿卢布,而不是我们根据五年计划拨给的4亿卢布。你们看见了,这个问题完全不成熟,把它作为应当在1929—1930年度控制数字里得到反映的具体问题来谈论,当然是绝对不行的。卡巴科夫同志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不对的,他指责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

有人喊:他是作为问题提出的。

古比雪夫:(他指责)说,他们完全没考虑到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发生的这种变化。此外,我觉得,卡巴科夫同志在这里有点诿过于人。乌拉尔煤炭焦化试验的缓慢,我觉得,应当完全由乌拉尔人负责。他们本应当自己加速这些试验,而实际情况是,由特劳特曼担任主席的黑色金属工业总局的一个在乌拉尔工作

的委员会推动了乌拉尔煤炭这些焦化试验的加速进行。因此,卡巴科夫同志,应当不仅叫喊,不仅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像您所做的并在这次全会上成功地做的那样狂热地提出它,而是应当进行工作,来论证由于这些煤炭焦化试验将会产生的对乌拉尔、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这个伟大和历史性变化的必要性。

为了最终确信,情况确实如此,我们把一大批基泽尔煤炭运往南方,以便在南方的炼焦炉里进行焦化。

卡巴科夫:还为了冶炼乌克兰的矿石吧?

古比雪夫:我说的是运往乌克兰的炼焦炉的一批试验用煤,为的是完全公正地找出这种复杂生产的一切指标。卡巴科夫同志,例如,有西伯利亚人的这样一个声明,说你们取炼焦用的基泽尔煤炭的堆积场混有优质的西伯利亚炼焦煤。

卡巴科夫:永远不会用基泽尔的焦炭冶炼乌克兰的矿石。

古比雪夫:没有人这样说。卡巴科夫同志,这与乌克兰的矿石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试验,我认为,在远离你们的南方的环境里这种试验将进行得最公正和最科学,我们将获得对这个重大问题判断的一切数据。

提交给你们批准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决不可能被指责为忽视乌拉尔。请允许我宣读我们对整个乌拉尔工业历年投资的比较数字。1927—1928年度用于整个乌拉尔州的共计为4 750万卢布。当然,这非常少。这是对乌拉尔州丰富资源的完全估计不足。1928—1929年度拨给1.31亿卢布,即增加到上一年的276%。因此,1928—1929年度在基本建设工程规模方面向乌拉尔大大靠近了一步。与去年的1.31亿卢布相比,现在我们打算投入乌拉尔工业4.85亿卢布或者去年拨款的369%,即比去年多2.5倍多。在这之后到这里来叫喊,乌拉尔受了委屈,古比雪夫走遍了各个地区,却把乌拉尔忘了,我觉得,这只能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来解释……

有人喊:或者用小小的夸张来解释。

斯克雷普尼克:只不过是热情而已。

古比雪夫:是的,或者用小小的夸张来解释。不仅如此,如果拿联盟工业为例,那么,我们对联盟工业的投入比去年多将近三倍。去年我们投入了1.11亿卢布,今年我们投入3.94亿卢布。

卡巴科夫:你们建设工厂的周期是五年。

斯大林:毕竟应当考虑到乌拉尔的炼焦问题。

古比雪夫:完全正确。

斯大林:它还未被考虑到。

古比雪夫:现在,1929—1930年度它不可能被充分考虑到,因为第一次煤炭焦化试验是9月刚进行的,那时控制数字已经编制完成,更不用说,乌拉尔的工业五年计划是这之前十个月编制的。但我们还是于今年在乌拉尔开始兴建三个炼焦装置。现在应当大力着手根本修改与乌拉尔有关的整个黑色冶金工业计划。特别是,我认为,乌拉尔比乌克兰有更加丰富的矿物资源,乌拉尔黑色冶金工业发展的这种前景也应当反映在乌克兰的黑色冶金工业计划里。

斯克雷普尼克:通过什么途径和朝什么方向?

古比雪夫:我个人认为,1929—1930年度在乌克兰我们应当把精力集中于扎波罗热工厂,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今年我们不应动工兴建克里沃罗格工厂,因为它的方案还未完全准备好……

苏霍姆林:为什么?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古比雪夫:方案准备好了,苏霍姆林同志,但是这个方案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且你们自己也不知道,像你们经常说的那样,你们将在普通的矿上工作还是在石英岩上工作。

丘巴尔:首先是被我们批评的。

古比雪夫:克里沃罗格工厂今年不应动工兴建,还因为把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生产能力增加到110万吨生铁的极限或许更多一些,也许将更为合理,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矿藏。我觉得,这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的对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现有工厂进行巨大改造的问题²⁷⁶情况是不同的。我个人现在不说这种修改一定得进行,但是对这个问题至少应当加以注意。是否需要把捷尔任斯基工厂的生产能力扩展到二百多万吨生铁?增加扎波罗热工厂的生产能力是否更好?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当从乌拉尔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的角度进行专门的讨论。为了结束对乌拉尔工业的投资话题,我谈谈关于这些投资的比重。

卡巴科夫:请谈谈电气化。

古比雪夫:这我也要谈。与对工业的全部投资相比,在乌拉尔的投资1927—1928年度为6%,1928—1929年度为7.9%,1929—1930年度达到了15%。因此,在基本建设工程总投资方面,乌拉尔现在的比重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关于电气化。听卡巴科夫同志讲话的时候,可能会想,在电站方面什么事情也没做。然而基泽尔电站今年将完成2.2万千瓦,正在开始把这个电站的发电能力增加到7万千瓦的扩建工程。

卡巴科夫:在九年期间。

古比雪夫:有过延误,我不否认,我说的是,今年正在投入大量的资金。

车里雅宾斯克电站4.7万千瓦的第一期工程今年将要竣工,并开始电站4.4万千瓦的扩建工程。关于下萨尔达电站将进行电站的设计和4.8万千瓦的第一期工程的准备工作。此外,为了在丘索瓦亚河上建设水电站,那里正在继续勘探工作。卡马河—伯朝拉河流域的勘探在继续进行。乌拉尔的电气化需要更多的钱,这一点我不否认,特别是由于工业发展的那种飞快速度正在超过我们电气化方面原先的设计方案。但是,除了至今已经划拨的,我们今年是否能再多拨一些给乌拉尔,现在我不能说。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施米特同志任主席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设法把基本建设工程更多地集中起来,以便在更短的期限内既完成电气化方面的建设工程,又完成工业建设方面的工程。如果这个委员会能够做到把更多的拨款集中到乌拉尔,那么,我认为,这将是好事。

现在我来谈另一个重要的地区——乌克兰。丘巴尔同志发表一个有点奇怪的声明,实际上我没有明白。他说,乌克兰产值的增长好像只达到4%。

丘巴尔:与五年计划相比。

古比雪夫:与五年计划相比?但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我进行了计算。我得出的结果是,1929—1930年度你们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如果把共和国的和联盟的都算在内,将是30.5%。

丘巴尔:而按照五年计划是26%。

古比雪夫:按照五年计划整个工业1929—1930年度原为22%。

丘巴尔:从地区的观点来看。原为26%。30%减去26%,将等于4%。

古比雪夫:按照整个五年计划1929—1930年度全联盟为22%,而你们为30.5%,而且这30.5%的结果也仅仅是因为一个情况,这就是你们产值构成中的甜菜大大减少。如果不考虑甜菜,那么,你们产值的增长今年将为37%。我们在甜菜方面遇到了巨大的自然灾害……

柯秀尔:被毛毛虫吃掉了。

古比雪夫:甜菜在你们的产值数额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它占你们产值的14%,因此这场自然灾害对乌克兰工业产值的数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主要重点工业部门的发展情况如何:金属、煤炭、采矿、化学。这些工业部门都比1928—1929年度增长37%。甚至比乌克兰五年计划规定的26%的增长已经高出11%,而不是4%,因此我觉得,乌克兰抱怨为乌克兰规定的速度不够快,是不应该的。

至于乌克兰的基本建设,那么,与去年相比,与五年计划相比,当然还有与乌

拉尔相比,这方面有了很大的增加。

投入乌克兰 8.78 亿卢布。如果考虑到工程造价的降低,五年计划原预计投入约 6.5 亿卢布,也就是说,1929—1930 年度比五年计划原预计的多投入 2.2 亿—2.3 亿卢布。

丘巴尔:多 20%,而全联盟多 43%。

古比雪夫:你们希望乌拉尔以四倍的速度发展,希望乌克兰也以这样的速度发展。

有人喊:以十倍的速度。

古比雪夫:希望整个基本建设工程比五年计划增加十个亿或者 30%。这是办不到的。你们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有人喊:比联盟的速度慢一半。

古比雪夫:我认为,中央黑土地带州、中伏尔加和乌克兰右岸地区更有理由抱怨。

斯克雷普尼克:这是对鲍曼要与中央黑土地带州结成联盟的声明的回答吗?

古比雪夫:我不明白您的讽刺,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您认为我是莫斯科工业最大的捍卫者,而鲍曼同志认为我是莫斯科州的敌人。

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太天真了。我对莫斯科的亲近并没有模糊我在分配基本建设方面的经济合理性。

实际上,中央黑土地带州、中伏尔加和乌克兰右岸地区基本建设工程数量少,这是对的。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再做些什么事情。看来,今年要做什么重大的事情是不可能了。包括利佩茨克工厂。我是建设利佩茨克工厂的大力支持者并在某种程度上把提出建设利佩茨克工厂问题的光荣归于自己,因为在黑色冶金工业总局提交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之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许多工作人员大力反对和州的工作人员沉默的情况下,根据我的建议这个工厂第一次被列入了五年计划。但是我认为,今年,1929—1930 年度我们不能动工兴建这个工厂。

我认为,今年我们应当把我们黑色冶金工业新厂建设方面的费用集中起来用于更少的项目。否则,我们会失败。我们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建设工程,不能说,它进行得顺利。我们有库兹涅茨克建设工程,不能说,那里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达到良好的效益。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于今年结束刻赤工程²⁷⁷。我们有扎波罗热工厂。这四个大型项目必须置于美国式的建筑轨道。它们应当在资金、在建筑材料、在技术援助方面得到保证,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党的相应的

组织力量方面得到保证。

戈洛谢金:政治局关于有色金属工业决定²⁷⁸的执行情况怎么样?

古比雪夫:哈萨克斯坦我也要谈,如果给我时间的话。

因此我认为,今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所列举的这些黑色冶金工业项目上。

应当结束利佩茨克工厂的设计,这是一,第二,现在就商定吸引外国技术援助,商定从美国引进这种技术援助。应当商定吸引美国一家大公司来承包建设工程或者至少承担提供最密切的技术援助。如果这一切都准备妥当,那就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建成利佩茨克工厂。

我认为,鲍曼同志提出的在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区大大扩大冶金工业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并且应当讨论的,因为那里确实有矿石,就近有燃料,这个问题应当认真研究。但应当指责莫斯科人的是,他们没有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在讲话里、在报告里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部这方面的著作,虽然莫斯科集中了雄厚的科学力量。

鲍曼:有,有,是手稿。

米高扬:是彼得大帝留下的手稿。

古比雪夫:没一部像样的著作从经济上论证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认真地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那时候让我们再来谈这个方案的实施。

至于有色冶金工业,我大概只能限于谈哈萨克斯坦,但我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并提交到这里批准的控制数字²⁷⁹完全能够保证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五年计划的完成。

戈洛谢金:不能保证。

古比雪夫:政治局没有按年分配用于有色冶金工业的费用,但是现在给予有色冶金工业的拨款完全能够保证五年计划最末一年的那些最终任务。拨给了1.13亿卢布。有色冶金工业工作者认为,为此需要1.3亿卢布,即为了在这方面采取他们认为需要的速度还差2000万卢布。

如果他们开始的那些工程不是在10月1日前竣工,而是到1931年1月1日……

戈洛谢金:推迟整整一年。

古比雪夫:〈如果它们将于1月1日前竣工,〉那么,不会因此而发生任何灾难,对完成政治局关于五年任务的决定也不会发生任何延误。但是,我打算在将要开会讨论集中使用经费的那个委员会里坚持给有色冶金工业增加一些拨款,

因为必须在五年计划第二年更认真地给予我们国民经济的这个薄弱环节以物资保证。

主席在打断我的话,这里提出的其他意见我就不能谈了。而这里提出的意见很多也很重要。比如说,关于什捷罗夫卡的意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会专门谈这一点的。这件事显然不顺利。一个由工程师组成的重要的委员会已前往什捷罗夫卡,电机工业总局的领导人克桑德罗夫同志也到那里去了,以便查明涡轮机安装延误的原因。负责这台涡轮机安装的德国“布劳恩-博韦里”公司方面也正在采取措施,该公司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正从德国派到这里来。但我想,无论如何这里也少不了某种破坏活动。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需要最仔细地研究。

关于顿巴斯的给水工程问题将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回答。

关于三人集团的声明我想说几句。在总结这个问题讨论情况的时候,首先应当指出,签署这个文件的三人集团企图把这样一种对我们过去斗争的认识强加于党,即我们只是在实行非常措施方法问题上有过小小的分歧。原来,分歧只被归结为一些小事情。我觉得,这里全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是伪善的谎言。实际上,分歧原来大得多,分歧涉及主要的政策问题,涉及党在农村的路线问题,涉及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路线问题。我认为,这个事实已经被发言的同志们证明得清清楚楚,而攻击党的几个同志自己也未予否认。托姆斯基同志在上一次全会上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现在我们之间有没有政治分歧呢?有,同志们,它们正在形成。当有人用‘新的结合’,最新的结合吓唬人的时候,他们想说的不是列宁的语言,而是自己最后的、最‘新的’理论语言。我感到惶恐不安。遗憾得很,我不能够在这上面签字和无条件地投票赞成这一点。”

这样,托姆斯基承认有严重的政治分歧。李可夫同志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自己的发言里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求助,这个决议赋予每个中央委员和每个党员在与中央路线有根本分歧的时候向党申诉的权利。他援引了有关的引文来证明自己有权就这些问题发言的权利²⁸⁰。因此,他还强调说,所谈的不是小事情,而恰巧是根本的问题。因此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不大的分歧的企图是绝对失败了。三人集团在这次全会上被揭露了,因此他们想要躲开曾经存在而他们又不愿意在这里表明自己意见的那些重大的分歧。

我认为,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宣读的文件,正如大家在这里完全正确指出的那样,是伪善的,此外,这个看似为了和解的文件包含着继续与党分道扬镳的明确成分。

实际上,这个声明的第六点说:

“毫无疑问,在短时期内保证了无产阶级国家粮食储备的非常措施的实行在一些地方引起了某些中农阶层不满情绪的增长,把这一部分中农推到了拼命抵抗的富农一边。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非常措施的实行对农业计划的未能全部完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摘自右倾分子最后文件的这段引文证明,这些同志对中央委员会根本的总路线的分歧保留了下来,现在他们在伪善地掩饰。

我觉得,这些同志放过了,如果他们确实希望真诚地与党和解的话,放过了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时机。历史不会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实际上,党和国家正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我们正在经历中农群众向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形式方面大步前进的历史时期。这是使我们大家都受到鼓舞,使我们整个国家真正能够按照崭新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的历史事件。似乎现在,当我们庆祝这一胜利,当整个工人阶级充满巨大的积极性和对社会主义必然尽快建成的信心的这个时刻,似乎在这个时刻应当到这里来说:“同志们,生活站在了你们一边,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我们错了。”如果他们这样说了,那一切就会清清楚楚,我们会齐心协力地一道并排继续前进,这些同志身上蕴藏的巨大力量便会被党和我们国家用来为无产阶级革命造福。一切都会被忘记,我们党的历史的不幸的一页就会被抹掉。

他们没有这样做,却提出了这样一个文件,它向我们预示的是我们党内的,先锋队内的新的战斗,新的撕打,新的争吵,新的斗争,而我们党这个先锋队在这个时刻应当特别一致,特别团结和钢铁一般的坚强。

历史性的时机放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不是年轻的政治家。他们为什么会放过时机呢?我个人想,是因为他们显然没有消除自己与党的分歧,他们关于撤销分歧的声明是伪善的。如果是这样,那这对他们会更糟糕,党将没有他们而继续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主席:现在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作总结发言。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的发言时间最为不利。但是我想,其实,我要说的话并不很多。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从所谓各地区角度提出的不同意见,只不过是我们在很长时期眼见的讨论这控制数字时展开的争论的小小余音而已。

只要回忆一下,分歧是由我们的计划与各个地区报来的申请有7亿卢布的差额而引起的:为满足各个地区的需要差7亿卢布,只要回忆一下这一点就够了。后来这个数额逐渐减少到了5亿卢布,后来又减少到了2亿卢布,最后,在

计划委员会最后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谈了数额为2 000万的追加基金的某些可能性。

当然,这2 000万的基金满足不了各个地区的经济所产生的合理要求。应当记住,各个地区的经济与即将展开的全国计划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物质资源富足到我们现在作计划时就能够对每一个地区按需要给予,按“所能”索取的时期还未到来。你们知道,这只有在完备的共产主义时期才会有。

我想回答地方上的同志指出的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我要把我们听到的来自顿涅茨煤矿的声明摆到首位。我找不到足够的色彩来突出强调这个煤矿的工作对我们整个经济计划的成功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然而顿巴斯的情况很不顺利,我应当说,洛莫夫同志的报告令我感到不满意。问题不只在在于水,问题也不只在在于谢格洛夫卡社会主义竞赛参加者的百分数不够高。中央委员会往顿巴斯派去了一名特派员,一名特命全权代表²⁸¹,10月6日就在这个谢格洛夫卡召开了一个顿巴斯干部,熟练矿工干部会议。我给大家读一位老矿工发言的一段摘录,这段摘录描绘了顿巴斯这个最重要的中心的情况。请听他在发言里是怎么说的:

“生产情况很糟糕,因为老工人看不见我们生产的效益。如果资本主义企业里有这样的情况,它早就被关闭了。要知道,我们出的不是煤,而是矸石。老工人们看看,摇摇头,心里想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请看,同志们,如果工作了25年的无产阶级老干部这样证实,那就是事情不妙。我认为,无论是乌克兰的同志们,无论是中央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我们的苏维埃和经济机关,无论是党都必须十分重视顿涅茨煤矿的情况。如果干部的这种流动性和这种经营状况哪怕在一个矿区继续下去,那么情况将非常糟糕。不错,应当说,这是一个特别差的矿区,那里突出地集中了一切病症,但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于近期在顿巴斯消除这样的矿区。去年,有多处燃料计划没有完成。莫斯科郊区的煤矿没有完成计划,木柴采购没有完成,泥炭也没有完成计划;这就是说,在我们迅速改用新型燃料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主要对顿涅茨燃料的继续需求。顿涅茨燃料的不足立即会打击整个工作,打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整个生产战线。这将是沉重的打击。我在这里全力强调情况的危险性,也许,古比雪夫同志会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加紧工作,因为再也不能等待了。

有人喊:有一个委员会正在那里工作。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少一些委员会,多一些中央机关这次派出的那种工作

人员。

柯秀尔：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神秘的工作人员？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现在谈顿巴斯的水。关于水的问题，我觉得，洛莫夫同志用过去用过的那种语调谈论的时候，只是浮皮潦草而已。我来告诉你们，第一，顿巴斯的水的问题分为两个部分：饮用水和工业用水。根据我们国家计委掌握的资料，政府委托于1930年1月1日前供给斯大林诺20万桶饮用水——这已经完成。至少执行者是这样保证的。

柯秀尔：你别相信。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为自己要了一份关于“引水渠道”工程的资料。我告诉你们，向我通报了什么情况，如果这是真的，就应当把有的人送交法庭审判。向我通报说，这种饮用水1月1日还将是天然水，应当提供经过过滤的净化的水。据说，到春天就将供给经过过滤的水，这是第一批20万桶，下一批20万桶只有到1930年秋天才能供给。当洛莫夫同志断言，他掌握着用5000万卢布向顿巴斯供水的秘诀的时候，我应当说，洛莫夫同志是把问题的技术方面弄混了。用5000万卢布他只能供给整个顿涅茨煤矿所需用水的1/45，即不仅是饮用水，而且还有工业用水。

柯秀尔：你不是说，不应当把这些问题混在一起嘛。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谈的是整个问题。顿巴斯工业用水和饮用水的足量供应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和困难的问题，这是整个的五年计划；这个问题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析。已经制定了几个顿巴斯工业用水供应五年工程的方案，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亿卢布的投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谈中央黑土地带州。

臧声：关于什捷罗夫卡呢？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对，关于什捷罗夫卡我们遇到了经常发生的非常大的麻烦之一，顺带说一句，而且与破坏活动没有关系。什捷罗夫卡第一期工程——是两台各1万千瓦的涡轮机，现在它应当启动第二期工程——这是两台各2.2万千瓦的涡轮机。什捷罗夫卡应当由2万千瓦的电站变成6万多千瓦的电站。第一台2.2万千瓦的涡轮机投入运行的工作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两台涡轮机是向瑞士的布劳恩博韦里公司订购的；由该公司的两个分部——瑞士分部和德国分部安装两台涡轮发电机。第一台涡轮机启动时振动了起来。有经验的人很容易就能使涡轮机振动，以达到破坏的目的。但是我应当说，即使没有恶意破坏的任何成分，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我曾是在战前从一个公司接收的涡轮机投入运行

的见证人,那时涡轮机的振动使电站好几个月不能工作。现在什捷罗夫卡,除了现有的三个德国安装工,又从国外请来了第四名技师;对于公司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我们也在莫斯科召集了一些有名的工作者并把他们派到那里去。有希望,至少很快能够由这两台涡轮机(第三台和第四台)组成一个2.2万千瓦的机组。因此,如果事情真的不妙,那也不应当绝望,问题有可能很快消除,但它同时表明,在电力建设战线上我们并非一切顺利。

有很多话可以向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同志们说,他们曾经不准确地指出今年为他们的经济拨款的数字。我认为,这个州的同志把自己的请求送到了不该送的地方。如果要谈这个州的发展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不会有很大误差地预言,这将是我们的冶金工业中心,与它相比,无论是乌拉尔还是南方矿山工业区或许都将退居到次要地位,因为那里的磁铁矿层的厚度特别大(其烧结过程非常简单)。库尔斯克的石英石矿层埋藏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这就预先决定了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可以说利佩茨克工厂是冶金工业的起点,这是有可靠根据的,我们只是不希望利佩茨克冶金工厂重复我们一般建设工程的情况,因为从设计的观点和在勘探方面利佩茨克工厂早就并非一切顺利,因此,中央黑土地带州未来命运的重心就在库尔斯克磁铁矿上的宏大的冶金工业上了。

有人喊:你们甚至不给库尔斯克电磁异常区钱。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地质勘探,我说以下几点:尽管增加了巨额拨款,但我们指出,这些勘探的任务赶不上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决定自己来抓这件事情,在国家计委里成立特别支部负责检查和监督地质勘探工作。当然,如果情况像卡巴科夫同志在这里报告的那样,例如,乌拉尔的地质调查预计要用八年时间,那么这样的工作对我们毫无用处。

中伏尔加。它今年确实只有1100万卢布用于新的工业建设。但还应当说,已拨给1300万用于改善、改造现有的工业。当然,2300万是一个不大的数目。但应当坚定地,为了发展伏尔加河沿岸的工业,还得解决伏尔加河的能源问题。顺便说一句,鲁祖塔克同志是这个问题的阻挠者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铁路员工²⁸²,他不能不战栗地看着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它建成以后将大大改变我们的水路和铁路运输的比例关系。可他在拖延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根据友好的协议我们还希望在这方面推他一把。

我就不谈细节了,最后我想谈几句我们总的形势。对许多发言者关于我们党的状况的清晰的描述,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只想提出一个论点。我觉得,企图找出与党及其共产主义核心所捍卫的道路不同的什么道路,这种企图的错

误就是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它通过怎样的历史道路来实现。我给你们读一段列宁关于这个题目的引文,它清楚地阐明了党内的分歧。请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谈无产阶级专政的: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了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²⁸³

我们必须根据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潜力的精神去生活和工作。美化形势,寻求某种宁静的、书生气的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就是整个本质。

同志们,如果看一看我们的控制数字,我不能离开五年计划单独去看它们,那么什么是它们的中心,它们的本质呢?我,顺便说一句,使你们受了不少劳累的那些控制数字之上是什么,我为什么向你们道歉,是什么比这个计划的细节更高呢?我想起了马克思的话,他富有表现力地说:“无产阶级要么革命,要么它就一无所有!”²⁸⁴依我看,我们提出的和同你们一道并按照你们的指示尝试形成的五年计划,其特点不是它有两个方案。李可夫同志在这个讲台上说:报告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提出了两个方案,而他,李可夫,赞同最高方案。似乎报告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打算坚持计划的最低方案。计划的两个方案说明什么呢?我们以此在全国面前坦率地承认,我们不能把我们独特的经济的发展放在一种硬性的数字序列系统里。我们坦率地说:可能,这些数字,这种和那种序列的数字明天都会动摇。现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高方案变成了最低方案。我们这里也有一种独特的所谓个人英雄主义的观点。我们时常看到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有人断言:今年能够生产多少数量的金属。金属是好东西,于是有人想,给金属计划追加2 000万—3 000万卢布,就会在“工业化”热情方面胜过前人。工业化事业并非总是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加速的。金属问题是一个涉及整个经济的问题,用冲锋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实质不在于方案,实质在于五年计划,在于控制数字,还在于通过这些控制数字我们得到了实现无产阶级那种革命毅力的丰富营养,这种革命毅力使无产阶级成为“天下的主人”,没有它无产阶级便会“一无所有”。我认为,衡量我们计划的最好的标准就是它们不仅在我国,

而且在国内的劳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这比话语更雄辩地证明,我们在这些计划里拥有多么丰富的材料,以便利用最宝贵的工具——无产阶级创造性的革命毅力。这并不表明,我们的计划是完美的。这并不表明,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计划可以更进一步地完善,我们现在已经成长到了对经济实行全面的计划制度。当然不是。当我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当我看到经济问题怎样变成浓缩的政治并落到我们同志们肩上的时候,我感到良心有愧,因为我们计划工作人员没有充分地帮助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但客观情况就是如此。我们能够我们的计划中成长,不是由于独立地前进,而是与管理经验本身的增长一道一点一点地前进,以与过去可能有的不同的新的方式抓住经济领导的杠杆。是否可能和是否需要修改整个五年计划呢?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大家都知道,有人不止一次地建议重订和修改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我们有意地没有这样做。它是一个历史文件,五年计划也同样如此。它们的价值在于自身,尽管它们有种种缺点。现在已经是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显然,我们面前正在提出新的任务,很快就将需要新的五年计划。旧的五年计划会带着它的全部缺点和优点作为历史文件保留下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特殊阶段的公正的见证者,尽管我们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取得伟大成就的阶段。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着另一项任务,巨大而又艰难的任务,它在进一步统一我们的意志方面会给我们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梦想,我们在经济战线工作的时候,能够做到过去在战场上曾经实现并保证了胜利的那种意志的统一,这个梦想,如这次全会的情况所表明的,正在接近实现。为了这个梦想,我们现在就应当准备进行另一项宏大的、十分重要的工作,制定我们经济总体规划的工作。我认为,应当以另一种方式调集力量在国家计委进行这项工作,应当改变国家计委对地方,对所有科研工作人员,对一切管理部门、地区、各共和国和对全国的态度。我们应当通过这个总体规划提供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典范。我深深地相信,我们会在最短期间以全民的创造力(在这个词的毫不夸张的意义上)制定出这样一个规划,制定出这样一个新的、引导我们前进的、社会主义的远景规划,它将把这方面初期的一切尝试都远远地抛在后面。

在我们最后表明自己对这些控制数字的态度之前,我们的什么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席摇铃)主席同志,别摇你的铃了,我说的是需要说的事情,并且认为,这种因素在我们国家的生活里并非意义不大。我本来反对您今天让我发言,但是既然让我发言了,那您就得有点耐心。

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指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期望的东西,指望能在实际上给我们“过去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巨大加速度的力量?在关于控制数字的多方面的讨论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且不仅在讨论中,而且在谛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注意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怎样成长,最广大农民群众回应的浪潮在怎样高涨的时候,——我们是用经济总结的数字、事实得出这个结论的。有一个有趣的历史文件,我提请你们注意。它刊登在1925年9月27日的《真理报》上。那里援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病没有发表的一篇讲话的提纲,这个提纲是为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2年12月)准备的²⁸⁵。这个文件的预言性的预见是惊人的,它的整个结构是富有教益的。我没有时间详细发挥我阅读它的时候产生的那些想法……

古比雪夫:是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然,这个提纲大概是在1922年底写的。那时恰巧符拉迪沃斯托克刚刚完全转到我们手里。他进行了回顾,研究了所度过的1917到1922的五年,对形势进行了估计并要求向前看。在他草拟的提纲的这些简短的话语里说了那么多东西!把他注意到的好的方面与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所能举出的加以对照,是非常有意思的。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了。他说,鉴于战时的经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团结是不可战胜的。他谈了邓尼金和白卫军分子(他们是“很好的教员”)给予我们的通过军队这所学校的优秀的工作人员的教育。他对成绩进行了估计(请注意,那是1921年大饥荒之后的1922年)。他说:饥荒度过了,接下来做什么呢?他说,现在应当怎样从这个时期走向社会主义建设呢?并毫不犹豫地回答: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加紧发展经济。这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由于时间晚了,我就不在这里发挥自己的想法了);他这样说:从1919年起到1922年止是迅速的提高(把经济理出一个起码的战斗秩序)。他说,接下来就慢一些了。缓慢前进是怎样一个时期呢?他确定这个时期为1922年到1927年并画上了两个问号。结果似乎是这样,只是第一个五年我们将保持缓慢的速度。事实证明,恰好1927—1928年度是向经济这种新的加速发展方面转变的一年。认真思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札记,把他的计算放到新的五年计划的数据里的时候,你就会充满更大的信心:新的速度、新的加速前进的时期真的已经到来了。这次是伴随着我们过去未曾指望的那种巨大的结合,伴随着大量劳动群众积极分子的参加到来的。

由于这个原因,今年的控制数字具有完全特别的性质。当我们在国家计委里换算和完成这些控制数字的时候,我强调指出,这是完全不同寻常的数字,对它们的储备我们没有进行平衡。当然,我不能以特别的热情来谈论已经在那里进行过数量计算的那些储备。实际上,如果我们有那么1.07亿卢布预算后备金,在113亿卢布预算的情况下这难道多吗?当然,这种储备金不多。外汇储备也不多,就像燃料和粮食储备不多一样。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巨大的储备。难道我们的工厂在五年计划关键一年的工作不具有完全特别的性质?难道今年把每个工厂变成独特的“列宁角”的任务不是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十分重要的战斗性的工作吗?

对这一点的认识不断在我们眼前显示出我们无产阶级群众创造热忱的新的潜力,推动并引导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前进。同志们,这是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性的工作。我们应当在这里,在争取降低成本的运动中发扬这样的方针,使这项工作的参加者感到和了解,他们不仅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决定着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这种不仅深入我们内心,而且深入广大工人群众内心的对伟大工程的认识是我们主要的根本的储备!(鼓掌)

主席:同志们,提纲已经发给了大家,现在我提付原则表决。谁赞成原则通过提纲?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斯大林:怎么会这样?库利科夫同志在哪里?

有人喊: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都投了票。

主席:一些同志建议选举一个对提纲进行最后校订和起草关于三人“文件”决议草案的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米高扬、瑟尔佐夫、基洛夫、鲍曼、多加多夫、什维尔尼克、戈洛谢金、瓦列伊基斯、库比亚克、雅科夫列夫、丘巴尔、安德烈耶夫、埃赫、柳比莫夫、布勃诺夫、洛博夫、卡巴科夫、柯秀尔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召集人鲁祖塔克。

· 奥尔忠尼启则:让乌格拉诺夫就投票动机发言。

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请,请!(场内有人走动)

主席:谁赞成批准由上述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谁反对?通过。

喊声:让乌格拉诺夫发言!

主席:乌格拉诺夫同志没有要求发言。会议结束。

第八次会议

11月14日,上午

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²⁸⁶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请卡明斯基同志就第二项议程发言。

卡明斯基:党和工人阶级已着手认真解决我国革命最艰巨和困难的问题之一——以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的问题。集体农庄建设目前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正在根本改变农业发展的整个面貌,说明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任何农村工作(而且不仅仅农村工作)问题,无论是土地规划、区域划分或者,比如说,农业拨款、国民教育、卫生等等,如果不考虑集体农庄运动状况和需求,如果不同农业生产集体化的直接前景联系起来,现在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获得正确解决。

在观察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它不断增长的速度。按1927、1928、1929和1930年期间集体农庄播种面积的增长情况来看,这种速度可以大致表示(以1927年为1)如下:1,2,5,17。根据最新(初步)数字,截至1929年10月1日全联盟计有集体农庄7.5万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为190万户,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为800多万公顷。五年计划规定,你们可以从图表上看到(见图1,图2),到1932—1933年度末公有化播种面积为1450万公顷;然而,1929—1930年度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预计不少于1530万公顷。毫无疑问,这一数字也将被大大超过。

柯秀尔:对。

卡明斯基:运动的进展情况如何呢?你们知道,集体农庄的蓬勃发展始于1928年春天,即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个春播运动期间。当时,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建立众多的小型集体农庄,普遍发生了中型集体农庄小型化的

图1 播种面积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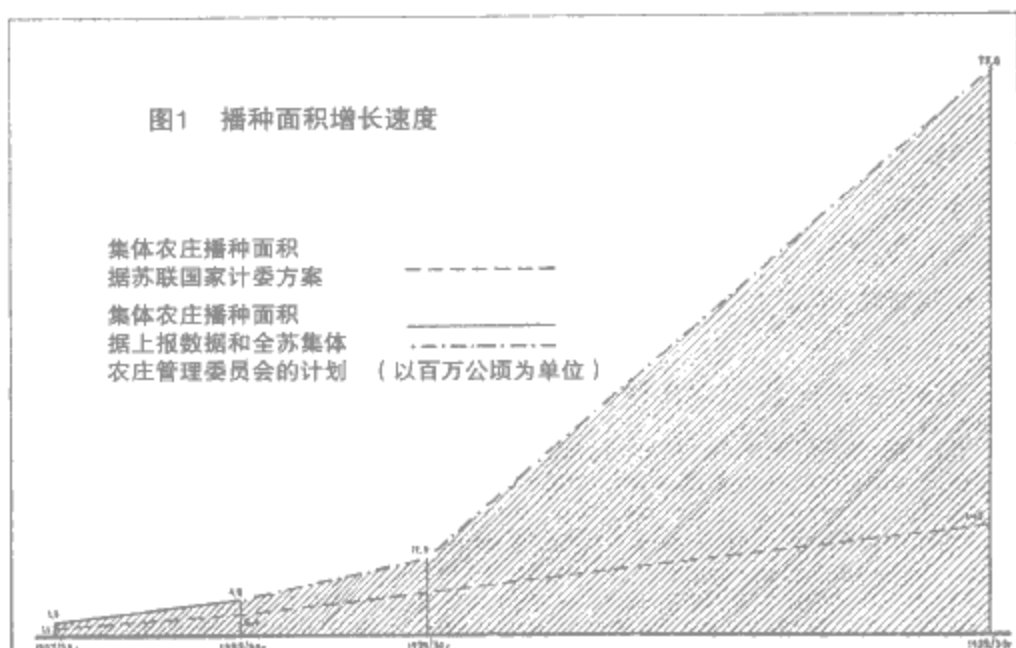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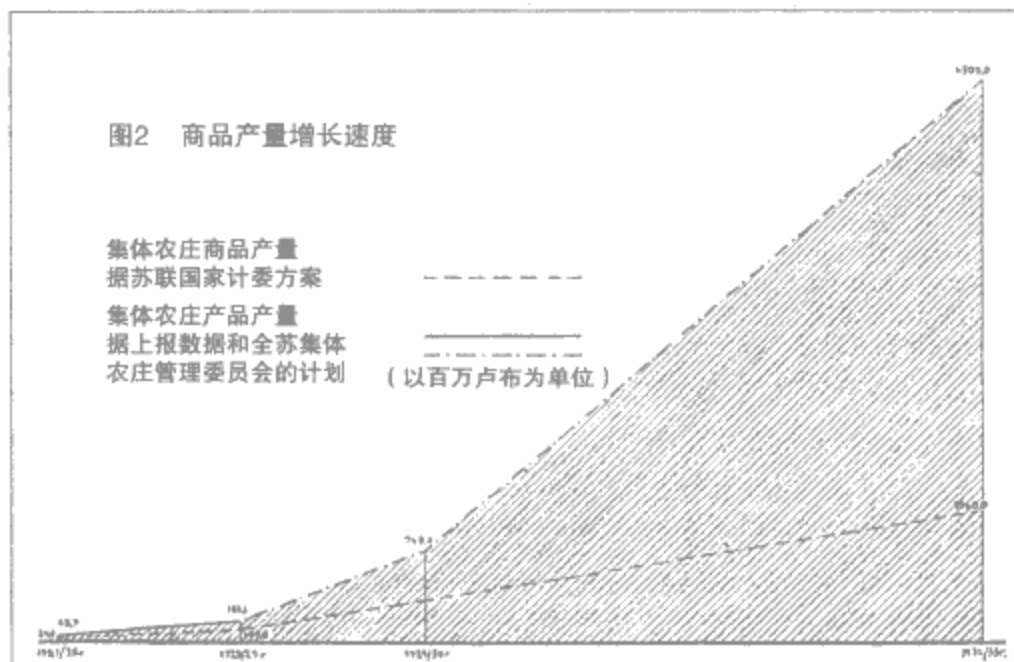


图2 商品产量增长速度



情况。1929年的特点已经是向集体农庄大型化、中型集体农庄的扩大和建立几百个真正大型集体农庄的方面发展。现在全联盟已有大约600个大型集体农庄,其播种面积超过150万公顷,约占集体农庄全部播种的20%。

柯秀尔:你所说的大型集体农庄指的是什么?

卡明斯基:我们所说的大型集体农庄一般是指播种面积不少于2000公顷的集体农庄。

有人喊:20%指什么——是数量还是播种面积?

卡明斯基:20%指的是大型集体农庄播种面积在集体农庄全部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重。

只要看一看这张图(见集体化图3),可惜它只包括联盟的欧洲部分,集体农庄运动的地区发展情况就会一目了然。你们看到,集体农庄运动在南部和东南部开展得最为广泛并在向东伸延,发展最差的是白俄罗斯以及西部、中部、西北部、北部、莫斯科、伊万诺沃和下诺夫哥罗德各州。可见,集体农庄运动获得最大发展的是谷物粗放种植地区。

现在,全联盟集体化的密度平均为7.5%,各州和区的差别变化很大。例如,在北高加索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与个体户相比为25%,在克里米亚为25%,在下伏尔加为12%。在白俄罗斯这一比例数低得多,为5%,在西部州为2.6%,在伊万诺沃州为3%,即大大低于全联盟的平均比例数。

莫洛托夫:这是哪个时期?

卡明斯基:根据当年10月1日的数字。

莫洛托夫:您的材料过时了。

卡明斯基:我应当说,这些数字无疑落在了生活的后面。运动的进程现在每个月都给集体农庄发展的总的状况带来重大的变化。如果举下伏尔加的霍皮奥尔专区这样的地区为例(图4),那么,今年8月那里集体化的比例为12.7%,现在已经达到63%。这就是集体化飞快发展速度的例证之一。我们在很多区和其他州也看到同样的情景。例如,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利戈夫专区也给自己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现在这个专区有几个区正在进行全盘集体化。

应当指出,集体农庄的建设正在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一方面,可以看到以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为基础的大型集体农庄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不依赖新技术基础而建立的大型集体农庄。红波利亚纳区(乌拉尔)的全盘集体化主要是靠农民的生产工具实行的。该区大量旧的牢固的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存在起了巨大的作用。这里的集体农庄运动不是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的工作引

发的,而是以引导全体基本农民群众前进的众多小型集体农庄的形式产生的;现在这个区集体化的密度为62%。现在,这个由拜卡洛沃、兹纳缅斯科耶和叶兰等区构成的红波利亚纳区正在建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集体农庄,下面划分为若干独立的生产单位——农场(见图5)。这种全盘集体化的区,我选取几个为例,如塔洛夫和伊洛瓦伊-德米特罗夫区(中央黑土地带州),矿泉区和叶伊斯克区(北高加索),恰帕耶夫斯克和基涅利区(中伏尔加),萨莫伊洛夫、巴拉科沃区(图6)(下伏尔加),都是在合作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的工作、粮食合作社的工作、实行预购合同制和小型集体农庄结成联社等的基础上实现的。

与此同时,今年秋天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全盘集体化的地区,那里的集体农庄建设原先开展得非常差。全体农民越过各种过渡形式,即生产合作的低级形式,带着自己的农具,直接转向土地共耕,取消地界,实行共同播种。

由此可见,在集体农庄建设,特别是大型集体农庄的建设中,我们采取了多种途径:在一些区里,集体农庄建设与合作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的组建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另一些区里,尽管完全没有技术基础或者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却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发展。然而,集体农庄主要是以农民的生产工具为基础组建的,辅之以复杂农业机器和少量的机械牵引力。这已为全盘集体化各区的全部经验所证实,这样的区已经有二百多个。

应当指出,在谈论全盘集体化的各区时,我们指的是集体化比例特别高的那些区,例如:红波利亚纳区集体化的比例为62%,而阿尔米宗斯克区的比例为71%。集体农庄建设的实践和活生生的经验表明,在集体化已经覆盖,比如说,50%农户的地方,其余50%的问题最短期间内就会解决。运动正在如此加快速度,集体农庄对个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如此增长,在集体农庄遍布一系列地区,甚至专区的情况下,其余农民群众转入集体轨道将是几个月,而不是几年的问题。

如果不久之前全盘集体化覆盖的主要是谷物种植地区,那么,现在以亚麻、甜菜、棉花种植以及畜牧等农业专门部门为主业的各区的集体化进程已经开始了。

沃特州搞了个全盘集体化的格拉佐夫区,有耕地面积103 142公顷,其中种植亚麻14 735公顷。在该区南部,1 109户,或者说42%的户已经实现集体化。到1930年底,6 064户,即除富农之外全体居民将实行集体化。

沙特罗沃区(乌拉尔州)按其经济特点是畜牧业区,68%已实现集体化。其土地总面积为84 055公顷。区里有几个磨坊、一个榨油厂、一个奶油制造厂、一个皮革厂等。沙特罗沃村实现了电气化,不仅农民的小屋,连牲口棚都用电灯照

明。“劳动”公社所有的建筑物,甚至猪圈都通上了电。沙特罗沃区全盘集体化的基本核心是国内战争年代建立的那些老的农业公社。

一场大规模的和引人注目的运动正在北奥塞梯进行。截至1929年9月25日,北奥塞梯已经有306个集体农庄,共联合了10715户,有57860口人。现在北奥塞梯集体化的平均比例为45%。因此,北奥塞梯州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问题正在提上日程。

有人问:有100%实现集体化的区吗?

卡明斯基:我们眼看着集体农庄运动的性质在急剧变化: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发生集体农庄由小型向大型的过渡,由个别类别农户集体化向整村集体化,由整村和若干村集体化向整区、专区乃至州全盘集体化的转变正在获得极大的进展。

我想,你们都拿到了舍博尔达耶夫和马哈拉泽同志关于霍皮奥尔专区集体化情况的有趣材料²⁸⁷。这类材料是所论述过程的鲜明例证,其他州的材料也纷纷送来。

由此可见,运动正在达到一年半以前我们根本不可能预见的崭新规模:运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主要的是,这一点应当大力予以强调,继贫农之后,中农也开始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运动成了大规模的贫中农的运动。这是一个具有特别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无产阶级在为社会主义农业进行斗争,坚决克服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同时,依靠贫农,在新的生产基础上以新的生产形式巩固自己同中农的联盟。这就是我们在总结集体农庄运动和论述我们农业发展中正在发生的极大转变的时候应当得出的结论。

今年秋天出现了整村整村转向共耕秋翻地的普遍现象。没有任何像样的机器基础,整村整村取消了地界,把自己的劳动和土地合在一起,以便全部实行共耕。这种情况我们在中央黑土地带州,在北高加索,在乌拉尔和其他地方也都看到了。这种仅以农民自己的工具为基础向土地共耕的大规模过渡具有自发的性质。

我曾听到这样的议论,说向集体化的这种过渡在某些情况下与行政压力有关。特别是有些同志断言,霍皮奥尔也发生过行政强制。当然,可能有的地方用过这种办法,但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主要的不在于此。用行政措施吸引如此众多的人加入集体农庄运动,形成如此规模的集体化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巨大进展,只有在无产阶级国家物质和文化资源增长的基础上,在彻底执行党的总路线的基础上,通过党的全部政策,通过我们的全部农村工作,特别是使千百万农民合作化的工作和农村贫中农群众在工人阶级

领导下政治积极性的普遍提高,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我们能为集体农庄运动打下坚实的机器基础,如中央在所通过的关于加速建设拖拉机厂、联合收割机厂等²⁸⁸的决定中所规划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已有的经验宣布,在主要谷物和原料生产地区在一年半至两年期间绝大部分贫农和中农将实现集体化。来年春天在这方面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全党和工人阶级应当集中注意力为此作好准备。

不时听到去过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同志对集体农庄这样议论,例如:

“我来到某个全盘集体化的区……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社会主义。”访问过恰帕耶夫斯克区的一些同志这样说。我认为,这些同志没有看到或者没弄明白主要的东西。不要以为,只要某个区的全盘集体化一实现,农村立刻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实际上,一切都要复杂得多。应当理解,现在的集体农庄,甚至农具、牲畜公有化水平不高的初级形式(共耕社形式)的集体农庄,都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行程中迈出的巨大的一步。然而,这当然还不是社会主义。集体农庄还要经历很长的发展道路,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使集体农庄真正变成为社会主义大生产。而有些同志,显然对不能通过向集体农庄过渡一举得到社会主义感到失望,看到集体农庄,特别是其最普遍的形式——共耕社还保留着旧农村的许多东西及其社会矛盾,便开始这样议论:可否控制一下这个运动……

有人喊:规定限额。

卡明斯基:(控制一下这个运动,)在这方面规定某种限额。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所谈的贫中农群众对集体经营方式的态度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这种变化,集体农庄运动的这种群众性证明集体农庄有条件进一步加速发展,证明集体农庄运动量的发展与质的变化的相互关联。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存在决定意识。

卡明斯基:1928年春天,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是以建立小型和极小型集体农庄的形式进行的。然而,只要看一看一年之后的集体农庄运动一览表,你们就不难发现集体农庄在扩大规模、提高社会主义质量、改善经营组织和出现新文化最初萌芽方面的进展。

我们是怎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这不仅是上面规定的。“向大型集体农庄前进”的口号是受到集体农庄庄员本身拥护的。运动不可能停留在小型集体农庄上,生活本身促使人们联合和聚集在比较巩固的集体农庄周围并通过联合社继续向大生产前进。

对于个体农民来说,迈出第一步——建立即使最初级的小型集体农庄也比

由小型集体农庄向大型集体农庄过渡要困难得多,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他迈出的是根本上全新的一步,是由千百年形成的以个体为基础的经营习惯改为建立在新的,他还从未体验过的集体基础之上的经营。正是由于集体农庄运动巨大的量的规模(最初表现为初级的、最能为一般农民接受的形式,即小型集体农庄形式),新的质——大型集体农庄才开始增长。因此,问题应当提得十分明确: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集体农庄运动根本谈不到采取任何“阻挡”措施,尽管集体农庄运动存在缺点。

我们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工作,以便加速集体农庄扩大的进程,保证全面提高现有集体农庄的质量。

如果仔细观察当前集体农庄运动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相关方面的社会主义成分,我们在这方面就会看到以下情况。照例应当指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很差,特别是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庄。然而,1929年里在这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朝好的方面的变化。如果拿1929年同1928年相比,我们会得到集体农庄播种面积公有化的以下过程:在乌克兰公有化比例由42%提高到63%,在克里米亚由47%提高到65%,在中央黑土地带州由27%提高到50%。根据1929年春季资料得来的这些数字准确地表明了去年到今年的发展动态,但却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因为今年夏秋两季带来了播种面积新的大规模的公有化,而这尚未在统计上得到反映。这是一些需要时才不得不使用的平均数字,因为没有其他更新的多少具有概括性的资料。

现在我列举一些马匹公有化的数字:在乌克兰马匹公有化的比例由28%(1928年)提高到35%(1929年),在中央黑土地带州由14%提高到25%,在克里米亚由14%提到37%。这些数字像上面引用的公有化播种面积的数据一样,需要作同样的附带说明。在这一方面,今年秋天也表明了公有化马匹比重的增加。现在农民基本上都实行土地共耕,把马匹公有化,只留一小部分马匹个人使用;后一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共马厩和牲口棚等。然而,应当指出,在公有化的同时,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时出卖牲口的现象。在这方面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们的实践和我们同这种极其危险的现象实际进行斗争的本领。凡是有好的组织者的地方,他们会找到适宜的方法防止出卖马匹并将马匹纳入集体农庄运动公有化基金。凡是缺乏好的组织者的地方,就会发生农民出卖马匹,等待拖拉机将来带来的好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指出生产资料包括马匹公有化增长的势头,这是前几年看不到的,当时土地共耕社的公有化进程几乎完全不包括耕畜。

最近可以看到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庄向更高级形式(劳动组合、公社)的大规模过渡。不仅如此,在新组建的集体农庄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越过初级形式,直接建成为劳动组合乃至公社。

在集体农庄生产方面的质量指标中间,应当指出和强调改良农作技术方面的进步。集体农庄,特别是老集体农庄一般都实行多区轮作制。在组建集体农庄的时候,第一个最普遍的改良农作技术方面的措施就是建立多区轮作制。其次,在集体农庄的生产中可以看出高价值作物(经济作物等)比重的提高。我就不说比个体经济更好的农学方面的服务了。老集体农庄——我说的“老”集体农庄指的是存在了哪怕只有一两年的集体农庄——大都采用纯种播种。集体农庄将从1930年的收成里提供7500万普特的商品良种,即关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法令²⁸⁹为整个农业规定的五年计划末尾的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农庄是良种的繁育场。尽管集体农庄发展最初阶段存在困难,尽管缺乏机器等等,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是农业领域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现者。1928年的资料表明,集体农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农户单位面积产量20%—25%。如果拿一些集体农庄,特别是萨莫伊洛夫斯克区“克里乌沙”这样的集体农庄,1929年的单产数字为例,那么,这里集体农庄的单位面积产量超过周围居民作物单位面积产量100%。在捷列克专区的“共产主义灯塔”、萨利斯克专区的“播种者”等这样一些集体农庄里,我们看到超过得更多。这都是可以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榜样的单位。

在谈集体农庄商品率的时候,必须指出,它比个体农户的商品率高出1—1.5倍。我强调指出,占全联盟播种面积总共4%的集体农庄1929年的商品粮产量为粮食收购计划的12%。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不仅无马的,而且只有一匹马的个体农户基本上是消费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变成成为商品的生产者。

你们都记得,集体农庄1亿普特的粮食在不很久以前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引起许多同志的怀疑,已经成为集体农庄即将完成的数字。现在集体农庄已经交了9000万普特粮食,而总计划为1亿普特。粮食收购是对集体农庄的一个严重考验:我们发现了许多虚夸的“集体农庄”,它们已经和正在被我们淘汰。但是,总的结果最令人信服地证明,通过集体农庄,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大型的集体农庄,即使在集体农庄运动的现阶段,尽管它有各种毛病和缺点,我们找到了解决农业最重要问题——农业商品率问题的途径,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在个体经济范围内费尽心机而未获得特别大的成效。

关于集体农庄发展前景的几点意见。根据我们春天看见的集体农庄运动的那种速度和规模,7月份我们制定了五年计划,按照计划我们希望到五年的末尾集体农庄至少拥有播种面积7000万公顷,即全部播种面积的50%,至少包括1400万个农户。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在实际上迅速解决农业机器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的问题,这个扩大的计划也会被超过。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一点。从1929—1930年度的收成中,集体农庄就将提供3亿多普特商品粮。

我觉得,在制定长远计划的时候,主要注意力现在应当放在今明两年的前景上,而且不仅是粮食方面,还有畜牧业、蔬菜种植和经济作物方面。直到现在,集体农庄畜牧业的情况非常糟糕。这项任务的巨大的重要国民经济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它在集体农庄里有极大的可能性获得解决。为证明我们的能力,我举捷列克专区为例,那里几乎所有集体农庄都在发展良种家禽饲养区。在那里这项工作作为主要工作进行。如果能把捷列克养禽业方面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集体农庄和其他区,那么,我们单靠养禽业一项就能够在加强城市供应方面和出口方面作出重大的成绩。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在集体农庄里开展畜牧业工作,以便到明年没有一个集体农庄不是畜牧业产品的供应者。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走既建立强大的畜牧业集体农庄,又在以谷物种植为主的集体农庄里发展畜牧业的道路。从目前的肉类供应困难和畜牧业总的情况看,把所有集体农庄的商品畜牧业搞上去变得格外迫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今天向7.5万个集体农庄中的每一个提出一项任务——在畜牧业方面提供一定的商品率。

我们的集体农庄建设现行政策,我们在集体农庄和国家之间签订订购合同方面的工作,在机器供应、资金拨放、农事指导和一切其他方面的工作应当这样进行安排,以便在普遍提高集体农庄商品率和增加向国家上交商品余粮方面获得最大的成效。同时,我们不仅应当指望粮食商品率的增加,现在同样重要的是,还应当指望畜牧业、养猪业、养禽业和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加。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那么,就能在很短期间内使集体农庄转向发展商品畜牧业并以此创造条件消除这方面目前存在的困难。我们进行了计算,1929—1930年度集体农庄至少能够提供1300万普特商品肉。如果在这方面多少施加点压力,让集体农庄内部建立某种制度(不必隐瞒,许多集体农庄在这些事务上没有任何制度),如果这样进行实际工作,使集体农庄的机器供应、拨款和贷款取决于它们所承担的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和商品率的义务,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比解决集体农庄粮食问题更为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1930—1931年度提出的

具体任务是:至少从集体农庄得到3500万普特肉,以此保证各大城市和军队对肉的一半需求。这个任务主要通过发展养猪业来解决,因为养猪业能够最快和最容易发展起来。

即使在投资比较少数的情况下,集体农庄1929—1930年度就必须提供100万头猪,即500万普特商品猪肉。1930—1931年度集体农庄将提供300万头猪或者1500万普特猪肉。我们应当让集体农庄分支机构众多的整个系统为这个任务服务。

如果严肃认真提出这个任务,如果所有集体农庄都能清楚理解尽快解决这一任务的必要性,而党会对这事给以帮助,如果这一切将得到相应的拨款和贷款政策的支持,那么,所提出的这个任务无疑会得到解决。

同志们,你们都了解,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集体农庄只占全部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一和同样比例的农业商品量。当斯大林同志十分清楚地提出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加速农业发展问题,当莫洛托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向集体大农业前进”口号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刻许多人觉得,在集体农庄只有1%播种面积的情况下不能那样尖锐和深远地提出这个问题²⁹⁰。那时,许多人觉得,指望如此迅速地在农业中发展集体农庄在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结果,在很短期间里(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过了还不到两年),正是在集体化的道路上,我们找到了振兴农业、提高农业商品率和完成城市食品供应实际战斗任务等问题的真正解决办法。

柯秀尔:就是说,说到点子上了。

卡明斯基:是的,这就是说,“说到点子上了”。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根据我谈过的最近几年的远景规划好好地开展工作,那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即通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能够找到提高我国农业生产能力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和为国家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建立牢固的食品和原料基地。

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证明,右倾分子的全部阵地是怎样垮掉的。在极短的期间内,十分清楚和明确地显现了右倾反对派政治上的完全破产。我们都很清楚,对集体农庄问题右倾分子曾在狭小的范围内做过某些“试验”。他们不仅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全部意义缺乏正确的理解,而且现在我们还在“三人团”的声明里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很多欺骗和混乱。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右倾分子接受党正在执行的路线,如果他们真的同意党正在实行的方针,那么,这就表明,需要以另外的态度对当前的整个经济和政治形势进行估计,以另外的态度提出一系列

具体的政策和实践问题;而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右倾分子“赞成”党的路线就是假的了。右倾分子应当十分清楚和明确地说,他们的估计和预测错了。他们谈论“退化”,而我们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他们谈论联盟受到威胁,而实际上我们在新的生产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加强了联盟。他们提出“解放”市场自发力量,而实际上我们在新的道路上,即通过预购合同制(右倾分子是不懂得其意义的)找到了同农户结合的方法和形式。

现在,在对已经走过的阶段进行总结的时候,应当十分坚决地宣布,由于彻底执行党的总路线,我们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党是在不顾右倾分子,反对右倾分子,同右倾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只有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才能保证我们今后取得新的成就。根据集体农庄运动速度快和规模大的情况,党将更加有力地把农业生产集体化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力争获得更大的成就。运动的新的规模和速度十分尖锐地提出一系列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全党的高度重视和不懈关注。

这些问题中间,建立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基础问题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当把现在具有许多矛盾和缺点的集体农庄转移到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轨道上去。现在技术情况如何呢?不必隐瞒,集体农庄技术装备的情况远不能满足要求。由于集体农庄运动的规模巨大,我们正在形成集体化的规模及其技术基础之间的剪刀差。尽管集体农庄的机器和拖拉机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拖拉机机耕面积在全部耕地中的比例却在急剧下降。下面的图表是对这一过程的直观说明(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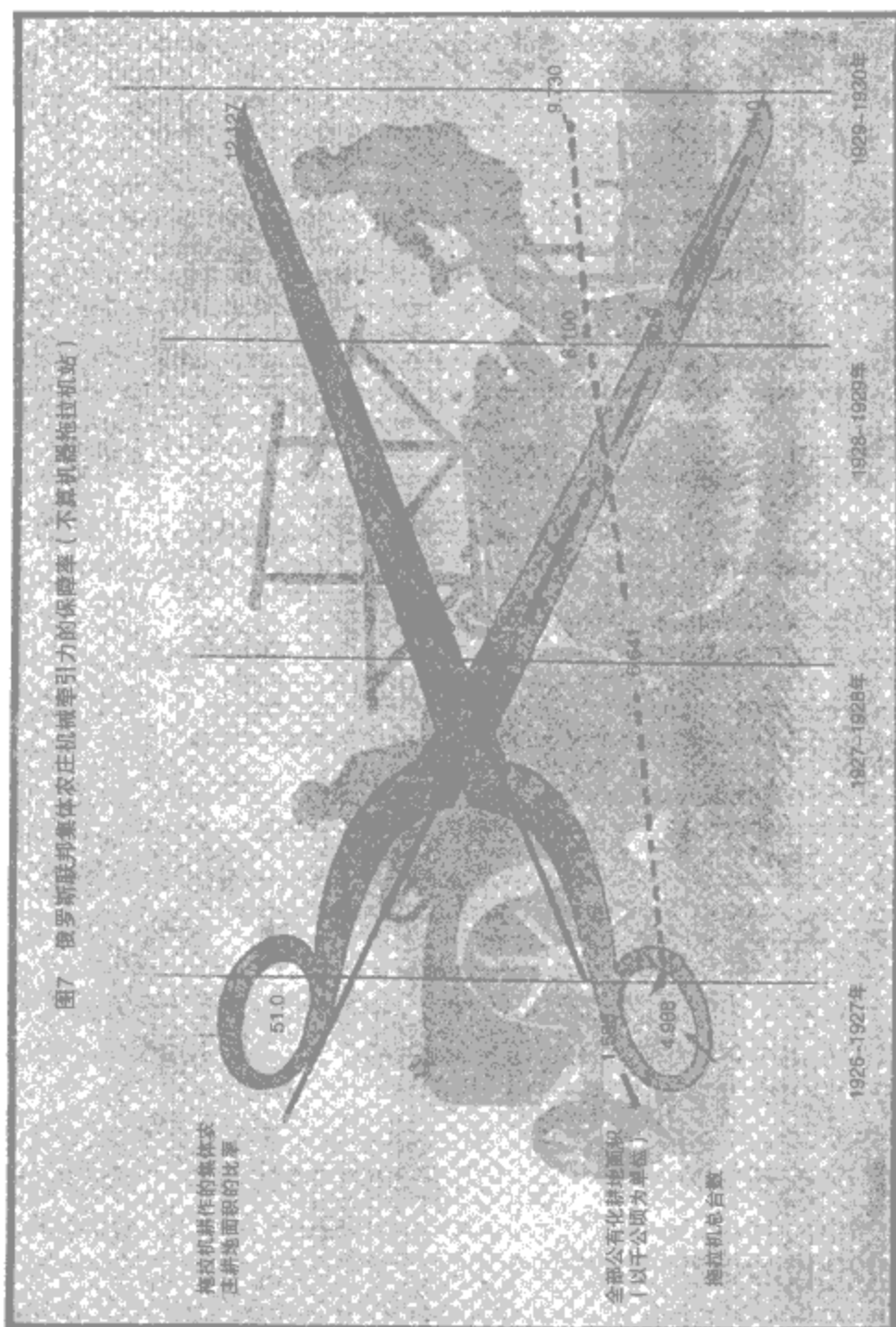
你们看到,如果1926—1927年度拖拉机的耕作面积为51%,那么,这一比例1927—1928年度下降到48%,1928—1929年度下降到30%,1929—1930年度下降到14%。

柯秀尔:这一切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卡明斯基:可见,存在集体农庄技术装备落后于集体农庄发展的情况。

柯秀尔:大概,很快就得用手挖地了。

卡明斯基:完全用不着。集体农庄的生产机械化在不断提高,集体农庄农业机器、拖拉机等供应在逐年增加;我们将力争拖拉机供应的更大增加(既靠国内生产,又靠进口)。但是,技术基础的发展仍然明显落后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我认为,只有尽快缩小上述“剪刀差”,我们才能用拖拉机巩固靠畜力得来的成果。除了我们拖拉机牵引力比重的下降(尽管其绝对量增加了),我还必须



指出,1929—1930年度确定的耕地面积,不仅没有足够的拖拉机保证,也没有足够的马匹保证。

现在,我们拥有高度机械化的大型集体农庄,也有主要靠畜力发展起来的、技术基础薄弱的大型集体农庄,例如“红波利亚纳巨人”集体农庄。然而很清楚,真正大型集体农庄问题的解决要求按照农业技术和畜牧学的最新成就组织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集体农庄机械设备类型的选择问题基本上像大型国营农场那样解决。无论在集体农庄里还是国营农场里,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高技术。集体农庄作为大规模的经济同样需要像国营农场一样的各种农业机器,同样功率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如果从前小型集体农庄占主要地位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怀疑,那么,现在由于集体农庄运动发展和大型化,这一切怀疑正在消失。

柯秀尔:这需要大功率的拖拉机。

卡明斯基:我们需要的将是最大国营农场所要的那种拖拉机,因为集体农庄运动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当然,集体农庄庄员也不会拒绝福特牌拖拉机,因为拖拉机根本就不够。

中央最近关于农业机器制造业的决定²⁹¹为集体农庄运动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当中央提出的发展机器制造业与拖拉机制造业和制造联合收割机的规划实现之后,十分清楚,那我们就将为集体农庄运动奠定真正的技术基础。但是,在这个扩大的计划尚未完成的最初几年里该怎么办呢?在这方面首先得进口拖拉机,为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出口项目,首先是集体农庄和农业合作社本身的出口。你们都了解中央关于建立专项出口基金以追加进口拖拉机的决定²⁹²。

决定规定,如果集体农庄、合作社组织筹集所述出口基金超过通常的……

丘巴尔:不是超过通常的基金,而是超过计划。

卡明斯基:是的,是超过计划。(如果所筹集的超过通常的数额,)那么,这些组织用相应数目的钱就能得到额外数量的拖拉机。我们必须把这一点作为对集体农庄全部工作的战斗要求。

其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好现有拖拉机的经营管理,最充分、最爱护和最节约地使用现有的拖拉机。我们还应当加强技术援助、维修,开展零备件供应和零备件本身的生产。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发展合作社的和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是大规模利用现有机器设备的最佳方式之一。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合作社—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与两个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在工作。今年将组建102个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其播种面积为150万—200

万公顷。至于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它们的总额今年将达到300个,覆盖播种面积450万—500万公顷。

因此,我想谈谈在集体农庄运动现在的发展情况下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农村机器供应政策。在一些集体化地区实行100%的机械化,而同时完全忘记靠农民生产工具兴起集体农庄运动的另一些地区,这样办事是不对的。在这些地区,我们必须给公有化了的农民生产工具补充新的机器技术。建立100%的机械化点,同时又容许其他地域在这方面形成荒漠,让全盘集体化的一些地区和许许多多加入集体农庄的村庄停留在原始技术状态,这样的政策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应当执行这样的政策,100%的机械化主要是作为试验示范目的样板实行,而主要的努力用于为公有化了的农民生产工具添加机械动力和复杂农业机器,从而加固这些集体农庄的生产基础。现阶段应当执行现在拖拉机和畜力配合使用的方针。在建立新的国营和合作机器拖拉机站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以复杂机器和马匹互相配合为形式的马匹机器站和马匹机器队,对土地进行混合(马匹和拖拉机)耕作。

直到我们的工厂向我们提供新技术之前,这是集体农庄建设发展的主要途径。当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把农民的生产资料纳入合作化,如何把它们的使用与我们所提供的为集体化服务的机器的使用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坚持执行为农民公有化了的生产资料补充机械动力的政策,直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形式的新技术以超过目前许多倍的规模开始进入集体农庄为止。但是,我再说一遍,以农民生产工具建立集体农庄是暂时的,我们必须实行建立机械化集体农庄,建立拥有高度发达的先进机器技术的集体农庄,建立与国营农场同为农业生产领域技术进步体现者和经济技术变革先锋的大型集体农庄的方针。用不着证明,只有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基础上,目前落后的农业才能变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的农业。

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加工企业,这些农业工业化的基地,肩负着不小的作用。

如果前一个时期合作加工企业曾经有过很大的意义,那么,在合作化目前的“集体农庄”阶段这些企业的作用应当大大提高,特别是由于畜牧业、蔬菜种植业和经济作物的集体化。建立和大力发展加工工业企业是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一任务的特别重要性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些地区将形成把谷物种植业和农业其他各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农工联合企业。农工联合企业就是集体化、整区全盘集体化和现有集体农庄转变为大型集体农庄进程

本身导致的结果。

我谈技术的时候,指的不仅是机械动力,而且是科学地组织集体农庄生产所需要的全部农业技术措施(化学制品、合理的轮作制、采用价值高的作物、育种,等等)。尽管机械化水平很低,尽快实行这些措施现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不言而喻,在畜牧业这样的部门中,例如与大田作物栽培相比,需要完全不同的技术,提出的是不同的农业和畜牧业技术问题。同时,电气化在这里应当起很大的作用。

在采用新技术和建立大型集体农庄方面,联合社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它们的作用1929年增长得异常迅速。现在我们正沿着发展联合社的路线解决我们小型集体农庄大型化的任务,联合社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参加联社的集体农庄借助于它获得用新技术补充自己生产工具的可能。联合社愈益成为合理安排集体农庄生产活动的组织者,成为机械牵引力、复杂机器、加工企业集聚的中心,特别重要的是,成为小型集体农庄联社变成统一的大型集体农庄的形式。

我举“十月”集体农庄生产结构的例子,说明即使在缺乏拖拉机和复杂机器的情况下,大型集体农庄是怎样建立的。这个集体农庄的组织者是共有84户的由四个小型集体农庄组成的联合社。现在它拥有土地面积19 000公顷,1 116个农户。集体农庄立即开始实行多区轮作,使播种面积扩大了3 000公顷。结果,每户几乎增添了3公顷播种面积。

有人喊:这是从哪里来的?

喊声:这是在哪个区,在什么地方?

卡明斯基:这是在北高加索,库班专区,新苏罗夫斯卡亚镇。

喊声:户数太少了。户数有点少。

卡明斯基:19 000公顷土地。

喊声:户数太少。

卡明斯基:户数是1 116户。

喊声: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您说的是116户。

卡明斯基:我就是这么说的。247户未被吸收加入集体农庄:这主要是富农和商人。有人问我,这3 000公顷扩大的播种面积是从哪里来的。从前那里实行的是不合理的轮作制和那样的经营管理,结果一部分土地(放牧撂荒地)完全没有利用。由于改行五段轮作制现在这部分土地也进入了轮作。改行五段轮作,种植中耕作物、种草等等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个镇的土地规划在很短期间就完成了,不需要国家花费千百万卢布历时经年进行村庄内

部的土地规划。领导这个集体农庄的是一个共产党大干部,农艺师工作得很好……

有人喊:农艺师是党员?

卡明斯基:不,农艺师是非党员,是季米里亚泽夫学派的。

喊声:有多少农艺师?

卡明斯基:有两个农艺师。

喊声:太少。

卡明斯基:显然太少。尽管如此,现在那里的经营管理搞得很好,虽然没有土地丈量员,土地规划在很短期间——三个月内就完成了。集体农庄庄员播种了6 250公顷冬小麦,他们已经翻了秋耕地,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工作方式和经营管理的新方向。这是一个并未完全机械化的集体农庄:这里有37台拖拉机,其余的工作由马匹进行,而且640匹马都公有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多区轮作制、特别的土地规划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土地划成许多方块,每块面积200公顷。(见图8)

划分成这种方块使得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组织劳动。在拥有一千多户、仍以旧技术水平为基础的集体农庄里,组织劳动、正确安排人力、马匹等是一项不轻松的任务。这种事就是鬼也会弄糊涂的。划分成这种方块表明,在这方面能做到什么:向划成为几十个组的一些农户和农民下达指示:到第50号地段去干什么活,到第100号地段去干什么活,等等。

这里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无论拖拉机还是马匹都不用跑多余的路。可见,工作有合理的安排。顺便说一件小事。这是哥萨克村镇;在邻近的一个村里住着外地人——马列万内人。就是这些马列万内人现在在集体农庄里干最重要的农活;顺便说一句,他们是最有经验的播种者。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一些同志来到田里问:“是谁在干活?”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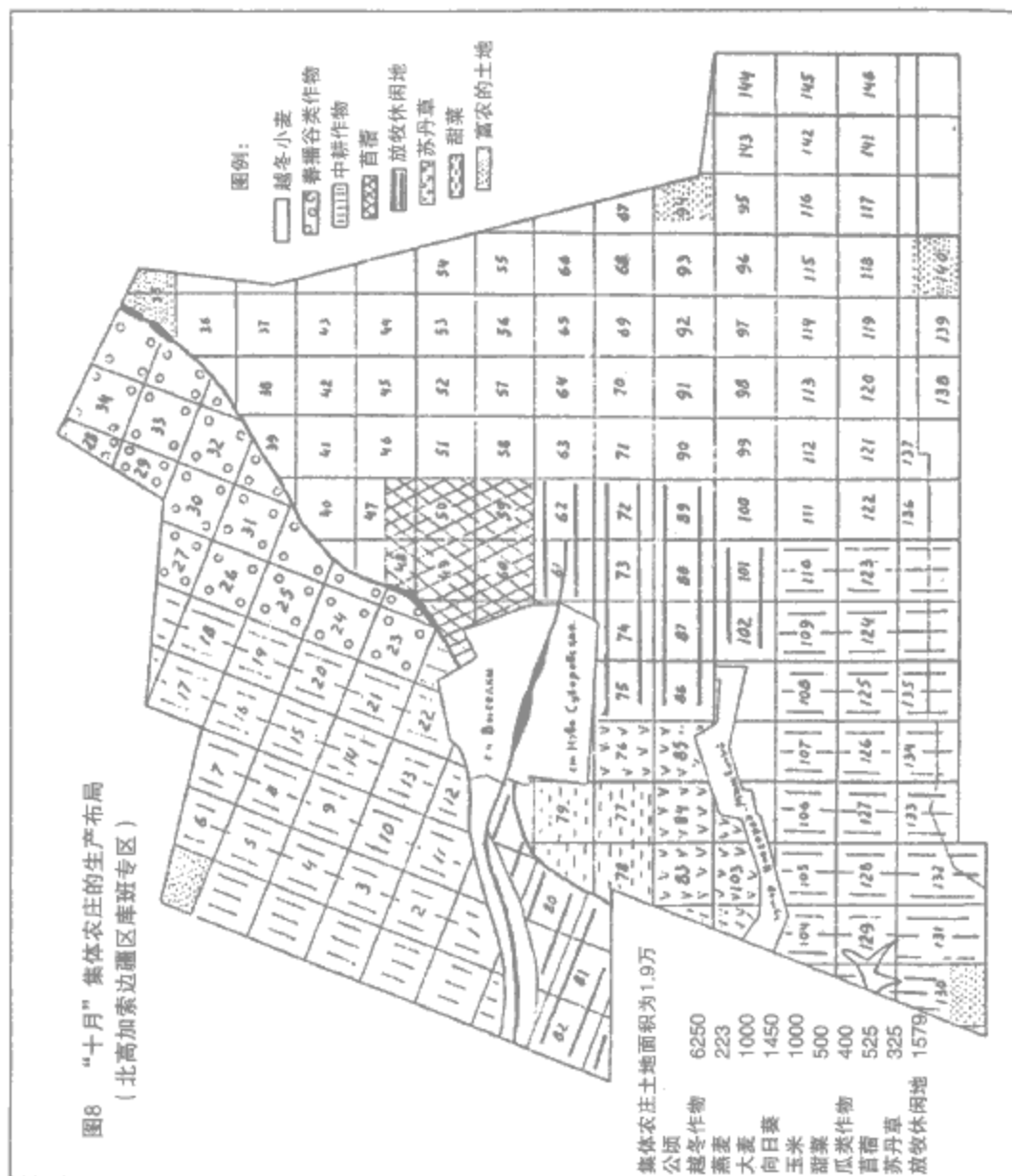
有人喊:傲慢?

卡明斯基:是的,傲慢——尊严:“我们是马列万内人。”马列万内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外地人,革命前给哥萨克当雇工,可现在是集体农庄的基干庄员。

有人喊:马列万内人是教派信徒?

卡明斯基:不是,他们这样称呼是由“伊诺戈罗德-马列万内”村而得来的。

“十月”的榜样表明,在恰当实行某些农业技术措施、在机器技术同旧的农民技术正确结合的情况下,可以怎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



“十月”集体农庄庄员采用纯种播种了小麦,全部种子都进行了消毒处理,引种了新的作物(甜菜、苏丹草、苜蓿),很显然,通过这种改进了的经营组织,他们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收成,获得比过去大得多的成绩。

“十月”的榜样还表明,劳动组织问题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说,现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状况非常糟糕。集体农庄里还没有应有的劳动纪律,没有正确和充分地使用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很差,等等。在这里,很多方面还显现出个体经济的习惯、小私有者的观念,很多方面还表现出平均主义和只顾满足个人要求的倾向。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是我们在集体化的全部工作中必须特别着重注意的。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根据呢?莫洛托夫同志在和我进行的关于解决劳动组织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您的眼里应当永远有工厂。”这就是说,应当注意考虑到工厂生产方法全部优点这样的劳动组织。当然应当注意,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例如与需要多少劳动力就雇用多少劳动力的国营农场相比,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情。在集体农庄里只能利用参加集体农庄的全体农民的劳动,而他们尚未完全扯断系在私有经济制度上的脐带。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工业类型劳动组织的方针。这里可能需要各种过渡形式和阶段,但我们主要应当考虑的正是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那种类型。当然,我们必须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商品率的任务来对抗一切平均主义和只顾满足个人要求的倾向。正是为此目的才需要发展计件工资制。

应当让集体农庄庄员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应当做到,比如说,像“十月”这样的集体正在做的那样。那里的人说:“你们去耕作比如说第48、第49、第50块地段吧,我们将要看一看,你们在这些地段上得到了什么结果。要是你们种得不好,你们自己会因此而受损失;当提出劳动报酬问题的时候,这种报酬将根据你们的工作成果而确定。”就应当这样提出问题。这种关心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团结一致。他们每一个人都关心,这个地段可别让人“丢脸”并因而减少全集体农庄的收入和他个人作为庄员的收入。实行计件劳动报酬、正确规定工资等级、建筑工程法规大全、严格的工作统计——这一切应当成为劳动组织的基础。我们应当十分清楚地把问题摆在每个集体农庄庄员的面前:他的劳动报酬的数额决定于整个集体农庄的总收入额、公有化成分的加强、商品率的提高等等。同时,应当在与此前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在集体农庄里实际采用社会主义竞赛、自我批评和广泛开展生产会议工作的方法来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集体农庄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尖锐地提出了组织统计工作的问题。有些我们派去进行粮食收购的工人去过农村以后说:“如果每个集体农庄里没有一个好的会计,集体农庄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集体农庄里没有正确组织的统计工作,没有会计,那里将会盛行偷窃和吵架。应当提出,我们的科研机构 and 单位至今没有好好研究并提出集体农庄简便而又省钱的统计形式和方法。

劳动组织和合理进行经营管理的问题同干部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不详细谈专业人员和技术干部的培养问题(决议草案中已经谈了),我只想提出立即就需要有的那些干部。我说的首选是抽调一定数量的工人去参加集体农庄建设。25 000名工人去组建集体农庄——这就是我们必须给自己提出的任务²⁹³。当然,同时也应当使用作为组织者和倡导者的原有集体农庄庄员干部,他们具有组织公有化经济的经验。加速培养群众工作干部应当既由红军系统进行,又由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大生产单位实际组织者培训系统在使用复杂机器等工作中进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冬季时期加速培训干部迎接春播运动。春季时期动员农业和其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参加春播运动和集体农庄建设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集体农庄干部现在就应当由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补充。更不用说我们在提高集体农庄庄员普遍文化水平、做好集体农庄整个文化工作方面面临着多么巨大的任务。

集体农庄运动的迅速发展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资金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根本改变原有的,特别是集体农庄庄员原有的一切观念。我们必须在吸收居民资金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转变。难道只靠国家能够实现千百万农户规模的集体农庄建设?我们的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明白,不动员居民本身的资金,集体农庄运动不可能有牢固的基础,集体农庄的建设必须依靠来自下面的物质资源。不应当掩饰,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解决得不好。现在,公有化的水平很低,公积金的积累远远不足,也有把公有化成分的资金化为个人成分和不正确使用贷款等。我不准备详细描绘这些现象,但我必须强调指出,加强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必要性是集体农庄建设的中心任务。在进行贷款、供应、土地规划、农业技术服务等的时候,应当以公有化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特别是拨款政策应当这样执行,以便促进这个任务的解决。而现在农业贷款是这样发放的,向集体农庄贷款不同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不同提高集体农庄的商品率、不同它们上交国家产品的义务相联系,结果常常是资金分散。这是一个大问题,只好十分尖锐地把它提出来,并从这个角度对农业信贷系统进行改组。特别是由于提出了组建大型集体农庄和在

新条件下动员农民资金的任务,前一个发展阶段形成并存在至今的信贷系统对于我们已经不合适了。在积累公积金方面,必须注意把一定份额的商品产量以及用长期贷款向国家购买的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记入其中。

此外,可以和应当摸索动员资金的新的途径和方法。例如,征集未来生产的拖拉机的预订单并收取预付款。大家都知道,根据中央的决定,每台拖拉机必须收取集体农庄提前半年预付的20%的订金²⁹⁴。以后我们也许会修改条例,延长期限。无论如何,征集对未来生产的拖拉机的订单、收取提前半年或一年预付的不低于拖拉机价值20%的订金、缩短贷款期限(从四年改为两年)——这一切都是动员居民资金的新工作的开端。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提出了动员农民资金的新途径。有些人根据农业信贷的经验对动员农民资金的可能性完全失去了信心。的确,农业信贷系统没能解决吸收农民投资的任务²⁹⁵。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认为,在发展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基础上,我们能够用另外的方式动员和组织农民资金并且已经开始以新的方式做这件事情,虽然还做得远远不够。在农民生产资料公有化与吸收居民资金搞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动员几亿,甚至几十亿卢布。

对这种可能性持不相信态度的同志,如果考虑到集体农庄对拖拉机特别关心这一点,就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红波利亚纳区的集体农庄庄员在同莫洛托夫同志谈话时指出,他们具有积聚出口储备以增加进口的许多具体可能性。集体农庄对筹集专项出口基金的兴趣可以和应当十分广泛地加以利用。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在其五年计划中计划用国家资金建立575个机器拖拉机站,这需要投资12亿卢布。现在能不能从工业化中拿出这笔资金用于集体化呢?为了集体化本身的利益,任何一个有觉悟的集体农庄庄员都会认为和筹集拖拉机订金,筹集资金建新拖拉机厂、联合收割机厂比指望得到这样的“礼物”更为正确。应当这样办事,让集体农庄“去挣”它的拖拉机。集体农庄应当提高自己的商品率,应当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益,用新方法组织自己的工作,应当严格厉行节约,以使用集体农庄的资金购买拖拉机。

此外,我们面前展开了至今尚未经历过的减少周转费用的途径。例如,北高加索“伊里奇遗训”集体农庄决定不修不必要的粮仓储存自己的粮食。既然可以把全部粮食交到机械化大粮库去,干吗要建粮仓?为了使集体农庄把它们的全部粮食交到机械化大粮库里去,只需要保证,集体农庄需要粮食的时候便能够得到。组织粮食周转本身的这些新的形式愈益需要在集体农庄系统加以发扬。

这些形式实质上就意味着集体农庄发放粮食信贷。这也是动员居民资金和解决合作销售问题的形式之一。

我们还应当用卢布来检验我们的集体农庄。只有筹集到资金的集体农庄,只有以农民本身筹集的资金为基础而建立的集体农庄才是检验完全合格的集体农庄,才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集体农庄。当然,这并不排除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生产也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给予直接财政支持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应当实行的路线。

现在我谈谈农业某些部门的集体化问题。现在我们不仅应当在谷物种植部门,而且也应当在非谷物种植部门展开集体化。我指的是畜牧业系统和其他专业部门(甜菜种植、亚麻种植、棉花种植等)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应当承认,在这些部门的集体化方面,我们至今远远没有利用那里具有的可能性。

拿甜菜种植业方面的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工作为例。应当坦率地对工业工作者说,靠我们现有的那种小农经济,制糖工业的发展是没有远大前途的。今年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显然,制糖工业必须以另外的方式建设自己的原料基地。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是否充分地展开了甜菜种植业集体化的工作呢?以我看,这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在棉花种植业方面,情况同样如此。只是今年认真开始抓了组建大型亚麻种植农庄的工作。

柯秀尔:我们是只管订合同。

伊克拉莫夫:他们有多少机器拖拉机站?

柯秀尔:暂时一个都没有。

卡明斯基:我们必须以全副精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农业各个部门展开组建大型专业集体农庄的工作,与有关工业部门充分配合,同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棉花总委员会等一道来做这件事情。在这里也应当表现出工业的主导作用和它在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领导意义。

简短地谈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联合这样的工作形式问题。在亚麻种植方面,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和亚麻大麻委员会²⁹⁶开始进行一项重大的工作:建立专业化大型亚麻种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工作的密切联系已初露端倪。我们刚同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大型国营谷物农场所在地区紧挨着国营农场联合进行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工作。这样一来,这些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可以互相补充。集体农庄将向国营谷物农场提供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并从国营农场获得技术和农艺方面的帮助。

但是,看来主要应当作出的结论是:工作的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多样形式一方面要求集体农庄本身专业化,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机关整个系

统最密切关注集体农庄建设。运动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任何个别的机构都胜任不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应当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棉花总委员会、由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以及其他机构来做。

同时,这就提出了十分复杂的整个组织问题。

在发给大家的提纲中谈到了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²⁹⁷并入集体农庄系统和在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属下以及在各共和国和最重要的州里成立新的机构——集体农庄建设委员会。

至于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那么,现在完全没有争议的是,组建拖拉机行业在集体化事业中有着巨大的意义。集体化的这个极为重要的杠杆必须列入集体农庄总的系统。因此,决议草案建议把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变成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独立机构之一并在其直接领导之下工作。

由于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营性建筑等基本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大型和专业化集体农庄里的发展,成立集体农庄建设委员会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例如,在畜牧业方面,不搞基本建设,不建造保暖的畜舍和青贮设施,我们在这一部门就不会有足够的基础展开集体化。由此应当清楚了解从事集体农庄基本建设、建筑物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机构的重要性。我认为,为了展开集体农庄建设,还需要若干类似的机构。

现在,农业合作社系统和集体农庄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全部组织问题中最现实的问题。在决议草案中我们提出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在农业合作社每一个专业系统里成立独立的集体农庄建设部组。在发展的现阶段,我们提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臧声:对。

卡明斯基:这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

臧声:对。

卡明斯基:(它)在于,农业合作社各个系统都在从事集体农庄运动,以这种形式实现农业合作社向集体化工作的逐渐过渡。因此,独立的部组就是那种形式,通过它农业合作社各专业系统逐渐转变并完全变为集体农庄合作社形式。

拿任何一个州为例,不论北高加索还是中央黑土地带州,你们就会实际看到,合作社脱离集体农庄运动就会使合作社工作失去自身的本质。只有在提纲指出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找到正确解决农业合作社系统工作和正确展开集体农庄建设问题的办法。

这些独立部组及其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会怎样呢?这些独立部组是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一道并在其直接领导下进行组建集体农庄工作的。随着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领导整个农业合作社运动的总机构——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²⁹⁸也应当与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合二为一。

组织问题的重要性使我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集体农庄运动是在整个合作社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和展开的。

臧声:对。

卡明斯基:合作社运动是从流通过程(销售、供应、信贷)的合作化开始的。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基层单位是具有中介职能的农业信用社。最初几年集体农庄运动几乎是不依赖于农业合作社的其他形式而发展的。但随着流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农业合作社通过组织销售、供应和信贷接近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问题。

农业合作社发展成为生产合作社的过程在全俄奶品合作社联社、全俄种麻合作社中央联社、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²⁹⁹等各专业生产销售系统的发展中得到了表现。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定义,这些专业生产联合体是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独特家庭制度”。由于预购合同制办法的发展,这个方针得到了光辉的证明,预购合同制逐渐引导农户按照预先的订货进行生产。这种“家庭制度”是向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的过渡形式。这种过渡最近几年已经清楚显现出来并在中央1929年6月27日关于农业合作社组织机构的决议³⁰⁰中得到了反映。中央这个决定的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在每个区确定农业合作社主导系统的情况下,根据该区农业的主要方向继续完成农业生产主要部门农业合作社的专业化。

我不能详细谈各个合作社的专业化和农业区划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说,由于全盘集体化的加速发展,农业区划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了整个集体农庄运动的面前。中央的决定规定这样组建合作社,使各个区的专业化与合作社的专业化协调一致。

第二,正如中央决定所指出的,就是通过预购合同制,通过国家预先订货改造农业合作社的全部工作。最后,应当指出以镇生产合作社为模式改组农业合作社基层单位的指示,镇生产合作社是农户集体化的初级形式。这就是中央就农业合作社问题发出的指示。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销售系统开始同集体农庄运动直接结合起来,逐渐变成集体农庄的建设形式。整个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前景在于,合作社专业系统的工作必须改造,生产职能在它们的工作中必须占有越来越大的地位,所有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系统现在就必须专心致志地开始搞集体农庄建设。

当然,所提出的集体农庄运动组织形式只规定了基本的发展路线。现在尚无法预见的详情细节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会显现出来。

在这方面规定某种必须遵守的标准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所建议成立的各专业合作社系统的独立集体农庄部组还不能预先就解决某些地区这件事情将如何在组织上定型的问题。现在无法对此作出详细的规定,因为所有这些极为复杂的关系将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最终确定下来。因此,立即按照这些原则进行整个合作社系统的组建应当成为合作社和党的全体干部的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集体农庄建设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使我不得不说,现今的合作社系统还不适应这一宏伟的事业。我想,谁都不会断言,比如说,农业合作社这些或那些系统以其现在的形态完全适应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務。无论在专业干部和组织者方面,还是在整个工作的安排方面,农业合作社本身应当去适应生产性质的新任务,去适应大规模集体农庄建设的新任务。原先集体农庄系统的旧形式完全不适应运动的新规模,原先的领导形式完全不合要求也已经十分明显。

一些同志有把合作社系统同国家系统对立起来的倾向;因此,可以听到用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代替合作社系统的议论。用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或者类似的机构取代整个合作社事业,我觉得这是十分荒唐的。

柯秀尔:是谁提这样的建议?

卡明斯基:斯大林同志昨天说得完全正确,集体农庄还不是社会主义,在集体农庄里对农民进行改造,这个过程需要若干年,为此就需要对农民的资产进行特别的重新组织,就需要把集体化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正确地结合起来,等等。大家都知道,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有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工作的正确安排应当促进一些形式向另一些更高级形式的转变,例如大型共耕社向公社的转变。

集体农庄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因此,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我认为,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在粮食战线上》一文中对这一点表述得十分清楚明了。文章中说:

“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

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有销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在粮食战线上》,第5卷,1928年,第469页)³⁰¹

集体农庄是最明显和最完善的生产合作社形式;集体农庄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部分。

现在,我们在很多情况下缺乏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我指的不仅是同布哈林同志的集团,同右倾反对派的争论,而且指的是常常从农业人民委员部内部听到的这种声音:我们需要合作社是为了以旧农具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正确的路线。

当然,只有合作社能够以旧农具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使这些旧农具在农民经济中变得更有收益。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像农业合作社那样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合作社必须由供应职能向生产职能过渡并进而把整个农业转入集体农庄运动的轨道,那么,这就是说,合作社将在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新技术基础上,而不是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向前发展。以旧农具为基础组织农民的工作应当与采用复杂农具、新的复杂机器同时进行。合作社的发展前途不在于以旧农具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在于以新的方式装备农业,把农民经济提到更高的高度。走别的道路,合作社不会有任何远大的前途。

正是由于集体农庄运动目前的规模,现在合作社的作用增长和提高了。只是现在合作社才步入自己真正兴盛的时期。合作社工作的前一个阶段可以认为是它的“前史”。只是现在才开始通过合作社对农民经济进行真正的改造。要知道,农民不是加入集体农庄的第二天立即就能改造好的。农民还会把昔日农村的成分带入集体农庄。全部旧农民生活方式、农民心理和农村关系的改造能够并且将在合作社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现在全党的任务是振兴合作社,帮助它解决这些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任务。

有些同志建议:“你们合作社就用旧的农民的工具展开事业吧,而拖拉机和其他复杂农业机器将沿着别的渠道进入农村。”这是无稽之谈。这样提出问题是绝对不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极为复杂的任务不是只靠集体农庄系统能

解决得了的。我曾经指出国营农场的作用、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等这类机构的意义,但是,尽管如此,不应当忘记,小农经济改造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是通过合作社渠道。与此相关,还应当提出资金、技术基础等问题。

因此,在发展国营拖拉机站的同时,我们今后也应当发展合作社拖拉机站。

我们将实际检验组织使用拖拉机的各种形式,检验这些机构对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适应性等。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任务——要这样组织拖拉机进农村,以便动员农民自己的资金做这件事。

大力展开实现列宁合作社计划的工作,从技术上装备合作社使其在新的集体农庄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党最重要的战斗任务。

我请求再给我几分钟时间谈谈我们的阶级政策问题。

喊声:给他,给他。

丘巴尔:对,要不,关于富农你什么也没说,关于妇女和共青团什么也没说。

卡明斯基:集体农庄运动现在的规模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围绕集体农庄建设展开的阶级斗争和把农村本身现有的社会矛盾转移到集体农庄的问题。目前农村的这些阶级矛盾特别显现在集体化的初级阶段上。

实际上,我们有时也会在比较高级的集体农庄里遇到社会矛盾的成分。因为许多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差,组织不够精密,公有化水平很低,所以在这些集体农庄里常常可以看到不平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成分。

集体农庄是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建立、生存和发展的,是这种斗争中一支明显的力量。富农对集体农庄运动的策略大家都十分清楚,报刊上详尽地进行了阐述,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只谈谈富农的两种手段。富农用两种方法向集体农庄进攻:包括暗杀、放火等直接反对集体农庄的形式和相反的形式——从内部“破坏”集体农庄的形式。面对全盘集体化的事实,富农极力“改变方针”,争取加入集体农庄。富农使用各种诡计混入集体农庄从内部进行破坏的大量事例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清楚的是,在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阶段,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加强反对富农的立法措施和司法惩治手段,清除现有集体农庄中的富农分子。

在全盘集体化的情况下把富农弄到哪里去,这长时间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请看,他们实际被放在了什么地方(指着图8)。瞧他们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段实行五区轮作制,富农被挤到最边上(第35、130、140、94地段)。为什么?为的是不让他们凑在一堆。

有人喊:他们四面围着,这也危险。

卡明斯基: 喏, 要知道, 让他们这样“包围”去吧。我们把他们赶到轮作的地边上, 赶到最差的地段去, 等等。

在集体化的情况下, 富农问题就是这样实际解决的。我认为, 我们无须争论这个问题。

在集体农庄运动中, 贫雇农的问题特别重要。三分之一无马和无农具的农户是加速和巩固集体农庄运动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的任务是保证贫雇农在集体农庄里的领导作用。但是为了保证贫雇农的这种领导作用, 应当加强对贫农的工作, 应当巩固贫农在集体农庄里的地位。这些问题必须明确地提出来。必须更深入、更系统地做好吸收和在集体农庄里建立贫雇农团的工作, 就像提纲中大力强调的那样。

雇农的情况怎样呢? 集体农庄里雇农的比例如下: 共耕社为 2.8%, 劳动组合为 4.7%, 公社为 8.6%。在各类集体农庄的平均数为 4.8%。由于我们向富农成分展开了进攻, 现在农村里寻找工作的雇农的人数会增多。因此, 突出强调比以前吸收更多的雇农加入集体农庄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提出的最近一年的任务是吸收大约 30 万个雇农家庭加入集体农庄。在这方面需要改变股金积累的做法, 需要加强贫雇农集体化等专项基金。

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但必须在极短期间内予以解决, 以此来改善吸引更多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贫农分子加入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

必须争取进一步加强这些分子的组织性和团结, 提高集体农庄内部贫雇农核心的作用, 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

毫无疑问, 集体农庄内部也存在社会矛盾。这些现象在集体农庄运动初期的低级阶段上特别明显, 在比较高级的阶段上有时也仍然存在。凡是生产资料公有化水平越低, 技术越薄弱, 劳动组织得越差, 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政治工作进行得越不好的集体农庄, 那里的这类现象便越多。

但是, 这与最近有些地方出现的一种说法相去甚远, 即高级形式的集体农庄(例如公社)也正在成为阶级斗争展开的舞台。当然, 认为那里初期有时也还保留着阶级斗争成分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说集体农庄是正在展开的阶级斗争的舞台, 就意味着对农村集体化的复杂过程一窍不通。当然, 对集体农庄里的阶级关系、矛盾成分和阶级斗争可能性的存在估计不足, 那将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在实践中这种机会主义常常表现出来。许多集体农庄庄员自己以为, 他们一跨进集体农庄的门坎, 一切社会矛盾便停止了。这种估计不足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们必须提出十分明确的方针, 既然有这些矛盾存在, 那么集体农庄就将沿

着消除它们的路线前进；既然低级形式有这些社会矛盾，那么在由低级经济技术形式向高级经济技术形式转变的过程中矛盾将会逐渐缓和。随着集体农庄组织程度和机械化的发展，随着公有化过程的深入和扩大，这些社会矛盾的成分将不断减少并最终完全消失。

报纸上报道的关于“红色土壤改良者”³⁰²集体农庄把雇农置于从属地位这样的事实，现在并不是个别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大型集体农庄也会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集体农庄资本主义蜕化变质的可能性并未排除。我们的任务是：同集体农庄资本主义蜕化变质的一切现象，同集体农庄的资本主义办事方法，同各种各样的冒牌集体农庄进行无情的斗争，经常不断和坚韧不拔地克服集体农庄里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坚持真正大公有经济的方针。对那些不履行向国家承担的义务而宁愿把粮食非法卖给外人的集体农庄，也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

现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向党的领导，向地方的特别是农村的党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的任务。

首先，由于实行集体化，我们必须加强地方上的党的领导。在霍皮奥尔把最得力的干部派去领导集体农庄。例如，专区农业局长被派去当一个大公社的主席。这以后会得到百倍的报偿。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大型集体农庄，只有在我们给它们派去严肃认真的得力干部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搞好。在大型集体农庄里应当建立党的支部，这也需要高水平的党的领导。因此，动员干部并对这些干部实行领导，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集体农庄的任务上来是迫切的需要。

共青团应当在集体化事业中起巨大的作用，集体化的工作是共青团最重要的革命义务。

在苏维埃的工作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集体化，特别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从新的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认为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里村苏维埃应当消失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现在这是绝对谈不到的。但在这些地区里，村苏维埃工作的内容无疑在发生变化。集体农庄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感受到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苏维埃的经常领导，应当向苏维埃报告工作。苏维埃应当成为在新的生产基础上发生改变的农村的真正领导者和组织者。依靠大的生产单位，依靠新的公有化农业，村苏维埃必须使自己的工作适应形势的要求和需要，首先为集体农庄的居民服务。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指出工人对集体化表现出的异常兴趣和异常积极性。莫斯科的“阿莫人”³⁰³和其他一些企业（狄那莫、电力输送等）的工人以极大的

兴趣关注着集体农庄并且实际提出怎样帮助、怎样促进这个运动。在农村集体化的基础上,这里正在形成工人阶级同农民交往的新形式。这些交往的新形式表明了无产阶级领导集体农庄运动的愿望和意志。工会的基本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群众对集体农庄建设的这种高度兴趣,正确实行工人阶级对整个集体农庄运动和单个集体农庄的领导。在集体化规模日益扩大,在这一事业存在重大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必须首先加强无产阶级干部的直接领导作用,加强无产阶级对整个运动的领导。同时,应当提高这样一些机关的领导作用,如农业人员委员部,它应当整合、聚集领导集体农庄运动的一切力量,在合作社发展的新阶段给予帮助。这样,农业发展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就将真正得到保障。

主席: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之后)

主席:现在请克利缅科同志发言。

克利缅科:我请求给我 25—30 分钟。

喊声:如果讲得好,还可以加时。

克利缅科:最近一年我们在落实我们的农村政策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民公有化成分的播种面积由 400 万公顷提高到了 1 500 万公顷;代替个别的集体农庄绿洲,我们看到的普遍现象是整村和整区正在转入集体农庄的事实;不单只是贫农,中农也开始走向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生产形式——这一切说明,我们在发展新的公有化农业生产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向大规模集体农业前进”——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只是一个口号,现在这个口号变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的实际纲领。当然,这些成就首先是同我们工业化战线上的成就,同执行向城乡资本主义——富农和耐普曼分子全面进攻的阶级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在决议中,而且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实际工作中坚持贯彻党的总路线的结果。现在,新的合作社生产形式的发展把建设,把在农民田地上有计划建设大规模机械化公共农庄的问题这个中心课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用不着在量的速度方面特别加劲,而主要注意力现在应当转到在农民田地上直接组织,直接建设,有计划建设大规模机械化公共农业生产的问题上来。

我准备谈谈展开机器拖拉机站建设的计划。但是我不得不涉及整个合作社问题和我们工业发展的问题,因为机器拖拉机站不仅是一个发明,而首先是我们

整个合作社运动,特别是合作社高级形式——集体化成就的结果。另一方面,这是坚决加强以工业为形式的农业发展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结果。如果集体农庄是合作社运动的高级形式,那么机器拖拉机站就完全包括在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之中。机器拖拉机站是把高技术用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机器拖拉机站是工人阶级及其国家在组建大规模集体农业方面给予分散的农民直接的组织和技术的帮助的形式。机器拖拉机站完全包括在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之中。它们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发展的结果。

我们以五年计划后四年控制数字主要指标为形式的计划,就在你们在这里领到的小册子里。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这个计划的一些问题。

卡明斯基同志说,最近几年农民经济的机械化应当同利用个体户的农具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机械化农业生产的个别样板将是我们在农业生产机械化方面前景和可能性的缩影。我们计划建立1000个站,拥有20万台拖拉机。机器拖拉机站活动覆盖的地区预计为5500万公顷左右。预计,到1932—1933年度这些拖拉机将直接覆盖4600万公顷耕地和轮作播种面积4000万公顷。按年度计算情况如下:1930年——570万公顷,拖拉机2.5万台;1931年——1580万公顷,拖拉机应为6.8万台;1932年——2930万公顷,拖拉机12.7万台;1933年——4620万公顷,拖拉机20万台。这就是我们所计划的,我们认为可能增加的拖拉机、站和面积的数量。这个数量包括了主要谷物种植地区。乌克兰草原将几乎全部机械化;北高加索主要农业区将几乎全部机械化,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也是一样。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其他州的相当大的面积将被覆盖。另一方面,我们打算把一千个站中二百多个建在集约地区,尽可能全部覆盖甜菜种植地区,即在最近一年内解决制糖工业的原料问题,而且是彻底地解决。第三,我们想根据技术方面的可能大胆地转入棉花种植地区,以便直接参与棉花问题的解决。

总之,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覆盖主要谷物种植地区、几乎全部甜菜种植地区和大部分棉花种植地区。现在我们正在专门调查和制定展开棉花种植地区机械化的技术组织办法。

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而且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确实都是大事,为了完成这些计划,当然需要广泛的动员。要知道,这不仅是20万台拖拉机和不知多少数量的机引农具和零件,而且是数千万个农户。指望用放任自流的办法完成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

必须着重强调头一两年的建设任务。这头几年将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拖拉

机,也缺乏经验。当农民看到我们工作的效益之后,事情会进展得更容易一些。

关于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效益。如果把大田作业的机械化提高到90%—100%,那么,主要谷物种植地区的播种面积将由于开垦荒地、不宜耕种土地、田滕、休闲地、三区轮作地而增加一倍,即扩大将近100%。这种扩大(按计划)将达到61%,因为我们的机械化总共将达到85%,而25%*头几年暂时还得靠使用农民的工具。我们计划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60%——由农业最低限度措施过渡到农业最大限度措施。这样,由于播种面积的扩大,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这个数字没有夸大),我们的总收入和商品率因而就都提高了。如果粮食总产量增加230%,那么商品率就将提高505%。甜菜的商品率将提高450%。这些数字是同一些地区在机械化以前,在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以前和将被机器拖拉机站覆盖以后的比较数字。

如果以50%的商品率为根据统计商品产量,那么我们可以在一个半月期间十分轻松地得到大约10亿普特粮食,而如果再算上实物加工费(占产量的四分之一),那就将有大约15亿普特粮食。从我们打算实现机械化的面积上我们可以不经过任何采购的困难,直接从打谷机上得到粮食,送往我们的国家粮仓。

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我们可以在4600万公顷的面积上完全实现整个大田作物栽培业——土地、劳动和很大部分大田作物产品即粮食部分销售的集体化。在我们将要建站的那些地区,大田作物栽培业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主导的意义。占领了大田作物栽培业的阵地,就能够自由和容易得多地去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于我们的马匹将大大减少,由于我们的播种面积将扩大几乎一倍,由于我们将确定中耕地和牧草栽培应有的正确的轮作制,畜牧业的饲料基地将极大地扩大。以这种饲料基地为基础,我们便有可能使畜牧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畜牧业发展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饲料基地。这往往成为我们畜牧业量的增长的限额。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帮助下,我们会大大地扩大这种限额,我们认为,可以用三四年的时间使牛的饲养量至少增加58%。我们打算把猪的饲养量增加204%,家禽饲养量增加220%。畜牧产品的商品率,按照我们的计算,结果如下:奶——455%,肉——280%,蛋——290%。关于畜牧业的发展规模,我们一方面把饲料基地,另一方面把农村现有的和由于大田作业机械化将部分腾出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整个大田作物的增长将为556%,畜牧业的生长为275%。由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建立,建站地区整个农业生产的商品部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分将提高422%。如果在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已由机器拖拉机站建立的事实本身在组织上、技术上解决了,那么在其他农业生产部门的发展方面,这些部门最初几年不属于实行机械化的范围,将以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初级形式为基础,有时甚至以个体的形式进行发展,那么为了保证这些部门的发展,首先是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的农业合作社,首先是地政机关采取一整套的措施。但是,为了实现大田作物栽培和畜牧业这些在我们看来完全现实的计划,需要广泛地动员起来。我们打算一周之后,最多两周之后把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计划下达到最基层,不仅下达到专区,而且下达到区,让将要建站的专区、州和区的机构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地方机构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之后两个月,这个计划再返回到我们手里。我们将根据地方机构的材料编制建立1000个机器拖拉机站的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并上报政府批准。

1000个机器拖拉机站就意味着给1000个区,给1000个区机构一个清楚和直接的前景。如果他们现在在努力工作,建设集体农庄等等,那么在物质保障方面,在生产本身更完善的组织形式方面,他们还没有清晰和准确的前景。现在,如果我们把1000个机器拖拉机站分配给1000个区,这就意味着给予1000个机构最近几年的工作前景,使它们有可能围绕这些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和非常有效的平常任务把全体农民和工人动员起来。

我们打算根据地方机构的动员情况确定建站的顺序。

有人喊:对。

克利缅科:首先是在农民资金方面,这是首先的,以及在干部准备和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的整个工作准备方面。在改造时期,动员农民的积累并把它们用于集体生产,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事情。这里一定要加强这种促进因素。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不仅涉及全盘集体化的区,它也涉及集体化的专区并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全盘集体化的州。在乌克兰我们将覆盖几乎整个草原,北高加索主要农业地区将被完全覆盖,伏尔加河地区和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因此,在提出专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州的全盘集体化问题的时候,应当让我们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立即讨论如何改变自己的工作,既改变工作方法,也改变力量配置的问题,以便驾驭这个运动,这一规模宏大的建设。当然,为了胜任这整个工作,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因为这里将以新的方式提出土地规划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关于试验、关于农业组织的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关于信贷的问题,因为有机器拖拉机站的地区,信贷显然会有计划地通过机器拖拉机站进行:合同制等。同样为了保证这个计划的实现,我们的生产合作社系统需要进

行改组。生产合作社系统应当根据我们的计划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

畜牧业增长58%将不仅靠自然增长率实现,还需要实行一整套措施,为了使养猪业和养禽业达到需要的规模,我们必须有一整套措施和实际工作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为了实际巩固这些地区的文明轮作制,为了利用三区轮作制的取消等,为此就需要保证轮作需要的种子,包括草种等。

这样,在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情况下,合作社不是被排除在外,相反,是真正参与实现农业改造的社会主义计划。它会真正为自己改造农业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工作计划获得支撑点。这里既有畜圈,又有青贮塔,既有加工企业,又有饲养槽,等等,等等。合作社应当好好地按照计划去做这件事情。

由于机器拖拉机站通过机械化把整个农业生产提高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建设问题正在成为最尖锐的问题。需要最紧急地成立主管建设的专门业务机构——集体农庄建设委员会³⁰⁴。

简短地谈谈干部问题。按照计划,我们将需要各种职业技能的干部,从拖拉机手到站长,需要八十多万人,而且这里将需要数万名从事修理的高技能的无产者:钳工、车工、内燃机专家,等等,等等。

为了在短时间内不仅挑选出这80万人,而且教会他们技能并在以后继续教育他们,需要地方机构做大量的工作和发挥很大的主动性。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乱提口号,而是实际提出使我们的共青团员,特别是农村中的共青团员掌握机器,掌握技术的问题,因为在农业生产中机器是制高点。谁开拖拉机,谁驾驶联合收割机,谁就主宰着生产。

关于我们的红军也是一样。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政治教育、普遍文化水平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就应当向自己提出任务,不让一个红军战士离开军队时没有技术知识,没有起码的技术知识,因为这都是要回到农村去的人。

有人喊:对!

克利緬科:为了得到这些干部,应当把对他们的培训作为群众工作来做,“在掌握农业机器技术”的口号下利用我们现有的一切杠杆。

最后一点意见——关于群众工作。在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情况下,应当把群众工作看作是生产的重要部分,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应当围绕这种生产展开群众工作,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最初,头几年这里贫农、农村贫困阶层的作用将极大地提高,因为由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这些没有农具和农具很少的阶层将获得巨大的优势。现在我们正在签订合同的运动。一切情况汇报表

明,现在贫农、贫困阶层、雇农会亲手把这一事业培育起来。所以应当把群众工作问题作为我们生产工作的重要部分提出来。

我还有很多问题,但已经没有时间了。毫无办法,只好就此结束。

主席:现在请里亚比宁同志发言。

里亚比宁:贫中农的思想情绪发生了向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根本转变,现在这个事实是毫无争议的。如果在这之前农民,特别是中农,对公社、集体农庄等抱怀疑和害怕的态度,那么今年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情绪了。农村贫中农阶层的大多数拥护集体农庄。

有一个场面清晰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中,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因为它十分鲜明地反映了农村广大贫中农阶层的思想情绪。

去年库尔斯克专区希格雷区建立合作社拖拉机站的时候,我们把农民召集起来,向他们说明了建立拖拉机队的目的和任务。农民都默然地听着,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表示担心,困惑不解: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活了一辈子,都是用马,用木犁、铁犁耕地,搞农业,现在突然有人给我们送来了经营计划和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神话一般的土地耕作方法。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错误的意图,这会不会导致更坏的情况?

经过说明以后,有一个贫农站出来:

“农民同志们,我想,我们应该支持党,支持合作社建立村际拖拉机站。我当了一辈子雇农。十月革命给了我土地,我年年得到贷款,给自己买了一匹蹩脚的马,尽管这样,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贫困。马把我吃穷了,我怎么也置办不起农具,无法耕种土地,孩子们穿不暖,吃不饱,尽管有苏维埃政权的帮助,我怎么也无法振兴家业。依我看,结论只有一个:到拖拉机队去,支持它,把这件事情搞好。”

真的,这个区的农民支持建立拖拉机队,同拖拉机队签订了合同并开始展开工作。这个拖拉机队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一场最彻底的革命。第一,现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学校和培训班,每年冬天在那里培训100个拖拉机手,还有一个修理厂,它不仅为拖拉机队修理农具,也为尚未加入拖拉机站的周围的农民修理农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拖拉机学校现在设在从前的一座修道院里,所以我们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主管宗教事务的同志们³⁰⁵不要因为我们占了修道院而特别责骂我们。农民并不怎么为修道院惋惜,现在整个这座修道院具有大型农业机器中心的外观。人们从前在里面祈祷上帝的修道院本身现在改成了工厂—学校,修女的宿舍改成了工作人员的宿舍,那里的一切旧东西全都被清除了。此

外,在实行农田和土地全部耕作公有化和从打谷机上把所有余粮上缴的同时,秋天我们正在区里建立一个300公顷的公共果园、一个公共菜园,公共养禽业、畜牧业等都在发展。

彼得罗夫斯基:就是说,修道院派上了用场。

里亚比宁:我认为,我们所有的那些修道院,对我们都会有用处的。

彼得罗夫斯基:您在深化问题。

里亚比宁:除了这个场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得出农民根本改变了的结论。如果拿中央黑土地带州的资料为例,那么我们曾计划以集体农庄运动5%的覆盖率代替先前的2%。实际上,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我们成功地使集体农庄运动的覆盖率达到8%。值得注意的是,集体农庄不仅数量上在增加,而且质量上在巩固。例如,现在我们中央黑土地带州共有200个土地面积从500到2000多公顷不等的大型集体农庄。这200个大型集体农庄共占有土地36万公顷。我们有四个全盘集体化的区。我想,这两年这些区里的贫中农群众将全部集体化。在利戈夫专区,工作已经展开。在三个区里,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对农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90%。当然,为了这一成绩,应当向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表示我们中央黑土地带州的感谢,因为莫斯科索科利尼基区对利戈夫专区和罗索希专区进行了对口义务支援。他们往那里派遣了很多人员,开展了很好的群众政治和文化工作。现在我们推动了同莫斯科河南区义务支援组织的联系,它们负责义务支援我们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专区。现在我们正在同列宁格勒人商谈,但他们暂时仅限于口头许诺,事情进展不很顺利,因为,据他们说,他们在为自己的州服务。我认为,像列宁格勒这样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绝对不能也不应当只局限在自己的州里。应当把它们同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影响难以实现的中央黑土地带州、中伏尔加州和其他州的农民联系起来。

今年我们已经有17个机器拖拉机站在工作,但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保证这17个合作社拖拉机站拖拉机供应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拖拉机站工作了一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当我们对农民说,也许应当把拖拉机站挪到别的区里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会把拖拉机站给别人。实际上,我们的拖拉机全都是旧的,是我们从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³⁰⁶和小型集体农庄里收集起来并加以利用的。部分拖拉机已经要报废了,为了替换这些不能用的拖拉机,我们必须进口,但给我们的进口数量太少。所以我们不得不缩小这些村际拖拉机站并因而不能履行与农民签订的合同和限制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莫洛托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你们工作得不好。

里亚比宁：也许是我们工作得不好，莫洛托夫同志，我们不会自夸。但要知道，我们州里不生产拖拉机，你们不愿意在我们那里建一个拖拉机厂。所以，为了巩固现有的已经工作了一年的17个村际合作社拖拉机站，我们请求给我们必要数量的拖拉机，这些拖机会巩固这些村际拖拉机站并保证它们进一步覆盖这些区的所有村庄。

认为整个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困难，没有任何阻碍，没有富农的反抗，没有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开展的，这样想就完全不对了。整个这项工作是在困难极大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农进行了疯狂的反抗，使用了一切斗争手段：贿赂、灌酒、恫吓、恐怖、暗杀、放火、破坏机器、毁坏庄稼等等，总之，使用了他们能够和可能使用的一切手段。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组织农村里最落后、最黑暗和有反革命思想的分子干这些事情。

当现在有人提出应当放弃采用非常措施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些农村实际工作者觉得，这是非常奇怪和荒唐的。党现在放弃对富农采用非常措施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当富农为了破坏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使用一切手段的时候，怎么能放弃对他们采用非常措施呢。不能把事情想象成这样，认为富农只是在粮食收购战线上进行反抗。这不算什么。现在富农进行的主要的、根本的反抗不是在粮食收购战线上，而恰恰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线上，因为他们眼看着自己得以剥削贫中农户的基础正在被从脚下抽掉。

这就是同富农斗争的根本和主要之点。

提纲对围绕地方集体农庄建设同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斗争的必要性重视强调得不够。我不了解别的州怎么样，但我们这里有这样典型的事例，不只是个别党员，而且整个支部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进行反对集体农庄的宣传鼓动并顺便援引说，集体农庄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说这是比你们和我们都聪明的人讲的，接着便开始引用布哈林、李可夫等同志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我们在村庄里共有9650名同农业有关的共产党员，而在集体农庄里只有2770名共产党员，这是我们采取一切措施才做到的。现在促进集体农庄运动迅速发展和集体农庄巩固的主要事情就是实行机器化。卡明斯基同志说得完全正确，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机器和拖拉机供应，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集体农庄变成大型农业生产联合体，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产品。机器供应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中央黑土地带州使用拖拉机的集体农庄的比例在逐年减少。运来的拖拉机甚至远远满足不了大型集体农庄

的全部需求,我就不说现有的那些小集体农庄了。

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在建立村际拖拉机站时所制定的拖拉机供应方案是绝对不能令我们满意的。我们中央黑土地带州 220 万农户中的 80 万户没有任何耕畜。种地 2 俄亩以下的有 42 万户,种地 2 至 4 俄亩的有 80 万户。所有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大量的农户没有任何耕畜,大量的农户都是分散的规模极小的经济单位,要在这种分散的基础上振兴农业是完全不可能的。

(主席摇铃)

我想请求再给我这个头一次发言的普通干部五分钟时间。

关于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我应当说,我们认为,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仍然在实际上实行他们的理论:“骑着牛奔社会主义”。在整个革命期间,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只给集中了全部制糖工业并划出 32 万公顷土地给制糖厂国营农场的中央黑土地带州运来了 90 台拖拉机,而且还是最后一年才增加到 90 台的,而在这之前还不到 60 台。

有人喊:他们也太落后了。不早一点给。

里亚比宁:结果怎样呢?当党的州委逼迫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这样说:“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不准许我们进口”,把过失推给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我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准许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为什么准许区粮食农业合作社联社和为什么不准许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我觉得,在这里把过失推给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党的州委员会给政治局发去一份电报,说我们希望在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国营农场周围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并请求由制糖工业系统运送 900 台拖拉机给中央黑土地带州。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甜菜的情况又怎样呢?今年我们本应当让三个糖厂暂时停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实行的不是农业工业化的口号,而是“骑着牛奔社会主义”的理论。

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同志们,你们是在假装阔佬:我们才是工业的主人,是我们给俄罗斯联邦甜菜生产合作社联社钱的。关我们什么事?你们的事是生产甜菜。全俄甜菜生产合作社联社把种植甜菜的希望押在个体种植户身上。他们没有认真地、充分地提出围绕甜菜建立集体农庄的问题。此外,在全俄甜菜生产合作社联社和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工作中应当注意发展畜牧业。糖厂和国营农场是什么呢?这不是除了糖什么都不能生产的企业,这是可以利

用甜菜加工的全部废料发展畜牧业的企业。现在大量的饲料都在毁掉,在糖厂周围,在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国营农场周围没有搞任何畜牧业。所以我们认为,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这方面的政策是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的,完全没有顾及党在农业改造方面提出的各项任务。他们在占据土地面积和把糖厂周围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时候,只是从自己狭窄任务的角度对待这件事情。

简单地谈谈对集体农庄的领导。我觉得,把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埋葬掉然后再夸奖它会更好一些。提纲却相反:先夸奖了一番,然后说,我们要把你埋葬。我们实际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央和州的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中间性的组织,它的指示对谁都没有约束力,它没有影响农业合作社的任何办法和手段,它事实上不会带来实际利益,是一个多余的环节。以我们的意见,提出取消或者改组中央和州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把更大权力集中到集体农庄联合会问题的时刻到了。与此同时,应当根本改组地政机关和改变它们的时机成熟了。我们赞成建立区集体农庄管理中心,使区里的全体农艺师归这些中心管辖。我们的地政机关,特别是地方上的地政机关落在了后面,怎么也开展不了工作,现在实际上置身于集体农庄工作之外。应当根本改变这种状况。

最后一点是党的领导。不能让党的领导保持先前的样子。当农业正在大发展,当以合作社集体农庄联社为形式的农民组织纷纷建立,当农民正在转向社会化合作生产的时候,怎么能够认为我们可以像先前那样进行领导呢?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情况怎样呢?在已经有大型集体农庄的区里,我们却没有领工资的党的工作者。在任何一个全部生产不值几个钱的小工厂里,那里都有领工资的书记,而在一个有将近4万农民,在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在群众工作已经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区里,由于没有群众工作,没有对贫农的工作,富农利用一切可能向集体农庄进攻,因为在那里我们没有领工资的党的工作者,在那里我们没有以支部书记为代表的好的领导者,在那里我们没有区党委的指导员。这个关于党的经常的领导,关于以在农村地区,在农村生活也能有保障的领导干部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一点在决议中提得太一般化。应当使它具体化,应当这样论述,以便有一个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工作者和党的领导网络的清楚明确的方针。

整个说来,我们现在的提纲充分阐明了农村中围绕集体农庄运动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正确前景。

主席:现在请贝京同志发言。

北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当托洛茨基分子躲避风头,在那里重新估价雾月政变,当右倾分子呆在政治局里反对执行党的总路线,在一切实际问题上进行阻挠(这一点莫洛托夫同志昨天讲过了),当布哈林的追随者在外国捣毁我们共产国际支部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是把国家带向雾月政变,带向经济崩溃和灭亡,而是像伊里奇 1922 年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³⁰⁷带领国家向前迈进,带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农民一道以我们过去梦想不到的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尽管第一个问题已经结束,请允许我再次提出一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们就得向群众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右倾分子抛出的新声明的问题,而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与为完成我国集体化计划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卡明斯基同志今天所说的并已写入党中央提纲的速度、我们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和复杂困难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需要极大地鼓足干劲和最广泛地动员群众,需要有一个统一、坚定、以列宁的方式进行领导和带领这些群众前进的领导班子。因此,如果一年前,甚至稍微晚一些,在第十六次党的代表会议批准五年计划的时候,集体化的发展速度必须保证我们到五年计划末尾能从公有化成分获得 43% 的商品粮,而今天通过的今年农业公有化成分增长的控制数字在商品率、播种面积、集体化农户数量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方面都完全超过了它们,那么,这一切说明,列宁 1922 年即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的设想已经开始全面实现。因此,必须最坚决地反对最后声明的作者,这份声明将如谢尔戈同志所说的以欺诈的声明载入我们党的历史,因为这些人想开脱自己,既不同自己的错误,也不同自己的尾巴,不同那些跟着他们走的人决裂。要知道,跟在他们后面的不仅有布哈林同志学派的编外副教授³⁰⁸,不仅有他们在共产国际里的追随者,外国党的一些个别的、不坚定的、带有社会民主党气味的代表,而且还有一条我们工厂企业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大尾巴,一条很大很大的尾巴,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级敌人,向我们提出这份声明的同志就是他们的喉舌。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彼得罗夫斯基同志错了,而且谈论爱和忠诚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也错了。党不喜欢那些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袖,党喜欢那些进攻时走在群众前面并带领他们投入战斗的领袖。当我们在集体化方面与我们整个经济改组和社会改造方面面临着如此宏伟任务的时候,应当让党的脊梁坚强,应当让路线清楚、明确,应当是阶级的路线。因此,尽管全会至今十分希望不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但这并未产生任何结果。既然至今没有别的声明,就应当明确地提出组织结论的问题,以便让群众了解,在解决基本问题和社会主义措施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出并强调同右倾分子斗争的问题,因为只有反对右倾分子的

斗争中这些措施才能够实行。不可能不这样提出问题。声明的本质说明,这些同志现阶段仍在张皇失措,说明今后的前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们过去一直存在着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现在继续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仍然没感觉到,没听见群众的呼声,也没看见党和工人阶级已经做到的一切。既然非常措施问题是声明的核心,是贯穿整篇声明的红线,那我们每个人就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他们害怕,他们不相信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工厂的一些支部,一些个别共产党员还存着恐惧心理、缺乏信心,也有看不见前途的分子。这方面还需要进行很多工作,以便表明和证明,我们现在和将来怎样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些同志不理解非常措施的实质,他们说,他们的方法更正确,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认为,整篇声明的本质就在这三行文字之中。这一点昨天还不完全清楚。这就是第四页的前三行:“我们认为,如果采用我们在四月全会上提出的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方法,我们就会通过痛苦较少的途径获得所期望的结果。”这是整篇声明的本质。要知道,中央在实行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方面在继续前进,要知道,党中央是第一次在新的地区推行这些措施。要知道,今年是第一次在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带进行粮食收购。只是今年我们那里才开始用南部的办法进行粮食收购。这些同志不懂得粮食收购、粮食收购方法、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与开展集体化的联系和关系。中农应当亲眼看到我们对富农采取的那些措施,如把粮食收购计划下达到富农户等。中农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应当向哪个方向走。他们看见党的总路线,看见自己面前摆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看见无产阶级专政是帮助贫农和他们,而压迫富农的。一方面,他们看见集体化,看见党在通过集体化帮助他们,使他们有可能无可限量地发展,而另一方面,他们看见对富农的进逼。他们对这一些很容易接受,理解了便纷纷涌向集体化。要是你们看一看最近一年我们粮食不能自给地带的农村,它们变得更像南部的农村了,具有了更多的阶级色彩,背景变得不同了,因为此前存在的分化变得更为突出,贫农和中农对自己面前的富农看得更清楚了。在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带,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养活和喂肥富农。要知道,粮食不能自给地带不仅消费粮食,而且除了工业品之外还生产亚麻、牛奶等。过去富农用亚麻和其他农产品换取金钱、布匹和粮食。他们用这些粮食投机。今年我们头一次来到他们家里,拿走了粮食。现在亚麻收购时还给他们粮食,这是不必要的和不对的。应当停止这种做法。但是进攻在扩大。这一点是右倾的同志们所不明白的,他们不明白向富农进攻的问题同集体化问题的联系。

我想谈谈有关我们州集体化发展的实际问题。如果你们看一看中央全会前

出版的中央统计局的最后一本小册子《苏联农村的集体化》³⁰⁹,那么粮食不能自给地带的各个州都落在了集体化的后面。我们伊万诺沃这个工业州只有1%的集体农庄,莫斯科州有1.8%,西北部州好像有0.9%。诚然,这些数字有点过时了,是4月1日前的数字,最近一年进行的集体化在我们各个区里也实现了大跃进。但我应当说,大家对这个问题给予的重视不够,卡明斯基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也没有好好论述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得解决我们亚麻厂的原料问题。由于我们的纺织厂棉花原料缺乏,亚麻问题今天非常尖锐地摆在并将继续摆在党的面前。粮食不能自给地带的各个区也应当帮助党中央解决这些工厂的原料问题,解决从国外进口棉花的问题。要知道,如果加速实现亚麻种植地区的集体化,就可以靠出口亚麻多进口一些棉花。然而,请看一看应当促进亚麻种植户集体化事业的主要支柱——国营亚麻农场吧。国营亚麻农场已经开始组建,但事情几乎原地未动。我们只限于得把一些小集体农庄里的拖拉机拿来去翻耕我们雅罗斯拉夫尔专区柳比姆大国营农场的荒地。这说明,问题提得不全面。没有提出国营亚麻农场的问题,没有提出下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雷宾斯克、伊万诺沃这些主要地区的亚麻集体农庄的问题,以便真正地解决原料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

最近一年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实际工资问题。应当给这些州任务,让它们帮助党把事情办好,以便落实中央全会提出的提高实际工资的数额。我们这些州必须有更多的肉、牛奶、蔬菜和油脂。应当让国营亚麻农场和奶牛场确实办得像党的任务所要求的那样,应当在今年向我们提供无论在集体化方面还是在国营农场方面我们几乎至今没有得到数量更多的拖拉机,以便一两年之后能够解决油脂、牛奶和肉的问题。从我们这里拿走油脂和肉,但数量很少,不够。

我们这些区的主要问题是单位面积产量低。比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同大型集体农庄里的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党中央委员会不以对谷物种植地区那样的角度向这些地区提出问题,这种新技术才有可能到来。粮食问题今年或一年之后将得到解决,现在就需要改变工作方式,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今天就应当提出原料问题、经济作物问题、这些区能够提供的追加畜牧业产品的问题。不这样做,党作出的决定就难以贯彻执行。

我想提的和提纲中只字未提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机器运输的问题。现在就应当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提纲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了道路建设,但关于运输只字未提。以后提就晚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干部的问题。我在自己的实践中确信,应当怎样解决干部问题,没有工人是无法领导集体农庄的。我们有过一件事,一名想在集体农庄里实行纪律的工人司机被指控为反革命。这件事发生在波舍霍尼耶-沃洛达尔斯克区。一个铁路工人被派去当集体农庄主席,他早晨6点就开始把人叫醒,于是大家便开始叫嚷,这是剥削,他是在折磨集体农庄庄员,便指控他是反革命。卡明斯基所说的那种自发势力应当加以改造。应当坚定地提出问题,让集体农庄里的人明白,他们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必须去挣这台拖拉机,这就要求派去能够领导集体农庄运动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力量。

主席:现在请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我敢于就这个问题发言,是因为集体化运动在乌克兰已经开始并集中于建立我曾在其中工作过的乌克兰贫农委员会,而不是因为我是集体化运动的专家,我更愿意向集体化运动的专家同志们提出一些实际问题,以便找到我在提纲中没有找到的如何实际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途径。乌克兰共产党组织同集体化运动这个贫农的社会主义问题有关系,是早在1922年开始的。克利缅科同志那时在自己的报告中声明,对乌克兰贫农来说,集体化运动的形式不仅是摆脱贫困、振兴农业的需要,而且也是同富农进行最坚决斗争的需要。当然,只是现在,有了我们党的措施,集体化的浪潮才发展到这样的规模,需要十分认真地予以对待,以便将这个运动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这个运动表明,害怕这个运动的右倾的同志们的论点是何等的错误。我记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建议托姆斯基同志去合作社工作³¹⁰。他当时声称:当把人强制赶到这个合作社去的时候,我怎么能在那里工作。当时托姆斯基同志没有想到,他的工会组织向工人提出的强硬的无产阶级纪律多得多,在工会之外工人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当然是离开工会他们找不到工作。托姆斯基同志不明白,我们应当把这种无产阶级纪律逐渐引入集体农庄,以便在那里形成工业无产阶级的纪律。

现在这个集体化运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发展,需要像卡明斯基和克利缅科同志所说的那样予以最严肃和最认真的对待。同志们,应当老实说,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以经济观点看待集体化运动,没有一个预计使新建立的集体农庄能于近期获得更大收益的计划。卡明斯基同志举了“十月”集体农庄生产机构的例子,指出工作安排良好并顺便说,那里还存在着只顾眼前的倾向。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卡明斯基和克利缅科同志领导的这样的机构应当承担起消除集体农庄中只顾眼前倾向的责任。因此,应当以更实际的打算对待建立集体农庄的问题。卡明斯基同志说,应当支持集体农庄拥有拖拉机,我们当然都赞成这

样做,但是,如果您只把自己的主要支点放在这件事上,那就只好长久等待着给我们所有的集体农庄拖拉机了。能不能把我们的工作这样改变一下,不仅仅是以拖拉机为中心建立集体农庄,而是以为实现集体化而应该建立的那些大的小的马力和牛力站把集体农庄建立起来。其次,提纲也没有指出,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在我们几个州里得到很大发展的独家农场和独立农庄。

卡明斯基同志没说,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边境州。请看一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田地,那里集体化运动很差,空空如也,而我们应当更有力地以社会主义建设巩固这些边境地带,因为在这些地带主要的敌人——波兰资产阶级在进攻的时候总能支持较长的时间。

有人喊:对。

彼得罗夫斯基:问题就在这里。那里贫农很多,无论如何得把我们党的工作的有觉悟的部分派到那里去。

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里亚比宁同志已经谈过的问题。你们是怎样提出同富农斗争问题的呢?对兴起的集体化运动应当全力予以支持。但是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加入集体农庄的倾向发展了,他们钻进集体农庄,以集体农庄为掩护,利用集体农庄并瓦解它们。同时,富农大力展开宣传鼓动说,共产党员给你们建立集体农庄是为了奴役农民。可这一点在我们提纲里论证得不够。应当尽可能把它加工得好一些。当一个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认为自己必须把马、奶牛甚至农具卖掉,提纲里也没有指出这种倾向,而在我们的工作中应预见到这样的现象,使它们在集体化发展的战线上少带来损害。

其次,要是在提纲里加上说明各个地区集体农庄发展史的数字材料就好了。所以需要这样做,是为了不仅在附图上有这些数据,而且是为了速记记录里也有这些数据,当全会记录下发以后,各地能够看到这些数据,以便使集体农庄少的地方,集体农庄比例小的地方尽可能好地把工作搞上去。

主席:现在闭会。宣布休息到晚上6点钟。

第九次会议

11月14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请安采洛维奇同志发言。

安采洛维奇³¹¹:集体农庄运动最近达到的那种极大规模最令人信服地说明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生活不仅证明了党在直接的合作社、集体农庄建设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性。为了使我们得到农民,特别是中农这种大规模参加集体农庄的局面,曾经需要正确进行粮食收购,实行信贷、土地及其他政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这就是党的政策的最好的结果及其正确性的总结。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右倾的思想和实践,机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曾经是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最大障碍。布哈林同志及其同道为首的思想无论如何也与右倾实践划不清界限。他们为安慰亡灵而创造理论,而实际工作者为安慰亡灵而进行工作。一些人从理论上论证机会主义,而另一些人按这种精神行事。我们举阿斯特拉罕案件为例,那里面有过多许多阶级歪曲现象,特别是在渔场对富农斗争方面。再举斯摩棱斯克案件³¹²和其他地区。理论家在中央概括出的东西,实际工作者就在地方上贯彻实行。应当说,右倾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走在右倾理论的前面。而在全会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听见来自地方的代表们谈论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谈论地方工作中的重大的政治的阶级歪曲。而依我看来,应当用斯摩棱斯克案件和阿斯特拉罕案件的教训,用乌克兰、北高加索、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许多阶级歪曲的教训教育党员,警告和指出,不应当怎样工作。如果对党最近时期所做的全部工作,包括清党³¹³、农村粮食收购进行总结,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进行总结,那每一个人都会看见,所有这些工作恰恰都是打击这些不良社会现象的,都是打击农村一部分党组织的具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分子,打击实践中的右倾的。同志们,这一切说明,不与右倾分子所表现和表述的在理论上偏离列宁主义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斗争,不在实践中克服右的和其他的倾向,我们就不可能展开集体农庄运动应有的速度,也就不可能

像我们整个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加强国营农场建设。集体化问题——这是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这也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问题。遗憾的是,在决议里国营农场在某种程度上被挂了起来,而在报告里它们甚至完全被挂起来,即在报告里甚至没有阐明国营农场建设的任务。

有人喊:那在副报告里呢?

安采洛维奇:没有副报告,但应当提请全会注意,我们甚至至今没有在全联盟范围内发展国营农场的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有一些共和国的初步设想,但并非处处都有,而且它们都是用手工业方式制定的,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

最后,是否可以用我们对待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例如对待我们的工业的办法对待国营农场的建设。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以便让大家都最终了解,五年计划期间国营农场建设将在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速度在农业一些部门展开。

国营农场建设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有一个共同任务的两个方面:国营农场是生产粮食、肉类、原料的机器化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国营农场是对周围农民进行无产阶级影响的手段,是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经济实行大规模集体化事业中的战斗杠杆。

在许多地区可以不必建立独立的机器拖拉机站,而以国营农场为基地,用最少的力量、资金和干部办这件事情,例如像“小村庄”国营农场等所做的那样。我提请全会注意,我们仍在把过多的外汇花费在农业原料上,大概有3亿多金卢布。用于购买羊毛、棉花、许多其他原料经济作物、茶叶、橡胶的外汇支出总共为3.5亿多外汇卢布。我们是否有可能于最近几年减少国外的这些花费和在国内安排这些作物的生产呢?我肯定地说,有这种可能性。例如,不仅是棉花生产,关于这一点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³¹⁴,而且还有其他经济作物包括亚热带作物,以及羊毛、皮革等的生产,我们可以做到比此前更大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可能在国营农场里发展这些作物的生产,但是,同志们,为此我们首先应当在这方面转换很多官吏、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党的工作者和工会工作人员的脑筋,使他们终于明瞭,国营农场建设具有怎样的意义。这种态度,特别是在合作社工作人员中间,经常可以看到。

有人喊:啊呀!

安采洛维奇:是的,是的,让他们出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反国营农场的情绪、对国营农场建设的作用和意义的理解至今在这些人中间相当强烈地存在着。

有人喊:什么人?

安采洛维奇：在合作社的、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中间。例如，当我们讨论建立机器拖拉机站计划的时候，一些合作社工作人员竟然开口说：“我们还得想一想，是否应当收缩国营农场的建设并以此展开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同志只是不懂得党在国营农场建设方面的政策，继续抹杀国营农场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特殊意义和主导作用。

在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方面，把资金投放到哪里（在资金普遍短缺的情况下）和首先用在什么地方更为合理的问题并非总是经过周密的考虑。例如，就拿格鲁吉亚来说吧，那里计划搞7万公顷茶叶种植园，大概的比例是：集体农庄占70%，国营农场占15%—16%，个体户占14%（这里我可加或减1%—2%）。应当知道，一公顷茶园，据专家说，需要400个工作日。格鲁吉亚和阿扎尔斯坦的茶园主要靠雇工的劳动经营。这往往只是名义上的集体农庄，而实际上是假集体农庄。我认为，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我寄很大希望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它大概不久就会组建起来）应当考虑，是否需要首先通过组建新的国营农场和扩大老国营农场的面积更大地发展茶叶生产。我们应该结束花费外汇去购买茶叶、棉花、羊毛的情况，而为此就应当大力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在这些国营农场的周围，我们必须利用大国营农场的机器技术、电气化和化学的最新成就，广泛展开集体农庄建设。不必说老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对此还重视不够），组建新的国营农场在许多农业州里面尚未仔细研究。

在粮食问题方面，国营农场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现有的可能性还远未充分利用，而至于经济作物、工业原料，以及畜牧业、蔬菜种植业、乳品业，国营农场建设在这方面尚处在萌芽状态。通过组建新的国营农场和加强老的国营农场来解决这些任务还完全在于将来。

在农业各个领域真正展开国营农场扩大千百万公顷新占土地范围的速度，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首要任务之一。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当好好地仔细研究展开国营农场建设的五年计划。应当说，我们不能不把对国营农场建设的估计不足看作是右倾的表现，这种估计不足不仅表现在例如右倾分子的政纲里、声明里，而且表现在苏维埃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实践里、活动中。

卡明斯基同志报告的缺点之一是，他对集体农庄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阐述得不够充分。在集体农庄内部和围绕着集体农庄正在进行怎样的斗争？对于集体农庄发展的现阶段哪些过程在阶级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应当与哪些倾向进行斗争？在集体农庄运动中什么是重要的和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支持的？报告很有意义，内容丰富，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报告里对集体农庄的社会成分未给予

足够的重视。在集体农庄里也有资本主义倾向。应当以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去战胜这些倾向,战胜富农分子的影响。这些倾向我和丘茨卡耶夫同志曾经在例如克里米亚看到过³¹⁵。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来自地方的同志对此应当给予更多的注意。中农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越强劲,保证工人阶级对这个群众运动的经常性的领导就越加重要。有人说,在我们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和个体户对待市场的态度没有原则的不同,说这种话的那些人当然是不对的。显然,这经不起批评。但同时不应当把集体农庄,特别是初级的、小型的集体农庄的现状理想化。不应当抹杀现阶段大多数集体农庄技术水平还很低,应当现实地考虑集体农庄在其中发展的农村的情况。我在克里米亚北部进行粮食收购工作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如果不往那里派几百名共产党员,那就未必能轻易地从集体农庄得到全部的商品粮。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在我们的集体农庄里一般没有党支部。如果以集体农庄大田作业、畜牧业和蔬菜栽培业的全部从业劳力为100,那么雇工大约占三分之一。例如在克里米亚的集体农庄,甚至公社里,雇工在一些经济部门占大约三分之一。我不打算用这一数字吓唬任何人,我自己,如你们看到的,也没被它吓坏。在正确的领导下,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会克服这些倾向。但是现在就应当注意这些倾向,也应当注意出租土地的做法和使用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剥削。这也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卡明斯基同志在总结发言里会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

卡明斯基:如果有时间的话。

安采洛维奇:对这应当给予时间。

不仅在克里米亚,而且在其他地区我们看到大致同样的情景。在集体农庄里,一年期间对雇工和日工的使用,毫不夸大地说,不是以数万计,而是以数十万计。同时不能不指出,雇工大都是雇农,他们在集体农庄里的生活一般不比在富农那里好。

彼得罗夫斯基:是吗?

安采洛维奇:说的不是集体农庄庄员,而是在集体农庄干活的雇工。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了解布里塔内发生的事情,他的惊奇使我感到惊奇。不错,布里塔内那里不是集体农庄,而是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但是这一切是在农业合作社的招牌下发生的。布里塔内是得到苏维埃信贷机关贷款的合作社。

扎东斯基:真的吗?!

安采洛维奇:您的惊奇也使我感到惊奇,扎东斯基同志。我原没打算谈布里塔内的富农“合作社”窝巢,但为了不时之需我带来了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说明,

富农怎样常常在合作社的招牌下欺骗我们。

卡明斯基同志说得对,不能人为地把合作社与集体农庄分开或者相反。他说,应当在辩证的发展中看待事物。

他说,应当注意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转变的趋势。而我们在布里塔内看到的情况怎样呢?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将举其他地区的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是怎样帮助这种转变的。例如,在敖德萨灌溉的田地上,合作社通常是用下列方式组建的:富农雇主,5—10公顷水浇菜地承租人,招来10—15个不识字雇工,教会他们签字,再到敖德萨去与公证人签订组建合作社的合同。在敖德萨周围的这类合作社里曾经有几百名雇工干活。他们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每人只得到30戈比的报酬。许多这种“合作社”已经被男女雇工的罢工消灭了。这些罢工是在工会的直接领导和在党组织总的领导下进行的。乌共(布)中央曾经讨论过富农农场里这些罢工的总结并对在剥削者农场里保护雇工利益的这种方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³¹⁶。各地都应当注意“富农的圈套”;富农善于在形式上把雇工变成合作社社员、集体农庄庄员,而实际上还保持着原先在合作社、集体农庄之外的那种阶级关系,即善于用合作社,时常还用集体农庄的招牌掩盖最粗暴、野蛮的剥削。

卡明斯基:那是什么集体农庄?菜农的劳动组合,这不是集体农庄。

安采洛维奇:卡明斯基同志,当你说7.8万个集体农庄的时候,你把最初级的形式也包括在里面了。不能搞两本账:7.8万里也包括共耕社等。难道不是这样吗?而当提出富农钻入这些合作社,常常把它们变成假集体农庄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说:“这算什么集体农庄!”要知道,7.8万这个数目里也包括一些专业的、土壤改良及其他的合作社……

卡明斯基:这不对。

安采洛维奇:那些生产资料和播种面积没有完全公有化的合作社。

卡明斯基:没有完全公有化——这是另一回事。

安采洛维奇:喏,这是主要的,在集体农庄的评定中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是主要的。我觉得,听了关于集体化的报告之后,我们应当对整个农业合作社这方面的活动进行总结。

由于这个缘故,请允许我多少谈谈布里塔内那边的情况。1929年,拥有600—700公顷葡萄园的47—50个富农,每户一年平均收入1.5万—2万卢布,——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这些富农为自己建造了非常漂亮的房屋,简直就是宫殿式的地主庄园。

柯秀尔:这是旧时代建造的。

安采洛维奇:不,这既有旧时代的也有新时代的。我的时间很少。我本可以对生产合作社的这些成员进行逐个描述。这是富农或者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地主的非常富有特点的形象。

柯秀尔:这不是生产合作社。

安采洛维奇:那好吧,这是专业葡萄种植合作社。

柯秀尔:不对,不对,别瞎编了。

安采洛维奇:那里有那么一个人,名字叫贝格……

柯秀尔:不是贝格,而是别尔捷。

安采洛维奇:柯秀尔同志甚至听说过他,知道这个富农。

柯秀尔:怎么会不知道。

安采洛维奇:这个别尔捷有47公顷葡萄园,一年缴税5万多卢布。

柯秀尔:那里不全是葡萄园,那里也有准备用做葡萄园的土地。

安采洛维奇:有人告诉我,就是这个别尔捷就在一年前曾经当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酿酒工业协会副主席。

这一切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农村生产合作化发展的现阶段就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在农业合作社中的影响,大力加强无产阶级对集体农庄的领导。也应当严肃地提出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干部的政治教育问题。在合作社社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党员中间,我们看到传播相当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的、右倾的情绪及其在他们工作实践中的表现。例如,不久前通过的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党团委员会关于果品蔬菜、烟草及其他合作社联社的决定完全证实了这些论点。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党团委员会谴责一些专业合作社联社的政治路线和右倾实践并指出,这种实践培育出了富农剥削雇农和贫农的独特的烟草和菜园的花束。因此,在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运动的现阶段,突出强调把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中贫雇农组织起来的问题尤为重要。

令我感到惊奇的还有,报告人为什么不谈例如在集体农庄的某些环节上建立贫雇农小组的问题。

卡明斯基:这一点我谈得已经足够了。

安采洛维奇:卡明斯基同志,关于这个问题说几句话是不够的。对这项任务应当集中更多的注意。

卡明斯基:这取决于性格。

安采洛维奇:与其说取决于性格,不如说取决于态度。在农村阶级斗争十分

尖锐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本应当在你强调商品率问题的同时予以强调。应当懂得,只有我们不再有例如我在克里米亚看到的那种现象,集体农庄商品率才能用相应的方法真正地搞上去和提高起来。有这么一个集体农庄:里面的六户拥有大约150公顷播种面积。对于克里米亚来说,这不是一个小农庄。联合起来的这六户中一户是过去的管家,另一户是神父的儿子,第三户是过去的投机商人,接下去是为了进行掩盖吸收一户贫农和两户殷实的富裕中农。有些集体农庄的成分往往就是这样。

阿尔秋希娜:这核实过吗?

安采洛维奇:是的,核实过。我说的是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区的集体农庄:它像其他集体农庄一样得到贷款,如果情况不是更好的话。应当更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理解的集体农庄是什么,卡明斯基同志。否则就会令人看到一种愿望,把什么都叫作集体农庄,用集体农庄制度包括一切,包括所有最初形式的,甚至以插犏³¹⁷为基础的合作社,而实际上因为这一切受损失的和无人照管的正是大型集体农庄。

因此我要说,库比亚克同志说的基本上是对的,不应当分散使用拖拉机,而应当在拖拉机供应中把重点放在大型和特大型集体农庄,即把机器首先供给我们拥有大规模生产合作化的地方。把拖拉机按一两台平均分配是不适当的,需要把它们成批成队地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大型集体农庄里,而首先是国营农场里。集体农庄运动领导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大型集体农庄、公社实际上常常处于后娘手里的孩子无人照看的状况。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现在由于机器拖拉机站管理中心的建立正在摆脱困境。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机构明显不能胜任组织集体农庄生产和劳动的任务。就拿对国营农场的日常服务来说吧,不管它怎样糟糕,但仍然比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系统对大集体农庄的服务要好。对地方和中央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各种组织形式应当从首先保证对大型集体农庄的最佳领导、供应、支持和巩固的角度去看待。这应当在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本身的工作内容、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中得到表现。如果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将分散精力什么都抓,而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精力、资金和领导集中于大型集体农庄,那以后会产生重大的危害。

我们有党关于1929—1930年度最少吸收30万男女雇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决定³¹⁸。实现这一任务不仅要求农业和林业工人工会³¹⁹作出决议,而且要求它在日常工作中作出明确的努力,要求合作社的、党的和苏维埃的机构坚决改革工作方法和加强吸收雇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工作。现在要求对这项任务采取完全不同

的态度,首先是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本身。要知道,这样实际上就提出了一项通过吸收数十万男女雇农参加来加强无产阶级在集体农庄里的影响的任务。实际上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其他合作社管理中心至今对这一任务重视得很不够。例如,有一个杂志叫《集体农庄庄员》³²⁰。但是除了与“红色土壤改良者”集体农庄有关的一个情况之外,你们在这个杂志里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吸收雇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意义、方法和总结的文章。地方上和中央的集体农庄工作者对雇农集体化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对于正是从这些雇农中间能够得到和培养出在阶级方面优秀的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干部,他们也估计不足。是的,在工厂工人干部之后,优秀的集体农庄干部、拖拉机手将出自于男女雇农。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经验被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利用了吗?没有,相反,正是这个从男女雇农中培养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干部的问题常常,特别是最近,甚至被弄得模糊不清。什么人常常被送到学校、拖拉机训练班学习呢?个体农民以及红军战士出身的集体农庄庄员。但是,我们的红军里既有雇农,又有贫农,也有中农。不应当用红军战士、集体农庄庄员这些词来模糊首先吸收贫雇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加入集体农庄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不想扩大农村富农剥削的进攻基地,而希望集体农庄本身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不应当一般地从集体农庄庄员中,而首先应当从贫雇农中为集体农庄和通过集体农庄培养干部。

要知道,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农庄有一个雇农在开拖拉机,这就会培养一个集体农庄庄员积极分子并加强无产阶级在集体农庄里的影响。这个拖拉机手对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但是拖拉机训练班培训的常常是富裕户家的子弟,而富裕的人当了拖拉机手以后,往往会更严重地危害集体农庄。此外,让富裕户和富农避开我们决定的可能的和正在实行的办法之一就是不准他们参加集体农庄³²¹。

我们还应当特别注意这样的事实:最新的数字表明,例如在下伏尔加边疆区定期雇用长工的情况减少了40%—45%。这个数字还未完全核实。雇用短工的情况也减少了25%—30%。这也还不是完全准确的数字,但趋势是明显的。对于雇农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问题——怎么生活和往哪里去?我们将从雇农群众中补充国营农场中新的农业无产阶级干部。在加大、加强新国营农场建设速度的情况下,这一点会特别顺利地做到。另一方面,雇农群众应当被广泛地吸收加入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里,男女雇农将把巩固集体农庄这种公有经济的一切凝聚起来,为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大公有经济而斗争。

尼古拉耶娃:对!

安采洛维奇:克拉夫季娅也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北高加索和其他地区还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例如,我担心,没有人会在全会上触及雇农问题,就像过去在其他全会上令人遗憾地发生的那样。看来,我们反对这种专业化的软弱无力也是工会工作的重大缺点:无论谈论什么问题,只要谈到培养雇农干部、谈到国营谷物农场的劳动组织,人们都认为,这只是工会的事情。这种专业化使我和工会的其他工作者处于雇农问题专门发言人的地位,而其他人只限于在决议里写……“男女雇农”。

有人喊:这是分工。

安采洛维奇:这是不正确的分工。伊克拉莫夫同志,这种分工,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尤其不正确,因为你们那里雇农暂时是唯一真正的无产阶级干部。数十万乌兹别克雇农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场里干活。这种分工就是不懂得,在农村里首先应当吸收雇农加入党的队伍,加入苏维埃机关,应当更广泛地吸收雇农加入集体农庄,以及争取做到使100%的男女雇农都成为工会会员。

有人喊:对!

安采洛维奇:报告的以及决议部分的重大缺点之一,是土地包括土地规划制度与大规模集体化的任务缺乏必要的联系。(主席摇铃)

我请求让我能用事实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甚至在最好的中心情况怎样。我像所有的人一样认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最先进的中心。实际上土地规划政策过去在于,在某些地方现在仍然在于,它不是在帮助,而是在妨碍集体化事业。要知道,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斯托雷平时期整个莫斯科省独立农庄等的土地规划为12.2万公顷,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为11.7万公顷。这样,很快就能赶上和超过斯托雷平时期。莫斯科州委会已经注意到在土地规划方面这种歪曲党的政策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但是,过去这种做法在莫斯科省和其他省曾广泛实行。

要知道,这是极大的阶级歪曲!再给你们举一个别的州的例子。列宁格勒是最文明的无产阶级中心。它拥有很大的潜力和许多无产阶级干部,可那里在干什么呢?不错,这是在普斯科夫专区,过去的普斯科夫省,但对那里过去发生的和甚至1929年正在发生的情况,列宁格勒在这方面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例如,请看地政处发出了怎样一个土地规划方面的指示:“在一个业务年度期间规划13 000公顷土地用于集体农庄和15 115公顷土地用于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

莫洛托夫：什么地方，这是在什么地方？

安采洛维奇：在普斯科夫专区。普斯科夫专区地政局进行了一番考虑、计算，决定为发展上述指示给集体农庄规划用地6000公顷，而给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规划用地1.1万公顷。显然，这不会为集体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从白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普斯科夫和莫斯科专区、克里米亚及其他地方的例子我们看到，我们的地政机关往往在朝着什么方向工作，它们是怎样帮助集体化的。要是完全不进行土地规划就更好了。要知道，这并没有通过土地规划为集体化创造前提，相反，却帮助了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分子巩固了自己在农村的阶级阵地。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曾经为施泰因贝格教授的一本小册子³²²做过编辑的一位同志提出了下列的表述：“最富生产效能型的农业是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这就是富农对我们地政机关独立农庄实践评价的样板。专家们在土地规划方面的右的实践由教授们的理论加以补充，而追随在教授们后面的，如你们看到的，也有一些共产党员。

土地政策、土地规划、信贷政策问题这一整套的措施，在地政机关系统本身、在合作社本身的许多环节上，对于集体农庄是没有明确目的的。[别连基同志，你用特别的眼光看我(笑声)。当然，不能禁止任何人看发言者，但是，我觉得，不知为什么你脸上挂着一副十分惊异的表情。]³²³

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在组建拖拉机方面正在做大量的工作，但在这一工作中实际上也有不少右倾。此外，并非每一个拖拉机队都应当和能够称为机器拖拉机站，如果赋予这个概念以明确内容的话。拖拉机队没有因此变得更好，还没有变成为机器拖拉机站。

关于拖拉机队，鲁祖塔克同志，我还要再说几句(笑声)。我可以断言，各个区粮食农业合作社联社、粮食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全体农业人员和机关远远没有为实现卡明斯基同志所说的那些任务而被动员起来。信贷和土地规划政策、农事指导、试验研究工作与对大集体农庄发展及国营农场建设发展的实际的战斗支援任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和不协调现象。这种现象应当结束！（主席摇铃）我马上就结束。现在我来谈谈干部问题。(笑声)

曾经推行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政策，甚至弄不明白，这是有害的，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不相容的那些工作人员，现在还在地政和合作社机关工作的这一部分党的干部，不能理解农庄社会主义改造时代的宏伟任务，更加不能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日益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所要求的那样，积极参加越来越广

泛覆盖贫雇农和中农群众的伟大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重新审查地政机关、农业合作社、专业和消费合作社的干部。这个问题同样不应当模糊。应当给予正在从事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工作的优秀老干部和更新的干部以有力的政治教育。如果我们这里有人说工会干部是尾巴主义(而且不无理由),那么,例如我在克里米亚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系统所看到的尾巴主义超过这种尾巴主义许多许多倍。而在工会干部中在不小的程度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尾巴主义。

有人喊:说具体点。

安采洛维奇:具体说就是,例如合作社社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党员掩饰集体农庄在向国家交售粮食方面的缺点。在粮食收购期间,他们用伪造的谷类饲料平衡表为掩护,用这种办法帮助集体农庄隐瞒其商品余粮。这表明,这一部分集体农庄庄员党员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每一普特粮食都是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的手段。我可以具体地肯定地说,尾巴主义在于,他们不善于也不想,如我在克里米亚那边看到的,向集体农庄的群众说清楚向国家交售粮食、完成信贷义务和必须参加工业化公债³²⁴方面的责任。具体说就是,当集体农庄,好像是“红色战士”集体农庄,或者别的集体农庄,把从国家得来的贷款,用于住房建设的为3万卢布,而用于生产的只有5000卢布,这就是他们对困难估计不足和不明白,正确使用贷款和投资在各处也包括集体农庄,是多么重要。

主席:安采洛维奇同志,这样不行,这是违反发言时间规定的。

安采洛维奇:这不是违反,而是正当利用可能性。(笑声)简单谈几句合作社信贷政策。向合作社,而现在特别向集体农庄注入数千万、数亿卢布计的国家资金。可这些资金是如何使用的呢?在国营谷物农场建场头一年里(现在有人为此开始骂我们,但我们认为,头一年突出强调把注意力放在生产上,而不是放在住房和日常生活问题上,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曾经说过:“让我们头一年多翻耕一些土地,无论多么艰苦,我们还要在帐篷里住一些时候。”

许多集体农庄从建设昂贵的房屋入手,形成了生产费用与其他需要费用之间的不正确的比例关系:5000用于生产和3万用于住房。而且这不仅是在克里米亚。能否认为这种使用贷款的政策是正确的呢?

正如你们从我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和例子中看到的,不应当把机器拖拉机站淹没在集体农庄的自发势力之中。机器拖拉机站应当实际上成为无产阶级影响这种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杠杆之一。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和在农村地区运营的工厂,特别是在原料需求方面与农业有关的一些工业部门应当采取一切

措施,大力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村大规模集体化事业的影响和巩固大型集体农庄这个与国营农场一道日益壮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

主席:现在请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

安德烈耶夫:我想从某些一般性的意见开始。卡明斯基同志公布的数字说明什么,而集体农庄运动和我们的一些边疆区与州,例如北高加索达到的飞快速度的数字又说明什么呢?集体农庄的速度每天都有新的增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和哥萨克户达到了25%到30%。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整村整村,甚至整区整区的全盘集体化,而在这种全盘集体化中大部分集体化的农户是中农,这一情况说明什么呢?最后,农民现在自己在修正我们的控制数字,这种情况又说明什么呢?我们为今年提出的控制数字是一个数额,而农民说:“不,要更多一些”,便修正我们的控制数字,当然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把控制数字增加了2—3倍。这不可能说明别的,而只能说明农民基本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大部分农民中间,特别是中农中间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富农当然仍是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但农民的主要阶层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害怕社会主义,过去对我们到农村办公社、集体农庄等的尝试,中农曾经抱敌视的态度。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对社会主义态度的根本变化。现在集体农庄建设的障碍不是社会条件,而完全是我们的物质技术组织能力。

这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所达到的那些数字和那些增长速度首先说明的东西。不言而喻,这驳斥了来自右边的同志们关于正在出现脱离农民群众危险的种种说法。这些数字也证明,我们真的已经面临着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最后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改造小私有经济的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解决了土地性质的问题;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以商品流转等方式解决了城市和农村结合的问题,那时候还没有提出农业改造的任务。现在农村的整个形势表明,我们已经完全面临着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最后一个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农业改造并把这一成分纳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纳入我们的计划。来自右边的同志们的根本错误是,他们看不见现在我们真的已经面临着解决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最后的和最困难的问题,面临着攻克最后的障碍。如果我们攻克这个障碍,那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当然是在我们大机器工业等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来自右边的同志们看不见主要的东西,依旧重弹这是非常措施的老调并向后看,说这是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方法的复原等等。他们注定落在伟大运动的后面,他们在声明中奇怪地承认集体农庄成了农业的主

要形式等,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这些人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们在伟大运动的后面蹒跚又不理解这个伟大的运动。我认为,现在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整个形势使不懂得农村由一些形式向另一些形式急剧转变情况的右倾分子产生了恐惧,我认为,这整个形势说明了一点:我们的农村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场革命是我们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增长的标志下和我们大工业的决定性影响下进行的。伴随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而来的,一方面是至今存在过的一切经济形式的根本摧毁,另一方面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我觉得,这就是这些数字说明的和我们右倾的同志们看不见的主要的东西。农民经济由个体向公有大经济逐步过渡的进化公式已经不符合现时期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现在达到的集体化增长的速度已经相当于上个阶段的300%—400%。这已经远不是逐步过渡。因此我认为,对于许多地区来说,逐步向集体经济过渡的提法正在失去意义。

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党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两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掌握这个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把它牢牢地抓到手里并领导这个运动,使它不具有自发运动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的责任是,尽快实现这个由个体农民经济向集体大经济过渡的过程,尽量缩短这个过渡阶段,因为这个过渡阶段如果拖延下去,那么这个由一种经济形式向另一种经济形式的过渡就必然会影晌我们国民经济的生产力,使其下降。我认为,我这样说是不会错的,特别是对于北高加索——我们的个体农民经济已经有某种断裂状态,无论我们现在怎样努力保证刺激因素来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现在这都不可能产生有决定意义的结果;无论我们怎样把个体农民经济置于特殊的温室条件下,当大多数中农群众站在集体化的门坎上并将一只脚跨了进去的时候,指望个体农民经济解决粮食问题,特别是畜牧业的问题,这将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尽快地完成这一过渡,以便少花附加费用。现在我们决不能把集体化问题与技术基础联系起来,等待集体化技术基础的到来并相应地严格控制速度。这我们决不能等待。

我想在这里谈谈我们北高加索人想在北高加索实行的一个意向。我想,你们不会说这个意向是幻想(我们北高加索人不应当被你们称为幻想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春播运动和下一个播种运动——春播和秋播运动期间,即在未来的1931年夏天之前基本实现北高加索的集体化。到这个期限,我们打算基本结束北高加索的集体化。现在我们实现集体化农户已经有25%到30%,今年完成北高加索50%农户的集体化没有特别的困难。这个方针里没

有任何幻想的成分,因为当整村整村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对北高加索情况的整个估计说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国营谷物农场和边疆区许多大集体农庄工作的巨大成就在推动集体化方面具有特殊的革命意义,例如,我们的“巨人”国营农场在自己的经营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年至少有5万人前去参观。不久前我们组织北高加索各村镇中农和贫农出身的农业全权代表两千人前去参观。这次参观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那里回来以后,他们都成了集体化的百分之百的宣传员。事情竟到了这种程度,他们了解了“巨人”国营农场的经营情况之后,便提出了自己是否可以入股的问题,以便能被立即接受加入这个“巨人”国营农场。但除了这种有组织的参观,农民自行骑马自费前去参观,以便亲自摸一摸,闻一闻,社会主义经济是怎样发展的,自己好加入集体农庄。

我们工作优异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巨大的革命意义就在这里。因此,我们给自己提出短期内在土地共同耕作、生产工具公有化、牵引力公有化等方面基本完成北高加索农业集体化的具体任务,这丝毫没有幻想的成分。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绝对可能的。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我觉得,我们不会遇到来自农民方面的重大障碍。整个形势表明,农民自己今天正在这样做,而我们作为组织者有时自己赶不大上他们。

彼得罗夫斯基:那富农怎么办?

安德烈耶夫:我认为,为了不使我们自己第一阶段的工作复杂化,应当暂时把富农划分出去。

有人喊:为什么是暂时?

安德烈耶夫:所以是暂时,因为我认为,当我们发展壮大,当我们能保证我们的集体农庄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当我们狠狠地剥夺富农(因为我们不打算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之后,我们将不怕把这一部分居民也纳入我们的公有经济,但是我们先得保证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巩固自己的领导,剥夺这些富农分子。

迅速向集体化过渡并以此减少农业生产附加费用的任务是现在十分紧迫的任务,否则我们真的会在农业生产力降低方面失去一些东西。也许,这里有些同志会想,北高加索人在玩新的花招,以便得到更多的拖拉机……

有人喊:不,哪里话!

安德烈耶夫:我应当向你们保证,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喧嚷)我们满足于提出的对北高加索农业的供应计划。

有人喊:你们已经来得及得到一切。

安德烈耶夫:不,除了决议,我们暂时还没得到任何特别的东西。

有人喊:你们什么都得到了。

安德烈耶夫:我认为,这样的安排对于许多别的地区也是正确的。

喊声:对,对。

安德烈耶夫:例如,对于同北高加索接壤的我们的一些邻居。

彼得罗夫斯基:例如?

安德烈耶夫:例如,对于下伏尔加、中伏尔加,对于乌克兰,甚至对于中央黑土地带州。

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认为,我们已经没有权利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完成。不允许我们拖延这个运动和作逐步过渡这样的计划。我们必须保证自己对迅速过渡的领导。我认为,你们不应当怀疑我们企图侵占额外的资金。

柳比莫夫:我们对你们什么都不怀疑。

安德烈耶夫:这种过渡基本上应当靠农业自身的资金来实行。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我们中央的决定里特别着重地予以强调,以便立即狠狠打击农民本身(他卖掉牲畜加入集体农庄,指望一加入集体农庄国家马上就会给他帮助)的只顾个人利益的依赖别人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打击我们一些机构的这种倾向,它们习惯于我们帮助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一建立便立刻带着贷款和拖拉机账单前来。我们必须截断这些倾向的道路,坚定而明确地表示,大规模集体化的过程基本上应当靠农业自身的内部资金和能力进行。当然,没有国家一定的专门帮助,这种过渡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主要应当立足于农民居民自身的资金。在大机器到来之前,甚至在现有生产资料和牵引力的范围内,立即着手农业生产合理化的工作,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难道我们拥有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潜力还少吗?我们在这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北高加索在这个春播运动期间做到了扩大播种面积17%,提高单位面积产量6%,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是通过农业生产的合理化,生产工具、牵引力的大负荷和实行农业最低限度措施做到这一点的,尽管与战前时期相比我们既缺乏农具,又缺乏牵引力。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些生产工具公有化,把牵引力公有化,更充分地实行农业最低限度措施,我们就会找到巨大的潜力来加强这种合理化,加强利用农业的内部能力并通过这一点立即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提高我们集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是与居民自身的资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我们的集体经济缺乏组织性,由于我们的集体

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单一的,主要是发展粮食作物,而没有利用由于机器的到来和节约而解放出的劳动力来发展畜牧业、蔬菜栽培等其他各业,现在的集体农庄里很多劳动力在徒劳无益地浪费掉。我们有很多未利用的劳动力在白白地浪费掉。由于我们缺乏组织性,集体农庄里出现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危险。我认为,在畜牧业这个行业我们近期将会遇到紧张的情况,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已经做了一些事情,现在情况将向前推进,那么,在畜牧业方面我们显然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因为提高畜牧业比解决粮食问题要困难得多。畜牧业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需要几年的时间。而我认为,在畜牧业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个体农民经济解决不了我们这个问题,畜牧业问题主要得由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解决。这个问题将在那里得到解决。个体农民经济正处于被摧毁的过程和向集体农庄过渡的前夜,未必能够基本上解决畜牧业问题。因此,突出强调以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基础发展畜牧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农庄其他各业发展的任务能够提高它们的收益,利用劳动力并同时真正解决畜牧业和其他各业的许多尖锐的问题。

中央在决议草案里提出要动员居民资金建立机器基础的问题是正确的。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在集资购买拖拉机设备等方面马上就可以开始顺利进行。

我们应当从这些物质问题的角度及时警告我们的集体农庄千万不要迷恋于住房建设。这可以暂缓进行。否则,我们的集体农庄刚一建立,便会开始议论,应当着手改造生活方式,应当建造新的住房等等。我认为,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事应等2—5年再办。让大家在自己的农舍里再住些时候吧。

有人喊:对。

安德烈耶夫:主要的资金应当用在生产上。我认为,我们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中存在的把从国家得来的资金用于住房建设的十分强烈的倾向应当消除。

我认为,在筹集和动员农户的所有内部资金和能力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根据我们北高加索的报告先前已经预先决定的村生产计划³²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对于集体农庄,对于尚未实现集体化的村庄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只要我们多少从粮食收购中摆脱出来,我们北高加索人打算实行生产经营计划,通过计划可以把一切因素集中起来合理地加以利用。我们打算开始做这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但是,对我们要拥有生产性大集体经济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问题,当然仍是技术基础的奠定,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央正确地决定了建设一系列农业机器制造

厂的问题。是否可以只表示希望——这事应当赶快去做。是否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技术基础奠定之前多少增加一些拖拉机的进口？也许，我们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节约一些？但这正是现在最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可否多进口一些零配件？我们发生了不能容许的事情，例如，在“巨人”国营农场里，由于没有零配件，今年一段时间里曾有60台拖拉机，即2400马力停车。是否可以多订购一些零配件并在国内组织更大规模的拖拉机零配件生产？拖拉机零配件的缺乏正变得越来越紧急。

但是，除了这些物质性质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集体农庄建设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领导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尖锐。

我们应当直接和坦率地承认，我们至今还未能保证对我们集体农庄经营的经常性领导。我们的合作社至今走的路线主要是注重集体农庄建设的数量成就，而不关心应该如何组织集体农庄的内部建设；另一方面，合作社的工作只是沿着供应和销售的功能方面进行，合作社尚未认真面对作为经济制度的集体农庄建设的生产方面。我觉得，这些问题现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问题在于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考验。我们召唤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他们来了，对我们表示巨大的信任，但他们要求我们：“你召唤我们加入集体农庄，但你必须把我们组织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卡明斯基同志可能由于时间不够而谈得很少的干部问题，有着巨大的意义。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干部，这么宏大的工作是不可能迅速搞好的。无论农民对集体农庄的情绪多么高涨，但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组织者，我们是不能迅速把这项工作做好的。我应当说，农村干部问题的情况不妙。我可以举我们北高加索的例子，在顿涅茨克这样一个专区的韦申斯克区，30个村苏维埃中只有两个主席是党员，其他的主席都是非党员。我们的村庄和集镇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少，我们的村庄里往往都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能迅速解决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那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因此，干部问题具有特别的尖锐性。

这个问题主要应当通过利用农村本身的后备力量来解决。我们拥有这种后备力量，但我们没有学会充分地利用它们。在农村里，我们拥有的这种后备力量就是现有的集体农庄，就是数量众多的农业全权代表、生产会议成员、村苏维埃委员、共青团员等。

农业全权代表制度说明，如果加以领导，这将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我们北高加索有3.2万农业全权代表，他们正在为我们迅速完成整个播种运动。因此我觉得，这就是农村的干部问题，无论对于集体农庄建设，还是对于这些干部的培

养,主要应当通过利用农村自身的后备力量来解决的原因。

要利用这些后备力量,就应当派组织者到那里去。我觉得,在派干部下乡方面,我们应当在这里下决心迈出更勇敢的一步,就像我们党当年决定派干部去运输部门工作³²⁶那样,不然的话,没有人员、干部的保证,我们就不能迅速完成农业向社会主义形式过渡这项宏大的工作。因此,我们党是否可以部分地掠夺我们的工业,派遣比如说5万—10万名干部到农村去工作一定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我们希望农村里有好的合作社,这样做是必需的。是否可以派有工业经验的干部,有办工业企业经验的干部下去,因为办大集体农庄几乎与办大工业企业是同样重大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应当派有经验的工业人员去做这件事情。在这次全会上应当决定更大胆地派遣干部下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放弃手工操作的方式。应当派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去,以便保证完成那里的巨大工作。

最后,最末的一个问题,虽然同志们也谈到了,但我认为,在决议里对此应当着重加以强调。我指的是斯大林同志昨天所谈的问题,即农民的真正改造只是在集体农庄里才开始的。这就是说,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我们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我们必须狠狠打击所谓的浪漫主义,打击不是我们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理想化的理想化,像有些人所说的,既然集体农庄建立起来了,就意味着困难从此而结束,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正在终止。对这种浪漫主义,对这种理想化应当狠狠地打击,因为在把现在的集体农庄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事业中我们还面临着艰难的道路。为此还需要进行几年聚精会神的认真的工作,以便从集体农庄里扫除私有者农民带来的全部个人主义的垃圾。由于他们今天曾经是私有者,而明天变成了集体农庄庄员,他们还未完全成为新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自己私有者的本能,带来了个体经济的习惯,因此我们还将长时间看到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和公有者的双重心理状态。在一定时期里他们身上还有新和旧两种因素在斗争。集体农庄里有时爆发阶级斗争的成分,正在成为我们这里常见的现象。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集体农庄在走粮食投机的路线,就像富农不完成国家的任务,有时进行粮食投机倒把那样。这就是为什么认真改造农民的工作从集体农庄建立的时刻起才刚刚开始,农民由小私有者到公有者的认真改造也只是从这个时刻才开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理想化狠地进行打击,对浪漫主义狠地进行打击,对所谓的形式主义态度和对数量指标的追求狠地进行打击,对流露出来的那种似乎已经应当对苏维埃制度问题加以修改的情绪狠地进行打击。这个修改苏维埃制度的口号,似乎苏维埃正在消亡,而集体农庄正

在取代它们的位置,同志们,我觉得,这种思想来自我们异己的、敌对的营垒……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来自富农的营垒。我们北高加索有过这样的情况,富农论证赞成建立集体农庄的时候说,到那时我们将不需要苏维埃,将生活得更轻松一些。这种现象是有的,这是敌视我们的论据,敌视我们的口号,应当与之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直到集体农庄运动取得决定性成就,直到集体农庄最终巩固,直到社会主义在农村取得决定性成就之前,阶级斗争将是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将使自己反对社会主义斗争的形式适应新的阶段,从外部和内部对集体农庄进行攻击。因为,我们把富农分到独家农场,作为集体农庄,这还不意味着,他们将不再有影响,这还不意味着,他们已被万里长城隔开,将不会再对某些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的影响。富农虽然在经济上破了产,但并没有停止与我们的斗争而且也不会停止。我们应当特别留神,别让富农到城里去。我们北高加索有这样的例子,富农收缩自己的产业,到我们的工厂里去,通过职业介绍所混乱无序的介绍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而无产者往往进不了工厂。对这种情况应当特别警惕。在与对集体农庄运动种种估计不足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党也应当狠狠打击对困难的估计不足,以便集中意志和精力,动员党的力量来保证农村的伟大改造。

主席:现在请伊克拉莫夫同志发言。

伊克拉莫夫:卡明斯基同志在这里宣读的那些数字,我们全联盟达到的那种集体农庄发展速度首先说明,在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上,在生产资料生产的问题上,在由市场结合向生产结合过渡的问题上,中央的路线和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右倾分子,右倾反对派是完全不正确的。他们反对党的主要斗争在于反对生产结合的提法。如果我们不“突击”机器和拖拉机,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主要问题,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是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因此,这些数字再一次证明了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的路线的正确性。

现在我来谈一个具体的问题。由于集体农庄的蓬勃发展、大型国营农场的建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解决,我们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已经拥有粮食储备,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³²⁷所指出的,我们不久甚至能够出口粮食并将成为粮食最富有的国家。与此同时,由于这个紧急问题的顺利解决,需要提出提高经济作物并保证我们工厂,如同志们在这里所说的,甜菜、亚麻、羊毛、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供应的问题。因为这是联盟工业化的辅助问题之一。现在我们应该提出关于我们经济作物地区的产业高速度改造的问题。同样,也应当提出畜牧业的问题。米高扬和卡明斯基同志在这里提出了发展集体农庄畜

牧业的问题。应当提出建立集体畜群的问题。在诸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达吉斯坦和部分地在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这些牧业区里尤其需要这样做。

卡明斯基:专门的集体畜群?

伊克拉莫夫:是的,专门的集体畜群。不仅从肉食的角度看这是需要发展的。我们有美利奴和卡拉库尔绵羊。卡拉库尔羔羊皮每张收购价格为11卢布,而向国外出口每张为18美元。这是最值钱的出口商品,应当给予特别的注意。

关于经济作物问题,我想简短地谈谈棉花。从集体化的角度看,我们的棉花产区至今仍落在后面。在贫中农经济的商品率达到80%并由统一系统灌溉的那些地区,集体化的速度会大大高于别的地区。在经济商品率比例这么高和100%棉花由国家订购的情况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集体化的速度落后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因为我们对这些产棉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现在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问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政治局最近的决定³²⁸预计将五年计划的棉花产量增加1200万普特。将收获的不是3600万普特,而是4800万普特。这样,我们三年内将节约2.5亿—3亿金卢布。我们将把这些黄金储备保存在自己国内,而不是扔到国外去。各共和国甚至打算超额完成这个计划,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经济将进行改造,我们的全部个体经济将进行改造。我浏览了发给我们的那些数字,看见外高加索和中亚那些共和国的集体化进展的速度比别的地区慢得多。因此,对这些地区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我仔细看了根据手稿印刷的红皮小册子里登载的那些有关机器拖拉机站的数字。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数字,你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向经济作物方面作任何转变。

政治局决定调拨1.5万台拖拉机给中亚各产棉区,尽管有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那里却写道:3800台给外高加索,3800台给中亚,而给巴什基尔各产粮区3900台。对粮食需要突击,我们不建议改变拖拉机的分配数字,但应当靠新增加的20万台拖拉机向经济作物的方面转变。今天我曾对克利缅科同志说,为什么今后的增长还要靠乌克兰?既然将近50%的机器拖拉机站在乌克兰,为什么还要再给他们?他说:“还需要给他们。”他在这个讲台上说过:“如果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往产棉区调拨拖拉机。”这些话应当扔掉,因为拖拉机也可以在落后的共和国里工作。根据前面的报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好像说过,在全联盟每台拖拉机的平均负荷为150公顷,而在我们那边的集体农庄里至少175公顷,这是平均负荷,而在一些集体农庄里达到200公顷。

柯秀尔: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算的是300公顷。

伊克拉莫夫:我们曾经从座位上喊,这是不对的,计算应当是150公顷。

斯克雷普尼克:怎么,你们那里负荷不足?

伊克拉莫夫:现在谈谈联盟其他部分和我们这个中亚共和国³²⁹集体农庄建设速度的差别。在吸收雇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上,安采洛维奇同志把所有的人都骂到了,也骂了中亚细亚。但他说的简直驴唇不对马嘴。在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³³⁰也载有乌兹别克斯坦的数字,我对它们进行了核对。得到的结果是,在我们的机器共耕社型的集体农庄里,没有生产资料的农户为76%,有200卢布以下的为92.8%。而在国营农场里,没有生产资料的雇农为33.1%。有200卢布以下生产资料的为80.7%。在吸收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方面我们的情况很好。

我们怎样组建这些集体农庄——这是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问题。几乎所有这些集体农庄都建立在新灌溉的土地上或者土改时夺来的巴依的土地上。雇农和贫农用国家的资金组建了集体农庄。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化方面我们是全联盟第一,因为雇农没有生产资料,而国家给予的东西是公有化的。单靠国家的资金我们是走不远的,因此,在吸收贫中农及其资金加入这些集体农庄的时候,就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我们没有季诺维也夫所许诺的金山,我们没有几十亿计的卢布,可以让我们完全用国家的资金来组建集体农庄。因此,吸收居民自身,贫中农自身的资金是一项最必需的任务,应当加以解决。

现在谈谈建立大型农场的可能性。我们有这样一些人,可以说是右倾分子,他们认为,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在大田里不长棉花,种植棉花需要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而且一定要使用月锄³³¹干活。同志们至今都是这样说的,但现在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帕赫塔-阿拉尔和其他地方的工作经验开始推翻这种说法。因此,应当坚决地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和对贫中农经济实行集体化,使它们成为大型集体农庄。

怎样解决拖拉机这个难题?我们正在把拖拉机增加到20万台,但这仍然不够。安德烈耶夫同志提出了一个用减少其他进口增加拖拉机数量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想法。应当在两三年内坚决减少棉花进口和扩大各种出口潜力来加紧这件事情,同时增加拖拉机的进口,支持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意见。这样一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要等待全部技术基础建立之后才建立集体农庄,不要等待机器拖拉机站,等待它们建立之后才搞集体化,或者像新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纲里所做的那样把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对立起来,他们说,没有机器拖拉机站根本什么都

做不成。我们不这样提出问题。但是,为了更快地实行公有化,进口拖拉机,使我们的经济机器化,需要技术基础。对于产棉地区,谷物饲料问题和牵引力问题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你们在谈论马匹及其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工作定额问题。我们连这样的马也没有,我们用奥马奇³³²,即木犁干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喂这马的饲料。这两样东西我们都需要从外面运来。这价钱很贵,在经济上很不合算。因此,这些地区需要实行全部机器化,不仅是拖拉机,而且培土犁都能加速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们的共和国里有人工灌溉,这使我们有可能加快我们经济集体化的速度。现在我们大大落在了后面,现在我们从公有成分将得到的棉花只有4%,而政治局提出了到五年计划末期,即到1932年达到30%的任务,乌兹别克斯坦组织讨论并决定达到60%,这一点我们会做到的。

我认为,与干部问题有关,现在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欧洲部分进行工作的时候,也别忘了其他的部分。那里根本没有干部。需要对干部进行正确的分配。这是一个建议。无产阶级地区和工厂也应当动员干部加强集体化地区,首先是落后地区。

与干部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工厂和企业里从工人中间培养了厂长经理和工作干部。无疑,现在也应当在集体农庄里安排好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在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培养公有化农业的干部。

我认为,在所有集体农庄里开办扫盲学校是一个大问题。应当提出扫盲问题,与此同时应当开办集体农庄积极分子进修班,提高他们的技能。为此应当派给干部,既领导集体农庄本身,又领导我们的集体农庄联合会。

其次,现在应当解决加强党的基层机构和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以便真正保证党对各个地区的领导和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保证无产阶级的路线。需要加强和吸收共产党员加入集体农庄的工作。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

第四,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对生产资料公有化斗争的领导问题。我调查了18个集体农庄,亲自去了集体农庄,在许多集体农庄里富裕农民和贫农为了生产资料在斗争。一个农民有一辆大车,他经营这辆大车,更多是忙这件事,贫农对此不满。因此,现在贫农小组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在集体农庄内部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斗争。这个问题也应当坚定地提出来。

第五,我以此结束我的发言。某些地方建立集体农庄时的命令主义必须制止。

我认为,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我们必须在解决集体农庄问题的时候努力消

除同志们头脑中的这样一个观念,即在产棉地区,在经济作物地区机器无法工作。

主席: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以后)

主席:日丹诺夫同志请求就会议的程序发言。

日丹诺夫:建议今天晚间会议结束讨论和总结发言,以便明天上午开始柯秀尔同志的报告。

卡明斯基:我建议这样的程序:今天和明天继续开到3点钟。

主席:我现在提付表决。谁赞成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谁赞成卡明斯基的建议?票数一半对一半。我再次提付表决:谁赞成日丹诺夫同志的今天结束的建议?15个人。谁赞成卡明斯基同志的会议开到明天午休前的建议?14个人。

柳比莫夫:今天继续讨论,明天上午作总结发言。

主席:喏,票数几乎是一半对一半,怎么办,看来只好继续讨论?

有人喊:只好继续讨论。

主席:我把柳比莫夫同志的建议提付表决。谁赞成讨论继续到这次会议完了就结束,明天上午作总结发言?谁反对?少数。

现在请库比亚克同志发言。

库比亚克:发言批评农业人民委员部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好风度。当然,批评我们的工作和系统是需要的,但要对工作有利。一些人在报刊上批评,报刊上更明确地提出指责。对这些指责我们予以回答。

关于农业人民委员部,今天卡明斯基同志就曾有话要说。第一,是哪个农业人民委员部?没有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而如果是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那么,他是这个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我应当声明,我从卡明斯基那里没有听到任何特别的意见、建议、报告、抗议、反对意见等。

有人喊:在什么问题上?

库比亚克: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我不知道,卡明斯基在什么问题上有话要说。

有人喊:关于合作社,这很清楚。

库比亚克:如果是关于机器供应,那么,要知道,这里有两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仓库里放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而不把它们给集体农庄,那样的话,不仅该骂,而且该打;但没有这种情况。所有的一切全都分发下去了,没有任何后备。

相反,应当指责同志们最近发表了许多报告和讲话,说如果我们不用拖拉机和机器支持大规模集体化运动,那么,我们不仅会使这个运动停顿,而且据说会从思想上败坏这个运动的名声。这个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当然,拖拉机应当在扩大集体农庄发展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认为没有拖拉机就会使集体农庄运动停顿,尤其会败坏它的名声,是胡说八道,是绝对不正确的,这样提问题是不行的。卡明斯基同志去年没有反对,相反,支持了我的靠牛和马建立集体农庄的建议。集体农庄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方针。

卡明斯基:我又没有反对。

库比亚克:你曾在空中晃动拳头,指责我们靠旧的牵引力组建集体农庄,怎么会没有反对呢?靠马匹当然不好,靠拖拉机更好,但是现在没有拖拉机,我们又不能把运动停下来。有些人因为没有拖拉机队就对现在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必要性提出疑义。不久前我们听了农业人民委员部一个巡视员的报告,由于没有所需数量的拖拉机,他根本怀疑建立集体农庄的必要性。这样的声明不仅来自我们的巡视员,我知道,在乌拉尔(有乌拉尔人坐在这里,他们记得这件事)曾有过一位负责同志的声明,他说:没有拖拉机,没有计划,你们想怎样建立集体农庄?在修建工厂之前,我们先制订计划,进行估计,有时有美国人帮助我们,而你们没有计划就想要建立集体农庄?这种思想是完全不对的,生活已经把它推翻了。安德烈耶夫同志完全正确,他说,他们计划两年内把北高加索全部大田作业公有化。在中伏尔加和下伏尔加情况也同様。关于这些州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说,在这个期间内实现全部大田作业公有化实际上是可能的。当整州整州实现集体化的前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面对着有些同志提出的对集体农庄运动的评价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要知道,有很多人现在说,他们赞成搞集体农庄。说只有集体农庄才是农业走出死胡同的唯一出路。当在他们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即便是不上交粮食的情况或者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卖牲口以及在大规模集体农庄背景上的其他缺点,他们都讥讽地说,这多么不好,他们只看见这些现象。这些同志对集体农庄的评价是,并非一切顺利。他们怀疑集体农庄运动,这样的同志说,第一,没有拖拉机不能建立集体农庄,第二,走只组建机器拖拉机队和站并放弃建立任何集体农庄等的路线岂不更好。对此应当进行更坚决的斗争,说明对集体农庄运动这种评价的缺点。不言而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里有很多缺点而且以后还会有,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这个运动是很健康的。我们还不会有组织地驾驭它,在经济上还没有掌握它;因此,在大规模运动的过程中现在有并且还将会有严重的缺点:有些集体

农庄可能会垮台,有些人会不上交粮食,会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卖掉牲口,等等。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运动是健康的。我们还没有一个样板,可供我们复制建立由个体小农经济构成的大农业的计划。如果对于国营农场我们有时还可以从美国弄到某种计划(即使这也是很少的),如果对于工厂我们有时可以弄到现成的计划,那么,对于这种经济形式我们在哪里都弄不到任何的计划。我们只好一边制订计划,一边在这些错误的背景上学习。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对我们集体农庄所存在的缺点似乎并无恶意的讽刺意见有时是不完全合适的。

另一方面,对于在我们集体农庄里有时看到比较轻率的态度,我们不能不持充分批判的态度。我们有“让胜利的雷声响起来吧”。他们说,整个农村都公有化了,集体农庄像雨后的蘑菇在生长,只要给我们拖拉机,我们会超越你们的一切计划。提交全会的并已由政治局基本通过的决议³³³绝对正确地指出了若干我们将难以消除的十分严重的情况。

关于这些困难我稍后再谈。现在从这个大规模运动的观点看,对于我们全党,对于工人和农民群众,集体农庄里有着大有教益的因素。不很久以前,我曾有机会在区建筑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右倾分子宣扬的关于退化、关于同中农分裂等观点的错误性。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他们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讲话,而只需要几个数字就够了,这些数字他们每个人根据各自村庄的情况就能够了解并用实践经验加以检验,以便确信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基本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右倾分子不承认这一点,出于顽固、不愿意,或者如一些右倾的同志说的,“中央全会今天还不闭幕,我们还来得及在全会结束前承认错误。”这是一个很短的期限,如果我们等到全会结束之前他们来说:“过去我们错了,我们痛悔自己的错误。”如果卡明斯基同志宣读的所有数字,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生活不能使他们改变看法,他们仍坚持自己关于农业退化和农民缺乏动力问题上的意见,当然就更糟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动摇的全部危害性和荒谬性。他们将更难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那就太晚了。

在谈集体化缺点的时候,正如他们的决议³³⁴所指出的,决议只指出了主要的缺点,因为中央全会绝对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决议里谈所有的缺点,我应当指出以下几点。主要的缺点当然是缺乏技术,缺乏能够更快加速农业改造的拖拉机。这个缺点我们无疑能够消除,因为中央刚刚提出的那些措施使我们有可能消除这些缺点。另一个缺点——不善于组织劳动将更难以消除。在这方面应当承认,以我们现在拥有的干部和我们掌握的技能和经验,我们将很难组织集体农庄

的劳动。我就不谈整个地政机关系统和各类合作社需要大大更新和加强的问题了。现在的情况是相当腐败。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里将讲述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许多在座的人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知道,这些干部的情况怎样,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明确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执行党的指示。

改造千百年来生活在个体劳动条件下的农民这个巨大的任务将是很难完成的。使农民转入集体农庄,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改造,帮助他们消除甚至在加入集体农庄时仍占有很大比例的私有倾向的残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就是集体化的困难将会多少变得复杂化的原因。与城市产业工人的紧密结合将是消除这些困难的最好办法。但这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集体农庄建在远离工业和城市中心的地方。只好把集体农庄与我们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结合起来,后者将使大量的产业工人深入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村。

从这个观点看,在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方面,无产阶级的帮助是必需的。因此只好修改提交全会的决议的提法,决议说,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应当是各个独立管理中心的领导者³³⁵。这个国家权柄的无产阶级杠杆必须由国家自己掌握。我不是说,卡明斯基同志做不了这件事。

集体农庄运动不是由卡明斯基和库比亚克构成的,这是千百万农民的运动。州里、区里成千上万的集体农庄应当由我们将以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加工业形式建立的这些无产阶级中心来管理。不应反对把这两个中心的工作合并起来,但应当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必须是绝对独立自主的。否则,从逻辑上推论,会是什么结果呢?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将领导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而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是股份公司,其股东有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等,这就是说,通过对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来领导我们,领导国家机关。卡明斯基同志和一些别的人会说:这是本位主义的局限性。

卡明斯基:大概,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将是最差的集体农庄。

库比亚克:可能。我认为,初期就将是这样。

第一稿里的这个提法比较好。那里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都是独立自主的等。这两行文字后来消失了。

卡明斯基:没有这么回事。

库比亚克:旧稿里曾经有,新稿里没有了。我这里有旧稿和新稿。中央委员会全会或者中央委员会将成立的那个委员会应当对这个地方进行相应的修改。

您在那里没有列举任何管理中心,您却强调了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要是您还说:“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马铃薯种植联合会等”,这我还能理解,但您说的是,您将领导一个股份公司,无产阶级的国家杠杆,当然,对它应当进行领导,但不是以这种形式。虽然您会说,这是本位主义的局限性,但许多东西取决于现有的提法。

安采洛维奇:正确!

库比亚克:你们看见了,连农业工人工会也说“正确”。绝对正确,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方针,在他们那里国营农场只是帮助,不是起主导作用,而是帮助。

为了帮助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这个提法应当取消,因为通过机器拖拉机站,通过国营农场以及我们正在组建的企业将拥有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组织劳动,提高劳动纪律等。

下一个问题是不善于组织经营。这正是我们的贫乏之处,如果不说得更重的话。我有一些集体农庄的几份计划。这是沃罗涅日专区一个农艺师制定的计划。这个集体农庄有100公顷土地,按照计划打算把全部资金的85%用于建房,再加上还想用国家的钱给每个集体农庄庄员两头奶牛、一匹马、一张犁供个人使用。这份计划是不很久以前从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毕业的一个农艺师制定的。

我们正在尝试制定的所有计划和我们没有计划工作时的情况没有多大区别。我说得重一点,没有计划比有这样的计划更好进行工作。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实践经验,第二,我们缺乏能够编制计划的干部。我们整整一年在加紧讨论措施,至今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取得成绩。我们没有在大型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组织经营的任何计划,尤其是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我们没有任何经营计划。我们必须加紧制订出不管什么样的即使是最简单的计划。

里亚比宁同志说得完全正确,需要改变地政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法。我们从4月份起一直在仔细研究这个问题³³⁶。速度慢得可怕。地政机关的工作不是与集体农庄运动同步前进,而是落在了后边。从4月份到今天已经建立了大量新集体农庄,可我们还是老一套。这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被耽搁了,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地位,因为我们要等到十一月全会。需要大大改变地政机关的结构方案及其工作方法。看来,我们地政机关系统的某些环节必须去掉。地政机关的基本工作环节应当是区,那里应当建立经营性的国家领导中心。专区作为一个环节应当去掉,因为如果采用我们提出的那些工作方法,它将无事可做。

我们还必须改变州地政局工作的性质。如果我们在工业方面走的是集中统一的路线,那么,在农业方面我们必须走分散的路线。现在我们正在制定若干措施,把某些工作移交给州地政局。

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整个的农艺服务。我们必须使各个站、试验田的工作,全体农艺师的工作服从于前所未有的集体农庄运动事业。集体农庄运动至今不顾我们的一切农艺措施在发展。所有的农艺措施不仅落在后边,而且甚至不想有所进展。我们必须对这种工作的性质进行大大的改变。

报刊上曾指责我们,卡明斯基同志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指责我们,说国家把千百万卢布花费在土地规划上。某一个不愿意显露自己真面目的季耶尔,要不就是皮埃尔³³⁷在报刊上骂我们。与匿名的作者当然很难进行辩论。他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土地规划工作方面的速度太落后等等。卡明斯基同志从另一个方面指责我们,说土地规划工作根本就不需要。

卡明斯基:我没说过这话。

库比亚克:你否认自己说过这话?

卡明斯基:当然,我没这么说过。

库比亚克:我想,不久我们将要听关于土地规划问题的报告。不是从保存这千百万卢布的观点,而是从保存劳动、精力和时间的观点看,我们必须停止土地规划工作。

有人喊:不是到处。

库比亚克:有些小小的例外。村际土地规划我们去年就停止了。迁移我们去年就禁止了。村内和村际土地规划正在北高加索各民族州进行。随着机器拖拉机站的建立已经不需要进行村际土地规划,也不需要把村内土地规划进行到户,因为一两年后我们将拥有机器拖拉机站,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化为泡影。

安采洛维奇:在土改地区也一样?

库比亚克:在一些地区只好这样做。至于小集体农庄,应当承认,我有怀疑——是否需要对它们进行土地规划,它们需要建立,但不需要进行土地规划。当我们在这些地区组建机器拖拉机站的时候,这些小集体农庄就会发生变化,土地规划工作将化为泡影。我们面临着对轮作进行土地规划。除了进行土改的一些地方,在各民族州里将进行土地规划。在建立集体农庄的时候,也可能有这种个别情况,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措施我们必须停止。对于小集体农庄,应当仔细地讨论和计算,以土地规划的这种状态我们是否能维持到每个区都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在那些将组建机器拖拉机站的区里,我们应当只在轮作制土地规划方面

进行土地规划工作。卡明斯基同志白白放弃了自己对使用1800万卢布的方针。

卡明斯基:我没有放弃。

库比亚克:我认为,我们最好用由一个项目转入另一个项目的办法把这一千多万卢布用于购买牲口。

主席:现在请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发言。

舍博尔达耶夫:对于我们最近看到的集体化高涨的浪潮,需要特别看待。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集体农庄的发展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进行,但最近两三个月正在发生的情况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对集体化发展道路的观念。我们过去关于集体化的那些观念,现在已经不符合现实提供给我们的事实。

浪潮兴起得如此迅速,数字都追赶不上生活。卡明斯基同志通报的数字已经完全不能反映实际生活,不能反映沸腾的农村里正在发生的情况。

当卡明斯基说,集体化的农户在下伏尔加为8%或者在北高加索为10%的时候,这已经完全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安德烈耶夫同志已经举出了集体化对农户的覆盖超出两倍以上数字。下伏尔加的情况也同样,大约是25%。8%和25%这个差别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最近两三个月里形成的。正是这个最新的浪潮使我们考虑村、区、专区全盘集体化的问题。而且我们正在非常迅速地走向全盘集体化,而不仅是在个别的区和专区里。下伏尔加边疆区过一年到一年半也将成为全盘集体化的地区。这一点我们在地方上看得十分清楚。一部分发言者看不见运动的这些特点,在集体化问题上仍抱着过去的观念,看不见全盘集体化提出的新问题。

有人喊:它表现在哪里?

舍博尔达耶夫:表现在全部土地的集体翻耕,生产资料必须公有化,因此,农业的主要生产过程必须公有化,不被接受加入集体农庄的富农户当然除外。

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集体化的过程中,正在逐渐显现出农民将组织在其中的大集体农庄的基本类型。

这首先是实行耕作公有化,消灭份地——共同播种,对春播我们将使用的种子实行公有化;秋天我们用公有打谷机把四个专区的几乎全部收成进行了脱粒。剩下的是还要对收割进行公有化。这些主要的农业生产过程在我们各产粮区里将实现公有化。

农民不提章程问题,章程将是什么样的等问题,有时他们甚至不经过我们就作出决定,不问章程如何,这之后便立即开始共同翻耕“一块土地”,带着所有的

犁杖下田,村苏维埃决定:两俄里这么翻耕,五俄里这么翻耕。这是个人地段的终结。我特别强调全部土地(富农的除外)集体翻耕的意义,因为在先前的初级集体农庄里往往只有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实行了公有化。

我们土地翻耕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播种的情况也同样。农民在实际解决农业若干生产过程的公有化问题。

实践表明,凡是公有化过程覆盖25%—30%以上农户的地方,其余的就会像传染病蔓延那样迅速地公有化,一个村接一个村必然会过渡到集体的形式。当个体农民知道,村子的三分之一,农户的三分之一已经加入了集体农庄,他们对自己的产业就已经没有信心了。这种集体化完全不可避免地、自发地在继续发展。

因此我们坚信,在未来一年半期间我们一定会做到使我们边疆区的全盘集体化成为事实,我再说一遍,仅仅主要生产过程的集体化决不是农民全部经营活动的公有化。农民相当大部分的经营活动是在他的庄园里进行的,各种副业活动和其他各业是这些主要生产过程包括不了的。

过一些时候,全盘集体化的浪潮无疑会扩大到那些边疆区、州和共和国,它们的代表在全会上并不特别积极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浪潮也许稍迟一些才会到达那里,但是,我们曾经面临的那些问题,过一些时候就会直接出现在你们的面前。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应对它们,就像应对粮食收购那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

我就不谈引起集体化这个高潮的原因了。非常清楚,中农确信,他们不能走富农经济的道路,他们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是否意味着,中农不会有动摇呢?绝对不是。如果下一年我们对集体经济作的经营总结是负数,中农就会为自己计算不利的经营结果,就可能会发生动摇。一切都取决于农业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的提高。我认为,有力量使我们能够肯定地说,新集体农庄的生产率将高于个体经济。在霍皮奥尔,就是那个现在已经完全集体化了的霍皮奥尔(虽然卡明斯基同志说它集体化了60%),整个专区秋翻是集体进行的,“在一块土地上”,没有个人的份地,而秋翻面积比去年几乎增加了一倍。而这是整个播种面积的主要问题,因为霍皮奥尔专区主要是在秋翻地上播种小麦。

这里有人询问粮食的情况。霍皮奥尔专区,尽管这时正在进行破除,在全边疆区率先超额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而且地方干部说:我们担心,农民别把种子也上交了,指望它们——集体农庄和国家不会让他们没有种子的。在完成各种义务方面,霍皮奥尔名列第一。

马队说明,在旧的技术基础上,用旧的牵引力能做出什么事情,马队表明,用

马可以比个体户多翻耕土地一倍,甚至两倍。我们不是翻耕5—6公顷,而是10—12公顷并认为还可以翻耕更多一些。

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谈话中把没有拖拉机、没有动力的集体农庄与保留旧技术基础,但把技术集中在一起、组织分工等等并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的手工工场进行了比较。确实,即使在现在新的集体农庄里那种完全手工业方式的和不熟练的领导下,它们的秋耕情况也比个体户好。这是一个表明我们可以沿着这条道路勇敢前进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要知道,当你看到农民抛掉自己的份地,在集体翻耕土地,摧毁旧的经营方式的时候,有时心里会感到可怕,因为,我再说一遍,如果结果是他们翻耕的地比较少或者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大部分新集体农庄庄员感到自己明年的经济状况会恶化,这对现有的集体化的高潮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应当考虑到,集体化的现有的速度在大大地破坏其他农民对应当发展他们产业的信心。在牲口问题上这一点感觉得特别明显。我们在集体化的地区里和没有实行集体化的地区里都有大量出售牲口的情况。米高扬同志靠这在超额一两倍完成肉的收购计划,但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情况,这将意味着,在拖拉机到来之前,我们的牵引力将会减少。因此基本的结论就是,不能放慢全盘集体化的速度,应当帮助农村尽快地和尽可能没有痛苦地过渡到主要农业生产过程的公有化和农业自身的扩大。虽然在由个体的土地耕作过程及其他农业主要过程向公有化过渡的事业中有许多重大的困难,这种过渡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能够坚持到拖拉机到来的时候。关于拖拉机农民都知道并强烈地提出这个问题。有很多代表团到拖拉机厂去,看看是否真的有这个拖拉机工厂。在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根据我们报纸的倡议,有两千有组织的和相当大量没有组织的农民前往参观。

其次,我想谈谈所感觉到的莫斯科许多同志对全盘集体化、对现在席卷农村的那个运动的有些冷漠的态度。当这个问题是我们地方党组织主要工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冷漠的态度,某种怀疑主义和议论,说这件事根本就是吹出来的,我们未必能够巩固现有的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缺点被提到首位,等等,等等。一方面,这是由于一部分同志不了解运动的规模,在这个问题上还生活在昨天,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种冷漠,这种怀疑主义来自于异己营垒。需要健康的批评和对运动的困难和缺点的清醒的估计。但是不应当只说明集体农庄运动,而且是昨天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消极方面,不说明哪些现在是最典型最主要的东西,而说明哪些是上一个阶段典型的东西。这意味着抹杀主要的问题。当然,在

新的运动中也会有病态的现象,但现在不应当只做一件事情——只谈论消极方面和缺点,像有些同志在这里所做的那样。

另一方面,不相信集体农庄会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真正康庄大道的情绪在我们党内有一定的传播。右倾反对派坚持不懈向我们证明的东西、布哈林关于只有贫农而且只是其少数会加入集体农庄,而对中农的组织只能通过合作社的周转来实现,只有这样同富农一道中农才会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上升为“农民局限性”理论的观念没有完全根除³³⁸。中央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应当更强烈地表示反对这种冷漠情绪,反对这种怀疑主义,同时突出和明确地强调指出我们在集体化事业中所面临的困难。

在与集体化相关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必须提出过去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否会尖锐化,这些过程将怎样进行?毫无疑问的是,与富农,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正在尖锐化并将继续尖锐化。正是在那个走在集体化前面的霍皮奥尔专区里,我们看到了富农—白匪力量的联合,看到了具有最极端白匪纲领、反苏维埃政权暴动纲领、用半截枪进行暗杀纲领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³³⁹。这是合乎规律的过程,它与富农上层被孤立有关,这种孤立是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结果。十分清楚的是,争夺集体农庄的斗争,争夺这些集体农庄领导权的斗争将以最激烈的形式继续下去,“红色土壤改良者”就发生过这种情况³⁴⁰,这种情况在巴拉绍夫的一些集体农庄里和对集体农庄运动的一系列调查里都看到过。最激烈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富农将从外部极力使集体农庄运动不沿着集体农庄的道路发展并企图把集体农庄变成冒牌集体农庄。现实生活里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个别的富农将不顾一切障碍钻进集体农庄,从内部瓦解它们。这是十分清楚的。在集体农庄内部,相当大部分的生产过程仍然未实现公有化,决议草案里所说的那些社会矛盾将会在这个基础上保存下来,阶级斗争的成分将会在集体农庄内部保存下来,特别是在其低级阶段。但是应当十分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一些主要生产过程的公有化使我们能更容易地进行这一斗争,使我们能更容易在这一斗争中制胜。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在缩小。因此十分迫切地提出了关于改造农民、把农民的劳动者“灵魂”组织起来并克服其小私有者“灵魂”的问题。

对于我们地区正在进行的和显然不久将席卷我们全国的集体化运动,我们是否作好了准备。我认为,对这个运动我们现在还没有作好准备,我们应当在更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这一点甚至现在,在这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都有反映。也许,中央委员会里应当分设一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处

理我们所谈的农村贫中农部分的巨大群众运动的日常问题。每天都在出现需要立即予以回答的新问题。这不是我们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直到最近所看到过的那种平稳发展的运动。这是排山倒海似的群众运动,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需要党的直接的干练的领导。

我们必须特别提出干部问题,而且是在比全会决议所提出的更大的规模上。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对,应当提出为集体农庄培养数十万干部的问题,而且应当用这样的办法进行输送,就像我们过去通过相应的培训班³⁴¹为红军输送干部那样。我觉得,这些实际问题应当提得更坚决一些。它们在政治局的草案里³⁴²被坚决地提出来了。决议是好的,符合生活现在提出的那些任务。但应当真正保证能够对现在已经漫过地方组织头顶的这个巨大的运动进行全面的领导。

主席:收到了由一批中央委员签名的建议修改关于结束讨论的决定的恳切请求。

有人喊:当我们进行修改的时候,有两个人可以发完言。

柯秀尔:朝哪个方向修改?

主席:朝明天还继续讨论的方向修改,但希望午休前听完总结发言。

有人喊:已经有过明天一早就听取总结发言的决定。

主席:是有过决定。所以我才通报你们,收到了一批中央委员关于修改这个决定的建议。现在我提付表决。谁赞成修改决定? 15票。谁反对修改决定? 少数。

现在请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发言。

弗拉基米尔斯基:我只谈谈“集体农庄运动”概念所包含的问题之一,即组织问题。组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集体农庄自身的内部建设。我认为这是根本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能够说的是,就像莫洛托夫同志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集体农庄运动概括地说的那样,“可惜,关于它我们什么也不了解”³⁴³。我读了现有的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全部书籍,它几乎一个口袋就能装下,那里面关于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几乎什么也没有。令人遗憾的是,卡明斯基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也未能提出这一点。这个问题将是我们党的机关和科研机关将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我来谈谈组织问题的另一部分,即关于从组织上驾驭名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这个规模宏大的运动的问题。它绝对装不进建立集体农庄的概念里。它包括的更多,它也包括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概念;不但如此,它还包括农民,贫中农群众现在在改造自己的农民经济中所抱的一切追求。因此,用百分数来概括这个运动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概念中包括,例如,

这样的事实,关于建立集体农庄的话题迅速从一家农舍传到另一家农舍,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区传到另一个区并正在覆盖所有的农民。我了解这样的事实,例如,在西部州的一个专区里(罗斯拉夫利专区里)覆盖了20个村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20个土地共用社,因为那里的村庄一心想建立亚麻集体农庄。关于农民的这个运动无论是党组织还是亚麻合作社都不知道。这个运动有这样的事情,例如,中央种麻合作社联社这一个星期里就收到了各地发来的要求建立集体农庄联合社的14封电报。这里还有这样一件事,当利霍斯拉夫利得到拖拉机以后,这些天那里发生了如同在革命的日子里我们无产阶级中心发生的那种情况,全体群众打着红旗走上街头。我就把这个运动称为集体农庄运动。这说明,这个运动是大规模的贫中农运动,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典型的和特有的运动。就形式而言,它的特点是由个体小经济向公有化大经济的过渡。而就实质而言,它十分丰富多样,包括农民中间、农村中间一切对抗性的、一切互相矛盾的结构。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运动,就其规模、深刻性和复杂性而言,在农民运动史上未必能有与之相匹敌的,而不仅因为它覆盖了我们苏联这样辽阔的地域。它的特点还有,这个运动首先是在高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波及的是商品率最高和阶级斗争最发展的地区(如中央统计局最近的调查所表明的)。农村中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社会集团都参与了这个运动。因此,运动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令人惊讶。最后,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在拥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不管这种领导有时显得多么不够,和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中央拥有一切物质上和组织上的可能性把这个运动纳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这个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在我看来,就赋予组织问题,即如何把这个运动纳入我们的组织框架并对其进行领导的问题以首要的意义。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农村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对这个运动的态度问题。

如果农村的贫农完全拥护这个运动,有明确的追求目标,这表现在,例如,根据中央统计局最近调查的统计资料,他们加入的主要不是初级形式,而是高级形式的集体农庄,是公社,这清楚地表示出贫农加入集体农庄时给自己提出的目标。这是对依附地位的摆脱,有时是对他们过去在一些地区所处的对于富农的奴役性依附地位的摆脱。中农群众大批加入集体农庄,这一点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这表明他们对我们党在农村的政策和实践的信任。富农集团对这个运动持的是另一种态度。如果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富农反对这个运动的公开、激烈的斗争形式,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有隐蔽的斗争形式,而有时还有钻

进我们集体农庄的企图。我把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与旧合作社里的那种现象联系起来,那里过去有并且现在仍然还有富农强烈的影响,现在富农感到,随着我们刚刚开始的合作社的改组,他们在那里的影响开始减弱,于是他们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办法并想利用集体农庄运动。

当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在发展的时候,很自然,一切社会政治集团都要确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资产阶级的报纸对集体农庄运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这说明,资产阶级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一现象,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这一现象。我们党内有些派别在改变对集体农庄运动的态度,这说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对这一新现象的某种适应。在前天宣读的右倾分子的新政纲里,集体农庄问题占有那么特殊的地位,本来是应该谈一谈的,但我今天不谈它。我认为(我用两句话来说),在集体农庄问题上主要的东西是右倾分子与党的总路线的根本分歧,这是对农村资本主义集团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在右倾分子的政纲里被掩饰到如此程度,可以说,隐藏着过去就表露出的那些分歧,就是向整个资本主义成分进攻的问题上,在向资本主义进攻问题上的那些分歧。这个问题在这里同样被提了出来,就像过去在粮食收购问题上被他们提出来一样。但是,请允许我不谈这一点。

这一切加在一起使我们赋予集体农庄运动的组织问题以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即创造驾驭这个运动可能性的问题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实际完成(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我们党在农村三位一体的工作任务,即组织贫农,依靠他们并与他们协商一致,联合中农,向富农展开进攻,保证集体农庄运动的建设及对这个运动的领导。

为了解决这个组织方面的任务,需要一方面对集体农庄系统,另一方面对合作社系统的地位和职能准确地予以确定。诚然,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运动中至今“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然而我们能够找到这个运动中正在形成的稳定的形式,这种稳定的形式是有的。我举两种形式,它们完全决定着,一方面集体农庄系统的职能,另一方面,合作社系统的职能。第一,关于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问题。这已经是在整个运动里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个稳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这项任务作为单独的独立任务分离出来,从组织方面给予特殊的服务,那么,我担心,我们会在这方面向后倒退一步,因为我认为,对于集体农庄系统来说,大型集体农庄作为制高点问题应当是其工作的根本问题。

对于作为向集体农庄过渡系统的生产合作社来说,这个职能就是建立生产合作社和签订预购合同。整个合作社—集体农庄工作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这两

项任务,这两个问题上,而这就要预先解决什么是集体农庄的问题。

我翻看了中央统计局出版的由盖斯特³⁴⁴同志主编的有趣的资料,我应当说,这里把那么多种多样的形式放进集体农庄这个概念里,有时很难在它们之间找到某种共同的东西。

有人喊:直到乌克兰的机器合作社。

弗拉基米尔斯基:卡明斯基同志对我说,关于机器合作社的资料是1928年的。现在发展的1929年的资料是,1.4万个集体农庄组织中3500个为机器合作社,我很了解,乌克兰的机器合作社是什么。

有人喊:这根本不是集体农庄。

弗拉基米尔斯基:这我很清楚,但问题就在于,它们被列入集体农庄里并作为集体农庄统计。

有人喊:不对。

弗拉基米尔斯基:在确定“集体农庄”的概念时,我们再也不能局限于章程形式——公社、劳动组合、共耕社。这些形式已经表现不了现象的本质。舍博尔达耶夫同志说,在下伏尔加劳动组合是主要形式。如果你们看一看这里分发的由埃赫同志作序的关于西伯利亚集体农庄的材料,你们就会看到,那里劳动组合形式正在消失,剩下的只有两种形式:共耕社和公社。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到公有化最低限度的规定中去寻找,这个最低限度应说明“集体农庄”概念的特点,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比过去所做的更多地谈一谈。

下面我想对集体农庄—合作社运动的领导概括地说两句。我认为,目前的集体农庄—合作社运动最近一年的特点是,合作社运动和集体农庄运动密不可分的联系问题终于成了共同的财富。它们并行存在,如果有人提出把它们对立起来,那只能是歪曲党的路线。因此,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保证对正在汇成一个总流的这两股潮流的统一的领导。但这种统一将在哪里实现,这将是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集体农庄总联合会,还是别的什么机构,这个问题绝对没有丝毫意义。

[米高扬:像出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东西,但是统一的领导。]³⁴⁵

弗拉基米尔斯基:主要的是建立基层系统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这应对那些不在我们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系统工作的人说),我们在这问题上不明确。当我问,集体农庄的中间环节和基层环节将会怎样,集体农庄联合会是否将存在的时候,例如,别连基同志说:“在州里将存在,州以下没有,那里将有专门系统进行工作。”

[米高扬:在您的安排下,最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345

弗拉基米尔斯基:应当提出关于加强我们在州里现有的集体农庄运动机构的问题。我在地方上多少看了看,我要说,我没看到比地方上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更软弱的机构了。舍博尔达耶夫同志,也许在你们下伏尔加有很多人关心这项工作,但在其他地区,我看到,很少有人关心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运动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将在边疆区,在州里,在区里建立怎样的对这个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机构。我把这个问题与我一年前说过的那个根本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关于领导,关于在一定生产地域(区)组织农业的问题。我说过,在工业中我们有三人小组形式的这样的领导机构,而在农业中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领导机构。例如,本应领导这事的地政机关没有了。我只是用这来说明库比亚克同志今天发表的悼词。

有人喊:悼词?

弗拉基米尔斯基:是的,因为在地方上你们感觉不到农业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存在,它们不领导这件事情。我讲一件夏天我亲眼看见的值得注意的事情。中央黑土地带州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一个工厂得到了来自美国的第一台联合收割机。这个专区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下发了一个通知:联合收割机将于某某日进行试车。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代表来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的工作人员来了,地方区委会的一位代表来了。合作社没有人来。而从专区地政机关收到一份公文,公文说:“随文附上表格若干,请于联合收割机试车之后填上有关数据并寄回。”

有人喊:农民去了吗?

弗拉基米尔斯基:农民去了并用整整一个星期都在谈论这台联合收割机。

柳比莫夫:开动了吗?

弗拉基米尔斯基:开动了,而且工作得很好。在地政机关的这种状态下,我们无法谈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安采洛维奇同志谈了刚刚接触这个运动的那些党支部。因此,根本问题是在每一个区里建立对这种农业生产的领导机构的问题。而且我认为,从这个观点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我所想象建立的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是什么样呢?不是我们现在有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那个样子。如果它将建立成同一个样子,既具有同样的职能,又具有同样的组织系统,那么它将是不能领导农业生产的人民委员部。

安采洛维奇:应当怎样建立合作社呢?应当怎样在中央建立领导机构?

弗拉基米尔斯基:这将是合作社联社联合会,还是集体农庄联合会,还是类

似合作社理事会、合作社的“莫斯科市苏维埃第一交响乐团”³⁴⁶的什么机构,只要每一把合作社的小提琴在独立演奏,这没有很大的意义。我已经把我的建议提交给委员会,令人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得到赞同。

现在我再谈一个问题就结束发言。我认为,与这个组织问题相关联,能够在这项工作中保证党的路线正确性的党的干部在任何一个合作社系统都不会有这样的意义。这是比粮食收购工作更为重要的工作。应当向这些干部提出什么要求呢?不仅是了解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不仅是一般地了解农村,应当了解自己的农村,以便领导集体农庄运动。在去西部州的时候³⁴⁷,我看到了了解自己区里每一个农舍的区干部。这样的了解自己的农村的干部才能够在地方的领导集体农庄运动。而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农村,不了解集体农庄里在发生什么情况。这不是说,我们没有进行集体农庄调查。我没有可能向你们讲述,我们这里谁在搞,或者更准确地说,谁现在不搞集体农庄调查。许多机关一次又一次地安排调查,有选择地到地方上去等等。进行调查总结,结果这些工作毫无用处。而应当从事这项工作的机关,还没有着手干这件事情,因此我认为,中央应当提出保证这个机关的工作的问题,而这样的机关就是列宁农业科学院,大经济研究所,该所应当承担起研究整个这一运动的任务³⁴⁸。

有人喊:恰亚诺夫将在那里进行研究。

弗拉基米尔斯基:在那里的不是恰亚诺夫,而是我们的同志,是共产党员。

我现在就结束发言。如果把整个运动照原样拿来,那么就可以说莫洛托夫同志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就是支持农村集体农庄建设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³⁴⁹……

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无论现在我们怎样勇敢和坚持不懈地去对待,生活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这样地去进行工作,至少不要落在这个运动的后面。而为此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来展开农村的集体农庄运动。“所以缺乏,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它很不了解。”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的第二项任务是:由我们的科研机关——列宁科学院对整个集体农庄运动进行科学的、严格科学的研究。

主席:会议休会到明天上午。

第十次会议

11月15日,上午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请别连基同志发言。

别连基³⁵⁰:安德烈耶夫同志指出,农民对集体农庄建设的态度正在我们国营农场,特别是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国营农场的影下发生怎样的变化。

现在机器拖拉机站正在发生同样的影响,如果不是更大的话。机器拖拉机站特别直观地向农民居民显示公有化大经济的巨大的优越性。它们勾勒出了整村整区实行大规模集体化的新的途径和为建设拥有数万公顷土地的真正大型的集体农庄奠定了基础。

我想简短地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农业合作社在这方面的经验。现在我们在全联盟已经有80*个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其中两个是国营的,其余的全是合作社的。我们粮食合作社系统在乌克兰有16个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在俄罗斯联邦有62个。我觉得,这些数字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它们表明,在展开机器拖拉机站建设方面合作社的自主行动和首创精神应当起到多么大的作用。这些数字同时证明了农业合作社工作的重大进展,农业合作社在克服自己工作的商业倾向并开始认真完成自己改造农民生产的主要任务。

在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中,有非常多的缺点。它们刚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装备很差。粮食合作社的62个站拥有2400台拖拉机,其中将近1000台是1928年以前的进货,只有1000多台是1928年和1929年的进货。大多数拖拉机是“福特”牌和“普梯洛夫工人”牌的。每个站平均拥有将近40台拖拉机。缺乏牵引农具。各站的车库和修理厂装备不够。缺乏组织者、农艺师、工程师、技术员等。3500多名拖拉机手全是从当地农民和雇农中招募的并在短期拖拉机训练班进行过培训。

* 速记记录为将近100。——编者注

我们的62个站现在服务于拥有115.3万公顷土地的550个土地共用社。

尽管设备不好和有很多的缺点,农业合作社的机器拖拉机站和队在它们所服务的农民经济中实现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正在机器拖拉机站所在的地区实行一整套措施,正是全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里包含着对机器拖拉机站和队给予它们所服务的周围农民经济那种巨大革命化影响的说明。

要把集中起来的拖拉机与农民经济的合作化和集体化,与对居民的新形式合同关系的发展,与在长期预购合同基础上把计划因素运用于农业生产,与对农民经济农艺服务及对其进行根本的农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在所有这些措施的结合里包含着我们在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和队活动的地区里所看到的农民经济技术和社会改造进行得非常迅速的原因。在粮食农业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和队的基础上建立了440个大型集体农庄,可以大胆地说,这是集体农庄巨人,每一个都包括几个村庄和拥有一万、两万、三万公顷以至更多的土地。

现在我们正感受到来自要求加入机器拖拉机站的周围村庄的巨大压力。有各村之间抓阄决定谁先入站和派代表团去中央请求扩大机器拖拉机站等情况。

中央黑土地带州州粮食合作社联社主席萨尔基斯同志最近告诉了我对粮食合作社几个机器拖拉机站和队的工作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果。调查是按照下列提纲进行的:1. 站和队对农民经济的农业技术影响;2. 站所服务的农民经济播种面积的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商品率和收益率的提高;3. 农民经济的社会经济改造。

下面就是机器拖拉机站农业技术影响的资料。

在被调查的站所在地区进行了百分之百的秋翻,并且86%—90%是早期的休闲地;所有的播种用的都是经过挑选和消毒处理的纯净的种子;到处都实行多区轮作制;在轮作中采用或扩大了价值高的商品作物。例如,塔洛夫机器拖拉机站所在地区(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专区)的亚麻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12.2%,而同一行政区农民经济的播种面积占1.4%。奥哈切夫站所在地区的大豆播种面积为16.6%,而同一行政区农民经济的播种面积为1.3%。其他高价值作物的情况也同样。

下面是关于播种面积扩大的资料。塔洛夫站扩大了播种面积28.4%,而行政区其他部分的播种面积为2.6%。奥哈切夫站扩大了播种面积15%,而该区其他部分的播种面积仍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伊洛瓦伊-德米特里耶夫斯克站的播种面积扩大了11.7%,该区的其他部分播种面积没有增加。必须指出,在可耕地面积很大的各个州里——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合作社

机器拖拉机站和队所在地区播种面积的扩大常常是80%—100%，而在个别情况下为300%，甚至为400%。

下面是说明机器拖拉机站对农民经济商品率提高的影响的资料。在包括50个土地共用社的奥哈切夫站所在地区谷类作物的商品率提高到总产量的44.5%，而在同一个行政区为22%。伊洛瓦伊-德米特里耶夫斯克站(科兹洛夫专区)处在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今年不得不往那里运去数量为该区粮食总产量4%的粮食。而在机器拖拉机站所在的地区，农民上交了总产量18.4%的商品余粮。这样，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影响下，该区相当大的部分由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变成了粮食生产地区。油料作物的商品率为：塔洛夫站达到总产量的90.3%，而同一个区为61%；帕里耶夫站所在地区为97.5%，而同一个区为65.1%；在霍霍尔站所在地区为85%，而同一个区为62.5%。

商品率的这种增长，除了播种面积的扩大，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大提高。

	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地段	在行政区	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百分数
塔洛夫机器拖拉机站(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专区)			
燕麦	15.0	13.0	15.4
黍子	13.0	9.7	34.0
向日葵	10.0	5.8	72.4
春小麦	11.0	8.0	37.5
亚麻	8.0	6.5	23.4
帕里耶夫机器拖拉机站(坦波夫专区)			
燕麦	15.0	10.0	50.0
向日葵	8.0	5.6	42.8
马铃薯	100.0	82.0	21.9

这就是两个机器拖拉机站地段的单位面积产量与那两个行政区未组织起来的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比较表：

塔洛夫站所在地区燕麦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相对较少，原因是站外的地区播种的也是纯种燕麦。几乎我们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都达到了30%，40%，50%。

机器拖拉机站所在地区农户的收益率大大提高了。在被调查的站所在地区每户平均获得各种作物 57.9 公担,总额为 417.01 卢布,而在相应的行政区熟地上,在相当于中等年成的情况下每户平均只能获得 25.5 公担,总额为 152 卢布。差别这样大的原因不仅是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且也是在轮作中大量采用和扩大了高价值的作物。因为要扣除总收成的三分之一作为站的维持费用,即 19 公担,用货币计算为 139 卢布,机器拖拉机站第一年工作的结果是,每户收入 276 卢布,而不是 152 卢布。这是大田作业方面,不算畜牧业、养禽业、蔬菜栽培和农产品初加工方面收益率的变化。

不言而喻,对于贫农户来说收益率的增加特别大,机器拖拉机使他们能够头一年就全部开垦自己按人口分配的份地,把收成的质量和数量提高到其他农户的水平。

中央黑土地带州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第一年的工作成果就是这样。这些成果对机器拖拉机站在农村贫中农阶层中受到欢迎和站的组建与工作遭到富农的疯狂反抗给予了详尽的说明。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对农业的集体化过程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和集体化在机器拖拉机站所在地区以怎样的形式在进行呢?调查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回答。

我们建立塔洛夫拖拉机队的时候,全区只有 2.2% 的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在站的活动地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预备党员。现在,塔洛夫机器拖拉机站所在地区 100% 的居民都加入了集体农户。奥哈切夫站所在地区在它建立的时候根本没有集体农庄。现在,站所服务的全部 50 个土地共用社组建了集体农庄。帕里耶夫站所在地区 73% 的居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其余的加入了初级生产合作社。在伊洛瓦伊-德米特里耶夫斯克站所在地区,100% 的居民都实现了集体化。霍霍尔站所在地区情况也相同。同时必须指出下面的情况:塔洛夫站所在地区 49% 的集体农庄是按照对农民的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的劳动组合章程建立的。在奥哈切夫站所在地区,该站所服务的全部土地共用社都采用了劳动组合章程,对农民的马匹和农具实行了公有化。在伊洛瓦伊-德米特里耶夫斯克站所在地区,我们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

对农民的农具我们按集体性原则使用,以补充拖拉机和复杂机器之不足,或者变卖,把腾出的资金用于在公有化基础上发展农业的其他部门:把马换成奶牛,开辟公共果园,发展经济作物等等。除了农具的公有化,在站所服务的所有合作社里都规定必须从收成中提取总产量 5%—10% 的公积金。

我们的各个站以其在农民经济集体化和农民资金社会化方面的这些成就有

利地区区别于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后者在集体化和吸收居民资金方面的成就很小,虽然,比如说,塔拉斯·舍夫琴柯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³⁵¹比我们各个站设备都好,而且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这是很清楚的,合作社比国营农场更能适应对居民进行生产组织方面的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现在,我们在中央黑土地带州有17个村际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每一个站平均为10个村和1421个农户服务。这是巨大的集体农庄,特别是对于中央黑土地带州这样的地区来说。现在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将在农民的土地上根据农户自愿联合的原则建立巨大的农业工厂,就如同我们现在正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未种庄稼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农业工厂那样。

我列举的中央黑土地带州的资料对于机器拖拉机站所在的其他地区也是典型的。

在北高加索、下伏尔加边疆区、中伏尔加州这样的可耕种土地多的地区,由于具有扩大播种面积更广泛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得到更大的效果。在这些地区我们已经拥有很多覆盖1.5万—2万公顷,甚至更多土地的机器拖拉机站。在叶伊斯克区,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覆盖土地3.2万公顷;在春播运动期间,机器拖拉机站所覆盖的地段至少将达到7万公顷。我们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我们的每一个站配备250—300台拖拉机,使每个站的覆盖地段平均达到6万公顷。在许多地区,例如在叶伊斯克站(北高加索)、萨莫伊洛夫站(巴拉绍夫专区)等所在的地区正在规划更大的地段——10万公顷以上。各个站扩大到这种规模遇到的唯一困难就是拖拉机不足。

由于缺乏拖拉机,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对农民的马匹实行公有化的办法,最大限度地使用活的牵引力。

我们各个站拖拉机的负荷平均每台接近200公顷。如果考虑到相当大部分拖拉机的磨损程度和我们全部拖拉机的品牌构成,它们大都是“福特”牌和“普梯洛夫工人”牌小马力拖拉机,这是很大的负荷。拖拉机高负荷的原因是我们各个站在日夜两班,甚至三班交替工作。

机器拖拉机站和队为整村整区的全盘集体化奠定了基础。现在这个运动远远地超出了机器拖拉机站所在的地区。全盘集体化已经覆盖或者现在正在覆盖没有机器拖拉机站的很多地区。然而这个运动到处都在发展,在期待拖拉机和复杂的机器,在指望组建机器拖拉机站。

昨天舍博尔达耶夫同志讲述了霍皮奥尔专区全盘集体化的情况。类似的事情在许多别的专区也可以看到,尽管规模较小。以农民农具公有化和集体使用

为基础的整村整村向共同翻耕田地的过渡具有群众性与自发性。收获大忙期间,共同打场和共同收割庄稼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秋翻时期这个运动的规模扩大了许多倍。在许多地区秋翻是集体进行的。整个整个村庄把农具和马匹合在一起,赶着几百匹马组成的浩大队伍到田里去共同翻地,消除了个人份地之间的地界,把土地连成一大片一大片公有的农田,在许多情况下绵延数十俄里。

在霍皮奥尔专区,整个秋翻是集体进行的。在中央黑土地带州利戈夫专区的若干区里和在较小规模上在许多别的专区里情况也同样。

安德烈耶夫同志和舍博尔达耶夫同志昨天所说的关于集体化速度的话丝毫没有引起我们农业合作社工作者的怀疑。我们相信,最近一年半至两年期间我们粮食和原料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居民将加入集体农庄。有些同志担心,集体化的这种速度会对集体农庄的质量方面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言而喻,在集体农庄组织覆盖率和为集体农庄服务这件事上,最近几年我们将经历巨大的困难。我们还不能在最近两年期间充分地集体农庄奠定新的技术基础。但这决不意味着,已经开始出现的集体农庄的量的增长会对集体农庄建设的质量方面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运动的巨大规模会把集体农庄建设大大提高到更高的阶段。非常清楚,大规模的集体化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会大大加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像扩大播种面积、实行农技最低限度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发展良种畜牧业和养禽业这样的任务,正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我们才能够在最近几年大部分予以解决,尽管集体农庄技术基础的水平很低。大规模的集体化是与农民经济向农业改良形式的大规模过渡,与农业技术改进措施的大规模采用,与农民农具的更充分和合理的使用,与播种面积的扩大,与对农村贫农帮助的大力加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霍皮奥尔专区正在发生的情况在这方面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集体进行秋翻的结果是,这个专区的秋翻面积翻了一番。霍皮奥尔的同志们打算今年至少扩大播种面积50%。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集体农庄建设巨大的量的增长将伴随着初级集体农庄向集体化更高级形式的大规模过渡。有一切理由认为,在最近的将来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将不再是共耕社,而是农民农具公有化的劳动组合。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明显显现出来。现在很大一部分集体农庄一开始就是按照劳动组合章程建立的,对农民的马匹和农具实行了公有化。这应当成为并且无疑很快将成为常规。在农民农具的公有化方面,在集体农庄股金和公积金的积累方面,我们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对集体农庄的要求。十分清楚,整区和整专区的集体化只有在农民居民自身资产公有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农民经济的大规模集体化也与集体农庄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大规模集体化的条件下,个别集体农庄的规模将逐渐接近最佳点,这个最佳点在每一个情况下将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并首先取决于集体农庄技术基础的性质。机器拖拉机站和队建设的发展和集体农庄结为联合社将在集体农庄的扩大中起巨大的作用。

集体农庄由小向大过渡,首先是在农民农具公有化的基础上把居民自身的资金广泛吸收到集体农庄建设中来,广泛采用农业技术改造措施,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商品率,普遍提高贫中农经济——这就是在集体农庄运动发展的现阶段我们能够和应当对这个运动提出的质量方面的任务。这些任务集体农庄是可能并且一定会解决的,尽管它们的技术基础薄弱。

现在简短地谈谈农业合作社。

在准备大规模集体化的事业中,预购合同制应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今年应该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用预购合同覆盖主要产粮区的**全部**粮食作物和**全部**原料作物。这个任务的完成将对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集体化速度的加快给以巨大的影响。

中央《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的七月决议,就像中央《关于签订粮食作物预购合同的总结和当前的任务》决议一样³⁵²,目的是使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适应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我觉得,这些决议对于近期的集体农庄建设仍有自己的意义,只是需要有某种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农业合作社各专业管理中心将发展成为集体农庄专业管理中心。在专业管理中心和专业联合社之下的独立的集体农庄管理部门的建立正在组织上完成这个过程。中央七月决议规定,必须按照镇专业生产合作社的模式坚决改造农业合作社的基层组织。在整村整村签订预购合同的基础上组建的这些镇生产合作社,在准备农民经济大规模集体化的事业中,应当起到并且已经起着巨大的作用。相当大一部分大型集体农庄就是由镇生产合作社发展而来的。

必须加速农业合作社基层组织的改组。除了大规模采用农业技术改进措施,在农民农具公有化和集体购买复杂机器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耕作土地、共同播种、共同收获庄稼应当成为镇生产合作社的主要任务。在大规模集体化的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大概会跨过初级的镇生产合作社并直接过渡到建立专业的镇集体农庄。农业合作社的区级机构现在具有巨大的意义。不大大加强农业合作社的区级机构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区级机关,我们就不能把握集体农庄运动,就不

能组织这个运动和为它服务。

在已经开始出现的集体化的速度下,我们现在就应当把像伏尔加沿岸、北高加索等地各个州里的每一个区看作是最近的将来即将被全盘集体化覆盖的区。

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应当从这个前景出发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现在,最重要的是制订一个哪怕是最概略的关于集体化的区计划。必须联系每个区集体化的情况确定其农业技术改造的基本方针,规划轮作制、农业商品产品的去向,确定建设机器拖拉机站、修理厂、加工企业的地点,拟定全盘集体化情况下集体农庄的最佳规模、它们的经营方针、集体农庄联合的计划和农业网的建立等。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集体农庄基本建设和土地规划方面的区计划。估计到区的全盘集体化,现在就应当尽可能把拖拉机车库、修理厂、经营性建筑物、公用粮仓、加工企业建在主要产粮区。在土地规划的全部工作中也必须从这个前景出发。区的集体化计划应当成为与集体农庄、生产合作社和土地共用社签订预购合同时的依据。这些计划的存在及其与预购合同制的联系会大大减轻对集体农庄建设的领导的负担,使集体农庄建设能够进行得速度更快,而消耗最小。

主席:现在请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³⁵³:同志们!我用列宁的话开始。我来读列宁的出色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尽人皆知的一段的开头。这个地方就是:

“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列宁文集》,第17卷,第135—136页)³⁵⁴

所引证的这一段我们大家几乎都能背诵,现在它能告诉我们每个人特别多的东西。

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认为重要的是请你们注意最后一句话。我把这句话再读一遍:“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

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组织”和“主要”两个词的着重是列宁表示的。

所引证的列宁的意见从未这样适用于我们党的现时期,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无产阶级的主要作用是组织作用的指示现在具有最现实的意义。在正在展开的农民经济真正大规模集体化的时期,无产阶级的组织作用变得非常重要。

集体化的蓬勃发展给我们提出很多往往需要立即回答的极为困难的问题。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全会的讨论有一个缺点,这就是需要我们采取最积极和最坚决措施的十分成熟和十分紧迫的当前的问题在讨论中反映得不够。而这在近期内可能会对集体农庄运动产生不健康的影响。因此,今后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急迫的问题上,特别是把注意力放在当前的问题上。

现在关于集体化的速度谈得很多。大家都承认,这种速度非常快疾和迅猛。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别让我们工作的速度落在集体化速度的后面,而这种情况现在是有的。在集体化的事业中,贫农和中农在很多方面走在我们各级组织的前面。我们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在这里也显现出来。

由于农村广大群众被吸引到集体农庄运动中来,我们必须更坚决地着手清除我们机关——我们所有机关,从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起到地政机关、苏维埃、工会和党的组织本身止——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成分。官僚主义,我们的机关里有很多很多,它现在尤其妨碍真正驾驭农村中正在展开的建设,妨碍驾驭对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但是,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地向官僚主义加紧开火的。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地呼喊,反对官僚主义是工人阶级最紧迫的任务。在当前的条件下,在农村一切都在激荡、一切都在沸腾的条件下,要以真正领导者的身份参加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我们机关工作中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障碍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根本改变和改进我们所有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只有在同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和顽强克服实践中的官僚主义歪曲并在这一切方面依靠真正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向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展开全面的进攻,走在千百万群众参加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前面。

现在我直接来谈集体化速度的问题。

我们关于集体化速度的推论应当尽量在更大程度上与实践、与事实相一致。这一点我们并非总能做到,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大大地落在生活的后面。对于我们来说不容争辩的是,集体化在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这一速度正在越来越加

快,这确实是疯狂的速度。我举北高加索作为例证。

一年前安德烈耶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报告了北高加索农业高涨的情况。请把他当时关于集体化的数据与现在的数据,与昨天他说的情况比较一下。在去年的十一月全会上,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在北高加索集体化覆盖了8%的农户。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在这次全会上,他通报说,在北高加索集体化现在已经覆盖了25%—30%的农户。这样,一年期间集体化补充覆盖了大约20%的农户。同时,集体化的速度不仅没有减退,而是在继续增长。在这之后谁能怀疑,最近一年期间北高加索的集体化将再覆盖20%多的新农户。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最近一年期间北高加索一半以上的农户将被吸收到集体农庄运动中来。这意味着,北高加索1930年就将基本实现集体化。

在集体化的速度方面,下伏尔加并不落后于北高加索。显然,甚至在这些州的农民中占不小比例的哥萨克居民原先社会生活的独特习惯对于集体农庄运动也具有自己的积极意义。我们还了解,与这些州相比,像乌克兰(特别是草原区)、乌拉尔、中伏尔加和中央黑土地带州这样的地区也落后不了多少。

我们集体化事业的前景如何呢?我回答:我们必须看到,集体农庄运动已经向个别一些州和共和国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完全落在生活后面的话,我们必须同意这种看法。特别是现在正在制订若干年集体化计划的那些人应当记住这一点。

代表会议通过的五年计划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我们正在对这个五年计划的所有主要部分进行修改……

米高扬:而且是往好的方面。

莫洛托夫:而且是往好的方面修改。但是,当现在学做好事制订种种集体化五年计划的时候,那么,对这些同志是无法羡慕的。至少我不同意读这些五年计划,因为更正经的东西都来不及读。

实际上,现在怎么能够谈北高加索的集体化五年计划呢?既然我们有理由肯定地说,这一点我个人毫不怀疑,1930年夏天我们将基本上完成北高加索的集体化,怎么能够谈这样的五年计划呢?明年秋天我们无疑就能够说,不仅一个州,不仅北高加索将基本上完成集体化。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只是,在像北高加索这样的各个州里1930年就能够取胜的只是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形式。随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形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胜利而来的还将是若干年十分艰巨的工作来把集体农庄变成农业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基层单位。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然而,在当前条件下谈论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就是在做一

件不需要的东西。对于主要的农业地区和州,尽管它们集体化的速度有种种差别,现在应当考虑的不是五年计划,而是未来的一年。我再说一遍,要更多地注意当前的需要和任务,注意1929年底和1930年初的任务——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绝对正确。

莫洛托夫:最近几个月我们有很多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暂时对它们掌握得很差。因此,我必须指出,某些同志对这些话不要见怪,例如,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是没用的事情。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做起了不需要做的事情。与其写很长的关于五年计划末期成千上万个机器拖拉机站的计划,不如帮助中央黑土地带州和其他地区的拖拉机队组建成为机器拖拉机站。

臧声:对,对!

莫洛托夫:看来,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搞无用的五年计划,即搞纸上谈兵的同志们认为生活中存在的东西,从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实践本身中突现出来的东西是次要的。因此,我担心,在搞五年书面计划的时候,他们至少会十倍落后于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他们作了一个到明年春天建立102个机器拖拉机站的计划,而没注意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100个拖拉机站,只是它们的名称不同——在一个地方叫拖拉机站,在另一个地方叫拖拉机队。

有人臧:对。

莫洛托夫:归根结底,这是同样的东西。谁找出了或者能够找出它们——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之间的原则差别?

柯秀尔:没有。

米高扬:只有组织方面的不同。

莫洛托夫:组织方面的不同是有的,但是,要知道,我们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把差的集体农庄变成好的集体农庄,把差的拖拉机站变成名副其实的机器拖拉机站。今天它是拖拉机队,明天它将是机器拖拉机站。难道我们会对纸面上的那些站感兴趣,即使它们叫机器拖拉机站,而忘记实际的站,哪怕它们还是萌芽状态的和名称不同的——拖拉机队!难道我们会忽视集体化的活生生的事实,而去迷恋纸上的计划!

当整个农村正在翻天覆地,真正变成了沸腾海洋的时候,什么样的五年计划现在能够把集体农庄运动包括进去。对于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越过我们的一些纸面上的计划,我们只能感到高兴。这一切我是作为自我批评说的,因为我甚至算

是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理事会的主席³⁵⁵。(笑声)我本人与这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没有过关系,没劝过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干这件事情,而是建议他们更多地注意当前十分重大的实际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专心致志地干实际的事情,实际干组织集体农庄建设的事情。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成就是巨大的。众所周知,这甚至迫使我们的右倾分子半投降了,只能说他们是“半投降”,因为,虽然不得不在事实面前退却并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例如在集体化问题上,他们继续把自己彻底与列宁主义敌对的机会主义路线(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称之为特别的“另外一种执行党的总路线的具体方法”,而不是特别的路线)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得不退却,虽然还企图如常言所说“保全面子”。

顺便指出,这种退却是在这样重大的事实,如集体化的成功和粮食收购的成功直接压力下进行的。关于后面一点,现在需要单独地谈一谈。

情况是我们今年已经建立了9 000万普特的紧急粮食储备³⁵⁶。这是未来一年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之一。我们有9 000万普特的紧急储备,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地区已经完成粮食收购,最近几个月我们将100%地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这决定着今年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

对于集体化的事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春天,在春播运动期间,在组织方面我们将有一个对农业和对集体化非常有利的时期,这样的时期我们过去是不可能有的。

喊声:对!

莫洛托夫:如果我们将把力量集中于播种运动,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真正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春播,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们会干出一件漂亮的事情!

喊声:对!

莫洛托夫:这将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播种运动,它会使集体农庄在苏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春播运动的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这个播种运动期间,当我们的力量将,这样说吧,解除束缚和用于组织经济高潮和农村集体化,而且是以这样的数量,以这样的规模……

柯秀尔:和对情况的了解。

莫洛托夫:完全正确,和以对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的了解去进行工作,在这个运动期间就将解决许多最大农业地区全盘集体化的问题并将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出全苏联的集体化问题。

但是,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讨论集体农庄运动任务的时候,让我们不是来考虑五年计划,而是考虑1929—1930年度冬季剩下来的几个月。11月、12月、1月、2月和3月——这就是留给我们准备春播运动的时间。在这四个半月里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必须这样安排我们的工作,特别是与农村直接有关的各个组织的工作,以便实际帮助贫农和中农,最大限度地帮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利用春播运动掀起经济高潮和实行集体化。因为帝国主义老爷们暂时还下不了决心直接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利用时机在掀起经济高潮和实现千百万农户集体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最近的几个月、几个星期和几天的时间,不要错过现在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和新的任务。

现在我来谈集体农庄任务的问题。提出的决议对任务的确定是正确的,但当然只是基本上确定。在决议里,也像在卡明斯基同志的报告里一样,重点放在以下三个问题上:1. 集体化的技术基础,2. 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和3. 集体农庄的干部。关于这些问题我不能不继续谈谈。首先是关于技术基础问题。由于政治局11月5日的决定³⁵⁷,最近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根据这个决定,我们今年正在着手建立两个巨大的拖拉机厂,一个在车里雅宾斯克,一个在乌克兰。这两个工厂都将生产履带式拖拉机,车里雅宾斯克的是50马力的,乌克兰的是30马力的。当时决定一个月后讨论关于建设专门的中耕作物拖拉机厂的问题。看来,不久的将来就不得不提出进一步扩大拖拉机制造业的问题。11月5日还同时决定立即开始建设两个联合收割机工厂,一个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指由农业机器制造厂改成联合收割机厂),另一个在西伯利亚。此外,当时还通过了关于建设一个专门生产拖拉机发动机工厂的决定,这也将是一个巨大的工厂。

这一切只是农业机器制造业宏大规模的开端,而且仅仅是开端而已。例如,在农业电气化的事业中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前进。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根据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初步打算为农业提供大约100万千瓦的电力。关于这项任务完成的百分数就不用说了,因为它太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暂时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但糟糕的是,五年计划提出的(头一年的)任务的执行也开始得明显不能令人满意。由此可见,农业电气化的宏大工作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毫无疑问,电机在农业生产中将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毫无疑问,农产品(尤其是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的加工对电力的需求将增长得如此迅速,农业最近几年至少就需要几座巨大的电站。

我还要指出关于把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独立管理

中心列入集体农庄系统的决定³⁵⁸。这会加强集体农庄系统的技术基础。

这样,为了建立大型集体经济的技术基础我们已经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在这方面还需要做比我们目前所规划的多得多的事情。没有拖拉机和复杂的农业机器,不广泛地利用化学和电站,我们就不会有集体农庄运动的牢固基础,因此,这个方面,即建立集体农庄真正雄厚的技术基础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

在这里我们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在讨论中对这个问题涉及得很少,而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正确地使用被吸收到集体农庄运动中来的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劳动组织,即集体农庄的经营组织是与克服各种巨大的困难联系在一起的。集体农庄在很多方面应当向组织良好的苏维埃工厂学习,但条件的多样性和某些地区集体农庄运动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集体农庄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要有特别的灵活性。由此可见,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组织问题是多么复杂。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各个领导中心对这件事情至今几乎没有认真地对待。

集体农庄系统以前工作的全部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得出来。集体农庄系统对解决集体农庄劳动组织问题准备不足是我们此前在农村集体化事业中工作得多么不好的标志。因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集体农庄联合会担负着改进自己这方面工作的重大责任。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机关必须更清楚地了解集体农庄的内部生活与发展并以迅速发展的试验为基础最有力地帮助集体农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集体农庄,不仅合作社,也不仅地政机关(其作用应当在整个集体农庄运动中大大加强),而且全党必须加紧研究集体农庄劳动组织,即生产组织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希望,我们农村各个组织的十分之九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问题上。

第三个问题——关于干部。党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这次全会上,国民经济的干部问题将单独提出。显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社会主义农业组织者干部给予高度的重视。后面我还要谈这个题目,现在我要指出,对于集体农庄,不能把干部问题和文化问题分割开来。不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事业中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们就不会有集体农庄运动的真正发展,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集体农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在集体农庄庄员群众不识字的情况下要有广大的业务水平高的集体农庄组织者干部那是空想。不与群众的文盲、政治落后和不文明现象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我们就不会有集体农庄所需要的数万和数十万组织者和专家。

现在我来谈谈构成集体农庄运动的所谓灵魂的东西,即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大家都知道,没有公共基金的集体农庄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应当根据这些基金的增长情况及其公有化性质来判断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

公共基金是以苏维埃方式,以社会主义方式对农民资金的动员。我国现在正在展开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是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资金的大规模动员。这样,动员农民资金的问题现在以全新的方式提了出来。

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有些人现在还在谈论按照过去的成例,按照新经济政策头几年的成例动员农民的资金。有些人根据我们最近几年已有的通过农业信贷系统动员农民积累的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经验,作出了当前条件下动员农民资金的不正确的结论。然而,最近一年在动员农民资金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集体农庄运动变成了一年半至两年以前我们不曾有的最广泛的群众性运动。

农村的集体化过去是在并且应当是在国家大力的物质支持下进行,但是,由于我们的贫穷,这种物质支持不可能特别大。既然千百万农户已开始加入集体农庄,那么,由农民的一个个戈比构成的公共基金,更正确地说,是由投入集体农庄公有化财产的农民资金构成的公共基金,将增长为一个巨大的数目。在这之后,对动员农民资金巨大可能性的怀疑就变得显然站不住脚了。诚然,农民资金的动员不是以过去预计通过信贷³⁵⁹和通过整个农业信贷系统去做的那些途径和形式进行,但这却是农民资金的真正动员,这是迅速增长的数量巨大的农民资金的动员。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应该最终确信,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用老办法,用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使用的办法动员农民的资金是不可能了。这至少在我们的条件下被完全证明了。革命前信贷机构曾经动员的农民资金比它们在新经济政策所有最初年代,在已经过去的整个恢复时期所动员的要多得多。对此不能不表示同意,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弄清楚这种情况的原因。

过去,革命前,信贷机构曾在农村动员了为数不小的资金。这大都是富农和担任公职的小资产阶级的资金。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富农不把自己的积蓄放到信贷机构。实践证明,通过农村信贷机构筹集积累货币的打算落空了。只根据一点,即我们的政策始终一贯反对富农,限制富农的剥削意图,剥夺他们的公民权等,这就很清楚了。富农不把自己的积蓄放到我们的信贷机构并以此给农村所有有积蓄的人定了调子。只有在工人阶级依靠贫中农群众向富农展开了加紧的进攻,农村里出现了转向真正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之后,我们才

有了通过集体农庄以苏维埃方式动员农民资金的有利条件。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

现在还会遇到这样的怀疑,我们能否在最近一年动员几千万农民资金。委婉地说,这是相当不得当的怀疑。但是,现在在这里搞什么类似五年计划的东西也是不得当的。不,我们不能此刻就认真回答有关这方面的五年计划的问题。我们应当懂得另外的东西。我们应当看到,农民的财产(可以大胆地估价为若干亿卢布)现在就被吸收到集体农庄里并且相当大部分正在变成公共基金,此外,集体农庄还从中建立了专门的“公积金”。而这些公共基金就是首先由这种或那种工具构成的数额巨大的农民资金的动员。诚然,这不是贫农和中农本来就很少的金钱的动员,这是农民物质资源的真正动员。这种动员不仅不低于,而且当然高于金钱的动员。这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动员,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少得可怜的,有时简直是寒碜的,但加在一起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同样正确的是,作为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物质基础,它是完全微不足道和非常之少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大规模动员农民个人的零散的资金,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无产阶级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给予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农庄运动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国家的任何帮助要充分保证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国家尽力给予的一切也只是区区小钱。国家必须把自己的主要资金继续用于发展工业,提高冶金业,用于建设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业机器工厂,用于发展化学工业,建设电站等等。集体农庄运动,只有在依靠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把农民的数亿和数十亿的资金(物质财富)吸收到自己的公共基金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群众性的事业发展。这些公共基金的增长实际上就表现了农村的集体化。如果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一年增长了一倍,这就是说,集体化的速度翻了一番;如果这些基金同一时期增长了十倍,这就表示,集体化的速度加快了十倍。首先我们可以根据集体农庄公共基金的增长情况真正检查集体化的实际速度。还应当补充,集体农庄农民资金的公有化也为其继续增长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是,如果集体农庄真正提高自己的技术基础,搞好自己的公有经济和正确地使用其现有劳动力的话,为此现在是那么需要集体农庄的组织者干部、技术员、农艺师和各种专业的工程师。

在与集体农庄直接有关的题目中,我再谈谈组织问题。

夏天,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农业合作社以及重新安排农业预购合同的决定³⁶⁰。这两个决定已经完全为生活所证实,在当前条件下也应当成为集体农庄工作的根据。

现在谈谈集体农庄与整个合作社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

把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对立起来的那些意见是十分荒谬的。这是对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理解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最后,总得要认识清楚,合作社正是通过集体农庄运动在高技术和电气化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公有化大经济的。实际上,我们许多同志至今仍在滑向把合作社与集体农庄对立起来的观点或者相反。令人遗憾的是,集体农庄系统本身也有自己的“本位主义”情绪。集体农庄系统的工作本身并不能预防政治视野的狭隘性。集体农庄系统的一些干部有一种要求,当然是考虑不周和反映过去一定时期的要求,即把整个集体农庄运动置于以全苏集体农庄中心管理委员会为首的集体农庄联合会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同志没注意到一件小事:他们没注意到合作社本身正在逐渐变成集体农庄系统。

我们眼前正在发生各合作社组织向高级形式,向集体农庄系统的这种转变。这个由供销组织向集体生产组织的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合作社系统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同的,但是怎么能看不见,例如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及其农田系统现在就已经不是旧式的合作社组织。它在下面有数千个生产型的谷物合作社,它有61个拖拉机队(关于它们的意义别连基同志已经令人信服地在这里谈过了),还有实际已经形成的它对农村许多集体农庄的领导表明,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已经不是旧的意义上的合作社系统,这是合作社—集体农庄组织。它已经由合作社系统变成了合作社—集体农庄中心,而明天它将会直接成为谷物业集体农庄中心。

对于合作社向集体农庄运动的这种转变,现在正在日益形成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合作社,用列宁的话说,我们曾经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正在转变成为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成为真正苏维埃的合作社,成为集体农庄生产合作社³⁶¹。在农村大规模集体化以前,合作社曾是小私有者的组织。合作社不曾触及农村小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在大规模集体化以前,合作社把小农户和小小农户联合起来,几乎只是为了销售他们的产品和向他们供给工业品。合作社的基础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但是,由于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供销合作社系统以其在农村的数万个合作社在训练农民群众走向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供销和信贷合作社加上基层的生产型合作社,依靠十月革命最初年代集体农庄运动先驱者的经验,为原先

的合作社转变为集体农庄合作社准备了土壤,也就是为真正千百万农民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准备了土壤。而这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实现。

很清楚,把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对立起来不仅是不能允许的,而且简直是荒唐的,尤其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提交全会的决议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提出了在各个合作社管理中心下设立集体农庄独立机构的建议。此外,决议还谈了加强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作为整个合作社包括集体农庄系统领导中心的工作的必要性。显然,越往后,联社联合会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将在自己的工作中越来越接近,而后就会完全融合在一起。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建立将对各个合作社系统工作的改造及其与集体农庄系统工作的协调具有重大的意义。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必要性现在用不着再怀疑了。

关于集体农庄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的作用和与此相关的工人阶级的责任,我再谈几点意见。

在开头我引用了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组织作用的指示。无产阶级是劳动群众在同资本进行斗争的事业中,在摧毁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组织者。在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工人的组织作用是巨大的。这特别适用于这个时期,当我们在这里真正着手组建利用高技术的公有大经济的时候。工人阶级对集体化事业的领导是对在小经济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落后的农民群众的最必需的帮助。

不能不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意见:北高加索大多数地区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户被吸收到集体农庄运动中来,那里集体化的完成,至少是基本上完成,是由经济利益,由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利益决定的。这一点再一次证明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要领导集体农庄运动,工人阶级应当走在它的前面。由于担心现在会出现软弱的、不巩固的集体农庄而企图阻止这个群众运动是可笑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待当前集体农庄建设的弱点和缺点,而有时还是明显松散的状况,但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叫苦,而是为了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支持集体农庄,支持集体农庄的发展,大力加强集体农庄运动。

不应当忘记,现在涌入集体农庄的还是大量未经改造的小私有者。我们必须由此得出结论,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影响,而且往往还有富农的影响现在在集体农庄里仍将是十分强大的。必须同这些影响进行严重的和长期的斗争。

围绕着集体农庄建设正在进行着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富农在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阻挡集体农庄的道路,而在做不到的地方,便钻进集体农庄,从内部进行瓦解。在集体农庄里面,阶级斗争的成分显示得十分强烈,而且让人处处能够

感到。反对富农在集体农庄里影响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而这需要来自外部,来自工人方面的极大的帮助。

因此,关于在允许富农参加集体农庄问题上存在的犹豫不决我说两句。

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是不能允许的,首先因为集体农庄还很软弱,还没有站稳脚跟。允许富农加入现在的集体农庄会使其中的许许多多集体农庄面临瓦解的危险。但是有时有人问,对富农究竟怎么办?令人遗憾的是,有人往往对主要的问题,即对贫雇农怎么办和怎样在集体农庄里建立贫雇农核心的问题还没有认真仔细地考虑,就提出这个问题。要知道,对于以无产阶级的方式,以共产党人的方式处理事情的集体农庄的组织者们,这个问题应当是首要的问题。

但是,也需要回答对富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据我们现在正全线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情况而来的。因此,对富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要把富农当作最凶恶的和尚未被彻底打倒的敌人对待。这是最凶恶的敌人,每天都有富农恐怖,富农袭击、放火和杀害我们忠于革命的干部、积极的集体农庄庄员和贫雇农的成千上万的事实在提醒我们这一点。这敌人尚未被彻底打倒,许许多多的事例也在说明这一点。富农没有停止危害集体农庄,不仅是在反对集体农庄的公开斗争中,而且是钻进集体农庄里面,而有时还钻进它们的管理机构。因此,根据对富农的这种态度而产生的这些措施,根据对最凶恶的和尚未被彻底打倒的敌人的态度而产生的这些措施将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对富农不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掌握不了集体化事业。

我们也不能忽视集体农庄不履行对苏维埃国家最起码义务的那些事实。难道我们没有集体农庄不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这样的情况?难道这不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直接破坏?难道这些事实不是钻进集体农庄的富农利用自己的影响使集体农庄与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富农赶出集体农庄并尽量更多地注意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在集体农庄里,特别是初级集体农庄里建立贫雇农小组。只有在农民群众中和在集体农庄里进行最坚持不懈的工作,对贫农进行政治启蒙、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建立贫雇农出身的组织者和各类专业人员的干部队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党才能真正地掌握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必须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在这次全会上特别卖劲地鼓吹,集体农庄现在是整个农业中的“主导因素”。但是,就在这个方面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一方面——迟了,另一方面——搞错了。

当然,集体农庄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通常走在个体农民的前面。否则就不

会有大量的农民蜂拥而入。但是,自从集体农庄在一些州里覆盖了由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户(北高加索),而明天这里的集体农庄就将有一半以上的农户,这究竟是什么——是“主导因素”吗?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之所以不能成为主导因素,就因为加入集体农庄的不仅是劳动农民的先锋队,而且是广大群众,而明天就将是区(州)的决定性、压倒性部分的农民。这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集体农庄作用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承认,右倾分子们关于集体农庄的“主导作用”的声明发表得迟了。

另一方面,他们显然搞错了。对于农业来说,主导的因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工业,是无产阶级。即使现在,在集体农庄运动规模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这一点。我们不当用空洞的小资产阶级的词句大谈集体农庄是“主导因素”,而应十分明确地向农民群众解释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观点之一:在国民经济中过去起过,现在起着并且能够起社会主义主导作用的,只有彻底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即我们的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政权掌握在依靠农村贫农和联合农村中农群众的工人阶级手里的情况决定的。我们的责任是不倦地向劳动农民解释,只有依靠这个政策,我们才能完全彻底地摆脱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保证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

其次,应当谈谈国营农场。国营农场在集体化事业中的巨大影响是很清楚的。

国营农场的建设和成就对周围的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国营农场的例子农民确信了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优越性。况且,国营农场往往还充当毗邻地区的集体农庄的组织者。今后国营农场的这种作用还会更大地增长。

但问题不仅在这里。已经建立的集体农庄应当向国营农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者学习很多东西。我们应当坦率地说:集体农庄,在组织自己的公共生产时,要向国营农场看齐!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普及一个思想,组织良好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集体农庄组织经营的榜样。

现在应当特别强调国营农场在培养集体农庄干部,集体农庄组织者和集体农庄专业人员事业中的作用。我们把很多时间花费在决议和宣传鼓动上,因此往往浪费了大好时光。然而对于集体农庄来说,现在主要的事情根本不是宣传鼓动,而是组织工作,而集体农庄需要的好的农业生产组织者和专业人员,我们并没有储备。可我们至今还不急于做这件事情,不急于建立集体农庄所必需的干部队伍。

这就是为什么最紧迫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为集体农庄培养新的力量,其

实不仅是为集体农庄,而且也是为国营农场本身,因为我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把国营农场建设推向前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每一个组织得还不错的国营农场立即变成集体农庄,而且也为国营农场本身培养新干部和重新培训老干部的学校。在这里也应当大力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转入准备春播运动所需要的速度。我们必须把剩下的冬天的几个月、星期和日子以最大的毅力用在这上面。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国营农场以及每一个组织良好的集体农庄变成为集体农庄培养和锻造干部的学校。愿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者尽快地把这件事情抓起来。是该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抓这件事情的时候了。

最后,谈谈产业工人。

向全会提出的决议建议动员 25 000 名产业工人到集体农庄去。这将是全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

动员 25 000 名工人下乡对于工业企业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困难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志们现在就应当考虑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我们仍要在最近几个月里至少从工厂派遣 25 000 名懂政治和积极的同志到集体农庄去。这将是工人阶级支持农民群众的最好实例之一。这种对农村的帮助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请再加上从城里派遣的为完成个别任务的工人工作队,如进行粮食收购、为农民修理工具等等。

工人对农村的义务帮助具有特殊的意义。现在这种义务帮助开始找到新的形式;工厂与某些集体农庄建立直接联系和实行义务帮助;在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开始传播到农民辽阔的田地上。要能做到把派遣 25 000 名工人去集体农庄在组织上与工厂工人对大集体农庄和全盘集体化地区的义务帮助结合起来就好了。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结合不断加强,变得真正牢不可破了。

不仅是个别工厂,而且整个工会现在都应当对集体化给予极大的关注。在这方面似乎出现了好的转变。如能加以巩固并把事情推向前进就好了。

红军在集体化事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最近几个星期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红军战士例行的秋季结业³⁶²。他们中间不少人怀着对集体化的热烈向往到农村去了。红军战士过去在农村呆过,而特别是现在将成为集体农庄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也许,今后应当对相当一部分服役期满的红军战士进行两三个月的专门培训,教给他们回到农村,回到正在转向集体化轨道的农村以后所需要的东西。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苏维埃在集体农庄运动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只有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集体农庄才能够生存,而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千百万农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应当让苏维埃加强自己对集体农庄建设的领导影响。必须让集体农庄经常向苏维埃报告工作。要知道,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农民经过集体农庄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主要环节。同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大规模的集体化正在为农村的苏维埃建立新的而且是空前牢固的基础。

关于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与集体农庄运动有关的任务我就不多说了。共青团员的位置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先锋队里。在这方面共青团的领导机关积极行动得还不够。可早就该动起来了!农村的党支部应当大大振作起来,以便履行领导集体农庄建设的十分重大的职责。党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应当利用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全部经验,以便真正掌握对集体化事业的领导。

最后,关于所谓的困难说几句。

用不着说,实际建设集体农庄的困难是非常大的。集体农庄正在把小农和小小农转移到使用高机器技术的公共大生产的轨道上。集体化正在解决农村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因此,不应夸大我们在这里时常遇到并且还将遇到的那些实际的困难。

然而,有人有时用对“困难”的议论努力掩饰对巨大的真正革命群众运动的机会主义畏惧。现在你们从右倾分子的营垒里时常能够听到公开的,而更多是隐蔽的是否应对这个运动稍加遏制的建议。机会主义者们的特点是永远害怕群众。这种惧怕来自于他们不理解千百万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意味着革命力量的巨大增长,社会生活新形式创造的巨大增长。对这一点的误解是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特点是说明机会主义者可以同这个或那个集团、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有联系,但却脱离群众,脱离工人,脱离劳动者的最好标志之一。

当议论“困难”为的是掩盖机会主义的退却,为的是收缩滚滚向前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时候,这种对“困难”的议论是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怀着这种情绪是不可能走在群众前面,是不可能引导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走向胜利的。我们必须对农村劳动群众现在的情绪表现出革命的敏感性。应当明白,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贫农和中农终于真正看到了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线希望。他们去加入集体农庄,往往还没弄明白,现在的集体农庄运动将通向何处。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看见并且相信,公共大农业生产会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扩大播种面积,会减轻劳动和提高农村劳

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农,还有在他们之前的贫农源源不断地涌入集体农庄,不是因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出路,而且往往还只是摆脱贫困、摆脱奴役劳动、摆脱农村千百年来野蛮状态的一线希望。同时,这个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标志着农民群众情绪的转变:中农从相信苏维埃是劳动者的政权转向相信苏维埃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由于苏维埃政权的整个政策,由于十月革命后12年来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和进行的政治教育,小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有限在农村劳动者面前愈益显现出来,同时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优越性已逐渐为千百万人所理解。农民群众对集体农庄的这种坚决的向往就是由此而来的。

农村的雇农、贫农和中农的这些情绪在很多方面是与脱离甚至心里根本没有真正群众的右倾分子们格格不入的。更合他们心意的是小市民的机会主义怀疑和反革命的不信任,他们被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所俘虏。“共产党人”中的小市民不会理解涌入集体农庄的贫中农群众,但这些已经坚决走上革命地摧毁农民经济“千百年基础”的群众也不会理解他们。

不是贫农和中农又是谁能看到并天天在自己的道路上遇见集体农庄建设的极大困难呢?然而集体农庄建设的困难并没有使农民群众止步,而是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提高了他们对领导者们,对苏维埃政权,对党的要求。对集体农庄运动道路上遇到的困难的回答只能是工人阶级对这一事业的更加重视,更大的人力支援和实际组织者与政治领导者对农村更有力的支持。当你遇到从农村来的,从正在建设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的同志们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变了样子。这往往就是眼里闪耀着胜利信心的那些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的大军现在在迅速壮大,人民群众中成千上万和数十万计的新的创造力量在觉醒。这些新的力量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浇灌牢固的水泥。

最后,我要提醒一下列宁1921年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在《论粮食税》小册子的一个提纲里所写的话。列宁的话如下:

“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文集》第4集,374页)³⁶³

现在我们生活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十三个年头。列宁所指出的10—20年的期限,我们已经度过了一半多。集体农庄运动的群众性十分有力地证明,我们真正找到了与农民建立正常关系的途径。尽管我们的工作中有成百万个困难和成千万个缺点,我们在胜利地前进。千百万农民被吸收进集体农庄运动说明,我们

正在走的道路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革命热情正越来越牢固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取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主席:现在请加夫里洛夫同志发言。

加夫里洛夫:莫洛托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集体农庄建设的速度现在不仅迫使不相信这一事业的那些人投降,而且这些速度正以我们自己没有料到的规模在发展。莫洛托夫同志举的一些例子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运动都说明,集体化的这些速度无疑将会越来越大。这是十分清楚的。在北高加索和在我们乌克兰,在草原区,我们现在已有25%—30%的集体户。一年以后这个比例数将翻一番,这对周围的个体户将产生一定的影响。集体化将以这样的规模扩大,个体农户是坚持不住的。最近一年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一切计划设想。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1928年10月1日我们乌克兰已经有了140万公顷。按照计划,我们应当达到220万—230万公顷,而现在我们完成计划的结果达到360万公顷,即达到了9.5%。在草原区,我们超过了20%,因此同志们在这里正确地指出,我们联盟的一些州,特别是北高加索、伏尔加沿岸地区和乌克兰的草原地区无疑将于最近一年半至两年期间完成农业的集体化。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乌克兰草原地区在最近两年完成此事,即与安德烈耶夫同志提出的目标大致相同,也许不是在春天,而是在秋天,也许是在1931年春天乌克兰草原地区的农业集体化将基本结束。如果早在七八个月前就曾经提出过整村整村转向全盘集体化的问题,那么,现在实际提出了在若干专区里整区整区转向全盘集体化的问题。在卡明斯基同志提供的地图上面有乌克兰全盘集体化的各个区。我们在25个区里已经有20%以上的集体化人口,有14—15个区里有40%以上,在9—10个区里有70%—90%集体化人口,特别是尼古拉耶夫、敖德萨、赫尔松专区最近一年内,也许比1931年春天甚至更早一些将完成集体化。我相信,尼古拉耶夫专区今年春天就将完成集体化,因为那里的集体化人口已有60%多。现在我们真的有整个整个的居民点在大规模过渡,所以,在我看来,全盘集体化的区和若干全盘集体化的专区现在无疑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我不同意别连基同志这样提出问题,说最近几年我们要谈的将不是共耕社,而是劳动组合。在他的观念里,被称为劳动组合的是耕畜和农具都公有化了的这样一种集体经济形式。在乌克兰我们认为,共耕社必须拥有公有化的耕畜和农具,共耕社如果没有实现耕畜和农具的公有化,那是不完备的。我们称之为劳动组合的经济形式不仅生产资料,而且牲畜和其他各业都实现了公有化。如果暂时没有做到这一切,那便是共耕社。

我认为,现在需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些集体农庄的质量问题上,放在加强公有化的问题上。同志们在这里对现在存在的一种现象(我要说不是小规模),即农民在心理上准备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尽力设法既卖掉耕畜,又卖掉食用畜的现象提出了意见。对这个问题应当给予最大的注意。主要的问题是公有化、公共基金积累、公共资本积累的问题,这一点莫洛托夫同志已经指出来了,而且完全正确。

考虑到时间少,我想转而谈谈组织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拥有的集体化的这种速度及其进一步的发展迫使我们考虑加强对集体农庄的组织和经济领导。完全正确的是,现在就应当使我们的合作社机关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农业集体化方面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拿到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没说清问题,这个提纲将在地方上引起极大的混乱,而这样的混乱之所以是不能允许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是因为最近三四个月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推进这些措施。别连基同志在点头。请看,别连基同志多么真诚地愿意与集体农庄系统一道工作。提纲还在中央委员会里进行讨论之中,而地方上已经得到指示,有俄罗斯联邦粮食合作社系统的,有我们的粮食合作社系统的,说集体农庄系统的管理职能取消了,你们那边要停止移交等等。我认为,集体农庄运动及其速度迫使我们统一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而不是把它分散到个别基层单位。我的想法是,如果按照提纲提出的路标走,把集体农庄建设,把对集体农庄的组织和管理服务交给专业合作社,这就意味着,专区集体农庄联合会今天就得解散,因为它们将无事可做。我认为,我们不能走这条路,这样做将是错误的。关于集体农庄系统业务管理职能的决定不仅应当仍然有效,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³⁶⁴。我们现在拥有的并将进一步发展的速度要求绝对必须建立区集体农庄联合会,不是区粮食农业合作社联社式的联合会³⁶⁵,而是拥有业务管理职能的联合会。我们现在是在农业中的具合作管理职能的联合会。我们现在是在农业中的合作社部门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不认为,大家会这样理解我的话,说我想把合作社从集体化分离出来,不应当指责我从本位主义的观点发言。这是我们共同的工作,是大家都必须参加的工作,而不只是集体农庄庄员。我认为,建立拥有业务管理职能的区集体农庄联合会是今天的需要决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专业合作中心,任何专业合作社专区联社,不论是将在专区占主导地位的谷物或是畜牧业的联社都没有能力领导此事。因此,加强专区集体农庄联合会是今天的首要任务。

这些过程将怎样发展?不能把今天装进任何一个组织方案里去,但我很清

楚,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不是对农民的牛实行合作化,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要把这牛公有化和搞好农业生产。我认为,业务部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问题很清楚,在全盘集体化的各个区和专区里,我们将在集体农庄联合会里建立业务部门——畜牧业部、粮食部等等,等等。因此,我认为,最近我们将在许多专区里看到基本的、主要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系统的合并,因为生活本身要求这样。我认为,应当对提纲的组织问题进行若干澄清,否则,在我看来,将会发生极大的混乱,这只会给事业带来危害³⁶⁶。

主席:收到了结束讨论的建议。

请允许我付诸表决。谁赞成结束讨论?谁反对?很少。

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以后)

主席:现在请卡明斯基同志作总结发言。

卡明斯基:我从个别的意见,首先从对库比亚克同志的回答开始。

从他的讲话里得出的结论是,似乎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什么重大的分歧。而实际上,正是我坚持了那个思想,即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新机器技术与农民的工具和耕畜的公有化结合起来。一年前在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例会上³⁶⁷,我们曾和库比亚克同志一起详尽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们曾有机会专门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说服工作,只有将来我们的工业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后,我们才会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建立以最新机器技术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直到我们的拖拉机制造业大发展,这个问题现在和最近的将来都保留着自己的全部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和库比亚克同志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分歧。

库比亚克同志还说,关于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集体农庄系统一个独立机构的段落从决议中消失了。然而在提纲的第7页上写着以下的话:“中央全会同意成立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的组织系统(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个专门的独立的机构。”³⁶⁸这一段绝对没有消失。

库比亚克:你读第11页。

卡明斯基:它留在了提纲里。

有人喊:只是页码不同。

卡明斯基:接着库比亚克同志对于我指出农业人民委员部内部对合作社问

题存在着不正确观点表示困惑不解。我所说的恰恰是莫洛托夫同志特别加以强调的。莫洛托夫同志突出强调了我们在把合作社整个工作提高到新的高度方面的任务。农业合作社各专业系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集体农庄合作社。在对农民经济进行生产合作化的大量工作的同时,各个专业系统面前直接提出了农业集体化和技术改造方面的巨大任务。因此,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整个拖拉机事业应当掌握在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手里,而让合作社去办的是以小农具为基础把居民组织起来。这是胡说八道。然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负责干部在论证不应给合作社拖拉机和复杂机器的时候,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这证明,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这些干部完全不懂得合作社的工作近期应当怎样开展。我必须顺便在这里谈谈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克利缅科同志在陈述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的时候,疏忽了组织居民的问题。他是把机器拖拉机站作为纯技术问题来谈的。然而,十分清楚的是,不组织居民和不动员居民本身的资金来办这件事,我们就无法解决农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就无法推动集体化事业前进。组织居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使居民积极参加集体农庄建设,使农民的工具和耕畜,大小耕畜和食用畜全都投入进去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基础,直到我们把整个运动转移到大机器技术的基础上面。需要这样的居民组织,它能保证最大限度地使农民的资金吸收到集体农庄建设中来和最合理地组织集体劳动。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才能保持集体化的革命速度。

对于右倾分子有关这个问题的声明顺便说几句。

右倾分子在自己的声明里说,只是在机器拖拉机站“开办”以后,集体农庄才能具有它们现在所起的作用。右倾分子想用这来事后证明他们至今对集体农庄运动所表现的估计不足是正确的。他们以机器拖拉机站的“开办”为托词是根本不对的。我们现在总共只有两个国营机器拖拉机站³⁶⁹,当然不能用它们来说明集体农庄运动的巨大规模。右倾分子忽略了运动的群众性,忽略了合作社拖拉机队将近两年的工作经验、大型集体农庄建设和全盘集体化区的全部经验。要知道“红波利亚纳巨人”及乌拉尔其他所有全盘集体化的区(梅霍斯科耶,阿尔米宗斯科耶,沙特罗沃以及其他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吗?它们是在农民工具的基础上,逐渐添加复杂机器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例如,乌拉尔是整区整区全盘集体化方面的开路先锋;那里现在已经有14个这样的区,而它们起初全部不是以拖拉机为基础建立的,因为我们的拖拉机极少,而是以耕畜的公有化为基础建立的。这些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是由于

农村所有条件的总合和整个形势的结果。我们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路线,我们实行的明确的阶级政策,经济中工业化和机器化的增长,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一切为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右倾分子忽略了这一切,没考虑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于是就企图用机器拖拉机站的“开办”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在这个问题上右倾分子又暴露了他们特有的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完全不了解。

克利缅科同志在这里所谈的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对吸收农民资金的问题解决得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十分清楚,千百万农户向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转轨只能基本上靠农民的资金来实现。莫洛托夫同志正确地断言,我们没有计算我们已经为集体化事业动员了多少农民资金并对这方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明显估计不足。

我们现在谈论的仍然只是诸如股金、存款等这些动员居民资金的形式,而忘记了,农民工具、牲畜和农具的公有化现在正在成为吸收农民资金的主要渠道。现在我们需要对动员资金的这种形式给予主要的注意。

认为大规模集体化可以用集体农庄建设发展初期的那种办法,即主要靠国家的投入进行,那将是极大的错误。从这个观点看,需要根本改变农业机器化和集体化的做法。我觉得,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吸收农民资金建设机器拖拉机站和正确组织劳动的观点出发,改变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方法和形式。不能这样安排机器拖拉机站:用圆圈画出五年后建站的地点——说在某某点上国家将建立机器拖拉机站,而不考虑区里集体农庄运动的状况、居民的准备工作的,不把建站与现有的技术基础结合,几乎不要求居民出任何资金,不争取实现农民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这就意味着在居民中培植完全不能允许的习惯,近似于依赖社会保障的习惯。

有些地方已经不断地前来:我们对你们的政策不满意,你们给的机器拖拉机站太少,你们派来的拖拉机太少,你们给的钱太少,等等,等等。应当放弃这种做法。应当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用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

集体化必须靠来自下面的资金进行。我们不会在农民不动员所需要的资金的地方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你们都知道,不很久以前我们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根据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投资总额 120 万^①的情况下,不算 5 亿—6 亿所需的流动资本,原打算共吸收 1.5 亿卢布的居民资

^① 原文如此,数字显然有误。——译者注

金用来建设机器拖拉机站。我们能不能走这条路呢?十分清楚,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应当坚决予以否定。应当用另外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我用两句话提醒不久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不到两个月前,在全联盟机器拖拉机站的会议上³⁷⁰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机器拖拉机站的许多工作人员没想过,也没有料想,应当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与农民经济的集体化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还太早,机器拖拉机站应当与个体农户签订合同,而决不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建立集体农庄。他们拿舍甫琴柯国营农场的经验作为依据。这一经验曾经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运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一经验。那些拥护机器拖拉机站并说这是强大革命工具的人应当考虑到,应当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利用这个工具,利用它来实现农民经济的集体化并为此动员居民的资金。因此,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对这项工作的支持非常不够,这种建设却在蓬勃地发展。在发展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同时,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发展大型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的合作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

我觉得,加夫里洛夫同志在自己对组织问题的说明中在这里表明了集体农庄系统最坏的本位主义倾向。应当不要再把集体化的问题作为某个专门集体农庄系统的部门的事情来提了。

加夫里洛夫:我没有这样提出问题。

卡明斯基:现在我们正处在大规模全盘集体化开始阶段。认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现成的机器拖拉机站,认为我们能够从莫斯科赠送集体化,——这是官僚主义的自欺欺人。任务恰恰在于抛弃这些办公室的陈规旧套,向深广前进,深入到居民中去,给自己提出改组农民经济本身的任务,使集体农庄主要靠农民的资金来建立。

我们将不只从一头,用一种方法,通过一种途径实行集体化。我们将通过几十种不同的途径,用最多种多样的方法去进行。国营农场将在这项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和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签订了合同;我们将在国营谷物农场周围组建大型集体农庄,它们将向国营农场提供劳动力,将利用国营农场的各种废料,我们将与国营农场一道建立共同的产品加工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联合经济单位等等。

在这些基础上将建立我们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关心自己原料基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它近期不为自己建立起集体化的原料基地,那么,制糖工业将会受到原料不足的威胁。有人说,我给了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重重的一击。我觉得,相反,我打

得太轻了。看来,同样的话更应当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棉花总委员会说,尤其是对亚麻工业说。早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莫洛托夫同志就大力提出了这个问题³⁷¹。当时谈的许多事情只是现在才开始实现。就拿亚麻工业为例吧。在建立亚麻工业与亚麻种植合作社联系的新形式这件事情上,我们失去了几乎两年的时间。工业与合作社在亚麻种植农户的集体化方面还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还必须最积极地吸引消费合作社参与农民经济集体化的事业。它在这方面明显地落后了。就拿蔬菜种植、园艺、乳品业等为例吧。通过预购合同的形式在消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之间建立组织联系,加强消费合作社对集体农庄建设的参与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如果我们能把工业、国营农场、消费合作社、手工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与集体农庄建设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取得空前的成果。必须大大加强集体农庄与工会的联系。

安采洛维奇:你们的集体农庄里有富农,可没有雇农。

卡明斯基:我们很清楚,我们的集体农庄里雇农吸收得不够,有富农分子混了进来。安采洛维奇同志,你强调要注意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你对情况的描述过于狂放了。在这一情况下,你没有保持比例,举动像一个夸张的作家,像一个喜欢夸大的人。

这样一来,同志们,我觉得,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去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最主要的就是改组农业合作社的工作,把它的工作转移到生产的轨道上。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帮助农业合作社的各个专业系统转变成为集体农庄合作社。这就是我们应当实行的路线。

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在这里说过,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将集中在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还是集中在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抑或像莫斯科市苏维埃第一交响乐团那样没有指挥,都无所谓……

安采洛维奇:在农业合作社里已经是完全没有指挥了。

卡明斯基:众所周知,莫斯科市苏维埃第一交响乐团是一个没有指挥的乐团。在音乐里这有时能够成功。但是,根据经验我必须说,在合作社里这种没有指挥的状况是不会有结果的。

现在谈谈书籍问题。有人在这里说,我们书籍太少。这无疑是正确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书籍还很缺乏。对集体农庄建设的研究和著述还非常不够。以对集体农庄的统计研究为例。我们有中央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这是怎样的统计资料呢?是1928年的。在目前的发展速度下它有什么用处呢?从里面你们连

趋势都弄不清楚。全会之前他们提供的1929年4月的新数字也什么都说明不了,因为它们已经赶不上生活。然而,最近几个月还是出版了一些即使是最简单的集体农庄书籍;有些书、小册子和手册都发给大家了。但是,落后于生活是我们书籍的不可避免的缺点。我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任何书籍都追赶不上。我们知道,写一本好书需要很多时间。这将是怎样的一本书呢?写完的时候,它已经过时了。送到印刷厂,它已经变成反动的了,而当它问世的时候,几乎就变成反革命的了。(笑声)

有人喊:怎么办,把印刷厂关掉?

卡明斯基:结论不正确。我只是想说,许多关于合作社的书都是陈年旧货,散发着恰亚诺夫的气味³⁷²,散发着旧合作社愚蠢做法的味道。关于生产合作社,关于集体农庄建设,关于同农村生产结合的新形式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需要的那种合作社书籍不久前才开始出现。需要我们研究所和红色教授更多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应当使我们关心的不只是这件事情,不只是书籍问题,还有让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组织者深入生活,投入地方的工作并在实践中研究建设和规划其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我已经在这里向你们介绍了“十月”集体农庄。这样的集体农庄有好几百个。它们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从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里你们看到,每一个集体农庄里有多少主动精神,有多少探索,有多少创造热情,有多少英雄主义。应当研究这些生动的事例,总结它们的经验,而不应当只是搞脱离实际的著述。

这样的著述只能模糊事情的本质。我们知道,很多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可以举出若干有关合作社的著作,它们的确是反动的,只是重复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的合作社的老道理,而没有提供一点与合作社现代作用有关的新的东西。

我们讨论的结果如何呢?我觉得,讨论清楚地显示了农民经济集体化事业中现在出现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了这个转变。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发展速度在如此加快,它使我们达到了农业的真正转变,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实现了向集体耕作形式的革命性的转变。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大约三个月之后,农村工作部由莫洛托夫和鲍曼同志署名发出了一份关于农村工作部工作任务的通知³⁷³。这个通知采取的是整村整村集体化方针。整村整村集体化的方针当时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怀疑态度;许多人觉得,这只是梦想,这离得还很远。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这条发展路线成为基本的和决定性的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不是通过建立五户集体农庄和十户集体农庄的道路,而是通过覆盖整个村庄、许多村庄和整个区的道路进行的。

必须指出,贫农和中农群众常常认为,加入十户集体农庄是危险的;他们不大敢加入很小的集体农庄,更喜欢整村整村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们明白,正是在大型集体农庄里他们才能完全实现公有化大农业生产的全部好处。

我想特别强调莫洛托夫同志今天在这里说的事情。在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中,主要的注意力正应当集中于准备迎接1930年的春天,集中于准备即将到来的播种运动。讨论完全肯定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从这个春天起我们将面临的已经不是实行个别的区,而是整个整个专区,甚至一些州的全盘集体化。

我在自己的报告里没来得及谈我们工作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例如,像集体农庄与消费合作社、妇女工作、民族州的工作等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全新的方式提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问题。消费合作社必须把自己在农村的全部作用来帮助集体农庄运动。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消费合作社的干部、资金和在这方面的影响。用不着强调,正确组织供应对集体农庄商品率的发展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可以把这种供应变成集体化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对于那些劳动组织得好、商品率高、公有化水平比较高的集体农庄,我们必须改善和扩大供应。在改善集体农庄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发展集体农庄公共饮食业方面,消费合作社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必须把能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将最终和彻底得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

我们正处在极其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这就要求我们鼓起巨大的干劲,围绕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把工人阶级和农村贫中农阶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即将来临的春天对于集体农庄运动的目前阶段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党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是:认真准备迎接春天,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春播运动,在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把这一运动变成大规模的整区,甚至整州全盘集体化的运动。

主席:现在就所提出的作为基础的关于卡明斯基同志报告的提纲进行表决。

谁赞成这个提纲?谁反对?谁弃权?没有。结果一致通过。

为了进行最后校订,建议成立以安德烈耶夫同志为主席的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加里宁、卡明斯基、米高扬、斯大林、莫洛托夫、安采洛维奇、库比亚克、戈洛谢金、彼得罗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阿尔秋希娜、哈塔耶维奇、埃赫、瓦列伊基斯、舍博尔达耶夫、伊克拉莫夫、梅日劳克、科马罗夫、鲍曼、别连基、雅科夫列夫、弗拉基米尔斯基、多加多夫。

还有没有建议?没有。谁赞成批准委员会?多数。

现在请柯秀尔同志就议程的第三个问题发言。

乌共(布)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³⁷⁴

柯秀尔:在这里全面展开的农业集体化方面的问题和任务的背景上,在这里说过的那一切之后,我的报告只能算是例证……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但是鲜明的例证。

柯秀尔:是对我们在农业方面现在正在展开和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工作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的相当鲜明的例证。

战前时期,由于大量商品率高的地主和大富农农场的存在,乌克兰的农业曾具有很高的水平。在乌克兰200—300—400公顷规模的农场过去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革命以前的时期,我们的甜菜80%集中在地主的农场里,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将近半数即46%的农户是没有耕畜和没有农具的农户。

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把96%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只有4%的土地,即150万公顷留在了国家的手里。当我们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在这些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农业提高到战前水平,而后越过战前水平线的时候,这当然是个巨大的困难,因为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代替地主的和商品率高的富农的农场是非常困难的。乌克兰的农民经济在这整个革命时期证明了自己非同寻常的生命力。

只要告诉你们,尽管有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和匪患等等,我们的播种面积从未降低到70%以下,粮食总产量从未降低到75%以下,除了1921那个荒年,那年只达到了粮食总产量的25%³⁷⁵,只要告诉你们这些就行了。在牲畜方面我们也从未降低到85%以下。

然而我们经济的恢复和提高进行得缓慢而又十分困难。苏联没有一个地区像乌克兰那样在农业方面遭受过各种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现在仍在影响着乌克兰农业提高的成果。

我们在自己的材料里³⁷⁶与1913年进行了比较,而那一年在乌克兰不仅是战前的一年,而且是农业各项指标特别高的一年,不仅是在战前的最后五年期间,而且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成就与实际情况相比有些被低估了。

尽管我们需要做浩繁的工作来取代地主和富农的农庄并在地主、半地主和

富农工作过的田地上取得同样的成果,我们所有的指标都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报告所附资料里提供的农业方面的数据了,我只指出,在总播种面积超过战前水平的情况下,只有在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的产量方面我们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换句话说我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战前低。在整个农业的商品率方面我们达到了85%,而在谷物方面达到了75%。所有这些超过战前时期的成绩的取得,是由于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在经济方面发动了过去没有耕地,没有牲畜、农具等的最广大的贫农群众。只要说,1917年十月革命前乌克兰有17%无耕地的农户,而现在只有2%,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使没有耕畜和没有农具的农户的比例从46%降低到了37%—38%。这当然是向前迈出的相当大的一步,但这还远不是我们为达到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所需要的东西。

即使是这一农业水平的这种速度我们也未能用简单恢复从前那种类型和那种农艺水准农民经济的旧水平来达到,因为过去每户的平均水平由于地主和富农的农庄而大大提高了,而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是我们亲爱的右倾的同志们完全不明白的,他们叫嚷退化,低估我们的成就,竟在这里使用蓄意歪曲现实的方法,不肯费力稍微分析一下我们面前正在发生的现象。要不是我们把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

在我们乌克兰,越冬作物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实际上,秋天我们播种下最主要部分的粮食作物。春天我们也常常种下数量不很多的春小麦,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是在草原区它产量很低,每公顷20—25普特,很少超过。春天,主要是播种大麦、黍子、玉米等。这样,在我们这里粮食种植问题是在秋天解决的。这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是越冬作物产量高,不利的是会受到两次危险——冬天和春天。在我们乌克兰,越冬作物的数量由战前的29%增加到了49%,即几乎增加到了50%。

有人喊:主要是小麦?

柯秀尔:小麦和黑麦。

有人喊:基本上是小麦?

柯秀尔:是的。草原区里有些地方越冬作物有比较高的水平,但需要指出,这些数据全是1927年的,因为其他的年份不能说明问题。1928年和1929年是越冬作物被冻死的年份。甚至右倾分子怎么也无法把我们的庄稼被冻死归咎于党,怎么也无法把这归咎于我们的政策,虽然有些人企图这样做。

我们不仅恢复了甜菜种植,而且把它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110%,而且我们不得不把甜菜种植从过去地主的种植场里转

移到农民的田地上。我们那里的国营农场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不大,农民的甜菜种植具有重大的意义。60万俄亩用于种植甜菜的土地中,只有14万俄亩是国营农场的,其余的全都是农民的土地。我们需要把甜菜种植转移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与战前相比,我们把农民的甜菜种植几乎增加了三倍,现在它是我们制糖工业的主要基地。

有人喊: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种植场比地主的小?

柯秀尔:我们把全部土地分给了农民,只剩下了150万公顷,而过去40%的土地是地主的,而且他们把一部分土地租出去了。

经济作物也是我们改造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把它提高了两倍。良种播种的情况很不妙。去年我们的良种播种面积勉强达到了12.5%。但这不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顾不上挑肥拣瘦,只要有种子能种上就行了。今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样。由于歉收和庄稼被冻死,我们良种的数量减少了,不得不随便使用什么种子来播种和补种,而不只是用良种,因为最近两年我们的良种大量地死掉了。最近两年良种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原来发现,今年冬天一些非良种更好地经受住了严寒。在实行多区轮作制方面,我们无疑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因为革命前农民经济里根本就没有过多区轮作,而现在我们已有大约350万公顷。农业的整个这种提高,特别是从我们所遇到的特大灾难性气候现象的角度看(1921年的饥荒,1924、1928、1929年的歉收,越冬作物的死亡等,而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所做到的使数量这么多的贫农经济的提高——这一切不仅是我们党的完全正确的政策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国和联盟在这些非常严重的关头给予乌克兰的非常巨大物质帮助的结果。

为了不拖延时间,我就不列举数字了,我只说,去年当乌克兰两次遭受打击——越冬作物死亡,冻死,春天进行了重新播种,庄稼又死于燥热风——的时候给予的帮助,今年给予我们的帮助比1921年和1924年多很多,虽然1921年死的人比今年多。

国家给予的帮助,特别是在草原地带各个专区里,在农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凡是到过我们草原地带各个专区的人都会立即发觉这一点,他会发觉,农民现在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信任。这种信任表现在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表现在我们顺利完成了粮食收购。总之,这种信任现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三次播种运动中——秋天、春天、秋天,我们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给了农民三千多万普特种子。

为了充分地想象出我们过去和现在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环境,我请你们考虑到乌克兰农村非常困难的阶级状况。我们这里的富农很有文化,他们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大干部。这些富农在盖特曼政权、彼得留拉匪帮³⁷⁷等的率领下受过国内战争的良好锻炼。他们的阶级自觉和积极性非常高并时刻由于来自外部的刺激而强化。农业提高方面的困难,在我们那里还需要加上民族方面的严重困难。我们的一切成就是与解决乌克兰民族问题方面十分宏大、非常成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我们取得的成绩,即使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任务的角度看,无疑是很大的。但是112%的播种面积,100%的谷物播种面积——这当然还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要知道,我们的农业从未降低到北高加索那样的水平。看来,我们提高自己的农业会更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我们的提高速度非常缓慢,虽然最近几年个体经济的这种速度也加大了。如果我们的播种面积提高了17%,而商品产量只等于战前水平的80%,农业的商品率等于战前的75%,尽管这是在国家给予的全部帮助下达到的,那么,这一切表明,问题不在于农业退化了,对于右倾分子的诽谤不仅应当反驳,而且应当直接作为反对党的罪行予以痛斥。

[米高扬: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句。

柯秀尔:甚至很难找到相当激烈的言词。

彼得罗夫斯基:那你就用乌克兰语说。

柯秀尔:您要知道,用俄语骂得狠一点总是可以做到的,俄语在这方面绝对具有优势,此外,我的俄语更好。

加里宁:现在你的俄语已经生疏了。]³⁷⁸

柯秀尔:从乌克兰的例子看,农业发展的进程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有一切好的条件,尽管有农村贫中农群众大好的积极性,我们仍然看到,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把乌克兰农业在商品率方面提高到战前时期在地主和富农制度下农业曾经达到的那个高度。战前大约70%的商品粮是地主和富农的农庄抛售的,这些农庄的商品率很高,比农民的高出两倍,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放任富农去恢复他们的经济,如果不是达到战前的规模,那么至少也要接近这战前的规模,要么走这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要么把农业转移到大经济,但是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的大经济的轨道上去。在这方面党完全正确地采取了明确的路线,同自己内部的各种倾向,首先是右倾进行了斗争,克服了对发展大集体经济的各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由于这条坚定的路线,我们现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和成绩。

试图通过个体经济把农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是如此没有希望,这从以下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乌克兰现在有210万无马、无牲口的农户,而在乌克兰马和折合成马的役畜加一起共约300万匹。我们得要等多久才能帮助这210万农户购置一匹马或者两头牛,你们可要注意,在我们各个草原区里用一匹马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有时甚至两匹马也拉不了。

有人喊:你们总共有多少?

柯秀尔:530万农户。

有人喊:可季诺维也夫许诺过。

柯秀尔:他许诺的是明显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没有出路的处境大多数农民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在集体化方面如此迅速前进的原因。农业的整个发展使贫中农群众,尤其是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集体化的最初步伐实际上表明了集体经营形式的优越性,也促进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展开了如此壮阔的向集体化前进的运动。

现在需要谈谈最近几年自然灾害期间乌克兰农业中发生的情况,即右倾分子称之为退化的情况。最近两年我们那里发生了两次越冬作物大批死亡的情况。去年我们有五百多万公顷庄稼死亡,主要在草原地带,主要是小麦,春天重新播种的庄稼又因燥热风死掉了,而今年我们有350万公顷,在草原地带带有300万公顷越冬庄稼死掉了。我们通常不相信,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各种统计资料。最初我曾准备指责春天说这话的那些人是右倾。但是我到各个村庄走了走之后,我确信了这些数字绝对是真实的。

莫洛托夫:你就这样算出了200万?

柯秀尔:这很容易算,如果你到几十个村苏维埃走一走,看一看情况,估量一下全专区的数字。

加里宁:你们每年有几百万公顷庄稼死掉,这有点可疑。

柯秀尔:情况就是这样。我曾有机会看到,在许多区里人们已经吃了两年大麦面包。这是事实,米高扬同志如果主持公道,就应该证实,小麦的情况今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去年(1928年)庄稼两次死亡以后(我们草原地带的各个区里庄稼常常被燥热风吹得旱死),草原的各个区过去通常两年才能从这样的重大打击中恢复元气。现在我们用一年时间消灭了这个巨大的缺口,不仅赶了上来和追补上了过去失去的东西,而且在播种面积方面超过了在这之前的几个好的年景。乌克兰已经结束的粮食收购运动³⁷⁹,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总的大好环境,总的大好形势的最好的例证。所有这些关于脱离中农、关于存在脱离的危险的

不祥预言稍一碰到现实便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我们不仅没有失去中农,不仅没有脱离的危险,而且相反,在粮食收购工作的影响下,这同时又是一件十分宏大的政治工作(莫洛托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事情的这个方面),我们还赢得了中农的信任,把他们完全吸引到自己一边。你们都记得布哈林去年就乌克兰越冬作物比计划少播种了12%而制造的严重的张皇失措³⁸⁰。这是右倾分子政纲的主要王牌,主要环节:“我们要完蛋了,没有希望了,乌克兰少播种了12%。”我们竭力劝说布哈林同志及其同伙,这用不着害怕,应当考虑到自然方面的原因。结果布哈林输了。春天我们不仅补上了秋天欠播的部分,不仅补种了冬天死去的庄稼(而这一点甚至布哈林秋天也不可能知道),而且使播种面积总增长率甚至有所提高,比去年增加了2.5%。只要指出乌克兰农民春天翻耕、播种的面积比上一个春播运动多35%就够了。这表明,中农对待经营的态度怎样和对党的路线反应如何。我认为,很难想象右倾预报者和预言家们蒙受过更大的耻辱了,不过,顺便指出,具有特别的羞耻心不是他的特点,这次全会就证明了这一点。

今年秋天我们对播种运动也有过一些担心³⁸¹。顺便说,我个人在写给中央的一些报告里曾警告有某些危险。现在,成绩已经使对比去年少播的一切担心消失。我们的秋播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但对计划的要求我们显然还有些达不到,不是我个人认为的15%,而是10%左右,即大大少于去年。而且,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气候条件不利得多。从7月直到9月南方几乎完全没有下雨。有些地方虽然下过雨,但雨量非常小。只要指出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在乌克兰南部的许多专区里,当我们提出往下土里播种的问题,当我们在大片的农田里把种子播进了干土的时候,真感到有些害怕——万一不下雨呢。

加里宁:上帝身边有你们自己的人,你们派去了一个选出来的人。

柯秀尔:很可能,在上帝身边有自己的人,也许,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派去了自己的人,他在为我们祈祷,但无论如何我们顺利地走过来了。如果第三个冬天“保佑”我们不受严寒,那就太好了。如果去年我们没有发生越冬作物死亡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是粮食最富有的地区了。

[米高扬:那就会向你要求5亿普特粮食的。]³⁸²

柯秀尔:气候方面的短暂间隙无疑会立即把我们推向前进。现在我们有40%的越冬作物播种面积已经签订了预购合同。这是农民,特别是中农对党所实行的那些措施所作出的反应的标志。对春播运动的展望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担心,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前景非常远大。现在甚至很难想象,已经结束了粮

食收购,对这甚至难以习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力量用于解决新的任务,用于好好完成春播运动。对于我们乌克兰,像对于全联盟一样,根本的问题当然是粮食问题。这两年我们根据痛苦的经验确信,粮食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去年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一年,1928年秋天的张皇失措,市场情况的十分恶劣,投机倒把的猖獗³⁸³。1928年秋天由于粮价过高损害了甜菜种植业和畜牧业。根据经验我们认为,粮食问题对于我们是根本问题。当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同志们常常来找我们并总是坚持说,请提高甜菜价格的时候,他们没看见,危害甜菜的与其说是土豆,不如说是过高的粮价。粮食状况一缓和,农业的其他部门,首先是甜菜和畜牧业便立即突出出来。粮食问题是整个农业提高的关键。乌克兰不能像北高加索和其他农业地区那样谈论大大提高播种面积。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事情可做,但是在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我们受到限制。

我们肯定还有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闲置的土地。[只要指出今年在这方面得到的许多意外的收获就够了。

有人喊:应当靠西边的邻居来扩大³⁸⁴。

柯秀尔:契切林不批准。外交人民委员部连谈都不想谈。]³⁸⁵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扩大耕地面积在我们那里毕竟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者比较重大的意义,而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这在我们那里是根本的问题,我们的主要工作应当放在这个方面。在这之前我们有过提高35%的方针³⁸⁶。集体化的发展,集体农庄和我们国营农场达到的单产水平表明,这个任务现在应该朝增加的方向修改。虽然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发言表示反对制订集体化方面的计划,但是拟定某些五年计划还是需要的。不这样是绝对不行的。无论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速度和数字我们不得不往增加方面修改。今年我们的收成非常好,虽然各种作物的比例关系不佳。产量超过了我们创纪录的1927年。当然,很难说,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哪一部分应当归功于赐予我们好天气的“天老爷”,哪一部分应当归功于我们那里和其他地方已经相当广泛展开的并且得到村民响应和欢迎的那些农艺措施。如果从解决粮食问题的观点来看待,那么我们必须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我们草原区的问题,我们的草原区不仅具有乌克兰的意义,而且具有全联盟的意义。在全乌克兰250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中,草原区向我们提供播种面积的一半,而且草原区在正常年景(我不举今年或者去年,而举正常的1927年)生产最重要的作物小麦的62%—65%。在草原区粮食作物的商品率非常高,超过60%,连个体农民经济也同样。过去草原区在通常年份提供粮食收购总量的70%—75%。

从对事实的这种简单的列举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草原区不仅对乌克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全联盟的重要意义。草原区在我们那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草原区如果歉收,就会使乌克兰遭殃,反之,就会使乌克兰一切顺利。而且,如果谈到自然灾害,那么,恰巧自然灾害的威胁和危险降临在草原区的几率比较大。我已经谈了越冬作物的重要性和越冬作物死亡的情况,我再重复一遍,越冬作物大量死亡的情况常常落在草原区头上。只要指出草原区1928年总播种面积将近80%的越冬作物,去年将近60%的越冬作物的死亡就够了。春天我们进行了重新播种,但小麦只有早春在很小的程度上能够重播成功,然后是其他各种作物(大麦、黍子、玉米等),这些都是米高扬不特别愿意算入粮食作物的。其次,是干热风。正是因为怕干热风才播种了大量越冬作物,因为庄稼越早长得壮,越早成熟,它们遭受这种该死的干热风灾害的危险就越小。在我们那里粮食问题,尤其是小麦问题完全卡在草原区上了。草原区过去频繁遭受这样的自然灾害并且现在又遭了灾,这就是我们乌克兰农业进展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按照我们拥有的潜力,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灾害,这些干旱、干热风和霜冻,我们是能够创造奇迹的。

有人喊:应当以另外的方式提出土壤改良的问题。

柯秀尔:请允许我在后面谈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关于干旱的问题曾在全联盟的范围内提出,而且提得很坚决。为此拨给了大量的资金,我们从这些资金中得到了1500万卢布。抗旱斗争是按照特别的计划突击进行的。如果对我们的整个这项工作进行一次总结,现在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呢?总之,结果是微不足道的。

加里宁:你干吗谈这么多干旱,你想要得到什么?

柯秀尔: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干旱是存在的,不管我说还是不说它,而因为草原区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认为需要再一次提醒这一点。这1500万资金的85%用在了土地规划上,用在了所谓移民上,移民是我们抗旱计划的关键。移民必须消除离农田远的状况,使农民离农田更近,这样,第一可以促进耕作的改进,第二应当使得有可能实行多区轮作制。从1925年起,我们迁移和安置了4万户,用于每个迁移户的费用平均为317卢布。但同时应当指出,1928年以前土地规划和移民的费用都放在了个体户身上了。因此居民的迁移和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成果。从1928年起,大约只有6%的资金用在了集体化方面。费用放在了25户、30户、40户的小村庄和个体户上。我们的地政人员非常不喜欢回忆和说这件事情。因此可见,我们非但没有促进集体化,而

且破坏了农业的改造,使它处于现在的状态。我们刚分散迁移了4万农户,就没有钱了,另外的时期开始了,这件事情立刻就停止了。这样,抗旱斗争不仅我们那里进行过,其他地方也进行过,而且花费的资金多得多。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抗旱大计划时期进行可悲的总结。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糟糕的计划,舍本逐末的计划……

柯秀尔:我不知道,当然,也许制订这些计划的是曾经掌管土地事务的地政官员,但这曾是庞大的计划,这在当时是要花很多钱的。曾经为这件大事拨给了几个亿,都白白地浪费掉了。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说的是这些计划的技术趋向。

柯秀尔:抗旱斗争不仅在土地规划系统进行。当时就提出了草原区和机械牵引的问题,因为这些区的饲料情况非常困难。饲料问题和耕畜问题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关于把没有耕畜也没有希望购置两匹马的大批农户提高到能够翻耕石头一样坚硬的土地的问题,关于拖拉机的问题当然是摆在面前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从1925年起,我们已经得到了9500台拖拉机。现在乌克兰的拖拉机供应数量比1927—1928年度少了。

莫洛托夫:你们就收集出口储备吧。

柯秀尔:问题不在于有过什么,而在于将会有有什么。我说的是今天之前有过的事情。1925年我们得到拖拉机3200台,1926年——2600台,1928年——1480台,1929年——2070台。

米高扬:与国营农场一道?

柯秀尔:总共这些。在获得拖拉机方面我们现在出现了一定的拖延。大部分拖拉机给了干旱地区,正是由于这些拖拉机在放德萨诞生了机器拖拉机站³⁸⁷。也不能低估实行多区轮作制问题对草原区的意义,多区轮作制在草原区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行并且还在扩大。但是,我们曾想用来影响农业的那些方法,我指的是曾经采用过的土地规划形式,用这样的方法工作,那将是手工业方式,现在从我们的新任务的角度看,显得非常渺小。对于我们来说,草原区的抗旱问题在于精心耕耘土壤、好好深翻、优良的种子、春耕休闲地和轮作制,而且,合适的种子问题对我们有着巨大的意义。若干年间我们草原区主要培育了耐旱小麦品种,在这方面好像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两个主要的小麦品种——“乌克兰软粒小麦”和“合作社员小麦”——在这两个严寒的年份里表明,它们一个在较大程度上,另一个在较小程度上是不耐寒的品种。在光秃秃的土

地上,因为草原区常常不下雪或者由于解冻天气积雪融化,越冬小麦就冻死了,现在遇到的是如何把耐旱和耐寒两种品质结合起来的难题,况且行家们说,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把这两种品质结合起来的反证。我们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的实验室进行的工作至今没有获得明显的成果。

其次,播种春小麦对于我们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我已经提到,我们有数量很少的春小麦,因为它产量很低,或者甚至于完全死于干热风。我们根本没有耐旱的春小麦品种。而作为后备,作为预防越冬作物死亡的保障,我们必须得有哪怕一个粮食谷类作物品种。

接着便是玉米、黍子等作物方面预防干热风的问题。事情很清楚,只有当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大规模集体化,已经面临按照新的公有原则,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对农业进行真正大规模改造的时候,只有现在所有这些任务才可能解决和真正尖锐地提出来,在这方面我们的草原区像北高加索一样有一切条件在谷物种植业发展方面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速度。

我们在这里对草原区提出了若干要求并希望这能设法确定下来。首先,在土地规划方面,虽然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但注意到集体化,应当在这里把它记下来,以便尽快地进行土地规划。主要的是我们需要拖拉机,需要这样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以便能够保证我们至少在最近两年期间用拖拉机耕作草原区整个播种面积的50%—60%,否则,我们用体力无法像样地开垦,主要是无法像样地耕耘这土地。然而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计划,不是莫洛托夫同志批评的那个计划,而是建立102个站的第一个计划是根据这样的观点制订的——要离干旱地区远一些,要建在收成完全有保障的地区。最危险,最需要的南部地区却被排除在外。这是根据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计划做的³⁸⁸。

有人喊:这不对。

柯秀尔:怎么不对!无论在敖德萨专区,无论在尼古拉耶夫专区,也无无论在赫尔松专区都没有一个新的机器拖拉机站。只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后,才在梅利托波尔专区建了两个站。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第聂伯河建设工程附近。

柯秀尔:我是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周围的灌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是真正的抗旱斗争。

柯秀尔:关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我们有很大的、宏伟的计划,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谈它们的时候,它们是与所谓的大第聂伯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提出哪怕是几万公顷土地的灌溉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有

自己的计划,但这也是次要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实际地提出一个问题,以便随着第聂伯河建设工程的投产,我们能够把这电气化用于农业,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下只有靠廉价的电力才有可能进行灌溉。总之,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委员会本身³⁸⁹必须在广阔的范围内提出引灌问题。在确定的最低限额的消耗下(主要不是国家的,而是居民资金的动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此外,这里必须有关于电气化的条款。

柯秀尔:对。在使用电力方面我们能够获得很大的成果。灌溉能使每公顷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两倍。如果我们有将近100万公顷的土地——加上河滩甚至更多,——那就请你们想一想,如果进行灌溉,我们能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什么?政府必须对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周围的最低灌溉计划进行讨论,以便在第聂伯河建设工程投产时我们的最低计划能够实现。

此外,在灌溉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别的可能,例如利用沃兹涅先斯克的布格河电站达到这个目的等。诚然,我们并非特别顺利地,而是拖延了好久才提出了利用沃兹涅先斯克电站进行土壤改良和引灌的问题,但暂时还没有任何结果。因此,草原区的问题应当特别加以强调和予以注意。当我们在这次全会上谈拖拉机,谈拖拉机分配的时候,需要完全摒弃平均主义观点。应当把拖拉机集中起来,送往拥有大面积草原的地区,应当多给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西伯利亚拖拉机。两年以后我们将有很多拖拉机,但是现在不能在各州和各共和国之间,在耕地缺少的地区和拥有辽阔草原面积的地区之间简单地分掉了事。这是不对的。

有人喊:在缺少耕地的情况下减少面积?

柯秀尔:干吗要减少播种面积?这也是集体化方面的极端主义。有人嚷嚷:没有拖拉机就没法提高。现在大家都叫喊:给拖拉机吧,没有拖拉机应付不了,而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贫穷,有些地区,也包括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必须等一等。我们联盟的机关必须注意这一点。

下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和伤脑筋的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右岸地区和边境地带的问题。在右岸地区我们拥有的是小型经济。只要指出将近一半的农户拥有两俄亩或更少的土地就够了。而且,如果你们到边境地带看看,那里就分得更细小了。我们的整个右岸地区人口非常稠密,每平方公里73人——这大体相当于中央工业区的人口密度,而在边境地带这种密度达到100人。

丘巴尔:还有更高的——116人。

柯秀尔:是的,也有每平方公里116人的。这是关于人口的密度。如果在我

们整个乌克兰范围内现在无马、无耕畜的农户有 38%，那么在那里则为 70%—80%。

有人喊：现在你明白中央工业区是怎样的了吧？

柯秀尔：是的，但是你们的非务农工资高出三倍。由于这完全是一个农业区，是小农经济和小小农经济区，这里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几乎完全没有地方挣工资。对于我们来说，右岸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提出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因为，要知道，旁边就是边界——波兰。恰巧在边境地带我们的情况特别糟糕。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在边境地带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但从大的方面来看，还仅仅限于议论，因为右岸地区的发展卡在了一系列共同的经济问题上了，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纳入联盟机关的视野，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直到不久之前，我们曾经认为解决右岸地区和边境地带问题的办法是移民。当然，我们不反对移民，但移民是件非常费钱的事情，至今尚未取得多少明显的成果，虽然乌克兰占了移民计划的 40%。显然，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移民，而在于提高右岸地区和边境地带的经济，特别是要在那里找到使用剩余劳动力的方法。我们需要这样改造农业，这样发展工业企业，使这些劳动力有事情可做，使居民本身的水平得到提高。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右岸地区主要是一个集约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在这里占第一位的是甜菜。右岸地区生产 54% 的甜菜。但是，顺便指出，这 54% 甜菜的种植者是拥有大约 1/4、1/2 俄亩土地的很小的农户。这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现在这只是农户的副业，然而它应当变成为主业。最近几年这件事情几乎没有进展或者进展很慢。我想表示同意那些在这里抱怨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同志们的意见。我们自己也有相当大的过错，但是我认为，对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过去的和现在的政策应当狠狠地，狠狠地批评。显然，这是大家共同的毛病。

伊克拉莫夫同志在这里发言谈了棉花问题。不管多么奇怪，棉花委员会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情况，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在我们这里也发生了。在我们的甜菜种植地区，预购合同的签订情况很好（100% 的甜菜都签订了预购合同），但我们这里集体化的情况却一塌糊涂。集体化的路线碰到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各个机关的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和对这件事情的不能允许的态度，就像碰到墙上一样破灭了。他们这样进行管理，把希望放在个体户身上，他们的态度是陈旧的、地主式的，地主过去怎么对待这件事情，他们也怎么对待。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干部是旧人员，呆在那里的是曾经在地主那里工作过的旧的工

作人员。他们现在实际上领导这件事情,在搞预购合同,在“实行”集体化等。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旧农艺师很多。

柯秀尔:预购合同的签订情况也进展得很糟。然而这对于我们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莫洛托夫:对。

柯秀尔:甜菜在饲料方面有巨大的意义,是制糖工业的基地,此外,甜菜是谷类作物极好的前茬作物。

因此,发展甜菜种植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的这件事情冻结了、卡住了、停顿了。现在需要把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来。我们今后不应当再发生今年甜菜大量被该死的毛虫毁掉的这种现象,而甜菜本来就那么少,现在简直得喊救命了。我必须指出,甜菜合作社跟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也差不多,我们的合作社在向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看齐。合作社在模仿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办法,而且甜菜种植地区的各类合作社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和联系。甜菜合作社需要进行根本的改组。甜菜问题是全联盟的问题,而不仅与我们有关。现在控制数字里提出的问题是要把甜菜的产量提高77%。工业的任务是能够实现的,粮食方面的任务也是能够实现的,而对于甜菜,我非常担心,这是实现不了的。

丘巴尔:不妨供给肥料。

柯秀尔:是的,实现不了是因为没有肥料,而没肥料就不可能有甜菜的好收成。我们需要过磷酸钙肥料,就像庄稼需要雨水一样。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呢?在基洛夫同志那里磷灰石的情况似乎进展缓慢。至少远不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迅速。在磷灰石上不能吝惜资金和人力。

加里宁:来了一个灵巧的急转弯³⁹⁰,完全是乌克兰式的。

柯秀尔:现在我们的过磷酸钙肥料勉强够45%的农户使用,而且只是部分施肥。没有这些磷灰石,没有过磷酸钙肥料,我们简直就喘不过气来,就无法大规模扩大甜菜的生产。这是关于甜菜。现在谈畜牧业。产品畜牧业对于右岸地区也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在奶油生产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过去乌克兰一直食用别人生产的奶油,而现在我们在为自己并且相当大量地为出口生产奶油。右岸地区养禽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在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了甜菜之外。

鉴于要加强出口,必须向米高扬同志声明,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右岸地区作为出口基地估计不够。在发展右岸地区出口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缺乏加工企

业的困难。

米高扬:现在是原料不够。

柯秀尔:根据经验我们看到并且了解,原料基地的发展是与加工企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熏肉加工厂可以作为例子。

米高扬:在乌克兰建的熏肉加工厂比任何地方都多。

柯秀尔:完全正确,米高扬同志。应当建设十分缺少的那些企业。如果有工业基地,我们就可以围绕着像乳品业、家禽饲养业等这样的经济部门大力展开工作。然而,根据我们现有的方针,是不让在右岸地区建设什么企业的。

在右岸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带,如果不把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集体农庄跟前,是任何大事都做不成的,而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仍处于五六年前的状况。右岸地区像基辅等这样一些大的中心被忘记了,那里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工业建设。我们右岸地区有许多这样的城市遭到破坏,我们却毫无办法在建设方面加强它们。有人总是指责我们乌克兰人说,“你们的手能划拉”。

有人喊:眼光贪婪。

柯秀尔: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工业部门,为了全联盟的利益它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就说右岸地区吧,这确实是个被大家遗忘的地区,格里亚金斯基同志,你的中央黑土地带州怎能相比?(笑声)

我认为,这些问题需要尖锐地提出来。

第三个生产性质的大问题,是乌克兰的畜牧业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全面超过了战前8%,但是也得考虑到乌克兰不同的特点:草原区、右岸地区等,我们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潜力。

草原区的饲料问题,是畜牧业的根本问题。牧草种植、玉米,从发展畜牧业和解决饲料问题的观点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去年由于玉米严重歉收我们决定运进40万普特玉米种子的时候,米高扬同志只给运来了10万普特。

米高扬:再多没有地方可买。

柯秀尔:我不是为此指责你,米高扬同志,我只是提一下事实。今年我们不再要玉米种子了,因为我们的玉米收成非常好。

有人喊:瞧,你可真成了种玉米的专家了!

柯秀尔:你说得对,我是种玉米的专家。

有人喊:从什么时候?

柯秀尔:从我不得不开始认真研究农业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扩大玉米播种面积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草原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饲料问题,也就是

畜牧业问题。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应当改变玉米的比重。

柯秀尔：什么，什么？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们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玉米没占有美国那样的比重。

柯秀尔：说得对！当你读到玉米在美国占有怎样比重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童话，当然不是给小孩子读的，而是给大人读的。

今年我们的畜牧业有所缩减。我们的牲畜总头数减少了15%，然而牛减少了12%，猪减少了40%，而马比原来多了。尽管牲畜的总头数的数量减少了，役畜在牲畜总头数中的比重却增加了。这是对满腹牢骚和张皇失措的右倾分子们的又一个回答。从这个事例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农民是怎样在可能的范围内计划自己的经济的，他们的主要基点是提高播种面积，提高经济。为此他们关心保存和增加役畜，而减少的是小牲畜，是猪等。如米高扬同志完全正确指出的，猪，我们很快就能提高上去。养猪业在我们的波尔塔瓦、克列缅丘格和其他专区曾经很快提高过，但同样又很快下降了，而且又是由于严重的粮食状况。

有人喊：是由于粮食收购。

柯秀尔：不，不是由于粮食收购，危害这件事情的是去年的高粮价和去年围绕粮食展开的那个大投机风潮。养猪做熏肉和油脂是与利用一定数量的粮食有关。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试验，以便不再用粮食喂猪，而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粮食，但这目前还没有成功。十分清楚，当粮价疯涨的时候，农民宁愿卖掉粮食，而不是养猪，因为养猪已经变得无利可图了。

没有必要重复，在畜牧业方面我们最迅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集体化。这是十分清楚的。许多同志已经在这里提出的对速度的简单的计算和估量说明，我们拥有巨大的可能性通过集体农庄把畜牧业推向前进。对此我们已经拥有巨大的可能性，而乌克兰的人口数量非常多，这就再一次促使我们更迅速地办这件事情。

现在可以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像右倾分子所做的那样，说什么你们在某某地方错过了某某事情，牲畜减少了，猪减少了等等。但是，党如此深入地研究农业问题很久了吗？

有人喊：总的经济问题。

柯秀尔：研究总的经济比较久了。我们开始研究农业完全是在不久之前。农业问题，哪个针对哪个卯，情况如何，只是一年、一年半之前才清楚地摆在了我

们的面前。我们只是不很久以前,只是最近才了解了如何养猪,怎样种玉米等。

莫洛托夫:“各种”磷灰石是什么东西!

柯秀尔:是的,磷灰石是什么,过磷酸钙、钾肥是什么等等。只是现在才着手做这件事情,开始掌握它。

完全不容争辩的是,农业的一切基本问题,包括乌克兰的问题,只能按照一条基本的路线——集体化的路线来解决。农业各部门的发展速度问题当然也在。最近一年是集体化发展方面速度极快的一年。它向我们展示了异常迅速的跃进,每个月都带来各种新的数据,根本改变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的视野。

在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宣读的文件中,右倾分子们对我们没有完成提高农业生产的计划而幸灾乐祸。但是他们为什么说这件事呢?当然是没有完成计划。我们是否早就比较实际地开始规划农业了呢?不是李可夫又是谁发表了关于下雨的讲话呢?而现在他们恶毒地嘲笑没有完成计划。今年的主要成就就是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宽广道路。今年正在实际解决农业的大问题,它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宏伟的规模。看不见这一点就是存心要做反对派,只是他在这个讲台上宣读声明的时候戴上一副招人喜欢、满怀善意的好人面具。

关于集体化这里已经讲了很多了,发表了许多好的和不好的讲话,我不想胜过任何人。我只想谈谈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集体化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但关于农业合作社我要先说几句。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系统各个部门曾经是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很好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运动已经超出了这个基础和途径,这也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还有发展农业合作社,它的初级形式,即所谓预备性质的合作社工作的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有些同志,特别是合作社工作者没有根据地把这件事情想象成这样,说既然有集体化,干吗现在又要农业合作社,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通过集体化问题基本上能得到解决,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拿乌克兰多样性的经济为例,我们的道路还是遥远的,不像有些人在这里认为的那样轻松。我们的农业合作社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但它只联合了全部农户的大约50%,各个地区的情况大不相同。畜牧业、甜菜种植、蔬菜栽培等方面的合作社专业部门发展得特别快。这件事我们必须继续发展下去,特别是在集体农庄运动将进行得比较缓慢的地方。

现在谈谈集体化的速度。如果乌克兰在整体上落后于北高加索,那么,如果拿同类地区来看,例如草原区,我们那里正在发生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等地正在进行的同样的过程。集体化的进程发展得异常迅猛,特别是在秋播运动期

间,可以按天,真的是按天计算这种发展。如果要举我们掌握的数字,那么,截止到7月1日,我们全乌克兰的集体化达到了大约7%,现在,根据初步的资料,我们达到了至少10%,而且在草原区,特别是在其最南部的各个专区,我们达到了30%—40%。我们的右岸地区落在了后面,虽然右岸地区现在也开始赶上来,那里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急剧的转变。我们也提出了把包括几个专区的大片田地集体化的问题。在这草原区的三个专区里——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春天之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整个实行全盘集体化。尼古拉耶夫现在已经达到60%以上,有同志告诉我,甚至达到了65%。敖德萨已经接近50%,在那里甚至不用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当然,在别的一些区里会困难一些,但在几个草原专区里这件事情无疑能够向前推进,而且我们会很快地把它推向前进。我应当指出,至今一直落在后面、集体化的农户只达到2%—3%的右岸地区现在也在加大速度,比我们预见的要快得多。我举几个例子。右岸地区的图尔钦专区(不错,它的一边毗邻草原区),集体化的农户已经达到21%,别尔季切夫、舍甫琴柯、白采尔科维这几个甜菜种植专区都达到了15%。这是初步的资料。毫无疑问,像安德烈耶夫同志所说的,这些资料是很不完整的,要赶上发展的速度是不可思议的,最终的资料会提供更大的数字。

集体化的速度为什么这样快?这个问题提得完全正确。我举乌克兰为例。在这方面,除了党的总路线,党对农民、对中农的总的意义具有一定的意义之外,我们应当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用实践,用试验向农民展示了集体经济的一切好处,也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这不是过去那种我们不断地给钱,给钱,用乌克兰语说是“铺路,铺路”,但却毫无成效的经济。虽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安德烈耶夫同志那里的那种规模巨大的国营农场,我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大国营农场,特别是机器拖拉机站,农民当然也会把自己的经济同这些大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比较的。

此外,还应当把集体化的成功与下面的情况联系起来。我已经说过,我们的草原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因此草原区的经营管理质量问题便成为决定性的问题。恰巧就是在这个经营管理质量方面,我们用实践,用试验证明了大经济的一切好处,我们展示了,只有在机器基础上改组的农业才是预防歉收的最大保证,才是预防自然灾害的最大保险。

但是,集体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毕竟是我们对富农的进攻。这解决了问题。党的路线坚定执行迫使中农环顾四周,迫使他们在选择自己经济的发展道路时由动摇转向明确的路线。这一点解决了问题。

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很对,甚至我们不用特别催促,我们就能够达到童话般的集体化发展速度,照我们一年、一年半以前的观念看来是童话般的速度。

但是在这里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我指的是草原地区,我们那里的农民简直被机器迷住了,于是现在只好约束一些同志,要他们不要在机器供应方面许太多的愿,说会给你们拖拉机的,也会给你们别的机器的等等。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现实的态度。在答应给拖拉机之前,先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拖拉机,应当坦率地说,我们的草原地区目前并没有多少拖拉机。但是同时应当在这里指出,在草原地区,集体农庄的建立,即便没有机器,也在农民的心目中证明了自己是100%正确的。因此,即便没有拖拉机,我们仍然拥有发展集体化的十分雄厚的基础。需要的只是在拖拉机供应方面少许些愿,那样就会少一些失望,我们也会少碰一些钉子。这样会更好一些。可我们有这样一种倾向——向农民许很多很多的愿,而没有东西可给。

在我们草原的南部地区拖拉机站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我应当在这里指出,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在我们那里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现在已经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我们有两个国营站,15个合作社站和17个按照机器拖拉机站的样子组建的联合拖拉机站。明年我们至少将拥有73—75个各种拖拉机站,而且我们现在用这些站耕作着大约25万公顷的播种面积,而明年将耕作至少100万公顷。就是说,乌克兰100万公顷的土地将由拖拉机站耕作。从发展集体化的观点看,这无疑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其次,必须指出,今年我们在乌克兰第一次看到了小的和极小的集体农庄大规模转变成为大型集体农庄的情况。

早在春天的时候,在春播运动之前,我们只是有了结成联合社的决议。春天我们还举不出一个结成联合社的例子。而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非常巨大的成果。在我们乌克兰小集体农庄非常发达的情况下,这个扩大的运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已经有了34个以上拥有2000多俄亩土地的集体农庄,有264个集体农庄联合社。这全都是今年在60.4万公顷的土地上建立的,并实现了整整355个拥有22.4万俄亩土地的村庄的集体化。今年——实际上不是全年,而是从春天起——表明了我们有怎样的潜力。而且我应当指出,为了实行集体化我们有有利的条件,为了实行集体化,从主观前提的角度看,我们的草原区过去就有商品率水平高的经济,居民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其次,农村的贫农群众最终确信,只有经过集体农庄才能够摆脱贫穷。

秋天,我曾去过粮食收购现场,在一个有300户人家的村子里看见了一个集

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是在某种帮助下建立的,目的是联合和提高贫农经济。在这个有300多户的村庄里,集体化以前大约120户没有一点庄稼地,而现在,春天他们已经有了庄稼地。这极大地鼓舞了群众。

集体农庄的社会成分也根本改变了。现在在集体农庄里,特别是大集体农庄里中农占30%到40%。这不用解释就很明白。同志们在这里充分地指出了集体农庄内部的公有化过程和集体农庄的质量方面。我想对这里的一些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关于集体农庄阴暗面语调提一点意见。阴暗面当然很多,但是,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用阴暗面来掩盖和遮挡整个集体农庄运动、对集体农庄运动的评价和集体农庄运动的总的情况。在我们乌克兰当然有过数十次过火行为,我们那里发生过这样的事,国营农场建立的时候,农民躺到拖拉机底下,不让耕地(兹韦尼戈罗德卡,乌曼戈罗德斯卡亚村)。我们有过几件事,整个整个村庄刚转成集体农庄,而后它们很快就垮台了,我们被打着鼓从那里赶了出来。我们在几十个村庄的土地上实现了全盘集体化,而后来发现,这一切全是吹出来的,虚构出来的,居民没有参与此事,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出过这样的事,一个这样的集体农庄向另外一个这样的集体农庄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竞赛的挑战,而后发现,它们几天就垮台了。不管乍看起来有多么奇怪,但这些事情恰巧不是发生在大规模集体农庄运动的地区,而发生在群众还未发动起来,集体化还很薄弱,许多同志还不懂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和途径并企图用行政手段制造这个运动的地方。这些事实不仅不会败坏集体农庄运动的名声,而是相反,突出表现了这个史无前例运动的宏伟规模和前景。

在集体农庄内部实行公有化方面,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公共播种面积方面,根据7月1日的调查统计,300多个集体农庄完全没有公有化播种面积。然而这些数字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大量刚刚建立、尚未进行土地规划的新集体农庄。

去年,我们那里的集体农庄拥有的播种面积只有100万公顷多一点,现在我们的规划为330万公顷。当然,这是最低的速度,我认为,根据保守的估计,我们能够超过去年的数字三倍。

集体农庄役畜的公有化现在为38%。其次,在公积金方面,半数集体农庄有公积金,而且专项资金在十个月里由1300万卢布增加到2100万卢布。这增长是很大的,但显然是不够的。我认为,同志们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了,我们整个工作,不是集体农庄运动,而是我们整个工作的最主要的、根本的弊端就是我们的信贷政策。信贷政策,更正确地说是挥霍资金的政策,促进了同志们所引用

的出卖牲畜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这样的思想情绪,反正集体农庄会给的。而我们是怎样发放贷款的呢?在我们的资料的第38页上列举了数字³⁹¹,在我们的公社里,每个农户个人的股金为30卢布,贷款为2000卢布;在劳动组合里,个人股金为53卢布,贷款为565卢布;在共耕社里,个人股金为6卢布,贷款为130卢布。折合成公顷情况也同样。我有许多集体农庄的例子,这些集体农庄每公顷的贷款达到120卢布,也有150—200卢布,甚至超过300卢布的。当你现在谈集体农庄运动速度的时候,你会从我们的地政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这样的议论:钱不够,应当拨给资金。就假定需要某种帮助,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经拨给的那些资金利用得好十倍。现在发生的情况——就是挥霍浪费,就是腐败,这里没有任何生产刺激,只是简单地给钱。应当根本改变这种政策。不能容忍集体农庄的资金积累甚至低于消费合作社股金的情况。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在集体农庄的自有资金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些进展,应当把这件事情真正推向前进,农民会找到资金的,农民居民肯定是有资金的。现在正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农民自身将提高自己的集体经济。其次是关于经营管理、劳动组织、土地耕作等的质量。现在在我们乌克兰和其他地方,集体农庄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个体经济高出25%。但这不值一提,与我们所拥有的潜力相比这太少了,如果能够正确、合理地在土地上下工夫,正确地组织劳动和利用土地等的话。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当要求,应当达到更高的速度,使速度急剧加大。

我们的商品率,个体农户平均大约相当于24%,而集体农庄平均为43%—45%。

有人喊:商品率高得多。

柯秀尔:就大多数而言没有,大型集体农庄达到60%和70%。毫无疑问,我们的大集体农庄已经达到了旧地主经济的商品率水平,但我们举的是大规模集体化运动。请别忘了,我们乌克兰主要是小集体农庄,而大型集体农庄,甚至集体农庄联合社还是大海里的小岛。需要注意的是,小集体农庄的发展过程本身还在继续。我认为,不能无视这件事情。今年米高扬同志从我们的集体农庄至少得到了2000万普特粮食。有过拒绝交售粮食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大量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虽然我们的集体农庄里富农多得是。我没有可能列举很多事实,但可以用事实向你们说明,我们那里富农有时在影响集体农庄,甚至在领导它们。这种情况很多。

我认为,应当联系集体农庄运动提出土地规划的问题。也许,库比亚克同志说得对,我们用不着为小集体农庄的土地规划忙活。但是我认为,至少对于乌克兰

兰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大量的事实,30%—35%的集体农庄没有公有农具,没有公有播种面积,因为这都是未进行土地规划的集体农庄。并非总是全村一起加入集体农庄,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现在我们必须停止对个体经济进行一切土地规划,但对集体农庄我们必须进行土地规划,这是毫无疑问的。应当帮助集体农庄,包括小集体农庄。

关于集体农庄里的富农我说几句。我觉得,用乌克兰的例子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在机器拖拉机站的早期,当我们最早的两个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覆盖农民的时候,富农问题解决得很简单,把他们也包括进去了,如果他们不捣乱,是不会把他们赶走的。许多人有过这样的观点,许多人曾经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不提得这样激烈,然而,今年,今年的经验最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能让富农靠近集体农庄,决不能吸收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现在这是毫无争议的问题,更不用说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了³⁹²。

我们在集体农庄里的工作正在变得复杂化,因为错综复杂的阶级状况依然存在,富农的阶级影响依然存在,虽然表现形式弱了一些,因此在集体农庄里也应当展开政治工作,继续与富农斗争,把贫农组织起来。

我想再谈谈土地规划。以甜菜种植地区现在的状况,不进行土地规划是不行的。应当安排轮作,那样我们就能把甜菜种植业置于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为此就需要进行土地规划,而当我们那些极小的农户一小块一小块地种植1俄亩至1/2俄亩,而更多是1/4俄亩甜菜的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使甜菜种植业有重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甜菜种植地区的土地规划问题,甚至不管有没有集体化,都应当提出来。等待我们实现集体化是不行的。但是,土地规划应当以新的方式,以另外的方式,整区整区地进行,而这也将对集体化的推动。

同志们,现在我们有一个令人头痛和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我不知道,别的地方,特别是安德烈耶夫那里是怎样处置这件事情的。

有人喊:北高加索没有独立农庄。

柯秀尔:他好像提起过,他那里有独立农庄,我不了解北高加索的经济。

米高扬:200—300户,能叫独立农庄吗?

柯秀尔:这算什么独立农庄,用乌克兰语说,这不是独立农庄,这是村镇。

有人喊:是村庄!

柯秀尔:嗯,是村庄。我们那里的情况怎样呢?在我们那里独立农庄的土地

使用形式实行得相当普遍。根据粮食收购的经验我们确信,独立农庄是最反动的东西。春天,我曾到一些独立农庄去过,不记得是哪个专区的了,不知为什么它们叫伏罗希洛夫独立农庄。

伏罗希洛夫: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柯秀尔:它们是革命后改名的,这是旧的独立农庄,而现在它们叫伏罗希洛夫独立农庄。

有人喊:那里有多少人口?

柯秀尔:那里有260户人家。

有人喊:这是村庄。

柯秀尔:对不起,但这个村庄绵延20俄里,一家农舍离另一家农舍的距离大约有1/2俄里,1/4俄里远,因此你们在这个村庄里坐车要走整整一个小时。

卡冈诺维奇:土地多吗?

柯秀尔:是的,土地很多。也有另一种类型的独立农庄。但像伏罗希洛夫独立农庄这种类型的独立农庄,我们在别尔季切夫专区和其他专区里都有。请问,不客气地说,在这种村庄里我们会有怎样的政治影响?而且,在伏罗希洛夫独立农庄里,村苏维埃是流动的,没有一处房舍,时而在一家农舍,时而又在另一家农舍轮流呆着。在这些地方你们无法展开任何严肃的社会工作、任何粮食收购,根本无法展开任何播种运动。粮食收购在这些地方进行得最为困难。这是富农影响最大的地方……

喊声:对!

柯秀尔:在这些地方富农如果不是全权的主人,那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可以举出几十个这样的例子。我们确信,在这些独立农庄土地使用形式集中的地区我们在集体化方面的工作进展受到阻碍,受到十分严重的阻碍。应当摧毁这种独立农庄制度。

喊声:对!

柯秀尔:让我们感到惭愧的是,是我们自己扶植了这些独立农庄形式。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们把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根据我的计算,革命前我们那里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里有6万—7万户,而我们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4万—15万户。而且1928年和甚至1929年对独立农庄的这种扶植仍在继续,说是为了执行完旧的计划。我举自己材料里的事实:波尔塔瓦1927—1928年度——8000公顷,而1928—1929年度——1.3万公顷被安排用于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舍甫琴柯——6000和1万;别尔季切夫——5000和6000;

文尼察——5 000,现在,1928年给了9 000公顷。只是现在,从夏天起才停止了这件事,但是本应当很早就纠正的。

我想联系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简短地谈谈干部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这里已经谈得够多了。我认为,现在一切问题中的关键问题在于集体化。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材料里列举了许多数字,表明我们现在的处境多么艰难和应当怎样医治这件事情。这次全会提出的关于干部问题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十分及时的。

关于国营农场。我们那里的国营农场拥有的土地不多,总共120万公顷,而且前景是这样的,也许我们还能一块一块地、逐渐地、慢慢地凑集20万—30万公顷土地,因此在我们那里谈不上国营农场大发展。应当抓的是,对现有的好好地组织。

有人喊:那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呢?

柯秀尔:那里也没有闲置的土地,有农民居住在那里,虽然不很密集。我们那里大多数国营农场是小型的:拥有土地2 000公顷以上的只有36个,拥有5 000公顷以上的只有8个。而且,同志们,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必须指出,许多地方对增划土地给国营农场的问题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通过一系列的配合行动是可以大大增加国营农场的面积的,但是有些人却没有这样做或者简单地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和我们乌克兰地方联合公司的国营农场的机械化已经达到了75%,可是我们的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却处于无望的状态,绝对无望的状态。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670个国营农场总共只有134台拖拉机。

卡冈诺维奇:丢人。

柯秀尔:阿达莫维奇许诺今年要作出坚决的改进,但对这种坚决的改进暂时难以相信,因为必须作出很大的改进。

卡冈诺维奇:否则怎么办呢?

柯秀尔: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和其他组织的国营农场的产量大大高于个体户:如果集体农庄的产量为25%,那我们国营农场的产量就是75%,甚至常常比个体户高出一倍。应当承认,粮食的成本是很高的。通常一普特小麦和黑麦超过一个卢布。

安采洛维奇:在工资很低的情况下。

米高扬:在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

柯秀尔:完全正确。现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开始在发展自己的乳品业、畜牧

业、蔬菜种植等方面展开了宏大的工作。明年国营农场就能保证供应我们的城市和大工业中心30%—35%的乳制品等。

我还想再谈谈我们农村里现在的阶级形势、阶级斗争和党。同志们,我认为,对于所有的人,甚至从报上的相当简短的消息里都能看得十分清楚,在乌克兰的农村里阶级斗争正在尖锐化,非常严重地尖锐化。在这方面,联盟的任何一个地区未必能与我们相比,也许北高加索是例外。我已经向你们描述了我们的富农和农村里反对我们的那些势力,但是乌克兰农村里富农阶层的积极性、组织性是很强的。我们那里的富农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大干部。通过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农村里,而且在城市里推行自己的路线。

尽管富农有充分的积极性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从我前面所说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十分清楚,我们并没有把中农从自己身边推开。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非常措施和我们在农村实行的政策会把中农从我们身边推开的一切预言,结果全都落空了,或者如同志们在这里更正确表述的,成了乌鸦的不祥的叫声。

如果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围绕着什么展开的阶级斗争的规模更大——是围绕着粮食收购还是围绕着集体化?我下不了决心说,是围绕着粮食收购。我认为,会倾向于集体化方面。对于机器拖拉机站所在地区和整村整村转向集体化的地方,这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那里有时简直是在进行一场战争。把一切都赌上了。富农斗争到所谓最后一息,直到杀害农村的积极分子或者自己剖腹自杀。

这表明,在与富农斗争方面,党现在打击得是多么准确,正中要害,这具有怎样决定性的意义,这最好不过地表明,所谓的非常措施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所听到的右倾反对派的一切声明又是何等的虚伪。正是在农业的改造方面,我们将同富农进行最残酷的战斗。粮食收购——只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一个独立的重要部分,而主要的斗争是围绕着富农所反对的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展开。

我可以举出一长串的事实说明富农在乌克兰农村进行恐怖活动的规模。恐怖行动比1927年增加了三倍。其次是反革命组织的存在。我们现在简直是成几十个地在破获它们。我就不说前不久刚破获的“乌克兰解放同盟”这样的大反革命组织了。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特殊的案件,其首要分子是以科学院院士叶夫列莫夫³⁹³为首的彼得留拉的著名的部长们。但是,即使只举在直接反富农斗争土壤上发展起来的单纯的富农组织,那么这也足以说明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这方面右倾分子提出的任何药方都是于事无补的。事情很清楚,对右倾分子要使我们离开把反富农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道路的一切公然的和隐蔽的

企图,都必须坚决地予以否决;对宣扬阶级和平或者与富农休战的人,必须从道路上清除。

同志们,由于我们那里的这种阶级形势,据说安采洛维奇在这里在很大程度上正确地骂我们(我只听了他讲话的一部分),说必须十分尖锐地提出关于农业林业工人和雇工的问题。如果你以批判的眼光仔细观察我们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情况,那你就会看见这样的情景。我们乌克兰现在有农业林业工人、雇工等43万—44万人。这比革命前少了一半。

安采洛维奇:毫无疑问。

柯秀尔:我们在个体农民经济中受雇的雇工有28.2万人,而且全部雇工中一半是妇女。

农业林业工人工会只包括了这些人中的30%。其次,在我曾经检查过的我们的集体农庄里,按照最乐观的估计,雇工约有1万人,不会超过。

安采洛维奇: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冒充的。

柯秀尔: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我认为,这个描述本身相当清楚地表明,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十分不顺利。

而在农村取得巨大社会进展和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同时,我们大大提高了雇工的积极性,提高了雇工的阶级自觉、积极性和文化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近波及乌克兰的罢工浪潮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我们应当感到羞愧地说,我们的各个地方机关,尤其是公用事业处,例如在敖德萨的罢工中,就有过一些过错。当然不是像安采洛维奇同志在这里所描绘的那样。

安采洛维奇:我并没有夸大。

柯秀尔:但事实就是事实,在敖德萨周围土地历来就租给了明明知道的富农,他们最残酷无情地剥削雇工,尽管也把他们列入了“自己的”劳动组合。

在涅任的黄瓜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这就成了罢工的主要理由。这些罢工进行得很好。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政治积极性的极大提高,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巩固。

我们那里的贫农委员会³⁹⁴在农村的整个改造和农村现在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贫农委员会是我们在农村的真正的、绝对可靠的组织支柱。它们包括了135万户,但它们包括的贫农还很少,不管这有多么奇怪,按官方的统计——为一半,而根据某些调查的批判性估计——只有25%—30%,有些地方更少——只有15%。而且,同志们,应当指出,使贫农委员会中农化和关于建立农民协会的倾向无疑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倾向。现在

农村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拯救了我们。它纯洁了贫农委员会并锻炼了干部。我应当说,中农分子在贫农委员会里,特别是在领导机关里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也显现出了富农影响的远非个别的事例。贫农委员会会员在集体农庄里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占了集体农庄庄员的一半以上,虽然只有12%的贫农委员会在集体农庄里。在使贫农转入集体化轨道这个方面,贫农委员会还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现在应当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的问题提到贫农委员会的面前。与这些巨大的任务相比,我们党在农村的干部是很少的。乌克兰有24.7万党员和预备党员,其中在农村总共只有1.5万名,从事农业的只有2.2万名。而根据联共中央统计处的统计,在集体农庄里我们有1.6万名党员和预备党员,而且这是官方的数字,可实际上只有7000名。

有人喊:在集体农庄里?

柯秀尔:是的。在50%的国营农场里我们完全没有共产党员或者只有一两名,而且是主任。我们有1500个国营农场,里面有222个支部,2600名党员。在大型国营农场里情况特别不顺利。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国营农场的全部重要性,还没有改造党组织的工作。共青团在农村有20万团员和将近6800个支部。在这方面,应当坦率地说,党还没有在改造农业的事业中对共青团进行领导,我们还没有好好地考虑到它的重要性。

在我们的农村和农村支部里,你可以特别经常地从石蕊试纸——集体化和粮食收购上看到右倾的表现。在春季粮食收购运动时曾经与富农进行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斗争,在这之后,似乎秋天的事情应当较容易一些。但是,正是现在——秋季粮食收购运动中却特别经常地看到右倾的表现。春天有过这样一件事,波尔塔瓦专区的一个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写了一份声明,说他不愿意执行党的军事政策,——他对“柯秀尔”说,但应当理解为对党说,——并请求解除他的工作。在克里沃伊罗格专区的多利纳区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月里,党的委员会暗中对抗粮食收购,当向他们施加压力之后,那里有八个人扔掉了自己的党证。

有人喊:是在清党以后?

柯秀尔:不,没有进行清党,八个人扔掉了自己的党证,包括一名区委宣传鼓动部长,他们声明说,他们不赞成党所采用的粮食收购的方法。同志们,这些右倾分子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理论里找到了支持。这些逃兵是右倾领袖们的主要基础。党的地委机关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右倾情绪。我们面临的那些巨大的任务要求认真改组农村党的干部。清党起了很大的作用³⁹⁵。清除了13%。现在看到既有贫农,又有雇农在大批入党,但人数还很少。今年我们

已经派了1 500人下乡。这里提出的关于派遣2.5万人下乡的建议是正确的。不管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无产阶级干部加强农村和帮助我们的农村组织完成我们现在面临的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解决并于近期一定能够解决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大工作。

主席:现在宣布休会到6点钟。

第十一次会议

11月15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请施利希特尔同志发言。

施利希特尔:粮食问题实际上已经由党通过集体和国营机械化大经济解决了。靠个体经济,主要以个体经济的力量解决粮食问题的打算,这种一两年前还曾经存在过的打算,由于党在粮食问题上采取的清清楚楚的路线,这些打算已经被生活摒弃,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国营和集体机械化大经济的道路才能找到。

例如,乌克兰粮食问题的解决可以用这样的数据来说明。根据我们的长远计划,到五年计划末我们期待并且一定会获得粮食总产量 15 亿普特。其中公有化成分应当提供商品粮总量的 35%。然而很清楚,决不能认为 15 亿普特的总产量是我们拿不下和不能超过的数字,就如同现在特别显然的是,指望从公有化成分得到 35% 的商品粮的打算,与最近几个月,而不是最近几年已经形成的现实使我们能够提出的那些速度相比,是非常低的。

现在继粮食问题之后排在日程上的第二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畜牧业问题。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把畜牧业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认真对待。然而我们乌克兰畜牧业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简短地说,这种实际情况是由今年秋天向市场大量抛售牲畜,包括抛售母牛和幼畜形成的。母牛和幼畜被送去屠宰。这件事情的意义正在变得特别清楚并应当引起最大的注意,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年已经获得了粮食作物中等以上的收成和足够数量的饲料。顺便说,尽管遇到了越冬作物死亡的巨大困难,我们今年完成了粮食增产 10% 的指示。尽管如此,我们发生了大量向市场抛售牲畜的情况。我们各个地方地政机关的报告说明了这一点,一切肉类收购计划的超额完成说明了这一点,牲畜价格的下跌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所以引起特别的注意,是因为 1929 年春天我们产品畜的数量比 1928 年春天大大减少,即:牛减少

了11.6%，母牛减少了2.9%，绵羊减少了40%，猪减少了13.7%；而马增加了2%。

如果根据我们1929—1930年度的控制数字，我们能够期待怎样的恢复和增长呢？与1928年相比，所提出的1930年各类牲畜的变化情况是：母牛增加2%，牛(全部)减少5%，猪减少11%，绵羊减少6%；而马(役马)将增加15%*。

这些数字表明，用计划里提出的办法，我们弥补不了1929年的损失。这样，你们看见，在这个计划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畜牧业问题的办法。

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仍然不是通过恢复和继续发展个体经济的畜牧业，而只能通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建立大型的畜牧场才能够实现。这就是生活正在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至今未曾作为问题提出过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像当年提出粮食问题那样十分清楚和明确提出的问题。因为如果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已经彻底消除了不久前曾经有过的企图通过改善个体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那么，对于畜牧业我们还不能说。直到最近，我们的计划现在还把注意力只放在通过改善个体经济解决畜牧业问题上。然而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只有通过集体和国营的大畜牧场才能找到。顺便说一句，只有这样也才能够解决向工人供应畜产品——肉、奶、蛋的问题。认为通过发展个体经济，我们就能够利用它的资源克服工人供应方面的困难，这样想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我们建立公有化成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型畜牧场的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创举之中。

在乌克兰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实行。根据1929—1930年度的计划，我们打算在乌克兰国营农场联合公司³⁹⁶的国营农场里建立2万头牛的和在集体农庄里建立2万—2.5万头牛的大型奶牛场。就是现在，在最后时刻，我刚得知，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理事会会议计划于近期在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各个国营农场里建立2万头牛的新奶牛场。

从这些根本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确定自己对社会主义成分，包括对集体化的态度。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集体化速度的问题。

在乌克兰我们也有安德烈耶夫同志和其他同志向全会通报的现象。现在来自最基层的集体化的速度那么快，当然无须考虑为集体化进行宣传鼓动，而需要考虑的只是使及时的组织和技術帮助能够跟上基层的这个极其伟大的过程。乌

* 速记记录为13%。——编者注

克兰提出了直到最近还曾经可能被认为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明年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我们打算到1930年秋天使集体化覆盖的土地达到600万公顷,即占农民全部土地的16%,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20%。但是,现在十分清楚,就是这个数字一点也不符合我们有权提出的指标,而决不用像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发言描述北高加索集体农庄运动时所说的那样使自己冒着被指责为幻想的危险。一年前,我曾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³⁹⁷说出了一个我当时觉得非常大胆的想法,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我们乌克兰将100%实现集体化。我应当说,现在一切数据表明,乌克兰可能并且一定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完全实现集体化。生活就是这样在前进,在这样纠正我们。

我们集体农庄运动的质量指标怎样呢?我们各种形式集体农庄的中等规模扩大了。例如,与1928年相比,公社的中等规模从258公顷扩大到321公顷,劳动组合从108公顷扩大到145公顷,共耕社从114公顷扩大到152公顷。其次,我们的高级形式的比重有了提高。例如,1928年10月1日公社和劳动组合为24.4%,到1929年6月1日已经为27.4%,而共耕社的比重相应地由75.6%降低到72.6%。我顺便回答莫洛托夫同志向我提出的关于乌克兰集体农庄的比重比北高加索低的原因的问题,就如卡明斯基同志在图表上所表明的那样。问题在于,所列举的乌克兰的数字是1929年7月1日的,而北高加索的数字是10月1日的。最新的数字表明,乌克兰在这方面至少没有落在北高加索后面。

对集体农庄建设的困难,我想指出以下几点。第一,确保集体农庄的拖拉机供应。当然也给我们拖拉机,但是我想在这方面表示希望,我们会由于我们的报告得到像安德烈耶夫同志曾经由于他的报告得到的同等数量的拖拉机。

丘巴尔:我们需要更多。

施利希特尔:当然,需要更多,但我希望不要更少。

关于我们是否可以只满足于以拖拉机系统来展开集体化就行了的问题,我应当说,决不可以。需要在决议里十分清楚和明确地指出,不建立机器马匹站,我们就无法完成以需要的速度解决集体化的极为重大的任务。这对于我们的森林草原地区和甜菜种植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乌克兰明年春天将有一百三十多个机器马匹站。这是一件在迅速发展的并将产生很好结果的事情。顺便说,应当希望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也适当参与建立机器马匹站的事情。

接下来,关于以自己的资金投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谈得已经很充分了。我只说,乌克兰完全赞成党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路线,的确,为了集体化本身的利益,我们必须从居民的资金中吸取投资。这是完全可行的措施。如果我们在这

方面至今没有取得应有的比较明显的成绩,那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过去没有真正提出过这个任务,只是现在我们才把它提了出来并希望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最后,第四点,就是集体农庄里的阶级因素。这里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不知是莫洛托夫同志还是别的人,已经指出,认为农民一加入集体农庄立刻就会失去他们固有的一切特点——个人主义的倾向、个人主义的利益等的想法是不对的。生活实践表明,这远非如此,在集体农庄内部与富农进行斗争的问题具有非常的紧迫性,容不得片刻的延误,因为富农失去阻止个体户加入集体农庄的希望之后,把自己的破坏活动从在个体户中进行反对集体农庄的宣传鼓动转到了在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破坏活动。

乌克兰的实践表明,如果一个集体农庄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那就可以完全深信不疑地说,这里有富农在活动,如果一个集体农庄在瓦解,那同样可以完全深信不疑地说,这是富农或者富农帮手活动的结果,他们先加入集体农庄,然后又退出去,目的就是要搞垮这个集体农庄。

因集体化快速发展需要而提出的许多任务中,可以指出以下两项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就是,第一,彻底修改我们的土地政策。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在《真理报》上读过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³⁹⁸。指出这件事,我在这里只想证实,问题当然不归结于写类似的文章,而归结于现在我们就在用文章里指出的办法构建我们的土地实践。现在我们的土地政策归结为,使土地规划完全为集体化的进程服务。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完全停止了服务到户并拨给每个个体户一块用地的土地规划。我们把这项工作完全取消了,不是采取取消的方针,而是完全取消了。

其次,在具有大规模集体化趋势的各个区和专区里,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专区里,我们将完全不进行个体农户的土地规划,我们将只在正在组建和已经建立的集体农庄里进行工作。

最后,我要指出柯秀尔同志已经在这里谈到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把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农民的土地并入公共轮作农田并吸收他们中间的贫中农部分加入集体农庄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的问题。

关于独立农庄顺便说两句。所以需要说这一点,是为了使你们不仅了解我们的成就,而且也了解我们的弱点。我给你们宣读一个还是1923年的文件,是关于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部对待独立农庄庄员态度问题的。这是农业人民委员部财务经济管理局关于村内土地问题的决议的摘录:“必须承认,在个人使用土

地的诸形式中,村镇独家农场的形式最为合理,在土地使用者明确希望转为独立农庄或者独家农场的情况下,应当予以推荐。如果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的建立是为了引种在公共轮作条件下不可能引种的特别集约的作物,在此种情况下应当特别予以重视。应当承认个体户的此类组织是绝对进步的现象。”

你们看见了,1923年我们在用怎样陈腐的语言说话。这个缺陷是乌克兰各界,是党和苏维埃组织发现的,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彻底予以消除。

我要谈当前主要任务的最后一点涉及土地社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成熟到如此程度,不能继续避而不谈的问题。1922—1923年度,有些同志把土地社,乌克兰语叫土地村社,看作是初级形式的基层合作社。你们是否觉得这种表述,这种说明现在像是一种陈腐的东西?同志们,甚至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的基本原则,根据它们土地社被赋予了生产功能,仅仅在一年多以前才通过的这些“基本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³⁹⁹。重新考虑土地社的问题已经十分成熟,应当立即付诸实行。这里有两个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对土地社的主要领导实际上现在已经交给了村苏维埃。这里有人已经完全正确地指出,认为大规模集体化似乎提出了村苏维埃的存在问题是荒谬的想法。我不知道,谁的头脑里会产生这种荒唐的想法。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是关于这一点的。相反,村苏维埃现在正在加强自己的政治领导,而在对农村的生产、经济生活的领导方面,它们的利益在制定和通过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最近我们正在转向崭新的阶段,走上新的台阶。现在,由于农业合作社系统的改组,生产的领导集中在各专业合作社联社的手里。村苏维埃的政治和组织职能与农业合作社手中的生产经营职能的这种加强,促使我把改变我们对待土地社态度的问题作为一个迫切的和已经成熟的问题提了出来。我在这个场合发表的是自己个人的意见,这个问题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尚未向乌克兰党的机关提出。然而,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因为生活正导向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寻找另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即自己正在自发地走向大规模全盘集体化的我们的农村应当是怎样的。

主席:现在请阿达莫维奇同志发言。

阿达莫维奇:我们要在这次全会上代表制糖工业发言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今年由于虫灾和干旱歉收,它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但是它是有言可发的,它终于找到了使它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方针和途径。我认为,糖的问题出现在这次全会上,不仅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在喝加糖的茶,而且也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柯秀尔同志代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的时候,把报告的很大一部分用

来论述制糖工业,这不是偶然的。但就是这位我们都尊敬和十分爱戴的柯秀尔同志,在粮食收购高潮期间我在他所在的哈尔科夫同他谈话的时候,请求他在他的办公室里挂上制糖工业的图表,他却说,他有粮食、煤炭、金属的图表,这暂时就足够了,还没有轮到我们。

[柯秀尔:龟孙子。]⁴⁰⁰

阿达莫维奇:我本来可以不在这里提这个细节,如果它对大多数地方组织没有意义的话。是否应当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呢?不,党在方针方面,甚至在结果方面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开始认真对待畜牧业问题,党现在已着手解决经济作物的问题。毫不奇怪,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全会上,在党完成了中心任务以后,我们相当有力地,至少同样“甜滋滋地”抓起了这件事情。

什么是制糖工业?在革命以来的所有年代里,我们的党在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没有对制糖工业进行过总结。我现在非常简短地谈谈这个问题。

鲁祖塔克:很快就需要解释糖是什么。

阿达莫维奇:我们全苏联有将近200个砂糖和方糖工厂,有将近1000个国营农场,其中我们乌克兰的国营农场占有全部国营农场土地的大约70%。我们糖的产量高于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国持平;我们甜菜的种植面积在欧洲国家中占第一位。

波斯特舍夫:我们的面积大,可糖的产量少?是的。

阿达莫维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下面再谈。第二,我们不仅交给国家产品,而且我们还在消费税方面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我们上交给国家的消费税高于全部农业税,1928年和前几年我们还曾经向国外出口。

有人臧:就假定说,这不是你们交的,而是买主交的。

阿达莫维奇:1928年我们上交了其他所有国营农场上交国家的优质商品粮总量的60%。1929年我们上交的少一些,但至少超过各个系统国营农场上交总量的一半以上。1930年,由于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工作,我们将上交少一些。这些事实是不言而喻的。

在畜牧业方面,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占有显著的地位,因为我们拥有很大的饲料基地(废渣)。到五年计划末期,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国营农场里育肥或至少饲养35万头牲畜。我们能够通过甜菜种植合作社在甜菜种植地区在五年计划末建立甜菜种植农户的产乳畜牧业,乳畜总数将达100万头。

里亚比宁:你最好说说,已经建立了的。

阿达莫维奇:这是我们工业情况的总的前提。因此需要和应当谈论它。里

亚比宁同志,我是不会欠债的,并将说说,我们会建立什么。至于加里宁同志,他的忠告我在走上讲台之前是不会听从的。

有人喊:是什么忠告?

加里宁:这是私人的谈话。

阿达莫维奇:制糖工业地区有220万农户,其中90万户为我们的工厂种植甜菜。此外,在我们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里大约有6万名编制内的工人、12万季节工和15万短工在工作,在个别的时期,例如在9月甜菜加工或者收获的时候,一个月期间在我们那里干活的农民工有150万人。

有人喊:有多少农艺师?

阿达莫维奇:关于农艺师我将在后面谈。

这就是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和制糖工业的情况。需要、应当和可以谈论制糖工业,但遗憾的是,我们谈论得有点晚了。为什么今年又特别谈起来了呢?有人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种种甜蜜的和辛辣的指责。

柯秀尔:辛辣的更多。

阿达莫维奇:这很好,因为并非总是只有甜食令人高兴,重要的是把午餐最后的甜食与午餐时的芥末搭配起来。

柯秀尔:芥末有别的用处。

阿达莫维奇:我们今年的情况怎样,为什么今年谈论我们那么多?今年对于我们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对于制糖工业是没有希望的一年。如果1928年我们生产了大约8000万普特糖,1929年我们原打算生产1亿普特,结果我们最多将生产5500万普特糖。在国内缺乏糖这种甜的产品,除了其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应当相当苦涩地来谈这个问题。

有人喊:讲话顶不了糖。

阿达莫维奇:1930年应当期待,——这一点现在就可以在这个讲台上宣布,——如果不发生任何类似的灾难性的情况,如寒冷的晚春、害虫大量出现和干旱……

有人喊:毛虫呢?

阿达莫维奇:是的,令人遗憾的是,螟蛾和毛虫1930年还会有——是1929年的残余,但我们一定会战胜它们。那样,1930年我们将会拥有1.2亿普特的糖。我应当向你们报告,1930年我们甚至可能会有超过1.2亿普特糖。

有人喊:如果?

阿达莫维奇:但是,很遗憾,我们播种甜菜的种子不足,由于我们这里发生了

虫灾,由于对甜菜生产非常不利的夏天,1929年我们甜菜种子的收获量非常少。

洛莫夫:它们,毛虫是不是从俄罗斯联邦来的?

有人喊:那里有自己的毛虫。

阿达莫维奇:现在十分清楚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得不关闭一些工厂,因为春天对我们十分不利。因为春寒,农民曾考虑——种还是不种甜菜。后来我们的主要地区又发生了旱灾。与此同时,我们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毛虫吃掉了我们1000万普特糖的原料,尽管我们发动所有苏维埃和党的机关与工人群众进行了消灭虫灾的斗争。当我们开始关闭工厂的时候,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同志们才明白他们的方针是错误的。在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上和代表大会上,他们曾为争夺建立工厂同我们进行过斗争,当时我们说,我们当前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不是建设工厂,而是发展农民的甜菜种植业,以保证我们现有的工厂有充足的原料。乌克兰的同志们也是不对的,他们谈论边境地带的新建设项目,而那里现有的工厂目前都缺乏原料。

有人喊:你们甚至不对它们进行维修。

阿达莫维奇:我们对它们进行维修并且甚至进行改造和扩建,但我们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为工厂弄到原料。在轻工业部门工作比在重工业部门工作困难得多,因为曾经及时向党组织提出的一切措施并非总能通过。甚至现在,在制糖工业正面临不可思议的危机的条件下,我们都没能做到把问题提到政治局,而问题转为按苏维埃程序解决。不错,11月3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并颁布了由鲁祖塔克同志代表人民委员会签署的法律,这项法律现在基本上令我们感到满意⁴⁰¹。

有人喊:当然啦,由地方预算出钱。靠别人负担费用,你们却得到暗中的补贴。

阿达莫维奇:这个法律保证我们1930年能够得到拖拉机(2000台)用于农民的甜菜种植业并使我们有可能会坚决转向完成我们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发展我们的制糖工业。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经受了表扬,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却相当严厉地“剋了”我们。怎么会发生这种态度的变化呢?对这一点我现在和过去进行过不少的思考。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没能把我们彻底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和国营农场相应地运用到与农民的关系方面。改变这种关系只有在糖厂所在地区通过用机器耕作土地(拖拉机)实现农民集体化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这对于我们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我们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曾因此受到表扬并一直实行至今的那种预购合同制再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了。这种预购合同制曾经是我们党的政治杠杆之一。通过预购合同制的要素我们把我们的农民经济,首先是制糖工业地区的农民经济领到了集体化跟前。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通过预购合同制为吸引贫农参与农民甜菜种植业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与个体成分签订预购合同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同时我们也不必隐瞒,1925年以前我们大部分原料是从农村的富农和中农分子那里得来的。谁会隐瞒这一点?1925、1926、1927和1928年,我们需要使贫农和中农转向另外的轨道,但当你们开始拉他们去播种费力的作物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生产资料。我们乌曼、右岸和波多利耶地区,无马户占50%。十分显而易见的是,这同时也就是尽快建立集体农庄的前提。但这就需要拖拉机,即使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无所事事,而是组建了马队,帮助贫农种植甜菜,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我们现在正在改造我们的农艺人员。对于我们只得到原料还不够,重要的是这些原料是从什么人手里得来的。为了以种植甜菜为基础扩大集体农庄,1930年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里将拥有甜菜种植面积13万公顷,在中央黑土地带州将拥有3.8万公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还能获得更多。这将是1930年全部种植面积的20%。

有人喊:签订长期预购合同的有多少?

阿达莫维奇:是的,现在我们应当由个人预购合同转向长期预购合同。1930年我们按照长期预购合同制签订了10万公顷的合同,而1929年总共为1.5万公顷。其次,我们必须不仅在我们的国营农场,而且在集体农庄一切主要田间作业过程的机械化方面坚决取得进展。

我们在推进机械化的标志下设计了我们的五年计划,但现在这已经不够了。

里亚比宁同志曾经问,怎么会发生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得不到拖拉机,而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却得到拖拉机的情况呢。也许,这是由于领导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那位组织者无能,而曾经领导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那位组织者⁴⁰²能干。

有人喊:他过去曾经是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组织者。工作像老牛拖破车。

阿达莫维奇:他过去曾经是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组织者。但是,批评一位不在场的同志从我来说是不礼貌的。

有人喊:也对。

阿达莫维奇:因此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当我们今年来到拖拉机分配委员

会,我在那里坚持应当给我们拖拉机的时候,米高扬和鲁祖塔克同志断然拒绝了
我们。

有人喊:那古比雪夫呢?

阿达莫维奇:我决不会说,古比雪夫同志有这些过错。我本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我本人曾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对交办的事情应负的责任不比其他人小,不能推到古比雪夫同志身上。

米高扬:对别的人民委员可以指责,但自己的不能出卖。

阿达莫维奇:我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并请求给我们拖拉机。米高扬同志拒绝了,那时我开玩笑地请求已经不是给我们606台,而只是给我们6台拖拉机。连这也被拒绝了。我请求鲁祖塔克记录下来,说他拒绝给我们拖拉机,而鲁祖塔克同志不愿意记录下来,考虑到各共和国应当给拖拉机,而不应从联盟的储备里给。我们当然热爱并尊敬各共和国,但我不相信,各共和国会给我们拖拉机。情况就是这样,里亚比宁同志。然而还是争取到了,从1930年起的两年期间我们就将得到整个五年计划规定给我们国营农场的全部拖拉机。但这还太少了。我们要求再给我们追加4000台,以便100%实现甜菜全部耕作、种植、收获过程的机械化。1930年我们会有大量的甜菜,机器不够就无法及时收上来。必须保证不仅100%用机器进行耕作,而且保证对甜菜进行收获。拿英国为例。它有可能购买廉价的糖,但却在建立制糖工业以缓解失业的情况,利用过剩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线。我们必须重新装备,必须用机械收获。

最后,我们要求五年给糖厂所在地区的农民5万台拖拉机。

我们争取到了在甜菜种植地区建立机器拖拉机站:1930年10个,1931年20个,1932年30个。1930年,我们在指望自己得到2000台拖拉机的同时,已经把其中的200台给了乌曼和波多利耶地区,今年秋天它们已经在工作。请你们读一读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在中央全会之前写的文章,他把中央黑土地带州拖拉机队的工作描绘得那么生动。卡明斯基同志不负责任地宣称,说我们改变了自己的集体化方针。在这之前集体农庄没有种过甜菜。我们需要借助苏联政府的决定要求它们种植甜菜。由于我们明显改变了过去对机械化问题的方针和对集体农庄的态度,这就是在这里对我们大加指责的原因,我们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坚决纠正了我们过去靠牛而不靠拖拉机的错误。

只有在我们那里和集体农庄里实现机械化和建立集体农庄才能最终解决原料的问题,这同时也使我们充满信心,我们一定会从集体成分得到无论如何不少于全部原料的50%,毫无疑问,这不仅将解决原料的问题,而且将在组成集体农

庄的农民中间加强我们工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除了以上所说,我们现在还遇到什么困难呢?柯秀尔同志曾经在这里完全正确地说,我们提供的矿物肥料不够,但是柯秀尔同志就在11月3日那个决定里却对我们提出的再进口300万卢布矿物肥料的申请予以拒绝。鲁祖塔克同志宣称进口计划已经过分紧张并删除了我们再进口300万卢布矿物肥料的补充申请。如果我们补充进口了300万卢布矿物肥料的话,在座的所有同志,首先是乌克兰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会靠补充进口的矿物肥料提高甜菜的产量,生产至少价值1500万—2000万卢布的糖。你们会说,有没有证据呀?耳朵里嗡嗡响着证据证据,可是人们并不总是在听,而听的时候,并不是总会得出结论。

我们每公顷平均使用矿物肥料3.5普特,而比利时平均使用40普特,结果我们一公顷面积的甜菜产纯糖100普特,最多120普特。而在国外一公顷甜菜产糖300普特。很清楚,我们现在碰上了必须通过大量使用矿物肥料和耕作机械化提高产量的难题。

米高扬:发展苏维埃的化学工业。

阿达莫维奇:米高扬同志建议发展化学工业。正确的建议,但当我们过去加强过磷酸钙化肥联合工厂的时候,乌克兰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帮助下把它也从我们手里夺走了。

有人喊:这是有人打着乌克兰的招牌干的。

阿达莫维奇:当我们今年不愿意按照乌克兰的要求从我们的过磷酸钙化肥联合工厂拨给矿物肥料的时候,鲁祖塔克同志指示我们把我们的过磷酸钙拨给他们供越冬作物地里使用,虽然我们自己的甜菜也缺乏这种肥料。除了在甜菜种植地区实现机械化和建立拖拉机站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之外,我们的中心任务还有解决增加甜菜矿物肥料的问题。在甜菜耕作和收获机械化的壮阔浪潮下,在建立集体农庄的壮阔浪潮下我们能够解决原料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我们原料基地问题的讨论有关。这个问题对于亚麻、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也很重要。只应当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完成我们已经提出的一系列措施,而我们希望,我们一定会完成它们,特别是现在党将更直接地抓这件事情,当党将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1930年我们就会得到1.2亿普特糖的。我们已经并且正在筹划弄2万头奶牛。你们会说,太少了吧?但是,很遗憾,今天我口袋里装的买这2万头牛的钱跟古比雪夫同志许诺的一样多。

喊声:就是说不是钱,而是古比雪夫的许诺?

古比雪夫:比五年计划多。

阿达莫维奇:但是我们今年差不多就将完成2万头牛的奶牛厂的组建。

鲁祖塔克:怎么,牛是偷来的?

阿达莫维奇:不,牛不是偷来的,但资金我们是从合作社借来的,从一个合作社,从另一个合作社,我们筹措了相应的资金,我们还从自己的周转中拿出资金等,这样,你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困难,我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害怕使用这样的说法,至少是在对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不太重视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

柯秀尔:而你们低估了粮食问题和粮食收购的意义。

阿达莫维奇:好啦,亲爱的柯秀尔同志,如果你们来种一种甜菜,甜菜之后的第二年种粮食,你们会得到更好的收成。

如果在甜菜之后,你们播种谷物,你们会提高这种谷物产量10%—15%。

柯秀尔:这话是对的,但问题不在这里。

阿达莫维奇:我们至今没有重视道路建设。人民委员会11月3日的决定责成俄罗斯联邦1930年再给我们700万卢布,责成乌克兰给700万卢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给700万卢布,再加上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现有的700万卢布。700万乘4为2800万,这使得1930年有可能预先解决道路问题。但是丘巴尔同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不愉快的插话,说从共和国预算里出这笔钱,他不会给的,如果各共和国将这样对待事情,那我们就不能解决甜菜制糖问题。

最近时期的这些措施,如预购合同制,其次如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国营农场用什么有组织地对集体化的准备进行了影响”,尽管我们现在处境非常困难,我们今天就可以向您,莫洛托夫同志,和整个全会声明,我们在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联合工厂为许多村镇服务;通过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我们以此带领大量土地社前进。我们正在以此培训和吸引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现在我每天收到来自地方的大量信件,信上对我说:只要您给我们拖拉机,我们就全区转向全盘集体化。这是此前我们在农村进行的不错工作的结果。

安采洛维奇:关于甜菜种植合作社你为什么一句话也没说?

阿达莫维奇:与此同时,我们组建了甜菜生产合作社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任务。合作社工作得非常糟,但是乌克兰中央和中央黑土地带州的中枢机关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总是帮助我们和合作社。他们把我们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派去进行粮食收购,收土豆等,这样在签订预购合同的时刻,我们就完全没有人了。在我们最紧张的时刻,我们连我们拥有的差劲的合作社也失去了。

当然,如果在我们完成这一切措施的条件下,到五年计划末我们当然会成为世界上甜菜制糖产量的第一大国。

在1929年大歉收、恶劣的春天和虫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住了播种面积,拥有不少于1928年的种植面积,这说明制糖工业是站得稳的。这说明,我们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们保住了甜菜种植面积,没有大量减少种植面积。至于克服我们曾经面临的那些困难,那么,你们知道,我们避免了提价,因为我们从米高扬同志那里得到了价值5000万卢布的紧缺货物算在甜菜结算的账上,得到允许向我们种植甜菜的农民发放良种算在甜菜结算的账上,我们的甜菜种植者,除富农以外,被免除了农业税等等。由于采取了这些相应的措施,我们避免了提价。是你们曾经提出了提价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只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在地方上未得到执行,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强迫它们执行的时候,我们才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本来不需要提价,用不着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到五年计划末,制糖工业将成为我们苏联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的联合工厂将成为工业中心,它们将按照崭新的原则建设集体农庄新农村的生活。我们还将面临规模空前的困难,但我们会借助这一切措施克服它们。对于我们的工业这次全会不应当白开了。在这方面需要集体农庄、合作社、党、社会团体采取一整套措施,在地方上共同工作,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12月份我们将召开我们农艺师的代表大会。斯克雷普尼克同志问:我们有多少农艺师?我们有大约2000名农艺师。12月份我们将召集我们的全体经理开会,以便实现集体化事业的决定性转变和使我们超过五年计划。我们打算讨论一系列措施,以便能够超过五年计划的规定。经理和农艺师的这两个代表大会将是今年地方实际工作方面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主席:现在请奥什温采夫同志发言。

奥什温采夫:柯秀尔同志提出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乌克兰农业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因为大容量的收成和内河水运、海港使我们有根据与可能于最近两年展开乌克兰粮食出口业务的情况——这一切说明需要通过现在提出的关于柯秀尔同志的报告的建议。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谈谈乌克兰时常发生的歉收。最近两年期间我们看到了那里给乌克兰农业造成重大破坏的现象。乌克兰发生的歉收和干热风——这是气候现象,显然,未来几年我们也必须不时予以注意。因此,未来几年也会像前几年一样给谷物饲料平衡带来波动。为了避免这种波动,应当关注东部,使东部的农业问题迅速地赶上来,使乌克兰这种交替性的歉收不至于影响联盟的谷物

饲料平衡。

因此,第一阶段——乌拉尔州应当在这方面起相当重大的作用,一方面乌拉尔州是工业发展强劲的州,它本身也将消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另一方面,它是最靠近铁路运输的州,这使它有可能把谷物饲料货物运往中心地区。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尽一切可能发展乌拉尔的粮食问题。

乌拉尔有没有发展粮食问题的可能?我们有闲置的土地并且现在就能够划给国营农场100万公顷,如果工作安排得正确,这些土地实际上每俄亩会为我们产粮80普特,加在一起就将是8000万普特商品粮,这些土地最近2—3年内就可以开垦出来。

有人喊:是小麦?

奥什温采夫:在乌拉尔州首先是小麦。因此可以说,这些措施会保证谷物饲料平衡的增长……

有人喊:你们那里是冬小麦还是春小麦?

奥什温采夫:我们那里只有春小麦,我们每公顷可以收获80普特小麦。

柯秀尔:那您就到我们这里来争取吧。

奥什温采夫:关于畜牧业问题。首先,乌拉尔具有150万公顷闲置的牧场土地,如果以3公顷1头牲畜计算,未来2—3年那里就可以放养这种公有化成分的牲畜50万头。由此提出的紧急措施是,由于乌拉尔南部地区歉收,个体户大量出卖牲畜,我们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把10万头奶牛从个体户手里转到社会主义成分——一方面是国营农场,另一方面是我们的集体农庄手里。如果事情安排得当,这10万头奶牛每年能向我们提供20万普特奶油。这件事情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必须在最短期间予以实现。除了其他的一切,除了建立畜牧业协会,还需要购买牲畜的贷款,何况现在牲畜的定价对于我们是如此合适和有利,使我们有可能把大量牲畜转为社会主义成分。

关于集体化我在这里应当说,我们乌拉尔拥有的不是小型集体农庄,而是扩大到整个区整个区的集体农庄,它们应当成为土地大规模机器耕作的大目标。现在红波利亚纳区有可耕地13.6万公顷,整个乌拉尔州已经登记在册的这样的区共有10个,毫无疑问,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在拖拉机的直接供应方面应当把这10个全盘集体化的区置于自己的照料之下,因为它们是联盟一级的全盘集体化的区。我认为,这些区应当由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直接供给拖拉机。

现在一般地谈谈集体农庄的拖拉机供应问题。如果柯秀尔同志指出,给他

们的拖拉机太少,那么完全没给我们乌拉尔拖拉机,如果三人集团在自己的声明里指出,集体化是在拖拉机队的基础上和一般拖拉机供应的基础上发展的,那么这种说法今天是不对的,因为集体化运动是在没有拖拉机和拖拉机队的情况下进行和开始的。我们可以继续使用拖拉机队加强集体化的蓬勃发展,使这件事情在生产上和组织上定型,只是在现在有拖拉机和拖拉机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占据集体农庄更快发展的主要环节。现在集体农庄拥有可耕地100万公顷,而完全没有拖拉机队,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机。为了巩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阵地,我们必须得到拖拉机,况且与乌克兰相比我们要的拖拉机数量不大——总共1600台,供集体农庄和10个全盘集体化的区使用,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占地5万至15万公顷。

在彼尔姆专区正在组建一个占地15万公顷的亚麻种植集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将是主要的和最大的亚麻种植联合公司之一。但是十分清楚,如果没有在拖拉机供应方面和建立技术基地方面对这一事业的即使是不大的支持,我们就不会把这项工作推进得很远。在这方面我们面前摆着一项吸收农民资金加强集体化的主要和巨大的任务——补充固定和流动资本。吸收资金的可能性很大,需要的只是善于吸收。

现在关于干部。对于干部,应当实行一系列的实际措施提高地方上的这些干部。应当说,我们拥有的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农艺师等,对于在实践中执行改造农业的任务,实际上完全没有准备,至今旧的地方自治局的工作方法仍占主要地位。结果,在执行我们的措施和我们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这些干部的充分的帮助,却看到他们执行这些决定时的歪曲。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培养自己的干部。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特别是乌拉尔需要建立一个农学院。如果我们在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州里有农学院,那么,特别缺乏新干部的乌拉尔需要未来两三年期间培养新的行政技术干部。

乌克兰两年期间发生了歉收。乌拉尔州,它的南部各区今年也遇上了歉收。我们这个历来被认为是缺粮的州运出了2200万普特谷物饲料,这是乌拉尔州空前的紧张外运粮食的一年,今年乌拉尔14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需要帮助,因为乌拉尔今年发生了歉收。我认为,在这方面乌克兰有过不足,后来得到了弥补。应当认为,政府和党对乌拉尔也会采取措施弥补这种不足。

主席:现在请米高扬同志发言。

米高扬:我们一些农业区党组织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具有这样的含义和意义,根据它们,第一,可以注意到一些地区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传播给别的地区;

第二,可以采取提高各个主要产粮区。我完全同意柯秀尔同志报告的内容。在乌克兰农业的问题中,乌克兰草原区的问题应当占据中心的位置。至今这个问题突出得不够,应当让这个问题在中央的决议里占有相应的位置。需要十分严肃地提出关于乌克兰草原区的问题,因为这里具有解决粮食问题的极大潜力。从乌克兰草原区我们可能和应当得到一个粮食资源不亚于俄罗斯联邦最重要地区的纯粹的粮食工厂。地理上接近港口和乌克兰粮食的质量保证它向国外销售粮食。当国内的粮食问题解决以后,乌克兰的余粮大概将在很大程度上销往国外,而其他地区的粮食将供应中央市场,这些市场现在很大程度上暂时靠乌克兰供应。

与乌克兰农业问题有着分不开的密切联系的是运输问题。第聂伯河轮船公司处境凄惨,甚至比伏尔加河轮船公司更糟。

柯秀尔:糟得多。

米高扬:但最奇怪的是,大家都看到了,却没有人为之呼喊。那里运营的只有战前蒸汽船队的40%。在这个地区整个货运量增长,整个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在两年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将要竣工、船闸将要打开、轮船可以沿着整个第聂伯河航行的情况下,我们的第聂伯河船队却处于最不幸的状况之中。

丘巴尔:我们要在基辅建一个工厂,但被禁止了。

米高扬:这样的工厂三个月里可以建十个。你们在露天里造船,只需要一个机械工厂帮助。

需要对赫尔松港进行扩建,使它适合于这件事情。

乌克兰草原区的主要祸患是干旱。我完全同意柯秀尔同志的意见,拨给抗旱的那几笔钱也许总的用得是对的(我不能说相反的东西),但是它们与抗旱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是十分清楚的。

从自己对乌克兰草原区的观察中,我个人认为,乌克兰草原区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水利化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整个草原进行灌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改用拖拉机耕作全部土地。

我亲眼看见干部陷入了张皇失措:天不下雨,我们种不上地。农民也这样说,富农在鼓动,干部士气沮丧,就在这同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非常平静地播下种子。我问:怎么样?为什么?原来,他们及时翻耕了休闲地,用拖拉机翻得很深,用不着下雨就可以播种。

柯秀尔:用马不可能这样翻耕。

米高扬:用马做不到这样。在用拖拉机翻耕的情况下,秋旱几乎没有任何意

义,剩下的庄稼成熟时期夏季干旱的危险也被拖拉机减轻了,因为拖拉机翻耕保证了土地较好的墒情,保证了较早的播种,这在乌克兰,在草原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有人喊:一个星期就全完成了。

米高扬:一两个星期就解决了问题。赶在干热风前进行收获或者干热风来得稍晚一些,这就解决了问题。不用说,任何马的牵引力都不可能在短期内翻耕乌克兰草原。那里干旱问题的解决在于耕作的机械化,在于用拖拉机翻耕土地。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草原区的中心问题。

在提交给乌共(布)中央的建议里说,要在两年期间完成乌克兰草原区的村内土地规划。我应当说,我对此有很大的怀疑。在猛烈摧毁农村一切经济关系的情况下,当整村整村加入集体农庄,当刚建立的新村在合并的时候,是否需要花钱进行村内土地规划,以便过半年或一年之后使一切再返回原处。现在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也许,等上一年或一年半当大家都加入集体农庄以后会更加有利,那时就可以彻底进行土地规划。我不怀疑,敖德萨专区和尼古拉耶夫专区一年就会过渡到全盘集体化,除了对德国移民的说服时间需要略长一些。应当承认,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专区的集体农庄是乌克兰最好的集体农庄,在全联盟也不是最差的。这两个专区无论在完成粮食计划方面,还是在扩大播种面积方面,在整个运动的规模方面都比其他的专区要好。

毫无疑问,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在乌克兰草原区采用拖拉机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不引入拖拉机,那里农业的生产效率是不可能提高的。要么这些个体经济必须成为大农场主的经济,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要么这必须是社会主义大经济。要么是美国农场主资本家,要么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这样草原区的小经济就不可能提高。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对于乌克兰的草原地区和对于俄罗斯联邦的其他草原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和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次全会已经注意到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蓬勃发展速度,我们都是这种速度的见证人,看见整个整个区一起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要知道,早在1928年1月中央委员会在关于粮食收购的号召书里确认(这是一个恰当的确认),“富农是农村的经济权威”⁴⁰³。这是完全正确的论断。中农,正如列宁同志所说,是动摇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动摇。在政治方面,中农早已摇摆到了我们一边,而在经济,在农村经济方面,由于过去没有社会主义成分作为样板,富农成分,富农经济曾经是中农的理想。因此经济权威过去在

富农一边,在富农经济一边。

现在我们做到了,在粮食收购过程中打破了富农的权威,这是一。第二,我们做到了,通过国营农场,通过机械化集体农庄和拖拉机队提供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样板,树立了权威。

我们表明,经济的公有组织高级形式会提供最高的生产效率。很清楚,任何一种形式,如果它不能保证更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取代另外一种形式的。不仅在集体农庄里,而且在拖拉机站里,我们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巨大的增加,使经济的收益率有了明显的增长。

让我们举著名的舍甫琴柯站为例。我去过这个站,我应当说,从经济整个安排的角度看,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读有关它的介绍时得到的印象深刻得多。

彼得罗夫斯基:联合收割机一台也没有给。

米高扬:没有人申请要联合收割机,而且现在谈的不是这个问题。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拖拉机站实际具有的巨大意义。在拖拉机站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领导经济的统计材料,这种统计我们不仅在集体农庄里,而且在普通的共耕社里都能得到。拖拉机站提供这样一把统计的钥匙,这是中央统计局的任何一份平衡表都给不了的。它们的平衡怎样呢?脱粒机的管理员记录下来,他打了多少粮食,按照计划算出,需要上交国家多少粮食,自己应当留下多少,总之,他提供了粮食的去向。这是任何中央统计局,任何义务通讯员不可能向我们提供的。这里有完全准确的报表,完全准确的平衡表。通过拖拉机站安排粮食的利用和去向,我们可以得到对农业进行改造,对农业进行社会和技术改造的极大杠杆。

很清楚,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是由我们正确的政策决定的,这表现在我们打败了富农,提供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样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了以拖拉机为形式的物质资源。很清楚,拖拉机将在组织这大量农民方面,在组织这股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的狂澜方面起极其巨大的作用。

对于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进行的关于不允许把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对立起来的争论,我说几句。当然,右倾分子的这整个政纲,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听到的新的政纲,这不仅是一般的伪善,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在党胜利了的事实面前,右倾分子不得不交出自己的阵地,但他们不想投降,他们在继续自己的路线。关于这一点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我就不重复了。我们很清楚,集体农庄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他的关于向高级形式过渡计划的部分,因为集体农庄就是生产合作社。

所面临的阶级斗争将具有怎样的社会特点,这种阶级斗争是否也会在集体农庄里发生呢?在集体农庄里的阶级斗争一定会有的。伊里奇是怎样论述合作社的呢?关于合作社他写道:

“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⁴⁰⁴

论述合作社时(在他这里没有“集体农庄”这个词),他说,合作企业不仅土地,而且生产资料都是国家的和公有的,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很清楚,伊里奇指出了合作社的不同形式,不同阶段。他评定一些合作社形式说,它们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它们是集休企业,而评定另一些合作社形式是社会主义企业,因为它们是在建立在公有化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当然,集体农庄有各种各样的,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上。冬天我在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西伯利亚看见过公社,公社里一切都公有化了,不仅生产完全公有化了,而且连日常生活条件也公有化了。很清楚,这与今天刚建立的只有庄稼地公有化了的那些集体农庄完全不能相比。这里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别。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些形式在发展成为另外一些形式,由初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但很清楚,在这些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和公社里,由于存在着集体农庄庄员和公社社员带进来的偏见,由于存在着周围自发势力的影响等,那里还将进行阶级斗争,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在这些集体农庄里不仅将进行与这些偏见的斗争,而且在经济公有化的同时,那里也有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在集体农庄内部将发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因素的斗争,为排挤集体农庄里存在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这也就是从外部和在内部进行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在大规模集体化的情况下,在集体农庄里存在斗争的情况下,在集体农庄建立的最初阶段富农的加入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把集体农庄牢牢地建立起来并且巩固了之后,我们也许会接收富农,因为我们总得把他们安置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地解决,而应当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解决。在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化的最初阶段,我们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

对于危害集体农庄运动的人,可以分出两类。一类是对集体农庄估计不足的,这是右倾,这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敌人。但是也有另一类人,他们赞成建立集体农庄,但不相信集体农庄在大范围内是自然的、健康的。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温室里的植物,需要像对有病的孩子那样照料,给了它们钱,就别指望偿还。如果我们将靠国家出钱建设集体农庄,那这会限制集体农庄建设的规模——我

们将完不成用集体农庄覆盖农业的任何计划,因为我们将没有钱办这件事情。因此,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钱上,认为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基础的人,这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反对者,他们不相信集体农庄运动的力量和生命力并限制它的规模,他们不相信集体农庄会自己弄到钱。这就是为什么考虑到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的情况是重要的。

我想谈谈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甚至在公社里只顾满足个人要求的倾向往往也占主要地位。甚至在公社多少得到巩固以后,也很少提出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现在正在发生新经济政策初期工业部门曾经发生的类似情况,应当谈论需要为国家多出产品,以便能够继续前进。

工人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懂得,他们必须提供利润,以便能够继续进行建设。然而在公社里,尤其是在集体农庄里并非人人都明白这一点,集体农庄的积累问题尖锐地摆在面前。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集体农庄运动中现在有一个关于建立集体农庄畜牧业的非常尖锐的问题。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1929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即社会主义成分在畜牧业方面只占商品产量的1%,而在粮食方面我们占12%。当然,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畜牧业可以推进得快一点。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耽搁,应当今天就抓起来。我们提出一个任务,1929—1930年度使公有化成分在农业的肉产量方面的比重达到8%,在牛奶和奶油产量方面达到同样的比重。

在解决肉类问题方面,我们必须走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数量的道路。但不仅是增加数量。阿达莫维奇同志说得完全正确,有些国营农场,特别是公社的商品率比农民的商品率还低,而且经常根本没有任何商品率。有数量很多的优良的奶牛,有防寒的牛舍,有畜牧业专家,但是一公升牛奶也不给城里的工人。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商品率。不仅集体农庄里是这样。我也到过几个国营农场。

就举乌克兰第聂伯河畔的“红色灯塔”为例吧,那里有大约200头奶牛,是一个很好的奶牛场,但产品的商品率只有40%,而且一直没有变化。我看过阿尔马维尔郊区的“小村庄”国营农场。普遍的现象是,工人和职员,只要谁想要,便能无限制地得到任何紧缺的畜牧业产品——奶油、牛奶、奶酪,每个人想要多少给多少。而主要的是,他拿去不是自己吃,却常常是为了投机倒把。既然随便给,干吗不拿呢?既然奶油缺乏,市场上价钱贵一倍,他们便拿了去卖。这样,是我们自己在培植投机倒把。如果由于布匹和其他工业品缺乏我们就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厂里和其他工厂里允许工人随便拿多少产品,那会怎样

呢?现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发生的情况,这不是无产阶级政策,这不是对工人的支持,而是名副其实的反无产阶级政策。人们在国营农场雇工的工资上进行节约,一个戈比也不给增加,却十分乐意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牛奶和奶油,而不是实行经济核算和定量,不是进行计算和按一定价格与一定定量该给多少给多少并增加工资。这样做对我们将更加有利,我们将造就真正的无产者。在国营农场和公社里并不这样做。

为了增加食品供应的货源,今年必须采取一系列专门的措施,首先是牲畜育肥和放肥的措施。与此同时,我们今年提出一项任务,要国营农场今冬明春最紧急地为我们至少育肥150万头猪。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新的战斗任务。养猪业最适合的地区是乌克兰,养猪业在那里可以大大地发展,因为那里有玉米基地,在草原区玉米种植相当普遍。在敖德萨和波尔塔瓦专区玉米可以作为集约化畜牧业的基础。正是在乌克兰养猪业将比肉牛饲养发展得更大更快(除了糖厂,那里也将发展奶牛场和养猪业)。玉米地是发展养猪业的极好基础。美国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养猪业的,因为玉米平均每俄亩产玉米粒150—200普特。这就是需要对玉米地给予必要注意的原因。在乌克兰人们早就在谈论这件事情。该是必须把发展玉米列入农业计划,把发展玉米地作为肉食业特别是养猪业基础的时候了。

关于拖拉机站。我认为,它们应当覆盖乌克兰的整个草原。当乌克兰的同志们叫喊拖拉机少的时候,那确实是少,但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给他们的比别人少。按照计划打算用拖拉机覆盖乌克兰的整个草原。

柯秀尔:按照什么计划?

米高扬:按照已经研究的计划,现在我谈谈这个计划。

我给你们举一些数字:1928—1929年度,我们进口了价值2900万卢布的带牵引农具的拖拉机,我们自己生产了5000台。今年,1929—1930年度,我们将进口价值9000万卢布*的带牵引农具的拖拉机,我们国内生产1万台。

柯秀尔:增加了两倍。

米高扬:你们看到,增加了多少。这全都是黄金。政治局有关于靠超额出口增加拖拉机进口的决定⁴⁰⁵。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党、集体农庄、合作社——都认真来抓建立超计划的补充出口储备这件事,我们就能够得到比计划预定进口多2000万卢布的拖拉机。

* 速记记录为7500万卢布。——编者注

这个进口数额可能将会增加,因为可能必须给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和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更多的拖拉机。

至于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我应当说,莫洛托夫同志不应该那样攻击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计划。要是他真的认为,人们只坐在那里搞五年计划,那当然就可以说,他们是只喜欢美丽的图画,而不干具体实事的空想家。但问题在于,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不能处理农业的一切问题。它的任务是有限制的。它应当进行工作部署,研究今年要建立多少个站,它计划春天建200个站。

有人喊:太少。

米高扬:应当提出另外的数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是从实际可能出发的。我们希望,这将是真正像站的名副其实的站。

有人喊:这少了点!

米高扬:你们自己判断吧,要知道,这不是手风琴。(笑声)

有人喊:可以让人拉!

米高扬:应当要么增加每个站拖拉机的数量,而减少拖拉机站的数量,要么相反。如果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今年一年建立200个站——这将是一件大事。关于拖拉机站,我看到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的站与其他组织形式的站有某些不同。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想要在几乎完全机械化的基础上,在最可靠的突击区里建立几乎是完全标准化类型的站。我看不出国营站和合作社站之间的原则不同。要知道,名称什么也说明不了。国家的和合作社的口袋是同一个口袋,人员是一个党供给的。这里没有不同。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应当建立标准类型的站,它们应当从根本上改造该地区的经济。如果别连基同志想要做同样的事情,工作不会因此而减少。问题应当在于把一切转到这条轨道上来,而不在于像有人对我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站都移交给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把站从一家手里移交到另一家手里,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也许,可以重新考虑把站建得更好,建得更多。但是,如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所规定的,拖拉机站五年计划期间应耕作5000万公顷播种面积——这已经是现实。这里还没有算上其他形式的站。大概,阿达莫维奇那里将有一定数量的站,中央种麻合作社联社也将有一些。五年计划规定了5000万公顷,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完成这个数字,那就不错了。如果我们将有更多的拖拉机,那就能坚决地超额完成。当然,计划安排,即使是两三年,是绝对需要的。这甚至已经不是五年计划,而是四年计划,因为

一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需要呢？甚至与农民联系不那么广泛的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现在也不得不制订行动计划,请注意,是行动计划,而不是三年设想。

莫洛托夫: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和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它们在五年计划问题上有很大的不同。

米高扬:我自己看得见这种不同。但是既然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有一个三年行动计划,那么,难道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没有五年设想能行吗?要这干什么?为了让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了解这个设想。为什么?为了动员群众、弄到钱等等。这就是需要的原因。计划的审核必须通过实地检查进行,必须吸收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参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的发言就此结束。我认为,乌克兰必须在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在未来两年里把乌克兰的草原区提高到更高的高度。我认为,把乌克兰草原列入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在这个草原区建立真正名副其实的集体农庄,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奠定机器基础——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任务。我们可以以此大大提高这个地区的商品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况且有中央黑土地带州的榜样。我手里有中央黑土地带州粮食农业合作社联社主席萨尔基斯同志告诉我的有趣的资料。那里的商品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极大地提高了,拖拉机站是加速集体化的极大杠杆。在奥霍切夫区,建立拖拉机站的时候,一个集体农庄也没有,在这之后站所在区的大片土地100%地实现了集体化。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些拖拉机站推广到草原上去。此外,在发展谷物业的同时,需要在谷物业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畜牧业问题,在这方面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重点,十分尖锐地提出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问题,因为这是最中心的也是最薄弱的环节,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变成工业企业。

主席:现在请库比亚克同志发言。

库比亚克:我认为,柯秀尔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这个报告应当得到适当的对待……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修正。

库比亚克:和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修正。毫无疑问,乌克兰的大功劳是,它在一年甚至更短期间战胜了规模极大的自然灾害的后果。毫无疑问,那里农村党组织的工作中也存在缺点。现在很难谈这些缺点,因为我们只是从他们的报刊上或者偶然落到我们一个友好共和国手里的一些文件上知道它们的。

柯秀尔:而且是用乌克兰文写的。

库比亚克:是的,而且是用乌克兰文写的,需要和翻译一起阅读。我想谈谈

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里包含的两点。

一个问题无疑是共同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的问题。同志们想用行政手段消除这种土地使用制度。施利希特尔同志说过,应当于近期,我不知道是在多长期间,消除他们那里的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我觉得,全会应当利用讨论乌克兰报告的这个机会。在我们的一些州里独立农庄比乌克兰更多,因为我们共和国本来就大⁴⁰⁶。我们的一些州提出在几个月期间用行政手段使独立农庄恢复原来状况的问题,即使独立农庄回到最初的状况,回到村庄里去。同志们打算把若干独立农庄合并到一起。

我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把独立农庄的房屋迁移到一个地方,为此就需要补贴或者数量相当大的长期贷款;没有贷款你们就不可能把独立农庄的农民迁移到村庄里去。西部州和俄罗斯联邦其他的州提出了把这些独立农庄迁移到村庄里去的问题,以便有可能更好地使它们实现集体化。有些地方已经在进行这种尝试,但这些尝试归结为由国家出钱把独立农庄这些简陋的农舍迁移到村庄里去。

柯秀尔:这不合适。

库比亚克:没有大量的资金,不宜于进行这项工作。

有人喊:应当让他们出钱。

库比亚克:我们也打算借助拖拉机队消除这种土地使用形式,这样做会是适宜的。只有用这个办法能够不花大量的钱做到这一点。

柯秀尔:独立农庄反正是要迁移的。

(斯克雷普尼克的插话没听清楚)

库比亚克:我们是这样看这件事情的,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虽然这些独立农庄得要迁移,但不是由我和您来迁移,而是由农民自己迁移他们的农舍,就像他们当年把它们迁往独立农庄一样。

柯秀尔:这是对的。

库比亚克:既然这是对的,就应当这样做,就像我们暂时在农业人民委员部里所规划的那样。现在我们暂且只给过去的斯摩棱斯克省一个拖拉机队。我们将借助这个拖拉机队巩固我们迁移独立农庄工作的某些试点地段。另一方面,我们想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提出一个任务,让它们选择独立农庄的农民可能聚集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医院。由于我们一方面将用拖拉机翻耕田地,另一方面将在区里建设文明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样我们就能迫使独立农庄的农民拆掉自己简陋的农舍并把它们迁往我们指定的地点。

斯克雷普尼克:这不是五年计划,而是五十年计划。

库比亚克:但是我们决不打算由国家出钱用行政手段消除这些土地使用形式。这将是我们的力不胜任的。

柯秀尔:这样对!

斯克雷普尼克:不由国家出钱。

库比亚克: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一点写进决议里。

第二个问题。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决议里有一点指出,必须在两年里实行草原区的村内土地规划。这一点需要……

柯秀尔:修改。

库比亚克:不是修改,而是完全删除。不言而喻,土地规划工作是必需的,但是是否在两年期间,是否是村内土地规划,我认为,不久的将来,将要形成的情况会表明这一点的。现在得知,乌克兰已经形成了这种情况……

雅罗斯拉夫斯基:必须得有指示吧?

库比亚克: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指示我们有:集体化运动,建立集体农庄,建立拖拉机队,建立机器拖拉机站——这就是指示。

柯秀尔:我说的就是这一点。

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土地规划的方针。

库比亚克:关于土地规划的决议说的不是这个方针。决议里说的是一般的村内土地规划,是农户的土地规划。

柯秀尔:不完全是这样。

库比亚克:决议里说的就是这样。

斯克雷普尼克:那就请您读一读。

库比亚克:你们的决议我们早就拿到了,我们已经拜读了,不仅是读,感兴趣的人还进行了研究。

斯克雷普尼克:这很好,但除此之外,还应当正确地理解它。

库比亚克:难啊——并非人人都理解相同,而如果你们将用乌克兰语说和写,那当然就不明白了。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要知道,我是用俄语理解您的。

库比亚克:另一个问题,关于草原。我认为,柯秀尔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那个方针,而继他之后米高扬同志也说,在草原里应当采取措施抗旱……

柯秀尔:这将是正确的。

库比亚克: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只靠拖拉机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免遭干旱。

柯秀尔:这也对。

库比亚克:因为这个干旱的秋天在干旱达到这样的深度(例如,在一些地区达到20英寸),拖拉机翻耕不了。

柯秀尔:拖拉机都损坏了。

库比亚克:就是说,问题不只在拖拉机。因此毫无疑问的是,需要寻找抗旱的作物,玉米和大豆就是这样的作物,我们必须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扩大它们的翻种面积。

柯秀尔:就是说,减少小麦。

库比亚克:柯秀尔同志,如果我们选不出抗旱和耐寒的小麦品种,那就可以放弃。难道您希望那里不断发生自然灾害?我认为,这在经济上将是有害的。

如果我们把一些新的小麦产区吸引进来,这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干吗要为每年在草原上迎接这种旱灾而绞尽脑汁呢?没有必要。但是我认为,一方面借助拖拉机,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小麦抗旱品种(我们有希望获得这类抗旱品种),我们终究会找到与干旱斗争的方法。

下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党的农村工作。我们不应当忽略现有的情况,以作为未来的出发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农业中有统一的领导,如果我们有一个坚强的规划的拳头,柯秀尔同志所说的结果会更好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今年拨给农业二十多亿卢布。各共和国参与的情况怎样呢?我说这话是针对斯克雷普尼克的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副报告的观点的。

柯秀尔:这是诽谤,我们赞成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库比亚克:如果这是诽谤,我收回自己的话;如果这是诽谤,我将感到高兴。

鲁祖塔克:这是议程的下一项。

库比亚克:这是对的。现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农业方面只调节35%,结果是,我们的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情况很不顺利。不很久以前我们在劳动国防委员会里讨论过棉花总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他们提交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计划里一句话或者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谈关于棉花种植地区的改造。

伊克拉莫夫:对。

库比亚克:对,而您,伊克拉莫夫同志,过去在什么地方?您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您在这里说——对,而当那里一团糟的时候,您在那里什么措施也没采取。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富裕富农的农庄。组织局在听他们汇报的时候,在决议里曾经指出了这一点⁴⁰⁷,我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棉花总委员会五年计划的

会议上也指出了这一点。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也同样。难道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情况更好一些吗？他们盘算并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甜菜上，而在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甜菜的时候，他们没有向自己提出，也没有试图提出怎样改造或者改变经营形式的问题。他们需要原料。他们便像工业家那样行事。不很久以前在农业林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全会上，当阿达莫维奇同志发言的时候（这可以查对速记记录），他一句话也没谈集体农庄，没谈国营农场，而只谈农民经济。

有人喊：那后来呢？

库比亚克：后来，在我发言以后，他说：“我们会纠正的，我们会改正的，等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组织政策的结果。他们不受监督地管理和领导农业的这样一个大的部门。

或者再举这样一个问题为例，难道我们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工业企业的情况就一切顺利吗？情况非常糟糕。没有人对它们负责，没有人领导。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的农业不仅被分割成托拉斯，我们还正在把它分割成股份公司。现在我们有养羊股份公司。我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都是股东。不得不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揭露那里存在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为了成立这个委员会，我们不得不同股东们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话。另一方面，这些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感受到某种优柔寡断和无人领导，不知道股东们会怎样看自己。如果他搞谷物种植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便大骂说：“拿羊毛来。”而如果他开始提供羊毛，便会对他说：“我们需要粮食，田地为什么荒着？”暂时只有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种麻国营农场股份公司的初步决定。这也是一种对工作极不负责任的形式。我认为，在我们的条件下，当资金出自国家的同一个口袋，股东们不交纳自己的资金，而不负责任的情况又很严重，由此未必会产生什么有利的结果。不很久以前成立了一个畜牧股份公司。暂时一头牲畜也没有，而丑事却很多。

柯秀尔：繁殖了许多牲畜。

库比亚克：米高扬同志已经威胁要在决议里反对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写信反对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有人喊：那编制，编制呢。

库比亚克：编制很大，争论很大，可牲畜还没有。

我认为，中央无疑应当注意这个组织方面。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发展农业的各个部门，就无法安排农村党的工作。现在结果怎样呢？大家都在搞农业。今年地政机关是决不会参与的。

将近10亿卢布的资金他们自己管理，工业家在养羊，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

司在种甜菜等,拥有10亿卢布的地政机关根本不参与。不管地政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建立它们毕竟是为了让它们参与某种调节,参与农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参与统一的国家计划。而现在却不是这样,它们是消极被动的。

养羊股份公司在搞养羊业,畜牧股份公司在搞畜牧业,等等。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丘巴尔同志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与我们相比,他们对农业的调节(不)少于35%,否则一切会没有他们的参与而进行调节……

有人喊:我们大概更少。

库比亚克:那您为什么反对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波斯特舍夫:谁反对了?

库比亚克:你们有一个决定,但你们取消了。

柯秀尔:你从哪里知道的?

库比亚克:因为它发表了,其他的没有发表。

波斯特舍夫:是谁告诉你的?

库比亚克:我读到的。

柯秀尔:我们什么也没发表。

库比亚克:我认为,农业人民委员部会在这35%的限度内参与调节更小的比例,大约20%。而当农业人民委员部用20亿预算中的20%参与调节之后,你们便开始骂它什么也没有,骂它什么也不做。而这时候绵羊、奶牛、猪却从农业人民委员部旁边走过。

主席:现在请丘巴尔同志发言。

丘巴尔: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我们有一项单独的议程,到时候可以谈这个问题。而对这里已经涉及的那些问题,第一个意见应当提给奥什温采夫同志。他在这里表现了、说出了社会情绪中可以感觉到的那些想法。从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观点看,这些想法是非常有害的。这种想法就是:因为那里有干旱,因为那里有严寒,因为那里根本没有稳定,那我们干吗还要在那里忙活,让我们用乌拉尔为自己进行再保险,用东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为自己进行再保险。再保险是好事,但是当……

卡巴科夫:丘巴尔,这一点毕竟是应当考虑的。

丘巴尔:(但是当)这种再保险是通过对加入苏联的被称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最大经济的低估来实现的时候,我们乌克兰的干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是目光短浅,是不懂得,苏联的这个地区不仅是及时满足最大消费中心对农产品需求的最富有的杠杆,而且通过这个地区可以在

最短期间与外部世界联系。要知道,这是这方面最好的地区。这样一来,奥什温采夫同志没认清这一点的价值并接近了那些人的立场,他们不反对认为乌克兰无论通过地方预算,还是通过地方主动精神绝对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已经结束。在这里,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上我们坚决地提出这个问题:是该结束这一小块可以听其自然的失败主义理论的时候了。决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需要努力地、坚持地工作,只有引起全苏联对我们这个苏联最大经济区所存在的那些问题的注意,才能提高和从这方面加强自己并在加强自己的时候,相应地影响资本主义包围圈的那很好的一大块——离我们比较近的西欧。

卡巴科夫:这是你们最强的方面。

丘巴尔:但是奥什温采夫同志还有一个声明,说“我们从乌拉尔运走了几百万普特粮食,供养了乌克兰,而现在让我们来清账吧”,这使我想起,请原谅我的粗鲁比喻,富农的手段:借给你一个戈比,却要你还一个卢布。(笑声)

罗伊津曼:应该帮助。

柯秀尔:现在我们将永远受奴役。

丘巴尔:如果我们把缺粮地区曾经从乌克兰得到的数亿普特粮食与我们在灾难的年代里不得不从别的地区和部分地从乌拉尔州得到的1000万普特粮食进行一下比较,——这是不能相比的数量。不能指责我们,说自然灾害使我们没有粮食吃。过去不曾这样提出问题,现在也不能这样提出问题。

现在谈谈柯秀尔同志十分尖锐地提出的乌克兰农业中存在的那些问题的实质。草原问题不管怎么样无疑是全联盟性质的问题。将近120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在一定的催促下,在技术基础提高的情况下,在社会条件、社会集团变化的情况下,即在实行集体化、增加经济公有化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极大数量的粮食。请你们算一算,12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100普特——就能够提供超过10亿普特的粮食。

柯秀尔:很容易。

丘巴尔:很容易。我给你们举一些年份单位面积产量波动的情况。在干旱的情况下,农民平均每公顷收获25—30普特小麦,而当雨量充足,气候条件较好,种的是秋耕休闲地的时候,平均每公顷收获120—125,甚至达到200普特。这是一些地区的真实数字。就是说,我们打算五年后把草原一些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200普特,这并不是空想。我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在有利的条件下这方面相当大的提高幅度是可能的。

当然,在分散的农民经济的条件下,在落后的技术的条件下,在我们称之为

“科尼克”现在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自然灾害之后,我们那里出现了“科尼克”,“科尼克”就是俄语的蚂蚱。这样,经过歉收的年份我们的马匹都变成了“蚂蚱”,变成了驴骡,它们只会蹦跳,但拉不了犁和别的什么机器。当我们在乌克兰各个地区巡视的时候,我们这些过去了解乌克兰的人,感到不胜惊讶,在荒年里这些马匹竟然死绝了。现在农民购买不会把他的小家当吃光的那种驴骡。当然,靠这种驴骡我们是怎么也前进不了的,是什么200普特的单位面积产量也达不到的。草原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拖拉机,拖拉机的供应问题不应当从地域观点,而应当从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观点看待。拖拉机供应应根据这个观点进行,只应当这样看待,在计划经济中只应当这样进行分配。

在草原区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水利化的任务。为了制定水利化计划,当然需要花费数百万卢布用于先期勘测。但是水利化计划及其实现可以使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不仅是粮食问题,而且还有经济作物问题,包括棉花问题。

柯秀尔:我们现在不追求棉花。

丘巴尔:但是五年计划给了我们发展这项事业的任务。

柯秀尔:为了不同伊克拉莫夫竞争,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弃。

丘巴尔:为了制定水利化计划,就需要给研究工作拨款。但是这些研究工作的拨款在逐年削减,因为现在它还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而且还得往前看许多年。研究工作拨款的减少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了问题。这种水利化是与在第聂伯河上修建第二个拦河坝及在赫尔松和梅利托波尔专区的草原上修建通往克里米亚的水渠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设计方案,甚至打算供给克里米亚一部分水。这件事情当然是巨大的,但是柯秀尔同志已经说过,有一个比较小的计划,而且已经写在了我们的计划里,——这就是通过修建水塘,通过在河流上修建简易的拦河坝引水灌溉草原。要知道,春天我们很多水都流失了,很快就流入了大海。需要把它稍微滞留一下,通过使用电力和借助内燃机把这水放进田里,实行局部性的灌溉。

乌克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提高右岸地区经济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论你怎么看,右岸地区是苏维埃国家通往资本主义欧洲的窗口。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窗口拥有农业人口过剩和因为没有经济基础而逐渐灭绝的小市镇犹太贫民。指望我们用这个屏障顶住来自资本主义包围对我们国家各种可能的进攻是不行的。这个问题不能用这样的办法解决:因为右岸地区离边界100俄里,所以不能在那里建设工厂。如果这样考虑,那么,在列宁格勒就完全不能建设工厂,因为列宁格勒离边界不是100俄里,而是更少——只有25俄里。但是阿达莫维奇同

志却给自己各个分公司下发了一个通令:未经我许可什么都不准做,因为这是个什么都不能建设的地区。政治局的决定说的是,在某个地区不能放任自流地展开大型建设项目,阿达莫维奇把政治局的决定变成了那里根本什么都不能建设,现在那里工厂不维修,什么都不做。

阿达莫维奇:这不对,丘巴尔同志。

丘巴尔:怎么不对?我们有这个文件,但是我们不想在这里把它拿出来。您否认不了这个文件。

右岸地区的问题,也像草原区的问题一样,需要来自组织方面和投资方面的极大关注,因为为了在那里大大加速农业的集约化,可以利用那里拥有的巨大的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储备。革命前这些地区向加拿大、美国移民,在沙皇制度下向各国移民,但是现在所谓的剩余劳动力都留在我们这里,我们应当最合理地加以利用。

对于右岸地区和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的提高,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任务就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这两年,实际上是三年,这项任务推迟了一些和不得不推迟,因为当基础有点吃不住的时候,不能建设和发展企业。例如,我们开始建设乳品厂(牛奶加工厂),但工厂建成以后,我们发生了灾难,工厂负荷不足。但是,如果我们的饲养基地稍微加以改善,如果在发展畜牧业上再加一把劲,这些工厂对于我们就不够了,将不得不建设其他的工厂,面粉工业、榨油工业、罐头工业的工厂,这就是作为特色经济的乌克兰农业提高计划里的所有工业部门,它们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方面,制糖工业对于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占乌克兰国民收入的一半。

当然,制糖工业不可能推广到全乌克兰,而只能推广到一些条件最有利的地区。在草原里暂时不能种植甜菜。我们的制糖工业在改造农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方面落在了后面。为什么?这一点柯秀尔同志已经说过了。过去地主那样的态度:“在这里我是主人,农民是我的,我跟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像阿达莫维奇同志说的),我们将发给自己的农民良种”,——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给自己什么样的农民呢?这是给那些用自己的大车送来甜菜的农民吗?

阿达莫维奇:不,我们将给全区发种子。

丘巴尔:这话您没说过。就谈谈制糖工业吧,这是怎样做到了继续发展的呢?除了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我们那里有农业合作社租赁的工厂,大约有15个。

阿达莫维奇:12个。

丘巴尔:就算是12—13个吧。它们被租出去,是因为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按照计划原就不打算恢复它们。合作社恢复了这些工厂并在这个时期积累了资金,建了一个新糖厂并于十月革命12周年的时候将其投产。而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在这同一时期,在12年里也建立了一个工厂,而它是整个制糖工业的所有者。所以我们有权要求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发展制糖工业,而不是把右岸地区工厂故意拖延不决。

关于制糖工业的原料。这里用不着蒙骗,因为原料基地是同工厂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工厂被取消,这个地区的原料基地也就随之取消了。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情。要知道,是不会从舍佩托夫卡专区往洛赫维察大糖厂运送原料的。

柯秀尔:暂时没有干燥法。

丘巴尔:就是将来有了干燥法,也不会运的,因为无利可图。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原料基地,而是指望制糖工业能在乌克兰获得发展并在速度上至少不落在那些现有的和曾被称为最差企业的合作社企业的后面。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否认,它们曾经是最差的。

关于畜牧业。在经过两年大部分庄稼死亡,因而饲料产品歉收之后,我们很难来谈畜牧业。但是,只要有很小的有利条件,我们当然就会恢复这项事业,而且已经在开始恢复。

卡明斯基:你们应当注意养猪业。

丘巴尔:我不了解先后顺序。但我知道,养猪业的问题我们早就提出来了,因为我们的经验表明,草原上的养猪业可以在玉米的基地上发展,在波列西耶多林低地可以在土豆基地上发展。总的说来,我们的养猪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草原上养猪业常常受到来自气候条件的打击。在炎热的夏天往往发生猪的大量死亡,有的公社发生过猪全部死亡的情况。在森林草原区条件比较有利。那里的养猪业也是在土豆基地上发展的。

畜牧业的区域划分,我们经济的饲料基地的区域划分在三种地区是很容易确定的:在草原区——靠玉米,在森林草原区——靠制糖工业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废渣,在波列西耶多林低地地区——靠土豆,那里有土豆生长的肥沃土壤。

简短地谈谈养禽业。我们曾经专门提出养禽业的问题。我们的养禽合作社在全联盟占有很大的地位,蛋禽出口总量的将近50%是由我们的全乌克兰家禽产品销售和出口合作公司⁴⁰⁸完成的。革命前我们曾经从沃洛格达省往乌克兰运奶油。现在乌克兰奶油走上了国外市场。这是农业集约化方面的一个十分重

大的成就。

罗伊津曼：你们给工人奶油吗？

丘巴尔：是的，我们把自己的奶油供给工人。我们供给自己的工人并向国外出口，而这是在困难的年份。今后，在完成出口计划方面，我们可以指望会有很大的发展。

有人喊：你们从库尔斯克运进。

丘巴尔：我不知道，从库尔斯克往哈尔科夫运什么和从哈尔科夫往库尔斯克运什么，我们没有考虑到这种计划外的流通，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计划。

在养禽业方面我们决定，在右岸地区，没有土地的和不能迁移的市镇居民，我们希望他们不仅从事手工业，而且从事那些有效益的农业部门。在这方面我们提出的任务是逐步把小型饲养业变成大型的集体饲养业，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全区范围的合作化。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利用一切杠杆——农业信贷等加以解决的。

我应当说，当我们从我们各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出发计划我们的贷款的时候，库比亚克同志在这里说，他们调节投资的35%，我们简直陷入了绝境。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些计划呈报到这里，我们的计划常常被勾掉，因为，你们要知道，从这里看得更清楚，贷款应当给谁和给哪些经济部门。所以我们原来设想实行的很多创举往往化为泡影。

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在中央委员会里汇报老国营农场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国营农场名列第一⁴⁰⁹。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保住了这些国营农场的土地和保住了国营农场本身，因为我们受到的来自富农方面，甚至来自在某种程度上跟着富农走的中农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早在1921年或者1920年我们就争论过，应当给糖厂的农场留下多少土地，我们也曾经在这里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过，是否需要从180万公顷中留下40万或者80万，在这里决定了留下40万⁴¹⁰。正当乌克兰农村在沸腾和有压力的这个时期，那时作出决定，在政治上应当这样做，而且在这之后国营农场还多次受到攻击。终于坚持住了，最近几年我们的国营农场巩固了并在农业的改造和改组中开始发挥它们特有的明显的主导作用。但这时出现了灾难和“但是”。由于有我们的国营农场为基地，我们便认为，我们能够计划良种的产量。结果是，我们不能，需要上交到大锅里去，结果我们没有了良种种子的储备。而当柯秀尔同志说，这具有很大意义的时候，我可以列举一些数字，我们使用良种进行的播种可以提高产量17%—20%。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宣传鼓动我们开展得

相当广泛,但我们进行了宣传鼓动之后,进行了工作之后,当有人在代表会议上说,我们不会按照需要发给良种,人民便开始怀疑:干吗说了那么多话,干吗做了那些事?

有人喊:你们那里有多少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国营农场?

丘巴尔:关于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它们暂时拥有土地面积6.5万公顷。我们曾经希望,我们的国营农场和我们的集体农庄能有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国营农场那样的条件。我个人看见过集体农庄联合社,联合社主席不停地骑着马奔波于联合社各个集体农庄,以便对它们进行领导,而同时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一个国营农场的板棚里却放着十辆福特牌小轿车——不必多说,因为他们暂时用不着坐这些车。哪怕给占地1.2万—1.5万俄亩的联合社一辆汽车也好。供给大型集体农庄汽车,不仅是服务用的小轿车,而且还有为及时运送燃料、及时运走产品的载重汽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有人喊:甚至可以在城里拨给一些。

丘巴尔:在我们大型集体农庄的机器化方面我们必须实行转变,但这里又有了麻烦。就在今年秋天,这又是一件倒霉的事,我们相当大部分的拖拉机由于没有燃料而无法开动。

有人喊:还缺零配件。

丘巴尔:全俄石油贸易辛迪加无暇及时批准我们的申请,所以拖拉机都趴在那里,翻耕不了秋翻地,保证不了秋播。各地过去传来,现在仍在传来,今后大概还将传来要拖拉机零配件的号叫声。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克服不了的毛病。我在一个集体农庄联合社里看见过一个拖拉机修理厂。这是一个板棚,没有一台机床,甚至没有一台用来拆卸沉重部件的悬吊式起重滑车⁴¹¹,备件箱就像工具箱一样。缺少某一个螺丝钉——拖拉机就得停着。

有人喊:你们是干什么的?

丘巴尔:当我们的申请送到许可证发放委员会⁴¹²,那里就把它们勾掉了,要知道,现在一切都集中统一和控制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干瞪眼和请求对事情给予帮助。

对库比亚克同志提出的关于我们打算如何取消独家农场和独立农庄,关于消除它们的问题,我这里还有一点意见,当然,我们不打算要求联盟政府或者在自己的预算里拨出款项把这些独立农庄的庄员,特别是富农部分迁回村庄里去,但是也有苏维埃产的独立农庄,贫农和中农的独立农庄,在建立集体农庄的时候,它们加入集体农庄,当然,对它们必须给予帮助。土地公有化、生产公有化战

线上的总进攻在这件事情中将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这是主要的杠杆,是对这些土地使用形式,对这些经营形式的主要打击。

关于土地规划——村内土地规划的三年期限也许长了点。也许,这些任务过时了,因为在土地规划中我们必须适应我们这里正在开展的那个宏大的集体化运动,这里的期限是根据我们保守的计算,这件事需要多少钱而提出来的。而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当需要钱的时候,是不会如数给的。当然,尽快地进行土地规划,这都是应该的,但关于土地规划有一个联盟的法律⁴¹³,我们应当免费多少进行土地规划,而临时土地丈量员的工作不是免费的,他们是要工资的。这些期限是按我们的财力计算出来的。为了不妨碍,不延缓,不破坏我们正在展开的、必将取得和应当取得巨大成果的集体化运动,就得多给钱。

最后,我也想强调我们那里阶级斗争展开的特殊条件,虽然柯秀尔同志已经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我们乌克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经验是很丰富的。

伏罗希洛夫:这一点你们可以引以自豪。

丘巴尔:在乌克兰境外帮助这一斗争的人也很多。我们的阶级敌人不断地注视着,在哪些地方可以给苏维埃政权制造麻烦,在哪些地方可以破坏社会主义的进攻。

伏罗希洛夫:而且他们相当巧妙地找到了这些地方。

丘巴尔: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思想家等等。因此,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率领贫农群众投入进攻的时候,我们不仅必须改变社会关系,而且也必须用正确的民族政策武装起来。也必须向我们的工人,顿巴斯的工人,哈尔科夫的工人回答一系列政治性质的问题,打击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宣传鼓动。这耗费了我们更多的精力,这占去了更多的时间,这多少阻碍了我们的进攻。我们那里的牧师不仅根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且他们还煽动(独立教会派)⁴¹⁴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的任何困难都因为这种反革命的鼓动而变得更加严重。当我们不得不坚持要一台拖拉机,或者坚持要一笔拨款,或者坚持某一个建议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就会考虑到这种反抗,这种阻挠。我们认为,你们也应当考虑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将考虑这一点,而你们不考虑,那就会形成即便不是红色的,也是黄-蓝色⁴¹⁵的剪刀差。

请允许我就此结束我的发言。我表示相信,把乌克兰农村工作和农业状况的报告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一定会大大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向我们的富农,向那些在与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寄大希望于富农的资本主义分子展开社会主义

进攻计划的实行。在这里我也必须谈谈李可夫宣读的声明。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在社会主义全线大进攻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共产党和我们各级的共产主义领导必须是多么坚强、一致、有力和团结。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允许有任何空子,任何含糊不清,布哈林集团上一次声明中的那些诽谤性的论点不应当留下任何痕迹,因为这些论点在所宣读的声明中并未撤销并且超出了我们“尊敬的”同志们的主观愿望。在真正驾驭现在农村存在的那个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和走在农业改造前面的无产阶级运动的事业中,我们需要我们的司令部有坚定性和牢固性,我们的党应当有清楚、明确的路线,明确的纲领,它们会像此前那样给我们动员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可靠武器,使我们取得我们最落后的地段——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胜利。

主席:名单上登记的人全部发言完毕。现在请柯秀尔同志发言。

柯秀尔:在这之后还回答什么?我放弃发言。

有人喊:丘巴尔全都说了。

主席:我提议基本批准关于柯秀尔同志报告的提纲并交给政治局进行最后修改以及研究那些与拨款有关的问题⁴¹⁶。

有人喊:对。

主席:谁赞成这个提议?谁反对?一致通过。

现在请莫洛托夫同志就第四项议程发言。

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莫洛托夫⁴¹⁷:同志们,我的报告很短。如果要作一个真正的报告,一个充分论证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合理性的报告,那实际上就得作一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而这样的报告在这里没有必要;况且,对有关这个题目的若干重大问题,我们已经联系控制数字问题,特别是联系集体化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我们听取了关于乌克兰农业的单独的报告,它提供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当前任务的具体样板并为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问题提供了又一个例证。只能说,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建立是由社会主义大农业大规模发展的事实决定的。在农业如此大规模转入社会主义轨道以前,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不曾提到我们面前。现在,当我们面对着全联盟国营农场建设的巨大规模,面对着日益成为巨大经济单位的集体农庄极大增加的时候,当全盘集体化正在席卷整个整个区,甚至专区的时候,——而我记得,在不久

的将来,在明年就能够不仅谈论集体化了的州,而且谈论集体化了的共和国,——很清楚,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向党和苏维埃提出关于建立领导农业生产的统一中心的问题;同时我们指的首先和主要是对大农业生产的领导。

联系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还应当谈谈第二个因素,即民族因素。

顺便指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有一处指出,如果某些中央机关(联盟各人民委员部)对各共和国的需求服务得不好,那就不排除提出关于地方分权,即把某些统一的人民委员部改为共和国人民委员部的问题⁴¹⁸。这是正确的。指出这一点是应当的。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迈进一步。然而这只从表面上看可能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相矛盾的。我们社会主义农业方面的任务绝对不是某些共和国范围能够容纳得下的,它们需要全联盟范围的统一领导。在哪些方面?关于这一点决议草案里已经说得很充分了⁴¹⁹。这个决议里还说,对一些民族共和国和州我们必须特别考虑它们与土地革命没有完成有关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事实。首先,这里指的是东部各共和国。但是,在落后性方面,从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看,我们不能不注意远东的情况,在这方面它过去大大落在了后面,现在仍然落在后面。但是农业经济的低水平仍然最大地影响着东部若干民族共和国,那里不仅保留了相当大量的富农分子,而且保留了半封建的残余。在目前条件下,清除半封建分子和富农会以比从前更快的速度进行。毫无疑问,比较落后的共和国和州恰恰在这方面应当得到来自联盟的帮助,首先是来自这个联盟无产阶级中心的帮助。我认为,这个因素在决议里已经被应有地注意到了。

最后,我认为,政治局的决议虽然很短,我们可以局限于决议内容的范围,因为决议里列举了有利于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全部主要理由。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后,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上讨论⁴²⁰,这就使得有可能更详细地讨论这个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和听取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党委员们的意见。

至于党员,那么据我所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意见没有任何重大的差异。

有人喊:对。

莫洛托夫: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建立已经完全成熟了。这个问题作为紧迫的问题相当清楚地摆在我们大家面前。

然而至今仍存在抹煞这个问题的企图。但是我甚至不想去研究最近出现在例如《农业报》⁴²¹上的建议和文章,它们出自某些在座的同志的笔下,他们打着

保卫“不是业务机关,而是计划机关的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旗号,把自己的矛头指向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⁴²²。

施利希特尔:莫洛托夫同志,请说出名字。

莫洛托夫:例如,站出来说话的施利希特尔同志。我认为,这个把问题转向又一个并且因此而完全无用的国家计委的企图,是根本不需要反驳的。

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我们各民族组织党的领导机关的意见和直接决议中可以看出,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建立在党内得到了公认。我可以列举各地方民族组织就这个问题通过的许多决定。表示赞成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有白俄罗斯中央、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土库曼斯坦中央、外高加索边疆区委,没有俄罗斯联邦中央⁴²³,就是说,它不可能表态。

有人喊:它现在正在表态。

莫洛托夫:但是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早就表示了“赞成”。没有正式表态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乌共(布)中央,但我知道,乌共(布)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没有任何异议。

斯克雷普尼克:是这样!

莫洛托夫:我在这里也希望得到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强有力的支持。(笑声)

有人喊:毫无疑问。

莫洛托夫:最后只有一点意见。

我会特别关注的是,未来的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它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我们显然还得在政治局里进行认真的讨论⁴²⁴,这个农业人民委员部能对决议草案中的下一处地方给予特别的注意。我指的是下面一点。在第一点开头谈到关于确立对农业生产统一领导必要性的地方说,这种统一领导的实现必须是“在利用领导苏维埃工业的经验的基础之上”。

当然,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任务和在其中工作的具体环境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和将在其中工作的具体环境差别很大,但是,让我们的地政机关不要对我说的话见怪,如果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将像联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那倒比像我们现在的各个农业人民委员部更好。(笑声)

喊声:对!

莫洛托夫:从这个观点看,应当强调尽量利用苏维埃工业的经验的重要性,当然,同时要最少地“利用”苏维埃工业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毛病……

有人喊：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毛病。

莫洛托夫：这样的毛病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多的是，但是对于领导农业它们是特别不能允许的，因为我们的农业是一部十分庞大和十分复杂的机器。

我就用对这一点的强调来结束我的报告。

主席：有人喊，不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柯秀尔：让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有多少人报名发言？

主席：有三个人报名。谁赞成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谁反对？少数。

柯秀尔：让斯克雷普尼克发言。

莫洛托夫：让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施利希特尔：我请求作为例外就个人问题发言。

主席：有人建议——作为例外让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有人喊：他没有请求发言。

喊声：让他，让他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我请求了。

伏罗希洛夫：让斯克雷普尼克和施利希特尔发言。

主席：谁赞成让施利希特尔同志发言？

柯秀尔：让斯克雷普尼克先发言。

主席：施利希特尔同志反正将要为个人问题的声明发言的。谁赞成让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作为例外发言？我提议按照会议规定发言只限十分钟。

现在请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⁴²⁵：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了我们党必须提出和解决的几个大问题。

听取的两个州和共和国——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报告，在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听取的我们农业活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鉴于我们的联盟在转入改造时期，我们不仅在地方的日常工作中，而且在整个通常的领导工作中应当做些什么来开辟新的途径。于是我们又面临着下面一个问题。随着向改造时期的过渡，先前那些领导和组织土地事业的组织形式是否应当保持不变？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应当承认，我们的地政机关过去确实不怎么样，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和不正确的阶级偏差，而且在土地方面和农业方面整个这全部工作，我们工作的相互关系制度也不符合改造时期的任务。库比亚克同志说，我们所面临的农业改造过程的总额只有35%是由共和国掌握的。我们那里的

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就产生了不协调。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机关能够统一我们联盟现有的一切共和国和联盟机关的活动,能够在技术不断变化和指导农业活动的统一改造过程中协调这全部工作。从改造时期的需要和任务的观点看,建立不仅能够计划和调节,而且能够进行业务活动的某个中心,即全联盟机关的问题便摆在我们的面前。

伏罗希洛夫:原来如此!这样本来就不应当让你发言。(喧嚷)

斯克雷普尼克:伏罗希洛夫同志显然认为,让对这个问题有特殊意见的人在联共中央全会上发言是对他们的奖励。

伏罗希洛夫:请突出问题。

斯克雷普尼克:在转入改造时期必要性的问题上,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结论是不可能有任何分歧的,我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意见。

但是在这里,亲爱的同志们,必须提出两个未被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下。应当坦率和明确地承认,我们的宪法中所表述的国家在农业和调节农业方面的相互关系制度现在已经不符合生活的需要。而且不仅在这个方面。继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问题之后便提出了联盟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提出了联盟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问题。还应当向我们提出一个总的问题,1922年通过的现行宪法⁴²⁶是否完全符合由于向改造时期过渡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和任务。

伏罗希洛夫:看见了吧,他——赞成。(喧嚷)

斯克雷普尼克: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因为干部问题恰恰是这样的共同问题,也像土地问题一样,同样需要共同的计划。我认为,同样又产生了一个关于争取革命法制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斗争的革命法定手续的问题。因此必须提出关于我们宪法的本质和为使宪法适应改革时期的任务而对其进行修改的问题。应当通过什么途径进行?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宣读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处地方并且说,虽然那里字面上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把某些联盟机关解散和将其权力分散,而现在提议建立一个新的联盟人民委员部,然而这里没有任何原则的矛盾。我完全同意这个声明。(笑声)这里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任何原则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联盟和共和国机关形式上的相互关系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实际界定和定型问题。改造时期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方面的任务决不会沿着集权和分权的路线进行。凡是说并且认为,路线,——加里宁同志,请注意听,——凡是认为,联盟的利益在于一切职能在这里通通都统一和集

中于一个中心的人,他实际上一点都不懂得,不想懂得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同样,那些认为,我们有这样的人,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联盟对农业改造的领导似乎是与确立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相矛盾的人,实际上走的不是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任务,而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改造时期在宪法方面提出的共同的路线,即在一方面加强联盟的总的计划和业务领导,同时又在更明确规定和确定我们各加盟共和国现有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修改相互关系的路线。这个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这个机关的建立丝毫也没说明,我们应当和将要如何进行这个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联盟工农检察院受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委托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联盟机关与共和国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积累了需要运走、需要清除的历史污秽。在这方面我们往往完全不明白,只有在各加盟共和国健康和生气勃勃活动的基础上共和国联盟才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同样,只有巩固和加强联盟的领导,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加盟共和国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伏罗希洛夫:那为什么要取消司法人民委员部?

柯秀尔:他徒然地在加深问题。

斯克雷普尼克:〈我认为,〉下一步的事情应当是,从明确阐明因向改造时期过渡而提出的那些需求的角度出发,对宪法进行修改。这是一。第二,修改联盟机关与共和国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同时我认为有必要的是,我们党应当在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活动的问题上进行进一步的组织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有必要联系改造时期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的修改,提出几个我们没有完成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有,第一,建立俄共(布)中央。我认为,这个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

有人喊:怎么?

斯克雷普尼克:建立俄共(布)中央。建立全俄工会中央和俄罗斯党中央。我认为,这是由于向改造时期过渡而对组织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总的修改的必然结果。我认为,因此应当提出修改我们若干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例如,我认为完全可以把摩尔达维亚作为加盟共和国分立出来,把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几个共和国分立出来。总之,我面前摆着一个问题——我们在我们联盟的相互关系和构成方面一项工作也没有做。由于向改造时期过渡而在这方面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还没有进行总的修改。这些问题之一是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这是第一个行动。但是应当善于勇敢地把问题考虑彻底,如果

我们转入了改造时期并在党的方面,在土地方面对一系列的工作进行了修改,我们就应当联系向改造时期的过渡也从总体上提出苏联总体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所有问题。

喊声:结束讨论。

主席:我们已经结束了讨论。

有人喊:请让施利希特尔发言。

莫洛托夫:请让我作总结发言。

主席:关于个人问题,表决以后我再安排发言。

请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⁴²⁷:我曾表示希望对于政治局在这里提出的关于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建议能够得到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显然我错了: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这里展开的那些论据,帮助的不是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而是它的反对者。这些论据的帮助之一就是把这事情搅得一团混乱,更不用说如此“扩大”(加引号的)这个问题,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做的那样,——这是一件十分可疑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不能忽略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考虑不周的建议……

伏罗希洛夫:尽管是“天才的”建议。

莫洛托夫:尽管我仍然坚持认为它们是非常不妥当的。

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谈到了宪法。我也不得不谈谈这一点。我们也不拒绝修改宪法。宪法是人写的,宪法是布尔什维克写的,宪法是经联共(布)中央研究过的,我认为,将来有必要的时候,这些人和联共(布)中央可以对宪法进行一系列修改的。难道这还需要向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解释?斯克雷普尼克想要说出“自己的”某种见解,但结果却是令人费解。事情没有考虑成熟,最好不要把联盟教育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等问题扯到这个问题上来。特别是决言论述民族地区特点的第二点和决议最后的部分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论据的回答,决议的最后部分里说,“在建立联盟人民委员部的同时,应该尽量保证发挥各民族区域和共和国在发展生产力和进行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⁴²⁸。这是谁写的,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布尔什维克写这些话不是为了好听,而是为了行动。如果这个决议将被通过,而它显然会被通过的,因为它没有引起异议,那么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就必须关心正确地落实这一指示。

在报告里我没谈具体的事实和数字,但是我有。实际上,问题在于,在各民族共和国里,尤其是在东部,直到最近,包括1928年,仍然有富农明显增加的许

多情况,这是从1928年起我们在苏联大多数区和州里所看不到的。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共和国里,我们早在1928年就看到了富农的明显增加。在小小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有将近150个地主式的田庄。在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共和国里,我们有相当大量的半封建分子。

伊克拉莫夫:封建贵族。

莫洛托夫:我不反对,就叫他们封建贵族吧。

因此,我们必须帮助这些地区更快地转入社会主义轨道,帮助这些共和国提高经济和加强对这些共和国工作的政治领导。这种帮助应当由苏联的无产阶级中心提供,而且首先是在这些共和国占主要地位的农业方面。这一切都是从各民族共和国的真正利益出发的,即从这些民族地区最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

这样一来,虽然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表示赞成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但他同时又不顾及实在的事实和支持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实际论据,以自己的发言,我觉得,助长了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的意见混乱。

我就不谈在这里听到的关于现在建立俄共中央或俄罗斯联邦工会中央理事会必要性的发言了——这种胡说八道就可以不用谈了。

喊声:对,对!

主席:我现在提付表决,谁赞成批准关于建立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谁反对?谁弃权?通过。

现在请施利希特尔同志就个人问题发言。

施利希特尔:当我在《农业报》上读了卡克腾同志的文章⁴²⁹批评我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当是怎样的问题的文章时,我感到困惑莫解。但当我在这里听到莫洛托夫同志用几乎同样的话语谈同一件事情之后,我简直是感到无限困惑。我的文章里到底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会让人说我企图寻找什么空子?

我在文章里究竟说了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的就是:为了保持集体化现在的那种速度,例如,在乌克兰……

莫洛托夫:文章的标题是什么?

施利希特尔:关于标题我最后说。(喧嚷,笑声)问题不在于标题,而在于文章的总的內容,在于整个上下文。在这样的问题上特别应当引用內容,而不是标题。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发言对我来说是出乎意外的,我没有随身带报纸来,但是我可以相当准确地传达我曾经说过的话。第一,我说(而且说得清楚而又坦率),情况现在变了,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如果在一年之前建立可能

会令人觉得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无疑是必要的了。

伊克拉莫夫:仅仅作为土地⁴³⁰。

施利希特尔:接着我继续说:为了保持集体化现在已有的,例如在乌克兰已经形成的速度,应当让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在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将要实行的计划和领导的范围内有机动的一定自由。如此而已,仅仅如此而已,在我的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职能问题的文章里白纸黑字地这样写着并且予以强调。我要问,这里是否有什么隐蔽的对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反对立场?然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意外的事情?为什么认为可以歪曲我对这个明确问题的态度呢?仅仅就因为用了一个看来不完全恰当的标题——《是计划机关,而不是业务机关》。(笑声)当然,虽然没有一个计划机关不同时又是业务机关的。(笑声)没有一个业务机关不又是计划机关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谈的只是界限,只是业务工作的范围。

柯秀尔:承认标题是不恰当的。

施利希特尔:我看出,标题确实不恰当。但指的只是我们人民委员系统中两种方法的比较: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把自己的整个业务系统建立在实际压倒地方工作的集中统一上面,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系统则给予地方一定范围的业务自主权。我应当说,没有一个乌共(布)中央委员,我与他在对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职能的这种理解问题上曾经有过分歧。(笑声)

臧声:标题不恰当。

施利希特尔:我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标题与我的文章的内容、上下文不一致。(笑声)如果这是莫洛托夫同志想要说的,那我没有异议。

卡冈诺维奇:承认标题是错误的,分歧就消除了。

主席:现在宣布闭会。明天将听取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

第十二次会议

11月16日,上午

关于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1928年)培养 技术干部决定的执行情况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宣布开会。请卡冈诺维奇同志作报告。

卡冈诺维奇⁴³¹:首先,我必须首先作两点说明。第一,材料太多。在委员会里⁴³²,起初我们对中央七月全会决定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的范围作了某种限制,但后来不得不扩大这个问题的范围,不仅将工业干部问题,而且将整个国民经济干部问题包括进去,尽管工业仍然是我们注意的中心,是整个问题的中心。在委员会里提到了党中央全会提纲中没有包括的一系列重大问题⁴³³。全会以后,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加以解决。有些同志找我说,提纲中没有这,没有那,但把什么都写进全会的提纲是不可能的。在报告里我不可能涉及提纲里提到的所有问题,我只能谈谈一些最主要的问题。这是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说明是,尽管干部问题方面有成绩,但由于这方面的主要工作还在前面,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将少讲成绩,多讲缺点。我这样做完全是有意,以便突出各种缺点,引起你们的注意。

对于干部问题,“因祸得福”这个谚语完全适用。这个祸就是沙赫特案件。沙赫特案件起了警示的作用,它提醒党,如果我们现阶段不十分尖锐地提出干部问题,那么,即使我们有好的政策,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仍会失去很多东西。在1928年中央四月全会上,斯大林同志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他说,沙赫特案件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我们对干部的教育工作做得很差,对我们红色专家的培养工作做得很差”,沙赫特案件不是偶发的案件,而是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斗争的明显表现,“是过去控制我们

煤炭工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专家策划的经济反革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把破坏活动问题和干部问题作为组织、技术问题提出,而应该作为政治问题提出。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特别是,请回忆一下李可夫同志的发言,他把整个沙赫特诉讼案及其原因归结为我们的放过了破坏活动的机关的缺点,归结为我们的专家工作的缺点,归结为偶然的现象。因此,李可夫同志看不见尖锐提出关于新的干部问题的必要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明了中央全会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否定了李可夫同志在对沙赫特案件的评价中和对干部的相关结论中所宣扬的立场。

在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1928年)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培养新的专业人员的任务,以便我们能够用以取代危害我们的旧的专家。七月全会在这方面拟定了一系列实际的措施。对中央七月全会决定执行情况检查表明,我们大大地前进了,虽然在执行七月全会决定方面我们工作很不力(我可以列举在执行七月全会决定方面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不力,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不力,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本身工作不力,工会工作不力的许多事实加以说明,如果同志们对这个论点提出异议,我会在结束语中这样做的),尽管工作如此不力,我们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七月全会的安排本身就要求将其扩展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包括经济领导干部。我们提出这种必要性的根据是什么?有两个基本事实迫使我们在这样大的规模上提出干部问题。第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沙赫特案件之后我们破获了多起重大破坏案件,这些案件向我们表明,破坏活动已遍及我们工业的主要部门。第二个事实是我们经济的飞快的发展速度。今年我们批准了五年计划,实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表明,我们正在超过预定的速度。当然,本来可以在这次全会上把干部问题扩展到国家活动的各个部门,扩展到教育和一切其他部门,但是,这样我们会淹没为国民经济培养干部这个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那个环节并且以其带动我们国家活动其余部门链条中的其他所有环节。

请允许我现在列举沙赫特案件之后我国发生的破坏案件的清单:南方矿业冶金托拉斯、矿山燃料总局、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纳杰日金斯克联合工厂、有色冶金业、国营机器制造厂联合总公司、苏联冶金工业总局、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煤炭化工托拉斯、马克耶夫斯克联合工厂、北方化工托拉斯、斯拉夫碱厂和北顿涅茨克碱厂、全苏黄金工业股份公司、列宁格勒造船托拉斯、国营格罗兹尼石油

工业联合公司、莫斯科化工托拉斯、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军事工业、交通人民委员部、北方木材采伐托拉斯、木材造纸工业管理总局和里海轮船公司。最后，不久前在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系统破获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案件。许多人曾经问，为什么只在工业中发现破坏活动，而在农业中没有发现。当然，也许工业在这方面也起着主导作用，也走在前面(笑声)，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农业、商业和财政方面没有破坏活动。还应当好好地找一找，搜一搜。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就是第一只春燕。

关于破坏活动可以谈很多，甚至可以作一个专题报告，可这会占太多时间，而且不是我的任务。因此，我就不详细分析破坏活动了，但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与这些案件相比，沙赫特案件显得逊色。

通过这些破坏分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敌视我们的明显的政治集团。破坏分子之一帕利琴斯基过去是克伦斯基属下一个副部长，他最清楚地表述了破坏分子的政治纲领。他供认说：

“破坏委员会(他们曾经有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今后通过在国内连续不断制造危机的办法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施加政治影响。委员会认为，在计划部门的各个组织及其成员平时的工作，特别是在制定五年和更长期计划方面的工作就是这种主要手段。这些计划的资料及计划的编制应当这样处理，使其成为国家在这个或那个经济部门遭受连续不断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经济危机。”

破坏活动的具体表现如何呢？我们应当坦率地说，这不单单是曾经讨论进行破坏可能性的组织，而且是屡屡破坏我们工厂的组织。我们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了解到，一个阶级在进行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中曾经采用过破坏机器的办法。工人阶级在自己发展的初期曾经破坏机器，用这种办法反对资本主义。这是不自觉的自发的运动。而我们所面对的是垂死的资产阶级自觉组织的反对我们的战争，是对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大工厂、国民经济大基地的破坏。例如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那里发生了管委会委员、破坏分子斯维岑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德鲁日科夫卡、塔甘罗格的大车间、大工厂的蓄意破坏。

在纳杰日金斯克联合工厂，破坏小组受国家计委委员陶贝男爵之命对博戈斯洛夫斯基炼铜厂、索西文斯克炼铁厂和布尔金斯克铜矿进行了破坏。在有色金属开采和加工总局，你们看到乌尔卡尔特的从前的股东对许多工厂进行的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在机器制造厂联合总公司，破坏组织是由赫连尼科夫和日丹诺夫领导的。赫连尼科夫曾经是最忠诚于我们的专家的象征，许多人相信他真

正是最优秀的专家,原来赫连尼科夫是破坏组织的中心人物。他曾领导机器制造厂联合总公司并对索尔莫沃、科洛缅斯科耶机器制造业和其他许多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在军事工业领域,破坏活动是通过有意缩小各工厂的生产能力造成不必要的花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对一个极为重要的生产炮弹引信的工厂即巴拉诺夫斯基工厂的蓄意破坏。化学工业领域的破坏活动表现为延缓和阻挠基本建设,缩小各工厂的生产能力,这会减少我们战时的潜力。破坏组织也拟定了战时使一系列化工企业停产的破坏活动计划。

破坏分子是这样安排的,使破坏活动的隶属关系与企业领导的隶属关系相一致。他们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合法机会进行反对我们的破坏活动。

破坏分子攫取了许多决定性经济机关的领导岗位。例如,在金属工业总局里破坏活动是这样进行的: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隶属于金属工业总局,而金属工业总局隶属于国家计委工业部。整个机器制造业和黑色冶金业的技术领导曾经掌握在赫连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手里,赫连尼科夫曾是索尔莫沃工厂的股东和厂长,而日丹诺夫曾是尼科波尔-马里乌波尔工厂的股东和厂长。领导有色金属处的伊万诺夫工程师从前是乌尔卡尔特的的大股东及其阿尔泰所有企业的经理。掌管造船业的是什韦佐夫工程师,他过去是“沙利基耶-纳瓦尔”公司的大工程师。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的技术领导者是别洛诺日金教授,他是“诺贝尔兄弟”公司的大股东。国家计委工业部分管金属工业总局的成员是陶贝教授和加尔特曼工程师,其中陶贝从前是男爵,是纳杰日金斯克联合工厂的共有者和厂长,而加尔特曼曾是帕斯图欣斯克和阿木林斯克工厂过去的经理和下塔基尔斯克几家工厂管委会的委员。由于“自己”人的这种部署,破坏分子得以安全地活动。在这方面,别洛诺日金工程师的供词是值得注意的:

“我承认自己有罪,——他说,——我参与了金属工业总局的共同行动,由于自己有反苏维埃思想,便跟上述其他人一起阻碍黑色冶金业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国家钢铁的匮乏……”

……这种破坏导致了机器制造业的计划未能完成,无法供给农业必要数量的农具,使运输业的发展和交通人民委员部需求的满足受到打击。生产资料的生产会受阻,国家的工业化计划会遭到破灭。”

破坏分子也钻进了农业领域。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破获了一个破坏组织。一个被捕的工程师供认说,“小组的破坏活动是根据他们认为个体经济比集体经济好的政治方针进行的。实际措施是他们政治方针的直接结果。”

破坏分子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通过生产不适用于联盟农业条件的机器,输

送不适合某个地区的农业机器,减少进口备件的数字等办法,败坏机器正在农民心目中的声誉。

参加破坏组织的有在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担任领导的专家。你们现在看到,你们面对的是破坏活动的崭新表现,它打击的是我们总路线的最关键之处。

对破坏案件的详细分析表明,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明确表现和反映,破坏分子多数是过去的企业的所有者和股东,他们都在恢复资本主义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纲领下联合了起来,我们的发展使阶级敌人变得更加凶残,资产阶级正是在我们最软弱、他们最强大的地方打击我们。在这方面,在专家中他们有自己最熟练的干部,因而能够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破坏活动。这就是为什么造就我们熟练干部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非常重要的而又尖锐的政治问题。

五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的干部保证

无论从代替破坏分子的角度,还是从满足我们飞快建设速度的角度都提出了干部问题。

在培养专业干部方面,我们在数量上跟不上这种速度,因此问题是这样地摆着:必须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规模展开培养完全符合这种改造需要的干部的工作。由于国民经济技术空前的提高和世界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利用,由于我们想要真正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不仅在于专业人员的数量,而且在于专业人员的质量。

严肃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⁴³⁴在最近一期上(11月2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五年计划的财务》的文章。顺便指出,俄语的“五年计划”一词已经成为英语以及其他外国语言的常用词:这个词已经不用翻译,就像“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等词不用翻译一样。请看,关于干部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怎么写的,一个聪明的阶级敌人是怎么写的。我略去文章的开头,那里写的是没有建筑材料,缺乏砖瓦……

有人喊:那里也有点右倾。

卡冈诺维奇:是的,他们在砖的方面也有这个毛病。(笑声)请听听,关于干部问题我们读道:

“在俄国,得到经过职业培训的工程师的问题比所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共产党需要在俄罗斯学校和综合技术院校学习过的人员构成的工程师

队伍……”

接下去是作者的预测,我把它略去了。我只引用对形势的总的估计:

“但是,不论获得技术‘干部’的问题当前如何严重,它现在仍然不那么尖锐,只是在开办新工厂的时候才会感到它的压力。”

曾经访问过我国的《曼彻斯特卫报》⁴³⁵的记者对这个问题提得更加尖锐:

“苏维埃政权怎样才能得到足够的专业人员呢?看来,培养专业人员的问题是各级苏维埃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比引起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更大的问题。”

资产阶级报刊就是这样理解我们在干部方面的任务的。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说,我们国内还不是人人都像我们的阶级敌人那样理解干部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同志们,我可以在这里坦率地说,尽管中央七月全会已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议,我们看到许多机关对干部这个普遍问题却完全不理解。

请允许我转入对问题的具体分析。中央七月全会就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制定培养干部五年计划的报告通过了决定。我们制定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五年计划,研究了经济的各个构成部分——原料、燃料、机器、厂房,而对于应当管理这一切的人,决定这一切是否会带来好处还是我们只会事倍功半的人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研究,现在也没有研究。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了五年计划,一个很好的五年计划,为此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扬它。可是关于干部的一章却完全不能用。这一章里宣称,“对工业所需要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干部进行总的计算并不特别困难”(见《五年计划》第2卷,第2部分,第276页)⁴³⁶。那里是这样计算的:五年期间工业需要2.5万名新工程师。而当我们委托以格林科同志为主席的我们所属的小组委员会进行计算并向我们提供准确数字的时候,他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以后,来对我们说:“你们要知道,很难提供准确的计算数字。我们没有进行这种计算的足够资料。”对需要的最低数量进行了计算,约略的数据表明,工业所需要的不是国家计委五年计划所要求的2.5万名新工程师,而应当是5万名新工程师,即多出了一倍。应当指出,对于后来确定的这个计算数字,工业领导机关无可奈何,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有根据的切实的计算。我们又回头来研究这个问题,在小组委员会里增加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各一人,他们又反复计算了三次,我们报废并退还了这些计算数字,着重研究比较初步的资料。

就当公正地说,由于没有专业人员定额的明确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很难确定,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原料、燃料的标准人人皆知,而关于干部却没有这种标

准。这种标准是根据大量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变化的。我们弄到了美国和德国的资料。下面就是他们工业中每1万名工人的专业人员的“标准”。根据国家计委的资料,你们看到,在美国每1万名工人有125名工程师和250名技术员。在德国每1万名工人有106名工程师和114名技术员。而我们每1万名工人有80名工程师和81名技术员。你们看到技术员、工程师和工人的比例关系是怎样的⁴³⁷。

伏罗希洛夫:一切质量,包括产品的质量都是由此而来的。

卡冈诺维奇:应当相对地看待这种比例关系,因为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与我们不同。那里资本的有机构成很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与我们完全不同,那里的劳动生产率高得多。如果说那里每1万名工人有125名工程师,那么在我们这里就不是每1万名工人,而至少是每1.5万—2万名工人才有125名工程师。相对而言,我们拥有的工程师比绝对数字表明的更少。

我不想在讲话里使用大量的计算数字,我只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5.7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和5.5万名技术员。而在七月全会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报告的决定中说,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比例应达到2比3;每3名技术员应有2名工程师。在这方面,我们远远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总之,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层领导人员——技术员大大落后了。有些人过分迷醉于工程师,但问题不仅在于工程师。应当规定2比3的比例,否则由于技术员缺乏我们将完不成我们的任务。

根据格林科同志的小组委员会的最约略的计算,五年期间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为8.5万名工程师和15.2万名技术员,其中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内的工业就需要大约5万名工程师和7.5万名技术员。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实行连续生产制,如果考虑到农村集体化的高速度和我们国民经济比五年计划原定速度更快的发展速度,你们就会明白,就是这些计算数字也未注意这一切因素,需要进一步的校正、增加。我强调指出,这只是些大体的、完全约略的数字。委员会不能承担制订干部五年计划任务。因此,我们在提纲中建议国家计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机关立即着手制订干部五年计划,使我们真正具有培养什么样的人 and 怎样进行培养的准确资料。

如果你们拿一些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为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这里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谈运输业了。在干部培养计划方面,运输业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就是在那里工程师现在也缺额56%。就是在那里也可以看到像萨马拉和乌法那样的没有一个工程师的铁路工厂。而且,像在

其他部门一样,运输业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管理机关和线路所拥有的专家的比例问题。过去,60%的专家在线路上,40%在管理机关里。现在,情况颠倒过来了:管理机关里有60%,而线路上只有40%。其次,我们的森林工业工程师也奇缺,那里的许多事情令人触目惊心。有些工厂提供数百万外汇,却没有一名工程师。我可以引用一位边疆区委书记来信中谈的一件事,阿尔汉格尔斯克来了一个工作人员,职务是林学家,工作了六个月,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个理发师。(笑声)

伏罗希洛夫:我们有一个理发师过去曾经指挥过一个集团军⁴³⁸,为什么理发师不能指挥工厂呢?

卡冈诺维奇:我不是反对理发师,但这个理发师担任林学家职务之后,从来没有去过森林。我还可以举其他经济部门的很多事例,但我不想太分散注意力。我们最主要的是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

有人喊:建筑也重要。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建筑业、森林工业全都非常重要。但是,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的文章中在总的谈到干部的时候,完全正确地突出了重工业的干部问题。我们重工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钢铁方面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正在建设规模巨大的工厂——捷尔别斯和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我要来了资料:是谁,是什么样的专家在战前建造了我们的工厂?我就不全部宣读这些资料了。我们所有的大工厂几乎都是比利时人、英国人、法国人建造的。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经验。

请对比一下两个工业部门——纺织和钢铁。纺织业过去是俄罗斯的工业部门,在这里工作的大都是俄罗斯专家。现在,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拥有的工程师很少,而有实际经验的人多,但纺织业的建设进行得比较好,尽管在这方面也在干不少蠢事,但是毕竟有经验。在运输业方面,我们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是在钢铁方面,我们几乎没有这种经验。在一些大工厂的建设工程地上没有总工程师,而如果有工程师的话,那么,第一,他缺乏大工厂建设的实践经验,第二,他周围清一色是青年,他们虽然能干,但没有实践经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把2亿—3亿卢布投入一个大工厂,将建成一座高炉,而后将出现裂口,这座高炉将不能正常运转,我们会冒着失去主要东西的危险。

再拿化学工业为例。在乌拉尔,别列兹尼基工厂的情况令人气愤——几乎完全没有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另一个工厂里,也是化工厂,工厂实验室主任是个有实际经验的人,他从未受过任何教育。他也许是个出色的实干家,可他怎么能

够领导科学实验室?如果拿德国和我们的这些工业部门比较,那么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和钢铁工业每100名工人有2.18名工程师,而我们只有0.76名,而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这种差别更加惊人:每100名工人我们有1.12名工程师,而德国为3.77名。在化学工业里,我们为0.98名,而德国为3.4名(国家计委资料)。

柯秀尔:还有更惊人的。

卡冈诺维奇:是的,还有更惊人的。所以他们在化学工业方面有那样的成就。我们也有成绩,但如果没有学识渊博的内行的技术人员,我们便无法推动化学工业。

顺便指出,我们工业专家拥有数量极少的原因之一是,呆在托拉斯里的工程师和在生产一线的工程师的比例对我们是不利的。这种比例简直太不像话。让工程师们在托拉斯里埋头于公文,而同时工业缺工程师缺得要命。这方面的比例大体是这样的:生产岗位上有2名专家,便有1名,甚至1.5名专家坐在托拉斯里。这种情况所以发生,部分是由于托拉斯领导人的过错,部分是由于工程师本身的过错。请看罗森霍尔茨同志提供的有趣的资料:全部建筑工程师的46%呆在机关里,只有54%在生产第一线,而且每100万卢布的投资我们只有2.3名工程师。工程师不愿意到外省去,不愿意离开莫斯科到某个别列兹尼基去。请看《工商报》编辑部收到的一封信,署名是“一个专家的儿子”,作者在信里公然宣称:

“你们采取强迫出差的办法,你们想把我们的父辈赶到外省去,可你们要注意,你们将得到的是更多的破坏活动。”

我们正在遇到来自老专家的反抗,也有部分来自青年专家的反抗。他们高等学校毕业后,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到工厂去。

怎么会这样呢:国家让你受了教育,国家给了你助学金,可你不想履行国家的职责。应当最严厉地把他们派到地方上去。让他们直接到生产第一线去呆三四年。在军事部门,当一个人从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在成为团长,成为师长之前,他得先去当连长、营长。对于国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也必须这样提出问题。

如果以农业为例,那么,这里存在的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专家的数量问题,而是专家十分缺乏的问题,而且更加尖锐地提出了质量问题。农艺师过去是为个体农业经济培养的,他们不适应现在的要求。需要对现有的专家大规模地组织重新培训,让他们了解,现在农业要求他们做什么。我们必须培养各种新类别的农业方面的专家。我们共有农艺机械师579人,工艺师1700人。

有人喊:是全联盟?

卡冈诺维奇:是的,是全联盟。

我们必须加速为农业培养自己的专家。我们每个区平均只有大约一名农艺专家。同志们,现在当我们整村整区实现全盘集体化的时候,每个区只有一名农艺师意味着什么。请看最粗略的最起码的概算。我必须说,如果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有最起码的概算,那么在农业方面连起码的概算都不如了。即使按照这种计算,现有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为28 926人,而五年计划期间的需要为:高级专门人才3.25万人和中级专门人才8.39万人,共计11.64万人。

库比亚克同志引用资料说,我们没有亚麻专家。在组建亚麻种植协会、亚麻种植合作社,可没有亚麻种植专家。畜牧专家的数量也微乎其微。请允许我引用教育人民委员部五年计划中的数据来评论我们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与1928—1929年度相比,计划规定1932—1933年度高等农业院校增加招生人数10%,而高等艺术院校增加招生人数60%。(喧嚷)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就是这样。

尼古拉耶娃:我们将在草原上跳舞。

卡冈诺维奇:是的,没有专家也可以在草原上跳舞。

至于经济专家,那么计划里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计算数字。他们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培养的是“一般的”经济专家。

有人喊:这种“一般的”我们不需要。

卡冈诺维奇:正是如此,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经济专家。请看出国工作人员的培养。有两所高等学校在为我们培养出国工作人员,一所是普列汉诺夫学院(在莫斯科),另一所在列宁格勒。而在两所高等学校里设的甚至不是系科,而是组,那里总共在培养60名出国工作的人。而在那边,在国外,我们的机构非常不纯。

有人喊:政府为什么不管?

卡冈诺维奇:格里亚金斯基同志,我们,政府全都在这里。您不要以为,当我批评这个或那个人时,我们是在为自己开脱。我们全都有错,我们的任务不是找一个代上级受过的人,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他,而是使我们大家都了解问题的全部尖锐性,都来动手做这件事情。政府为什么不关心?政府关心了,而后便抓教育人民委员部,从而改变它的计划。

有人喊:当我们为一所高等农业学校要钱的时候,我们遭到了拒绝。(喧嚷。主席的摇铃声)

卡冈诺维奇:格里亚金斯基同志,请您不要利用总的问题为自己的高等农业

学校捞取几千卢布。这样提出问题太商人气了。

主席:格里亚金斯基同志,您太激动了,好像您被从大学里开除了。(笑声)

伏罗希洛夫:或者被安排到大学去工作了。

卡冈诺维奇:我们需要的经济专家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你们要明白,在旧时代培养经济专家是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

有人喊:对!

卡冈诺维奇:在旧时代,培养经济专家是为了了解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货币经济。如果他用老办法对待我们的货币经济和财务,那他会把我们的事业完全断送的。在旧时代,培养经济专家是为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税收政策。要知道,经济同政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必须十分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现在不提把高等经济院校移交给相关主管部门的问题。这方面的主管部门很多。这方面有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这些高等学校可以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内。但各主管部门应当更关心这件事情。应当赋予它们明确的宗旨。应当修改它们的计划,改善它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第一,应当制订一个符合实际的明确计划,应当了解我们要干什么。高等技术学校网过去是无计划地建立的。我们应当重新考虑调整高等学校网。我们的重复现象非常严重。在同一个城市里设有同样的一些系,而教授很少,不够。教授在各个大学里兼课,因而教学质量差。

第二,我们应当为高等技术学校确定更明确的培养目标。我们应当把订货用户和生产者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最后,我们必须提出毕业生数量的问题。我们必须看一看,大学生是怎样培养的,专业人员是怎样毕业的。我们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便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数据。莫洛托夫同志在上一次全会上⁴³⁹曾经引用过这样的数字: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为6%—7%。令人遗憾的是,车到现在还没有动。有些资料说明,这一数字在7%到8%之间摆动。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计算,到五年计划末尾,剩下的只有全体学生的20%,其余的80%将被淘汰或者留级一两年或更长时间。我们在教育他们,而他们在被淘汰。经费我们每年都在增加,可留级现象增多了,效率降低了。说明这种情况的非常引人注意的资料,是波德沃伊斯基同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得到的,总的说来他提供了许多关于高等技术学校的材料⁴⁴⁰。同志们,如

果举德国、美国的大学生为例的话,那里的大学生比我们少。我们现在仅高等技术学校就有6.6万名大学生。1926年,美国共有大学生5.9万名,德国只有2.9万名。那里的毕业生率高得多。我们的有些报纸说,美国的这种毕业生率为40%。根据委员会的资料,这些数字尽管被夸大了,但在德国毕业生率仍然达到15%—20%,美国的数字也大体如此。可是,我们的毕业生率很低。为什么?第一,物质保证不足。大学生忍受不了,特别是工人忍受不了。他们过去在工厂里领薪水,而现在在大学里领助学金,比原先的工资少得多。住房条件很艰苦。今年我们给的住房拨款比去年增加了两倍,而去年的拨款比前年增加了一倍。现在我给你们宣读政治局11月18日关于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拨款的决定⁴⁴¹:

“为了在加强和扩大工业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物质技术基础的事业中保证取得进一步的决定性的进展,必须:

1. 扩大经济单位预订高等技术学校、高等农业学校、工业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办法,以便在最近几年把预订合同制推广到已经确定了相应专业的年级的多数学生(从三年级,甚至从二年级开始)。

2. 1929—1930年度,由国家预算和经济单位保证平均向全联盟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70%的学生及工业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50%的学生,包括通过预订合同的办法向高等技术学校大约25%、高等农业学校15%、工业中等专业学校15%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10%的学生提供助学金。与此相应,今年预订合同的拨款数额大体确定为3300万卢布,由各有关经济部门的内部资金负担,让工业系统为预订合同拨款2220万卢布,运输业拨款250万卢布,农业(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全俄国营农场中央联合公司、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农业合作社等)拨款700万卢布,150万卢布由其他主管部门(邮电人民委员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业,全俄手工业合作社联社、公用事业等)负担。上述农业和其他主管部门的预订合同拨款,责成国家计委在两周内分派下去。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会同有关单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等)在一个月内在制订出预订合同的形式和办法。

3. 确定一类地区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大学生的预算助学金如下(其他各类地区作相应改变):一年级和二年级——45卢布(原先工业为35,农业为30);三年级——50卢布(原先工业为35,农业为30);四年级和五年级——55卢布(原先工业为45,农业为30)。工业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一年级——30卢布(原先为20);二年级——35卢布(原先为25)。

4.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会同有关机关确定预订合同制大学生大体的助学金金额,以便预订合同制的助学金从二年级的75卢布起,三年级最多不超过80—100卢布,四年级和五年级不超过120—150卢布。

5. 提高高等和中等工业和农业学校教授和教师的工资,鉴于在编人员的增加,确定工资总额比1928—1929年度增加1800万卢布。

鉴于更多地提高初级教师干部工资的需要,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会同有关机关在两周内制订出今年的工资数额。

6. 为了改进教学质量,认为挑选出大约10%不兼课的教授和5%不兼课的副教授,为他们确定特别高的工资(每月大约500和700卢布)是适宜的。

7. 增加高等和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教学业务费用的定额。

8. 确定1929—1930年度新建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维修和装备高等和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及其公共宿舍的基本建设费用数额为1.35亿卢布(1928—1929年度为3100万卢布),为此目的由国家预算拨给1.15亿卢布,俄罗斯联邦地方预算拨给575万卢布(用于建造中等工业和农业专业学校及其公共宿舍)。

基本建设资金的其余部分应当通过增加吸收工业、运输业和其他主管经济部门资金以及地方预算资金(建造公共宿舍的部分)的办法筹措。

由国家计委将追加数额在相关主管部门和地方预算之间进行分派,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表以及基本建设投资在工业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之间的分配。

9. 鉴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大,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国立高等技术学校设计院,以保证正在设计的方案的可靠性、建筑工程本身的计划性及其适合教学生活的需要。

10. 根据这些决定,确定1929—1930年度高等和中等工业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费用的总额为2.71亿卢布(1928—1929年度拨款为9700万卢布),其中国家预算为2.18亿,其余的5300万由各主管部门(工业、运输业、各农业机关等)的资金和地方预算提供。”

不久前有数千名大学生聚集在莫斯科。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院校管理总局招收了学生,但没有准备好住房。学生们来到莫斯科,在火车站上和露天底下过夜。这是犯罪行为,他们在火车站上过夜,他们哪像个大学生。当我们向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拨款2000万给学生建造五座大楼⁴⁴²。但是,同志们,这是由于情况紧急而采取的非常措

施。应当使大学生有物质保证。应当使学校处于正常条件之下。在这里我不提最高的要求。我不说：“我们将给他们那么多钱，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这种要求现在是做不到的。但是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应当的。

我们正在扩大预订合同制，增加了助学金。预订合同制应当整顿，过去搞得毫无秩序和形式主义。我们将扩大预订合同制，物质状况会变得好一些。我应当说，在效率方面乌克兰特别落后了。

斯克雷普尼克：那里的毕业生率不到9%。

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四年级的留级率，高等技术学校为61%，高等农业学校为65%。尽管我对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满怀敬意，我应当保持客观态度，必须说真话。效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高等学校的纪律极端松懈。我应当坦率地说，如果拿高等技术学校同我们的企业比较，它们真有天壤之别。毫无纪律，毫无秩序，管理混乱。上次七月全会决定的事情没有执行。

莫洛托夫：也许，这对乌克兰是不必执行的。

卡冈诺维奇：这是大家都必须执行的。

在这里你们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况，根本就谈不到一长制。支部简直什么都管。它既管经济，又管行政，无论什么都管。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一位大学生斯列萨列夫同志在会议上对这种情况大体作了这样的描述：

“我们有管委会，其次是教务处，教务处下为系，系下面为科，科下面为组，组下面为教研室。这一切全由管委会领导，但是，实际上它当然并不领导这一切。整个系统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这个系统掌握在我们的异己者手里。由于各个教学组和整个教学机构掌握在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教授们的手里，我们大学生组织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学习生活中分不清何处是学生代表机构的终点及何处是正常教学机构的起点的界限。”

这里说的是最近已取得相当大成绩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情况。其他高等技术学校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应当果断地规定，生产纪律对于大学生是必须执行的，就像对于工人一样：你想领助学金，就请你提供优质的产品。在高等技术学校里，像在工厂里一样，必须建立稳定的秩序。各高等技术学校里存在的某种克伦斯基风气⁴⁴³必须消除。那里选举制至今仍占统治地位，校长选举制、系主任选举制等。我们必须取消校长选举制。校长由上级机关任命，系主任由校长任命，等等。

尼古拉耶娃：我完全同意这样提出问题。

卡冈诺维奇：高等技术学校应当建立校委会。校委会应当有经济机关的代

表参加,而且不是在形式上,像他们现在那样。对不起,在为你们培养工程师,那就请你们注意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大纲,照料它们的生活,你们应当参与高等技术学校的全部生活。工会必须参加校委会,它们至今只是在说:“应当参与此事等等”,而做的事情却非常少。工会应当更深入地参与此事。应当吸收工厂的工人参与此事;高等技术学校与工厂的联系应当更加密切。其次,为了加大培养学生的能力,我们建议实行连续学年和连续学习周制。这不是说,大学生将没有休息,但这表示,为了加速毕业我们应当采用连续培养制。生产上的连续生产周制必须有专业人员的连续培养制相配合。

对有实践经验的人进行重新培训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有大约5万名实际工作者,其中工业中有2.8万名,大都是熟练工人。要知道,这是现成的材料:把技师培养成技术员很容易。

有人喊:对!

卡冈诺维奇:但这需要进行组织,不是以手工业方式,而是从国家全局的观点进行组织。这样我们才能从对实际工作者的重新培训中得到大量补充,以满足我们在专业人员方面的需要。按照我们的设想,需要对大约4万名实际工作者进行重新培训,其中4000人将担任工程师职务。

高等技术学校教学工作的改革

现在请允许我简短地谈谈我们专业人员的质量和高等技术学校教学工作的的问题。不言而喻,我们不仅应当追求数量。专业人员还必须是高质量的。我们必须突出强调提高我们专业人员的质量问题。莫洛托夫同志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所引用的对我们专业人员的评述至今仍然有效,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值得指出的是,库珀在全联盟西部商会⁴⁴⁴美国处所作的报告中是怎样评论我们的专业人员的。

他说:

“在我看来,你们的工程师具有十分丰富的技术知识。你们所需要的是实践的、实际的经验。我认为,如果请美国的实际工作者到这里来,他们会教给你们的青年实际处理事情的方法。应当说,美国每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当六个月普通工人,然后才能准许继续工作。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担任重要职位的工程师不是从最基层干起的。甚至大学毕业之后他也是从最低级的职务干起。在我看来,我们那里造就人的不是学院,而是工厂。”

喊声：正确！对！

卡冈诺维奇：我认为，尽管库珀，当然，不是共产党人而且我们不应当处处向美国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埃普顿·辛克莱⁴⁴⁵在自己关于美国高等学校的《鹅步》一书中出色地描绘了这所学校的一切丑恶消极现象），但是美国高等学校实践中具有的那种合理的积极的东西，我们必须拿过来。在去年中央四月全会上十分及时和正确地提出了把一些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问题，当时斯大林同志就论证说，应当把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与工厂联系起来。在七月全会的决定中作出了必须把高等技术学校同生产联系起来，必须实行大学生连续生产实习制度的完全正确的指示。

我不长篇大论地来谈这个问题，但我要指出，我们在实行这一措施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情况。在这里我们遇到教授们中间的反动部分的拼命反抗。必须指出，这件事情缺乏领导，分散于各个企业，轮换得令人完全不可思议，以及大学生部分时间不去参加实习。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安排大学生的实习，曾经进行过争论。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让学生40%—50%的时间用于生产实习，即在工厂里干活。在这方面，指出美国对这件事情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那里有19所规模很大的高等技术学校推行连续生产实习制，或者如他们所说的“教学合作制”。在那里学习和生产实习以一个月对一个月的比例交替进行，在有些部门，例如采矿业，实习和学习的比例规定为三个月对三个月比较有利。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加以研究。

我们的生产实习进行得如何呢？请允许我在这里读几段关于这个问题的引文。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件事情的状况。曾经召开过一次大学生的专门会议，大学生们在会上谈了生产实习的情况。请看学生们作的一些评论：

“莫斯科的‘战士’工厂不知道该让学生干什么活。他们没有得到指示。工厂委员会和行政管理人员不重视实习生，对他们不感兴趣。在莫斯科的另一家工厂——‘无产阶级劳动者’工厂让大学生运铁，说这样他们会了解铁的种类。”有些地方对待大学生很好，例如科洛缅斯科耶工厂、哈尔科夫国营电机厂。

铁路上又是怎样使用大学生的呢？只要指出北高加索铁路的生产实习就够了：

“北高加索铁路达到了极端马虎和歪曲政府指示的地步。北高加索铁路把700名实习大学生的命运交到了登记分配处一个办事员的手里，他不考虑他们的学业修养和专业特点，大笔一挥便进行了分配。”（摘自П. 诺西科夫同志发表在《红色大学生》⁴⁴⁶杂志第二期上的文章）其他许多工厂的情况同样如此。生产

实习安排得非常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各个企业没有抓这件事情,因为各教育机关未同企业建立联系。应当坦率地指出这一点。有些人由此得出结论:这说明,把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是不对的。既然企业未同高等技术学校建立联系,干吗要移交呢?但这种看法是极大的错误。我应当说,如果我们不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我们就不会有进行实习的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系统的大约1.3万名大学生和职业教育系统的1万名大学生。事情动起来了,事情有了进展,但这当然并不是说,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已经胜任了这项工作。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并未做到这项事业所需要的一切。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必须把工业同这项事业联系起来的问题,以便让企业有明确的打算,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有正规的生产实习和专业人员的优良质量。

资产阶级过去是怎样培养自己的专业人员呢?在那里这一过程是自发性、无计划地不考虑需要进行的。但是资产阶级对培养自己干部的问题仍然非常重视。我给你们举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趣的例子。在法国,1794年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工业的需要创建了一个工学院,动员人们,当然是自己的人到那里去学习,在那里规定了纪律,这个工学院在法国工业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培养教师的问题。旧的教学工作人员正在全力反抗高等技术学校同工厂的联系。他们大都不了解工厂,他们会在这件事情上垮台,他们害怕工厂。第二,如果我们不培养出新的教师,我们就会完全失败。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网将增加47所高等技术学校和172所中等专业学校。这种扩大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扩大了,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教师。我们必须派自己的人去当教师,我们必须从工人中选拔新的研究生。这方面在做些什么呢?做得很少。请看实例。

为了执行七月全会关于扩大和改善科研工作干部队伍的决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自己的计划中确定了培养新研究生的速度:工业技术院校系统,1927—1928年度——109人,1928—1929年度——143人;艺术院校系统,1927—1928年度——113人,1928—1929年度——也是143人。在这方面教育人民委员部也存在同样的艺术—舞蹈倾向。

扎东斯基:这是哪个教育人民委员部?

卡冈诺维奇:这是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资料。我们突出强调教师问题。我们提出把科研工作既同企业,又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的问题。我们应当再把一些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我们应当把两三所新的高等农业学校交给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管理,以便该部能够以它们为中心为集体农庄运动加速培养专业人员。我们应当使科研工作具有比此前更快的速度。我们在科研工作方面大大地落后了,到了难以想象、不能容忍的地步。在这方面最近我们开始赶上来,有了一些生气。[事情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我讲一件事,听起来像是笑话,但令人遗憾和可惜的是,这是事实。在我们身边,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极端保密的机构,这也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破坏组织,不久前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这个机构戒备森严,它本应当帮助我们进行最美好的发明创造的事业。这是一个姆斯季斯拉夫的机构。这个研究机构做了些什么呢?它研究了下面的东西,它本应发明一种远距离催人睡眠的光线。这种光线似乎已经研究出来了,一种催人剧烈流泪的“阿克列奥林”(“акреолин”)。我们的人前去看了看,闻了闻,一点没有流泪。可以流泪,也可以催人流泪,他们竟然会这样欺骗我们。最后,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東西使我们的人相信了,我们的人当真相信了,能够发明一种引起极度性兴奋的荷尔蒙,可以使敌军战士失去战斗力。人们对此信以为真。这就是“科研机关”进行的工作,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作。后来发现,这完全是招摇撞骗。他们把6万卢布用于酗酒、淫荡、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他们买来普通的葵花子油,把它装进若干小瓶子里,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前去的时候,他们说,这就是那催人流泪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十分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447

列宁是怎样提出科学技术事业问题的?他在给戈尔布诺夫同志的一封信里写道:

“还有一件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看来是在睡大觉。”

莫洛托夫:看来是的。

卡冈诺维奇:(朗读):

“要么把它唤醒;要么真的把这些有学问的游手好闲之徒撵走。必须明确规定由谁负责向我们清楚地、及时地、切合实际而不是例行公事地介绍欧美的技术……再不要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和它在国外的大量懒汉们游手好闲了,否则我们就用别的人代替他们。”(黑体字是列宁强调的)448

现在我来谈下一个问题。我从所有的问题中只挑出了三个:连续生产实习制度、科研事业和与外国经验的关系。

我们是怎样利用外国经验的呢?请允许我向你们通报,去年七月全会关于利用外国经验的决议完成得极少。甚至像派遣250名青年专家出国留学这样的决定也未完全执行。只派出了148人,找不出250个人!而与此同时却往国外

派出了85名运动员。《探照灯》⁴⁴⁹上登了一幅非常成功的漫画：画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运动员用头在顶足球，而这里站着一个人身材矮小的工程师（展示漫画）。工程师羡慕地望着被派出国的足球队员们，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他们那么重视，我也是用脑袋工作的。”我不是反对运动员，我自己就是个体育迷，但我仍然反对在学习外国经验方面让运动员和运动超出于技术和工程师。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使用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些专家。

我们曾经召开过一次在苏联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员专家的专门会议。会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戈尔茨曼同志召开的。我们是怎样使用外国专家的呢？简直太不像话了。我这里正好有波多利斯克机械厂（以前的辛格厂）一位工程师的发言稿。我请戈尔茨曼同志核查一下这件事情。戈尔茨曼同志核查以后说，这件事情基本属实。这位外国专家弗拉克工程师说：

“我是一年前作为工程师和作为共产党员来到这里的。当红色厂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时候，我在上衣胸前戴了一个苏联红星。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以后，他让我摘下红星，说：在这次谈话之前已经同意录用我的技术厂长不应当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不应当看见我戴着苏联的红星。”

有人喊：而这是在我们莫斯科的郊区！

卡冈诺维奇：他接下去描述自己的磨难，人们怎样不愿意要他，最后他怎样进了车间。人们开始折磨他：

“工长努力同我保持接触并约我同他一起喝伏特加酒，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支部书记。他回答说：嗯，当然应当保持接触，让我们跟他喝酒去吧。”事情弄到了指控他进行破坏活动的地步，原因就是：“一台机器上价值45戈比的小轴承断了，因为它不是用渗碳铁，而是用过度回火钢做的。”接下去他描绘了生产本身中的荒唐事情。那里大量生产针，废品率达到60%。“人们做了思虑深远的化验，针上是否有杆菌，而没有发现针鼻断了。”于是这个工程师受到了排挤，他在那里干的甚至不是工长。

伏罗希洛夫：他是工程师吗？

卡冈诺维奇：他是工程师，可是不使用他。其他一些志愿来我们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工程师，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政治流亡者，一律都在受折磨，根本不被使用。

伏罗希洛夫：这也是破坏活动。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在使用外国专家方面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工商报》上登载了一篇描述列宁格勒一次冲突的文章。列宁格勒选出了一个

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文章的标题是：《不同速度的冲突》⁴⁵⁰。原来是，一家瓷器厂来了一个德国工程师，担任技术厂长，他提出的各种任务的完成期限很短，于是工厂的工程技术处和工会组织便开始了反对这位德国工程师的斗争。冲突是非常激烈的。最后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证明，提出比我们的工程师已经习惯的那种速度快一倍的速度的德国工程师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和必须进行的反对萎靡不振习气的斗争。

当然，我们必须断然地强调指出，外国专家中间也可能会有破坏分子、法西斯分子。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资料表明，被聘请的有法西斯组织“钢盔团”⁴⁵¹的成员。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法律工作者被聘请来当工程师，他每月领取800卢布，给了他一套很好的住房，而共产党员工程师们却岂有此理地不被重视。我们必须对外国专家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但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必须聘请优秀的专家到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和其他工厂工作，付给他们列宁所说的学费，在这件事情上要花费数千万卢布，不要舍本逐末，而要向优秀的专家学习。但是不应当聘请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窝囊废，而应当聘请优秀的、一流的专家并付给他们钱，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家进行工作的良好环境。

就拿外国人讲学和邀请外国讲学者这个问题来说吧。尽管全会有决定，全年总共邀请了五位讲学者。关于技术书籍。我们在技术书籍方面可怕地落后了，落后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在这方面我们的工程师怎么能够进一步成长？他大学毕业了，但生活并不停在原地不动，生活在前进，各种新的发明不断出现，如果一个工程师大学毕业了并满足于此，那他这个人就完了。他应当读书，深化自己的知识，然而我们不订购技术书籍，我们的出版社也不出版技术书籍，不出版所必需的和需要的东西。这种情况荒唐之极。人们抱怨没有对技术书籍的评论；有人出版了一本关于另一个部门的小书——便有书评，出版了一本技术书籍——大家都沉默，不刊登书评，不把注意力吸引到这件事情上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全会结束以后，中央组织局必须具体地提出这些问题并要求国家出版社或者国家出版社的技术出版社更有力地抓一抓技术书籍。我认为，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统一的技术出版社⁴⁵²，那将是很不坏的。

丘巴尔：将是非常有益的。

有人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属下有一个。

卡冈诺维奇：那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更糟，有出版社，但为满足对技术书籍的需要它什么也没有做。然而我们必须把技术给群众，所以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当技术不再是少数工程师阶层的专利，当技术应当成为千百万群

众的财富,当我们必须最广泛提出培养从熟练工人到工程师干部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驾驭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规模极其巨大的工作。

专业人员的社会政治素质问题

我们不仅需要增加专业人员的数量,不仅要保证他们一定的技术质量,我们需要在社会政治方面培养我们的专业人员,因为当前的改造时期不单是伴随着摧毁旧经济关系的技术革命时期,而且这是根本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关系艰难重要的时期,是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时期。我已经说过,干部问题不是作为技术问题,而是作为与阶级斗争、与我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过程相关联的纯粹和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从这个观点看一看我们大学生的状况,那就必须说,阶级斗争的过程在这里也得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在实现高等学校工人化的事业中,在完成党提出的改善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学校人员成分的任务⁴⁵³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我们使高等技术学校的工人有了肯定的增加。如果1923—1924年度在俄罗斯联邦高等技术学校的全体学生中我们只有17%的工人和5.9%的党员,那么1928—1929年度已有40.9%的工人和26.6%的联共(布)党员。但这一情况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必须给自己提出任务,争取达到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中工人不少于70%。如果看一看高等经济院校的社会成分,那里工人的比例只占23%。你们看到,在这方面我们大大地落后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愿意上技术学校。

为了保证我们进一步改善高等技术学校的成分,我们必须实行一系列的措施。你们知道,去年我们进行了选派“千人”的试验。选派“千人”的试验获得了完全成功⁴⁵⁴。1928—1929年度招收的学生中工人占67.9%,而1929—1930年度招收的学生中工人占75.9%。多数被招收者具有相当长的实际工龄和党龄。千人生在学习表现出了很大热忱和顽强精神。根据六所高等技术学校现有的资料,千人生中留级一年的只有5%。尽管这方面存在各种混乱现象,这个试验可以认为是完全成功了。

在实现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工人化的事业中,中等学校⁴⁵⁵对工人子弟的培养有着十分巨大和十分重要的意义,工人速成班⁴⁵⁶应当起到极为重大的作用。但是,工人速成班目前的成分和它们的工作不足以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日间工人速成班的学生中工人的比例在下降。工人速成班很大程度上在变成为农

民速成班⁴⁵⁷。日间工人速成班学生中工人的曲线图1924—1925年度达到8%，只是到了1928—1929年度工人的比例才上升到58%。我们晚间工人速成班的成分最好，工人的比例在逐年增加，1928—1929年度达到了80%。到这里来学习的是不愿意离开生产的基本工人。

令人遗憾的是，中等学校还不是能够加紧培养工人子弟的那种学校。应当说，中等学校培养工人子弟的工作做得很不好。首先，我们注意到随着往高年级升学工人子弟被淘汰出中等学校的过程在加剧。例如，1926—1927年度五年级中工人子弟占32%，那么九年级为16.4%。1927—1928年度的情况同样如此：五年级的工人子弟占30.7%，九年级为14.8%。

但是，除了淘汰之外，还必须强调指出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学识不足。在州和边疆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⁴⁵⁸，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中等学校的情况作了非常有意思的说明。他说：

“某个满怀怨恨的人会说，我们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知道契诃夫的《樱桃园》，但不知道怎样拿锤子。结果是，为了教会他们拿锤子，我们需要把高等学校的学习年限由4—5年增加到6—7—8年……如果有人能驳倒我的说法，我将感到高兴，但我根据数字材料得到的印象是，工人们是有意不想利用这种学校，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学校……在莫斯科被调查的索科尔尼基区十所七年制学校里发现了40%以上信教的儿童，而在莫斯科河南区——我们自1917年来的红色堡垒——大约有50%的信教儿童。索科尔尼基区一所模范七年制学校今年的毕业生中有92%的信教儿童。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莫斯科！如果仔细读一读对中央黑土地带州进行调查的巡视员们的数字，它们会提供这样的比例：斋戒的儿童为61%，信上帝的为24%，信妖魔鬼怪的29%。”

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中等学校很难胜任培养工人子弟上大学的任务。这就是必须广泛提出改进中等学校工作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培养农民青年学校里的孩子上高等农业学校。我们应当根本改善高等农业学校的成分，那里雇农只有0.5%，那里由于富裕农民和富农而成分很不纯，那里党员的成分比高等技术学校低(17%)。当然，高等农业学校的生源应当不仅由农民青年补充，但是他们应当在这方面占据应有的位置。

我们必须提出坚决加强党对大学生的教育工作和对敌视我们的分子进行斗争的问题。在改善大学生成分的同时，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工作，然而这项工作搞得非常糟糕。无产阶级大学生⁴⁵⁹莫斯科局对于自己的工作直接这样说：“工会教育的状况归结如下：大学生工会组织什么都搞，只是不搞大学生

的政治教育。”在大学生中间我们看到了国内现在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大学生中间我们也有我们公然的、近乎于破坏分子的敌人。例如，在沙赫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克雷连柯同志收到了一份署名“大学生们”的声明，在里面可以读到下面的话：“克雷连柯公民，我们把这封信寄给您，沙赫特英雄们的刽子手。如果您认为，枪杀几十名我们年长的同志，你们就能够拯救自己的工业，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在高等学校里你们能依靠谁呢？要知道，不能认真指望那些笨头笨脑的工人速成班的学生。高等学校里唯一生气勃勃的力量是我们，而我们发誓要更加巧妙和深思熟虑地继续您现在正在审判的那些人所那么不熟练地进行的事业。”我们也看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思想情绪的表现和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传播。对高等技术学校内外社会工作漠不关心的因循守旧人群、闭目塞听的行帮主义分子占有很大的地位，这些分子的外部表现就是佩戴工程师证章作为对自己专业忠诚和社会冷漠态度的象征。这因循守旧的一群就其本质而言近乎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大学生类型。埃普顿·辛克莱在自己的《鹅步》一书中(155—156页)对这种行帮情绪进行了描绘：

“他们的纪律是在俱乐部和兄弟会(社团)里形成的，他们不善于进行批评。这是一些群居情感代替了思想的幼稚的野蛮人。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相似并构成群体的一部分。教给新生的规矩是：他必须戴新生的帽子，如果他有自己的意见，那就会认为他话太多，便开始打掉他头脑里的糊涂念头。系里知道这一切并且认为正该如此。系里与兄弟会会员一道灌输服从和划一。”

这种大学生对资产阶级的美国是典型的，我们不需要他。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我们的大学生在政治上是积极的，积极参加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建设。但是我们必须坦率地说，不仅大学生工会的工作，而且支部的工作都做得非常不够。请看一个非党大学生的信的摘录，他贫农出身，上大学以前他是个很好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愿意接近共产党员。他写道：

“我去了支部。气氛又很不自然，显然没有非党员在场。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使大家都感到拘谨。他们在讨论什么重要的问题，我这个非党员被请求离开。支部在两次会议上讨论过给我什么工作的问题，但是什么工作也没给。于是支部书记让我到俱乐部文教委员会去。建议我为大学生卖电影票。我拒绝了，再也没到支部去过。我感到痛苦并责骂自己，我怪自己不能博得别人的信任。后来一切都过去了。我变得对他们态度冷漠了。”

即使承认这封信有些夸大，它总体上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支部对非党

员的工作。我们的支部,我们的党组织承担了为学校改造而斗争的全部重任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迫采取命令主义的作风。我们应当免除它们的这项工作,使它们的主要注意力也像大学生工会组织的注意力一样放在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上。

用所列举的这一整套措施,我们能够保证完成培养新干部,培养无产阶级国家所需要的专家的任务。

在坚决提出培养无产阶级新专家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以此改变党对旧专家的政策。我们坚决主张使用他们。

当然,我们看到旧专家中有许多破坏分子。但是破坏活动的统计资料表明,在500个因破坏案件被逮捕的人中[而我应当说,逮捕得非常“自由主义”,下层几乎没有触动,虽然他们也有牵连]⁴⁶⁰,工业方面——资本家和地主占29%,其他人及平民知识分子占70%,而运输业方面的被捕者(106人)中——贵族、世袭荣誉公民、商人和神职人员占62%,其他为37%。这证明,参加破坏活动的有过去的私有主、股东,或者换言之,即资本巨头出身的上层专家干部。跟在这部分敌视我们的专家后面的,也有一部分因循守旧的人。相当大部分的专家是因循守旧的人,对他们持所谓的中立态度。然而专家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融入了我们之中并真心诚意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描绘敌视我们的那部分人的政治面目,我引用被逮捕的破坏分子的几段供词。帕利琴斯基供称:

“我承认,我的政治立场、活动和行动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里是明显反布尔什维克的。如果把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量齐观,那也是反苏维埃的。”

因苏联黄金工业股份公司⁴⁶¹案被捕的克雷洛夫教授供称: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培养出来的革命前时期的工程师们初期在思想上不可能认清社会主义经济的潜力和意义……怠工、反苏维埃宣传以至最后的破坏活动……是这种情况的结果并说明了相当多的工程师自苏维埃政权和平工作最初年代,即从1921年起的工作情况。”

另一个破坏分子供认:

“我们那么坚信,我们持原先立场的人不可能同苏维埃政权一道工作,它会吸干我们的一切,但是什么也不会给我们。因此,我们作为君主制的拥护者应当阻碍它的巩固,这样做的最好办法就是破坏军事工厂。”

我们曾经试图弄清当前专家组成的情况怎样。为此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专门

的调查⁴⁶²,调查涵盖了9 000*名担任各种行政、技术职务的专家。请允许我引用只限于涉及受过完全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的资料。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62%的专家是革命以后作为专家开始工作的,而56.5%是革命以后从学校毕业的。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专家中间,革命后开始工作的上升到72%。这一点也被年龄方面的资料所证实。在工程师中间,53%的人1917年不到32岁,而在技术员中——58.8%。至于革命后的工程师,那么1917年不到22岁的占73%,而在技术员中这一比例上升到84%。当然,这些资料不能完全用于全体专家,但是考虑到调查对象的科学选择,可以认为这些资料是有代表性的,是接近于实际的。

如果根据这些资料以工程师是否党员来看,那么在革命前的工程师中我们只有2.3%的共产党员,而在革命后的工程师中有6.7%。所有这些资料表明,对于我们来说,专家问题相当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必须十分尖锐地提出我们对旧专家的工作和为我们无产阶级路线而斗争的问题。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对旧专家的政策。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李可夫同志是怎样带着一厚纸夹列宁关于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旧专家的引文来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列宁提出的不仅是使用旧专家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了用自己的无产阶级专家代替他们的问题。列宁是根据所处的时期,根据党所面临的任务辩证地提出问题的。因此,指责我们,说我们想要驱逐旧专家是绝对不正确的。相反,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使用旧专家,对他们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而我应当说,这项工作工会做得很差。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专家。列宁写道: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试验大量地吸收专家,同时培养新的领导人员、新的专家,使他们学会做极其艰巨复杂的新的管理工作,以便代替旧的专家。”

接下去是:

“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你们做到这一点,你们就能有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工作,要他们在学习时一直跟旧专家在一起,将来代替专家的位置,执行同样的任务,并为我们非军事部门即工业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改变领导成分作好准备,像我们军事部门所进行的那样。如果你们做到这点,这种工作当然将意味着一切。”(第16卷,第434—435页)⁴⁶³

你们看到,列宁不仅提出了使用旧专家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同时培养自己的专家的问题。请看军事部门如何代替旧专家的一个小小的例证。如果1920年

* 速记记录为4 000。——编者注

工农红军里有68 159名旧军官,那么现在只剩下了6 493名,即全体指挥人员的14%(这里也包括战时的军官,其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如果1920年指挥人员中共产党员占10%,那么现在共产党员则占60.8%^{*}。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在经济方面也达到这样的指标。当然,培养一名工程师比培养一名军事指挥官更难。

伏罗希洛夫:你这样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卡冈诺维奇:也许,但我觉得,这更复杂。

伏罗希洛夫:从我们的军事学院毕业并不是那么容易。

卡冈诺维奇:我们必须争取做到,到五年计划末期我们能大致有这样的曲线。这就是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的任务。

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向领导干部——经济、工业和财务领导干部。〔同志们,有一些同志问我,我打算谈**民族干部。总的说来,我们应当根据各地区和工业部门的情况来建设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为所有的国家所考虑。所以,高等技术学校的建设在这里是与一定的工业部门相联系的,如哪里有采矿工业,哪里有冶金工业等,这里也应当把经济因素与民族因素联系起来。曾经讨论过在塔什干创办棉花学院的问题⁴⁶⁴,人民委员会拒绝了,拒绝得完全不对,因为突厥斯坦、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是植棉业中心。我们必须把植棉工业提到空前的高度,他们接受了建立棉花学院的计划,棉花学院正应当建在那里,而不是建在莫斯科。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事情。对于其他工业部门也是一样。在谈工业区的时候,也考虑到每一个共和国相应的民族特点。此外,这里产生了一个语言问题。很清楚,如果这将建在格鲁吉亚,就得有格鲁吉亚干部,进行学习的将是格鲁吉亚青年,当然是用格鲁吉亚语言。应当这样提出问题。

简短地谈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很清楚,我们必须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修改,因为学习期限缩短了4年^{***}。我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由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主持召开了教授和科学院院士专门会议,我们的共产党员院士占布金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那里进行了很多争论。我曾想去听听关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争论,因为我不敢下判断,什么需要删去,而对于学化学的学生数学的哪一部分应当删去,而对于学技术的学生数学的哪一部分应当删去。这

* 速记记录为86%。——编者注

** 原文如此。——编者注

*** 原文如此,正确的应是“到4年”。——编者注

是一个专门的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不能用骑兵冲锋的办法对待;它需要认真的系统的研究。还有一点意见——关于数字。有些人以为:我说8万工程师——这是缺额,不,8万工程师——这是需要,我们将在总计划里予以弥补。再谈谈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志们对我说了,他们预想,我会更狠地骂他们,应当更狠地骂他们。我改正了。当我们审查其他数字的时候,我应当说,这些数字是国家计委提供的,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计算他们自己的工业需要多少方面表现出完全束手无策,而实际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自己工业所需要的数字比国家计委提出整个经济的数字要更容易一些。]⁴⁶⁵

关于领导干部

十分清楚,技术干部问题不能不与领导干部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总的说来,我们的经济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者的作用不同。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市场关系的条件下,经济工作领导者的主要作用归结为商品流转领域的活动,那么,在社会主义关系的条件下,这种活动主要是在组织生产过程的领域进行。在社会主义形式下,这种作用来自于经济的有计划的组织。因此,在我们的条件下,经济工作组织者的职能接近于工程师和技术员的职能。然而布哈林同志说得不对,他在关于科技局⁴⁶⁶工作的提纲中写道,未来属于行使经济管理职能的工程师,或者行使工程师职能的经济管理人员。这是通常的玩弄词藻。未来(从布哈林同志说的那个角度)不属于工程师,而属于劳动者。在这里布哈林同志多少陷入了认为技术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的波格丹诺夫主义,而那是绝对错误的⁴⁶⁷。未来不属于工程师,而属于劳动者。但是经济工作组织者同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接近将一直继续下去。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工程师的显贵将以机器的显贵终结。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把领导干部的质量问题与专家的质量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是怎样的呢?

在使用旧专家的时候,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是阶级立场坚定的,以便抵制企图影响他们的破坏分子。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是懂技术和有文化的,必须是有阶级警惕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我们的专家干部队伍可以作怎样的估计呢?请允许我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十分坦率地提出一个问题,而不怕有些同志可能会因此而生气。最终我们必须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提出问题。而谈的既然是干部,那么谈的当然就是活生生的人,而这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

事情。

首先,请允许我说,我们在工业干部方面已经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就。统计资料表明(我们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从1923年起,我们的工业干部中的工人和共产党员有了毫无疑问的增长。如果1923年我们企业的厂长中工人占39.1%,那么现在占71.1%。如果1923年我们的共产党员占29.4%,那么现在则占93.4%。托拉斯管委会成员的情况也一样。那里工人:1923年——23%,1929年——48.1%;共产党员:1923年——37%,1929年——78.5%。我们在工业干部的质量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我们的干部大大地成长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干部在结束恢复时期和着手抓我们工业改造之后领导整个这部巨大的机器,我们是完成不了我们面临的任务的。

格里亚斯基:尽管有破坏活动。

卡冈诺维奇:我们成就的取得不单是由于领导干部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和强大。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尽管有破坏活动,十月革命给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我们顺利地进入了改造时期并正在我们干部的帮助下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对工作内行并且已懂技术的最著名的、杰出的厂长、托拉斯主席的名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认真地学习。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不在这里自吹自擂,因为就在这一方面我们大量的工作还在前面。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主要的缺点。第一,我们有很大的流动性,巨大的流动性。例如,我们工作不到一年的企业厂长和托拉斯管委会成员,1926年为38.2%,而今年为50.3%。当然,工作不到一年,厂长是不可能清楚了解生产的。

第二,如果从坚定性的角度——道德的和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坚定性、日常生活中的坚定性的角度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会在这里看到许多消极的现象。如果把因这些案件而落到中央监察委员会里来的经济工作人员的数量与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相比较,那么经济工作者的比例会更高。然而,这并没有给予我们权利断言,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腐化了。我再说一遍,不能这样断言,而有时却笼统地这样断言。我们必须同这样的说法斗争,但同时我们必须对存在的不健康现象提出警告。我必须在这里向你们宣布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而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了一个案件,两个老布尔什维

克——俄联邦国家工业建筑工程局管委会主席基里尔·奥尔洛夫(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和俄联邦国家工业建筑工程局管委会委员哈哈列夫,一个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另一个是1901年入党的党员,还有,火炮制造托拉斯管委会主席萨维茨基,他是比较年轻的党员(1918年入党)却因为受贿而被抓住了,而开始他们都不承认。我们大家都感到震惊,后来弄清楚了,这是真的,基里尔·奥尔洛夫自己承认了。“第一笔钱,——他说,——作为贿赂是M. И. 哈哈列夫接受的,数目是2 000卢布,从中我从哈哈列夫手里拿了一半。第二笔钱是我从罗斯托夫采夫那里收下的,数目是2 300—2 500卢布。这笔钱的一半我给了哈哈列夫。”哈哈列夫作了同样的招供。人们简直是在强索贿赂。如果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投上阴影和给老布尔什维克投上阴影,那就糟了。只有恶意的煽动者,只有我们党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会利用这件事情反对老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同志们,我们不能回避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指出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警惕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由于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无产者、脱离了党员过的那种日常生活并向专家的生活、向敌视我们的分子靠拢的结果。对这种现象我们无法作别的解释。奥尔洛夫本人企图用自己的困难情况等解释。但这全都是胡扯。是的,我们的共产党员的生活并不阔绰。一位来过这里的美国工程师列昂·莫伊谢耶夫很生动地描述说,领导经济的、领导国家的共产党员们他们在怎样地约束自己,在怎样地生活和经受实际的穷困。当然,我们是在经受实际的穷困,但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领导国家不是为了奢侈。因此,这里全面提出的是关于与党本身的联系,与群众的联系和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我们必须有经常的互相影响、经常的互相监督,以便保持我们强大的革命的坚定不移的集体的本色。

我们常常听到抱怨:对我们吹毛求疵,责备我们,批评倒容易,可你到工厂来当一当家试试,当发生某某事情和某某事情的时候,你得对这一切负责。当然,同志们,谁工作得都不容易,任何人都得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我在乌克兰召开了一次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工厂厂长会议,会上比尔曼同志错误地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在国外的资本家那里进行管理很简单,那里没有我们所存在的那种混乱和掣肘的情况。我对他说,老板是一回事,他是资本家,他是用强制劳动进行安排的,而在我们这里经济的组织者是群众,我们必须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以便安排劳动,安排纪律,安排生产。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任任务。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经常是有失误的。就拿波尔坚科案件⁴⁶⁸为例

吧。波尔坚科是使用假印记的布良斯克工厂的前厂长。人们把假印记打在蒸汽机车上和不合格的部件上,于是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就作为合格产品发出去了。假印记在他之前就使用了,他在任时也部分地使用了,他并不知道此事,但是他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这件事情的通知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半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后来这件事情被揭露了,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了刑。在法庭上他托词说,我了解他,其他人(鲁希莫维奇、托洛孔采夫)也了解他。确实,我们了解他。总的说来他是一个诚实的工作者,但我不准备在这里,在党中央的讲台上对法院的判决进行评价。如果我是那里的法官,我就会详细弄清楚。我不准备断言——判决(判了他两年)是对还是不对,这一判决是应当减轻还是不应当减轻。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领导一个机关、工厂的共产党员厂长(他那里发生了不成体统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够和应当对他进行审判呢?我们是否能够拉他一把呢?我认为,我们能够和应当。列宁是怎样看这种事情的呢?我引用他写给戈尔布诺夫的一封信:

“其次,委托您调查一下瑞典‘尼特维斯和霍尔姆’工厂的停产事件(《经济生活报》第194号第4版)。水力涡轮机的订货手续办得太慢!!在这方面我们有严重缺点!!这太不像话,太丢脸!您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好让我们在监狱里好好收拾这些坏蛋。”⁴⁶⁹

我认为,党和中央委员会必须十分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当然应当爱护我们的干部。我们不当允许对干部进行迫害,没有根据的迫害,但是我们应当互相教育,而教育通过批评才能进行。我们应当这样安排工作,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对交给他的事情的责任。不错,中央关于一长制的通知⁴⁷⁰给予经济管理人员很大的权利,但随着权利增大而来的应当是责任的加大。我应当坦率地说,我们有许多事例(我再重复一遍,尽管我们的共产党员和老的工作人员的品质优良,尽管他们忠诚、可靠),这些同志把自己的权利转托给敌视我们的专家、盲目相信他们、对阶级敌人缺乏警惕性的许多事例。与专家和谐工作有时被理解为完全受他们的影响。我们的干部大都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在实行工业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过程的同时,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托拉斯管委会成员和企业厂长中的领导干部的比例由1923年的43.3%上升到了54.5%。我们必须坦率和坚决地指出这一点。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文化水平都不怎么高,我们有有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从地下工作中走出来的,从国内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干部大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水平很低。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听天由命地对

待此事,而不十分尖锐地提出问题:“学习吧!要是你不学习,作为一个干部你就完蛋了并且会毁掉交给你的事情。”为了不使我的论断空口无凭,我在这里引用我们敌人供词中的一些事例,我预先说明,我选取这些事例是有某种保留,是打了某种折扣的,因为敌人可能会诬赖我们的干部,可能会诽谤我们的干部。但是,因为这里面有某些真实的成分,那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对待敌人说了我们些什么,必须对这些事例进行仔细的分析,利用它们进行学习。这些事例究竟怎样呢?这些事例说明,我们把自己的职责转托给了专家。例如,请看被逮捕的萨马拉涡轮机厂(军工企业)原技术厂长萨瓦季耶夫的供词:

“我们的共产党员经济管理人员不可能及时地发现破坏活动,因为他们脱离了实际工作,把事情委托给了专家并由于同其他厂长的竞争有意掩盖自己的缺点。”

破坏分子所说的这种竞争意味着什么呢?破坏分子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语言表达了我們一些经济管理人员确实有某种不让人看自己缺点的意愿。难道没有这种情况?!

这就是把自己的职责转托给破坏分子的事例。

被逮捕的图拉兵工厂原技术厂长卡涅夫斯基供称:

“经济管理人员的一些命令的荒唐和有害被意识到了,也有以写条子和报告的形式提出异议的,但仅此而已。技术领导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米哈伊洛夫、奥尔洛夫(两个人都是破坏分子)的托拉斯里的威望被共产党员们看得那么高,认为情况虽然不好,但工作的客观条件就是这样。”

被逮捕的乌拉尔白金企业联合公司机械师塔拉索夫供称:

“关于乌拉尔白金企业联合公司及其地区机构的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肯定地说,在联合公司存在的全部时间里这个领导班子纯粹是形式上的。如果描绘一下前来就任的几位管委会主席、副主席和地区经理,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联合公司管委会的第一任主席是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洛莫夫称自己是攻城槌,打开一个缺口,使后面的路变得容易,不再有大的障碍]⁴⁷¹,他把事业的领导权交给了多梅诺夫。当我去找第二位管委会主席 A. A. 斯莫利尼科夫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听到的不是对所谈的一切表示完全同意,就是一句老一套的话:‘尽量做得好一些。’”

莫克尔希茨基被捕的时候是十月铁路管委会主管技术的委员,过去他是世袭贵族、私营北顿涅茨克铁路的机务长和股东。他这样描述十月铁路管委会共产党三人领导小组的工作:“日常的事务他们(管务会主席别兹鲁基赫和副主席

库佐夫列夫)过问得十分浮皮潦草,主席本人常常一连许多天不在管委会里,一会儿因长途出行离开,一会儿忙于管委会以外的其他事情,甚至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管委会正式开会的时间,他并不总是亲自主持,如果主持,也是急急忙忙结束会议,而在开会的时候,常常与管委会的其他成员互相传递一些幽默和淫秽性质的条子。”

斯大林:这是常有的事。

卡冈诺维奇(朗读):

“他的副手库佐夫列夫常常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打猎去了,或者到莫斯科去了,一缺席就是好几天。管委会的第三个成员罗森茨韦格忙于劳动与日常生活方面社会联系的事务,我有时甚至‘代替主席’签过支票和票据,因为缺这道手续出纳处的财务工作就得停止,仅仅由于三位党的领导人即路局委会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特派员)和他的两名副手中没有一个人在班上。”

我在这里再引德莫霍夫斯基供词里关于运输业情况的一段描述:

“业务计划方面的共产党的领导,——他说,——由中央计划局运输计划委员会的格鲁宁实行。在中央计划局建立以前,运输计划委员会全部处于瓦尼法季耶夫的影响之下,即实际上是由他瓦尼法季耶夫在管理。随着中央运输计划局的建立,舒霍夫工程师成了格鲁宁的副手,而因为格鲁宁曾是舒霍夫个人要好的朋友,甚至同他在一套公寓里住过,由于对他完全信任便把中央运输计划局的整个领导交给了他。

中央铁路运输局的实际情况如下:各处处长一连几个星期都不来汇报工作,就这样各处处长带着自己的事情聚集在别涅舍维奇(破坏分子)的周围。”

莫洛托夫:舒霍夫好像也是?

斯大林:他也出风头了。

卡冈诺维奇:是的,是的。或者再举关于军工总局的供词。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最清楚地暴露出了破坏活动。总工程师、破坏分子米哈伊洛夫这样供认:

“1919年和1921年军事工业是由党员工程师(波格丹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克拉辛)领导的。按照自己的水平,他们最适合当高级领导。在以后的年代里领导权先后转到下列人员手里:

托洛孔采夫、K. 奥尔洛夫、И. Н. 斯米尔诺夫、比特克尔、波格丹诺夫、扎尔科、塔马林、阿瓦涅索夫和托洛孔采夫(第二次)。

上面列举的人员中,波格丹诺夫是工程师,托洛孔采夫是工厂的老工人,扎

尔科是半个工厂干部。

其余的人都完全不了解工厂的事情。在他们就任军事工业领导人职务的时候,我通常要向他们介绍情况,从怎样造枪、什么是大批生产、动员准备等基本知识开始。

很清楚,在这样的领导手下我和反革命组织的其他成员很容易进行任何破坏活动而不用冒被发现的危险。

这些领导人(党员)不仅不能对工作进行什么领导,而且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向他们报告的东西。

这尤其与 K. 奥尔洛夫、扎尔科、塔马林、阿瓦涅索夫有关。至于兼职的波格丹诺夫(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个很好的工作者分给军事工业的时间太少了。

在上述时期里(1921—1926年),军事工业总局管委会的成员大多数不是工厂出身的人;尼基福罗夫、布鲁诺、曼德尔施塔姆、П. Д. 米哈伊洛夫、别尔津和其他对军工生产、兵工厂一点都不了解的人。

鉴于以上所说,反革命组织在 1921—1922 年期间十分放心地进行自己的活动,在这样非内行的经济管理人员手下不用冒失败的危险。在这个时期很容易得到党的负责领导人在发往各工厂的和暗带破坏性质的指示上签名。

中央和各工厂党的领导人员的极大流动性也助长了破坏活动。军事工业总局七年里换了八个主席,各工厂的红色厂长不停地调换。”

来自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的各种材料中的描述我就不全读了。

斯大林:如果有意思,为什么不读?

卡冈诺维奇:专家们的共同意见是,希望管委会能够做到工作更明确,相互关系更清楚,管委会成员和主席更深入托拉斯机构的工作,希望托拉斯的首长做更多的工作和更有才干。[“令人遗憾的是,Г. И. 洛莫夫在改组以前,特别是现在一直根本没有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的概念,在他的观念里这些职能是不清楚、不明确和不肯定的。给人的印象是,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不是他的机构,而他是长期休假之后顺便来到了这里并了解新鲜事物的。你会不由得想起马克西莫夫、丘巴尔、鲁希莫维奇和托拉斯其他的领导人,他们毕竟把托拉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看见了,他们也会表扬,——Л. 卡·)。

丘巴尔:但是他们却指责我排斥非党专家。

卡冈诺维奇:“洛莫夫比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软弱。他是一个和善的、认真负责的好人,更像是一个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和旁观者,而不是手里掌握着我

们很大部分工业命脉的坚强的经济管理人员。”⁴⁷²

关于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管委会副主席列夫琴科和管委会委员格佐夫的工作他们是这样评论的：

“托拉斯管委会成员中意志最坚强的和中心的人物是列夫琴科，但是……单有意志而没有如何建设和让像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这样一个大托拉斯进行工作的知识，大概就是和可能是错误和经验的那种代价，而错误将是不会少的，但是列夫琴科的果断连同他的错误一起也比格佐夫的不清不白的卤莽行为和空洞议论要好。格佐夫是个法律工作者和空想家、知识分子，他的心思用在安插自己的人和同洛莫夫谈话上的比用在实际工作上的更多。”

有人臧：他们不应该这样评论格佐夫。

斯大林：他就是这样的人。

有人臧：他刺到了他们的痛处。

卡冈诺维奇：在这里你们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流动性的问题，碰到了把管理转托给专家的问题，碰到了以极不像话的犯罪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问题，碰到了有关这样情况的问题，即当人们从事“崇高”政治的时候，却忘记了只有在得到具体的实际行动，耐心细致、埋头苦干工作支持的情况下它才是美好的。在这里你们碰到了盲目信任的事例。

最后，枪械托拉斯⁴⁷³总工程师的供词里提供了文化水平低的最鲜明的例子。他供称：

“在机关平时的工作过程中(当着全处工程师的面)在很多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用平常的声音公开发布明显破坏性的指示和进行汇报，但大多数工作人员由于自己技术水平低不明白所听到的东西的实质……不知情的人(普通工程师，经验不足的人)很难觉察出组织的存在，因为组织成员的行动不能算作犯罪，因为表面上一切(所有指示、计算、计划)都是经过商量并由党的干部(布鲁诺、米尔扎哈诺夫、萨维茨基)签字发出的。”

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伊里奇曾经预先提醒过我们的那个问题，敌人是可以战胜的，但是如果这个敌人文化比我们高，他会从内部向我们施压，努力从内部打败我们。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我们干部的文化水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派到那里去的有文化的青年专家真的完全被窒息和扼杀了。军事工业总局的工程师米哈伊洛夫的供词说明，他们不放年轻工程师进去，而经济管理的领导人总是支持他们，至少没有反对这样做。破坏分子斯维岑在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简直是组织了一个由革命前和革命后在乌克兰工作过的老工程师构成的匪帮。这个

老工程师匪帮简直是在压制青年人,不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共产党员们什么也没做,相反,当事情涉及一个反对破坏活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共产党员工程师的时候(那时他还没把这叫作破坏活动,但他说了,这是不能容许的,这是明显荒唐的事情),当这个斯维岑破坏了工厂以后,我们的共产党员们什么也没有做并维护斯维岑,反对青年专家。总之,关于青年专家和老专家及他们的相互关系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安德烈耶夫同志交给我一些大学生的信,他们在信里写道,他们简直是在受迫害,不让青年专家发挥自己的才能。当然,许多青年人有这样一个缺点:他们想一下子成为高级首长。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必须让他们到基层这个学校去锻炼,通过这种锻炼以后再把他们推上高级职务,因为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家。

这样,在分析所有上述事例的时候,我们碰上了难题:关于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问题,关于反对盲目信任的问题,关于同纪律涣散进行斗争,让每个人感到自己的责任而不做这里所说的那些事情的问题。我们面前还摆着一个我们经济管理人员工作的合理化问题。我们经济管理人员的大量时间花费在各种会议上和把他们淹没的文件的海洋里。厂长们从各个托拉斯收到数百普特的文件,这全都需要阅读和研究。他们自己也把数十普特的文件发往各个托拉斯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切都需要翻阅或者机械地签字。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使工作制度变得合理和简化。我们已经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入手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应当这样地实际进行这一改革,别再把这件事情搞乱了。

必须全面地提出干部重新培训的问题。在干部培养方面,工业学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斯大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说:“问题在委员会里拖延了两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工业学院。”工业学院能够、应当培养和重新培训经济管理干部,以便以后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培养和重新培训在生产中被提拔担任领导工作的所有工人。工会在这项工作中应当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只有有了工会从基层提拔起来的经过培训的干部,“面向生产”的口号才能够实现。工会应当开展培养无产阶级干部的工作。在提拔工人的时候,我们不仅必须提拔成千上万的新人,而且必须要培养他们。不能容忍把工人从机床旁边提拔上来而不预先培训的情况。这种培训应当由工会工作人员进行。我应当说,甚至为了自己的经济工作,工会工作人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认真的培训,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不能处理他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最近将举行的全会上,必须十分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安排好干部的培训,必须展开工业学院及其各个分校的工作,必须展开函授教育网,保证经济管理人员的书籍,保证他们有能

够真正进行学习的条件。

经济管理人员通常提出一个理由：你们指责我们，而各种会议妨碍我们工作，工厂经常打搅我们，折腾我们，妨碍我们工作等等。当然，同志们，党应当保证经济管理领导干部必要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一长制的通知不仅提出了一长制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与生产领导有关的所有问题，关于党支部工作的问题，关于工厂工会委员会工作的问题，通知使我们能够保证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环境。困难当然会有的，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在这些困难面前却步不前。我们应当教育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再出现破坏活动，否则我们就不能用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的速度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事情涉及的不仅是重新培训的问题，而且是满足宏伟建设规模的需要问题。

我们选拔领导干部的总的情况如何呢？我必须坦率地说，我们对待这件事情是不够认真的。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个托拉斯都需要人，而不对人进行考查，只是他们有什么事情被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抓住的时候，才开始考查。那时才开始对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分析，一个人证明说，他是个好干部，另一个人证明说，他是个坏干部。应当考查厂长们、托拉斯管委会成员的工作，应当了解，我们提拔的是什么人，我们的提拔常常是根据履历表进行的。对人完全不了解，便根据履历表任命。

斯大林：有时把姓名搞错，把一个安德烈耶夫搞成另一个安德烈耶夫。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把姓名搞错。如果姓氏相同，而登记员偶然把履历表弄混了，那提拔的就会是另一个干部，而后有些认识这个人的人会说：“对不起，这可是另外一个安德烈耶夫。”人们对为自己培养干部，对选拔、分配干部不认真地对待。

人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员、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及其他的人）通常喜欢推给中央。他们说，让中央给我们人吧。我完全无意说，中央机关是没有过错的，我们会有并且也有错误。

斯大林：有时错误很大。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错误很大]⁴⁷⁴。既然有自我批评，我们也应当在这里批一批自己。

臧声：请，请。

卡冈诺维奇：缺点我们是有的，我们应当批一批自己。

伏罗希洛夫：虽然不很情愿。

茹柯夫：您批评自己的时候少。

卡冈诺维奇:茹柯夫同志,当我批评做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批评的是同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我不是作为一个主管部门的代表,而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发言,在这里我们是以党性的态度提出问题。

[斯大林:这毕竟不是组织分配部。

卡冈诺维奇:因此我想说,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包括在组织分配部里,像有人悄悄告诉我的,工作有缺点,而且很大。]⁴⁷⁵

中央机关在工作中有缺点。在任命方面我们抓得太多,可是我们没有储备、后备。需要人了一便来回奔波,常常偶然地任命一个人去工作。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问题的解决拖延好几个星期。

有人喊:一拖就是半年!

卡冈诺维奇: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为了不再发生这种情况,应当让工业本身和经济管理机关自己为自己培养干部。应当让经济管理人员,让工业自己挑选干部。党应当进行领导。中央监督,中央任命,中央批准,而我们得到的结果相反:经济管理人员没法为自己弄到人,便来找中央:请给人吧,便来找地委、州委。

有人喊:给点吧,感谢上帝!

卡冈诺维奇:我们应当对经济管理人员说:“你们在分配从国家得到的成十成百亿的卢布,你们在分配原料,你们在进行工厂的建设,因此你们必须对活的人予以关注。”然而各主管部门的分配处工作得很不好。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建设,只是现在才在物色厂长,而车里雅宾斯克建设工程的问题半年以前就决定了⁴⁷⁶。为什么不能在得知半年一年之后我们就要建设一个大厂,为什么不能在半年内就找好合适的人,为什么正是现在我们必须来物色人并匆匆忙忙任命或者拖延这件事情。这一切说明,经济管理机关应当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自己抓干部的挑选和培养。

农业领导干部的培养情况,财务干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干部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

就拿地政机关为例吧。这里的情况触目惊心。已经揭露出来,在许多区里,呆在那里的是我们公然的敌人——高尔察克分子、过去的军官等,在农业人民委员部里我们有旧有人员 22% (贵族 31 人,旧部的大官吏——30 人,过去的军官——22 人,商人身份的——13 人,僧侣身份的——24 人,各党派出身的——将近 20 人),而共产党员为 21.5%。在专区地政局的领导人中共产党员占 64%,而在共产党员中 60% 是过去的社会革命党员。然而,特别是地政事业应当主要派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去管理。在这样的成分下,地政机关里有

右倾实践是毫不奇怪的,鞑靼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正式指示里写道:

“贫农(更准确地说,二流子、懒汉),自己有劳动能力或者家里有其他劳动能力,但不同他本人一起直接参加经营工作的其他成员,而只收取地租的,可以由乡执行委员会或者村苏维埃列入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户类别。”(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1927年12月14日1461号通知,1929年10月清理农业人民委员部机关时由工农检察院发现)。

关于财务干部。我们在那里也看到严重不纯和很多漏洞。财务机关工作人员中党员成分由1926—1927年度的12.9%上升到1928—1929年度的24.7%。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干部(各自治共和国的财政人民委员及其副手,边疆区、州和专区财务处处长和副处长)中,共产党员由1926年的74.9%上升到1928年的81.7%。

在财政人民委员部里由于混进了“旧有人员”和旧官吏,队伍严重不纯。呆在那里的有消费税征收机关的旧官吏、旧税收官吏。难道旧官吏能够实行我们无产阶级的税收政策?你们知道,在清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时候,在那里发现了不少顽固分子、旧有人员。

财政人民委员部在培养自己的干部方面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再看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国内贸易部分大都由过去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构成,相当大部分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转入了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那里重新建立了干部队伍,但是这里的情况仍然不妙,在这里你们也看到过去的股东们在领导经理部。在那里你们看到一些与委办之事毫无共同点的人,这些人在领导着一些大处。如果在各种管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助理中共产党员占70%,那么在高级专家中占26.9%,在顾问中占38.5%。旧有人员(贵族、商人等)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里共计有61人。

驻外干部问题特别尖锐。罗伊津曼和莫罗兹同志将在这里发言并讲述国外在发生什么事情。请允许我举一件事情。原来,毛皮这个重要出口项目全部落在了敌人手里。驻伦敦的毛皮出口领导人扎克斯背叛了我们⁴⁷⁷,投到了我们的订约人一方并在那里当上了我国毛皮的顾问。在巴黎博伊佐夫也背叛了我们,也投到了我们的敌人一边⁴⁷⁸。

米高扬:在莱比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卡冈诺维奇:是的,莱比锡的克莱因伯格也叛变了⁴⁷⁹。整个毛皮这个出口大项掌握在背叛了我们的敌人手里。我们这里别谢多夫斯基不少,令人遗憾。

你们再看曾经在德国领导我们电影事业的采列尔,他是怎样与我们的敌人

签订了合同,然后带着150万马克溜了,投到我们的敌人方面去了。

米高扬:不仅是他,还有一个共产党员⁴⁸⁰。

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得对,我们必须对派遣出国的共产党员进行仔细的审查。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培养青年,培养我们的人,而为此就要学习语言。在德国人们学习西班牙语,因为德国人把自己的扩张推行到了那里。

有人喊:南美洲讲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学习西班牙语。

卡冈诺维奇:南美洲和西班牙都讲西班牙语。我们这里不学习语言,我们的青年不适应这一点。

有人喊:对!

卡冈诺维奇:所有这些事实迫使我们提出整个国民经济的干部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工业干部,特别是重工业干部的问题淹没在这个总的提法里。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到工业干部、重工业干部的问题上。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人,自己的干部——农业、财务和贸易方面的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我们已经摸索出了培养和重新培训领导干部的一种形式。如果为了培养无产阶级专家我们有高等技术学校,那么为了培养领导干部我们有学院。在工业方面我们有工业学院。还应当加上它的若干专业分校:巴库的石油分校、顿巴斯的矿业分校等。我们还必须建立培养农业、贸易领导干部的学院。我们必须为我们已在工作并有实践经验,但知识不足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建立这样的学院。

培养领导干部、重新培训现有干部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不亚于技术干部问题。我们必须对现有干部进行重新培训,我们必须培养新的干部,因为工业在发展,每一个新工厂的建设都提出需要领导工厂的组织者、无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培养、重新培训领导干部的形式——工业学院、培训班大力扩大,必须在地方上建立若干分校,进行某些生产部门专业教育:巴库的石油专业、顿巴斯的采矿专业等。我们也必须为农业、贸易方面的领导干部建立一个学院并与这个学院同时建立完整的培养和重新培训学习班的网络。我们必须把经济领导工作的任命与从基层提拔工人和对他们的培训联系起来;我们必须顺便对提拔制度本身实行根本改进。运动式的突击提拔,因而常常就如石臼捣水一样徒劳无益的提拔,不会留下任何成果的提拔,应当废弃,而代之以对在生产会议上,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在工会工作中,在妇女代表会议上表现好的优秀无产者进行经常的选拔,进行培养并从这些后备人员中一个一个地挑选到一定的具体工作岗位上。而且这种挑选和提拔不应带有外部强加的性质,

而应当是经济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亲自从这些后备人员中为自己挑选人才并有义务把工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担任领导工作。这完全与工人群众的巨大生产热情结合在一起;工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壮阔浪潮一定会促进干部问题的顺利解决。而且这里的关键角色之一是工会,党决非偶然地把它定位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必须把一切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组织的努力集中和动员起来,必须使工会组织的积极性与经济领导机关的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汇入统一的洪流,必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程。而这一点只有和主要在干部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我们已经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干部问题作为从熟练工人、工长、技术员到工程师的各个环节干部的问题,已经充分地提到我们面前。一个环节应当拉动另一个环节。在解决国民经济干部问题的时候,并在这一范围内突出注意重点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我们将逐步地解决苏维埃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部门,不仅经济部门,而且还有文化、管理等部门的整个干部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期,工程师、技术员、生产的指挥员不是由专门训练剥削雇佣劳动的剥削者阶级中产生,而是由无产者自己、劳动者自己的阶级中产生。因此我们必须把工程师、技术员的培养与熟练工人的培养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使高等学校越来越接近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作为试验开办独特的学校——企业,它们应当就在工厂里培养从熟练工人到工程师的干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努力做到,让每一个设备不错的企业,每一个新的国营农场都成为培养我们联系生产、联系无产者及其思想、日常生活、文化的指挥人员的学校。这将意味着手工业方式的终结,意味着利用无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强大的杠杆,把科学、技术、工业、国家政权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根本的问题,最困难的问题。

顺便指出,我们的敌人也开始明白这一点。不久前《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写道,科学、国家和工业的结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苏维埃制度下,科学、国家和工业的一体化,——他写道,——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完全可能,20年以后(这是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这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很多部分只有一个骨架,但我觉得,那里面有思想。”

斯大林:我们使他们感到恐惧了。这很好!

卡冈诺维奇(朗读):

“如果这个思想将顺利实现,那么,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不特别愉快地看到具有一亿多人口的用科学发展和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情景。”(笑声)

斯大林:悟到了,悟到了!

卡冈诺维奇:《曼彻斯特卫报》作出这样的结论:

“鉴于这些考虑,精心培育同苏俄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请看承认来自何方,却不是来自麦克唐纳的自由派和平主义谈话。我们的力量迫使别人承认我们,因为人家将不会特别愉快地得知,将有1亿武装起来的人民……

有人喊:两亿。

卡冈诺维奇:用武器,用知识,用科学武装起来的人民。

但是,为了实现这种一体化,我们大家必须把科学和技术与政治,与我们的阶级政治联系起来并且懂得,掌握科学的问题、培养新专家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大的政治问题、阶级问题。

干部问题不是行政机关的问题。当前突出强调这个问题是与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政策,与我们在根除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最快速度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文化方面,在干部方面资本主义的根子特别强大,因为过去技术知识为有产阶级所垄断。

干部问题就本身而言是组织问题。但是,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没有政治之外的组织问题。我们始终把我们的组织工作、我们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任务同基本政治路线,同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阶级路线联系在一起。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各个阶段,对于不同的组织,重视干部问题始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特点。当然,任何历史的类比都是相对的。就拿职业革命家问题来说吧,列宁在我们党建立的初期就突出强调这个问题,反对孟什维克。列宁把培养我们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者和建设者、始终不渝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逐步培养工人的任务与基本任务与实际的,而不是虚假的、口头上的革命斗争任务联系在一起。如果再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另一个转折时期——十月革命前的日子,你们就会看到,反对我们自己队伍里那些说工人阶级不能胜任管理国家任务的孟什维克分子、新生活派分子和半孟什维克分子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理由之一就是列宁的理由:苏维埃会给我们千百万新苏维埃国家新的建设者干部。在这里列宁也把干部问题与自己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政治方针联系在一起。

我们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方法给予了坚决的反击。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方法也是与它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其反党斗争的一定阶段上用命令主义代替政策,因为它不相信我们党的政策,它不相信无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能够率领最广大的千百万农民群众前进。它过去和现在都用小资产阶级的左的词句掩盖这种孟什维克的缺乏信心。因此,在机关命令主义原则遭到失败以后,它便以其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变化无常迅速从夸大机关方法和命令主义思想转向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机关的思想,转向使无产阶级与国家对立的思想。托洛茨基不懂得,机关是政策的服务职能,政策正确的时候,机关、干部、组织就是强有力的。正是因为有正确的政策,我们的党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并正确地确定了政策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把政策与正确组织群众、正确组织我们的国家管理机关结合起来。

目前时期强调注意国民经济的干部问题,首先是工业干部的问题,是由我们的总政治路线决定的。这是由党提出的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快速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由对国内力量的阶级对比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过程的正确理解决定的。

决非偶然的是,右倾分子的领导人不懂得这条总路线,把自己的政策,乌龟速度政策,抹煞阶级斗争的政策与之对立起来,这些同志不懂得干部问题的尖锐性,抹煞干部问题,企图用必须使用旧专家的完全无可争议的道理掩盖自己的这种右倾立场,就像他们企图用联合中农为借口掩盖自己反对集体农庄、反对向富农进攻的意见。

如果李可夫同志公开和直接发言反对培养新干部,那么,布哈林同志虽然同意培养新干部的任务,却是按自己的方式,即不是以列宁的方式提出这一任务。我提请你们注意布哈林同志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会的《关于改组工业和科学技术局管理体制的提纲》。我不来详细地谈布哈林同志在那里犯的一般性的错误了。但在这份提纲里在关于科研工作任务、关于工业改组和干部培养问题的提法上,布哈林同志犯了一系列错误。只要向你们指出以下的情况就够了:布哈林同志在自己关于干部和科研工作的整个提纲里只字未提我们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学者中间的阶级分化。在谈新干部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只字未提专家干部中的破坏活动,没有在使用旧专家的同时指出他们中间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和思想上与理论上进攻的必然性。顺便指出,布哈林同志一直使用“苏维埃专家”这一术语。但是他不会不知道,这现在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现在问题涉及的不单是“苏维埃”专家,问题涉及的是把工人变成专家。我就不谈对社会主义革命当前时期总的分析中的错误了,布哈林同志在那里宣称,“改造时期,这是社会革命正在经历的技术革命阶段,这个阶段伴随着旧的关系的摧毁”。顺便指出,这就是布哈林同志错误的根源之一,他对日前时期不是从社会

阶级观点,而且从技术观点进行观察,干部问题也是从技术观点提出,而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技术改造,而是与技术革命同时根本摧毁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任务,而不是相反。在干部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也不单是增加干部数量的任务,我们所面临的是培养忠于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干部的社会阶级任务。

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时期,垂死的资本主义成分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残酷斗争的时期,党坚定实行快速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政策,我们必须在组织任务方面跟上国家发展迅速前进的过程,在组织上加强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党对右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他们在这次全会上的随机应变的企图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路线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松懈,使它变成一锅素食稀粥。党已经证明了并将证明,这是办不到的。党正在顺利地解决重大的政策问题、工业化问题、重工业发展问题、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解决干部问题,“干部问题却还待解决。而在目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干部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⁴⁸¹。

党必须做到也一定会做到以造就自己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以列宁的方式从组织上加强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

喊声:对!对!

鲁祖塔克:同志们,我就全会的工作程序发言。我认为,我们应当明天结束全会。

喊声:对!

鲁祖塔克:而为了明天结束全会,我们今天就得结束干部问题。

有人喊:有点困难,这做不到。

鲁祖塔克:如果做不到,我们明天就不可能结束全会,因为,显然明天得召开各个委员会的会议,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让我们来决定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明天结束全会?

有人喊:可以在休息时间。

鲁祖塔克:可以在休息时间加加班,明天晚上结束。可以这样做:明天两点钟以前我们结束干部问题,宣布2—7点钟休息,在这段时间里各委员会结束工作,而在晚间会议上可以结束全会。

如果把每一个人就干部问题发言时间真正限制在十分钟以内,那今天就可以有20位同志发言。我建议真的把发言时间规定为十分钟,任何人都不得超过

十分钟。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结束总结发言,总结发言不会很长:最多25分钟。所以我请求允许我重新安排发言人名单。让我们执行这样的方针:给每个发言者十分钟,这样就可以有15—20个人发言。

我现在提付表决。谁赞成今天结束这个问题?谁反对?少数。这就是说,明天5点钟以前结束全会。现在请罗伊津曼同志发言。十分钟。

罗伊津曼:太少。(笑声)

主席:现在请罗伊津曼同志发言。

罗伊津曼:我想谈谈我们苏联驻外机构⁴⁸²的干部问题。如果在苏联国内,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监督下,我们有一系列的破坏事件,当阶级敌人钻入我们的机关,进行腐蚀,当苏联国内我们有一系列的共产党员腐化的事件:最近几天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就逮捕了1904年入党的党员奥尔洛夫、萨维茨基等,——那么,国外的情况就更糟糕得多。在脱离党的环境下,利用国外工作的特殊条件,阶级敌人——资本家和白俄流亡者的行动就更坚决得多,用各种办法对我们的机构进行腐蚀。只要有可能,就用贿赂收买,只要有可能,就直接破坏——敌人在使用一切办法。应当说,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员委员部对这个机关的清理采取了许多措施。1927年我们清除了260人,但是绝对不能说,这些措施使情况有了根本改变,相反,应当公开承认,实际上我们至今一直在用手工业方式行事。目前,国外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而我们相应干部的培养跟不上。领导我们机关的是党员领导干部,但如常言所说,人是跳不过自己头顶的。事业发展得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掌握不了我们所进行的庞大的业务。这一切使我们的驻外机构处于可悲的状态。我并没有把问题尖锐化,我只是说现有的情况。当然,指责整个驻外机构,说它是卖国的,那就不对了。那里有共产党员,有好的经济管理人员,也有好的非党工作人员,但要知道,就是在苏联国内,在那些有过破坏活动的单位里,在国营机器制造厂联合总公司里,在顿涅茨克国营煤炭托拉斯等里面也有好的共产党员,但是发生了破坏活动。

我来列举一些数字,今年有多少被揭露犯有背叛、受贿等各种过失的我们的职员拒绝返回苏联,他们到外国公司工作并和白俄流亡者一道反对我们。

今年拒绝返回苏联的共有72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主任、特派员、经理23人——占32%,进口处的工程师和专家15人——占21%,出口处的专家9人——占12%,顾问5人——占7%,账务工作人员11人——占16%,打字员、办事员等9人。这只是1928—1929年度10个国家的情况。在不同国者中间有10名党员⁴⁸³。

你们知道,我不久前去过法国。在那里,在商务代表、全权代表、支部和工会基层委员会完全同意下,对商务代表处人员进行检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出开除 241 中的 84 人,即全体人员的 33%⁴⁸⁴。如果看一看各个业务处的机构,得到的将是最令人不快的情景。

领导贸易额 1 500 万卢布的纺织品进口处的,是在国外待了三年多的一个非党工作人员。处里只有一名工程师——扬波利斯基,他实际工龄很短,从 1911 年起一直住在国外,从未到过苏联,不了解我们的经济。这个处里原来还有一个工程师——扎洛金,被揭露受贿并拒绝回苏联。

其他处的情况也并不更好。全部主要领导干部是在当地在国外待过 10—11 年的人中间,在过去的流亡者等中间招募的。

如果再看贸易额 1 000 万卢布的综合进口处,那么,领导这个处的是 1918 年入党的党员,过去的社会革命党员,也在国外待了已经五年了。实际领导全部采购的主任工程师的职务,由非党工程师斯拉夫斯基担任,他从 1915 年起就住在国外。代理人是一个名叫扎尔尼茨基的,是过去的孟什维克,从 1911 年起就在国外。

如果看一看工程处,负责完成军事部门订货的机密处,那么,那里的全部业务由一名非党工程师进行,他从 1914 年起就住在国外和不值得信任。

在执行采购设备复杂任务的技术进口处里,只有两名在当地招收的工程师——一个是从前的军官,另一个是过去的孟什维克。在搞进口工作的 19 名工程师中,14 个人完全是异己分子,而这是在巴黎所有流亡者围着商务代表处转、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与这些流亡者在家庭气氛中会见和他们受《最后新闻报》⁴⁸⁵等教育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看一看出口处及其现在实际上提供至少 50% 全部出口收益的木材料,那么,待在那里多年的是一个叫施特龙贝格的人……已经让我看表了。

主席:只剩下两分钟了。

罗伊津曼:这是一个非党专家,他收受贿赂,利用各种伪造和虚假情报只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专营合同,以对苏联不利和亏损的条件把我们的全部木材出卖给它。担任木材处顾问的是在国外住了 15 年多的捷列利包姆。

领导食品处的是在国外住了将近七年的一个非党工作人员,在他之前掌管这个处的是某个韦尔尼克,据商务代表处的资料,他收受贿赂,把全部工作通过一家公司进行,最后逃跑了,到那家公司效力去了。商品按公开账户低价赊销给这家公司,没有办任何手续。结果,这家公司的欠款一直在增加,已经达到了 26

万美元,而没有任何东西作担保。

简单说说我们受监督的单位。

在苏联商船队的一个分支机构里看到的是完全不能允许的状况,90%的工作人员是在当地招收的我们的异己分子,其中多数人一次都没到过苏联,如果他们持有苏联护照,那只是为了到苏联机构里找个工作。除了两位领导人和一名外省的代理人,整个机构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出口机构里,除了不久前到来的一个领导人,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没到过苏联的非党人士,全是在当地招募的。纺织品销售部主任是过去的伯爵、沙皇大使馆武官伊格纳季耶夫的妻子;按职业说,她是舞蹈演员,没有国籍⁴⁸⁶。

关于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简单说几句。待在这里的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柳比莫夫同志,我谈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不是没有用意的。我希望,他能在中央全会上申明,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国外分支机构的不成体统的状况还将继续多久。是谁在领导工农合作社巴黎办事处和谁在那里工作?请看我们的决定:

“会议一致满怀强烈义愤地指出,工农合作社驻国外的一个重要站点在进行商业工作的同时还有相当多的政治社会工作,多年来一直由一个非党工作人员,过去的孟什维克波波夫领导。而且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对自己驻外机构的这种马虎态度,对严肃、重要事情的这种麻木不仁漫不经心近似于犯罪。会议注意到,这个问题曾经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些回过国的代表提出过。但是在各种窃窃交谈的掩盖下这个问题的解决被千方百计地拖延下来,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整个机构里没有一名从苏联派出的人员。这就是我们工农合作社的命运托付给这样一个以过去的孟什维克波波夫为首的机构的原因。

我是可以谈谈我们驻外机构的许多情况的。就拿毛皮业务来说吧,我们在这方面看到了不能允许的现象:在巴黎,得到信任的拜京与一些投机公司有联系并收受它们的贿赂,多年来一直以低价出售毛皮;在德国,毛皮部主任扎伊登伯格是党员,他腐化堕落了,被指控与外国公司勾结,他的专家克莱因伯格和布拉金被揭露受贿,拒绝去苏联;在伦敦,毛皮部主任扎克斯逃跑了。这一切提醒我们,我们毛皮销售业务的情况十分不顺利,而毛皮的出口每年超过1.2亿卢布。我也可以谈谈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化工产品进口处,据该处主任本人的报告,处里“不可替代的专家”在许多情况下原来不是专家,处里假专家风行。然而主席在

催我,因此请允许我就此结束发言。

主席:现在请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波克罗夫斯基:我一开始就必须请求增加一些时间,因为我得谈两个问题。第一,得谈关于培养科学接班人。我担心,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会谈这个问题,然而卡冈诺维奇同志引用的那些资料很值得注意,但是,如你们自己所看到的,它们是笼统的、简短的,没有描绘出我们科学干部培养状况的清晰情景。谈这个题目我将最多占用十分钟。此外,关于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准备进行的那个手术,即今后取消它的高等技术教育和高等农业教育的部分,我也必须说几句。关于这一点也得谈五分钟。因此我请求给我15分钟。

主席:我不能给您,我必须提付表决。

波克罗夫斯基:你们会看到,听我讲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关于我们科学干部的问题在这里只是从技术和农业干部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你们很容易就会悟到,这是关于我们四分之三科学干部的问题,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话,因为没有一所高等技术学校不讲授物理学、数学和化学,也没有一所农业学校不讲授生物学和地质学。可见,所有这些学科都在为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农业服务,而这占大约四分之三。首先,请允许我提请你们注意,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非常老化了。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老化,即这些人当然不属于1917年十月革命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的那个阶级,而且他们真的在身体上老了。我们各工业技术学科将近三分之一——29%的科学理论家都50岁以上了。请允许我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说,科学家过了50岁通常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他只有50岁以前在前进。50岁以后,科学家靠自己积累的资本在生活并变成非常会精打细算和吝啬的资本占有者,他原则上反对任何变化,因为随着这些变化,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教学方法方面,他便会失去一部分积累的资本,而他已经那么老了,不可能再去积累。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科学家本质上都是保守主义者,不论……

卡冈诺维奇:反正得把波克罗夫斯基从教授中除去。

波克罗夫斯基:怎样除去,为什么?

卡冈诺维奇:您说,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科学家都是保守主义者,可我说:除了波克罗夫斯基之外。(笑声)

波克罗夫斯基:第一,梁赞诺夫很久以前就确诊,我患有左派老年病。(笑声)第二,不管怎样加给我教授的称号,甚至加给我院士的称号,但我希望,你们会明白,无论学院意义上的教授还是学院意义上的院士我都不可能是。我天生

是个特种类别的科学工作者。在这种类别的科学工作者中我可以援引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伟大先驱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位大学者,但是他什么时候钻进过学院的框框里?请原谅,我把自己同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相比,但无论如何我是一个特种类别的科学工作者。此外,我在这段时间里所贡献的最好的东西,当然是我在50岁以前贡献的。因此这对我也是适用的。

也许,鲁祖塔克同志不会把这算我的时间吧?

主席:不会,不会。

波克罗夫斯基:我们的工业技术干部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50岁以上的科学工作者,在既同工业又同农业紧密相关的实用经济学方面,50岁以上的科学工作者超过40%。因此,我们科学干部的年轻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需要尽快地加以解决。

在这里提供了一些数字。指出了,在按专业分配方面这种年轻化进行得简直是滑稽而又可笑,因为好像我们正在培养的艺术家比工业家多得多。在这里我必须作一点小小的纠正。卡冈诺维奇同志掌握的是另一些资料,而我掌握的资料是这样的。根据最后一年的资料,我们招收了工业技术方面的研究生23名,农业方面的——45名,物理数学方面的——34名,高等艺术院校——总共只有4名。

有人喊:问题不是关于研究生。

波克罗夫斯基:如果我们拿1929年11月6日,即昨天的研究生的构成来看,我们得到的将是工业技术——94人,农业——202人,物理数学——136人,教育人民委员部共计——432人,加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的210人,总计642人,而艺术研究生——60人。这只占10%,甚至更少一些。这个比例是否那么可怕,我表示怀疑,我们有剧院、俱乐部、博物馆、广播电台、电影院,一定的理论基础对于它们是必须要有的。

卡冈诺维奇:我不反对电影院和广播电台。

波克罗夫斯基: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降低培养艺术工作专家的比例。所以,这方面的情况不像卡冈诺维奇同志描绘的那样可笑。虽然我必须同意,这样的比例:94名技术研究生比60名艺术研究生——这只不过是计算错误;当然,比例大致应当这样:200技术研究生比40艺术研究生。

这些研究生的质量成分的情况更差。首先,应当说,研究生党员成分的状况比我们想的更好。我们全联盟所有科学研究所,除了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⁴⁸⁷以外,党员、预备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方面第一次达到了这种相当高

的情况。我不说社会科学研究所：那里我们有90%的共产党员，而在我们所有高等学校和研究所里我们达到了43.3%。这是一个不坏的比例！至于社会成分，工人成分，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就差得多，工人成分波动很大，上一次招生的情况是，工人占全体学生的19%，而今年招生的情况是，工人为12.7%。这是全会需要千方百计注意的一个问题。实现我们研究生的工人化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着手实行工人化的时候，来源本身突然枯竭。我们从1925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人们向我们蜂拥而来，但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100%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当时是我在领导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对社会成分和按阶级原则挑选注意不够。他们不仅是向我们走来，而是像鱼儿一样成群地涌来。现在我们有800个名额，报名的一共只有560人。（主席摇铃）

有人喊：应当再给他五分钟。

伏罗希洛夫：让我们再给他五分钟。

主席：把波克罗夫斯基同志作为唯一的例外，再给他五分钟，没有异议吧？

喊声：给！

波克罗夫斯基：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学生中，按阶级原则录取的现在的和过去的工人速成班学生中没有能够成为科学家的有才华的男女青年。这证明了另一件事情，这证明，我们的教授们看到我们按照阶级原则选拔科学工作者，对提拔科学工作者便失去了任何兴趣。当教授们看到他们不能推荐地主的女儿和商人的儿子以后，他们便不再推荐任何人，而负责这件事情的机关表现得比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研究生委员会更加消极。对此应当予以注意。

其次，请允许我再说一点。这就是我们进行培养的教学方法完全不适合于工人。工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他不是从书本、从言词出发，而是从事物本身出发进行思维。然而我们科学家的培养带有非常可怕的经院性质，把一大堆不需要的材料压到他们身上。我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培养的头一年给一个被推荐者指定了1500页书。请想象一下，这件事会在他的头脑里产生怎样的结果，他的头脑里成了一锅粥。我们到处，甚至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都是这种经院习气，把无数页的书压在学生身上。

第一个实际的建议就是，我们必须从利用工人这个十分宝贵特点的角度认真制订研究生的培养方法和同时制订我们一般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工人这个十分宝贵的特点就是，他不从书本、不从言词，而从实在的事实出发并且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读书磨破40条裤子。我认为他的这种能力不是缺点，而完全是优

点。关于研究生我就谈到这里。

请允许我对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提纲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那一部分就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如下：仍然打算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拿走高等农业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我原则上将不在你们面前展开谈这个问题。它已经在两次全会——七月全会和1928年四月全会上讨论过并很好地解决了。但是请你们注意，国家的工业化和整个农业的机械化要求我们所有普通教育学校的工业化和我们所有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的农艺化。请问，没有以我们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为代表的任何科学基础，我们将如何做这件事情？因此，也许完全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这一切接近用户和应当真正让主管部门有可能自己培养专家。但是，如果你们把这个基础从教育人民委员部砍去，它将变成一个培养完全不需要的语文工作者的主管部门，因为它将没有任何办综合技术学校的基础。这是一。第二，如果将保留教育人民委员部对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那些高等学校的监督，而这种监督会保留的，那么，这种监督，应当在这里指出，将完全是纸上谈兵，特别是如果它将通过现在那些形式实行的话。如果你们希望，对高等学校工作的教学方法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监督真的集中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里，以便这种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不被打断和我们不用去追赶十几个中心（呆在那里的还将长期不是我们的人），那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权力的中心，哪怕它将是跨部门的，只要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参加，我倒认为，只要由教育人民委员部主持就行，但得要是一个权力机关，它有权纠正在高等学校如此分散到各主管部门的情况下无疑会出现的那些教学法方面和思想方面的失误。

主席：现在请梅日劳克同志发言。

梅日劳克：工业现在所面临的的任务的特点是，我们可以非常坚决地转向在工业中采用全新的技术和新的组织原则，这些任务要求以新的态度对待干部。

卡冈诺维奇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培养干部的任务只是现在才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提到它的面前。下级工业组织还完全不明白，还没有清楚地感到这一点。原因是，每一个组织都认为，我们的国家有某种干部储备，可以向什么地方去要并且会得到他们。不久前，为提高乌拉尔工业问题来到这里的乌拉尔代表团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振兴乌拉尔，他们立即就需要1300名工程师。这种提问题的方法证明，人们完全不明白国家的处境。可以提出请求帮助培养和再造就1300名工程师的问题，但要从什么地方抢来或者弄来，是不可能的。现在工业中正在发生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情况就是现在就转向建设这样的企业，借助于这些企业我们开始真正“追赶”资本主义世界并

“超过”它。如果采取布哈林同志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那么,这当然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但是如果采取资本主义世界里现在业已形成的那些实际关系的观点,那么这就再清楚不过了。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这样好的例证,就像在组织自己的资本主义方面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所具有的。福特工厂 29 年期间一直靠生产一种型号的汽车维持,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建造最好最廉价汽车的办法进行竞争,现在在竞争的影响下,在需要适应不断缩小并且是灾难性缩小的市场的影响下,他不得不改为生产两种型号的汽车。福特说,他必须在一个工厂里生产两种型号的汽车,虽然这会使工厂的情况恶化,使得没有可能充分地利用工厂的技术。但是,在转向生产新型号汽车的情况下,这却使得有可能部分地在他的企业的一种机床上进行工作。竞争迫使他这样做。鲍尔文机车厂(Болдвин локомотив воркс)预计建造 2 400 台蒸汽机车作为它所采用的最新设备的最佳经济方案,但它的负荷率仅勉强达到 15%—20%,因为这种生产能力与市场策略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政治局决定在乌拉尔建设一个年产 5 万台 50 马力拖拉机的工厂⁴⁸⁸。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 1928 年美国生产了 1.9 万台 25 马力的拖拉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乌拉尔建设一个超过 1928 年美国全部产量四倍的工厂。我们这里存在的对工厂最高生产能力的限制与美国所存在的完全不同。在美国,市场限制技术。技术的手脚被束缚住了,因为市场逼迫技术迅速应变,很容易地从一种型号改变为另一种型号,这使得大批量生产的新技术的全部主要优势失去价值。三位反对派的同志在这里谈了市场关系的发展,在我国随着市场关系开始转入新的形式,在对市场不断加强的调节的情况下,我们的干部面临一项任务:不是简单地移植外国技术,而是自觉地以改进了的形态拿过来,以便消除资本主义特殊条件加之于技术的一切限制。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决定:建设一座年产 5 万台 50 马力拖拉机和 5 万台 30 马力拖拉机的工厂,或者在技术上比美国的更为先进的工厂。

这就需要全新的干部和以新的态度对待干部。不仅破坏分子必须彻底消除干净,而且对那些不理解我们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特殊任务的消极的专家也必须撤换。[除了这种破坏活动之外,你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机关是怎样工作的。有一个人呆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我们猜想,在这个地段上战线封闭了。而当我们赶走了这些破坏分子以后,结果这里发现了最尖锐的问题,这向我们表明,由于机关的无所作为和没有作为的能力,在受到有意破坏活动的同时我们遭受了十分巨大的损失。]⁴⁸⁹

对于所有墨守成规进行工作,实际上向我们掩盖工业管理中最尖锐问题的人,应当加以撤换。破坏活动决定了黑色冶金业和船舶制造业不相称的低速度,从工厂到金属工业总局的一连串隐蔽的破坏活动和怠工使我们没有可能彻底改变这件事情。

安采洛维奇:不要对资产阶级专家采取宽容的态度。

梅日劳克:不是在宽容的情况下,而是在所有经济组织,有时还有出于地方利益支持他们的地方党组织最激烈地和团结一致地反对我们的情况下,例如斯大林工厂⁴⁹⁰2号高炉事件。

在整个破坏活动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情景:我们看到的不是在社会主义工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应当有和可能有的那种广泛和迅速的发展,而是缓慢的速度和完不成计划。例如,索尔莫沃工厂⁴⁹¹,内河船舶制造和双柱式机床安装了三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然而,正在被国外细心而又惶恐不安研究的我们计划的宏伟甚至使美国人感到压抑,他们在《商业周刊》杂志上写道:“彼得大帝建造了旧彼得堡,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苏联计划委员会的如此宏大的在统计学上令人感到压抑的计划。”⁴⁹²任务的这种伟大性就决定了我们对待干部和干部培养方法问题的态度。

主席:现在请米哈伊洛夫同志发言。

梅日劳克:我还想请求再给我5分钟时间谈谈连续实习问题、专家干部问题。

如果我不能够完整地陈述我们的建议,那就请求你们办一件主要的事情——把高等技术学校彻底移交给我们。如果你们希望连续生产实习产生应有的结果,就应当这样使它同生产结合起来,使大学生在工厂里是工人,在大学里是学生。只要从一个中心对工业和高等技术学校进行领导,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主席:现在请米哈伊洛夫同志发言。

米哈伊洛夫(列宁格勒):今天,经济管理干部的问题十分认真地提了出来。我回想起了斯大林同志到我们列宁格勒来的情景⁴⁹³,他在党的州委会会议上提出了工业干部的问题并指出,我们已经有了指挥官,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工业方面要有自己的将军。我们原以为,相当大部分的人会在这个工业学院里学到很多东西。

有人喊:在知识方面?

米哈伊洛夫:关于将军的想法是属于斯大林同志的,请问他去吧。我认为,

有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将军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事情。

有人喊：在好的意义上。

米哈伊洛夫：是的，是在好的意义上。实际上一切却不像我们很多人期待的那样。

伏罗希洛夫：得到的是士官，而不是将军。

米哈伊洛夫：招收到工业学院的毕竟不是需要在理论上进修的最熟练的有实践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而进入学院的是刚起步的经济管理人员——厂长助理、数量很少的一些厂长和工厂委员会推荐的一些人选等。

我们原以为，恰巧是最熟练的有实践经验的上层——工人、经济管理人员应当首先进行理论培训。据说，工业学院似乎满足不了这类经济管理人员的需要。令人遗憾的是，我过去没有进入工业学院的荣幸，所以不能肯定地这样说，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不能让我们中的许多人离职三年，那么至少让30名最优秀的干部离开工作半年是可能的。

伏罗希洛夫：不是半年，至少一年。

米哈伊洛夫：那就更好了。当然是可能的，军人同志也在这样做，而我们工业界的人却不这样做。无论你们给我们开办多少函授班，但是一个厂长晚上9点才回家，比如说，普梯洛夫工厂的厂长，他整个人已精疲力竭，勉强能看看报纸，他当然已经顾不上函授班。因此应当让他们完全脱产至少半年，让他自由地思考思考，环顾一下四周，进行一下总结，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学会读书。这就是所需要的，而且这所学校应当是完全特殊的。需要有业务水平最高的党和非党的教学人员。用这半年时间可以大致地学到科技成就中的一些东西。为什么经济管理人员不在这段时间里读一读，不是顺便浏览，而是研究，比如说，工业地理，学习半年英语，研究五年计划呢。要知道，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使之系统化。为了得到30名经过培训的经济管理人员，让他们能够自己内行地、文明地、正确地进行工作并在自己的周围造就一批学生，花点钱是值得的。

斯大林：对！

伏罗希洛夫：这绝对正确。

米哈伊洛夫：其次，我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曾经和古比雪夫同志谈过，为了经常地吸取最新技术成就，我们的食粮不足。不是总能到国外去，这花钱多而又困难。在我们的各个托拉斯、工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都有合理化处；我们订购外国书籍，但我们几乎读不了它们，翻译困难。为什么不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一个由高级工程师组成的小组，每月搞一份系统的最新成就

综合报告,分别按照工业部门发给我们经济管理人员?这对于我们像空气一样需要。我们有卡片索引,上面说,英国一本杂志上有过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谢谢这个建议,这对工程师非常好。但是,难道我们能够订购这些杂志并反复阅读它们?每一次都翻译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需要有卡片索引,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部门从中汲取一切最新的成就。这是一定要向中央关于干部和学校的提纲提出的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问题,是派遣我们的专家出国的问题。实践常常与我们的愿望不一致。应当说,如果过去,四年以前我在国外的時候,人家放我们到工厂里去,我们可以转上一个星期,那么,现在在最好的情况下放你进去一天,两天就够多了,而且一两天时间是学不到多少东西的。我们的工程师们抱怨,在研究国外工厂的生产方面我们的工程师得不到商务代表处的应有的帮助。我们需要米高扬同志使我们的商务代表处确信,他们应当竭尽全力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派往国外的同志以最大的帮助。同时应当指出,如果我们把工程师派到国外,但没有技术帮助合同,那么,他们的学习会很困难并且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需要我们的商务代表处在签订这种或那种订货合同的时候,照例一定要附加上我们派人前去学习的权利。这一点做得太少太少了。而最主要的是,实践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签订了技术帮助合同,我们的工程师在国外的学习会容易得多。上一次我出国的时候,我们带回了三个合同:水轮机、汽轮机和柴油机。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合同,是我们的专家在国外学习的最好办法。

其次,再谈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有人问我们:你们派往国外的人为什么那么少?第一,我们派出的并不那么少。第二,当你来请求批准的时候,便说:没有外汇,又是这,又是那,派遣便耽搁下来。在派遣委员会里设置了那样的障碍,进行了那样的阻挠,简直要喊救命。应当说:如果信任米哈伊洛夫,就应当把成千上万的事情交给他去办,对不起,即使他会犯错误,100名工程师里跑掉一个。我们教出的人数量越多,我们获得的成绩就越大。让我们有可能减少那些障碍和简化我们现有的派遣出国人员的批准手续吧。我把这个问题尖锐地向中央提出来。

关于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出国的问题。我认为,应当更经常地派他们出国,应当十分认真地安排这些出差。应当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许还有党的州委会不要这样派经济管理人员出国;他独自一人就出国去了,一种外语都不懂,不带翻译,在国外的马路上闲逛或者观看大楼的屋顶。这不是回事。在派遣一个经济管理人员出国的时候,要责成他带两三名优秀的搞合理化的工程师:一名

搞行政管理的,另一名搞技术的,让他在那里呆上四五个月,让他和他们一起好好地研究情况。在这之后,要求他拿出成果——具体的实际措施来。

你去了一趟国外,那就让我们看看,你的出国之行给了你什么。

这里提出了工程师问题。提得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将贯彻执行。工人问题也在同等程度上存在。我认为,如果把一名毕业于学校的工程师与一名熟练工人相比,那么,这名熟练工人更宝贵。

有人喊:对!

米哈伊洛夫:从我们的熟练工人中间我们可以相当大量地吸收我们的中层生产干部……

有人喊:对!

米哈伊洛夫:即工长和中层生产领导干部。我们将在斯大林格勒建设一个拖拉机厂,我们将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一个拖拉机厂,我惶惶不安地想,在为这些工厂配备工人方面,特别是在配备受过训练的机床工和高级熟练工人方面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需要考虑这一点,现在就要开始大声疾呼。需要立即为这些工厂开办三四所培养机床工的好学校,每一所学校能为我们提供至少1 500—2 000人。而为了我们将要建设的所有工厂,至少需要开办15—20所这样的学校。

有人喊:对!

米哈伊洛夫:我认为,现在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提出工厂技校的问题。我们的工业将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机器和自动化机器的基础之上。这是由熟练劳动力使用的合理化和技术的高级程度决定的。我们需要三四个月就能培训出来的机床工。我们需要加速培养受过训练的工人。

有人喊:对!

米哈伊洛夫:我们需要迅速培养出数万名工人,对工厂技校不惜花钱。这是当前的紧迫问题。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大量为机器制造各种装置的工具工、钳工、旋工等高级熟练工人干部、各种各样的低级技术员等等,也就是说,另一方面需要广泛提出培养高级熟练工人的学校问题。应当加强对这些问题的注意。

主席:现在宣布休息。

第十三次会议

11月16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请莫罗兹同志发言。

莫罗兹:我想只谈一个问题——罗伊津曼同志谈过的和卡冈诺维奇同志顺便提及的问题,即我们驻外干部的问题。我们对驻外干部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只举几个数字说明,我们的驻外干部近期面临着怎样的任务。如果从五年计划的观点看,那么,在剩下的四年里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驻外进口贸易机构实现55亿卢布的周转。如果拿现在的1929—1930年度来说,那么,仅金属工业进口一项,我们必须利用价值4亿卢布的许可证,在化学工业进口方面为1亿卢布等。在任务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请问,我们与罗伊津曼同志所说的那些干部能否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罗伊津曼在这里读了一长串人名单……

罗伊津曼:我什么也没有读,给我的时间太少。

莫罗兹:这些人,在他看来,一定得紧急地从我们的驻外机构清除。我可以把这个名单续到300人。我在柏林总共呆了三个星期,标出了100个应当从商务代表处清除的人,他们大都是不可靠的人⁴⁹⁴。罗伊津曼计划在巴黎撤掉100人,在美国也撤掉相同数量的人。这样,在两三个月期间我们必须清除我们驻外机构中的300名非党负责工作人员,原因是,如果把这些人留在国外,他们可能会成为叛徒,因为在国外期间他们全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腐化了。

外贸机构工作人员的腐化和破坏活动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呢?主要是在驻外干部社会成分不好的基础上。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在德国共有工作人员1190名,其中社会出身为工人的只有34人;在法国——344人,其中社会出身为工人的20人;在美国——244人,工人出身的总共只有7人,我们外贸工作人员的90%出身于过去的商人、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无疑给我们驻外贸易机构的工作打上了印记。卡冈诺维奇同志正确地指出,破坏活动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难道国内展开的阶级斗争不会在我们苏联国外的侨民

区里得到反映？要知道，在苏联内部，在全体工人群众、工人阶级专政、国家政治保卫局等经常影响的条件下我们还不断碰到专家们的破坏活动，何况是在国外？要知道，在那里我们的专家处在相反的影响之下，即处在白匪报纸、全体白俄流亡者和极力想收买他们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影响之下。

有人喊：对！

莫罗兹：卡冈诺维奇、罗伊津曼和其他同志所说的驻外工作人员背叛的数字和事实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关于在国外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我也说几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里常常有人不加区分地指责和大骂在国外工作的共产党员。这完全是不对的。在国外我们也有大量忠诚、坚定和正直的党员忘我地工作在我们经济战线十分重要的地段上。然而，应当说实话，直到最近只是在共产党员身体有病，需要康复的时候，我们才派他们出国。到国外去的往往是自己想要出国的共产党员。我们对这些共产党员实际上并没有挑选。

有人喊：他们自己挑选自己。

莫罗兹：虽然在形式上是我们“挑选”他们，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去了国外。结果我们就有了我们国外党支部生活的下列事实。

前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墨西哥的电报，那里总共只有五名共产党员：全权代表马卡尔同志和他的妻子把商务代表和支部书记开除出党，而支部书记和商务代表则把全权代表马卡尔同志和他的妻子开除出党。再举驻国外支部生活和工作的另一个事实。不久前我去过莱比锡，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托清洗了莱比锡支部，在莱比锡支部的11名共产党员中，我们决定立即撤销九个人的国外工作，只留下两个人。而在我们清党前一个月，柏林支部对莱比锡支部进行了调查并且决定：“认为莱比锡支部是健康的。”一字不差就是这样写的。从上所述得出的结论就是，单靠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一个部门的力量我们是解决不了驻外干部问题的。曾经负责挑选驻外干部的我的前任刚刚因挑选干部不力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下放基层工作。我预先声明，如果中央和各州委对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仍将采取此前那种态度，下一次清洗的时候我会受到同样处分的。

柯秀尔：这是宿命论，莫罗兹同志！

莫罗兹：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干部队伍改善的问题取决于党真正给予多大程度的重视。现在需要做什么呢？十分钟是说不全的。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我们根据米高扬同志的建议决定请求中央委托我们党的各州委会

对我们的驻外干部进行挑选和审查。在远东我们偶尔采用这种办法。通过远东州委会从远东挑选派往日本、中国的干部。我们认为,例如金属进口方面的驻外工作干部应当由党的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拉尔州委会挑选。这些委员会必须选拔最优秀的同志,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获取他们在国外工作的情况和评价等。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对派往国外的人员没有任何实际的审查。对被派出国的人员仅在主管部门进行审查是不够的,可以并且需要通过党的委员会对他们进行认真的审查。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些地方党委会所进行的审查也往往是形式上的审查,然而对派出国的人员需要专门挑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上⁴⁹⁵,对土库曼在清党时对共产党员的妻子也加以审查进行了讥讽。对派往国外的共产党员,必须对他们的妻子也进行审查。

总之,我们的第一点请求就是,让党的州委会承担起挑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出国工作的任务。卡冈诺维奇同志谈了商业学院的事情。为了建立商业学院,我们艰苦奋斗了两年,而大车仍停在那里:怎么也办不成。这件事需要推动。

最后一点,关于高等学校。我们高等学校的全部不幸在于(谨奉告我们的新任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同志)⁴⁹⁶,我们的高等经济院校不了解它们的培养目标。它们在培养一般的经济学者,没有任何实用的目标,然而有学问的人证明,经济学家只是个称号。除了称号,在高等学校里应当获取实际的知识 and 所培养大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我们所拥有的外贸工作方面的大学生在数量上绝对保证不了我们的需要,更不用说我们当前的需要了。截至11月1日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的人员共有5000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另外一种培养青年外贸专家的速度。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像对培养工业专家一样给予同等的重视。没有党对外贸方面驻外干部的重视,我们会有失败的危险。我们大家决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主席:现在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发言。

克鲁普斯卡娅:1891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里,在讨论一旦发生战争政权转入德国党手里的时候会发什么情况的问题时,说道:“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⁴⁹⁷

恩格斯1891年说的情况,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卡冈诺维奇同志讲话的很大部分都用于说明这个事实:技术人员怎样欺骗我们,我们怎样威慑他们和他们最终怎样继续欺骗我们。令人遗憾的是,讨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事情的这一方面。实际上,这些事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亲身强烈地感受到了。我认为,主

要的注意力应当放在怎样把我们的高等学校变成培养我们所需要的干部的真正基地。我必须指出,像在其他各个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也需要协作。必须在组织上指定并与一定责任相关联,让经济管理人员、教育人民委员部(通过职业教育总局)和党最积极地参与这件事情。只有这三个环节,这三个部分都将积极、负责地参与的时候,只有那时才能够建立起培养我们的专家,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专家的真正的基地。因为如果问题只在于把高等学校交给哪个主管部门,由此得到的成果会相当小。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没有人涉及,只有卡冈诺维奇同志部分地触及了,这就是我们的中层干部问题,中级技术员和农艺师问题。对于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改造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的时刻,这些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些干部是反对破坏活动的最好的保证。要知道,我们都在什么时候才发现破坏活动?当破坏分子已经进行了破坏活动,已经造成了很多损害之后,那时才开始威吓,而需要的是及时预防,不让破坏活动发生。

柯秀尔:当破坏刚开始的时候。

克鲁普斯卡娅:能够最好地预防破坏活动,使它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这些中级技术员。工人常常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是说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工程师在做什么的准确情报,没有必要的知识。而技术员必须执行工程师拟定的计划,他立即就能看出破坏活动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有优秀的中层专家干部,他们一方面贯彻执行工程师和农艺师的计划,另一方面又经常同群众打交道,那样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破坏活动。关于这些干部我们考虑得非常少。格林科同志说,将需要8万名大学毕业的专家和15万名中专毕业的专家。

卡冈诺维奇:15.2万名。

克鲁普斯卡娅:喏,15.2万名,这不会使情况发生多大变化。如果德国的实习技术员比我们多两倍,那么,在我们劳动技能水平低,广大工人群众技术素养差、文化水平低的情况下,需要数量更多的这种中层干部。

我曾经有机会同许多专家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指出,技术干部这个环节对于我们整个建设的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实,从熟练工人中和从我们的青年中培养这种干部,认真地、以我们的方式培养,挑选真正阶级成分好的,较之培养大学生,我们能够更容易和更快得多地做到。可能,那里需要的专家数量比较少,但水平却要高得多。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呢?把大家都赶去上大学。谁都不想上中专,人人都想上大学,因为大学能提供一定的条件,使人出人头地。大家都想上大学,而对于世界上有中专,很多人都不知道。

关于培养问题。关于我们将通过什么途径培养,决议里谈得非常少。决议里说:青年农民学校必须培养学生上大学。但青年农民学校只是七年制学校,那里的学生年龄很小,在能够上大学之前,他们还得再学习几年。所以,如果说,应当把青年农民学校变成大学的预备学校,那就需要给青年农民学校再加上三年。同样应当说,我们的中学没有进行应有的培养工作。我们的中学在同旧专家斗争。我们对他们说:我们的教学大纲应当这样编制,使它容易被工人青年和农村贫雇农青年所掌握(这一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已谈了)。而我们的专家却极力想把许多陈旧的、无用的东西塞到大纲里去,拉回到资产阶级中学去。工人速成班也同样如此。当你听见工人速成班在怎样学习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和怎样详细描绘罗亭⁴⁹⁸和各种女主人公性格特点的时候,你就会想:工人去工人速成班,丢下工作,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情吗?在这一方面没有全线应有的对旧事物的那种反击。我们应当把培养干部的问题与工人速成班问题,与我们整个学校系统联系起来。

接下去根据决议得出的结果是,每年需要在我们的系统之外,即在工人速成班之外,在中学之外培养大约1.4万人。显然,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校。但决议里没说,将建立何种类型的学校。

卡冈诺维奇:这还需要深入研究。

克鲁普斯卡娅:当说共青团应当培养5000人的时候,却不清楚,它应当在什么地方培养。要知道,它总不会在自己的各个支部里培养上大学的人,而培养必须在某些学校里和在某种领导下进行。关于培养学生上大学的问题没有准备停当,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实习问题。实习是需要的。梅日劳克同志说:“应当把高等学校交给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那样我们会安排实习,否则,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知道,实习——这不仅是乘车或者徒步到工厂里去,而且要按照一定的计划工作。关于大学生们应当怎样在工厂里工作,我们一定要商量好。我们引证外国人对我们专家的培养在说些什么。但应当阅读的不是他们对我们专家的培养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们对自己专家的培养写了些什么。那样就可以学会应当怎样培养专家。当你读他们的培养方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实习是怎样进行的,实习的安排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例如,那里怎样规定必须作为普通非熟练工人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实习,实习怎样与理论联系等等。而我们这里,一名大学生来参加生产实习,他在那里的态度举止已经不像个工人,做普通工人所做的事情,而像一名专家,虽然他也许还没有任何知识,却极力想要指导,而对

于这种指导他自己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我认为,培养干部——这就是应当抓住的那个环节,但应当抓住的正是这个环节,而不是把它从整个系统中扯出来,因为我们的高等学校只是整个系统中的一环,这个系统现在必须进行一些改革,这也许会给它奠定真正的综合技术基础。

现在我国农业改造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工业建设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迫使我们特别留心地考虑一下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使它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加适合于培养各个阶层,既有青年也有成年工人,去建立经济和生活的新的形式,这也将是为新型大学培养学生的最好途径。

主席:现在请茹柯夫同志发言。

茹柯夫:我想谈谈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的一个部分。他谈了大量已破获和尚未破获的破坏活动并联系这一点谈了本来可以采取的和我们应当采取的加强我们许多工业部门的速度。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认真地提出关于我们工业的最薄弱环节——电气工业的问题。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在电气工业部门工作,而是因为没有一个星期你们看不见一家苏联报纸、一个苏联单位不在骂这个电气工业部门的,而且经常地,十分经常地骂得不是没有原因的。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认为有必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如果就拿它几年以前的、现在的情况和未来几年的前景来看,那就可以看到,已经提出的未来几年的前景并不看好。

1927—1928年度在强电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我们在电机方面自己只生产了30%,进口了70%,那一年电机进口为70%,变压器进口为61%。整个强电工业的前景如何呢?如果以1924—1925年度为100,那么,全国电机和电器设备生产增长了300%,而同一时期进口增长了1375%。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前景怎样呢?提出的前景如下。1928—1929年度仅在主要产品方面就进口了6500万金卢布的电气产品,而1932—1933年度,根据我们通过的同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将应当进口2.87亿卢布的电气产品,换句话说,我们对外国的依赖程度将逐年急剧增加,尽管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这种必要性。还可以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总局在包括热电站在内的电力建设方面的全部订单为例,那么它现在提出的进口订单是1.6亿卢布,而电气工业如果需要原料来增加自己的400万—500万卢布的生产,那它是得不到的。我故意在这里提出这些突出的事实,是为了让同志们更认真地考虑这一点。而我们的所有计划已经讨论,通过,进行过平衡并且已经经过各级组织批准。到

五年计划末期(如果我们顺利完成五年计划的话,而我们一定会顺利完成五年计划的),我们的许多工业部门将会大大向上跨越,而本应当是我们整个工业主要基础的电气工业却不仅将没有这种向上的跨越,而且相反,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国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们看一看我们正在开始建设的任何一个大工厂,它的电气设备占10%—15%。我们建设工程的全部主要部分虽然已经完成,但却被延误下来,因为电气设备不能如期提供,换句话说,即我们不能使我们投入的资金带来它们本该有希望提供的效益和产品。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前景将会更糟。为了说明,可以给你们举电气工业完成某些订货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这不是笑话,而是痛苦的实情。我们有这样一些订货,按照生产的速度需要6—7个月时间,而我们从1917年就开始完成它们,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并且每年要就这个问题写好几十封信,用户写给我们,我们写给工厂,等等。

同志们读过,莫斯科的一个工厂里曾经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因为它的计划被削减了,它的专业化被削减了,而如果告诉你们,这家工厂1925年收到了一批订货,生产和完成的期限是1926年初,这批订货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其他全部设备1926年初都做好了,而电动机直到今天仍在等待这家工厂完成订货。这种例子数不清。这就是需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干部问题,这很好,但可惜晚了。很多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些干部。我想说,整个事情99%取决于干部,因为如果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另一种态度,那么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艰难处境。可我们的生产安排、技术利用的情况如何呢?仅仅列举像笑话一般的事实,就可以一连说上几天。我来举一件像笑话似的事情。为了让一家工厂得到为执行技术援助合同而寄来的一期杂志,需要进行大量的书信往来,工厂还是没有得到这本杂志。

有人喊:你们都跟什么人通信了?

茹柯夫:简直是跟所有的人都通了信,而杂志还是没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做点什么严肃的和更坚决的事情!?

我们是怎样利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潜力的呢?关于利用我们的潜力,即利用我们的固定资本、我们的设备,我说两句。

我们决定一年内增加生产74%,在没有一个工厂反对的情况且下决定和坚决通过了增产74%,而且这个数字不是极限数字,在加劲干的情况下是可以将其大大提高的。这个计划将完全用现有的那些设备完成。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是怎样利用固定资本,怎样实行我们所需要的速度,怎么能够使国

家摆脱电力建设和电气设备方面的严重情况的呢?

如果转而具体地谈干部问题和中央作出的关于建立一长制的决议⁴⁹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这个有罪的奴隶,不得不撤一个工作人员的职,他曾经主管国外工作和接受技术援助。请允许我不提他的姓名,但我要说,他是在一个有关机关的坚持要求下被撤职的,大概那里很快就会弄清楚,他应当到哪里去。在这一切之后,在他被撤职之后,我开始收到来信,要求解释这个工作人员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撤职的。这样的信件我收到整整16封。我有来自不同检察院的几封信,来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的几封信和来自不同组织的几封信,这些信都要求解释,这个工作人员根据什么理由被撤了职。最后,我进行过几次私下谈话和私人解释。只是在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作了说明,对撤职的原因应当向有关机关和那位我曾与之商量此事的同志询问,只是在这之后才停止了质询。瞧一长制可以怎样实行!

主席:现在请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必须承认,培养新干部的任务以其全部广度提到党的面前只是最近一年的事,在明确了这方面的任务以后,去年一年进行的工作还是很不够的。今年我们必须完成去年在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以及工作计划方面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为了今年能够完成任务,应当加以消除。原因之一是由联共(布)中央最近的关于动员有苏维埃行政经验的负责干部到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机关任职的决议⁵⁰⁰所决定的。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议使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能够以新的速度和新的方法工作。必须让这一决议推广到各苏维埃共和国,以便由新人来执行新的任务。我们保留教育人民委员部旧的文化至上主义传统越少,我们就越发能展开所需要的速度。我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碰到的,首先就是克服旧的文化至上主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影响的表现并妨碍以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速度进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在使用和改造教育人民委员部现有干部的同时,动员新的干部为朝这个方向工作创造了第一个条件。这里所提出的和为保证生产所需干部的工作状况的明显转变所必需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资金和物质条件。应当说,去年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表现得还不够。去年的预算还没有反映出为保证物质基础的新速度,为保证干部生产的新任务的必要的转变。

现在已经实行了十分重大的转变,但仍然还不够。我想这样说,现在拨出的经费和对我们工业干部生产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符合于我们现在的建设速度。

我们的这些速度现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控制数字对这一点有相当详尽的说明,说明显示比上一年度增长124%,尽管例如运输业的增长为113%。今年对干部生产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增加。但是这些现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速度与基本建设投资,不符合五年以后将会有的那些速度。请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投入干部生产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四五年以后才能提供产品。我们现在开始培养工程师、技术员,他们过三四年,过五年才会成为生产出的成品。因此,当我们将起草决议的时候,当我们将拟订干部生产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设想3—4—5年以后,即下一个五年计划时的建设速度,以便现在就对今后的工作作好干部保证。在拟订干部培养计划的时候,这个制订计划的任务必须充分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的任务,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为未来的几年培养干部。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请不要忘记,我们将在今年和未来几年生产出我们3—4—5年以前承接的产品,即在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里,在高等技术学校旧的生产基地上加工的产品。

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很多缺点。当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们有60%的学生在学校里呆得太久的时候,我证实这一点说,这导致我们工作的普遍效率的降低。卡冈诺维奇同志没听完我的话,认为我反对他的说法。没有这么回事。应当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总的比例数——60%,从纵的方面看,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工业技术教育方面,有17个人没有完成学业就退学了。那里四年毕业的学生只有4%,五年毕业的为21%,六年毕业的为18%,七年毕业的为26%,甚至也有在学校呆了八年的学生,他们占14%。总之,在乌克兰高等技术学校招收的每100名学生中83人现在正在完成学业,但按期毕业的只有四人。这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不幸。

一年前我进行了一次计算,我们乌克兰的高等学校、学院和中专有多少留级生和国家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多少钱。我计算的结果是,国家每年为他们花费800万卢布。我们学校总预算的大约20%用在了这些留级生身上。顺便说,这表明,改进工作质量的资金不仅在国家新的拨款中,而且在我们工作质量的改进中可以找到。

现在,你们大概在报纸上都看到了,在清洗高等学校的问题上大学生和共青团方面对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共青团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普遍的大清洗。我们坚持对高等学校社会成分进行日常的经常检查的观点,清除一切敌对分子和一切表明自己是反革命力量的分子等。共青团提出的要求是清除一切异己分子。四年前,1925—1926年度,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党

的和苏维埃机关的批准和同意(当时我不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通过了一个关于限制招收异己分子的决定:90%招收工人和农民,10%招收非劳动者。这10%被录取了。现在他们已经快要大学毕业,已在读三四年级,是在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而现在有人提出,应当把他们清除出高等学校,尽管他们并没表现出有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然而,今年春天我们的高等学校开除了五十多名应届毕业生,即已经完成大学学业,去进行实习,在实习中度过了一年并回校领取毕业证书的人。但是由于他们不属于工人和农民,而属于根据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1925—1926年度的决定过去被录取的这10%,因此便把他们开除,尽管他们与任何敌对活动没有牵连。他们是作为社会异己分子被清除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里没有任何右倾,我们应当善于正确地使用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反对在高等学校一蹲几年的那些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基辅工学院现在有1921、1920、1919、1917、1916年招收的学生,甚至还发现了一个1908年招收的大学生!喏,当然啦,我们不能这样长时间养着他们,要知道,在他们身上是要花掉一定费用的。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把呆得时间最长的最后几个班级的的大学生,这些旧产品,在工作中作为技术员使用,如果他们具有一定知识的话。总不能长年养活他们,直到他们成为工程师。

关于高等学校的移交问题,我再说两句。我不完全同意建议所说的,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被证明“完完全全”是正确的。这种移交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引起了所有机关对高等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但是在这方面远非该做的一切都做到了。我刚刚去过斯大林诺,去了一年前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斯大林矿业学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的代表一次都没去过那里,他们处于这样的情况,既不考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因为已经脱离了那里,而且也不考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因为从那里没得到任何指示。这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独立王国。

我还必须声明,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丝毫应当改变我们对高等技术学校所实行的总的政策。例如,联盟工农检查院的代表阿托季扬同志曾经在我们那里对民族政策进行过一次专门的调查,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在原先由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主管、后来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的斯大林诺市的矿业学院里对工人速成班和一年级实行非乌克兰化。他宣称,他坚持认为,继续在高等技术学校推行乌克兰化是不能容许的沙文主义。我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

员会管理丝毫不应改变总的政策。

现在,我们已开始显现出实行我们在干部生产方面所面临的任务的条件的条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对我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这样的条件就是必须建立联盟教育人民委员部。

柯秀尔:又是坚持他那一套。

斯克雷普尼克: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完全贯彻执行的条件之一。

主席:现在请苏霍姆林同志发言。

苏霍姆林⁵⁰¹:干部问题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卡冈诺维奇同志做得完全正确,把这个问题十分充分和尖锐地展开在全会的面前。尽管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尽管有七月全会的决议,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但与生活的要求相比这是如此之少,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部分是因为应当卷起袖子推进决议执行的那些人所表现出的毅力与问题的重大性不相称。我认为,经济管理机关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我们不应寻找减轻过错的情况。这个问题如此重大,不是个别一些人和个别一个主管部门所能胜任的。中央引起全党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做得很对。对这个问题,像卡冈诺维奇同志正确指出的,应当从政治上去对待,而不应当像右倾反对派在七月全会上和现在那样地对待。现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像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不仅要有苏维埃专家,而且要造就无产阶级专家。这是全部问题中最困难和最伤脑筋的问题。我们的子女,工人的子女现在还没处在资产者子女过去所处的那种条件下。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条件,但是今天的住房和物质条件却影响着高等技术学校之前的,甚至高等技术学校里的技术干部的培养。

我们的子弟在这种学前教育条件下,以后在初等和中等学校里⁵⁰²还难以掌握所采用的教学大纲,而这后来又会影响他们在高等技术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为了保证高等技术学校的无产阶级成分,乌克兰今年不得不降低了考试的要求。我们应当十分注意进入高等技术学校以前的培养,这特别是指提纲里提出的缩短教育的期限。为了使我们的高等学校达到更高的效率,缩短学习期限是需要的,但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培养的质量。关于对工人及其子女进入高等技术学校以前的培养给予帮助的问题,应当由共青团和工会承担起来。我们的经济管理部门应当对这件事情给以物质上的帮助。我们生产部门的工会组织至今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太不够了。托姆斯基同志曾极力主张在各个俱乐部里建立手风琴小组,请你们看结果吧:在乌克兰所有被吸收参加小组的工人中间,合唱队里有

16%，戏剧小组里有14%，工会小组里有2%，而技术小组里只有1.5%。

我们的工会机关很少进行提高工人技术素养的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建立“把技术给群众”的小组和技术小组的活动根本就没有得到广泛发展。工程技术处没有被认真吸收参加这项活动。大学生的社会工作也同向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普及技术知识没有联系。我们让大学生担负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和一般性的运动。应当把他们的社会工作同他们的学习，同向群众普及技术知识联系起来。用不着担心，这会把他们推上不问政治的道路，因为没有政治之外的知识和科学。

大力增加技术干部的方针是十分重要和必需的。应当把扩大我们高等技术学校学生名额的问题与生产实习制度联系起来。卡冈诺维奇同志突出强调了函授教育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是如此之大，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教育途径。函授教育无论如何一定要扩大。数量的不足对质量的压力太大。现在不仅不能向年老的专家，而且也不能向年轻的专家提出工作要求，因为每个人口袋里都装着一份辞职书和20份招聘声明。每一位“专家”去上班的时候不是干今天的工作，而是仔细研究各家报纸最后版面上的五花八门的招聘广告。在这种数量缺乏的情况下，失去了做好工作的推动力。

提纲正确地提出了在一些大型企业里开办这种类型的培训班，使我们能够不脱产地从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中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员，只是提纲里提出的这种试验工厂很少。三四个工厂太少，这是肯定的。可以更大胆一些。在这样一些大型工厂里，比如说我们的国营电气机械厂，在安装工程方面有三百多名工程师，在拥有这么雄厚技术力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开办这样的培训班呢？有许多其他的工厂也可以安排这项工作。

我还想再谈谈我们工业领导干部的培养问题。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也并不完全顺利。政治局做得非常好，扩大了工业学院的网络，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业务水平的措施⁵⁰³。但是我们还没克服流动性这个生产组织方面极为有害的现象。提拔工作的情况不妙。卡冈诺维奇同志在报告里提请全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提拔工作的实践中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呢？尽量不挑选熟练工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条件，需要做一些修正。

我们的生产工人依法享有特殊的社会法律和政治地位，但他一被提拔到某个负责工作岗位，经济管理或者工会工作岗位上去，他便失去了这种地位，他便被列入“职员”之中。工人合作社的购物证成了“乙”种，子女考高等技术学校按第三类录取等等。我了解不少这样的情况，熟练工人在车床上干活的时候挣

180卢布,而提拔为工厂经理以后便发给他该区党员最高月工资⁵⁰⁴——148卢布。我们的杜布科同志在生产岗位上时拿158卢布,提拔为工厂经理后拿120卢布。在乌克兰机器制造托拉斯的生产会议上,有人告诉我一个典型的事例。有一名工人共产党员在生产岗位上挣180—200卢布。他被提拔为工厂经理以后,按照当地党员最高月工资他应当拿165卢布。他过去是游击队员,有游击队员证,女儿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并作为游击队员的女儿领取助学金。他成了工厂经理以后,她作为工厂经理的女儿,这种助学金被收回了。这种不健康的现象已经超出了在报酬方面向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看齐的范围⁵⁰⁵。他不愿意失去在生产中干熟练工人工作时享有的社会地位,不情愿地去就任被提拔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同志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还很穷困,我们只好把个人的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我所列举的事实正在变成政治问题。我们不能由高级熟练技术工人形成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需要创造能够消除这些现象的条件。

我还想谈谈下面这个问题。提纲里指出了我们的工程师缺乏经济知识,但我觉得,也应当指出,我们的经济师缺乏生产知识,我们需要有经济工程师。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交通人民委员部在自己对日本运输工作的研究中发现的。调查清楚了,我们的蒸汽机车大修需要105天,根据五年计划我们打算在一些修理厂里把机车的停留时间缩短到28天,而在日本蒸汽机车大修的时间只有六天。当有人告诉我,六天可以完成蒸汽机车大修的时候,我本人作为机务人员感到吃惊。

[斯大林:这里有组织工作。]⁵⁰⁶

苏霍姆林:问题不总是卡在技术上,而是卡在生产组织、工作计划、经济核算上面。原来,在蒸汽机车大修之前,先仔细地检查,哪些部件需要置换。如果置换汽缸或者汽阀,便先对它们进行铸造、加工,准备其他的部件,而机车一直在运行,整个事情归结为拆卸和组装。

伏罗希洛夫:机车在运行中。

苏霍姆林:对。把机车拆卸开,换掉不能用的部件,就好了。乌克兰农业机器制造托拉斯和其他托拉斯所属工厂的专业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不仅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安排了大批量生产。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比应当做的还差得远。我们获得了效益,是因为我们简化了生产过程的组织。我们开始用计划组织来管理生产。就拿我们的技术定额处等来说吧,在这方面面前摆着多么宏大的工作。因此我认为,在培养工程师的同时,应当培养能够在工厂里帮助组织

生产的经济工程师。不这样做,我们将很难推动有计划组织生产的问题。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改学新技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当让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改学新的技能。在培养普通工程师的同时,也要培养能够承担起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伏尔加河建设工程、运河等工程的大人物、高级工程师。我们遇到的情况真使我们感到不寒而栗。大型冶金工厂的技术领导人问题已经具体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在黑色冶金方面只剩下了卡先科和叶美利亚诺夫,但这两个人也有污点。培养大工程师的问题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必须搞好质量登记和选拔,以便为下一个五年计划或总计划培养人才。

主席:现在请彼得罗夫斯基同志⁵⁰⁷发言。

Д.彼得罗夫斯基:我只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出,高等技术学校的效率要么没有提高,要么提高得微乎其微。然而,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七月全会的决议实际上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生命力已为夺取干部斗争的整个进程所加强。请问,这个决议执行得如此缓慢,结果如此微不足道,这个事实的原因何在呢?我知道总的政治答案,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答案。它归结为,在这一条战线上阶级敌人拥有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强的有高度技能的力量,而且他们以旧高等技术学校的传统和惯性为依托。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这个答案。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这个答案,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培养出接班人之前,我们大概不会明显地向前推进。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决议必须更加强调和突出问题的策略方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七月决议过去被这样执行,好像是在谈论为期十年的改革。在这个决议里必须强调,不仅需要急剧的转变,而且也需要最激烈地改变高等技术学校改造的整个策略。卡冈诺维奇同志说,高等技术学校一点也不像企业。我不想使用任何激烈的言词,但我难以说出,高等技术学校像什么。最近两个月期间,我在那里呆了三十多天,我们在高等技术学校里遇到的情况不是通常可以理解的。我举几个小例子。如果您到高等技术学校去听一次课并试图了解,应该有多少人出席,有多少人缺课,那您就会被看作是一个大怪人,因为在高等技术学校里还很少有人考虑工作统计。如果您在课堂上呆完最后一刻钟,那您还会看见很愉快地前来听课的大学生们在继续大声交谈。

请看另一个例子:正在为争取连续生产实习而与工业企业斗争。你们谈完了,达成了协议,得到了72个名额,而后来你们收到一份简短的报告——报到的

只有36人。为什么其余的36人没去报到,这一点谁都不知道,谁都不了解。实行真正的统计,实行真正的纪律,使高等技术学校真正采取正常的工作速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强烈地谴责此前采取的策略,并采取更加坚决的策略。

具体地说,决议的第三点使我十分困惑不解。决议的这一点说,应当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便在1930—1931这一学年就能开始按新的教学大纲讲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显示少许不同的速度并从1月份起采用新的教学计划和新的教学大纲。我知道,有人会说:在学年中间突然改变。如果您面对的是一台正常运转的机器,应当担心突然的改变。我检查过最大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表。如果让事情保持现在的样子不变,那么能正常达到最后第五年的为11%。我认为,我们可以豁出去给自己某些行动自由并显示强劲的速度。

丘巴尔:不正常毕业的有多少?

彼得罗夫斯基:我说了,正常的为11%,而其余的人已经不是在四年期间,他们的学习拖得长得多。

斯克雷普尼克:每年毕业多少?

彼得罗夫斯基:卡冈诺维奇同志在报告里说了,所有高等技术学校平均每年毕业6%—7%。最后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人数稍微多了一些,但这不是靠学习的合理化,而是靠顶出了蹲班生这个塞子。但由于状况的真正改善而提高毕业率的情况暂时还没有出现。因此我认为,效率差的原因之一,是慢条斯理的策略,是小步前进,而不是急剧转变的策略。第二个原因是,决议实际上基本没有执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棉花学院的例子。就在我们关于在塔什干创办学院问题的建议被否决的人民委员会那次会议上,我们塞给李可夫同志政治局的一个决议⁵⁰⁸;他平静地读完了决议,微微笑了笑说,一个月内不得开始。但在那次会议上不仅否决了这个建议,在那里还否决了对我们也有重要意义的另一个建议。我们学校学生的成分相当杂:年龄方面很杂,从19岁直到35—38岁;在教育程度方面——这里有曾经毕业于某个学校的无产者,这里有工人速成班毕业的,这里也有在预科受过培训的。在学生成分这样杂的情况下,50—60人一个大班就意味着整个事情会失败。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正在成为绝对的需要,实际上这个建议已经被采纳了,但从财务观点考虑,一切要求都在人民委员会那次会议上被拒绝了。必须使十一月决议不再重复七月决议所发生的情况。应当在决议本身里更有力、更坚决地强调,决定干部命运的一切机关必须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帮助执行决议里提出的计划。这是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也谈到了,这就是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问题。至于我本人,我没有任何理由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有什么不满。相反,当我们希望尽快实行连续实习制,尽快实行转变的时候,我们不仅从布勃诺夫那里得到了同情,而且得到了他十分积极的协助。另一方面,如果我在干部问题上赞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那就不好了。那就不正确和不真诚了。起草一份起诉书对我来说倒更容易一些。

卡冈诺维奇:您说说,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到底执行得怎么样?

彼得罗夫斯基:我来说。至于技术院校管理总局,那我可以做一个绝对客观的证人。把这称为管理局确实是可笑的。卡冈诺维奇同志谈到过的那个计划处,这个处里管工程技术方面的只有一位同志——罗蒙诺索夫学院⁵⁰⁹一名大学生。整个计划处里没有一名工程师。根本没有教务处。过去曾经有过,也只有一个人。

布勃诺夫:现在你们有多少人?

彼得罗夫斯基:情况马上就会十会清楚地显现在你们面前。我再说一遍,现在根本没有教务处;过去有过教务处,只有一个人,他每周来三次,每次两个小时。这就是那个本人坚信整个旧学校只能报废的人,而所有的学校对他也持同样的看法。你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这样一个人会怎样实行教学方法方面的指导。我们的登记分配处只有一名被提拔上来的女干部,她必须既提拔她自己,又为所有的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挑选需要的干部。这就是我们的各个主要的处。尽管我说了这一切,我仍然认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意见不对。我认为,还应当再把一些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院校管理总局。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七月决议,如果布勃诺夫同志必须自己考虑为把高等技术学校推向前进该怎么办的话,我坚信,他会看见,主要的困难在于,高等技术学校不愿走向工业,而工业不愿走向高等技术学校。无论如何必须使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联系起来,紧紧地联系起来。在工业本身的机构之外,你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尽管我向你们描述的那个机构有种种弱点,我并不怕(布勃诺夫同志也了解这一点)从11月21日起实行连续实习制,我们一定会在所有工厂里实行并保证必要的实习,因为软弱的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终究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而从1月1日起我们将在一对一的基础上采用轮换制。在没有机构的情况下,我们将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力量来保证这一点。

这些小小的例证表明,在当前的条件下,在当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决定性

的杠杆只能是工业内部的机构。这并不是说,应当保留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现在的样子。它这样工作是不行的,但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它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何机构能够促进更好和更准确地进行改造。

主席:现在请戈尔茨曼同志发言。

戈尔茨曼:卡冈诺维奇同志为培养新干部而应当采取的那些措施描绘了一幅详尽的图画。因此,我想只谈谈使用我们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现有干部方面应当实行的那些个别的措施。

因为时间短,我将只谈要点,而不作过于详细的说明。

第一点——关于工业管理体制的问题。工农检查院所制订的工业改组方案,大概如你们所了解的,就是我们正在把所有的工业管理机关改为实行经济核算制⁵¹⁰。这是否提供新的干部,这是否能腾出一定数量的老的干部,现在很难说,而且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整个管理体制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工作更加明确,各种相互制订计划的机关的重叠现象将大大减少。现在,工业中没有这种明确性;托拉斯总是可以推给辛迪加,辛迪加推给总局,总局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计划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整个推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等。由于新体制的实行,担负的责任更大了,因此,大概用不着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就可以提高技术干部的效率。

这项改组不仅需要推广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且需要推广到所有管理经济的人民委员部。我们的各个人民委员部必须由经济管理机关变成为计划调节机关,它们的业务职能应当从上到下改为实行经济核算。

应当指出的第二点,就是干部提拔制度问题。我们搞干部提拔已经很多年了,但在对这种提拔制度进行总结的时候,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这种提拔制度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干部?在个别情况下,由于提拔我们得到了新的干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今制度下的提拔只是导致了干部的损失。应当根本改组这件事情,因为由于提拔制度我们不仅能够教会工人阶级管理工业——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我们能够直接在国家机关得到新的干部,技术干部,也许文化水平不很高,但总是干部,在经过一定培训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管理工业。

在现在提拔制度下,我们得不到这些干部。我们举联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为例,在那里的3 000名工作人员中有40名被提拔为干部。请问,这些被提拔者对机构的阶级影响怎样呢?当然,影响等于零。

以任何一个机关为例,派一两个被提拔者去干清洁工或者让他们在各个办公室间闲逛。现在的使用被提拔者的制度几乎不会提供新的干部。需要采取另

外的提拔制度:代替一个被提拔者,它提供的是--堆一堆的,或者如现在所说的,一队一队的干部。如果我们提供一队被提拔者,第一,我们将赋予他们阶级的团结,他们将会对机构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二,他们将以此为自己打下学习、成长和成为主要干部的基础。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企业管理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对企业管理制度问题没有研究(我说的不是整个工业,而是个别的工厂)。然而,现在由于社会主义竞赛的开展,正在产生完全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些方法从根本上影响企业对干部的使用并解放出很多人来。就拿社会主义竞赛开展以前和社会主义竞赛开展时的生产会议⁵¹¹这种组织的工作为例吧。社会主义竞赛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人来参加生产会议,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希望——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深思熟虑的或者未经深思熟虑的。而应当由谁来实行呢?应当由工厂管理处来实行。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职能划分:生产会议就像是一个议会的机构,是立法的或者讨论法律草案的机构,执行权力机构是工厂管理处。这是对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时间的巨大浪费,他们抱怨说,为每一件小事都要到这些生产会议上去作报告。但社会主义竞赛展开了,它引入了新的因素。工人们不仅议论应该怎样改进生产,而且亲自动手改进。他们成立了突击队;他们不仅表决,讨论,而且作出决定并自己去实行这些措施。这在极大的程度上减轻了技术人员的工作。

最近我同电器厂的同志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工厂的各个方面都令人很感兴趣,特别是在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工业的新试验方面。他们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呢?管理体制简化了。有突击队。例如,要是变压器车间发现,电缆车间拖了它的后腿,并认为需要指出这一点,工人们不是到生产会议上去抱怨,不是,而是这个突击队里的一个人亲自到电缆车间或有关的车间去,在那里同这个车间的工人商量,共同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简而言之,他们由议会式的办事形式改为工人直接参与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办法。我不想用这来说明,生产会议正在消亡。没有那么回事。恰恰相反,与此同时它们的职能在加强,因为它们从讨论小事转向讨论大的问题。但我想强调指出另外一点,工厂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任务极大地减轻了,在这种条件下,在正确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的条件下,一个技术员在苏维埃企业里工作比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作的技术员要轻松得多。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里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就是为减轻技术人员的工作和使他们的劳动获得更高效率而需要加强和实行的那些措施。

剩下的几分钟我想用来谈谈卡冈诺维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简短涉及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外国专家的问题。由于我们对外国专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专家利用得不好,除了经济损失之外,我们惹出了大乱子,招致了大麻烦,应当设法解决。大家都知道许多这样的情况,一些外国共产党员专家,作为共产党员,他们当然不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坚定,他们认为无法在我们这里工作,撕掉党证,到国外去了。这是些共产党员专家,他们是怀着满腔热情到苏联来的,是心情急切地奔到我们这里来的!⁵¹²

罗伊津曼:谁撕掉党证,他就不是共产党员。

戈尔茨曼:罗伊津曼同志,谁撕掉党证,他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谁不关心为外国共产党员创造正常的同志般的工作条件,我也不会称他为共产党员。我不是为那些撕掉党证的人辩护,谁也不会为他们辩护,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正常的现象会有的。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到了工农检察院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外国共产党员会议。来了56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人说,他对俄国的条件感到满意。但为什么呢?他说:“对俄国工人要讲究态度”,因为他是用德语说的,而且使用了俄语的“态度”一词,所以其他人不明白,便开始问:“‘态度’是什么意思⁵¹³?”他说:“对俄国工人需要演示一次,演示两次,演示三次,只有那时他才会明白,而德国人不习惯这样工作。”(主席摇铃)

我这就结束,我只想读一下曾在图拉工作过的姓久特什的一个采矿工程师讲话中的一小段。他说:

“我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在矿石和石炭开采方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我是通过柏林德国共产党中央派到俄国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派到了褐煤矿上。当然,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我曾见过褐煤,也一定能胜任褐煤的开采,但是毕竟不能像在属于我的专业的石炭矿上那样高效率地工作。我在柏林问会把我派到哪里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

没有给我派翻译,我无法交流。八天以后我被告知,他们不需要德国工程师,我们自己对一切更了解。我便被打发走了。我困惑不解:干吗请我到这里来呢?煤矿经理暗中与我对抗。他利用我不会俄语,不执行我的指示。我不知道我可以到什么地方求助。他们作了一个已经花了几千卢布的方案;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完全没用的方案,但他们还是实行了,为此花费了1.3万卢布,他们纯粹由于固执挥霍掉了这笔钱。这些人对什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常常有记者前来,他们说:‘如果你了解什么情况,请告诉我们和给报纸写稿,不需要署名。’我就这样做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于是我陷入了绝望,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

题:我干吗在这里?要知道,我是想要工作的,还有很多非党专家也是想要工作的。一位同志回答我说:你究竟想要什么,你拿着外汇,如果他们不愿意,你就别去打扰他们。这个人说得完全正确,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给经理写过一封信,真的什么反应都没有。

最后我被派到莫斯科煤炭工业托拉斯总管理处担任合理化工程师。当然没有给我派翻译,我在那里呆了五个月,什么事情也没做。

还有其他一些同事,他们也同样什么事情都没做。他们把很多文件堆在桌子上,装出一副鬼知道多忙的样子。我没有这样做,我拿来一本长篇小说阅读,我读的正是《好兵帅克》。我曾这样推想,这一定会闹出大乱子的,但连这也没有发生。”

也许,他表述得比其他人更为激烈和更为坦率,但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示了意见,这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主席:现在请维辛斯基同志发言。

维辛斯基:毫无疑问,干部问题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对我们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情况进行估计和确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的原因远不是无关紧要的。毫无疑问,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进攻而在我们全国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动员起了富农反革命力量反对我们,这种阶级斗争也正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进行。如果说只应该直接用这种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整个人才培养体制和事业改革的挫折,那将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在这些挫折里,在这些挫折的原因里(我们认为这样的原因是我们高等技术学校的无纪律状态,缺乏严格的硬性的学习制度,松懈涣散,我们速度的缓慢,不愿执行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总而言之,如果在这一切里面看不见阶级斗争的鲜明表现,看不见不单稳稳呆在高等技术学校里,而且呆在它的首脑机关里(因为这是指挥机关)的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进行的反抗,那将是更大的错误。我们工作中主要的难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彻底的松懈涣散,缺乏严格的纪律,换句话说,即我们可以称之为“奥勃洛摩夫式”旧贵族学校后果的那种习气。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至今仍然是旧式的贵族学校,具有那个时代的一切特点:奥勃洛摩夫习气,慢条斯理,当然还有思想上的敌对性。

卡冈诺维奇:这太过分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维辛斯基:卡冈诺维奇同志认为,这太过分了,但我可以用一些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说的是教授和教员。

卡冈诺维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维辛斯基：我说的是高等技术学校的这一部分，而不是笼统地说高等技术学校。高等技术学校里有无产阶级干部，他们对这种现象进行充分的抵抗并执行我们的路线，但在高等技术学校改革中起作用最大的毕竟不是可以用自己坚决行动去冲锋，但缺乏足够知识的大学生，而是教授和教员。

安采洛维奇：他们是按照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委任状在工作的。

维辛斯基：问题不在于委任状；委任状可能是长期的，但内容很简单。

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化学教育会议⁵¹⁴。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和技术院校管理总局提出了有必要把学制改为四年，取消毕业论文和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上实行连续生产实习的问题。我们建议确定比例为1:1，最后，比以前更早开始专业化，即不是从三年级，而是从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开始。

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了什么呢？全体与会教授的坚决抵抗，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贝尔肯海姆教授简直回忆起了过去的好时光，特别是回忆起了当时给我们工业教育定调子的那个工业家普罗霍罗夫。我们把高等技术学校转入培训的新轨道的一切尝试都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那位贝尔肯海姆教授和索尔道教授说，连续生产实习是无偿的使用，是对穷人有利的话题。甚至在这个事例中我们也遇到了来自这些教授干部的坚决抵抗，这种抵抗不是源于别的什么，而正是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旧的资产阶级贵族气质。在教授和教员中间这种旧的资产阶级贵族气质是主导的因素。由此我们看到了两种斗争着的力量，但它们的武器很悬殊：一方面是技术知识上武装得很差，但思想上武装得很好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方面是装备了十分精良的，尽管在技术上并非十分完善的武器，但思想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大教授和教师干部。请看，我们掌握的我们的教授和教员干部的社会指标情况如何。根据我所掌握的所有高等技术学校的最新数据，这些干部中：贵族、商人、军人——9%，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11%，知识分子——19%，教授子女——3.6%，农民子女，大部分是上层富农的子女——11%，而工人，请注意，为1%。很自然，这种社会成分，而且应当再加上年龄指标（40—60岁的教授和教员为60%到70%），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和教员干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说实在的，我们拥有的是一支没有指挥人员的军队，我们不得不越过这些人员进行我们的改革。不掌握这些干部，无论我们的校长，也无论我们职业教育总局和技术院校管理总局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分化，我们必须这样分化他们的队伍，以便找到支撑点带领全体人员沿着我们的道路前进。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这种奥勃洛摩夫习气不是别的，正是在于我们学校之中并妨碍我们事业的旧的资产阶级贵族

残余。在这方面,大学生们的努力本身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七月全会决议没有贯彻执行原因的时候,说明这是因为松懈涣散、缺乏硬性的制度和效率低下。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这也源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高等学校的社会面貌。

有人喊:教训是什么?

维辛斯基:教训是,正是在这方面应当进行十分坚决和顽强的斗争。今年采取的这种斗争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了教授和教员干部的改选,这种改选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和狠狠地打击了教授教学不受监督的旧的学院式的传统。

有人喊:改选的结果如何?

维辛斯基:改选使我们能够免去了许多绝对不能接受的和有害的教授的职务。当然,不得不保留那些多少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清洗掉那些相对有害的,我们就无法解决教员干部的任务。第二,改选帮助我们从生产岗位上选拔青年人、实际工作者、工程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这个队伍并使之面貌一新。但这当然只是开始阶段,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一定会保证我们真正的胜利。

七月全会关于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联系决议的执行情况如何呢?七月决议考虑的是建立高等技术学校和工业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为此目的已经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了工业部门⁵¹⁵。由于这种移交,联系是否就建立起来了呢?应当说,这种联系尚未建立起来。我们掌握有这个问题的大量资料。那位曾对一系列高等技术学校进行过调查并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的戈尔茨曼同志指出,这种联系很不紧密,甚至在按照具体方针最接近工业的纺织学院这样的高等技术学校,也存在着与这个工业部门完全脱节的现象。

П.彼得罗夫斯基:这样说不对!

维辛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有这样一份注明日期为1929年10月14日的文件,并不是偶然的,顺便说,在这个文件里我们看到,纺织教育促进委员会对此是怎样考虑的。这个文件里说:“一封信呈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同志,另一封信呈送党中央。”这个文件谈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和纺织辛迪加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而且要求把纺织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直接交给纺织辛迪加领导:“取消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的管辖权,直接交给纺织辛迪加管辖。”⁵¹⁶这就表明,应当建立的那种联系,实际上并不存在。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把高等技术学校交给工业部门管理的试验是不充分的,因此现在通过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移交更多的高

等技术学校来扩大这一试验为时尚早。

主席：现在请科萨列夫同志发言。

科萨列夫：决议基本上正确地提出了解决培养新干部问题的办法。根据决议，共青团需要大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也包括在参加经济建设问题和培养干部问题上的工作方式。我想说，许多同志完全不理解共青团在经济建设问题，也包括干部培养问题上所能够做的一切。这种不理解在中央全会本身的工作中也有表现。

培养干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卡在了必须改变现有的国民教育体制上。中等学校，无论就其成分还是就其工作的实质来看，至今不是劳动的学校。它没有进行必要的劳动教育，它没有培养必要的劳动技能。因此，它对于工人，对于工人的子女没有足够的威望。我们高等技术学校人才的选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中等学校的社会成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提请中央全会注意下面的情况。拿中等学校五年级为例，五年级我们有工人子女8.7万人，而九年级我们只有工人子女7000人。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高等技术学校里的工人子女和工人青年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在减少呢？正是通过中等学校不能令人满意的成分的渠道。中等学校在工人家庭中完全没有足够的威望和不受欢迎，因此，男女青年上到五年级便不得不寻找谋生之路，放弃学业，到别处去了。

有人喊：这里也有物质方面的考虑。

科萨列夫：当然，物质方面的考虑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必须对中等学校进行改组，使它们成为综合技术学校和把它们改组成为中等技术学校或者职业学校。我们必须这样做，从这个角度看，需要打破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工作人员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那种因循守旧。在使国民教育体制适应工业要求的问题上，我应当说，工厂七年制学校具有很大的意义并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工厂七年制学校数量不多。应当提出一项1932年让所有工人子女通过工厂七年制学校的任务。应当设立专门的有助于扩大工厂七年制学校的贷款建设基金。我们觉得，中等学校的改造和工厂七年制学校更大规模的开办，这一切将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解决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和其他高等学校的社会成分和质量构成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培养初级技术干部的问题。党并非总是和并非充分地讨论初级干部培养的问题。论证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是没有意义的。有一点是清楚的，根据改造时期的任务，80%的现有工长和副工长都必须学习新的技能。单是这一点就指出了问题提出的全部重要性。共青团和其他许多机关对

此事曾经进行过相应的争论。现在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共青团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已就培养必要数量干部的所有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关于工厂艺徒学校的争论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财务角度看已经基本上解决,还应当更全面地提出一个问题,即在某些经济管理人员中仍然存在着对工厂艺徒学校问题的不够理解。

来自列宁格勒的米哈伊洛夫同志今天在讨论中的发言,就是这种对工厂艺徒学校重要性不理解的样板。我们觉得,不论米哈伊洛夫同志愿意不愿意,但他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事务主义的道路,在干部培养问题上他宣扬了事务主义观点。在干部培养问题上不能只考虑今天。共青团在争论中从未提出只把政治教育问题作为中心点。没有这么回事。我们争取的是什么呢?我们争取的是对青年工人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我们争取的是我们现在欠缺的东西。而这样提出问题,好像我们坚持只对青年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观点,这就意味着不正确地阐述争论,就意味着把共青团并没有提出的东西加到它的身上。

我们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建立两年制普通职业学校的命令。这项命令实际执行得如何呢?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干部问题,现在一切都卡在干部上。我要问大家,其中也包括来自列宁格勒的米哈伊洛夫同志,为什么这项命令没有贯彻执行?而它几乎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也包括在列宁格勒,——这是事实。

克拉瓦利:这样说不不对。

科萨列夫:这是事实,请回忆一下列宁格勒州委会的决议,您就会明白一切。

由于这项命令未贯彻执行,由于在建立工厂普通职业学校中存在某种,我想说是,抵抗,因此我觉得,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克服这种思想情绪。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中等专业学校。中专社会成分的改善进展得非常缓慢。中专的社会成分六年多只改善了9.4%。

工厂七年制学校必须这样改组自己的工作,使学生能够考入中专。应当走建立晚间和星期日中专补充网络的路线。在这方面共青团有非常好的不需要大量财务开支的经验,这种经验实际上已经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工业单位中采用。正应当利用连续工作制来达到改组我们中专工作的目的。

我们至今没有有计划地为高等技术学校培养人才。通常我们放人去学习,而不是培训人去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缺点。我们至今对进入高等技术学校的人没有进行充分的培训,我这里谈的是应当建立的各种小组。例如,我们在喀山建立了很多这样的小组并用这种办法培训1000名青年工人考入高等技术学

校,我们这样进行了培训,使他们在考试时没有不及格。应当更大力地抓这件事情,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甚至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下面连科学教学法中心都没有。需要建立这样的中心。

主席:宣布休息十分钟。

(休息之后)

主席:现在请苏利莫夫同志发言。

苏利莫夫: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以许多鲜明的例证,个别情况下以致人死亡的例证提出干部问题是十分尖锐的问题。对于运输业,干部问题尤其尖锐。运输业的技术干部,可以说,具有某种历史形成的派别主义和因循守旧的特点。这原因很多,但是我们不得不从这个事实出发,正是这种派别主义大大方便或者甚至帮助我们运输业刚刚经历的那场破坏活动,它的部分后果可能还没有完全消除。工程师们的这种派别主义也表现在不仅不给年轻工程师让路,不让他们晋升,不让他们出人头地,甚至也不让年老的,但对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建设比较忠诚的工程师晋升,如果他们不在某种程度上同破坏组织有联系。这种情况使运输业的干部问题变得格外尖锐了。由于缺乏干部登记、考查方面的比较明确的井然有序的工作,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不仅对我们运输业是伤脑筋的问题,对于所有的干部也是伤脑筋的问题,这大大加剧了事情的困难。在很多委任中,虽然我们并没有把握我们所提拔的正是那个应当被提拔的、最优秀的、最适合做这事的人等,我们仍在任命。如果我们有对我们技术干部适当进行的登记和考查,干部情况的紧张程度是可以大大缓和的。报告和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给予极大的重视是正确的。

七月全会关于把若干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经济机关的决议是正确的,但如果说老实话,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移交给予经济机关的那些好处,无论在高等技术学校与经济机关联系的意义上,还是在改善大学生的实习、见习的意义上,还未被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无论在运输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在谈干部问题的时候,不能把事情只归结为数量。我们在运输业中感到专业人员数量的严重不足。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数字,我认为,它们是不完全的。即使只谈状况比较好的铁路运输,工程师的实际缺额也将大得多。至于水路运输或者轨道运输这种未来四五年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巨大意义的运输,那么,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开始组建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的队伍。而对这个运输部门所具有的东西,看来不得不用扫帚来扫除,因为在我们刚刚着手建

设公路的这个领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最新资料证明了许多十分令人气愤的事情,更不用说明显的破坏活动了。

问题,像我已经说过的,不仅在于技术干部的数量,而且也在于质量。我们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由于从学成以后走上实际工作岗位的那一刻起就过多地担负大量日常工作,面对改造时期提出的那些复杂的技术问题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我们常常遇到我们技术人员业务水平欠缺,而在个别场合下工程师完全失掉专门技能的情况,因为他们10—12年前从学院毕业以后始终在外省工作,由于在破坏活动被揭露之前工程师帮派造成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他们一直呆在某一个偏僻的地段,他们的眼界超出不了这个地段。无论如何,不重新培训,没有我们在提高知识、了解外国技术方面相应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这个质量问题在我们运输业尖锐存在,丝毫不亚于数量问题。

铁路运输部门老工程师和青年工程师的比例大体上是这样的,全体工程师的四分之一是1924—1928年从学院毕业的青年工程师。在拥有这些工程师的情况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更大胆地依靠他们,提拔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在运输业中,等级服从和对工程师白发的尊重过去是格外强烈的。

有人喊:还有对制帽的尊重。

苏利莫夫:那里是决不会让青年工程师迅速提升的,只有故意耽搁,把他在某个地段上留十来年,只有在这之后才会提拔他。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老办法至今仍在左右着提拔。在运输业工程师力量十分紧缺的同时,我们看到许多令人非常气愤的事实,青年工程师得不到相应的使用。没有一条铁路,没有一个经济机关,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表明不合理使用青年工程师力量的最令人气愤的情况。不能把我们拥有的所有青年工程师全都认为是苏维埃的。这里有相当大比例的所谓不忠诚的。但毫无疑问,这部分工程师毕竟是比较靠近我们的。

最近一年有一个很鲜明的事例,它使我们有可能在解决一个技术和经济意义十分重大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次完全依靠青年工程师。我想指出我们运输业解决桥梁问题的事例。你们大概知道,由于一批批新的蒸汽机车的采用,关于铁路桥梁的问题两年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运输业的改造,我们必须更换所有的铁路桥梁。我们很少有一座桥梁,列车能够以正常的速度通过。对于大多数的桥梁都有限速,列车在这些桥上行进像乌龟在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必须重建这些桥梁。这得花费大量的资金,此外,这还需要大量的钢铁。在我们桥梁处工作的青年党员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国外这种桥梁利用得好得多,那里桥梁的负载比我们大得多。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技术争论,而且反对我们青年

党员工程师的是桥梁建设方面的大技术权威(教授)。举行了技术讨论。青年工程师主持了这次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站在了这些青年工程师一边,教授听众们,这些桥梁事业的行家,他们放出了多少关于这些桥梁的金属疲劳等的烟雾,他们发出了多少威胁,说你们有陷入十分困难境地的危险。总之,他们预言可能会发生灾难。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站在这些青年工程师一边并决定像国外那样利用这些桥梁,但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从美国请来了大工程师顾问。不久前莫伊谢耶夫工程师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是大专家,是美国桥梁建设的行家,他完全肯定了我们青年工程师立场的正确性。我认为,由于使用旧桥梁问题得到这样的解决,我们为五年计划赢得了1.8亿多卢布,且不说我们所节约的并将用于其他经济部门那大量的钢铁。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运输业工程师技术人员的报酬很差。最近半年我们运输业流失了400名工程师,而且他们到工业部门去是由于运输业和工业部门工程师的报酬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最后,最末一点意见。我认为,在谈运输业技术干部培养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运输业本身的需要,而且也应当考虑工业对运输工程师的需要。这种需要同样也很紧迫。

主席:现在请阿尔乔莫夫同志发言。

阿尔乔莫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自己报告的开头就说了,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的决议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我觉得,卡冈诺维奇同志宽恕了很多对这一任务没有完成犯有过错的人,其中也包括我们学生会。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同样应该受到一定指责的缺点。不能闭口不谈我们七月全会决议是如何执行的,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里。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这里在我们面前处于注意力中心的或者是技术院校管理总局,或者是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请你们看一看各民族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它是一个工业区并拥有许多技术和农业学校),那里高等学校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呢?为了让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公众注意乌克兰在培养专业人员方面在做些什么,不久前我们决定对乌克兰学生会中央局进行调查。我们狠狠地打击了中央局,对它的主席团进行了100%的改选,进行了更新,因为它对七月全会的决议执行不力。我们完全清楚,他们不是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这么办,那我们就是有意间接打击乌克兰在领导高等学校方面所进行的整个工作。

中央七月全会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的联系,关于实行连续生产实习,关于从使高等技术学校适应工业和国民经济提出的要求的角度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关于消除课程过多和重复现象,关于在较短

时期内培养工程师的问题,在乌克兰这项工作实际上只是现在,从今年秋天起才开始进行。而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明确政策是等待和旁观。乌克兰许多领导人毫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宣称,让我们等一等,看一看这件事情在俄罗斯联邦进行的结果如何,如果情况好,我们就跟着行动。用这种速度不仅超不过西欧的技术,就是连乌龟也追不上。

其次,接着往下说。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我不知道他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某个泽连克维奇前来参加化学教育会议。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一部分狂妄的教授、极端保守分子,他们不仅现在已经把自己全部打击的矛头对准目前的措施,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党正在为将来提出什么措施,他们现在就在动员起来用各种方法对抗所有这些措施。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这位代表对党现在提出的各个主要问题,对高等技术学校实行四年制问题⁵¹⁷、对理论与实践的比例问题,没有给予任何明确的答复,托词说教育人民委员部尚未研究这个问题。会议到底没有弄清楚,乌克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是什么。对进行改革,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还在继续自己含糊不清和犹豫不决的老政策。

我还想谈两个问题,关于我们高等学校的制度和学生会进行行政管理的问题。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指出了,学生会包揽全部工作,我们的党支部用行政命令领导一切。情况确实如此。卡冈诺维奇在这里言词激烈地谈了我们高等学校松懈涣散的情况和那里正在发生的岂有此理的事情。在座的同志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没去过高等学校,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单用词句是不足以描述这种情况的。就举开学上课这个例子吧。规定9月1日开学上课,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以列宁格勒为例。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一年级只是9月2日才开始上课,其他年级从9月20日起上课;工艺学院——9月20日;师范学院——10月5日;国立大学——10月15日,即比应该开始上课的时间晚了一个半月。我们一个古怪的大学生心血来潮:如果把时间的这种浪费折合成为货币,会得出多少卢布的亏空。他进行了计算,由于我们没有如期开学上课,仅莫斯科一地,代价就为50.8万卢布。乘上所有拥有大型高等技术学校的城市,你们就会得出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问题不在于金钱,而在于我们浪费了最宝贵的时间。我们谈论缩短学制,谈论四年制,然而我们却在胡乱地浪费时间。大学生上午10点到校,课程进行到晚上10点钟,而且一堂课与另一堂课之间有两三个小时的所谓“空堂”,这段时间学生闲游荡,什么事情也不干并妨碍别人工作。因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們的高等技术学校里实行工厂制度,安排两班学习制:上午8点到下午2点为一班,下午2—3点到晚上9点为另一班,以便使工作日得

到充分的利用。这样,我们既能赢得时间,又能使高等技术学校本身的工作得到更加合理的安排。

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草案现在提出的,真正是我们高等学校的革命的行动纲领。

关于我们学校展开的阶级斗争,这里已经谈得很多了,而且不仅是在思想战线上,教授们正在动员起来与党的决议对抗。教授们用来进行对抗的方法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现在反对我们,反对学生会,是以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为根据的。你们要知道,在他们看来,只有教授们才是党的决议的“捍卫者”。不久前在化学会议上索尔道教授站出来问:“谁受权解释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对于我们,你们不是权威。”他宣称,他们也坚持中央七月全会决议的观点。他们坚持的是什么决议呢?那里说,我们需要在五六年里培养出工程师来。于是教授便抓住这点说——决议是正确的,而你们突然讲什么四年制。速度问题与他们无关。

第二个问题——理论与实践的比例。我们提出这一点是为了执行七月全会关于使高等技术学校接近生产的决议,可他们,你们要知道,提出根据说,不能这么办,因为正是七月全会说:不要降低理论,不要降低理论水平。因此,现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面临着自身改革的许多问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实行四年制和理论与实践的比例为1:1的命令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这是需要落实的,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需要用教授们的双手,而不是我们的双手工作,而相当大部分的教授是保守的、反动的,不愿意进行这种改革。因此,我们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从最宝贵的科学力量中找到接近我们的人,以便依靠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现在坚决提出了学生会脱离行政管理的问题。我们也认为学生会进行行政管理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干部,没有人工作。七月全会关于派遣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去高等技术学校领导高等教育事业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⁵¹⁸。在许多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校长。哈尔科夫工艺学院已经六个月没有校长;阿塞拜疆学院很久没见到校长了,他在国外的什么地方;在格鲁吉亚,工学院的校长是教育人民委员部。

有人喊:在哈尔科夫有校长,但他生病了。

柯秀尔:实际上没有。

阿尔乔莫夫:校长已经六个月不工作。柯秀尔同志证实了这一点。需要加强对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现在的领导软弱无力。我们承担起脱离行政管理的任务,这一点我们一定完成,但我们提醒党,在这样做的同时,党、苏维埃机关必

须注意派坚强的人到高等技术学校里去。即便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他们很难找),但愿是这样的人,他们善于吸引和使用教授和工程师,善于让教授工作,善于吸引我们苏维埃公众的全部力量、工会、经济管理人员、工程技术力量、学生会,根据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共同努力实现党对高等学校改造的指示。

主席:布勃诺夫同志请求破例给他半小时。

有人喊:20分钟。

布勃诺夫:我请求给30分钟。

主席:我提付表决。谁赞成给布勃诺夫同志30分钟?谁赞成给20分钟?少数。

现在请布勃诺夫同志发言。

布勃诺夫:我将谈几个与中央委员会七月决议的执行最密切相关的问题。

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整个工业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事业的领导问题。在七月全会上莫洛托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保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统一领导”。现在的十一月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必须“改进”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总的领导”方面的工作并加强这种领导。我认为,这些指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许多情况紧迫地把这项任务提到了首位。第一,我们有相当多部门有“教育人民委员部”。这种“多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情况现在就十分尖锐地提出了统一领导和加强领导的问题。第二,这个问题的提出还由于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不仅已经能够谈论综合技术学校,而且能够真正地创办这种综合技术学校。从我们的生产开始提高的时刻,特别是从我们开始真正开展集体农庄运动这样规模宏大运动的时刻起,就在为我们的学校,从初等的到最高等的,奠定现实的基础,使它能够真正变成综合技术学校。

有人喊:对。

布勃诺夫:而这又比过去更尖锐得多地提出了统一领导的问题。

最后,第三,还有一个因素也要求统一领导(我说的领导是七月决议所指的意义上的领导)。现在我们正在技术干部培养的事业中进行大破除,这一点应当坦率地说明。当然,这种破除是必需的,因为假如我们试图在这里保存我们的所谓“正常的方法”,那么我们会同我们正在建造的那个工业化的庞大机器一起垮台。因此,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制度的突击的方法可能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但无论如何是十分必要的和绝对适宜的。但是,这样的方法本身会在教学安排方面为各种偏离和过火的情况创造许多条件。因此,这也要求最大限度

地加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的领导。我认为,为了实际保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统一领导,为了像决议草案中所说的改善和加强这种领导,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需要保留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教授的批准权;第二,需要保留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批准权;第三,需要保留教育人民委员部对科研工作计划的批准权和对高等技术学校科研工作的监督权;第四,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建立检查机构,该机构可以对任何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方面的问题进行检查和督导。

有人喊:不分部门?

布勃诺夫:是的,不分部门。事情的本质就在这里。应当建立这样的检查机构。这样我们将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教学方面不发生任何偏离和任何歪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将保证连续生产实习的大规模的试验将得到系统的研究,因而会比现在进行得更加顺利。

第五,应当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专门的教学法问题会议,负责联系、协调和指导各部门的这种“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活动。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告诉你们说,我约见他是为了在连续实习制问题上建立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和职业教育总局之间的统一行动。但这只是一个问题,而这种问题无疑将会很多,那时将需要在职业教育总局和技术院校管理总局之间建立统一行动。因为我们有高等技术学校和中专,彼得罗夫斯基那里也有高等技术学校和中专。如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学校将这样做,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高等技术学校将那样做,那会怎样呢?这是绝对不行的。这里需要完全的行动一致。有些好事者把教学法方法的领导理解为“一般化的”领导,即没有具体内容的领导。应当使这成为对教学法事业各个方面的实际领导。为了让这种领导成为实际的,就应当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教学法问题会议来协调和指导所有高等技术学校这方面的全部工作。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这五个条件,那我们就会真正有所需要的东西,即我们将保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统一领导,我们也将有可能既改善又加强这种领导。

关于生产实习这里已经谈了很多了。很遗憾,梅日劳克同志未能展开他的想法。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大学生进行连续生产实习,希望建立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的联系,就应当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否则是不会有结果的。这个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它没有写进七月决议。

克拉瓦利:去年您持的是另外的观点。

布勃诺夫:克拉瓦利同志,请您先听一听。如果认为七月决议仍然有效,谁都不会持这种观点。为什么?莫洛托夫同志在七月全会上说得完全正确,工业掌握在国家手里,高等技术学校也掌握在国家手里,因而实行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的结合并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但他没有说,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个机关能够实行这种结合。教育人民委员部也可以实行这种结合。我不打算否认,在这件事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许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大概是有的,实践表明,这种优势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你们面前有一个完全公正的人——戈尔茨曼同志。他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并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证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没做这件事情,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相比,它这一年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古比雪夫同志的插话没听清楚)

而我想问您,亲爱的古比雪夫同志,为什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至今没有回复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写给你们的信,即《真理报》11月3日刊登的那封信⁵¹⁹?

古比雪夫:回复了。

布勃诺夫:你们前进的这种速度与当前时期不相适应。(笑声)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信里说:

“连续生产实习没有成为生产教育的方法,事实上与理论训练脱节,实际上只是多余的补充……”

接下去是对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相当有分量的赞美(我就不读它了),信的最后指出: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当时没有以自己权威的全部力量干预此事,在我们看来,这大大地加深了七月指示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执行情况的不能令人满意。”

不论怎样对待这个文件,文件毕竟刊登在了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并有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工会执行局主席团和共青团支部委员会的签名。因此,这个文件有相当大的可靠性。所以在这之后梅日劳克同志应当态度更谦虚一些,不再发表这样的声明,似乎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才能够组建这么出色的,既能保证生产实习又能保证其他方面的技术院校管理总局。

古比雪夫:您去问问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他们是否想转到你们那里去。

布勃诺夫:我也没打算把他们拉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我也不想和您争论这

个问题,因为它已经由中央解决了,我只想再一次重申,没有必要持这种七月全会没有坚持,这次全会也不可能坚持的观点,即除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人能够建立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的联系。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高等技术学校物质状况的平等问题。七月全会十分坚决地记录下来,“无论是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还是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学校的物质状况必须继续是平等的”。

Д.彼得罗夫斯基:这很难做到。

布勃诺夫: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要求不单是起码的公正性的要求,当然这是真正的小事,这是经过非常严肃的考虑而得出的要求,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高等技术学校物质状况的平等,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竞赛”,甚至相反,会出现置教育人民委员部于无法容忍的困难境地的情况。而我们现在是否有和在何种程度上有这样的平等呢?请看几个数字。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院校管理总局,一个学生的培养费用1927—1928年度为431卢布;1928—1929年度——1200卢布;而1929—1930年度——2260卢布。这是在技术院校管理总局方面。而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字:1927—1928年度——421卢布,1928—1929年度——693卢布,巨大的差距,而1929—1930年度——1458卢布,差距就更大了。

克拉瓦利:高等技术学校各式各样,这里是技术学校,而那里是整个系统。

布勃诺夫:对不起,七月全会决议里说得非常明确,应当执行这个决议(喧嚷)。否则对教育人民委员部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非常消极的结果。不是别人,正是莫洛托夫同志在七月全会上说,不根本改善高等技术学校的物质状况,我们就不会有我们高等技术学校情况的改善。这是完全正确的。请允许我从这个角度再谈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把工业技术教育作为注意的中心。我们正在开展预订大学生合同的广泛运动,我们正在认真尝试改善工业技术教育的物质基础,但要知道,我们还有医学教育和师范教育。

安采洛维奇:也不应当忘记农业学校。

布勃诺夫:要知道,医学院的学生、师范学院的学生都不签预订合同,就是说,与高等技术学校相比,他们的情况将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想问你们,这里是否在形成这样的“比例失调”,它将使我们的教师干部受到痛苦的打击,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教师干部的情况很不好,关于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的师范学校只能供给初等学校 50% 的教师干部和高一级学校 30% 的教师干部。对于教师干部我们应当给予最大的注意,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情况如此,他们会成为后娘的孩子。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情况也同様。我很担心,这将打击医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在这方面应当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增加它们的助学金数量,使其与技术院校管理总局的助学金一样,等等。我提请全会注意这一点,因为教师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师范教育问题我们必须从今年起给予最大的注意。

关于社会经济学科的某些部分我不能同样这么说,因为社会经济高等学校的某些部分(为税务、财务等机关工作的)在开始签预订合同,但就在这里也有社会经济教育的某些重要部分同样会不受重视。对这一点需要考虑考虑。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科研干部和科研工作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迅速壮大要求对这个问题给予特别的注意。如果在改造时期的开始就如此尖锐地遇到了工程技术干部紧缺的情况,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过一些时间,比如说,到五年计划末期,当我们在城乡极大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这个基础会向我们苏维埃科学提出我们现在甚至想象不到的要求。也许到那时候会发生我们不得不用救火的方法去解决科研干部和科研工作这个极其重要问题的情况。我认为,需要认清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而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处于不令人羡慕的境地。

我认为,我们有四大科学中心:苏联科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科学机构管理总局和科学技术局⁵²⁰。这就是应当经常推动科研工作的四个中心。

安采洛维奇:列宁农业科学院⁵²¹。

布勃诺夫:农业科学院暂时只在列宁格勒占有几座大楼。

洛佐夫斯基:量以后会变成质!

布勃诺夫:我赞成让农业科学院好好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在提高农业的时候,这对于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现在我们有四个中心。可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科学机构管理总局至今仍挤在一个旮旯里。现在需要把它同苏联科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局一起全力推到首位。我就不说专业人员的工资了,我就不说科学机构管理总局的专家收入为 140 卢布,而科学技术局的专家收入为 350 卢布了。这一点也是有意义的。与去年相比,今年总经费的增长情况如何呢?科学机构管理总局把自己的预算增加了 13.4%,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把自己科学机构的预算增加了 119%,而某些科学机构的预算增加到

了139%。情况就是这样。

戈尔茨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联盟的,而你们是俄罗斯联邦的。

布勃诺夫:是的,是俄罗斯联邦的,但是只有住在火星上的人不知道,八分之七最大的科学机构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即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上。(喧嚷)

我请求别打断我的发言,因为鲁祖塔克本来就不停地说我。

我必须告诉你们,科学机构管理总局有86个科学机构,其中四个最大的是——科学院士约费的物理技术研究所、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的光学研究所和涅梅诺夫教授的两个研究所。“肢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倾向在这方面也有表现。不很久以前,领导光学研究所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找过我。这是个工程师,他的工作与工业有联系。我这里有一个来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的文件。这个文件里说:“应当以把光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和科研工作集中于国家瓦维洛夫光学研究所为基础,对国家瓦维洛夫光学研究所进行紧急改组。”接下去是,“逐步取消全部预约的计算工作,把它们交给工厂去做”。文件最后说:“提出把国家瓦维洛夫光学研究所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问题。”同志们,应当坦率地说,这个文件是“不讲原则的”,是吧,因为有人叫喊加强工业与科学的联系,叫喊科学研究所与工业没有联系等等,而当有这么一个光学研究所真正与工业有联系的时候,便企图夺去使它与工业具有这种联系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什么是光学计算工作呢?这就是对新光学系统的研究,这就是科研工作的心脏。而他们却想把这从国家瓦维洛夫光学研究所夺去并交给工厂,最后竟建议把整个研究所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我认为完全不容争辩的是,我们应当把科学机构管理总局从穷困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把科学机构管理总局撕成两半,而是加强并把它推到我国最重要的科学中心之列,这些中心将保证我们的科研工作并定将促进我们科研干部的培养。这是一项这样的任务,它的全部重要意义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而过两三年以后,它也将会作为像1929年的工程技术干部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任务被提出来。

我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即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个国民教育系统的问题(既是关于我们的,也是关于这个系统的中间环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将谈得非常简短,因为我希望,全会还会让爱泼斯坦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言。现在我们正在实行一系列适当和必要的突击措施,否则我们就无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主

要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样关心加强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决议草案第五部分的第三点和第四点谈的是初等和中等学校。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初等和中等学校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第三点提出了“关于提高中等学校毕业生学业水平的措施”,而第四点提出了若干十分重要的突击性措施,以加速培养我们如此需要的技术干部。最后这些措施应当执行,但是也不应当忘记我们正常的学校。应当大力予以加强。我没能够就集体农庄问题发言,我可以向你们提出强烈的要求,因为在就集体农庄问题发言的时候,你们谁都一句话没谈文化工作,没谈学校,没谈我们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的中专。我们十分清楚,既然我们有国营农场,就可能和需要把农业中专搬到这些国营农场里去。这将毫无疑问是适宜的。而在集体农庄里应当是建立学校。我刚刚翻看了许多有关集体农庄文化措施情况的材料。应当说,那里文盲比个体户严重。初等学校不足,中等学校几乎完全没有,等等。目前在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时期,应当最大限度地开展这项工作。也应当大力加强我们整个国民教育系统。教育人民委员部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尽管存在种种缺点。必须大力加强这项工作。

主席:现在请瑟尔佐夫同志发言。

瑟尔佐夫:我和鲁祖塔克同志有协议,我必须把自己的发言压缩到三分钟,因此我只能提几点修改意见并十分简短地说明理由。

决议草案的第四部分里说,必须把几所高等农业学校移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管辖。会有少数人根本否定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同样会有极少数人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农业人民委员部能够胜任这件事情。

有人喊: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瑟尔佐夫:如果指的是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那就应当考虑到,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其组建时期对这件事情是完全力不胜任的,因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组建时期会占相当长的时间。它将长时间顾不上此事,我不会羡慕那些将被移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高等学校。这是十分清楚的,至少一年半期间它实际上不会着手处理这件事情。我认为,应当放弃把高等农业学校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做法⁵²²。

这一部分里还说:

“认为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必须把新建的高等工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全部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必须就在1929—1930年度继续进行重工业方面最重要的几所高等技术学校的移交工作。”

我们有许多说明今年内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高等技术学校工作情况的材料。情况是十分令人不快的。波德沃伊斯基同志领导的委员会⁵²³的材料,还有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局长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的权威性的和客观的发言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一切提供作出完全相反结论的材料。我毕竟不会走得那么远,我不会提出加上一个“不”字的“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即不会提出这样修改:“认为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是完全不正确的。”考虑到时间很短——只有一年,我不这样做,但出于谨慎,我想建议这次全会不要作出没有事实证明的正面的肯定,也不要继续进行高等技术学校的移交工作,让技术院校管理总局能够暂且消化它现在所拥有的和暂且丝毫还未能胜任的事情。

我的第三个修改意见是关于青年农民学校的。这里是这样说的:

“对青年农民学校应当这样改组,使它们一方面培养农业方面的实际工作干部,另一方面为高等农业学校输送生员。”⁵²⁴

我觉得,这一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目标,即改善高等学校的社会成分和使更大比例的青年农民有可能进入高等学校。但这一点可以通过别的途径,采取别的措施予以保证,而不是顺带改组青年农民学校。尽管青年农民学校现在的方针是培养农业实际工作者,但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农民大都向往到城市去,摆脱农村,把青年农民学校变成为高等学校培养生员的学校,毫无疑问,我们在大大助长这种不健康的和不正确的离开农村的思想情绪。然而,保证青年农民学校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一定比例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必需的,但这也可以在现有的体制下做到。我们有各种可能进行这种安置,包括通过工农速成班。然而,提纲中对问题的提法破坏了青年农民学校的基本方针,即培养实际工作干部的方针。改组必将使青年农民学校变成为学制比现在更长的学校,因为青年农民学校在目前情况下给予的知识量低于考高等学校所需要的知识量。而这意味着,培养实际工作干部的基本任务在这里模糊了,培养期限拖长了。

对于作为七年制学校的青年农民学校,需要额外再加上三年,否则就进不了高等学校。因此,不得不这样改组,即必须延长青年农民在青年农民学校的在校学习期限。而这一点,我再说一遍,会使加速培养实际工作干部的任务变得模糊和复杂化。

应当用别的什么办法保证增加青年农民进入高等学校的数量的任务,这种办法和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用不着摧毁青年农民学校。

主席:现在请温伯格同志发言。

温伯格: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干部问题的主要之点,在于使党和无产阶级公众正确地确定培养新工程师和技术员问题的方针。对这项任务,目前不仅工人,而且经济管理人员都领会得很不够。只是现在经济管理人员才着手认真研究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任务。这项任务也必须十分广泛地摆到工会的面前。

整个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数万名新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如果不是数十万名的话。这件事情极为复杂,需要动员各种组织,首先是工会的力量来培养新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问题在于,现有的工程师干部(我没有时间来谈他们的特点,对这些问题我已经在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里研究过⁵²⁵,这个委员会为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进行了准备),即使拥护苏维埃的那一部分,业务水平不够,就像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现在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问题而培养出的那一部分工程师业务水平不够一样。工会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力求扩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里的工人核心。现在,工人核心或者自称工人的那些人占38%—40%。应当注意的是,许多自称工人的人,他们实际上不是工人,现在在报考高等技术学校的时候有很多冒充工人的情况,他们极力想钻进高等技术学校,成功钻进去的大都不是无产阶级分子,不是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为工业,为攻克技术制高点而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干部的任务,如果党、工会和经济机关不认真地抓其实现,我们是解决不了的。现在卡冈诺维奇同志提交的决议草案里提出的任务是,在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招生的时候把工人和工人子女的比例增加到75%。如果工会认真对待这项任务,这是能够并且一定会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对推荐和推动工人进入高等技术学校的任务,工会至今未给予认真的注意。如果进行自我批评的话,就应当说,工会甚至没有完全利用给予它们的名额。也有另外一些情况使正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和即将毕业的工人的数量不断减少,这就是所谓的淘汰。我向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高等技术学校每个年级,尤其是临近毕业时工人退学的资料。不仅在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里,而且在七年制学校和初等学校里,都有大量工人和工人子女退学。不久前我曾有机会去过列宁格勒的一些企业,工人们向我诉苦说,他们无力供养孩子到初等学校毕业,无力让孩子受高等教育。不久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同提出了一个建议,由经济机关拨出工资的百分之一作为所谓的工资社会化基金,供给工人子女上到七年制学校和九年制学校毕业并到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学习。正是物质条件使工人不可能在七年和九年供自己的子女上学、穿衣、吃饭和买教科书,而后再送他们到高等技术学校继续深造。我们给予成年工人的助学金使他们没有可能去上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

学校,因为工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家庭负担。其实,有大量熟练工人干部可以派去上高等技术学校。根据我们的资料,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有将近10%的工人,即数万名工人受过中等教育,许多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中间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很长的工龄,但有真正的无产者。他们成千上万,这些人可以顺利地送入高等技术学校。决议里提出的让工会培养5000名熟练工人上高等技术学校的建议是完全现实的,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大概会在更大的规模上完成⁵²⁶。由工会培养5000名工人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十分清楚,受过中等教育的熟练工人可以很容易地送入高等技术学校。应当选拔既有一定工龄,又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这个决议能够顺利实现,如果这5000名工人将得到经济单位给予的像“千名调干党员”⁵²⁷同样的助学金保障。否则,我们就无法做到让熟练工人去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实习。应当认真提出一项帮助成年工人通过工人速成班去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任务。令人遗憾的是,工人速成班的条件是这样的,在很多情况下农民的比例大于工人。我在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里作的报告中把它们叫作“农民速成班”,因为那里农民数量多。在一些情况下,农民出身的人学习成绩很好,因为他们的社会工作和党的工作负担比较少,从农村得到很大的帮助等。任务在于,让我们派往高等技术学校的工人核心真正巩固起来,以便我们使数量更多的熟练工人能够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学习。

关于老工程师。不言而喻,新工程师和技术员干部的培养丝毫没有取消最大限度地、最好地使用老工程师的任务,特别是数量众多的那“一类”工程师,他们虽然不问政治,态度冷漠,但却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吸收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他们接近我们的任务,激发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紧张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个任务现在广泛地摆在工程技术处面前,也摆在工会的面前。

简短地谈谈推荐、挑选和培养工人担任经济管理领导职务的问题。应当承认,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在国内战争年代,需要的是把工厂夺到自己的手里,那时候工会提拔了不止一百,也不止一千工人担任工业部门的领导职务,担任厂长、托拉斯管委会的主席和委员。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年这项工作工会里没有人管了。现在无论如何得把这项任务重新抓起来。工会必须经常地提拔工业组织者,特别是农业的组织者,让他们担任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领导职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扩大培养工业干部的任务。应当指出,占据着工厂和托拉斯中层环节的远非处处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任命厂长、管委会主席的话,那么我们

却很少提拔工人去担任处里和局里及一些管委会和工厂管委会的职务。同时,我可以根据在工厂里与工人进行的很多次谈话和会见指出,大批积极分子成长起来了,现在我们拥有可以顺利提拔担任企业内外领导职务的工人。我们对他们提拔得不够。提拔、培养、挑选新人的任务首先摆在工会的面前。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竞赛,正是由于生产会议和突击队工作的加强,可以挑选和培养大批后备力量。培养这些后备力量的任务应当在工会的经济工作中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经济机关应当全力帮助这项工作。

主席:现在请卡缅斯基同志发言。

卡缅斯基(工业学院):由于时间短,我没有可能充分地答复布勃诺夫同志,但我将谈谈他的两个论据。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即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论据,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如果从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进行评价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大概十年前就应当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把所有的学校拿走。在领导高等技术学校一年期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然不可能全面掌握这整个工作。我丝毫不想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辩护,但我要说,卡冈诺维奇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完全有理由说,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正确的。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下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学比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下的高等学校昂贵的论据,是个不严肃的论据。我曾经在职业教育总局工作,我了解,例如,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一直比高等工程技术学校便宜。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高等学校的教学总的说相对比较便宜,是很自然的。我只谈了这两个论据。我同意布勃诺夫同志的什么意见呢,只是这一点他说得没有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大胆,这就是需要有一个全联盟的教学法中心,没有这样一个中心要领导全联盟范围的教育问题是不可能的。在每个管理经济的人民委员部里必须建立一个该经济部门(工业技术、农业等)的职业教育管理局。为了协调这项工作和协调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看来,我们最终将不得不建立如果不是联盟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话,那也是某个联盟统一中心,我认为,应当建立联盟教育人民委员部,而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局长们应当参加部务委员会。

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在分析干部问题时它第一次清楚和明确地提出,需要研究的不仅是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保证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这就是,第一,原料的准备,即大学前时期学校的正确安排,然后是大学时期,最后是大学后时期,因为没有一个是能够给人一劳永逸的完整教育。技术、科学在不断前进,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同

它一起前进,甚至赶在它的前面,因为不这样我们在技术上和科学上就不会取得成就。因此,提高业务水平的问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由于时间不够我就只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十分重要,对于我们行政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尤其重要。应当说,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网络,今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函授和面授学习班覆盖大约5万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同时必须指出下面的事实:截至11月1日,只开办了68个学习班,而不是规定的150个,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由于房舍和教师缺乏,而主要是因为经济管理人员不派人去学习。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场合,对它需要专门讨论,但是,尽管这个问题在地方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它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同时,函授教育现在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工业学院附设的函授班吸收了1500名领导干部),如果我们照章把这些学习班办好,我们就能通过它们把函授教育变成大众化的教育形式:我们将在同时间内重新培训大量的工作人员,又能在较短期间(1—2年)培养学员去工业学院这样的学校学习。因为让他们长期离职,比如说三年,像现在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第一,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不能让我们的企业长期缺员;第二,三年的脱产会使工作人员失去专业技能;第三,不能让从前没上过学的35岁的工作人员去当学生,不能不作好学习的思想准备,一下子就把35岁的人调到学校里去学习。因此,开办函授和晚间学习班应当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引起很大的重视。我可以展示莫斯科已经存在了五年的晚间学习班和列宁格勒、乌拉尔等地的晚间学习班。它们吸收最多的是我们的厂长,我们做到了用晚间学习班覆盖他们。我们不是让他们离职三年到工业学院去学习,而是让他们不脱离工作在晚间学习班培训三年,只是在三年晚间学习班毕业后,他们才将离职去学习一年。今年我们已经在莫斯科对此进行了试验。因为时间短,我没有可能谈许多问题。但我认为有必要突出强调对函授和晚间学习班广大网络的注意。

我还想再提一点意见。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得到优秀工程师的任务,我们首先就应当在高等技术学校学生毕业的时候不授予任何人工程师称号。应当授予技术员称号,让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必须在工厂工作五六年以后通过编著某种著作或者在工厂里进行某种改进来表现自己。只有那时他才能够到工厂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社团组织的同意下获得工程师称号。我们以此激励高等学校毕业的青年必须上晚间和函授学习班,更多地阅读书籍来不断提高自己,并迫使他们不要蹲在机关里,因为不在企业里工作五六年,我们是不会授予工程师称号的。第二,我们可以达到这种状况,即真正获得实际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工程师。

主席:已经有18个人发了言,未能发言而抱屈的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如果想要今天结束会议,就应当马上听取总结发言。因此我把结束讨论的问题提付表决。谁赞成结束讨论?谁反对?很少。

现在请卡冈诺维奇同志作总结发言。

古比雪夫:我倒想建议让克拉瓦利同志发言。

喊声:真的,应当让克拉瓦利发言。

主席:讨论已经结束。现在请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

卡冈诺维奇⁵²⁸:我就不谈讨论中涉及的和我完全同意的全部问题了,我只谈那些需要说明或者我有这样或那样不同意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我列举的数字提出了异议。数字是奥斯特罗维佳诺夫⁵²⁹同志根据国家学委(国家学术委员会)的资料提供给我的,这是有科研人员培训委员会学术秘书伊利切夫斯基签字的完全正式的数字。至少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没有否认工业技术教育方面培养研究生非常少的事实。我不反对戏剧和艺术研究生,但我反对艺术研究生多于工业研究生。

第二,关于领导干部。米哈伊洛夫同志提出了一个对经济管理人员进行短期技术再培训的十分重大的问题。工业学院满足不了全体经济管理人员的需求。它能够满足离职三年的那些人,可有些经济管理人员只能离职八个月。因此,应当欢迎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建议并广泛展开这类半年的、一年的或者十个月的培训班的网络。这件事应当详细讨论,以便我们那些重要的经济管理人员能够离职6—8个月去充实自己,而学习八个月以后他们可以自己利用技术书籍等,继续自己的学业。我完全同意这样做,这个建议必须得写进决议里去。

茹柯夫同志指出,我没谈电气工业。当然,电气工业需要干部来大力加强,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我没有谈,不是因为电气工业保障良好,而是因为我主要引证了金属和机器制造业这些最具危险性的部门的数据。然而,对电气工业干部的培养也应当给予注意,是正确的。

其次,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的性质。维辛斯基同志在这里说,“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至今仍然是旧式的贵族学校”。然后他作了附带说明,说他指的是教授,但他只是在有人插话后才作附带说明的。当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已有40%多无产者,高等技术学校的成分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时候,这种估计是有害的偏激。

再次,关于修改教学计划。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干吗要在那里忙活一整年,让我们在1月份前就修改教学计划。当然应当加速进行,但对

这个问题不应仓促行事。同志们,我们对待这个问题非常慎重。曾经在技术院校管理总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教授会议。会上展开了争论。我十分注意地倾听了这些发言;我明白了,用骑兵冲锋的办法打破现有的教学大纲很容易,但编制新的教学大纲却很困难。

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鼓励老教授的保守主义,我们必须与老教授的保守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我们也必须与用“左打右砍”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的想法进行斗争。关于老教授也应当这样说。许多事情确实证明,在老教授中间我们有很多反动的、敌视我们的分子,有很多人只是由于年老而保守,毕竟不能把他们列入反动分子。而我们有时不慎重地把人家列入反动分子。例如,一个教授在工程系讲授了30、40、50年数学,现在他表示怀疑怎么可以删去课程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他不能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他马上便被列入反动分子。我曾亲自见证了这样一件事情,列福尔马茨基教授,一位最年老的教授(我不了解,他忠诚还是不忠诚——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事)在一个会议上发言反对削减化学教学大纲。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我们的研究生,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反动分子。列福尔马茨基教授,还有30—40位学者就坐在那里,而他却说,我们应当撤换像列福尔马茨基这样的老反动分子。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讲授这门化学的苏维埃的列福尔马茨基们。我必须指出,我们的报纸上最近也表露出写得越发尖锐的意向。例如,卡甘-沙布沙伊教授写了一篇题目响亮的文章《从7月到10月》,以此指七月全会到十月全会的时期,并称莫斯托文科同志为反动分子。当然,卡甘-沙布沙伊在学校改革的事情中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派,但在他的高等技术学校里也发现了很多缺点⁵³⁰。[我担心,卡甘-沙布沙伊可别发生梅耶尔霍尔德在剧院发生的情况:起初他是革命派,而后来就落后了。]⁵³¹

我认为,我们必须与保守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与反动教授实际的阶级反抗进行斗争,对反动派给予坚决的反击,真正为改革而斗争。但当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说,我们应当对策略路线进行某些修改的时候,我们必须指出,问题不在于策略路线,党的策略路线是好的。问题在于要实际执行党提出的路线。我们感到不安不是因为策略不好,而是因为策略实际上没有执行。光说不做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在我们的决议,一个很好的决议之后,我们不做任何事情去执行它,那您关于策略路线的一切宏论都毫无用处。如果技术院校管理总局招揽了一批无用的,对在高等技术学校办高等教育是怎么回事完全无知的人,并着手领导和进行教学,那么它当然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结果。如果在职业教育总局里领导工业

技术教育的人是反对七月全会路线的,是反对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里建立集体化系科的,那么事情当然是不会有进展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叫喊,而在于实际执行我们的决议。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刚刚来到技术院校管理总局,作为一个新人,他能够客观地估计情况。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作者,这非常好,但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政治上的大事和不说空话地执行我们的决议。我们需要的是实际执行我们的决议,让我们拥有办得很好的高等技术学校。这才是主要的。

现在谈谈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二次提到我们的面前。看来,已经是该放弃争论的时候了,看来,已经是该理解我们所做的试验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了。瑟尔佐夫同志在这里大体是这样说的:我不建议说,试验没有成功,但我也建议说,试验成功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试验证明,我们使高等技术学校与工业接近了,把一切都翻动了起来*。诚然,工业对待这件事情是无组织的、自发的、无领导的,但是这样做了,之所以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一部分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不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进行中央四月全会上展开的那场关于移交高等技术学校的争论。

柯秀尔:已经过去的阶段。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已经过去的阶段。斯大林同志那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种移交的必要性。布勃诺夫同志毕竟有点不好意思那么快就出来反对自己在上一次全会上的发言,但仍然引起了某些含糊不清。当然,同志们,“存在决定意识”,而有些人却代之以:“职务决定观念。”(笑声)可能,布勃诺夫同志就有点这样。他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是怎么说的呢?在中央四月全会上他说了下面的话。我要强调,我不是在同布勃诺夫同志争论。

我赞成布勃诺夫同志的意见。我同意四月份的布勃诺夫同志的意见,而不是十一月份的。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工业在自己的干部方面必须走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在我看来徒然反对的那条道路,这就是把某一部分高等技术学校和整个再培训系统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道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军事部门,——布勃诺夫同志问,——有自己的各种学校?而且我们的学校并不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差,我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工业中搞这件事情?这是非常有好处的”等等。

* 原文如此。——编者注

臧声：那时候他不是教育人民委员。

有人臧：你站到他的位置上试试。

卡冈诺维奇：布勃诺夫同志在四月全会上是这样发挥自己的想法的，我认为，他说得对，生活完全证实了这个想法。

我这样来提出问题：如果在技术院校管理总局不好，在工作不好，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取得了成绩，那么我们作了改进之后，今年会取得什么结果呢？我认为，我们将取得5—10倍大的成绩。为什么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而是去反对已经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已经付诸实施并且符合我们的需要。有人问我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作用。我同意布勃诺夫同志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建立检查处、关于同时加强教育人民委员部作用的建议。只是应当辨别清楚：“什么样的作用”。根据我们党的纲领，我们有统一的教育系统。我们必须保留纲领规定的这个原则，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主管部门并不意味着破坏我们党的纲领。当然，工业可能会追求简单化。工业可能会出现尽快培养出更多专业人员的愿望，由此可能会产生某种简单化。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此应当予以注意并实行教学法和教学大纲方面的指导。如果谈到实践，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我们作为实践家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实干，如果以布勃诺夫同志为代表的教育人民委员部认真抓这件事情，如果这将召集会议，我相信，布勃诺夫同志将从实质上对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工作实行真正的总的领导，而不是从形式上为自己要求权利，那工业部门是不会反对这样做的，你们只会用自己的权威性、培养教师的工作和科研机关的工作等给工业以帮助。

大家在这里谈了前景。布勃诺夫同志，我不排除将来有可能把高等技术学校重新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

布勃诺夫：莫洛托夫也这样说过。

卡冈诺维奇：这种辩证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将来”。我们现在分开，因为现在，像斯大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着速度问题。速度问题的尖锐性在于根本改变人才培养制度。我们培养工程师不单是为了神圣的科学，而且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技术改造和有关的组织工作。同志们，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应当把已经移交的高等技术学校留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且还要再移交一些。

我们有什么可以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呢？我们打算移交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培养机械师、建筑工程师、电气工程师、造船工程师等的列宁格勒工学院。应当移交像罗蒙诺索夫学院这样的学院及其拖拉机发动机系。我顺便指

出,根据我们的资料,在拖拉机制造方面,教育人民委员部计划今年培养33人,明年13人,后年22人,而到五年计划末培养29人,要知道,这可是个丢人的数字。接下去我们应当移交乌拉尔工学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哈尔科夫工学院。瞧,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好像在犹豫,而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好像曾经赞成这样做。

斯克雷普尼克:有我的参与。

卡冈诺维奇:基辅工学院也应当移交。

至于农业,我们必须加速培养集体农庄专业人员。为了给集体农庄培养农艺师、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像国内战争时期加速培养红色指挥员、医生等那样提出问题。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这应当由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来做。为重新培训这些专业人员,必须选拔工人、农民实干家,主要是雇农和贫农。有很多优秀的、有本事的实干家,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当组织对他们的培训。可以把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和沃罗涅日农学院移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

丘巴尔:移交给谁?移交给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卡冈诺维奇:我认为,应当移交给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乌克兰有一所农学院。

斯克雷普尼克:有。

卡冈诺维奇:也可以把乌克兰这所并过去。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请求把乌克兰这所学院并过去。

斯克雷普尼克:我根本没有请求。我反对移交高等农业学校。

卡冈诺维奇:我认为,我们正是应当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并进行移交。这一点我们没有写进决议,我想,政治局会最终决定这个问题⁵³²。

最后,关于培养熟练工人和中级技术人员的问题。克鲁斯卡娅同志在这里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应当加速培养中级技术人员。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也许,决议对这一点应当说得更明确,以便让大家了解,我们需要加速培养中级技术人员。我们可以从工长中培养中级技术人员,培养实际工作者。我已经举了我们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与美国的比例。应当考虑到,我们的熟练工人与美国的熟练工人是大不相同的。与美国的熟练工人不同,我们的熟练工人是多面手。不久前一些美国工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有人问他们:“你的技能是什么?”其中一个回答说:“我的技能是12号螺丝帽。”那里的分工就是这样。而

我们的熟练工人是多面手。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员比较容易。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加紧努力。

怎样培养工人上高等技术学校呢？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这里表示反对我们不经过工人速成班、不经过现在网络进行培养。当然从现有体制的观点看，这是对的；中等学校应当成为综合技术学校，直接培养人上大学，上中专。但是请注意，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只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必须比我们设想的更大地扩大工人教育网。我要强调指出，例如，我们的晚间工人速成班现在占了上风。在晚间工人速成班里工人占80%，而且曲线正在不断上升，而日间工人速成班一半已经是农民速成班，只是今年我们才使曲线多少保持了平衡。这就是不能让活生生的事业服从公式的原因。工人教育系统应当更加扩大，事情应当这样安排，让每一个设备比较好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都来培养熟练工人、工长、技术员，甚至工程师。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了我们提纲里具有十分重大原则意义的一点。我们打算作为试点建立一两个企业—学校。

有人喊：太少。

卡冈诺维奇：让我们不要着急；这是件新鲜事，让我们建立一两个作为试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在企业里组织对低级、中级和高级人员的培养。他们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晚间工人速成班的曲线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工人不想离开自己的企业，同时又想要学习和准备上大学。因此，应当使学校靠近工厂，靠近国营农场。30—40个装备良好的最大的国营农场也可以培养中级农艺人员。

安采洛维奇：有三百多个大型国营农场。

卡冈诺维奇：不要一下子抓300个，让我们暂且就选定30—40个吧。

工厂也是一样——必须使人才培养接近工厂，在这里我接近了曾经引起争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同意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发言，他说，我们需要培养“车床工”，培养与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根本没有联系的技能狭窄的工人。

同志们，你们要注意，在这里应当把我们的原则方针和今天迫不得已的需要分开。

我们的原则方针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我不想多劳你们的注意：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第460页上，他非常广泛地发挥了这个思想⁵³³。

柯秀尔：共青团员们已经使这段引文相当普及了。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共青团员们已经使这段引文相当普及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十分尖锐地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全面教育的问题⁵³⁴。现在米哈伊洛夫同志提出建议,让我们在培养熟练工人的时候稍微离开一点这个原则。

米哈伊洛夫:我根本没提过这样的建议。

卡冈诺维奇:您说:“我们需要三四个月就能培养出来的车床工。当你向共青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大喊:‘救命啊,他们将是政治上的文盲。’”也许,这是口误,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丝毫不想说,你们有什么倾向。问题不在于倾向,问题在于实质。而实质在于,我们必须加速从青年中培养熟练工人。我们必须培养无产者,他们不应当是机器的目光短浅的附属物。

斯大林:把我们的共青团员培养成苏联的公民。

卡冈诺维奇:培养成为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参加使群众主动性得以发扬的自我批评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公民。在十月革命节的日子共青团组织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仅莫斯科就有10万青年工人参加,这种义务劳动表明了广大青年群众的极大的主动精神。我们需要共青团员一无产者,苏维埃国家的公民,而不是机器的目光短浅的附属物。但同时我不能不指出来自共青团员方面的某些冒进和偏差……

斯大林:这是对的!

卡冈诺维奇:共青团员们这样提出问题:

“让我们受全面的综合技术教育,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的那样。”同志们,我们还不是一切都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里所写的那样。我们实现了工作的主要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更多的工作还在面前,我们在建设中还有很多困难。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我们不仅需要资本,也需要劳动力,也需要工程师。我们是在困难和穷困的情况下建设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穷困,也就不会有争论了。我们是在困难极大的情况下建设我们的国家的,因此我们不能向无产阶级国家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像共青团员常常做的那样,要求把工厂艺徒学校实际上变成学院。我们必须给予政治教育、普通教育,但是我们也必须加速培养劳动力。科萨列夫同志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从工厂艺徒学校直接拉去上大学。

从工厂艺徒学校毕业的学生,年龄在15—16岁。工厂艺徒学校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但工厂艺徒学校不是锻炼和教给生产技能和纪律的学校。工厂艺徒学校毕业之后,你们可以让工人少年通过工厂、通过车间、通过劳动纪律锻炼,而同

时也可以让他们准备考大学。让他们在工厂里工作一段时间,而后也可以放他们去上大学,而不是马上去,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工厂艺徒学校毕业,然后就去上高等技术学校,高等技术学校毕业就去当厂长。需要通过生活这所学校,应当在企业里工作一段时间,那你就能够学会一些东西并将成为工程师。你在车间里干一段工程师,在别列兹尼基什么地方,在某个偏僻的地方工作一段,在农村里干一段农艺师,得到相应的经验,而后你就会成为国营农场的领导者、工厂的厂长,或者甚至是托拉斯的主席。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有着提拔的无限空间,而提拔在大规模地进行。

戈尔茨基同志在这里谈了提拔。问题在于被提拔的进入机关的人是有文化的,而不是钻进去的。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否则受罪的是他自己,受损失的是事业,受损害的是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把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培养,领导干部的重新培训与工厂里培养的、经过某种学校学习的无产者的大量提拔结合和联系起来,——那时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力量,让官僚主义无法存在。我们在青年中间看到了简直是急于想要工作的情绪。妇女的大军也在不断走上工作岗位。我们正在工业学院和其他高等学校里培养数量相当多的妇女。这是一支资本主义所没有的新的工作者的大军,这是一支新的十分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切潜力。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国家依靠最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给予我们的一切资源利用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主要任务。

主席:有人建议不成立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决议修改委员会,而把决议草案交给政治局最后审定,把所有的修改意见一并送去⁵³⁵。谁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弃权?没有。建议通过。

为了结束全会的工作,明天我们必须结束各个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建议控制数字问题委员会明天11点在这里开会,而集体农庄问题委员会下午1点在隔壁大厅里开会。下午3点将开全会的总结会议。

现在散会。

第十四次会议

11月17日,晚上

主席(鲁祖塔克):现在继续开会。

乌格拉诺夫同志请求让他优先发言。

喊声:让他讲。

主席:乌格拉诺夫同志。

奥尔忠尼启则:让我们听听,是怎么回事。

乌格拉诺夫(宣读):“同志们,请允许我发表以下声明。党中央委员会了解,我们与中央委员会在对待国内经济形势问题上曾经有过分歧。

特别令我们不安的是,工人阶级与中农有分裂的可能。

过去的经济年度和粮食收购的结果表明,是我们错了,因此我们认为需要向党声明这一点。

党正在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

我们党的队伍越是在党所执行的总路线和对右倾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进行坚决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党和工人阶级就能够越加容易地解决摆在前进道路上的任务和困难。

我们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呢?是与党和工人阶级保持一定距离并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呢,还是与全党步调一致前进呢?我们认为,应当与党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胜利地斗争。H. 乌格拉诺夫和叶戈尔·库利科夫。”

(掌声)

主席:现在转入对决议的讨论。请允许我代表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委员会报告委员会所作的修改。

首先,我向大家通报,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作了一系列数字方

面的改变和校正,这没有改变提纲的性质,但使某些数据更准确了。我就不宣读它们了,因为决议大概明天,最迟后天就能印出来,所有手头有材料的同志都会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因此,我将只谈委员会采纳的那些修改意见。

材料第7页,在“彻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是进一步加速农业集体化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及加速发展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钥匙的工业”一句后面,委员会建议加上下面一句:

“在本经济年度,应特别注意使春耕运动顺利进行。”

请允许把每一处修改立即提付表决。全会对修正案有反对意见没有?

喊声:没有。

主席:第9页第一段末尾谈到今年总产值增加的地方,最后一句:“……这是完全符合于国家工业化的方针,符合于加强国防力量以及使苏联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的方针”之后,加上以下文字:

“因此应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增加产量,使之超过原定计划(特别是在矿石、焦炭、黑色及有色金属方面),并同不节省这些十分缺乏的物资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对这个修正案有反对意见没有?通过。

接着在同一页上“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大量增加”的字句后面,加上下面的话:“是由于扩充灌溉系统,改变耕作技术和增加矿质肥料生产的结果”,接下去像印刷稿那样,“应保证棉花产量增加”等。

对这个修正案有没有反对意见?通过。

同样在第9页的一段里说:“应当组织102个机器拖拉机站”,应当改变如下。这一段应当这样开始:

“在1929—1930年度,应供给农业4万台拖拉机(每台拖拉机以10匹马力计算),用这些拖拉机组织102个机器拖拉机站,这样可以使社会主义成分的耕种面积增加100万至150万公顷^①。”末尾再加上:“并且大大加强集体化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基地。”

有没有反对意见?通过。

然后,第12页上谈到保证实际工资的重要性并列举哪些组织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实际工资提高的地方,漏掉了一个词:“合作社的”。应当这样说:“一切苏维埃的、工会的”接着加上:“合作社的”……工作。

^① 原文如此,附件3为“150万至200万公顷”。——译者注

我希望,没有反对意见吧?通过。

第11页,在这一页的最末尾谈到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的地方,作以下补充:

“责成所有的地方的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工会组织,在第一季度就全速展开工作来实现这一指示,以保证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

有没有反对意见?通过。

第14页倒数第二段谈右倾的地方,在“布哈林集团彻底暴露了自己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的字句之后,加上:“因此,全会决定:凡是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同右倾机会主义调和的观点的人,都不能留在联共(布)的队伍中。”

有反对意见没有?通过。

委员会没有进行更多的修改。现在我把关于控制数字的整个决议提付表决。谁赞成?谁反对?请举手。

乌加洛夫:我有声明。我投票赞成决议谈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至于倾向:右的和其他的,我投票反对这一部分。

斯大林:不能这样投票,我们只有一个决议。

主席:谁弃权?没有。全体赞成,一票反对。

由于这个决议,委员会还通过了一个决定……

莫洛托夫:他投“赞成”票了吗?

主席:投了。

伏罗希洛夫:他投了从某页到某页的票,而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席:乌加洛夫同志说了什么,这里都速记下来了,我不能说再多了。

莫洛托夫:他投“反对”票了吗?

主席:投了。

我再一次提付表决。谁反对这个决议?请举手。

托姆斯基:我不弃权,但我认为,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宣读的那个文件充分地显示了我个人对控制数字的态度和对控制数字的表决。

主席:现在表决中央的决定。

托姆斯基:我再说一遍,那里面,这个文件里说了些什么。我赞成控制数字,赞成整个决议,除了那些我认为对布哈林同志不公正的攻击。

有人喊:亲爱的,彻底乱套了。

主席:我认为,这种表决方式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根据在讨论控制数字时谁

是怎么说的来收集选票的。我们是经过讨论达成了现在提付表决的明确决议的。

托姆斯基：我投“赞成”票并附加我宣布的投票理由。

主席：谁弃权？没有。

委员会建议全会通过一个单独的记录决定，不把它列入总的提纲：

1. 委托政治局根据各地区的特点研究关于促进和发展个体中农户的畜牧业的问题，特别是研究修改征收农业税的牲畜的年龄构成问题。

2. 鉴于从地方工业收回控制数字所规定数额的资金对于完成基本建设工程计划的极端重要性，重申政治局关于所有的党组织无论如何必须执行这一决定⁵³⁶。

3. 认为苏联电影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文化意义，委托政治局单独研究在我们国内紧急组织电影胶片生产的问题。

4. 委托政治局从纸张供应的角度研究造纸和印刷工业的问题⁵³⁷。

罗伊津曼：对。

主席：对这些建议有没有反对意见？

格里亚金斯基：我认为，关于从地方工业收回资金的条款应当从这个决定里删去，因为从地方工业收回资金意味着，主要靠内部资金发展地方工业的地区今年不可能进行任何投资。如果来自最大工业地区的同志们没有反对意见，那么来自工业处于萌芽状态地区的我们则坚决反对这种削弱地方工业的做法。这将意味着，对于我们地方工业的继续发展将没有任何刺激和可能，我认为，对整个地方工业的这种决定不应当通过。假如说，也许可以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收回，那么无论如何不能从我们这些贫困地区收回。因此，我们请求不要批准这个决定，而让政治局适当地把它细化。

鲁祖塔克：我来发言为这一条辩护。起初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有过怀疑，是否需要通过这个决定，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个政治局的决定。但是，由于一些同志表述了格里亚金斯基同志的观点，认为这个决定对于他们不是必须执行的，由于这个决定的执行才能保证你们在这里刚刚通过的那些控制数字实施，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建议全会重申政治局的这个指示。

现在科马罗夫同志还请求发言。我们通常是这样的情况，对修正案一个人发言表示“赞成”，一个人表示“反对”。

喊声：让科马罗夫发言！

主席：谁赞成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谁反对？多数。

谁赞成通过这个决定,包括收回地方资金的问题?谁赞成整个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弃权?通过。

其次,全会委托委员会研究三人声明问题并就此问题提出决议草案。请允许我宣读这个决议草案。

喊声:读过了!

主席:大家都看过这个文件了吗?

喊声:是的!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修改:去掉决议末尾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的姓名。

主席:鉴于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同志的声明,决议里提到的人需要作相应的修改。

Г.彼得罗夫斯基:请允许我就表决问题发言。

同志们,我在这次全会上就控制数字的发言谈到了右倾,我的发言被看作是对右倾的庇护。这不符合我的工作和反对右倾斗争的情况。有几位同志就这个问题发了言并对我颇有微词。

斯大林:有微词不行吗?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们,如果我用这种语调说话,只不过是希望创造比较宽松的条件让三人同志式地承认他们的错误。令人遗憾的是,这没有得到他们思想上的回应。他们编写了一个文件,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和在党内的处境变得更加严峻了。因此,我,这样说吧,将非常轻松地投票赞成提付表决的关于这三位同志的最低建议。

主席:没有人要求宣读文件?

喊声:没有,大家都读过了。

主席:我现在提付表决。谁赞成委员会提出的这个决议?谁反对?两个人。谁弃权?没有。

我收到了布哈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以下字条:

“我请求在表决《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决议》的时候宣读我的下列声明:

1. 对整个决议我投反对票;
2. 关于把我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这一点我不表示意见,因为由于我们党完全合理的传统,我不能捍卫我自己作为这个或那个岗位的人选。

尼古拉·布哈林

1929年11月17日莫斯科”

其次,委员会建议把本决议的发表问题交给政治局决定⁵³⁸。有反对意见没有?

臧声:没有。

斯大林:能否这样安排,把与右倾决裂的某些同志——科托夫、米哈伊洛夫、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的声明在报刊上发表⁵³⁹?可以这样做吗?

臧声:我们请求,请求。

主席:现在请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

安德烈耶夫:同志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委员会刚刚结束工作。修改意见还没有印出来。

柯秀尔:我们不能等了。

安德烈耶夫:在委员会里没有特别有争议的修改意见,因此我认为,整个决议连同修改意见可以一起批准,委托政治局最后定稿。[对补充条款,也像对控制数字那样,予以通过,对即将到来的春播运动的进行要特别加强注意。这一条尚未成文,委托政治局确定表述措词。我建议通过这个方案。]⁵⁴⁰

主席:我现在付诸表决。谁赞成安德烈耶夫的建议?谁反对?谁弃权?没有。好像议程上再没有问题了吧?现在请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关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莫洛托夫:同志们!我们应当决定关于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中央全会成员经过预先酝酿正在形成这样的意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我们应当定在1930年春天于5月份召开。

斯大林:播种结束以后。

莫洛托夫:建议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定于1930年5月举行,代表大会召开的准确时间和议程可以委托政治局确定⁵⁴¹。

主席:对此有没有反对意见?通过。

关于组织局的组成人员

主席:现在请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提出关于组织局组成人员的建议。

卡冈诺维奇:同志们!书记处建议批准加马尔尼克同志为组织局委员和什维尔尼克同志为组织局候补委员。

主席：谁赞成这些建议？谁反对？通过。再没有任何建议。
全会现在闭幕。

附 件

1

1929年11月10—17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 第7号记录

出席的有：

联共中央委员：

阿库洛夫、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阿尔秋希娜、巴达耶夫、鲍曼、布勃诺夫、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马尔尼克、戈洛谢金、多加多夫、茹柯夫、泽连斯基、卡巴科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克维林、基尔基日、基洛夫、克诺林、科洛季洛夫、科马罗夫、大柯秀尔、科托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库比亚克、库利科夫、古比雪夫、洛博夫、洛莫夫、柳比莫夫、曼努伊尔斯基、梅德韦杰夫、米高扬、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莫斯克温、奥拉赫拉什维利、彼得罗夫斯基、波斯特舍夫、皮亚特尼茨基、鲁祖塔克、鲁希莫维奇、李可夫、斯克雷普尼克、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斯捷茨基、斯特里耶夫斯基、苏利莫夫、瑟尔佐夫、托洛孔采夫、托姆斯基、乌加洛夫、乌格拉诺夫、乌汉诺夫、丘巴尔、丘多夫、施瓦茨、什维尔尼克、施米特等同志。

联共中央候补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安采洛维奇、巴拉诺夫、布留哈诺夫、瓦列伊基斯、格里

亚金斯基、口丹诺夫、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卡达茨基、卡雷金娜、卡明斯基、基谢廖夫、克利缅科、康德拉季耶夫、克里尼茨基、列昂诺夫、洛佐夫斯基、洛卡茨科夫、洛米纳泽、马尔科夫、梅日劳克、美尔尼昌斯基、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米尔佐扬、穆萨别科夫、尼古拉耶娃、诺索夫、奥新斯基、奥什温采夫、波隆斯基、鲁缅采夫、伦金、留京、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索博列夫、斯特罗加诺夫、苏霍姆林、温什里希特、乌雷瓦耶夫、哈塔耶维奇、齐洪、恰普林、丘维林、丘茨卡耶夫、埃利亚瓦、埃赫等同志。

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鲍尔、别连基、И. 波格丹诺夫、П. 波格丹诺夫、瓦西里耶夫、维克曼、维克斯宁、维什尼亚科娃、加列耶夫、戈尔茨曼、贡恰罗夫、戈尔恰耶夫、格罗斯曼、格鲁泽里、古列维奇、古谢夫、杰索尔、叶戈罗夫、叶努基泽、赞格维尔、扎东斯基、泽姆利亚奇卡、伊利英、卡冈诺维奇、B. 卡拉什尼科夫、M. 卡拉什尼科夫、卡尔马诺维奇、卡尔宁、卡拉瓦耶夫、科科维欣、科米萨罗夫、科皮耶夫、Г. 科罗斯捷列夫、科萨列夫、克里沃夫、拉林、列别德、利西岑、雷切夫、利亚克苏特金、马约罗夫、马尔采夫、曼扎拉、马丁诺维奇、米柳亭、米特罗法诺夫、纳扎列强、纳扎罗夫、尼科诺罗夫、诺沃肖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奥西莫夫、帕夫卢诺夫斯基、帕斯图霍夫、彼得斯、佩列卡托夫、波德沃伊斯基、拉杜斯-津科维奇、罗森霍尔茨、罗兹米罗维奇、罗伊津曼、谢尔加宁、斯米多维奇、斯莫罗金、索尔茨、斯特列利佐夫、斯图季托夫、特里利谢尔、菲加特纳、菲勒、沙茨金、施韦泽、舍博尔达耶夫、什基里亚托夫、舒什科夫、尤尔岑、雅科夫列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A. 雅科夫列夫等同志。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波格丹诺夫、贝京、弗拉基米尔斯基、列帕、利亚多夫、里亚比宁、里亚博夫、斯捷潘诺夫、尤列维奇等同志。

总计出席：

中央委员——64人，中央候补委员——48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0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9人。共计——201位同志。

听取并决定：

1929年11月13日的决定

1. 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指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同志)。^{*}

(1)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提纲予以基本通过。

(2)为了对提纲进行最后校订和起草关于三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文件的决议草案,成立由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米高扬、瑟尔佐夫、基洛夫、鲍曼、多加多夫、什维尔尼克、戈洛谢金、瓦列伊基斯、库比亚克、雅科夫列夫、丘巴尔、安德烈耶夫、埃赫、柳比莫夫、布勃诺夫、洛博夫、卡巴科夫、柯秀尔和伏罗希洛夫。

由鲁祖塔克同志召集。

1929年11月15日的决定

2. 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卡明斯基同志)。

(1)基本批准根据卡明斯基同志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2)为了对决议进行最后校订,成立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安德烈耶夫、加里宁、卡明斯基、米高扬、斯大林、莫洛托夫、安采洛维奇、库比亚克、戈洛谢金、彼得罗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阿尔秋希娜、哈塔耶维奇、埃赫、瓦列伊基斯、舍博尔达耶夫、伊克拉莫夫、梅日劳克、科马罗夫、鲍曼、别连基、雅科夫列夫、弗拉基米尔斯基、多加多夫同志。

由安德烈耶夫同志召集。

3. 乌克兰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柯秀尔同志)。

(1)基本批准根据柯秀尔同志关于乌克兰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2)决议的最后校订和有关拨款问题的研究委托中央政治局

^{*} 在各个附件和补充材料里保留了文件中原有的着重符号。

进行。

4. 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同志)。

批准根据莫洛托夫同志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1929年11月16日的决定

5. 关于中央七月全会的培养技术干部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卡冈诺维奇同志)。

(1)基本批准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中央七月全会培养技术干部决定执行的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

(2)决议的最后校订和对所有修改意见的研究委托中央政治局进行。

1929年11月17日的决定

6. 关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报告的决议草案(全会委员会的报告)(鲁祖塔克同志)。

(1)批准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草案及委员会进行的修改⁵⁴²。(一致通过。托姆斯基和乌加洛夫同志投票赞成决议,关于右倾分子的一条除外。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缺席)。

(2)委托政治局根据各地区的特点研究关于促进个体中农户畜牧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研究修改征收农业税的牲畜的年龄构成问题。

(3)鉴于从地方工业收回控制数字所规定数额的资金对于完成基本建设工程计划的极端重要性,重申政治局关于所有的党组织无论如何必须执行这一决议的决定。

(4)认为苏联电影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文化意义,委托政治局单独研究在我们国内紧急组织电影胶片生产的问题。

(5)委托政治局从保证纸张供应的角度研究造纸和印刷工业的问题。

7. 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集团(鲁祖塔克同志)。

(1)批准全会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决议草案及

由于乌格拉诺夫等同志与右倾分子决裂的声明而对决议草案中提到的人名进行的修改。

(全体通过,托姆斯基和乌加洛夫同志两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同志缺席。)

(2)本决定的发表问题交政治局处理。

8. 关于卡明斯基同志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的决议草案(全会委员会的报告)(安德烈耶夫同志)。

(1)批准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及委员会所作的修改。

(2)决议的最后校订委托政治局进行。

(3)认为有必要对即将到来的春播运动的进行给予集中的特别的注意。对此问题的最终决定委托政治局作出。

9. 关于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莫洛托夫同志)。

(1)定于1930年5月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2)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议程委托政治局最后确定。

10. 关于中央组织局的组成人员(卡冈诺维奇同志)。

(1)批准加马尔尼克同志(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为组织局委员和什维尔尼克同志为组织局候补委员。

2

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决议

1929年11月17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准

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1929年11月12日的声明后,查明下列事实:

(1)声明人指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说全会把他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想这样来向党力争与政治局同等的“权利”,以便作为平等的一方同党“自由地”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力争以他们为首的右倾派别集团的合法化。

(2)现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在自己的一切预言遭到可耻的破产之后,不得不承认党取得无可争辩的胜利,在自己的声明中假装宣布“取消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又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在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的政纲中曾得到阐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曾加以斥责,认为“是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的”)。

(3)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同志)对于党没有完成工资方面和农业方面的计划进行煽动性的指责,硬说“非常措施”使中农倒向富农方面去了,他们想借此对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发动新的攻击。

(4)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斥责布哈林同志的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把布哈林同志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根据上述事实,中央全会不能不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1929年11月12日新文件是派别活动性质的文件,是与托洛茨基分子的“退却”手腕(托洛茨基分子曾多次使用所谓折中主义的声明作为准备对党发动新的攻击的

方法)相类似的政治破产者的派别活动手腕。

因此,中央全会驳斥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一种敌视党的文件,并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作出如下的决定:

(1)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2)警告李可夫、托姆斯基同志以及没有同右倾分子划清界限、没有摒弃对右倾分子的调和态度的乌加洛夫同志,如果他们企图继续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和决议,党就立即给他们以适当的组织处分。

3

关于 1929—1930 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

1929 年 11 月 17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上一个经济年度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上一年度的总结表明,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绩。

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完成,而在许多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中,五年计划的任务则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产值增加了 23.7% (五年计划原定增加 21.4%),其中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产值增加了 29.8% (五年计划原定增加 25.6%)。发电能力增加了 20.3% (计划原定增加 14%)。铁路的货物周转量增加了 21% (计划原定增加 10.1%)。

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发展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原定任务,再加上工业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增加了 7.8%)、无产阶级阵地的巩固和政治积极性的提高等条件,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集体农庄在贫中农群众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基础上蓬勃地发展起来。结果,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的预计。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总数由 1927—1928 年度的 445 000 户增加到 1928—1929 年度的 104 万户(五年计划原定增加到 564 000 户)。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由 1927—1928 年度的 140 万公顷增加到 1928—1929 年度的 430 万公顷,增加了 206.7% (五年计划原定增加 137.4%),总产值增加了 240.5%,商品产值增加了 278.3%。集体农庄的

商品产值在农业的全部商品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 1927—1928 年度的 1.4% 增加到 1928—1929 年度的 4.9%,在商品粮食方面所占的比重,由 4.5% 增加到 12.9%。

集体化的这种空前未有的超过最高估计的速度,表明广大的中农根据实际经验已经确信集体耕作形式的优越性,随贫农之后参加了集体化运动。

贫中农群众对集体农庄的态度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完全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党在农村中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加强了工人阶级在它同贫中农的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迅速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加强了生产结合,这种转变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农业集体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到 1929 年春天,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已增加了 27.5% (计划原定增加 26.3%),粮食的总产值已增加了 34.7%。

在 1928—1929 年度,农业中的公有部分的总产值共达 6.128 亿卢布 (1927—1928 年度为 2.832 亿卢布),商品产值达 2.639 亿卢布 (1927—1928 年度为 1.345 亿卢布)。整个公有部分在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年之内由 2.5% 增加到 5.8% (计划原定增加到 4.9%),在整个商品粮食中所占的比重由 12.2% 增加到 21%。

农业中公有部分的播种面积和贫中农的播种面积增加的数量,超过了富农和富裕农户的播种面积减少的数量,这样,播种面积共增加了 5% (略少于原定计划)。

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和商品产值的增加,预购合同的加多和农业的公有部分在商品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所有党的、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机关在粮食收购工作方面的共同努力,对于为完成计划和克服富农的抵抗和怠工而斗争的贫中农的组织工作的加强,对粮食投机和富农隐藏余粮行为的镇压的加强,以及对农村的工业品供应的改善等等,——所有这一切,保证了粮食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使粮食收购工作的成绩大大超过往年,并使我们在今年就能拥有 1 亿普特的粮食储备。

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公有部分的比重增加了:在投资方面由 55.2% 增加到 65.2%,在固定基金方面由 51.7% 增加到 54.1%,在总产值方面由 41.9% 增加到 43.5%。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完全相反,在过去一年中,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实际工资提高了(虽然略低于原定计划)。约有 50 万工人

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物质、文化设施(如住宅建筑、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开支也增多了。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是和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的提高分不开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创造积极性提高的结果。这种创造积极性表现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自我批评、举行工业化日和普遍认购工业化公债(认购数字大大超过了公债发行额)等方面。由于进一步加强了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党组织、工会、苏维埃)的工作活跃起来了,它们都在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日益面向生产,面向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经济任务。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分子(农村中的富农、城市中的耐普曼、生产中的破坏分子)的抵抗,也加强了。

上一经济年度的这些总结,充分证明党的全部政策是正确的,并说明右倾分子(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立场已经彻底破产,因为这种立场无非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的反映,无非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张皇失措,无非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投降。

右倾分子硬说农业“退化”了。但实际上贫中农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播种面积普遍扩大了,机器的供应增加了,农业的物质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也提高了。

右倾分子硬说什么贫中农群众同工人阶级“分裂”了。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了,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加强了,这表现在农业集体化的蓬勃发展和国营农场的建设上。

右倾分子曾经预言饥荒和粮食进口是不可避免的。但实际上我们收购的粮食增加了,国内生产的粮食保证了全国的需要。此外我们还建立了数千万普特的粮食储备,并且在贸易方面达到了出超和积累了外汇。

右倾分子硬说计划所规定的国家工业速度是难以达到的。但实际上我们不仅完成而且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

右倾分子说计划所规定的集体化速度和国营农场建设速度是不能实现的,说我们没有必要的物质技术前提,说贫中农不愿意实行集体耕作制。但实际上农业集体化蓬勃发展了,贫中农户都渴望采用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集体农庄运动事实上已经开始发展到整区地实行全盘集体化的程度。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新时期。

右倾分子由于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而要求迁就“薄弱环节”,消极地适

应困难。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克服了困难,使生产力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得到了进一步的超计划的发展。

右倾分子硬说经济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生产和再生产的正常进程必然会遭到破坏。但实际上生产增长之多,速度上升之快,都出乎我们的意料,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五年计划的最高方案在实际上变成一个最低的方案。

只是由于坚决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富农资本主义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使党离开我国发展的总路线的企图,工人阶级和党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前进了一大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困难,并且这些困难因资本主义分子的抵抗而日益严重起来。克服农业,特别是谷物业和畜牧业部门的发展过分缓慢的现象,仍然是党的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彻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是:进一步加速集体化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及加速发展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钥匙的工业。

在本经济年度,应特别注意使春耕运动顺利进行。

愈来愈多的广大的贫中农群众采用集体耕作制的情况下,解决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在生产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生产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的工业部门)落后于集体化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实际速度。

无论对于农业或工业来说,化学工业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

虽然机器制造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机器制造业的生产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

在燃料以及黑色和有色金属的供应方面,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由于这些物资的缺乏,机器制造业和电气化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物质技术改造都难以按照预定的速度进行。

虽然在工业品和其他“次要”输出品的出口方面已获得巨大成绩,但加紧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出口部门(首先是木材出口部门)仍然是目前的迫切任务;由于这些部门的发展较慢,国家所必需的机器、半成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遭到了阻碍和困难。

最后,作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之一的各种运输业的问题日益严重起来。

二

考虑到上一年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发挥工人阶级的新的潜力和实行“连续生产制”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就,并根据基本农民群众大批参加集体农庄运动这一转变的情况,中央全会规定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如下:

(一)国民经济基本投资应达到130亿卢布左右(五年计划原定为102亿卢布。而1928—1929年度为85亿卢布。),其中计划工业和电气化的投资为40亿卢布(五年计划原定为28亿卢布),运输业的投资为19亿卢布(五年计划原定为15亿卢布),农业的投资为43亿卢布(五年计划原定为35亿卢布),其中农业公有部分的投资应达16亿卢布(五年计划原定为6亿卢布);教育卫生事业的投资为6.46亿卢布(上一年度为3.36亿卢布)。

(二)国民经济固定基金应自1928—1929年度的745亿卢布增加到1929—1930年度的852亿卢布,即增加14.4%(1928—1929年度固定基金增加7.2%)。工业和电气化的固定基金应自1928—1929年度的128亿卢布增加到1929—1930年度的175亿卢布,即增加37.1%,在整个国民经济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重,则应自1928—1929年度的17.1%增加到20.5%。运输业的固定基金应自127亿卢布增加到145亿卢布,即增加14%,农业的固定基金应自300亿卢布而增加到318亿卢布,即增加6%。

(三)基本投资和国民经济固定基金的增加,会保证产值大大增加。

整个工业的总产值应自1928—1929年度的223亿卢布,增加到1929—1930年度的280亿卢布,即增加25.8%强。

计划工业的总产值应自1928—1929年度的137亿卢布而增加到1929—1930年度的181亿卢布,即增加32.1%(五年计划原定增加21.5%),其中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总产值应增加45.1%,这是完全符合于国家工业化的方针,符合于加强国防力量以及使苏联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赖的方针的。因此应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增加产量,使之超过原定计划(特别是在矿石、焦炭、黑色及有色金属方面),并同不节省这些十分缺乏的物资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农业总产值在1930年应较1929年增加13%。在1930年农业播种运动中应保证播种面积增加10.5%,其中谷物播种面积应增加10%,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应提高8%,从而使谷物总产量提高16.6%。

由于扩充灌溉系统,改变耕作技术和增加矿质肥料的生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应大量增加:棉花产量将增加 48.7%,亚麻增加 12.5%,甜菜增加 77%。牛的数量将增加 4.5%,马增加 3.5%,猪增加 10%。

铁路的货物周转量应自 1928—1929 年底的 1 067 亿吨公里增加到 1929—1930 年度的 1 270 亿吨公里,即增加 19%(五年计划原定增加 12.1%)。

国民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应自 1928—1929 年度的 285.34 亿卢布增加到 1929—1930 年度的 343.63 亿卢布,即增加 20.4%。

(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将大大加强。按各种主要指标,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和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应当如下:

	1928—1929 年度	1929—1930 年度
固定基金(至年底)	54.1	59.0
总产值	43.5	51.2
商品产值	69.9	75.4
中介贸易额	93.4	96.7

1929—1930 年度将是农业公有化事业继续大踏步向前发展的一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应自 1928—1929 年度的 180 万公顷增加到 330 万公顷,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应自 430 万公顷增加到 1 500 万公顷。

在 1929—1930 年度,应供给农业 4 万台拖拉机(每台拖拉机以 10 匹马力计算),用这些拖拉机组织 102 个机器拖拉机站,这样可以使社会主义成分的耕种面积增加 150 万至 200 万公顷,并且大大加强集体化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基地。

完成这一农业公有化计划之后,我们将能够以农业的公有部分在 1930 年的收获量中得到 50% 以上在农村以外流转的商品粮食(五年计划原定 1933 年得到 43% 的商品粮食),这样,在进一步推广预购合同制的条件下,就能克服我国的粮食困难,使粮食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

(五)雇佣劳动者的数目将自 1928—1929 年度的 1 220 万人增加到 1929—1930 年度的 1 330 万人,即增加 9.4%,其中工业和运输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将自 590 万人增加到 650 万人,即增加 10.2%,农业工人将自 210 万人增加到 230 万人,这就大大超过五年计划的预计,这是在物资生产和文化建设方面超过五年计划规定,实行连续生产周制,迅速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以及实行多班制等的结

果。由于新劳动力参加生产和文化建设,失业现象不仅将停止发展,而且失业人数也将大大减少。

(六)鉴于工业生产的和运输业的质量指标还很落后(例如工业品的成本只降低了4.5%,而计划原定降低7%),同大量的基本投资很不相称,而且产品质量还有降低的现象,因此1929—1930年度最起码的任务应当是:降低工业品成本11%,降低工业建设成本14%,降低运输业建设成本8%,同时还必须提高运输业工作的技术标准和工业品的质量。本经济年度最重要的任务和完成既定的工业发展计划的决定性条件,就是把劳动生产率提高25%,同时把名义工资提高9%,实际工资提高12%以上。

(七)合作社(集体农庄不在内)投资总额应达13.6亿卢布,一切合作社的纯商品流转额应达到213.75亿卢布。

(八)1929—1930年度的国家预算额应为113亿卢布(五年计划原定为92亿卢布)。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要求全面紧张努力的情况下,要完成财政计划,就必须有一种最严格的预算计划纪律,就必须动用一切物资后备和居民的储蓄,厉行节约制度。

我们在实现这一巨大经济建设计划方面所面临的任务是复杂而困难的,因此,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所有组织和全党必须以最大的关怀、最高的积极性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对待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问题。

对于去年开始的工会“面向生产”的转变,在本经济年度中应巩固和加强,同时应保证贯彻中央委员会关于在一切经济企业中建立一长制的指示。

应该尽量利用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利用外国的技术帮助和外国专家,应该对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技术改造,尽力使它们合理化,——所有这些工作应该更广泛地展开。在工业建设方面,推广各种合理化措施和采用最新的技术和施工方法等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工业方面的新建工程的比重在1929—1930年度将达46.7%,而这些新建工程的成本和完工期限,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各企业应迅速实行连续生产周制,到1929—1930年度结束时,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营工业实行连续生产制。

工业的技术改造的任务和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急速增长,空前尖锐地向党提出了干部问题、技术教育问题和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需要问题。因此,1929—1930年度应坚决加强整个社会文化战线上的工作,使它能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适应经济建设中的新任务。

对于国民经济工作的质量指标,特别是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的完成以及成本的降低,应给予极大的注意。中央全会强调指出,必须把工业品的成本降低11%,并认为这一任务是1929—1930年度整个经济发展计划的最重要的基本指示之一,而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

责成所有的地方的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工会组织,在第一季度就全速展开工作来实现这一指示,以保证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

中央全会特别强调指出,为了完成在1929—1930年度保证实际工资至少提高12%这一重要的任务,必须继续贯彻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并要求一切苏维埃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党的组织努力改进工业地区的供应工作,合理使用和分配食品后备,改进食品的保管和加工,更完善地组织肉类和奶类的供应等等。由于粮食的缺乏,这一任务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必须广泛动员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的力量来加以解决。

中央委员会重申,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即1月以前完成全部粮食收购计划,并认为应将粮食收购计划传达到农村和富农农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富农对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怠工和抵抗。

中央全会强调指出,只有充分发挥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尽力改善一切经济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党的机关的工作,才能完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因此,中央全会责成各级党组织继续努力清洗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的异己分子,并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中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应当在进一步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大量提拔干部的基础上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全会认为,不但必须加强对于限制自我批评的官僚主义企图的斗争,同时也必须加强对于自我批评方面所不能容许的过头现象的斗争,因为过头现象使阶级敌对分子有可能利用自我批评来反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必须特别重视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竞赛是完成整个计划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之一。中央委员会指出,虽然在社会主义竞赛方面已经获得一些成绩,但是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这种新因素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来看,还是非常不够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忱和创造性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领导,这种领导应当促进社会主义竞赛的进一步开展,不断吸引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竞赛,从而使社会主义竞赛获得更大的成就。全会认为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工会的严重注意,工会应当使自己在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杠杆。

三

最近几年来获得的巨大成绩,经济发展的巨大规模和空前的速度,都证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是可以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的迅速改造,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一切都越来越清楚地证实:苏维埃经济制度无疑是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得多。

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蓬勃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它们对个体农民影响的加强(表现在贫中农群众自发地趋向于集体耕作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的政策已经有了获得决定性胜利的保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可以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的。

因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困难,一方面锻炼着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毅力,另一方面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为克服这些困难所必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同时,在我国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资本主义分子对社会主义进攻的顽强抵抗,使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内不坚定分子的影响加强了,因而产生了向困难投降、逃跑和企图同城乡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妥协的思想。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列宁:第14卷,第347—348页)⁵⁴³

厌恶阶级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幻想逃避阶级斗争,——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整个立场的特点。布哈林集团所以对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毫不了解,对富农—耐普曼分子的反抗力量估计不足,宣扬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理论,反对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政策,其根源就在这里。右倾分子所以对列宁同志的合作计划、对集体耕作制的决定性作用毫不了解,对国营农场的建设不重视,要求减低工业化速度

和削弱生产结合形式,其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集团拒绝承认自己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营农场建设问题上的错误,拒绝承认自己由于对阶级斗争估计不正确和丝毫不了解而产生的错误,企图采取派别斗争的方法来反对党,这样就彻底暴露了自己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因此,全会决定:凡是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同右倾机会主义调和的观点的人,都不能留在联共(布)的队伍中。

在右倾危险加强的同时,作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的另一种表现的反中农思想,以及托洛茨基和半托洛茨基分子对党的总路线的攻击,也加强起来。因此,中央委员会除了指出目前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主义之外,同时要求党的组织决不放松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容忍态度的斗争。

上一年度的成就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党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彻底揭露了反革命托洛茨基思想的残余而取得的。要在今后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继续坚决彻底地揭露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以及对他们的调和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并同这些倾向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作无情斗争。

4

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

1929年11月17日联共(布)中央全会
根据卡明斯基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

1.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曾经规定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把分散的农民经济逐步转上大生产的轨道。”两年来，党在贯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这一指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已进入了对农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时期。

在广泛实行生产结合和普遍推行预购合同制等的基础上，农民经济的生产合作化不断发展起来，日益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转变为集体农庄运动。继贫农之后，中农群众也开始加入集体农庄。吸引了农村的千百万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在实现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方面具有了决定的意义。

在总结集体农庄建设的时候必须指出：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迅速增多了；集体化的新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已经采用（主要是根据机器拖拉机站的经验）；大型集体农庄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作用加强了；农民们整村地加入了集体农庄；一些区和专区已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化。现在，集体农庄运动已向某些州提出全盘集体化的任务。

集体农庄运动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的直接结果。由于贯彻了党的总路线，才保证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开展了合作社运动，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增加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物质和文化财富。

同时,这种蓬勃发展的集体农庄运动也向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极其复杂的任务,在运动中暴露了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一些新的困难和缺点。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缺点是:集体农庄的技术基础薄弱;集体农庄中的组织工作不强,劳动生产率低下;集体农庄庄员干部非常缺乏,必要的专门人才几乎没有;部分集体农庄的社会成分不纯;领导方式与集体农庄运动的规模不相适应,落后于这一运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而且有不少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机关简直是不称职的。

2. 声势浩大的集体农庄运动是在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已经有了改变的情形下开展起来。富农除了加紧直接而公开地反对集体化(包括直接采取暗杀、放火、破坏等恐怖手段)之外,正越来越多地采取隐蔽的形式来进行斗争和剥削。他们钻进集体农庄,甚至混入集体农庄的管理机构,企图从内部来瓦解和破坏集体农庄。

在阶级斗争加剧的条件下,坚决采取措施来揭穿作为富农分子的伪装和工具的冒牌集体农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党除了继续加紧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坚决向富农进攻,严防富农钻入集体农庄之外,还应当努力保证集体农庄中的贫雇农核心的团结。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在集体农庄里,尤其是在低级形式的集体农庄里,生产资料还远没有全部实行公有化,小私有者的私有观念还很强,富农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此,大力巩固作为集体农庄运动发展基础的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使集体农庄同整个苏维埃经济体系密切地联系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党组织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力促使城市无产阶级分子以及农村的无产阶级阶层和半无产阶级阶层更多地参加集体农庄运动,努力加强他们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在低级的生产合作组织和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庄(共耕社)中建立贫雇农组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3. 集体农庄建设所达到的规模,已超过了一切原定的计划。它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列宁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日千里的速度。

党在解决建设公有的大农业的任务方面日益获得更大成绩,这个事实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的观点的投降主义本质。

党和工人阶级坚持不懈地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对待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进行了斗争,坚决地对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力量展开了进攻,坚定地引导着贫中农群众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右倾反对派首领们关于农业“退化”的假“理论”相反,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实际上是在公有化部分迅速发展和贫中农个体经济普遍高涨的基础上加速地发

展着。

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理论”相反,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出的允许资本主义分子“自由贸易”和延缓工业化和农业公有化速度的惊惶失措的要求相反,党正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来坚决同富农作斗争,根除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迅速地把贫中农个体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以及为发展有计划的城乡产品交换准备条件。

开展集体农庄建设的结果表明,苏维埃制度内部蕴藏着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在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同贫中农基本群众的生产结合的基础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了。

二

4. 目前阶段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主要困难是技术基础落后。大规模的、具有高生产率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只有在现代机器技术和电气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中央全会同意政治局的下述决定:扩大拖拉机制造业和机器制造业的计划;立即着手建设两个新的拖拉机制造厂(各年产5万台履带拖拉机)和两个联合收割机制造厂,扩建复杂农业机器制造厂和化学工业等等。还必须扩大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所需要的电站的建设,并扩大电机的生产。大力开展这些建设工作,就能为社会主义大农业创造必要的技术基础,就能为实现农业中的根本的技术革命和农业的公有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中央全会认为有必要吸收农民的资金来从事这些建设,例如可以采取在拖拉机制造厂和复杂农业机器制造厂中实行订货制的办法,由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直接交付订购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复杂农业机器的订金。在集体农庄中应开展积累出口物资、换取外国拖拉机的群众性运动。

在集体农庄建设普遍开展的情况下,必须日益加强大型机械化集体农庄的建设工作。大型机械化集体农庄在技术组织方面应当吸取国营农场的经验,逐步变成以现代机器技术和最新科学成就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

村际机器拖拉机站在大型集体农庄的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机器拖拉机站为农民经济创造了利用优越的现代技术的广泛可能性,它应当成为整区地实行全盘集体化的中心。

中央全会同意成立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的组织系统(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个专门的独立机构。

目前,在许多农户没有农具的情况下,在拖拉机和复杂机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集体农庄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除了建立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高级集体农庄之外,还要帮助低级集体农庄和生产合作组织中的千百万农户有效地利用比较简单的生产工具。由集体农庄自己倡议建立起来,并在集体农庄建设的实际工作中被肯定下来的集体农庄联合社,在这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联合社应当组织小型集体农庄共同使用复杂机器和拖拉机,把小型集体农庄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企业、拖拉机队和使用马力或马力与拖拉机混用的大型机器站(主要是改组现有的农具租赁站),联合社应当成为一个生产中心,为巩固小型集体农庄和大批吸收周围农户参加这些农庄准备必要的物质技术前提。

因此,大型集体农庄的建设应该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在建设中应该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和大型国营农场的组织上的影响,并接受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

党的任务是:要估计到千百万农户过渡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全部复杂性和过渡的方式的多样性,而充分发挥群众本身在集体农庄建设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加强党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发展工人阶级在农业改造事业中对农村基本群众进行联系和帮助的新形式。此外,国家机关,特别是农业机关对集体农庄建设的领导作用也应大大加强。

5. 集体农庄运动的根本缺点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纪律松弛,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机关关于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因此,每一个集体农庄必须坚持不懈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商品产量而斗争。

为此,首先,应当使集体农庄庄员真正自觉地对待自己的义务,在这个基础上彻底整顿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实行工作责任制,并使集体农庄庄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实行计件工资制,规定生产定额,实行奖励制度等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加强生产会议的工作,广泛开展自我批评。

巩固集体农庄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的组织问题,这种组织应根据各区不同的条件,保证使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可以从事畜牧业、集约化作物、副业企业及手工业的生产等等)。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在制订组织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6. 党、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系统应该特别注意干部问题。当前集体农庄运动的规模,要求我们以革命方式彻底改变为集体农庄建设事业培养组织者、农艺师、工程师、土地规划人员、技师、财务会计人员等等的整个系统、计划和方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时,应该大大增加集体农庄庄员,特别是贫雇农出身的庄员的比重。

中央全会认为必须在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中央学校以培养大型集体农庄的组织者。⁵⁴⁴

此外,还必须广泛组织集体农庄干部到国营农场和大型集体农庄去学习。国营农场和大型集体农庄应当成为大型农庄的实际建设者的群众性学校。这些建设者将根据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工作经验来学习使用最完善的机器,学习以新的形式组织农业生产和劳动,学习完善的农艺技术和使用化学方法等等。

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农业领导干部的最大来源。中央认为,除了以党的领导干部不断加强集体农庄运动外,必须在最近几个月内至少派遣 25 000 名具有相当组织才能和政治经验的工人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等岗位去工作。工会应该最积极地挑选这种工人,应该为此选拔出最先进的工人。

不努力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文化水平,要想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是不可想象的。苏维埃机关、集体农庄系统本身、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一切苏维埃社会团体,应对集体农庄庄员,首先是对大型集体农庄和全盘集体化区域的集体农庄庄员开展广泛的文化服务工作。加强扫盲团体、图书馆、集体农庄训练班和各种函授学习班的工作,尽量扩大学校吸收儿童入学的名额,在妇女中间加强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普遍为青年农民设立学校,大力普及农艺知识,改善为集体农庄庄员,特别是为妇女服务的社会生活设施(开办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等),——这一切是集体农庄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村际机器拖拉机站之下设立文化中心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消费合作社应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应该特别重视集体农庄的无线电、电影、邮电事业和道路建设事业的发展。应该大大增加供应集体农庄的一般出版物和专业出版物。

7. 如果不经常巩固和努力增加集体农庄运动的公共基金,就不能开展群众性的集体农庄建设,也不能在建设中取得巩固的成绩。集体农庄公共基金的增加和巩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公积金的增加,是在集体农庄中建立必要的生产资料的基础。努力扩大集体农庄的这一生产基础,防止新加入集体农庄的庄员滥用耕畜和农具,是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必要前提。只有在农民自筹资金来增加

集体农庄投资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集体农庄按照章程和合同的规定积累农庄内部基金的条件下,国家才对集体农庄给以帮助,这一点应该成为必须坚决执行的制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扣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应该增募股金和建立专用基金(筹集购买拖拉机和组织工业企业用的订金,积累专供出口的物资以增加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进口等等)。

8. 无产阶级国家对集体农庄进行生产和经济调节的形式之一,就是与集体农庄签订预购合同。这种预购合同的目的就是使集体农庄在改善生产和发展公有化成分的基础上提高集体农庄的商品率和有计划地以剩余的商品粮食供应国家。

对集体农庄进行贷款、供应生产资料和在农艺及动物饲养技术方面给以帮助,应该有一个条件:集体农庄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和合同规定的数量向国家缴售商品。根据农庄的性质,缴售的商品可以是谷物,也可以是畜牧业、养禽业的产品以及原料作物和特种作物。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某些集体农庄把剩余产品卖给私商而不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的行为。

9. 目前的集体农庄运动是以谷物业的集体化为主,而今后集体农庄运动的任务则应该是在集体农庄专业化的基础上,按照农业的区划,大力加速其他农业部门的公有化过程。

中央全会指出,在这方面,集体农庄系统的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农业合作社各专业管理局对这一极重要的任务不够重视;全会认为,必须加速建设养畜、牛奶、谷物、蔬菜、技术作物等的专业集体农庄。这些集体农庄应当成为保证国内不断增长的粮食、原料和出口需要的重要基地。

集体农庄建设是列宁的统一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合作化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的建设只有依靠整个农业合作社体系才能顺利进行。现在农业合作社体系正由供销合作社和最低级的生产协作社形式日益向集体农庄运动的方向发展。因此,当前最重要的组织任务,就是在集体农庄系统和各种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系统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

中央全会认为,除了从组织上巩固并加强专业的农业合作社系统的物质技术基础之外,还必须根据同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商定的办法,在各地的农业合作社专业管理局和专业联合会之下设立独立的集体农庄组。集体农庄组直接依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联合社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组织上和业务上的问题。农业合作社专业管理局应在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集体农庄联合会的直接领导

下,同有关的工业部门取得密切联系,在自己所服务的农业部门中进行集体农庄建设。

鉴于集体农庄建设在急速发展,鉴于必须对这一建设加强领导并给予技术帮助(特别是在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方面),中央全会认为有必要在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个别较大的区域集体农庄联合社之下设立为集体农庄的基本建设服务的专门机构——“集体农庄建设委员会”。

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是所有农业合作社(包括集体农庄系统)的中心,它的工作在目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0. 在民族地区,封建氏族关系的残余在农村中还有很大势力,这些地区正由游牧经济和半游牧经济转向定居生活和经营农业。因此,应该特别着重指出,在这些地区,实行集体化和在农业中运用先进的机器技术,对于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全会要求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机器供应部门对于东部民族地区的集体化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大力促进这些地区的集体化。

11. 作为纯粹社会主义类型的农业企业的国营农场,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示范作用,树立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农业中运用最新技术的榜样。同时,这些拥有强大的物质技术装备的国营企业(国营农场),还应该努力加强自己的杠杆作用,推动个体农户转上集体化的轨道。

应当鼓励在国营工业企业(糖厂、亚麻加工厂、净棉厂等),同国营农场,同周围的集体农庄之间建立直接经济联系的积极办法,要利用一切可能,在这些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的总的领导下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联合管理处,制订互相配合的经济计划,建立共同的技术基地(拖拉机队、修配厂等)和共同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奶油制造厂、干酪厂、亚麻加工厂和面粉厂等)。

三

12.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蓬勃地展开,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面前的任务,是把这一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因此,中央全会预先提醒大家不要低估集体农庄建设中的困难,尤其不要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建设和估计这一建设的成果。

中央全会认为,密切注意集体化问题,是各级苏维埃,特别是农村苏维埃的最重要的任务。苏维埃应该注意如何最充分地、优先地帮助集体农庄庄员,使集

体农庄变成发展农业生产和对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地,变成实行苏维埃的农艺措施、社会生活措施和文化措施的基地。全会认为必须加强苏维埃对集体农庄的领导作用,加强苏维埃对集体农庄建设的责任,实行集体农庄向苏维埃报告工作的制度,同时,也不允许包办代替和以行政方式干涉集体农庄的领导。

农村的集体化应该在工会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大胆提拔工人去做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系统的一切环节的组织和领导者,以便加强工人阶级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作用,以便把集体农庄运动提到更高的水平,更迅速地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农业。

中央全会指出,产业工人积极参加农村集体化的热潮正在高涨,这表现在普遍组织工人工作队,选拔集体农庄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参加集体农庄的生产会议,举行“收获与集体化日”等等方面。工人群众的这种主动精神,应该大力加以支持和发扬,尤其是应该在生产互利的基础上来加以发扬。应该加强义务帮助协会在帮助农村实行集体化方面的工作;迅速组织各种新的帮助进行农业集体化的团体;为了保证工业的原料供应和工人集中区的粮食供应,应该派遣更多的工人参加在集体农庄中推行预购合同制的工作;企业听取集体农庄的报告,以及派遣工人工作队到集体农庄去的做法应加以推广等等。

全会指出,必须加紧进行工作,大量地吸引雇农参加集体农庄,并指出农林工会在这方面应起特别的作用。

由于产生了各种新的任务,由于集体农庄运动的规模大大扩大,由于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必须大力加强党对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导。为此,农村的所有党支部都必须积极参加集体农庄建设,各级党组织也必须大力帮助集体农庄运动。

必须指出,共青团组织在集体化运动中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共青团在农村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走在集体农庄运动的最前列,并且不断地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成千上万的集体农庄组织者。

在努力贯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吸收最有觉悟、最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体农庄庄员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的队伍这一指示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大型集体农庄的党支部。党组织要实际地领导集体农庄运动,通过自己的领导来加强作为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途径的集体农庄运动。

日前广大农民群众对农业集体化的态度的这种转变,在即将到来的春播运

动中将成为进一步促进贫中农经济的发展和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起点。在向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线进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同农业的生产结合的同时,党组织应当及时地动员力量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播种运动,把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生产合作,促进农民经济的集体化和开展国营农场的建设当作首要的任务。

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一工作在新的年度的年初就能完成,这就使党、苏维埃和合作社能够腾出一部分力量,从而为播种运动创造有利条件。党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力量动员起来,使工人群众有组织地积极地进行准备工作,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播种运动中党就能把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实现发展经济和过渡到集体耕作形式的任务,只有这样,把贫中农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工人阶级才能彻底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农业基地,从而巩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5

关于乌克兰的农业和关于农村工作

1929年11月15日联共(布)中央全会

根据柯秀尔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联共(布)中央全会在听取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乌克兰农业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之后指出,尽管乌克兰农业的恢复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长期的国内战争、土匪骚扰、1921年的饥荒以及1924年和1928年的歉收)进行的,但是,由于乌克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农村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执行了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现在,农业不仅已经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过去的水平(播种面积达到过去的109.3%,粮食达到97%,技术作物达到287.5%,粮食的总收获达到战前的92.2%,畜牧业达到107%)。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民经济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扩大了秋播面积,逐步采用集约化耕作形式,扩大了纯种种子的播种面积,发展了多区轮作制等等)。

对乌克兰农业的现况和发展的分析,再一次极为清楚地证实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农业衰退的断言是多么荒诞无稽。乌克兰农业方面的成就,近几年来集体化的发展,都说明农业在不断提高,说明所有贫中农群众都在不畏自然灾害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发展和改善自己的经济。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可能性受到限制和连年严重歉收,最近几年乌克兰农业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大量采用拖拉机、复杂农业机器和人造肥料。

党提出的在新的社会和技术基础上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的改造,并坚决向富农展开进攻的路线,在农村广大贫中农群众中得到愈来愈热烈的响应和支

持。在这方面应当指出,近两年来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的数目大大增加了(从6 000个增加到18 000个),集体经济已经巩固,大型的联合组织已经建立,实行群众性集体化的新工作方式(建立拖拉机站,整村实行共耕)已经在各地推行,同时,集体化在最近时期已经广泛开展,开始把中农阶层也包括进来。

鉴于发展谷物业对于乌克兰也是一个根本的和重要的任务,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各点:

1.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应该考虑到在乌克兰已无法再大量增加谷物播种面积的这种情况,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提高个体经济、集体农主和国营农场现有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上一经济年度的经验证明,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5%的任务,是可以而且应当大大超额完成的。全会要求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更加努力贯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决议,并根据乌克兰各个地区的特点规定执行这一法令的实际措施。

2. 发展乌克兰最重要的主要产粮区——草原区(包括特别干旱的南部地区)的经济,应该作为一项中心任务。苏联中央机关在自己的计划中也应该把乌克兰草原问题当作一个专门问题。在这方面,必须:

(1)保证最近两三年内在草原区建立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机器拖拉机站,以便两三年后使草原区的全部播种面积至少有一半由拖拉机耕种,同时使草原区的全体劳动农民都实行集体化;

(2)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给草原区增拨抗旱资金和抗旱贷款。这些专门资金主要应当用来开展整区与整专区的集体化;

(3)向乌克兰农业实验机关也提出一项紧要的任务:为草原区培育出各种耐寒冬麦,特别是耐寒春播作物(小麦和大麦)。

3. 乌克兰的领导机关在最近两年内应当使国家和合作社拥有2 000万普特的优良种子。党、苏维埃和合作社机关都应该更加注意发展育种合作社。

4.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四个月内审查和批准第聂伯水电站周围的灌溉计划,使第一期灌溉工程在第聂伯水电站开始发电之前完成。

5. 除了草原区问题之外,还应该提出关于人口过多和土地太少的第聂伯西岸区的问题以及关于边境地带的问题。第聂伯西岸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大力发展费劳动力的集约化的技术作物(首先是甜菜)和产品畜牧业。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所属的国营农场和工厂应该在周围的农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工作,争取扩大甜菜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建立大型的甜菜集体农庄。为

此必须围绕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国营农场建立若干机器拖拉机站,并保证尽量和优先给这些农场供应肥料。

6. 虽然乌克兰的畜牧业已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是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指出,这个重要的农业部门的情况并不很好。乌克兰各个工业中心对肉类、油脂和乳制品的需要增长得很快,而对发展乌克兰畜牧业也有着尚未充分利用的巨大潜力,因此,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应当特别注意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此外还必须采取措施,使乌克兰国营农场和大型集体农庄立即开始建立畜牧业部门,并且规定种种办法以刺激贫中农个体农户也来发展畜牧业(如给予税收优待,供给饲草种子等等)。

7. 为了增加工业原料(烟草、向日葵、大麻、油类、腌肉、蛋类、家禽)的出口和生产,应该保证在乌克兰建立必要数量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并注意满足边境地区的特殊需要。

8. 农业合作社系统中的所有各种专业合作社的全部工作,应该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使贫中农个体经济转变为公有经济形式。为此,应该大大扩大和更好地利用预购合同制,必须使它同机器、肥料和商品的供应配合起来,动员农民的资金,用于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等方面,应当是整个农业合作社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还应该加强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做到在最近两三年内吸收 90% 的贫中农个体农户参加各种专业的合作社。

9. 去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大力发展建立在最新技术基础上的公有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农业才能获得高速度的发展,粮食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按照乌克兰的条件(农业水平较高、商品产量较高、农业工人和雇农较多),在草原区和第聂伯西岸区,完全可以比其他共和国更快地把个体农民经济纳入集体化的轨道。乌克兰应该在最短期间,不仅在个别地区,而且在整个专区的大片土地上树立起组织公有大经济的榜样,以便在最近几年内使乌克兰整个草原区全盘集体化。在这方面,在乌克兰已经获得特别广泛发展的机器拖拉机站应该起重要的组织作用。

在集体化方面,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应该特别注意贯彻以下各项重要措施:

(1) 在从下面开展起来的集体化运动已经开始包括整个区和整个专区的地区,拟定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具体工作计划。同时,必须在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地区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并调派熟练工作人员去加强这些地区。

(2) 进一步扩大集体农庄,在共耕社和劳动组合中实行主要生产工具和耕

畜的公有化,规定一定的劳动纪律,固定劳动组织,根据保护贫农利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则确定最合理的劳动报酬制度。

(3)建立较严格的发放集体农庄贷款的制度,防止负债过多的现象,尽量鼓励建立和积累自有的公积金,进一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监督专用贷款的合理使用。

(4)清洗钻进集体农庄(包括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地区的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坚决取缔冒牌的集体农庄;同时,在那些受富农影响和控制的集体农庄中,组织全体贫中农积极分子起来同富农作斗争。

(5)在一年内,普遍完成现有集体农庄的土地规划并进行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土地规划,因为集体农庄往往会由于没有进行土地规划工作而垮台。

(6)不仅要保证专区委员会,而且主要是要保证农村基层支部和区委员会对集体农庄运动和个别集体农庄认真进行实际的领导,并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10. 鉴于在乌克兰许多地区得到广泛发展的独立农庄和独家农场的土地使用制度严重地阻碍着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全会同意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关于废除这种土地使用形式从而为更迅速地实行集体经营创造条件和保证发展农村文化机关(学校、农村图书馆、电影院等)的方针。

11. 在乌克兰,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国营农场的土地面积是很小的,因此,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也就更加有必要来注意发展现有的国营农场,改进它们的工作。乌克兰的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提高单位产量,至少要比个体农户高1—2倍,应该认真降低谷物成本,竭力发展畜牧业,同时应该大力帮助周围农民,在国营农场周围建立集体农庄网。

12. 为了培养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今年应该扩大现有的训练班,吸收产业工人、集体农庄工作人员和农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同时必须更积极地从农业无产阶级中提拔和培养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拖拉机队的领导者、机器租赁站的站长和拖拉机手。

在培养农业技术人员方面,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应该改进乌克兰高等农业学校和中等农业专业学校的工作,要求这些学校培养出能够组织公有的大农业生产的专家。

13. 要完成所有这些任务,乌克兰共产党(布)就必须在一切环节上都正确地估计到乌克兰农村的异常复杂的情况,估计到阶级斗争的大大尖锐化以及富农活动的加强。富农是反对我们在集体化、粮食收购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的最

凶恶的敌人,只有反对富农,只有同他们斗争,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因此,乌克兰党组织应该更加加强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群众(农业工人、雇农)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团结全体贫农群众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切实巩固他们同中农的联盟,以便坚决向富农展开进攻。苏维埃、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应该成为展开这一进攻的主要据点。

14. 贫农委员会是乌克兰贫农的主要组织。虽然它们在农村中对于发展农业以及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还远没有充分开展自己的工作,没有使全体贫民都受到自己的影响。在乌克兰,参加贫农委员会的贫农平均只占全体贫农的一半左右。在某些贫农委员会的村的领导机关中还有富裕农民和富农分子混入。

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改善和活跃贫农委员会的工作,使它成为贫农的真正群众性的战斗组织,能够把全体贫农群众都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选入贫农委员会的领导机关的,一般只应是那些真正能够在苏维埃、合作社和土地共用社中维护贫农的利益并推进集体化事业的贫农。必须有系统地对贫农委员会的成分进行审查,这一工作必须吸收全体贫农参加,而不应当只由贫农委员会委员来进行,必须把一切破坏贫农委员会工作以及损害它在贫农群众中的威信分子从贫农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15. 虽然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内无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但是乌克兰的农村组织还是十分薄弱的(在2 500万农民中间只有3 000个支部,其中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共产党员只有25 000人左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党组织也非常薄弱(1 250个国营农场中只有222个支部和2 634个共产党员,4 037个劳动组合和公社中只有174个支部和1 800个共产党员)。雇农和农业工人所占的比重也很小(10.1%)。

虽然乌克兰农村组织最近时期在粮食收购和集体化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并且获得了成绩,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农村中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中有一些异己分子以及丧失阶级嗅觉而与富农相勾结的分子,特别是在农村组织中有很多右倾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乌克兰党的一切领导机关的严重注意。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应该加强农村组织的干部,在一年内认真地从产业无产阶级组织中至少培养出500名组织员和宣传员派往农村。同时必须更加积极地吸收雇农、农业工人(特别是在国营农场中工作的)、贫农以及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积极的集体农庄庄员入党。

乌克兰共产党(布)除了提高农村组织的政治水平并加强它们在思想上的团结以外,还应该要求个体农民中的每个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组织集体农庄的先锋,竭力促使个体农民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

乌克兰共产党(布)应该把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完成乌克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6

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

1929年11月15日联共(布)中央全会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 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急剧增长,要求改变农业生产的领导方法。

以提高个体农民经济为主要任务的恢复时期已经过去了,已经依靠各个共和国的力量并在各个共和国的范围内基本上顺利渡过了。在恢复时期,在执行共产党的指示时,苏维埃的中央机关的作用仅限于规定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的一般原则、通过全苏联的计划、采取财政措施(特别是对最重要的原料产区)以及有系统地发展农业机器制造业。

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大大加速农业发展的任务,是同对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线进攻相联系的,不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任务就不能实现,因此,过去的领导方法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了。

过去的领导方法所以急需改变,是由于以下的情况:

(1)集体农庄运动已变成贫中农群众的极广泛的运动,它已走上了迅速发展大型集体农庄和实行整区、整专区的全盘集体化的道路,因而大大地发挥了苏维埃制度内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潜力,同时,苏维埃国家也广泛展开了组织大型国营农场的工作,这就要求利用领导苏维埃工业的经验来确立对农业生产的统一领导。

(2)大农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发展已开始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联合组织的范围,因此,除了以前建立的中央农业银行和合作社联社联合会以外,又建立了谷物业托拉斯、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全苏水利委员会、农业供应部、养牛托拉斯、养羊托拉斯等等全苏联的生产组

织,这就要求对它们进行全苏联的统一领导。

(3)个体农业和社会主义大农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必然会使各农业区生产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不可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联合组织的范围内,它会使苏联的各个部分彼此更加密切地配合起来,这也要求在各加盟共和国范围内和全苏联范围内对农业生产实行统一的领导。

(4)为了加强工业同农业的生产结合和发展工业同有关的农业生产部门的**直接联系**(例如工业同自己的农业原料基地的联系),除了依靠已有的全苏联的工业联合组织外,还必须在农业方面建立全苏联的联合组织。

(5)要加速配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干部,就必须进行统筹安排,以苏联无产阶级中心区的力量来加强各个较落后的民族地区。

(6)最后,建立全苏联的领导会使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极大的发展。

因此,关于必须改变农业生产的领导方法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要认识到:不仅需要制定全苏联的统一农业计划和采取与此有关的财政措施,而且需要在全苏联范围内对公有化大农业的全部建设工作实行统一的领导。

2. 在某些民族州和共和国内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估计到当地的各种特殊和复杂的条件。若干民族地区还没有完全结束恢复时期,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着封建氏族经济成分,但同时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大经济成分。在这里,开展集体化和建设国营农场是同消灭封建氏族经济的残余分不开的,这样就不能不引起富农分子和半封建分子的激烈反抗,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还在农村中保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等等的幌子,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这里,由于群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极端落后,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必须特别加强苏联无产阶级国家对农业的计划调节作用,加强无产阶级中心对这些地区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同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为完成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在民族地区建立工业基地(包括农业原料加工企业、电站、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等等)的任务创造了新的条件。

3.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看到,把农业生产的领导集中于一个全苏联的中央机关,已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央全会根据一些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认为必须建立**统一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成立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目的,是统一进行大型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加强领导机器供应、电气化、农贷和干部培养等方面的工作,以及加强发展农

产品加工企业的工作。此外,在成立全苏的人民委员部的同时,应该尽量保证发挥各民族州和共和国在发展生产力和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7

关于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1928年)的 培养技术干部的决定的执行情况

1929年11月16日联共(布)中央全会
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一

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党提出的“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的实际表现)的执行、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一切普遍而尖锐地向党提出了改造时期的干部问题。多年来存在的熟练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不足的现象,在目前工业蓬勃发展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更加严重起来。一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实际上超过了五年计划的规定,同时,又破获了一系列新的破坏案件,这就更尖锐地提出了大力加强和改进新的无产阶级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的问题。

目前时期,由于新的要求,不仅尖锐地提出了专业人员数量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专业人员质量的问题。以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为基础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一切生产基础的彻底改造,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条件下社会经济过程的复杂性,这一切都要求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工业、运输业、农业、财政、合作社、商业等等)的新型的技术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些干部作为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组织者必须具备深湛的专门技术知识和经济知识,远大的社会政治眼光和优秀的政治品质。

然而,培养新干部的速度完全赶不上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目前在对专业人员的需要和专业人员的成长速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剪刀

差”。这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目前专业人员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很差：他们的技术不够熟练，经济知识不够丰富；现有的一部分专业人员在社会政治上动摇不定，抱着中立，甚至敌对的态度。这种敌对态度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某些暗害集团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有意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一方面要坚决与破坏分子作斗争，继续使用老老实实工作的专业人员，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必须尽力加紧培养新的无产阶级专业人员，他们将是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工作中的可靠力量，他们将会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代替专业人员中的敌对分子并使苏联所有工业和经济部门的干部成分得到彻底的改善。

党内的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不懂得目前时期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迫切性。他们实际上把加强培养新的无产阶级专业人员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这完全符合他们的降低工业化速度和农业集体化速度、听任国内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基本方针。右倾分子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抹杀专业人员政治上分化和阶级敌人通过个别破坏集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

右倾分子不懂得：不仅经济上的必要性，而且在我国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专业人员政治上分化的过程，都向苏维埃国家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培养新的无产阶级专业干部的任务。右倾分子的上述整个方针与党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党应该集中全部力量来解决这个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干部问题。

二、五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的干部保证

1. 过去的这一年完全证明了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所制定的关于改善新的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的方针和实际措施是正确的，并且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中央委员会指出，虽然在改进新的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结合生产，改善社会成分，改善大学生的物质生活状况等），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机关、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在执行七月全会决议方面做得还不能令人满意。

新的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还没有成为“全党最重要的任务”。七月全会对于专业人员培养工作所作的估计，即使在目前基本上还是适合的。

2. 五年计划期间的干部保证工作做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在进行这一工作

时,既没有可靠的计划,又没有考虑实际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中央委员会认为,应当特别注意培养工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缺门的专家(特别是冶金学家、机器制造专家和化学家),在培养新的专家干部方面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并吸取外国企业的经验。中央委员会认为,五年内计划建立的47所新的高等技术学校和172所新的中等专业学校,不能充分满足五年计划的需要,特别是对技术员的需要,因此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各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及各个地区的具体需要,在三个月内拟出关于培养高级和中级技术专业人员以及建立新的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五年计划。同时,必须调整现有的高等技术学校网,使高等技术学校专业化,消灭重复现象。

3.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从现有的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专业人员来(消灭留级)。今年,四年制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要达到现有学生总数的20%,三年制的高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要达到25%。为了提高高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率,高等技术学校必须改行连续学年制和学习周制。

4. 在最近几年内应尽力从最优秀的工人中培养实际领导生产的干部,有计划地把他们从低级领导职位提拔到高级领导职位,同时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来系统地充实自己的实践知识并获得必要的理论教育。在最近三年内,应该把所有工业和运输业中担任实际技术工作的基本工人群众都重新训练。

5. 对于农民和工人出身的农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给以系统的进修机会。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应该会同各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30年1月以前在所有主要农业区的高等农业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设立速成班,以培养具有农艺知识的工作人员,首先是培养集体农庄这方面的人员。

6. 中央委员会赞同政治局关于今年高等技术学校的拨款的决议(大量增加基本建设和实验室的经费,增加教学人员的工资,增加助学金,扩大预约学生去工作的办法并使之更有条理更有系统等等)。中央委员会建议,在制订培养新的专业人员的五年计划时,要研究以充分的物质(其中包括住房)保证计划的实现的问题,在批准五年计划的同时,要批准高等技术学校所需要的经费。中央委员会规定:拟定控制数字和编制国家预算,必须考虑到不断增加技术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经费。

三、高等技术学校教学工作的改革

1. 在执行七月全会关于在教育工作中采用连续生产实习制的决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个工作还是刚刚开始。今后必须大大扩大生产实习并改进其质量,延长生产实习的期限,使生产教育的时间占40%—50%;建立理论学习与企业生产实习的互相更替制,对个别生产部门规定较长的生产实习期限(约为:一个月理论学习—一个月生产实习,三个月理论学习—三个月生产实习,等等)。

委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今年设立一两个企业—学校进行试验,在这些企业—学校里把干部(低级、中级和高级)的培养工作同经常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2. 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措施彻底消灭实行连续生产实习中的形式主义的和无组织的因素,保证顺利地实行连续生产实习,把它当作生产教育的制度和方式。改进工业机关(企业、托拉斯和其他联合组织)与高等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所在新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中的有机联系。

3. 增设具有明确的专业目标、同一定的工业部门相联系的新型高等技术学校,把学习期限缩短为三年,并规定其他一切高等技术学校的最长学习期限为四年。为此就应该重新审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必须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地、机械地对待这一工作的现象,必须更深入、更有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以便在1930—1931这一学年就开始按新的教学大纲讲授。并且必须保证在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列入实用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史;保证按新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来再版教科书。

4.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根本改进为工业、商业、财政、计划和统计机关培养经济专家的工作;整顿高等经济学校的制度和方针;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使有关的高等学校、系和组更加专业化;按照各种不同的高等学校、系和组的方针重新审订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委托有关部门专门研究高等经济学校的设备供应以及学生和教员的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认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划委员会、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中央统计局应该同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高等学校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更有成效地培养经济专业人员和执行中

央全会的决议。

5. 提高对科学研究干部和教学干部的培养工作的质量和扩大这个工作的规模,并挑选生产中具有必要理论素养的专业人员来补充教学干部。除合理地使用老干部外,必须更加努力培养和提拔青年科学人员,特别要从工人、党员中来培养和提拔。改变挑选这种工作人员的方法,并且广泛吸取科学小组、有奖竞赛、科学著作的公开答辩和其他适当的竞赛形式的经验。就在今年至少要从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工人和共产党员中选出300人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并且预先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养。

6. 中央委员会指出,在执行七月全会关于利用外国经验的决议方面做得非常不好,建议本年度增派工作人员出国留学(至少500人)以补充七月全会的决定。同时,要坚决地吸收卓越的外国专家参加技术—经济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使用他们。切实保证不断订购外国技术书刊,组织外国专家的讲演和苏联专家关于外国经验的讲演,并且保证大学生和青年专业人才学习外语。同时,必须不断地把必要的外国设备供给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的一切实验室。

四、高等技术学校的组织与领导问题

1. 中央委员会认为把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必须把新建的高等工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全部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必须就在1929—1930年度继续进行重工业方面最重要的几所高等技术学校移交工作。大力改进高等技术学校管理总局的工作,为它选派更强的工作人员,责成高等技术学校管理总局对交给它领导的各高等技术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和科学教学工作负责。同时,把几所高等农业学校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应改进对于高等教育总的领导方面的工作,加强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上的领导,其中包括对已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

2. 必须努力消除高等技术学校内部组织中一直存在的各种缺点;将一切行政和教务职能集中于高等技术学校管理委员会,解除学生组织在这方面的职能;党组织在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党的工作和对学校中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领导的时候,不应当干涉管理工作的细节和行政方面的具体指令;应当以有关领导机关任命管理人员(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等)的制度来代替选举制。同时,在高等技术学校中设立由工会、经济机关、教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的真正能进行工作的委

员会。

3. 中央委员会建议党组织在受培养的新干部中加强党的工作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在与阶级敌对分子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必须彻底改进工会组织的工作;努力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学习效果,这对于高等技术学校的共产党员来说是和企业中的生产纪律同样重要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精减高等技术学校中的会议,减轻学生过多的社会工作。

五、改善高等技术学校的社会成分

1. 全会指出,在1928—1929年度高等技术学校招收的学生中,工人成分已有了增加,并要求在最近几年内使工人成分的比重至少占录取学生总数的70%。在高等农业技术学校中,工人、雇农、贫农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比重,至少应当占75%。同时,必须改善高等技术学校中的学生成分,清除敌对分子;进行这一工作应当采取有系统的研究和审查的方式,而不应当采取搞运动的方式。

2. 按专业的原则改组工农速成班,将工农速成班固定设在相应的高等技术学校内。规定工业技术工农速成班录取的学生中工人应当占90%,而在农业工农速成班中,工人、雇农、贫农和集体农庄庄员至少应当占75%。

按照高等技术学校招生的五年计划增设工农速成班和增加学生总数。

3. 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央七月全会关于提高中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的决议没有很好地执行,因此建议大力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并保证高等技术学校优先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中的工人、雇农、贫农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子女。为此,必须修订中等学校的教学大纲,改善教学制度、学生的社会成分和物质生活状况(特别是工人区的学校)。

青年农民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业方面的实际工作干部,但同时它也应该不断输送贫雇农青年和中农青年进入中等农业专业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

4. 全会认为保送“1 000”人去学习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在1930—1931年度至少应当选派2 000人到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再下一年度至少选派3 000人去学习;1930年选派1 000人到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31年则选派2 000人去学习。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应当使那些在技术上特别有首创精神的党工工人和非党工人受到有系统的普通教育(经费由工会负担)。在最近两年中,准备用这种方式送入高等技术学校的人数如下:1929—1930年度——3 000名熟练工人,1930—1931年度——5 000名熟练工人;送入高等农业学校学习的将有

2 000名农业工人和林业工人。应当保证这些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干部得到超过普通助学金的津贴,超过部分由有关经济机关的经费中开支,其办法与保送“1 000人”去学习的办法相似。

增设工人和雇农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的各种预备班。

责成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每年培养5 000人送入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每年至少从工农出身的复员军人中培养3 000人入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同时,必须制定关于培养工人、雇农等的中等和高等函授技术教育制度。

六、专业人员中的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

1. 中央委员会指出,四中全会(1928年)决议中关于加强专业人员中的工作、不断审查他们并改善其中老老实实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条件的指示执行得非常不好,它还没有引起党、工会和经济组织的重视。在这方面,工会组织和它的工程技术人员部应该起极重大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建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坚决采取措施,改进工程技术人员部和各有关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在下列方面的工作:改善专业人员的物质生活状况;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技术,给他们创造进修的条件(会同有关经济机关组织讲演、报告,设立图书馆等等)。

必须大力吸引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加改进生产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作。

2. 党组织除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无产阶级路线,坚决反对部分显然抱敌对态度的专家之外,应该替大多数老老实实地工作的专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党组织应该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盲目地信任显然抱敌对态度的专家,另一种是完全不相信忠诚的专家,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带有敌视非党专家的性质。

3. 经济机关在领导专业人员的日常工作时,应该保证专业人员能够在生产中大胆发挥首创精神,同时要反对某些专业人员(无论新的或老的)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疲沓态度来对待工作,反对有意推诿责任。

4. 必须改进对专业人员的使用情况,提拔最有能力、最优秀的专业新老专业人员,不容许排挤新的年轻的无产阶级专业人员。必须坚决消除专业人员流动过大和经常从这一企业调到另一企业的现象;有计划地把托拉斯中的技术力量调

到企业中去,特别是要根据地方上的需要把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年轻专业人员派去承担基层的生产技术工作。大学生既然得到国家和经济机关不断的物质帮助(助学金等等),就必须在高等学校毕业后,按照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指示,根据各地区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在规定的地区内工作一定时期。

七、经济领导干部

1. 中央委员会指出,在加强工业领导人员方面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与目前时期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对干部的要求比较起来,还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建议更加坚决地从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中间,特别是从在生产会议工作中提拔出来的工人中间,以及从积极的工会工作者中间,提拔新的组织者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提拔 1 500—2 000 名工会工作者去担任经济工作。

中央全会赞同中央委员会和各工业机关所采取的提高工业领导干部(组织者)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经济修养的措施(设立工业学院、进修班等),并建议广泛实行这种制度,把它推行到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部门中去,其中包括在各地设立工业学院分院,而分院在主要工业部门(石油、煤炭等)方面应更加专业化。广泛建立为期六个月至一年的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专门让那些不能较长期学习的经济领导干部进修。此外要保证有可能开展函授教育。

2. 中央委员会着重指出,在克服一团和气、反对有意识地掩饰缺点与错误的同时,必须为领导干部创造在生产中有效而深入地工作的条件,坚决解除他们的一切与企业 and 机关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无关的工作。不得经常调动工作人员,保证他们能在一个地方至少连续工作 3—4 年。

3. 中央委员会特别指出,农业领导干部的情况非常不好,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不仅在业务能力方面,而且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面,都不能保证实现党所提出的关于发展农业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中央委员会委托政治局拟定一系列加强农业领导干部的措施,其中包括至少从党、工会和经济工作中调出 1 000 名负责干部去专门承担农业领导工作。

4. 同时,中央委员会委托组织局拟定一系列加强财政和贸易系统的领导人员的措施,特别是要对到国外去工作的人员进行专门的训练。

5. 中央委员会建议坚决改进挑选和分配现有干部的工作、提拔新干部以及使用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必须根本改进目前各主管登记分配局(最高

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等等)的工作,把它们变成真正有威信、能办事的机关,以便完成统计和合理使用工作人员这项极重要的任务。

必须彻底纠正以形式主义的、机械的态度来对待挑选和分配干部的工作,这一工作必须在认真考查工作人员和评定他们的工作的基础上来进行。同时,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分配部不仅不应放松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相反地还应该加强干部挑选、培养和分配方面的工作。

党组织既然把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人、雇农、贫农、妇女、青年干部提拔起来承担经济领导工作和国家领导工作,就应该不断提高这些被提拔人员的文化水平。

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任务,要求根本改变以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高级的和中级的)以及下级领导人员(工长等)和熟练工人来供应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大农业的整个工作,必须彻底克服这项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和无组织现象。干部(从工程师一直到熟练工人)的培养工作的规模,应当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规模相适应。为此就必须使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尤其是其中技术装备最好的)变成大量培养和训练熟练工人、干部、技术员和工程师的学校。

中央委员会要求一切党的、经济的和工会的组织把这个重要任务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来积极完成这项工作。

8

С. П. 比尔曼、Н. М. 什维尔尼克、 Ю. П. 菲加特纳的声明

—

送中央全会主席团

现就什维尔尼克同志关于南方冶金托拉斯下属个别工厂的某些不正常情况问题送上几位厂长提出的下述初步查讯资料(这些资料已由一些社会组织证实):

1. 关于临时监察委员会在捷尔任斯基工厂发现的所谓伪造降低成本计算问题。什维尔尼克同志把9月份的成本同年度成本搞混了,顺便说一句,他今天交给我的书面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成本降低1.86%,并不像什维尔尼克同志说的那样,是全年成本降低的数字,而是9月一个月成本降低的数字。全年成本降低的数字是4.32%,而11个月(截至9月1日为止)数字是5.2%。9月份成本降低数字是1.86%,并不是临时监察委员会调查的结果,相反是工厂会计室提出来的。在工厂会计室算出9月份成本降低仅为1.86%之后,临时监察委员会决定弄清9月份成本降低为何如此之少,这时才查明主要原因是,由于年终结算,9月份通常都要冲销全年的开支。无论如何,我应该指出,这个工厂的厂长马纳延科同志是最好的国民经济领导者之一。

2. 什维尔尼克同志说,在斯大林工厂生产会议建议1929—1930年度产品成本降低7%,而工厂管理委员会仅规定为2%。

查对结果。6月份工厂管理委员会在制订控制数字时规定生产增长5%,成本降低2%。但是两个月后,即早在执行年度到来之前,在上级管委会下达的任

务的基础上,工厂管理委员会已在生产代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规定生产增长20%,成本降低11.5%。到10月份提高了的生产任务真的完成了。

3. 什维尔尼克同志说,彼得罗夫斯基工厂17 000条工人的建议没有完成。

查对结果。根据厂长和厂党委书记的电报,一年来(自1928年5月1日至1929年5月1日)在各种会议和集会(工厂党委会、车间工会会议、生产会议、车间和全厂会议)上提出的所有的各种建议正好是17 000条。生产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已完成79%。什维尔尼克同志在工厂里也收到了同样的书面材料。

C. 比尔曼

1929年11月12日

二

联共(布)中央

在中央全会讨论控制数字时我发言中关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捷尔任斯基工厂降低成本指标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发言中我曾指出,年成本降低的百分比应为7.1%,而工厂会计室的数字为1.86%。

事实是,经过由金属工业总局,全俄五金工人联合会中央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的检查,现已查明,第一季度成本降低3.14%,第二季度——5.03%,第三季度——7.04%,第四季度——4.82%,年平均——4.37%。经济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只降低了1.86%。9月份成本降低比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工厂管理委员会把一系列全年的生产开支——像专门委员会查明的那样——都算在了9月份的账上。因此9月份成本降低比率——按专门委员会的大致计算应为6%,由于冲销生产开支而降低为1.86%。9月份冲销的开支总额为307 186.02卢布,据专门委员会的意见是可以在全年过程中予以冲销的,其中的198 436.04卢布在9月份冲销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整个数额(307 186.02卢布)分月冲销的话,那么成本降低的比率每月大概将降低0.4%,也不会出现9月份成本降低指标如此大的陡然下降了。

这种计算生产开支的办法不能反映出全年成本降低的真实情况。

我的基本想法是,成本降低指标的陡然下降(考虑到专门委员会关于9月

份劳动指标应保持稳定的决定)可能会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情况下。我仍然持上述想法,这一想法也得到专门委员会结论的承认,而工厂管理委员会也同意了这个委员会的结论。

请将本声明列入联共(布)中央全会的速记报告。

H. 什维尔尼克

1929年11月30日

声 明

谢尔戈同志!有一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问我,是否坚持在四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对党的总路线的观点,因为我未能在中央全会上发言。我的回答是:

(1)在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总路线及其实施的争论中——正确的是中央,而不是布哈林同志所领导的集团。

(2)在四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我所作的表决,现在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

请将我的这一声明列入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

菲加特纳

1929年11月18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2—441号,726—729号案卷。)

补充材料

1

斯大林 1929 年 11 月 13 日在联共(布) 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

斯大林:同志们,关于三人文件这里讲了那么多又那么详尽,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了,我只需要 10—15 分钟,但有些东西我认为是必须要说的。

首先,需要作一点实际说明。在这个三人文件里试图通过办公室的途径偷偷塞进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人喊:对!)他们的这个提纲编写得如此狡猾,愿同志们原谅我这粗话,如此诡诈,让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去分析它。“关于‘长入’的提法,——没有说是谁,——它实际上本应当表示……(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党的造谣诬蔑。(喊声:对!)长入的提法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时候中央委员会或者共产国际表示过赞成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从未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旧纲领的前言里有过关于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的提法,而不是关于富农长入——绝对不是。

对此,一个委员会,好像是俄国代表团给予了批准。这可能是出于某种疏忽,因为“长入”的术语本身,即使说的是农民基本群众,它,这个术语,也会造成某些不正确的前提。当然,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是在十字路口的,他要么应当长入资本主义,当然是加引号的,如果是在资本主义起主导作用的国家里;他要么应当长入社会主义,如果在社会主义起主导作用的国家里,因为生产的商品性质还不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其中含有资本主义倾向。

大概这就是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批准这个问题时的想法,但是那里并没说富农长入、富农的窝巢长入社会主义。没有这么回事!中央委员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未批准过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从未批准过!这完全是诽谤,这完全是对中央委员会和共产主义国际的诬蔑。

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社会主义的术语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它认为,农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需要农民自身的根本改造和根本变化,这是不对的。

由于农民基本群众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十字路口和由于社会主义起着主导的作用,他们将投入社会主义,但不是以他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将逐渐进行改造。当我们谈论集体农庄,当我们指出集体农庄的极大发展是党过去一年的主要成绩的时候,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同志们作出结论,既然我们有集体农庄,就是说集体农庄里有社会主义,那将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农民的真正改造现在才在以新技术为基础建立的集体农庄的基础上刚刚开始。因为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社会主义的术语使人有理由认为,似乎说的是农民不经过改造,而以其现有的样子机械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术语用在农民基本群众身上是不对的。还可以这样说,但把这个提法归咎于党、归咎于中央委员会,说党,或者中央,或者共产国际似乎曾经赞同富农,而不是农民基本群众长入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对党的诬蔑。党从未批准过这样的提法,而是一直在与之斗争。这里并没有说——富农长入的提法。这里没有说——是谁,没有说——长入哪里。这就是我所谈的这个文件的那一部分的全部欺詐、伪善和虚伪。这是我预先要作的一点说明。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文件的实质。这个文件是我们的同志退却的结果……

柯秀尔:亲爱的……

斯大林:我们亲爱的同志、右倾的领袖们退却的结果。文件是从他们过去所持的立场的退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右倾分子。他们退却是为展开新的进攻准备基础。这就是文件的全部本质。他们退却,是因为不能不退却,不能不承认,我们的集体农庄在发展。不能不退却,是因为所有屋顶上的麻雀都在吱喳地叫这件事情,连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在叫喊,我们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甚至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里谈到的巴扎罗夫先生,连他也只得承认,我们在这条战线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当然,在这之后很难坚持原来的立场,坚持说中央似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那种立场。很难!三人集团今年年初提出的旧的政纲,它们已经没有用了。继续坚持旧的政纲就要冒着置身党外的危险。你们现在来宣扬党对农

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试试看吧！你们试试看吧！应当承认——而且这也是事实，——我们的集体农庄确实在发展，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不能再使用党在培植官僚主义的旧的说法，就像我们的同志们过去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把不可靠的分子清除出党和机关方面取得胜利和成功之后，现在，在集会上提出这样的政纲就意味着冒着置身党外的危险。发表旧的政纲是不行了。需要新的政纲。

现在已经不能在工人面前说，联共过去执行的是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现在不冒着落入奇尔布姆们、布兰德勒们等的营垒的危险，你就不能像我们的同志们过去在自己的政纲里说的那样说了。现在这已经变得危险了。

因此，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成就，在工业战线上是因为展开了疯狂的速度，在农业战线上是因为中农开始大批加入集体农庄，在思想战线上是因为右倾分子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整个这种胡说100%地被揭穿，以及在共产国际系统的对外政策战线上，党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和如此明显，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连路标转换派分子如巴扎罗夫都承认，要是在这方面我们右倾的同志们成了我们阶级敌人的尾巴，要是他们对我们的成就比我们的阶级敌人承认的少，那会令人感到奇怪的，因此我们的同志们应当重新武装。于是他们便重新武装，从旧的立场上退却和站到新的立场上。这个文件——就是新的政纲，就是右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与党斗争、对党发动新进攻的新的派别政纲。他们在这个新的政纲里究竟提出了什么呢？他们提出承认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承认的那些明显的成就，但强调指出，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没有完成——这是一，发展畜牧业的计划没有完成——这是二，提高实际工资的计划没有完成——这是三，四是农村新的危险和新的威胁的成分保存了下来，因为所谓的非常措施有变成反对富农的措施制度的危险。这就是四个基本要点。这也就是新政纲的成分，新政纲的目的就是承认现在所有的人直到我们的阶级敌人都承认的那些明显的成就，在另外的生存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向党进攻。提出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和同志，右倾分子的领袖们好像在向自己的军队说：“好吧，弟兄们，老办法不行了，旧的政纲被粉碎了。现在军事封建剥削不能说了，最好说，我们看到中央有倾向把非常措施制度化。已经不能再说，党在培植官僚主义，不能说，党在瓦解共产国际。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党的成就是如此巨大，必须重新武装，丢掉旧的政纲和创立新的政纲。在新的政纲的基础上，在这四个要点的基础上还可以与党战斗一阵子。

因此,弟兄们,不要解散,要在我们给你们的那个文件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右倾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就是这个文件的含义。不退却,因为不能现在退却,因为他们将被彻底击溃,如果他们坚持旧的政纲的话,但是,他们退却不是为了清算自己的立场,而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政纲的基础上坚持它们。正因为如此,这个文件尽管里面用的是这样一种和平的语调,尽管他们承认了一些东西,承认他们错了,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派别文件,是在新的政纲基础上与党斗争的文件。

问题:提出这个文件之后他们是否多少有点什么好处和便宜呢?当然没有。这完全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他们将被彻底粉碎。

在这个文件之前还可以指望,他们将会保留在政治局里。在这个文件之后,如果他们不对其进行修改,如果他们坚持这个文件,他们当然不可能留在政治局里。这很清楚,同志们,很清楚。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并非我党最差的工作者的这些人——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虚伪的、伪善透顶的文件?这个文件将打击的是他们,而不是党。这个文件有一切可能断送他们,而不是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对某些成就他们有某种概念,因为这些成就太引人注目了,但实际上国内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党内发生什么事情,阶级斗争的奥秘怎样和如何展开,我们发起的全线进攻的内容是什么,它,这种进攻是从哪里来的和它是否需要——这些问题他们都不明白,至少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而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态度看待它们的。这是事实。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非常措施问题上。他们说,使我们分开的只是非常措施问题。他们说,有这样的危险,你们,中央委员会,会把这些非常措施变成反对农民的非常措施制度。他们认为,非常措施是反对农民的,而不是反对富农的。

第一,他们认为,我们在农业战线上的进攻仅限于所谓的非常措施。这不值一提。只有被吓怕了的自由主义者才会这么想,只有《社会主义导报》才会这么想,只有身处国外的克伦斯基才会这么想,但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么想的。

非常措施,这不是目前条件下进攻的特点。这完全不值一提。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待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恐怖”。他们就是这样评价我们在农村的进攻的。

难道我们一年前实行的非常措施,难道它们像我们现在实行的非常措施吗?当然不会。去年的情况怎样呢?对那些搞粮食投机的人使用了法典的那个条

款。这是试探富农的尝试。说实在的,这甚至不是进攻,是用行政办法试探富农的尝试。这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贫农和中农的参加,没有组织他们反对富农,没有加紧供给农具和拖拉机,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还没有对富农实行所谓的个别课税,根本就没有一整套的措施,只有这些措施才能称为在农业战线上对富农的进攻。这只是反对富农的行政措施:你那件事没做到,犯了法,是否想去坐牢。

而现在,非常措施难道就是这样吗?没有这么回事。现在对富农施压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发动广大工人群众,首先是派工人工作队下乡,这是1918年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做过的,把发动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的事情交给粮食收购基地、集体农庄建设基地、机器拖拉机站筹建基地、贯彻税收阶级原则基地等。整个这件事情都交给了从城里动员来的工人、工人工作队,以便发动贫中农群众起来反对和孤立富农。这里问题已经不在于法律。法律只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这是全线进攻。

农业战线上的这种进攻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呢?工人工作队保护贫农、组织贫农,保护中农、组织中农,反对富农的行动,团结他们公平分担赋税,在收购中实行阶级原则,这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去年所没有的。加紧组建集体农庄、群众转到集体经济的道路、我们国营农场的扩大及国营农场对周围农民的帮助(关于机器拖拉机站我好像已经说过了),如此等等,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向富农进攻的一整套措施。这里有什么引人注目呢?引人注目的,可以说,不仅是法律方面(这只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引人注目的是给广大农民群众送去新的杠杆,以便在生产方面,在供应收购方面,在合作社方面和通过集体农庄提供直接生产支援方面,在税收等等方面和在粮食收购方面孤立富农。实际上,三人集团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已经成为我们进攻体系的一切措施。难道真是这样?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所谈的是什么样的非常措施?是什么措施?如果贫农和中农集合起来,依靠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孤立了富农并迫使他们交出了余粮,这是什么——是旧的非常措施吗?当然不是。当他们把旧的非常措施和对富农的新的进攻等量齐观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呢?显然,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问题的。他们说,你们在侵害富农,而不是中农,因为非常措施是反对富农的,而这是危险的。因此,把你们的所谓进攻小心地刹车吧。构成我们在农业战线上对富农最广泛进攻行动的这一整套措施,就是他们那么不清楚却又那么悄悄地谈论非常措施的实质和奥秘所在。人们不明白(我来回答关于怎么会发生他们跌进泥潭的问题)我们这

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曾经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后退,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助跑和发起进攻,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顽强的进攻。他说,现在我们在重新排队。什么时候需要进攻,这个问题应当研究。1921年他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政策的秘诀在于,党认定,最近一年半时机来了,我们强大到了足以由退却转入全线进攻。这不仅是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这样说不对。过去一年我们进攻的特点和这一进攻取得巨大成就的秘诀在于,进攻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在农业战线、工业战线上,在劳动生产率战线(社会主义竞赛)上进行。这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是对旷工者和劳动纪律破坏者等(他们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同盟者)的进攻。进攻的典型特点在于,它是全面的、全线展开的进攻。这就是同志们所不明白的。这里问题不在于非常措施,这是小事一桩。只有张皇失措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才会认为,我们进攻政策的中心是非常措施。这不值一提。进攻政策的中心在于,它,这种进攻,是全面的,它在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进行:在思想战线上,在农业战线上,在工业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在所有的战线上进行。

正因为我们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所以不仅能够一条战线上,而且在所有战线上展开进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就是本质,而不是早就被我们埋葬的旧的什么非常措施。似乎它们曾经有变成一种什么非常措施制度的危险或者威胁,或者倾向。这全都不值一提。只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被吓坏了的想象才会这样看待我们进攻政策的中心、基础、核心。这个基础是同志们所不明白的。我们应当助跑,以便在各条战线上向资本展开进攻。我们同志们的错误的中心就在这里,他们商谈之后最终搞出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这个只能使共产党人蒙受耻辱的虚伪文件的基础也在这里。

最后,是一个大概萦绕在所有人的心头而大家又不说的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同志,并非党内最差的同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支持他们的那些人,像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人会活到这种地步?要知道,他们曾经是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同盟者,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得不错,这我们很清楚。我们了解,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并非党内最差的人,经过与托洛茨基斗争考验的人成了右倾分子的首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同志们?

* 文件如此。

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我们党内一般常常发生的那样。通常,当党,当党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核心进行斗争,比如说,反对披着左的外衣,包着左的外壳的机会主义,如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这种斗争,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十月革命的日子一直进行到最近),通常,当党的基本核心,马克思主义核心进行坚决的、经常的、有组织的斗争反对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右倾分子、隐蔽的右倾分子便会作为同盟者参加这个核心,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场斗争的性质和目的。或者相反,当党的基本核心,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得不向没有任何伪装的右倾机会主义,公然的右倾机会主义开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些“左”的半托洛茨基分子,这左是带引号的,加入党的这个核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评价党的核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及这场斗争的意义和目的。1905年革命被粉碎和失败之前,当我们的党主要是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时一些曾经很好地帮助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斗争的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分子加入了我们党的核心:这就是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他们曾经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同盟者,他们曾经和列宁一起站在反对孟什维克,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前列。这我们很清楚。后来,当1905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当不得不由进攻(它通常会吸引各种坏蛋来参加),当党开始由进攻转入退却和面临着不得不由斗争的革命形式,由直接向沙皇制度进攻转向斗争的其他形式,利用合法的可能性的形式的时候,那时,曾经和我们一道出色地同孟什维克战斗的,以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等为代表的我们的同路人、我们的同盟者以及各种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向我们,向我们党的核心发起了进攻。这一点你们很清楚,同志们,当我们党的核心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进攻,一方面是党认为并未结束的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党所进行的反对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分子的斗争,这时候又有一些自称为普列汉诺夫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加入到党这里来,后来,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这些分子又开始与党进行坚决的斗争。参加我们党的斗争之后,这些人,普列汉诺夫分子、“左的”分子以自己的方式评价我们党的核心反对“左的”分子的斗争。波格丹诺夫分子只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才明白了,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理解它。我们现在发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当我们过去与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反对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的时候,党的一部分,同志中以自己的方式评价这一斗争的一部分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像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党的这一斗争的基础。在反对想要推动我们与农民分裂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我们总是提出中农,提出中农好的方面,说

他们,中农,不仅在买卖粮食的时候是投机者,而且他们在生产粮食的时候是劳动者,是劳动的人。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我们自然提出了他们所具有的好的方面。以此培养了整整一代我们的同盟者,像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这样的年轻人,但这是些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你们要问他农民的特点,他只会指出农民好的特点,而看不见他们坏的特点。他不承认中农,不喜欢中农,想象不出中农是什么样子,不愿意谈论这一点,这是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与托洛茨基主义,与披着左的外衣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参加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时候需要强调中农过去被完全否定的好的方面。在这样的时刻,一部分同志加入了我们党的核心,以自己的方式对此进行评价,他们说,一切将这样发展,我们这里一切将长入社会主义,他们说,我们将驱散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就是说,他们曾经保护过中农,只看见中农好的方面,而以后如果与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发生分歧的话,我们可能会逐渐地慢慢地把这个核心推翻的。这个目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我不知道,大概没有。但是,许多同志那时参加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作为“左”的分子的敌人,做“左”的分子的敌人并不就是做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作为敌人来打垮“左”的分子,然后把自己的思想带到党里来,这一点我不怀疑。于是他们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了,而后来,当党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得不转过身来反对右倾的时候,很清楚,这一定会揭开与那些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斗争的同路人的分歧,他们在这一斗争中有自己的目的和任务和并不完全明白党的方针,即与右倾分子,即与在隐蔽状态中已是右倾分子的那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后来才开始弄清楚的。在与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又有各种来自“左”边的机会主义分子参加到我们这里来。

关于他们这里已经说得很多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忏悔了,但许多人没有忏悔。但是我们党里有半托洛茨基主义,有“左”的分子存在,他们往往有一种倾向把为巩固党的自我批评起劲地变成为破坏党的自我批评,他们往往为集体农庄大唱颂歌,并不明白,集体农庄只是农民经济发展的新的渠道,这个渠道内部有其自身的矛盾,他们过分地赞扬我们的每一个成就往往是为了降低我们党的警惕性和不让它有可能发现伴随着我们的成就和成绩的那些阴暗面,——这就是我们将要打击的我们现有的这些新的同路人。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是存在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和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党内斗争的诀窍。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一些带引号的左的分子便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党的方针。而在反对

“左”的分子的斗争中,一些右倾分子便怀着自己的目的和任务,作为同盟者参加到我们这里来,以便致“左”的分子于死命。那好吧,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是怎样做的呢?当我们转而反对带引号的左的分子之后,他们便离开了我们;或者像各种戈尔登贝格们、各种罗日科夫们等所做的那样,参加到我们这里来,而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我们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新生活报》,向我们进行袭击,这就是党内斗争的诀窍,这就是党既清除来自带引号的左的,又清除来自右的不坚定分子的政策。你进行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便有带引号的左的分子中的同路人参加进来。因此,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当你现在主要进行反对“左”的分子的斗争的时候,右倾分子中的同路人便会参加到你这里来。我认为,那些现在把反对右倾视为常规的同志,他们过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过去不是同我们在一起,他们参加到我们这里,怀有自己的目的和任务,曲解了党的政策。只是现在,当我们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进攻,从两方面进行阻挡——既反对向“左”动摇,又反对向右动摇的分子,只是现在他们才清楚了,党的政策是什么。就是由于事物的这种逻辑和由于党内斗争的这种诀窍,我们的同志们,我们昨天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同盟者——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现在处在了右倾分子的营垒里。

你们会问,以后会怎样?我认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同志们让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见鬼去,以工人的方式,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诚实地对我们说,是我们错了,党是正确的。我们中间谁没犯过错误呢?同志们,让我们作个了断,一起前进吧。这我明白,这将是诚实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保证。要么他们这样说,那我们就在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来自“左”的和来自右的敌人,要么他们坚持这个不成体统的东西,这是一个退却的文件,一个为了准备向党进攻的文件。当然那就只好抨击他们,痛打他们。如果同志们不愿意消除自己的错误,我们只好被迫地痛打某些人,那就请同志们原谅了。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毫无办法。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113号案卷,第151—174张。原件。打字稿。)

2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布哈林的决议》

在看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4月23日通过的关于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的决议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下列各点:

布哈林同志跟联共(布)政治总路线的分歧早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已出现,这种分歧在布哈林及其同谋者反对党的政策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一个独特的机会主义政纲,即实质上是右倾的政纲。

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联共(布)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节节胜利的进攻,并在动员贫农和实现无产阶级跟贫农、中农在生产上联合的新形式的基础上,加紧了反对富农的斗争,从而保证了在农业这个国民经济最落后的部门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方面形成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在农民大规模集体化不断向前发展、国营农场建设大规模发展以及农业机器站广泛组织起来等等情况下,实行这种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进攻和排挤的政策,势必引起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即资本主义分子力图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以及小资产阶级阶层更加动摇不定。跟联共(布)的路线相对立,右倾分子(当时布哈林同志也已转到这些人的立场上)提出另一条路线,一条反对对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进攻、否认必须加强跟富农作斗争,以及放弃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亦即对资本主义分子投降的路线。为了反对联共(布)的路线,布哈林同志竟堕落到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自由主义的解释,在开放贸易的幌子下主张给予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以发展自由,主张对猖狂地进行粮食投机活动的富农分子不加控制,以及不顾党对资本主义分子课收重税的政策而否认对富

农征收个人捐税的必要性,等等。这表明布哈林同志事实上已经堕落到采取跟资本主义分子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他用“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偷换无产阶级对富农的阶级斗争政策。

跟布哈林同志这种错误观点密切联系的,是他的旨在压制党所实行的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正当联共(布)坚持不渝地执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国家工业化这一路线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及其同谋者却在困难面前投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主要问题上放弃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若干阶层所施加的压力。正当联共(布)领导着工人阶级热情奋发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把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时候,布哈林及其同谋者则散布小资产阶级悲观主义和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情绪;如果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最后,在对联共(布)的情况及其领导方法进行评价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及其集团只是重复一些托洛茨基的陈词滥调。正当联共(布)在开展自我批评和发扬党内民主的口号下,卓有成效地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和清洗党内蜕化分子的时候,布哈林及其同谋者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的掩护下,反对党所领导的在采取种种新的方式来大力加强跟群众联系的基础上,对各级党组织、工会、合作社以及苏维埃机关的全盘工作进行改组,这就反映了反抗党的路线的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情绪。

布哈林同志在对待联共(布)的政策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跟他在国际政策方面的错误路线有着密切联系的。联共(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进攻,乃是破坏资本主义稳定的一个因素,而布哈林和洪别尔-德罗、谢拉、埃韦特等人则低估了这个因素的作用,这实际上便为整个共产国际的右派分子的政策奠定政治思想基础。为了反对党的路线,布哈林同志竟堕落到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来否认资本主义稳定已日益动摇这个事实,因而势必就要否认革命工人运动的新浪潮的日益高涨。从这种立场出发,布哈林同志提出了他的所谓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趋于缓和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在所谓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仅仅存在于世界市场这类词句的掩盖下来偷运这种理论。这种作为共产国际一切右派分子的思想基础的“理论”,正在被资本主义整个发展情况所推翻,它实质上是对改良主义思想意识(希法亭的“资本主义健全”的理论)的投降。

布哈林同志所写的《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理论》这篇文章(载6月30日《真理报》)表明,他非但没有放弃自己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缓和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不断加深自己的错误。

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布哈林同志及其同谋者大叫大嚷的关于共产国际“分化”的言论,乃是偷偷摸摸地支持右派分子的一种方法。而跟右派分子作斗争,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共产党清洗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过程是健康发展的,这个过程在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条件下尤其是必要的,但布哈林同志及其集团却在竭力诋毁这个过程,借以削弱共产国际反对右倾叛徒的斗争。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一切右派分子的重心,布哈林同志及其集团散布悲观失望和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情绪,这不仅助长了一切反列宁主义派别的气焰,而且还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

布哈林同志的这种机会主义动摇思想,使得他试图背着党跟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结成毫无原则的同盟来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

鉴于以上种种事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肯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撤除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的决议的正确性,决定解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职务。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列宁格勒,1934年,第911—913页。)

3

基辅 C. C. 加米涅夫联合指挥员军事
学校附设军政训练班学员 И. 普列杰因
1929 年 3 月的发言记录

复制件
苏联
海军人民委员部
工农红军政治部
1929 年 6 月 1 日
第 273/М 号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收

现呈上 C. C. 加米涅夫军校附设军政训练班学员普列杰因在学校基层党组织大会的发言记录。

发言是右倾的直言不讳的和全面的纲领。

另附上学校基层党组织委员会决定的复制件和训练班主任兼政委阿尔乔缅科同志公函的复制件。

请您把这些文件发给政治局各位委员。

A. 布勃诺夫

复制件的复制件

如果你们中间有人作出结论,说我反对大工业,那将是很大的错误。硬说建设社会主义不需要大工业,而需要小工业,当然是荒唐的。

总之,我赞成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但是,这种大工业我们现在还没有。它需要建设。我们刚刚才为这一宏伟的建设奠定了开端,打下了基础。而在下面的问题上:怎样继续进行大工业的建设,怎样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利用各个阶级,与农民建立怎样的关系,是否按照列宁同志提出的那样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当前时期是否需要向我们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坚决的进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与党的大多数有分歧。

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我从党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的决议开始。

瞧,十一月全会是怎样决定的:“坚定执行国家工业化的方针,以政府的决定保证今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生长,同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提高整个农业,包括谷物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生产,大力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在对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不断加大限制的情况下建立国营农场,鼓励并大力支持农业的各种集体形式(集体农庄、公社、劳动组合等)和大力加强对贫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摘自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全会首先建议保证基本建设投资的生长。其次“同时”提高农村的生产力,越来越加大对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刺激贫中农经济的发展。

有意识地不对这个计划进行批评,我向你们声明,这个计划是不正确的。党永远不可能按照全会提出的那样实现这一计划。

很自然,你们会产生一个问题:我想用什么来代替这个计划?

下面就是我的建议。

为了建立国家工业化比较牢固的物质基础,首先需要采取一切措施发展农村的生产力。

应当采取的这些措施如下:

1. 通过以下办法降低对全体农民的税收:

(1) 取消对收入超过500卢布的中农和富裕农户的比例附加税(收入不到500卢布的没有比例附加税);

(2) 降低对年收入不超过2000卢布的所有农户的统一农业税累进率;

(3) 取消对富农户的个别课税;

(4) 不允许向所有农户收取超过35%的公益捐;

(5)降低间接税,即降低日用工业品的价格。

2. 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和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在粮食和原料收购问题上。

3. 给予各阶层农民参加合作社的广泛权利。

4. 给予私人手工业和农业手工艺发展以充分的自由,免除手工业者和手工艺人的税负。

5. 比现在更大规模地发展为农民广泛需要服务的和作为提高农业耕作要素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化学工业、农具生产等)。

6. 逐步地,但决不后退地建设大工业并在不断发展和增长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工业化。

7. 在国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集体耕作形式(公社、集体农庄、劳动组合等)的发展给予充分的可能和鼓励。

你们看到,我的建议为农村和城市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些建议如果得到实施,将会进一步巩固我国资本主义的基础。

这一点我完全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我的出发点如下。

第一,我的出发点是,只有这样的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计划,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与千百万劳动农民的联盟,没有它(联盟)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需要“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列宁:第18卷下册,第29页)(见列宁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7页)。

你们怎么想,从十一月全会决议的观点看,“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这些话是否太过时了?

我认为,不仅过时了,而且已被束之高阁。

我们是否同劳动农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了呢?我们是否重又陷入了梦想?我认为,在对工业超高速度的追求中,我们正在脱离农民基本群众。为了掩盖这种脱离的鸿沟,我们拼命地把贫中农拉上了结合的新形式(集体化)的道路。

我们不得不这样用力地把农民拉入集体农庄,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经济基础。

现在当大工业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现在来考虑农业大规模的集体化,——这样考虑就意味着模仿 18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那些幻想农民村社的民粹派。

总之,按照列宁的提纲:慢慢地同劳动农民一起前进,不冒进,不幻想,——这就是我第一个出发点的结论。

第二,我的出发点是,列入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不仅有富农,而且有中农,并完全不是按照列宁的方式提出“不断加大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问题,似乎这种进攻不会触及中农。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生活表明,这种进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农的生产活动陷于瘫痪。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中农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下面引用列宁对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论点。

首 先

“小经济的发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18 卷上册,第 216 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210 页)

其 次

“我们应当给农民这些小生产者相当大的活动余地。不提高农民经济,我们就解决不了粮食问题。”(第 18 卷上册,第 265 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307 页)

列宁的这些论点在当前时期是否正确呢?是的,是完完全全正确的。我们是否在贯彻执行这些论点呢?没有,我们没有贯彻执行。我们主要通过税收系统宣布向消灭农村资本主义成分进军,我们已经以此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农经济,使它们失去了发展的刺激因素。

就是说,十一月全会关于刺激农民经济发展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只适用于贫农经济。

在我们与中农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从列宁的立场向“左”转了。这就是我对第二个出发点的结论。

* 原文如此,应为 19 世纪。——编者注

第三,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近期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和农业原料的生产。在3—4年间,余粮每年最大增加量不应当是2亿—2.5亿普特,而应当是4亿—5亿普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景,第一是无法实现的,第二,即使实现了,也丝毫不能使国家摆脱粮食困境。

实现这个前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农村政策下个体农户在这段时间里决不可能多向我们提供1亿普特的余粮。我们钳制了农村。农民抑制了自己的生产活动。

然而,就假定我们得到了这2亿—2.5亿普特粮食,但是这几年由于城市人口和需求的的增长,这些增加的粮食将被这增加的需求吃掉。结论是清楚的:应当让全体农民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这样在最近3—4年间我们将会多得到5亿普特的余粮,将从手工业得到非常宝贵的成果并使我们的市场充满各种原料。

我们的大工业这几年由于对农民税收的减少而少收的钱,可以因农村的发展使得出口加强而加倍收回。

现在当我们经常缺乏粮食、油脂、原料,现在当我们发给工人维持半饱的定量,当我们没有可能出口一公斤粮食的时候,党必须大致用列宁同志这样的话向工人阶级声明:“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第18卷上册,第213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7页)

第四,我的出发点是,经济上壮大起来的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对我们并不可怕。认为恢复元气的富农会把贫农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想法是可笑的。在选举村苏维埃的时候,富农将失去和一定会失去选举权。其次,农民互助委员会、贫农小组、我们的支部、贫农的集体化,——这一切都是相当强大的因素,通过它们可以使贫农摆脱富农的影响。

认为主要是小的私人手工业和农民手工艺,如果任其自由发展的话,可能会压倒我们的大工业,这种设想也是荒唐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小工业压倒大工业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工业总是摧毁小工业。情况既然如此,那我们干吗要害怕私人小工业和农业手工艺在国内的发展。我们干吗要对这种私有成分规定不可思议的高额税收,预先就知道,谁也承受不了这种致命的税收。

在我们手中掌握着国家政权、红军、大小工业、交通运输、银行等的情况下,我们干吗要害怕一般的资本主义成分。

既然离开私有成分我们现在无法生活,我们干吗要用行政手段消灭这种成分?你们会回答我说,党是根据列宁的理论执行这样的政策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请看他 1921 年 5 月 25 日在全俄党代表会议上向党提出了怎样的任务:“这是一个任务。另一个任务就是尽量实现农民的流转自由和尽量发展小工业,给在小私有制和小商业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点自由。不要害怕这种资本主义,因为它对我们一点也不可怕。”(第 18 卷上册,第 267 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308 页)

我再给你们举一个论点作为对此的补充。“这一切全都应当利用起来,目的是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奇谈怪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但这一点也不是奇谈怪论,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第 18 卷上册,第 225 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220—221 页)

列宁也善于利用敌人。

如你们所看到的,列宁的这些论点与我们现在正在贯彻执行的对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加大进攻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你们会对我说,列宁的这个论点在 1927 年以前(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六年期间是正确的,而到 1927 年就过时了。你们会重复斯大林同志的话说:“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但这全都将是些十分没有说服力的话。

你们会向我证明:为什么 1927 年列宁的这些论点过时了,不适合作为“行动的指南”了。要知道,列宁的这些论点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再需要新经济政策,请回答——究竟为什么。我无法找到对此的答案。或者因为我们变得太强大和太富有了,而资本主义变得十分软弱,我们再也不需要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帮手”了。

或者相反,因为我们软弱,而资本主义强大,它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无产阶级国家太危险了吗?

你们不能告诉我第一个答案,因为不久前斯大林同志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

列宁主义观点,“资本主义在我国拥有比社会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而谁拥有“更牢固的基础”,谁随时就会成为强大的。

剩下的是第二个答案,即资本主义是强大的,社会主义还是软弱的。如果不现在就消灭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就会消灭我们。

总之,你们只能这样回答我,说我所引用的列宁的论点从1927年就不适合作为“行动的指南”了,因为资本主义在我国拥有很大的潜在力量,而我们还太软弱。需要向资本主义成分展开进攻,消灭它们。

但那就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列宁同志1921年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难道那时候我们比1927年或者1929年更强大?或者列宁同志那时候实行的是孤注一掷的政策?是冒险的政策?

你们会对我说,列宁实行的确实是“谁战胜谁”,即是我们战胜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战胜我们的政策。但要知道,这不是极端的政策。它是完全切合实际的。

如果我国的农民人口不是80%,而只有20%,那列宁是不会容许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国家内部发展的。难道现在这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人口比例发生根本变化了吗?难道“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们会回答说,各阶级的关系基本上仍然还是那样。“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软弱,所以应当进攻。

为什么要进攻?

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在已经形成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面下,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这种进攻绝对是毫无根据的。

请听列宁1921年容许资本主义在我国自由发展的时候,是怎样说明理由的。“由于目前形成的总的经济政治局面是无产阶级掌握着大工业的一切命脉,而且根本不会取消国有化,我们是用不着害怕这种资本主义的。在我们主要是苦于产品极端缺乏、苦于极端贫困的时候,担心建立在小的农副业上面的资本主义会构成一种威胁,那是很可笑的。”(第18卷上册,第267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08—309页)

同志们,请你们凭良心说,难道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不适合做我们党的“行动的指南”了吗?难道现在的政治经济局面比1921年更不利了吗?难道大工业的一切命脉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吗?难道党内有谁在谈取消国有化吗?难道现在我们不苦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缺乏吗?难道你们中间有谁会说我们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足够了吗?

总之,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鞋子和做衬衣的花布,由于领取有限量的面包,无产阶级必须冒着最终与农民基本群众决裂的危险,向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坚决的,但暂时完全徒劳无益的进攻,目的是彻底消灭它们。

当我对你们说,这种进攻是根本错误的,它会像例如1920年对华沙进攻的失败那样遭到失败,你们会回答我说:“你是机会主义者,你在修正列宁的理论。”

然而,请你们试试对我提出的列宁的这些论点设法作另外的解释,你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列宁的这些论点不适合做“行动的指南”。那就是你们修正列宁的论点,而不是我。

对列宁的这些引文作另外的解释是不行的。自然而然就会得出结论,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带领党走的不是列宁的道路,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从我的第四个出发点得出的结论。

第五,我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现阶段,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国内挑起阶级斗争对于我们太危险了。你们会回答我,“革命理论的不妥协性”是列宁主义的主要武器,我们是不会缓和阶级斗争的。党内没有人建议你们缓和阶级斗争。我建议你们当前时期不要挑起阶级斗争,理由如下:

1.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牢固的物质经济基础。

2. 因为在现行的政策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失去我们的大同盟者——中农,这在关键时刻对我们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你们会说:“这是一派胡言,中农将永远在我们一边。”请试试证明这一点。而我来对你们说,我们现在如此顺利实行的剥夺富农的政策不是孤立,而是使中农与富农联合起来。我们就是这样学会打击富农的,我们对这个进程是这样热衷,以至分辨不清我们的打击落在了谁的身上。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得完全正确:“如果有人向共产党员提出问题说,究竟党更有准备的是剥夺富农,还是不做而去同中农结成联盟呢,我以为,在一百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九十九个人会说,党最有准备的是这样的口号:打击富农。只要让他们干,那他们一下子就会把富农剥夺干净。至于不要剥夺富农,而要实行较为复杂的经过同中农联盟来孤立富农的政策,那他们就不那么容易领会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第54页,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9页)

斯大林的这些话在对富农实行个别课税的问题上和粮食收购中实行非常

措施的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在这两个运动中不仅勇敢地打击了所有的富农,而且也打击了大量的中农。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让他们干,那他们一下子就会把富农剥夺干净。”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让把富农剥夺干净。它提出了“较为复杂的经过同中农联盟来孤立富农的政策”。

但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给予了把富农剥夺干净的充分自由,点燃起了阶级斗争。最后,在国内挑起阶级斗争对我们不利,还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决定性战斗的门坎上。

你们中间有谁会对这个论点提出异议,如果在同帝国主义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后方有敌人随时准备揪住我们的后背,那对我们将是不妙的?

有谁会提出异议,在我们的军队战时一半将由中农组成的时刻,与中农基本群众决裂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同志们,在我看来,在当前情况下在我们国内挑起阶级斗争的政策对于我们隐藏着毁灭性的后果。永远保持战斗的进攻精神对我们是不无益处的。

我们随时准备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牺牲自己。

同志们,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不仅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我们是在拿整个国家冒险。我们是在拿千百万劳动者冒险。共产党人最少关心自己,最少为自己负责。他为整个阶级负责。而我们知道,这个阶级的力量取决于什么。这种力量取决于这个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当我确信,这个联盟年复一年地经常遭到破坏,当我们党的正式机关报上畅行无阻地登出大体这样的论点和要求:“农村富裕上层家里存有粮食,集市价格和收购价格出现了很大差距,因此必须发挥狂热的力量去完成年度收购计划。”我向你们指出,这样的说法是走极端。我们知道,随着这些号召而来的会是什么行动。随着这些号召而来的会是口号:从富裕农民那里扒粮食。经验表明,这些非常措施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很久以前,斯大林同志亲自声明,继续实行非常措施会导致与中农的决裂。

这样一来,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我们使国家走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虽然你们会称我为右倾分子、机会主义分子,还会给我与此押韵和不押韵的随便什么称呼,我要向你们声明,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我将为立即改变不仅导致农业“退化”,而且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停顿的政策而进行斗争。

决 定

联共(布)基辅 C. C. 加米涅夫 联合军校附设军政训练班党委 1929 年 4 月 17 日的决定

党委会在听取了责任书记介绍情况和第五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关于把普列杰因同志开除出联共(布)队伍的记录摘录以后指出,普列杰因同志提交的在党支部大会上个人汇报的报告提纲是完全定型的富农纲领,其矛头是反对联共(布)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以后各次代表会议、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所采取的党的基本总路线的。

按实质说,普列杰因的“纲领”是一个反党的文件,是右倾主要论点的逻辑上的结论。

普列杰因的纲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直接拒绝和公开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注意到普列杰因是完全坚信不疑地、深思熟虑地和公开地坚持这个客观上反革命的“纲领”和公开提出自己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的政策的主要问题有原则分歧的问题并宣称自己“将为立即改变党的似乎不仅导致农业退化,而且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停顿的政策”而进行斗争。

根据以上所述,党委会决定:批准第五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今年 4 月 16 日一致通过的把普列杰因同志开除出联共(布)队伍的决定。(一致通过。)

训练班党委责任书记 萨伦采夫

本决定已于 1929 年 4 月 18 日由训练班基层党组织党员大会批准(700 名联共(布)党员一致通过)。

党委责任书记 萨伦采夫

苏联

基辅 C. C. 加米涅夫联合指挥员

军事学校附设军政训练班

1929 年 4 月 22 日

第 28/c 号

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收

今年3月初,在我负责的列宁主义政治指导员培训班的课堂上(在分析农民土地问题的题目时),学员普列杰因同志发言,宣称在党的当前政策下中农被剥夺了发展的前景——他们必须参加集体农庄,否则就会被课以重税。

教员的讲解未起任何作用。此后,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当区委的代表和专区党委书记介绍右倾情况的时候,普列杰因同志声明,他同意右倾的主要论点。后来主席团和教员向他进行的正确阐明问题的解释工作(指定参考书等)没有产生所希望的结果。支部主席团决定于4月初先在主席团会议上,然后在全体大会上听取他个人的汇报。

普列杰因同志的履历材料是这样的。据他本人承认,他是乌拉尔斯克州沙德林县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他1919年参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20年入党,毕业于省苏维埃党校,后参军入伍。他父亲家有9口人,14俄亩土地,3匹马等。他父亲家今年的粮食总产量,据普列杰因说,为400普特。其中有200普特余粮——100普特他父亲卖给了合作社,另100普特在自由市场上卖了。

根据工人工作队的提议,村民大会判决剥夺他父亲在合作社的购物权两年并召回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从红军召回,即这个普列杰因,另一个从九年制学校召回。

纳税96卢布(本应纳税120卢布),其余的按优惠扣除。

在支部主席团会议上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暴露出了普列杰因与党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

在支部大会上普列杰因同志宣读了自己的纲领,这是一个表述鲜明的富农的反革命“纲领”,这从其全部内容上可以看出。对普列杰因的汇报,43位同志中有18位同志发了言,大家一致对他进行了谴责,他被一致决定开除出党的队伍。

今年4月17日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支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把他开除出党的问题,而4月18日在全训练班党员大会上一致批准了支部的决定。

鉴于以上所述,注意到普列杰因同志是完全坚信不疑地、深思熟虑地和公开地坚持这个客观上反革命的“纲领”,我曾向乌克兰军区政治部主任提出请求(1929年4月18日的第27/c号公函),让普列杰因同志紧急从工农红军队伍中复员。

附件：普列杰因同志纲领的复制件和联共（布）训练班基层组织关于把普列杰因同志开除出联共（布）队伍的决定。

训练班主任兼政委——阿尔乔緬科

训练班党委责任书记——萨伦采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68—76张。复制件。打字稿。）

4

联共(布)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 1929 年 9 月 19 日
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

联共(布)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 1929 年 9 月 19 日会议记录第 23 号

书记哈哈列夫。

出席的有:谢达舍夫、索博利、阿尔先季耶夫、阿尔马佐夫、马卡罗夫、多尔别什金、季霍米罗夫、布什科夫、普列穆德罗夫同志。

В. И. 沃罗比约夫同志的声明

(见速记记录)

考虑到,在对我们支部联共(布)队伍进行审查和沃罗比约夫同志通报情况的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党内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学院支部的范围,实际上是全党性质的事情,是右倾分子旨在破坏党的总路线和破坏由拥护党的总路线的同志组成的党的领导班子权威的派别斗争的尝试的组成部分,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情况紧急报告各上级党组织,以便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关于支部内部事务的问题单独分出来,召开支部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非公开的联席会议解决。

全部材料上交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

复制件送:联共(布)州监察委员会、联共(布)区监察委员会、联共(布)州

委会,并交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学院支部存档。

联共(布)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 1929年9月19日会议速记记录

主席(哈哈列夫):现在开会。在我们支部的清党中我们碰到了一个远非支部内部性质的问题,一个涉及正在莫斯科组织这里活动的右倾集团,主要是原莫斯科领导的问题。因此,我认为需要听取沃罗比约夫同志的情况通报,将其记录下来并由此作出相应的结论。支部委员会无法早一些开会,因为部分同志原先在休假,而且现在还有曼采夫和卡缅斯基两位同志不在,有些人在搞清党工作,有些人原先在参加代表会议。现在恰好有机会召开人员比较齐全的支部委员会会议。

沃罗比约夫同志,请通报全部情况。

沃罗比约夫:同志们,关于我所犯的政治错误,关于我曾经同意的布哈林同志集团的观点,我在9月4日工业学院支部大会上,而后又在第九次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里已经充分地,我认为,十分详尽地通报了。同样,我在自己这几次最初的发言里坚决声明与布哈林集团的思想彻底决裂,谴责了这些观点并对此发表了相应的政治声明。很自然,既然我已成为直截了当地和坚决地与右倾反对派的思想实行了决裂,为了让党的机关也了解,我应当向支部委员会通报右倾反对派及其在莫斯科组织里的支持者曾经进行的活动。我想向你们通报的第一点涉及莫斯科组织内的斗争,包括与乌格拉诺夫同志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他一些委员有关的斗争。关于党中央政治局里存在某些分歧的最初消息是去年夏末我回到莫斯科以后从马特维耶夫同志那里得到的。当时我被告知,说斯大林正在向一些政治局委员施加压力,当时提到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说斯大林在离开列宁的立场,说因此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斯大林同志那里开了一次会,说后来列宁格勒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开了一次有斯大林同志出席的非公开的会议,会上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当编辑时《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刊登的几篇文章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活跃而又激烈的讨论。后来我又得到消息,说在鲍曼区组织里特别狠劲地在批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在搞臭他们,鲍曼区委同莫斯科委员会似乎不是走在一道,说主要是鲍曼人对李可夫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表示了不满,说主要是他们就一些尖锐政治题目递了纸条,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李可夫同志的威望。布哈林同

志集团的政治观点的主要本质,像他们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发言的本质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因此,除了那些我想说是带有政治组织性质的消息之外,对于政治分歧的本质我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去年9月初我来到工业学院以后,丘任同志也告诉我,说他知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发言,说在他们的发言里发现了,揭露出了一定的右倾色彩,说莫斯科将发生为保卫党的政治路线的战斗,说需要让工业学院的支部作好相应的准备。由于前面我已向你们通报的马特维耶夫同志告诉我的消息使我特别警觉,我当时认为,这里有点不正常。因此我告诉丘任同志,现在我不能向他陈述自己的意见,因为没有读过中央全会的材料。接着我把与丘任同志的谈话告诉了马特维耶夫同志,我同他多年保持着最密切的同志关系。他建议我去找乌格拉诺夫同志。就在我把与丘任的谈话告诉了马特维耶夫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到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去了,他也曾经到我和丘任这里,并特别向他指出,丘任同志在谈话中援引说,齐夫里诺维奇同志也向他作过这样的指示。听完我的话,乌格拉诺夫同志肯定了这些消息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并建议我写一个声明。一两天之后我写好了声明。我和马特维耶夫同志一起到乌格拉诺夫同志家里去。乌格拉诺夫同志打电话把当时的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同志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米哈伊洛夫叫了来。我给他们读了自己的声明。他们仔细听完声明之后,认为写得很好,不需要作任何修改。整个的意见交换都是围绕着应当给声明定个怎样的方向进行的。乌格拉诺夫同志认为,而且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就对我说过,这些谈话和这个声明应当作为文件加以利用,可以据以证明鲍曼区委在进行破坏莫斯科组织统一的活动,可以据以在鲍曼区作出相应的组织结论并以此达到莫斯科组织更大的统一。我前面已经说过,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莫罗兹、米哈伊洛夫、马特维耶夫、乌格拉诺夫同志和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把声明送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但后来又认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可能会不让这个声明广为传播,并且可能会对我采取过于严厉的惩罚措施。有人建议把声明直接送到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但后来也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可能会怀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参与了此事。因此,我们最后一致同意必须把声明直接交给支部委员会,争取让支部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决定,以便把这个声明送往区监察委员会,而后声明将送往莫斯科监察委员会。根据这个协议,我直接向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递交了声明。在支部委员会这次会议上决定把这件事情交给鲍曼区监察委员会。顺便说,我是否应当在括号里附带声明,在这次会议上米哈伊洛夫同志对这个文件-声明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他认为,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对声明在政治上给予大力推动,它只能

被用来作为鲍曼区委在进行活动的证据,被用来作为在中央全会上进行发言的文件等。接着,声明送到了鲍曼区监察委员会。那天晚上我好像是去了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他告诉我,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打电话给他,说齐夫里诺维奇带着我的声明到雅罗斯拉夫斯基那里去过,雅罗斯拉夫斯基看了声明以后,要求把沃罗比约夫开除出党并严肃对待这个声明。乌格拉诺夫同志在电话里回答雅罗斯拉夫斯基说,等一等再动手,应当对这个声明进行研究。后来召开了鲍曼区委常务委员会和区监察委员会联席非公开会议,我在会上通报了我了解的情况,无疑赋予了政治性质。莫罗兹同志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另外一些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他们的姓名我现在不记得了。莫罗兹同志以对此事毫不知情的样子发表了讲话。但是认为有必要指出区委和区监察委员会的代表们似乎不正确的倾向,主要是他们保护丘任同志和把指责的矛头整个指向了我。当时莫罗兹同志在自己的讲话里指责鲍曼区的领导人偏袒和至少是犯了不能允许的片面性。后来乌格拉诺夫同志告诉我,事情将适当地发展并将正常进行。在鲍曼区委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决定。这个决定应当设法取消,应当证明给声明提出的政治目的是正确的。当时乌格拉诺夫同志告诉我说,已经同他商定了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的委员会组成人员,说委员会的班子里有很好的同志,如莫纳霍夫同志,还有一位,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只是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希列尔特同志使乌格拉诺夫同志有此担心。预计,在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对案件进行审查之后,召开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研究这个声明和通过相应的决定。但当暴露出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莫斯科组织的弱点,当在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对波德沃伊斯基同志关于莫斯科汽车联合公司支部的报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莫斯科委员会里并不一致之后,吉别尔和亚戈达同志参加到了波隆斯基一边,那时支持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委员们认为,在联席会议上提出声明是不适宜的。因此,声明和整个案件只在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米哈伊洛夫和曼德尔施塔姆同志代表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前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委员会的第一个结论是比较有利的。对丘任同志的谈话和活动进行了谴责,我向党组织报告这些谈话和拟议的活动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在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会议上后来情况不利地复杂化了,因此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决定。我和马特维耶夫同志,也像乌格拉诺夫同志一样,对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评价较差,但莫罗兹那时用一系列的策略考虑来说明

这个决定的通过,首先是,如果通过一个强烈的决定,那鲍曼区委就会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讨论这个案件,那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可能会撤销这个决定,指责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等。况且,莫罗兹同志当时说,工业学院的代表们在区委会和区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言并不那么精神饱满和坚决。从递交声明的时候起,由于我后来已经完全坚信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讲话里没有包含着甚至任何机会主义错误的萌芽,我整整一年把自己的命运(当然是带引号的命运)与乌格拉诺夫同志的集团联系在了一起。我经常到乌格拉诺夫同志家里去。参与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的谈话的主要有下列同志:马特维耶夫、库利科夫(莫斯科河南岸区区委书记)、雅科夫列夫(哈莫夫尼克区区委书记)、别尔津(好像是科洛缅斯科耶县原县委书记)、莫斯科苏维埃支部的维诺格拉多夫,工业学院的巴申科夫同志去过那里一次,“镰刀和锤子”工厂支部的菲拉托夫同志去过一两次,常去的还有切斯诺科夫同志。谈话完全都是政治性的,为了别的目的当然也用不着在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集会。讨论的是反对派的策略问题,政策是由最高领袖在他们的发言和文件里确定的。那时我们的共同意见是,应当尽量同时在一个会上发言,以便表明拥护莫斯科委员会原领导、拥护布哈林同志集团政策的情绪并不像党内认为的那样微不足道。但同时发言没有实现,据我所知,是因为没有产生相应政治影响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经有过的那些力量太小了。认为有必要只在那里和只由大家已知是布哈林同志集团支持者的那些人发言(包括在共产主义科学院支部里,在红色教授学院支部里)。认为在工业学院支部发言是不适宜的,因为,既然工业学院支部里有几位支持乌格拉诺夫的同志,那么在莫斯科组织里发生严重战斗的情况下,在反对派的发言更有根据的情况下,只有那时候工业学院支部才可以一下子全都发言,然后要求请乌格拉诺夫或者布哈林同志到这个会上来作报告并努力通过有关的决议,《真理报》的马列茨基等同志会玩一套那种把戏,比如像他们过去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时那样,设法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个决议的。因此,如果最终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那会是莫斯科组织内斗争的某种信号。但如大家已经知道的,所幸的是,预计的发言没有进行,因而特别是布哈林同志集团的支持者们没有在我们的会上正式出击。应当指出,库利科夫同志,我记得,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要么应当完全停止各种谈话和议论,要么,如果有应当为之奋斗的东西,那就用不着害怕派别发言。在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前的中央全会之前,库利科夫同志对他未能准确了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主要经济问题、五年计划等方面究竟坚持什么观点,表示了不满。他说,因此他,库利科

夫将在中央全会上发言,但只谈他最清楚的党内问题。我记得,雅科夫列夫同志曾劝诫我们年轻人,我和马特维耶夫,放弃大致与库利科夫同志的想法同时产生的建议和想法,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站在共同的党的立场上,要么别害怕斗争的某种尖锐化。特别是我和马特维耶夫同志提出了进行辩论的想法,乌格拉诺夫同志认为,辩论会使全党活跃和行动起来,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既没有可以适当利用的报刊机关,又没有做这件事情所需要的足够的人力。关于进行辩论的想法被埋葬了。我个人在要求或者表示赞成辩论的时候,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让党员群众了解我们所赞同的观点并以此避免走上非常危险并会使我们有遭到以前所有反对派的命运之虞的派别道路。现在我当然完全明白并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包括进行辩论的想法对党会多么有害,我完全明白,顺着这条路我们会走得多么远。那时,乌格拉诺夫同志答应把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情绪告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从我们后来进行的谈话中可以确定,看来,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没有得到上面的批准,因此,关于这些有组织的发言的谈话就成了梦想。

我们有过好几次谈话,每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很难复述出来。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和我到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过政治局的文件和中央的其他的文件。有时也进行托洛茨基反对派式的议论,议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议论他似乎打算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似乎有意在李可夫同志下台后被推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最后一次我同马特维耶夫、切斯诺科夫和巴申科夫同志一起到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去好像是在4月初,现在已经记不准了。乌格拉诺夫同志那时主要讲述了自己的克里米亚刻赤工厂之行,谈了自己在这个工厂工人集会上的讲话等。但是这一次我很早就从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走了,巴申科夫同志和其他人留在了那里。除了全党性质的政治谈话之外,乌格拉诺夫同志还向我们谈了去年他以调查“马利亚”矿难原因政府委员会主席身份被派往顿巴斯的时候在几次非党群众集会上的讲话。那时大家都担心,乌格拉诺夫同志会因为这些讲话被指责为企图向非党工人发出号召,但他的这些讲话不知为什么未被注意。至少据了解,中央未因此而给乌格拉诺夫同志任何指示。

关于莫斯科组织里发生的与乌格拉诺夫同志有关的斗争情况,我基本上就通报到这里。

现在我想通报我与青年布哈林学派的关系和这个集团或者大家称呼为这个学派的活动情况。我第一次见到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同志是1925年在哥尔克。从那时候起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主要是每逢星期天到他们那里去,顺便

到《真理报》编辑部去,当布哈林同志的众多学生在他亲自主持下,而他本人没来的时候在斯列普科夫同志主持下举行集会,研究和讨论一些与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有关的理论问题。后来我与这个学派关系中断了。因为在联合反对派被解除武装以后,不再召开范围较大的会议,而在小范围和很小范围的会议上只有布哈林同志最优秀的学生、最亲近的学生才能参加。后来我同这个学派又恢复了密切的联系,诚然,由于布哈林的错误这个学派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损失就是罗森塔尔、克拉瓦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斯腾同志及随后斯捷茨基和其他一些同志相继离它而去。这样,去年秋初我同他们又恢复了联系。看来,这个学派按照原来的传统保留了自己原先的一切习惯。特别是斯列普科夫同志仍然是学派的“灵魂”,只是环境变了,不再在《真理报》集会,因为在那里很容易会被揭露等,而主要是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斯特列什涅沃那边斯列普科夫的别墅里集会。斯列普科夫同志处的集会比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的集会范围更广。通常在那里集会的有《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成员阿斯特罗夫、亚历山大·斯列普科夫(那时他从萨马拉来长期休假,在那里他是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瓦西里·斯列普科夫、《真理报》编辑部成员马列茨基,其次还有他的兄弟格里戈里·马列茨基、扎伊采夫、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罗夫、红色教授学院的库兹明、马克思主义讲习班的莱温娜和马特维耶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罗济特、戈尔德曼,还有一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同志,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其次还有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副主席戈尔登贝格和从列宁格勒来的彼得罗夫斯基(他是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的儿子)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

在这些集会上讨论各种有关右倾反对派斗争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新闻、轰动一时的政治消息等进行通报。这个学派也在布留索夫大街的《真理报》大楼马列茨基同志家里集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马特维耶夫差一点与这个学派分道扬镳,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过多地辩论崇高的政治问题,而对真正群众的真正情绪几乎未表现出丝毫的理解。马特维耶夫也认为他们是无助的、无休止争论的知识分子的集团。但是我们没有同他们决裂,因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观点的一致足以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对罗济特同志通报的俄罗斯联邦减少越冬作物3%,其他地区减少的比例更大的情况展开了特别尖锐的争论。我和马特维耶夫同志觉得,学派的学生对待这样严肃的事情就像对待一个时常发生的轰动消息,企图利用它来作为中央在农业问题上的路线不正确的证据等。我们认为,播种面积的减少证明有困难,证明我们进入了

困难时期,应当首先讨论如何帮助党克服困难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利用播种面积的减少来反对中央大多数的问题。诚然,罗济特和其他同志当时热烈地证明,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他们,他们是党性很强的人。有可能,但是当现在对我们所发生的那一切进行回顾和用全党的观点来看待的时候,我更觉得,在我们对学派、对他们发言的评价中无疑有真理的成分,有很大的真理的成分。在马列茨基同志家里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的支部委员巴申科夫同志也去了,那次出席的有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罗济特、阿斯特罗夫、戈尔登贝格、马特维耶夫、马申科夫和我。戈尔登贝格同志通报了经济问题的情况。特别是我们的财政状况、外汇情况等。我们作了相应的笔记,记录下了数字等。这些记录我在自己家里暂时没有找到。在罗森塔尔同志家里也曾集会过很多次,那里通常聚集了整个学派,布哈林同志的几乎所有支持者。亚格洛姆同志也去过。那时他是《劳动报》的编辑。我记得,他是从讨论《劳动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来的并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通报。在马列茨基和罗济特同志那里我们也看了中央的各种文件。正是在他们那里,我们曾经对库兹明同志在红色教授学院发表的关于“贡赋”,关于中央实行军事封建政策等的著名讲话交换过意见。特别是在罗济特同志那里,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包括我在内,有可能(我利用了这种可能)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速记公报上抄录列宁的遗嘱。我也到布哈林的秘书蔡特林同志那里去过。有一次我和阿斯特罗夫同志一起来到了“柳克斯”,好像这是特维尔大街上的共产国际大厦。我们在戈尔德曼同志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托出国之前到了他的家里,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蔡特林、亚格洛姆、戈尔登贝格、德国调和派的领袖埃韦特,还有德国共产党的一位中央委员,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与埃韦特和其他同志的谈话是用德语进行的,可惜我不懂德语。我们自己之间相互交谈,而后译成德语,包括谈论关于英苏关系,关于斯大林似乎指望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几乎是20亿的一大笔贷款,关于布哈林,据蔡特林说,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如果英国人同意给这笔贷款,那么这笔贷款就会使经济有所好转,他,斯大林,以后就会说:“请看,经济怎样不顾你们的预言在发展,在壮大等等。”而如果英国拒绝给贷款,那斯大林就会这样提出问题:拒绝给我们贷款,这是你们,反对派的错误,因为英国考虑到分歧,不愿意贷款给我们,那时斯大林就会对布哈林及其支持者进行打击。我们的整个意见交换大体上围绕着布哈林同志的这些建议翻来覆去地进行。我个人认为,学派与德国调和派有着经常的联系。诚然,我没有这方面的准确材料,因为这样的问题没提出来讨论过,但是有一次戈尔登贝格说,他有一个人可以派他带信去德国。况且,瓦西里·斯列普科夫去德国的时候,也会随

身携带有关信件的。我个人现在对布哈林学派的评价,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从全党的观点进行的,我认为,它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现在我完全认识到,它的存在对党具有怎样的危险性。只是现在我才完全这样评价。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可能不大的,但无疑是集团分离的萌芽。我觉得,斯列普科夫同志的集团自命不凡,认为它集中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精英。因此,他们在这些集会上也那么经常地谈论理论思想的贫乏,谈论党的理论水平的降低,谈论全党出版物上的文章都是公式化的等等。你们自己可以认定,布哈林同志现在的学生与他过去的以斯腾同志为代表的学生在这点上看法是一致的,斯腾曾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表述过大体上同样的想法。

最后,我想说一说这些集团的反对派活动是怎样传播到工业学院支部的。从我已经说的一切很自然地可以得出,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或者斯列普科夫集团里所发生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我、切斯诺科夫和巴申科夫同志传播到了学院里。我和巴申科夫同志经常与马特维耶夫联系,常常到他那里去,他也不止一次到我们这里来过。此外,阿斯特罗夫同志也常到我们过去住的“灯塔”旅馆去,他同样也经常到波克罗夫卡40号工业学院的宿舍里来。阿斯特罗夫同志向我们通报政治新闻、这段期间里举行的各次中央全会的情况。此外,我记得,阿斯特罗夫同志曾就我们将要进行的清党的报告向我们提出过一个决议草案。诚然,我们那时未敢把它提到全体大会上去,因为我们认为,反正我们要失败,我们不会得到完全支持的。我们,我,其次是巴申科夫同志,曾经多次回访阿斯特罗夫同志。巴申科夫和切斯诺科夫也到他那里去过。如果我们在学院里散布的从我所列举的那些来源得到的政治新闻不算的话,我们没有在工业学院里进行过完全意义上的有组织的活动。此外,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我们都就尖锐的政治题目往上递纸条,有时是预先准备好的,目的是让这个或那个报告人坦率直言,迫使他说他所避而不谈的东西,以及显示支部的某一部分人中存在着怎样的情绪等。还应当说老实话,马列茨基同志也到我们的宿舍里来过,其中有一次他向巴申科夫同志建议(那是在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派别谈话被揭露的时期),让几位同志在工业学院里发言为布哈林同志辩护,以便如他当时说的,鼓励一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诚然,我们支部里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派别活动或者宗派活动的成分,除了六人集团在切斯诺科夫同志家里开的一次会之外,出席这次会的有切斯诺科夫、沃罗比约夫、巴申科夫、科兹洛夫、米罗什尼琴科、博尔佐夫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阿扎尔斯坦暴动情况的通报。从这些通报里我们后来得出了结论,斯大林把国家弄到了这个地步,农民开始用暴动

的语言说话,我们面对的是第二个喀琅施塔得,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对此无法平静地对待,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我们当时商定邀请布哈林学派的同志来作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详细报告,以及关于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和试图说服新人的报告。现在巴申科夫、切斯诺科夫、科兹洛夫及其他同志大概由于自己对反对派的忠诚与受集团纪律的束缚,顽固地不肯承认自己参加切斯诺科夫同志家的集会的事实,但我觉得,有太多的证据使人决不会相信这些同志的否认。我认为,这些同志是在以其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保持顽固的沉默,仿效托洛茨基分子的最坏榜样并公然走上反党的道路。我认为,对这些同志必须最坚定不移地揭露,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一系列其他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迫使这些同志承认。

其次,我想通报一些诚然是我后来了解的情况,但这些情况与以前的事情相关联,——这就是关于舍斯塔科娃同志最近几天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代表会议上揭露齐夫里诺维奇等同志的发言的情况。关于舍斯塔科娃同志的发言我下面再说,而现在我先提下面的情况,就算作证实我们曾经进行破坏某些领导人政治声誉的谈话的例子吧。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所有引起怀疑和打算散布关于他们的谣言的工作人员的名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我们曾经议论过党的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同志。同志们,特别是马特维耶夫同志在那里说,根据他掌握的材料,基洛夫同志曾经是北高加索米留可夫机关报的编辑,这家机关报的名称好像叫《捷列克》。说他当时写社论和由他署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说,只有在米留可夫领导下我们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他们说,这家载有基洛夫同志文章的机关报《捷列克》似乎就存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里。我得知舍斯塔科娃同志的发言之后,我就已经感到,这样做并非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虽然毫无疑问的是,齐夫里诺维奇同志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舍斯塔科娃同志多年来曾经是马特维耶夫同志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认识她多年了,特别是最近几天巴申科夫同志告诉我,对舍斯塔科娃的发言他比我知道得更早。巴申科夫同志也认识舍斯塔科娃多年了,早在罗斯托夫时就认识,他读过许多这样或那样破坏党的某些领导人威望的其他材料,据巴申科夫同志告诉我,这些材料似乎已经送往《共青团真理报》和另外一家什么报刊,但未被发表,因此他们商定,为了赋予这些材料更大的政治规模,舍斯塔科娃同志必须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代表会议上发言,而且也这样做了。

看来,我就以此结束我的通报了。当然,我个人已经好几个月同右倾反对派的思想毫无共同之点了。在谴责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及其反对党的活动的时候,

我将不调和地、彻底地揭露右倾反对派的全部活动并与之斗争。

主席:有人建议从提问开始。谁有问题?

布什科夫:沃罗比约夫同志说过,乌格拉诺夫得知齐夫里诺维奇同志与丘任同志的会谈之后,似乎认为,应当争取达成一致。他想的是什么样的一致,或者想要在一致的幌子下进行斗争,或者可能真的是在争取达到某种一致?

谢多舍夫:我正是这样理解的,乌格拉诺夫想要达成一致,指的是鲍曼区是反对莫斯科组织领导的唯一的区。

沃罗比约夫:对!

布什科夫:罗济特是什么人?

您说,一些同志往德国捎过信件,不是一封,而是几封,您怎么认为,这是些什么信件,为了什么目的,有什么需要捎去这些信件,捎给了什么人?您能不能说,这是怎样在“柳克斯”饭店发生的?

您如何评价您在工业学院进行的工作,您认为,它有什么成绩?

您认为,反对派分子当前在学院的派别工作方面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是否只有您列举的同志是反对派分子,或者还有其他摇摆和动摇不定的同志,或者也许还有积极分子,特别是戈卢别夫、扎哈罗夫、伊利英-波斯托夫斯基。这些同志在反对派的工作中是否被注意到了?

沃罗比约夫:布什科夫同志问,乌格拉诺夫同志在什么意义上说过,在我所提供的文件的基础上可以争取达到莫斯科组织的一致。他是否争取过全党意义上的真正一致还是在另外的意义上。谢多舍夫同志在这里用他怎样理解我的问题的形式所作的解释大概已经给予了回答。确实,谈的是在莫斯科组织里达成一致,因为鲍曼区委不支持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反对党中央的斗争,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犯了错误,斗争指向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央,乌格拉诺夫同志本人在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的总结讲话里已经承认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话里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是在为了避免鲍曼区委同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对立的意义上谈论莫斯科组织的一致的。正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十分遗憾地说,提拔齐夫里诺维奇同志担任鲍曼区委书记的职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失误,他讲述了,他本人那时来到鲍曼区委扩大全会上,在撤销齐洪职务的时候,相应地推荐了齐夫里诺维奇同志等。

罗济特同志是什么人?罗济特同志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现在他担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职务,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最亲密的学生和支持者之一。

布什科夫同志问,由瓦西里·斯列普科夫同志和戈尔登贝格(他曾提到过他们)带到国外去的是什么信件,信件的内容是什么,是写给什么人的。

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用重复我在主要讲话里已经说过的话来回答,即在我们那里进行的那些谈话里,没有详细谈论过与德国调和派的联系,没有谈论过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系统与布哈林同志在各国共产党内其他的支持者的联系,没有讨论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这大概可以说是集团或者派别的最高秘密,但我再说一遍,在一次这样的谈话里我听见,瓦西里·斯列普科夫要去德国进行学术出差而且已经去过了,他必须随身带一封信,戈尔登贝格也说,他有一个人可以让他转递这封信。信是写给什么人的,我难以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由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常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向我们通报共产国际的情况,对这个或那个外国共产党可以寄托怎样的希望。单是这一点已经说明,信件当然不是没有问题的,而无疑具有与外国同志建立某种联系并向他们通报情况的目的。

布什科夫同志还问我,怎样评价在工业学院的工作,工作有什么成绩。

就去年秋天的那种情绪而言,诚然,那种情绪,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不是由政治方面的考虑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支部里发生的那些事件(丘任的声明、亚罗舍夫斯卡娅的死等)决定的,我们指望,在发生决战的情况下可以在工业学院里获得一定的成绩,我们把这些美好的希望也传给了乌格拉诺夫等同志,而这些希望最终也是骗人的。

个别反对派分子在工业学院进行反对派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我个人政治上已经脱离了右倾反对派并与他们断绝了组织上的个人联系,如果你没记错的话,那是今年4月底或5月初我在墙报上写了《伟大的路标》一文之后。我们支部的某个委员,我个人想,是巴申科夫同志把这篇文章抄录了下来,马特维耶夫和其他同志也知道了这篇文章。在这之后,我们之间的一切个人联系全部中断了,我同马特维耶夫只是偶然在大街上相遇,已经不是作为朋友,而是作为仇敌。

反对派在工业学院进行反对派活动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我只能根据一周前我同科兹洛夫同志进行的一次谈话来判断。我同他在大红门这里谈话的时候,恰巧斯多布诺夫同志当时从那里经过,看见了我们。科兹洛夫同志告诉我,他过去的那些观点现在更加坚定了。我也向他表明,相反,我的分歧更明显了,更彻底地成熟了,他向我表明,你离我们而去是个重大的损失,因此我们无法像春天设想的那样开展工作,以便在组织上更加定型等。我个人

有这样的看法,看来,我离开之后他们大大地惊慌失措了。很清楚,他们了解,现在要开始进行某种活动将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害怕被揭露和坚决的行动等。请看我们所掌握的对我们支部进行审查的事实:这些同志顽固地拒不交待他们所做事情,拒不交待在切斯诺科夫同志那里发生的事情等,这些事实令我确信,如果说过去没有这种集团的、派别的团结的话,那么,现在派别的团结无疑已经形成了。由于这种宗派主义和派别精神他们发誓,他们用连环保约束自己不互相出卖等等。我个人还能说的只有,早在秋天巴申科夫同志到三年级来学习以后,常到马特维耶夫同志那里去,但他们在那里进行了什么谈话,提出了什么设想,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工业学院里是否还有动摇的、持怀疑态度的人,特别是戈卢博夫、某个扎哈罗夫(我们那里有很多扎哈罗夫)、伊利英—波斯托夫斯基等,这个问题很难直接回答。当然,对个别一些问题持怀疑态度,或者,更正确地说,表示某种不满的人大概更多,而不只是提到名字的那些,这是他们中间(最为)坚定的。此外,把这些同志列入反对派积极分子或者已经形成他们认为必须为之奋斗的明确政治信念的人,我认为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些人只是有过某些怀疑、某些不满和模糊认识,后来我与许多同志见过面,谈过话,最近我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弄清楚了,他们现在坚定地、牢固地站在我们党的总路线的立场上,特别是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和整个经济活动无可辩驳地证明,党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等等。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支部总的说来是健康的,曾经有过的某些情绪、某些不理解 and 模糊认识,在实际的经济情况和我们党的正确政治立场的影响下,看来已经消除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些情绪,我认为我们应当与之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些情绪表明,我们学院的某一部分学员对审查中发生的事情缺乏必要的政治嗅觉和政治认识。许多同志,或者至少是有些同志现在以庸人的态度对待所发生的一切,怎么也不能理解揭露右倾反对派的意义。

谢多舍夫:你说,你常去《真理报》编辑部,那里举行布哈林学派的集会,集会总是由布哈林主持,他不在的时候由斯列普科夫主持。我想知道,这些谈话具有怎样的性质,你是否参加过布哈林发言的那些会议。你们在这个学派里对我们党的领导,对政治局进行了些什么议论。很想知道你们这方面的议论。你是否认识舍斯塔科娃,她是否参加了这一伙。(沃罗比约夫:哪一伙?)反对派一伙。你说,在我们学院里没有集团,在进行清党的时候你也说过这话,顺便指出,而你现在说,如果能够迫使这些同志改变立场的话,还会了解许多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指的,你暗示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了解他们知道什么,也许

你能一一列举出来并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你们决定了同时发言以制造声势，可究竟为什么你们中间谁都没有在我们支部里发言？

沃罗比约夫：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因此不再回答。

阿尔先季耶夫：在乌格拉诺夫那里进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如您所说，菲拉托夫和维诺格拉多夫出席了。这个菲拉托夫是什么人，他是否曾是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多夫又是什么人。在乌格拉诺夫那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沃罗比约夫和马特维耶夫曾经提出了进行争论的问题，现在反对派是否放弃了进行争论的问题？集团的会议是什么时候举行的，你好像举了切斯诺科夫、沃罗比约夫、巴申科夫、科兹洛夫、博尔佐夫和米罗什尼琴科的名字，你是否曾打算向支部委员会报告这次会议和打算什么时候这样做？

马卡罗夫：从所说的当中我明白了，反对派有两个院——上院和下院。一个院是高级党校，另一个院是从地方上邀请来的干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个院通过乌格拉诺夫进行活动，另一个院通过布哈林进行活动。而且布哈林学派，从您的讲话里可以了解，也有两个院，实际上是三个类型，结果成了三个院：乌格拉诺夫那里的座谈会是下院，对青年学生和教授的是中院，最后，发指令的学派是第三院，即上院。我想了解，您是否知道，除了克拉瓦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有人参加了这些院中的一个，您是否遇见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什么工作人员？

沃罗比约夫：我遇见过你最亲密的老板——梅日劳克。

马卡罗夫：你大概知道，我说的是谁；我希望你给予回答。你在这里的讲话有一个地方不明白，你说，你和马特维耶夫不同意学派的政治见解。

沃罗比约夫：相反，是政治见解把我们联结、团结在一起的。

马卡罗夫：你是因为粮食收购的减少而说这话的，我希望你准确地说明，也许是你口误或者是我理解得不对，说实在的，对你们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何在。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说，这里有一个右倾反对派积极工作人员的六人集团，认为在300人中有六个人，而且还是些威望不够的人，指望靠这六个人，你们会在布哈林或乌格拉诺夫发言的某个时刻掌握听众，这样考虑和打算是天真的，幼稚的。然而从你的讲话里可以看出，你们是会掌握听众的。然而从你的讲话里可以看出，你们是这样指望的；就是说，显然这种人多得多，也许不是这样的积极分子，但至少通过决议方面你们指望的这种人数量多得多。沃罗比约夫同志，在这里应当坦白地说清楚这件事情。

沃罗比约夫：我说的一切都是坦白的。

马卡罗夫:不对,这里有一些“但是”使人无法判断支部的状况。其次,您个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停止动摇,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和转向反对派的对立面的?这里您有一些矛盾。您同科兹洛夫同志在大红门边谈话是什么时候?这非常重要。随后你们学院的回廊里纷纷传说,很多人,学生、我们支部的成员都知道有这样一个集团存在。也许,这里真的通过办法保持着联系,这非常重要。是否还有人,完全无关的人,也许甚至对各种政治事件漠不关心的人知道你们集团的存在。

多尔别什金:除了您说的那一个,学院里是否还有过别的集团?特韦里京和卡尔普欣是否参加过你们的小组或别的小组的什么活动?除了在乌格拉诺夫那里,你们是否召集过你所说的那些人开会,都有什么人参加?其次,请你准确说明关于农民问题、播种面积减少等,都有过什么分歧。

亚诺夫斯基:阿斯特罗夫交给你的决议,你是否还保留着,或者也许至少你能凭记忆举出这个决议的要点。

普列穆德罗夫:前几天你在同我的谈话里说,在你看来,布哈林大概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但那里有那么一个集团命令布哈林不要放弃。也许,你能指出那里有的这个更加坚定的集团?

布什科夫:反对派怎样看待工人对他们的态度和他们在工人中间将会得到怎样的支持?他们怎样估计各个外国党的情况,他们指望得到哪些党什么样的支持?反对派是否考虑过在工人面前蛊惑人心地激化与食品困难有关的问题,例如排队问题等。他们是否打算利用这些困难直至排队问题等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

阿尔马佐夫:关于计划中对基洛夫的揭露是推迟一段时间还是缺乏事实,其次是舍斯塔科娃在代表会议前的讲话,或者关于齐夫里诺维奇的这件事情早就交给了监察委员会,还是根本没有提交?

普列穆德罗夫:工业学院的集团是否曾企图趁沃罗比约夫同志在编辑部里的机会利用墙报推行自己的路线?

索博利:沃罗比约夫同志说,在一次会议上曾有德国右派的代表出席。你们是否讨论过,说实在的,是什么把你们与德国右派联合在一起,是德国问题还是联盟内部的问题?其次,关于二班的鲍里索夫,他与你们有过什么关系吗?你们的集团对支部委员会持什么立场?你们是怎样估计学院里的形势和情绪的?

多尔别什金:集团是否在学院里散发过关于中央的传单?

主席:大家都再没有问题了?现在请沃罗比约夫同志回答问题。

沃罗比约夫：谢多舍夫同志的第一个问题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布哈林青年学派是否在《真理报》举行过集会，我是否出席过布哈林同志主持的，他不在的时候由斯列普科夫同志主持的那些会议？我已经说了，主要是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编辑部里集会。此外，有一次集会是在《消息报》原编辑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普列穆德罗夫：他也在场吗？）当时出席的人很多，有斯大林的前秘书梅赫利斯，有许多别的人，我不记得了，也许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本人也在。每逢星期天我个人出席过多次这样的集会，这些会议有 Н. И. 布哈林参加，而且甚至在 Н. И. 布哈林在场的情况下通常由斯列普科夫同志主持（在安排各个报告人发言的意义上）。当然，布哈林始终是思想上的领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热烈地参加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等。我记得，有一两次是他亲自主持会议。这些集会具有怎样的性质呢？我应当说，学派（莫斯科组织这样称呼它）在《真理报》的集会，党中央，包括斯大林同志，是知道的，因为那时候这个学派在从理论上揭露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而后在揭露联合反对派的事业中，在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列宁观点的事业中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个集团在会上讨论的题目，而后都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真理报》及许多其他机关报刊上，也体现在这些同志的发言里，因为那时候阿斯特罗夫、扎伊采夫、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斯捷茨基——他们全都是《真理报》编辑委员会的委员。到那里去的有很多重要的党的负责干部。在《真理报》举行的这些集会上，我记得，有一次还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理论问题的计划，并把这项研究委托给一些同志进行，以便以后在报刊上发表。其中，我不记得，我必须与哪一位同志一起研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问题。因此，应当一开始就约定把与联合反对派斗争时期的布哈林青年学派的活动（那时它是帮助党的）与它在右倾反对派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活动区别开来，这时这个学派的活动基本上是反对党的。

对党的领导人议论过些什么？如果把所表述的这方面的想法加以综合，通常议论说，如果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志除掉，那政治局的领导就太软弱了，说斯大林实际上将变成独裁者，说那里没有能够在理论上独立思考的人，说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只起从属作用，政治局里唯一比较独立自主的人是莫洛托夫，但今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关系将会变得紧张起来。

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些揣测，列举了一系列关于莫洛托夫同志的错误、他在政治局里有过什么冲突等的证据。那里是根据什么谈论政治局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的？假定星期四开政治局会议，星期五我们就到马列茨基同志那里去，了解

政治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政治局委员中谁作了怎样的发言,有什么争吵等。就是根据这些争吵、插话等推测,事情将如何发展。

亚格洛姆在罗济特同志那里举行的那次集会上通报了什么情况?现在我无法准确地复述这些通报,因为我记不很清楚了,只有一点我能清晰地想象出来,亚格洛姆同志讲述了,怎样讨论了关于《劳动报》,关于所犯错误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撤销亚格洛姆同志职务的问题似乎没有预先决定,托姆斯基,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那里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我过去是否认识了舍斯塔科娃,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学派?我从1925年夏天就认识舍斯塔科娃同志,她根本没有参加学派。她对右倾反对派的形成有什么政治情绪我也不知道,因为最近一年我同她几乎没见过面,她从国外回来之后(她是去那里治病的),我同她通过一次电话。但这次通话完全是私人谈话性质的。

关于六个人。就这个问题我同审查委员会主席和其他人进行过多次谈话。如果巴申科夫同志(我谈的主要是他)能够不仅干脆下决心谴责右倾观点,而这样做是最容易不过的,马列茨基曾经说过,如果情况变得不妙或者在那里没有发现支持者,就应当甚至站出来批评布哈林,对他进行谴责等,当时认为这在策略上是正确的,因为推举出两三个同志过早地发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由于这些发言会更积极地展开反对右倾反对派的工作,会正式地暴露一些人等,因此在主要的战斗打响之前,在右倾分子比较有组织的发动之前,应当避免进行这种发言。我再说一遍,如果巴申科夫同志坦白和直截了当地承认了他了解的右倾反对派的活动,那他就是帮助党揭露了这种活动。当然,我在这里向你们通报的情况,有很多是巴申科夫同志不知道的。(座位上有人喊:是地下工作?)集团斗争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知道,也包括我在内,大概,也许我只知道最高领导人之间所谈的事情的百分之一,但切斯诺科夫同志如果承认的话,他会说出,他是怎样去阿斯特罗夫那里,同他进行了什么谈话的,他是和巴申科夫一起去的。巴申科夫是能够更详细讲述戈尔登贝格那里集会的情况的,可他却说,他只是去喝茶的。毫无疑问,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其次我想说,但是不要进行速记……

主席:我们要把一切都速记下来,如果有需要,可以从速记记录中删除,但一切都应当进行速记。

沃罗比约夫:我曾多次向巴申科夫讲述过所举行的那些集会,他是了解这些会议的情况的,有一次我们开完会出来,他对我说:“嗯,如果你是真诚地承认自

己的错误,你为什么不说出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你为什么不在会上交待,你曾在玛丽娅·伊里伊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在场的情况下参加过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讨论”;我当时回答他说,我们的会议是公开的,我不能把我所了解的右倾反对派的活动情况全都说出来,这是一,第二,我不了解玛丽娅·伊里伊尼奇娜·乌里扬诺娃现在的立场,因此只根据她在场的事实,何况她并没有发言(她出席过波克罗夫斯科耶—斯特列什涅沃的集会和马列茨基那里的一次会议),我认为不可以在会上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她的威望,我不想亲自把这一点告诉中央监察委员会。出于这些考虑,我不愿意这一点被写进速记记录里。这个例子证明,同志们是能够讲述,特别是能够证实许多情况的。顺便说一句,我们与斯列普科夫分子集团决战的时候,玛·伊·是在场的。

布什科夫:也许您能指出,在学院的集团里到底谁是领导者——巴申科夫,或者切斯诺科夫,还是沃罗比约夫?

沃罗比约夫:在我们那里谁也未正式被推选为带引号的领袖。

布什科夫:那谁是最主要的积极分子?

沃罗比约夫:最主要的积极分子当然是我,因为是我与高层人物联系并供给他们思想政治食粮的。

布什科夫:谁是副官?

沃罗比约夫:副官和学院里最亲密的朋友是巴申科夫。我们昼夜都在一起。我们也有很多私事。

主席:私事您可以不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沃罗比约夫:在我们之后的同等者中间,切斯诺科夫同志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与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乌格拉诺夫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能够得到有关的信息、阅读各种文件并向我们传达。

现在我来回答阿尔先季耶夫同志的问题。维诺格拉多夫是什么人,菲拉托夫是否曾是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多夫同志是联共(布)党员,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支部的,他在那里担任什么工作,我现在记不准了。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乌格拉诺夫,经常到他那里去,像他常去找马特维耶夫一样,在马特维耶夫那里我们经常遇到,有巴申科夫,有维诺格拉多夫,有我,有马特维耶夫几兄弟,别的人我现在不记得了。菲拉托夫是联共党员,是“镰刀和锤子”工厂支部的,过去是莫斯科组织的积极的共青团干部,是个年轻小伙子,因而根本不可能是社会革命党的党员。

阿尔先季耶夫同志接着问:你们过去提出过进行辩论的问题,反对派是否至

今保留着辩论是适宜的的看法？我已经说过，曾经提出的并且得到包括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乌格拉诺夫赞同的那个认为辩论会帮助党变得更健康和更有活力等的意见，大概没有被批准，因为后来关于进行辩论的想法完全无声无息了，消失了，再也没有提出来过。

在切斯诺科夫同志家的集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我无法准确地指出是哪一天，是几号，但大概是在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通报（我本人后来也读过这个通报）、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和业务汇报发给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第二天。大概是在第二天。这个会是在切斯诺科夫同志那里开的。在切斯诺科夫同志那里开的这个会之前，我对阿扎尔斯坦暴动一无所知，后来才在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看了通报。切斯诺科夫同志开车来到宿舍里，带上我和巴申科夫，我们便到博尔佐夫家里去了，等等，但这些情况我已经在会上说过了。

马卡罗夫同志关于反对派有几个院或者不同等级的问题。你们看到，在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集会的集团和在学派里集会的那个集团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乌格拉诺夫同志是个有独立精神的政治家。在他那里集会的主要是莫斯科组织的前领导同志，是在工作上知道他的人和他认识的一些人。常到那里去的也有一些下诺夫哥罗德人。现在我不记得名字了，而学派那里有自己的所谓长期形成的人。当然啦，可以认为，这种有机联系是存在的，因为以马特维耶夫和我为代表的一些人到过那里，也到过这里，但没有关于在乌格拉诺夫那里做过什么和相反，学派在做什么的专门通报，更何况我们这里有些人对学派抱有某种成见。当然我们与乌格拉诺夫联系是最密切的，但学派内部有某种分工，那是十分自然的。在大范围的会议上，所有的秘密，一切政治秘密没有很广泛地提出过，而马列茨基、阿斯特罗夫、罗济特、蔡特林这些布哈林亲密的老学生，他们是亲自与他交往的。很自然，他们的谈话和论题的范围显然更广、更尖锐，等等。

我在布哈林青年学派的会议上是否遇到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什么工作人员？我再说一遍，我认为有必要区分与联合反对派斗争时期的和以后时期的布哈林青年学派。在与联合反对派斗争的时期，布哈林青年学派里有很多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工作者。有很多人去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梅日劳克、尤里谢夫，罗沙利也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其次有沙特汉、《共青团真理报》的编辑科斯特罗夫，沙茨金去过一次，诚然，在他们那里与布哈林发生了一次大的争吵，他对一系列问题的方针有些不同意，而布哈林提示说，你闭嘴，在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斗争的时期你动摇过，但沙茨金站出来声明说，没有过任何动摇，唯一的一点就是，他认为撤销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是不适宜的。还有谁在场,现在我不记得了。

马卡罗夫:得了,这不重要,那时候是合法地集会的,而后来这些人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去过。

沃罗比约夫:不。但是至少我不了解,也许他们去过,但我不知道。

我们,我与马特维耶夫同学派有过什么政治分歧,这些分歧是什么时候的事? 如果你们注意地听了我的主要讲话,就不可能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我们同学派有过政治上的或者什么别的重大原则分歧。与学派没有过这种重大的政治上的原则分歧,但是我们有过非常热烈的、激烈的争论。我们常常指责这个学派有宗派主义,对于他们布哈林名字的光环是主要的。我们认为,我们首先是党员,应当从这个观点出发讨论问题,如果布哈林同志有一些缺点,应当予以批评,特别无论是我还是马特维耶夫同志都不同意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关于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指责,不同意布哈林同志去同加米涅夫谈话(这件事后来弄清楚了)。我记得,马特维耶夫同志非常坚决地说,你们和布哈林现在的这种纲领(他的文件里陈述的),用它来争取群众是不可能的,它只容得下这三个人。特别是巴申科夫同志,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会承认和交待这一点的。今年冬天我们与这个学派的关系变得紧张了。马特维耶夫同志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尖锐的、内容丰富的信,信里说:“你们算是什么领袖,你们不能积极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好好地解释它们,你们发表一些非常深奥的群众难以明白的讲话,您写《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里面不是直接提出问题,而是用一些只有具有尖锐政治嗅觉才能猜透的暗示进行应付,你们想要做很多事情,开展工作,但是你们的(这是马特维耶夫的原话)筋脉在发抖,你们的膝盖在打颤等等,你们的政纲只能容得下三个人,你们错误地提出了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口号等。”马特维耶夫同志给我和巴申科夫同志读了这封信并问,你有什么意见,我记得,当时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认为,这封信现在不应该交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太早了。要不我们就必须明确商定,我们脱离他们,只有那时寄出这样一封骂人性质的信才有意义。否则,这样做没有意义。我当时建议亲自与尼·伊·谈谈。因此,这封信没有发出,他原来设想,我,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同志会在信上签名的。马特维耶夫那时说,我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想法,说这封信决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离开布哈林,等等,等等。如果你们真诚地与巴申科夫谈谈,关于这封信他会告诉你们同样的情况。他也持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集团,未必会给党很多好处,等等。

在我们工业学院里是六个人还是有更多的人?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这六个

人出席了在切斯诺科夫同志那里举行的座谈会,参加了那里的交换意见。马卡罗夫同志困惑不解地问,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能指望掌握听众?我说,这六个人是与莫斯科组织的这些或那些领导人或者与这个学派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直接联系的人,等等。是否还有什么人常到我那里或者巴申科夫那里去,我同谁谈过话?我的房间里人很多,当我来到工业学院的时候,在这里也遇到过无数的人,我向我认为可以的所有的人说了政治局发生的情况,讲了各种政治新闻,传播了所谓的流言,我不仅同那些能够倾听我的话并不再外传的那些人谈话,而且也同这样的人谈话,关于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坚决地反对我,特别是叶尔绍夫同志。他同我交谈过多次,我到 he 家里去过,向他讲述过很多事情,我们进行过争论等。能否根据这一点断言,这里有很多同情右倾反对派的人?我认为,我没有任何权利作这种断言,因为如果一位同志从我这里得到了某个消息,但并不知道它的来源,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得来的,因为我从不对任何人讲这些来源,我也不让自己抱这样的希望,这就是以后可以发展的那个人,但我考虑过,既然人们在听,看来就是放在心上,就是说,如果在会上突然(秋天我们学院里的不满情绪恰巧很强烈)鬼使神差地发生什么事情,又没有通报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确,应当说,在原先支委会的班子下我们的政治信息很少),秋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认为,既然对缺乏信息有这样的不满,如果我们有几个人在会上发言并通报一些新闻,提出建议,既然你们认为有必要了解正在挨批、挨整和受到极不公正对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真实的观点,那就让我们要求把他请来,我们预料,这样出人意外地提出问题,再考虑到想听领袖讲话的愿望等,是会起作用的。当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有人设想,只有在我们明确决定进行斗争的时候,才能请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因为政治上更有经验的人是这样考虑的。他们认为,如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到会上来,那斯大林就会来回答布哈林,然后李可夫就会来等等。这样一来战斗就会开始了。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成了梦想。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脱离反对派的?我已经说了,我不赞成布哈林同志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关于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及某些其他论点,但是在农民问题上,还有在党内问题上我同他是完全一致的。其次,我在会上的讲话里已经说了,对我进行审查的时候,搞粮食收购回来的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们介绍了农民的情绪怎样,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怎样,他们怎样在那里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等的消息。而且在派去进行粮食收购的人中间,像我已经说过的,有我亲密的私人朋友,我曾期待收到他们的来信,可他们一封信也没给我写,但他们回来以后,对我讲述了一切。我十分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坦率地对我说了这一切。对于我来

说,这是我错了的又一个证明。其次,我再说一遍,经济情况的事实,我们党的经济成就的事实也使我思考这些问题,重新估计自己的全部观点。再次,坦率地说,我很不喜欢我们在乌格拉诺夫那里集会时我们之间内部进行的那些谈话。在代表会议上,在别的会议上我都说过,我越是接近地了解他们,我的分歧随后便越加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特别是他们从托洛茨基分子的词汇里借用了许多用语,他们说,斯大林是波拿巴主义者,斯大林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以及各种各样的带引号的小事。所有这些情况使我脱离了反对派。这种脱离对我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伴随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因为所有我的私人朋友,包括我最好的朋友马特维耶夫,都在反对派那边。我给墙报写了《伟大的路标》一文之后,实际上就实现了这种脱离。

(原本此处缺一行)*

〈……〉同科兹洛夫的谈话是不到一星期前进行的。不对,大概是在一个多星期前,是在9月4日的会之前。

好像是马卡罗夫同志问我,学院里是否很多学员知道集团的存在。我个人认为,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十分保密的。我们知道,对此有关机关是会追究的,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会上被碰到的话,那就是参加派别的明证。

多尔别什金同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学院里是否还有别的集团?是否有托派集团或者别的什么集团,对此我一无所知,只有鬼才知道。

特韦里京和卡尔普欣是否参加了集团,大概指的是在切斯诺科夫同志那里集会的集团?特韦里京和卡尔普欣没有参加。我与特韦里京同志一次也没有谈过政治话题,与卡尔普欣同志我谈过多次,但我不能说他是有明确右倾情绪的定型的人,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常去米哈伊洛夫那里,有一次到乌格拉诺夫那里去过,但当我同他离开乌格拉诺夫家的时候,他坚决地表示反对右倾分子的观点等。由于以前的工作他与米哈伊洛夫关系密切并常到他那里去,最近他表示同意米哈伊洛夫对布哈林的整个这个集团,其中也包括乌格拉诺夫集团所作的评价。要知道,米哈伊洛夫最近已经从政治上脱离了他们,看来也没有个人的联系。

是否有其他人来过我这里?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人们到我这里来下象棋,我自己也不断迎接前来的人,他们全都只是我的熟人。

* 文件如此。——编者注

我是否保留着阿斯特罗夫写的决议?今天和昨天我都找过,但没有找到,因此我现在不能说,它还有没有。顺便说一句,当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派别谈话被揭露以后,我们聚集在罗济特同志那里,好像是罗济特同志写了一个决议草案,应当在通报传单的事时在会上提出来。正是这个决议草案的抄件被在那里发言的红色教授学院支部的库兹明同志和我记录了下来,但我再说一遍,我在工业学院里没提出这个草案,好像关于这份传单我们那里没有进行专门通报,而最近才由区委书记齐夫里诺维奇同志对当时举行的中央全会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亚诺夫斯基:你记不记得这个决议的要点?

沃罗比约夫:我不记得了。

普列穆德罗夫同志显然是在回忆我同他的谈话时说,我表示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是处在青年学派的包围之中,布哈林是会承认一些自己的政治错误的。是的,我大体上,也许不是完全以这样的形式,但实际上向普列穆德罗夫同志表述了这样的想法,我个人对此十分重视。因为在我们那里举行的座谈会上,马列茨基同志和其他人,由于对布哈林同志性格的缺点十分了解,多次说过,他会承认一些错误的,似乎他在谈话中亲自对尼·伊·说过,支持者中间关于您流传着这样的传言,说跟着您走很困难,因为您今天捍卫的东西,明天您可能会推翻、会放弃等等。因此,马列茨基同志强烈地提出一个想法,要让布哈林同志的观点以文件、发言等定下来,如马列茨基同志说的,让这些发言在党的历史上作为一个明确的流派保留下来。关于这些人与布哈林同志很接近,有密切的政治联系的〈观〉点,——这一点全党都知道,特别是党中央知道这一点。这样,我在这里只是说出自己的猜想,如果没有这种包围,布哈林同志是会放弃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的。

布什科夫同志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反对派指望找到什么社会力量作为依靠,我与之交往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工人群众会跟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走吗,工人会怎样对待反对派。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捍卫列宁的观点,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只有布哈林、乌格拉诺夫等同志的集团才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支持者,我们常常在学派的座谈会上,在乌格拉诺夫同志那里谈论,在我们这里工人问题有点处于不重要的位置,党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对工人的生活和文化利益的某种忽视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谈论过,现在存在的困难使工人阶级受到很大的打击。反对派的代表们究竟根据什么判断工人群众的情绪并作出预测,认为会在工人群众中得到需要的支持。我记得下面的事情:乌格拉诺夫同志曾经讲述布哈林同志在布哈林有轨电车停车场发表讲话的情景,

他说,在那里布哈林同志受到了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这掌声表现了对布哈林的政治同情,好像布哈林同志离开那里的时候,无轨电车场的一个工人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手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知道,您在为什么而斗争,您可以指望我们的支持。”乌格拉诺夫同志也讲述了改选活动时他自己在一家工厂里的讲话,他也受到了非常热烈和亲切的欢迎;他在那里谈了困难,谈了工人群众感兴趣的事情等。乌格拉诺夫同志特别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也使他相信,工人是非常同情反对派的,这就是当主席提出名誉主席团名单的建议时,一个工人站起来说:“我提议把我们大家爱戴的布哈林同志选入主席团。”这个关于布哈林的提议被采纳了。然后,乌格拉诺夫同志说:“我要求发言,我说——我提议把领导我们工会运动达十年之久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同志选入名誉主席团。”于是托姆斯基同志在这次会上也被选为名誉主席团的成员。所有这类的事实以及所进行的讨论的实质使人相信,工人中间对反对派的同情是存在的。其次,在这方面相当引人注意的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对自己在顿巴斯几次工人大会上讲话的描述,好像是在戈尔洛夫卡或者谢尔宾卡,我记不准了,而后是在“马利亚”煤矿上和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他在那里讲了困难,讲了我们常常避而不谈的事情,据乌格拉诺夫同志说,他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讲话的,他说,我将对你们说的不是报刊上写的东西,而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谈粮食问题等。党中央应当知道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这些讲话,何况党组织的宣传鼓动部长已经发言表示反对乌格拉诺夫的这些讲话,但是,用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话说,没有人听他的。他说,发言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然后在戈尔洛夫卡的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是乌格拉诺夫同志亲口对我说的):当乌格拉诺夫同志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讲话非常热情,目的是引起工人群众的同情,一个小伙子走上来说,乌格拉诺夫同志,您说,您那里没有任何右倾等,这是真的吗,请告诉我们,您不是因为右倾被撤销了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吗?难道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曾经支持您不是真的,难道伏罗希洛夫说,如果斯大林不同意我们的政策,我们就让红军调转枪口,难道这不是真的。乌格拉诺夫讲述说:“那时我站了起来,敲了几下桌子说,关于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这全都是谎言。”后来这个小伙子被逮捕了,原来,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想进行挑拨,在他那里发现了传单等。然后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这个会上向工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瞧,有人企图指责我、布哈林同志的集团和其他人是右倾;请你们,矿工们说说,我所说的一切是反党的,非列宁主义的吗?”作为回答全场嗡嗡地嚷了起来——对,对。

这些就可以基本上回答您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同他一起去戈尔洛夫卡的是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列别德同志。

普列穆德罗夫:乌格拉诺夫是列别德在场的情况下发表讲话的吗?

沃罗比约夫:我记不准了,好像是,至少他是同他一起去的。

我们是否有过通知,应当指望国外的哪些力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根本就不怎么详细了解国外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我只清楚地记得,曾经提到过美国、德国党的一些中央委员同志,一些持布哈林同志观点的法国同志。但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这些同志的名字了。我也不记得这个或那个外国党在数量上有多大力量了。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记录下来的:是否尖锐地提出了排队等问题?我大致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布什科夫:策略就是这样吗?

沃罗比约夫:总的策略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也引起了我们的某些不满,等待,等待困难的加剧。这些困难以后会证明右倾分子的政策是正确的,整个生活正在表明这一点。顺便说,科兹洛夫同志持的就是这种看法,他又给我举了很多这样的事实来证明,正是布哈林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建设方面的危机现象等,但利用困难的最极端的代表者是切斯诺科夫同志。诚然,他受到了马特维耶夫和乌格拉诺夫十分尖锐的指责,我也同他谈过多次,他提了这样一个公式:越坏越好,同志们,我个人认为,在切斯诺科夫同志身上托洛茨基主义与右倾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寻常地融合在一起了,某些对立的東西结合在一起了。我是这样确信的。

关于对基洛夫的揭露和是否准备过舍斯塔科娃的发言。关于基洛夫曾经进行过议论,好像还是在冬天,我们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谈论这一切的,甚至预先说明了,这件事不能让人知道,不能露出任何痕迹等等,而当问题审查清楚,文件研究完毕之后,那时这一切将予以公布。关于舍斯塔科娃同志的发言准备情况,除了我已经说过的,我一无所知。

对普列穆德罗夫提出的关于墙报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没有过这种企图,因为有沃伦斯基和普列穆德罗夫这样的老手在那里坐镇,用不着我去考虑利用墙报,我也没有试图这样做,相反,我想用自己认真负责的努力工作证明,我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我与政治问题隔绝地呆在那里,呆在讽刺与幽默栏目部里。

关于鲍里索夫我应当说以下情况。我个人不认识鲍里索夫同志,一次没见

过面,因此当然不可能同他谈话,但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对我说过,鲍里索夫到他那里去过几次,应当与他建立联系,但我不知怎么忽略了这一点。好像鲍里索夫曾经是莫斯科组织一个县委书记。

索博利同志提问,集团对支委会采取什么态度。对这个问题我必须作以下说明,我们没形成这样的对一切问题进行讨论的集团;只有在切斯诺科夫那里的一个集会,参加的人员我已经说过了。通常只是我、巴申科夫等说话,散布流言,进行交谈,再就没有什么了。对支委会的态度怎样——关于这一点,当索博利同志在会上提出类似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我说,为了反对那个支委会我们进行了最有力的工作,为“推翻”那个支委会我们做了一切。情况对这样做是有利的,因为那时由于政治信息的缺乏、雅罗舍夫斯卡娅的死等而存在着不满情绪。对那个支委会进行了改选。对这个支委会我们,我个人(我再说一遍,我们大家没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敌视态度。所以会这样,大概是同志们因为不了解事情的全部本质,没有进行所谓的迫害,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没有推动我们更早地形成派别。否则,很可能,我们会更早地走上派别活动的道路,那就会被清除出党的队伍了。

我已经说过,当我与布哈林同志集团的分歧显现出来的时候,我同哈哈列夫同志进行过几次谈话。在这些谈话里,哈哈列夫同志极力让我相信必须断绝与反对派的思想上的联系,与反对派的观点决裂等。我也同谢多舍夫同志和同索博利同志谈过一次,他们也坚决地证明,反对派的政治观点是不对的。

在学院里是否散发过传单?对此我必须说下面的话:在昨天我读《布哈林青年学派与右倾》一文之前,我对存在这样传单的事一无所知。我个人没有读过这个传单,对它的存在,我再重复一遍,我一无所知。

布什科夫: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切列塔耶夫是你们集团的吗?

沃罗比约夫:切列塔耶夫不是我们集团的,但我与他经常谈话。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64—82张。副本。打字稿。)

5

在阿拉木图查抄 Л. Д. 托洛茨基档案时发现的 Л. Б. 加米涅夫同卡普林斯基与佩列维尔泽夫谈话的记录(1928年9月22日); 讯问 Л. Б. 加米涅夫、Я. В. 沙罗夫、卡普林斯基的速记记录和 Л. Б. 加米涅夫关于此事的信件(1929年11月)⁵⁴⁶

副本

К[康斯坦丁诺夫]*和 П[潘克拉托夫]**
同志 1928年9月22日同加米涅夫的会见与谈话

我们是在剧院街上遇见的。他们五个人开完派别会议出来。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我们决定前去,但不是作为代表,而是作为 К. 和 П.。说了几句很少见面之类的话以后,便转入了对国家经济政治形势估计的主要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Л. Б. 在这些问题上是十分权威的人物,他留心地注视着升降的变动,了解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Л. Б. 通过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和对问题的说明,给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下面的定义。国家经济上在发展,在第四个丰收年之后正在进入更加尖锐的经济危机。粮食收购的情况就标志着,所采取的措施消除不了

* 原文如此。——编者注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危机。去年愚蠢地实行的非常措施触及了相当大部分的中农分子,甚至于贫农分子。在进行粮食收购的时候,党和苏维埃政权向贫农许了很多的愿,只求这些贫农帮助机关制服富农和弄到粮食。在一些地方贫农响应了号召,富农被制服了。

贫农因给予的帮助得到了什么呢?春天,当这些贫农最穷困的时候,当他们不仅没有种子播种,而且连吃的东西也没有的时候,政府未能实现诺言和贫农的要求。由于需要,贫农不得不再到富农那里去,重新依赖他们,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富农比过去两倍、三倍、五倍地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走投无路的状况迫使贫农只能接受这些条件。

夏天过去了,秋播过去了,而贫农仍然还没有得到所许诺的东西。经过秋播,在一些地区贫农又陷入了依赖富农的地位。苏维埃政权又晚了一步,没有履行诺言,欺骗了贫农。很自然,这种情况在贫农中间造成了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不利的和不赞成向富农分子进攻的情绪。富农春天拯救了贫农,秋天拯救了贫农,在困难的时刻帮助了贫农,成了这些贫农心目中的权威。如果政府和党不得不提出重新实行非常措施的问题,那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措施是不会得到农村贫农的支持的。这一次,贫农大多数会跟着富农走,因为在困难的时刻他们从富农那里实际得到了帮助。领导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能够用自己的资金使国家摆脱危机的经济性质的手段已经没有了。现在重新实行非常措施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并会造成这样的状况,使农民居民转而采取不可容许的方法去夺取粮食。现在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政治性质的措施,即更换领导,校正党的路线,使其具有更大的阶级明确性,制定一些措施,长期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

当前,为了缓和危机状况,他们将从国外进口粮食。根据最新的消息,已经这样做了。除了原先进口的1500万普特,政府又购买了3000万普特。

但是,粮食价格的上涨,从国外的进口,农业原料价格的上涨在使农村的积累增加并使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矛盾在随着危机的扩大而增长。危机状况的这种扩大向领导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后怎么办?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同谁一道前进?特别是在七月全会之后,如果李可夫的政纲是清楚的,那么斯大林的政纲则是不清楚的、模糊的。斯大林不能继续只局限于提出修正意见,使这些修正意见协调一致起来。现实生活在提出表述的方式、修正并完全抛弃许多东西。排队的现实生活比七月全会的表述更有说服力。这就要求斯大林说出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政纲和行动纲领。因此,Л. В. 认为,在十月全会上所有这些问题

将会重新提出并通过全会以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各个集团一定会各抒己见,路将从这里开始,或者通向热月政变,向工人群众掩盖国内和党内的真实情况,即使用长期的,更加有害的,欺骗的手段。接着Л.Б.宣称,Л.Д.托洛茨基对中央七月全会所作的评价是绝对正确的。同志们提出一个问题,Л.Б.怎样说明群众对危机问题的绝对消极态度和应当做些什么来向这些群众预告正在发展的严重危机。对此Л.Б.回答说,在我们的战斗发动时期,广大党员群众不了解我们分歧的实质。他们对一些支部会议上不时爆发的这类激烈的争论没有准备。由于看到领导层正在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一切困难,我们已经迅速地行动起来,把大量的重大问题压到了党员群众身上并在能够做到的地方对这些问题进行坚持。但是党员群众由于对这些问题不了解,不敢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不停地用我们的问题打击党。就是这种过于坚持不懈的打击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去年10月和11月看到的那种不信任或畏惧(但愿别更糟)。Л.Б.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加入党,逐渐占据苏维埃和工会的负责岗位。同志们指出,当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右倾的部分会席卷而来,您就实现不了这个计划了。

对此加米涅夫回答说,危机正在成熟,当它达到某种限度的时候,我们会向党和工人阶级说明和宣布这一点的。而现在应当采取措施,以便一道工作。

在场的沙罗夫指出,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甚至被选进了一些支部委员会,这证明,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是有生命力的。

Л.Б.对散发Л.Д.生病的传单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他说,这会使情况恶化。稍晚收到的迟到的消息说,关于你们的Л.Д.的转移的问题在政治局里提出来了。在别的地方再详细谈。可见,加米涅夫在对П.(佩列韦尔泽夫)说情况恶化的时候,是由此出发的。加米涅夫接着说,Л.Д.现在应该递交一个文件,在文件里应当说:“召唤我们吧,我们将一道工作。”但Л.Д.是个固执的人。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将呆在阿拉木图,直到派特快列车去接他。但要知道,当这一列车派出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将会是这个样子:克伦斯基就要回来了。同志们指出,如果特别快车将在克伦斯基就要回来的时候派出,那么,第一,这就将是克伦斯基式的统治,第二,对此的责任将落在您的身上,因为您为了纠正路线而放弃了阵地和加入了党,对防止这些严重的后果您一点事情也没做。特别是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把Л.Д.从被斯大林及其同伙赶走的那个危险的地方弄回来,在这一切之后您怎么能来批评传单。加米涅夫有些慌乱并且宣称,他可以同布哈林谈谈。至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季诺维也夫一个月前就同莫洛托夫谈过了。接着,对Л.Д.托洛茨基过于经常和尖锐地在每一封信里强调他们的投降

主义,Л. Б. 表示不赞成。

现在不应当这样做,他说,现在应当一道工作。错误人人都会有,不应当加剧错误。要知道,就是 Л. Д. 也有某些可以谈的东西。这将导致新的谈话,现在用不着重复。只能表示遗憾的是,发生了破裂。生活证实了反对派的所有论点。反对派作出的诊断是完全正确的。他谈了集团,说正在为撤掉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和斗争。按照他们的看法,头号人物是已经成形的并且是热月派分子最完美的典型,他把希望寄托在红色工会国际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合并上并谨慎地表示赞成准备进行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合并。对乌格拉诺夫,工作正在从基层进行。他们想通过基层的机构欺骗上层。通过挑选基层的机构把斯大林支持者的多数选到代表会议上,并用这种办法否决乌格拉诺夫的候选资格。关于李可夫,他说,在许多问题上李可夫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很狡猾,他在等待别人说。很可能,斯大林在十月全会战胜李可夫之后,会坐到他的位置上并推行李可夫的纲领。是的,很可能,Л. Б. 回答说。离开加米涅夫的时候,同志们得到了晚上看见灯光来坐坐的邀请。

安东

加米涅夫同志的信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今天从早晨就听见一些同志说,好像昨天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对我提出了指责,说我与托洛茨基有某种联系,向他通风报信,几乎是同他或者他的同伙相勾结。我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根据。我认为,可能是某些托洛茨基分子编造了关于我的什么谎言。我希望,将让我有可能了解这类指责的根据并详细地向党说清楚。但我现在就认为有责任最坚决地声明:自从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那一刻起,我就把托洛茨基视为政治上的敌人;坚决地坚持与他断绝往来;决不会想对他的活动给予任何的支持或帮助,因为他的这种反党活动与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选择的道路大相径庭。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我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便毫无共同之点,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谈到托洛茨基,除了强烈谴责他的立场、他的策略和他的全部行为,我不会说任何别的东西。因此,我可以预先断言,托洛茨基分子与此相矛盾的任何声

明都是造谣或者恶意的歪曲。

最后我想说,现在,1929年11月突然指责我与托洛茨基有某种联系,使我深感震惊。在政治上我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我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用词进行了充分的斟酌,认为他们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罪犯。我认为,联共(布)中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同样也反对我本人曾经有过的那些怀疑和动摇,——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执行了列宁主义政策的路线和在实际上证明了自己的整个方针和策略的正确性。在这些条件下在工人的会议上被指责与托洛茨基主义有某种联系,被怀疑为想要动摇联共(布)的领导或者其威信,对于我是不应得的负担。我准备为我所有的真正的错误和动摇负责,但我不能为我没有做过和我从未想做的事情负责。恳请您让我有可能详细地驳斥对我提出的那些指责。

我曾两次尝试打电话向您陈述我的这个请求,但均未找到您。

11月15日晚5时

Л. 加米涅夫

副本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9年11月17日 对沙罗夫同志讯问的速记记录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想弄清楚关于您的几个细节,因为在最近的托洛茨基的一个文件里提到了您的名字。这是在托洛茨基的一处档案里发现的谈话记录。是有您在场的情况下 K. 和 П. 同志 1928年9月22日的会见和谈话。显然,谈的是佩列韦尔泽夫,而这个 K. 是谁?

沙罗夫:是卡普林斯基。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剧院街上遇见了五个人,他们开完派别会议出来。”
(朗读)

沙罗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卡普林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不在场,我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要是能把他们叫来就好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佩列韦尔泽夫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沙罗夫:顺便插一句,我应当说,我听说,好像这次谈话印在了传单上,三周前我去上班在尼科利斯克街上遇见卡普林斯基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情。

雅罗斯拉夫斯基：卡普林斯基在这里？

沙罗夫：是的。三周前我在街上遇见了他，我用最龌龊的话骂他。他对我说，让我们现在到列夫·鲍里索维奇那里去，但所写的一切从头到尾都不是真的。

就这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声明，我坐在了列夫·鲍里索维奇那里，这确实是在9月份。我们坐在那里，女仆端来了茶，突然门铃响了，卡普林斯基和佩列威尔泽夫来了。我说——真是意外的客人。是怎么回事？首先谈起了列夫·达维多维奇的病情。他们说：“请您，列夫·鲍里索维奇，这件事请您帮帮忙”，——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听了他们关于托洛茨基病情的谈话之后，我一直在沉默。列夫·鲍里索维奇说，你们找错了门。意思就是这样。当然，谈话逐字逐句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会引起这样的谈话，但意思就是所说的那样——你们找错了门，我们同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对党，对我们所持的态度已经不像是同志，同你们谈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主要的思想就是这样。那时他们便立刻转向了请列夫·鲍里索维奇帮忙的问题。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说这是徒劳的请求。他说了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即便我可以帮上什么忙，我必须向斯大林和李可夫同志报告，现在他们两位都不在莫斯科。在这之后，他们试图开始政治性的谈话。那时我对列夫·鲍里索维奇表现出的冷淡态度感到吃惊，他说，我们同你们，小伙子们，就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谈的，总之，任何谈话，甚至普通的谈话，你们都进行歪曲，你们在自己的传单上撒谎，因此，关于任何政治问题我也不准备同你们谈。

雅罗斯拉夫斯基：也许，谈了准备印刷的关于加米涅夫与布哈林谈话的传单？

沙罗夫：完全没有谈布哈林。只提到了李可夫和斯大林同志，谈到他们不在莫斯科，但再也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在他们同列夫·鲍里索维奇谈话的全部时间里，我一直坐在那儿，后来，晚上10点我同佩列威尔泽夫与卡普林斯基到有轨电车站去，在路上，我记得，我对佩列威尔泽夫说——你们在做些什么，应当停止这种做法。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开始进行宣传鼓动。佩列威尔泽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您今天在党内有什么意义，您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什么人物？我说，第一，我心想，对不起，我在党内不仅是为了在政治上得到什么升迁，而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党和为专政事业进行斗争。这就是我大体上说的话，原话我不记得了。我们的一些在列宁格勒工作的工人同志，我认识一个同我们一起签署声明并开始诚实工作的纺织工人，他们被选进了支部。总之，凡是诚实的工人到

来并开始工作的地方,到处党都信任他们。这就是我们从列夫·鲍里索维奇家出来去无轨电车站的路上我谈话的大体的意思。我劝他们别这样做了。我了解佩列韦尔泽夫,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我真的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正确,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声明之后我认为有责任去影响所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劝他们回到党里来。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过去知道佩列韦尔泽夫是国外反对派的代表吗?

沙罗夫:我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我因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事务到国外去过。我在柏林遇见过他。他那时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他没有别的交往。但是我知道,佩列韦尔泽夫是老布尔什维克,我认为自己应当和必须去影响他,使这位同志回到党里来。这种做法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既然我们错了——就应当改正错误,以便回到党里来并做对党和工人阶级有益的人。我的全部谈话就具有这样的内容。而在这里所说的其他一切事情,像需要散布关于在某个剧院旁边相遇的传单等,全都不是真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谈到托姆斯基了吗?

沙罗夫:我记得,谈到了斯大林和李可夫同志。提到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说到他们在休假,而关于托姆斯基我不记得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而加米涅夫说,托洛茨基对七月全会的评价是正确的,——这是很难杜撰的。谈话的转述是由某个叫安东的签字的。也许他不那么准确地转述了谈话,也许他多少添加了些什么,但是干吗要呆在那儿杜撰,他需要事实和文件的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情报员。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是这样的人,他总是需要某些书面的文件,准确地陈述这是怎样发生的,于是人们就向他陈述一切细节,就假定某些细节被夸大了,但要杜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在进行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是否开过派别会议——我不知道,记录上说,遇见了五个人,他们开完派别会议出来,邀请去他们那里,我们决定去。您却说,事情不是这样。现在是通过对所提问题进行回答和对问题的说明的一个半小时的谈话。谈的是什么呢?是关于国家的经济形势,关于粮食收购,关于农民各阶层的相互关系,关于富农的行动,关于我们对贫农的政策,关于从国外进口粮食,关于价格上涨,关于工人的工资。想出这一切——这是不可理解的。

沙罗夫:我说话是真诚的,我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是平生第二次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我说话是真诚的,他们来了之后,他们便开始谈列夫·达维多维奇,这次谈话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沙罗夫同志,过去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来是作为派别组

织的成员，派别组织要求您遵守派别纪律，这是一回事，谈话也是以特别方式进行的。您认为有必要承担派别活动的责任，等等。现在是另一回事：您是我们信任的党员，与您过去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来不能相比。我们要求完全真诚。

沙罗夫：我说得十分真诚，他们是直接从托洛茨基的病情开始谈话的，而谈话的最后当他们试图把谈话引向政治话题的时候，我再重复一遍，他的冷淡态度使我吃惊，他声明说，就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一次偶然的谈话，关于帮助托洛茨基，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了。这就是谈话的大体的基调，对他们转向政治话题的尝试，他回答说，就是你们对你们所说的再加上十倍，那也是撒谎，等等。也许，这不是原话，但意思就是这样。我说话完全是真诚的。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你说的是另一回事，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必须考虑到，当这类文件成为党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隐藏它们的，它们要求我们把事情彻底查清楚。加米涅夫同志是党员，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党员宣称完全赞同并且认为反对派的路线是正确的，而同时又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散发着某种和解气味的谈话，说你们，托洛茨基分子，错骂我们了，我们认为，你们在某些方面错了，但反对派仍然是正确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说出自己的意见。这里有某种欺骗。

沙罗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不能想象，加米涅夫在他已经恢复党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没有再进行任何派别活动之后，他会说这一切，他会突然与最先遇见的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谈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佩列韦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我认为，他不可能认识他们。我认识卡普林斯基，他曾经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呆过。在工作上我也同他们见过面。但是他们怎么会来到列夫·鲍里索维奇那里，同他谈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说通。当然，列夫·鲍里索维奇会同我们，同他已经认识的人谈话，但同第一个碰到的人谈话——这是不可理解的，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一点。当然，写得很尖刻，但我坦率地、十分真诚地声明，这从头到尾都不是真的。关于我引用的一句话，现在想想这句话：“同志们，党信任我们并把我們选进了支部。”这句话我记起来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佩列韦尔泽夫我们不能谈，因为佩列韦尔泽夫是个正在进行派别斗争的人。

沙罗夫：他现在还在进行？

雅罗斯拉夫斯基：那还用说。他坚持必须让托洛茨基回到党里来的观点，坚持认为反对派是正确的，而我们是错误的。与这样一个人我们将谈什么呢？但

我们有权指望,在党内的同志们应当会提供准确的事实。难道我们要去问托洛茨基分子不成?

沙罗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再说一遍,我完全诚实和真诚地声明……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也愿意相信,您所作的声明是完全诚实和真诚的,但是只要在文件所陈述的和您所说的之间不出现明显的不一致。喏,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据您说,是最诚实的小伙子——佩列韦尔泽夫,为什么这个诚实的小伙子想要向托洛茨基通报事实和事情的真相,通报的却是谎言?我们应当弄明白这一点。如果关于这件事您回想起什么来,请写下来。

沙罗夫:好,也许,我真能想起什么来,但现在除了我已经说的,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没想到,不得不谈论这个问题。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在谈话的最后,您要我如果对这件事想起什么就写下来。我答应考虑。现在我告诉您,除了我已经说的,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除了我向您转述的那次谈话,无论我还是加米涅夫同志都没有同卡普林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进行过任何政治问题的谈话。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并再一次完全予以肯定。

Я. 沙罗夫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让加米涅夫同志 看过《记录》之后对他进行讯问的速记记录

〈1929年11月17日〉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看,随便地闭口不谈这个文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委员会已经知道这个文件,应当弄清楚,有过什么和没有过什么。

加米涅夫:直截了当地说,非常令人难堪的处境。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成千份这样的文件,而后我们将对此负责。我们的情况如此不正常,每一个坏蛋都可以加以利用。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雅罗斯拉夫斯基:1928年9月22日

加米涅夫:一年半。这全部谎言的唯一的实际理由可能是,好像是我们从卡卢加来以后第一天或者第二天,还是在我没有住房,没有椅子,我们坐在木头箱

子上的时候,沙罗夫跑来了,我们打算打开这些箱子。这时候佩列维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闯进来了。我几乎完全不认识他们。至于剧院广场,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已经叫了卡普林斯基,原来,他在莫斯科这里。

加米涅夫:这太好了。他们一来到,就直接向我提出了请求,说托洛茨基病了,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入党以后同整个领导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以托洛茨基生病为由把他转到苏呼米,转到克里米亚去等。我冷静地回答说,我们同领导没有私人关系,我刚来到这里,什么人都没见过,我根本不会接受这种委托。他们开始说服我,说我们刚刚一起进行过斗争等等。我声明说,你们和托洛茨基在干令人气愤的事情,他和你们应当递交入党申请书。谈话不超过15分钟,这之后他们就走了,沙罗夫也同他们一起走了。从那时候起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们。根本就没有说“晚上看见灯光来坐坐”的话。这些人我几乎完全不认识。卡普林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并不是什么政治人物,即便我想要同托洛茨基保持联系,那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让我同他们,即卡普林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谈这件事情。

雅罗斯拉夫斯基:佩列维尔泽夫曾经是反对派的代表。

加米涅夫:也许,他曾经真的是信件的一个收信人,但不是进行政治谈判的。不可能有我们进行关于某个克伦斯基谈话的这种情况。

这个文件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些谈话的汇总。也许,他们给托洛茨基写过这些东西,是为了给他一些鼓励。我只跟他们说过,他们应当入党,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说服每一个人,甚至偶然来的人这样做,但只是用寥寥数语。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里记述了一次很长的谈话,谈了许多问题:关于国内形势,关于粮食收购,关于在国外购买粮食,危机在加大等等,托洛茨基对七月全会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加米涅夫:我根本不记得他给予七月全会什么评价。我再说一遍,这个文件给我的印象是,这是同许多人谈话情况的汇总。我不可能同他们议论克伦斯基要来了。他会从哪里来?此外,如您看到的,这个文件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即不是同我谈话的那些人写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不知道,署名的是安东。

加米涅夫:他们一定是向某个人进行了转述,那人又向某个人进行了转述,而第三个人就写下来了。难道党真的认为,去年9月我们会抱有与托洛茨基联合的什么希望、幻想和意图?这个文件毫无价值。

雅罗斯拉夫斯基:没有根据,党是根本不会这样想的。党的中央机关得到了这样一个文件,里面记述着这样的谈话,说让我们等一等,等到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将同你们,托洛茨基分子一道工作,等等,等等。总之,同党保持着表面上忠诚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同托洛茨基分子保持着同样的关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这种谈话的可能性是不能容忍的。

加米涅夫:我说的不是对党表面的忠诚态度。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个文件说的是表面的忠诚态度。

加米涅夫:我不承认任何表面的忠诚态度。我完完全全是属于党的。整个谈话的起因是佩列维尔泽夫来了;我希望他提出申请和回到党里来。如果我有与托洛茨基恢复关系的愿望,我们就会系统地、经常地保持这种关系等。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资料依据。我证明,我没见过任何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闯到我那里并开始请求我帮助他们把托洛茨基转到苏呼米或者克里米亚。我没支持这个请求。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有过于托姆斯基的这次谈话?

加米涅夫:我完全不记得并且怀疑有过这次谈话。为什么专门谈托姆斯基?要知道,这是个片断,鬼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里曾谈到了集团。有人说,正在为撤掉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和斗争。

加米涅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如果有与这些人一起搞政治的愿望,那我就不会与他们只见一面,如果这具有政治性质的话,我就一定会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并向他们转达些什么,但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卡普林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都会证明,在这次唯一的谈话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其他人。同时,也许,过一段时间有人还会拿来一个什么“文件”。例如,有三名工人到我那里来过,我不记得是来自什么工厂了,他们按了门铃,进来说,我们想跟您谈谈。要是我知道,佩列维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将这样转述我所说的话,我会把他们赶走的。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两年以后您来负责吧。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封信是写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

加米涅夫: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说。我来到班上,列别杰夫同志对我说:“加米涅夫,是怎么回事,据说,您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并想派特快列车去接他。”我说——什么信?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以前碰见过什么人吗,谁会对您说这件事?

加米涅夫:我记起了托洛茨基的一份传单,传单上说,加米涅夫说,将会有什么克伦斯基的统治。关于此事我给中央写了信,但我没有任何文件。

雅罗斯拉夫斯基:沙罗夫说,三个星期以前他在街上遇见了卡普林斯基,他说,谈到了有关这件事的什么传单。

加米涅夫:我没见过卡普林斯基。我回忆起,还是去年在托洛茨基的一份传单上有过一段什么引文。传单上说,加米涅夫在谈话中说了关于克伦斯基统治的什么话。那时我就此事给中央写了信,说托洛茨基在对我进行诽谤,我认为,可以翻一翻这些传单并把它找出来。大概他得到了这封信并加以利用。关于这事我不记得有过什么情况。在列别杰夫同志告诉我这事之前,至少我没听到和没想起任何情况。这是昨天早晨的事,晚上我就给您写了这封信。事实仅仅是,佩列维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确实向我提出过请求,我没把他们赶走,这可以说是一个错误。但我表明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可以对没入党的人说,你们入党吧,别再犯傻了。后来他们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然后他们大概去找一个人,另一个人,第三个人,匆匆炮制出了整个谈话,而后这些人把这个被歪曲的谈话呈递给了托洛茨基。这里需要起码的信任,如果您根本就不相信,我与托洛茨基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要证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对我没有这种起码的信任,我能用什么来证明呢?

雅罗斯拉夫斯基:对这样的问题,必须尽可能地进行最仔细的审查。

加米涅夫:我本人对审查很关心。让我同佩列维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当面对质。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无法让您同佩列维尔泽夫对质,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同卡普林斯基对质可以。

加米涅夫:当然,我不能保证他会说什么。您很了解,我们没有搞任何政治上的事情。我们什么人都看不见,但是不能总呆在班上办公务,而且是荒唐的公务。我有五六位老同志,我们在一起交谈,但再没同任何别的人见面。总不能认真地猜测,我们与托洛茨基有什么密谋,这是不可能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对托洛茨基更了解,因为您曾与他呆在一个集团里,大概把他研究透了,当两个托洛茨基分子来找您并提出关于帮助托洛茨基返回莫斯科的问题的时候……

加米涅夫:他们请求转到克里米亚。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应当知道,您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写给托洛茨基,都会向他通报和报告的。我觉得,毕竟在这样的问题上——请求您为托洛茨

基从中斡旋——把谈话的全部内容及时转报中央委员会真是最好不过了,否则一年之后您现在去弄清楚吧。您自己说,细节很难想起来了。例如,像谈到让过去的反对派分子进入某些领导机关的班子这样的细节。这样的谈话你们之间可能有过。沙罗夫说,也许,并非如此,但这样的谈话是有过的。沙罗夫和您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谈话中指出,唯一的道路就是为党工作,这意味着取得党的信任并证明你们是在以党员的态度进行工作,——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总的说,这些谈话完全不带有只言片语的性质,显然谈话是有某种目的的,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这次谈话涉及了一系列的问题。

加米涅夫:我说,一年半之后要在记忆中恢复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给予重视的一次谈话,我做不到。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没搞过与党敌对的任何政治,不会与托洛茨基有任何关系,即便只是因为他在每一份传单里都用最粗野的话漫骂我们。佩列维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我很不了解,我不会选他们做托洛茨基和自己之间的中间人。我只同他们进行了很短的谈话并强调指出,他们应当入党。我决不会同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会对他们说(这一点他们可能会夸大),党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个时候你们应当帮助党。你们看到,情况很困难,应当帮助党,应当加入党。再多我什么也不会说。谈话正是带有片断的性质。

雅罗斯拉夫斯基:谈到了粮食收购运动了吗?

加米涅夫:我不记得了,我不认为,我会同卡普林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谈。我会概括地说,困难很大,应当帮助。对粮食收购运动我过去完全赞成,现在也赞成。

雅罗斯拉夫斯基:有人说,他们毫不中用,他们把粮食运往国外,等等,等等。

加米涅夫:我肯定,我决不会说任何类似的话。第一,我不这样认为,其次,我是不会同他们谈这种事的。请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同布哈林的谈话——我保持这样的态度,只听而不说。

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哈林说,加米涅夫听取了我说的话。

加米涅夫:他说了一个半小时,不给我开口的机会。您面前有一份文件,关于这份文件可以说,它反映了我所说的。我只能间接地证明,这是对我的话的歪曲。如果我想要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的话,我会经常这样做的,可实际上是有人闯进来了,我同他们谈了谈,就分手了。不然,我会和他们通信并继续搞政治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显然,这次谈话是关于如何摆脱困境。对于反对派来说,入党就是摆脱困境。这次谈话是有过的。他们说,当他们表示异议之后,您回答

说——危机在成熟,当它达到某种限度,我们会说出这一点的。你们有过指望危机激化的打算。

加米涅夫:已经过去几乎一年半了,我们甚至不尝试说出自己的任何看法。关于危机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的只是,尽管所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党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应当帮助党。这就是我真正能够说的一切,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是您所说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话,您是否说过您会给他们机会同布哈林谈谈?

加米涅夫:不,我什么也没说过。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上面说:“加米涅夫有些慌乱并且宣称,他可以同布哈林谈谈。”

加米涅夫:无论是同布哈林,还是同别的什么人,我一次都没有提出过关于托洛茨基的问题。我坦率地对他们说,我不会接受类似的委托,如果托洛茨基希望并等待什么特快列车,他就是傻瓜。我说,应当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努力争取党给予信任。现在要复原谈话非常困难,但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说任何类似的话。文件里引的不是我的话,不是我的想法。我不会把这样的事情委托给卡普林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要是我愿意的话,难道我不能在莫斯科找到更正经的人,况且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们,我只是在路过柏林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以后再也没见过面。总之,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再出现十份这样的文件,我不会感到惊奇的。例如,我来说这样一件事。一个月前中央租让委员会的支部书记找我说:我们想组织一次俄罗斯联邦和苏联租让委员会之间的竞赛,举行两个支部的会议,共有40人,签订一个协议等,您是否能发表一篇关于竞赛意义的开幕词,等等。我说——好,不过首先请您到区委去一趟,您知道我的处境怎样。他去了区委,第二天来说:他们说,不要这样做。而这是在自己的支部里,您要知道,是什么情况。在这种处境下,任何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都可以利用这种情况。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不算什么:如果您自己不让别人利用,任何人也不可能利用您。

加米涅夫:我们过去觉得,一切旧的东西都会消除,我们能够像以前那样成为党的干部。可悲的情况是,我们赞成党的政策,看见了大规模的建设、巨大的困难,我们想给予帮助,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在祖国的大地上却像外国人被限制。难道我进行过什么反抗?建议我到英国去。我立刻就同意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与这件事情无关。您自己明白,布哈林的整个事情不可能不影响对您的态度,这一切一定会在对您的态度上留下一定的痕迹。

加米涅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可以用同志式的态度说话吗?在同布哈林的关系上我究竟错在哪里?我唯一能够承认的就是,我第二天没有去和没有报告这件事情。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您自己赋予这次谈话政治意义的。您看见了,这是一次明确的政治谈话。索柯里尼柯夫写信叫您,索柯里尼柯夫给您的信也在托洛茨基那里。叫您是为了谈话。谈话是索柯里尼柯夫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谈话涉及政治局内部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您记下了这次谈话并把它寄给了季诺维也夫,就在几天之后它就送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手里,是通过一方面在托洛茨基身边的,另一方面又同您有朋友关系的人送去的。

加米涅夫:是的,很可能。

雅罗斯拉夫斯基:结果就是,加米涅夫同志是托洛茨基分子了解我们党内事务消息的来源,而另一方面,加米涅夫同志是这样一个人,掀起反党斗争的布哈林同他走在一起,例如商量如何共同行动,要他们不要触动他,等等,等等。不言而喻,党不可能不由此作出明确的结论。您不应当抱屈,而应当从已有的事实中回忆这一点。

加米涅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不是抱屈,我说的只是情况不正常,会给人以产生种种误解的借口:我们在政治上最接近的是现在带领党的那个集团,而我们却被抛到我们所敌视的人们的怀抱里去,在两年期间往外推我们,经常往外推我们。我说,我准备在同志式的谈话中承认,我是在向一位同志叙述我们的谈话,如果一位政治局委员到我这里来,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他说。您可以提出指责,说我没有去,没有去报告这件事情。如果政治局委员中有谁来到您那里并开始骂别的委员,您是否会有勇气去找这些委员并对他们说,有人在骂他们。我应该怎么办,到斯大林那里去告诉他,布哈林到我这里来过并用最粗野的话骂他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问题不在于他是否骂了斯大林,而在于此人在您面前摆出了自己同党的一整套分歧,提出了一定会发生某种某种政治变化的问题。就在三天前斯米尔诺夫在私人谈话中说了拉科夫斯基的命运。我把这次谈话转告了奥尔忠尼启则,因为我认为,这关系到党,而不是我。在这里你们谈的是,在党内应当实行完全另外的政策。

加米涅夫:布哈林讲述了,在政治局里大家说了些什么。如果他告诉了我斯大林不知道的什么秘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此外,他大骂了政策。他讲述了全会上发生了什么,即他说的是斯大林同志清楚了解的那些事情。

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加米涅夫同志,不会有为了内心的发泄写信把一个人从卡卢加叫来这种事,来是进行十分重要谈话的需要,要知道,索柯里尼柯夫已经预先告诉了您,将有一次同布哈林的十分重要的谈话。您来吧,索柯里尼柯夫将作为见证人在场。

加米涅夫:他立刻就走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如果您真的不重视这次谈话,那这就有些轻率了,这就不像是您了,因为您是一位严肃的政治活动家。

加米涅夫:我没有说,我不重视。我很重视。

雅罗斯拉夫斯基:既然您自己触及了这个问题,那我就应当明确地说,从您这方面说,这是一个大错误。

加米涅夫:我的错误在于,我本应当到中央去并报告所有这一切。我应当承认,我的错误还在于,卡普林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到我这里来过,尽管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我还是应当把这次来访报告中央。如果我拥有最低限度的信任,事情大概就会是这样的。但您是知道的,在两年期间我们请求与斯大林会面,我们是老同志了,我想,他会同我们谈一谈的,但是我们什么也没争取到,而甚至作为一名党员我都不能与总书记谈谈。我是会向他讲述所有的一切的,但是怎么也争取不到。

转交与布哈林谈话的信的情况如何呢?我举了两个人的名字,也许,是我弄错了,但事情的进展怎样呢?我很难想象,我什么也不知道。

雅罗斯拉夫斯基:很明显,这简单得多,您把信交给了某个人,也许是潘克拉托夫。

加米涅夫:哪个潘克拉托夫?

雅罗斯拉夫斯基:也许是姆季瓦尼。

加米涅夫:我是说,不能进行这样的指控。如果您这样认为,您就应当把我关进监狱。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给什么人看过吗?

加米涅夫:我肯定,除了季诺维也夫,我没给任何人看过。

雅罗斯拉夫斯基:从托洛茨基档案的文件里可以看出,有过这样的事。

加米涅夫:在弄清这件事情的可能性的意义上,全部权力和力量掌握在您的手里。我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十分坚决地肯定,除了季诺维也夫,这封信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对托洛茨基除了仇恨没有别的,因为他,我们跟老同志们处于分离之中,在这之后我会去帮助他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9 年 11 月 17 日 当着加米涅夫同志的面讯问卡普林斯基同志的速记记录

雅罗斯拉夫斯基:卡普林斯基同志,现在谈的是 1928 年 9 月 22 日您和佩列韦尔泽夫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谈话。请您谈谈,这是怎样、在哪里进行的一次什么样的谈话。

卡普林斯基:谈话是在加米涅夫同志住处进行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之前你们是否见过面?

卡普林斯基:在这之前几天,我沿着阿尔巴特街回家,在阿尔巴特街的拐角上遇见了加米涅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正要上有轨电车。我同他打招呼问候并问,是否可以去看他?他说,可以,并把自己新住处的地址告诉了我。这之后我见到了佩列韦尔泽夫,建议他一起去加米涅夫同志家。那时正流传着列夫·达维多维奇生病的消息,于是我们想谈一谈,让加米涅夫同志帮助把他转到另一个地方。我记不很清楚了,好像这是遇见加米涅夫同志两三天以后的事。我们和加米涅夫同志通了电话,便到他那里去了。谈话是从列夫·达维多维奇生病和我们请求加米涅夫同志尽可能帮助把他转到另一个地方开始的。但这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很难在记忆里恢复一切。加米涅夫同志回答说:我未必能做什么,让托洛茨基自己提出申请,这将是比较正确的办法。从自己方面,他说,我乐于帮助,但未必能做什么。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据我回忆起来,有沙罗夫在场。

雅罗斯拉夫斯基:除了这件事,您想不起任何别的话题了吗?

卡普林斯基:这之后谈话转入了一般政治性话题。加米涅夫同志说了以下内容:在基本问题上我们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错在我们灌输我们观点的方法上,我们是用鞭子把它们打入党的头脑。这样做是不对的。对此,党忍受不了,也不能容忍。

雅罗斯拉夫斯基:如果我宣读这样一个消息,也许您会更容易回想起来。安东是谁?

卡普林斯基:我不知道安东是谁。您要知道,两天以后我就到索利卡姆斯克去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是谁转达的,是安东还是您?

卡普林斯基:我没有转达给托洛茨基,大概是有人根据彼得的口述转达的。究竟是谁转达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时我在我们的组织里处于机会主义分子的

地位。

雅罗斯拉夫斯基:有这样一个文件:“在剧院广场遇见了等等”……(读)。这就是这次谈话。

卡普林斯基:至于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详细的我记不起来了。现在我记起加米涅夫同志的主要想法是:国家处在这样的危机情况之中,只用一套经济措施是不能保证走出困境的,需要有一套广泛的政治措施。关于领导和改变领导等,据我记得,加米涅夫同志没有说过。我记得,我和彼得往回走的时候,我们从加米涅夫同志的论题里得出的正是这样的推断和结论:现在国家处在这样严重经济状况之中,只有一套政治措施,而不仅仅是经济措施,才能拯救危局。加米涅夫同志的这个论点我记得很清楚,而且措词正是这样。我转述的是当时铭刻在记忆中的东西。

雅罗斯拉夫斯基:对您没有更多的要求,请把有过的一切都讲出来。

卡普林斯基:也许,这一切都是加米涅夫同志说的,但我记不清楚了(关于中农、贫农等的想法)。我只记得加米涅夫同志的那个基本结论,只有一套政治措施才能保证摆脱已经形成的危机状况。

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谈过粮食收购吗?

卡普林斯基:是的,有过这样的谈话。

加米涅夫:多长时间?

卡普林斯基:我觉得,将近两个小时。

加米涅夫:在什么环境里?您回想一下,这套房子收拾好了吗?有没有电话?

卡普林斯基:是的,房子没收拾好,在进行谈话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我们坐在一个柳条编的沙发和椅子上。

雅罗斯拉夫斯基:“对粮食价格的上涨……”(读)。

卡普林斯基:从信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出,这个事实转述的是片面的。加米涅夫同志当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同意列夫·达维多维奇对七月全会的评价,但又这样解释说:现在应当指出有一定的左的进展,右的危险在不断增加,斗争应当转向右边。我们说,列夫·达维多维奇指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别的东西,但列夫·鲍里索维奇说,他是像他向我们陈述的那样理解托洛茨基的文件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是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托洛茨基对七月全会提出评价的这个文件他是知道的?

卡普林斯基:他说,他同意,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把它解释为继续斗争的文

件,而加米涅夫同志解释为这是说明托洛茨基向某一部分人方面靠拢的步骤和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右倾分子必要性的文件。他说,如果托洛茨基向即将召开的十月全会递交声明,他会认为是正确的。这会是摆脱困境的最正确的办法。他说,他担心,要是托洛茨基将继续留在阿拉木图,他就会开始表现自己特有的历史性的托洛茨基主义并将继续大声疾呼地发表讲话,这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力不胜任的并且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不正确的。这次谈话不是以加米涅夫同志作报告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一次政治性的座谈,我们经常插话,他回答。谈话不是按照信里陈述的那种顺序进行的。我说的是谈话的顺序。

我想转向从信的这一部分里得出的结论。加米涅夫同志没有说,任务在于占据重要的社会岗位。我们向他指出:您进到了党里,但是您现在不能在党政方面影响政治生活的进程。沙罗夫反对说,这不正确,说在列宁格勒有一些入了党的同志,他们被党吸引,被工人推举,投入了党的生活的整个系统。您的关于不让我们参加党的生活的结论,沙罗夫说,是不正确的,应当逐渐赢得党的信任和融入党的生活。加米涅夫同志说的不是应当夺取负责岗位,而是应当参加党的群众工作并能够参加他们的生活。

其次,我还想再谈一点。加米涅夫同志在谈到危机的时候指出,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左的方针并且对此没有任何保证,因为提出的一套左的措施是不够彻底的,在右倾分子和领导之间没有划清界限,但在即将召开的十月全会上,这些分歧,在他看来,会尖锐地提出来并可能会朝着党所提出的方向找到解决办法。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什么保证和是否会有别的前景,加米涅夫同志回答说,可能会有别的前景,可能会出现,像加米涅夫所说的,“庄稼汉出身的克伦斯基”。现在的任务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系统,帮助党克服对左的方针的阻碍。而托洛茨基将做什么呢?托洛茨基会等待无产阶级给他往阿拉木图派特快列车吗?也许,会是这样的,但那时候这可能就晚了,因为这趟列车将被某个农民出身的克伦斯基颠覆。

雅罗斯拉夫斯基:您是否记得说李可夫的政纲是明确的,而斯大林的政纲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谈话?

卡普林斯基:我不记得这种表述,我既不能予以否定,也不能予以肯定;我记得什么,我就说什么。

雅罗斯拉夫斯基:总之,您现在所说的又被印出来的信的一部分所证实(读)。

卡普林斯基:他说——我们的同志保住了党和工人的信任,尽管他们曾进行

过那样激烈的斗争。加米涅夫同志声明：“你们在散发传单和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难道领导对此不应当作出反应？任何一个政府不得不对这样激烈的斗争作出反应。”对加米涅夫同志所说的话，我是这样记得的。我们感到惊奇并且宣称：要知道，不久前您还和我们一起进行过这种斗争。关于托洛茨基病情的传单，他说，你们散发这种传单，是选择了不正确的道路。

雅罗斯拉夫斯基：*(读信的末尾)*

卡普林斯基：最后加米涅夫同志指出，不排除这个左的方针失败的可能性。加米涅夫同志说，尽管领导内部今天有斗争，左的方针可能明天会被推翻。

雅罗斯拉夫斯基：有过关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白白攻击投降主义者的谈话吗？

卡普林斯基：是的，他说，你们是完全徒劳地进行反对我们的激烈斗争，也许，我们也会加剧对你们的斗争。

雅罗斯拉夫斯基：加米涅夫同志是否说过，对发生的破裂只能表示遗憾，但反对派作出的诊断是完全正确的。

卡普林斯基：对左的力量的最大打击，加米涅夫同志说，大概是当时我们的分道扬镳了，反对派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也说过，我们过于急切和用鞭子向党的头脑里灌输我们的观点，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谈过集团吗？

卡普林斯基：是的，谈过。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谈话，您可记得，再没有别人在场吗？

卡普林斯基：是的，再没有别人在场。

加米涅夫：在这之后您见过我们吗？

卡普林斯基：不，再没见过。

加米涅夫：而同佩列韦尔泽夫呢？

卡普林斯基：我是三个月前到来的。我不知道，您是否与佩列韦尔泽夫见过面，我没听说过这事。我没有写过这封信。我向许多反对派的同志讲述过这次谈话，但那是在会见后大约三个星期，因为在这之后两天或者三天我就到索利卡姆斯克去了。为了准确起见，应当指出，在我们去列夫·鲍里索维奇家的路上，我遇见了舒拉·萨福诺娃。我告诉她，我们去找列夫·鲍里索维奇请他帮助转移列夫·达维多维奇。她问——是谁授权给你们的，她说，你们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同“机会主义分子”是惺惺惜惺惺，你们无权去请求，没有人授权你们这

样做。

雅罗斯拉夫斯基:要知道,她曾进入莫斯科组织的核心,大概不希望同加米涅夫同志进行单独的谈话。

卡普林斯基:她认为,去请求加米涅夫同志在政治上是不对的,但我们还是去了。关于同加米涅夫同志的这次谈话我向她转述了,是在我去索利卡姆斯克之前还是回来以后,我不记得了。当我向她转述我们谈话的时候,谈话的内容她已经知道了。我没有以书面的形式这样做过。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是说,有人做了。在您看来,这里,这份记录里的一切都是对的?

卡普林斯基:是的,基本上一切都是对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卡普林斯基同志,到此可以结束了。

加米涅夫:这给我的是另一种印象。卡普林斯基同志讲述的东西,我完全不记得,但他所说的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告诉他们并劝说这两个人入党,停止斗争。我举了各种论据,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但是我讲话的主要目的、任务和含义本身在于,你们和托洛茨基在干蠢事,你们应当加入党,尤其是党内左的方针在取胜,你们的一切传单和斗争——是蠢事。沙罗夫证实,有许多人入了党,可以给予一定的影响。他们表示反对,我坚持。这把整个事情描绘得与这封“信”里陈述的情况完全不同。

雅罗斯拉夫斯基:但主要的是,您为这样的事情,如为反对派的观点提供了论据,说它们完全被证实了,说反对派是正确的。

加米涅夫:这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说,我们曾坚持同富农的斗争,但同富农的斗争正在进行。看来,佩列维尔泽夫在转述这一切的时候,不像卡普林斯基有好记性。如果写这封信的是卡普林斯基,就会是完全另一幅情景,我所说的话全部含义归结为应当入党,就会清清楚楚。这是一次辩论性的会见,我劝说人们入党,我列举了各种论据来说服他们。而佩列维尔泽夫在转述这些的时候,显然是弄得让托洛茨基更容易接受。

卡普林斯基:安东不是佩列维尔泽夫。佩列维尔泽夫叫彼得。这大概不是他,因为他当时已被隔离在反对派的领导工作之外。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相遇不是在剧院广场,而是在阿尔巴特街上。

雅罗斯拉夫斯基:情况大概是这样的:这或者是要根据卡普林斯基同志的口述,或者是要根据佩列维尔泽夫的口述记录下来的,这显然是速记员干的,她坐在那里记录。我不是说,这份记录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对此我并不坚持,重

要的是你们就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过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谈话,而记录十分之九符合实际情况。

卡普林斯基:是的。

加米涅夫:卡普林斯基说,遇见我之后,他们请求见面,我没有拒绝他,他和佩列维尔泽夫来了,他们请求让托洛茨基转移个地方,然后就谈起了一般性的政治话题。谈话的内容是,为了鼓动他们入党,我论证说,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托洛茨基实行的政策是招致灭亡的、有害的,我挑选的那些论据对他们应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好吧,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所涉及的问题都多少得到了阐明。

1929年11月17日与加米涅夫同志谈话 的继续,卡普林斯基同志不在场

加米涅夫:在卡普林斯基同志说了那些情况之后,我想对您说,如果有最小的信任,您就应当相信我,我的全部谈话的含义就在于,我试图说服这些人,特别是佩列维尔泽夫,放弃地下活动并加入党。我不能用那些一碰到他们就像豌豆那样弹回来的论据说服他们,我必须采用这种手腕。我不认为我千方百计劝说两个托洛茨基分子放弃地下活动并加入党是任何犯罪。同时我可以这样说,例如,我们纲领的一部分正在实现,你们想同富农斗争——同富农的斗争正在进行,但说这一切是为了说服这些托洛茨基分子放弃反对党的斗争。

雅罗斯拉夫斯基:显然,谈过互相不进行攻击。

加米涅夫:你们不登载我们的文章,我们不同任何人见面,我们怎么能够进行攻击,而他却最无情地进行了攻击。这次谈话无疑是片段性的、偶然的,它并不证明与托洛茨基分子有任何经常的联系。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没有根据向您提出指控,说您与托洛茨基分子有经常的联系,我是受命查清这个情况——这次谈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是否正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就这些。

加米涅夫:我希望,还有一个落在我身上的阴影尽可能地排除掉,并且说明,我是在什么气氛、环境下进行这次谈话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我看来,他没有说谎。他回忆得很客观,他的记忆力不错。我给他看的记录的那些段落,他没有看记录就把内容讲述了出来,与记录的

文字相当接近。可能,他正确地注意到了,托洛茨基这份转述的主观色彩不同,看来不是根据卡普林斯基的口述,而是根据佩列韦尔泽夫的口述写成的。可能,那个写的人在信里这样转述,为的是让托洛茨基更高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加米涅夫:我希望把这件声明和在我身上的阴影除掉。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把这转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政治局会决定,这些说明可以发给哪些人或者不应该发给哪些人。

加米涅夫:我对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但只关心,可别让领导同志形成玩弄某种两面派手法的印象;这个文件可能会被这样理解,但如果进行正确的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样一个文件,根据它可以看出来,我曾经劝说两个到我那里去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地下活动。我再没有任何关心的事情了。

关于布哈林。我不能平静地对待您对我提出的这样一个指控;不论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但是如果有怀疑,那就应当推翻它。我保证,我说的全部是老实话,我保证,这封信是被偷走的,我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我相信,在目前托洛茨基分子瓦解的情况下,可以查清这封信是怎样落到托洛茨基手里去的整个途径。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们已经提出了查清楚的任务——托洛茨基是怎样得到您的记录的,我们一查清楚,立刻就会告诉您。

莫斯科。1929年11月18日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亲爱的同志!

翻阅昨天与您谈话的速记记录,我注意到了您指出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给我往卡卢加写的信也在托洛茨基的档案里。在同您谈话的时候,我没来得及或者没有想到要指出,这个事实对认为信(与布哈林的谈话)可能是由我交给的想法是最有力的客观的驳斥。要知道,不可能设想,我不仅把与布哈林谈话的记录,而且把索柯[里尼柯夫]叫我从卡卢加前来的信交给了托洛茨基。我相信,对这一点进行考虑之后,您自己会坚定地认为,我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这种转交。干吗我不仅把一个政治文件——与布[哈林]谈话的记录,而且还把对托洛茨基毫无意义的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交给随便什么人?而对于我来说,这封信在托洛茨基分子手里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所有这些文件是从我那里偷去的推测。我清楚地记得,索柯[里尼柯夫]的信和与布[哈林]谈话的记录我是一起放在一个纸袋里的。大概,小偷不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把整个纸袋拿走了,而后来托洛

茨基分子才把谈话记录单独分了出来并加以利用,索柯[里尼柯夫]的信对他们毫无价值,就随便扔进了档案里。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猜测我自己会给什么人看,或者让人誊写,或者不仅把与布[哈林]谈话的记录,而且也把索柯[里尼柯夫]的信转寄给什么人,——这样猜测不是明显荒唐吗?!

此外,我想提请您注意,索柯[里尼柯夫]的信的发现可能提供揭破整个事情的途径。要知道,现在大概可能弄清楚:信被发现时是什么样子,是谁的手抄写的,是手抄的,还是打字的,还是速记下来的等。恳请您对这一点予以注意,因为我一直希望,这些文件如何到达托洛茨基手里的途径最终会调查清楚,对于我的荒唐的和对我来说可耻的怀疑将会消除。

副本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亲爱的同志!

在奉还修改后的速记记录的时候,请您把所附上的我的补充声明同速记记录放在一起。

给您的第一封信,速记记录和这个补充,我都没有副本。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求您给我一个副本,供需要时查阅。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И. 加米涅夫

1929年11月18日

看了讯问卡普林斯基的速记记录,我认为需要对我的说明作以下补充。

从卡普林斯基的声明里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

1. 我同卡普林斯基与佩列威尔泽夫的谈话不是他们记录的,而是第三个人或者第四个人根据他们的口述记录的;

2. 这份记录里加进了许多不是我说的话,而是卡普林斯基和佩列威尔泽夫离开我以后两个人之间说的话,这样,就把我没有说过的结论和想法加在了我的身上;

3. 写信的和谈话时不在场的那个人明显地把别的什么谈话和事实同我的谈话混淆在一起了。比如,信里说,似乎佩列威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在剧院广场

遇见了我以及还有五位什么同志,然而卡普林斯基证明,根本没有过这样的相遇,而是他遇见我一个人在阿尔巴特街上正要上无轨电车,就在我住处的附近,即几乎就在斯摩棱斯克市场旁边;

4. 谈话的转述中,如卡普林斯基所说,加进了“主观的”色彩,看来,是根据第二手或者第三手材料写这封信的那个人加进去的;

5. 一些最引人反感和不体面的地方明显是以歪曲的形式放入我的口里的(关于“危机”,关于“夺取党的负责岗位”,关于“экстерное место”^①547等等——见卡普林斯基的速记记录);

6. 说明谈话整个含义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令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不高兴的段落干脆被删掉了。例如,从卡普林斯基的话里可以得出,我直截了当地声明,因为地下活动和传单对托洛茨基分子应当予以逮捕,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样做的,然而在信里这一点却无影无踪。同时,我当面对托洛茨基分子所作的我的这一声明就证明,谈话具有完全不同于信里强加于它的性质;

7. 最后,主要的是,从卡普林斯基本人的话里可以得出,整个谈话带有辩论的性质,而且我劝说他们放弃地下活动,嘲笑了他们对会派“特快列车”去接托洛茨基的期待,劝说他们放弃与党的斗争和提出入党申请,等等。同时,我举出了各种论据,但没有说过“反对派的政纲是正确的”,而大概说过,党正在同富农和同右倾分子斗争,大家都必须在这方面帮助党,因为这种斗争有很大的困难。

这一切在托洛茨基分子惊扰不安的头脑里得到了歪曲的表现,而经过第三道手、第四道手的转述就变成了那个被歪曲的、许多地方政治上简直不通的“文件”,这个文件被送给了托洛茨基。

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这样的争论——指出因地下活动会进行逮捕的正确性,嘲笑他们对“特快列车”的幻想,嘲笑他们关于“左的曲折”的哲学——我是会这样做的。但是这样的争论与“文件”里强加给我的那些言论毫无共同之处。

从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对我与在街上偶然遇见的卡普林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的谈话,我不可能赋予,也没有赋予任何政治意义。很自然,其中很多东西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肯定地说,我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是政治上的敌人,而中央的路线和策略是正确的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时而披着右的,时而披着“左”的外衣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成功地执行列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进行争论并嘲笑托洛茨基分子,但是不会说任

① 编者在注中亦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文件内容看可能是特快列车之误。——译者注

何有利于托洛茨基分子和有损于党的话的。

*И. 加米涅夫*⁵⁴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183—185、187、189—207张。副本。打字稿。)

注 释

- 1 全会的议程 1929 年 7 月 25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过讨论。И. В. 斯大林因为在南方休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在全会的材料里有 B. M. 莫洛托夫修改过的议程。1929 年 7 月 25 日政治局会议的第 90 号记录 1929 年 7 月 26 日发给了斯大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50 号案卷,第 3 张;2 号目录,729 号案卷,第 22 张;558 号全宗,11 号目录,74 号案卷,第 78 张)。
- 2 1929 年 7 月 25 日政治局通过了于当年 10 月召开联共(布)中央例行全会的决定。在 1929 年 9 月 16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日期具体化为 10 月 25 日。由于在地方上进行粮食收购工作的联共(布)中央委员的请求,10 月 20 日政治局决定把全会开幕的时间定在 11 月 10 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50 号案卷,第 3 张;758 号案卷,第 6 张;763 号案卷,第 7 张)。
- 3 全会讨论了 1929 年 10 月 1 日至 1930 年 9 月 30 日期间,即所谓经济年度内,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数字,经济年度是 1921 年确定的,与农业生产的周期相一致。从 1931 年起,经济和预算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 4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29—1932/33 年度)由 1929 年 4 月 23 至 29 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并由 1929 年 5 月 20 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 5 见:《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29 年。8 号公报,第 1—43 页;12 号公报,第 33—35 页;14 号公报,第 1—12 页。
- 6 苏联工业是 1930 年实行连续工作周的。关于企业实行连续生产周的决定的起草工作是由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政府委员会和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类似的委员会进行的。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1929 年 8 月 22 日由政治局进行了研究,最后定稿于 1929 年 8 月 26 日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54 号案卷,第 2 张;755 号案卷,第 5 张)。为了阐明这个决定,联共(布)中央 1929 年 9 月 17 日发出了《因实行连续生产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党的工作者手册》第 7 辑下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 年,第 183、184 页)。
- 7 南方冶金托拉斯系 1921 年秋天起至 1930 年年初曾经存在的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南方冶金托拉斯包括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境内的各冶金

工厂、煤矿和炼焦设备。在政治局 1929 年 8 月 8 日关于南方冶金托拉斯的决定中提出的任务是 1932—1933 年把生铁产量从 520 万吨提高到 600 万吨,而后再提高到 650 万吨。

- 8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了提高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特别是预计在最近几年间实行七小时工作日。1927 年 11 月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属下成立了一个准备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政府委员会。1928 年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见《真理报》,1927 年 10 月 16 日;本书第 3 卷*)。
- 9 准确的名称是《致切列姆霍沃挖煤工人的信》。是 B. И. 列宁 1920 年 9 月 15 日写的。最初发表在那一年 11 月 11 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为了宣传的目的,1929 年 11 月 7 日由《真理报》重新发表。

B. И. 列宁 1918 年 5 月 26 日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353—360 页;第 49 卷,第 545 页)。

- 10 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五卷本文献与资料,第 1 卷(1927 年 5 月—1929 年 11 月),莫斯科,1999 年,第 13—67 页**。
- 11 恩格斯 1891 年 10 月 24—26 日致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187 页。也见注 497。
- 12 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23 页。
- 13 《工商报》1893 至 1918 年和 1922—1940 年出版。自 1922 年起作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报出版,自 1930 年 1 月起以《争取工业化报》的名称出版,自 1939 年 10 月起改为《工业报》,自 1940 年 10 月起改组为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名称为《黑色冶金工业报》。
- 14 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是 1928 年 7 月根据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决定成立的,目的是组建大型国营谷物生产企业并对它们的活动实行领导(见本书第 2 卷***)。
- 15 预购合同制——根据预先签订的合同收购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的制度。在苏联,预购合同制从 1922 年起采用,但作为采购的主要形式是 1928—1929 年度实行的。
- 16 斯大林格勒区电站,其建设是 1928—1929 年度开始的(《苏联的工业化——文献与资料(1929—1932)》,莫斯科,1970 年,第 201 页****)。
- 17 畜牧业农场托拉斯和养羊农场托拉斯——均为国家畜牧业国营农场联合公司。
- 18 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苏联公路管理和汽车运输的决定(《苏联法律

* 以下文中凡提到联共(布)中央十一月(1928 年)全会的地方,均见本书第 3 卷。

** 以下称:《苏维埃农村的悲剧》。

*** 以下文中凡提到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 年)全会的地方,均见本书第 2 卷。

**** 以下称:《苏联的工业化(1929—1932)》。

- 和法令汇编》*，1929年，第6期，第52页)。
- 19 1929年5月31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了关于在苏联安排汽车生产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苏联经济生活——大事记(1917—1965)》第2版，第1卷，莫斯科，1967年，第195—196页)**。
- 20 1929年7月22日М. И. 弗鲁姆金被政治局批准为全苏渔业辛迪加主席并解除了他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职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0号案卷，第4张)。
- 21 中央劳动研究所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属下的一个科学研究所(1921—1940)，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为А. К. 加斯捷夫。研究所从事劳动过程的心理生理分析问题和某些劳动操作训练方法的研究。因为不重视和甚至忽视对工人的普通教育和一般技术培训，研究所及其领导人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各次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受到了强烈的批评。
- 22 见本次全会11月15日《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12月7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法律汇编》，1929年，第75期，第18页)。
- 23 1929年10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计划和统计工作结合起来的决议》，提出拟在专区和州一级建立统一的统计和计划机关(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20—21张)。
- 24 指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建设工程主任В. И. 伊万诺夫。
- 25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曾经起草了两个方案。起始方案，即最低方案——供歉收和外部情况复杂化时采用；第二个方案，即最佳方案，供条件有利时采用。起始方案和最佳方案之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别大约为20%。
- 26 Н. И. 布哈林的论文《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发表在1928年9月30日的《真理报》上。论文对1927—1928经济年度进行了总结并确定了从10月1日开始的新的经济年度(1928—1929)的任务。在批评Е. А.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理论的时候，Н. И. 布哈林对在经济中运用非常措施进行了批驳并指出了违背市场关系的危害。1928年10月8日政治局会议向《真理报》编辑指出，它不应该未经政治局批准就发表这篇论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8号案卷，第3张)。这就强调指出了，论文的主要论点与政治局多数委员的立场是相左的。
- 27 这个用语出自Н. И. 布哈林。他在1929年1月30日致政治局的声明里，在批评斯大林在1928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宣布的向农民征收贡赋的口号时，使用了这个用语(《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526页；本书第4卷)。

* 以下称：《法律汇编》。

** 以下称：《苏联经济生活》。

- 28 关于1929—1930年度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提纲的最后定稿于1929年11月5日由政治局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2张)。
- 29 什捷罗夫卡、“红十月”、埃斯哈尔(丘古耶夫)——分别为顿涅茨克州、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州的电站。
- 30 在1928—1929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材料中指出,截至1929年10月1日苏联有正在实行的技术援助合同70个,其中55个是与美国和德国公司的合同(《苏联的工业化(1929—1932)》,第218页)。
- 31 美国“鲁宾逊”公司(Дуайт П. Робинсон)起草的合同草案要求苏联政府方面给予一些明确的保证,而公司方面没有作出任何保证。Я. Э. 鲁祖塔克领导下的委员会提出了修改合同的问题。1929年5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9号案卷,第3、9张)。
- 32 见注6。
- 33 指特克瓦尔切利(阿布哈兹)的煤矿。
- 34 指的是政治局1929年9月5日关于乌拉尔石油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6号案卷,第5张)。
- 35 捷尔别斯工厂是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企业最初的名称。
- 36 指的是政治局1929年11月5日《关于有色冶金和金属加工托拉斯和企业实行合并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3张)。
- 37 委员会是1929年9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建立的,由19人组成,其中有B. B. 古比雪夫、H. A. 库比亚克、Г. Н. 卡明斯基、M. И. 卡尔马诺维奇、A. Ф. 托洛孔采夫等。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拖拉机制造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决议》草案,由政治局于1929年11月5日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8号案卷,第4张;765号案卷,第2、11—13张)。
- 3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47张。在准备速记报告时被删去。
- 39 见政治局1929年9月19日《关于1929—1930年度的农业机器制造》、《关于拖拉机制造的计划和拖拉机的类型》、《关于1929—1930年度的拖拉机制造及其分配》的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案,3号目录,758号案卷,第3、4张)。
- 40 B. B. 古比雪夫报告此处及后面的数据引自政治局1929年11月5日《关于拖拉机制造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1—13张)。
- 4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56张;440号案卷,第125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42 政治局1929年12月份两次,1930年1—2月三次研究了有关汽车制造业的问题(俄罗斯

- 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8号案卷,第7张;774号案卷,第3—4张;775号案卷,第12张;162号目录,8号案卷,第16—17张)。
- 43 1929年10月30日政治局通过决定一个月后讨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橡胶生产的现状和前景的报告。12月25日政治局批准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橡胶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70号案卷,第4、10—11张;162号目录,8号案卷,第3张)。
- 44 根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宣布的工业生产合成橡胶方法国际比赛,苏联化学家C. B. 列别杰夫和一批工作人员研究出的(1926—1928)生产合成橡胶的方法被评为最佳方法。
- 45 此处使用的是H. П. 戈尔布诺夫1929年5月21日报告里的数据,他当时去基辅出差,了解沃伊诺夫斯基工程师从一种杂草——马力筋中提取橡胶的工作情况。在报告的副本上有И. В. 斯大林的批示:“已阅。应当同发明家见见面。戈尔布诺夫大概着急了。建议星期一与乌克兰人一起讨论。И. В. 斯大林。”1929年5月27日政治局通过决定:保证沃伊诺夫斯基每月的工资并免除他在手工业工厂的工作,让他专门从事提取橡胶问题的研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87号案卷,第13—15张;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78、85张)。
- 46 政治局关于1929—1930年度的进口和外汇计划的决议是1929年10月20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3号案卷,第5张)。
- 4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72张;440号案卷,第250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48 指的是索利卡姆斯克的两个开采钾的矿井的建设。一个矿井的建设由苏联专家进行,另一个由德国专家进行。1928年4月苏联专家负责建设的矿井发生了事故。工程停顿了三个月,消除事故花费了14.6万卢布。1928年7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尤林的文章《索利卡姆斯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详细情况在M. П. 鲁希莫维奇和Г. К. 奥尔忠尼启则署名的1929年11月21日和22日给政治局的报告里进行了描述。报告里提到了德国工程师科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812号案卷,第31—54张)。
- 49 M. П. 托姆斯基是由政治局1929年8月19日的决定任命为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化工总公司)主席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4号案卷,第4张)。
- 50 指的是1929年夏天希比内磷灰石矿的发现和开发。对此《真理报》曾于1929年9月24日,10月6日、19日、30日进行过报道。
- 51 1929年11月初举行了由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召开的讨论实现1929—1930年度木材出口计划的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12号案卷,第110张)。

- 52 1928年6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整顿工业基本建设和电力建设的措施的决定》，认为由自营施工方式改为承包施工方式是适宜的（《法律汇编》，1928年，第33号，第297页）。
- 53 1927年7月18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棉花总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它以联共（布）中央《关于棉花总委员会的工作的决定》发表。决定特别指出，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修订植棉业发展的五年计划，把收获皮棉78.72万吨，而不是59.04万吨作为1932年的任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18—25张）。
- 54 1929年12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种植和利用罗布麻和苧麻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7号案卷，第4、15、16张）。
- 55 第二部类产品这些降价指标是政治局于1929年10月20日在讨论苏联人民委员会提出的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过程中批准的。政治局改变了自己1929年9月5日批准的关于降低第二部类产品出厂价格1.5%—2%，降低零售价格3%—4%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6号案卷，第2张；763号案卷，第9张）。
- 56 1929年9月18日扎波罗热“公社社员”农业机器制造厂生产出了苏联第一台拖拉机（《苏联经济生活》第1卷，第200页）。
- 5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100张；439号案卷，第2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58 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南方机器制造托拉斯（南方机器托拉斯）主席当时是И. С. 多岑科。
- 59 大概指的是1928年6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给顿巴斯住宅建设和完善工人村设施拨款数额”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0号案卷，第3张）。在通过的决定中特别谈了建设顿巴斯输水管道的必要性。
- 60 贫农委员会是1920—1933年间乌克兰农村贫农的组织。自1925年起作为维护贫农和中农利益的志愿协会在行动。
- 6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112张；440号案卷，第135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62 禁卫军是古罗马军队的特权部分。转义是充当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的支柱的雇佣军。
- 63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的发言稿在准备速记报告时进行了重大的文字修改。
- 64 全会的参加者得到了两本题为《全会材料》的小册子，里面有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В. В. 古比雪夫、Г. Н. 卡明斯基报告的提纲和关于С. В. 柯秀尔、Л. М. 卡冈诺维奇、В. М. 莫洛托夫报告的决议草案。此处指的是关于1929—1930年度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提纲（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9号案卷，第49—78张）。
- 65 А. И. 米高扬的发言没有作者修改过的速记记录。有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和准备在速记

- 报告中发表的文本。发言全部进行了重写,发言的原意保留了,但文本变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6号案卷,第120—145张;425号案卷,第184—211张)。
- 66 指 Н. И. 布哈林、А. И. 李可夫、М. П. 托姆斯基 1929 年 2 月 9 日致政治局的信(见本书第 4 卷)。
- 67 见注 14。
- 68 关于增加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土地面积的问题 1929 年 7 月 4 日曾在政治局里讨论并交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会议研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7号案卷,第4张)。
- 69 《社会主义导报》是一份杂志,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机关刊物,是 Ю. О. 马尔托夫和 P. A. 阿布拉莫维奇于 1921 年创办的。1933 年 3 月前在柏林出版,1940 年 6 月前在巴黎出版,而后到 1963 年在纽约出版。
- 70 在苏联人民委员会 1929 年 6 月 21 日《关于 1929—1930 年度粮食收购和粮食供应的安排的决定》里责成中央统计局修改编制粮食饲料平衡表的方法和程度(《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17,772 页)。
- 71 指 1928 年在中央统计局内建立的评估和确定农产品平衡的专家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中央管理机关(1917—1967)》。参考手册,莫斯科,1967 年,第 69 页)。关于在苏联人民委员会里和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的分歧,米高扬在 1929 年 8 月 23 日的信里通报了斯大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 号全宗,11 号目录,765 号案卷,第 57 张)。
- 72 指为在歉收和其他异常情况下满足居民需要而设的年复一年的粮食和饲料结转储备。建立这种储备的决定是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29 年 6 月 27 日的政治局会议确定储备的数量为 1 亿普特(《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773—774 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62 号目录,7 号案卷,第 93 张)。
- 73 根据政治局 1929 年 9 月 23 日的决定,雅科夫列夫被派往西伯利亚进行粮食收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59 号案卷,第 4 张)。
- 74 苏联粮食公司系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内的全苏国营股份公司。建立于 1928 年,是由许多股份公司合并而成。苏联粮食公司肩负的责任是在苏联境内进行粮食收购,向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粮食和粮食产品,向生产地区和工业中心供应粮食。
- 75 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属下的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建立于 1921 年。
- 76 指 1929 年 6 月 20 日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会议批准了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联渔业的决议草案并通过决定将其交给劳动国防委员会详细确定财务和生产计划并通过苏维埃程序形成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45 号案卷,第 2 张)。

- 77 在1929年11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由A. И. 米高扬签名的“关于肉类生产问题的提出”的报告已准备完毕。为了研究这些建议,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由21人组成,后来又增加了6人。委员会制定的措施计划由政治局于1929年12月20日讨论并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3张;766号案卷,第9张;769号案卷,第13—21张)。
- 78 指联共(布)中央11月(1928年)全会和第五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
- 7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142张;439号案卷,第6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80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指出必须进行实物、商品和外汇后备的积累:“这些后备的积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可以保证苏联不受国际市场行情巨大波动的影响,不受可能出现的部分或全面的经济、财政信用封锁的影响,不受国内歉收和对无产阶级共和国联盟直接武装进攻的影响。”(《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莫斯科,1984年,第4卷,第280页)*
- 81 指的是下列文件:由A. И. 米高扬与M. Л. 鲁希莫维奇署名的《关于扩大木材出口的措施的报告》和由Л. М. 欣丘克署名的《关于比萨哈林木材出口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为1929年11月25日举行政治局会议准备的,会上讨论了保证木材出口计划的问题和萨哈林木材出口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12号案卷,第106—115张;17号全宗,3号目录,766号案卷,第3、4张)。
- 82 Г. С. 别谢多夫斯基,1917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自1927年5月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处参赞。1929年9月发表了几份政治声明,拒绝返回苏联。
- 83 在由A. И. 米高扬署名的呈送给И. В. 斯大林、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929年11月8日关于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外干部的报告引用了这些情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127张;同样见B. Л. 格尼斯的《1920年代—1930年代初的叛逃分子》一文,载《历史问题》,2000年第1期,第48页)。
- 84 大概说的是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的苏联驻汉堡商务代表处烟草处的工作人员И. И. 戈尔德施泰因。根据对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看法,自杀的原因是家庭纠纷和处内的不健康气氛(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6号目录,118号案卷,第44—48张)。
- 85 1929年11月22日和12月10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了“关于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外干部”的问题。中央组织分配部授权在一个月期限内从党的、经济的、工会的工作岗位上挑选100名负责干部来加强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驻外干部,而人民委员部在三个月期限内组建贸易学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1张;803号案卷,第4—6张)。

* 以下称:《苏共决议汇编》。

- 86 贸易学院是根据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30年3月31日的决定建立的。学院有三个部:对外贸易、国内商品流通和食品工业。学制定为两年,此前有为期一年的函授预备培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836号案卷,第4张)。
- 87 H. M. 什维尔尼克1929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顿巴斯(《真理报》,1929年10月30日)。
- 88 所谓五天周(四个工作日,第五天为休息日)与工业转为连续工作周有关(见注6)。不固定的休息日在不同的企业各不相同,这造成了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
- 89 指苏联人民委员会1929年6月18日《关于加强生产会议的工作和利用职工在改进生产方面的首创精神的决定》(《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第2卷,1929—1940年,莫斯科,1967年,第93—95页)*。
- 90 1929年12月5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草案,补充指出了工人群众和工会组织广泛参加生产管理的必要性(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7号案卷,第3、4张)。
- 91 《关于整顿生产管理和建立一长制的措施的决定》是政治局1929年9月5日批准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6号案卷,第4、9—13张;《苏共决议汇编》,第4卷,第556—562页)。
- 92 指的是1929年10月20日根据政治局决定建立的对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财务状况进行检查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H. П. 布留哈诺夫、Г. К. 奥尔索尼启则、И. Е. 柳比莫夫、Л. М. 欣楚克和Э. И. 克维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3号案卷,第9张)。
- 93 根据政治局1929年5月3日的决定,И. Е. 柳比莫夫被派往顿巴斯帮助合作社机构改善对工人的食品供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8号案卷,第3张)。
- 94 对工业建设地区的消费服务问题政治局1929年8月26日进行了研究,该问题的解决交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会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5号案卷,第4张)。
- 95 大概指的是1928年12月10—24日举行的苏联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当时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M. П. 托姆斯基表示反对政治局关于把Л. М. 卡冈诺维奇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代表选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决定并且两次(1928年12月23日和1929年1月10日)向政治局提出辞职声明以示抗议。当时政治局未接受他的辞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8号案卷,第4张;721号案卷,第3张)。
- 96 指M. И. 弗鲁姆金1928年11月5日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里

* 以下称:《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

- 关于农业和与农民关系状况的提法(《苏联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452页)。
- 97 指 В. Я. 丘巴尔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 1929年4月》,莫斯科,1962年,第104页)*。
- 9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5号案卷,第202张;439号案卷,第12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99 В. И. 列宁 1918年6月27日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20页)。
- 100 见 1929年11月1—5日举行的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全会的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1号目录,3175号案卷,第61—62张)。
- 101 指的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委托“农业机器”托拉斯在 1930年7月前试制出四台 П. И. 博罗金工程师设计的联合收割机(《В. В. 古比雪夫选集》第2卷,莫斯科,1988年,第420页)。
- 102 见注 76。
- 103 1929年8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提出的 1929—1930年度全苏联及各个地区的粮食统购计划(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4号案卷,第2、9张)。
- 104 大概指的是建设和装备向工人出售食品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大厦。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专门的决议。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1926年10月26日—11月3日)在讨论 А. И. 李可夫的关于国内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时候,С. И. 瑟尔佐夫谈了“商品运销网安排不合理”。在 1927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В. Я. 丘巴尔在就 А. И. 李可夫和 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报告进行讨论时发言说,必须在五年计划中规定解决商业建设问题(《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第174页;《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两卷本),莫斯科,1961—1962年,第1003页)**。
- 105 大概是指 Н. 奥辛斯基的文章《论当代生产技术趋势》在《真理报》的发表(《真理报》,1929年11月11、12、14日)。
- 106 指政治局 1929年11月5日《关于拖拉机制造和农业机器制造的决定》,决定确定建设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1—13张)。
- 107 见注 56。
- 108 指的是对中亚一些被控管理不善和舞弊的水利干部的起诉。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巡回审判庭 1928年3月28日在塔什干作出的判决,3人被判无罪,21人分别被判处一至六年

* 以下称:《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

** 以下称:《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 期限不等的徒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22号案卷,第23、24张)。
- 109 布哈林在《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写道:“……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见《Н. И. 布哈林文选》,莫斯科,1988年,第184页)*。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1929年)全会上,富农合作社的窝巢长入苏联经济体系的论点被视为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见本书第4卷)**。
- 110 苏波战争是1920年4月25日由波兰军队进攻基辅开始的。5月26日红军转入反攻并接近了华沙和利沃夫,但由于波兰军队的反击而撤退。在波兰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根据1921年的里加条约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划归波兰。
- 1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通过了关于解除Н. И.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定并把他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见《补充材料2》)。
- 112 指的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收到的Е. А.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К. В. 拉狄克、И. Т. 斯米尔加1929年6月22日和И. Н. 斯米尔诺夫与М. С. 博古斯拉夫斯基1929年10月27日关于同反对派决裂并同意党的“总路线”的声明。这些声明分别于1929年6月25日和10月3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连同这些声明的支持者的名单一起发表在《真理报》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6号案卷,第4、12—15张;765号案卷,第5张;《真理报》,1929年7月13日、11月3日)。
- 113 见注26。
- 114 大概是指Г. Е. 季诺维也夫和Н. И. 布哈林在1925年12月18—31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两位发言者都大量引证了В. И. 列宁的话(《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97—129页)。
- 115 此处和以下是指Я. Э. 斯腾的文章《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旗帜》和Л. А. 沙茨金的文章《打倒党内的庸俗作风》,两位作者在文章里反对不加批判地听从党(《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6月18日、26日)。1929年7月22日政治局通过决定,指出沙茨金的文章是错误的、“政治上不坚定的”并解除了他《真理报》编委的职务。7月25日政治局建议《共青团真理报》编委会发表文章批评沙茨金的“错误”,建议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讨论加强编辑部的措施。8月8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报纸的决议,建议《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刊登稿件批评沙茨金和斯腾文章的错误观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0号案卷,第2、5张;752号案卷,第3张;753号案卷,第4张)。斯腾11月2日,沙茨

* 以下称:《布哈林文选》。

** 以下凡文中提到联共(布)中央四月(1929年)全会均见本书第4卷。

金 11 月 12 日先后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立场是错误的(《И. Б. 斯大林致 B. M. 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 年)》莫斯科,1995 年,第 135—138 页)*。

- 116 指斯大林 1928 年 5 月 28 日与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关于粮食收购困难的谈话。1928 年 6 月 2 日谈话记录以《在粮食战线上》为题发表在《真理报》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71—83 页)。

红色教授学院系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1921 年 2 月 11 日的决定创办的专门高等学校,其宗旨是为各高等学校培养社会科学教师干部以及为科研机构、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培养干部。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学院实行总的领导。1921—1932 年红色教授学院的院长是 M. H. 波克罗夫斯基。

- 117 可能指的是 A. И. 李可夫 1928 年 4 月在会见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他在会上列举了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被追究责任的人数和在农村中重新出现的对苏维埃政权不信任的情况,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红军战士的情绪。M. И. 弗鲁姆金 1928 年 6 月 28 日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里也写了这一点(见:A. C. 谢宁著《A. И. 李可夫·生活之页》,莫斯科,1993 年,第 173 页;《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291 页)。
- 11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27 号案卷,第 43 页。
- 119 大概指的是赞同 H. И. 布哈林理论和政治观点的青年学者和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有 A. H. 斯列普科夫、B. H. 阿斯特罗夫、A. И. 斯捷茨基、П. Г. 彼得罗夫斯基、E. B. 蔡特林、Д. П. 马列茨基。
- 120 见注 109。
- 121 指的是 1929 年 10 月 20 日的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定:“(1)认为李可夫同志的关于 1929—1930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提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鉴于李可夫同志拒绝按照政治局会议交换的意见对提纲进行修改,赋予提纲更鲜明的政治性质和突出强调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确定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中央在全会上的报告人并责成他们在下次政治局会议前提出自己的提纲”(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63 号案卷,第 9 张),亦见注 204。
- 122 1929 年对职工进行了抽样调查(《1929 年的职工调查》,莫斯科,1930 年)。
- 12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27 号案卷,第 55 张。插话是准备速记报告时删去的。
- 124 1929 年 9 月 5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 1929—1930 年度工资的决定》,决定预计通过平均降低第二部类工业品出厂价格 1.5%—2% 和商业合作社工业品零售价格 3%—4% 来提高实际工资。在政治局 1929 年 10 月 20 日关于 1929—1930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定里,这些指标分别降低到 1% 和 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56 号案卷,第 20、21 张;763 号案卷,第 8、9 张)。

* 以下称:《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

- 125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1929年)全会认为必须更换苏联工会的领导。1929年5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二次全会撤销了М. П. 托姆斯基的主席职务并把他的支持者开除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为领导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集体领导机构——由И. А. 阿库洛夫、А. И. 多加多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Г. Д. 温伯格、Н. Н. 叶夫列伊诺夫五人组成的书记处(《劳动报》,1929年6月2日;见注95)。
- 126 马尔托夫在《社会主义导报》杂志两期(1921年第18、19期)上发表的《在取消之路上》的论文里,表明了自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符合孟什维克经济纲领,但表示担心,这项政策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俄罗斯保留着一党专政(见:И. X. 乌里洛夫著《Ю. О. 马尔托夫·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莫斯科,1997年,第386—387页)。
- 127 大概是指В. И. 列宁1920年12月3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任务的演说,列宁在演说中强调指出,托姆斯基在自己的言论里反映了劳动者的情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06页)
- 128 见注26。
- 129 指的是М. М. 哈塔耶维奇及其1929年4月1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论文《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如何》。
- 130 指Н. И. 布哈林的论文《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某些问题的看法》中《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真理报》1929年5月26日、6月30日)。在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理论观点时,Н. И. 布哈林写道:“不合理的自发势力的问题,正在被合理的组织问题所代替……正在被实实在在起指导作用的‘关于组织的科学’所代替。”(《真理报》,1929年5月26日)。1929年7月8日政治局指出,“布哈林同志在反宗教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的论文《有组织的经营不善》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反党斗争的继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8号案卷,第5张)。
- 131 Н. И.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出版于1920年。В. И. 列宁在手稿上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后,建议将其出版(《列宁文稿》,第11卷,第346—403)。
- 132 书的准确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出版于1920年12月。列宁关于此书的言论和为布哈林的书辩护的发言未能发现。
- 133 指的是所谓工业学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培养工业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В. И. 沃罗比约夫的事件,他原来赞成Н. И. 布哈林的观点,而后在党员大会和支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激烈地批评他的立场(见《补充材料4》)。
- 134 指的是В. И. 格里涅韦茨基的《俄罗斯工业战后的前景》一书,书中制定了对俄罗斯工业进行技术和组织改造的计划。该书第一和第二版于1919年在哈尔科夫问世,后来于1922年在莫斯科再版。

- 135 所引用的 M. Ю. 莱蒙托夫《沉思》的诗句被歪曲了。正确的是：“我们，刚刚离开了摇篮，脑子里就装满了祖先们的错误和他们迟笨的才能。”
- 136 见注 39。
- 137 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5 年 9 月 25 日《关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恢复中央和黑土区各省的措施的决定》（《法律汇编》，1925 年第 6 期，第 65 页）。
- 138 见《Н. И. 布哈林文选》第 392 页。
- 139 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全俄集体农庄联合会）是根据政治局 1926 年 12 月 30 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总结的决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1927 年 3 月 16 日《关于集体农庄的决定》建立的。1927 年 4 月 10 日全联盟集体农庄理事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俄罗斯联邦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全联盟集体农庄理事会和俄罗斯联邦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 1929 年 10 月 7 日合并之后，成立了一个联合机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
- 140 指 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 B. B. 古比雪夫的报告提纲，它们同时成为全会关于 1929—1930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729 号案卷，第 51—58 张）。
- 141 1929 年 6 月 28 日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61 条通过了以下版本：“凡拒绝履行义务、全国性任务或者拒绝进行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建设工程，第一次——由相应的政权机关处以所赋予任务、义务或者工程价值五倍以内的罚款；第二次——剥夺自由或者强制劳动一年以下。一批人按照预先的高定犯有这种行为并在履行义务、任务或者进行工程中积极反抗政权机关——剥夺自由两年以下，并没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从原地流放或者不流放。”（《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1929 年，第 60 期，第 591 页；《俄罗斯联邦法典》，莫斯科，1930 年，第 32、33 页）。
- 142 1929 年 10 月 15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执行政府向工业区供应马铃薯指示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62 号案卷，第 3、4 张）。
- 14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40 号案卷，第 259 张。是 И. Е. 柳比莫夫加上的。
- 14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27 号案卷，第 106 张；440 号案卷，第 274 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145 指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驻防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某些军舰的人员在反布尔什维克口号下进行的暴动。暴动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和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引起的。暴动开始于 1921 年 2 月 28 日。1921 年 3 月 18 日被 M. H. 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红军部队消除。有作战经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 300 名代表参加了攻打喀琅施塔得。
- 146 《Vorwärts》（《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于 1891—1933 年出版。
- 147 指政治局 1929 年 10 月 30 日《关于把计划工作与统计工作结合起来的决定》，这项决定

- 委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改进基层统计机关工作人员的挑选并将其活动置于村苏维埃、工会和贫农团的监督之下。拟在五个专区的农村里建立村的统计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20—21张)。
- 148 指Г.洛莫夫和Б.斯琼克尔的文章:《官僚主义的苦难历程——祖耶夫卡电站建设面临威胁》(《工商报》,1929年11月12日)。
- 149 该委员会对顿涅茨矿区采矿工业劳动保护情况的调查结果于1929年10月4日发表在《工商报》上。
- 150 指联共(布)中央四月(1928年)全会的决议《沙赫特事件和克服经济建设缺点的实际任务》(见本书第1卷)。
- 151 见注90。
- 152 见А.洛莫夫的文章《顿巴斯阶级敌人的暗中进攻》(《真理报》,1929年10月16日)。
- 153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建议举办并由政治局1929年7月18日批准的工业化日于1929年8月6日举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5张)。
- 154 1929年10月31日劳动国防委员会责成Н.П.布留哈诺夫主持的专门委员会在五天内对把地方工业积累的某一部分收归苏联统一预算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委员会提出的方案经过不大的修改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29年11月16日批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Р-5446号全宗,1号目录,51号案卷,第92—93张)。
- 155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9年4月16—23日举行的联席全会,全会在《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里谴责了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М.П.托姆斯基的政治立场。
- 156 指М.И.弗鲁姆金1928年6月15日给政治局的信里的一句话:“应当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293页)。
- 157 引证全会《关于1929—1930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
- 158 阿斯特拉罕案件是指控地方党组织犯有官僚主义、“蜕化变质”、贪污受贿、破坏苏联法制的案件之一。在反对“右倾”斗争的情况下,这个运动使中央有可能对党的中层干部的工作加强监督和摆脱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М.П.托姆斯基的支持者。对阿斯特拉罕党组织活动检查的结果,就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1929年8月29日《关于阿斯特拉罕党组织的情况的决定》和更换其领导班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33号案卷,第9—13张)。
- 159 指由Л.Б.加米涅夫、Г.Е.季诺维也夫、Н.К.克鲁普斯卡娅、Г.Я.索科里尼科夫签名的题为《秘密报告书(供名单上的几位同志阅读)》的信,信里批评了Н.И.布哈林及其支持者(А.Н.斯列普科夫、А.И.斯捷茨基、В.С.博古舍夫斯基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在下列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农的态度、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于农村的阶级斗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4号全宗,1号目录,139号案卷,第83—89

- 页)。由 Н. И. 布哈林、Ф. Э. 捷尔任斯基、М. И. 加里宁、В. В. 古比雪夫、В. М. 莫洛托夫、А. И. 李可夫、Я. Э. 鲁祖塔克、И. В. 斯大林、М. П. 托姆斯基签名对此信进行了答复。《报告书》的签名者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并被指责进行派别活动。“四人政纲”的作者表示不同意这种批评,于是1925年10月出现了由同一些人签名(Ф. Э. 捷尔任斯基除外)的《对答复的答复》(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同上第89—91张;17号全宗,84号目录,868号案卷,第1—40张)。
- 160 所引证的片断之前有一句话是:“政纲的作者利用中央的多数的支持者似乎没看见合作化发展的矛盾来进行投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4号目录,868号案卷,第14张)。
- 1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是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举行的。指的是全会通过的《农民问题提纲》,在提纲的《夺取政权之后问题的提出》部分里指出,农民经济的合作社组织“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下将长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体系”(《共产国际文献汇编(1919—1932)》,列宁格勒,1934年,第500页)*。
- 162 见注26。
- 16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7号案卷,第168张;440号案卷,第141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164 指的是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制定委员会的工作(详见本书第3卷)。
- 16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7号案卷,第170张。
- 166 沙赫特案件——是党和苏维埃领导制造的对顿涅茨矿区技术专家进行蓄意破坏的指控,根据这些指控1928年5—6月在莫斯科组织了由 А. Я. 维辛斯基主持的审判。被起诉的53名专家中,5人被枪决,多数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几个人被判无罪(见:С. А. 基斯利岑著《沙赫特案件》,顿河畔罗斯托夫,1933年)。关于政治局内对沙赫特案件的分歧,详见本书第1卷序言。
- 167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发言结束后,И. В. 斯大林给了他一张便条,赞成他的发言(见本卷序言)。
- 168 指的是列宁1915年12月为 Н. 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3页)。
- 16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9号案卷,第20张。是作者删去的。
- 170 《46人声明》是1923年10月15日在当时经济和财政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里指责党的领导没能使国家摆脱这种危机和在党内推行等级制度。А. С. 布勃诺夫签署了这个声明,但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我不同意声明第一部分里的一些估计;我不同意对党内情况的一些评述。同时我深信,党的状况要求采取根本的措施,因

* 以下称:《共产国际文献汇编》。

- 为现在党内的情况不顺利。实际的建议*我完全赞成。A.布勃诺夫。1923年10月11日。”(《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189—194页)。
- 17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7号案卷,第185张。
- 172 见注121。
- 17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7号案卷,第187张;440号案卷,第145张。A.И.米高扬保留了插话,在准备速记报告时插话被删掉。
- 17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7号案卷,第188张;439号案卷,第205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175 指的是政治局1929年10月5日《关于1929—1930年度粮食酒销售限额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3张)。
- 17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8页。
- 177 发言进行了重大修改。没有作者修改的稿本。
- 178 指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的信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929年2月9日的信(见本书第4卷)。
- 1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是1929年7月3—19日举行的。全会通过了《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当前的任务》提纲和《关于布哈林同志》的专门决定(见:《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886页;《补充材料2》)。
- 18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7号案卷,第204张。此处及后面的引文均出自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2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1929年)联席全会上的发言(见本书第4卷)。
- 181 隶属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主义科学院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高等教学和科学研究机关。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24日的法令建立的,称为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科学院。1925年1月12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更名为共产主义科学院,1926年3月19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交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1936年2月8日撤销,下属的所有研究所和机构均移交给苏联科学院。
- 182 指的是1929年1月21日B.И.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H.И.布哈林在会上作了《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布哈林文选》,第419—436页)。
- 183 同上,第429页。
- 18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5页。
- 185 同上,第366页。
- 186 同上,第364页。

* 指召开有积极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的会议。——编者注

- 187 引证的是列宁的著作《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二段是编辑的时候加上去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1—392页)。
- 188 斯大林的文章《大转变的一年》发表在1929年11月7日的《真理报》上。
- 189 见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苏共决议汇编》第4卷,第455—469页)。
- 190 原文如此,是个方言词,标准语是“羞愧地”。
- 19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9号案卷,第22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192 提及的是M. И 弗鲁姆金1928年6月15日给政治局的信和11月5日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里话(《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290—294、443—458页)。
- 193 见注178。
- 194 白钨矿是钨酸盐族矿物。重晶石(用现在的说法)是硫酸盐类矿物。
- 195 用基泽尔焦炭试炼生铁是1929年9月24日在下萨尔达工厂进行的(《真理报》,1929年9月25日)。
- 196 麦克唐纳工程师1929年在红色乌拉尔炼铜联合工厂建设公司系统担任采矿主任,试图运用美国普遍使用的采矿方法。他被乌拉尔炼铜联合工厂建设公司行政领导撤销了工作(《真理报》,1929年10月16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23号案卷,第3张;613号全宗,3号目录,146号案卷)。
- 197 C. C. 洛博夫的发言作了重大文字修改。
- 198 见注154。
- 199 木材出口问题讨论的结果就是A. И. 米高扬和M. Л. 鲁希莫维奇1929年11月23日为政治局会议准备的《关于扩大木材出口措施》的报告,政治局会议于1929年11月25日举行并研究了“关于保证木材出口计划的条件”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6号案卷,第3、4张;84号全宗,2号目录,12号案卷,第106—111、116—120张)。
- 200 指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1929年6月12日《关于改组林业和森林工业的决定》(《苏联经济生活》第1卷,第197—198页)。
- 201 1929年10月20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了《关于加强林业干部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88号案卷,第2张)。
- 202 由于没有政治局会议的速记记录,无法证实或者推翻M. Ф. 什基里亚托夫所引用的A. И. 李可夫的话。
- 203 指工业学院学员B. И. 沃罗比约夫1929年9月4日在工业学院联共(布)支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其次是他9月19日在支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9年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定:“把从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收到的材料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定交中央监察

- 委员会研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6张;见《补充材料4》)。
- 204 指的是以《联共(布)中央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为题的文件。在所附的1929年10月19日给政治局的报告里,А. И. 李可夫写道:“根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和政治局为阐明这些决议而通过的决定,我编写出了草案。写入决议草案的数字指令是由各位副主席与苏联人民委员会建立的控制数字和预算各个部分的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的。进行平衡时得出的这些最后数字指标,尚未经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根据前几年实行的审议控制数字的程序,我认为在政治局讨论这些问题之后,今年也就有关控制数字和预算的问题通过一个人民委员会的正式决定是正确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6号案卷,第7张)。在这个文件里有И. В. 斯大林所作的修改,在决议最后一页的反面他表明了自己对А. И. 李可夫提交的提纲(决议)的否定态度(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113号案卷,第99—121张)。政治局在自己的决定里表示同意И. В. 斯大林的立场(见本卷序言和注121)。
- 20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27,28张。
- 206 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9号案卷,第55张反面。
- 207 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讲话里所引用的那些发言和声明中的所有引语原始速记记录稿中均未记入。所引用的文件的副本在速记记录的附件中都有。引证的地方由雅罗斯拉夫斯基标出,单独印了出来,有顺序编号并分别标出插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讲话的什么地方。这样一来,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讲话经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的情况如下:(1)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39—54张);(2)印出的插入的引语(同上,第54a—61张);(3)以文件副本为形式的附件(同上,第62—87张)。
- 208 指的是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见本书第4卷)和1929年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政治局对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1929年3月27—29日声明的答复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3号案卷,第7张)。
- 209 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援引的是Н. И. 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和2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里的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62张)。
- 210 同上,第63张。
- 211 Г. Я. 索柯里尼柯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说:“我们的货币制度是以苏联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为基础而采取的渗透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货币制度”(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235页)。
- 212 在1929年2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速记记录

- 的摘录中指出,这些话是 А. И. 李可夫说的。另一个版本是:“与托洛茨基分子的通货膨胀计划相反,我们过去曾经那么关心其坚挺的我们的货币,现在已经有明显膨胀的迹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64张)。
- 213 在 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发言的速记记录的附件里,此段引语标明摘自 А. И. 李可夫 1929 年 2 月 9 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64张)。
- 214 传单没有发现。
- 215 见《补充材料3》;《布尔什维克》杂志,1929年,第13—14期,第16—34页。
- 216 指 Н. И. 布哈林、А. И. 李可夫、М. П. 托姆斯基 1929 年 2 月 9 日的信。
- 217 马克耶夫的发言是根据联共(布)莫斯科委员情报处的资料引用的。那里面有马克耶夫 1926 年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的资料。1929 年 10 月 18 日石印工人大会通过决定撤销马克耶夫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工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77—78张)。
- 218 拉佐廖诺夫,彼得·彼里索维奇,是莫斯科沃伊科夫铸铁厂的工人,1929 年 10 月 23 日就关于一长制报告的讨论在党的公开会议上发了言。第二天他递交了声明,请求把他开除出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78张)。
- 219 皮萨列夫,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是克里沃罗格专区党校的学员,1929 年 5 月 15 日党支部大会上发言反对党的路线。同年 5 月 21 日被开除出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80—82张)。
- 220 在所指的布哈林著作中没有所引证的这句话。那里面一次也没提到“集体化”这个词。在概括列宁最后一些著作的意义时,布哈林特别指出:“由此提出了要在实现农民的合作化的条件下——即用最简便易行的而不需任何暴力的方式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储蓄和提高工作质量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布哈林文选》,第435页)
- 221 苏博京,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修炉工人。他发言的日期和地点未能查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86张)。
- 222 见注 109。
- 223 雅罗斯拉夫斯基引用的是 1929 年 6 月被开除出党的梁赞伏罗希洛夫步兵学校学员 П. 科热夫尼科夫的声明,他同时也被开除学籍(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84—84张反面)。
- 224 Т. В. 萨普罗诺夫的支持者,萨普罗诺夫是“民主集中派”集团的首领之一,该集团主张在党内有自由建立派别和集团的权利,反对党在苏维埃里的领导,主张对工业企业实行集体管理。萨普罗诺夫分子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 年 12 月)开除出党。他们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同意开除(《联共(布)第十五

- 次代表大会》，第1469,1470页；《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873页）。
- 225 指联共(布)中央十一月(1928年)全会。
- 226 在政治局1929年10月30日的决定里指出：“在下一一次中央全会上提出铁路运输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1931年联共(布)中央六月全会才进行了讨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7张)。
- 22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99张;439号案卷,第212张。插话是准备速记报告时删去的。
- 228 没有经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在对登在速记报告里的发言稿和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进行比较时,发现了一些不同。是由谁和在什么时候修改的,未能确定,因为在B. M. 莫洛托夫的私人档案里有一份重新打字的发言稿,莫洛托夫在上面作了一些很小的修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104—145张;82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8—38张)。
- 22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105张。
- 230 大概指的是B. И. 列宁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引用了H. B. 乌斯特里亚洛夫发表在《路标转换》杂志上的《演化与策略》一文中的话：“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92页)。
- 231 B. A. 巴扎罗夫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苏联经济的恢复过程》,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
- 232 从修改过的发言稿里删去的这句话与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里下面的一句话是一致的：“喏,季诺维也夫当然可以到处要求百分之百的信心,并在任可条件下都有充分的保证,他对他所做的一切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但他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113张;82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15张)
- 233 莫洛托夫指的是弗鲁姆金1928年6月15日和11月5日给政治局的信。
- 234 指的是B. B. 洛米纳泽1929年11月1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声明。他在声明里承认,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和1929年6月26日在给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的信里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贫农组织”和关于党在农业方面的经济政策的其他问题的建议是“政治错误”。声明发表在1929年11月19日的《真理报》上(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36号案卷,第58—64,77—78张)。
- 235 此处及后面引证的是H. И. 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给政治局的信(见本书第4卷)。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里,在И. В. 斯大林的发言里没有对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批评。И. В. 斯大林是1926年11月1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6—257

- 页)。
- 23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127张)。
- 237 在全会上B. M. 莫洛托夫还提到了B. Я. 丘巴尔的名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129张)。
- 238 引证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通过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当前的任务》提纲(《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886页)。
- 239 根据政治局1927年12月24日的决定,Н. А. 乌格拉诺夫被派往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督查粮食收购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66号案卷,第3张)。
- 240 根据政治局1929年3月13日的决定,Н. А. 乌格拉诺夫作为政府委员会(Д. З. 列别德、И. И. 施瓦茨)的成员被派往顿巴斯调查戈尔洛夫卡“马利亚”矿的矿难(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0号案卷,第3张)。
- 241 指的是恢复1927年5月保守党政府执政时断绝的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1929年春天工党政府上台执政之后,1929年7月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建交谈判。谈判进行得相当困难,因为苏联政府要求先恢复外交关系,然后再讨论有争议的问题。1929年11月5日英国议会下院批准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 242 “关于英国”的问题1929年7月—10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二十多次。没有会议的速记记录,因此无法确定所谈的是什么分歧(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94、126、136、138、140、143、149、150、156、158、159—163、167—171、173—175、178—186张)。
- 243 根据政治局1929年8月26日的决定,М. П. 托姆斯基从1929年9月1日到10月25日在休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5号案卷,第6张)。
- 244 指被第十次全会或者随后不久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的Г. 布兰德勒和A. 埃韦特、美国的Д. 洛夫斯顿、捷克的Б. 伊列克、瑞典的K. 奇尔布姆。
- 245 见注130。
- 246 1929年10月2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呈送给И. В. 斯大林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Г. Г. 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密处处长Я. С. 阿格拉诺夫签名的通报,内有关于存放在被流放的B. В. 朗格尔住处的Л. Д. 托洛茨基档案的情报。情报是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哈萨克斯坦办事处得到的。档案被没收并运往莫斯科,其中一部分文件进行了复制并分送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阅读(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4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121—122张)。
- 247 同上,第133张。
- 248 最初K. 和П. 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被破译为康斯坦丁诺夫和潘克拉托夫,在B. M. 莫洛托夫讲话的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里就是这样说的。在全会开会的最后一天,即11月

- 17日,雅罗斯拉夫斯基讯问了在Л.Б.加米涅夫同К.和П.谈话记录里提到的Я.В.沙罗夫。在讯问的过程中弄清楚了谈话者的姓名是卡普林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9号案卷,第138张;84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189、207张;见《补充材料5》)。
- 249 Л.Б.加米涅夫是1927年12月18日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第二天,即12月19日,他和其他一些被开除的人一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根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1928年6月22日被恢复党籍(《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7期,第99页)。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的会见是1928年7月11日进行的(详见本书第4卷)。
- 250 此处和后面引证的是К.和П.与Л.Б.加米涅夫1928年9月的谈话记录,该谈话记录原保存在阿拉木图被没收的Л.Д.托洛茨基的档案里(见《补充材料5》)。
- 251 指И.В.斯大林的文章《大转变的一年——为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 25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1929年)联席全会认为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和М.П.托姆斯基的观点是与党的总路线不相容的,并解除了Н.И.布哈林在共产国际里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把布哈林开除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 253 根据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9年4月23—29日)的决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9年6月2日决定在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属下成立苏维埃机关中央清洗委员会,负责领导全联盟性机关的清洗工作。委员会主席是Я.Х.彼得斯。根据联共(布)中央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该委员会于1932年7月15日撤销。
- 254 大概是指列宁1918年3月为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写的党纲草稿,其中包括有关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在其中的一个要点里提出了吸引居民参加苏维埃组织工作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集,第67—68页)。
- 255 根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来访者接待日志的资料,Н.А.乌格拉诺夫和В.М.米哈伊洛夫是1928年10月15日被接见的。关于В.А.科托夫出席这次接见的材料没有发现。也许,说的是另外一次什么会见(《历史档案》,1994年,第6期,第15页)。
- 256 1930年2月18—28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指出,“早在第十次全会前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北美合众国的右派叛徒在工人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滑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去了。第十次全会以后瑞典共产党内形成的并且已被开除出共产国际队伍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奇尔布姆),以及统一工会运动内和法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就实行了这种演变”(《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923页)。
- 257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1928年,第9—13页。
- 258 见注110。
- 259 见注115。

- 260 见注 161。
- 261 指的是 Н. И. 布哈林、А. И. 李可夫、М. П. 托姆斯基 1929 年 2 月 9 日的信,信里有一段“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见本书第 4 卷)。
- 262 在 В. М. 莫洛托夫主持下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对“第三阶段”的定义进行了修改。按照新的解释,它表明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发展和西方革命形势的不可避免。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和社会党都被宣布为敌人。
- 263 见 Н. И. 布哈林的著作《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1929 年 1 月 21 日)和《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1928 年 9 月 30 日)(《布哈林文选》,第 391—436 页;见注 26)。
- 264 斯大林集团 1928 年 8—9 月开始的反对莫斯科党组织领导干部的运动,1928 年 11 月 26 日以政治局关于撤销 Н. А. 乌格拉诺夫的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而结束(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14 号案卷,第 5 张)。
- 265 见注 133。
- 266 见注 211。
- 267 “茨维申鲁夫”(“zwischenruf”)(德语)——插话。
- 268 见注 249。
- 26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全宗,2 号目录,429 号案卷,第 206 张。
- 270 在全会的材料里既没有未经修改的,也没有经作者修改的 И. В. 斯大林的讲话。在经过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里附有一份重新打字的稿子(第二份),И. П. 托夫斯图哈把保存在斯大林私人档案里的第一份打字稿上斯大林作的一个很小的修改也移了上去。档案里还有一份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稿,该稿发表在《补充材料 1》里。斯大林发言的原始记录是由谁编辑加工的,未能查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29 号案卷,第 222—230 张;558 号全宗,11 号目录,1113 号案卷,第 142—174 张)。
- 271 见注 27。
- 272 指 1925 年发表的 Н. И. 布哈林的著作《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布哈林文选》,第 146—230 页)。
- 273 指的是在 1925—1907 年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略的不同的观点。召回主义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独立的派别。它是 1908 年三四月间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工作总结的时候在莫斯科组织的一些区里产生的。由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决定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而独立,一些党员要求向它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服从,就将其召回并宣布抵制杜马。
- 274 1908 年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一些城市里开始形成主张保存党的秘密组织的孟什维克派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取消主义的 Г. В. 普列汉诺夫支持了他们,他在社会民主运动的许多其他问题上与孟什维克保持着共同的观点。
- 275 《新生活报》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份社会文学报纸。1917 年 4 月 18 日至 1918 年 7 月 16

- 日每天出版。正式出版人为俄国作家 A. H. 吉洪诺夫(A. 谢列布里亚科夫)。编辑有 A. M. 高尔基、B. 阿维洛夫、H. H. 苏汉诺夫、B. A. 杰斯尼茨基。表达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左翼派别的观点。在十月革命时期谴责布尔什维克搞武装起义,1917年十月之后批评苏维埃政府的活动。
- 276 见注7。
- 277 指的是刻赤冶金厂的建设,那里的第一座高炉已经投产,而第二座高炉的投产延迟了(《苏联的工业化(1929—1932)》,第123页)。
- 278 1929年7月18日政治局对有色冶金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了政治局一个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有色冶金工业生产计划规模的决议并责成把这个问题按照苏维埃程序进行审议和最后解决(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4,10—16张)。
- 279 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9年8月2日通过了《关于有色冶金工业发展前景的决定》(《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第95—102页)。
- 280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1929年)联席全会上,A. И. 李可夫援引了B. И. 列宁对Д. Б. 梁赞诺夫对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修改意见的以下看法:“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象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101页)。
- 281 1929年12月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听取了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关于中央四月(1928年)全会改善顿巴斯生活条件决议执行情况问题的汇报。为会议准备的材料里有一份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A. П. 罗森霍尔茨和部务委员会委员З. М. 别连基签名的1929年11月1日关于顿巴斯住房和社会生活条件调查结果的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801号案卷,第2,73—76张)。
- 282 1920—1922年Э. Я. 鲁祖塔克任运输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4—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
- 283 引证的是B. И. 列宁1919年5月19日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37—338页)。
- 284 马克思1865年2月13日在给И. Б. 施韦泽的信里写道:“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51页)。
- 28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24页。
- 286 Г. Н. 卡明斯基《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提纲的第一稿是1929年10月18日前准备的。讨论两次被推迟。10月24日卡明斯基准备了第二稿。他在附给政治局的报告里写道:“送上《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提纲草案的最后定稿。它与已散发稿的不同是,一些提法更确切了并作了一些不改变旧稿原则方针的篇幅不大的增补。”10月25日政治局通过决定:“为了对卡明斯基同志的提纲进行

- 预先审议,建立由卡明斯基、莫洛托夫、米高扬、雅科夫列夫、库比亚克和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纲的第三稿由政治局于1929年11月5日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7号案卷,第4—59张;729号案卷,第72—78张;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2张)。
- 287 所指的材料未能发现。
- 288 1929年11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拖拉机制造和农业机器制造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1—13张)。
- 289 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12月15日《关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措施的决定》。提出的任务是最近五年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30%—35%(《法律汇编》,1928年,第69期,第643页)。
- 290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举行。斯大林在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时指出,必须“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成大农庄。莫洛托夫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已经在一点一点地……以千百万农民的队伍向农业的集体化挺进”(《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献》,第63、1038页)。
- 291 见注288。
- 292 指的是由劳动国防委员会起草的和1929年10月5日由政治局批准的关于建立集体农庄和粮食合作社为增加拖拉机进口的专门出口储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3、13张)。
- 293 挑选25 000名产业工人去农村工作,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1929年)全会之后就立即开始了。全苏联共有7万人表示愿意到农村去。实际派去了两万七千多人(《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809页;第2卷,第8、814—815页)。
- 294 见政治局1929年11月5日《关于补充发行机器拖拉机托拉斯债券和发行普梯洛夫与斯大林格勒工厂“机器拖拉机债券”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4张)。
- 295 农业信贷体制条例是1927年1月7日通过的(《法律汇编》,1927年,第4期,第39页)。制定全联盟农业信贷计划的工作由中央农业银行负责。
- 296 亚麻大麻委员会是1929年9月在俄罗斯联邦经济会议属下建立的领导亚麻大麻发展的机构。由于同名的全联盟委员会的建立,于1930年10月撤销。
- 297 1929年4月4日政治局建立了一个由莫洛托夫领导的研究组健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管理中心的合理性问题的委员会。根据委员会的报告,1929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认为需要建立全苏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和领导中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3号案卷,第7张;738号案卷,第5张)。1929年6月×日^①苏联劳动

^① 原文为%日,具体日期不详——译者注。

- 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作为股份公司的决定。
- 298 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是联合一切类型农业合作社的非贸易领导中心。建立于1927年7月,1931年3月撤销。
- 299 全俄奶品合作社联社——是1924年在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奶品和奶油部的基础上建立的奶品合作社的生产和销售中心。全俄种麻合作社中央联社——是1922年8月在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相应的部的基础上建立的。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是1926年5月建立的,是作为从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分立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组织。
- 300 指的是政治局《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4号案卷,第7—9张)。
- 301 见注116。
- 302 “红色土壤改良者”集体农庄(下伏尔加,卡梅申区)被列入所谓冒牌集体农庄,因为它的领导班子里有富农以及其他“异己”分子。关于它的报导见1929年9月17日、10月22日的《真理报》,1929年11月6日的《农业报》。
- 303 “阿莫”的工作人员——“阿莫”即莫斯科汽车制造股份公司(现莫斯科科哈乔夫汽车厂)。
- 304 关于需要在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之下建立集体农庄建设委员会的建议包含在全会关于Г. Н. 卡明斯基报告的决议里。
- 305 可能指的是1929年4月8日建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属下的中央宗教问题常设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П. Г. 斯米多维奇,成员有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
- 306 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自1921年建立,附属于村苏维埃和乡苏维埃。
- 307 指列宁在1922年三四月间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列宁没有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高速度(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7—133页)。
- 308 编外副教授是革命前俄国的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学校编外教师的学衔,一般让他们讲授所谓非必修课程。此处指的是Н. И. 布哈林的支持者,他们中间有些人在高等学校任教(见注116)。
- 309 大概是指《苏联农村的集体化——1928年和1929年普查的初步结果》一书,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29年。
- 310 在К. Е. 伏罗希洛夫1929年6月8日给Г. К. 奥尔忠尼启则的信里有关于建议М. П. 托姆斯基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工作的信息(参见:《斯大林致莫斯科的信》,第123页)。大概彼得罗夫斯基提到的是1929年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

- 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4号案卷,第3张)。
- 311 H. M. 安采洛维奇对自己的发言稿作了一处不改变发言实质的文字修改。
- 312 关于“阿斯特拉罕案件”,见注158。1928年5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听取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斯摩棱斯克党组织的工作的报告。省委的活动受到激烈的批评。5月31日Я. А. 雅科夫列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政治局批准了省委新班子所进行的逮捕并将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共产党员交付法庭审判。认为有必要在斯摩棱斯克党的、共青团的和工会的组织里准备提前改选。建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重新审议关于把斯摩棱斯克党组织的领导人开除出党的问题。1928年6月1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把省委前书记Д. А. 帕夫柳琴科和几名前省委委员开除出联共(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22号案卷,第1、8—12张;3号目录,689号案卷,第3张;613号全宗,1号目录,78号案卷,第102张)。
- 313 清党是根据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决定从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进行的。被开除出联共(布)的有99 610人,或者经历清党的人的7.8%。被开除数量最多的是非无产阶级分子(《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卷下册(1929—1937),莫斯科,1971年,第35页)。
- 314 见注53。
- 315 根据政治局1929年9月5日和20日的决定,H. M. 安采洛维奇和С. Е. 丘茨卡耶夫被派往克里米亚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和帮助地方组织加快粮食收购的速度(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6号案卷,第7张;759号案卷,第13张)。
- 316 指的是1929年夏天和秋天在乌克兰南部和其他地区农场里雇农的罢工。乌共(布)中央在专门通过的关于雇农罢工的决定里指出,这些罢工促进了雇农物质状况的改善,是工人阶级和贫农向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向富农进攻的表现。中央建议农村党组织、农林工作者联合会和贫农委员会加强对雇农反对富农运动的领导(参见:《乌克兰共产党简史》,基辅,1977年,第419页)。
- 317 插棋——几户共同耕作。
- 318 指的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9年10月26日通过的《关于大量吸收雇农参加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实际措施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89号案卷,第16张)。
- 319 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9月,名称是全俄农业和林业工作者职业联合会,1926年1月改名为苏联农业和林业工人工会。
- 320 《集体农庄庄员》——群众性集体农庄刊物,1925年至1933年出版,是俄罗斯联邦和苏联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而后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每月出版两期。
- 321 指的是政治局1929年7月18日《关于中央全会对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农村工作报告决

- 议执行情况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同意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关于不宜接受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和必须不断进行工作把企图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清除出集体农庄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31张）。
- 322 1929年П. Н. 施泰因贝格出版了以下几本书：《个体经济还是集体农庄》、《农业的金科玉律》、《共产党员应当如何经营自己的产业——农村共产党员在自己和邻家产业经营中的实际任务》。指的是所列举的哪一本书，无法确定。
- 32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1号案卷，第169页。
- 324 国债作为吸收居民货币收入的手段是筹措工业资金的重要来源。首批工业化公债是1927年发行的，以后年年发行。认购公债表面上认为是自愿的，实际上是强制进行的。关于配售第三批总额7.5亿卢布十年期工业化公债的决定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9年7月24日通过的（《法律汇编》，1929年，第49期，第442页）。
- 325 在政治局1929年7月18日《关于中央全会对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农村工作报告决议执行情况的决定》里写道：“认为某些村庄编制生产经营计划的做法是适宜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29张）。
- 326 动员共产党员到运输部门工作是俄共（布）中央1920年1月宣布的。派往运输部门的大约有900名领导干部。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号召，动员5000名共产党员去运输部门工作。动员进行到1920年7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通过了一项动员10%的代表到运输部门去的专门决定。根据党内的统计资料，共向运输部门，向机务段、铁路工厂、枢纽站派遣了将近6000名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历史》第3卷下册，莫斯科，1968年，第393—394页）。
- 327 指斯大林的文章《大转变的一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 328 指的是政治局1929年7月18日通过的关于棉花总委员的报告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副报告的决议。接着列举的是这个决议里的一些指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18、20张）。
- 329 指乌兹别克斯坦，А. И. 伊克拉莫夫自1929年在那里担任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330 见注309。
- 331 月锄——中亚的一种类似锄头的农具。
- 332 木犁——中亚的一种古老的耕具。
- 333 见《关于卡明斯基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的决议》。
- 334 指的是А. И. 李可夫在本次全会上的发言及发言中与Н. И. 布哈林和М. П. 托姆斯基联署的声明。
- 335 提法没有改变。
- 336 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9年4月29日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决议》里提出了加强地政机关工作的任务（《苏共决议汇编》第4卷，第468

- 页)。
- 337 1929年11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B.皮埃尔署名的文章《坚决修改土地规划计划》。
- 338 陈述的是H.И.布哈林著作《走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里的一些论点(《布哈林文选》,第182—183页)。
- 339 在1929年9月23日政治会议对B.П.舍博尔达耶夫和M. A.特里利谢尔通报的单独记录里记有下列决定:“鉴于在下伏尔加破获了社会革命党——富农的暴动组织,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消除,枪决该组织的50名领导人,特别是其中的大富农、基于军官和被遣送回国者。在报上发表对该组织最著名的一批贵族—富农—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被判处枪决的相关通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158张)。在政治局1929年10月3日发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指示里指出:“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司法人民委员部对那些对党和苏维埃干部组织恐怖袭击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如在下伏尔加建立富农和基于军官暴动组织的富农,采取果断而迅速的措施进行镇压,直至枪决。”(《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714页)。1929年11月5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关于霍皮奥尔案件。枪决在霍皮奥尔区逮捕的164人中的60人(其中有40名军官),其他人在集中营关押十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8号案卷,第3张)。
- 340 见注302。
- 341 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开办的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培训班,但这类培训班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仍在继续开办。
- 342 见本次全会《关于卡明斯基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的决议》第六点。
- 343 莫洛托夫1927年12月6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但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支持农村集体农庄建设的这种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之所以缺乏,首先是因为对它很不了解。”(《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209页)。
- 344 《苏联农村的集体化》一书1929年出了两版(见注309)。第二版的名称是《苏联农村的集体化——1928年和1929年集体农庄普查的初步结果》,A.盖斯特主编,苏联中央统计局,农业统计处,莫斯科,1929年。
- 34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1号案卷,第255张;440号案卷,第197—198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346 第一交响乐团——莫斯科苏维埃第一交响乐团,是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团。存在于1922—1932年,组织者是Л. М. 蔡特林。
- 347 М. Ф. 弗拉基米尔斯基是根据政治局1929年9月20日的决定被派往西部州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9号案卷,第13张)。

- 348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是苏联最高农业科研机关。关于建立该院的决定是政治局 1929 年 5 月 16 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40 号案卷,第 3 张)。
- 349 见注 343。
- 350 在全会的材料里有 M. H. 别连基发言的两份速记记录。一份上有作者作的修改,只是在准备速记报告时被部分考虑到了。第二份未经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有 M. H. 别连基的签字,于是就这样收入了速记报告。它的风格和实质都与原始速记记录不同。含义上的不同由速记报告的编者作了说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33 号案卷,第 2—16,17—34 张)。
- 351 1928 年 11 月敖德萨专区别廖佐夫卡区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建立的拖拉机队被改为全国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
- 352 所指的政治局的决定是分别于 1929 年 6 月 27 日和 8 月 26 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46 号案卷,第 7—9 张;755 号案卷,第 21—23 张)。
- 353 没有 B. M. 莫洛托夫讲话的原始速记记录。只有一份重新打字的文本,作者在上面作了很小的修改,这个文本与速记报告的文本是一致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33 号案卷,第 35—39 张;82 号全宗,2 号目录,41 号案卷,第 40—64 张)。
- 35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24 页。
- 355 1929 年 9 月 5 日政治局批准了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团的组成人员:B. M. 莫洛托夫为主席,H. A. 库比亚克、A. И. 米高扬为副主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56 号案卷,第 7 张)。
- 356 见注 72。
- 357 指的是政治局《关于拖拉机制造和农业机器制造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65 号案卷,第 11—13 张)。
- 358 见全会关于 Г. H. 卡明斯基报告的决议。
- 359 此处为信贷组织。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1928 年 10 月 8 日研究了关于农业信贷系统的问题。在提交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农业信贷系统包括以下环节:1. 以股份银行形式组成的国家环节:中央农业银行、6 个共和国农业银行及其 12 个分行和 69 个农业信贷公司及其 94 个分公司(共有 181 个银行业务单位);2. 合作社环节:有 49 个农业信用合作社(俄罗斯联邦 31 个,乌克兰 18 个)和 8 453 个农业信用社,它们构成农业信贷系统的基层网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13 号目录,666 号案卷,第 12 张)。
- 360 指的是政治局的两个决定,1929 年 6 月 27 日的《关于农业合作的组织机构的决定》和 8 月 26 日的《关于粮食作物预购合同制的基本总结和当前的任务的决定》(俄罗斯国家

- 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6号案卷,第7—9张;755号案卷,第21—23张)。
- 361 引证得不准确。在《论合作社》一文里列宁写道:“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2页)。
- 362 指服役期满的军人从红军队伍复员。
- 36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8页。
- 364 指的是苏联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9年7月21日《关于加强集体农庄制度的措施的决定》,决定规定集体农庄联合社和集体农庄协会(共和国的、边疆区的、州的和专区的)业务经营活动的权利(《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第76—78页)。
- 365 准确的名称是区粮食农业合作社联社,为初级合作社(粮食农业合作社)的基层联合组织,它们加入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系统,又参加专业的或地区的粮食农业合作社联社。
- 366 见关于Г. Н. 卡明斯基报告的决议第9点。在卡明斯基为自己报告准备的提纲里,关于集体农庄系统与各专业农业合作社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论点没有改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2号案卷,第61张反面,第62张)。
- 367 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会议是1928年12月举行的。
- 36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2号案卷,第60张。
- 369 指舍甫琴柯国营农场的机器拖拉机站(1928年11月)和北高加索“小村”国营农场的机器拖拉机站(1929年2月)。
- 370 机器拖拉机站会议是1929年9月举行的。为了对会议实行党的领导,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以H. A. 库比亚克同志为主席的委员会,但委员会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联共(布)中央组织局1929年9月9日在决定里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中央为领导机器拖拉机站会议成立的委员会没有进行工作,没有领导这次会议,是不对的。认为:拉齐斯同志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没有向中央的书记们通报会议的情况,没有提出必须召开会议领导委员会的会议,是不对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525号案卷,第91张;526号案卷,第1张)。
- 371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198—1199页。
- 372 指农业经济学家A. B. 恰亚诺夫提出的农民农业经济“合作集体化”的观点,他后来被宣布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敌人,小农经济的辩护士。1930年因所谓的“劳动农民党”案件被逮捕。1987年平反(《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6期,第210页)。

- 373 《真理报》，1928年5月16日。标题是《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农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务)——致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中央各局、联共(布)各边疆区委、州委、省委、地委和县委》。
- 374 原计划在1929年四月全会上听取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但后来决定推迟至下一次全会听取(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9号案卷，第16张)。
- 375 1921年在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附近地区、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草原区的广大地区旱灾毁掉了全部庄稼。1922年春初，这些地区有将近2200万人挨饿。到1922年5月在歉收地区大约有100万人饿死；流浪儿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几乎200万儿童成了孤儿。为了救济饥民成立了专门机构。国际组织给了俄国大量资金。红十字会、宗教团体、美国救济总署给俄国运来了2200万普特粮食。
- 376 C. B. 柯秀尔报告的材料大概发给了全会的参加者，但这些材料未能发现。
- 377 指的是1918年4月—12月乌克兰盖特曼 П. П. 斯科罗帕茨基的政权。彼得留拉匪帮是由1917年中央拉达和1918年内阁执政的组织者之一，并自1919年起为内阁执政首脑的乌克兰政治家 C. B. 彼得留拉的姓氏而来。在苏波战争期间他站在波兰一边。1920年流亡国外。
- 378 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3号案卷，第95、96张；440号案卷，第32、202张。C. B. 柯秀尔和 M. И 加里宁的插话是编委会删去的。A. И. 米高扬和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的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379 乌克兰是11月5日发布粮食收购运动结束并于1929年11月1日前年度粮食统购计划完成106.6%的(《真理报》，1929年11月6日)。
- 380 指 H. И. 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给政治局的信。
- 381 政治局于1928年9月19日根据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讨论了秋播运动的情况。认为秋播运动的进展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向地方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秋播运动的指示》，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加紧开展秋播运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8号案卷，第2、7张；759号案卷，第14张；《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699、700页)。”
- 38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40号案卷，第205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383 1928年秋季前，国家收购价格提高得很少。私商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粮食，因此商品粮的主要拥有者对收购条件不满，或者把粮食卖给私商，或者暂时保存起来。一些地方已经暂时停止烤面包。由于粮食缺乏，国家已经停止向居民出售面粉。由于缺乏饲料，农民试图把粮食储存起来充作牲口饲料。全国流传开了关于饥荒和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详见：E. 奥索金娜著《在“斯大林式富足”的背后》，莫斯科，1997年，第60、61页)。
- 38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3号案卷，第104张。是准备

- 速记报告时删去的。关于乌克兰的行政边界问题,苏联和乌克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0 世纪 20 年代不止一次地进行过讨论。例如,见 Л. М. 卡冈诺维奇 1928 年 4 月、5 月给 И. В. 斯大林的信,信里请求因中央黑土地带州的区域划分把库尔斯克省和沃罗涅日省乌克兰居民占多数的那些县交给乌克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1 号全宗,3 号目录,120 号案卷,第 57、60 张)。
- 38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33 号案卷,第 105 张。
- 386 见注 289。
- 387 见注 351。
- 388 1929 年 11 月 14 日《真理报》刊登简讯说,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管理委员会 1929—1930 年度计划里预定建设 102 个机器拖拉机站。
- 389 大概指的是根据政治局 1928 年 9 月 13 日的决定建立的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 И. В. 柯秀尔、А. П. 罗森霍尔茨、И. И. 列普谢及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一名代表。1929 年 5 月 31 日,根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请求,И. В. 柯秀尔由 В. Н. 克桑德罗夫代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04 号案卷,第 3 张;743 号案卷,第 6 张)。
- 390 急转弯——转义为把戏,突然的转变。
- 391 在全会前印行的材料里只有关于 С. В. 柯秀尔报告的决议草案。柯秀尔引用的数字材料里没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729 号案卷,第 59—62 张)。
- 392 见注 321。
- 393 指的是 С. А. 叶夫列莫夫,他是学法律的,自 1919 年 1 月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24—1928 年为乌克兰科学院管理局主席。1930 年因捏造的“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件被判处枪决,后改为十年徒刑。死在狱中(见:В. И. 普里斯泰科、Ю. И. 沙波瓦尔著《“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件》,基辅,1995 年)。
- 394 见注 60。
- 395 见注 313。
- 396 乌克兰国营农场联合公司 1930 年上半年取消。
- 397 大概是指 А. Г. 施利希特尔作为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 1929 年 5 月在第十一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398 А. 施利希特尔:《最重要的任务》(《真理报》,1929 年 11 月 16 日)。
- 399 土地社是农户的用地联合体。其活动的法律规范是由 1922 年俄罗斯联邦的土地法典、1926 年的《土地社标准章程》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届第四次会议 1928 年 12 月 15 日通过的《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的共同原则》确定的。土地社实际上是村社。在 1927—1929 年期间曾实行了一些旨在使土地社服从于村苏维埃的措施(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55、56、435—441 页;第 2 卷,第 813 页)。

- 40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3号案卷,第171张。插话是准备速记报告时删去的。
- 401 关于加强制糖工业原料基地的问题1929年9月曾经三次提到政治局讨论,但没有通过任何决定。9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只有在对苏维埃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再提出讨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6号案卷,第6张;758号案卷,第2张;759号案卷,第3张)。
- 1929年11月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制糖工业原料基地的现状和发展的决定》(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P-5446号全宗,1号目录,51号案卷,第7—13张)。
- 402 1928—1929年苏联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主席是И. А. 阿达莫维奇,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领导是М. И. 卡尔马诺维奇。
- 403 在联共(布)中央1928年1月5日和14日关于粮食收购的指示里没有这句话(《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136,147页)。
- 404 引证的是列宁的著作《论合作社》。引文的开头是:“在我国现存制度下……”(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6页)。
- 405 1929年10月5日政治局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集体农庄和粮食农业合作社为增加拖拉机进口而建立专门的出口储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13张)。
- 406 Н. А. 库比亚克1928—1931年是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 407 指的是组织局1929年5月17日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书记А. И. 伊克拉莫夫报告的决议草案。草案于1929年5月25日由政治局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30号案卷,第3,131—173张;3号目录,742号案卷,第7,11—15张)。
- 408 全乌克兰家禽产品销售和出口合作公司是乌克兰养禽合作社管理中心。
- 409 1929年4月11日政治局通过了加强老国营农场的决定。决定表扬了乌克兰国营农场联合公司、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的国营农场,国营俄罗斯农业辛迪加的部分国营农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34号案卷,第13张—13张背面)。
- 410 指的是1921年10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213号案卷,第6张)。
- 411 悬吊式滑车——起重机械。
- 412 大概指的是由内外贸易、农业、财政各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并在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之下运作的许可证会议。
- 413 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12月15日《关于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的共同原则的决定》(见《农业的集体化》,第96—108页)。
- 414 自主教会的教徒,自主教会是正教中行政上独立于其他教会的教会。

- 415 (乌克兰语)蔚蓝色的。
- 416 根据政治局 1929 年 11 月 28 日的决定,关于 C. B. 柯秀尔报告的决议的最后定稿交给由 Л. М. 卡冈诺维奇、Г. К. 奥尔忠尼启则、Я. Э. 鲁祖塔克、Я. А. 雅科夫列夫组成的委员会进行。1929 年 11 月 29 日决议发表在《真理报》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67 号案卷,第 8 张)。
- 417 莫洛托夫修改过的报告的速记记录在他的私人档案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 号全宗,2 号目录,41 号案卷,第 66—76 张)。
- 418 见:《苏共决议汇编》第 3 卷,第 86 页。
- 419 决议草案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729 号案卷,第 63、64 张。
- 420 见注 22。
- 421 《农业报》是日报,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机关报。自 1929 年 3 月 1 日在莫斯科出版。自 1930 年 1 月成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机关报,以《社会主义农业报》的名称出版。
- 422 指的是 1929 年 10 月 30 日发表在《农业报》上的 А. Г. 施利希特尔的文章《是计划机关,而不是业务机关》。
- 423 俄罗斯联邦在那些年代没有共和国的共产党。
- 424 关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人员问题 1929 年 11 月 25 日和 12 月 15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Я. А. 雅科夫列夫被批准为人民委员,Г. Ф. 格林科、М. И. 卡尔马诺维奇、И. Е. 克利缅科、Н. И. 叶若夫为副人民委员;М. С. 戈连多、И. Е. 科罗斯托舍夫斯基、С. С. 奥金佐夫、Н. И. 瓦维洛夫、Г. Н. 卡明斯基为部务委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66 号案卷,第 6 张;768 号案卷,第 4 张)。
- 425 在速记记录里没有经作者修改的 Н. А. 斯克雷普尼克和 А. Г. 施利希特尔的发言稿。他们的发言是谁修改的,无法确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433 号案卷,第 1 张)。
- 426 1922 年 12 月 30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联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选举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1924 年初进行了宪法的起草工作。草案的准备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3 年 1 月建立的制宪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以斯大林为主席的委员会进行。俄共(布)中央全会 1923 年 6 月批准了宪法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99 号案卷,第 1—3 张)。1924 年 1 月 31 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宪法。
- 427 经作者修改的发言速记记录,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 号全宗,2 号目录,41 号案卷,第 73—76 张。
- 428 莫洛托夫引证的是为全会印行的材料中《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729 号案卷,第 64 张)。

- 429 见:《农业报》,1929年11月5日,A.卡克滕的文章《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应该是怎样的》。
- 430 指土地计划机关。
- 431 没有经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稿。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与速记报告里刊登的文稿相比较,发现有差异,但是是谁修改的——是卡冈诺维奇,他的助手还是编辑委员会——无法确定。在Л.М.卡冈诺维奇的私人档案里有一份重新打字的报告稿,作者在上面作了很小的修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6号案卷,第3—91张;81号全宗,3号目录,19号案卷,第1—153张)。
- 432 政治局技术干部培养问题委员会是1929年8月21日建立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4号案卷,第7张)。后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变化。
- 433 Л.М.卡冈诺维奇《关于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培养技术干部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报告》提纲由政治局1929年10月18日的决定批准。最后定稿委托Л.М.卡冈诺维奇、Н.И.布哈林、В.М.莫洛托夫进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9号案卷,第35张)。
- 434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杂志,自1843年在伦敦出版。
- 435 《The 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后来的《卫报》,是一份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是英国影响最大和发行最广的报纸之一。自1821年起出版。
- 436 见:《苏联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第2卷下册,莫斯科,1929年。
- 437 在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里引用了美国、德国和苏联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数量的资料。在美国,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分别为7500和2000;在德国分别为6000和3000;在苏联为5239和4000(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6号案卷,第16、17张)。
- 438 可能指的是С.П.梅德韦多夫斯基。
- 439 В.М.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上作了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的报告。
- 440 Н.И.彼德沃伊斯基为主席的委员会是为了检查1928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的决定》的执行情况而建立的。委员会六个月工作的成果在彼德沃伊斯基1929年10月2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里得到了反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5号全宗,27号目录,361号案卷,第3张背面—第4张;《真理报》,1929年9月12日)。
- 441 在速记记录里没有政治局决定的文稿。政治局决定的准确名称是《关于技术和农业教育的拨款和关于改善学生的物质状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3号案卷,第4—5张)。
- 442 1929年11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大学生住房的决定》,决定里有Л.М.卡冈诺维奇提到的拨款数字。问题是斯大林提交政治局审议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

- 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张)。
- 443 “克伦斯基风气”来自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成立的临时政府首脑A. Ф. 克伦斯基的姓氏。此处的意思是无组织性、不遵守纪律和内部秩序。
- 444 苏联西部商会是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决定于1927年9月23日通过改组西北商会而成立的。1928年商会的活动由列宁格勒转移到了莫斯科。除了进行外贸业务之外,它的任务还有保证苏联参加国际博览会、展览会,给在苏联的外国公民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和把苏联的发明推向国外(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69号目录,626号案卷,第21、23、28张)。
- 445 埃普顿·辛克莱——美国作家,自1903年参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鹅步》是作家总标题为《死手》的系列政论书籍之一,以抨击文的形式批评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446 《红色大学生》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月刊。自1925年5月作为无产阶级大学生中央局和莫斯科局的机关刊物以《红色青年》名称出版。1925年11月改名为《红色大学生》。
- 447 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6号案卷,第43、44张。
- 448 列宁1921年9月3日致H. П. 戈尔布诺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274页)。
- 449 《探照灯》是文艺和讽刺画报。1923—1931、1933—1935年作为《真理报》的附刊在莫斯科出版。
- 450 1929年11月13日《工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作者署名)《速度的冲突。他们是怎样迎接外国专家的。把墨守成规者的手脚束缚起来》。
- 451 “Шталъгельм”(“Stahlhelm”)——“钢盔团”——德国的半军事组织。建立于1918年11月。自1929年起与国家社会主义组织联合。自1934年改组为国家社会主义士兵协会。
- 452 这个问题1929年5月6日和6月16日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讨论过。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决定里规定建立统一的科学和技术书籍出版社(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847号案卷,第1、2张;860号案卷,第3、19—21张)。
- 453 1929年7月2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保证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入校生社会成分的整套措施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59号案卷,第1张)。
- 454 为贯彻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的决议,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8年7月20日决定在1928年9月1前完成招收“1000人”到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工作。1928年9月14日所做的工作受到了赞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39号案卷,第4张;658号案卷,第2张)。
- 455 到1929年苏联的学校教育形成了以下体制。初等学校(1—4年级),中等学校(5—7年级或者5—9年级)。还有青年农民学校——在初等学校基础上再学三年;工厂七年

- 制学校;在初等学校基础上学制3—4年的工厂艺徒学校。
- 456 工人速成班——学制三年的普通教育学校;自1919年附设于国家的各大高等学校,目的是加速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和农民上高等学校。1940年取消。
- 457 农民速成班——类似工人速成班的农村青年学校。
- 458 大概是指1929年2月15—2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联邦州和边疆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M. H. 波克罗夫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教育制度的报告(《真理报》,1929年2月22日)。
- 459 无产阶级大学生——大学生的工会组织,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下工作的无产阶级大学生中央局的下属组织,自1930年起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个部。
- 46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6号案卷,第51张。
- 461 全苏国营黄金工业股份公司成立于1927年。拥有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全部国营黄金工业,自1928年拥有苏联的全部白金工业。
- 462 1929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对共产党员一国民经济熟练专家进行统计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利用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材料对工程师、农艺师、技术员等进行了统计(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61号案卷,第1张;《真理报》,1929年11月15日)。
- 463 卡冈诺维奇引证的是列宁1919年12月8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组织小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409—410页)。在《列宁全集》第一版里,与新版全集相比,文字略有差异。
- 464 在政治局1929年7月18日《关于棉花总委员会的工作的决定》里,在其他措施之中提出了在中亚建立培养植棉业专家的专门高等学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9号案卷,第24张)。
- 46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6号案卷,第59、60张。
- 466 Н. И. 布哈林于1929年5月30日被任命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科技局)局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42号案卷,第5张)。
- 科技局是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命令于1926年9月4日建立的,取代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原有的科学技术处。
- 布哈林的提纲名称是《关于工业管理体制和科学技术局的改组》。提纲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并发表在1929年10月12日的《工商报》上,署名“科技局局务委员会主席团”。
- 467 波格丹诺夫主义——由A. A. 波格丹诺夫的姓氏而来,他是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经验一元论”、“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哲学奠基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波格丹诺夫活动的一切主要方面都遭到了列宁及其支持者的激烈批判。在波格丹诺夫的《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提纲里(1921年4月),——该提纲成为他一系列公开讲话的基础,——有这样一个定义:“……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国家官吏和技术知识分

- 子,这个社会集团本质上是个阶级(它在生产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但就其意识和组织来说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无名的波格丹诺夫:《A. A. 波格丹诺夫(马利诺夫斯基)·论文、报告、书信和回忆·1901—1928年》第1卷,莫斯科,1995年,第93页)。
- 468 自1929年5月到11月,波尔坚科事件的问题不止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5号案卷,第4张;756号案卷,第5张;762号案卷,第6张;764号案卷,第1张;765号案卷,第5张;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85、143张)。
- 469 卡冈诺维奇引证的是列宁1921年9月3日致H. II. 戈尔布诺夫的信。1921年11月劳动国防委员会委托B. A. 阿瓦涅索夫和Д. И. 库尔斯基调查“尼特维斯和霍尔姆”工厂的停产事件。1922年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了结论,结论里陈述了对工厂涡轮车间停车事件肇事人追究责任的措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273页)。
- 470 根据政治局1929年9月5日《关于整顿生产管理和实行一长制的措施》的决定,对管理机关(厂长)的命令和指示,“无论下级管理机关还是工人”都必须执行,“不论他们在党、工会和其他组织里担任什么职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6号案卷,第10张)。
- 47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1号全宗,3号目录,19号案卷,第46张。
- 472 同上,第49a张。报告的这一部分卡冈诺维奇在全会上讲了,但未收入速记报告。
- 473 准确的名称是步枪和机关枪托拉斯。
- 47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6号案卷,第79张。
- 475 同上,第80张。
- 476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建设问题是1929年11月5日最后决定的,而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批准K. П. 洛温为建设工程主任,他后来成为工厂的厂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1—13张;766号案卷,第9张)。
- 477 Я. И. 扎克斯——全俄有限合作公司毛皮部主任,非党员,自1924年驻国外。1929年5月拒绝返回苏联。
- 478 姓名说得不对。指的是巴黎贸易代表处毛皮原料部的工作人员И. М. 拜京。1929年9月他拒绝返回苏联并转到过去有业务关系的一家巴黎公司去工作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113、120张反面、150张)。
- 479 克莱因伯格——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处毛皮部的工作人员。被控贪污受贿,叛逃分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110、121张)。
- 480 Э. Я. 采列尔,1918年入党的党员,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处电影摄影部主任,同时兼任“俄德电影发行股份公司”苏方经理。被控私吞拨给生产(拷贝)影片的部分资金。与采列尔在一个部里担任顾问的M. И. 罗宁,是1921年入党的党员,也拒绝返回苏联(俄

- 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91—92张;36号目录,118号案卷,第49张)。
- 48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1页。
- 482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机关里有领导苏维埃驻外机关党组织的专门机构。1922年在组织指导部里成立了国外支部局,1934年在党的领导机关部里成立了超地区党组织处,自1937年年底成立了中央办公厅驻外干部处。
- 483 拒绝从国外返回苏联的苏联工作人员的人数说法不一(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110—113张;36号目录,118号案卷,第44—48张;84号全宗,2号目录,12号案卷,第91张;《历史问题》,2000年,第1期,第46—63页)。
- 484 此处和后面B. A. 罗伊津曼利用了自己关于对苏联驻法国组织审查结果的报告中的资料。报告于1929年11月3日上交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Г. К. 奥尔忠尼启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120—123张)。
- 485 《最近新闻报》——流亡者的日报。自1920年4月至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报纸的编辑是П. Н. 米留可夫。
- 486 A. A. 伊格纳季耶夫——俄国军事外交家。1924年第一个苏联大使馆来到法国之后,他把文件和数额相当大的公款交给了使馆的代表。他被接受加入苏联国籍并到苏联商务代表处工作。1937年他迁到莫斯科。自1943年起为中将。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芭蕾舞演员H. B. 特鲁哈诺娃(A. A. 伊格纳季耶夫著:《服役五十年》,莫斯科,1959年,第410、562页)。
- 487 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有12个研究所和2个科学院,存在于1923年至1930年。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的任务是组织科学研究,培养科研人员,普及社会科学知识。
- 488 见政治局1929年11月5日《关于拖拉机制造和农业机器制造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11张)。
- 48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5号案卷,第31张。
- 490 斯大林诺市(乌克兰)斯大林冶金工厂。
- 491 “红色索尔莫沃”工厂,即索尔莫沃机械厂。
- 492 《商业周刊》杂志的引文是作者修改时加上去的,但大概在全会引用的篇幅更长,因为从加进速记记录的文字里删去了下面的话:“你们看到,在这里他们谈论的是约瑟夫·斯大林,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同志在一切方面都是主要的。在这方面精心帮助他们的是反对派,直到托洛茨基的那些文章,斯大林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5号案卷,第32张)。
- 493 指斯大林1926年的列宁格勒之行。4月12日他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全会上作了

- 关于联共(布)中央四月(1926年)全会工作的报告,4月13日给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作了《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在报告里说:“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6页)。
- 494 Г. С. 莫罗兹被派往柏林去检查商务代表处的工作。1929年10月20日他给 А. И. 米高扬发了一份“必须在1930年2月1日前调回的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的名单”。名单上有102人,并标明了他们的职务和是否党员。同时莫罗兹写了一份《柏林商务代表处的情况》的公务报告,他在自己的发言里利用了这份报告里的一些数字和事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96号案卷,第91—99、100—102张)。
- 495 指1929年11月8—10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613号全宗,1号目录,77号案卷)。
- 496 А. С. 布勃诺夫由政治局1929年7月29日的决定批准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1号案卷,第3张)。
- 497 引证不准确。Ф. 恩格斯1891年10月在伦敦在给倍倍尔的信里写了以下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187页)。
- 498 罗亭——И. С. 屠格涅夫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 499 见注470。
- 500 1929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63号案卷,第2、6—7张)。发表在1929年11月5日的《真理报》上。
- 501 作者对发言的速记记录作了相当大的文字修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5号案卷,第72—78张)。
- 502 见注455。
- 503 关于在列宁格勒、巴库、乌克兰建立工业学院分院的决定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的。在1929年9月13日的决定里提出了若干改进培养考入工业学院学生的措施,提出了需要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组织生产实习的问题。
- 504 党员最高月工资——对共产党员工资的限制是根据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的决定于1922年8月实行的。工资超过规定水平的共产党员必须向共产党员互助基金交纳一定的比例。交纳的数额由各省党委规定。自1929年12月1日起,确定了根据所得工资交纳每月党费的统一办法。党员最高月工资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于1932年2月8日正式取消(《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7期,第147页)。

- 505 1920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了苏维埃、党和工会机关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表。他们工资的最高水平是在与高级熟练工人工资同等的基础上确定的。管理机关的平均工资与工人的平均工资取齐。
- 50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9号案卷,第55张。插话是作者删去的。
- 507 在全会上发言的Д. А. 彼得罗夫斯基由政治局1929年8月26日的决定批准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局长,而1929年9月12日被吸收参加为全会关于技术干部问题作准备的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5号案卷,第6张;757号案卷,第8张)。
- 508 见注464。
- 509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机械学院。
- 510 在政治局1929年12月5日根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起草的草案通过的《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里,特别指出:“……必须取消各总局并在辛迪加的基础上建立实行经济核算的领导各个工业部门的组织(效法纺织工业所做的那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7号案卷,第30张)。
- 511 生产会议——该企业或者机关职工讨论生产问题和研究从技术上改进生产的建议的会议。1929年7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生产会议的工作和利用职工的首创精神改进生产的措施的决定》。委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布决定实施细则,但从А. 3. 戈尔茨曼的发言来看,这样的细则并未制定。
- 512 外国专家离开苏联的原因各不相同,最常见的是劳动组织和生活条件不好,工资低(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20号目录,33号,35号,38号案卷)。
- 513 Was ist das(德语)——这是什么?
- 514 苏联第三次高等化学教育问题会议是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民经济化学委员会召开的。于1929年11月11、12日举行,会议讨论了技术院校管理总局和职业教育总局关于高等化学院校改革的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29年11月11、12日)。
- 515 根据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的决定》,六所高等技术学校和五所中等技术学校移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两所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辖。
- 516 全苏纺织辛迪加是1922年为协调各纺织工业国营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贸易、采购和财务活动而建立的。1928—1929年度成立了全苏纺织工业联合公司,纺织辛迪加同其他最大的纺织工业企业和纺织品贸易股份公司都加入了该联合公司。
- 517 在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的决定》里指出:“自1928年起,要建立若干新型的高等技术学校,特别是紧缺专业(如建筑业等)的高等技

- 术学校,学习期限定为3—4年”。
- 518 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通过了关于选拔卓越的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担任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者的决定。
- 519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的信的题目的是:《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公开信》(《真理报》,1929年11月3日)。
- 520 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最高科研机关。建立于1725年。
共产主义科学院——见注181。
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机构、艺术科学部门、博物馆和环保机关管理总局,成立于1922年。
科学技术局——见注466。
- 521 见注348。
- 522 C. И. 瑟尔佐夫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未被考虑。
- 523 见注440。
- 524 C. И. 瑟尔佐夫宣读的决议草案的这一段以另外的措辞被采纳。
- 525 1929年8月21日政治局建立了一个“为中央全会研究培养技术干部问题”的委员会,Л. М. 卡冈诺维奇是委员会主席,Г. И. 温伯格是委员会的成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54号案卷,第7张)。
- 526 无论在决议草案里还是在决议最终方案里都向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 527 联共(布)中央七月(1928年)全会通过了关于派遣1000名共产党员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决定。中央组织局1929年8月27日和9月10日的决定规定,除了国家助学金之外,用工业和运输业为工业技术教育的需要上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提成部分给他们发放补充助学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51号案卷,第17张;656号案卷,第3张)。
- 528 没有作者修改过的速记记录稿。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与收入速记报告的文稿相比,表明修改不大。在作者修改过的速记记录稿里夹有一份大概是Л. М. 卡冈诺维奇秘书处重新打字的文稿。
- 529 指K. B.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1929年2月他被选为高等教育和科研干部培养问题中央理事会的书记。组织局1929年6月26日的决定责成以B. П. 米柳亭为主席,K. B.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为成员的专门委员会“根据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五年计划”,在五个月期限内制订出培养苏联科研干部的计划(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45号案卷,第78张反面)。
- 530 Я. Ф. 卡甘-沙布沙伊曾领导电机制造学院(实行上是中专),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学院按照速成的和最接近于生产的教学大纲培养专家。学制为2—2.5年。在一个学习周期间,学生四天进行实习,两天在学院里学习。1928年7月2日政治局委托苏联人民

委员会研究把学院改名为高等技术学校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5号案卷,第1张)。1929年10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1929年10月5日的决定,决定指出,学院仍然是高等技术学校改革中的先进学校,但学院的院长Я.Ф.卡甘-沙布沙伊却因不善于建立学院领导同党组织和学生组织的正常关系而受了警告。要求消除存在的冲突,实行一系列措施改善学生的物质状况,改善他们对理论课程的掌握,加强生产实习的效果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787号案卷,第187—192张)。

卡甘-沙布沙伊文章的准确标题是《改革之路——从7月到10月》(《工商报》,1929年10月6日)。

- 53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5号案卷;第165—166张。
- 532 在准备付印的决议里这个建议被考虑到了。
- 53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写了下面的话:“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0页)。
- 534 恩格斯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是以问答方式拟定的纲领。在回答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会产生什么结果的问题时,恩格斯特别写道:“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70—371页)。
- 535 全会关于卡冈诺维奇报告的决议草案及对草案提出的意见保存在全会记录材料里。签名同意这些修改意见的政治局委员有B. B. 古比雪夫、K. E. 伏罗希洛夫、M. П. 托姆斯基、A. И. 李可夫、M. И. 加里宁、B. M. 莫洛托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2号案卷,第13—22张)。
- 536 政治局于1929年11月5日通过了《关于收回地方工业资金的决定》。责成各级党委保证地方工业及时和全部上缴款项并指出,这些款项是完成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5号案卷,第9张)。
- 537 记录决定的1、3和4点所列举的问题,在政治局里进行了研究:11月30日——关于促进个体中农经济中畜牧业的发展;1929年11月19、25日,12月20日——关于印刷工业的纸张供应问题;1930年2月15日——关于成立“苏联电影”股份公司和生产自己的电影胶片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6号案

- 卷,第7、12张;767号案卷,第10张;769号案卷,第3张;776号案卷,第5、22、23张)。
- 538 政治局当天,即1929年11月17日通过了以下决定:
1. 决议不发表。
 2. 在全会新闻公报里加上下面一段:“此外,全会还研究了关于右倾分子集团(布哈林同志的集团)的问题。全会考虑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以及把布哈林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并鉴于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同志)至今不肯放弃自己的错误,决定把右倾的思想家布哈林同志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而对其余的右倾分子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有任何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和决议的企图,党将立即对他们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66号案卷,第10张)。
- 539 B. A. 科托夫、B. M. 米哈伊洛夫、H. A. 乌格拉诺夫、E. Ф. 库利科夫的声明发表在1929年11月18日的《真理报》上。
- 54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37号案卷,第14张。在政治局的记录里没有讨论关于卡明斯基报告决议最后方案的材料。在全会会议记录的材料里有一份决议草案,上面有全会参加者对草案提出的意见和补充(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2号案卷,第57—67张)。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有一份他加了批注的这个决议和他1929年11月20日给莫洛托夫的短简:“莫洛托夫同志! 决议不坏,虽然有些冗长,重复太多。此外:1)没有突出共青团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作用;2)缺少关于冒牌集体农庄和与之斗争的段落;3)没有预先说明必须与那些不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而更喜欢把余粮卖给私商的集体农庄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他的意见,见稿子。И. 斯大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68号案卷,第93—110、128张)。1929年11月21日决议发表在《真理报》上。
- 541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后来又改变了。根据政治局1930年3月10日的决定,代表大会定于6月15日开幕,而根据政治局6月20日的决定,挪到1930年6月26日开幕。代表大会于1930年6月26日至7月13日举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79号案卷,第9张;781号案卷,第9、13张;788号案卷,第2张)。
- 542 在全会的材料里有一份全会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决议编辑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26号案卷,第56—58张)。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报告的决议草案准备付印的时候,编辑委员会改变了许多数字指标。在草案的第1页上有鲁祖塔克的批注:“修改与全会所通过的一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22号案卷,第30—36张)。
- 543 引证的是列宁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

- 37卷,第264页)。
- 544 1930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把联共(布)中央现有的集体农庄培训班改组为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所属的培养大集体农庄联合公司领导人和集体农庄系统指导员的高等集体农庄学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851号案卷,第6张)。
- 545 在全会记录里没有关于联盟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这个决议保存在莫洛托夫的档案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史档案馆,82号全宗,2号目录,41号案卷,第103—106张)。
- 546 关于人名的破译,见注248。
- 547 指的是什么——不清楚。在讯问卡普林斯基的速记记录里谈到了给托洛茨基往阿拉木图派特快列车。
- 548 1929年12月31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加米涅夫确实同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佩列韦尔泽夫和卡普林斯基进行过谈话,“其结果就是那封给托洛茨基的关于加米涅夫同志准备与托洛茨基结盟的信”。宣布给加米涅夫同志警告处分并要求他“断绝为这种文件的出现提供借口的与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切联系”(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613号全宗,1号目录,20号案卷,第144张反面)。

人物简介*

- 阿布拉莫维奇, Р. А. (Абрамович Р. А., 1880—1963)——崩得领导人之一, 社会民主党人。自 1921 年起移居国外。
- 阿达莫维奇, И. А. (Адамович И. А., 1895—1937)——1918 年入党。1929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俄联邦和乌克兰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
- 阿尔乔莫夫, Л. Е. (Артемов Л. Е., 1898—1956)——1917 年入党。1929—1931 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 同时任无产阶级学生会中央局代表。
- 阿尔秋希娜, А. В. (Артюхина А. В., 1889—1969)——1910 年入党。1925—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 年任联共(布)中央工农妇女工作部部长^①, 同时任《女工》杂志编辑。
- 阿格拉诺夫, Я. С. (Агранов Я. С., 1893—1938)——1915 年入党。自 1923 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处副处长, 自 1929 年起任处长。
- 阿库洛夫, И. А. (Акулов И. А., 1888—1937)——1907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自 1927 年起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 1929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
- 阿列克谢耶夫, П. А. (Алексеев П. А., 1893—1939)——1914 年入党。1927—1930 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 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理事会主席。
- 阿列克辛斯基, Г. А. (Алексинский Г. А., 1879—1967)——俄国政治活动家, 社会民主党人。1905—1907 年参加过布尔什维克。自 1918 年起移居国外。
- 阿斯特罗夫, В. Н. (Астров В. Н., 1898—1995)——1917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编委, 1929—1931 年在伊凡诺沃-

* 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参加者大部分均死于恐怖年代。——编者注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 3, 4 卷均为 1925 年起任此职。——译者注

沃兹涅先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高等学校任教。

阿瓦涅索夫, В. А. (Аванесов В. А., 1884—1930)——1903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阿韦尔巴赫, Л. Л. (Авербах Л. Л., 1903—1939)——1919年入党。自1929年起任《在文学的岗位上》和《外国文学通讯》杂志编辑。

阿维洛夫, Б. В. (Авилов Б. В., 1874—1938)——社会民主党人, 记者, 统计学家。自1918年起停止政治活动。1928年前在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 自1929年起在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工作。

埃韦特, 阿图尔 (Эверт Артур, 1890—1959)——德国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埃赫, Р. И. (Эйхе Р. И., 1890—1940)——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9—1937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

埃利亚瓦, Ш. З. (Элиава Ш. З., 1883—1937)——1904年入党。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艾亨瓦尔德, А. Ю. (Айхенвальд А. Ю., 1904—1937)——1920年入党。1925—1928年先后为红色教授学院学员、《共产国际》杂志编委, 后在喀山担任教学工作。

安采洛维奇, Н. М. (Анцелович Н. М., 1888—1952)——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农林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安德列耶夫, А. А. (Андреев А. А., 1895—1971)——1914年入党。1922—1961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0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30年为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

安季波夫, Н. К. (Антипов Н. К., 1894—1938)——1912年入党。1924—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1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奥尔洛夫, К. Н. (Орлов К. Н., 1879—1943)——1904年入党。1922—1929年任军事工业管理总局局长、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工业建筑工程局局长。

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 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Серго] Г. К., 1886—

- 1937)——1903年入党。1921—1927年和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同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奥拉赫拉什维利, М. Д. (Орахелашвили М. Д., 1881—1937)——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奥什温采夫, М. К. (Ошвинцев М. К., 1889—194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乌拉尔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9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 К. В.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К. В., 1892—1969)——1914年入党。经济学家。1925—1929年任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副院长。
- 奥西莫夫, Н. М. (Осьмов Н. М., 1891—1962)——1907年入党。1924—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2年任下诺夫哥罗德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奥新斯基, В. В. (Осинский В. В., 1887—1938)——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1928—1929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巴达耶夫, А. Е. (Бадаев А. Е., 1883—1951)——1904年入党。1925—1951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年任彼得格勒统一消费合作社主席,后任列宁格勒消费合作社主席。
- 巴拉诺夫, П. И. (Баранов П. И., 1872—1933)——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24—1931年任工农红军空军司令。
- 巴扎罗夫, В. А. (Базаров В. А., 1874—1939)——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自1922年起任国家计委司长、《计划经济》杂志编辑,是社会主义(后改为共产主义)领导科学院奠基人之一,也是该科学院的正式院士。
- 鲍尔, Я. Я. (Бауэр Я. Я., 1885—1958)——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贸易检查主管。
- 鲍曼, К. Я. (Бауман К. Я.,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为

- 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自1928年11月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二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 贝京, Я. Б. (Быкин Я. Б., 1888—1938)——1912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
- 倍倍尔,奥古斯特(Бebelь Август, 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
- 比尔曼, С. П. (Бирман С. П., 1891—1937)——1918年入党。1927—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营南方冶金托拉斯管理局主席。
- 比特克尔, Г. С. (Биткер Г. С., 1895—1937)——1913年入党。1928—1929年先后任驻德国商务副代表,驻奥地利商务代表,设备、金属、原料、半成品和工具进口股份公司主席。
- 彼得罗夫斯基, Г. И. (Петровский Г. И., 1878—1958)——1897年入党。1921—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9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自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 彼得罗夫斯基, Д. А. (Петровский Д. А., 1886—1937)——1919年入党。自1929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学校管理总局局长。
- 彼得罗夫斯基, П. Г. (Петровский П. Г., 1899—1941)——1916年入党。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①、《列宁格勒真理报》责任编辑,1929年任《下伏尔加流域》杂志助理编辑。
- 彼得斯, Я. Х. (Петерс Я. Х., 1886—1938)——1904年入党。1923—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2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党组领导人。
- 别尔津, Ю. П. (Берзин Ю. П., 1891—?)——1912年入党。奥列霍沃-祖耶沃县委书记,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为工业学院学员。
- 别连基, З. М. (Беленький З. М., 1888—1940)——1905年入党。1927^②—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1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4卷为部长。——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2卷称1928年。——译者注

部务委员。

别连基, М. Н. (Беленький М. Н., 1890—1938)——1920年入党。1926—1928年任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副主席和全苏农业合作社联社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 1928—1930年任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主席。

别谢多夫斯基, Г. З. (Беседовский Г. З., 1896—1951?)——1917年入党。1927—1929年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处参赞。

别兹鲁基赫, П. Е. (Безруких П. Е.)——十月铁路管理局主席。

波德沃伊斯基, Н. И. (Подвойский Н. И., 1880—1948)——1901年入党。1924—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8—1929年在中央社会保险局工作。

波格丹诺夫, А. А. (Богданов А. А., 1837—1928)——哲学和经济学家, 社会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从事科学工作。

波格丹诺夫, И. А. (Богданов И. А., 1891—1966)——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后任哈萨克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波格丹诺夫, П. А. (Богданов П. А., 1882—1938)——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波格丹诺夫, П. Б. (Богданов П. Б., 1882—?)——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9年在波罗的海造船厂工作。

波克罗夫斯基,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1868—1932)——1905年入党。历史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 共产主义科学院院长, 红色教授学院院长, 历史学杂志编辑。1929年任苏联副教育人民委员。

波隆斯基, В. И. (Полонский В. И., 1893—1937)——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委书记, 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波斯特舍夫, П. П. (Постышев П. П., 1887—1939)——1904年入党。1927—1938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兼任哈尔科夫专区委员会书记和市委书记。

伯恩斯坦, 爱德华(Бернштейн Эдуард,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 博古斯拉夫斯基, М. С.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М. С., 1886—1937)——1917年入党。1924—1926年任俄联邦共和国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因属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而被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
- 博罗金, П. И. (Бородин П. И.)——苏联工程师。
- 布勃诺夫, А. С. (Бубнов А. С., 1884—1938)——1903年入党。1924—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星报》责任编辑,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 布哈林, Н. И. (Бухарин Н. И., 1888—1938)——1906年入党。191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18—1929年任《真理报》责任编辑,1924—1929年兼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1929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1919—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 布兰德勒,亨利希(Брандлер Генрих, 1881—1967)——德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 布留哈诺夫, Н. П. (Брюханов Н. П., 1878—1938)——1902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 布鲁诺, Г. И. (Бруно Г. И., 1889—1945)——1906年入党。1929年8月之前任步枪和机关枪托拉斯主席。
- 蔡特林, Е. В. (Цетлин Е. В., 1898—1937)——1918年入党。1926—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成员。
- 蔡特林, Л. М. (Цейтлин Л. М., 1881—1952)——1941年入党。小提琴家,教育家,第一个无指挥交响乐团的组织者。
- 邓尼金, А. И. (Деникин А. И., 1872—1947)——沙皇军队的将军,俄罗斯“白色运动”的首领之一。自1920年4月起移居国外。
- 多岑科, И. С. (Доценко И. С., 1888—1950?)——1920年入党。1928—1930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南方机器制造托拉斯管理局主席。
- 多夫加列夫斯基, В. С. (Довгалеvский В. С., 1885—1934)——1908年入党。1927—1934年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

- 多加多夫, А. И. (Догадов А. И., 1888—1937)——1905 年入党。1924—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和书记。
- 菲加特纳, Ю. П. (Фигатнер Ю. П., 1889—1937)——1903 年入党。1925^①—1934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② 年任苏联商业企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菲勒, С. И. (Филлер С. И., 1882—1954)——1910 年入党。1924—1934 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党纪事件委员会委员。
- 弗拉基米尔斯基, М. Ф.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М. Ф., 1874—1951)——1895 年入党。自 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9 年任全苏农业合作社理事会主席。
- 弗鲁姆金, М. И. (Фрумкин М. И., 1878—1938)——1898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副财政人民委员;1929—1930 年任全苏鱼品工业联合公司托拉斯主席。
- 伏罗希洛夫, 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 1881—1969)——1903 年入党。自 1921 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60 年为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1934 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 福特, 亨利 (Форд Генри, 1863—1947)——美国工业家,美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
- 盖斯特, А. И. (Гайстер А. И., 1899—1937)——1919 年入党。经济学家。1926—1930 年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 戈尔布诺夫, Н. П. (Горбунов Н. П., 1892—1938)——1917 年入党。苏联科学院院士(1935)。1928—1932 年任化学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主席,农业科学院组织者之一。
- 戈尔茨曼, А. З. (Гольцман А. З., 1894—1933)——1917 年入党。1927—1933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戈尔德贝格, И. П. (Гольденберг И. П., 1873—1922)——社会民主党人,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2 卷为 1924 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 1,2 卷为 1928 年。——译者注

- 1920年入党。1917年是《新生活报》立场的支持者。
- 戈尔恰耶夫, М. Д. (Горчаев М. Д., 1886—1960)——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克里米亚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戈连多, М. С. (Голендо М. С., 1894—1936)——1916年入党。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农业局副局长。
- 戈洛谢金, Ф. И. (Голощекин Ф. И., 1876—1941)——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边疆区委书记。
- 格里涅韦茨基, В. И. (Гриневецкий В. И., 1871—1919)——俄国工程师和学者,热工学方面的著名专家。
- 格里亚金斯基, Ф. П. (Грядинский Ф. П., 1893—1938)——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格林科, Г. Ф. (Гринько Г. Ф., 1890—1938)——1919年入党。自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团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
- 格鲁泽里, В. П. (Грузель В. П., 1884—1937?)——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巡视员。
- 格罗斯曼, В. Я. (Гроссман В. Я., 1895—197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财政检查局局长。
- 格佐夫, С. А. (Гецов С. А., 1883—1937)——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顿涅茨克国营生产和销售煤炭和无烟煤的煤炭托拉斯驻莫斯科代表处工作人员、该托拉斯管委会委员。
- 贡恰罗夫, Н. К. (Гончаров Н. К., 1886—1970)——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行政财务管理局局长、局务委员。
- 古比雪夫, В. В. (Куйбышев В. В., 1888—1935)——1904年入党。1927—1935年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古布金, И. М. (Губкин И. М., 1871—1939)——地质学家,苏联石油地质学

- 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自1920年起任莫斯科矿业学院院长。
- 古列维奇, А. И. (Гуревич А. И., 1896—1937?)——1916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党组领导人。
- 古谢夫, С. И. (Гусев С. И., 1874—1933)——1896年入党。1923—1933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自192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哈塔耶维奇, М. М. (Хатаевич М. М.,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7年为中央委员。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伏尔加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韩德逊,阿瑟(Гендерсон Артур, 1863—1935)——英国政治活动家。1929—1931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 洪别尔-德罗,茹尔(Эмбер-Дро Жюль, 1891—1971)——自1921年起为瑞士共产党党员。1921—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 基尔基日, К. О. (Киркиж К. О., 1888—1932)——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先后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苏联商业企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基洛夫, С. М. (Киров С. М., 1886—1934)——1904年入党。自1926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自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4年任列宁格勒省委和市委及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 基谢廖夫, А. С. (Киселев А. С., 1879—1937)——1898年入党。1925—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吉别尔, Б. В. (Гибер Б. В., 1897—?)——1918年入党。1929年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书记。
- 吉洪诺夫, А. Н. (Тихонов А. Н., 1880—1956)——俄国作家。自1917年起主持《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
- 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 Г. Е. (Зиновьев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й] Г. Е., 1883—1936)——1901年入党。1912—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10月、1921—1926年为政治局委员。1919—192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派首领之一。1927年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28—1930年任喀山大学校长。

- 加夫里洛夫, И. А. (Гаврилов И. А., 1885—1937)——1908年入党。1929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
- 加里宁, М. И. (Калинин М. И., 1875—1946)——1898年入党。1926—1946年为政治局委员。1919—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自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加列耶夫, Г. Г. (Галеев Г. Г., 1894—1938)——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鞑靼州监察委员会主席并任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加马尔尼克, Я. Б. (Гамарник Я. Б., 1894—1937)——1916年入党。1927—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7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 加米涅夫, Л. Б. (Каменев Л. Б., 1883—1936)——1901年入党。1919—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10月前,以及1919—1925年为政治局委员。反对派领导者之一。1927年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27—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29—1932年任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 加斯捷夫, А. К. (Гастев А. К., 1882—1941)——1931年入党。自1921年^①起任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
- 杰斯尼茨基, В. А. (Десницкий В. А., 1878—1958)——社会民主党人。自1919年起在列宁格勒从事科学和教学工作。
- 杰索夫, Г. А. (Десов Г. А., 1884—1937?)——1902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 捷尔任斯基, Ф. Э.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Э., 1877—1926)——1895年入党。1922—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同时自1924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卡巴科夫, И. Д. (Кабаков И. Д., 1891—1937)——1914年入党。1925—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
- 卡尔马诺维奇, М. И. (Калманович М. И., 1888—1937)——1917年入党。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3卷为1920年。——译者注

- 1927—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理事会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农业副人民委员。
- 卡尔宁, А. Я. (Калнин А. Я., 1889—?)——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 卡冈诺维奇, 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Л. М., 1893—1991)——1911年入党。1924—195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年4月—1928年7月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1928—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书记。
- 卡冈诺维奇, М. М. (Каганович М. М., 1888—1941)——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同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卡拉什尼科夫, В. С. (Калашников В. С., 1890—1970)——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9年为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
- 卡拉什尼科夫, М. И. (Калашников М. И., 1894—?)——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交通和通讯检查局副局长。
- 卡拉瓦耶夫, П. Н. (Караваяев П. Н., 1894—1952)——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9^①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部巡视员。
- 卡雷金娜, А. С. (Калыгина А. С., 1895—1937)——1915年入党。自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工农妇女工作部副部长。
- 卡缅斯基, А. З. (Каменский А. З., 1885—1937)——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工业学院院长。
- 卡明斯基, Г. Н. (Каминский Г. Н., 1895—1938)——1913年入党。1925—1937^②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8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第1,2,3,4卷为1938年。——译者注

- 康德拉季耶夫, Т. К. (Кондратьев Т. К.,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检察长。
- 考茨基, 卡尔(Каутский Карл,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
- 柯秀尔, И. В. (Косиор И. В., 1893—1937)——1908年入党。1927—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7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柯秀尔, С. В. (Косиор С. В., 1889—1939)——1907年入党。自192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7—1930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8年为联共(布)中央书记, 1928—193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
- 科达茨基, И. Ф. (Кодацкий И. Ф., 1893—1937)——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 科科维欣, М. Н. (Коковихин М. Н., 1883—1965)——1903年入党。1924—1934年^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中央清洗苏维埃机构委员会主席。
- 科罗斯捷列夫, Г.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Г. А., 1885—1932)——1905年入党。1924—1932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科洛季洛夫, Н. Н. (Колотилов Н. Н., 1885—1937)——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省委书记。
- 科马罗夫, Н. П. (索比诺夫, Ф. Е.) (Комаров Н. П. [Собинов Ф. Е.], 1886—1937)——1909年入党。1921年、1923—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市和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 科米萨罗夫, С. И. (Комиссаров С. И., 1890—1965)——1914年入党。1923—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自1927年起任全苏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科皮耶夫, А. К. (Копьев А. К., 1890—?)——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3—1930年。——译者注

联合申诉局副局长。

科萨列夫, А. В. (Косарев А. В., 1903—1939)——1919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 年为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自 1929 年 3 月起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科托夫, В. А. (Котов В. А., 1895—1937)——1915 年入党。1925—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 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自 1929 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部门负责人。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 М., 1872—1959)——1893 年入党。1924—1939 年为中央委员。1925—1930 年任苏联国家计委主任;1929—1930 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克拉瓦利, И. А. (Краваль И. А., 1897—1937^①)——1919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经济局局长;1928—1930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 年任莫斯科工业经济学院工业和劳动系主任。

克拉辛, Л. Б. (Красин Л. Б., 1870—1926)——1890 年入党。1924—1926 年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而后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克雷连柯, Н. В. (Крыленко Н. В., 1885—1938)——1904 年入党。1927—1934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1 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

克里尼茨基, А. И. (Криницкий А. И., 1894—1937)——1915 年入党。1924—1934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②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和出版部部长。

克里沃夫, Т. С. (Кривов Т. С., 1886—1966)——1905 年入党。1924—1934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3 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克利缅科, И. Е. (Клименко И. Е., 1891—1937)——1912 年入党。1925—1934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各中心机器拖拉机站联合管理部主席。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2、3 卷为 1897—1938 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 1、2、3 卷为 1926—1928 年。——译者注

- 克鲁普斯卡娅, Н. К. (Крупская Н. К., 1869—1939)——1898年入党。自1924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0年起领导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自1929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 克伦斯基, А. Ф. (Керенский А. Ф., 1881—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1917年曾任临时政府首脑。自1918年起移居国外。
- 克诺林, В. Г. (Кнорин В. Г., 1890—1938)——1910年入党。1927—1937年为中央委员。1927—1928年为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 克桑德罗夫, В. Н. (Ксандров В. Н., 1877—1942)——1904年入党。1928—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克维林, Э. И. (Квириг Э. И., 1888—1937)——1912年入党。1923—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 库比亚克, Н. А. (Кубяк Н. А., 1881—1937)——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1年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 库尔斯基, Д. И. (Курский Д. И., 1874—1932)——1904年入党。1927—1932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
- 库利科夫, Е. Ф. (Куликов Е. Ф., 1891—1937?)——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责任书记,1929—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
- 拉狄克, К. Б. (Радек К. Б., 1885—1939)——1903年入党。1925—1927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因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关系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到托木斯克,1929年恢复党籍后在《消息报》工作。
- 拉杜斯-津科维奇, В. А. (Радус - Зенькович В. А., 1877—1967)——1898年入党。1926—1930年^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陆海军督察局副局长。
- 拉科夫斯基, Х. Г. (Раковский Х. Г., 1873—1941)——1917年入党。1923—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3—1930年,第2卷为1925—1929年,第3、4、5卷为1926—1930年。——译者注

1928年^①先后任苏联驻英国和法国全权代表,同时任外交副人民委员。因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关系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自1928年起先后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和巴尔瑙尔。

拉林, В. Ф. (Ларин В. Ф., 1895—1937)——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赖因霍尔德, И. И. (Рейнгольд И. И., 1887—1936)——1917年入党。1929年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自1929年11月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棉花总委员会主席。

雷切夫, И. А. (Лычев И. А., 1882—1972)——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苏联驻英国总领事。

李可夫, А. И. (Рыков А. И., 1881—1938)——1899年^②入党。1922—1930年为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至1929年)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于1926—1930年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里亚比宁, Е. И. (Рябинин Е. И., 1892—? ^③)——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黑土区州委的一个部长。

里亚博夫, А. Н. (Рябов А. Н., 1888—1939)——1906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12月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书记。

利西岑, Н. В. (Лисицын Н. В., 1891—1939)——1910年入党。1923—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全苏农业合作社联社中央理事会副主席。

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 М. Н. (Лядов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Н., 1872—1947)——1893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委员;1923—1928^④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3卷为1923—1927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2卷为1898年。——译者注

③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892—1941年。——译者注

④ 原文如此。本书第1、3、4卷为1929年。——译者注

- 利亚克苏特金, Ф. Ф. (Лякуткин Ф. Ф., 1896—?)——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梁赞诺夫, Д. Б. (Рязанов Д. Б., 1870—1938)——1917年入党。自1921年起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
- 列昂诺夫, Ф. Г. (Леонов Ф. Г., 1892—1938)——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 列别德, Д. З. (Лебедь Д. З., 1893—1937)——1909年入党。1926—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1930年兼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列别杰夫, С. В. (Лебедев С. В., 1874—1934)——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2年)。1928—1930年主持合成橡胶实验室工作。
- 列帕, А. К. (Лепя А. К., 1896—1938)——1914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下诺夫哥罗德州委书记。
- 列普谢, И. И. (Лепсе И. И., 1889—1929)——1904年入党。自192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5年起任冶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及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 留京, М. Н. (Рютин М. Н., 1890—1937)——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8—1930年任《红星报》副主编。
- 柳比莫夫, И. Е. (Любимов И. Е., 1882—1937)——1902年入党。1927—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联社中央理事会主席。
- 鲁缅采夫, К. А. (Румянцев К. А., 1891—1932)——1916年入党。1925—1932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7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副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自1929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营乌拉尔石油工业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
- 鲁希莫维奇, М. Л. (Рухимович М. Л., 1889—1938)——1913年入党。1924—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鲁祖塔克, Я. Э. (Рудзук Я. Э., 1887—1938)——1905 年入党。1926—1932 年为政治局委员。1924—1930 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同时在 1926—1937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伦金, К. В. (Рындин К. В., 1893—1938)——1915 年入党。1924—1930 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
- 罗济特, Д. П. (Розит Д. П., 1895—1937)——^①1917 年入党。1924—1930^①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罗日科夫, Н. А. (Рожков Н. А., 1867—1927)——历史学家,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
- 罗森霍尔茨, 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 А. П., 1889—1938)——1905 年入党。1927—1934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人民委员。
- 罗伊津曼, Б. А. (Ройзенман Б. А., 1878—1938)——1902 年入党。1924—1934^②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执行局监督和检查处处长。
- 罗兹米罗维奇, Е. Ф. (Розмирович Е. Ф., 1886—1953)——1904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1930 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操纵技术研究所所长。
- 洛博夫, С. С. (Лобов С. С., 1888—1937)——1913 年入党。1924—1937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 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洛夫斯顿,杰伊(Ловстон Джей, 1898—1974)——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 洛卡茨科夫, Ф. И. (Локацков Ф. И., 1881—1937)——1904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黑色冶金管理总局局长。
- 洛米纳泽, В. В. (Ломинадзе В. В., 1897—1935)——1917 年入党。1925—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 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4 卷为 1927 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 2,4 卷为 1932 年。——译者注

- 洛莫夫(奥波科夫), Г. И. (Ломов [Опкоков] Г. И., 1888—1938)——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洛佐夫斯基, А. (德里佐, С. А.) (Лозовский А. [Дридзо С. А.], 1878—1952)——1901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 马丁诺维奇, К. Ф. (Мартинович К. Ф., 1894—?)——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海军检查处副处长。
- 马尔采夫, Н. В. (Мальцев Н. В., 1891—?)——1908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8—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务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党组领导人。
- 马尔科夫, А. Т. (Марков А. Т., 1877—?)——1898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马尔托夫, Ю. О. (Мартов Ю. О., 1873—1923)——孟什维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 1920年出国, 在柏林出版《社会主义通讯》。
- 马哈拉泽, Ф. И. (Махарадзе Ф. И., 1868—1941)——1891年^①入党。1925—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 马卡尔, А. М. (Макар А. М., 1877—1961)——1899年入党。1927—1930年任苏联驻墨西哥全权代表。
- 马列茨基, Д. П. (Марецкий Д. П., 1901—1937)——1919年入党。1928年之前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工作, 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经济室主任。
- 马纳延科, И. П. (Манаенко И. П., 1896—1938)——1920年入党。1920—1930年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捷尔任斯基钢铁厂厂长。
- 马约罗夫, М. М. (Майоров М. М., 1890—1938)——1906年入党。1927—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898年。——译者注

- 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 曼德尔施塔姆, Н. Н.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Н., 1879—1929) ——1902年入党。1926—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长。
- 曼努伊尔斯基, 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 Д. З., 1883—1959) ——1903年入党。自1923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4年7月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 曼扎拉, Д. И. (Манжара Д. И., 1885—?) ——1917年入党。1924—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亚全权代表、乌兹别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梅德韦杰夫, А. В. (Медведев А. В., 1884—1937) ——1904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 梅赫利斯, Л. З. (Мехлис Л. З., 1889—1953) ——1918年入党。1926—1929年为红色教授学院学员。
- 梅日劳克, В. И. (Межлаук В. И., 1893—1938)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1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梅耶尔霍尔德, В. Э. (Мейерхольд В. Э., 1874—1940) ——1918年入党。导演、演员。
- 美尔尼昌斯基, Г. Н.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 Г. Н., 1886—1937) ——1902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米尔佐扬, Л. И. (Мирзоян Л. И., 1897—1939) ——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书记。
- 米高扬, А. И. (Микоян А. И., 1895—1978) ——1915年入党。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米哈伊洛夫, В. М. (Михайлов В. М., 1894—1937) ——1915年入党。1923—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工程副主任。
- 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 М. С. (Михайлов - Иванов М. С., 1894—1931) ——

1913年入党。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列宁格勒机器制造托拉斯总经理。

米留可夫, П. Н. (Милюков П. Н., 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 历史学家, 政论家。

米柳亭, В. П. (Милютин В. П., 1884—1937)——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8—1930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 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米特罗法诺夫, А. Х. (Митрофанов А. Х., 1870^①—1941)——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建问题研究小组组长。

莫罗兹, Г. С. (Мороз Г. С., 1893—1940)——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 1929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 В. М. (Молотов [Скрябин] В. М., 1890—1986)——1906年入党。1926—1957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1—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书记, 1928—1929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莫斯克温, И. М. (Москвин И. М., 1890—1937)——1911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

莫斯托文科, П. Н. (Мостовенко П. Н., 1881—1938)——1901年入党。1927—1930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

穆萨别科夫, Г. М. (Мусабеков Г. М., 1888—1938)——1918年入党。1925—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1931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纳扎列强, А. М. (Назаретян А. М., 1889—1937)——1905年入党。1924—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6—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29年为外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纳扎罗夫, С. И. (Назаров С. И., 1879—?^②)——1903年入党。1927—1934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4卷为1879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卒年为1944年。——译者注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尼古拉耶娃, К. И. (Николаева К. И., 1893—1944)——1909年入党。

1925—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宣传鼓动部长。

尼科诺罗夫, А. Ф. (Никоноров А. Ф., 1887—?)——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组织指导局局长。

诺索夫, И. П. (Носов И. П., 1888—1937)——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委书记。

诺沃肖洛夫, С. А. (Новоселов С. А., 1882—1953)——1905年入党。1923—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工业劳动检查院领导人。

欧文, 罗伯特(Оуэн Роберт,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帕夫卢诺夫斯基, И. П. (Павлуновский И. П., 1888—1940)——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海军检查院院长。

帕利琴斯基, П. И. (Пальчинский П. И., 1875—1929)——工程师。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1928年4月被捕,1929年5月被枪决。

帕斯图霍夫, М. Д. (Пастухов М. Д.)——1908年入党。1927^①—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佩列卡托夫, И. Г. (Перекатов И. Г., 1894—?)——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组长。

皮达可夫, Ю. Л. (Пятаков Ю. Л., 1890—1937)——1910年入党。1927年因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关系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自1928年起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29年任行长。

皮亚特尼茨基, О. А. (Пятницкий О. А., 1882—1938)——1898年入党。1927—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4卷为1924年。——译者注

- 皮亚特尼茨基, И. А. (Пятницкий И. А., 1882—1939)——自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成员。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Е. А.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 А.,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4—1927年任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7年因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关系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后在苏联国家计委系统工作。
- 普列汉诺夫,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Г. В., 1856—1918)——俄罗斯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 齐夫里诺维奇, В. Е. (Цифринович В. Е., 1897—1938)——1917年入党。1928—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分配部副部长、莫斯科市鲍曼区委书记,自1929年10月起任全苏钾盐工业托拉斯经理。
- 齐洪, А. М. (Цихон А. М., 1887—1939)——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书记,1928—1930年和自1933年起任建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奇尔布姆, 卡尔 (Чильбум Карл, 1885—1961)——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记者。1921、1924—1929年任瑞典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 契切林, Г. В. (Чичерин Г. В., 1872—1939)——1918年入党。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30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 恰普林, Н. П. (Чаплин Н. П., 1902—1938)——1919年入党。1924—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28—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培训班学员。
- 恰亚诺夫, А. В. (Чаянов А. В., 1888—1937)——俄国和苏联农业经济学家。1922—1930年任农业经济和政策科学研究所所长。
- 丘巴尔, В. Я. (Чубарь В. Я.,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 丘茨卡耶夫, С. Е. (Чуцкаев С. Е., 1876—1946)——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远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主席。
- 丘多夫, М. С. (Чудов М. С.,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5—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二

书记。

丘维林, М. Е. (Чувьрин М. Е., 1883—1947)——1903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 1923 年^①起任联共(布)卢甘斯克区委书记。

日丹诺夫, А. А. (Жданов А. А., 1896—1948)——1915 年入党。1925—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

茹柯夫, И. П. (Жуков И. П., 1889—1937)——1909 年入党。1925—1937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 年任莫斯科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总经理。

萨普罗诺夫, Т. В. (Сапронов Т. В., 1887—1939)——1912 年入党。自 1925 年起任中央租让委员会委员。1927 年被开除出党。

瑟尔佐夫, С. И. (Сырцов С. И., 1893—1937)——1913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9—1930 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9 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 1929—1930 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沙茨金, Л. А. (Шацкий Л. А., 1902—1937)——1917 年入党。1927—1934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6—1928 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舍博尔达耶夫, Б. П. (Шеболдаев Б. П., 1895—1937)——1914 年入党。1927—1930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自 1928 年起任联共(布)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

施利希特尔, А. Г. (Шлихтер А. Г., 1868—1940)——1891 年入党。1925—1937 年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自 1927 年起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

施米特, В. В. (Шмидт В. В., 1886—1938)——1905 年入党。1925—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0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施瓦茨, И. И. (Шварц И. И., 1879—1951)——1899 年入党。1924—1934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0 年任苏联煤炭工业职工工会中央委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 1 卷为 1927 年。——译者注

员会主席。

施韦泽, В. Л. (Швейцер В. Л., 1887—1950)——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党组领导人^①。

施韦泽, 约翰·巴布季斯特·(Швейцер Иоганн Баптист, 1833—1875)——德国社会活动家和作家。

什基里亚托夫, М. Ф. (Шкирятов М. Ф., 1883—1954)——1906年入党。1922—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和组织指导处处长。

什维尔尼克, Н. М. (Шверник Н. М., 1888—1970)——1905年入党。1925—197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年任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舒什科夫, П. С. (Шушков П. С., 188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斯捷茨基, А. И. (Стецкий А. И., 1896—1938)——1915年入党。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和列宁格勒省委宣传鼓动部长。

斯捷潘诺夫, С. И. (Степанов С. И., 1876—1935)——1895年入党。1925—1934年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30年任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斯克雷普尼克, Н. А. (Скрышник Н. А., 1872—1933)——1897年入党。自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2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自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И. И.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И. И., 1870—1928)——1896^②年入党。自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自1927年起任《真理报》助理编辑。

斯列普科夫, А. Н. (Слепков А. Н., 1899—1937)——1919年入党。1926—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长、《真理报》编辑之一和《布尔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04年入党。——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04年入党。——译者注

什维克》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联共(布)中伏尔加边疆区委宣传鼓动部长和萨拉托夫市高等学校教师。

斯米多维奇, П. Г. (Смидович П. Г., 1874—1935)——1898年入党。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斯米多维奇, С. Н. (Смидович С. Н., 1872—1934)——1898年入党。1924—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斯米尔加, И. Т. (Смилга И. Т.,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6年任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院长。因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关系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自1928年起被流放。

斯米尔诺夫, А. П. (Смирнов А. П., 1878—1938)——1896年入党。1922—1933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年先后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同时任农民国际总书记。192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联共(布)中央书记。

斯米尔诺夫, И. Н. (Смирнов И. Н., 1881—1936)——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因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有关系被联共(布)十五大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

斯莫罗金, И. Т. (Сморозин И. Т., 1885—1961)——1917年入党。1925—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远东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斯特里耶夫斯基, К. К. (Стриевский К. К., 1885—1937^①)——1902年入党。1929年任莫斯科州工会理事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斯特列利佐夫, Г. М. (Стрельцов Г. М., 1901—?)——1918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9年为红色教授学院学员。

斯特罗加诺夫, В. А. (Строганов В. А., 1888—1941)——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斯大林诺区委书记。

斯腾, Я. Э. (Стэн Я. Э., 1899—1938)——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斯图季托夫, П. И. (Студитов П. И., 1888—1969)——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伏尔加州监察委员会主席。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2卷为1938年。——译者注

- 斯托雷平, П. А. (Столъпин П. А., 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
- 苏哈诺夫, Н. Н. (Суханов Н. Н., 1882—1940)——农业经济学家,政论家。
- 苏霍姆林, К. В. (Сухомлин К.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苏利莫夫, Д. Е. (Сулимов Д. Е., 1890—1937)——1905年入党。1923—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第一副交通人民委员。
- 索博列夫, С. М. (Соболев С. М., 1900—1939)——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为马克思主义培训班学员。
- 索尔茨, А. А. (Сольц А. А., 1872—1945)——1898年入党。1920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主席。
- 索柯里尼柯夫,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Я., 1888—1939)——1905年入党。1922—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总经理,1929—1932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 特里利谢尔, М. А. (Триллиссер М. А., 1883—1940)——1901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局局长、总局副局长。
- 图哈切夫斯基, М. 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 Н., 1893—1937)——1918年入党。1928—193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 托夫斯图哈, И. П. (Товстуха И. П., 1889—1935)——1913年入党。1926—1930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任斯大林的助理。
- 托洛茨基, Л. Д. (Троцкий Л. Д., 1879—1940)——1917年入党。1917—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6年为政治局委员。联共(布)党内左倾反对派的首领和思想家。1928年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驱逐出苏联。
- 托洛孔采夫, А. Ф. (Толоконцев А. Ф., 1889—1937)——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工业总局局长。
- 托姆斯基, М. П. (Томский М. П., 1880—1936)——1904年入党。1919—

- 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0年为政治局委员。1922—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 瓦列伊基斯, И. М. (Варейкис И. М., 1894—1938)——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黑土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 瓦维洛夫, Н. И. (Вавилов Н. И., 1887—1943)——遗传学家,植物栽培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苏联生物和农业科学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 瓦西里耶夫, С. В. (Васильев С. В. 189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 维克曼, П. М. (Викман П. М., 1890—?)——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俄联邦共和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小组组长。
- 维克斯宁, С. О. (Виксин С. О., 1887—1968)——1912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下伏尔加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 维什尼亚科娃, П. И. (Вишнякова П. И., 1887—1967)——1903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责任书记,自1928年起在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
- 维辛斯基, 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 1883—1954)——1920年入党。1925—1928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1931年任俄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温伯格, Г. Д. (Вейнберг Г. Д., 1891—1946)——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食品工人工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 温什里希特, И. С. (Уншлихт И. С., 1879—1938)——1900年入党。1925—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
- 沃罗比约夫, В. И. (Воробьев В. И., 1906—1982)——1922年入党。1927—1930年为工业学院学员。

- 沃伊京斯基, В. С. (Войтинский В. С., 1885—1960)——经济学和统计学家, 社会民主党人。自1921年起移居国外。
- 乌格拉诺夫, Н. А. (Угланов Н. А., 1886—1937)——1907年入党。1923—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29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 1924—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
- 乌汉诺夫, К. В. (Уханов К. В.,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3—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自1929年起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 乌加洛夫, Ф. Я. (Угаров Ф. Я., 1885—1932)——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联合会主席。
- 乌雷瓦耶夫, М. Е. (Урываев М. Е., 1887—?)——1917年入党。1925—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任军事工业总局局长。
- 乌里扬诺娃, М. И. (Ульянова М. И., 1878—1937)——1898年入党。自1925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17—1929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和责任秘书。
- 乌斯特里亚洛夫, Н. В. (Устрялов Н. В., 1890—1938)——俄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920—1935年侨居国外。
- 希法亭, 鲁道夫 (Гильфердинг Рудольф, 1877—1941)——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
- 谢尔加宁, М. М. (Серганин М. М., 1889—?)——1912年入党。1927—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自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市联共(布)彼得格勒区委书记。
- 谢拉 (Сера, 1892—1960)——意大利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 谢列布罗夫斯基, А. П.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А. П., 1884—1938)——1903年入党。自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6年起任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金管理总局局长,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谢苗诺夫, Б. А. (Семенов Б. А., 1890—1940)——1907年入党。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 辛克莱, 埃普顿 (Синклер Эптон, 1878—1968)——美国作家。

- 欣楚克, Л. М. (Хинчук Л. М., 1868—1939^①)——1920年入党。自1927年7月起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雅科夫列夫, А. И. (Яковлев А. И., 1900—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雅科夫列夫, Я. А. (Яковлев Я. А., 1896—1938)——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同时任《贫农报》(1924—1928)和《农民报》(1923—1929)编辑。1929—1934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 雅罗斯拉夫斯基, Е. М.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М., 1878—1943)——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亚戈达, Г. Г. (Ягода Г. Г., 1891—1938)——1907年入党。1924—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
- 亚格洛姆, Я. К. (Яглом Я. К., 1897—1939)——1918年入党。1925—1929年任邮电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劳动报》编辑。
- 扬松, Н. М. (Янсон Н. М., 1882—1938)——1905年入党。自1923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8—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
- 叶夫列莫夫, С. А. (Ефремов С. А., 1876—1939)——乌克兰政治活动家,文艺学家。1922—1928年为全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1924—1928年任该科学院管理局主席。
- 叶戈罗夫, Я. Г. (Егоров Я. Г., 1892—195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巡视员。
- 叶努基泽,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А. С., 1877—1937)——1898年入党。1924—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
- 叶若夫, Н. И. (Ежов Н. И., 1895—1940)——1917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副部长,自1929年12月起任苏联农业副人民委员。
- 伊格纳季耶夫, А. А. (Игнатъев А. А., 1877—1954)——将军,俄国军事外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2卷卒年为1944年。——译者注

交家。

伊克拉莫夫, А. И. (Икрамов А. И., 1898—1938)——1918年入党。1925—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5年3月起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9—1937年为第一书记,同时任联共(布)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伊利英, Н. И. (Ильин Н. И., 1884—1957)——1910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伊列克, 博古米尔 (Илек Богумил, 1892—196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自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其主席团委员。

伊万诺夫, В. И. (Иванов В. И., 1893—1938)——1915年入党。1925—1934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尤尔岑, М. И. (Юрцен М. И., 1880—?)——1903年入党。1926^①—1930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苏维埃建设检查局副局长。

尤列维奇, Э. И. (Юревич Э. И., 1888—1958^②)——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州委书记。

约费, А. Ф. (Иоффе А. Ф., 1880—1960)——物理学家。1920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26—192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苏联科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

赞格维尔, З. Г. (Зангвиль З. Г., 1895—1981)——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30年在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财务检查局工作。

泽连斯基, И. А. (Зеленский И. А., 1890—1938)——1906年入党。1922—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

泽姆利亚奇卡, Р. С. (Землячка Р. С., 1876—1947)——1896年入党。自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5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第1卷为1888—1937。——译者注

1924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1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巡视员、部务委员。

扎东斯基，В. П. (Затонский В. П., 1888—193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193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